



中国国际中文期刊卓越行动计划 建设期刊
国际中文学术期刊数据库ICAJD 收录期刊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刊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Humanities

Social Sciences



香港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
HONG KONG RESEARCH INSTITUT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WISVORA



ISSN 3079-4552
eISSN 3079-4560

1卷2期
2025年3月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刊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主办 香港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院
Hong Kong Research Institut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编辑出版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刊》编辑部
编辑部邮箱 xk@wisvora.com
投稿地址 www.wisvora.com



中国国际中文期刊卓越行动计划 建设期刊
国际中文学术期刊数据库ICAJD 收录期刊

总编辑 陈科存

副总部编辑 梅见华 孙文杰

编辑委员会

李兆祺	林鑫	苏天	穆艾伟
熊森浩	刘伟伟	吕憬岩	黄少安
刘宇	叶明裕	陈曦	景瑞宾
崔健	王正威	李泽宇	姚金芳
李明蔚	吴钰双	穆尚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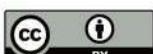
青年编委

舒波 田蕾娅

版权声明

文章版权由文章作者与维思沃尔出版社(WISVORA Publishing)所有。单篇文章由 WISVORA Publishing 正式出版, 所刊载文章均依照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进行许可。根据该许可协议, 任何第三方在明确署名原作者与出处的前提下, 均可对本刊内容进行复制、传播、演绎使用, 无需作者及出版社另行个别授权。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刊》© 已获得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4.0 International许可



香港人文社会科学院
HONG KONG RESEARCH INSTITUT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香港人文社会科学院专注于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研究与交流, 旨在为学者提供研究支持, 并促进知识的共享与应用。研究院通过出版学术期刊、举办学术会议及提供政策建议, 推动学术界与社会各界的对话与合作。

网址: www.hks.ac.cn 邮箱: info@hks.ac.cn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印刷出版 ISSN 3079-4579

电子出版 ISSN 3078-4387

出版社 WISVORA Publishing

维思沃尔出版社

地址 香港新蒲岗景福街99号启德工
业大厦8楼D07

wisvora-publishing@wisvora.com

www.wisvora.com

中国大陆引进
北京中科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

发行
广东国图出版管理有限公司



WISVORA
Publishing



微信扫一扫

维思沃尔出版

目 录 TABLE OF CONTENTS

- 大观念视角下的高中英语教学跨学科能力培养的教学设计 - 侯俊 1-4
- 项目驱动和社交媒体评价相结合的高校摄影教学改革实践研究 - 李润杰, 郑昕渝 5-10
- 《小夫人金钱赠年少》中的“志诚”观及其与《金瓶梅》的互文性 - 孟祥泽, 赵千慧 11-15
- 大型国际会展对城市发展的影响--以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杭州)为例 - 周璜, 李依睿, 全文彬, 潘逸航, 陈佳乐 16-23
- 电影《宠儿》象征主义分析 - 何明瑞, 冉吟啸 24-29
- 跨文化共情传播视角下大型体育赛事国际传播路径研究--以2025年哈尔滨亚冬会为例 - 李一, 李佳凯 30-35
-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of Strategies to Enhance the Application Ability of Digital Health Resources for the Elderly - Peng Liu, Fuzhi Wang 36-49
- 孤独到连接: 数字时代下街舞亚文化与青年身份建构 - 唐家杰 50-57
- 初中音乐学科跨学科教学的实践探索 - 夏嘉 58-63
- 游戏化学习导向的多场景应用桌游设计--以面向文化遗产教育的桌游《博物寻踪·守藏吏》为例 - 侯琳慧, 付一苇, 吴雨潇 64-72
- 高校传统戏曲与外语戏剧社团发展研究--以聊城大学慕曲京剧社与外语俱乐部为例 - 赵心玉, 李欣语, 刘恩成, 张庆艳 73-78
- Strategies for Global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A Translation-Centered Approach - Pengfei Bao 79-89
- Transmission of Cultural Imagery in Translation: An In-depth Exploration Focusing on Literary and Poetic Texts - Pengfei Bao 90-103
- UI设计中的色彩心理学与广告学的视觉冲击力研究 - 曹楚怡 104-107
- 社会建构理论视角下的性别批判: 以《夜宿荒宅》为中心 - 孔枳蕲 108-112
- 悲欢离合的记忆建构--文化记忆理论视角下肖水的小说诗集《两日晴, 郁达夫》研究 - 白一祎 113-119
- 被忽视的“雕琢”--论珀西·比希·雪莱对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雪莱《弗兰肯斯坦》的修改 - 陈瑞浩 120-127
- “代理人媒体”: 东盟金边六国媒体涉华国际冲突报道的消息来源偏向研究 - 李康龙 128-135
- 因距生情: 拟剧理论视阈下音频主播的自我呈现研究--以克拉克拉App为例 - 王柏儒 136-144
- 数字经济发展时空演化分析--以黄河“几”字弯都市圈为例 - 闫浩浩 145-152
- 内生式发展视野下东北乡村振兴的道路探索--基于松原市车木铺村的个案研究 - 刘文喆, 韩骜 153-160
- 基于SAPAD的老年服药提醒APP服务系统设计研究 - 盛雨欣 161-168
- 美丽假象: 社交媒体审美观对女性形象塑造的误导及反思 - 袁雨欣 169-175
- 非洲现代性的危机: 本·奥克瑞《饥饿的路》中的“荒原” - 蓝婷 176-179
- Signal-Based Trading Strategy for SPY ETF: A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Approach - Zhen Zou 180-195
- 地方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职院校“校本教材”的原则遵循、实践瓶颈与优化路径 - 唐浩然, 许伟胤 196-200
- 数字戏剧现场性的消解与重构 - 代兴盛 200-204
- 京津冀城市群物流业效率测度研究 - 侯婷 205-210
- 言语行为对人物动机及态度的构建机制--以音乐剧《欢乐岁月》为例 - 刘奕奕 211-216
- 《饥饿的路》中的非洲女性困境 - 蓝婷 217-220
- 生态文明建设中的新质生产力角色: 理论探讨与现实启示 - 陈楠 221-227
- 从资本逻辑到生态逻辑: 奥康纳对当代资本主义危机的生态学解读 - 陈楠 228-234
- 余华和森鸥外的女性观对比--以《文城》和《雁》的女主形象为中心 - 王云樵 235-238

- 封建礼教下的双重困境：《红楼梦》与《源氏物语》中的已婚女性形象对比研究 - 张洪涛 239-242
- 进退之间：清代江南文人的隐逸思想及形成原因--以苏州状元石韫玉为例 - 孙铭泽, 董粉和 243-249
- 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历史演进及其当代启示 - 陈楠 250-256
- 明清风水知识在琉球近世村落的具体应用研究-以《北木山风水记》为例 - 王育洁 257-262
- 沉浸、释放与回归：青年剧本杀社交的内在逻辑 - 侯培森, 王梦菡 263-267
- 养老机构失能老人长期照护的多重困境--以 L 市 R 养老院为例 - 韩敬梓, 杨瑞, 赵婷, 盛玲嫣 268-274
- 身体与民族：民国时期岭南武术与民族国家建构 - 黄昊昱 275-279
- 阿根廷主流媒体对于“一带一路”倡议报道的数量、主题与框架分析 - 王菁菁 280-286
- 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路径 - 陈楠 287-293
- 乡村振兴背景下汤家汇小镇旅游形象感知与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 - 赵雯 1 车晨 1 刘家俊 294-301
- 数学史概论课程思政建设：消防救援中的数学智慧与育人价值 - 于晟伟, 何永明, 王洪庆, 赵赫 302-307
- 以“格林公式”教学为案例的思政元素挖掘探讨 - 何永明, 于晟伟, 王洪庆, 王亚男, 汪雁 308-313
-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Differences of Advertising Ethic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Cross-cultural Contexts - LeiYa Tian 314-320
- 19世纪中至20世纪初俄罗斯征服和统治突厥斯坦期间的伊斯兰教政策 - 陶克清 321-324
- 一境到底：贯通历史课程“教-学-评”一体化的重要途径 - 张攀 325-330
- 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新闻伦理的博弈与融合 - 王才铭, 田蕾娅 331-337
- 线性代数课程思政：以数学之美育时代新人 - 赵赫, 于晟伟, 王洪庆, 何永明 338-343
- 记忆史视野下的孙中山研究--评《崇拜与记忆--孙中山符号的建构与传播》 - 罗嫣, 谭洁 344-347
- 公共社交领域的转移、身份构建与认同--中国贵州黔东南苗族村落社交媒体使用研究 - 文均同 348-352
- Poetic Translation and Meaning C Reflections on the Design Valu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Decorative Patterns - Bingxue Zhang , Yixuan Zhou 353-359
- “永远的杉菜”：网络哀悼空间的集体记忆建构研究--以台湾地区地区艺人大 S 粉丝为样本 - 陈栩梵, 王竣 360-365
- Auditory Atmospherics in Games: Beyond the Visuocentric Paradigm - Hengran Yang,Tian kuoHong 366-374
- 浅析宁夏知识产权转化运用促高质量发展的问题及对策 - 唐璐琪 375-382
- 轻罪时代下犯罪附随后果研究 - 刘丁玲, 苏圣斌 383-391
- 交流电路理论分析的数学化路径 - 付亚坤, 于晟伟, 何永明 392-398
- 新时代高校反邪教教育研究 - 魏斌, 洪婷婷, 果建业, 邵继萍 399-405
- PBL 教学法在现代金融基础课程中的应用与探索 - 梁天悦, 秦雯 406-410
- 偏头痛与心理不适导致的言语抑制--语言学视角下的情绪表达障碍 - 张晶晶 411-415
- 性别平等与差异：与谢野晶子对女性存在方式的探索与重构 - 孙菁菁 416-421
- AI 主播与真人主播:一项语言审美视角的探析 - 牛勇博 422-426
- 跨学科视域下美国舆论控制策略的演变与中国国际传播策略研究 (1947 年至今) --基于历史学与传播学的双重维度 - 李想 黄睿贤 李佳雯 潘亚楠 邱昭翰 杨春雨 427-434
- 称谓的政治逻辑：陈寿笔下的司马氏王号与魏晋禅代的历史形塑 - 于健平 435-439
- 刘智《天方性理》中的心性论--兼论对宋明理学的吸收 - 汪正祺, 张思听 440-447
- 课程-毕设导师制下的 A 校区 B 学院经济学专业本科生科研素养提升效果研究 - 黄娟 448-455
- 语料库驱动的网络隐性仇恨言论的语用分析 --以“专家建议”话题评论为例 - 徐俊扬 456-460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2.478

大观念视角下的高中英语教学跨学科能力培养的教学设计

侯俊

(三峡大学外国语学院, 湖北 宜昌 443000)

摘要: 以大观念指引教学的模式目前已然成为教育界的热点话题, 并且它确实对我国英语教学体系改革提供了全新的方向。但是目前该模式在实际运行中在学生跨学科能力的培养上仍流于形式, 没有形成具体的跨学科教学体系。通过对英语教学各个内容包括教材、教法、评价等进行分析, 提炼出了相应问题出现的原因同时探讨了对应的解决措施, 发现高中英语教学设计过程中应要紧密抓住大观念的指引, 形成英语学科和其他学科的互联互通, 真正激发学生有效地跨学科思考, 最终确保英语核心素养的落地。

关键词: 大观念; 英语教学; 跨学科; 教学设计

一、引言

大观念 (Big idea) 在教学中应用的历史其实是很悠久的, 但是主要研究仍然聚焦在国外, 国内正式掀起对其探讨的热潮是 2017 年教育部发布最新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之后^[1]。然而, 在具体的教学实施当中, 英语教学中学生的跨学科能力培养的具体实践却始终没有得到重视, 会出现只是拼盘, 甚至很多教师对英语跨学科主题学习的内涵及意义还缺乏深入的认识等问题^[2]。如何有效地在大观念指引下进行英语跨学科教学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这不仅是对英语学科素养的反应, 更是英语教学中的现实需求。基于大观念下进行英语跨学科教学需要落地, 不能仅以理论化、概念性的形式存在, 而是要形成一套完整的体系, 切实保证一线教师能够理解最终应用到教学实践当中去。

二、大观念下英语教学跨学科设计——教材篇

学科“大概念”是指指向学科核心内容和教学核心任务、反映学科本质、能将学科关键思想和相关内容联系起来的关键的、特殊的概念^[3]。它本身就旨在打破各学科之间的桎梏, 加强各学科的互通性和联系, 于是在教材的设计当中, 就不应该局限于某一个学科的具体知识点。以新人教版高中英语课本为例, 虽然此版的内容设计已经十分符合目前我国英语教学的大部分需求, 但是在大观念大主题下的跨学科内容设计仍然不够“大胆”。所有的学科知识实质上都是基础问题的阐发, 在设计教材时可按照第一性原理, 打破一切知识的藩篱, 回归到事物本原思考问题, 逐步建构起围绕大概念的知识框架, 然后把多学科知识填充到知识框架中^[4]。通过对新人教版英语教材进行分析发现, 教材内容虽然涉及到了多学科的知识点内容, 但是人文学科内容仍然占据主导 (见表 1)。

表 1 新人教英语学科类型分析

课本来源	涉及单元主题	涉及学科
必修一	Teenage life	人文
	Travelling around	自然、地理
	Sports and fitness	体育
	Natural disasters	自然
必修二	Language around the world	人文
	Cultural heritage	人文
	Wildlife protection	自然
	The internet	科技
	History and traditions	人文
	Music	人文

必修三	Festivals and celebrations	人文
	Morals and virtues	人文
	Diverse cultures	人文
	Space exploration	科技
	The value of money	人文

当今,学生整体的学习水平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这也意味着我们不能再以传统的教学设计眼光去看待学生,学生对各个学科知识间的内化水平也不可同日而语。英语这一学科其实是可以尝试“摆脱”其人文性的,而英语教材作为英语教学的重要载体,为英语课堂教学提供了丰富的内容和话题,方法和设计指南就是一个着手点^[5],而这一点在中学英语中并没有很好的体现,更多的是应用在大学英语教学中。今后在高中英语教材设计中理应更加突出跨学科,可以涵盖工学、自然科学和工程等这类对于英语能力有需求的专业性学科。可以看出新人教版高中英语教材在“跨学科”编排上起到了一定引领作用,但是未来的教材开发还可以从话题、内容、组织和设计的整体上体现“跨学科”性,从而使语言学习真正融入到学科教学中来,以减少语言学习的目标单一性、内容单调性、手段唯一性、资源的有限性以及评价的孤立性^[6]。教材的设计和编排应在大观念的指引下进一步深化跨学科主题,做到真正的“跨”。

三、大观念下英语教学跨学科设计——教法篇

跨学科主题学习不同于传统的英语课堂,教师必须改变以讲授的方式传递知识的习惯,以学生为主体,激发学生参与到课堂探究活动中的热情,让学生成为课堂真正的主人^[7]。大观念统领下的英语教学强调教师需要善于采取多样的教学方法,不要再将课堂内容按照一套固定的教学模式灌输给学生,这显然是不符合目前英语核心素养的要求的。在传统初中英语教学中,可以发现许多教师只会简单一味地讲,而学生无聊枯燥地听,墨守成规地记笔记、背单词、做课后题,不能将自己所学的运用起来。教师只注重知识的机械式传授,而完全忽视了学生跨能力综合素质的培养^[8]。所以目前所提出的英语大观念也就给英语跨学科教学提供了新的思路,教师在正式的教学中首先自己要养成跨学科思维,从传统教学的思维定势中逃脱出来,也就是说不能再完全依赖课本知识而是要丰富自己的知识素养,合理的将大主题下的跨学科知识点传递给学生。

目前关于大观念下的教学方法便是英语学习活动观。王蔷,胡亚琳将英语学科能力划分为学习理解、应用实践、迁移创新三大维度,要求教师以提高学生不同层级学科能力为目的,设置相应的课堂教学活动以培养学生的学科核心素养,以活动整合学习内容、驱动学习过程、促进语言与思维的发展^[9]。里面所提到的三大维度都可以有效的融入跨学科素养的知识内容,且其中最能体现跨学科教学的便是“迁移创新”环节,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一定要积极引导学生思考,让学生成为跨学科内容的主导者,图1是教学方法的可行性流程(以新人教版必修一 unit 1 教学为例)。



图 1 新人教必修一 Unit 1 教学过程设计

这一单元的大主题显而易见是关于人与自然的,当然也会涉及部分人与社会的主题内容,于是在教学设计中,不是一味呈现传统的“Pre—While—Post”环节,而是直接以活动为指引。同时,在具体的教学实施

中, 学生始终是课堂的主导者, 通过对秘鲁的学习迁移到对其他世界各地的了解和认识, 这个过程里面具体的跨学科知识纳入了地理、科技交通、人文等多方面的内容, 可以充分满足大观念下的跨学科教学新要求。

四、大观念下英语教学跨学科设计——评价篇

“教学评价设计”即为教学评价的准备阶段, 准备的质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评价的质量。多元智能理论认为, 评估要遵循三大原则, 即多元化原则、真实性原则和发展性原则^[10]。教学的评价环节本身是教学过程中极为重要的环节, 其中教、学、评一体化更是落实英语学科核心素养目标的重要保障, 但是在以往的教学过程中评价环节往往会被教师忽视, 更不用提对于跨学科知识评价体系的建立。基于此现状, 大观念教学其实对英语教学评价环节提供了新的方向, 其中就更加突出于学生跨学科知识的评价。

目前学界对于跨学科创新能力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方向, 一种侧重于评价学生的跨学科实践能力, 如占小红等人将跨学科创新能力细化为构思问题能力、跨学科知识认知能力、方案设计能力、方案实施能力、收集、分析与解释数据能力、交流与评价能力以及优化设计能力等七种能力; 另一种评价方向则仍以传统的创新能力要素为基础, 如周蓓蓓等人通过创新思维、创新人格、认知结构、创新实践、创新成果五个维度评价学生的跨学科创新能力^[11]。对于英语学科, 传统的教学评价主要集中在第二种模式, 但是它并不符合目前学生核心素养的培养, 因为它过于抽象, 可测性很低, 而它理应要向学生实践能力培养转向, 这也符合前文所述的一定程度“摆脱”英语的人文性, 更重要的是这对学生构建主题概念的能力有着深刻影响。

表 2 A Day in the Clouds 教学目标和课堂评价目标

教学目标		评价目标
使用略读、寻读等阅读技巧, 找到段落中心句或概括段落大意	准确找到主题句或概括段落大意	准确找到主题句或概括段落大意
课时一 准确找到主题句或概括段落大意	根据语篇结构绘制思维导图。考查关键词和注释等的运用、逻辑关系的清晰程度	
通过语境推断单词的隐含意义	结合语篇主题意义和上下文语境, 能够使用概括的语言表达深层含义, 语言表达准确, 使用新词汇和新句型	

表2是对某老师所设计的新教版高中必修二Unit 2 课本教学目标与教学评价目标的内容展示, 通过此表格可以发现, 教学评价目标仍然只是局限于课本知识, 对于跨学科知识内容的评价并没有得到体现。随着大观念教学在高中教学的深入应用, 跨学科能力的评价体系也应随之建立, 图2是由钟柏昌等学者总结的创新人格、创新思维、创新学习、创新技能、创新成果5个一级指标与12个二级指标组成的跨学科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 对我们的英语教学中学生跨学科能力评价有很深刻的意义。

评价维度	评价指标	指标内涵	评价方式	评价工具
创新人格	好奇心 想象力	喜欢探究事情发生的原因为何, 对不了解的事物感兴趣 善于思考, 能够提出标新立异的想法	自我评价 自陈量表	
创新思维	发散思维 逻辑思维	冲破传统思维, 思想、观念、理论、方法的束缚, 同中求异, 多向辐射, 正向求反 对事物形成完整认识, 能够对跨学科问题进行分析综合, 汲取数据, 找到推理		
创新学习	自主学习 知识迁移	根据自身兴趣或需求, 有计划地学习不同学科的新知识并进行总结反思 在掌握跨学科概念及创新方法的基础上, 融会贯通各学科知识, 形成整体知识结构并能迁移应用于不同情境	客观评价 测试题	
创新技能	问题提出 问题解决	在复杂情境下, 能够发现问题并清晰地表述问题 对于复杂问题, 能够冷静分析, 妥善规划, 运用跨学科知识与方法解决问题		
创新成果	艺术性 新颖性 过程性 价值性	作品造型美观, 比例协调, 具有观赏性 作品在外观、材料、结构、功能等方面具有新颖性 作品在制作过程中综合运用了多种学科的知识与方法 作品能够解决生活与学习中的实际问题, 或为解决未来跨学科难题提供思路及启发	基于证据的评价 作品评分表	

图 2 跨学科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与评价方式

五、总结

大观念教学已经是目前英语教学的总体趋势，它对学生的英语核心素养培养有着积极作用。在大观念指导下进行跨学科能力培养需要关注到教学过程当中的各个环节，从大观念的宏观角度把握各个细节。大概念教学是落实核心素养的重要路径，教学目的是让学生具备在现实生活中生存和发展的关键能力和必备品格。现实生活是大概念教学的落脚点，也是跨学科教学的实践旨归。跨学科教学成效主要通过现实问题解决状况来表征，但是大多数情况下，对于跨学科教学的成效往往是通过书面方式考查学生知识掌握和运用情况，难以考察学生实践素养发展的真实情况。基于大概念的实践性特点，跨学科教学可用实践方式来考察教学成效。如上述研究所表明的，应让学生利用所学知识解决某个现实问题，或者是用知识解释生活现象等，通过学生对现实问题的解决成效检验教学成效。在此前提下，跨学科教学自然会对标现实生活教学，着重于培养学生的实践素养。

参考文献：

-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 (2017年版 2020年修订) [S].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20
- [2] 王蔷, 刘诗雨. 在英语教学中开展跨学科主题学习的意义与关键问题解决[J]. 英语学习, 2023(7):4-11
- [3] 王喜斌. 学科“大概念”的内涵、意义及获取途径[J]. 教学与管理, 2018(24):86-88
- [4] 马刚. 基于大概念的中小学跨学科教学优化[J]. 教育理论与实践, 2023, 43(26):8-11
- [5] 谢旭. 新版译林高中英语教材跨学科分析[J]. 中华活页文选 (高中版), 2022(11):0184-0186
- [6] 陈柏华, 吴月文. 高中英语教材跨学科分析——以人教版必修模块为例[J]. 课程. 教材. 教法, 2012(4):49-55
- [7] 王蔷, 刘诗雨. 在英语教学中开展跨学科主题学习的意义与关键问题解决[J]. 英语学习, 2023(7):4-11
- [8] 刘成玲. 打破传统英语教学模式, 引导学生自主学习[J]. 语数外学习(初中版下旬), 2013(07):91.
- [9] 张秋会, 王蔷, 蒋京丽, 朱丽萍(指导). 在初中英语阅读教学中落实英语学习活动观的实践[J]. 中小学外语教学, 2019, 42(1):1-7
- [10] 李臣之, 梁舒婷. 跨学科教学力: 撬动新课程改革的阿基米德点[J]. 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 2023, 22(2):63-69
- [11] 钟柏昌, 龚佳欣. 跨学科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与实证研究[J]. 中国电化教育, 2022(12):27-34

Teaching Design for Cultivating Interdisciplinary Competence in High School English Teach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ig Ideas

Hou Jun¹

¹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China Three Gorges University, Hubei, China

Abstract: The model of guiding teaching with big ideas has become a hot topic in the education field, and it does provide a new direction for the reform of China's English teaching system. However, at present,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interdisciplinary ability in the actual operation of this model is still a formality, and no specific interdisciplinary teaching system has been formed.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various contents of English teaching, including teaching materials, teaching methods, evaluation, etc., the reasons for the corresponding problems are extracted and the corresponding solutions are discussed, and it is found that in the process of high school English teaching design, it is necessary to closely grasp the guidance of big concepts, form the interconnection between English and other disciplines, truly stimulate students' effective interdisciplinary thinking, and finally ensure the implementation of English core literacy.

Keywords: Big Ideas;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Interdisciplinary; Instructional Design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2.474

项目驱动和社交媒体评价相结合的高校摄影教学改革实践研究

李润杰¹ 郑昕渝²

(¹河北美术学院, 河北 石家庄 050700, ²河北科技大学, 河北 石家庄 050091)

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讨项目驱动和社交软件评价相结合的高校摄影教学改革实践。从摄影教学的需求出发, 探讨了项目驱动教学模式在高校摄影教学中的应用, 并结合社交软件评价方法, 对学生的学习过程和成果进行了有效评估。研究发现, 项目驱动教学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主动性, 提高学习的实践性和针对性; 社交软件评价能够促进学生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丰富评价手段, 提高评价的客观性和及时性。因此, 将项目驱动教学与社交软件评价相结合, 有助于提升高校摄影教学的质量和效果, 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团队合作意识。

关键词: 项目驱动教学; 社交软件评价; 高校摄影教学; 教学改革

随着数字影像设备的不断更新, 手机网络的飞速发展以及 5G 时代的到来, 国内高等摄影专业教育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到目前为止, 全国开设摄影专业的高等院校有 200 多所, 师资与教学体系相对完备。新的成像设备(如数码相机、手机、无人机等)、传播路径、影像评价标准和体系都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而原有的高等摄影专业教学体系面临着新技术、新传播媒介与新评价标准的挑战。传统摄影专业存在着训练单一、学生主动参与不够、学生作品评价单向化、离业界要求较远等问题。项目驱动下的摄影实践教学改革以其目标性、真实性和综合性等优势较好地解决了传统摄影实践教学存在的弊端。用社交软件作为学生作品评价平台, 解决了传统摄影实践教学中学生作品评价单一化、主观化的问题。因此, 项目驱动和社交软件评价相结合的教学模式, 将有效的提高高校摄影教学质量。

1 目前摄影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1.1 教学方法陈旧, 教学内容缺乏创新性

随着摄影技术的快速发展, 新的摄影理念、技术和设备不断涌现。现阶段, 众多高校都已开设摄影课程并且摄影理论教学已经相对成熟阶段。理论讲授与实践拍摄成为摄影课程教学的主要内容, 但是随着网络技术发展和摄影艺术理念不断更新, 传统摄影课程还始终停留在原有的教学理念, 主要表现在摄影教学内容停滞不前; 许多高校摄影课程的内容更新缓慢, 无法跟上时代的步伐; 教学方式单一等。

这导致学生对新的摄影技术和理念了解不足, 无法满足社会的需求。许多摄影课程仍然沿用传统的讲授、示范、练习和考核的教学模式, 学生往往只能被动接受知识, 缺乏启发式和创造性的授课方法, 实践脱离实际, 导致课程之间黏性不足, 分散课程输出效率。摄影是根据实践性经验落实到具体的工作任务当中, 需要通过大量的实践来掌握技能。然而高校摄影课程的实践机会有限, 往往局限于课堂内的练习和少量的摄影实践, 实践教学内容缺乏创新性, 学生在实践创作中仅仅是为完成课程作业而实践, 缺乏与当下摄影理念和摄影市场相关的实践拍摄, 这导致学生缺乏真实的摄影实践经验, 无法真正掌握摄影技能。

由于近年来媒体形态转变多样, 对于摄影从业者的需求也不再局限于摄影技术, 更多是对策划、编辑、

[]

[1] 1996

[2] 1999

运营等能力的复合型人才。通过影视行业需求的培养思维上观察,从思维模式上看。传统摄影课程过于单一,没有“导演”意识,不具备全局观;从实践考察上看,学生所具备影视行业能力不足,单纯的业务技能也过于单一;从教学内容上看,摄影基础知识与视听语言课程有着大量重复现象,仅仅依靠教材中进行分类,往往具有滞后性。影视人才的培养要与行业发展态势需保持同步,教师也需对当下影视行业需求进行深入了解,同步到摄影实践课程的设计中去。在传统摄影实践课程当中主要是针对技术性训练,但不少教师为了追求知识本身的系统行与完备性,对单一的摄影技巧进行渗透讲解,忽略了学生的实际需求。同时,许多高校教师在讲解专业知识时,忽视了不同时期、不同国家、不同创作者创作背景,也没有做到最新行业发展动态与其相关影视知识的交融。影视人才的培养需与行业发展态势保持同步,因此高校教师也应当与当下前沿知识融合与理解。在传统摄影实践课程中,主要集中在内容产出上,而学生对整个影视行业的前期筹备、中期拍摄、后期制作以及推广工作少有涉猎。然而在数字摄影时代背景下,搜索引擎所带来的信息碎片性与多媒介平台下信息杂糅性,因此,作为影视行业教师应当综合审视媒介信息所带来的复杂性与挑战性。

诸如,以近期短剧为例,其在前期筹备层面应当站在受众群上审视受众审美趣味,能够精准抓住受众心理,而且也要从创作者角度来综合审视行业标准;在中期拍摄方面满足当下短剧团队的创作需求,对当下较为流行性视听风格进行把握分析,满足受众的接受度;在后期制作方面满足当下受众信息密集与丰富多元的视频需求。因此,在新的教学方法上应综合考虑其行业发展动态,教学内容应审视多媒介下信息的复杂性,在摄影实践课程中的技术训练紧跟行业动向,确保技术应用与行业标准对标。

现阶段,我国很多学校都设立有摄影课程,为热爱摄影的学生提供了学习机会。虽然我国的摄影理论教学已经迈入正轨,但是在实践教学的过程中,却存在一定的问题与不足。从我国摄影课程的设置情况来看,摄影课程数量设立的相对较多,但是却缺乏高质量的实践教学课程。同时,部分教师在上课过程中,并没有合理对理论教学同实践教学进行合理的设计,过度重视理论教学内容,从而使得学生掌握了大量的理论知识内容,但是摄影实践能力却相对较低。另外,虽然部分摄影专业教师具有知识的理论基础,但是却缺乏较好的教学经验,从而一定程度上也阻碍了教学质量的提升,导致学生很难开展实践学习,不利于学生灵活的应用实践教学知识内容。除此之外,还有部分高校专业摄影教师较为匮乏,为了不耽误学生学习课程的开展,甚至出现其他专业教师代课摄影课程,阻碍了摄影实践课程的开展。

1.2 学生作业评价机制单一

摄影课程中学生作业评价机制是体现学生掌握摄影知识和技能的重要方法,随着课程理念的更新以及当下外部实际市场的需求,现有的作业评价机制还建立在原有的评价标准之上,无法多方面的反映学生所掌握的知识技能,具有一定的单一性,其表现在评价标准单一化、评价主体单一化、评价方式单一化。

首先,在高校课程中评价标准的单一化体现在很多摄影课程的作业评价往往只依赖于一个或少数几个标准,如构图、色彩、光线等。这种单一的评价标准忽略了摄影艺术的多样性和个性。其次,在作业的评判主体主要依赖于教师的个人审美和主观判断,缺乏明确、客观的评价标准。这种单一的评价标准往往导致评价结果的主观性和不公平性,不能准确反映学生的摄影技能和创新能力。最后,评价方式的单一化,现有的评价机制往往是教师单方面对学生的作品进行评价,缺乏学生之间、市场与课程之间,专业人士与学生之间的互评和互动。这种单向的评价方式不利于激发学生的积极性和参与度。

与此同时,教师给学生的作业反馈只是简单的分数或等级,或者是一些笼统的建议。这种反馈方式缺乏具体性和针对性,无法帮助学生明确自己的不足和制定改进计划。因此,每个学生的摄影基础、审美观念和创新能力都有所不同。然而,单一的评价机制往往采用一刀切的评价标准,无法充分考虑到这些个体差异。这导致一些基础较差或风格独特的学生无法得到公正的评价。

2 摄影课程教学改革的实施方法

2.1 项目教学和任务驱动相结合

在近代,项目作为一种管理方式,它是为了有效地实现预期的目标范围,在有限的时间进程里,运用相对有限的人、财、物等资源所进行的彼此相互关联的一次性任务或活动。而当今,项目围绕范围、进程和资源有效地完成预期目标,成为一种重要的思维体系和系统方法。项目教学作为西方许多高等院校教学模式,近年来在我国也受到了广泛的关注与探索。其特点是教学模式以项目为载体实施教与学,包括目标内容、真实情景、过程控制、评价评估四个要素。美国巴克教育研究所认为项目教学“是一套系统的教学方法,是对复杂且真实问题的探究、设计、规划与实施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学生能够掌握所需要的知识与技能。”因此,项目教学与任务驱动相结合主要价值体现在三个方面:

- (1) 以项目为载体,密切联系社会与行业需求。

项目教学是在真实的情景中实践学习，教师在教学中主动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可以有效地解决传统教学模块中课程各自分割，实践脱离实际的问题，以及社会行业的真实需求。项目教学不同于平时的作业和自我表达，学生学习课程的效果如何，是以项目的形式在社会或市场中进行检验，是以能否满足社会需求为考量标准，使学生在动力和压力中成长，解决了学生做作业是为老师而做和“盲目自信”、“过度自信”的任性行为。因此，以项目为载体的教学实践，是符合社会与行业需求的。

(2) 以学生为主体，唤醒学生的学习兴趣与认知。

在教育的主体性上，大多数学者都持“教师和学生双主体说”。不过，“在实践层面上来看，高等教育延续着传统的教学关系，教师依然是教学的支配者，学生作为教学对象而存在，被动的接受教师的传道与授业。尽管学生已经发育出了一定的自主意识和能力，并对传统教学表现出了怠倦与抵制，但传统教学模式并未改变学生主体缺失的状况。”在项目教学中，学生的参与度与自我价值能够在不同阶段体现，因而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与积极性，培养学生基于职业的创新、沟通、协调与就业能力。

(3) 以项目为中心，建构新的教学内容。

项目教学不是被动地接受知识，而是主动参与探究，建构新知识的过程。项目教学强调以客观现实为背景，打破学科知识被人为分割过细的现实。项目的实施与目标的实现需要按照项目需要建构教学内容，以创新思维，实现教学内容的吐故纳新。具体对于一个摄影项目的完成，需要各种知识的综合运用，而项目在不同阶段需要的能力也不同。因此，从整体把握项目的实施——前期策划方案，中期执行与落实，后期反馈改进，都是项目教学内容充实与更新的过程。另外，当今应用类影像的生产，不仅仅体现在拍摄的技术层面，更多还表现在拍摄者的素养以及对行业与职业的认知方面。因此项目教学对培养学生良好的“情商”、职业意识、强烈的责任感和团队精神等方面都将起到促进作用。（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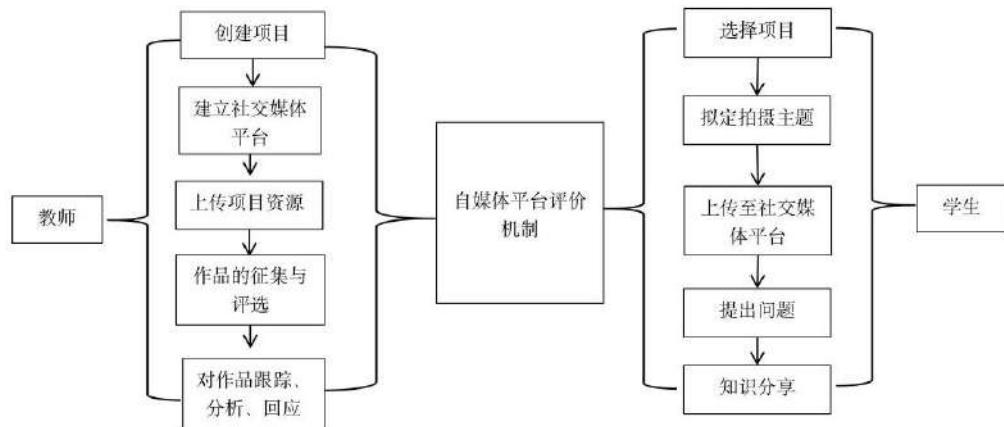


图1 项目教学与任务驱动模式

2.2 自媒体评价机制引入

在多媒体网络背景下，现代高校大学生依赖社交媒体关注明星、专家、企业家以及朋友等发布的信息，以关注对象为信息源来获取资讯，通过分享感悟、评论进一步传递信息，建立符合兴趣与需求的信息知识圈。由于自媒体平台往往具有去中心化、碎片化等特点。通过自媒体平台评价机制来弥补“教”与“学”之间的不对称现象。一方面，在教学传播与互动教学上呈现出便利性；另一方面，教师所对学生掌握知识的滞后性正在逐渐缩小。因此，通过自媒体评价机制的引入不仅可以增加师生之间的互动，也可以发挥社交媒体的分享特征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

(1) 借助社交媒体平台可增加师生之间的互动。

摄影教学结合社交媒体的信息发布，更容易让师生之间共享和传递课程信息，增加与学生在理论学习层面的互动性。因为没有时间和地点的束缚，课堂教学的延续性可以增加，可以进一步讨论教学疑难点。运用社交媒体促进教学的互动效果，能够充分调动教师与学生之间的积极性，充分利用一切有利于教学活

动的资源，建构“学与教”理论为基础，以学生为主体、实践训练为主线，达到提升教学质量教学模式。在社交媒体平台上，以网络资源作为有效载体，通过互动教学为核心方法，整合社会、行业、学校内丰富教学资源，不仅使学生学习效率逐渐提升，也提升学生自主互动学习兴趣。在教学过程中，由于自媒体评价机制的引入，师生之间的交流互动能够及时提出、反馈与解决出现的教学问题，打破往常之间的陌生感，通过社交媒体平台机制恰好给予学生自主学习的氛围与资源平台。

(2) 社交媒体的分享特征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

摄影专业课程实践教学结合社交媒体，鼓励学生把自己的作品上传到社交媒体，与同学和老师第一时间一起分享，这不仅符合社交媒体用户喜欢分享图片的兴趣爱好，同时也能激发他们的创新意识，也可以让学生作品有更好的展示空间，让学生相互之间形成竞争意识，使学生从被动完成作业到主动参与作品设计中来，从而达到摄影摄像课程实践教学的培养目标。通过社交媒体及时反馈与广泛曝光的特征，将能够有效将教学方法、手段、内容与形式高度融合，打破了传统教学的单一性。从多样化的视角来看，社交媒体汇集了不同背景与文化的观点，学生可以从中获得启发与不同的思考角度，促进创新思维发展。同时也可与不同领域、不同学科的人士进行交流，进行跨界合作，实现共赢。

社交媒体的资讯发布促进学生自觉主动学习前沿专业知识，能够促使学生探索不同摄影主题与风格，帮助学生快速识别自己作品的优缺点。摄影摄像作品本身作为视觉信息载体、新媒体、社交软件的主要流通符码，天然与交互软件有血亲关系。摄影行业发展迅速、设备迭代日新月异，使用社交媒体推送专业前沿知识从渠道到内容都具适应性，非常利于结合行业热点信息丰富教学手段，探索改革创新教学模式，贯彻能力培养。在高校教学过程中，探索教学模式的革新，寻求多元化的教学方法，保证教学的有效性。社交媒体上的持续分享和互动可以维持学生的创作热情，有助于纠正偏差、强化学生的自信，增强其内在动力，鼓励学生不断探索和实验新的摄影理念和技术。（见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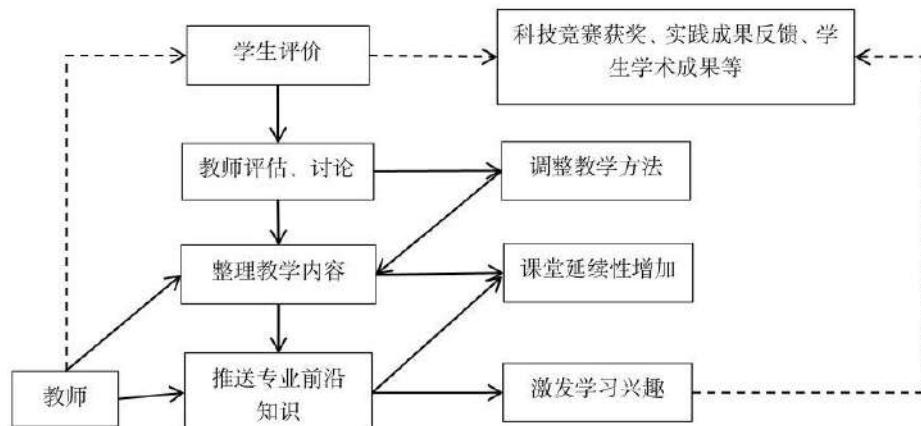


图2 自媒体平台评价机制

3 影视短片创作实践教学改革成效分析

3.1 学科竞赛与项目教学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教师作为学生学习的引导者与促进者，教师应当构建新型开放式课堂，摒弃传统枯燥的教学理念，引导学生知识的运用及价值，促进学生感受知识的灵活性与多样性。若要提升学生的创新能力，不仅仅要从高校教育环境出发，也要依据科学的教学方法，在此基础之上培养学生创新意识与创新思维是高校教师所面临的现实基础。首先，影视专业人才应当具备较好的操作能力与实践能力；其次，面临不同岗位、不同环境、不同要求的影视从业人员应当具备及时调整状态和适应环境的能力；最后，优秀的影视团队需要互相配合、互相扶持、互相帮助，共同完成项目任务。实践证明，项目教学与学科竞赛关注的是专业应用、学校教育、社会需求、个人表达与社会角色等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内容。随着实践教学的逐步展开和项目的结束，笔者对项目教学总结出以下特点：

(1) 应付怠倦向重视认真转化。

学校教育和实践工作之间一直存在着差距。项目实践教学的目的之一就是不断缩小二者之间的差距，提高学生的社会应用意识，培养他们做事的认真习惯与态度。学生通过对一个项目的前期调研、沟通到项

目的实施，以及后期制作与传播的全过程体验，完成了一个课程的有效学习。从而把老师和书本传授的知识转化为实践能力，在项目中提高自我学习的能力，增强了对摄影应用的复杂性和技术、艺术以及文化层面的理解，形成了自己的知识感悟与经验积累。使得传统教育方式下学生常有的应付、怠倦感，变为压力与挑战。因此，足够的重视与认真的态度是项目开始的基础。

(2) 完成作业向完成项目转化。

在项目教学中，项目就是作业。学生在完成项目的过程中理解、训练、消化课堂上学到的专业知识和技术，不仅可以解决常规意义上的作业（课堂内容讲授的演练），而把作业的训练转化为项目的完成。作业不再是堆在角落的半成品或废品，而是具有社会应用价值的作品。这些作品在媒介传播中发挥出应有的价值，进而使学生的价值感和社会参与度都有提升，进而培养了学生的专业兴趣。

(3) 单项训练拓展向综合项目转化。

在相对课程作业的单项训练，项目教学是一个整体的综合性训练。为完成项目要求，教师必须把创作的单一过程看作是一个整体去认识、理解和把握。并运用一系列具体方法对学生进行训练，使学生能够形成良好的意识、建立正确的认知，掌握科学的方法。既掌握了课程所设定的目标，又训练了学生与社会业界的对接。

(4) 教师讲授向控制评价转化。

摄影实践项目是不容失败和重来的。因此，在项目实践过程中，教师需要参与和把控项目的进程，对项目的整体性和学生的具体拍摄方案进行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修正。项目教学要求老师从台上走到台下，从灌输变为共同探究，把学生从懒于动手向忙于问题的解决与完成方面引导，从而培养学生的知识汲取能力，构建新型的师生关系。

摄影专业是一个应用性、实践性较强的专业，其课程大多与社会行业结合紧密。项目实践教学尽管与现实教学管理之间存在着一些问题。但是，项目教学作为新的教学理念下的教学模式，应该受到高校教学管理的重视。同时，社会发展、行业变化也都要求教学自身要不断修正与调整教学目标和手段，要因地制宜、适时调整、探索出更好的适合本专业发展的项目实践教学模式。高校教育不应是数字化进程的反对者，应用先进的数字教育技术武装课堂，让我们的课堂锦上添花”，让学生在课堂内外的学习效率大幅提升才是高校教育改革的宗旨。

3.2 自媒体平台完善课程评价体系

教学模式的好坏可以直接体现在教学质量与教学成果上，任何一门课程都应结合其学科特点建立相对应的教学评价体系，通过合理的评价机制是维持课堂多元互动教学的基本保障。对于教学活动的评价形式一般有形成性评价和总结性评价两种。摄影教学采用过程——结果相结合的评价方法，把握教学活动过程和结果来考察学生的学习效果。

(1) 形成性评价

教师教学过程中，为使教师的专业水平继续提高，不断获取反馈信息，以便改进教学而进行的系统性评价。在摄影教学过程中，运用形成性评价帮助教师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及时发现教和学中存在的问题，根据学生学习过程中的学习态度、参与实践程度、阶段性练习作品的拍摄情况进行分析评价，使学生能扎实地掌握各个阶段的知识，摄影理论与实践环环相扣，达到良好的学习效果。这要求在摄影教学开始之前，教师要制定一个详细的评价体系，将教学内容分为若干个阶段，按照这几个阶段分别给予评价。每一次评价可以根据所要求的目标不同，制定相应的测量评价方案，根据评价的结果来调整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确保评价体系不仅覆盖知识掌握，而且应该关注学生的长远发展，鼓励独立思考与创造性思维，不仅仅是短期成绩。

(2) 总结性评价

在教学活动告一段落后，为了解教学活动的最终效果而进行的评价。学期末的各科考试、考核都属于这种评价，其目的是检验学生的学业是否达到了各科教学目标的要求。总结性评价重视的是结果，借以对被评价者做出全面鉴定，区分出等级，并对整个教学活动的效果做出评定。总结性评价往往是一种动态、持续监测和不断调整的过程，以适应教学内容与方法的不断变化。摄影课程总结性评价一般是以考试的形式考查学生对摄影基本理论知识点的掌握情况。任何的理论都是指导实践的武器，不清晰透彻地理解理论就无法开展有效的拍摄实践。以考试来作为总结性评价对学生全面掌握摄影基础知识，进而开展下面的学习有着突出的优势。在新闻摄影课程的评价中，学生不仅要熟悉理论知识，更要能灵活运用理论开展实践，从而使理论与实践相统一。所以在对学生进行评价时要综合运用总结性评价和形成性评价，全面考量学生的学习行为和学习成果。

笔者在教学中充分运用新媒体的形式，将学生的作业放置于网上，依托网络的优势给予每一份作业以公平公正的评价。一方面可以促进学生使用新媒体方式展示自己，将自己的微博、SNS 网站打造成个人门户，成为自媒体发声的平台。另一方面，让更多人在分享的过程中学习，收获新的体会，打开新思路，有利于开展新的摄影创作实践。利用新媒体来综合评价学生的学习效果是摄影实践教学方式的创新。

4. 结语

项目驱动教学与社交软件评价相结合，构建了一种新型的摄影教学模式。在这一模式下，学生以团队形式完成实际摄影项目，并通过社交软件平台进行作品展示和互动评价。充分利用自媒体评价机制，有效地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热情和积极性，提高了学生的摄影技能和团队协作能力。社交媒体不仅为学生提供了展示和交流的平台，还通过用户点赞、评论等互动数据，为教师提供了客观、量化的评价依据。同时，教师可以通过分析这些数据，及时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和需求，进而调整教学策略。实践结果显示，这种新型的教学模式。同时，社交软件评价机制的引入，使得教学反馈更加及时、全面，有助于教师精准把握教学重点和难点，提升教学质量。本研究对于高校摄影教学的改革和创新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也为其他学科的教学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参考文献：

- [1] 宋泽薇,何永昌.元宇宙背景下关于应用型影视人才培养的新思考[J].新闻研究导刊,2024,15(03):123-125.
- [2] 罗见闻. 媒介融合背景下新闻实践课程教学改革探析 [J]. 传播与版权 , 2023, (23): 4-6+10. DOI:10.16852/j.cnki.45-1390/g2.2023.23.001.
- [3] 尺天睿.应用型本科院校人工智能专业《Python 程序设计》课程的教学改革与实践[C]//新课程研究杂志社.新课改教育理论探究论文集 (二十五) .楚雄师范学院;,2022:2.DOI:10.26914/c.cnkihy.2022.092271.
- [4] 王然.创新型影视人才跨专业融合培养研究[J].戏剧之家,2021,(35):171-172.
- [5] 廖素霞.完善多元评价机制促进学生个性发展[J].新教师,2014,(11):47-48.

A Practical Study on the Reform of Teaching Photography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by Combining Project-Driven and Social Media Evaluation

Li Runjie¹ Zheng Xinyu²

¹ Hebei Academy of Fine Arts, Shijiazhuang, Hebei

² Hebe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ijiazhuang ,Hebei

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reform practice of photography teaching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at combines project-driven and social software evaluation. Starting from the needs of photography teaching, the application of project-driven teaching mode in photography teaching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explored, and combined with social software evaluation methods, the learning process and outcomes of students are effectively assessed. It is found that project-driven teaching can stimulate students' learning interest and initiative, and improve the practicability and relevance of learning; social software evaluation can promote communication and cooperation among students, enrich evaluation means, and improve the objectivity and timeliness of evaluation. Therefore, combining project-driven teaching with social software evaluation can help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effect of photography teaching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cultivate students' innovative ability and teamwork consciousness.

Keywords: Project-driven instruction; social software evaluation; teaching photography in higher education; pedagogical reforms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2.499

《小夫人金钱赠年少》中的“忠诚”观及其与《金瓶梅》的互文性

孟祥泽¹ 赵千慧¹

(¹ 云南大学，云南 昆明 650000)

摘要：冯梦龙创作“三言”的主要目的是教化普通民众，他在篇目的编排当中采用了对应原则，即每两卷题目成对偶句，内容互相补充呼应。其中，《警世通言》第十五回与第十六回补充呼应，共同表现了“忠诚”的主题。“忠诚”在境界层面表现为“静无动有”，在内容层面表现为“忠信”“忠孝”，这两个层面共同构建了普通民众的核心伦理道德观与行为准则。此外，《小夫人金钱赠年少》与《金瓶梅》处于相同的文化环境以及共时的话语空间，文本存在着相互交叉、渗透的现象，具有互文性。

关键词：忠诚；张胜；互文性；《金瓶梅》

《警世通言》兼善堂刻本中，目录第十六卷题作《张主管忠诚脱奇祸》。不同于其他道德品质，“诚”是从古到今人们为人处世的基本准则。如《周易·文言》中有“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1]《中庸》中亦有“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2]《孟子》中亦有相似的论述。可以说“诚”构成了社会中人与人交往的基础。在《小夫人金钱赠年少》中，张胜面对情色与钱财的诱惑，能不为所动，始终践行“忠诚”品质的行为准则。

此外，《小夫人金钱赠年少》与《金瓶梅词话》以及《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在第一回，第二回，第一百回的情节与语言上有诸多相似之处。尽管《金瓶梅词话》早于“三言”发行，但《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却晚于“三言”。“三言”与《金瓶梅》大体处于同样的文化环境，共时的创作与传播空间，两者间具有互文性。

一、“忠诚”境界层面的溯源

《尚书·尧典》中有“诗言志，歌咏言，声依咏，律和声。”^[3]即“在心为志，发言为诗”^[4]《说文解字》中释“志”为“意也。从心之声”^[4]，释“意”为“志也，从心察言而知意也。”^[4]说明在先秦、秦汉时期，“意”与“志”的含义是互通的，都指向人的内心，但二者意思又有略微的差别。相较于“意”，“志”“具有强烈的意向性，是主体人格的显现。”^[5]如孟子“以意逆志”中的“意”指向的是读者的认知和思维，而“志”指向的是作者的志向、信念、欲望等。除此之外，“志”还常常与君子的品格联系起来，如《孟子·公孙丑上》“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夫志至焉，气次焉。”^[6]“志”的强烈意向性以及与君子人格的联系在后世得以延续，如陆凯“志励秋霜，冰洁玉清”；李白“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春”；《西厢记》“尚在湖海飘零，何日得遂大志也呵！”^[7]再如《警世通言》中的“刘翁夫妇料到女儿志不可夺”^[8]等。综合以上语义不难看出，“志”指向的是人们内心意图、意象，且常常与高尚品格相联系。

再来看“诚”，《中庸》中认为，“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2]《孟子》中亦有，“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6]皆指出诚乃是天的本质属性，而追求“诚”则是人们为人处世的基本原则。人之诚乃是上天赋予的，但并非所有人都能达到“至诚”的境界，达到“至诚”境界的圣人在道德生活中可以做到“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2]即他们内心极真诚，没有丝毫虚伪的成分，所以在行为中没有任何的勉强亦不需要刻意的思考。因而，要实现“至诚”，归根到底要做到内心的真诚不虚伪，而不是简单从行动上坚持“诚”和“善”。周敦颐受《中庸》“诚”观念的影响，在《通书·诚下》篇说：“圣，诚而已矣。诚，五常之

[作者简介]

[1]孟祥泽（2004-），男，山东济南，云南大学汉语言文学在读，主要研究方向为古代文学；

[2]赵千慧（2004-），女，辽宁抚顺，云南大学汉语言文学在读，主要研究方向为外国文学。本文二位作者不分先后，为共同第一作者。

本，百行之原也。静无动有，至正明达也。”^[9]认为圣人具有诚的品质境界，并视“诚”为“五常之本，百行之原。”与“诚之者，人之道也”在内在逻辑中有一致性，接下来，他还指出了“诚”的境界，即“静无而动有，至正明达也。”此是说具备“诚”之境界的人本身是无欲无求的，即没有任何的私心与私欲，只有人天性中的真与善；当人们感于外物，有所行动时，因为真诚如一，本性至善，没有私欲，所以其行为也“至正明达”即不需要任何强迫与刻意，便能做出中正的行为。此亦与孔子所说的“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相通。

所以，从境界层面来看，“志”即人的念头，意志，“志诚”就是说人的意志是极为真诚无私欲的，表现在行动中自然真诚而仁善，也就是“静无动有”。

二、“志诚”内容层面的溯源

从内容层面来看，“志”依旧指人的心志与意志，“诚”则主要表现为“忠信”与“忠孝”。

《说文解字》中释“忠”为“敬也。”^[4]，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注“敬者，肃也。未有尽心而不敬者。”^[4]所以“尽心曰忠”^[4]而自春秋、秦汉以来，“忠”又侧重于指政治生活中的道德品质，也就是臣对君“忠”，即臣要对君尽心，甚至肝脑涂地。臣对君“忠”的前提又是“信”，在中国古代，“诚”与“信”意思有互通之处，如《说文解字》便释“信”为“诚也。”^[4]表现在政治生活中即臣对君的真诚无欺。故“忠信”在中国古代的最基本含义便是臣对君真诚无欺、鞠躬尽瘁乃至肝脑涂地。中国古代小说话本中常常提及的诸葛亮、关羽、岳飞等人都是“忠信”的代表，在民间广为人知。进一步推而广之，“忠信”又可以延伸为在政治、经济层面的各个层级中，下对上的真诚无欺，尽心尽力。具体到中国古代，佃农或者家仆便必须对地主或者家主“忠信”。

另一方面，中国古代又常常将“忠”“孝”并举，在夏商尤其是西周时期，由于血缘常常是维系政治秩序的纽带，“建立的是‘家国一体’的宗法型政治结构”^[10]所以“忠”常常寓于“孝”之内。至战国时期，伴随着三家分晋，田氏代齐，原有的宗法血缘政治土崩瓦解，“孝”的范畴逐渐缩小至家庭生活之内，“忠”与之分离并逐渐成为政治生活的道德标准。汉代以后，伴随着大家庭一定程度的消解，个体小家庭成为国家构成的基础。因而对于仕宦家庭以外的绝大多数家庭而言，“忠”并未成为他们的道德重心，于是统治者便提出“以孝治天下”“忠孝一体”等观念，逐渐建构起“忠”“孝”并举的道德评判标准，使二者分别成为维系政治秩序与维系社会家庭伦理秩序的核心道德标准。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忠”“孝”并举，但亦有层次之分，“孝”为“忠”的前提和基础，而“忠”则为“孝”的最终目的，因而在“忠”“孝”之间当以“忠”为重。诸如舜、老莱子、董永等人的孝行在民间亦广为流传。

故而在内容层面“志诚”主要指家庭生活中人子对长者、尊者行孝、行忠的意念与行动，政治生活中臣子对君主尽忠的意念与行动。

三、“三言”创作之目的及《小夫人金钱赠年少》题目的玄机

要理解《小夫人金钱赠年少》中的“志诚”观，首先当理解冯梦龙写“三言”之目的，在《喻世明言》的叙言中，冯梦龙首先追溯了小说的发展史，将韩非、列御寇诸人称为“小说之祖”^[8]，并指出宋以来小说的鄙俗性，可以“谐于里耳”，正因其“谐于里耳”所以能为更多的普通百姓听懂，亦比《孝经》《论语》等经书更为打动人心，从而足以起到教化之作用。其中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冯梦龙为何推韩非、列御寇诸人为“小说之祖”？盖韩非、列御寇、庄子等人长于寓言，于故事中寄托事理哲思，这与冯梦龙对小说功用的理解颇有相似之处；此外，将诸子推为“小说之祖”亦有着抬高小说地位的意图。此两点缘由与苏轼“自是一家”观，常州词派以屈骚比附温词的行为有相同之处。

第二个值得注意的点便是冯梦龙提出了其对小说功用的理解，即他认为相较于儒家经典，小说更通俗易懂，亦能更好的感化人心，起到教化之作用。这一观点也是其创作“三言”的重要目的。在《警世通言》中冯梦龙亦表达了相近的观点，认为小说不必拘泥于故事的真假，重点在于展现故事中的“理”，若“理”真，即使故事为“赝”，亦“不害于风化，不谬于圣贤，不戾于《诗》、《书》经史。”^[8]从而使里中儿根据故事中的“理”“推此说孝而孝，说忠而忠，说节义而节义，触性性通，导情情出”^[8]，实现教化的目的。《醒世恒言》中冯梦龙亦指出其作“三言”“以触里耳而振恒心”“为六经国史之辅”^[8]的功用。

理解了冯梦龙以小说教化百姓的创作观念，便不难理解“三言”书名的含义了，《喻世明言》颇有通过寓言故事使人明晓事理的意味。《警世通言》则是以通俗易懂又具有警示意味的小说来教化读者。《醒世恒言》则是说选入的故事有导愚之用，又并不枯燥乏味，故而可长时间广为流传。由此，《小夫人金钱赠年少》作为其中的一篇，标举“志诚”的伦理道德观也就不足为怪了。

颇有意思的是，在《警世通言》兼善堂刻本与衍庆堂刻本中，其目录上均将《小夫人金钱赠年少》题作《张主管志诚脱奇祸》，而正文中又将题目改为《小夫人金钱赠年少》。在三桂堂刻本中，目录和正文均题为《张主管志诚脱奇祸》。

且“三言”常常选入或改写前代话本故事，《寒山堂曲谱》引注有南戏《志诚主管鬼情案》，似与《张主管志

诚脱奇祸》之名有关，但惜并无传本，不足以作为有力证据。笔者认为不妨从冯梦龙的创作意图及题目构思角度来解释上述问题。从创作意图上来看，冯梦龙创作“三言”是为了寄事理道德于通俗故事中，以教化民众。而一书目录的最初作用便是解释作品的创作缘由，概括作品的大致内容，表达作者的观点态度，这一作用尽管在后世逐渐被作品的序取代，一书目录逐渐成为方便读者检索的工具，但其概括内容，表达作者观点的作用时至今日依然存在。既然如此，那么目录题为《张主管志诚脱奇祸》无疑可以在第一时间使读者得知其中的劝诫意味，有利于达成教化的目的。

但诚如涂秀虹所说，“冯梦龙的题目着眼于人物情节发展的因果线索”^[1]。正文题目《小夫人金钱赠年少》正体现了整篇故事情节发展的因果线索，盖本故事共有三条线索，第一条线索为张士廉娶王招宣府小夫人为妻，后王招宣府一串一百单八颗西珠数珠不见，于是便派人至张士廉家搜查，小夫人自杀，张士廉被毒打监禁后放回，后于张胜家寻得此珠，终于重整家业。第二条线索是王招宣府小夫人因言语失宠，将被王招宣嫁与他人，在府内时她又盗得了一串一百单八颗西珠数珠，后被媒人欺骗嫁给了年长几十岁的张士廉，因而闷闷不乐。某日，小夫人在门外看街时看到了铺子中的张胜，于是顿生好感，有意与其行有失伦常之事，然张胜后闭门称病，小夫人并无接触机会。后东窗事发，小夫人自杀，因对张胜情意深重，故死后意念未消，化作鬼魂，为张胜一家收留，然二人终未发生不正当关系，后张士廉到访张胜家，小夫人知道自己与张胜再无可能，遂意念消散。第三条线索为张胜某日无意见到小夫人，受其金银衣物相赠，回家后将此事告知母亲，其母担忧儿子因此生祸，于是让其闭门不出，后元宵看灯，张胜始出家门，竟偶遇小夫人，小夫人告知他张士廉家被抄，自己无处可依，请求张胜收留，张胜心生怜悯，于是告知母亲，母亲亦为人心善，将小夫人收留，后小夫人虽多次暗示张胜行乱伦之事，然张胜“志诚”，不为所动。后张胜偶遇张士廉，得知小夫人竟已死，对家中小夫人心生疑虑，后张士廉到访，家中小夫人竟不见踪影，确信其果真为鬼，因“志诚”躲过一难。

这三条线索全是以小夫人起，小夫人一线自不必说，张士廉也是因娶小夫人才遭遇了后续的变故，张胜后续的一系列行为也是因小夫人起。三条线索又全是以小夫人终。另一方面，这三条线索又全是因为金钱起，又以金钱终。表面上看，此金钱指的是小夫人赠张胜钱财一事，与张士廉无关，但进一步看，金钱所指实为财，小夫人因贪财而盗珠，最终身死，张士廉又何尝不是贪财呢？其娶亲的第三件事便是要求“有十万贯房奁的亲来对付我。”，结果却料遭遇横祸，最终幸而寻得数珠才重获家产。在张胜线索中，金钱又与情紧紧联系在一起，其线索亦是因小夫人赠金钱起，又以归还数珠终。在这三条线中，小夫人和张士廉全是因为没有节制的情欲与贪欲才导致劫难，唯独张胜坚守本心之诚之善，所以才免遭劫难。因而，以《小夫人金钱赠年少》为题无疑更有利于揭示故事的情节线索。至于三桂堂刻本将正文亦题为《张主管志诚脱奇祸》，则是书商出于追求目录与正文题目的统一性所为。可能并未重视正文题目的对偶性，亦没有重视《小夫人金钱赠年少》一题与情节线索的密切关系。

四、《小夫人金钱赠年少》中“志诚”观的体现

从“志诚”的境界层面来看，张胜对小夫人并无非分之想，做到了“静无”，故而即使小夫人三番五次暗示张胜，张胜亦不为所动，始终以主母待之，在“动有”时并不纠结与勉强。

从“志诚”的内容层面来看，不仅兼善堂刻本的第十六回体现了“忠信”与“忠孝”，第十五回亦体现了这两种道德品质。盖冯梦龙在“三言”篇目的编排当中采用了对应原则，即每两卷题目成对偶句，内容互相补充呼应。从题目上来看《金令史美婢酬秀童》与《小夫人金钱赠年少》构成对偶。从内容上来看，秀童与张胜相互呼应，都具有“忠信”与“忠孝”的品质，在《金令史美婢酬秀童》中，秀童是金满家的小厮，二人构成的是主仆关系，但金满又将他视为过继的义男，二人构成父子关系。秀童在对待金满时既有对他的忠，又有对他的孝。如当遭到阴捕毒打，奄奄一息，被金满逼问时，秀童并未痛骂金满，反而说：“又见爹信了野道，召将费钱，愈加不乐，不想道爹疑到我身上。今日我只欠爹一死，更无别话。”^[8]即使真相大白遭到冤枉亦没有怨恨金满之意，说的是“这砍头贼！你便盗了银子，却害得我好苦。如今我也没处伸冤，只要咬下他一块肉来，消这口气。”^[8]除“志诚”在两篇中都有所体现外，金满信奉道人神将与张士廉信奉道士道疏、金满之圆滑事故与张士廉之“精明”贪婪亦相呼应。此外，秀童与张胜最终都获得了好的回报，亦体现了作者宣扬“志诚”的意图。

下面再来看张胜的“忠信”与“忠孝”，一方面，张胜作为张士廉铺子的主管，应当对张士廉“忠信”，而他确实亦做到了。比如，张胜对小夫人从未动过邪念，只以主母待之。再比如，张胜并没有因一己私欲偷藏价值连城的数珠，而是将数珠下落如实告知张士廉。足见其对主人尽忠无欺。另一方面，张胜亦做到了“忠孝”，比如，当母亲不让他去张士廉铺子时，张胜并没有违背母亲意愿；元宵节看灯与王二哥走^[8]散时，张胜第一时间想的是“只我先到屋里，我娘便不焦躁。若是王二哥先回，我娘定道我那里去。”担心母亲挂念自

己。当小夫人请求张胜收留时，张胜亦没有自作主张，而是先请示自己的母亲，足见其孝。

综上所述，在面对有违伦常的情事以及来源不正的财物时，张胜并没有为情欲与贪欲所惑；相反，他并没有任何不正当之想法，无一己之私欲，在具体行动时，亦践行了“忠信”与“忠孝”的品质，没有内心的纠结，更无表里不一的行径。其“忠诚”的道德品质符合中国古代政治生活与社会家庭生活中最为核心的“忠”“孝”的品质，因而冯梦龙选入此篇，以告诫、教化普通民众。

五、《小夫人金钱赠年少》与《金瓶梅》的互文性

“互文性”这一理论最早由法国批评家“克里斯蒂娃”正式提出。在《巴赫金，词语、对话和小说》一文中克里斯蒂娃写道“任何文本的构成都仿佛是一些引文的拼接，任何文本都是对另一个文本的吸收和转换。互文性概念占据了互主体性概念的位置。诗性语言至少是作为双重语言被阅读的。”^[12]在《文本的结构化文体》中，她写道“文本是一种文本置换，是一种互文性：在一个文本的空间里，取自其他文本的各种陈述相互交叉，相互中和。”^[12]尽管以上两段文字并不足以展现“互文性”理论的全貌，但却揭示了“互文性”理论的一个重要特性，即任何文本都不是完全孤立存在的，各文本之间的陈述是相互交叉和转换的。

诚如李桂奎在《〈金瓶梅〉与“三言”之“互文性”及相关悬疑破解》中所说，“尽管‘三言’较《金瓶梅》‘词话本’晚出数年，但我们不要忽视二者基本上处于一个共时的话语空间之中，况且出版时间的前后并不绝对代表创作或编辑时间的先后，而且某单位时间内的文学共时创作本身也容易造成双向渗透。”^[13]在“三言”与《金瓶梅》文本的创作过程中，二者可能在一个共时的话语空间中，双向渗透，进而导致二者在文本内容上具有一定的相似性。而《警世通言》中《小夫人金钱赠年少》一篇，恰恰很好体现了“三言”与《金瓶梅》文本内容的相互渗透。

从内容上来看，《金瓶梅词话》第一回中，年过六旬的张大户买了两个使女，其中一个便是潘金莲，潘金莲年幼时则被卖在王招宣府里，这与《小夫人金钱赠年少》中张士廉、小夫人的出场形象极为相似。第二回中潘金莲帘下偶遇西门庆亦与《小夫人金钱赠年少》中小夫人帘下遇张胜颇为相似。再如一百回中春梅托金匱送李安衣服与银元，李安回家告知母亲，母亲让其闭门装病，亦与《小夫人金钱赠年少》中情节颇为相似。此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为明末时期《志诚张主管》的故事却乎存在，被兰陵笑笑生和冯梦龙同时使用。第二种可能即《金瓶梅》与《小夫人金钱赠年少》在创作过程中双向渗透，甚至兰陵笑笑生与冯梦龙关系密切。无论哪种可能，都足以说明二者间存在互文性。此外，两者在语言上亦极为接近，试看以下两段标注部分：

一日冬月天气，李安正在班房内上宿，忽听有人敲后门，忙问道：“是谁？”只闻叫道：“你开门则个。”李安连忙开了房门，却见一个人抢入来，闪身在灯光背后。李安看时，却认的是养娘金匱。李安道：“养娘，你这晚来有甚事？”金匱道：“不是我私来，里边奶奶差出我们来。”李安道：“奶奶教你来怎么？”金匱笑道：“你好不理得，看你睡了不曾，教我把一件物事来与你。”向背上取下一包衣服，“把与你。包内又有几件妇女衣服与你娘。前日多累你押解老爷行李车辆，又救得奶奶一命，不然也乞张胜那厮杀了。”说毕，留下衣服出门。走了两步，又回身道：“还有一件要紧的。”又取出一锭五十两大元宝来，撇与李安，自去了。^[14]

其日却好正轮着张主管值宿。门外面一间小房，点着一盏灯。张主管闲坐半晌，安排歇宿，忽听得有人来敲门。张主管听得，问道：“是谁？”应道：“你则开门，却说与你！”张主管开了房门，那人跨将入来，闪身已在灯光背后。张主管看时，是个妇人。张主管吃了一惊，慌忙道：“小娘子你这早晚来有甚事？”那妇人应道：“我不是私来，早间与你物事的教我来。”张主管道：“小夫人与我十文金钱，想是教你来讨还？”那妇女道：“你不理会得，李主管得的是银钱。如今小夫人又教把一件物来与你。”只见那妇人背上取下一包衣服，打开来看道：“这几件把与你穿的，又有几件妇女的衣服把与你娘。”只见妇女留下衣服，作别出门，复回身道：“还有一件要紧的到忘了。”又向衣袖里取出一锭五十两大银，撇了自去。当夜张胜无故得了许多东西，不明不白，一夜不曾睡着。^[14]

从标注部分不难看出，两者处在共时的话语空间中，所以语言接近，存在互文性，并且亦不能排除冯梦龙与兰陵笑笑生关系密切，二者在创作过程中确实有着相互引用、借鉴文本的可能性。

此外，《金瓶梅》与《小夫人金钱赠年少》之题目亦存在相似性。《金瓶梅》之“金”代表的是金钱，“梅”代表的是女色。而《小夫人金钱赠年少》中，小夫人亦代表了女色，“金钱”则代表着钱财，尽管财色二欲在各类话本小说中屡见不鲜，冯梦龙和兰陵笑笑生皆以此为题也不足为怪，但亦足以说明两者处于同样的话语空间与文化环境。又，张主管与小夫人故事中的相关信息在《金瓶梅》其他回中并没出现，独出现在第一回、第二回和最后一回。若此为巧合（一二回中交代潘金莲身世及其与西门庆初识的情节，作者引用、借鉴了张主管与小夫人故事中的叙事套路和模式，最后一回庞春梅勾搭李安亦借鉴了该套路和模式，并不排除因情节需要作者套用了该套路，而这两段情节又恰好在故事开头和结尾的巧合）那创作者屡屡借鉴该

模式是否能说明其与民间的说话艺人有着密切联系呢？（前提是张主管话本在“三言”以前确实存在），若此确实为作者刻意安排，他又想表达什么呢？其与说话艺人或冯梦龙的关系又是如何呢？

综上所述，以上诸多信息虽不足以证明《金瓶梅》与“三言”《小夫人金钱赠年少》存在直接的引用、借鉴，但足以说明二者处于同样的文化环境与共时的话语空间，具有“互文性”。同时，亦可以侧面论证《金瓶梅》大致为明万历时期所作，创作者与冯梦龙或说话艺人（也有可能两者都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六、结语

从以上的论述中不难看出，“志诚”实为中国古代统治阶层用以维系政治秩序以及社会家庭伦理秩序的最为核心的品质，冯梦龙《警世通言》中存《张主管志诚脱奇祸》一篇，足见其教化普通民众的意图。另一方面，同其“情教”观类似，冯梦龙亦旨在将“三言”建构为一个完整的体系，因此无论是在书名选择上，还是故事编排上，都有一定的体系性和逻辑性，最为明显的特点便是，上下两回的题目常常对偶，其内容亦常常相互呼应，以此将中国古代之重要伦理道德规范都纳入自己的“三言”中，来实现教化之目的。

另一方面，《金瓶梅》与《小夫人金钱赠年少》处于同样的文化环境下，亦大致有着共时的创作与传播空间，因而二者之文本相互渗透、交叉，具有互文性，表现为情节与语言有诸多相似之处。借助互文性理论，亦可以辅助研究者更好的研究《金瓶梅》的创作时间及创作者等问题。

参考文献：

- [1] 黄寿祺,张善文译注.周易译注[M].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
- [2] 王国轩译注.大学·中庸译注[M].北京: 中华书局, 2006.
- [3] 曾运乾,黄曙辉点校.尚书[M].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6.
- [4] (汉)许慎著; 汤可敬译注.说文解字[M].北京: 中华书局, 2023.
- [5] 周才庶.孟子“以意逆志”论的阐释[J].孔子研究, 2009, (06) : 48 - 54.
- [6] 金良年译.孟子译注[M].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6.
- [7] (元) 王实甫注;张燕瑾校注.西厢记[M].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2.
- [8] (明) 冯梦龙著.警世通言[M].北京: 中华书局, 2014.
- [9] 朱伯崑.易学哲学史[M].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95.
- [10] 朱汉民.忠孝道德与臣民精神——中国传统臣民文化分析[M].河南: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4.
- [11] 涂秀虹.从“三言”看冯梦龙的贡献[J].明清小说研究, 1997, (01): 102 - 113.
- [12] 秦海鹰.互文性理论的缘起与流变[J].外国文学评论, 2004, (03): 19 - 30.
- [13] 李桂奎.《金瓶梅》与“三言”之“互文性”及相关悬疑破解[J].明清小说研究, 2016, (01) : 15 - 30.
- [14] (明) 兰陵笑笑生著; 陶慕宁校注; 宁宗一审定.金瓶梅词话[M].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8.

The Concept of "Sincerity and Loyalty" in "The Little Lady Gives Money to the Young Man" and Its Intertextuality with Jin Ping Mei

Meng Xiangze,Zhao Qianhui

Yunnan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main purpose of Feng Menglong's creation of "Sanyan" (Three Collections of Short Stories) is to educate the general public. He adopted the principle of correspondence in the arrangement of the stories, that is, the titles of every two volumes form an antithetical couplet, and the contents complement and echo each other. Among them, Chapter 15 and Chapter 16 of Jing Shi Tong Yan (Stories to Warn the World) complement and echo each other, jointly expressing the theme of "sincerity and loyalty". In the aspect of realm, "sincerity and loyalty" is manifested as "stillness in the absence of movement and existence in movement", and in the aspect of content, it is manifested as "faithfulness and loyalty" and "filial piety and loyalty". These two aspects jointly construct the core ethical and moral values and code of conduct of the general public. In addition, "The Little Lady Gives Money to the Young Man" and Jin Ping Mei are in the same cultural environment and synchronic discourse space, and there are phenomena of mutual intersection and penetration in the texts, showing intertextuality.

Keywords: Sincerity and Loyalty; Zhang Sheng; Intertextuality; Jin Ping Mei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2.504

大型国际会展对城市发展的影响——以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杭州）为例

周璜¹, 李依睿², 全文彬³, 潘逸航⁴, 陈佳乐⁵

(杭州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18)

摘要: 我国会展业的迅速发展, 为相应的办会城市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以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对杭州市发展的影响为例, 结合线下访谈和调研的数据后不难发现: 此会展的举办带来了极大的积极影响, 但依旧存在管理体制机制不够完善、基础设施与物资供应不足、办展专业化有待提高等问题。结合参会人员的建议以及国内外优秀展会案例, 针对本次数贸会存在的问题, 提出有关会展优化的多方面建议, 意在为其他展会的举办做参考并更好地“搞活一座城”。

关键词: 会展业; 城市发展; 数字贸易

习近平总书记在青岛峰会成功举办后, 提出了“办好一次会, 搞活一座城”的重要指示, 不仅强调了会展业对城市发展的巨大影响和强大推动力, 而且凸显了大型国际会展的成功举办能够有效地带动参展企业的发展、促进地区内外交流与沟通、优化城市国际形象。而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也强调要“完善发展服务业体制机制”, 意在将我国服务业的未来方向具体化, 为会展业的企业规划作出明确要求与目标, 进一步推动会展业在我国的质量提升与布局优化。

由浙江省人民政府和中国商务部共同主办, 杭州市人民政府、浙江省商务厅和商务部外贸发展局承办的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是经国家批准的国内唯一以数字贸易为主题的国家级国际性展会, 是中国(浙江)自贸试验区扩区后国家赋予的重要战略平台。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以‘国家级、国际化、数贸味’为宗旨, 截至2023年, 已举办过两届, 习近平总书记曾致贺信: “共商合作、共促发展、共享成果, 携手将数字贸易打造成为共同发展的新引擎, 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本次数贸会将以“一体运营, 数实融合”为特色, 以“数字贸易, 商通全球”为主题, 于2024年9月25日至29日在杭州南阳街道的杭州大会展中心举办。浙江省副省长卢山介绍, 已经有1500多家企业确认参展, 其中国际企业超过300家; 超过3万名专业采购商登记注册参会, 其中国际客商超过6000名。本次展会总规模达15万平方米, 展示面积较上届提升88%, 总体架构由“1+6”升级调整为“1+8”, 分别为1个综合馆和8个特色数字产业馆。

值得注意的是, 三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皆在杭州召开。自2022年至2024年, 数贸会的举办都吸引了来自不同地区、文化、专业的展商与客商, 并引起了世界各地人们的关注, 也为杭州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机遇。数贸会不仅促进了杭州企业与国内外其他企业的深入交流, 促成了相关领域的交易, 创造了巨大

[作者简介]

- [1]周璜 (2004—), 男, 江西抚州人, 杭州师范大学本科生, 研究方向为传播学。
- [2]李依睿 (2005—), 女, 浙江温州人, 杭州师范大学本科生, 研究方向为传播学。
- [3]全文彬 (2004—), 男, 浙江温州人, 杭州师范大学本科生, 研究方向为传播学。
- [4]潘逸航 (2005—), 男, 浙江温州人, 杭州师范大学本科生, 研究方向为思政教育
- [5]陈佳乐 (2004—), 女, 浙江丽水人, 杭州师范大学本科生, 研究方向为数字媒体。

的经济效益，同时也带动了城市形象、基础设施、科技创新、展馆建设等方面全面提升，集中体现了“办好一次会，搞活一座城”这一习总书记关于会展举办与城市发展关系的重要论述，具有较高的研究意义。本文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运用实地调研法、访谈法等研究方法，围绕以下问题展开研究：

1. 本次数贸会为杭州发展带来了怎样的机遇与影响？
2. 本次数贸会是否有给展商、客商及媒体等提供全面且周到的参展服务（有哪些亮点及不足之处）？
3. 结合国内外优秀展会案例针对本次数贸会暴露出的一些问题可以提出哪些具有实操性的建议？

最后通过分析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的相关数据以及与会者的相关访谈记录，探究该展会对中国城市发展的影响，即总结该展会的办展成功之处以及相关问题，并结合实际、学习国内外其他优秀展会的经验，提出提升展会质量的一系列措施，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办好一次会，搞活一座城”的重要论述，并为其他会展提供一定的借鉴。

一、文献综述

会展业是指由举办会议、展览和大型社会活动而引起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各相关企业共同构成的一种综合性产业形态，是现代服务业和现代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主要以展览和会议的各组织和承办单位为中心，以活动的展馆设施、配套服务和完善的基础设施为支撑，由各有关企业共同组成的一个综合性完整产业链条^[1]。

国内学者从多个不同的角度研究了会展对于城市发展的影响：

（一）推动经济发展与优化营商环境

吴媚（2016）从国际会展影响效应的角度，认为国际会展业在城市发展方面有乘数效应、集聚效应、产业联动效应，不仅能够为城市带来直接经济效益、带动城市相关产业发展、优化城市产业结构，还能增加城市就业机会、促进国际的城市交流合作、提升城市的国际营商环境^[1]。以上学者认为会展业的发展能够直接抑或间接地带动城市的经济发展，成为城市营商领域的关键成分之一。

（二）增强产业优化合作与相关产业发展

唐伟文（2011）就会展与城市的关系，认为会展业是高度依存于城市的产业，它必须以城市会议和展览设施为依托，以城市基础设施、产业结构、消费结构等为基础，通过市场，利用专业化运作，才可为城市带来综合效益的经济活动。因此，产业的互相合作与带动可以促进会展业的发展，同时，会展业的发展也可反作用于城市中的相关产业，推动产业结构优化^[2]；孟凡胜、宋国宇、井维雪（2012）发刊认为城市会展业能够实现资源要素跨时空维度的聚集、整合与配置，进而实现城市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并且强调会展业发展为实体经济提供平台并促进资源要素的优化配置与整合提升，与城市经济增长、城市发展综合能力提高关系密切^[3]。因此，会展业的发展能够带动一个城市中相关产业的结构优化与升级，从而创造更加优良的经济发展环境，带动了产业以及城市的经济发展。

（三）带动基础设施建设与完善

蔡礼彬（2006）以昆交会为例，认为会展业推动了市容市貌的明显改观和会展场馆建设的逐步升级，也间接改善了基础教育状况与办学条件^[4]；安婷和朱彦（2018）发刊认为，城市政府为了发展会展经济，必定会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力度，以满足国际会议、展览及活动的要求，即会展业能够推进城市基础设施建设^[5]。可见，无论是交通、能源、通信还是市政方面的基础设施都有所升级与促进，会展业的举办为周边地区的基础设施改良作出了难以估量的贡献。

（四）吸引与培养高端科技人才

岳辉（2019）发刊认为通过会展活动这一发展机会，相关机构可以加快科研步伐，且社会各界精英和学者进行交流时，也会在很大程度上促进对科研领域的认知，进而更为精准的培养出更多符合时代发展以及城市发展所需的综合性人才。因此，可以说会展经济的不断发展不仅能够促进城市产业结构的升级，同样也能够帮助城市带来更多高效的人力资源^[6]。因此，特别是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这类与科技、数字息息相关的会展，能够更好地吸引高端数字人才的参加与合作，从而带动数字贸易的高速发展，为城市乃至国家科技都作出了关键的贡献。

(五) 改善城市形象和提高国际化水平

洪晔(2019)以第22届津洽会为例收集大量调研数据并使用软件SPSS 19.0分别针对参展商和观众样本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品牌会展的信息传递效率、组织主体评价水平、展出效果对城市形象传播效果均存在显著影响,得出“提高品牌会展影响力对于提高城市形象传播效果有积极作用”的结论^[7]。综上,会展的举办代表了一个城市的形象,能够对城市带来良好的国际宣传作用,使得本城市在国际环境中更有影响力。

(六) 促进跨文化交流

结合了会展、市民与文化,胡冰清(2015)指出在会展业与城市文化的关系中,会展业可以提高市民的整体文化素质,并且可以促进文化交流的学习,更好地弘扬文化,推动文化的创新,并且城市文化的软实力的提升也会对经济的发展有极大的推动作用^[8]。因此,文化作为城市的标签,不仅能够对本城文化作出有影响力的宣传,也能促进不同城市乃至不同国家之间文化的沟通交流。

在以上研究中,学者们主要以城市与会展经济关系本身为研究对象,从不同角度揭示了会展对城市发展的研究。他们的研究对今天的我们仍然有着极大的借鉴意义,其研究成果为我们研究国际数字会展对城市发展的影响奠定了基础,尤其是部分专家以具体会展(如昆交会、津洽会)为例,为我们该项研究的开展提供了富有意义的启示。

然而,其中涉及到数字经济的研究相对较少,且都较为宏观,缺少对具体案例的分析。而在数字经济(贸易)高度发达的今天,会展业的发展模式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提升人们观展体验的同时,也给城市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本文将结合前人的研究,运用较为科学的研究方法,以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对杭州市发展的影响为具体案例,对前人研究进行补充,并以研究会展对城市的具体影响为引,来探究“会”与“城”之间的联系。

二、研究方法及数据分析

(一) 文献研究法

文献研究法是指查找、整理、分析大量国内外文献资料,对研究主题形成科学的认知。本论文通过查阅大量有关会展经济、会展服务等期刊文献资料和中外优秀会展的新闻报道,获取详尽数据、背景,确立研究目标,建立大致框架。

(二) 访谈法

在建立对中国会展业和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初步认知的基础上,采用半结构化一对一访谈法,发挥其聚焦会展主题和发散访谈对象思维的作用,深度挖掘数贸会亮点及其影响,更好把握客商、媒体等不同群体基本需求。在本次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上,我们在线下邀请了20位的参会者进行简单访谈,包括展商、客商、以及普通观众,并进行了相关记录。

(三) 问卷调查法

为掌握第一手数据,让本论文提出的建议更具有实际应用价值,在对展会进行实地调研及与不同群体之间访谈的基础上,设计调查问卷。从多维度切入,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总结本次展会不足,并提出针对性建议。团队收集57份调查问卷,涵盖展商、专业客商等群体。团队以国际化视角,着重调查外国客商对于本次展会的想法与满意度,得到了相关信息。

本次研究使用SPSS24.0软件对问卷数据进行信度分析、描述性分析、相关分析、回归分析、方差分析:

1. 信度分析

表 1 信度分析

问卷问题	删除项后的克隆巴赫 Alpha
您对本次展会的整体满意度是:	.709
您对展位的布置和位置满意吗?	.731
您认为您产品展示效果如何	.703
您认为展会的宣传推广效果如何?	.719
您在展会期间达成的商业合作意向数量是:	.788
可靠性统计	
克隆巴赫 Alpha	项数
.759	5

如表1所示,各个量表及总体的可靠性值均高于0.7,总体可靠性值为0.759,大于0.7,说明问卷量表信度较好,问卷的信度通过了检验,可以进一步做定性定量分析。

2. 描述性分析

表 2 描述性分析

	个案数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您对本次展会的整体满意度是:	57	3	5	4.37	.747
您对展位的布置和位置满意吗?	57	2	5	4.18	.848
您认为您产品展示效果如何	57	3	4	3.46	.503
您认为展会的宣传推广效果如何?	57	3	5	4.19	.789
您在展会期间达成的商业合作意向数量是:	57	1	3	1.86	.854
有效个案数 (成列)	57				

如表2所示: 整体满意度、展位布置与位置、产品展示效果、推广效果的均值均大于3 (问卷选项最小为1, 最大值为5); 而达成的商业合作数量为1.86 (问卷选项上, 达成1-2个商业合作项目赋值1, 达成3-4个赋值2)。这些数据表明在此次会展上, 产品展示方面相对有所欠缺, 可能需要加强但总体情况良好, 绝大多数参会者也都达成了商业合作。

3. 相关分析

表 3 相关性分析

	您对展位的布置和位置满意吗?	您认为您产品展示效果如何	您认为展会的宣传推广效果如何?	您对本次展会的整体满意度是:	
您对展位的布置和位置满意吗?	皮尔逊相关性 显著性 (双尾) 个案数	1 .563** 57	.563** .000 57	.376** .004 57	.545** .000 57
您认为您产品展示效果如何	皮尔逊相关性 显著性 (双尾) 个案数	.563** .000 57	1 .540** 57	.540** .000 57	.543** .000 57
您认为展会的宣传推广效果如何?	皮尔逊相关性 显著性 (双尾) 个案数	.376** .004 57	.540** .000 57	1 .513** 57	.513** .000 57
您对本次展会的整体满意度是:	皮尔逊相关性 显著性 (双尾) 个案数	.545** .000 57	.543** .000 57	.513** .000 57	1 57

**. 在 0.01 级别 (双尾), 相关性显著。

如表3所示: 整体满意度与各因素 (布置与位置、产品展示效果、宣传推广) 之间两两样本的P值为0.000, 整体满意度与各因素的皮尔逊相关性系数分别为0.545、0.543、0.513, 大于0, 为正相关; $p<0.01$, 具有统计学意义, 说明问卷研究的各因素对整体满意度具有积极的影响作用。

4. 多元回归分析

以整体满意度作为因变量, 布置和位置、产品展示、宣传推广、商业合作数量作为自变量, 进行多元回归分析, 得到分析结果见表4。从回归分析统计数据显示: 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R方值为0.482, 说明两者之间具有相当强的相关性。

从表4可以得出的回归方程为:

$$\text{整体满意度} = 0.975 + 0.297 * \text{布置和位置} + 0.283 * \text{产品展示效果} + 0.188 * \text{宣传推广效果} + \text{商业合作意向} * 0.256$$

通过回归分析可以看出, 宣传效果的影响较小, 而布置和位置、产品展示效果以及达成商业合作数量影响较大。

表 4 多元回归分析

模型	R	R 方	调整后 R 方	标准估算的误差
1	.694a	.482	.442	.558

a. 预测变量: (常量)商业合作意向数量, 布置和位置, 宣传推广, 产品展示效果

b. 因变量: 整体满意度

模型	未标准化系数		Beta	t	显著性
	B	标准误差			
1 (常量)	.975	.544		1.794	.079
您对展位的布置和位置满意吗?	.297	.107	.337	2.767	.008
您认为您产品展示效果如何?	.283	.199	.190	1.419	.162
您认为展会的宣传推广效果如何?	.188	.118	.199	1.597	.116
您在展会期间达成的商业合作意向数量是:	.256	.094	.238	2.213	.031

a. 因变量: 整体满意度

5. 调查结论

从问卷数据分析可得知, 布置和位置、产品展示、宣传推广、商业合作数量对会展总体满意度具有强烈的相关性, 且可知参会者在产品展示这方面的满意度略逊于其他方面, 说明会展主办方在此方面上需要加强。从多元回归分析中可得知, 对整体满意度影响最大的是展位的布置与位置, 说明参会者可能更注重实际游览的感受。

三、研究发现

(一) 展会亮点及影响

1.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提升数贸法治保障

根据访谈记录和调研数据, 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的知识产权保护措施较为完善, 52.63%的展商表示对本次数贸会非常满意, 未发现有抄袭或模仿产品的现象。针对此次数贸会, 检察机关出台了数字贸易知识产权保护的服务清单来统筹工作, 同时进一步畅通检企交流的通道, 推动数据安全等领域的发展, 其不仅在现场接受相关举报与投诉, 还上线了微信小程序以方便参展方反应情况。同时, 数贸会主办方还在中登录厅两侧的服务台设置了专门的知识产权服务点, 以方便参展商及客商进行知识产权相关方面的咨询。除知识产权保护外, 全国首部数字贸易地方立法《杭州市数字贸易促进条例》的正式实施也为数贸会的举办保驾护航。该条例的出台明确了数字产业发展方向与重点, 有利于培育壮大数字贸易市场主体、推动数字经济的二次发展, 并促进了政务环境的优化。这些措施有效支撑了数博会展商展示先进核心技术的信心, 同时也展现了杭州市政府对数字贸易发展的重视, 为加强政企深度合作创造了有利条件。

2. 升级会展数字平台, 优化展商客商体验

展会整体申请流程高效, 办展效率较高。在本届数贸会的筹备过程中, 主办方充分运用了数字化网络手段在不同传播媒介上开发了不同的服务平台, 推动了整场数贸会办展效率和服务质量的提高, 改善了展商、客商等的参展体验。首先, 主办方提供了多样的申请入会渠道, 参会人员不仅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微信小程序“数贸在线”进行线上注册报名, 还可以在支付宝、数贸会官网申请参展。其次, 通过对展商的调研, 我们发现数贸会的展位搭建效率较高, 展会对于展商及客商的审核较快, 并为展商与客商提供了专属的注册确认函。而且系统在客商注册确认成功后, 会根据客商的采购意向、询盘信息等进行展商个性化推荐, 提高了客商的参展效率与机动性。同时, 主办方在“数贸在线”小程序上开放了活动预约、在线约见等功能, 使得展商及客商报名参加“丝路电商”合作资源对接会、“数智中非”产业对接会等主题及特色活动更加便捷。

3. 构筑国际开放高地, 扩大杭州国际影响

数贸会的成功举办, 是杭州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先把蛋糕做大”这一指示的具体实践。本届数贸会吸引了来自32个国家和地区的300余家国际企业参展, 海外企业占总参展商的20%以上。400余项创新成果中, 约25%为海外引进。这些都彰显了杭州的开放姿态和国际视野。在数贸会上, 英国医药企业阿斯利康与同行合作, 推出了数字化诊疗方案; 联合国数字贸易发展相关组织及中国-东盟国际中心分享了数字贸易发展与合作的经验; 亚马逊、沃尔玛、美客多等国外知名电商平台, 共同展示数字电商发展带来的巨大效益,

为丝路沿线各国带来发展机遇。借助数贸会，中国与多国共同推动了数字贸易项目的开发与落实，如加快建设“一带一路”中非合作产业园项目，深化数字贸易领域交流合作。综上所述，数贸会这一国际性的商贸会展平台，不仅为杭州的众多企业带来了国际化的机遇，还极大地提升了杭州在数字贸易方面的国际影响力，有序推进“中国数谷”的建设，不断释放数字经济潜力，拓展杭城在数字经济发展领域的全球影响力。

4. 助推商务数字转型，打造全球电商新都

跨境电商，作为一种集合传统贸易和数字经济的新业态，正朝高水平、深层次迅猛发展。其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作为抓手，开拓数字化路径，优化数字赋能效果，建立数字型商务生态环境。数贸会期间举办的“丝路电商日”活动以“2+2+1”方式开展，即2场对接活动、2场配套活动、1场主题展：从现场签约，到线上数贸，数字技术深度赋能“引进来”和“走出去”，数字平台降低贸易成本、简化贸易流程。关于跨境电商高质量发展行动和计划的推出，加快杭州电商深度发展步伐。数字贸易发展合作呈现良好态势：在与阿里巴巴集团合作下，卢旺达成为首个建设eWTP的非洲国家。通过阿里巴巴的跨境进口平台销售咖啡豆，增加当地营业利润。该合作更是证明杭州电商辐射全球的发展潜能。数贸会的成功举办，助力杭州商务的数字转型持续发力、纵深推进，扩大杭城电商辐射范围，激活电商企业创新活力，建立全球性链接的电商平台，为杭城电商可持续发展注入强劲支撑。

5. 完善配套基础设施，提高城市服务能力

据中共杭州市委、杭州市人民政府报告，为迎接数贸会，杭州大会展中心周边交通路网体系不断完善，如：104国道会展新城核心段的建设，跨港城大道节点钢混组合梁架设的完成，南阳大道北伸工程的正式通车等。这些措施有效缓解区域交通压力，提供了便捷的外部交通条件。其次，场馆及周边实现了5G网络的全覆盖，应用智能网络调度系统等先进的网络优化技术，确保展会期间网络的稳定性和低延迟性。同时，展馆还配备前言的监控、门禁和检测系统，均符合安全标准，为未来会展活动的安保工作树立典范。此外，杭州会进一步加大数据中心的建设和资金投入，提升数据中心的硬件设施和服务水平，这无疑为数字贸易企业提供更强大的数据存储和计算支持，也为杭州打造“中国数谷”的梦想蓝图迈出具象化一步。无论是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善、“数智”系统的建设，亦或是安全系统、数据中心的优化，都能加速杭城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便捷性与智能性，稳步增强杭城现代化服务水平。

（二）不足之处

1. 基础设施与物资供应不足

根据展商的问卷反馈，在布置场地方面，会展主办方并未直接提供座椅等基础设施，要求展商自己租赁座椅并单独为租赁物的受损程度负责，使得部分展商感到困扰。并且，也有客商反馈，由于指示不清晰，他们并不能在会展中及时找到水源供给点。此外，冠以“数字”标签的会展，其网络状况却并不是非常稳定，影响了部分展商及客商的参展体验。同时，多数人表示停车场的引导与地下停车库的运行并没有想象中的方便快捷。综上，在举办会展时，部分基础设施与物资的供应出现了纰漏，以致于给展商与客商带来了部分的不快体验。因此，会展举办方面需要对基础设施与物资供应进行改善。

2. 场地指引流程亟待优化

根据我们对展商、客商的访谈及回收的调研数据来看，部分展商认为场地指引不够到位，他们在会展刚刚开始的时候，并没能迅速找到自己展位的具体位置，白白浪费了许多时间，降低了展位布置的效率。而许多客商虽然在“数贸在线”小程序中查找到了自己想要参观的展位，但由于单个场馆面积过大，想要迅速找到相关展位，对于客商而言，仍然有一定困难。尽管本次会展组织了多轮的客商团指引工作，但对于客商本身而言，如果他们想要单独进行逛展，而不是跟随大部队的话，相关指引工作仍需提高。

3. 语言翻译方面仍需提升

在我们采访的多名外国客商当中，有许多外国友人表示，整场展会（尤其是展商）能讲英文，可以进行翻译的人员过少，而且许多展位并没有配备英文模块的讲解，甚至并没有展示英文，大部分只是以中文呈现相关信息，为他们逛展造成了极大的不便。而我们也对多位展商进行了访谈，许多展商表示，自家的展位确实没有配备相关的翻译人员，并且也并没有为展位的相关模块配备英文翻译。除此以外，整场展会具有翻译能力的志愿者相对较少，且场馆较大，志愿者较为分散（且志愿者的积极性有待提高），部分外国客商在遇到语言沟通问题时，没能及时找到对应的翻译。

4. 安保巡逻工作存在漏洞与隐患

在参展现场以及数贸会微信公众号线上评论区中，皆有参展人员表示遇见过不良商贩。他们向他人介绍自己所谓的产品（尤其是民用无人机等低空飞行机），并在受害者完成支付后便离开现场。他们的存在

无疑破坏了数贸会的诚信氛围，损害了展商以及客商甚至普通观众的利益，影响了数贸会的安全性与可靠性，这也进一步反映出了此次数贸会安保与监管力度的不足，防范意识还不够到位，让不良商贩能够有可乘之机。

四、总结与建议

(一) 总结

总而言之，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为杭州带来了一系列的发展机遇，为杭州市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同时也促进了当地基础设施的完善，推进了人才培养机制的发展，尤其是政企校的深度合作。此外，本次会展还进一步提升了杭州的国际影响力，促进了国内外客商展商的合作，助力杭州打造国际数贸之都。当然，本届数贸会仍然存在着一些有待提升的不足之处。通过对访谈记录及调研数据的分析，并结合国内外优秀展会案例的成功经验，我们针对本次展会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以下建议。

(二) 改进建议

1. 综合优化会展设施

为推进会展可持续和高质量发展，首要在于将完善的基础设施和智慧的服务体系结合。从提升会展周边基础设施入手，在开展前做好相关调研，为重要展客商、高端群体、媒体预留停车点；在开展期间定期进行道路检修，优化停车环境，提高参展期间舒适度。对于会展配套服务，可增设自助服务站点，为展客商和观众提供打印服务。加强5G网络信号，构建大带宽、低延时、广联接会场数字特色，优化网络服务环境，提升参展各方数字体验感；赋能以数字信息技术化，推出在线3D立体地图以优化导航服务，详细表明各展厅所在位置以及内部的展商分布，节省客商时间精力，使参展过程更具目的性，避免关键展台的遗漏或无目的地重复观展。开通专门的物流运输渠道，并配备不同型号运输工具，增强搬运服务便捷性，解决展厅大、物资运输不便的问题；设立应用RFID技术的临时存储点，在提高物流效率同时，也保证了展品的安全性。

2. 构建双线并行会展

线下会展受企业、社会等多方面制约，最多持续5-7天。但这对于目标为新兴技术与高精尖产品的国家外派客商代表团而言，在短时间内汇报总结新展品，到洽谈合同、最后签订订单，这是一项耗时较长的工程。这就导致纵使有订单，成交额也并不乐观。再者，由于部分客商或展商时间冲突，难以抽身参展。据此，笔者建议设立线上平台，对线下会展辅助延伸，促进沟通交流、贸易往来。在提高会展成交率，增加销售额，落地会展成果，实现会展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大有裨益。让交易不再受时间地点制约，线上线下会展互为补充，实现会展的引流增值。

3. 打造英文友好型会展

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作为全球化的会展，更应认识到无障碍沟通的重要性。远道而来的外国友人，普遍将英文作为与中方沟通交流的媒介。经问卷分析和访谈调研，营造一个英文友好型展会迫在眉睫。这就需要主办方从多处入手：筛选英语水平更高的志愿者，对其提出更高的能力和性格要求；主动提供翻译服务，包括实时翻译工具或翻译人员等，确保无障碍沟通；设置双语展台，这也就意味着对产品的介绍要采取中英文分栏方式，以及双语字幕的推广宣传视频。此举都为充分激发市场活力扫清语言障碍。例如，德国汉诺威工业博览会(HANNOVER MESSE)作为全球顶级、世界排名第一的专业性、涉及工业领域最大的国际性贸易展览会，有充足的专业翻译人员提供服务，为展会的顺利进行保驾护航。

4. 优化会展管理体系

井然有序的会展秩序和科学合理的管理有利于会展的成功举办。针对展商证发放和信息通知两方面，可建立线上认证系统，发放展商电子码，简化展商证发放流程；实时更新展会信息，确保信息同步，从而提升展会的运营效率，改善各方参展体验。其次，制定详细的展会操作手册、设置岗前培训测试、落实细化管理人员具体工作、明确追责制度，以解决展会分工不明确和规则混乱的问题，增强工作人员责任感，有效避免相互推诿、不担当不作为的结果。最后，设立在线反馈收集点，完善反馈流程机制，并设立突发事件处理小组，保证会展顺利推进，同时，以持续性的服务提升各方满意度，增强会展专业性和吸引力。美国拉斯维加斯CES(International Consumer Electronics Show)的主办方美国消费技术协会(CTA)便具有丰富的展会组织经验，能够根据市场需求和行业发展趋势，不断调整和优化展会的内容和形式，以逐步改善展会的管理体系。

5. 精准筛选会展观众

一场优质的会展，受众群体地质量远比数量更为重要。专业性群体能够深入商业洽谈，推动订单合同的签约。提高会展交易额，促进新技术落地。而高端群体在扩大展品应用领域，增强产品影响力方面起推动作用，驱动会展良性循环。故而，组展单位有必要建立观众信息表和数据库，提高部分展区的观众准入门槛，为展商提供高质量客源，节省展商精力、提高介绍产品的针对性；针对性邀请相关嘉宾，推动深层次对话沟通，扩大品牌影响力。并且，身为国际化的大型展会，国际观众占比应多加提高，对国际观众的宣传与邀请也应更为广泛，例如德国慕尼黑激光及光电展览会(LASER-World of Photonics)，其中来自世界各地的观众参与度高，国际观众与专业学者比例较大，且不同的展区分设了不同的观众准入门槛，这为参展商提供了广阔的国际市场和高效的合作交流，也促进了全球光电行业的发展与进步。

6. 加强安保监管力度

安全，应落目于会展的每一个角落。首先，要增强会展现场的巡查力度，安排足够多的安保人员在展会现场进行高频率大面积巡查，密切关注参展人员是否存在吆喝行骗等可疑行为。并且，要向大众普及防骗知识并提醒他们谨慎交易，需要在数博会官网核实信息真实性，如若发现并无此展商相关信息，便可进行举报将其交予安保人员。同时，要提高会展出入口审核要求，在线登记参展人员的出入情况，避免不良商贩在来去自如的情况下肆意倒卖。

参考文献：

- [1] 吴媚.会展业对城市服务业经济的影响研究：以厦门市为例[D].华侨大学,2016-06-01.
- [2] 唐伟文.科学看待会展业对城市发展助推作用之浅见[J].中国城市经济,2011,(20):312.
- [3] 孟凡胜,宋国宇,井维雪.会展业发展的影响因素及对城市经济影响的实证研究[J].技术经济,2012,(04):32-37.
- [4] 蔡礼彬.论会展对城市发展的影响：以昆交会为例[J].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02):73-76.
- [5] 安婷和朱彦.西安市会展业发展对城市影响的研究[J].陕西广播电视台大学学报,2018,(03):89-92.
- [6] 岳辉.会展业发展水平对城市服务业经济增长价值探讨：以天津市为例[J].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9,(11):47-49.
- [7] 洪晔.品牌会展对城市形象影响及提升策略研究：以第 22 届津洽会为例[J].信息与管理研究,2019,(Z1):44-59.
- [8] 胡冰清.会展与主办城市的互助发展[J].中外企业家,2015,(06):39.

The influence of large-scale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on urban development -- Take the Global Digital Trade Expo (Hangzhou) as an example

ZHOU Huang, LI Yirui, QUAN Wenbin, PAN Yihang, CHEN Jiale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Abstract: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s conference and exhibition industry has created unprecedented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for the corresponding cities. Taking the Global Digital Trade Expo held in Hangzhou as an example, an evaluation system was constructed using data collected through offline interviews and research, with SPSS software employed. Based on the suggestions from participants and referring to successful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models, a series of recommendations for optimizing the Global Digital Trade Expo have been formulated to address some issues. Combined with the suggestions of participants and excellent exhibition cases at home and abroad, in view of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is exhibition, various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to optimize the exhibition, aiming at making reference for other exhibitions and better “revitalize a city”.

Keywords: exhibition industry; urban development; digital trade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2.488

电影《宠儿》象征主义分析

何明瑞¹ 冉吟啸²

(¹ 武汉大学，湖北 武汉 430072, ² 南京传媒学院，江苏 南京 211199)

摘要：随着美国、日本、欧洲等国家和地区的种族运动、性别运动的高涨，种族问题、性别议题逐渐成为社会热点。作为第一位非裔女性黑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托尼·莫里森在其代表作《宠儿》中，以魔幻式的手法展现了那段触目惊心的黑人受屈史。将以乔纳森·戴米的《宠儿》为影像文本，对象征主义的国内外概念进行进一步厘清和界定，同时从象征主义在电影艺术中的身份、地域、物品的具体应用，阐述象征主义和电影艺术的融合。其次，文章将深入分析电影《宠儿》的影像与角色象征意义，包括角色、空间、颜色，从代表族群未来希望的丹佛，到意味生命活力的绿色森林，一方面加深了电影对于族群文化、殖民文化的探讨；另一方面也印证了电影《宠儿》与象征主义的深层关联。此外，对《宠儿》所呈现的象征主义主题进行了探讨，涵盖身份认同的解构与建构、族群文化的殖民与反殖民，以解析黑人世界中充满象征与符号的历史，重现黑人生活的艰苦悲惨过往，期冀能给当下火热的种族、性别运动提供理性、客观的参考。

关键词： 象征主义；《宠儿》；种族文化

《宠儿》（1998）又译为《真爱》，由美国著名导演乔纳森·戴米根据第一位非裔女性黑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托尼·莫里森的《宠儿》改编而成，讲述了塞特从美国南方州逃离以后，结果一位宠儿的年轻女子的神秘闯入，让一家人不得不重新回首那黑人屈辱且痛苦的过往的故事。电影以极其魔幻色彩的方式展现美国黑人历史、奴隶制等社会问题，以塞特、宠儿为线索，烛照整个美国黑人社会和历史遗留问题。因此，在佳片辈出的九十年代，其成为了学术研究的热点之一，国外学界从各个方面讨论了其中所涉及的议题。

对于象征主义，从文化研究来看，随着文化研究的深入，人们越来越重视文化符号和象征在构建社会身份、传递价值观念和表达情感方面的作用。象征主义研究关注符号和象征在文化中的意义和作用，为理解文化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从跨学科角度来看，象征主义研究涉及到哲学、心理学、社会学、艺术学等多个学科领域，这种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有助于深入探讨象征的内涵和表现形式，同时为各学科之间的交流和对话提供了平台；从全球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下来看，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融合越来越频繁，象征主义作为一种跨文化的表现形式，对其研究有助于理解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冲突，以及文化融合的趋势。象征主义在当下的研究背景涉及文化研究的新发展、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交流等多个方面。这些因素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共同构成了如今象征主义研究的宏大背景。

故此，总体上从象征主义对电影《宠儿》进行艺术分析，一方面有助于推动象征主义于影视艺术之中电影表意方式的研究，另一方面也借助象征主义揭示其与社会的关系。

一、象征主义的概念与应用

（一）象征主义的定义和特点

象征主义是于 19 世纪末在西方欧美国家出现的一种艺术思潮，其名词源于希腊文“Symbolon”。在法国

[作者简介]

[1]何明瑞（2002-），男，湖北宜昌人，武汉大学艺术学院艺术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东欧电影、湖北电影、影视传播。

[2]冉吟啸（2001-），男，中国重庆人，青年影人，高校青年教师，代表作《大雾朦胧》《不要说古德拜》，作品曾在莫斯科国际电影节、北京国际电影节等多个国际电影节入围、获奖。

《Dictionnaire Encyclopedique Quiffet》中，象征主义是：1. 旨在联想信仰行为或表现信仰的象征体系。2. 以传说形式再现自然力量的象征。在这一意义上一切神话均具象征性。3. 将故事或语言作为象征的历史体系。世纪出现的诗歌运动。^[1]从中可得知，象征主义与神话、传说有着紧密的关联，因此其本身附着人们对于自然力量或未知事物的符号性想象，常通过某种符号指涉该自然力量和事物。

在艺术领域中，象征主义既指艺术、文艺运动，也指某种艺术手法，以表现人的深层思想。就前者而言，其泛指19世纪以来兴起于法国的艺术运动，包含文学、绘画、戏剧等多种艺术种类，其拥有共同特点，既用特定艺术形式，表现作者的情感、精神、思想等内在之物，而非外在之物，反对自然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直接描述；就后者而言，象征主义拥有多种独特的艺术手法，体现在戏剧艺术中，比利时戏剧家梅特林克所创作的“静态戏剧”标志着象征主义戏剧的诞生，其往往通过许多具象符号以表达抽象思想，也借用环境替代事件，以环境推动情节发展，更主张用“无声的语言”成为戏剧性动作的一部分。中国戏剧家孟昭毅在《东方戏剧美学》中，认为象征主义的基本特点有：1，主张暗示、直觉、意象，反对陈腐的说教和抽象的感慨；2，对外在事物的描写要以物言情，隐喻内心；3，借梦幻表达思想，从联想产生形象，以含蓄代替激情；4，借音韵增强感受，讲究音乐性、雕塑美和形式的工整，有时以晦涩的语言来刺激人的感官。^[2]

因此，所谈及的象征主义指的是一种艺术手法，即通过具体事物符号化、人物思想隐喻化、视觉表达梦幻化的电影艺术手法，指涉人类深层的真理和经验的多重层次。

（二）象征主义在电影中的应用和意义

象征主义最早出现于文学、美术、戏剧等领域，随着卢米埃尔兄弟发明电影后，也逐渐烛照电影艺术，但其并未像法国印象派、立体主义、抽象主义、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那般形成具有固定宗旨和特征的电影流派，而是化为电影艺术手法成为电影的一部分。因此，在众多电影艺术作品中都存在着象征主义或象征主义手法。

1. 身份

在电影叙事中，人物之所以重要往往是因为其所携带的身份。身份向上承接着电影主题的表达，向下连接着关系网和叙事逻辑的建立。以象征主义的视角出发，人物的身份往往也具有切实含义和指向，对整部电影的导向产生深刻印象。

在张艺谋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金陵十三钗》中，主人公约翰·米勒是从美国飘洋过海来到中国收敛遗体的神父，途中收到日本帝国主义军队的袭扰，并收容了许多中国人，最终使他们摆脱了苦难。米勒神父象征着基督教、耶稣，更象征着整个欧美国家，具有浓厚的西化意识形态。赛义德在著作《东方主义》(1978)中认为：东方主义是与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西方关于东方的话语形式，通过使东方成为西方属下的他者，东方主义服务于西方对东方的领导权统治。^[3]通俗而言，即西方在殖民过程中，极力通过暴力或非暴力的方式，将东方（广大非西方国家）纳入到其自身的叙事体系中，并使东方成为它的他者。在《金陵十三钗》中，导演将中国人民与帝国主义的斗争并最终取得胜利的过程，通过米勒的神父身份，潜移默化地转化为西方与帝国主义的斗争，以此达到西方世界拯救东方世界的殖民叙事，正因如此，张艺谋也多被诟病其创作陷入了他者化的陷阱。

而在《宠儿》中，最为典型的象征主义下的人物身份是作为母亲的塞特。塞特作为女性，其社会身份具备多重性，既可以是孕育生命，抚养家庭的母亲身份，也可以是相濡以沫、相敬如宾的妻子身份，然而在电影中，塞特的女性身份被落后的种族制度所肢解。一方面，作为母亲的塞特，她无法像白种人那般爱护自己的孩子，其对孩子表达爱意的方式在种族制度的压迫下，被扭曲成杀自己的孩子，以此不让孩子步自己的后尘；另一方面，作为妻子的塞特，她缺乏正常人的家庭，终日生活在一个充满梦魇、动荡的房屋内，只能依靠自己抚养自己的孩子，其妻子的身份也逐步将已经缺失的父亲身份给囊括。因此，在一个在充满种族制度社会中的黑人塞特，其作为女性的母亲身份和妻子身份被无限扭曲，充分体现出侵犯人权的种族制度对黑人族裔的压迫，以及其带来的无尽痛苦。

2. 地域

地域，或空间，即电影故事所发生的地方，是主人公性格转变与发展的空间，对于电影的主题和表达具有浓厚的象征意味。某个单一地域的形成有其主要的原因，而原因则是各类象征符号的意义。

在“追光动画”的动画电影《白蛇2：青蛇劫起》中，影片90%的叙事主要开展于修罗城中。根据电影剧情，修罗城不是天堂不是地狱，也不是人间，修罗城是弱肉强食。根据美国学者爱德华·W·索亚在1996年的专著《第三空间：去往洛杉矶和其他真实和想象地方的旅程》^[4]中提炼出“第三空间”的概念，又译为异质空间，而此概念是针对“第一空间”和“第二空间”而言。“第一空间”是指可感知的空间，其认识领域包括自然和人文科学等，即真实的空间，而“第二空间”是由空间思想构成，它是在空间的观念之中构想出来的，缘于

人类的精神思维活动。在“第一空间”和“第二空间”的基础上，“第三空间”则指代既是生活的真实空间，又是想象的精神空间，即“第一空间”和“第二空间”交集，人们就在此地作出决断和选择。修罗城便是典型的异质空间，象征着人对于前世的执念。小白和小青在修罗城中对前世的执念做抉择，与自己的前世斗争。因此，地域作为培养人物性格的培养皿，本身具备着浓厚的象征意味。

而在《宠儿》中，124号是塞特一家获得自由以后的住所，虽然他们一家在法案的支持下，重新获得自由，但种族制度的社会仍给他们造成了相当的心理压力，即影片中所呈现的屋子内不安的躁动、无端的咆哮等等。在爱德华索亚的“第三空间”的理论下，124号房间亦是一个第三空间，其不同于物质的第一空间和精神的第二空间，而是物质和精神、主观和客观的第三空间，所有族群的记忆、过往的伤痛均暴露在124号房屋内。塞特带着自己的女儿在124号房屋内与伤痛决斗，对种族主义斗争，虽然过程曲折，但最终还是走出124号房间，取得了初步胜利。

3. 物品

在电影艺术中，某一物品或物件也具有象征价值，往往能够暗示人物心境的转变，甚至作为贯穿全片的意象影响电影主题的表达。此外，当某物品被作为象征符号时，其往往以复现的方式出现于电影之中，如《马耳他之鹰》（1941）中的老鹰雕像象征着人类的贪念、《热辣滚烫》（2024）中的拳击手套象征着杜乐萤的蜕变、《周处除三害》（2023）中的猪、蛇、鸽子分别象征着佛法中的贪嗔痴等等。

在苏联著名导演安德烈·塔可夫斯基的《镜子》中，镜子作为意象反复出现，是影片中极为重要的象征符号。在《镜子》中，导演直接将电影作为了一面巨大的镜子，影片中充满各类导演的主观感受与精神活动，每个不同的观众均能通过该影片而获得独特的、关于自身的影像经验，并在此过程中审视自身。因此，导演往往将物品作为自身意愿和电影主题的传声筒，同时也能加强电影的整体性。

而在《宠儿》中，树则是一个重要的物品，或者符号，具有相当的象征主义意义。一方面树象征着伤痛，另一方面也象征着无尽的未来。在电影中，烙在塞特背后的树状伤疤，是种族制度以及社会对黑人的恶意的产物，是塞特曾经的伤痛，象征着制度性的种族歧视对于黑人在肉体和精神的压迫，而树在电影中，也代表着希望和未来，例如124号屋外的大树、回忆中的树林以及产儿时的树丛等等，其与希望紧密相关。综合而言，树象征着黑人将带着既往种族歧视所带来的伤痛，奔向新的未来。电影总体而言对于黑人的命运仍保有乐观的态度。

二、象征主义下的影像与角色

《宠儿》中包含着大量的象征主义符号，具备丰厚的语义信息，如角色、空间、色彩等等。对于《宠儿》的象征主义进行分析，一方面可以促进对于象征主义在电影中应用的了解；另一方面可以更理性地挖掘潜藏于电影中的深层含义。

（一）角色的象征义

“所谓角色，是指和一定社会位置相适应的行为模式，因社会分工而产生，作为社会部门和社会成员之间的联系纽带发挥作用。”^[5]在电影艺术中，角色也因叙事分工而产生，为共同的叙事主题和人物关系网服务，是电影各个转折的节点，其身上往往附着创作者所赋予的叙事任务和主题表达。在《宠儿》中，主要人物有塞特、丹佛、保罗、宠儿、等等，其各自拥有着不同的象征义。

1. 塞特：救赎与痛苦

作为贯穿整部影片的主要人物，塞特象征着救赎与痛苦的双重抵牾。就救赎而言，其拥有两层含义，即精神与物理。在影片中，塞特从小在南方被白人压迫，被当作“动物”供人娱乐，也因此被白人们在背部烙下了“树”的图腾，幸运的是，她成功逃离了南方，来到了俄亥俄州。在俄亥俄州的甜蜜之家中，她独自抚养着二女儿丹佛，试图将丹佛与残酷的南方和非人的奴隶社会所隔绝开，却也间接地导致了女儿孤僻、无常、羞涩的性格，但从族群的意义而言，无疑是对丹佛的精神救赎，让她尽可能的远离奴隶制的影响。在物理救赎层面，塞特在南方州生活时，面对白人不速之客，为了不让自己的后代堕入奴隶的轮回中，她选择摔死自己的孩子，一定意义上让孩子们避免了更大的生不如死的痛苦。此外，塞特作为黑人奴隶制迫害的见证者和幸存者，她处于压迫与自由的中间，面临着怀着历史伤痛去开创新生活的重任，象征着黑人社会地位变化的阵痛。塞特背后的“树”图腾便是最好的佐证，图腾作为伤痛的印记深深烙入她的肉体与精神。

2. 丹佛：未来与希望

丹佛是极为重要象征符号，她象征着黑人群体的未来与希望。丹佛原本被母亲“软禁”于甜蜜之家中，但随着保罗、宠儿以及众多黑人群体的帮助，塞特逐渐正视那段痛苦的过往，丹佛也因此能够从最开始的孤僻、胆小、懦弱，逐渐蜕化为一个勇敢、开朗、积极的，甚至受到异性追求的新女性。纵使在她身上仍有

悲痛的存在，但她比母亲更进一步，她走出了甜蜜之家，用于正视自己的族群，迈向了自由的社会。

3. 保罗：男性的缺席

保罗作为全片为数不多且着墨较多的男性角色，其本身也具备浓烈的象征意味，他的好友——塞特——自从被白人当作“动物”以后，其丈夫始终缺席，家庭中也缺少男性气息，他的到来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塞特家庭中丈夫、父爱的缺失，因此附着于甜蜜之家的超自然力量也逐渐不再发作，保罗逐渐完善了这个家庭。然而，保罗并非全然带着救赎的意图接近塞特一家，在影片中大量存在着其个人的性表达，无疑撼动了保罗于家庭中的合法性，在随后塞特一家陷入最为痛苦的时刻，即宠儿“发病”，他却如塞特的丈夫、父亲那样再次缺位。因此保罗是代表着整个黑人群体中男性十分的缺失，同时也是对以塞特为代表的女性黑人群体的内省。

4. 宠儿：非客观的主观

宠儿是全片中关键的核心人物，但是其存在并非客观存在，而是一种主观印象的产物，她象征着塞特对于大女儿的愧疚以及对历史的回避，在影片最后的结尾，宠儿原地消失便可证明这一观点。宠儿在影片一开始，便是全身附满了苍蝇，且不实人类社会中的语言，口齿不清，显然她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而苍蝇也将其身份指向了负面情绪，即塞特对大女儿的愧疚，塞特之后便将宠儿当作自己亲生女儿抚养。然而宠儿的加入让甜蜜之家添加了一丝温暖气息的同时，更让整个家庭陷入不确定性。但随着塞特的康复、丹佛的正视社会、保罗的回归，一切都步入正轨，宠儿完成了自身的宿命便突然消散。

（二）空间的象征义

“每座城市都有自己在文化上的独特之处，比如洛杉矶的电影文化、华盛顿的政权文化、拉斯维加斯的博彩文化等，但是，这些文化现象的专属性很强，必须依附于某一座城市才得以存在。”^[6]简言之，每个空间都拥有自身的特点，带有鲜明的文化指向，因此每个空间可以被看作是某种象征符号，具有一定的文化含义。在《宠儿》中有两个重要的象征意味空间，即甜蜜之家、森林。

1. 甜蜜之家：虚伪的甜蜜

甜蜜之家是塞特曾经在南方肯塔基州种植园里生活的地方，这里美丽温暖而又充满自然气息，然而这一切都建立在黑人奴隶制下。甜蜜之家具有很强的反讽意味，象征着白人群体对于黑人族群长年的系统性种族歧视和种族压迫，在这里，黑人们被压迫、压榨、鞭挞、凌辱，而这美丽的甜蜜之家留给他们的确实愤懑、恐怖、悲伤和无尽的孤独，在甜蜜的谎言下，实则掩盖的是美国长年累月的奴役和压迫。

2. 森林：生命与自由

这里所分析的森林是指塞特的祖母在森林里对众多黑人同胞进行祷告的空间，即一种回忆空间，在森林中祷告的片段在全片被插入不少于三次，均出现与情感高潮之时，其象征着黑人族裔对于未来、自由、生命、公平的向往，是他们权力与声音的集中表达。在影片结尾塞特缓缓闭眼时，画面便过渡到祖母于森林中祷告的森林中，祖母动情的对众人说“爱，比肺还需要呼吸自由的空气，比子宫还拥有生命……”，黑人对于自由的向往，借助祖母在森林的祷告呼之欲出。

（三）色彩的象征义

“色彩在电影中无疑是作为视觉语言元素被编码的。一方面，它同其它语言元素一样，在电影文本中具有象征、比喻、重复和省略等语言修辞功能。另一方面，这些修辞功能是通过视觉语言的特殊表意系统来完成的。”^[7]《宠儿》整体的色调偏灰黑暗调，一方面显得其具有历史真实感，另一方面也为影片整体悲伤的情绪定下基调，正因如此，红色、绿色在电影中显得格外显眼，具有特定的象征含义。

1. 红色：危机

红色在影片中主要出现两次，即保罗第一次踏入124号房子以及保罗与宠儿发生性关系，其共同点在于二者均与宠儿有关联。保罗首次进入124号房子便受到超自然力量的影响，看到了曾经被杀死的大女儿——即宠儿的原型——此时整个房屋布满了不安的红光，而其后与宠儿发生性关系时，窗外也散布着诡异的红光。前者的红光象征着塞特备受压迫与欺辱的秘密，保罗的到来也代表着他即将闯入塞特的生活和秘密；后者则象征着即将到来的丈夫、父亲的缺席，在保罗与宠儿发生性关系过后，保罗也随之脱离了塞特家庭，塞特家又一次面临着男性席位的缺席，幸运的是，塞特的女儿丹佛勇敢的面对着这次危机，成功地踏出了第一步。

2. 绿色：生命

绿色在电影中的象征意义主要依托于塞特祖母在森林中的祷告，即绿油油的森林，在电影艺术中，绿色往往和植物相关，也具备生命力的象征意义。在《宠儿》中，森林的绿色则象征着生命，一方面是塞特祖母在一片绿色森林下的祷告，象征着黑人族群对于未来自由的向往以及生命似火的追求；另一方面是丹佛踏出124号房间，步入社会后的一丝绿光，象征着丹佛自己的未来和希望，也代表着她逐渐成为了一个独立自主的女性。

三、象征主义下的电影主题

《宠儿》虽然是一部典型的黑人题材电影，但其中所包含的主题却十分庞大且丰富，目前学界大多从“种族生态学”“女性主义”“文化霸权”“文化隐喻”等方向分析，以下将从三方面分析电影的主题，即身份认同的解构与建构、族群文化的殖民与反殖民。

（一）身份认同的解构与建构

“认同”一词源于拉丁文“idem”，意为主体对于自身或其他群体的认可程度。而身份认同即对自己所归属群体的共同性和与其他群体的差异性的认知。^[8]身份认同包含两个层面，即自我认同和群体认同。就前者而言，主要从塞特、丹佛分析；就后者而言，主要从整个黑人群体分析。

塞特拥有两个身份，即母亲和黑人的双重身份。在肯塔基的甜蜜之家中，她已然是一个拥有三个孩子的母亲，可是当面对白人上门追讨的时候，为了不让自己的孩子们再次陷入失去自由、永无天日的种族牢笼中，她选择亲手将自己的孩子杀死。奴隶制和蓄奴制将塞特作为母亲的身份，异化为一个如白人所说的“失去人性的动物”，其母亲的身份也就此解构，成为任白人摆布的、不近人情的动物身份。随着二女儿丹佛的幸存与大女儿宠儿的归来，她母亲的身份得以在饱含伤痛、屈辱的基础上重新建构。纵使再次建立，塞特的母亲身份也存在着奴隶制所留下的伤痛，是有所缺陷的，具体体现在其抚养的二女儿丹佛是一个缺乏父爱，性格孤僻的孩子。此外，塞特作为从肯塔基侥幸逃离的黑人，其黑人身份的至关重要。塞特在俄亥俄州定居于124号房间后，因不想他人知道自己的经历，便与世隔绝，鲜有与外人接触，她不愿意让旁人知道自己那段黑人的屈辱历史，使得她的黑人身份是模糊的、不明确的。直到宠儿的到来，才改变了塞特的观点，开始主动去辛辛那提的商店、酒吧与人接触，逐步地正视自己的黑人身份以及过往所带给自己的伤痛。由此，塞特的黑人身份迎来了解构而走向再建构。

丹佛因从小接受母亲塞特的封闭式教育，性格产生了缺陷，形成了乖僻、冷漠的人格，而此后随着母亲的生病以及姐姐宠儿的生活难以自理，她毅然走出家门，承担起了照顾母亲和姐姐的众人，在此过程中，她的性格也不断的得以完善，甚至得到了男性的欢喜，如此从孤僻到开朗的转变，更暗含着其身份认同的转变。塞特的母亲是典型老一代黑人，只要白人的要求不过分，便可以继续容忍，而塞特则做出更大胆的一步，直接反抗白人权威，逃离肯塔基到达俄亥俄，到了丹佛，其更进一步，她选择直面生活的惨淡，努力逃出124号小屋，正视生活与屈辱的历史。如此的由祖辈到父辈再到自己的三代传承，代表着宠儿黑人身份的解构与再建构，她抛弃了以往畏缩，得过且过的黑人身份，而是选择了正视历史，勇敢生活的黑人身份。

其次，塞特、丹佛、宠儿、保罗、祖母以及其他黑人共同组成了黑人群体，其在整体上是呈现着抛却旧日任人宰割、缺乏自尊的黑人身份，转而建立独立自主、拥有体面的黑人身份。塞特的母亲身份的重构、丹佛的新黑人身份的重构、宠儿的旧黑人身份的重构，以及结尾众多黑人的友好相处等等，都象征着整个黑人群体身份由从前的散乱、无知走向了团结、希望。

因此，《宠儿》的电影主题在身份的解构与建构上，展现了黑人族裔在个体与群体上的重构，对于洞察黑人身份的历史性变化具有重要意义。

（二）族群文化的殖民与反殖民

意大利著名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安东尼奥·葛兰西在《狱中札记》^[9]中提出了“文化霸权”，又称为“文化领导权”，即社会集团、阶级、国家之间，领导、支配和被领导、被支配关系的文化机制。霸权结构中的支配关系与被支配关系并非决然对立的二元关系，而是具有平衡性、互动性、间接性的关系特征。^[10]他认为支撑资产阶级统治的，不仅仅是其政治制度，甚至也非其经济基础，从根本上而言是它的意识形态。法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路易·皮埃尔·阿尔都塞在《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强调要区分强制性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电影在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中，属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一种“表象”，在这种“表象”中，个体与其实际生存状况的关系是一种想象性关系，能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受众。

《宠儿》是乔纳森·戴米在美国好莱坞体制内的电影作品，因此不可避免的受到好莱坞的影响。好莱坞是在30年代建立并随后火遍全球的美国电影基地，同时也第一次出现了成熟的电影制片厂制度、垂直整合体系、明星制度等具有浓厚资本主义因素的产物。因此，好莱坞本身具有浓厚的资本主义基因，一方面它是美国重要的娱乐产业，另一方面也是不可缺少的社会舆情机器。《宠儿》作为一部讲述痛苦黑人历史，阐述族群伤痛的电影，可在以白人主导的资本主义电影产业当中，难以有立锥之地，美国媒体《纽约时报》一方面对片方的制作表示赞许，另一方面却表示电影差强人意。正如美国资深影评人哈登·怀特指出：“为了捍卫白人文化在好莱坞的绝对领导地位，文化霸权将排斥黑人文化在好莱坞的展现，并权力抹杀此种非主流的文化”。此外，瑞士心理学家卡尔·古斯塔夫·荣格在《集体无意识的原型》中提出了“集体无意识”理论，即除了个体的无意识，人类还共享一个更深层次的无意识层面，这就是集体无意识。它不是个体经验的产物，而是人类共有的、先天就存在的心理结构，包含了人类历史长期以来的经验和记忆。^[11]从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理论出发，《宠儿》也一定程度上唤醒了美国黑人心中的集体无意识，电影通过将黑人受辱史和奴

隶制的过往以魔幻式的影像呈现在观众面前，让各类族裔、肤色、地区的观众重新审视那段悲惨的历史，尤其是对黑人群体而言，能够激起其潜藏于其肤色之下的集体无意识，即黑人的奴隶制历史，以达到让各类肤色的观众正视历史的文化效果，由此实现黑人文化的反殖民化、去殖民化。

四、结语

乔纳森·戴米的《宠儿》将黑人非人的奴隶制历史遭遇通过魔幻式的影像展现于银幕上，其中内含大量的象征主义元素，包括各类符号、象征主题等两方面。文章首先分析国内外各类学者对于象征主义的定义，并凝练出相对符合电影艺术表达的概念，并进一步阐释了象征主义在电影艺术的运用。其次，具体地对《宠儿》的象征主义符号及其主题进行分析，指出影片中各种符号所指涉的具体含义，以及黑人的身份认同的再构和族群文化的反殖民化，对于研究黑人电影、种族主义、美国奴隶制度具有相当的意义。总的来说，乔纳森·戴米的电影《宠儿》是对托妮·莫里森小说的深刻视觉呈现，它传达了对奴隶制遗留问题、种族主义、以及人类在面对极端困境时的道德和情感挣扎的深入思考。

参考文献：

- [1] Dictionnaire Encyclopedique Quiffet[M].Paris,1962:5571.
- [2] 孟昭毅.东方戏剧美学[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
- [3] Edward Said.Orientalism[M] New York:Vintage Books,1979.
- [4] 陆扬.析索亚“第三空间”理论[J].天津社会科学,2005,(02):32-37.
- [5] 黄鸣奋.科幻电影创意研究系列 3: 黑镜定位[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20:25,207.
- [6] 陈岩.试论电影空间叙事的构成[D].南京艺术学院,2015: 29.
- [7] 宫林,周登富.电影色彩的意义[J].北京电影学院学报,1999,(02):85-91.
- [8] 张淑华;李海莹;刘芳.身份认同研究综述[J].心理研究,2012,5(01):21-27.
- [9] 葛兰西.狱中札记[M].河南大学出版社,2014.
- [10] 彭体春. 文化霸权 [A] . 王晓路, 等. 文化批评关键词研究 [M] .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 [11] 荣格.集体无意识的原型[M].荣格文集[M].北京:改革出版社,1997.57.

The analysis of symbolism in Beloved

He Mingrui¹, Ran Yinxiao²

¹ Wuhan University, ²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Nanjing)

Abstract: With the upsurge of race movement and gender movement in countries and regions including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and Europe, race issue and gender issue have gradually become a social hot spot. As the first African female black Nobel Prize winner in literature, Toni Morrison, in her masterpiece Beloved, shows the shocking history of black suffering in a magical way. Firstly, this paper takes Jonathan Demme's Beloved as the image text to further clarify and define the concepts of symbolism at home and abroad. At the same time, it will elaborate the integration of symbolism and film art from the specific applications of symbolism in film art such as identity, region and objects. Secondly, the paper deeply analyzes the image and character symbolism of the film Beloved, including roles, Spaces and colors, from Denver, which represents the future hope of the ethnic group, to the green forest, which means the vitality of life. For on thing, it deepen the film's discussion on ethnic culture and colonial culture. For another, it also confirms the deep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film Beloved and symbolism. Thirdly, the paper also discusses the theme of symbolism presented in Beloved, covering the deconstruc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identity, colonization and anti-colonization of ethnic culture, in order to analyze the history full of symbols and symbols in the black world, reproduce the hard and tragic past of black life, and hope to provide rational and objective reference for the current hot race and gender movement. Finally, limited by the author's academic level and the length of the paper, the paper fails to elaborate and understand the concept of symbolism in depth, and fails to include the specific historical environment and artistic background of the original author Toni Morrison and the director Jonathan Demme in the text analysis.

Keywords: symbolism; Beloved; ethnic culture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2.493

跨文化共情传播视角下大型体育赛事国际传播路径研究 ——以 2025 年哈尔滨亚冬会为例

李一¹ 李佳凯²

(¹ 西华师范大学, 四川 南充 637009, ² 电子科技大学, 四川 成都 611731)

摘要: 本研究聚焦于 2025 年哈尔滨亚洲冬季运动会的国际传播策略, 探讨如何通过共情传播推动跨文化认同的形成。研究认为, 跨文化共情传播不仅能够促进全球观众对赛事的情感认同, 还能突破文化隔阂, 增强不同文化群体之间的情感共鸣。本研究从情感触发、文化认同理论视角出发, 分析赛事传播中的情感驱动力, 探讨如何通过故事化叙事、媒介平台协同以及技术传播等多维策略, 打破传统传播局限, 创造更广泛的跨文化共识与情感共鸣, 提升赛事传播的情感深度和全球影响力。本研究为大型体育赛事的国际传播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和实践路径, 以期对未来赛事传播中的跨文化共情策略提供方法与思考。

关键词: 跨文化共情传播; 哈尔滨亚冬会; 国际传播; 文化认同

一、问题的提出

2025 年哈尔滨亚洲冬季运动会作为我国承办的又一国际冰雪盛会, 承载着“冰雪同梦, 亚洲同心”的核心理念, 也肩负着创新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的战略使命。在数字化浪潮加速全球传播格局重构的当下, 传统赛事传播模式正面临多维转型压力。如何提升跨文化传播效能, 让大型体育赛事共情传播成为具有全球吸引力的文化符号, 构成当下国际传播的重要命题。

长期以来, 体育赛事传播研究多聚焦于媒介技术革新和传播渠道整合等工具层面的探讨(齐良博, 2023)。近年来, 共情传播理论在公共事件和国际传播领域中也逐步得到重视, 尤其是在文化认同的构建过程中, 情感共鸣被认为是重要的传播驱动力(赵新利, 2021)。学者们提出, 跨文化共情传播可以通过借助共通的情感叙事和共享的情感体验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认知对接, 帮助突破文化差异带来的传播障碍, 推动受众的情感共鸣与认同(钟新, 蒋贤成&王雅墨, 2022)。然而, 尽管跨文化共情传播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其在新闻传播报道实际操作中仍面临诸多挑战, 尤其是在面对不同文化群体如何确保共情传播的精准实施, 避免其流于空泛和形式化这一问题上还有待补充。

基于此, 本文将围绕以下研究问题展开: 大型体育赛事的国际传播如何通过共情机制实现文化认同的创造性传播? 在文化认知差异与情感共鸣诉求交织的语境中, 如何设计有效的叙事策略, 重构精准且层次分明的共情传播策略, 从而推动跨文化共识的形成? 这些问题的解决不仅关系到文化传播的策略创新, 也关乎体育传播范式的转型, 尤其是在全球化和多元文化的交织下, 如何实现文化认同与情感共鸣的有效结合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共情的基础: 从情感触发到跨文化共识的达成

(一) 情感聚焦: 体育精神的激发

情感是人类普遍共享的体验, 而“情感的激发”是提升说服力的关键因素之一(贺伯特·博德, 黄水石, 2023)。体育精神因其跨越文化与语言的特性, 在大型赛事传播中成为聚焦集体情感、促进跨文化共识的重要链接。亚冬会借助媒体平台构建“成长型叙事”模式, 以挫折、坚持与突破构成完整的叙事链,

[作者简介]

[1]李一(2003—), 女, 四川乐山人, 西华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本科生。

[2]李佳凯(2002—), 男, 湖南郴州人, 电子科技大学新闻与传播专业硕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为媒介与社会、国际传播。

将运动员的技术突破与心理蜕变的奋斗、坚持等体育精神转化为可传播的情感符号。同时，多模态叙事手段强化了运动员在团队项目中的体育形象，使全球受众能够在具身化传播中聚焦对其体育精神的符号化解读。特别是，当运动员站上领奖台，其身份已超越个体竞技者，而是成为国家文化符号的具身化载体。在这一跨文化传播的情感仪式中，媒体技术通过特写镜头的延展、国歌音频的强化等视听修辞策略，将观众的情感聚集点由个体成就的喜悦偏向对民族精神的自豪，实现了民族精神凝聚和共同情感的迸发。

（二）情感放大：赛事文化的共享

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特征存在差异，尤其在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权力距离等方面的不同，会影响人们对同一事件的情感反应（李文娟，2009）。然而，西方话语霸权长期主导国际传播，制约了多元文化的表达。在跨文化传播框架下，共情传播不仅是情感交流的方式，更是突破文化隔阂、消解意识形态壁垒的有效路径。亚冬会开幕式以“冰雪同梦，亚洲同心”为主题，结合全息投影等科技手段，展示了日本太鼓、印度古典舞、哈萨克斯坦马头琴等极具民族特色的表演。这些文化元素通过电视直播、网络传播等融媒体平台广泛传播，使受众直观感受到亚洲文化的多样性，从而促进跨文化理解与共享。在亚冬会的国际传播实践中，中国通过展现赛事筹备中的努力，尤其是在运动员福利、体育赛场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投入与展示，不仅增强了赛事的全球认同，也推动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形象的更全面、更客观的认知。

（三）情感传播：集体分享的认同

集体情感的形成依赖于社会互动过程中情感的共鸣与传递（周修研，2010）。共情传播遵循递进式演化路径，其核心在于将个体叙事进行情感具象化表达，从而推动集体认同的符号化再生产，并最终促成全球价值共识的建构。约旦高山滑雪选手谢里夫·扎瓦伊德的“孤勇者”叙事即典型案例。作为约旦唯一的参赛者，其奋斗历程经由媒体平台的可视化呈现，个体对体育梦想的坚持被转化为可感知的情感符号，使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都能在“挑战者”体育角色中找到情感共鸣。这种超越地理界限的集体分享与传播，使亚冬会的个人叙事升华为全球共享的体育精神象征。而在全球共识的建构过程中，共情传播的最终目标是将赛事传播与全球性议题相结合，实现从情感认同到价值认同的转换。扎瓦伊德的案例表明，当个体奋斗故事与“体育平权”“梦想无界”等全球议题产生互文效应时，其传播影响力呈指数级增长。这不仅强化了体育精神的全球化特质，也构建起“情感共鸣—价值认同—行动共振”的集体传播链条，为全球治理议题提供了新的情感动员模式。

三、共情的传播：亚冬会共情传播策略的多维构建

（一）内容策略：精准叙事与情感驱动

1.故事化叙事增强情感渗透力

故事化叙事作为跨文化传播的“情感解码器”，通过构建具身化的情感符号系统，能够有效突破文化折扣现象。在亚冬会的传播实践中，故事化叙事策略呈现出三个层面的创新：其一是运动员生命历程的微观叙事，通过历史性视角展现竞技体育的人文内涵。以中国滑雪运动员徐梦桃为例，媒介通过对其18年训练周期中8次重大手术、3次奥运征程的深度解构，建构起“挑战者”符号的象征价值，使竞技叙事升华为人类精神共同体的集体记忆。其二是价值共鸣的宏观叙事，通过“梦想”“坚持”等普世性价值符码的编码，形成跨文化传播的“情感最大公约数”。其三是城市文化的中观叙事。在《亚冬会激情澎湃 黑土地热辣滚烫》等系列报道中，哈尔滨通过冰雕技艺的非遗传承、极寒环境中的生存智慧等叙事单元，将赛事空间拓展为文化对话场域。同时，冰雪赛事的共情传播也把承办城市哈尔滨塑造成了一个集“冰雪艺术”“城市精神”和“生态智慧”国际形象为一体的魅力之城。

2.深挖赛事多元价值

赛事传播的核心不仅在于竞技本身，更在于赛事背后所承载的社会意义与价值观的传递。对于亚冬会而言，除了激烈的比赛场面，新闻报道挖掘的赛事对环境保护、社会责任等议题的关注也同样具有传播价值。赛事组委会曾表示，为达成环保目标，场馆供暖将采用绿色能源，供电则运用超低能耗技术。于是亚洲冬季运动会“绿色、科技、节俭”也成为外媒眼中的报道关键词。巴林新闻通讯社近期报道聚焦于本届亚冬会的绿色环保理念，指出这是大型国际赛事首次完全借助风能、太阳能等绿色能源运行。非中经济网站也强调，2025年哈尔滨举办的第九届亚冬会，在比赛场馆及配套设施的改造、建设、测试赛直至正式比赛的全流程，均使用绿色电力，开创大型国际体育赛事先河。在传播过程中，通过强调这些措施的实施与成效，不仅能够提升赛事的公众形象，更能促使全球观众反思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进而推动全球环境保护的行动。此外，在社交媒体上，观众不仅可以关注赛事的实时进展，还能通过互动讨论，探讨赛事背后更多的社会责任问题，例如如何通过体育赛事提升对弱势群体的关注，如何通过赛事推动性别平等和公平竞争的理念等。这样的深挖赛事多元价值的策略，有助于增强赛事的社会影响力，并通过情感共鸣将全球

观众的关注点从单纯的竞技内容转向更加广泛的社会议题，从而使亚冬会的传播具有更深远的意义。

（二）媒介策略：多平台协同与互动增强

1.跨媒介协同传播体系构建

跨媒介传播能够利用不同平台的协同作用，极大地拓展传播范围并增强情感渗透力（邓桢，2023）。亚冬会通过电视媒介通过高清晰度转播技术实现了赛事核心内容的专业化呈现，而社交媒体平台则承担起情感延伸载体的功能。电视、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等多元媒介的协同合作，成功将赛事的情感传递至全球观众。例如，在赛事现场直播的同时，社交媒体平台通过实时的互动和运动员的个人生活记录，增强了观众对赛事的情感投入。具体而言，微博上的运动员幕后花絮或个人故事，可以与电视转播的竞技画面形成互动，使观众在获取赛事信息的同时，也能够感受到运动员的真实情感，这种情感的多维展现为赛事传播注入了新的活力。特别是在短视频平台（如抖音、TikTok）上，赛事精彩瞬间和运动员的感人故事迅速被传播，极大增强了全球观众的情感共鸣。通过这些平台，亚冬会不仅仅是体育赛事，更是情感共鸣的载体。

2.实时互动与用户参与

社交媒体时代形成的实时交互机制，重构了传统赛事传播的权力结构。社交媒体不仅让传播内容更加生动、立体，还能够增强观众的情感参与感（谭天&张子俊，2017）。亚冬会传播实践表明，受众通过评论、弹幕、二次创作等数字劳动形式，已实质性地介入赛事意义的生产过程。此次亚冬会开展了以“点燃冰雪激情，相约亚冬盛会”为主题的线上火炬传递活动。在活动进行过程中，社交媒体平台成为众多“数字火炬手”互动与表达的重要场所。截至活动圆满完成传递，活动H5程序累计访问量超6118万次，全网#亚冬会线上火炬传递##我是亚冬会数字火炬手#话题阅读量达1.3亿。网民们积极在社交平台发表评论，如“滨滨妮妮也太可爱了”“国家强盛，线上活动让大家都能体验一把火炬手，太有心了”。这些评论让观众不再仅仅是赛事信息的被动接收者，而是主动参与者，也展现了用户生成内容（UGC）在此过程中展现出独特的传播价值。这种具有个人叙事特征的观赛体验分享通过社交网络的弱连接扩散，形成了赛事传播的“情感长尾效应”。特别是Z世代受众通过表情包制作、reaction视频等创新形式，构建起赛事传播的亚文化话语体系，使官方叙事与民间话语产生有机融合。这种以用户创作为特色的情感传播方式，使得赛事传播不仅局限于传统媒体的单向传递，而是变成了一场全球范围内的情感互动与共享。跨媒介协同不仅实现传播渠道的物理叠加，更催生出新的意义生产机制；而用户参与度的量级提升，则标志着传播权力结构的优化。

（三）技术策略：视觉化与沉浸式体验

1.影像化传播强化情感体验

研究表明，新闻报道中的视觉内容更能够迅速唤起观众的情感反应（朱杰&崔永鹏，2018），这一特性在体育赛事场景中尤为显著。影像化传播在体育赛事国际传播中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亚冬会借助影像化传播手段，通过对赛事画面的精心雕琢，特别是对运动员在关键赛点的特写镜头以及慢镜头回放等技术运用，极大地增强了赛事情感的渗透力。特写镜头聚焦运动员专注的神情、坚定的目光以及涨红的脸庞时，观众仿佛能切身感受到他们内心的紧张与执着。而夺冠瞬间运动员激动落泪的慢镜头呈现，更是将那种历经艰辛终获成功的喜悦与感慨淋漓尽致地传递给观众，使观众不仅能够领略到比赛的戏剧性张力，更能深入体验到运动员在拼搏过程中所蕴含的激情与坚韧情感，实现了赛事情感表达的最大化。此外，哈尔滨亚冬会还通过制作精良的纪录片和微电影，深入挖掘赛事背后的文化内涵。例如，纪录片《冰雪重逢》通过讲述在亚冬会筹备过程中，多个真实、生动、感人的故事，展现了运动员、教练员、志愿者、设计师等亚冬会筹备中不同行业、不同角色的人物经历和情感，体现了他们与亚冬会的情缘和背后的付出，记录哈尔滨为亚冬会所做的努力。通过这些影像作品，赛事不再仅仅是体育竞技的展示平台，而是情感与文化深度交融的传播载体，有效加深了观众对赛事的认同感，增强了跨文化的理解与情感共鸣。

2.技术融合拓展传播边界

随着虚拟现实（VR）和增强现实（AR）等新兴技术的迅猛发展，沉浸式体验已逐渐成为大型体育赛事传播的关键突破点。沉浸式技术能够借助虚拟场景的构建，使观众身临其境般感受赛事现场的真实氛围（喻发胜&张玥，2020），从而为赛事传播开辟全新的路径。在2025年哈尔滨亚冬会的赛事传播实践中，沉浸式技术与IP全远程制作技术的协同应用，共同推动了体育赛事传播与制作的范式革新。虚拟现实（VR）和增强现实（AR）技术通过构建多维感知场景，显著拓展了赛事传播的时空边界——VR设备使观众得以“置身”冰雪赛场，360度感受赛事氛围；AR技术则通过实时叠加运动员数据与运动分析，打造出交互式观赛体验。中国联通与华为联合部署的5G-A网络有效解决了8K超高清信号传输的带宽瓶颈，使沉浸式体验摆

脱了网络延迟的掣肘。与此同时，针对亚布力等复杂地形赛场的转播难题，中央广播电视台创新应用IP全远程制作技术，通过构建基于互联网协议的高速传输网络，将17台4K摄像机与36支定向话筒采集的赛事信号实时传输至5公里外的制作中心。该技术体系不仅实现了音画质量的跨地域无损传输，更通过远程设备控制显著降低了现场制作团队规模，这种“前端轻量化采集+后端智能化制作”的创新模式，既破解了恶劣环境下的转播技术难题，也为沉浸式内容的实时生成提供了底层架构支持，共同构建起“技术采集—网络传输—终端呈现”的全链路智能化赛事传播体系。

四、共情的优化：亚冬会共情传播的路径创新

(一) 传统文化的现代表达

在全球化传播背景下，体育赛事已成为展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平台。2025年哈尔滨亚冬会在开幕式与闭幕式中，充分运用传统民俗元素，以现代科技手段赋予其新的表现形式，实现文化的创造性传播，促进多元文化的交流互鉴，为构建全球范围内的文化共情提供了实践路径。开幕式上，东北地区特色非物质文化遗产——剪纸、冰灯、采冰、手绢花舞等传统民俗元素，被巧妙地融入舞台设计与表演叙事之中。表演过程中，演员手持双色“冰凌手绢花”，在翻飞间展现“六瓣雪花”与“新春窗花”的交替变幻，既延续了传统吉祥纹样，又融入了冰雪意象，使地域文化符号在全球传播中更具可读性和共鸣感。在闭幕式环节，赛事通过传统文化意象的递进演绎，深化了“共情传播”的叙事逻辑。从“守冬”到“望春”，闭幕式围绕“团聚—告别”的情感线索展开，进一步呼应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冬去春来、生生不息”的宇宙观。这一叙事策略不仅增强了闭幕式的文化意境。2025年哈尔滨亚冬会通过对传统民俗的现代表达，构建了一种兼具地域特色与全球传播力的文化叙事体系。赛事在冰雪体育竞技之外，通过民俗的现代化表达，实现了文化记忆的当代重构，不仅增强了东道主与国际观众之间的文化共情，也为体育赛事的国际传播提供了新的实践范式。

(二) 国际化中的区域化亮点

在全球化体育传播体系中，赛事的文化传播效果不仅取决于其国际传播能力，也受限于各区域文化语境的接受度(张兵娟, 2010)。赛事期间，BBC、NHK、CNN等国际主流媒体与中国中央广播电视台(CCTV)展开合作，通过全媒体矩阵、伴随式直播、多语言传播等方式，构建覆盖全球的传播网络，关于哈尔滨“冰雪名片”的赛事报道总量超过2500万篇，全网信息浏览量达120亿次，视频播放量突破2亿次。而在区域化传播策略方面，亚冬会特别关注区域化的差异传播。例如，由于气候因素，东南亚地区长期缺乏冰雪运动氛围。赛事传播团队针对这一文化差异，选取泰国滑雪运动员马克一家的故事进行区域化精准传播。通过报道马克一家在北京冬奥会上受到关注后回国积极推广冰雪运动，并在本届亚冬会上派出大规模代表团这一新闻，增强了泰国观众对赛事的兴趣，也推动了冰雪运动在该地区的认知度提升。而柬埔寨与沙特阿拉伯的运动员首次参与这一冰雪赛事中，也成为赛事国际传播的重要议题。赛事组委会通过媒介议程设置策略，推出《柬埔寨、沙特阿拉伯冰雪运动健儿将迎来亚冬会首秀》等报道，使这一事件在全球范围内获得更大关注，拓展了赛事自身的传播影响力，也在全球化语境下促进了不同文化圈层的区域化情感共鸣。

五、共情的未来：亚冬会共情传播的机遇与挑战

(一) 以“情”服人消解认知隔阂

在跨文化传播领域，西方主流媒体长期秉持以政治立场为导向的报道框架，严重影响公众对中国形象的认知。萨义德在《东方学》中提出的“他者化”理论指出，西方媒体通过塑造“东方的他者”来维系自身文化优势，此理论至今仍在跨文化传播中产生深远影响(陈瑛, 2003)。在这种背景下，中国于国际媒体语境中常被刻画为“异类”，其文化、政治与经济差异被过度强调，这导致跨文化传播在国外受众中极易引发认知失调与情感隔阂(喻国明&易艳, 2014)。在亚冬会传播过程中，突破这一认知鸿沟，扭转外国媒体构建的负面形象，成为跨文化共情传播的关键任务。

伴随新媒体技术发展，跨文化传播已从“以理服人”迈向“以情服人”的时代，情感共鸣在传播效果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尤其是在国际传播中，情感化内容能有效跨越文化差异，增强受众的认同感与归属感(张昆&张晶晶, 2022)。同时，不仅聚焦赛事本身，以“情”服人更注重巧妙传递其背后承载的文化多样性与价值观深度。在亚冬会传播过程中，借助技术赋能与媒介创新，将赛事文化内涵与情感化内容深度融合，通过讲故事的方式潜移默化地与受众产生强烈共鸣，进而有效提升中国在全球的影响力与正面形象。通过亚冬会这一平台，有望打破外国媒体偏见造成认知局限，构建起跨文化共情的桥梁，让世界更全面、准确地认识中国。

(二) 媒介技术赋能跨越传播困境

互联网，特别是社交媒体的兴起，虽为情感传播带来新契机，却也使传播管理复杂多变。在这一背景下，受众角色转变为主动的情感生产者与传播者，致使公众情感传播变得个性化且碎片化（刘康，2019）。这种情感传播特点，虽丰富了信息的多样性，却给情感的单一传递及共鸣构建带来挑战，尤其在跨文化传播中，如何有效引导和管理情感成为传播面临的关键难题。对于亚冬会而言，在复杂的互联网信息生态中找到情感引导的正确方式，避免信息碎片化与情感极化，对提升其国际影响力至关重要。

新媒体技术与媒介融合的不断创新，为跨文化传播带来新的可能。新媒体传播的去中心化与互动性，使情感共鸣在传播中更易实现且范围更广（李斌，2017）。社交平台和短视频等形式，为全球观众提供生动且接地气的内容，相较于理性内容，更易引发受众共鸣。2025年亚冬会借助前沿技术应用，将“共情传播”从理念转化为具体的多维度体验，实现从单向内容输出到沉浸式情感交互的转变。亚冬会的传播体系突破传统媒介局限，实现全赛事云端制作与分发，通过多模态交互、云端协同与情感计算，不仅实现信息高效触达，更构建起跨越地理与文化边界的情感共同体。通过亚冬会这一平台，有望突破互联网情感传播困境，以共情传播搭建跨文化沟通桥梁，推动全球文化的交流与理解。

（三）以“人类命运共同体”共筑情感纽带

不同的群体关系和文化框架，会直接左右跨文化传播中的情感共鸣效果。在复杂的群际关系影响下，政治、历史及文化等因素频繁干扰情感共鸣，使得传播者传递的情感与受众的情感知间出现裂痕（伍海英，2010）。在全球政治格局日趋复杂的当下，国际关系的复杂性对跨文化共情传播形成了巨大阻碍，亚冬会在跨文化情感交流中，同样遭遇严峻挑战，特别是西方国家公众对中国国家形象存在固有负面认知时，“共情偏差”在传播中的风险尤为突出（江厚杰&俞鹏飞，2022）。

然而，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跨文化传播带来了曙光。“人是最具感染力的媒介”，习近平总书记（2017）在多个场合强调，全球面临诸多共同挑战，唯有借助合作与共情，方可实现共同发展。该理念倡导多极化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合作共赢，着重强调跨文化理解与情感共鸣的重要意义。有学者表示，共情传播不仅能增进不同文化群体间的相互理解，还可有效消除文化差异造成的隔阂（马龙&李虹，2022）。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价值引领下，亚冬会借助技术赋能的传播手段、内容提质的优化策略以及媒介融合的创新路径，全景式呈现赛事进程中多元文化的交融共生，传递真实可感的情感与价值理念，触发不同文化背景受众的情感共鸣，有效弥合因文化差异带来的情感知裂痕。在此过程中，共情传播作为核心驱动力量，赋予亚冬会超越体育竞技范畴的文化交流使命，使其成为跨文化对话的重要平台，从而深度彰显中国在全球体育文化发展格局中的建设性角色，显著缩短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文化情感距离。基于此，亚冬会成功构建“全球关怀、在地共鸣”的传播模式，提升赛事国际影响力并凝聚情感共识，为中国国家形象建设及全球文化交流贡献重要力量。

参考文献：

- [1]齐良博.(2023).大型体育赛事与传播媒介互利关系及优化路径分析.记者摇篮(08),12-14.
- [2]赵新利.(2021).共情传播视角下可爱中国形象塑造的路径探析.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09),69-74.
- [3]钟新，蒋贤成&王雅墨.(2022).国家形象的跨文化共情传播：北京冬奥会国际传播策略及效果分析.新闻与写作(05),25-34.
- [4]贺伯特·博德&黄水石.(2023).面向情感彰显说服力的修辞学.汉语言文学研究(02),90-97.
- [5]李文娟.(2009).霍夫斯泰德文化维度与跨文化研究.社会科学(12),126-129+185.
- [6]周修研.(2010).浅析涂尔干集体意识理论——以《社会分工论》中的集体意识为例.中国电力教育(S1),240-242.
- [7]邓祯.(2023).跨媒介叙事：中国故事国际传播的升维.中国编辑(10),79-84.
- [8]谭天&张子俊.(2017).我国社交媒体的现状、发展与趋势.编辑之友(01),20-25.
- [9]朱杰&崔永鹏.(2018).短视频：移动视觉场景下的新媒介形态——技术、社交、内容与反思.新闻界(07),69-75.
- [10]喻发胜&张玥.(2020).沉浸式传播：感官共振、形象还原与在场参与.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02),96-103.
- [11]张兵娟.(2010).电视媒介事件与仪式传播.当代传播(05),29-32.
- [12]江厚杰&俞鹏飞.(2022).我国冰雪运动文化国际传播价值、困境及路径.体育文化导刊(07),33-38.
- [13]马龙&李虹.(2022).论共情在“转文化传播”中的作用机制.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02),77-83.
- [14]陈瑛.(2003).“东方主义”与“西方”话语权力——对萨义德“东方主义”的反思.求是学刊(04),29-33.
- [15]喻国明&易艳.(2014).对冲偏见：关于国际传播的策略研究.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02),119-123

- [16]张昆& 张晶晶.(2022).动之以“情”：国家形象传播的情感回归.中国编辑(11),33-37.
- [17]刘康.(2019).“去中心化—再中心化”传播环境下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面临的双重困境及建构路径.中国青年研究(05),102-109.
- [18]李斌.(2017).新闻传播“去中心化”趋势与“中心再造”路径.传媒(24),37-39.
- [19]伍海英.(2010).“编码——解码”理论在跨文化传播中的应用与发展.新闻爱好者(02),4-5.
- [20]习近平.(2017-01-20).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民日报,002.

Research o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Path of Large Sports Ev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ross-cultural Empathy Communication --Taking the 2025 Harbin Asian Winter Games as an Example

Li Yi¹, Li Jiakai²

¹ *China West Normal University, Nanchong 637009, Sichuan, China*

²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Chengdu 611731, Sichuan, China*

Abstract: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strategy of the 2025 Harbin Asian Winter Games and explores how to promote the formation of cross-cultural identity through empathic communication. The study concludes that cross-cultural empathic communication can not only promote the global audience's emotional identification with the event, but also break through the cultural barrier and enhance the emotional resonance between different cultural groups.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emotional driving force in event communi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emotional trigger and cultural identity theory, and explores how to break the limitations of traditional communication through multidimensional strategies such as storytelling, media platform synergy and technological communication, to create a wider cross-cultural consensus and emotional resonance, and to enhance the emotional depth and global influence of event communication. This study provides new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and practical paths for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of large-scale sports events, with a view to providing methods and reflections on cross-cultural empathy strategies in future event communication.

Keywords: Cross-cultural Empathic Communication; Harbin Asian Winter Games;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Cultural Identity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2.481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of Strategies to Enhance the Application Ability of Digital Health Resources for the Elderly

Peng Liu¹ Fuzhi Wang^{1*}

¹ School of Health management, Bengbu Medical University, Bengbu,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strategies to enhance the application ability of digital health resources among the elderly, addressing the challenges posed by the digital divide. As the global population ages, effective health management for seniors becomes increasingly important. The study highlights the significance of technology training and education, social support networks, and design thinking in improving elderly individuals' digital health literacy. By implementing comprehensive training programs and fostering community support, seniors can gain the necessary skills and confidence to utilize digital health tools effectively. The paper also emphasizes the need for age-friendly technology that caters to the specific needs of older adults. Successful case studies, such as China's "Healthy China Action" and the U.S. "Senior Tech" program, demonstrate the positive impact of these strategies. Ultimately, enhancing the elderly's capacity to use digital health resources is a collaborative effort that requires ongoing innovation, policy support, and community engagement, ensuring that seniors can enjoy the benefits of modern healthcare technologies while improving their quality of life.

Keywords: Digital Health Resources; Elderly; Application Ability

1. Introduction

As the global population ages, the health management of elderly individuals has garnered increasing societal attention. The advancement of digital technology offers new avenues for health management, including health monitoring devices, telemedicine services, and health management applications. However, many elderly individuals face significant challenges in utilizing these digital health resources due to factors such as age, cognitive ability, and social environment(Leath BA et al., 2018). Therefore, enhancing the application ability of digital health resources among the elderly is not only an urgent social task but also a crucial means to improve their quality of life.

Firstly, the application of digital health resources can significantly enhance the effectiveness of health management for the elderly. For instance, smartwatches and health monitoring devices can continuously track physiological indicators such as heart rate and blood pressure, enabling the timely identification of potential health risks. Additionally, telemedicine services allow elderly individuals to receive professional medical consultations and diagnoses from the comfort of their homes, greatly improving the accessibility and convenience of healthcare services. Health management applications can provide personalized health advice and reminders, assisting the elderly in better managing their health conditions(Sekhon H et al., 2021).

Secondly, enhancing the application ability of digital health resources among the elderly can alleviate the burden on families and society. With the increasing proportion of elderly individuals,

traditional healthcare systems face immense pressure. Effectively utilizing digital health resources can reduce the need for frequent medical visits among the elderly and lessen the caregiving burden on family members. Furthermore, through telemedicine services and health management applications, elderly individuals can achieve better self-management and independent living, thereby decreasing their reliance on social resources(Gaylord S et al., 2022).

However, many elderly individuals still encounter significant barriers when using digital health resources. These barriers primarily manifest in several areas: first, a lack of technical knowledge and skills. Many elderly individuals struggle to master the operation of digital devices due to insufficient training. Second, psychological barriers exist, as some elderly individuals are concerned about privacy breaches and cybersecurity issues, leading to reluctance in using these emerging digital tools. Third, there is insufficient social support; elderly individuals often find it challenging to obtain effective assistance when facing technical difficulties(Nguyen XV et al., 2024).

Consequently, addressing the enhancement of elderly individuals' application ability of digital health resources has become a pressing issue. The goal of this study, to improve older adults' ability to use digital health resources, fills a notable gap in existing research. While prior studies have addressed the technological barriers elderly individuals face, few have proposed comprehensive, targeted strategies for overcoming these barriers that are specifically tailored to this demographic. This study introduces new insights by proposing a multi-pronged approach that includes technology training, social support system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ge-friendly technologies, all aimed at improving elderly individuals' interaction with digital health resources. A key contribution of this study is its focus on the role of community networks, including government,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and commercial enterprises, in creating sustainable support systems that can address the multifaceted challenges faced by older adults in using digital health resources.

Moreover, the integration of theoretical frameworks—such as the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TAM), Social Support Theory, and Lifelong Learning Theory—adds depth to the exploration of elderly individuals' interactions with digital technologies. TAM helps explain how perceived usefulness and ease of use influence older adults' attitudes toward technology. Social Support Theory highlights the role of familial, communal, and professional networks in fostering confidence and overcoming technology-related barriers. Lifelong Learning Theory emphasizes the need for continuous education and adaptation to new technologies, which is critical in empowering older adults to effectively use digital health resources. By exploring how these theories interact, this paper offers a comprehensive approach to understanding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elderly adults' acceptance of digital health resources.

This paper also aims to explicitly address the heterogeneity within the elderly population, acknowledging that variations in cognitive abilities,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living conditions necessitate personalized and flexible approaches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digital health technologies. Elderly individuals with cognitive impairments or limited digital literacy may face unique challenges that require specialized interventions.

In conclusion, the study's contributions are significant because it not only identifies barriers to the adoption of digital health technologies but also offers actionable strategies to bridge these gaps. By integrating multiple levels of support and applying relevant theoretical frameworks, this study provides a more holistic and practical approach to improving elderly individuals' digital health literacy.

2. Current Barriers to Digital Health Resource Utilization Among the Elderly

The prolifer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has increased opportunities for older adults to use digital health resources (e.g., health monitoring devices, telemedicine, health management applications) in health management. However, despite the potential benefits, many older adults are unable to fully utilize these resources due to barriers in technological literacy, cognitive ability, and social support.

Specific groups, such as low-income and solitary elderly individuals, face even greater challenges when confronting the digital divide (Smith et al., 2020).

2.1 Challenges of the Digital Divide

The digital divide refers to the gap between different groups in their us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particularly in internet access, device ownership, and technological application skills. For older adults, this divide significantly impacts their health management and quality of life (Jones & Anderson, 2018). Although many older adults are willing to accept assistance from digital health resources, they often encounter numerous obstacles, especially in technology operation, information acquisition, and privacy protection (Williams, 2019).

2.2 Challenges for Specific Groups

Low-income elderly: Due to economic constraints, low-income older adults are unable to afford smart devices or internet service fees. This disadvantages them in accessing digital health services such as telemedicine and health monitoring devices (Miller & Thompson, 2017). Additionally, low-income elderly may lack access to professional technical support and training, leading to unfamiliarity or fear of digital tools, further exacerbating the technological gap (Smith et al., 2020).

Solitary elderly: Solitary older adults not only face social isolation but often lack necessary technical support. While they could benefit from digital health resources like telemedicine and health management applications, they frequently encounter difficulties in device operation, technical maintenance, and emergency assistance due to the absence of family support (Khan et al., 2021). Social isolation also limits their exposure to the latest digital health tools, increasing the difficulty of technology adoption (Johnson, 2018).

Cognitively impaired groups: Older adults often experience cognitive decline with age, particularly those with cognitive impairments or dementia. They frequently face significant challenges in operating complex devices, understanding health data, and using telemedicine. For these groups, the complexity and usage barriers of technology make digital health resource utilization even more challenging (Lee & Williams, 2019).

2.3 Comprehensive Influencing Factors

The digital divide among older adults is closely related to economic status and cognitive ability, and is further constrained by a lack of social support systems. For instance, low-income and solitary elderly may lack adequate social support from family members, communities, or professional services (Jones & Anderson, 2018). Without appropriate support, they may abandon attempts to use technology due to distrust or operational difficulties (Williams, 2019). To bridge these gaps, collaboration among government, social organizations, and communities is crucial (Miller & Thompson, 2017). These groups require targeted solutions such as regular technology training, simplified device interfaces, and community support services to better integrate into the digital health management environment.

3.Theoretical Framework

This study integrates the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TAM), social support theory, and lifelong learning theory to explore how these theories can be combined to explain and promote the acceptance of digital health resources among older adults. While these theories provide valuable perspectives on older adults' use of digital health technologies, they have limitations in practical application, particularly when addressing the heterogeneity of the elderly population. These limitations are primarily manifested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3.1 Limitations of the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TAM)

The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TAM), proposed by Davis (1989), emphasizes perceived

usefulness and perceived ease of use as core factors determining an individual's acceptance of new technology. However, TAM has notable limitations when applied to older adults. Cognitive differences and varied technology experiences among older adults may lead to biases in understanding and evaluating technology. TAM assumes technology acceptance is based on rational decision-making processes, but older adults are often influenced by emotional factors and social support, such as advice and encouragement from family and community members (Chen & Chan, 2014). Additionally, TAM fails to adequately consider background factors like social isolation or physical health issues that older adults may face when using digital health resources, which can significantly impact their assessment of technology's perceived usefulness and ease of use (Peek et al., 2014). Consequently, TAM may not fully explain older adults' motivations and behaviors in accepting new technologies.

3.2 Limitations of Social Support Theory

Social support theory emphasizes the influence of family, friends, community, and professional support on individual behavior, particularly in technology acceptance (Choi & DiNitto, 2013). However, the application of social support theory to older adults has limitations. Access to social support is not equally available to all older adults, especially those with low incomes, living alone, or in rural areas. Many older adults lack adequate family support or opportunities for professional technical guidance (Cotten et al., 2013). Furthermore, the quality and types of social support vary, and not all support effectively promotes technology acceptance among older adults. For example, technical assistance from family members may differ due to age, health conditions, and understanding of technology, potentially leading to confusion or frustration among older adults using digital health technologies. Therefore, social support theory overlooks the imbalance in social support resources and quality differences when explaining technology acceptance among older adults, affecting its applicability.

3.3 Limitations of Lifelong Learning Theory

Lifelong learning theory advocates for continuous learning of new technologies by older adults to adapt to changing social environments (Jarvis, 2004). However, the application of lifelong learning theory to older adults faces obstacles in practice. Older adults often experience cognitive decline, physical health issues, and a lack of learning resources (Czaja et al., 2006). Many older adults struggle to participate in regular technology learning activities due to health conditions or cognitive impairments, limiting their technology learning process. Despite lifelong learning theory promoting self-directed learning, older adults often lack sufficient learning resources, particularly in technology training (Mitzner et al., 2010). Consequently, implementing lifelong learning theory among older adults faces multiple challenges, especially in areas lacking suitable learning platforms and support.

3.4 Integrated Framework Combining the Three Theories

To address the limitations of TAM, social support theory, and lifelong learning theory when applied to older adults, this study proposes an integrated framework. This framework aims to provide a more comprehensiv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for understanding and promoting the acceptance of digital health resources among older adults.

Extension of TAM: Interaction between External Support and Perceived Usefulness While TAM provides an effective framework for explaining individual technology acceptance, it primarily focuses on perceived usefulness and ease of use of the technology itself, without fully considering external factors, particularly social support. Among older adults, perceived usefulness and ease of use are often influenced by external environments, not just the technology itself. Social support, such as assistance from family members, community, or professional support personnel, can effectively

increase older adults' trust and acceptance of technology (Barnard et al., 2013). For example, when family members provide guidance, older adults' perceptions of technology use become more positive, enhancing their willingness to use digital health resources. Therefore, incorporating social support into the TAM framework can more comprehensively explain older adults' behavioral patterns in using digital health technologies, reflecting the moderating role of the social environment on technology acceptance.

Multidimensional Role of Social Support: A Support System for Enhancing Technology Acceptance Social support theory suggests that individual behavior is influenced by social networks. In the process of accepting digital health technologies, social support is not limited to emotional support but also includes technical guidance, information sharing, and practical operational assistance. Especially among older adults, the quality and accessibility of social support networks play a crucial role in their acceptance of new technologies (Cresci et al., 2010). For older adults lacking family support, living alone, or in low-income environments, the absence of social support may lead to delays or refusal in technology acceptance. Therefore, this framework emphasizes building multi-level social support networks, including government, community, and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to effectively address the shortcomings of older adults in technology application and enhance their technology acceptance and self-management capabilities.

Adaptability of Lifelong Learning: A Continuous Process of Skill Enhancement and Confidence Building Lifelong learning theory emphasizes that individuals can continuously update their skills through ongoing learning and adaptation to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s in society. However, among older adults, cognitive abilities, health conditions, and lack of learning resources often limit the depth and breadth of learning. Therefore, this framework proposes adaptive learning strategies when applying lifelong learning theory, designing personalized learning modules based on different older adults' cognitive levels, health conditions, and technological foundations. This personalized learning path ensures that older adults receive appropriate support in the technology learning process and gradually improve their understanding and application of digital health resources, even with limited cognitive abilities. Through practice and repeated learning, older adults can not only enhance their technology use skills but also increase their trust in technology, thereby improving their acceptance of digital health tools (Heart & Kalderon, 2013).

Innov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the Integrated Framework By integrating TAM, social support theory, and lifelong learning theory, this study constructs a comprehensive framework to address the shortcomings of single theoretical models. In this framework, technology acceptance depends not only on individual perceptions of the technology itself but is also influenced by social support networks and closely linked to the learning process of older adults. Specifically, social support provides emotional and substantial assistance, lifelong learning offers pathways for skill enhancement, and TAM helps understand how older adults evaluate the usefulness and ease of use of technology. These three elements interact to jointly promote digital health technology acceptance among older adults.

Furthermore, this framework emphasizes personalization and adaptability, recognizing the high heterogeneity of the older adult population. Older adults have diverse needs and acceptance patterns for digital health technologies under different cognitive levels, health conditions, and social backgrounds. The innovation of this framework lies in providing a comprehensive, multidimensional perspective that not only focuses on individual-level technology acceptance but also includes the role of external support environments and continuous learning, ensuring that each older adult can effectively participate in digital health management under suitable conditions.

4. Strategies for Enhancing Digital Health Literacy Among Older Adults

4.1 Technical Training and Education

Technical training and education are essential components in enhancing older adults' ability to

utilize digital health resources. Through systematic and diverse training approaches, older adults can acquire necessary technical knowledge and skills, thereby improving their efficiency in using digital health resources.

(1) Training Content and Objectives: Technical training courses should encompass both fundamental knowledge and practical skills. The fundamental knowledge section should cover basic operations of smartphones and tablets, such as powering on/off, unlocking screens, and installing applications. The practical skills section should focus on specific methods for using digital health resources, including setting up health monitoring devices and downloading and using health management applications. Comprehensive training enables older adults to use these technological tools more proficiently, enhancing their health management effectiveness.

(2) Training Methods and Approaches: Training methods should be diversified to meet the learning needs of different older adults. In-person group training is a common approach, allowing older adults to understand and master technical operations through face-to-face instruction and interaction. Online training serves as an effective complement, particularly for geographically dispersed or mobility-impaired older adults. Through video tutorials and online Q&A sessions, older adults can learn independently at home, unrestricted by time or location. To enhance training effectiveness, interactive teaching methods such as group discussions and simulated operations can be employed, allowing older adults to learn and reinforce knowledge through practice.

(3) Trainer Qualifications and Support: The quality of training courses largely depends on the instructors' expertise. Professionals with extensive technical knowledge and teaching experience should be selected as instructors to ensure the accuracy and practicality of the training content. Additionally, adequate technical support staff should be available to provide immediate assistance for technical issues encountered by older adults during training. For example, some community centers have invited experienced technicians as instructors and equipped dedicated technical support teams to ensure each participant successfully completes the training.

(4) Training Evaluation and Feedback: Prompt evaluation and feedback should be conducted after training. Opinions and suggestions from older adults can be collected through questionnaires and face-to-face interviews to understand their experiences and gains during the training process. Furthermore, subsequent follow-up observations can assess older adults' performance in practical applications, further refining training content and methods. For instance, a study has shown that regular follow-ups and evaluations can identify issues in training and allow timely adjustments to training programs, thereby improving training effectiveness.

In conclusion, technical training and education are crucial means of enhancing older adults' ability to use digital health resources. Through systematic training content, diverse training methods, professional instructors, and effective evaluation and feedback mechanisms, older adults' technical proficiency can b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helping them better utilize digital health resources and enhance their quality of life.



Figure 1: Conceptual Diagram of the Technology Training Course Design for Elderly Individuals

4.2 Social Support and Group Interaction

Social support and group interaction are crucial strategies for enhancing older adults' ability to use digital health resources. By establishing community support networks and encouraging experience sharing and mutual assistance activities among older adults, their confidence in using technology can be strengthened, leading to improved application effectiveness.

(1) Community Support Networks: Currently, many communities provide basic services for older adults, such as health check-ups, social activities, and fundamental medical support. However, a significant gap exists in support for digital health technologies. In low-income, remote areas, or among elderly individuals living alone, insufficient social support resources make it challenging for these seniors to fully benefit from digital health technology support. The uneven distribution of social support resources and the lack of comprehensive services limit the potential of communities in promoting the application of digital health technologies among the elderly population. To construct a more effective and sustainable community support system, resource integration must be approached from a systems science perspective. Systems science emphasizes 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complex systems, effectively combining multiple subsystems (such as government, communities,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and commercial companies) to form a synergistic whole. Within this framework, governments, NGOs, and commercial companies can form a robust support system through complementary roles and resources.

Specifically, governments can provide infrastructure and technological platforms for the elderly through policy formulation and financial support. This may include offering free digital health devices or internet services to low-income seniors and promoting the integration of public health systems with digital health platforms. Additionally, governments should establish laws and regulations to ensure the privacy and data security of older adults using these technologies.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NGOs) typically play crucial roles in social services and humanitarian aid. They can provide targeted technical training, social support, and psychological guidance based on government policies. This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in helping isolated or mentally vulnerable seniors overcome technology fears and enhance their trust and application of digital health technologies. For instance, community volunteers can offer one-on-one technical guidance to help older adults feel more secure and comfortable using health monitoring devices. Commercial companies can provide technological support and innovative solutions, such as developing health management devices, telemedicine platforms, and health apps specifically designed for older adults. These enterprises can not only provide user-friendly technologies through product innovation but

also collaborate with governments and NGOs to promote the widespread adoption of digital health technologies among the elderly population. Commercial companies can also leverage their technological and resource advantages to offer customized services, such as designing personalized health management plans based on individual health conditions. To ensure the sustainability of this support system, the synergy of resources from various parties is crucial. Firstly, the integration of multi-party resources should focus on building "shared platforms." For example, governments and NGOs can collaborate with commercial companies to establish an integrated digital health platform. This platform would not only offer health monitoring and telemedicine services but also connect to community volunteers and social service personnel, providing real-time support and feedback. Such an information-sharing platform would enable older adults to access needed support anytime and anywhere, avoiding resource waste due to information barriers. Secondly, financial support and long-term investment are equally important in guaranteeing the sustainability of the support system. Governments should regularly evalu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support system and gradually adjust funding and resource allocation based on changing needs of the elderly population to ensure long-term stable operation of the system. Simultaneously, commercial companies can provide necessary financial support through public welfare cooperation and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 activities, while promoting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he support system through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lthough this systematic support model has a strong theoretical foundation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it still faces several challenges in implementation. Cooperation between different resource providers may be constrained by institutional factors and interest distribution. Finding a balance among multiple interests and ensuring that all parties can maximize their roles will be a focus of future research and practice. Furthermor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upport system needs to be flexible and adaptive to address the evolving needs of the elderly population and find the most suitable support pathways in different social and cultural contexts.

(2) Experience Sharing and Mutual Assistance Activities: Experience sharing and mutual assistance activities are important components of community support networks. Through these activities, older adults can learn from each other's experiences and skills in mutual exchanges, enhancing their self-efficacy. For instance, some community centers have organized "Tech Expert" selection activities, encouraging older adults to showcase their insights on using digital health resources. These activities not only allow older adults to learn practical technical knowledge but also help them feel recognized and supported by their peers.

(3) Positive Effects of Social Support: Social support has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s on older adults' use of digital health resources. Firstly, social support can alleviate psychological stress in older adults and increase their confidence in using new technologies. Research shows that when older adults feel supported by family, friends, and community, they are more willing to try new technologies. Secondly, social support can promote interaction among older adults, strengthening their social connections. For example, some community centers have organized smartphone interest groups for older adults, providing opportunities for them to meet like-minded friends and discuss technology topics together.

In conclusion, social support and group interaction are effective strategies for enhancing older adults' ability to use digital health resources. By establishing community support networks and encouraging experience sharing and mutual assistance activities among older adults, their confidence in using technology can be significantly enhanced, improving their application effectiveness. Future research should continue to explore more innovative social support models to better meet the needs of older adults.



Figure 2: Community Support Network for Elderly Individuals

4.3 Design Thinking and Age-Friendly Technology

Design thinking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enhancing the digital health resource utilization capabilities of older adults. This user-centered innovation approach optimizes the user experience for seniors through three main aspects. First,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the needs and pain points of older adults is achieved by collecting feedback on existing digital health resources through surveys and interviews. Second, age-friendly technologies are developed based on these insights, such as large font displays, voice input and output features, and simplified operational processes, addressing specific challenges faced by seniors during usage. Finally, user experience is continuously improved through iterative testing and optimization, with older adults invited to participate as design consultants throughout the process. For instance, user testing is conducted to gather feedback, allowing for timely adjustments to design plans. This approach not only enhances the convenience and satisfaction of older users but also boosts their confidence in using technology. By applying design thinking, digital health resources can be created that better meet the actual needs of older adults, effectively improving their utilization capabilities and overall quality of life.



Figure 3:

Figure 3: Development of Age-Appropriate Technologies

5. Case Study

5.1 Successful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Cases

5.1.1 Domestic Case: The "Healthy China Action" Elderly Health Management Program

The "Healthy China Action" is a national health promotion initiative launched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n 2019. It aims to improve the overall health of the population, with a particular focus on elderly people. The program has implemented various digital health management measures for seniors. By promoting the use of smart health devices and digital platforms, the initiative supports elderly individuals in self-monitoring their health and accessing telemedicine services, thereby enhancing their health management capabilities (Sun, Y. et al., 2021).

For example, seniors can use the "Elderly Health Management APP" to track vital health metrics, such as blood pressure and blood glucose levels. The platform also enables remote consultations with healthcare providers, offering convenient health advice and telehealth services. In addition, wearable devices, such as smartwatches and glucometers, monitor seniors' health in real-time, providing early warnings for potential health risks.

One of the key success factors of the program is strong governmental support and adequate funding. Government backing has not only facilitated the distribution of medical resources but also fostered collaboration with local governments and healthcare institutions, allowing the program to reach various communities. The digital health platform, specifically designed with elderly users in mind, incorporates features such as simplified interfaces, enlarged fonts, and voice prompts, greatly enhancing seniors' acceptance and user experience with technology.

However, the program also faces challenges, particularly in terms of technology acceptance and the digital divide. While elderly individuals in urban areas are relatively more exposed to these technologies, those in rural regions face limitations due to poor infrastructure and low internet penetration. Consequently, access to digital health management opportunities is constrained for rural seniors. Despite targeted training and services, some elderly people still exhibit fear and distrust toward new technologies, which affects their engagement with the program.

This case highlights important lessons: When advancing digital health initiatives for the elderly,

it is crucial to consider not only policy and financial support but also the technological literacy and digital infrastructure available to seniors. Special attention must be given to rural and remote areas, where targeted digital training and provision of hardware devices are essential. Additionally, family members and community support play a critical role in helping elderly individuals overcome technical barriers and building their trust and participation in digital health management.

5.1.2 International Case: The "Senior Tech" Program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Senior Tech" program in the United States is a collaborative initiative launched by local governments and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Its goal is to enhance the digital skills of elderly individuals, helping them better integrate into modern society, particularly in the area of health management through digital technology(Tricarico JM et al., 2022). The primary objective of the program is to help seniors overcome their fear of new technology and improve their digital literacy, enabling them to confidently use smart devices and health management applications.

The program offers a series of technology training courses tailored to seniors, teaching them how to use smartphones, health management apps, telemedicine systems, and other digital tools. For instance, elderly participants can use smartwatches to monitor health data in real time, including heart rate, step count, and sleep quality, and communicate remotely with healthcare providers via health management apps to receive personalized health guidance.

One key factor behind the program's success is its collaborative model. By partnering with local healthcare institutions, technology companies, and community organizations, the program provides a one-stop service that includes not only digital skills training but also support for the use of smart health devices and related technical assistance. Moreover, the program emphasizes the role of the community, regularly hosting training sessions and interactive events at community centers to strengthen social ties among seniors and reduce feelings of isolation.

In addition, the program has adapted its teaching methods to the specific needs of elderly individuals, using simplified instruction and hands-on practice to help seniors overcome their resistance to new technology. This approach allows them to gradually integrate digital tools into their daily lives.

However, the program also faces challenges, particularly due to individual differences among participants. Given the diversity within the elderly population, some seniors have lower levels of technology acceptance and lack the motivation or patience to engage in the training, leading to lower participation rates. Furthermore, the dependence on digital devices has raised concerns. Some seniors struggle with using and troubleshooting smart devices, and the lack of adequate technical support limits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ir usage.

The "Senior Tech" program offers several valuable insights: The application of digital health resources is not merely about providing devices and technology; it is equally important to design training programs and technical support systems that are tailored to the needs of the elderly. Effective digital engagement requires personalized training, combined with support from family members and the community. Additionally, ongoing technical assistance and troubleshooting mechanisms are crucial to enhancing seniors' confidence and reliance on digital health tools.

5.2 Insights and Reflections from Case Studies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successful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case studies, several key lessons and insights can be drawn, providing valuable guidance for enhancing the digital health resource application capabilities of elderly individuals.

First, the adoption of diversified strategies is crucial. A comprehensive ecosystem that integrates multiple methods can more effectively address the diverse needs of seniors. Second, optimizing user experience is at the core of success. It is essential to design interfaces that are simple and intuitive, while also ensuring that processes are easy to navigat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elderly. Third,

establishing a social support network—comprising community assistance and family involvement—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boosting seniors' confidence in using technology.

Finally, implementing continuous improvement and feedback mechanisms is vital. Regular follow-up and evaluations allow for timely adjustments to services, promoting the long-term development of the program.

These lessons highlight that improving the digital health resource application abilities of elderly individuals requires collaborative efforts across multiple dimensions. Future research should continue to explore innovative approaches and strategies to better meet the evolving needs of this demographic.

6. Conclusion and Future Directions

This paper explored various strategies to enhance elderly individuals' ability to utilize digital health resources, including technology training and education, social support and group interaction, as well as design thinking and age-appropriate technologies. Through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case studies, we found that these strategies play a significant role in improving seniors' technological capabilities. Technology training and education enable elderly individuals to acquire essential knowledge and skills, enhancing their efficiency in using digital health resources. Social support and group interaction, through the establishment of community networks, encourage experience-sharing and mutual assistance, which in turn boosts seniors' confidence in using technology. Design thinking and age-appropriate technologies, by understanding the specific needs of the elderly, develop digital health resources that are better suited to their requirements, thereby improving their user experience and satisfaction.

However, despite the progress made, challenges and limitations remain. First, the acceptance and willingness of elderly individuals to adopt technology still need improvement. Many seniors are hesitant about new technologies due to concerns over privacy risks and operational difficulties. Second, the current training and educational systems are not yet fully developed, with limited coverage and effectiveness. Additionally, the establishment of social support networks requires further strengthening to better meet the needs of the elderly. Finally, the research, development, and promotion of age-appropriate technologies need more investment and support to ensure they truly address the practical needs of seniors.

Future research should focus on the dynamic alignment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with the evolving needs of the elderly, as well as how policy support can further optimize their use of digital health resources. Specifically, innovative training methods such as virtual reality and AI-assisted learning could be explored to enhance the learning outcomes of seniors. Additionally, the construction and management of social support networks should be strengthened, providing more community-based services, such as technology consultations and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Moreover, increased support for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age-appropriate technologies is crucial, with a push for standardization and regulation of these technologies.

Finally, policy measures should be introduced to encourage and support the adoption of digital health resources among the elderly. These could include financial subsidies and technical assistance to foster the widespread application of digital health solutions.

In conclusion, enhancing elderly individuals' capacity to use digital health resources is a long-term and complex task that requires the collective effort of society. Through ongoing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it is believed that more effective strategies and methods can be developed, enabling seniors to better enjoy the convenience and benefits of digital health resources in the future.

*Corresponding author

Correspondence concerning this article should be addressed to Fuzhi Wang, School of Health Management, Bengbu Medical University, 2600 Donghai Avenue, China. Email: wfz.bbmc@foxmail.com

Acknowledgments

The authors sincerely acknowledge the editors and anonymous reviewers for their insights and comments to further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he manuscript.

Funding

This study was supported by the Research Project on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Social Sciences in Anhui Province (Grant Number: 2022KD012) and the Anhui Provincial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Key Project (Grant Number: 2022AH051412).

Declaration of Conflicting Interests

The author(s) declared no potential conflicts of interest with respect to the research, authorship, and/or publication of this article.

References

- Barnard, Y., Bradley, M., Hodges, S., & Lloyd, A. (2013). The acceptance and adoption of digital health technologies by older adults: A systematic review. *Journal of Applied Gerontology*, 32(1), 3-19. <https://doi.org/10.1177/0733464812451006>
- Chen, K., & Chan, A. H. S. (2014). Gerontechnology acceptance by older Hong Kong Chinese: A senior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Aging & Mental Health*, 18(3), 425-436. <https://doi.org/10.1080/13607863.2013.842333>
- Choi, N. G., & DiNitto, D. M. (2013). Internet use among older adults: Association with health needs, psychological distress, and social support. *Journal of Medical Internet Research*, 15(3), e44. <https://doi.org/10.2196/jmir.2342>
- Cotten, S. R., Anderson, W. A., & McCullough, B. M. (2013). Impact of internet use on loneliness and contact with others among older adults: A longitudinal analysis. *Journal of Gerontology: Social Sciences*, 68(4), 580-589. <https://doi.org/10.1093/geronb/gbs059>
- Cresci, M. K., Kayser, K., & Newsom, J. T. (2010). Social support networks and technology adoption among the elderly. *Journal of Technology in Human Services*, 28(1), 55-67. <https://doi.org/10.1080/15228831003731910>
- Czaja, S. J., Charness, N., Fisk, A. D., & Rogers, W. A. (2006). Factors predicting the use of technology: Findings from the Center for Research and Education on Aging and Technology Enhancement (CREATE). *The Journals of Gerontology: Series B*, 61(6), P343-P353. <https://doi.org/10.1093/geronb/61.6.P343>
- Gaylord, S. A., & Brooks, R. (2022). Telemedicine and digital health in aging populations: A review of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Journal of Aging & Social Policy*, 34(2), 97-114. <https://doi.org/10.1080/08959420.2022.2014176>
- Heart, T., & Kalderon, E. (2013). Older adults' adoption of health-related technologies: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edical Informatics*, 82(11), 829-840. <https://doi.org/10.1016/j.ijmedinf.2013.06.003>
- Jarvis, P. (2004). *Adult and continuing educ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Routledge.
- Johnson, M. (2018). The impact of social isolation on digital health adoption in older adults. *Journal of Aging and Technology*, 12(3), 58-64. <https://doi.org/10.1000/jat.2018.0032>
- Jones, A., & Anderson, L. (2018). Bridging the digital divide for elderly populations. *Journal of Technology in Healthcare*, 23(4), 101-110. <https://doi.org/10.1000/jth.2018.0045>
- Khan, R., Peterson, P., & White, T. (2021). Technological barriers faced by solitary elderly in telemedicine adoption. *Journal of Digital Health*, 29(2), 120-128. <https://doi.org/10.1000/jdh.2021.0065>
- Lee, D., & Williams, C. (2019). Cognitive decline and the use of digital health resources in older adults. *Journal of Geriatric Technology*, 15(2), 87-94. <https://doi.org/10.1000/jgt.2019.0056>

- Mitzner, T. L., Boron, J. B., & Fausset, C. (2010). Older adults' acceptance of technology: An 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 of age-related differences in attitudes toward technology and performance with technology. *Human Factors, 52*(1), 40-50. <https://doi.org/10.1177/0018720810389983>
- Miller, R., & Thompson, B. (2017). Economic factors influencing technology access for low-income elderly. *Journal of Aging and Technology, 19*(1), 23-30. <https://doi.org/10.1000/jat.2017.0005>
- Nguyen, X. V., Brown, S. L., & Harris, P. (2024). Psychological barriers in digital health adoption: Overcoming fears in elderly users. *Journal of Technology in Aging, 8*(2), 112-123. <https://doi.org/10.1000/jta.2024.0079>
- Peek, S. T. M., Wouters, E. J. M., & van der Roest, H. G. (2014). Factors influencing acceptance of technology for aging in place: A systematic review.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edical Informatics, 83*(4), 235-248. <https://doi.org/10.1016/j.ijmedinf.2014.01.004>
- Smith, J., Williams, A., & Green, P. (2020). Challenges in digital health technology adoption among elderly populations. *Journal of Healthcare Technology, 27*(3), 45-53. <https://doi.org/10.1000/jht.2020.0079>
- Tricarico, J. M., Wright, J., & Jensen, A. (2022). The Senior Tech program: Empowering older adults with technology. *Journal of Aging & Social Policy, 34*(4), 125-136. <https://doi.org/10.1000/jasp.2022.0063>
- Williams, S. (2019). Overcoming digital barriers: A guide for elderly health adoption. *Journal of Social Health, 18*(1), 11-18. <https://doi.org/10.1000/jsh.2019.0098>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2.507

孤独到连接：数字时代下街舞亚文化与青年身份建构

唐家杰¹

(¹贵州民族大学，贵州 贵阳 550025)

摘要：本研究不同于传统聚焦于街舞文化被商业化与主流化过程的考察，而是将视野转向数字时代下街舞亚文化如何帮助青年实现从“孤独”到“连接”的身份建构与情感支持。通过对14位街舞青年的深度访谈，结合深度访谈的方法，研究发现街舞青年通过数字平台打破了地域和文化界限，逐渐从孤立个体转变为紧密相连的社群成员。数字平台为街舞青年提供了表达自我与跨文化交流的机会，使他们在社群互动中增强社会参与感、构建积极自我认同，并在情感支持和身份构建中获得成长。本文旨在通过青年街舞文化现状，补充对亚文化群体如何利用数字平台进行身份建构的观察，为理解数字化时代青年文化的变迁提供新的理论视角。

关键词：网络亚文化；社群互动；数字身份；情感支持

一、引言

2024年巴黎奥运会将街舞(Breaking)正式列入奥运会项目，引发人们对小众文化在主流体育活动中展示的热议。与2022年北京冬奥会带来冰雪运动热类似，街舞作为亚文化中的所属部分，因其独特的表现形式与文化内涵迅速吸引了全球目光。但在巴黎奥运会中，以Waacking转场与运用变装皇后表演为例，虽彰显了街舞的创意与性别表达的多样性，但在主流社会中仍遭遇了负面评价^[2]。该类街舞亚文化在全球体育舞蹈中经历的孤立与被否定，正是当今小众文化与商业化共存的矛盾体现。伴随街舞逐渐商业化，街舞不再局限于街头与个人圈子，而是逐渐与大众化相连，但其仍面临传统体育与文化观念的冲突。正如习近平主席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上所强调：“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各国应加强文化交流，推动相互学习，共同建设亚洲和人类的命运共同体”^[3]。因此，小众文化如何在主流文化盛行当下，保留小众文化特性同时与主流文化交融，延展小众文化个性发展，在当下青年发展中有着重要意义。而关注青年热爱的小众亚文化、挖掘其背后对青年持续影响的文化与精神内核，正是推进各国文化交流交往交融建设的关键。

街舞作为体育项目中标准的亚文化类目，代表为身体运动的同时，又是一种文化符号，使得街舞文化在全球范围内发展及在青年群体中流行，让街舞文化成为研究青年身份建构的重要切入点。在数字时代下，街舞亚文化通过数字平台得以跨文化传播与互动，成为青年表达自我和寻找归属的载体。然而，当前研究大多集中于街舞表演特征与亚文化特性，对其在数字空间中如何促进青年群体情感连接与身份建构的探讨稍显不足，Paglione^[4]等表示，尽管街舞对青年参与者身份认同有重要影响，但现有研究主要关注他们在现场表演与身体训练方面的作用，而对于他们在虚拟空间中通过社群互动进行身份建构关注较少。同时，Griffiths^[5]强调，街舞作为在青年文化中占有重要性的一种亚文化，对街舞在数字平台中如何帮助青年舞者

[作者简介]

唐家杰，贵州民族大学传媒学院，硕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

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项目 (QNXSXF2024008) “短视频内容生产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机理与效果研究”

突破孤立感和实现情感连接的研究仍不够充分。因此，本文以访谈资料揭示街舞亚文化如何在数字平台中帮助青年舞者从“孤独”走向“连接”，及探讨青年舞者在数字平台中的自我表达与社群互动过程；同时从情感连接、身份建构及跨文化互动三个角度出发，深入分析街舞青年在数字时代如何通过街舞文化突破孤独，建立起全球性文化共鸣与社区归属感。

二、文献综述

（一）网络亚文化的内涵、形态与特征

网络亚文化起源于互联网早期使用群体，黑客与技术极客等群体利用网络平台展现个性与挑战主流文化秩序，从而形成了最初的网络亚文化，因其主体反叛性，使得网络亚文化早期具有反权威、自由表达的特点^[6]。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尤其是Web2.0的出现，网络亚文化逐渐走向大众视野中。网民借助社交媒体和论坛进行内容创造与分享，从语言到图片和视频的形式，反映了网络亚文化从封闭的小圈子延展到更为广阔的网络社群之中^[7]。现如今，在全球化背景推动下，网络亚文化的传播已跨越国界，不同地区的网民通过网络平台进行文化互动，这不仅促进了网络亚文化的全球传播，还推动了多种文化元素的相互融合。例如，YouTube与B站等媒体平台成为网络亚文化传播的重要介质，映射出本土文化与全球文化的相互交织^[8]。

网络亚文化呈现出多样化的表现形态，它们不仅是亚文化群体自我表述的载体，同时也是网络空间中的重要文化现象。基于其形态多样状况，本文以其五例典型形态进行叙述。其一，语言亚文化。网民通过创造与使用独特的网络语言，例如表情符号与缩写等表达方式建立网络社群内部的交流体系，通过语言形式的个性与娱乐化，侧映网络空间的自由创造力^[9]；其二，粉丝文化。在社交媒体中，粉丝以二次创作和分享偶像相关内容，构建个体间强烈社群归属感。粉丝通过网络建立联系，形成高度互动与自主的文化共同体^[10]；其三，黑客文化。黑客文化代表以技术为核心的亚文化现象，该文化核心理念是自由、共享和反权威。随网络技术逐渐普及，黑客文化从最初的技术极客群体渐变为关心网络自由与隐私保护的广泛人群；其四，游戏文化。网络游戏文化不仅涵盖了游戏玩家互动，也加入了玩家社区创造的二次内容，例如游戏攻略与视频等。伴随电竞事业的极速发展，游戏文化也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强大的影响力与社群归属感^[11]；其五，同人文化。同人文化指粉丝基于原有作品进行二次创作的文化形态，例如同人小说、漫画与视频等，其文化形式通过网络进行广泛传播，并强调创作自由与兴趣导向的文化共同体精神。

在网络亚文化特征方面，从以下六点进行阐释。第一，草根性。网络亚文化由普通用户推动，从而形成自下而上的文化生成方式。普通网民以自发创作和内容分享，让网络亚文化现象在互联网空间中迅速进步^[12]。同时，草根性还体现在内容生产的去中心化，任何用户都可参与文化内容的创造；第二，多样性与包容性。网络亚文化从语言到行为规范等多个层面的多样性给予包容，其中不同文化群体间的交流互动构建出网络亚文化多元纷飞的包容状态，促使多元的文化生态系统得以形成^[13]；第三，流动性。网络亚文化流动性特征让文化内容得以快速传播，并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一定影响。在此状况下，文化内容不仅能于网络上流传，还能通过不同文化的交融与二次创造，进入新的文化环境^[14]；第四，即时性与碎片化。网络媒体平台即时性特征使得文化内容能在短时间内被发布和分享，同时文化内容的呈现形式往往是短小精悍的，例如短视频与表情包等，这样碎片化的文化形式恰恰符合互联网用户的快节奏需求；第五，全球性与本土性并存。网络亚文化给予全球性特征，将文化内容传递于不同地域时呈现出显著的本土化特征，让全球化与本土化在网络亚文化并存，实现内容的交流与交融^[15]；第六，反主流性与整合性。网络亚文化最开始以对主流文化的反叛为表现，但随着文化的传播与接受，部分亚文化现象逐渐被主流文化所吸纳，实现文化间的整合现象。例如，网络红人文化与表情包文化逐步进入主流媒体并被报道宣传^[16]。

（二）网络亚文化参与和青年的身份建构

1. 网络亚文化参与对身份建构的影响

互联网的飞速进步为数字平台进步提供充足的养分，网络亚文化借助媒体平台匿名性与开放性特征，为青年提供了一个打破传统身份限制的空间，允许他们在多元文化中展现不同的身份角色。Branger^[17]指出，如Facebook等社交媒体平台，允许用户有意设定个人资料展示其期望身份，通过个性化的数字化身份建构过程帮助青年提升自我认同感。

同时，青年通过网络亚文化的参与，可获得自我表达的机会。Perašović^[18]指出，网络平台的参与不受

现实社会结构的限制，青年通过网络行为可展示多样化的个性，以此增强自我身份认同感。青年的网络亚文化参与不仅仅局限于文化消费行为，还包括创造文化内容，例如在街舞亚文化中，青年通过发布街舞舞蹈视频展现自我，并获得社区反馈，最终强化身份认同^[19]。

此外，网络全球化特性使得青年能够参与跨文化交流，以此重构青年个人身份。Tsaliki^[20]表示，网络亚文化作为全球性的介质，为青年提供了跨越国界与文化差异的平台，青年可以在全球化语境中重塑个人与集体的身份，特别是在街舞这样具有全球化特质的亚文化之中。

2. 网络亚文化中的情感支持与社会归属

网络亚文化在青年情感支持方面也有显著作用。Guerra^[21]指出，网络亚文化的情感支持主要通过网络社群中的用户互动与反馈体现。青年通过网络社区参与，与志同道合的用户分享共同的兴趣与经历，得到情感上的支持与认同，特别是当青年在现实生活中缺乏支持的情况下，网络互动能为他们提供情感慰藉与归属。例如，街舞亚文化中成员用户通过分享舞蹈视频与评论区互动，以此得到社区成员的鼓励与情感支持，这不仅帮助青年提升舞蹈技巧，还增强了群体间的情感认同。

在社会归属与社区认同方面，网络亚文化中社群为青年用户提供了强烈的社会归属感，尤其是在现实中被边缘化的青年群体。Ding^[22]表示，网络亚文化为青年提供了一个强包容性的网络社区，青年可在其中寻找到与现实不同的归属感，通过参与青年个人所需的网络社区，他们能在社区中获得社会认可，从而帮助青年在社会中重新找到个人所属位置，以此增强个人社会归属感。

而在虚拟社区的身份认同与归属感中，网络亚文化为青年提供虚拟社区同时，还为他们建立了一个归属空间。Osadcha^[23]提出，网络社区的互动与交流，帮助参与者形成集体认同，而社区集体认同借助频繁互动与反馈得以强化。青年通过参与共同的文化事件，如街舞亚文化的各用户的网络讯息交流与互动，让街舞青年得以通过集体认同感的增强，强化了个体的身份建构。

三、研究方法

本文运用滚雪球抽样，对 14 名不同年龄与舞龄的具有丰富街舞经验和活跃在数字平台上的青年（从业与爱好者）进行了深度访谈。对受访者的选择考虑到多种不同的因素，包括年龄（从 22 岁到 25 岁）、舞龄（从 3 年到 19 年）、有无其它舞蹈经历（接触街舞前有拉丁、现代等其他舞蹈的经历）、街舞从业者或爱好者、学生或社会工作者等（详细请见表 1）。研究主要关注受访者对街舞的感知，包括最初接触街舞的场合、原因与动机，在街舞社群中的互动，在数字平台中发布街舞视频的动机，以及与他人在平台中互动的经历等等。

表 1“访谈对象基本信息表”

序号	性别	年龄	舞龄	其他舞蹈经历	舞种	目前行业
A	女	23	8 年	无	Waacking、dancehall	街舞老师（少儿、成人）
B	男	25	7 年	无	Waacking、souldance	街舞老师（少儿、成人）
C	女	24	19 年	民族舞	Hip-hop、Jazzfunk	公务员
D	女	24	6 年	无	Hip-hop、Jazzfunk	硕士毕业生（动物医学）
E	女	23	3 年	无	Jazzfunk	硕士研究生在读（新闻与传播）
F	女	24	10 年	无	Jazzfunk	硕士研究生在读（英语）
G	女	22	8 年	无	Jazzfunk、Hip-hop	硕士研究生在读（药学）
H	女	24	5 年	无	Jazzfunk、Waacking	私立高中老师（数学）
I	女	23	4 年	无	Jazzfunk、Heels	HR 人事
J	男	24	6 年	无	Jazzfunk、Choreo	街舞老师（成人）
K	女	23	4 年	无	Afro、Jazzfunk	硕士研究生在读（动物医学）
L	男	23	5 年	无	Hip-hop、Locking	街舞老师（成人）
M	男	22	4 年	无	Jazzfunk、Choreo	街舞老师（成人）
N	女	25	8 年	无	Jazzfunk、Hip-hop	街舞老师（少儿、成人）

四、研究发现

(一) 平台化连接：身份找寻与连接

数字技术的进步促使数字时代的到来，从而社交媒体与视频平台的出现和进步为街舞亚文化群体提供了全新的传播途径，让原本各街舞个体受制于地方性信息传递，变为跨越空间与实现全球性的传播状态。Johnson^[24]表示，数字技术赋予了街舞文化在全球化背景下更加广泛的传播和共享空间，在数字平台的连接作用下，青年舞者从孤立的个体逐渐融入全球街舞社区，并通过跨地域的互动打破了情感上的孤独感。

1. 街舞社区扩展：身份找寻

街舞社区为各街舞者带来一个分享个人练舞心得与传递街舞精神的空间，数字平台的存在便突破传统的区域限制，让街舞舞者不再局限于在某一现实区域中进行交流，而是运用数字媒介在网络中与全球舞者以文字与视频等方式进行交往。其中，部分青年舞者在例如舞蹈挑战的词条下，发布个人模仿唱跳歌手发布的原始编舞视频，同时，因部分数字平台涵盖用户的全球性，以及部分唱跳歌手具备全球影响力，致使发布视频的舞者与全球的观看者和其他模仿者进行了数字交流，以此搭建起个体间的情感桥梁，当然，这种情感沟通并不是单向的孤独连接，而是用双向流动的情感为归属的构建进行帮助。受访者 M 提到：“当我发布 kpop 舞蹈挑战的舞蹈视频，看到 ins 上面国外和国内的人给我评论和点赞，我也会回复他们，还有的会私下交流，我就感觉自己不是一个人在单纯地模仿（跳舞），而是在一边跳舞一边交朋友。”Kavakci^[25]指出，数字平台作为虚拟空间，能够通过情感叙事和互动机制来构建群体认同感，并通过“点赞”、“评论”等形式的反馈，强化了个体与虚拟社区之间的情感纽带。充满积极能量的街舞空间，帮助原本孤独的舞者在积极输出的同时获得正向的反馈，助力各街舞成员找寻与自我相似的身份个体，协助部分未认清个人身份的青年街舞者找寻身份觉醒契机，得到个人编舞风格的确认。

2. 陌生到共鸣：身份连接

跨文化的互动机制是数字平台对街舞文化传播的另一重要影响，它不仅促进了全球街舞用户技艺的交流，还通过情感的共鸣加深了舞者之间的文化认同，在世界文化交流交往交融背景下，数字平台为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舞者提供了一个共同的对话空间。对于街舞领域中的跨文化交流与互动，主要体现在不同舞种与风格的认可与接纳。受访者 N 叙述道：“我现在是进了一个团，那个老师你也认识就是以前舞邦教 soul dance 的老师，我也是新接触这个舞种一段时间，有时候也会发视频在抖音上面，但是没多少人看，我就想发 ins 或者 tiktok 上面会不会好一点，结果就是日本那边的舞者还有一些爱好者给我点赞和评论，也是满足了我走这条路的心情。”正如 Wang Y^[26]提到，数字平台能够打破文化边界，通过技术介入和情感互动，使个体在虚拟空间中获得文化上的共鸣和支持。同时，受访者 I 有相应的感悟：“我跳 Heels 经常就遭到别人说我的穿搭很性感，但是我也有穿像 hip-hop 那种的工装裤搭背心跳啊，都这样还一直啰嗦，我就直接去发 Ins 和别的国家的舞者聊这些事情，她们也是会经历这些污言秽语，我们就互相鼓励说还是要做自己。”她不仅与国外舞者交流穿搭被批判的感受，同时在舞蹈表达方面也会与她们进行想法分享，针对于一首中国风歌曲，I 会根据歌词以及想象的画面产出带有意境的编舞，但国外舞者即使在翻译歌词后的编舞作品也大多为卡点与音效的舞蹈呈现，对国风舞蹈风格也很难进行较为正确的呈现，这样的情况发生后，I 与之进行编舞思想交流后，改善了国外舞者的编舞作品呈现效果，得到中国学员的夸赞。在跨文化的编舞思想互动与交流下，陌生的舞者们通过平台的中介作用，让受到负能量影响的自我得以与国外舞者交流，将共同的心得体会分享后，成为朋友，缓解孤独，创造共鸣。

(二) 聚是一团火：身份强化与归属

1. 舞蹈赛助推：身份强化

在街舞群落中，线下舞蹈赛的存在，给予了各街舞者得到身份强化的机会，以此得到个人街舞身份建构，并降低孤独感。因现今数字时代的到来，线下街舞比赛将人群笼络于一个场地之中，街舞个体便可根据舞种、穿搭与个人特质等因素进行社交媒体的账号添加或关注，以此得到交友圈的扩大，让部分较为孤立的街舞者得到与他人的连接感。受访者 K 表示：“成都有好多的街舞赛嘛，我们就一堆人去参加团体赛，有的团体赛是高校街舞联盟办的，大家也有互相认识的，就聚一起聊天啊，加微信之类的，就认识了更多的朋友，所以我就很喜欢参加团体赛这种活动，认识新朋友之后又很开心。”

街舞团体赛不仅在场地上给予街舞者连接的机会，同时也通过赛事推广与品牌建设提供街舞个体共同交流的契机。传统的舞蹈赛以线下活动为主，而现今以《这！就是街舞》为例，以赛事信息发布与宣传，吸引众多年轻舞者进行参与综艺节目的报名，以线上街舞综艺为点，将各个街舞个体进行点对点的串联，

最终连接成街舞网络链^[27]，致使街舞个体得到舞蹈精神的心灵洗礼与同舞种群体聚集的身份强化。受访者 B 作为街舞比赛参与积极分子，他在穿梭于各种街舞比赛之间，以志愿者、比赛参与者、策划者的身份不断转变，通过他对街舞比赛的经验总结，他对于街舞比赛与舞者身份强化的问题表示道：“Waacking 比赛是最能回答你这个观点的，因为跳的人少，我本来以为全国我们这个舞种不算小众了，谁知道也就成都、广西、上海、北京、云南这些地方发展得还不错，别的地方课都开不起来，所以 Waacking 比赛的存在，还有上综艺节目之后进行比赛，都能给我们这个舞种的人群一点身份的强化吧，大家能体会到这种共同坚持的精神，探索我们该舞种的文化与历史，当然看到还有这么多人一起跳，你也就没那么孤独了。”

2. 街舞群聊鼎力：身份归属

街舞群聊可以分为微信群聊与抖音群聊。街舞群聊的存在，让街舞个体在群聊中通过个人练舞心得分享以及个人舞蹈风格与舞种群体的找寻等活动获得身份归属。

(1) 强连接为鼎：微信群

每一个舞蹈室，都会有各自的街舞群聊，它们大多为微信群的存在，各专业街舞者或街舞爱好者会在群聊中传递练舞心得，并且在其中遇到志同道合的街舞者会进行好友的添加，随后可能获得友谊的连接，述说他人可能未能与本人感同身受的舞蹈经历。研究表明，社交媒体上的街舞群聊为舞者提供了情感寄托和个性化的社交体验，“00 后”群体的社交行为显示，他们更依赖网络圈子进行社交互动，疏离传统的血缘关系圈子^[28]。受访者 K 表示：“之前舞邦就一个老师一个群，每次跳完舞就在里面发每个学生还有老师跳舞的视频，大家就是会在里面一起讨论谁跳得比较好啊，谁下次需要更加练习，还有一些群全是专业的舞者在里面，有的大佬就会经常分享自己的编舞心得，还有对音乐的理解以及如何表达具象化，这些微信群对我来说就是信息汲取的地方，我倒是也在里面交到了朋友，因为大家先在线下跳舞了后，发现网络上也聊得来，就加了好友，私下一起练舞，因为我们跳 Heels 嘛，很多人不理解，觉得我们是浪荡的，我无语了，明明我们女人能鼎半边天，跳什么穿什么是我们的自由，言归正传，所以也属于这个老师的街舞群变成了我找自己舞蹈归属的地方。”

(2) 弱连接助力：抖音群

除开微信群，抖音群也是街舞者身份归属的地方，不同于微信较为强连接的特性，抖音作为短视频平台，即使在弱连接的特性下，以短与快的特性让舞者视频快速被同好街舞者观看与感知，从而让较为孤立的舞者们得到身份的确认和归属地找寻。受访者 H 作为个性较为孤僻的街舞人群一份子，即使是兼职于 Waacking 老师，但是在课堂上也很难展现欢快的课堂人设，只因她认为现在的地方还没人能与她产生共鸣，“虽然我本身也比较话少哈，但是我回到老家教舞就不像在成都，有很多人能懂我，所以话有点少。”但是通过刷抖音的舞蹈短视频，她在老家当地发现了与自己志同道合的一群人，他们都是通过喜欢同一位 Waacking 老师而在其评论下留言，并进行了评论互动活动，最后在识别为共同的 IP 归属地后进行账号互关，通过他人的介绍，受访者 H 进入了当地的抖音粉丝群，大家在其中互相分享对 Waacking 的喜爱，并表述自己在当地的舞蹈困境，这让曾经感到孤独的 H 获得了一份情感力量，和他们进行了身份的确认，最终找到了自己的身份归属之处。

(三) 粉丝与经济：身份刺激下的共筑

街舞舞者生存在数字网络的影响下，已从原始的单纯授课，转变为利用数字平台，例如抖音、美拍等短视频平台，进而促使舞者得到个人舞蹈技艺的展示。同时，在抖音平台中，以往对街舞舞者的喜爱者变成了舞者或舞蹈工作室账号的粉丝，会对舞者或工作室视频进行评论、转发与收藏，帮助舞者与工作室得到流量的堆砌。作为粉丝的他们，为了让自己的“偶像”老师被大众熟知，会支持老师以及舞蹈室所创立的服饰品牌，例如 Hellodance、Qfun 与舞蹈家等舞室，即便舞蹈工作室本身在售卖服饰周边，但其中任职的“偶像”老师仍有自己创立的品牌向公众售卖。粉丝购买所追捧老师或工作室的服饰，不仅为他们带来了打扮的欢喜，还有对作为该服饰符号下的成员归属感，当别人也被工作室“偶像”老师的舞蹈技艺所征服时，转变为粉丝的他们，部分为了追捧老师或者工作室而购买其品牌服饰，部分认为穿上对应的服饰，仿佛他人在看到自己时便能被划分进优秀舞者的行列，而他们的存在便为自己的偶像一同筑起了为喜爱之人而做贡献的城墙圈子。受访者 L 作为 HIP-HOP 专业舞者，对于成都舞蹈室 Simple 和 Hellodance 是常客成员，为了彰显自己的身份，他购买了众多相关舞蹈室的周边，每次去舞蹈室跳舞都会穿上彰显身份的 LOGO 服装，他认为，穿上对应的衣服能给自己自信，别人也会在不认识自己时更高看自己，所以到舞蹈室后跳舞也能更放得开。而对应于“偶像”老师的服饰时，受访者 I 经验更为丰富，因其喜爱 Heels 舞种，从而对于喜爱的

Heels 老师创建的高跟鞋品牌便会大力购买，她认为自己的“偶像”老师作为专业的舞者，会更懂得如何在保持舞蹈安全性与稳定性下设计更为性感与时尚的高跟鞋，并且因为价格适中，作为粉丝的她，支持自己的“偶像”，实为理所当然。在问及身边人会一同为喜欢的老师买单时，她表示：“当然啊，我们社团不是一堆人一起买老师的衣服还有鞋子吗，然后会穿着一起去上课，我们就是一群小迷妹，我们都很开心呀，守护我们的甜心。”

五、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探讨了数字时代下街舞亚文化对青年身份建构与情感支持的多重作用。借助深度访谈方法分析，本文解释了街舞青年在数字平台中如何通过街舞视频的发布、街舞社群互动、跨文化交流等实践，逐步从孤立的个体转变为紧密相连的社区成员。本研究不仅揭示了数字技术如何打破地域与文化的边界，还为理解青年文化的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与质性支持。同时，本文还为网络亚文的理解进行了视角补充，特别是在数字平台如何促进情感支持与社群归属方面，为青年文化的变迁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

在学术价值方面，本文主要体现于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本文拓展了对街舞亚文化在数字时代下的情感支持与身份建构作用的研究，为青年如何借助虚拟空间实现自我认同提供新方向。其次，本文揭示了数字平台在跨文化互动中桥梁作用，帮助不同文化背景的街舞青年建立起全球性文化共鸣和情感连接。最后，本研究还关注了性别和小众文化群体在数字平台中的隐形边缘问题，特别是女性舞者与性少数群体舞者在自我表达和身份认同中面临的挑战^{[29][30]}，补充了现有关于青年文化中性别维度的探讨。

实践价值方面，本研究在于为青年文化政策的制定与实践提供了重要参考。在当前提倡文化交流与多样性建设的社会背景下，数字平台作为促进文化交流的重要工具，为街舞青年提供了跨文化互动的机会，有助于青年个体的自我表达和文化认同，特别是街舞亚文化的跨文化传播，为推进文化交流交往交融、构建多元文化社会提供了具体的案例支持。对街舞文化者通过数字平台传播与参与街舞文化的探讨，促进了青年文化的交流，这与全球文明倡议强调的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倡导不同文明和平共处、和合共生的理念相符合，体现街舞文化在促进文化交流与社会和谐方面的实践价值。

尽管本研究在探索数字平台如何帮助街舞青年从“孤独”走向“连接”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果，但仍存在不足之处。首先，本研究的样本集中于城市青年，缺乏对农村和社会弱势群体的考察，这会影响研究结论的普适性。其次，本研究主要关注了街舞青年在数字平台上的可见展示行为，而未能深度探讨他们在创作和展示背后的心理动机与行动过程。此外，尽管本研究重点讨论了青年街舞者在如何在数字平台中进行自我表达与身份认同，然而对于他们的长期身份转变过程以及身份的动态性探讨较为欠缺。街舞本身作为一种活跃的并不断发展的亚文化，青年街舞者的身份认同可能会伴随时间发生变化，特别是在数字技术迅速发展的背景下，个体如何通过长期的数字平台实践不断调整并重塑自我的文化身份，值得进一步探讨。

参考文献：

- [1] The Sporting News. Olympics Last Supper controversy, explained: Why drag performance during 2024 opening ceremony is drawing backlash.[EB/OL]. (2024-07-29)[2024-11-20].<https://www.sportingnews.com/us/olympics/news/olympics-last-supper-controversy-explained-2024-opening-ceremony/cd6a1ccc666cc8c182ec6244>.
- [2] 中国日报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纪念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全文.[EB/OL]. (2024-06-28)[2024-11-20].<http://global.chinadaily.com.cn/a/202406/28/WS667e6f2ea31095c51c50b638.html>.
- [3] Paglione, V., Magrath, J., McDonough, M. H., Din, C., & Kenny, S. J. (2023). 'Promoting wellness, having fun, and creating community': a dance instructor's pedagogical practices and perspectives on the influence of community dance classes for older adults. *Research in Dance Education*, 1-18.
- [4] Griffiths, L. E. (2023). Dancing through social distance: Connectivity and creativity in the online space. *Body, Space & Technology*, 22(1), 65-81.
- [5] Coleman, G. (2015). *Hacker, hoaxer, whistleblower, spy: The many faces of Anonymous*. Verso books: 15-20.
- [6] Burgess, J., & Green, J. (2018). *YouTube: Online video and participatory culture*. John Wiley & Sons: 55-66.

- [7] Zhu, H., Feng, D., & Chen, X. (2024). Introduction: Approaching Social Identities and Discourses in Chinese Digital Communication. In *Social Identity and Discourses in Chinese Digital Communication* (pp. 1-21). Routledge.
- [8] Mkrtchyan, M. (2023). LINGUISTIC SUBCULTURE: LITERARY ARGOT AND ITS TRANSLATIONAL INSIGHTS (IN “A CLOCKWORK ORANGE” BY ANTHONY BURGESS). *PHILOLOGICAL RESEARCHES*, (VII): 338-350.
- [9] Luu, V. T., & Williams, J. P. (2024). How K-pop fans utilize conventional and subcultural frameworks to construct fan identities: A case study of Seungri and the Burning Sun scandal. *Deviant Behavior*, 1-14.
- [10] Akarachantachote, P. (2023). Communication for Social Space Creation of Board Games Subculture in Thailand.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Arts*, 41(1), 125-143.
- [11] Chang, J., He, R., & Ren, H. (2021). The semiotic guerrilla: Internet subcultures as political resistance in China. *Journal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Studies*, 13(4), 110-120.
- [12] Bhoj, R., Thapa, R., & Chowdhury, A. R. (2024). Effects of recreation of subcultures on social media on the subculture, inter-subculture community and intra-subculture community individuals. *Fashion, Style & Popular Culture*, 11(3-4), 555-571.
- [13] Yin, Y., & Xie, Z. (2024). Playing platformized language games: Social media logic and the mutation of participatory cultures in Chinese online fandom. *New Media & Society*, 26(2), 619-641.
- [14] Yoon, K. (2019). Transnational fandom in the making: K-pop fans in Vancouver.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gazette*, 81(2), 176-192.
- [15] Han, X. (2022). Platform as new “daddy”: China’s gendered wanghong economy and patriarchal platforms behind. *Internet Policy Review*, 11(1), 1-34.
- [16] Branger, L. A. G. (2023). Mediated Identities: How Facebook Intervenes in the Virtual Manifestation of Our Identities. *Virtual Identities and Digital Culture*, 38-47.
- [17] Perasović, B., Mustapić, M., Ibañez Garzaran, Z. L., Mulari, H., & Hofreiter, R. (2023). Youth in conflict: space and subculture. *Journal of Youth Studies*, 26(3), 368-386.
- [18] Zhao, Y. (2022). Teaching traditional Yao dance in the digital environment: Forms of managing subcultural forms of cultural capital in the practice of local creative industries. *Technology in Society*, 69, 101943.
- [19] Tsaliki, L. (2022). Constructing young selves in a digital media ecology: Youth cultures, practices and identity.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25(4), 477-484.
- [20] Guerra, P. (2020). Under-Connected: Youth subcultures, resistance and sociability in the Internet age. *Hebdige and Subculture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Through the Subcultural Lens*, 207-230.
- [21] Ding, W. (2022). Emoticons Production of Bing Dwen Dwen: Meme, Online Socialization and Youth Subculture. *BCP Social Sciences & Humanities*, (17), 274-284.
- [22] Osadcha, L. V. (2022). Personal identity in the space of virtual culture: on the example of geek and glam subcultures. *Anthropological Measurements of Philosophical Research*, (22), 90-98.
- [23] Johnson, A. (2021). Copyrighting TikTok dances: choreography in the internet age. *Wash. L. Rev.*, 96, 1225.
- [24] Kavakci, E., & Kraeplin, C. R. (2017). Religious beings in fashionable bodies: The online identity construction of hijabi social media personalities. *Media, Culture & Society*, 39(6), 850-868.
- [25] Wang, Y. (2023). Virtual love experience in love and producer: Exploring perceptions of love, romance and gender in otome game player communities in China.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4(10), 5-11.
- [26] Yuexin, L. (2023). Research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Strategies of Street Dance Competition Marketing. *Academic Journal of Business & Management*, 5(15), 36-40.
- [27] Pritchard, R., Darko, N., & Stevenson, E. (2024). Enhancing community engagement, public involvement, and social capital through researchers’ participation in community dance projects: unexpected outcomes in underserved communities. *Research Involvement and Engagement*, 10(1), 79.

- [28] Koutsougera, N. (2018). Women's Performativities and Gender Politics in Hip Hop and Street Dance Cultures of Greece. *The Popular as the Political*, 38, 22.
- [29] Meneau, V. (2024). Queer dancers' experiences in the dancesport world: exclusion, invisibilisation and assimilation. *Equality, Diversity and Inclusion: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43(9), 55-70.

Loneliness to Connection: Street Dance Subculture and Youth Identity Construction in the Digital Age

Tang Jia-jie¹

¹Communication Guizhou Minzu University Guiyang, Guizhou

Abstract: This study is different from the traditional focus on the commercialization and mainstreaming of street dance culture, but shifts the perspective to how street dance subculture in the digital era helps youth realize the identity construction and emotional support from “loneliness” to “connection”. Through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14 young street dancers and the combination of in-depth interview methodology, the study finds that street dance youth have broken the geographical and cultural boundaries through digital platforms, and have gradually transformed from isolated individuals to closely-connected community members. Digital platforms provide street dance youth with opportunities for self-expression and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enabling them to enhance their sense of social participation in community interactions, construct positive self-identity, and grow in emotional support and identity construction.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supplement the observation of how subcultural groups utilize digital platforms for identity construction through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youth street dance culture, and to provide a new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for understanding the changes of youth culture in the digital era.

Keywords: online subculture; community interaction; digital identity; emotional support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2.496

夏嘉

(¹北京市顺义区第三中学，北京顺义 100000)

摘要：传统分科教育模式难以应对复杂社会问题的解决需求，科技进步与教育改革推动学科整合成为培养学生核心素养的重要路径。跨学科学习通过多维度知识融合，助力学生形成综合思维与创新实践能力，成为全球基础教育改革的焦点。当前研究聚焦初中音乐跨学科教学实践，探索课程设计、方法创新及教师发展路径，为新课标背景下的教学转型提供理论与实践参考。

关键词：跨学科学习；核心素养；课程改革

一、引言

传统的“分科主义”课程观致使学生的学习呈现分科式，百年前的“新教育”思潮让传统教育的天平逐渐倾倒，面对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新技术革命的挑战，世界各国都把教育改革放在了国家发展的重要地位。学生从一个自然人过渡成为一个社会人的过程中离不开教育的滋养，但现实社会需要面对的问题是非常复杂的，这样的复杂性意味着学生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往往需要综合考虑和运用两个或两个以上学科的知识与方法，这使学生核心素养的培养不仅需要相关学科的具体学习，也需要学科关联的跨学科学习。如何激发学生的内在潜力，让他们能逐步从容应对未来社会的复杂问题，培养出独特的关键能力和卓越的必备品格，是基础教育阶段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1]为了加强教育与学生完整生活世界的联系，一线教育者、学者以及政策制定单位也开始反思单一学科知识传授存在的弊端，进而转向不同学科知识的整合与应用，引导学生能够运用不同的学科视角去思考和解决问题，培育学生的跨学科素养。

基于此大背景对新课标进行相关内容的梳理分析，归纳新课标背景下初中音乐学科跨学科教学的实践基础和现状，试图探索初中音乐学科跨学科教学的实践路径，旨在为新手教师面对当前我国中学音乐课程改革提供理论与实践的相关参考。

二、初中音乐学科跨学科教学的实践基础

(一) 跨学科教学的内涵

跨学科这一概念最早可追溯至 20 世纪 20 年代，当时哥伦比亚大学知名心理学家伍德沃斯首次将其公之于众，使其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2]伍德沃斯将其定义为，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学科的实践活动，他认为这种实践活动超越了已知的一个学科的边界。有学者指出跨学科需要通过多学科的视角，对同一问题展开深入探讨，挖掘其内在联系，形成一套完整的解决方案。^[3]张华认为，跨学科作为一种核心课程观念，强调的是以跨学科意识为内核，同时兼具综合性与探究性特点的深度学习方法，此外，它还呈现为一种以综合主题为基础的独特课程形态。^[4]还有学者认为，跨学科教学是在尊重各学科内在逻辑的基础上，突破学科之间的边界，构建彼此之间的联系，对各学科进行整合。进而在教学实践中实施整合后的多学科融合教学。^[5]

而对于“跨学科教学”，美国学者认为跨学科教学是跨越学科边界，整合课程的各个层面，构建具有实质意义的相互关联，促使学生在广泛的领域内开展学习的一种教学方式。关于这一概念，德国存在多种解读，但有一个公认的定义，即“以一门学科为核心，选定一个中心主题，运用跨学科的知识进行对该主题的深入处理和教学设计。”由此可见，跨学科教学是一种追求突破学科界限的独特教学方式，它致力于促进学科间的深度融合与联系。这种教学方式，就像一个精致的织网，将多个学科的知识、方法与思维紧密地编织在一起，形成一个和谐共融、互相支撑的教学体系。在它的引领下，学生能够以更宽广的视野、更全面的角度去认识世界，去探索未知的领域。

(二) 新课标与跨学科教学的联系

近年来，我国对跨学科教学、跨学科学习尤为重视，发布了一系列指导文件。2014 年《关于全面深化

课程改革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意见》^[6]中提出了开展跨学科主题教育教学活动,要求提高学生综合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旨在通过跨学科的学习,学生能够更好地理解不同领域的知识,形成更加全面的思维方式,从而更好地应对现实生活中的各种挑战。2019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7]提出需要优化教学方式,探索基于学科的课程综合化教学,开展研究型、项目化、合作式学习、项目学习日渐成为当下我国教育教学改革的热点。

在推进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过程中,音乐学科不断突破自身局限,积极展开向外探索的迹象。在2001年版的《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实验稿)》^[8]中,“提倡学科综合”的理念犹如春风拂面,为音乐教育注入了新的活力。为了避免在追求学科综合的过程中迷失音乐的本真,2011年版的课标修订为“突出音乐特点,关注学科综合”^[10],这一理念的转变为音乐课程内容的变革指明了方向。2022年4月21日,教育部正式发布了《义务教育课程方案(2022年版)》(以下简称“新方案”)和新的义务教育艺术课程标准。《义务教育艺术课程标准(2022版)》(以下简称“新课标”)以新面貌出现在教育工作者和大众视野中。新方案指出,在此次新课标中关键改进之一是对课程内容结构进行了优化,提出艺术课程原则上至少要用10%的课时设计跨学科主题学习。^[11]其亮点在于提出了跨学科主题学习活动,这一活动蕴含了我国义务教育教学改革的导向。跨学科主题活动强调课程与生活的紧密融合,关注每一位学生的全面发展,致力于培养学生的综合思维能力。在跨学科主题活动的设计与实践中,必须遵循新课程标准,紧扣主题展开,注重不同学科间的有机整合,强化协同教学,淡化学科界限,紧密贴合学生现实生活,以培养学生在真实情境中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为目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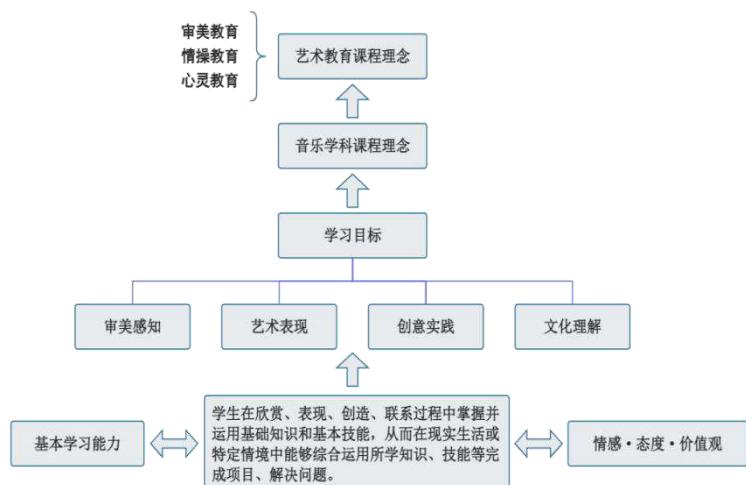


图1 音乐学科课程理念结构图

同时,在新课标中明确提出了“突出课程综合”这一课程理念,以落实核心素养主线,强调“以各艺术学科为主体,加强与其他艺术的融合;重视艺术与其他学科的联系,充分发挥协同育人功能”^[12]。并且在课程目标上,对不同年级的学生提出了不同层次的要求,如针对初一年级的学生要求能从文化的角度理解音乐与姊妹艺术、其他学科、以及个人、自然、科技、社会生活之间的广泛联系,而对于较高年级的初二、初三学子,要求他们能认识不同艺术的主要表现形式审美特征,理解音乐与其他学科,以及人类生活、社会发展等方面的紧密联系和相互作用。

针对这样的课程目标,具体初中音乐学科课程内容也进行了相应调整。音乐学科课程内容从以往的“感受与欣赏、表现、创造以及音乐与相关文化”,变为“欣赏、表现、创造和联系”4类艺术实践。主要将“音乐与相关文化”进行深层次融合,归纳为“联系”,在“联系”领域主要介绍音乐与社会生活、姊妹艺术和其他学科的关联与融合。

因为面对新课标中多样的学习任务,单一的教学方式是无法满足社会的发展和学生的需求。因此,在音乐教学中教师应高度重视音乐与其他学科的有机整合,积极探索有效的教学方法,将跨学科融合切实融入到新课程教育改革实践中,引导学生通过音乐实践活动,更全面地理解知识体系,领会音乐学科的人文内涵,培养学生的音乐学科核心素养,增强其综合素质。

三、初中音乐学科跨学科教学的实践路径

学校音乐教育的常规课程是培养学生音乐学科核心素养的主要途径,几乎所有学生都需要面对此类课程,并在此过程中学习相关知识与技能,在潜移默化中提升自身素养。音乐,这门古老的艺术形式,在发展过程中,与众多学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哲学等学科。在音乐学科及各学科的课程标准中都出现了跨学科教学相关内容的表述,新课标中提及到“加强与其他艺术的融合,重视艺术与其他学科的联系”;语文学科课标将音乐视为实践资源,以深化文化现象的教学探讨;数学学科课标强调关注音乐要素与数学的关联;历史学科课标则从音乐与历史的关联出发,着眼于提升学生人文素养的整体性。通过对音乐与姊妹艺术、社会生活和其他学科进行综合研究,可以大致掌握音乐常规课程的跨学科教学的现状。

(一) 音乐与姊妹艺术

人类早期开展的艺术活动就是“诗、乐、舞”三位综合一体的活动,不同的艺术形式之间在很多方面本来就具有许多相通之处。音乐中的画面和绘画中的音乐感,往往是艺术家们经常谈论的问题。比如美术中的术语“色彩”和“线条”经常作为音乐用语出现在音乐欣赏过程,以此来表现旋律的走向、乐句的发展等,或者用“色调”等美术的创意表达来形容音乐风格、和弦性质;无独有偶,音乐中的术语“节奏”一词也往往作为美术用语出现在美术评论,人类艺术活动的“通感”实际上是人们认识活动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

利用此特性,在进行跨学科教学时会将这些姊妹艺术进行有机融合。针对富含少数民族或异域风格的作品教学时,如北京版七年级下册《青春舞曲》,旋律简单耳熟能详,教师指导学生学习维吾尔族舞蹈中具有代表性的动作,如扭脖子、拍手及抖肩等,从而丰富其舞蹈表现形式,加深对相关文化的认识。对于乐曲体裁的学习,如圆舞曲和奏鸣曲等音乐形式,引导学生能够构建出丰富的旋律线条,让音乐与美术相互融合,进而直观地感受旋律的起伏、音高的变化以及曲式结构的呈现。

舞蹈、美术、戏剧等姊妹艺术在情感与情绪的表达上具有共通之处,这也是这些艺术表现形式共有的特征。音乐与美术、舞蹈等学科的交融为学生提供了丰富多样的感知与表现方式,从而使学生在音乐课堂上能够实现审美观的多元化拓展,进一步提升学生的艺术审美能力、想象力及创造力。

(二) 音乐与社会生活

音乐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也反映了社会的发展和变迁。新课标在学习任务中提到“探索生活中的音乐”,要求初中阶段学生在日常生活中能够运用生活中声音的特点与规律进行音乐创编与表演,积极参与社区和家庭的音乐活动,探究音乐的功能以及音乐与社会生活的联系。所谓社会生活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指人类社会生活,另一方面是指物质生活和社会日常生活。“艺术源于生活”,这是自古以来就被广泛认可的观点,它往往反映了音乐创作者对现实生活的观察、思考和感悟。

在学习不同时期的音乐作品时,需要从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背景和文化特征以及人们的生活习惯进行思考,如《叫卖调》一课可依托学生熟悉的广告,引导他们对广告功能及表现形式的思考。进一步引导学生发散思维思考在广告尚未出现的年代,小商贩如何促销其商品。随后,播放相关录像,让学生观察并回答售卖方式。通过介绍“叫卖”,教师引出本课主题。这种生活化的导入方式,既兼顾学生的实际理解能力,又紧紧吸引他们的兴趣和注意力,将音乐与社会生活紧密联系。

在进行跨学科教学时,教师会引导学生从自身的日常生活经验中入手,以自身音乐体验为出发点,紧密联系社会生活和音乐现象,积极探讨音乐与生活之间的内在联系,理解音乐对于生活的重要意义,这样的教学方法有助于将学习音乐转变为一种丰富、细腻、充满艺术氛围的生活体验。

(三) 音乐与其他学科

在初中阶段,学生所需学习的科目繁多,除音乐之外,尚包括诸多课程。其中,语文、英语、历史、地理、化学、信息技术等以及哲学等都被称为人文学科;而数学、物理、化学等则被视为自然学科,这些皆为艺术以外的其他学科。这些科目是学生每日学习的主要内容,从学生熟悉的学科出发,强化音乐与其他学科的关联,有助于提升学生的文化修养,集中学生的注意力,并拓宽其知识领域,也能激发学生对音乐学习的兴趣,进而提升学生的音乐学科核心素养,推动学生全面成长。

1. 音乐与语文

音乐与文学同源,早在人类文明启蒙阶段,便有记载:“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乎心。”由此可见,音乐与语文之间联系非常密切,尽管文学与音乐的表现形式各异,但都是表现传递情感的艺术,而且从汉语特性来看,古今诗歌、词曲等,大都可作为歌曲演唱。

新课标对初中学段学生的编创能力提出了一定要求,在初一年级学生应“能选用合适的音乐作品表达自己的情感,编创与展示简单的音乐作品”,初二、初三年级应“能编创与展示比较完整的短小音乐作品”。

与旋律相比，音乐中的歌词作为语言的载体，能让学生从另一个角度感受到作品的情感，歌词分析也是进行创编活动的一个环节。在跨学科教学过程中，教师通过引导学生分析歌词中的修辞手法、意象和隐喻，帮助学生理解语言的运用和表达方式。

2. 音乐与数学

音乐中存在着明显的数字规律，比如节拍。音乐的节拍形式不一，其中常见的是 $\frac{2}{4}$ 拍、 $\frac{3}{4}$ 拍、 $\frac{4}{4}$ 拍， $\frac{3}{8}$ 拍等，标志着一个小节中有不同的强弱关系。而提到音乐和数学的关系人们总是会追溯到古希腊时期的数学家毕达哥拉斯的“和谐论”，他在世界范围内首次发现了音乐与数学的联系，即拨动琴弦产生的声音与琴弦的长度有着密切的关系。

音乐与数学相结合的教学方式为学生提供了探索和应用数学概念的空间，这种方法为阐释音乐作品或音乐现象提供了具体且科学的方式。在编创音乐过程中，学生学习需要掌握一定的作曲理论。在音乐创作中，一种常见的技法是将某一旋律以保持节奏不变的基础上，整体上移或下移若干音符。从几何学的视角来阐述，这种手法可被视为“平移”。以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为例，其乐曲开头的震撼效果得益于后两个小节对前两个小节音符的垂直平移，从而使得整体音调更为低沉，力度更强。除此之外，还有“逆行”的创作手法，将一段旋律从后向前进行重复，使其在曲谱上呈现左右对称的“镜像”效果，就像在平面直角坐标系中进行了水平翻转。

在深入研究音乐与数学相互交织的可能性之后，学者安嵩构建了“数学-音乐跨学科课程与教学模型”，教学分为五个阶段：首先以音乐为重点，介绍音乐创作及背景知识；其次探讨音乐活动与数学之间的联系，重点仍在音乐；第三阶段引导学生参与音乐活动，从中识别数学概念；第四阶段教师根据学生成果设计数学示例，学生分配教学任务，更侧重数学；第五阶段转向纯粹数学，促进学生对数学的理解提高。这个模型层次分明，有助于整合音乐与数学的跨学科教学，激发学生兴趣，提高跨学科能力，促进综合发展，培养创造力和批判性思维，加深对数学理解，提升学习体验和成效。在音乐常规课程教学中，常常会遇到一些学生，会和老师表达音乐的晦涩难懂，跨学科教学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不仅是因材施教，也符合音乐学科的学科发展特点，感性的音乐中也有着理性的数学。

3. 音乐与历史

义务教育中的艺术课程具有鲜明的人文特色，与历史学科在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和人文素养方面有共通之处。音乐与历史有着密切的交融，历史学科的广泛内容可以涵盖音乐学科的诸多传播方面。因此，音乐在历史研究中扮演着文化艺术的重要角色。

音乐风格可以表现特定历史时期的历史特点，历史叙述可以分析音乐作品、音乐家创作的形成原因。音乐风格是历史特点的重要体现，不同历史时期的音乐作品，反应了不同的社会背景、文化氛围、审美观念，通过对这些音乐风格的研究，我们可以领略历史的变迁和各个时期的社会风貌。在北京版八年级上册教材中，第一单元编写的曲目为《春游》、《保卫黄河》、《在太行山上》等作品，同一学期该学段学生历史学科所学习的内容为中国近现代史，通过对这些音乐作品的学习、演唱、研究，我们可以领略历史的变迁和这个时期的社会风貌。与此同时，音乐作品也是对历史事件的反映和记录。例如，人音版九年级上册教材中编写了柴科夫斯基的《1812序曲》，描绘了拿破仑战争时期的战争场面，结合九年级历史教材中的世界史内容，使学生能更加感受到那段历史的波澜壮阔。

4. 音乐与地理

初中学段音乐学科教材中，中国民族民间音乐所占比例逐步增加，在新课标中也明确指出“热爱中国音乐文化，能从中汲取民族文化智慧，坚定文化自信”。我国历史悠久，国土辽阔，众多的民族让各地自然、社会、生活及劳动方式有一定差异，使得民歌在体裁、风格、表现手法等方面呈现出丰富多样、各有千秋的特点。通常，北方民歌的旋律波动较大，音域宽广，甩腔运用频繁，表现出阳刚、开朗、奔放的格调；相较之下，南方民歌曲调更具抒情性、委婉性、细腻性，且音乐性较强。各民族的传统、地理环境、语言、生活习惯等因素，使得演唱方法也呈现出多彩多姿的特点。

在丰富多彩的音乐文化中，地区的自然环境、文化环境以及民间习俗等元素，与音乐文化风格、体裁形式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元素相互交织，共同塑造了音乐文化的独特魅力。

目前在现有教材中，我们可以认识到悠扬高亢、粗犷奔放的陕北信天游《信天游》，陕北沟川遍布，人们习惯把声音拉得很长，于是便在高低长短间形成了自由疏散的韵律；旋律舒展、气势宽广的蒙古族民歌《天鹅》、《银杯》，蒙古族居住在辽阔壮美的草原环境，在长期的实践中形成了一种字少腔多，且拖腔悠扬、舒缓的长调歌曲，具有浓厚的草原生活气息；细腻委婉、美丽动人的江南民歌《茉莉花》、《无锡景》，江南地区资源充裕，地势平坦，自古人才辈出，孕育出了旋律和谐、韵味细腻的江南民歌，其风格富含叙

事性与抒情性；清悦嘹亮、热烈奔放的藏族民歌《献上最洁白的哈达》，藏区地势较高气候寒冷，晴朗天气较多，日照时间较长，该地区的民间音乐呈现出嘹亮悦耳、热烈的特点，洋溢着高原天空广阔无垠的氛围。

即便是“同一首歌”，地域差异亦会使歌曲呈现出不同的音乐风格。以《茉莉花》为例，该曲广泛流传于全国各地，如我国河北、江苏及东北等地。然而，受地理环境的影响，《茉莉花》的曲调和歌词在各地区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风貌。河北地区以明快爽朗的旋律见长，浓郁的中原特色尽显其中；江苏地区则以柔美细腻的旋律为特点，江南风情得以展现；而东北地区的曲调夸张风趣，颇具二人转之意蕴。

在进行此方面曲目的教学时，教师都会与地理学科进行关联，呈现地区地图、民俗民风照片、歌曲流传路线等等，其主要原因是音乐文化类型的划分与地理学中对不同范围和地貌的自然地理环境划分存在密切关联。历经长久的历史沉淀，我国各少数民族及不同地域的民众在地理环境、文化气息和历史传统等多重因素影响下，孕育出了独具特色的音乐。不仅是中国民族民间音乐，新课标还表明应“领略世界音乐文化的多样性，包容不同音乐的表达方式，尊重文化差异”，因而在学习世界音乐文化时，也将此跨学科教学方式进行了运用。

四、初中音乐学科跨学科教学的探索思考

1. 改变教学思维，加强理论素养

改革数十载，每一次改革都是一次深入推进。新课程标准精神的落实，除了和专家引领，政府学校支持有关，还与教师本身息息相关。传统的知识传授已转变为核心素养的培养，教师的教学思维进行跨学科教学过程中尤为重要。跨学科教学思维并非意味着每位教师都必须达到“样样皆会”的水平，而是有开放的学科观念和学科融合的意识，运用不同学科的思维方式理解分析音乐学科的问题，从而不仅把握音乐学科的内涵，也加深对其他学科的认识。新课标的正式颁布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学生多方面核心素养的养成需要教师拥有与之匹配的专业素养，教育教学理论是指导教学实践的基础，树立终身学习的教育理念，掌握丰富的教育教学理论，只有才能更好地进行教学设计、组织和管理。

2. 坚持音乐为本，兼具跨学科特征

在我国，基础教育学段长期采用分科教学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各个学科具有独立的体系，彼此之间学科界限分明。跨学科教学则是一种全方位的教育革新，它以音乐学科为中心，融合多元学科知识进行教学设计的教学方式。但在教学层面上，很容易出现“两头跑”现象。一是“拼盘教学”现象，音乐课程的核心内容包括演唱、欣赏以及音乐创作等方面，教材主要聚焦于音乐领域的教学内容。然而，音乐教师在其他学科领域的知识掌握方面相对较少，且在日常教学中较少与其他学科教师展开交流与合作；二是“主体偏离”现象，音乐课可能会变成语文课、历史课、地理课，音乐学科作为主线和主体地位很难坚持。

音乐跨学科教学本质上是为了促进音乐学科学习能力的提升，教学过程中应通过情感的迁移或情景的交融实现跨学科教学，利用其他学科的内容来丰富音乐学习体验和拓展音乐理解，要避免“重过程经历、轻知识学习”的现象，确保音乐课堂保持主导地位，坚持音乐为本，兼具跨学科特征。

3. 研读课程标准，关注教学设计

进行跨学科教学的过程中，教学设计尤为重要，它需要建立在对新课程标准的研读思考基础之上。新课标要求初中阶段要着重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即审美感知、艺术表现、创意实践和文化理解。核心素养目标是在上一轮新课改三维目标的基础上提出的，基于三维目标又高于三维目标。因此，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教师应深入研究新课标，充分考虑学生所要达到的素养要求，以及音乐学科的逻辑结构，选取跨学科教学所需的主题内容及教学素材，通过一次次的教学设计，实现跨学科教学的目标，达成做中学、学中做。

五、结语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对“学科融合”的持续关注，核心素养的“跨学科”属性都能让我们切实体会到音乐课程跨学科发展趋势。基于 2022 年颁布的《义务教育艺术课程标准》，通过对音乐与姊妹艺术、社会生活和其他学科进行综合研究和内容分析，对初中音乐学科跨学科教学的现状进行了简要归纳，并对此进行了一定探索思考。然而，关于跨学科教学发展路径的探讨深度与层次尚显不足。但这是一个较好的研究开端，随着对教育教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和教学实践经验的不断丰富，相信今后在音乐跨学科教学研究方面会进一步完善和加强。

参考文献：

- [1] 李洪修,崔亚雪.跨学科教学的要素分析、问题审视与优化路径[J].课程.教材.教法,2023,43(1):74-81.
 [2] 刘仲林.交叉科学时代的交叉研究[J].科学学研究,1993,(02):11-18+4.

- [3] 任学宝.跨学科主题教学的内涵、困境与突破[J].内蒙古教育,2023,No.878(9):24-34.
- [4] 张华.跨学科学习:真义辨析与实践路径[J].中小学管理,2017,No.324(11):21-24.
- [5] 于国文,曹一鸣.跨学科教学研究:以芬兰现象教学为例[J].外国中小学教育,2017,(07):57-63.
- [6]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意见[Z].2014-04-08.
- [7]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Z].2019-6-23.
- [8]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实验稿)[S].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 [9] 全日制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实验稿)[M].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 [10] 全日制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M].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 [11] 义务教育课程方案[M].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
- [12] 义务教育艺术课程标准[M].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

Practical Exploration of Interdisciplinary Teaching in Junior High School Music

Xia Jia¹

¹ Beijing Shunyi No.3 Middle School, Beijing, China

Abstract: Traditional subject-based education struggles to address the demands of solving complex societal issues. Advance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upled with educational reforms, have driven curriculum integration as a critical pathway for cultivating students' core competencies. Interdisciplinary learning, through the fusion of multi-dimensional knowledge, facilitates th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comprehensive thinking and innovative practical skills, emerging as a focal point in global basic education reform. This study focuses on interdisciplinary teaching practices in junior high school music, exploring curriculum design, pedagogical innovation, and teacher development pathways. It aim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references for educational transformation under the new curriculum standards.

Keywords: Interdisciplinary learning; Core competencies; Curriculum reform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2.500

游戏化学习导向的多场景应用桌游设计 ——以面向文化遗产教育的桌游《博物寻踪·守藏吏》为例

侯琳慧¹ 付一苇¹ 吴雨潇¹

(¹ 西北大学, 陕西 西安 710127)

摘要: 随着教育理念的不断革新, 游戏化学习作为一种新兴的教育模式, 正逐渐走进人们的视野。然而, 目前教育类桌游的设计多为针对特定学科或特定学习目标的定制化产品, 其游戏框架也难以推广到其他学科的学习中。为此, 本研究通过探讨游戏化学习理念, 提出了一个可再生产、能够应用于不同学习背景的游戏框架。并将其应用到文化遗产教育领域, 设计了桌游《博物寻踪·守藏吏》, 从而具象展示了如何通过游戏化学习机制设计实现教育目标与趣味性的平衡, 这为以学习者为导向的教育提供了一种创新的实践路径。

关键词: 教育、自主性、游戏化学习、桌游、可多场景应用

一、引言

在灌输式教育的课堂上, 教师滔滔不绝地讲解, 学生机械地记录, 知识以存储物的方式被强行灌输进学生的记忆中。在这种“存储行为”中, “教师越是往容器里装得彻底, 就越是好教师; 学生越是温顺地接受灌输, 就越是好学生”^[1]。这种表面看似高效的教育模式掩盖了问题的存在: 在单向的知识传递中, 学生主体性逐渐被消解, 学习变成了对规则的服从, 而不是对世界的探索。

然而作为原初的、特定的人类的行动中包含着“是谁”的主体性言说, 无言的行动因为缺少行动者的彰显而不再是行动。当学生缺乏对知识主动探索的欲望, 而仅被允许充当重复他人思想和行为的存在时, 个体的独特性就逐渐被消解, 成为工具性存在的延伸。在灌输式教育中, 学生的学习行为被控制在一条单一的轨道上, 所有的思考与行动都必须服从于既定的教育目标。这种控制性学习不仅剥夺了学生与知识互动的自由, 也阻碍了他们通过探索重新定义自我与世界的可能性。于是, 教育本应激发学生的创造力和批判性, 却培养了恭顺与取巧, 这正与使“他们成为具有更完美人性的本体使命背道而驰”^[2]。并且在这一过程中, 惯习成为了无形的结构力量, 强化了学生的从属性和被动性, 教育也因此陷入了循环的困境。

但是否可以在教育中重新唤醒学生主动探索的活力? 如果学习不再是一种被动的存储行为, 而是一个动态生成的过程, 教育又会呈现怎样的面貌? 我们可以从具身体验的视角加以思考。“具身性意味着人的身、心、物及环境自然且无分别地融为一体, 以致力于某活动的操持”^[3], 在这里身体进入感官世界参与同周遭的“对话”。学习并非发生在抽象的认知层面, 而是通过身体与环境的互动而动态生成的。这一观点启示我们, 学习不仅仅是对外部知识的接受, 更是感知与实践过程。与传统灌输模式不同, 具身性的学习模式通过身体的参与与体验, 使个体能够在实践中获得新的理解、生成新的意义。

[作者简介]

[1] 侯琳慧 (2004-), 河北衡水人, 西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在读本科生, 研究方向为媒介学。

[2] 付一苇 (2003-), 四川成都人, 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在读本科生, 研究方向为工商管理市场营销。

[3] 吴雨潇 (2003-), 陕西宝鸡人, 西北大学艺术学院在读本科生, 研究方向为动画设计。

在这样的背景下，教育创新成为应对当下问题的重要议题。其中，作为一种强调互动性和情境化的学习方式，游戏化学习通过构建虚拟情境和动态任务，使学生能够在具身体验中感知知识的意义。游戏的互动性与沉浸性不仅可以激发学习者的参与热情，还能够通过模拟场景与动态反馈机制，使知识的学习过程更加直观与生动。然而，目前市面上以教育为目的的游戏往往停留在简单的知识传递层面，缺乏深度学习与探索的空间，难以满足学生的个性化需求。因此，如何设计出既能承载教育功能，又能实现趣味与自由探索的游戏形式，成为亟待探讨的课题。基于以上思考，本研究旨在回应这一问题，意在通过“基于游戏化学习可多场景应用的桌游设计模型”这一“手段”来激发学生对知识主动探索的活力的“目的”。为更好的展示这一理念在实践中的具体运用，本研究以基于此理念制作的教育类桌游《博物寻踪·守藏吏》为例，来阐述这一模式运行的逻辑。从而探讨如何将学习内容融入开放性游戏结构之中，并将其应用于多个场景模块化以适应教与学，从而希望回应以下问题：什么是游戏化学习？如何在将这一理念具体运用到学习场域，以平衡知识的深度和学习的乐趣。这些不仅是游戏化学习的教育实践，也关乎学习者在教育中的主体性。

二、游戏化学习理念与桌游教育产品

2.1 游戏化学习理念简述

游戏化学习（Game-Based Learning）被定义为一种可供学习的环境，其中，“游戏内容和游戏玩法增强了知识和技能的获取，游戏活动涉及解决问题的空间和挑战，为玩家/学习者提供了成就感。”^[4]也就是说，使用游戏元素（如激励系统）来激励玩家参与他们原本不感兴趣的活动，通过游戏机制来实现学习目标。作为一种学习理念，游戏与学习的结合早在古希腊时期便初见端倪，“在强迫下获得的知识无法占据心灵”^[5]，柏拉图认为儿童的早期教育应当以游戏的形式进行，以此发现他们的天赋与兴趣。他指出，“不要使用强迫，而是让早期教育成为一种娱乐；这样你会更好地发现他们（儿童）的自然倾向”^[6]。游戏化在教育中的应用也由来已久，在传统教学中，教师使用游戏化思维技巧来培育孩子的主动学习、创造力与解决问题的能力，比如当学生表现优异时奖励小奖票或者发朵小红花。此外，现在的一些学习网站中，如多邻国和百词斩，会利用闯关、积分、徽章、排行榜等元素来激发学习者的挑战心。



图 1 游戏化学习的模型

（引用自 Plass, Jan L., Bruce D. Homer, and Charles K. Kinzer. "Foundations of game-based learning." *Educational psychologist* 50.4 (2015): 258-283.）

游戏设计师在学习类游戏的设计中，常常运用行为主义元素、认知主义元素以及建构主义元素，以及这些元素的多种组合。“在基于学习行为理论的游戏中，学习过程的基本要素是游戏面向玩家的问题；玩家对这个问题/刺激的反应就是一个答案，这个答案可能是对的，也可能是错的；正确的答案会得到游戏的积极回应，从而进一步激发玩家的积极情绪；一个错误的答案会触发一个消极的游戏响应”^[5]而建构主义的观点强调学习者的能动的积极作用，学习者在其中扮演游戏世界故事中角色，认同游戏世界中正在发生的事情并积极解决问题。除了知识层面的获取，游戏也同认知发展关系紧密。“根据皮亚杰的观点，随着儿童在不同发展阶段逐渐成熟，游戏变得更加抽象、象征性和社会性。”^[6]游戏通过激活儿童的图式使他们能够超越现实去思考，这对象征性思维、创造性和分析与反思思维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同时，或逼真或虚拟的

游戏情景都在一定程度上隐喻着现实世界的现实世界的情境，这支持学习者在互动中具身参与，从而成为学习的主体。

Plass, Homer 和 Kinzer (2015) 进一步指出，游戏化学习并非是单一独特的学习理论，因此“很难在认识论层面上定义”。与此同时，Jan L. Plass 等人认为与其构建一个全面的学习理论，不妨考虑一个简单的模型，用以描述几乎所有游戏所具有的基本结构。作为一个学习的环境，这一结构由三个关键要素组成：挑战、反应和反馈（见图 1）。当反馈构成一个新的挑战，或者促使玩家对原始挑战做出不同的反应时，一个循环便得以生成。

2.2 基于游戏化学习的桌游

桌游进入学习场域已经不是一件新鲜事了，1645 年，制图者皮埃尔·杜瓦尔设计了《世界游戏》（Jeu du monde）^[7]，这是已知的最早的教育类棋盘游戏，旨在通过游戏的形式教授玩家地理知识，这款游戏的赛道由一系列世界各国的小地图组成，沿螺旋赛道展开。

在数学教育中，鉴于卡牌游戏能够塑造学习兴趣，Singh, Parmjit 研究开发了一种名为 Math Zap 的卡牌游戏，学生们在乐趣中提高心算的流畅度，从而在潜意识中收获数学知识。研究者在 34 名 12 至 13 岁的小学生中进行了测试，统计显示学生增长的的前后的成绩测试分数证明了游戏化学习的有效性^[8]。

在医学科普领域，2020 年的新冠疫情让一款相关桌游重新成为焦点——《瘟疫危机》（Pandemic），在游戏中，作为专业的抗疫团队，玩家们要与时间赛跑，走遍世界，治疗被感染的病人，采集病原，为四种致命的传染病研发药物，根治传染病。这帮助玩家理解传染病的传播机制、公共卫生应对策略以及团队合作的重要性。

《本草》则融入中草药知识，背景设定在瘟疫肆虐的古国，扮演药师的玩家们聚在一起，通过合作配药、学习解药配方，应对瘟疫。游戏包含问药、喂药、组药等行动。

在文化遗产领域，地理游戏将教育内容与游戏机制巧妙结合，使得游戏参与者在移动和互动的同时学习文化遗产知识。例如，Geo Tic Tac Toe 游戏通过让玩家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城市班贝格中设置标记，从而深入了解文化遗产。这种游戏形式不仅娱乐性强，且能通过嵌入教育内容实现寓教于乐同时为文化传播提供了一种既有趣又有效的新途径。^[9]

此外，在复杂抽象的科学概念学习中，棋盘桌游也试图平衡教育需求与可玩性。Chiarello 等人为量子力学原理而设计的《量子竞赛》、有关免疫系统和纳米生物技术的《芯片实验室》以及为解释时间膨胀等相对论概念而设计的《时间竞赛》。游戏选择了几个需要解释的基本概念作为核心，并完全围绕这些概念设计游戏机制和规则。例如，在量子力学（包括波粒二元论、离域化、观察状态坍缩、不确定性原理等概念）和相对论（时间膨胀、空间收缩、引力对时间流动的影响等）中尤其如此。每个游戏都有大约 1000 名学生参与，经过 Chiarello 等人研究发现，游戏的使用对于他们理解和学习此类抽象概念特别有帮助。^[10]

三、基于游戏化学习可多场景应用的桌游设计模型

由上述可知，教育类桌游作为一种新兴的教育工具，逐渐受到教育工作者与研究者的关注。然而，目前教育类桌游的设计多为针对特定学科或特定学习目标的定制化产品。这些桌游在设计过程中往往高度依赖于具体的学习内容与教学目标，缺乏通用性与可扩展性，例如，《玩转 520 化学桌游》虽然在化学教育领域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其设计思路与游戏机制难以直接应用于数学、语言或其他学科的教学中。同样，Singh 等人开发的 Math Zap 卡牌游戏虽然在提升学生心算能力方面表现出色，但其游戏框架也难以推广到其他数学概念或学科的学习中。

这无疑增加了创作者和学习者的成本。教育工作者在选择桌游时，往往需要针对不同的教学目标重新设计或寻找合适的桌游，他们需要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设计和调整规则，以确保其既具有教育意义又易于理解；同时，学习者在熟悉桌游规则时，需要投入一定的时间和精力。对于复杂的桌游，这一时间成本可能显著增加。例如，一些策略类桌游可能需要数小时甚至更长时间来熟悉规则，这对于学习者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这种时间成本不仅影响了学习者的参与意愿，还可能导致学习者在游戏初期就感到疲惫，从而放弃进一步参与。

鉴于上述问题，开发一套可再生产、能够应用于不同学习背景的游戏框架显得尤为重要。并且，游戏框架的通用并不意味着照搬照抄，教育类桌游的设计需要考虑不同学科的特点和学习目标，例如，数学桌游可能需要更注重逻辑思维和计算能力的培养，而语言学习桌游则可能更侧重于词汇和语法的掌握。此外，学习者的个体差异也不容忽视，不同年龄、学习风格和知识水平的学习者对游戏规则的理解和接受能力各不相同。因此，通用框架包容足够的灵活性，以适应这些差异，确保每个学习者都能在游戏过程中获得积极的学习体验。与此同时，游戏框架只提供泛化的流程，但具体规则细则应根据实际教学目标和学习者特

征进行灵活调整，以产生有意义的变化，来提供新的体验，并且平衡优劣势，来拉近不同水平玩家距离，降低操作和策略门槛。从而使得游戏具备一定的可玩性和深度，同时具有重玩性。

基于以上阐述的游戏化学习和可多场景应用的设计理念，我们提出一种可以广泛应用于各个学科学习领域的桌游设计模型。该模型的核心思想是通过开放的行动选择和交互式的探索机制，让玩家能够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知识储备自由参与，同时通过多样的任务和目标设定，确保游戏具有较高的教育性和娱乐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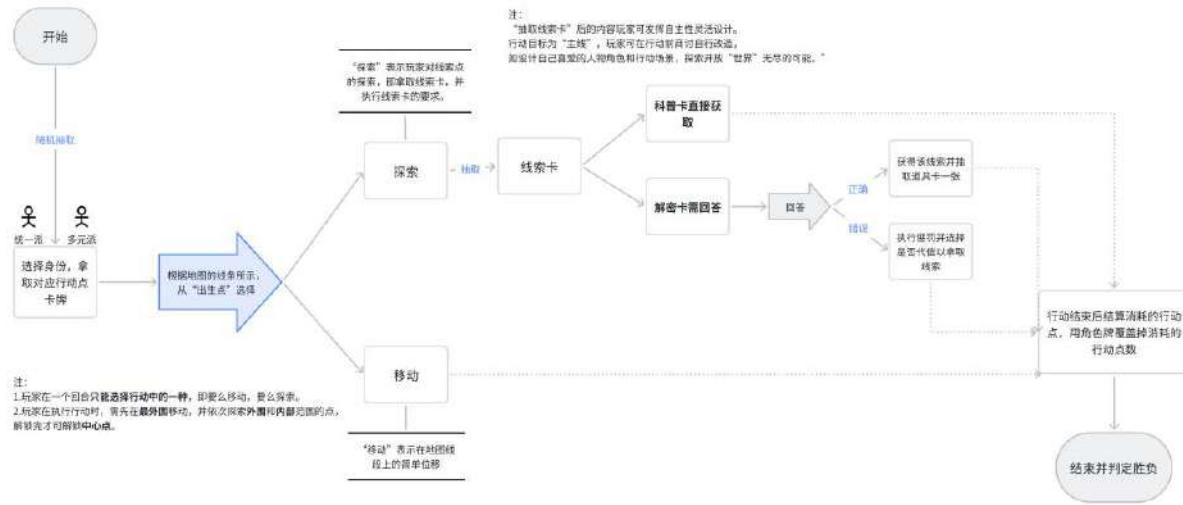


图 3 基于游戏化学习可多场景应用的桌游设计模型

该模型的设计包含以下几个主要步骤：

初始阶段，玩家通过随机抽取的方式确定自己的阵营和身份，并获得相应的行动点卡牌。随机性不仅增加了游戏的变化性，也使得每个玩家的游戏体验都有所不同。这一设计能够确保游戏的公平性，并促使玩家在相同的起点上展开不同的策略。

在此之后，玩家根据地图的线条所示，可以选择移动或探索两种基本行动。移动表示在地图上沿着线段进行简单位移，探索则意味着在特定的线索点进行深入探索，并抽取线索卡。在每个回合中，玩家只能选择一种行动方式，这要求玩家在“行动”与“探索”之间做出战略性决策。为了保持游戏的节奏，玩家需从外围的点开始探索，并依次解锁外围区域，最终才能进入中心区域进行进一步的探索以及执行任务。

在探索过程中，玩家将抽取“线索卡”，这些卡片分为科普卡和解密卡。科普卡为玩家提供直接的信息，而解密卡则需要玩家通过回答问题来解锁线索。答对后，玩家不仅获得该线索，还会抽取道具卡；答错则会遭受惩罚，并可选择是否代偿以获得线索。这一机制不仅能够加深玩家对知识的理解，还通过惩罚机制增加了游戏的挑战性。

每个回合结束后，玩家需结算消耗的行动点，并使用角色牌记录消耗的点数。这确保了资源的合理分配，并为后续回合的策略决策提供了依据。游戏的最终目标是通过收集线索并完成任务，最终根据具体判定标准来判定阵营的胜负。

值得注意的是，在通用的游戏框架内部，玩家可发挥自主性，在其他玩家允许的前提下设计角色、场景甚至设计互动性的新规则，进一步提升游戏的可玩性。比如增加合作解密的机制，某些解密卡可能需要本阵营玩家共同回答问题才能解锁。

四、实证研究：《博物寻踪·守藏吏》设计实践

为了更好的展现这一模型的实际运用，下面以我们设计的《博物寻踪·守藏吏》为例。

4.1 设计背景

五千年历史浩如烟海而收聚一阁，文物便是那持有时间和记忆的文化载体。可纯粹地将“物”陈列只是一种凝固的艺术，而人可以能动性地从“物”的既有中汲取灵感，将“物”再创作，重构外形和故事，再把这一重新凝聚起替代带有人的意志的结合体放回与世界的联系当中，使其拥有“沟通”的可能。《博物寻踪·守藏吏》以寓教于乐、文化自信为旨趣，以陕西省丰富的文化遗产为基础，旨在通过对文物的艺术化再现与创新设计，通过引入文物和其对应历史时代的文化元素，游戏让玩家（学习者）在探索与解谜的过程中，深入了解华夏文明的辉煌与演变，激发对文化遗产的兴趣与热情，从而达到文化遗产“可沟通”性学习。

4.2 设计思路：“时间—空间—器物”三元映射

以陕西省文明演进的七个历史阶段为轴心，为游戏构建“时间—空间—器物”三元映射结构（表1）。

时代命名	时间跨度	地理区域范围	代表性元素	典型文物案例
曙光漫野 (史前)	5900-2600BC	渭河流域等地	半地穴房屋； 绳纹波纹、	陶鹰鼎、 人面鱼纹盆
殷土芒芒 (商)	1600-1046BC	今陕西中部和 北部地区	夯土台基； 甲骨文、饕餮纹	乳钉纹青铜爵
赫赫宗周 (周)	1046-771BC	关中平原、陕北部分 地区及汉中盆地	宗庙布局； 夔纹、雷纹	何尊、利簋
九州争鸣 (战国)	475-221BC	关中、陕北及 汉中盆地	高台建筑； 小篆、猎碣文	错金杜虎符、 秦石鼓
东方帝国 (秦)	221-207BC	今陕西中部和 西部地区	陵墓、直道轴线； 方孔钱链	跪射俑、秦半两
长安一梦 (汉)	202BC-220AD	今陕西中部和北部、 甘肃东部、宁夏部分 地区	“前朝后寝”； 白玉、鎏金鎏银	皇后玉玺、 鎏金银竹节铜熏炉
四海晏然 (唐)	618-907AD	今陕西、甘肃东部部 分地区以及内蒙古 河套地区	木结构； 唐三彩	骆驼载乐俑、 镶金兽首玛瑙杯

表1 历史阶段与代表性元素

寻踪图以陕西省历史地理演进为核心，结合考古地层学逻辑，构建七层活页式地图册。通过物理叠层设计模拟按时间倒序（唐→汉→秦→战国→西周→商→史前），每一层地图对应特定历史阶段，以呈现文明演进的连续性。其中每张地图参考《中国文物地图集 陕西分册》等资料，按照当时的地理区域划分范围、建筑风格进行复原式设计。例如商时期的陕西地域图结合当时的地形环境、植被类型、人们的居住生活环境等元素绘制（图4、5）。



图4 商建筑复原图与设计图



图 5 商时期陕西地域与设计图

文物选取朝代中具有代表性的文物，共 32 件，通过纹样与字样复原、动物元素萌化、拟人化三种方式，以兼具专业性与艺术性。

(1) 纹样与字样复原：按照文物原貌进行纹样和字样的复原

陶器网纹船形壶



秦半两



乳钉纹青铜爵



错金杜虎符



(2) 动物元素的萌化处理：挖掘文物中的动物元素，处理其眼睛和身体部位，使其目光更为灵动，色彩变得更有光泽。

陶鹰鼎



金怪兽



(3) 拟人化设计：根据文物的特征，保留其图案和纹理，将文物拟人化为可爱的立绘角色，服饰及饰品均采用文物所在朝代的服装，拉近其与玩家的距离。

孟簋



镶金兽首玛瑙杯



线索卡则基于这些文物的考古属性，并与对应的时代地图相结合。线索卡包含文物的主要线索，分别为籍贯、住址、属性、用途、年龄、外形。

4.3 游戏化学习机制设计与游戏展示

4.3.1 游戏概述

游戏主要面向对初中以上对文化遗产知识感兴趣的群体，4-5人最佳。游戏的核心目的是收集文物线索，完成历史文物的恢复任务，从而恢复历史记忆，玩家将进入不同的历史时期，通过“统一派”和“多元派”两大阵营的对抗与合作，逐步解锁历史的真实面貌。统一派主张将文物集中，试图通过建立“博物方舟”来复原历史记忆；而多元派则试图将文物归还至原位，以期恢复器物之灵，延续人类文明。玩家（学习者）将经历曙光漫野、殷土茫茫、赫赫宗周、九州争鸣、东方帝国、长安一梦、四海晏然。寻踪华夏博物，寻觅逝去的文明，重现那些见证和成就中国历史的文明。

4.3.2 游戏规则与机制

游戏的基本规则围绕移动探索和线索收集展开。每个时代的文物对应一定数量的线索，玩家必须在对应时代地图上通过收集这些线索来完成文物恢复任务。核心机制分为四个方面：



图 7 规则机制细节图

(1) 阵营设置与角色能力：游戏中的角色分为统一派和多元派这两个阵营。多元派角色的能力不同，行动点不同且上限固定，超出自身行动点上限，不额外增加行动点；而统一派角色无任何能力，行动点没有上限，探索线索不需要回答文物的问题，直接获得线索。多元派角色有6类，不同角色具有不同的技能，例如历史学家可以每两回合有一次免去回答问题点机会，地理学家可花费行动点修路，修路后可节省路上行走所需行动点等。每个角色的能力在不同的历史任务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玩家必须根据角色能力进行策略选择。

(2) 探索与解密机制：玩家随机进入不同的历史时代进行游戏，每个回合，玩家可以选择移动或探索之一，探索过程涉及获取线索、解锁文物信息，并应对可能出现的惩罚。在行动时，任务卡的设置为玩家提供了明确的目标，移动或探索以及具体文物线索点的选择提供了可选性，从外围到内围的行动限制增强了游戏的思考性。

(3) 线索的获得与惩罚: 玩家在收集线索时, 如果没有正确解锁文物, 还会面临不同的惩罚卡。惩罚卡的数量与文物数量相同, 玩家必须在每个回合合理规划行动, 以避免因惩罚而影响探索机会。

(4) 胜利条件: 为平衡各阵营的获胜概率, 游戏的胜利条件基于积分系统。每个玩家通过收集线索和恢复文物来积累积分。每条线索获得 1 个积分, 而每个文物的恢复则可以获得 6 个积分。游戏结束时: 1、根据积分决定胜负, 统一派的线索分值是多元派的 n 倍 (n 为多元派的人数); 2、当多元派玩家都失去行动能力, 统一派获胜。

4.3.3 游戏化学习的体现

游戏设计注重增强玩家的沉浸感与互动性。每个历史时代的地图板和线索卡都依据真实的历史背景, 玩家在探索过程中可以更直观地感受到该时代的文化遗产知识。统一派与多元派的合作竞争关系也增强了游戏的可玩性。由于行动点的有限性, 玩家必须有策略选择行动路线。另外, 游戏有明确的目标和方向, 玩家通过完成任务可以获得奖励, 这些奖励能够帮助玩家在接下来的游戏中解锁更多线索或获得额外的行动点。此外玩家还可以在其他玩家允许的前提下设计角色、场景甚至设计互动性的新规则。这些机制都调动了学习者主动探索知识的动力。



五、结语

“游戏允许玩家通过互动, 在虚拟世界中表达自己的情感和观点。”[11]这种参与性让游戏超越了传统的线性叙事形式。作为学习者的玩家不仅是知识的接收者, 还是知识生产的参与者和创造者。也就是说, 游戏化学习不仅是对传统教育模式的一种补充, 更是对教育本质的一种重新定义。它强调学习者的主体性, 通过具身体验和互动机制, 使学习者从被动的知识接受者转变为知识的探索者和创造者。这种转变不仅有助于激发学习者的内在动机, 更能够培养他们的思考能力。在未来的教育中, 游戏化学习将为教育创新提供无限可能。

然而, 这一模式的推广与应用也面临着诸多挑战。一方面, 如何在游戏的趣味性与教育性之间达成平衡, 仍然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毕竟, 教育游戏的真正潜力不在于其表层的娱乐性, 而在于它能够通过构建情境和动态机制, 将学习者引导思考与决策之中。

另一方面, 游戏化学习框架的普适性需要在实践中不断验证与调整。不同学科的知识结构与学习目标存在差异, 如何通过游戏机制的设计实现知识的深度学习与个性化体验, 是未来研究需要重点关注的议题。

参考文献:

- [1] Paulo Freire. *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 [M]. Translated by Myra Bergman Ramos. Bloomsbury Academic, 2000, 24, 27.
- [2] 芮必峰, 孙爽. 从离身到具身——媒介技术的生存论转向 [J]. 国际新闻界, 2020, 42(05): 7-17.
- [3][4] Boghian, Ioana, et al. Game-based learning. Using board games in adult education[J]. Journal of Educational Sciences & Psychology, 9.1 (2019): 51-57.

- [5][6] Plato. The Republic [M]. Translated by B. Jowett. Random House Inc, 1991, 316.
- [7] Plass, Jan L., Bruce D. Homer, and Charles K. Kinzer. Foundations of game-based learning[J]. *Educational Psychologist*, 50.4 (2015): 258-283.
- [8] Rumsey D. Le Jeu du Monde (Game of the World) [EB/OL]. David Rumsey Historical Map Collection, [2025-01-27]. <https://www.davidrumsey.com/lu>.
- [9] Singh, Parmjit, et al. Card Game as a Pedagogical Tool for Numeracy Skills Development[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valuation and Research in Education*, 10.2 (2021): 693-705.
- [10] Kiefer, P., Matyas, S., Schlieder, C. Learning About Cultural Heritage by Playing Geogames[J]. In: Harper R, Rauterberg M, Combetto M, eds. *Entertainment Computing - ICEC 2006*. Vol. 4161. Lecture Notes in Computer Science. Springer Berlin Heidelberg, 2006: 217-228.
- [11] Chiarello, Fabio, and Maria Gabriella Castellano. Board games and board game design as learning tools for complex scientific concepts: Some experience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ame-Based Learning (IJGBL)*, 6.2 (2016): 1-14.
- [12] Nguyen, C. Thi. Philosophy of games[J]. *Philosophy Compass*, 12.8 (2017): e12426.
- [13] 王瑾, 胡玥, 范文翔. 游戏化学习反馈系统真的能提升学生成绩和改善情感态度吗? ——基于 37 项 Kahoot! 相关实验和准实验研究的元分析[J]. *现代教育技术*, 2024, 34(12): 76-85.
- [14] 沈科杰, 苏晗宇, 尚俊杰. 游戏化学习方式如何影响知识保留——基于 38 项实验和准实验研究的元分析[J]. *现代远程教育研究*, 2024, 36(06): 55-68.
- [15] 周達. 作为传播的游戏: 游戏研究的历史源流、理论路径与核心议题[J].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16, 38(7): 25-31.
- [16] 涂先智, 王昆. 数字博物馆的角色代入人类叙事设计研究[J]. *包装工程*, 2023, 44(2): 365-371.
- [19] 李芳宇, 周乐. 具身认知视角下的乡村儿童教育产品设计探究[J]. *包装工程*, 2020, 41(16): 154-163.
- [20] 马奔腾. 历史文化遗产“利用”的多维视野[J]. *求索*, 2024, (2): 98-106.
- [21] 叶浩生. 身体与学习: 具身认知及其对传统教育观的挑战[J]. *教育研究*, 2015, 36(4): 104-114.

A Multi-scenario Applicable Framework for Game-based Learning ——A Case Study of the Cultural Heritage Education Board Game Relic Guardian

Hou Linhui¹, Fu Yimei¹, Wu Yuxiao¹

¹*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710127*

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innovation of educational concepts, game-based learning, as an emerging educational paradigm, is gradually gaining attention. However, most educational board games are currently designed as customized products for specific subjects or learning objectives, making their frameworks difficult to generalize to other disciplines. To address this, this study proposes a multi-scenario applicable framework for game-based learning, which can be flexibly adapted to various educational contexts. By applying this framework to the design of the board game *Relic Guardians*, this study demonstrates how a unified set of game mechanics can achieve both educational goals and entertainment value across different fields. This approach provides an innovative and scalable pathway for learner-oriented education.

Keywords: education, autonomy, game-based learning, board game, multi-scenario application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2.485

高校传统戏曲与外语戏剧社团发展研究

——以聊城大学慕曲京剧社与外语俱乐部为例

赵心玉¹ 李欣语¹ 刘恩成¹ 张庆艳¹

(¹聊城大学外国语学院 山东省聊城市 252000)

摘要: 本文以聊城大学外语俱乐部和慕曲京剧社为研究对象,深入探讨高校戏剧社团建设的实践经验与发展策略。通过问卷调查与相关数据分析,揭示两个俱乐部在校园内的受众范围及当前人员构成。通过两社团建设的现状,剖析二者在人才培养机制、文化传承作用等方面的效果与问题。最后提出针对性现存问题提出改进建议与可持续发展策略,为高校戏剧社团的发展提供参考。

关键词: 高校; 戏剧社团; 实践思考

一、引言

高校作为教师教育的核心阵地,为了更好的承担起国家素质教育的任务,其校园文化建构与学生成才培养的重要性日益凸显。高校戏剧社团凭借其跨学科属性与文化活动载体功能,逐渐成为师范类高校学生提升综合素质教育能力、涵养美育情操的重要平台。

在当前社会背景下,聊城大学外语俱乐部与聊城大学外国语学院慕曲京剧社的运营实践具有典型的研究价值。前者以外语戏剧为媒介,通过“莎翁杯”话剧大赛等活动推动跨文化戏剧交流;后者则聚焦京剧传承,将戏曲教学融入社团活动,体现“中外戏剧互鉴”的发展理念。两社团虽均取得显著成效,但仍面临发展资源供给不足、专业化支撑薄弱等共性问题,亟待通过系统性研究探索破局路径。

本团队立足聊城大学,以访谈作为预调查手段,深入了解聊城大学外语俱乐部和慕曲京剧社在校园内的发展状况,评估对其开展深入研究的可行性。正式调研主要采用调查问卷的方式进行,调查问卷涵盖三个板块:调查者基本信息、对戏剧社团活动的参与意向与需求、对社团活动的满意度。问卷题型丰富多样,包含单选、多选以及填空等,其中满意度分析采用五级李克特量表。后续则采用 Excel 软件对回收数据展开频数分析,以达到清晰呈现两俱乐部在校园内的受众范围、同学们对戏剧社团的需求倾向以及满意程度的目的,为深入剖析师范类高校戏剧社团建设实践提供有力的数据支撑。

从理论层面出发,当前现有研究多聚焦于高校戏剧社团的普适性功能,针对师范院校特色化建设及中外戏剧融合实践的案例研究尚存空白。本文与黄岳杰教授在长期致力于戏剧教育的实践经验与理论研究提出“用舞台延续课堂,以戏剧拓展教育”的理论观点不谋而合。^[1]本文通过解剖聊城大学戏剧社团模式,从而进一步丰富高校文化育人理论的内涵维度,同时提供高校戏剧社团发展的现存问题改进意见与可持续发展战略。

从实践层面出发,其一,本文系统总结外语俱乐部与京剧社的协同经验。该经验可为同类院校戏剧社团提供发展范式;其二,本文提出针对社团运营痛点的对策建议。该建议有助于优化资源配置与管理制度,提升高校育人效能;其三,本文构建文化传承的可持续链路。师范生通过戏剧实践积淀的复合型素养,可转化为未来基础教育中的美育实施能力。

二、师范类高校戏剧社团概述

戏剧社团是一群怀揣戏剧梦想与热情的青年学生自发集结的创意集体,该群体专注于戏剧艺术的演绎、

创作及深度交流。^[2]

钱群理认为校园戏剧是中国现代话剧的萌芽，其对中国现代戏剧向西方话剧拓荒的建设思路提供了导览，在非营业性的“爱美剧”与业余的“小剧场运动”的实践中，校园戏剧也展示了不可低估的实力。^[3]在师范类高校的背景下，戏剧社团不仅聚焦于艺术实践，更融入了教育实践的使命。社团成员们在经过系统的训练戏剧的演绎方法与内容的同时，也会思考如何将戏剧与教育紧密结合，^[4]如何探索戏剧在教学中的应用，如情境模拟、角色扮演等，并以此作为未来教育生涯的预热与实践，这也赋予了师范类高校戏剧社团鲜明的师范特色与教育理念。

陈寅恪先生曾言：“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236）。^[5]师范类高校戏剧社团的建立与发展在当今时代也就具有了独特作用，同时被赋予了新的使命：

人才培养的深度挖掘：戏剧社团为成员提供了全面成长的课堂与舞台，该课堂与舞台不仅锤炼了表演技巧、编剧思维及导演能力，更在团队协作、情感表达、批判性思维等方面有助于实现自我超越，促进德智体美劳五育全面发展，为培养具备艺术素养与教育情怀的复合型人才奠定了坚实基础。庄晴提出：“英语戏剧社团有利于英语专业人才的培养，它可以通过改编剧本，加深学生对经典英语作品的理解和灵活运用。以及学生可以从导演工作中锻炼自己，从而成长为多元化人才等。”^[6]

文化传承与创新的桥梁：通过演绎经典国内外剧目、创作原创作品，戏剧社团不仅传承了戏剧艺术的精髓，更在创新中赋予了传统文化新的生命，有助于学生在戏剧活动中进一步对戏剧内容进行思考，也促进了校园文化的繁荣与多样性，成为连接传统与现代、国内与国外、艺术与教育的桥梁。例如：《莎氏乐府本事》等一些悲剧性故事译著传入中国，引起了中国有无悲剧的学术论争。一些国内外学者援引西方悲剧的标准，断言中国缺乏纯正的“悲剧”体裁。这种差异观念的争论，反倒推动了对中国悲剧自身的认识。^[7]

校园文化生态的积极塑造：戏剧社团的活动如同一股清流，滋养着校园文化的土壤。通过举办戏剧节、戏剧大赛、剧本朗读会等多元化活动，不仅丰富了师生的精神文化生活，更促进了跨学科、跨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为构建和谐、多元的校园文化生态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我国话剧史上的每一个阶段，学生演技始终是一支生气勃勃的力量”；^[8]“中国话剧始于校园，更胜于校园。长达一个世纪的中国现当代话剧史，每一步无不伴随着校园的影子”；“校园戏剧能激发内心激情，张扬学生的个性，可以有效改善当前学生学习生活中强调社会性，削弱个体性的局面”，^[9]综上得出，校园戏剧社的建立有助于高校学生在学习生活中体会社会的千姿百态，提前做好进入社会的准备，同时，学生在戏剧活动中获取的经验，也有利于和谐多元校园生态文化的构建。

三、聊城大学外语俱乐部与慕曲京剧社现状分析

外语俱乐部建设实践：

聊城大学外语俱乐部成立于2005年，是聊城大学首批校级社团之一，由聊城大学校团委、外国语学院团委及聊城大学学生社团指导办公室共同指导。作为校级优秀社团，外语俱乐部曾多次获得校级十佳社团称号，并荣登国家级媒体报道，如中国文化报、中国新闻报等。

外语俱乐部设有理事长1名，副理事长两名，部长6名，下设主持部、秘书处、策划部、督察部、外务部、宣传部共6个部门。各部门分工明确，协同合作，以确保社团活动的顺利进行。外语俱乐部现有会员190人。其中外国语学院的成员共有144人，占比达到75.79%。其余的46名成员分别来自文学院、商学院等其余18个学院。外语俱乐部在理事的带领下，协调六部门交流合作，推动社团不断发展，组织了如英语角、“莎翁杯”话剧大赛等丰富多样的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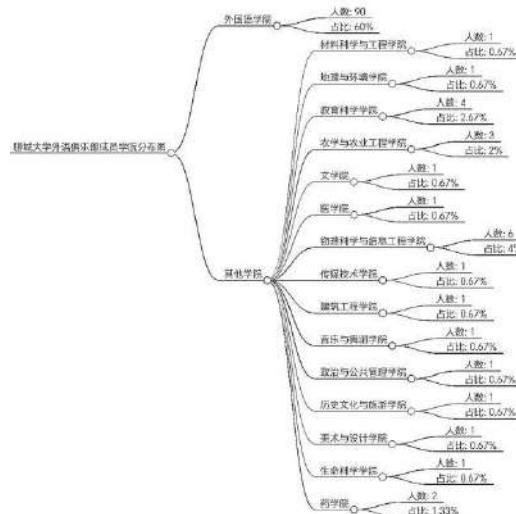


图1 外语俱乐部人员构成

外语俱乐部通过组织丰富多彩的外语活动，提高了学生的外语学习兴趣和语言学习专业技能，社团以语言为桥梁，开阔学生的视野，帮助他们更好地认识世界。社团品牌活动包括“莎翁杯”话剧大赛、英语角、外语风采大赛等，深受学生喜爱。针对外语俱乐部的活动将以“莎翁杯”剧大赛为重点进行分析。

“莎翁杯”话剧大赛已成功举办十八届。该活动以莎士比亚经典剧目如《罗密欧与朱丽叶》、《仲夏夜之梦》、《李尔王》等为基础，鼓励全校学生进行改编和演绎，在表演过程中，要求学生全情投入，并通过肢体动作、台词、语气等展现角色情感和剧情发展。大赛从服装道具、话剧内容、演员对角色的把握程度等多方面进行评审，评选出优秀表演团队和个人，由专业评委老师进行评选，外语俱乐部负责协助比赛进行。

通过“莎翁杯”话剧大赛，学生不仅提高了外语水平和表演能力，还增强了团队合作意识和综合素质。同时，该活动也为学生提供了一个展示自我、锻炼能力的平台，丰富了校园文化生活，增强了学生的团队合作能力和综合素质。社团的社会实践活动多次受到国家级媒体的报道，提升了社团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综上所述，聊城大学外语俱乐部是一个充满活力、积极向上的学生社团，是一个中西文化交流的平台。在这里，学生可以尽情享受外语学习的乐趣，结交志同道合的朋友，共同成长进步。

慕曲京剧社建设实践：

聊城大学慕曲京剧社成立于2019年6月。该社团以传承中华国粹为宗旨，致力于弘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和传承民族艺术文化。该社团为聊大学子们提供了京剧艺术学习机会，也成为提升当代学生文化素质的重要文化类社团。在外国语学院的高度关注与大力支持下，慕曲京剧社不断走向成熟与壮大，并于2024年6月成功获批聊城大学2024年品牌文化驿站提升项目。

在初创阶段，慕曲京剧社主要依托外国语学院的“中华艺术精粹”课程，为学生提供京剧理论知识和身形步法的系统学习。同时，社团还定期举办“水袖舞”“京剧唱腔”“京剧脸谱”等学习小课堂，吸引校内京剧爱好者参与，共同探索京剧艺术的奥秘。随着时间的推移，慕曲京剧社的影响力逐渐扩大。社团开始策划并举办中华传统艺术文化节，这一活动迅速成为校园内的文化盛事，吸引了大量师生参与。文化节中，社团成员们精心编排的京剧剧目、丰富多彩的互动体验环节以及邀请到的京剧专家讲座，都让师生们对京剧文化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和认识。

慕曲京剧社设有文宣部、服化部、组织部/秘书处等部门。该社团现今共有成员152名，另有其他学院的成员32名。慕曲京剧社成员主要集中分布于聊城大学外国语学院。外国语学院社团成员占全体成员的78.95%，而化学化工学院、传媒技术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建筑工程学院等，则占全体成员的2.63%。另有未明确学院成员28名成员，占全体成员的18.42%。综上所述，慕曲京剧社的成员主要来自聊城大学外国语学院，占比高达78.95%。其他学院的成员占比较少，为2.63%。此外，还有18.42%的成员未明确标注所属学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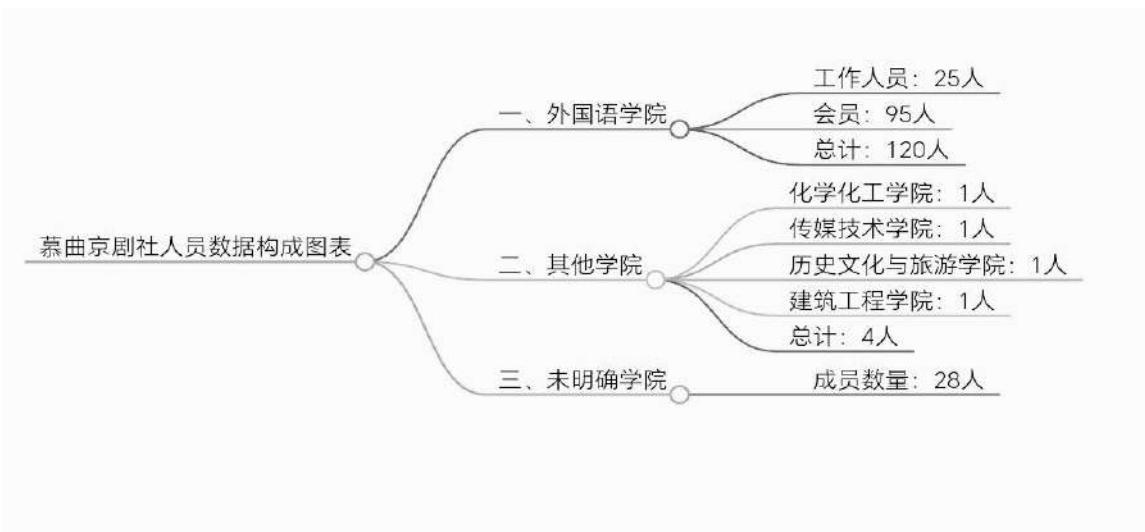


图 2 慕曲京剧社人员构成

慕曲京剧社人才培养机制:

课程学习方面:依托聊城大学外国语学院“梨园小课堂”,由齐敬华老师教授《梨花颂》。教授内容包括舞蹈、戏曲、化妆、扎头等相关理论和实践知识。学习一段时间后即通过团队内部选拔组成《梨花颂》表演团队,每有大型活动,慕曲京剧社即派表演团队去表演《梨花颂》。

社团活动方面:通过线下常规的社团活动和京剧舞曲教学小课堂,慕曲京剧社为学生提供了艺术实践机会;定期开设“水袖舞”“京剧唱腔”“京剧脸谱”“梨园小剧场”“京剧脸谱创作”等学习小课堂和餐厅文艺沙龙。这一系列课下小活动将课上理论学习与课下实践活动相结合,有助于促进学生理解戏剧文化,增强学生表现力。

文化节与比赛:慕曲京剧社已连续举办了四届“中华传统艺术文化节”以及其他相关的“戏曲大赛”等校园文化活动,让学生在活动中锻炼和展示。

在社团成员的共同努力下,慕曲京剧社不仅在校内取得了显著成绩,还开始与校内外相关单位建立合作关系,参与各类文艺演出和文化交流活动。这些经历不仅提升了社团成员的艺术水平,也为京剧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贡献了力量。

如今,慕曲京剧社已成为聊城大学内一颗璀璨的文化明星。它不仅为校园文化生活增添了浓厚的艺术氛围,还培养了一批批热爱京剧、致力于文化传承的青年学子。社团的成长历程,见证了聊大学子对传统文化的尊重与热爱,也彰显了慕曲京剧社在传承与弘扬京剧文化方面的不懈努力与显著成就。

四、聊城大学戏剧社团建设成效与问题剖析

为深入了解师范类高校戏剧社团的发展现状,我们对聊城大学的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220份,回收有效问卷192份,有效回收率达87.3%,其中男性受访者86人,女性受访者106人。调查结果显示,约98%的学生认为外语俱乐部与慕曲京剧社这两个社团的活动丰富了校园文化生活,有助于学生提高综合素质,锻炼学习能力,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学生提供了一个便利的平台。超过85%的成员认为参与社团活动提高了自己的综合素质和语言表达能力。例如:在“莎翁杯”话剧大赛中,成员们需要用流利的外语进行表演,这一舞台极大的锻炼了他们的语言表达能力。同时,通过该舞台,学生们的团队协作能力也得到了很好的培养。在剧目排练过程中,演员、导演、剧务等各岗位成员需要密切配合,共同完成演出任务。同样,在慕曲京剧社排练京剧时,从舞台布置到演员表演,每个环节都需要成员们相互协作,这种经历使得他们学会了倾听他人意见,从而提高了团队协作能力。

对于两社团当前现存的问题方面,约43%的学生表示社团活动受到资金不足的影响,约31%的学生认为缺乏专业老师指导是社团发展的主要问题之一(针对外语俱乐部莎翁杯大赛),约19%的学生认为,相较于其他学校的社团而言,聊城大学两社团的团队核心竞争力显然不够强。

综上所述,外语俱乐部的活动让学生接触到了丰富的外国文化,拓宽了国际视野;慕曲京剧社则让学生深入了解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增强了文化自信。同时,社团发展也有许多不足之处亟待解决与优化。

五、师范类高校戏剧社团发展建议

加大资金支持：学校可给予两社团更多的资金支持，用于改善其师资力量，增加表演道具等。在足够的资金支持情况下，两社团可以承办更多的戏剧类活动，提供更宽广的平台，容纳更多的参赛者进行比赛，同时也可让社团内部成员增加发展社团的信心。

增加师资力量的投入：学校可聘请戏剧方面的中外专家学者对戏剧方面的知识进行讲解，加深学生对于中外戏剧的理解。促进学生对中外戏剧的不同理解，有利于学生在未来的戏剧表演中推陈出新，融合中外优秀文化。这点同样符合聊城大学外国语学院“汇通中外，信达天下”的院训。

增加“莎翁杯”话剧大赛的竞争性与公开性：外语俱乐部的“莎翁杯话剧大赛”可公布参赛者的参赛录制视频与评委评分细则，从而帮助参赛者进一步改进参赛作品的内容和细节问题；比赛可增加评审的大众打分，从而让观众们更加细致的欣赏比赛并融入自己的思考，站在评委的视角去评判比赛，使得观众和参赛者都能有所进步和体会。

优化社团内部管理：可以建立更为完备的社团考核激励机制。根据成员参与活动的频率，在筹备演出中的贡献度，各种技能的掌握情况和专业程度等方面进行综合考量与评估。表现优异者给予荣誉表彰，对于参与度低或无明显进步的成员实施专人帮扶、定时定量培训等措施。定期开展社团内的满意度调查和意见反馈调查，了解各成员对社团的管理与运营方式，活动的种类与开展频率等的看法与建议，依据反馈及时调整优化社团运作，提升成员参与活动的热情和建设社团的积极性。^[10]

创新传统剧本：在传承的基础上注重创新发展，对传统剧本进行适当改编，使其在适应当今社会主流价值的同时，又不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风范。社团成员们在创新剧本的过程中的思维碰撞也是对传统观念的一种改革和更新。但这其中要有专业老师的指导，注重思想引领，文化传承，教学相长。

借助第二课堂来传播：两社团可以借助第二课堂即到梦空间平台来创新传播方式。在两平台发布更多的相关活动，从而让全校学生乃至全国的学生都有得知并了解两社团的机会，^[11]进而吸引更多的参赛者来参与活动，学习知识，扩大两社团的影响力。

与外校开展竞争与合作：可以引进外校社团和学生来参与比赛。要将“莎翁杯”大赛与慕课京剧社举办的比赛活动的影响力扩展到外校。鼓励外校的社团和学生们一同参与，增加比赛的竞争性，从而使同学们得到更好的进步。同时，本校学生也可借此机会结识到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双方在竞争中相互切磋共同进步。这样的行为也有助于扩大聊城大学的影响力，从而让大学之间得以交流进步，做到“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美人之美，天下大同。”

六、结论

此研究通过对聊城大学外语俱乐部和慕课京剧社的社团成员构成、团队的发展理念和实践意义、发展现状等因素的探讨，为师范类高校戏剧社团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实践经验，有利于社团运营模式的优化，丰富其文化意义，提升两社团的育人效果；有助于戏剧文化的在师范类高校的传承与发扬；有效促进了师范类高校戏剧社团的建设与发展。^[12]

参考文献：

- [1]黄岳杰.黄岳杰戏剧作品集[M].
- [2]肖志瑶.高校戏剧社团——校园戏剧发展的新寄托[J].戏剧之家, 2017
- [3]钱理群.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第八章 戏剧（中，一）”
- [4]梁爽.“教育戏剧+”模式在高校教育中的人文意义及应用初探[J].中国戏剧, 2019
- [5]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 [6]庄晴.英语戏剧社团队英语专业人才培养的意义[J].文教资料, 2019, (31): 97 - 98
- [7]刘茂生.文明交流互鉴与百年中外戏剧交流史研究[J].外国文学研究, 2024, (5): 77 - 78
- [8]陈白尘, 董健.中国现代戏剧史稿[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 1989
- [9]范寿康.学校剧[M].上海：商务印书馆, 1923
- [10]黄文泽.高校戏剧社团发展现状的研究[J].戏剧之家, 2019
- [11]赵月月.文化自信与高校第二课堂育人实践研究[J].公关世界, 2025
- [12]李彦翰.浅析高校戏剧社团的建设和发展[J].戏剧之家(上半月), 2014

A Study on th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Opera and Foreign Language Drama Club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 A Case Study of the Muqu Beijing Opera Club and Foreign Language Club of Liaocheng University

Zhao Xinyu¹, Li Xinyu¹, Liu Encheng¹, Zhang Qingyan¹

¹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Liaocheng University, Liaocheng 252000,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the Foreign Language Club of Liaocheng University and the Beijing Opera Club of Muqu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and probes into the practical experience and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the construction of college drama clubs. Through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relevant data analysis, this paper reveals the audience range and current personnel composition of the two clubs on campus. Through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wo associations, the effects and problems of the two in the aspects of talent training mechanism and cultural inheritance are analyzed. Finally, it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trategies for the existing problems, and provides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ollege drama societies.

Keywords: universities; The Drama Club; Practical thinking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2.487

Strategies for Global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A Translation-Centered Approach

Pengfei Bao¹

¹*School of Chinese,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999077), China*

Abstract: This study systematically examines the strategies essential for enhancing the global presence and influence of Chinese literature through translation. It begins by elucidating the significance of disseminating Chinese literature on a global scale, emphasizing its role in fostering cultural exchange, mutual understanding, and cross-cultural dialogue. Subsequently, the research provides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tate of Chinese literature's international outreach, highlighting both its achievements and the multifaceted challenges encountered during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By exploring diverse translation strategies—including domestication, foreignization, and cultural adaptation—this paper offers practical and theoretically grounded recommendations for improving the global reception of Chinese literary works. Through detailed case studies of prominent Chinese texts, it demonstrates how the judicious application of translation strategies can effectively convey the richness and cultural nuances of Chinese literature to international audiences.

Keywords: Chinese literature; global dissemination; translation strategies; cultural exchange;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1. Introduction

In the contemporary era of globalization, characterized by the rapid flow of information and the increasing interconnectedness of cultures, cultural exchange has emerged as a pivotal compon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is exchange is not merely a superficial interaction but a profound engagement that shapes global understanding and cooperation. Chinese literature, with its long-standing and rich historical heritage, serves as a profound repository of Chinese culture. It embodies a wide range of elements such as traditional values, philosophical ideas, historical narratives, and unique aesthetic sensibilities, making it a vital conduit for cultural transmission. The process of Chinese literature "going global" through translation is a complex and multi-faceted endeavor that extends beyond mere language conversion (Yang 2015). It involves the intricate task of bridging cultural gaps, fostering mutual respect, and enriching global cultural diversity. Translation, in this context, is not a straightforward mechanical process but a sophisticated activity that requires the transfer of cultural meaning, adaptation to different cultural contexts, and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with diverse audiences. The success of this endeavor hinges on the employment of suitable and effective translation strategies, which are crucial for the integra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to the global literary market and its widespread recognition and acceptance.

Moreover, the transla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is not just an academic exercise but a strategic initiative that has significant implications for cultural diplomacy and soft power. It offers a unique

opportunity to present China's cultural identity and intellectual heritage to the world, thereby enhancing its global influence. However, the challenges are manifold, ranging from linguistic nuances to cultural specificities, which necessitate a thorough and in-depth exploration of translation strategies. This exploration is not only crucial but also necessary for the successful international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ensuring that it resonates with global audiences and contributes meaningfully to the global literary canon.

In light of these considerations, this paper aims to delve into the various translation strategies employed in the international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By examining the theoretical underpinnings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s of these strategies, the study seeks to provide 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factors that contribute to the successful translation and global reception of Chinese literary works. Through this analysis, the paper aspires to offer valuable insights and recommendations that can inform future translation practices, thereby facilitating the broader and more effective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on the global stage.

2. The Significance of Chinese Literature "Going Global"

2.1 Promoting Cultural Exchange

Chinese literature functions as a dynamic and multifaceted window into Chinese culture, offering profound insights into the values, beliefs, and social structures that have shaped Chinese civilization across millennia. Its translation and dissemination to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provide a unique opportunity for cross-cultural dialogue, enabling non-Chinese readers to engage with the intellectual and cultural heritage of China. A prime example of this is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论语》), a foundational text of Chinese philosophy. Through its translation into numerous languages, global audiences have been able to explore core Confucian concepts such as "仁" (ren), which embodies benevolence, kindness, and humanity. These translations have allowed Western readers to understand how Confucianism has influenced Chinese ethical systems, educational philosophies, and governance structures for over two thousand years. This exchange of cultural knowledge not only enriches the global literary and intellectual landscape but also fosters mutual understanding and appreciation among diverse cultures, thereby contributing to a more interconnected and harmonious world.

Furthermore, the transla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facilitates a bidirectional cultural dialogue. While introducing Chinese cultural elements to the world, it also invites international readers to reflect on their own cultural assumptions and values. For instance, David Hawkes's translation of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红楼梦》) has enabled Western readers to engage with the intricate social hierarchies, familial relationships, and aesthetic ideals of 18th-century China. This engagement not only broadens their cultural horizons but also encourages cross-cultural comparisons, prompting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both Chinese and Western literary traditions. Thus, the transla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is not merely a one-sided export of culture but a dynamic process that fosters reciprocal cultural enrichment.

2.2 Enhancing China's Soft Power

The global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plays a pivotal role in enhancing China's soft power, a concept articulated by Joseph Nye (1990) as the ability to influence others through attraction and persuasion rather than coercion. Chinese literature, with its unique charm and cultural depth, has the potential to captivate international audiences, thereby shaping their perceptions of China in a positive light. A notable example is the international success of Mo Yan's *Red Sorghum* (《红高粱》), which has been translated into multiple languages and adapted into a critically acclaimed film. Through this work, global readers gain access to the complexities of Chinese history, culture, and societal transformations, particularly during periods of conflict and upheaval. The vivid portrayal of ordinary Chinese people's resilience and struggles in the face of adversity not only humanizes China but also underscores its rich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legacy. Such literary achievements contribute significantly to China's cultural diplomacy, enhancing its global image and soft power.

Moreover, the transla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can serve as a counterbalance to prevailing

stereotypes and misconceptions about China. For instance, the works of contemporary authors like Yu Hua, whose novel *To Live* (《活着》) has been widely translated, offer nuanced depictions of Chinese society that challenge monolithic narratives. By presenting multifaceted characters and exploring themes of endurance, survival, and the human condition, these works invite international readers to engage with China on a more personal and empathetic level. This engagement not only deepens their understanding of China but also fosters a more balanced and informed global discourse.

The transla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can be examined through various theoretical lenses, such as Lawrence Venuti's concepts of domestication and foreignization (Paloposki 2012). Domestication strategies, which adapt the text to the target culture's norms, can make Chinese literature more accessible to international audiences. For example, the translation of *Journey to the West* (《西游记》) by Arthur Waley simplifies certain cultural references to cater to Western readers. While this approach facilitates immediate comprehension, it risks diluting the cultural specificity of the original text. On the other hand, foreignization strategies, which retain the source culture's distinctiveness, as seen in Howard Goldblatt's translation of Mo Yan's works, preserve the cultural integrity of the text but may pose challenges for readers unfamiliar with Chinese context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se strategies reveals the inherent tensions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While domestication may enhance readability, foreignization ensures the authenticity and cultural richness of the source text. The choice of strategy often depends on the translator's objectives and the intended audience. For instance, the translation of *The Art of War* (《孙子兵法》) by Lionel Giles employs a hybrid approach, balancing accessibility with fidelity to the original text. This nuanced approach underscores the importance of tailoring translation strategies to the specific demands of the text and its cultural context.

3. Current Status of Chinese Literature "Going Global"

3.1 Growth in Translated Works

The global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has experienced a notable surge in recent years, characterized by a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Chinese literary works being translated into foreign languages. This expansion is largely driven by the strategic initiatives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cultural institutions, which have recognized the importance of promoting Chinese literature as a means of cultural diplomacy and soft power. A key initiative in this regard is the China Book International program, which has been instrumental in providing financial support, resources, and platforms for the translation and international distribution of Chinese books. This program has facilitated the translation of a diverse range of Chinese literary genres, including novels, poetry collections, and philosophical treatises, making them accessible to global audiences in multiple languages.

One illustrative example of this trend is the widespread translation of Yu Hua's *To Live* (《活着》), which has been rendered into over 30 languages and has garnered international acclaim. This novel, with its poignant portrayal of individual resilience amidst historical upheavals, has resonated with readers across cultural boundaries, offering them a window into the complexities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and society. Similarly, the works of other contemporary authors, such as Yan Lianke and Can Xue, have also gained traction in international literary circles, further expanding the reach of Chinese literature. These translations not only introduce Chinese literary voices to the world but also facilitate cross-cultural dialogue, fostering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China's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narratives.

3.2 Limited Influence in the Global Market

Despite the quantitative growth in translated Chinese literary works, their influence in the global literary market remains relatively limited. In international bookstores and literary festivals, Western literature continues to dominate, while Chinese literature often occupies a niche market. Its readership is primarily confined to sinologists, students of Chinese studies, and individuals with a

pre-existing interest in Chinese culture. This limited influence can be attributed to several interrelated factors, including cultural differences, linguistic challenges, and insufficient marketing strategies.

One of the primary barriers is the profound cultural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a and Western countries. Chinese literature is deeply rooted in its cultural context, and many of its themes, values, and narrative styles may appear unfamiliar or inaccessible to Western readers (Feuerwerker 1998). To illustrate, the concept of "harmony" (和谐), which is central to Chinese literature and is influenced by Confucianism, Taoism, and Buddhism, may be difficult for Western readers to fully grasp due to their distinct philosophical and cultural frameworks. This cultural gap often results in a lack of resonance or engagement with Chinese literary works among broader audiences.

Linguistic challenges further complicate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making it difficult to fully convey the essence and aesthetic qualities of the original texts. Chinese, with its unique grammatical structure, rich idiomatic expressions, and intricate character system, presents significant hurdles for translators (Yesheng 2024). For instance, the translation of classical Chinese poetry, such as the works of Li Bai or Du Fu, often requires creative adaptation to preserve the rhythm, imagery, and emotional depth of the original verses. While translators like Arthur Waley and Stephen Owen have made commendable efforts in this regard, the inherent limitations of translation inevitably result in some loss of cultural and literary nuance.

Additionally, the limited visibility of translated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global market can be attributed to a lack of effective marketing and promotion strategies. Unlike Western literary works, which benefit from robust publishing networks and targeted promotional campaigns, Chinese literature often struggles to gain traction in competitive international markets. This disparity highlights the need for more strategic efforts to enhance the visibility and appeal of Chinese literary works among global readers.

The challenges faced by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global market can be analyzed through the lens of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cultural theory. Lawrence Venuti's concepts of domestication and foreignization provide a useful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the trade-offs involved in translating Chinese literature (Paloposki 2012). Domestication strategies, which adapt the text to the target culture's norms, may enhance accessibility but risk diluting the cultural specificity of the original work. For instance, the translation of Journey to the West (《西游记》) by Arthur Waley simplifies certain cultural references to cater to Western readers, thereby making the text more approachable but potentially losing some of its cultural richness. On the other hand, foreignization strategies, which retain the source culture's distinctiveness, as seen in Howard Goldblatt's translations of Mo Yan's works, preserve the cultural integrity of the text but may alienate readers unfamiliar with Chinese context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se approaches underscores the need for a balanced strategy that respects the cultural authenticity of the source text while ensuring its accessibility to target audiences. For example, the translation of The Art of War (《孙子兵法》) by Lionel Giles employs a hybrid approach, combining fidelity to the original text with explanatory notes to aid comprehension. This nuanced approach highlights the importance of tailoring translation strategies to the specific demands of the text and its cultural context.

4. Challenges in Translating Chinese Literature for the Global Audience

4.1 Linguistic and Cultural Barriers

The transla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for a global audience is inherently complex due to the profound linguistic and cultural disparities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languages. Chinese, as a language, operates within a grammatical framework that differs significantly from that of Western languages. For instance, Chinese lacks the explicit tense system found in English, and its syntax often allows for

greater flexibility in word order. These linguistic idiosyncrasies can pose significant challenges in rendering Chinese sentences into English while preserving the original meaning, tone, and stylistic nuances.

Beyond linguistic differences, Chinese literature is deeply embedded in a cultural context that is often unfamiliar to Western readers. The language is rich in idiomatic expressions, proverbs, and allusions that draw from China's extensive historical, philosophical, and literary traditions. Translating these elements requires both the linguistic expertise and a profound understanding of the cultural underpinnings that give them meaning. A notable example is the Chinese idiom "塞翁失马, 焉知非福"(When an old man at the frontier lost his mare, who could have guessed it was a blessing in disguise?). This idiom encapsulates a narrative and a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 rooted in Taoist thought, which emphasizes the cyclical nature of fortune and misfortune. Translating this idiom into English necessitates more than a literal rendering; it requires an explanation of the cultural and philosophical context to ensure the idiom's full significance is conveyed. This exemplifies the intricate interplay between language and culture in translation, where the translator must act as both a linguist and a cultural mediator.

Additionally, Chinese culture is replete with unique concepts that are challenging to translate accurately. Terms such as "风水"(feng shui), "阴阳"(yin-yang), and "道"(dao) are deeply ingrained in Chinese philosophy, religion, and daily life. These concepts often lack direct equivalents in Western languages, necessitating strategies such as transliteration accompanied by explanatory notes or the use of approximate equivalents. For example, "feng shui," which refers to the traditional practice of harmonizing physical spaces with natural forces, is frequently translated as "geomancy." However, this translation fails to capture the full cultural and spiritual dimensions of the practice. Similarly, "dao," often rendered as "the Way," requires extensive contextualization to convey its philosophical depth in Taoist thought. These examples underscore the difficulty of translating culturally specific concepts while maintaining their richness and complexity.

4.2 Meeting Western Aesthetic Expectations

Another significant challenge in translating Chinese literature lies in reconciling the aesthetic expectations and literary preferences of Western readers with those of Chinese audiences. Chinese literature often reflects values and narrative styles that diverge from Western literary conventions (Gu 2007). For instance, Chinese literature frequently emphasizes collective values, such as familial loyalty, communal harmony, and national identity, whereas Western literature tends to prioritize individualism and personal agency. This cultural divergence can create a disconnect between the source text and its target audience, necessitating careful adaptation by the translator.

A case in point is the classic Chinese novel Water Margin (《水浒传》), which portrays a group of outlaws who band together to fight injustice and uphold moral principles. The characters' motivations are deeply rooted in Confucian ideals of loyalty and righteousness, which may not resonate as strongly with Western readers accustomed to narratives centered on individual heroism. Translating this novel for a Western audience involves the linguistic translation as well as cultural adaptation. The translator must rephrase certain passages, provide additional context, or adjust the narrative structure to make the characters' actions and motivations more comprehensible and engaging for Western readers. This process highlights the translator's dual role as a cultural interpreter and a literary artist.

Moreover, Chinese literary aesthetics often prioritize subtlety, ambiguity, and indirect expression (Wang 1993), which may contrast with the Western preference for explicit and direct storytelling. For example, classical Chinese poetry, such as the works of Li Bai and Du Fu, relies heavily on imagery, symbolism, and allusion to evoke emotions and ideas. Translating these poems into English while preserving their aesthetic qualities is a formidable task. Translators like Arthur Waley and Stephen Owen have employed various strategies, such as using free verse or incorporating explanatory notes, to bridge this aesthetic gap. However, these approaches inevitably involve

trade-offs between fidelity to the source text and accessibility for the target audience.

5. Translation Strategies for Chinese Literature "Going Global"

5.1 Domestication and Foreignization

Domestication and foreignization represent two fundamental approaches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each with distinct philosophical underpinnings and practical implications. Domestication, rooted in the functionalist theory of translation, emphasizes the target reader's comprehension and cultural assimilation. This strategy manifests in the adaptation of culturally-specific elements to align with the target language's cultural norms and linguistic conventions. To illustrate this point, consider the translation of the Chinese idiom "画蛇添足" (huà shé tiān zú). A domesticating approach might render it as "to gild the lily," an English expression that conveys the similar notion of unnecessary embellishment. This strategy, while ensuring immediate comprehension, raises questions about cultural authenticity and the potential loss of original cultural nuances.

Contrarily, foreignization, influenced by postcolonial translation theories, prioritizes the preservation of cultural otherness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source culture elements into the target language. This approach is particularly evident in the translation of culturally-specific concepts such as "气功" (qìgōng). Rather than seeking an equivalent in the target language, a foreignizing translation would retain the original term accompanied by explanatory notes, such as "qigong (a traditional Chinese practice involving the cultivation of vital energy through coordinated breathing, meditation, and movement)." This strategy, while potentially challenging for target readers, serves as a valuable tool for cultural exchange and mutual understanding. The application of these strategies in Chinese literary translation often requires a nuanced, context-sensitive approach.

A case in point is Howard Goldblatt's translation of Mo Yan's "Red Sorghum." Goldblatt's approach demonstrates a sophisticated interplay between domestication and foreignization. When translating common cultural elements, such as culinary references, he often employs domestication to ensure readability. For instance, he might translate "饺子" (jiǎozi) as "dumplings," a term more familiar to Western readers. However, when dealing with culturally significant elements like "高粱" (gāoliang, sorghum), he adopts a foreignizing approach, retaining the Chinese term while providing contextual information to explain its cultural and symbolic significance in the narrative.

The choice between domestication and foreignization often reflects deeper considerations about the purpose of translation and the intended readership. As Venuti argues, foreignization can serve as a form of resistance against cultural hegemony, challenging target readers to engage with cultural difference (Myskja 2013). In the context of Chinese literature "going global," this approach can be particularly valuable in promoting cultural diversity and countering stereotypes. However, as Chesterman (1997) points out, excessive foreignization might alienate readers and hinder the very cultural exchange it seeks to promote. Recent development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suggest a move towards hybrid strategies that combine elements of both domestication and foreignization. This approach is exemplified in the transla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novels, where translators often employ footnotes, glossaries, and contextual explanations to bridge cultural gaps while maintaining the integrity of the source text. For instance, in the translation of Yu Hua's "To Live," the translator uses a combination of domesticating strategies for common expressions and foreignizing approaches for culturally-specific concepts, accompanied by explanatory notes that enrich the reader's understanding of Chinese culture. The choice of translation strategy also reflects broader considerations about the role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global literary discourse. As Bassnett and Lefevere (1998) argue, the translation of literature from non-Western cultures often involves complex power dynamics.

In this context, the strategic use of foreignization can serve to assert Chinese cultural identity and challenge Western-centric literary norms. However, as Tymoczko (2000) suggests, this must be balanced with considerations of readability and accessibility to ensure that Chinese literature reaches a global audience. In conclusion, the transla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for global readership requires a sophisticated understanding of both domestication and foreignization strategies. The effective use of these approaches can facilitate cultural exchange while maintaining the integrity of the source text.

As Chinese literature continues to gain international recognition, the development of translation strategies that balance cultural authenticity with reader accessibility will be crucial in shaping its global reception and impact.

5.2 Cultural Adaptation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Cultural adaptation in Chinese literary translation constitutes a complex process that requires translators to navigate between cultural preservation and target audience accessibility (Yifeng 2009). This process involves not merely linguistic transfer but also cultural mediation, requiring translators to possess profound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and cultural sensitivity. The successful transla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to other languages demands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both the source and target cultures, as well as the ability to bridge cultural gaps while maintaining the integrity of the original text. The transl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festivals presents a particularly challenging aspect of cultural adaptation. Taking the Spring Festival as a case in point, a mere literal translation of "春节" as "Spring Festival" fails to convey its cultural richness. A more culturally adaptive approach would involve contextualizing the festival within its socio-cultural framework.

In the translation of Chinese literary works, the description of Spring Festival celebrations often incorporates explanatory elements about the symbolic meaning of red decorations and the ritual of family reunion dinners. This approach helps bridge the cultural gap while maintaining the text's authenticity. For instance, the significance of red envelopes, which symbolize good luck and prosperity, and the tradition of setting off firecrackers to ward off evil spirits, are essential cultural elements that need to be explained to ensure Western readers grasp the festival's importance in Chinese culture. Cultural taboos and symbolic meanings represent another critical dimension of cultural adaptation. The Chinese cultural aversion to the number "4" (四), due to its phonetic similarity to "death" (死), poses unique challenges in translation. When this number appears in a Chinese literary work with negative connotations, the translator may need to add a note to explain this cultural belief to Western readers. This ensures that the cultural meaning is accurately conveyed without causing misunderstandings.

Similarly, the translation of Chinese idioms and proverbs, which often carry deep cultural implications, requires careful consideration. For example, the Chinese proverb "画龙点睛"(huà lóng diǎn jīng), literally "draw a dragon and dot the eyes," should not only be rendered as "adding the finishing touch" but also provided with context about its origin in Chinese painting tradition, where the act of dotting the eyes was believed to bring the dragon to life.

The process of cultural adaptation also extends to the handling of culturally specific concepts and practices (Bernal et al. 2009). In translating Chinese literature, a balanced approach often proves most effective. For instance, i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hinese classical novels, culturally specific terms like "qipao" are often retained while providing contextual explanations, thereby maintaining cultural authenticity without sacrificing readability. This strategy ensures that the target audience can appreciate the cultural nuances without being overwhelmed by unfamiliar terms. Cultural adaptation strategies can be further analyzed through the lens of domestication and foreignization. While domestication makes the text more accessible to target readers by adapting cultural elements to their expectations, foreignization preserves the source culture's foreignness.

In translating Chinese literature, a hybrid strategy that combines both approaches often yields the best results. For example, retaining culturally specific terms while providing contextual explanations helps maintain cultural authenticity while ensuring the text remains accessible to the target audienc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on cultural adaptation in translation studies have evolved significantly. Earlier approaches emphasized cultural adaptation for target audience comprehension, while more recent theories advocate for greater preservation of cultural otherness. This theoretical evolution has significant implications for Chinese literary translation, where the tension between cultural accessibility and authenticity remains a central concern. Translators must navigate this tension carefully, ensuring that the cultural essence of the original text is preserved while making it accessible to readers from different cultural backgrounds. Cultural adaptation in Chinese literary translation, therefore, emerges as a multidimensional process that requires translators to balance multiple considerations: cultural authenticity, target audience comprehension, and the preservation of

literary aesthetics. As Chinese literature continues to gain global recognition, the role of cultural adaptation in facilitating cross-cultural understanding becomes increasingly crucial, underscoring the need for sophisticated translation strategies that respect both source and target cultures.

6. Case Studies

6.1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ranslation Approaches in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a pinnacle of Chinese literary achievement, presents a particularly compelling case for examining the complexities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The divergent approaches adopted by Yang Hsien-yi and Gladys Yang, and David Hawkes in their respective English translations offer profound insights into the interplay between cultural fidelity and reader accessibility in translation practice. Yang Hsien-yi and Gladys Yang's translation exemplifies a foreignizing strategy that prioritizes the preservation of cultural authenticity. Their approach manifests in several key aspects. Firstly, they maintain the original Chinese names in pinyin, such as "Jia Baoyu" and "Lin Daiyu," rather than anglicizing them. This decision is particularly significant when considering the symbolic meanings embedded in these names. To illustrate, the character 玉 ("yu") in "Jia Baoyu" not just signifies "jade" but carries cultural connotations of purity and preciousness in Chinese tradition. The Yangs' decision to retain this nomenclature, accompanied by detailed footnotes, allows Western readers to engage directly with the cultural essence of the text. Furthermore, the Yangs' translation preserves the syntactic structures and literary devices characteristic of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When translating poetic passages, they maintain the original's rhythm and imagery, often at the expense of syntactic fluency in English. This approach creates a reading experience that, while potentially challenging for Western audiences, offers an authentic encounter with the text's cultural and literary nuances.

In contrast, David Hawkes adopts a more domesticating approach that emphasizes reader accessibility. His translation strategy manifests in several distinctive features. Notably, he adapts Chinese names to more Anglicized forms, transforming "Bao-yu" into "Pao-yu" and "Dai-yu" into "Tai-yu." This adaptation aims to reduce the cultural distance for English-speaking readers, facilitating their engagement with the characters. Hawkes' treatment of cultural references demonstrates a different strategy. Rather than relying heavily on footnotes, he integrates explanations directly into the main text. This approach is particularly evident in his translation of complex family rituals and social hierarchies. For instance, when describing the elaborate ceremonies during significant family events, Hawkes provides contextual information within the narrative flow, enabling Western readers to comprehend the cultural significance without interrupting their reading experience. The contrasting approaches of these translations reveal fundamental questions about the purpose and nature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The Yangs' foreignizing strategy aligns with the goal of cultural preservation, treating the target language reader as an active participant in cross-cultural understanding.

On the opposite side, Hawkes' domesticating approach emphasizes reader accessibility, viewing translation as a bridge between cultures rather than a cultural artifact in itself. These differing strategies also reflect varying conceptions of the translator's role. The Yangs position themselves as cultural ambassadors, prioritizing the transmission of Chinese literary and cultural traditions. Hawkes, on the other hand, assumes the role of cultural mediator, balancing the preservation of cultural elements with the need for comprehensibility in the target language. The impact of these translation strategies on reader reception warrants consideration. The Yangs' translation, while potentially challenging for Western readers, offers an authentic experience of Chinese literary aesthetics and cultural values. Hawkes' version, by contrast, facilitates smoother reading for English-speaking audiences but may risk oversimplifying certain cultural nuances.

This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two translations underscores the complex interplay between cultural fidelity and reader accessibility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It highlights the need for translators to make strategic decisions based on their understanding of both source and target cultures, as well as their assessment of the target audience's cultural literacy and reading expectations. The case of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thus serves as a valuable reference point for understanding the

challenges and strategies involved in translating culturally rich literary works. In examining specific passages, the differences in translation strategies become even more apparent. Consider the translation of the poem "芙蓉女儿诔" (The Dirge of the Hibiscus Maiden). The Yangs' translation maintains the original's structure and imagery, resulting in a text that feels distinctly Chinese in its rhythm and symbolism. Hawkes, on the other hand, adapts the poem to conform more closely to English poetic conventions, altering the structure and, in some cases, the imagery to make it more accessible to English readers. The translation of cultural concepts and practices also highlights the different approaches. For example, the concept of "礼" (li), which encompasses a range of meanings from ritual to propriety, is handled differently by each translator. The Yangs often retain the term "li" and provide extensive footnotes to explain its cultural significance. Hawkes, in contrast, translates the term differently depending on the context, using "ritual," "propriety," or "etiquette" as appropriate, and integrates explanations into the text.

These examples illustrate the broader implications of translation strategies for the recep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West. The Yangs' approach, with its emphasis on cultural authenticity, challenges Western readers to engage with Chinese literary and cultural traditions on their own terms. Hawkes' approach, with its focus on accessibility, makes the text more approachable for Western readers but may risk losing some of the cultural specificity that makes the original work unique. Ultimately, the choice between foreignizing and domesticating strategies involves a delicate balance between preserving the cultural integrity of the source text and making it accessible to the target audience. The case of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demonstrates that there is no one-size-fits-all solution; rather, translators must carefully consider the cultural and literary context of the work, the expectations of the target audience, and their own goals as translators in determining the most appropriate approach.

6.2 Wolf Totem

Jiang Rong's *Wolf Totem*, a literary phenomenon in China that achieved international acclaim, serves as a compelling case study for examining the intricate challenges and strategies involved in translating culturally and ecologically dense texts. Howard Goldblatt's translation of the novel exemplifies a sophisticated approach to cultural adaptation, striking a delicate balance between preserving the authenticity of Mongolian nomadic traditions and ensuring accessibility for a global readership. This section delves into the translation strategies employed in *Wolf Totem*, focusing on cultural mediation, ecological discourse, and the interplay between domestication and foreignization, while providing concrete examples to substantiate the analysis.

One of the most distinctive features of *Wolf Totem* is its rich portrayal of the nomadic culture of the Inner Mongolian grasslands. Goldblatt's translation demonstrates a meticulous commitment to preserving the cultural authenticity of the source text while making it comprehensible to Western readers. A notable example is his handling of the term "敖包" (oboo), a traditional Mongolian stone pile used for worship and navigation. Rather than substituting it with an English equivalent, Goldblatt retains the original term and integrates explanatory context within the narrative. This approach allows readers to grasp the cultural and spiritual significance of the oboo without disrupting the flow of the text. By preserving such culturally specific elements, Goldblatt ensures that the translation remains a faithful representation of Mongolian traditions.

Another significant challenge lies in conveying the complex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herdsmen and wolves, a central theme of the novel. Goldblatt's translation captures the cultural specificity of this relationship while highlighting its universal ecological implications. For instance, the herdsmen's reverence for wolves as symbols of strength, intelligence, and ecological balance is rendered with precision. The translation emphasizes the wolves' role as keystone species in the grassland ecosystem, a concept that aligns with contemporary Western environmental discourse. This dual focus on cultural and ecological dimensions enables the translation to resonate with readers across cultural boundaries.

The philosophical underpinnings of *Wolf Totem*, particularly its emphasis on the balance between humans and nature, are another focal point of his translation. The novel's ecological message, which underscores the importance of biodiversity and conservation, is rendered in a manner that is both

accessible and thought-provoking. To illustrate, the description of the grassland ecosystem's fragility and the herdsmen's traditional practices for maintaining ecological harmony are translated with a clarity that highlights their relevance to global environmental concerns. Goldblatt's translation not only conveys the ecological wisdom embedded in Mongolian nomadic culture but also positions it within the broader context of environmental ethics, making it relevant to a diverse readership.

Goldblatt's translation strategy exemplifies a hybrid approach that skillfully combines domestication and foreignization. While he retains culturally specific terms and concepts, such as "那达慕" (Nadam, a traditional Mongolian festival), he also adapts certain elements to enhance readability for Western audiences. This dual approach is particularly evident in his handling of the novel's descriptive passages. The vivid depictions of the grassland landscape, for instance, are rendered with a lyrical quality that captures the original's poetic essence while remaining accessible to English-speaking readers. This balance between cultural fidelity and linguistic fluency is a hallmark of his translation, ensuring that the text's unique charm is preserved without alienating its target audience.

Goldblatt's work in *Wolf Totem* underscores the translator's role as a cultural mediator. By preserving the cultural and ecological richness of the original text, Goldblatt positions himself as both a translator and an interpreter of Mongolian nomadic traditions. His translation serves as a bridge between cultures, fostering cross-cultural understanding and dialogue. This role is particularly significant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 literature, where translations often serve as the primary means of accessing foreign cultures.

The international success of *Wolf Totem* highlights the importance of cultural adaptation in globalizing literature. Goldblatt's translation has introduced Western readers to the ecological and cultural wisdom of the Mongolian grasslands, contributing to a broader appreciation of Chinese and Mongolian literature. The novel's reception underscores the potential of translation to transcend cultural boundaries and foster global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By making the ecological and cultural insights of *Wolf Totem* accessible to a global audience, Goldblatt's translation has played a pivotal role in its international acclaim.

7. Conclusion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underscore the significant potential of Chinese literature to exert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the global literary landscape. However, the realization of this potential is contingent upon the effective resolution of translation challenges through the implementation of well-considered translation strategies. The analysis reveals that the strategic integration of domestication and foreignization approaches, coupled with a nuanced focus on cultural adaptation, enables translators to effectively convey not only the textual content but also the intricate cultural subtleties inherent in Chinese literary works to international readerships.

The implications of this study suggest several promising direc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First, more comprehensive case studies examining both successful and unsuccessful translations of Chinese literary works would provide valuable insights into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translation strategies. Second, the exploration of emerging digital platforms and new media as innovative channels for disseminating translated Chinese literature presents an important avenue for enhancing global accessibility and engagement. Furthermore,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combining translation studies with cultural studies, digital humanities, and global literary trends could yield novel perspectives on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As the world continues to witness increasing cultural interconnectedness, the role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fostering cross-cultural understanding and enriching global literary diversity becomes ever more crucial. Through sustained efforts in translation quality enhancement, strategic promotion, and scholarly research, Chinese literature is poised to assume a more prominent position in international cultural exchange. This progression will not only contribute to the diversification of world literature but also facilitate a more comprehensive global appreciation of China's rich literary heritage and contemporary creative expressions.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contribute to the ongoing discourse on literary translation and cultural exchange, highlighting the need for continued collaboration between translators, scholars, and cultural institutions. As we move forward, it is imperative to maintain a balance between preserving the authenticity of Chinese literary works and ensuring their accessibility to global audiences. With these concerted efforts, Chinese literature is well-positioned to make enduring contributions to the global literary canon, fostering greater cultural understanding and appreciation in an increasingly interconnected world.

References:

- [1] Yang, P. (2015). Translation studies in contemporary China: Retrospect, reflection, and prospect. *Translation and academic journals: The evolving landscape of scholarly publishing*, 37-66.
- [2] Nye, J. S. (1990). Soft power. *Foreign policy*, (80), 153-171.
- [3] Paloposki, O. (2012). Domestication and foreignization. In *Handbook of Translation Studies: Volume 2* (pp. 40-42).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 [4] Feuerwerker, Y. T. M. (1998). Ideology, power, text: Self-representation and the peasant 'Other'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5] Yesheng, T. (2024). *Translating Chinese Fiction: Multiple Voices and Cognitive Translatology*. Taylor & Francis.
- [6] Gu, M. D. (2007). *Chinese theories of fiction: A non-Western narrative system*. suny Press.
- [7] Wang, B. (1993). *The sublime subject of history: Aesthetics and politics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 [8] Myskja, K. (2013). Foreignisation and resistance: Lawrence Venuti and his critics. *Nordic Journal of English Studies*, 12(2), 1-23.
- [9] Chesterman, A. (1997). Ethics of translation. *Benjamins translation library*, 20, 147-160.
- [10] Lefevere, A., & Bassnett, S. (1998). *Constructing Cultures*. Multilingual Matters.
- [11] Tymoczko, M. (2000). Translation and political engagement: Activism, social change and the role of translation in geopolitical shifts. *The translator*, 6(1), 23-47.
- [12] Yifeng, S. (2009). Cultural translation in the context of glocalization. *ARIEL: A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nglish Literature*, 40(2-3).
- [13] Bernal, G., Jiménez-Chafey, M. I., & Domenech Rodríguez, M. M. (2009). Cultural adaptation of treatments: A resource for considering culture in evidence-based practice. *Professional Psychology: Research and Practice*, 40(4), 361.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2.490

Transmission of Cultural Imagery in Translation: An In-depth Exploration

Focusing on Literary and Poetic Texts

Pengfei Bao¹

¹*School of Chinese,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999077), China*

Abstract: This study delves into the complexities of cultural imagery transmission in translation, with a particular focus on literary and poetic works. Through a meticulous analysis of the transfer and transformation of cultural imagery—manifested in symbols, metaphors, and idioms—this research addresses critical questions regarding the preservation of source-language cultural imagery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target-language readers' comprehension. By conducting detailed case studies of the translation of Chinese classical poetry, specifically the works of Li Bai and Du Fu, and the Indian epic Mahabharata, this study not only uncovers the intricate nature of cultural imagery transmission but also proposes practical translation strategies. The research aims to advance the field of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foster more effective cross-cultural literary exchange.

Keywords: Cultural imagery transmission; Translation studies; Literary translation; Poetic translation; Chinese classical poetry; Mahabharata

1. Introduction

In an era marked by unprecedented globalization, translation has emerged as the vital medium for intercultural dialogue, enabling the exchange of ideas, values, and artistic expressions across linguistic and cultural boundaries. Within the domain of literature and poetry, cultural images hold particular significance, serving as intricate tapestries woven from the threads of a society's history, beliefs, and collective consciousness. These images transcend mere linguistic constructs; they embody the essence of a culture, encapsulating its unique worldview, aesthetic sensibilities, and symbolic traditions. As such, the accurate transmission of cultural images in translation is not merely a technical endeavor but a profound act of cultural mediation, essential for preserving the integrity of the original work and fostering meaningful cross-cultural understanding.

Yet, the translation of cultural images is a complex and nuanced process, fraught with inherent challenges. Linguistic disparities, such as divergent syntactic structures, semantic nuances, and lexical gaps, are compounded by deeper cultural differences, including varying belief systems, historical narratives, and social conventions. These dual layers of complexity often result in the loss, distortion, or misinterpretation of cultural images, potentially diluting the richness of the source text and alienating target-language readers. For instance, a metaphor deeply rooted in one culture's

collective memory may resonate differently—or not at all—in another cultural context. Consequently, the translation of literary and poetic texts demands not just linguistic proficiency but a profound sensitivity to the cultural underpinnings of the source material^[1].

This study seeks to address these challenges by exploring the mechanisms and strategies for effective cultural image transmission in translation. Through a focused analysis of literary and poetic texts, including Chinese classical poetry by Li Bai and Du Fu and the Indian epic Mahabharata, this research aims to uncover the intricate interplay between linguistic fidelity and cultural adaptation. By examining how cultural images are preserved, transformed, or lost in translation, this study seeks to provide actionable insights for translators and scholars alike. Furthermore, it endeavors to contribute to the broader discourse on translation theory, emphasizing the pivotal role of cultural imagery in bridging literary traditions and fostering global literary appreciation.

In doing so, this research both underscores the importance of cultural image transmission and highlights its implications for the preservation of literary heritage and the promotion of cross-cultural dialogue. By shedding light on the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inherent in this process, this study aspires to advance both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dimensions of translation studies, ultimately enriching the global literary landscape.

2. Theoretical Framework

2.1 Cultural Images i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Cultural images are conceptual constructs that emerge from the interplay of a society's historical, philosophical, and aesthetic traditions^[2]. These images, which manifest as symbols, metaphors, and idioms, are deeply embedded in the collective consciousness of a culture, serving as vehicles for transmitting its values, beliefs, and worldview. Their translation, therefore, is not merely a linguistic exercise but a complex act of cultural mediation that requires a nuanced understanding of both the source and target cultures. This section explores the theoretical underpinnings of cultural images, examining their roles i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and the challenges they pose in translation.

Symbols, as one of the most potent forms of cultural imagery, carry meanings that are often both universal and culturally specific^[3]. A prime example is the lotus (lianhua) in Chinese culture, which transcends its botanical identity to embody ideals of purity, enlightenment, and spiritual resilience. This symbolism is deeply rooted in Buddhist philosophy, which venerates the lotus for its ability to rise untainted from muddy waters, symbolizing the triumph of spiritual clarity over worldly corruption. Zhou Dunyi's essay *The Love for the Lotus* (Ai Lian Shuo) exemplifies this cultural image, praising the lotus as a metaphor for moral integrity and spiritual transcendence. The essay's enduring influence has cemented the lotus as a recurring motif in Chinese poetry, art, and religious discourse. However, translating such culturally specific symbols into another language presents significant challenges. For instance, a direct translation of the lotus symbol into a Western context may fail to evoke the same spiritual and aesthetic resonance, as the lotus does not hold an equivalent symbolic weight in Western traditions. This underscores the importance of contextual adaptation in translation, where the goal is to preserve the layered meanings of cultural symbols while ensuring their accessibility to target-language readers.

Metaphors, as another key form of cultural imagery, serve as bridges between the concrete and the abstract, often drawing on culturally specific associations to convey complex ideas. Shakespeare's metaphor "Juliet is the sun" in *Romeo and Juliet* provides a compelling illustration. Here, the sun is

not merely a celestial body but a symbol of vitality, divinity, and hope, deeply ingrained in Western cultural and literary traditions. By comparing Juliet to the sun, Shakespeare not only conveys Romeo's intense adoration but also taps into a rich cultural reservoir of meanings associated with light and life. Translating such metaphors into another language, however, requires careful consideration of the target culture's symbolic associations. For example, in cultures where the sun may symbolize harshness or oppression rather than warmth and vitality, the metaphor could lose its intended emotional impact. This highlights the need for translators to navigate the cultural nuances of metaphors to ensure their intended meanings are preserved.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how this metaphor is rendered in different languages could reveal fascinating insights into the interplay between cultural context and linguistic expression.

Idioms, as fixed expressions with non-literal meanings, are particularly reflective of a culture's unique characteristics and historical experiences. The English idiom "a piece of cake," for instance, conveys the idea of something being easy, a meaning that can be traced back to 19th-century American cultural practices, where cakes were often awarded as prizes in simple competitions. This idiom reflects the American cultural tendency to use food-related imagery in everyday language, as well as the value placed on simplicity and ease. However, translating such idioms into another language often requires more than a literal rendering. In Chinese, the equivalent expression "小菜一碟" (xiao cai yi die), which literally means "a small dish of food," carries a similar connotation of ease. While the cultural context differs—the Chinese idiom draws on culinary imagery rather than confectionery—the underlying meaning remains intact. This demonstrates the importance of cultural adaptation in idiom translation, where the goal is to preserve the idiomatic meaning while aligning it with the target culture's linguistic and cultural norms. Such adaptations not only ensure the idiom's comprehensibility but also enhance its cultural relevance for the target audience.

In literature and poetry, cultural images serve as powerful tools for evoking emotions, conveying complex ideas, and creating immersive textual landscapes. T.S. Eliot's *The Waste Land* provides a striking example, where the titular metaphor of the "waste land" serves as a multifaceted symbol of spiritual and cultural desolation in the modern world^[4]. Eliot's use of this metaphor draws on a wide range of cultural and literary references, from the Fisher King myth in Arthurian legend to the Upanishads in Hindu philosophy. The "waste land" thus becomes a complex web of cultural allusions, reflecting the fragmentation and disillusionment of post-World War I society. Translating such a richly layered metaphor into another language demands full linguistic skills and an in-depth comprehension of the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contexts that inform it. For instance, a translator working on a Chinese version of *The Waste Land* might need to consider how the metaphor resonates within the Chinese cultural and literary tradition, where themes of spiritual desolation are often expressed through different symbolic frameworks, such as the imagery of barren landscapes in classical poetry. This highlights the translator's role as a cultural mediator, tasked with bridging the gap between disparate cultural and literary traditions.

In closing, cultural images i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are dynamic constructs that reflect the interplay between language, culture, and history. Their transmission in translation demands a delicate balance between linguistic accuracy and cultural sensitivity, as well as a willingness to engage with the complexities of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By examining the challenges and strategies involved in translating symbols, metaphors, and idioms, this study seeks to contribute to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cultural image transmission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transl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Through this exploration, it becomes evident that cultural images are not merely decorative elements

in literature but essential components of meaning-making, whose effective translation is crucial for fostering cross-cultural understanding and appreciation. The examples discussed in this section illustrate the intricate relationship between cultural context and linguistic expression, underscoring the need for translators to adopt a holistic approach that respects both the form and the spirit of the original text.

2.2 The Role of Translation in Cultural Image Transmission

Translation serves as a critical mechanism for mediating cultural differences, enabling the transfer of ideas, values, and artistic expressions across linguistic and cultural boundaries^[5]. In the context of cultural image transmission, translation is not merely a linguistic act but a cultural negotiation that requires the translator to balance fidelity to the source text with accessibility for the target audience. Cultural images, as embodiments of a society's collective consciousness, pose unique challenges in translation due to their deep-rooted cultural, historical, and philosophical significance. A successful translation must accurately convey the semantic content of the original text and preserve its cultural essence, ensuring that the target-language readers can engage with the text on both intellectual and emotional levels.

From a theoretical standpoint, various translation theories offer distinct approaches to the transmission of cultural images. Eugene Nida's theory of dynamic equivalence, for instance, prioritizes functional equivalence, emphasizing the need to elicit a similar response from the target-language readers as the source text does from its original audience^[6]. In practical terms, this approach might involve substituting culturally specific images in the source text with equivalents in the target culture. To illustrate, when translating a Chinese poem that employs the lotus as a symbol of purity and spiritual enlightenment, a translator adhering to Nida's principles might opt for the lily in Western contexts, as it also symbolizes purity. However, this strategy risks oversimplifying or distorting the original cultural image, as the lotus carries additional layers of meaning in Chinese culture, such as its association with Buddhism and its philosophical connotations of resilience and transcendence. While such substitutions may enhance immediate comprehension, they often fail to capture the full cultural and emotional resonance of the original image.

In contrast, Lawrence Venuti's concept of foreignization advocates for retaining the "foreignness" of the source text, including its cultural images, to challenge the dominance of the target-language culture and expose readers to the cultural otherness of the source text^[7]. This approach is particularly relevant when translating texts rich in culturally specific imagery, such as Japanese poetry that frequently employs cherry blossoms (sakura) as a symbol of transience and beauty. A foreignizing translator might retain the original term sakura and provide contextual explanations to help readers understand its cultural significance. This strategy allows target-language readers to experience the aesthetic and philosophical depth of the source culture but may also present challenges in terms of readability and comprehension, particularly for audiences unfamiliar with the cultural context. For instance, a reader unfamiliar with the Japanese concept of monono aware (the pathos of things) might struggle to fully appreciate the emotional weight of cherry blossom imagery without additional cultural mediation.

The tension between domestication and foreignization underscores the broader debate in translation studies regarding the translator's role as a cultural mediator. While domestication prioritizes accessibility and immediate comprehension, it risks erasing the cultural specificity of the source text. Foreignization, on the other hand, preserves cultural authenticity but may alienate readers unfamiliar

with the source culture. This dichotomy is particularly evident in the translation of literary and poetic texts, where cultural images often serve as central elements of meaning and aesthetic expression. To further illustrate these theoretical approaches, consider the translation of the Chinese idiom "对牛弹琴" (dui niu tan qin), which literally means "playing the lute to a cow" and conveys the idea of addressing an audience incapable of understanding or appreciating the message. A domesticating translation might render this idiom as "casting pearls before swine," a phrase with a similar meaning in English. While this substitution maintains the idiomatic force of the original, it loses the cultural specificity of the Chinese idiom, which draws on agricultural imagery rather than biblical references. A foreignizing translation, by contrast, might retain the literal meaning of "playing the lute to a cow" and provide a footnote explaining its cultural context. This approach maintains the original cultural image but requires additional effort on the part of the reader to fully grasp its meaning.

The choice between these strategies often depends on the translator's goals and the intended audience. For instance, in literary translations aimed at academic or culturally informed readers, a foreignizing approach may be more appropriate, as it allows for a deeper engagement with the source culture. In contrast, translations intended for a broader audience might prioritize domestication to ensure accessibility and immediate comprehension.

3. Preserving Source-Language Cultural Images in Translation

3.1 Transliteration and Annotation

Transliteration is an indispensable strategy for keeping cultural images when direct equivalents are absent in the target language^[8]. By retaining the original form of the source-language term, translators can maintain the authenticity and cultural specificity of the image, ensuring that its unique connotations are not lost in translation. However, to bridge the cultural gap for target-language readers, annotations are essential. These explanatory notes provide the necessary cultural, philosophical, or historical context, enabling readers to grasp the full significance of the term.

A notable example of this approach can be observed in the translation of Chinese classical poetry, where terms such as "太极" (Taiji) are often transliterated to preserve their cultural integrity. Taiji, a concept deeply rooted in Taoist philosophy and Chinese cosmology, represents the primordial force that generates the dualities of yin and yang, symbolizing the unity and balance of all things in the universe. A mere transliteration of Taiji without annotation would leave target-language readers with an incomplete understanding of its profound philosophical implications. An explanatory note could elucidate that Taiji is not merely a term but a cornerstone of Chinese thought, influencing areas ranging from philosophy and martial arts to traditional medicine and art. Such annotations not only enhance comprehension but also foster a deeper appreciation of the cultural richness embedded in the source text.

Similarly, in the translation of Sanskrit terms within the study of Indian philosophy, transliteration accompanied by annotation is a common practice. The term "karma," for instance, is frequently transliterated in English-language translations. However, without additional context, readers may fail to grasp its full significance. An annotation could clarify that karma refers to the principle of cause and effect in Hindu and Buddhist philosophies, where an individual's actions in this life determine their fate in future incarnations. This concept is central to the moral and spiritual framework of these religions and has profoundly influenced Indian literature, art, and social values. By providing this context, translators enable readers to understand karma not merely as a word but as a foundational

concept that shapes the worldview of millions.

3.2 Contextualization

Contextualization is another critical strategy for effectively transmitting cultural images in translation. By embedding the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context in which a cultural image is used, translators can help readers appreciate its significance and emotional resonance. This approach is particularly valuable when translating literary works, where cultural images often serve as key elements of meaning and aesthetic expression.

Consider, for instance, the translation of Li Bai's poem "将进酒" (Invitation to Wine), which includes the line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 (Do you not see the Yellow River's waters rushing down from the sky). Here, the Yellow River (Huang He) is not merely a geographical feature but a cultural symbol of immense significance in Chinese history and identity. Known as the "cradl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the Yellow River has sustained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shaped societal structures, and inspired countless works of art and literature. To fully appreciate Li Bai's use of this image, target-language readers need to understand its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weight. A translator could include a note explaining that the Yellow River's floods and the efforts to control them have been central to China's historical narrative, symbolizing both the nation's resilience and its vulnerability. This contextualization allows readers to grasp the grandeur and temporal sweep evoked by Li Bai's imagery, as well as the poet's sense of awe in the face of nature's power.

Another example can be found in Du Fu's poem "登高" (Ascending the Height), which contains the line "艰难苦恨繁霜鬚" (Hardships and hatreds have made my frosty hair grow thick). In this context, "frosty hair" is not merely a physical description but a cultural image laden with symbolic meaning. In Chinese tradition, white hair is often associated with the burdens of life, the passage of time, and the weight of responsibilities. By providing this cultural context, translators can help readers understand the depth of Du Fu's emotions. An annotation could explain that in Chinese society, the appearance of white hair was not only a sign of aging but also a metaphor for the trials and tribulations one has endured. This contextualization allows readers to empathize more deeply with Du Fu's feelings of weariness and the profound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that permeates his work. In both examples, contextualization serves as a bridge between the source and target cultures, enabling readers to engage with the text on a deeper level. By situating cultural images within their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frameworks, translators not only preserve the integrity of the original text but also enrich the reading experience for the target audience.

3.3 Creative Adaptation

Creative adaptation is a nuanced strategy employed when a direct translation of a cultural image risks obscuring its meaning or emotional impact in the target-language context^[9]. This approach involves identifying an equivalent or analogous image in the target culture that can evoke a similar response while preserving the essence of the original. While creative adaptation enhances accessibility, it must be executed with care to avoid diluting the cultural specificity of the source text. Translators often supplement adaptations with explanatory notes to ensure that readers appreciate the cultural diversity and richness of the original expression.

A compelling illustration of creative adaptation can be found in the translation of the Chinese idiom "画蛇添足" (hua she tian zu), which literally means "drawing a snake and adding legs." In its cultural context, this idiom conveys the idea of over-complicating or spoiling something by adding unnecessary elements. A direct translation, however, might confuse English-speaking readers

unfamiliar with the cultural reference. To address this, a translator might adapt the idiom to the English expression "to paint the lily," which similarly suggests superfluous embellishment that detracts from the original. While this adaptation captures the idiomatic essence, it risks erasing the cultural specificity of the Chinese idiom. To mitigate this, a translator could include a note explaining the original phrase's origin—a fable from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and its cultural significance i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philosophy. This dual approach ensures both accessibility and cultural fidelity, allowing readers to engage with the idiom's meaning while appreciating its cultural roots.

Another example of creative adaptation can be observed in the translation of Japanese haiku, which often feature cultural images deeply embedded in Japanese nature and aesthetics. The image of "cherry blossoms" (sakura), for instance, carries profound cultural connotations in Japan, symbolizing the fleeting beauty of life and the concept of mono no aware (the pathos of things). In translating a haiku for a Western audience, a translator might adapt this image to "apple blossoms," a floral symbol more familiar to English-speaking readers. While this substitution allows readers to connect with the imagery on a personal level, it risks diminishing the cultural depth of the original. To address this, the translator could include a note explaining the significance of cherry blossoms in Japanese culture, highlighting their role in literature, art, and the annual tradition of hanami (flower viewing). This approach strikes a balance between accessibility and cultural preservation, enabling readers to appreciate both the adapted image and its cultural context.

The use of creative adaptation is particularly relevant in the translation of culturally specific metaphors and symbols. For instance, in translating the Chinese concept of "龙" (long), often rendered as "dragon" in English, a translator must navigate the cultural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images. In Chinese culture, the dragon is a benevolent and auspicious symbol associated with power, wisdom, and good fortune. In contrast, the Western dragon is often depicted as a malevolent creature. To bridge this gap, a translator might adapt the image by emphasizing the positive attributes of the Chinese dragon in the target text, while also providing a note explaining its cultural significance. This strategy ensures that the adapted image resonates with the target audience while preserving the cultural essence of the original.

4. Impact of Loss or Transformation of Cultural Images on Target-Language Readers' Understanding

4.1 Loss of Cultural Richness

The loss of cultural images in translation significantly diminishes the depth and richness of the source text, thereby depriving target-language readers of the intricate cultural connotations and associations that the original work intended to convey. This phenomenon is particularly evident in the translation of classical Chinese poetry, where cultural symbols are deeply embedded in the text. To illustrate, consider Li Bai's "静夜思" ("Thoughts on a Silent Night"), where the line "举头望明月, 低头思故乡" ("I look up at the bright moon, then lower my head and think of home") employs the moon as a potent cultural image. In Chinese poetry, the moon transcends its astronomical identity to become a symbol of homesickness, longing, and the inexorable passage of time. A translation that merely renders "moon" as "moon" without elucidating its cultural significance fails to capture the profound emotional and cultural undertones of the poem. Consequently, readers are unable to fully appreciate Li Bai's use of the moon to express his yearning for his hometown, as well as the

universal human experience of longing and nostalgia. The moon in Chinese culture is steeped in a long-standing literary tradition, with myriad poems and stories associated with it. Its loss in translation results in a significant erosion of this rich cultural heritage, leading to a less profound and enriching reading experience.

Another compelling instance is the translation of the Mahabharata, where the concept of "dharma" is central. "Dharma" encompasses a complex set of moral, ethical, and religious duties in Hinduism, and its accurate translation is crucial for understanding the motivations and actions of the characters in the epic. If this cultural image is not accurately translated or explained, Western readers will be unable to grasp the deep-seated cultural and religious significance that "dharma" imparts to the narrative. The loss of this cultural image would result in a superficial understanding of the text, devoid of its moral and ethical complexities. Without an understanding of "dharma," readers may misinterpret the characters' actions as arbitrary or self-serving, rather than being guided by a sophisticated moral and religious framework. This not only distorts the narrative but also undermines the philosophical and ethical dimensions of the epic.

4.2 Misinterpretati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cultural images in translation can lead to significant misinterpretations by target-language readers. This is particularly problematic when the cultural images are deeply rooted in the historical and social context of the source language. To exemplify this, consider Du Fu's poem "春望" ("Spring View"), where the line "烽火连三月, 家书抵万金" ("Beacon fires have burned for three months on end; a letter from home is worth ten thousand in gold") features the "beacon fires" as a cultural image representing war and turmoil in ancient China. If a translator were to translate "beacon fires" simply as "fires" without providing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ontext, Western readers might misinterpret it as a general reference to fires, rather than understanding its significance as a symbol of war. This misinterpretation could lead to a distorted understanding of the poem's theme and the poet's intentions. The beacon fires in ancient China were a crucial means of communication during times of war, and their continuous burning indicated the ongoing conflict and the instability of the society. Without this context, readers may not grasp the sense of urgency and anxiety that Du Fu was trying to convey, thereby losing the emotional depth and historical resonance of the poem. Similarly, in the translation of the Mahabharata, the metaphor of "Arjuna's divine weapons" requires careful handling to avoid misinterpretation. These weapons are not ordinary armaments but are imbued with religious and mythological powers. If translated without proper cultural context, Western readers might misunderstand the power and significance of these weapons, viewing them as mere fictional devices rather than understanding their deeper spiritual and cultural significance. For instance, Arjuna's "Brahmastra" is not just a powerful weapon but is associated with the power of the god Brahma. A translation that fails to convey this cultural context may lead readers to underestimate the significance of Arjuna's actions and the forces at play in the epic. This not only diminishes the narrative's complexity but also misrepresents the cultural and religious underpinnings of the text.

To be compared, the loss and transformation of cultural images in translation have profound theoretical implications, particularly in the fields of cultural studies and translation theory. Scholars such as Lawrence Venuti have argued for the importance of "foreignization" in translation, a strategy that seeks to preserve the cultural specificity of the source text, thereby enriching the target-language culture. In contrast, "domestication" aims to make the text more accessible to the target audience by

adapting it to their cultural norms, often at the expense of cultural richness. The examples discussed above underscore the limitations of domestication, as it risks erasing the cultural depth and specificity of the source text.

Analyzing the translation strategies exhibits that the choice between foreignization and domestication is not merely a technical decision but a deeply ideological one. Foreignization challenges the target-language readers to engage with the cultural otherness of the source text, thereby fostering a more nuanced and respectful understanding of the source culture. Domestication, on the other hand, risks perpetuating cultural stereotypes and reducing the source text to a more familiar, but ultimately impoverished, version of itself. The loss of cultural images in translation, therefore, is not just a linguistic issue but a cultural and ethical one, with far-reaching implications for cross-cultural understanding and communication.

4.3 Limited Aesthetic Appreciation

Cultural images play a pivotal role in shaping the aesthetic value of literary and poetic works, serving as vehicles for emotional resonance, symbolic depth, and cultural specificity. When these images are lost or inadequately transformed in translation, the aesthetic appreciation of the target-language readers is inevitably constrained. This limitation not only diminishes the artistic impact of the work but also obscures the cultural and emotional nuances that the original author intended to convey. To explore this phenomenon, we can examine specific instances from both Chinese classical poetry and Hindu epics, where cultural images are deeply embedded and carry significant aesthetic weight.

4.3.1 The Symbolism of the Willow in Chinese Poetry

In Chinese classical poetry, natural images such as the willow are frequently employed as aesthetic devices, imbued with layers of cultural and emotional meaning. The willow, for instance, is not merely a tree but a symbol of farewells, grace, and the cyclical nature of the seasons. A case in point is Wang Wei's poem "渭城朝雨浥轻尘, 客舍青青柳色新" ("In the morning, rain in Weicheng wets the light dust; the willows by the inn are fresh and green"). Here, the willow image evokes a mood of melancholy and the anticipation of separation, a sentiment deeply rooted in Chinese cultural tradition. In ancient China, the willow was often associated with parting, as its drooping branches symbolized the sorrow of saying goodbye. The sight of a willow by an inn would evoke a sense of sadness and the bittersweet feeling of farewell, a cultural connotation that is lost if the translation fails to convey the symbolic significance of the willow. Without this cultural understanding, the poem loses much of its emotional resonance and aesthetic appeal, reducing it to a mere description of a rainy morning by an inn. The aesthetic impact of the willow image is further amplified by its historical and literary associations. In Chinese literature, the willow has been a recurring motif in poems about separation, dating back to the Tang dynasty^[10]. Translators who render "willow" as simply "tree" or "green foliage" strip the image of its cultural depth, thereby limiting the reader's ability to fully engage with the poem's emotional and aesthetic dimensions. This loss is not merely linguistic but cultural, as it erases the layers of meaning that the willow carries within the Chinese literary tradition. Consequently, the translated poem becomes a shadow of its original self, devoid of the richness that makes it a timeless piece of art.

4.3.2 The Grandeur of Celestial Palaces in the Mahabharata

Similarly, in the Mahabharata, the elaborate descriptions of celestial palaces and divine landscapes

are replete with cultural images that are integral to the epic's aesthetic appeal. These descriptions are not merely ornamental but serve to transport readers into a mythical realm of unparalleled beauty and grandeur. For instance, the celestial palaces in the Mahabharata are depicted with vivid imagery that is deeply rooted in Hindu mythology, reflecting the cultural and religious values of the society that produced the epic. Translators who fail to capture the cultural significance of these descriptions risk reducing them to generic depictions of opulence, thereby limiting the reader's aesthetic experience of the text. To illustrate, consider the description of Indra's palace, which is adorned with jewels, celestial gardens, and divine beings. In Hindu mythology, Indra's palace is not just a place of physical beauty but a symbol of divine power and cosmic order. A translation that omits or misrepresents these cultural associations deprives readers of the opportunity to visualize the grandeur and spiritual significance of these mythical settings. Without this cultural context, the text may appear less imaginative and less engaging, as the reader is unable to fully appreciate the aesthetic and symbolic richness of the original descriptions.

In conclusion, the loss of aesthetic appreciation due to the inadequate translation of cultural images has significant theoretical implications for the field of translation studies. Scholars such as Susan Bassnett and André Lefevere have emphasized the importance of cultural transfer in translation^[11], arguing that translators must act as cultural mediators who bridge the gap between the source and target cultures. This perspective underscores the need for translators to not only convey the literal meaning of the text but also to preserve its cultural and aesthetic dimensions.

Full comprehension of translation strategies manifests that the choice between literal and cultural translation is not merely a technical decision but a deeply artistic one. Literal translations, which prioritize word-for-word accuracy, often fail to capture the aesthetic and cultural nuances of the source text, resulting in a diminished reading experience. Cultural translations, on the other hand, seek to preserve the artistic and emotional impact of the original work by adapting its cultural images to the target audience's cultural framework. While this approach may involve some degree of transformation, it ultimately enhances the reader's aesthetic appreciation by making the text more accessible and meaningful. For instance, in the translation of Wang Wei's poem, a cultural translation might include a footnote or explanatory note to elucidate the symbolic significance of the willow, thereby enriching the reader's understanding and appreciation of the poem. Similarly, in the translation of the Mahabharata, translators could provide contextual information about the cultural and religious significance of celestial palaces, enabling readers to visualize and engage with the text on a deeper level. By adopting such strategies, translators can bridge cultural divides and foster a more profound and respectful engagement with the source text.

5. Case Studies

5.1 Translation of Chinese Classical Poetry: Li Bai and Du Fu's Poems

The translation of Chinese classical poetry presents a unique challenge due to its dense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connotations. Li Bai and Du Fu, two of the most celebrated poets of the Tang Dynasty, exemplify the intricate interplay between language, culture, and emotion in their works^[12]. A closer examination of their poems reveals the complexities of translating cultural images and the importance of contextualization in bridging cultural gaps.

5.1.1 Li Bai's "静夜思" ("Thoughts on a Silent Night")

Li Bai's "静夜思" ("Thoughts on a Silent Night") is a quintessential example of how cultural images can be lost in translation. The opening lines,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Before my bed the moonlight lies, I wonder if it's frost on the ground"), are often rendered in a straightforward manner, such as "Before my bed the moonlight lies, I wonder if it's frost on the ground." While this translation captures the literal meaning, it fails to convey the cultural significance of the "moon" image, which in Chinese poetry symbolizes homesickness, longing, and the passage of time. A more nuanced approach would be to include an annotation: "Before my bed the bright moonbeams shine, I wonder if it's frost on the ground. (In Chinese culture, the moon often symbolizes homesickness and longing.)" This addition provides readers with the cultural context necessary to fully appreciate the emotional depth of the poem. Furthermore,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Li Bai's time is crucial for understanding the poem's emotional resonance. During the Tang Dynasty, scholars and poets often traveled extensively, leading to frequent separations from family and hometown. This context could be further elaborated in the annotation to help readers empathize with Li Bai's sense of isolation and yearning. By incorporating both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context, translators can enhance the reader's understanding and appreciation of the poem, ensuring that the emotional and aesthetic dimensions of the original work are preserved.

5.1.2 Du Fu's "春望" ("Spring View")

Du Fu's "春望" ("Spring View") offers another compelling case study in the translation of cultural images. The line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Though a country be sundered, hills and rivers endure; in spring in the city, grass and trees are thick") contains the cultural image of "国" (country). In ancient China, "国" carried a more complex meaning, often referring to the imperial state and the associated social and political order. A translation that simply renders "国" as "country" without further explanation may not convey the full emotional weight of the poem. A more effective approach would be to add a note: "Here, '国' refers to the imperial state of the Tang Dynasty. The fall of the capital during the An Lushan Rebellion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nation and its people. Du Fu's use of '国破' reflects his deep-seated grief for the destruction of the imperial order, the loss of social stability, and the suffering of the common people." This note provides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background, enabling readers to understand the poem's underlying themes of national crisis, personal sorrow, and the contrast between the endurance of nature and the fragility of human society.

5.1.3 Du Fu's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The Thatched Cottage Unroofed by Autumn Gales")

Another illustrative example from Du Fu's works is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The Thatched Cottage Unroofed by Autumn Gales"). The line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 ("In the eighth month, the autumn gale howls; it rolls up three layers of thatch on my roof") contains cultural elements related to the living conditions and seasonal rhythms of ancient China. The mention of the "eighth month" is not merely a temporal marker; in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lunar calendar, this month is associated with the onset of autumn and the approach of winter, which was a time of hardship for many. Translators could add a note explaining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lunar calendar and how the changing seasons affected the lives of people, especially those living in rural areas like Du Fu. This would help readers understand the urgency and desperation in Du Fu's situation as he faced the destruction of his humble dwelling in the face of the autumn wind.

To be concluded, the translation of Li Bai and Du Fu's poems underscores the importance of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context in preserving the emotional and aesthetic dimensions of literary works. Scholars such as Eugene Nida have emphasized the concept of "dynamic equivalence," which seeks to convey the meaning and impact of the source text in a way that resonates with the target audience. This approach is particularly relevant in the translation of culturally rich texts, where literal translations often fall short of capturing the depth and complexity of the original work.

5.2 Translation of the Indian Epic Mahabharata

The translation of the Mahabharata, one of the most revered texts in Hindu mythology, presents a formidable challenge due to its intricate cultural and philosophical underpinnings^[13]. The epic is replete with cultural images and concepts that are deeply embedded in Hindu religious and philosophical traditions. A nuanced approach to translation is essential to remain the richness and depth of these elements, ensuring that target-language readers can fully appreciate the text's spiritual, ethical, and aesthetic dimensions.

5.2.1 The Symbolism of Arjuna's Chariot

One of the most striking cultural images in the Mahabharata is Arjuna's chariot, which is both a vehicle as well as a symbol of divine protection and power. In Hindu mythology, the chariot is adorned with jewels that are imbued with divine blessings, signifying Arjuna's special status as a warrior favored by the gods. A translation that simply describes the chariot as "a vehicle decorated with jewels" fails to capture the profound cultural and religious significance of this image. To address this, a translator could include a footnote: "In Hindu mythology, the jewels on Arjuna's chariot are believed to be imbued with divine power. They are not mere ornaments but serve as a source of protection and a sign of Arjuna's special status as a warrior favored by the gods. These jewels are often associated with specific deities and their powers, adding a layer of religious and mythological significance to the chariot." This annotation provides readers with the necessary cultural context to understand the symbolic weight of the chariot, enhancing their appreciation of the narrative. The chariot's divine attributes are not only central to Arjuna's identity as a warrior but also reflect the broader themes of divine intervention and cosmic order that permeate the Mahabharata. By elucidating these cultural images, translators can bridge the gap between the source and target cultures, ensuring that the epic's spiritual and mythological dimensions are preserved.

5.2.2 The Krishna-Arjuna Dialogue

The "Krishna-Arjuna dialogue," a cornerstone of the Mahabharata, is replete with cultural images rooted in Hindu philosophy. Krishna's teachings to Arjuna are laden with metaphors and concepts that require careful translation to convey their profound spiritual and ethical messages. To illustrate, consider Krishna's metaphor of the "eternal self" (atman)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the body. A translator might include a detailed explanation: "The 'atman' in Hindu philosophy represents the eternal, unchanging self that is distinct from the physical body. It is believed to be a part of the divine essence. Krishna's teachings to Arjuna emphasize the importance of realizing the true nature of the atman and detaching oneself from the material world. This metaphor is central to Hindu spiritual and philosophical thought and forms the basis of many religious practices and meditative techniques." This note not only clarifies the concept of the atman but also situates it within the broader framework of Hindu philosophy, enabling readers to grasp the ethical and spiritual implications of Krishna's teachings. The dialogue between Krishna and Arjuna is not merely a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but a call to spiritual awakening, emphasizing the need for self-realization

and detachment from worldly attachments. By providing this context, translators can ensure that the profound spiritual messages of the Mahabharata are not lost in translation.

5.2.3 The Concept of "Yoga"

The term "yoga" in the Mahabharata is another example of a cultural image that requires careful translation. In the modern, Western-influenced context, "yoga" is often associated with physical exercise and wellness practices. However, in the Mahabharata, "yoga" refers to a comprehensive system of spiritual practices that includes meditation, self-discipline, and the union of the individual self with the divine. A translator could include a note explaining: "In the context of the Mahabharata, 'yoga' refers to a comprehensive system of spiritual practices that includes meditation, self-discipline, and the union of the individual self with the divine. This concept is central to Hindu spiritual and philosophical thought and is distinct from the modern, Western-influenced understanding of yoga as physical exercise." This annotation helps readers understand the deeper, more profound meaning of "yoga" as it is used in the epic, ensuring that the spiritual and philosophical dimensions of the text are preserved. The concept of yoga in the Mahabharata is not merely a set of practices but a path to spiritual enlightenment, emphasizing the importance of inner discipline and the realization of the divine within oneself. By elucidating this concept, translators can enhance the reader's understanding of the epic's spiritual teachings.

In summation, the translation of the Mahabharata highlights the importance of cultural and philosophical context in preserving the richness and depth of literary texts. Scholars such as Lawrence Venuti have emphasized the need for "foreignization" in translation, a strategy that seeks to preserve the cultural specificity of the source text, thereby enriching the target-language culture. This approach is particularly relevant in the translation of culturally rich texts like the Mahabharata, where literal translations often fall short of capturing the depth and complexity of the original work.

6. Conclusion

Cultural image transmission in translation, particularly within literary and poetic contexts, constitutes a complex and multifaceted process that demands meticulous attention and scholarly investigation. This study has systematically demonstrated that the preservation of source-language cultural images is paramount for maintaining both the cultural integrity and aesthetic essence of original works. The potential loss or transformation of these cultural elements during translation can lead to significant consequences for target-language readers, including diminished cultural richness, potential misinterpretation, and constrained aesthetic appreciation. Through comprehensive case studies of Chinese classical poetry and the Mahabharata, this research has illuminated the efficacy of various translation strategies, particularly transliteration with annotation, contextualization, and creative adaptation. These approaches have proven instrumental in bridging cultural divides while preserving the essential cultural and aesthetic elements of the source texts.

Looking forward, this study suggests several promising direc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First, the exploration of innovative translation techniques, particularly those leveraging emerging technologies such as machine learning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ould significantly enhance cultural image transmission. Second, in-depth comparative studies across diverse language pairs could yield valuable insights into the universal and language-specific challenges of cultural image translation. Third,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es that incorporate cultural studies, cognitive linguistics, and reception theory could provide a more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how cultural images are

processed and interpreted across different cultural contexts.

The continued refinement of cultural image transmission methodologies holds substantial implications beyond the realm of translation studies. By enhancing our ability to protect and communicate cultural nuances across linguistic boundaries, we contribute to fostering greater cross-cultural understanding and preserving global cultural diversity. This endeavor not only enriches academic discourse but also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a more inclusive and empathetic global community that values and appreciates the rich tapestry of human cultures. Ultimately, as the world becomes increasingly interconnected, the study and practice of cultural image transmission will play a crucial role in shaping our collective cultural consciousness, ensuring that the unique voices and perspectives of diverse cultures continue to resonate in the global literary and cultural landscape.

References

- [1] Kern, R., & Schultz, J. M. (2005). Beyond orality: Investigating literacy and the literary in second and foreign language instruction. *Th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89(3), 381-392.
- [2] Bryson, N., Holly, M. A., & Moxey, K. (Eds.). (1994). *Visual culture: Images and interpretations*.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 [3] Womack, M. (2005). *Symbols and meaning: A concise introduction*. Rowman Altamira.
- [4] Ramazani, J. (2001). *The hybrid muse: Postcolonial poetry in English*.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5] Buden, B., Nowotny, S., Simon, S., Bery, A., & Cronin, M. (2009). Cultural translation: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roblem, and responses. *Translation Studies*, 2(2), 196-219.
- [6] Felber, S. (2005). Chomsky's Influence on Eugene Nida's Theory of Dynamic Equivalence in Translating. In *Bibelübersetzung als Wissenschaft. Aktuelle Fragestellungen und Perspektiven. Beiträge zum Forum Bibelübersetzung aus den Jahren* (Vol. 2011, pp. 253-262).
- [7] Myskja, K. (2013). Foreignisation and resistance: Lawrence Venuti and his critics. *Nordic Journal of English Studies*, 12(2), 1-23.
- [8] Kuleli, M. (2020). Culture specific items in literary texts and their translation based on "foreignization" and "domestication" strategies. *RumeliDE Dil ve Edebiyat Araştırmaları Dergisi*, (Ö7), 617-653.
- [9] Zerbi, E. More than just translating: the transcreation of advertising campaigns in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 [10] Silbergeld, J. (1980). Kung Hsien's Self-Portrait in Willows, with Notes on the Willow in Chinese Painting and Literature. *Artibus Asiae*, 42(1), 5-38.
- [11] Lefevere, A., & Bassnett, S. (1998). *Constructing Cultures. Multilingual Matters*.
- [12] Zhirong, Z. (2024). Prefac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Literary Criticism. In *A Survey of Chinese Literature* (pp. 1-31). Singapore: Springer Nature Singapore.
- [13] Bhattacharjee, A., & Sarkar, D. (2024). Contemporaneity of the Mahabharata Narrative.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1.489

UI 设计中的色彩心理学与广告学的视觉冲击力研究

曹楚怡¹

(¹东莞城市学院新传媒与艺术学院, 广东 东莞 523000)

摘要: 本研究通过文献分析法, 深入探讨了色彩心理学在 UI 设计和广告学中的应用及其对视觉冲击力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 色彩心理学在 UI 设计和广告学中都具有重要作用。色彩不仅能够影响用户的心理和行为, 还能够增强广告的视觉冲击力和效果。例如, 红色可以增加用户的注意力和唤醒水平, 而蓝色则具有镇静作用。在 UI 设计中, 色彩的选择和搭配可以影响用户对界面的感知和使用体验。在广告学中, 色彩可以用来吸引用户的注意力, 传达品牌信息和情感, 从而提高广告的视觉冲击力和效果。此外, 文化背景对色彩心理学的影响也不容忽视, 不同文化背景下, 人们对色彩的感知和情感反应可能存在差异。在 UI 设计和广告学中, 考虑文化因素可以更好地满足不同用户群体的需求和偏好, 从而提高设计的效果和影响力。基于以上研究结论, 本研究提出了一些建议, 包括设计师应深入研究色彩心理学, 考虑文化差异, 运用色彩对比等手法增强设计的视觉冲击力, 提高用户体验和界面的可用性。

关键词: UI 设计; 色彩心理学; 广告学; 视觉冲击力; 用户体验

一、前言

在当今数字化时代, UI (用户界面) 设计和广告学在商业和日常生活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和用户需求的日益多样化, 如何通过有效的设计手段吸引用户的注意力、提升用户体验并传达品牌价值, 已成为企业和设计师面临的重要挑战。色彩, 作为一种强大而普遍存在的视觉元素, 在 UI 设计和广告学中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它不仅能够影响用户的心理和行为, 还能够增强广告的视觉冲击力和效果(刘海, 2011)。

本研究旨在探讨色彩心理学在 UI 设计和广告学中的应用及其对视觉冲击力的影响。通过系统地分析相关文献, 我们希望揭示色彩如何影响用户的心理和行为, 以及如何通过色彩设计提升广告的视觉冲击力和用户体验(柳林 & 李娜, 2006)。研究将从色彩心理学的基本理论出发, 结合 UI 设计和广告学的实践应用, 探讨色彩在不同文化和背景下的作用及其对品牌形象的影响。

色彩心理学作为一门研究色彩如何影响人类心理和行为的学科, 近年来受到了广泛关注。Elliot 和 Maier (2014) 的研究指出, 色彩可以显著影响人类的心理功能, 如感知、认知和情感。例如, 红色能够增加用户的注意力和唤醒水平, 而蓝色则具有镇静作用。这些发现为 UI 设计和广告学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帮助设计师更好地理解色彩对用户心理的影响。

在 UI 设计中, 色彩的选择和搭配不仅影响界面的美观度, 还直接影响用户的使用体验和满意度。Rider (2010) 的研究强调了色彩在平面设计中的应用, 指出色彩在创造视觉吸引力和传达意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通过合理运用色彩心理学原理, 设计师可以优化界面的视觉效果和信息传达, 从而提高用户的满意度和忠诚度。

在广告学中, 色彩的运用更是至关重要。色彩不仅能够吸引用户的注意力, 还能够传达品牌信息和情感, 从而增强广告的视觉冲击力和效果。Maghraby 等人 (2024) 的研究探讨了色彩心理学对品牌形象的影响, 发现色彩在不同文化中的象征意义和情感联想可能不同。这表明, 在设计广告时, 考虑文化背景和用

户的心理需求是至关重要的(Whitfield & Wiltshire, 1990)。

此外,色彩与视觉冲击力之间的关系也是本研究的重要内容。Liang 和 Hangeldiyeva (2024) 的研究表明,通过运用色彩对比、色彩饱和度和色彩明度等手法,可以显著增强广告的视觉效果和吸引力。这些发现为设计师提供了实用的指导,帮助他们在设计中更好地运用色彩元素,提升广告的视觉冲击力。

综上所述,色彩心理学在 UI 设计和广告学中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通过深入研究色彩心理学,设计师可以更好地理解色彩对用户心理和行为的影响,从而在设计中选择合适的色彩方案,提升用户体验和广告效果。本研究将通过文献分析法,系统地探讨色彩心理学在 UI 设计和广告学中的应用及其对视觉冲击力的影响,为设计师和研究人员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和指导。

二. 研究方法

2.1 文献收集与筛选

本研究采用文献分析法,通过系统地收集和分析相关文献,探讨色彩心理学在 UI 设计和广告学中的应用及其对视觉冲击力的影响。首先,通过学术数据库(如 Web of Science、Google Scholar、CNKI 等)和图书馆资源,广泛收集与色彩心理学、UI 设计和广告学相关的文献。文献类型包括学术期刊文章、学位论文、书籍和行业报告等。在收集过程中,注重文献的权威性和时效性,确保所选文献能够反映当前研究的最新进展和成果。随后,对收集到的文献进行初步筛选,排除与研究主题关联性不强或质量较低的文献,确保后续分析的文献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参考意义。

2.2 文献分类与整理

对筛选后的文献进行分类整理,将其分为以下几个主题:色彩心理学在 UI 设计中的应用、色彩心理学在广告学中的应用、色彩与视觉冲击力的关系、文化与色彩心理学的融合、色彩心理学与广告效果的评估、色彩心理学在 UI 设计中的实践应用。在分类过程中,详细记录每篇文献的核心观点、研究方法和主要结论,为后续的深入分析奠定基础。同时,对文献中的关键数据和案例进行整理和归纳,以便在分析中能够清晰地呈现相关研究成果和实践应用情况,如表格 1 文献收集与文献分类结果所示。

表格 1 文献收集与文献分类结果

作者	文献名称	年份	来源	研究领域
Elliot, A. J. 和 M. A. Maier	《色彩心理学: 感知色彩对人类心理功能的影响》	2014	《心理学年度评论》	色彩心理学基本理论
Liang, L. L. 和 N. Hangeldiyeva	《文化与消费者心理学的协调: 基于传统装饰灵感优化儿童产品设计的色彩方案》	2024	《BMC 心理学》	文化与色彩心理学融合
Maghraby, T. M. 等人	《色彩心理学及其对品牌形象的影响》	2024	《纺织品、色彩与聚合物科学杂志》	色彩心理学在品牌形象中的应用
Nissen, A. 等人	《用户对网站设计的反应: 基于进化心理学的神经影像学研究, 重点是色彩和按钮形状》	2024	《计算机在人类行为中的应用》	色彩心理学在 UI 设计中的应用
Rider, R. M.	《色彩心理学与平面设计应用》	2010	—	色彩心理学在平面设计中的应用
Whitfield, T. 和 T. J. Wiltshire	《色彩心理学: 批判性综述》	1990	《遗传学、社会学和一般心理学专论》	色彩心理学批判性综述
刘海	《对广告设计中视觉冲击力的认识与思考》	2011	《大众文艺: 学术版》	广告设计中的视觉冲击力
柳林和李娜	《商品广告设计中的色彩视觉效果研究》	2006	《商业研究》	商品广告设计中的色彩应用

2.3 文献分析与综合

对整理后的文献进行深入分析,提取关键信息和观点,并综合归纳出色彩心理学在 UI 设计和广告学中的主要应用及其对视觉冲击力的影响。具体分析内容包括:色彩如何影响用户的心理和行为,以及在 UI 设计和广告学中的具体应用;色彩对比、色彩饱和度和色彩明度等手法如何增强广告的视觉效果和吸引力;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对色彩的感知和情感反应的差异及其在设计中的应用;色彩心理学如何为广告效果的评估提供理论支持;色彩心理学在 UI 设计中的实践应用及其对用户体验和界面可用性的影响。通过文献

分析, 总结出色彩心理学在 UI 设计和广告学中的重要作用和应用策略, 并提出相应的建议和未来研究方向。

三. 研究结果

3.1 色彩心理学在 UI 设计与广告学中的应用

色彩心理学在 UI 设计和广告学中都扮演着重要角色。研究表明, 色彩可以影响用户的心理和行为, 从而影响广告效果和用户体验。例如, Elliot 和 Maier (2014) 指出, 红色可以增加用户的注意力和唤醒水平, 而蓝色则具有镇静作用(Elliott & Maier, 2014)。在 UI 设计中, 色彩的选择和搭配可以影响用户对界面的感知和使用体验。在广告学中, 色彩可以用来吸引用户的注意力, 传达品牌信息和情感, 从而提高广告的视觉冲击力和效果。

3.2 色彩与视觉冲击力的关系

色彩是创造视觉冲击力的重要元素之一。通过运用色彩对比、色彩饱和度和色彩明度等手法, 可以增强广告的视觉效果和吸引力。例如, Liang 和 Hangeldiyeva (2024) 研究了传统装饰图案中的色彩如何优化儿童产品设计的色彩方案, 发现色彩对比和色彩组合可以增强产品的视觉冲击力(Liang & Hangeldiyeva, 2024)。在 UI 设计中, 色彩的运用也可以增强界面的视觉层次和信息传达效果, 从而提高用户体验。

3.3 文化与色彩心理学的融合

文化背景对色彩心理学的影响不容忽视。不同文化背景下, 人们对色彩的感知和情感反应可能存在差异。例如, Maghraby 等人 (2024) 研究了色彩心理学对品牌形象的影响, 发现色彩在不同文化中的象征意义和情感联想可能不同(Maghraby, Elhag, Romeh, Elhawary, & Hassabo, 2024)。在 UI 设计和广告学中, 考虑文化因素可以更好地满足不同用户群体的需求和偏好, 从而提高设计的效果和影响力。

3.4 色彩心理学与广告效果的评估

色彩心理学可以为广告效果的评估提供理论支持。通过对色彩心理学的研究, 可以更好地理解色彩对用户心理和行为的影响, 从而制定更有效的广告策略。例如, Nissen 等人 (2024) 通过神经影像学研究发现, 色彩和按钮形状可以显著影响用户的感知和行为(Nissen, Riedl, & Schütte, 2024)。在广告效果评估中, 可以运用色彩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 评估色彩对广告效果的影响, 从而优化广告设计和投放策略。

3.5 色彩心理学在 UI 设计中的实践应用

在 UI 设计中, 色彩心理学的应用可以提高用户体验和界面的可用性。例如, Rider (2010) 讨论了色彩心理学在平面设计中的应用, 强调了色彩在创造视觉吸引力和传达意义方面的重要性(Rider, 2010)。在 UI 设计中, 可以运用色彩心理学的原理, 选择合适的色彩方案, 优化界面的视觉效果和信息传达, 从而提高用户的满意度和忠诚度。

四. 结论和建议

本研究通过文献分析法, 深入探讨了色彩心理学在 UI 设计和广告学中的应用及其对视觉冲击力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 色彩心理学在 UI 设计和广告学中都具有重要作用。色彩不仅能够影响用户的心理和行为, 还能够增强广告的视觉冲击力和效果。例如, 红色可以增加用户的注意力和唤醒水平, 而蓝色则具有镇静作用。在 UI 设计中, 色彩的选择和搭配可以影响用户对界面的感知和使用体验。在广告学中, 色彩可以用来吸引用户的注意力, 传达品牌信息和情感, 从而提高广告的视觉冲击力和效果。此外, 文化背景对色彩心理学的影响也不容忽视, 不同文化背景下, 人们对色彩的感知和情感反应可能存在差异。在 UI 设计和广告学中, 考虑文化因素可以更好地满足不同用户群体的需求和偏好, 从而提高设计的效果和影响力。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 本研究提出以下建议。对于设计师而言, 应深入研究色彩心理学, 了解不同色彩对用户心理和行为的影响, 从而在设计中选择合适的色彩方案。同时, 设计师还应考虑文化差异, 在设计中根据不同文化背景选择合适的色彩, 以更好地满足不同用户群体的需求和偏好。此外, 设计师可以通过运用色彩对比、色彩饱和度和色彩明度等手法, 增强设计的视觉冲击力, 吸引用户的注意力。在 UI 设计中, 色彩心理学的应用可以提高用户体验和界面的可用性, 设计师应通过选择合适的色彩方案, 优化界面的视觉效果和信息传达, 从而提高用户的满意度和忠诚度。

尽管本研究通过文献分析法对色彩心理学在 UI 设计和广告学中的应用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探讨，但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例如，研究缺乏实证数据的支持，未来研究可以通过实验研究和用户调查等方法，进一步验证色彩心理学在 UI 设计和广告学中的应用效果。同时，未来研究还可以进一步探索色彩心理学在不同领域和情境下的应用，如移动应用设计、虚拟现实设计等。此外，结合心理学、设计学、市场营销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方法，深入探讨色彩心理学与广告学的交叉领域，为设计实践提供更多的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同时，研究新技术（如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在色彩心理学和广告学中的应用，探索如何利用新技术提高设计的效率和效果，也将是未来研究的重要方向。

参考文献：

- [1] Elliot, A. J., & Maier, M. A. (2014). Color psychology: Effects of perceiving color on psychological functioning in humans.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65(1), 95-120.
- [2] Liang, L. L., & Hangeldiyeva, N. (2024). Harmonizing culture and consumer psychology: optimizing color schemes for children's product design inspired by traditional ornaments. *BMC psychology*, 12(1), 161.
- [3] Maghraby, T. M., Elhag, A. E., Romeh, R. M., Elhawary, D. M., & Hassabo, A. G. (2024). The psychology of color and its effect on branding. *Journal of Textiles, Coloration and Polymer Science*, 21(2), 355-362.
- [4] Nissen, A., Riedl, R., & Schütte, R. (2024). Users' reactions to website designs: A neuroimaging study based on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with a focus on color and button shape.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155, 108168.
- [5] Rider, R. M. (2010). Color psychology and graphic design applications.
- [1] Whitfield, T., & Wiltshire, T. J. (1990). Color psychology: a critical review. *Genetic, social, and general psychology monographs*, 116(4), 385-411.
- [6] 刘海. (2011). 对广告设计中视觉冲击力的认识与思考. 大众文艺: 学术版(15), 63-64.
- [7] 柳林, & 李娜. (2006). 商品广告设计中的色彩视觉效果研究. 商业研究(18), 208-210.

The Study of Color Psychology in UI Design and the Visual Impact of Advertising

Cuyi Cao¹

¹ College of New Media and Art, Dongguan City University, Dongguan, China

Abstract: This study, through the method of literature analysis, delves into the application of color psychology in UI design and advertising, as well as its impact on visual appeal.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color psychology plays a pivotal role in both UI design and advertising. Colors have the power to influence users' mental processes and behaviors and can also amplify the visual impact and effectiveness of advertisements. For instance, red can heighten users' attention and arousal levels, while blue exerts a calming effect. In UI design, the selection and combination of colors can shape users' perception of the interface and their overall experience. In advertising, colors can be strategically used to capture users' attention, convey brand messages and emotions, thereby enhancing the visual impact and effectiveness of advertisements. Moreover, the influence of cultural background on color psychology cannot be overlooked. Under different cultural contexts, people's perception of colors and their emotional responses may vary. In UI design and advertising, considering cultural factors can better meet the needs and preferences of diverse user groups, thus improving the effectiveness and influence of the design. Based on the research conclusions, this study offers several suggestions, including that designers should conduct in-depth research on color psychology, take cultural differences into account, and employ techniques such as color contrast to enhance the visual impact of the design, and improve user experience and interface usability.

Keywords: UI design; color psychology; advertising; visual impact; user experience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2.521

社会建构理论视角下的性别批判：以《夜宿荒宅》为中心

孔枳薪¹(¹东南大学，江苏 南京 211102)

摘要：《雨月物语》改编自中国作家瞿佑的《剪灯新话》等作品，创作于1768年，是日本的江户时代怪谈文学的代表作，因其怪诞离奇的超自然叙事吸引了大量读者。既有研究多聚焦于文学审美分析与历史源流考证，对文本蕴含的性别维度鲜有深入探讨，也缺乏基于社会建构主义理论框架的系统性阐释。因此本研究聚焦《雨月物语》中的《夜宿荒宅》故事文本，通过剖析上田秋成塑造的女主人公宫木的亡灵形象，揭示其作为封建制度下受压迫女性的符号表征意义。同时，结合社会建构主义与女性主义理论，着重论证父权制度如何通过性别角色的文化建构将女性禁锢于结构性困境之中，进而形成对当代社会性别权力关系的批判性省思。

关键词：幽灵；性别；社会建构理论；女性主义理论

一、引言

《雨月物语》是江户时代作家上田秋成的代表作品，由九则志怪短篇构成。该作品为中国作品的改编之作，同时江户时期儒家思想仍旧盛行，因此《雨月物语》中不免流露出“男尊女卑”的封建儒家思想。上田秋成不仅通过精微的心理描摹展现人物精神世界，更深刻反映了女性在婚姻关系与家庭场域中的生存困境。

《夜宿荒宅》便是凸显这一点的经典作品。故事讲述战后丈夫胜四郎返乡发现夫妻二人天各一方，妻子宫木已化为亡灵苦苦守候着丈夫的悲剧。作品塑造了一个婚姻中即便是去世了也留在原地苦苦等候丈夫的“等待的女人”、“忠贞的妻子”的形象^[1]。本研究旨在解构该文本中宫木形象的多重隐喻，揭示秋成对封建婚姻制度与女性社会地位的批判策略，进而探讨这种文学批判对当代性别不平等问题的启示价值，最终阐明《雨月物语》性别书写的现代性意义。

二、作品背景

作者上田秋成的作品在承袭中国古典文学精髓的基础上，融合了日本民间传说与独特叙事风格，形成兼具汉学素养与日本本土意识的审美特质。其作品超越表层叙事，通过精密的空间建构，深刻揭示人性多维面相与社会结构性矛盾。《雨月物语》作为其代表作，由九则志怪短篇构成，其中《夜宿荒宅》以亡灵叙事为媒介，通过女主人公宫木在孤寂守望中化为亡灵的故事情节，构建起对人性困境、社会不公及婚姻制度下女性生存境遇的三重批判空间。

《夜宿荒宅》以幽灵叙事载体，对封建制度中的性别权力关系进行解构性书写，是植根于对江户时代社会现实的深层观照。这种将怪谈叙事与社会批判相结合的双重编码策略，既强化了作品的文学张力，亦为解构江户女性命运提供了独特的阐释路径。《夜宿荒宅》通过超现实与现世性的叙事融合，具象化呈现

[作者简介]

孔枳薪（2001—），女，吉林人，东南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日本文学、日本民俗。

个体情感与社会环境间的复杂的互文关系，在日本文学史与社会批判维度均具有范式意义。

三、古典文法与描写技法论析

(一) 助动词的功能分析

表1 对《夜宿荒宅》中的助动词的分析

助动词	古典日语原文	现代日语翻译	中文翻译	解析
ぬ	古里に捨てし人の消息をだに知らで、萱草生ひぬる野辺に、長々しき年月を過ごしけるは、信なきおのが心なりけるものを。	故郷に置き去りにした人の安否さえ知らず、萱草の生えた野辺で、長い年月を過ごしてしまったのは、自分の誠実さのない心のせいであったのに。	故里音沉萱草深，荒年独销野蒿尘。无信方知身是客，残碑风裂证前因。	助动词「ぬ」的完成态「ぬる」将野草生长定格为静止画面。对比着人物「捨てし人の消息をだに知らで」的漂泊无依。「生ひぬる」的完成态使得“自然繁荣”与“人世荒废”、“颠沛流离”形成强烈反差。同时，「ぬる」作为野草生长周期完结的标志，体现着自然的“春生秋枯，周而复始”的循环。与随后「長々しき年月を過ごしける」这一感叹时间流逝（人）却无归属的句子形成对比，凸显出孤寂感和无力感。
けり	人の心も、今や一劫の尽くるならんと、はかなき限りを悲しみける。	今は人間の住むこの世も尽きるのであろうかと、はかない運命を嘆き悲しみんだ。	人皆哀叹世事无常，恍若劫波将尽时。	「けり」具有双重功能。既作为过去助动词表动作完成（对应现代日语「た」），又通过咏叹语气（ <i>exclamatory tone</i> ）赋予文本抒情特质。在时间维度确立叙事距离的同时，在情感维度构建出集体悲叹的共时性场域。
たり	有明月の白みて残りたるも見ゆ。	有明の月が白っぽくなつて空に残つているのも見える。	但见残月泛白悬中天。	「たり」通过其存续态「たる」构建出月光残留的永恒化意象。语法形式角度来看，「残りたる」不仅对应现代日语「ている」的持续状态，更通过时空压缩将视觉现象固化为文学意境。与视觉动词「見ゆ」的结合不仅在语法层面确立月光存在的客观性，还在审美层面则折射出秋成对无常世界的静观姿态，形成了双重认知机制。
べし	たとへ、泉下の人となりて、ありつる世	たとえ、（妻が）死んで、この世にいな	纵化黄泉客，不复现世身，犹当循旧迹，	「べけれ」为「べし」的已然形。此处试图表达伦理义

にはあらずとも、そ いとしても、その亡 筑坟寄幽魂。
の跡をも求めて、塚 き跡を探して、墓を
をも築くべけれ。 築こう。

务的必然性。通过「泉下」(冥界)与「世」(现世)的二元对立结构,「築くべし」所反映的强制性既反映江户期儒教伦理对祭祀行为的绝对要求,又透露出叙事者对现世责任的叩问。使文本同时承载社会规训与哲学思辨的双重功能。^[2]

(二) 环境描写与心理投射分析

1、情景交融

古典日语原文:

「日ははや西に沈みて、雨雲は落ちかかるばかりに暗けれど…」

中文翻译:

日落西山，雨云低垂锁暮色。

解析:

此处的落日与雨云构成双重衰变意象系统。日落西山所展现的视觉明度衰减过程,隐喻主人公希望体系的崩解。低压雨云则借助空间压迫感,象征着不祥预兆。「沈みて」(落下)、「暗けれど」(变暗)等描述自然现象的词汇所展现的时间性演变为心理时态的具象化表达,使环境描写突破表层景物再现功能,转化为人物内心空间的投影。这种将物理时间与心理时间进行意象叠印的手法,既继承《源氏物语》“物哀”的抒情传统,又通过“日落”、“云层沉降”等动态化场景强化了叙事进程中绝望情绪的累积效应。

2、拟人

古典日语原文:

「松風をすすりて、夜もすがら涼しきに…」

中文翻译:

啜饮松风，清宵透夜生凉意。

解析:

“啜饮松风”中“啜”一词的拟人化表述构建出通感。听觉层面的风声被转化为具有吞咽动作的味觉体验,这种感官错位映射出人物内心难以言说的悲怆密度。夜凉意象与松风声响共同加深“冷”的体感,物理层面的温度下降与情感层面的温度失却形成隐喻性同构。该修辞策略通过将自然元素转化为情感载体,强化了环境氛围使读者沉浸体验,并外化了人物潜意识层面的精神颤栗。使环境要素突破背景性存在,成为故事叙述的推手之一。

四、幽灵形象所蕴含的性别压迫

《夜宿荒宅》中宫木的幽灵形象是故事的核心。通过宫木的超自然形象,揭示了封建社会女性在婚姻家庭中的附属、弱势处境,以及人性中复杂的欲望与情感矛盾。

(一) 环境描写与心理映像的互文

正如上文所述,宫木的幽灵形象与文本环境描写形成深度互文关系。其徘徊的荒废宅邸不仅是物理空间的存在,更是主人公绝望感与心理状况的投射。上田秋成通过朽坏的家屋结构、蔓生的荒草等精细的环境刻画,使空间荒凉度与人物心理创伤形成同频共振。这种环境和心理的镜像关系,既强化了幽灵形象的真实性,也构建出封建婚姻制度对女性精神空间的侵蚀。

(二) 封建婚姻制度下的女性困境

宫木的幽灵象征着封建制度对女性的系统性压迫，使得封建社会中女性的孤独与无力感得以具象化传达。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她仍对丈夫保持忠贞，最终在死后仍徘徊于荒宅的命运，不仅是个体悲剧，更是当时女性普遍处境的缩影。正如中村（1986）所指出的，宫木揭露了女性在家族结构与社会制度中的边缘化境遇。¹³这种幽灵化的生存状态，实质是对婚姻制度中女性主体性被抹消的控诉。

(三) 欲望困境的幽灵化表达

宫木幽灵形象不仅承载社会批判，更通过超自然叙事展现人性欲望的复杂性。她在生前因长期孤独与执念逐渐被内心欲望吞噬，最终跨越现实与超自然的界限。这种转化过程，隐喻着人类在欲望与现实矛盾中的精神困境。¹⁴

作为幽灵，宫木既保持着对丈夫的忠贞，又困锁于未获解脱的执念。这种死后仍被束缚的状态，折射出生前未能实现的情感诉求，成为面对命运时的无力感与孤立感的象征。作者上田秋成借此深刻揭示了欲望驱动下的人类痛苦与挣扎，强化了故事的悲剧性内核。

五、社会建构与性别批判的现代启示

(一) 从社会建构论视角分析

依据社会建构论理论，性别角色并非生物性决定，而是社会文化共同建构的产物。社会通过语言规训、教育体制与媒体传播，将特定性别认知自然化，使其作为“常识”被人们所内化接受。这个过程不仅塑造了性别认同，更试图通过制度性去固化性别分工体系。

宫木的幽灵形象可视为是封建社会对性别角色的期待的具象化载体。其对婚姻的忠贞、对丈夫的漫长等待与自我牺牲，实则体现了江户时代通过婚俗制度将女性定位为“顺从的一方”的社会分工。宫木化作幽灵后仍持续地等待着，展现了江户时期女性面临着“即便在生物性死亡后，社会性身份依然禁锢着女性”的困境。

从社会建构论的视角审视，宫木的幽灵形象实为对性别建构机制的沉默抗议。其跨越生死的等待姿态，揭露了社会制度对女性主体性的剥夺，使她们沦为被动承受者而非自主行动者。这种文学呈现为解构传统性别角色提供了历史注脚，同时也为当代性别政治研究保存了珍贵的文化样本。

(二) 从女性主义理论视角分析

引入女性主义理论框架，可进一步揭示宫木故事中社会建构如何维系父权制结构。西蒙·德·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指出，女性被建构为“他者”，其社会角色由男性中心主义体系所规定。宫木的悲剧正是这种父权制的产物，她的忠贞与牺牲实质是维持男性权力而强加的社会义务。

在此分析框架下，宫木的幽灵形象具有双重象征意义。宫木既是个体命运的具象化，也是对父权社会的无声控诉。其忠诚未获回报、牺牲未得解脱的处境，深刻揭示了婚姻制度作为性别压迫工具的本质。这种借助文学作品的跨时空交互，使《夜宿荒宅》成为解构传统性别权力关系的典型案例。

(三) 现代社会的批判性分析

尽管全球性别平等进程持续推进，但难以否认结构性不平等仍顽固存在。根据联合国妇女署 2024 年公布的报告显示，全球女性担任管理职位比例仅为 28%。¹⁵国际劳工组织在 2024 年公布的全球工资报告显示，女性时薪普遍低于男性。¹⁶

在中国语境下，智联招聘 2023 年公布的《中国女性职场现状调查报告》表明，女性遭遇过职场不公的占比高达 9 成以上，接近职场男性的 2 倍。¹⁷这些数据表明，制度性保障与文化惯性间的张力仍是性别平等的主要障碍。

通过社会建构论与女性主义理论的双重视角，《夜宿荒宅》的现代性价值得以彰显。宫木的故事不仅揭示性别角色建构对个体命运的操控机制，更为理解当代性别不平等提供了历史参照。这种跨时代对话启示我们，解构文化惯性是推进性别平等的重要因素，只有这样，最终才会实现波伏娃所言的“成为自我而非他者”的主体性建构。

六、结语

《雨月物语》不仅是文学作品，更包含着对当时社会现象的深刻批判。《夜宿荒宅》的细腻描写与巧妙的情节设计，深入揭示了江户时代下婚姻制度中女性所面临的困境，与社会施加于女性的压迫。这种批判性不仅深化了作品的文学价值，更赋予《雨月物语》重要的社会意义。对这些故事的深入研究，既能增进对江户时代社会文化的理解，也可为反思当代性别问题提供历史参照，进而促进性别平等与社会进步。

参考文献：

- [1] 张杜娟.日本古典文学中“等待的女人”——以《浅茅之宿》（《夜宿荒宅》）为中心[J].世界文艺, 2014.
- [2] 孙成冈, 李先瑞.日语专业八级考试 文语法文学文化篇[M]大连: 大连理工出版社, 2014:10-54.
- [3] 中村正市.「浅茅が宿」断簡--宮木の「心ばへも愚ならず」について[J].文学研究, 1986,(63):30-37.
- [4] 赵鑫.《雨月物语》中上田秋成的女性观——以三位女主人公为考察对象[J].青年文学家,2017,(35):86.
- [5] UN Women.Caring Societies,Inclusive and Green Economies in Asia and the Pacific[EB/OL].[2025-02-20].<https://mp.weixin.qq.com/s/42zRaanDDZp8pWv8FolXdg>.
- [6] ILO.Global Wage Report 2024-2025[EB/OL].[2025-02-21].<https://ifwea.org/resource/global-wage-report-2024-2025/>.
- [7] 智联招聘.2023 中国女性职场现状调查报告[EB/OL].[2025-2-21].<https://oss.godar.cn/domain/bjyuanzhong/246405/2023/03/20/crHnBarjBK.pdf>.

Gender Critiqu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Constructivism:

A Focus on Night Lodging in a Haunted House

Kong Zhiqi¹

¹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 Southeast University, Nanjing, China

Abstract: *Tales of Moonlight and Rain* (*Ugetsu Monogatari*), adapted from Chinese literary works such as Qu You's *New Tales from the Trimming Lamp* (*Jiandeng Xinhua*), was composed in 1768 as a representative masterpiece of supernatural literature during Japan's Edo period. Its grotesque and fantastical supernatural narratives have captivated numerous readers and inspired extensive scholarly research. While previous studies have predominantly focused on literary aesthetic analysis and historical textual research, few have delved deeply into the gender dimensions embedded within the texts, nor provided systematic interpretation grounded in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social constructivism. This study centers on the story *Night Lodging in a Haunted House* from *Tales of Moonlight and Rain*, analyzing the spectral figure of the heroine Miyaki crafted by Ueda Akinari to unveil her symbolic significance as an oppressed woman under feudal patriarchy. Furthermore, employing social constructivist theories and feminist theories, this paper critically examines how patriarchal systems confined women to structural predicaments through the 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gender roles, thereby offering critical reflection on contemporary gender power dynamics.

Keywords: Ghost; Gender; Social Constructivism Theory; Feminist Theory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2.533

悲欢离合的记忆建构——

文化记忆理论视角下肖水的小说诗集《两日晴，郁达夫》研究

白一祎¹

(¹ 中央民族大学，北京 100081)

摘要：随着文化记忆理论研究的拓展，从文化记忆理论的视角对文学文本的研究也逐渐展开。以肖水的小说诗集《两日晴，郁达夫》为文本对象，采用文化记忆理论框架的形成、发展及在文学领域的应用，可以有效分析肖水《两日晴，郁达夫》作品中个体记忆、文化记忆的作用和表现媒介。同时，在探讨这些媒介及其记忆建构的同时，应用文化记忆理论作为研究手段，不仅丰富了文学作品的内涵，还为理解个体与社会、与空间等之间的互动提供了新的视角。除此之外，研究还拓展了文化记忆理论的应用范围，为文学研究提供了跨学科的理论支持，并为文化记忆的本土化研究与创新提供了实践可能性，也让我们看到一位当代作家除了美学建构之外的悲欢离合的记忆建构、情感建构。

关键词：文化记忆理论；肖水《两日晴，郁达夫》；个体记忆；文化记忆

当代诗人肖水（原名黄潇）于2021年出版的绝句小说诗集《两日晴，郁达夫》被划分为三个独特的部分：短篇叙事诗、系列组诗和长篇叙事诗，各部分都展现了不同的艺术风格，并以其独特的文体实验与记忆书写在当代诗坛中占据重要地位。在《两日晴，郁达夫》一书中，肖水汲取了中国古代绝句的灵感，尝试在有限的四行诗中描绘出广阔的生活图景和深邃的精神空间。而在长篇叙事诗部分，则巧妙地将诗歌的含蓄与精炼与小说的复杂情节和跌宕起伏相结合。肖水以个人的生活体验为基础，融合了日常生活中的细微之处，以及日常生活中情感的波动和诗意的闪现，更重要的是，他以精炼的语言和充裕的抒情美学建构了数量庞大的记忆场域，在这些被肖水建构起来记忆场域中，人物、事件、情节和环境在历史和社会中经由文学媒介共同构成了一个个充满悲欢离合的记忆，交际、记忆和媒介三者之间存在着随时间演变的相互关系^[1]得以充分体现。得益于20世纪兴起的文化记忆理论及其相关研究，我们得以更深入地探讨肖水如何通过其作品《两日晴，郁达夫》在文化记忆的框架内构建记忆，并以此为契机挖掘文化记忆理论对于文学研究的重要价值。从理论层面来看，肖水将传统绝句的凝练性与现代叙事的开放性结合，为文化记忆的文学表达提供了新的范式：既保留诗歌的抒情内核，又通过叙事拓展记忆的时空维度。从在现实层面来看，这部作品对记忆的书写直指当代社会的文化困境：在信息爆炸与记忆碎片化的时代，个体如何通过文学重构连贯的意义？《两日晴，郁达夫》的实践提示了一种可能性——以诗性语言对抗遗忘，在文本中重建记忆的连续性与情感的真实性。这种探索不仅为文学研究提供了新路径，也为理解当代人的精神境遇提供了独特的参照。

从文化记忆的视角切入《两日晴，郁达夫》的研究，源于该文本中鲜明的记忆建构特质。文化记忆理论关注集体记忆如何通过媒介被保存、传递与重构，而《两日晴，郁达夫》恰恰通过语言与形式的创新，将个体的生命经验转化为具有公共性的文化记忆载体。作品中反复出现的意象、人物故事、经历的碎片化再现，以及现代都市的疏离感描写，均非单纯的个人回忆，而是通过文学手法将记忆抽象为一种文化符号，

使读者在阅读中激活对共同生活经验的共鸣。这种记忆的“媒介化”过程，不仅揭示了文学作为记忆载体的功能，也展现了诗歌如何通过美学形式参与文化记忆的再生产。

一、文化记忆理论内涵与历史革沿

20世纪以降的社会研究随着实证主义的兴起，被原本属于心理学研究范畴的记忆（Memorial）渗透，产生出不同维度的记忆理论研究，并随着研究的转向和进一步发展，逐渐建构起文化记忆理论。

早期对社会心理学维度上的记忆理论研究的先驱之一弗雷德里克·巴特莱特（Frederic Charles Bartlett）的相关研究更贴近真实生活情境下的记忆机制，深入分析了记忆如何在个体中形成、存储和再现，为社会心理维度的文化记忆理论提供记忆的分析基础。而将集体情感上升成为社会情感层面研究的埃米尔·涂尔干（Émile Durkheim）则取得了超越了柏格森对记忆的主观化理解，为将记忆视为一种社会现象提供了理论基础^{[2]25}的成果。作为涂尔干和巴特莱特的传承者的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结合上述二者的相关研究提出了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2]理论，集体记忆理论的出现说明了记忆是社会交往和社会互动的核心组成部分，并且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这也成为文化记忆理论的最重要的理论来源之一。

20世纪后期，西方记忆理论经历了文化学转向，研究重点逐渐从个体记忆扩展到文化记忆，并且研究倾向逐渐转向探讨如何在世代交替和历史变迁中保持文化的相对一致性^{[2]20}，在社会心理学维度的记忆研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文化记忆理论成为学术界的一个热点领域。文化记忆理论不仅关注个体记忆的形成和再现，而且扩展到集体和文化层面，探讨记忆如何在社会和文化中被构建、传承和重塑。文化记忆理论的代表人物扬·阿斯曼（Jan Assmann）以及阿莱达·阿斯曼（Aleida Assmann）提出的文化记忆理论对哈布瓦赫的理论进行了深化，将其细分为交往记忆和文化记忆两个主要内容，从《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记忆和政治身份》、《记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两本著作中，可以看出阿斯曼夫妇文化记忆理论与诺拉的记忆场理论具有明显区别。阿斯曼夫妇的理论更强调文化记忆与记忆场概念之间的相互联系^[3]的记忆理论，这一重要理论标志着记忆不再仅仅是个体的私有财产被纳入研究，而是成为了一种社会和文化现象，它在个体与集体之间流动的同时被不断地重新解释和赋予新的意义。

二、文学文本作为文化记忆的研究对象

（一）文学研究进入文化记忆视域的理论建构

20世纪末期，特别是进入21世纪，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所提出的“媒介革命”正在逐渐改变传统社会结构^[1]。德国学者阿斯特里特·埃尔（Astrid Erll）以及她的后续研究者显然已经注意到这一问题，这也意味着文化记忆的研究范围需要得到进一步拓宽，文学文本得以进入文化记忆的研究视野，记忆研究之所以能够为文学和电影领域带来新的探索路径，是因为它促使研究者将文本视为记忆的载体，从而为文本赋予了新的意义和研究视角^[4]，这也与阿斯曼文化记忆的相关阐释进行某种程度上的呼应：“黑色墨水笔书写的文字痕迹无疑将是一座更持久的纪念碑”^[5]。因此，文学文本作为文化记忆的研究对象具有独特意义，因为文学作品通过直观和生动的表现形式，传达社会价值观、审美倾向，以及那些被遗忘的诸多事物。它们不仅能够解构或重塑现有的文化记忆，还能修正价值观念、历史人物的形象，或是改变社会群体成员对自我和他者的认知^[6]。

当然，文学文本进入到文化记忆的研究对象的场域中并非简单的进入，而是涉及记忆与文学这一对复杂关系及其众多相关问题的处理过程。20世纪两次“记忆潮”^[7]的推动之下，记忆研究已经不再仅仅是关乎一个学科领域内的研究，文学文本的进入已经在取得了合理性的阐释基础的同时需要更加深入的阐释空间，阿斯特里特·埃尔（Astrid Erll）的相关研究回应了文学文本的进入以及这一阐释空间的拓展，并且关注到文学在记忆研究中扮演多重角色，其既作为文化记忆的一部分，又作为记忆的文学，涉及文学与艺术的互文性和文本间性。同时，文化记忆需要关注文学经典的形成与历史化，表现文学中的记忆美学形式，文学作为文化记忆的活跃媒介，影响着集体记忆的构建和传承，要使文学成为文化记忆的媒介，它必须满足三个条件：首先，文学要能够存储信息；其次，文学要能够传播信息；最后，文学要在记忆文化中起到暗示的作用^[1]。当文学作品被用作媒介，并通过文化记忆的处理，甚至融入到文化记忆之中时，它们将以文学的形式呈现某些记忆中的事件^[8]。

（二）作为文化记忆媒介的文学文本书写

结合以上的阐述，可以有较为充分的理由认为，将文化记忆的视角纳入文学研究，对于文化记忆边界

的拓展和对基础理论的深入思考具有重要意义。陶东风指出，文学研究与记忆的关系既是理论探讨的路径，也是解释和论述的框架。文化记忆理论重塑了学术研究的视角，深化了对时间与空间中个体和集体关系的理解，并在自我认同受挑战时提供了一种对抗虚无化的途径。文学与文化记忆紧密相连，文学中的记忆书写不仅构建叙事，也反映了作者的生命体验，成为记忆表现的重要领域。随着文化记忆的本土化的进一步推进，研究视野也呈现“一般层面的‘文学记忆’理论却因此多少受到忽视”^[9]的趋势。因此在处理本土化的文化记忆和文学文本的相关研究时很重要的一点需要注意：“文学中的记忆”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拓展研究视角的尝试。对文学中记忆的类型、层次和功能进行分析，不仅为文学文本分析提供了新的观察视角，也为“记忆表现”的研究提供了一个较为全面且贴近的参考^[9]。肖水《两日晴，郁达夫》通过对人物经历、情感体验以及社会环境的细致描绘，构建了一个多层次的记忆场域。作品中的记忆不仅涉及个人的成长经历和情感历程，还反映了一定的社会文化氛围。通过文化记忆理论对《两日晴，郁达夫》中建构起来的记忆场域进行深入的研究，挖掘文学研究中跨学科研究方法的价值所在。

三、《两日晴，郁达夫》中的个体记忆建构

作为阿斯曼文化记忆中非常重要的交往记忆 (Communicative Memory) 具有明显的个体记忆 (Individual Memory) 倾向，阿斯曼认为：交往记忆存在于人与人之间，它源自于人们的互动，情感在其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爱情、兴趣、同情、依存感、归属感，以及憎恨、敌视、猜疑、痛苦、罪过和羞耻——所有这些情感都参与了记忆的界定，并为记忆的范围提供了界定^[10]，可见，交往记忆是一种在人际互动中形成的记忆形式，它根植于人们之间的交流和情感联系之中。这种记忆不仅仅是信息的传递，更是情感共鸣的产物。它涉及一系列复杂的情感，肖水的《两日晴，郁达夫》构建的种种复杂的记忆正是充满悲欢离合的、复杂的。皮埃尔·诺拉 (Pierre Nora) 也有很多有关记忆的表述，他认为，因为记忆本身已经变得稀缺，所以人们频繁地提及记忆^[11]，这表明了记忆在社会发展中脆弱性的一面，同时也从某种程度上说明了文学文本作为文化记忆媒介的重要性，这些情感共鸣的产物——记忆在社会和个人的互动中被重塑和组合，并被文学文本记录下来，于是，文学文本就提供了一种无形的记忆载体，用于保存和重塑遥远的回忆^[12]。

肖水的小说诗集《两日晴，郁达夫》伴随肖水的生活体验和观察视角完成了这些个体记忆的建构，从湖南的乡村到山西的大学，再到毕业之后去到上海，这些伴随肖水经历的记忆，无论是自身的体验，还是小说诗中出现的人物及相关的记忆，都在完成着记忆的储存，以及社会、历史与个体互动的再现。虽然肖水的《两日晴，郁达夫》被界定为绝句小说诗，但侧重点仍在小说，其叙事方式更偏向小说那样的完整叙事，而非单纯的诗歌。雷武铃 (2022) 也认为《两日晴，郁达夫》包含了男女主人公、时空背景、情节、细节等各种叙述要素，事件逻辑清晰明确，语义理解上没有含混的存在^[13]，这种完整的叙事载体也给记忆的储存提供了较为宽阔且具备可延伸的空间场域。同时，作为文化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个体记忆在《两日晴，郁达夫》中的三辑中得到充分的体现，成为文化记忆理论研究视角下《两日晴，郁达夫》的一个出发点和观察视角。

(一) 山海之间的记忆场域：《两日晴，郁达夫》中的回忆空间

“我在午夜的雪地里，贴着山西大学的围墙转着圈，思考着如何走出去，也同样思考着如何在这四年不误入歧途。我很不快乐。其实对自己的怀疑一直平息不下来。在法学院，无论是在上海还是太原，你要以诗人的面目出现，其实很容易变成娱乐事件”^[14]，这是肖水在山西大学就读时的感悟。的确如此，湖南，山西，上海等很多城市、地区将肖水的《两日晴，郁达夫》中大多数的小说诗带入这些记忆发生的场域中。这些地点在这本小说诗集中是有用的，它们承载着大量的个体记忆，在《两日晴，郁达夫》中，肖水把它们整合起来，形成了诸如《上海故事集》、《南岭故事集》、《江东故事集》、《太原故事集》、《渤海故事集》的记忆场域的集合。这些回忆空间和记忆场域中，充斥着大量的他我记忆 (Allocentric Memory)，与之相比的自我记忆 (Autobiographical Memory) 则少了很多，按照阿斯曼提出的自我记忆是基于有意识的重建过程形成的，而他我记忆则是在意识形成之前，由于缺乏组织而无法被系统整理。自我记忆是在与重要事件的互动中逐渐构建的，而他我记忆则是在与特定地点和物品的接触中被激发出来^[15]的阐释路径出发，这一论述较为明确地阐释了他我记忆与回忆空间、记忆场域的关系，不难发现在《两日晴，郁达夫》中，他我记忆的存在将肖水曾经处于的空间以及那个空间所发生记忆片段编织起来，而且在《两日晴，郁达夫》中的叙事中，叙事的主体主要是“他”或者“她”，很少有内聚焦 (Internal Focalization) 形式的“我”的出现，他我记忆更加强化了记忆场域、回忆空间的联系，尽管这些空间并非固定的，但不影响其成为作家通过叙述童年生活、家庭成员、朋友以及周围人物的经历，构建的一个重要的叙事空间^[12]。这样的空间比比

皆是，成为了悲欢离合的情感寄托，可以是《湘粤古道》中“八岁那年清明，父亲独自回老家扫墓，他扒住车门，大哭不止”^[16]的愁绪，也可以是《骆氏宗祠》中“人们才知她肚子里有了他。彼时武生正空翻，锣声清脆、鼓声咚咚”^[16]的新生喜悦。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古道”、“宗祠”或者很多在《两日晴，郁达夫》里提及的地点或许只是普通的地点，但当这些地点发生的事情被回忆、被文学文本这种媒介所关注到时，这些看似普通的地点就已经成为对事件全过程中的环境细节特征有着深刻的记忆，能够捕捉到瞬间的心理活动，对日常细节表现出异常的心理关注，使人感受到事情背后隐藏的深层含义^[13]的存在，就成为了悲欢离合的记忆场域和回忆空间。

（二）森罗万象的记忆再现：《两日晴，郁达夫》中的人与物

对于一位以记忆为书写目标之一的作家而言，书写记忆的过程中人和物也是不可或缺的，尤其是当一个作家开始对他人的生活进行介入以谋求记忆的重现时。这些记忆的重现不一定是作家自身的记忆构成，为了再现某种情感表达时，他人的记忆与经历也可以建构成为文学文本，当讨论这些的记忆的属性时，借用保罗·德曼（Paul de Man）“作为内在凝思和经验保存”^[17]的观点，暂且可以将作者对他人记忆重构之后形成的记忆归类为内在化记忆（Erinnerung）。这种记忆理论扩充了保罗·康纳顿（Paul Connerton）有关个人记忆的阐释，即把个人的生活经历作为记忆对象的称为个人记忆，因为它们确定了个人的过往经历。人们在自我反思的过程中，通过回顾自己的生活史来了解自己过去的事和身份^[12]。

肖水的《两日晴，郁达夫》中的人与物也是个体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春日即事》、《野风娱人》等这些无名无姓的生命中或亲友或过客的记忆的建构，也有第二辑《故事集》中全是以人名为题的《南溪故事集》。和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在《序曲，或一位诗人心灵的成长》中对记忆的理解类似，肖水在整篇《南溪故事集》尽力通过生活中鲜活的人们的个体记忆再现，尽可能表达成为个人叙事重要组成的事件，以及这些在个人的历史中具有标志性事件的瞬间。这一点在《南溪故事集》里尤为突出，九个有名有姓的人们，他们的记忆被肖水的文本编织起来，有“栽进了高坡下的稻田”且有着“一堆痴呆儿女”^[16]81的《高亮明》，有“丈夫后来成了乡村一生，而她终于将儿女拉扯上大学”^[16]的《李启凤》，这些人们在各自不同的生活和人生境遇中形成各自不同的个体记忆，这些个体记忆同样也是充满悲欢离合的。在《南溪故事集》的标题下有一行解释小字“献给郴县南溪乡”^[16]，这些存在于作者故土中的人与物以及共同作用下产生的个体记忆已经成为超越个体记忆而存在的在一种注定的时间中徘徊^[13]的情感载体。

四、《两日晴，郁达夫》：个体记忆到文化记忆

如果抛开肖水对《两日晴，郁达夫》已有的分类，而是将《两日晴，郁达夫》中的《短篇》、《故事集》和《延长》当作一个整体进行考察，这个巨大的文本似乎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平台，换句话说，这个巨大的平台就是无处不在的社会生活场景，肖水期望所实现的“‘从中国回到中国’和‘在本土性之上建设汉语诗歌的现代性’的反思和延伸”^[18]正是《两日晴，郁达夫》这部作品与社会生活场景紧密相关的原因所在，也是对这部作品进入文化记忆讨论的基础。当充满悲欢离合的个体记忆被建构起来的同时，搭建这些悲欢离合的场景也自然而然地将对这些回忆的处理从个体记忆的研究视角引向文化记忆的研究之下。具体而言，《两日晴，郁达夫》中的叙事场景纷繁复杂，诗中出现了许多地点，包括地名、场所，如佛寺、街道、城市等，涵盖了杭州、武汉、海南、青岛、郴州、南京、北京、太原、三亚等，估计有上百个城市的名字。这些诗歌的内容也非常广泛，涉及了当代生活的方方面面，描绘了当代社会的各种场景^[13]，同时，在这些纷繁复杂的叙事场景建构之外，更重要的是诗中包含许多现代词汇，但这并不是对社会现实问题的批判，也不属于现代社会观念下对现实社会（包括个人精神和社会群体）问题的参与式探索，更不是对现实的批判性介入，而是一种美学上的构建^[13]。

当这些当代社会场景成为叙事场景时，文化记忆的书写痕迹也就明显地显现在《两日晴，郁达夫》中，同时，这些无论是时间、事件还是空间等的叙事场景将个体记忆的表现场域进一步拓展和延伸，触及到社会记忆、集体记忆的文化记忆视角。需要注意的是，《两日晴，郁达夫》文学文本虽然触及到文化记忆的研究范式，但讨论的文化记忆范式与阿斯曼的文化记忆理论有所不同，对《两日晴，郁达夫》文本的文化记忆处理一定是“区别于不同历史时期官方为维护意识形态话语的需要从上而下建立的回忆政策以及五四以来知识分子站在高处审视民间社会的文化立场”^[12]的。就《两日晴，郁达夫》而言，肖水的创作更加贴近人们的生活体验和社会生活场景，更像是一种“在一个社会中借助各种媒介保存、流传的记忆，一个大我群体社会经验的总合”^[19]的社会记忆。

(一) 《两日晴, 郁达夫》中当代社会人们的生活记忆

当代社会下, 电脑和互联网正在改变人们对空间的感知, 同时也对传统的书本文化产生了冲击^[20], 在《两日晴, 郁达夫》中, 互联网记录下的生活记忆在不断重现, 有加上微信后男女主人公心中的奔涌或怯懦的记忆, 有某位朋友毕业后看到六年前发的想去滑雪的微博, 有故人在文昌看到火箭发射时随手的朋友圈定位, 有在星巴克里看艺术杂志时看到男人喝剩咖啡的情景, 这些瞬间的情景所导致人们产生的情感也是充满悲欢离合的, 这些情景瞬间被组成了当代社会人们的生活记忆, 成为文化记忆的一环。去旅行, 发朋友圈、微信、微博, 去喝咖啡, 去搭一辆出租车……这仿佛成了当代社会人们的共有习惯, 甚至上升成为共同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 这些是从对过去的回忆和解释中剥离出来的^[20], 当这些共同的价值体系和行为准则在社会的运作和人与人交往的过程中逐渐被认可时, 通过这些方式, 社会成员获得了某种认同, 于是就形成了凝聚性结构, 这种凝聚性结构的意义在于, 它让所有成员对这一文化体系产生归属感和认同感, 从而定义了这个集体以及成员作为集体一员的身份, 而文化记忆正是这种凝聚性结构得以形成和维系的基础^[20]。回溯阿斯曼有关文化记忆的理论时, 可以发现阿斯曼的文化记忆具有文化层叙事的研究倾向: 文化记忆是一种集体记忆的形式, 由于大多数人都拥有并共享着相同的文化记忆, 这些记忆向他们传达和展示了他们的集体, 即文化身份^[21], 当代社会人们的生活记忆是丰富多彩的, 通过微信聊天(《自然光线》, 2020), 旅行(《异星枝萤》, 2020)、在星巴克喝咖啡(《一二七八米》, 2020)等, 人们内心深处充满悲欢离合的情感便通过共有的生活记忆在《两日晴, 郁达夫》中留下痕迹。

(二) 《两日晴, 郁达夫》中的文化记忆媒介

《两日晴, 郁达夫》中的群体(集体)记忆构成的文化记忆在文本中的留存和传递离不开对文化记忆媒介的再探讨。

首先, 《两日晴, 郁达夫》中的文化记忆媒介表现为作为“仪式”存在的重要时刻。康纳顿认为, “仪式具有重演特征, 通过重复与循环, 对于塑造社群记忆具有重要作用”^[22], 当然, 为了更加适应当代文化记忆研究, 仪式可以被重新解读为更加宽泛节日或者重要时刻, 不再仅仅拘束在仪式一词, 因为节日等的重要时刻与仪式共享着“通过仪式的演示来使自己的文化记忆不断重现并获得现实意义”^[20], 这也成为《两日晴, 郁达夫》中的文化记忆媒介的重要组成部分。《两日晴, 郁达夫》中存在大量文化记忆媒介的叙事, “那次, 毕业典礼还没开始, 人行横道两头, 阳光很烈, 他眯起眼看了看我身上同样的学士服”^[16], 毕业典礼作为一个重要时刻的仪式, 见证人们的相聚又分离, 是重要的文化记忆来源。除此之外, 还有吊唁的时刻, 这同样也是一种重要时刻的仪式: “去殡仪馆前, 她找到当年留下的钥匙, 打开了他家的门……她想起他的父母, 他们正哭着接住每双慰唁的手”^[16], 在这里, 肖水并未回避悲伤的仪式的再现, 这和毕业典礼、同学聚会、婚礼、大寿等的仪式一样, 同样也可以成为文化记忆的媒介, 这些媒介共同塑造了悲欢离合的记忆。除了重要时刻, 节日也是一种文化记忆的仪式: “又返佛殿, 火光升腾于香烛之末, 我们朝心中一念, 一拜, 再拜, 时近中秋”^{[16]29}, 以及“祠堂里, 只有你一个人在写春联”^[16]等。中秋、春节, 这些传统习俗与传统节日, 是团聚和见面的时刻, 人们的记忆在这些特殊的日子里得以留存和传达, 略显清冷或热闹的节日同样是悲欢离合的文化记忆产生和传递的媒介所在。

“杭州、武汉、海南、青岛、郴州、南京、北京、太原、三亚, 估计有上百座城市地名”^[13], 出现在《两日晴, 郁达夫》中的城市地点已经被作为个体记忆的回忆空间在上文已有初步的探讨, 在进入文化记忆的回忆空间被重新以更加符合文化记忆媒介的研究对象被提出时, 需要进一步寻求回忆空间作为群体(集体)记忆的理论适用性。首先是“地铁站”(《山海浪打浪》, 2020)、“机场”(《异星枝萤》, 2020)这样的地点。作为交通枢纽, 车站和机场是人们抵达和出发的常见空间, 在《两日晴, 郁达夫》中, 肖水没有在这些回忆空间中加入准确的时间, 这就意味着: 当时间因素被剥离之后, 空间不再是一个个场景的连续展开, 而是以一种同时存在或不受时间限制的自由方式呈现出来^[20], 这也为记忆场所提供了充足的空间, 人们的悲欢离合的记忆都可以在这些空间中被构建, 于是, 这些记忆空间成为了文化记忆的重要媒介。此外, 就是更加日常的地点: “火锅店”(《二三里》, 2020)、“学校”《浅净深莞》, 2020》等勾连起人们日常生活、学习、工作的地点, 在这些地方产生的记忆为社会中生活的人们提供了一个可以帮助他们更快找到身份定位的环境, 肖水借助文本的叙事塑形出一个个空间, 通过这些回忆空间的文化记忆媒介“复活”了记忆, 同时, 这些空间的的变化也引发了更深层的记忆再现和文化反思。因此, 这些仪式、重要时刻以及回忆空间作为文化记忆的媒介, 通过文学文本的再现, 使记忆得以在更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下被重新诠释和传递。

五、结语

综上所述,通过对肖水的小说诗集《两日晴, 郁达夫》在文化记忆视角下的研究,可以揭示文化记忆理论在文学研究中的重要应用价值。通过上述研究和阐释,可以发现肖水通过《两日晴, 郁达夫》的文学文本将个体记忆与文化记忆相融合,借助仪式、重要时刻和回忆空间等文化记忆媒介,构建了一个充满悲欢离合的记忆场域。这种记忆的构建不仅丰富了文学作品的内涵,也为文化记忆跨学科研究中理解个体与社会之间的互动提供了新的视角。对该文学文本研究的意义不仅拓展了文化记忆理论的应用范围,为文学研究提供了跨学科的理论支持,同时也为文化记忆理论的本土化研究与创新提供了一定的实践可能性。当然,基于已有的文化记忆研究成果和文本实践,在今后的研究中更深入地探讨不同文化背景下记忆媒介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将更有意义,以及更进一步探讨这些媒介如何在更广泛的文学文本和与之关联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发挥作用,以便更深入探讨复杂情感在不同理论话语体系下的文本关照和表现。

注释:

①: 具体参看《理解媒介: 论人的延伸》(Understanding Media: The Extensions of Man, 1964)

参考文献:

- [1][德]阿斯特莉特·埃尔、冯亚琳. 文化记忆理论读本[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 [2]赵莹. 霍桑作品中的文化记忆建构研究[D]. 北京: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3.
- [3][德]扬·阿斯曼,金寿福译. 文化记忆: 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记忆和政治身份[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 [4]Kuhn, Annette. "Memory Texts and Memory Work: Performances of Memory in and with Visual Media"[J]. *Memory Studies*, 2010, vol. 3, no. 4.
- [5][德]阿莱达·阿斯曼. 记忆空间: 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 [6]王鑫. 文化记忆理论视域下《雅科夫的梯子》中的女性形象[D]. 哈尔滨: 哈尔滨工业大学, 2022.
- [7]Astrid Erll, Ansgar Nünning, eds. *Cultural Memory Studies: An International and Interdisciplinary Handbook*[M]. Berlin, Boston: De Gruyter, 2008.
- [8]黄雅婷. 文学记忆的生成——阿斯曼之后文化记忆理论的叙事结构[D]. 武汉: 武汉大学, 2021.
- [9]刘顺. 论文学中的记忆[J]. 浙江工商大学学报, 2015, (06): 56-62.
- [10][德]扬·阿斯曼著; 黄亚平译. 宗教与文化记忆[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8.
- [11][法]皮埃尔·诺拉主编; 黄艳红等译. 记忆之场: 法国国民意识的文化社会史[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 [12]闫琪. 文化记忆理论下的迟子建小说研究[D]. 喀什地区: 喀什大学, 2023.
- [13]雷武铃. 一种抒情美学的重构读肖水的小说诗集《两日晴, 郁达夫》[J]. 上海文化, 2022, (03): 56-64.
- [14]肖水. 某物之来临: 我与《西川诗选》[J]. 名作欣赏, 2014, (34): 84-87.
- [15][德]阿莱达·阿斯曼著; 王扬译, 丁佳宁校. 文化记忆理论读本[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 [16]肖水. 两日晴, 郁达夫: 绝句小说诗[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1.
- [17]王广州. 美国解构主义理论家保罗·德曼研究述评[J]. 国外理论动态, 2006, (03): 52-55.
- [18]肖水, 木朵. 孤独的, 未来的——诗人肖水访谈[J]. 名作欣赏, 2013, (22): 132-135.
- [19][德]韦尔策编; 季斌, 王立君, 白锡堃译. 社会记忆: 历史、回忆、传承[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 [20]王炳钧, 王炎, 汪民安, 等. 空间、现代性与文化记忆[J]. 外国文学, 2006, (04): 76-87.
- [21]Jan Assmann. *Communicative and Cultural Memory. Knowledge and Space* (Klaus Tschira Symposia), vol. 4. Springer, Dordrecht, 2011.
- [22][美]保罗·康纳顿著; 纳日碧力戈译. 社会如何记忆[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The memory construction of vicissitudes

—A study of Xiaoshui's poetry collection *two sunny days*, *Yu Dafu*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memory

Bai Yiyi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81,China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memory theory, the study of literary tex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memory theory is gradually unfolding. Taking Xiaoshui's novel poetry collection *two sunny days*, *Yu Dafu* as the text object,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ultural memory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its application in the literary field can effectively analyze the role of individual memory and cultural memory in Xiaoshui's *two sunny days*, *Yu Dafu* works and the performance media. At the same time, while exploring these media and their memory construction, the application of cultural memory theory as a research means not only enriches the connotation of literary works, but also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for understanding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individuals and society, and space. In addition, the research also expanded the application scope of cultural memory theory, provided interdisciplinary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literary research, and provided practical possibilities for the localization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of cultural memory. It also let us see the memory construction and emotional construction of a contemporary writer in addition to aesthetic construction.

Keywords: memory theory; Xiao Shui's *Two Sunny Days* , *Yu Dafu*; individual memory; cultural memory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2.519

被忽视的“雕琢”——论珀西·比希·雪莱对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雪莱

《弗兰肯斯坦》的修改

陈瑞浩¹

(上海师范大学, 上海 200000)

摘要: 学界关于雪莱夫妇之间的文学互动研究并不常见, 部分研究大多落入“珀西对于弗兰肯斯坦这一角色创造具有巨大作用和影响”的窠臼之中。而当尝试将珀西在原版《弗兰肯斯坦》的改动纳入观察、评介的视野中时, 以往“珀西对玛丽的影响巨大”之定论似乎能产生更多新的有趣结果。同时, 通过对珀西于玛丽初稿中“浅薄的改动”和“深刻的改动”进行分析, 可以推得相较于珀西企图利用“诗”的力量来面对或制衡英国步入工业革命时期文学创作群体所面临的焦虑, 玛丽更愿意站在功利主义的角度直接指出“科学家应采取谨慎负责的态度去限制和控制科学的发展”这一具有现代性和科学伦理意义的观点。因此, 珀西之“雕琢”不应一言以蔽之, 否则难免步入布鲁姆所谓“影响的焦虑”的忧郁症之中。

关键词: 珀西·比希·雪莱; 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雪莱; 《弗兰肯斯坦》; 《原初的弗兰肯斯坦》

前言

1816年, 瑞士日内瓦湖畔的夏天因恶劣吊诡的天气而变得寒冷潮湿。狄沃达蒂别墅内五个年轻人中由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雪莱 (Mary Wollstonecraft Shelley, 后简称“玛丽”) 所创作的《弗兰肯斯坦——现代的普罗米修斯》(*Frankenstein, or the Modern Prometheus*, 1818, 后简称《弗兰肯斯坦》)在拜伦倡导的“鬼故事竞赛”中催生而出, 并在日后的“长达几乎两个世纪的时间中, 它牢牢地控制住了人们的想象”^{[1]3}, 甚至在哈罗德·布鲁姆 (Harold Bloom) 的《西方正典》(*The Western Canon*, 2015) 附录中所呈现的民主时代权威经典书目中, 《弗兰肯斯坦》也在众多男性作家的作品中显得如此亮眼^{[2]483}。珀西·比希·雪莱 (Percy Bysshe Shelley, 后简称“珀西”) 作为玛丽爱情和文学上的启蒙者, 对玛丽文学创作尤其是小说创作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然而长久以来, 关于雪莱夫妇之间的文学互动研究并不常见, 多是单独地对《弗兰肯斯坦》的“科学发展带来的惊悚”“科学普罗米修斯主义”或是以老生常谈的“世界第一部科幻小说”之视角来对其进行评骘和定位, 在《弗兰肯斯坦》经典化的过程之中, 珀西对玛丽的影响——在国内学术界被忽视而不见——在国外研究界却是一个近两百年都悬而未解的难题。从“科学”角度去解读《弗兰肯斯坦》显然已经取得了丰富的成果, 无论是作为“反科学小说主要叙述形式”存在的《弗兰肯斯坦》抑或是浪漫主义时期主张“创造”的《弗兰肯斯坦》, 都在早前的国内外学术界获得了详尽的阐述。但当尝试将珀西在原版《弗兰肯斯坦》的改动纳入观察、评介的视野中时, 以往“珀西对玛丽的影响巨大”之定论似乎能产生更多新的有趣结果。

[作者简介]

陈瑞浩 (2001—), 男, 浙江温州人, 上海师范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硕士研究生。

一、关键与否：《弗兰肯斯坦》作者之争

哈罗德·布鲁姆曾在2008年编辑了研究玛丽的专著《布鲁姆的经典批评：玛丽·雪莱》(Bloom's Classic Critical Views: Mary Shelley, 2008)，在专著中他强调了作者生平对《弗兰肯斯坦》的创作影响，这一传统的“知人论世”的研究方法为我们开拓了用传记来研究珀西对玛丽小说创作研究的视野。由此，关于珀西对玛丽创作《弗兰肯斯坦》时期的影响，可以从两人各自的传记以及国外学者对于这一文学事件的评价窥得一些信息。

多萝西·胡布勒(Hoobler.D.)与托马斯·胡布勒(Hoobler.T.)这对伉俪合著的《怪物：玛丽雪莱与弗兰肯斯坦的诅咒》(后简称《怪物》)是国内外研究玛丽作品或生平较为重要的一本专著，两人在书中谈到：

1817年5月，玛丽完成了《弗兰肯斯坦》的创作……这本书以巨大的雄心描述了一些形象，为了实现它们，甚至不顾及他人所付出的代价。玛丽力图揭示，即便那些动机良好、极富天赋的人——葛德文和雪莱就是这样自认的——也会出错。但是去诟病这两个高大的形象，这两个名义上几乎是她生命中的上帝的人，她不得不把自己变成一个怪物。[1]220-221

葛德文和珀西作为玛丽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位男性，玛丽试图通过塑造弗兰肯斯坦这一科学无节制发展而诞生的怪人来揭露这两位“高大的形象”也会因自己的自负和高傲而出错，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了玛丽创造这一角色的间接原因。除此之外，在《怪物》中也直接谈到了珀西对玛丽创作《弗兰肯斯坦》的帮助：

关于雪莱在这部小说创作中所起的作用，长久以来一直存在争议。他对手稿作了一些修改，但是对故事并没有作任何大的改动；实际上，雪莱的一些修改意见微不足道，显得有些谦虚……雪莱所做的最重要的改动是小说的最后一行。玛丽开始是这么写的，“说完他纵身跳出窗外跳上紧挨着船边的冰筏随之远去他被波涛推着而我在茫茫黑夜中很快就看不到他了”。雪莱改成了“说完，他纵身跳出窗外，跳上紧挨着窗外的冰筏。一转眼，他就随波涛而去，消失在茫茫黑夜之中。”玛丽的“看不到”更大地保留了怪物仍然活着的可能性。[1]222-223

多萝西夫妇认为珀西对于玛丽《弗兰肯斯坦》的创作所给予的帮助更多的似是导师对学生一般的改正，而玛丽也选择了全盘接受，但珀西对玛丽的修改对于故事的主要走向并没有任何重大的变动和转向，其认为珀西对小说最为重要的改动仅仅只是在结尾降低或者是抹杀了“科学怪人”弗兰肯斯坦存活的可能性，这处的改动似乎也能闪耀出珀西的人道主义精神光辉²。上述论断揭露出了一个结论——珀西对于“弗兰肯斯坦”这一角色的创造有重要意义，而其对玛丽的原稿改动的作用却微乎其微。

事实上，当《弗兰肯斯坦》最初于1818年1月1日在伦敦匿名出版时，珀西在与该书出版商的沟通之中，“否认了在该书的创作中发挥了任何作用，并表示该手稿是‘一位朋友托付给我的。’”^{[3]101}而玛丽自己则在1831年修订版《弗兰肯斯坦》的序言中也表示“她并没有得到珀西关于任何一件事的建议，或一系列的感情。”

除此之外，国外的评论家与学者也有对这一争论作出评价，但大多较为分裂，难以统一。一部分学者或评论家声称虽然该小说为玛丽构思并撰写，但珀西的编辑和对手稿提出的意见在小说的创作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甚至是主要的作用；而另一部分学者却认为这一说法夸大其词且并不能得到论证与证实。如穆里尔·斯帕克(Muriel Spark)认为《弗兰肯斯坦》前五章的弗兰肯斯坦“反映了雪莱这个人，她在创造怪物时抛弃了这一个角色，然后被弗兰肯斯坦的朋友克莱尔所接受。”^[4]而编辑詹姆斯·里格(James Rieger)却持反对意见，认为：“珀西在本书制作过程中每一点的帮助都非常的宽泛，人们很难想明白他是读者还

² 然而多萝西夫妇这一论断几乎是错误的，在原版的手稿之中，珀西并没有对这段有上述的修改。

是次要合作者”，但在此之前的 1974 年，里格也曾声称珀西“在《弗兰肯斯坦》的各个阶段都进行了工作，从最早的草稿到印刷校样”，并认为他至少应该被视为一个小小的“合作者”。^[5]美国语言教授玛丽·海伦·休特 (Marie Hélène Huet) 在其 1993 年出版的著作《巨大的想象力》 (*Monstrous imagination*, 1993) 中，提出“珀西在《弗兰肯斯坦》的创作中被忽略了”。她特别指出了卢梭的《新爱洛伊丝》对这部小说的影响，然而在当时只有珀西读过这本书，而玛丽没有。休特还强调了珀西用自己的词汇取代玛丽更简单的措辞的几个例子，称这是“无可挑剔的证据”，表明珀西正如里格所说，至少是一个次要的合作者。除此之外，她还认为珀西应该对小说中人类繁衍和不育的主题负责，并认为珀西发展了维克多和伊丽莎白角色之间的对比，以及应将“维克多应该前往英国为他所创造的怪物再创造一个女性伴侣”的想法归功于珀西。^[6]“珀西为作者”这一假说的支持者也将珀西早期的两部哥特式恐怖小说《扎斯特洛奇》 (*Zastrozzi*, 1810) 与《圣欧文》 (*St. Irvyne; or, the Rosicrucian*, 1811) 纳入研究的视域之中，并认为这两部小说中的“复活尸体”“炼金术士”“追求与复仇”等情节和母题与《弗兰肯斯坦》高度重合，尽管这两部小说大量借鉴了弥尔顿《失乐园》中的情节，但假说支持者仍认为玛丽是在参考了珀西这两本匿名出版的小说后才创作出的《弗兰肯斯坦》。

对于休特的观点，编辑编辑邓肯·吴 (Duncan Wu) 提出了异议，认为玛丽在珀西提意见或修改之前已经确定了“维克多与伊丽莎白之间的角色对比”这一书写以及“为弗兰肯斯坦创造一个女性怪物”这一情节，并说明珀西只是提议维克多去英国应该是他自己的想法而非其父亲之意图。^[7]^[212-217]专攻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杰出英国文学教授安妮·K·梅勒 (Anne K. Mellor) 认为里格的主张带有明显的对女性作家创作的偏见，是“明显的性别歧视”，她认为里格似乎是在暗示玛丽无法独自创作出这部作品。安妮随后还继续了这一项研究，其认为珀西只“做了许多技术上的勘误，多次澄清文本的叙述和主题延续性。”以及论证了“珀西更有可能是《弗兰肯斯坦》1831 年编辑”的观点。^[8]^[31-37]无独有偶，莱斯利·S·克林格 (Leslie S. Klinger) 在《新注释弗兰肯斯坦》 (*The New Annotated Frankenstein*, 2017) 中坚持认为“维克多·弗兰肯斯坦和珀西·雪莱传记上的巧合证明了珀西是这部小说作者”的说法是靠不住的，并认为相较于传记，批评家们更应该从原初文本即手稿和玛丽于 1831 年版的《弗兰肯斯坦》的序言入手。^[9]

查尔斯·罗宾逊 (Charles E. Robinson) 于 1996 年出版了《弗兰肯斯坦》手稿的转录版本及该作的创作年表。基于一手的原始材料，他认为玛丽才是这部小说背后的“创意天才”，珀西的贡献类似于出版商编辑所给予的帮助。然而，罗宾逊的评价也并非一成不变且颇显暧昧，前后甚至有抵牾之势。2008 年，罗宾逊不情不愿地承认了珀西在《弗兰肯斯坦》中的贡献，引发了传媒界和学术界的狂热辩论。但 2015 年，罗宾逊却认为这个问题仍然值得商榷，悬而未决，应该进一步讨论。^[10]^[117-136]时间推进到 2022 年，苏德比·李 (Suddaby Lee) 和戈登·J·罗斯 (Gordon J. Ross) 通过对《弗兰肯斯坦》的分析，发现了重要的证据，论证了玛丽在整部小说中具有完全的“作者身份”，并反对“珀西在《弗兰肯斯坦》的创作中发挥重大作用”这一观点。^[11]

由是观之，珀西对《弗兰肯斯坦》的影响难以盖棺定论，近两百年的争论也难以在今天画下休止符。在下文中，笔者将从查尔斯·罗宾逊 2008 年版《原初的弗兰肯斯坦》 (*The Original Frankenstein*, 2008) 入手，浅议珀西对玛丽手稿的修改以及对珀西修改的一些思考。

二、被忽视的“雕琢”

《原初的弗兰肯斯坦》为查尔斯·罗宾逊根据馆藏于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的《弗兰肯斯坦》的手写草稿，通过辨别珀西和玛丽两人在手稿的字迹，分别收录了珀西修改版《弗兰肯斯坦》与玛丽原版《弗兰肯斯坦》。在原版手稿中，珀西做了大量注释，且第一卷中缺少沃尔顿写给妹妹的四封介绍信和第一章的前半部分，第二卷中缺少第三章的部分内容和第四章的全部内容。^[12]值得肯定的是，《原初的弗兰肯斯坦》企图让读者更直观地观察到珀西对玛丽的小说创作之影响以及玛丽所创造的“弗兰肯斯坦”原本的模样。

在字数上，珀西之修改版《弗兰肯斯坦》相较于原初玛丽于 1816 至 1817 年间所作手稿即原版的《弗兰肯斯坦》，珀西在修改版的 72000 字中大约贡献了至少 4000 至 5000 字^[13]^[25] 大约占全文的百分之七。

查尔斯认为，珀西对《弗兰肯斯坦》4000至5000字的修改之中，大部分都是正向的修改，而他的改动大部分也都较为细微，如更改标点符号、修改玛丽的拼写等^{[13]26}。除去对于玛丽拼写错误和病句的修改，对于这类较为浅薄和细微之改动，查尔斯对之作了大致的分类与总结：

首先，珀西会对玛丽的不明确指向提供一个具体的实物，如会在玛丽原文的不定代词或及物动词后增添一个更为具体的名词。比如在玛丽所创作的原版小说中，她写道“如果不是懦弱和粗心限制了我们的话”而珀西则修改为“如果懦弱或粗心没有限制我们的调查的话”。^{[13]270,75}其次，珀西不似玛丽用简单的词句或语法来协调及连接句子，反而有时会在句子中引入从属关系甚至更为复杂的关系句式。玛丽一开始写道：“但我不断重复同一话题的执着让他感到惊讶”，而珀西则将之修改为“但我不断重复同样的话题，让他相信我的失常是由于某些不寻常的可怕事件造成的。”^{[13]282,86}再次，珀西会删去玛丽原版中的单词，重写原版中的短语，精简原版中的行文，让原本的句子不至于冗长。例如玛丽原版味“仍保留着她姓氏‘莫里茨’的马丁女士”，珀西则直接了当地将其改为“马丁—莫里茨女士”。^{[13]284,88}最后，珀西会修改玛丽口语化、散文化的语调以契合人物言语的方式，尽管玛丽原本的特色仍然明显。比如玛丽原版写道：“我不寒而栗地思考着曾经发生的一切……，你让我凄惨得无以复加”珀西将其改为“我不寒而栗地想到，我一直是悲惨的起源和作者……，你让我无力考虑我对你是否公正。”^{[13]319,124}

查尔斯总结的上述观点或许得以佐证珀西于玛丽在《弗兰肯斯坦》创作实践中的微弱作用，其对语病的修改、行文的捯饬，对于玛丽口语化、散文化言语的更正似乎是现代编辑或者读者都能够做到的事情。但事实并非如此，除了使玛丽行文的语言更偏向拉丁文古典的风格，珀西在文章中增添之大篇幅的段落往往带有其深刻的含义，其改动往往能够加深读者对小说第一卷情节、科学、政治等内容的理解。

首先，在第一卷的第一章中，珀西的补充强调了维克多和伊丽莎白“差异中的和谐”，为小说中维克多和伊丽莎白日后的情感走向铺垫了基础，珀西写道：“我乐于调查与现实世界有关的事实，而她则忙于追随诗人所创造的空中楼阁。世界对我来说是一个秘密，我想去发现它，而于她而言，它是一个得想用自己的想象去填补的空缺。”^{[13]62}其次，在小说第四章珀西扩展了教授沃尔得曼对两位炼金术士阿格里帕和巴拉塞尔苏斯对现代科学家影响的评价，他提及：“现代哲学家的大部分知识基础都要归功于这些人不屈不挠的热情。他们留给我们的一项更容易的任务，就是为这些事实赋予新的名称，并对它们进行有关联的分类，而这些事实在很大程度上是他们为我们揭示……”。^{[13]72-73}再次，第八章珀西在伊丽莎白的信中加入了一段长文以昭示日内瓦比法国和英国更加的开明与共和。在这一段长文中，珀西认为“我国（指日内瓦，笔者按）的共和体制造就了比周边君主制国家更简单、更幸福的礼仪。因此，在我们这个幸运的国家，既不贫穷也不受人鄙视的人类所处的阶级之间的差别较小，他们更有教养和道德……，这并不包括牺牲人的尊严。”^{[13]89}最后，第十五章中珀西在原本的文段中加入了大段的环境描写，通过对于环境的刻画和书写烘托氛围与推进人物的情绪发展，最有代表性的便是珀西增添的一句：大海，或者说是浩瀚的冰河，蜿蜒于群山之间，山顶高耸入云。冰雪闪烁的山峰在云层中闪耀着阳光。^{[13]121}

除此上述的改动之外，珀西仍需要因其质疑维克多的动机，对小说第二卷第六章中作出的重大改动而负责。在征兵初期，维克多的父亲建议维克多陪同克莱尔前去英格兰。珀西在玛丽原稿空白处为其注释，写道：“我认为去英格兰的提议应该被归为维克多的提议，他去英格兰的目的应该是为了收集知识，为了创造一个女人（formation of a female），他应该在谈话中引导他的父亲认识到这一点——谈话一开始就应该这样”。^{[13]28}而玛丽依照珀西的批注照做了。因此，在1817年4月中旬她完全重撰小说之前，她插入了一段重要的段落，这段落意在阐述“维克多最初迟迟未征得父亲同意访问英国”这一前因。随后玛丽删去了两页半的草稿，并起草了四页半的替代页来讲述“维克多在其中最终恳切地请求父亲允许他访问英国”这一后果。职是之故，在珀西的建议下，维克多成为了决定自己命运的人，而并非其父亲。

如果说珀西对于玛丽《弗兰肯斯坦》创作实践中细微的词语乃至语病修改难以说明问题，那么大段的文本插入无论是在字数上或是在文本深层乃至形而上的意义之上都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上述列举的珀西对玛丽原版《弗兰肯斯坦》几个方面的修改与添置，首先折射出了珀西自身熟稔于男女主人公的情感走向和对于小说节奏走向的把控。于此同时，珀西补充的有关“教授沃尔得曼对两位炼金术士阿格里帕和巴拉塞尔苏斯对现代科学家影响的评价”也引导读者对小说中的科学无限制发展之思，但同时似乎也与玛丽

原本的创作意愿相悖。除此之外，在第八章中对于日内瓦的赞赏也反映出珀西对于民主观念的思考与政治思想的展示，对因“无神论”而被驱逐出校园且被褫夺两个孩子抚养权最后逃离英国奔赴意大利的珀西而言，有这一政治思想似乎也并不为奇。最后，作为无神论者和素食主义者，大段环境描写的插入似乎也在透露出珀西作为泛神论者的乞灵，昭示着浪漫主义作家与自然之间难以言语的联结。除此之外，有关第二卷中珀西对玛丽原稿空白处的补充注释，让玛丽最终插入了一段重要段落以说明是维克多父亲起初不允许维克多前往英格兰，并在其后删去两页半草稿，以四页半的替代页阐明维克多成功说服父亲使其前往英格兰，令其成为决定自己命运的“唯一之人”这一重要改动，使珀西对于玛丽原初《弗兰肯斯坦》的“雕琢”——无论是在浅薄层面上或是形而上意义层面上——均有所裨益，其贡献并不能单纯以“现代编辑”或“现代读者”的作用来概括。

三、“雕琢”之思：《弗兰肯斯坦》中珀西有关炼金术士的补充

前文所述之珀西对玛丽原初手稿的改动大抵可以分为“浅薄的改动”与“深刻的改动”。“浅薄的改动”修改了玛丽语法与单词的错误，使文本更偏向于古典的拉丁文风格，起到了一个现代编辑或读者之作用。至于“深刻的改动”即几段长文在《弗兰肯斯坦》中的添置却在浪漫主义时期的文学浪潮中闪出别样的光点，双元革命（Dual Revolution）进行中的欧洲大陆与英国中的人民对于工业、民主，乃至科学都有了更深层次的思考与反思，甚至站在历史主义的角度上能引出当代读者别样的思考。

十九世纪，现当代西方对科学的依赖与敬仰在整个世界无出其右，尤其英国更甚。工业革命与圈地运动的进举让科学之地位在英国无限制地拔高。历史学家罗宾·吉尔莫（Robin Gilmour）曾在《英国文学的思想和文化背景》中写道：

在业余层面，科学化身为自然史，差不多成为了英国中产阶级的全民爱好。在职业层面，科学成为了人们为之奋斗的事业，他们对古老大学进行现代化改造，在教育体系中建立科学学科，千方百计争取公共资金资助科学研究，奋力赢得尊贵的专业地位。在新兴的工业城市，科学化身为推进公众卫生运动成为社会改革的前线……1860年以后……科学变成一种日益自信和帝国色彩日益浓厚的意识形态，开始把手伸到此前不归它管的领域——人类行为研究。“科学”得到广泛认可，被看作是打开所有门户——从社会结构到潜意识的工作机制再到宗教经验本身魔法钥匙。^{[14][11]}

科学事业的繁荣与兴盛是与英国工业革命的发展和自身生产力的需要高度匹配与呼应的。然而英国的小说界却对此种拔高做出了有趣的回馈即“深层的反思”——对于科技无节制发展和科学普罗米修斯主义的担忧与恐惧。当我们面对以科学和科学家为题材的小说——不难发现——科技对于社会诸方面的积极影响消失了，科学的正面意象不见了。^[15]简而言之，在19世纪英国作家笔下诞生的“疯狂科学家”形象似乎揭橥出了一个难以预料的事实——“文学虚构做出了与真实世界相反的故事叙述、形象刻画及价值评判”^[15]。

相当矛盾的一点是，即使在玛丽原版的《弗兰肯斯坦》的主旨之一是为了强调科学普罗米修斯主义会带来严重后果的前提下，珀西仍旧对“炼金术士”这一中世纪在众多作家所创作的文本中便已存在的负面形象给予正向描写，认为“现代哲学家的大部分知识基础都要归功于这些人不屈不挠的热情”^{[13][89]}。这一有悖于玛丽原版《弗兰肯斯坦》主旨的改动是否与珀西本身对科学的观念有关？

怀海特曾评价珀西颇具慧根，认为“假如雪莱晚生一百年，到20世纪再降临到世界上来，他肯定将成为化学家中的牛顿”^{[16][82]}。而珀西对于科学的探索与好奇，在伊顿中学时期已初具端倪，徐凌曾考证到珀西在伊顿中学的教师林德³是“雪莱生命中最重要的智力因素”^[17]珀西本人也曾坦言道：“我永远不会忘记

³ 林德本人精通于天文学和气象学，自皇室学术退休后成为伊顿中学的教师。

我们那长时间的交谈，他在其中显露了最仁厚的宽容和最纯洁的智慧的精神”^[18]。科学对于珀西的创作影响，在《解放的普罗米修斯》的第四幕与其诗论《为诗辩护》中均作了阐释，“智性”作为珀西创作实践产出物的标志属性之一已无需多言，而普罗米修斯作为古希腊道德和智性的代表人物自然受到了珀西的大力推崇，正如其于《解放的普罗米修斯》的序中所言：“普罗米修斯仿佛是道德和智识本性最高完美的典范，在至纯至真动机的驱使下向着最美好、最高贵的目的”。珀西对于科学的肯定态度延续到了科学家的身上，甚至连前几个世纪作为文学中负面形象呈现的炼金术士都沾了光。《科学事实与科学小说百科全书》曾对“科学家”一词进行解释：

指科学的实践者……然而，在文学和艺术领域，科学家的形象继承了中世纪炼金术士和巫师的许多特征。早期的文学作品通常不信任“科学家”，认为他们热爱钻研抽象事物是不适应社会以及对邪恶感兴趣的表象，可能带来更危险的后果。^[18]⁴⁶⁹

对于炼金术士，中世纪以降的最经典的文学范式便是站在道德的角度，对沉迷于炼金术而误入歧途的人进行讽刺以揭露炼金术之弊端。但显然珀西并没有继承这一传统的文学范式，而是选择对其多加的赞赏甚至将现代哲学家的知识基础归功于他们。多萝西之《怪物》中也提到：

雪莱对于文稿的改动，也倾向于为弗兰肯斯坦医生的行为平反，把他描述为一个牺牲品，而不是一个罪恶的制造者。这反映出雪莱不仅没想明白而且他自己和维克托本来就很相像。玛丽·雪莱总是看得很明白，弗兰肯斯坦在欺骗他自己。她的丈夫也是这样。^[1]²²²

我们并不能仅从这一处的文本增添而武断地推断出珀西对科学怪人持推崇的态度，事实上，在浪漫主义时期的英国还存在着另一种倾向，即“科学探索为人类开拓出一个无比神秘、真正广阔的前景，在发掘、服从最高想象力的层面，科学与文学并不矛盾”^[19]¹²⁰，但其添置段落的隐含话语无疑是与“疯狂炼金术士”转换为“疯狂科学家”文学例证的《弗兰肯斯坦》所蕴含的主旨相悖。

颇有趣味的是，在《为诗辩护》中，珀西写道：“科学已经扩大了人们统辖外在世界的王国的范围，但是，由于缺少诗的才能，这些科学的研究反而按比例地限制了内在世界的领域；而且人既然已经使用自然力做奴隶，但是人自身反而依然是一个奴隶……而创造力是一切知识的基础。”^[20]¹⁵²由此可推得珀西的诗思也同上述提到的众多作家一样有着与现代科学所抗衡的意味在，诗人仍旧高于一切，仍是浪漫主义时期“创造”的代言词，仍是“世间之未被公认的立法者”。对于科学的推崇与诗人地位的崇高其实并不冲突，但相较于玛丽原版的《弗兰肯斯坦》而言，珀西之添置似乎是起了负面效果了，这也导致了部分当代学者做出了一些过于武断之结论——玛丽·雪莱以其《弗兰肯斯坦》的“世俗神话”，用弥尔顿的认识论框架对科学普罗米修斯主义进行了富有远见的批判，不动声色然而激进地翻转了她丈夫毫无疑义的普罗米修斯主义。^[21]

四、“诗的焦虑症”

时至今日，国内有关珀西对于玛丽原版《弗兰肯斯坦》的修改之研究仍存在着较大的漏洞与空缺。以“知人论世”等外部研究方式探讨玛丽所创作的文学作品，势必逃不开也避不掉多萝西夫妇所作的玛丽传记——《怪物》。可至今仍没有学者对书中珀西对玛丽原稿《弗兰肯斯坦》最重要的修改提出质疑。在《怪

物》中，多萝西夫妇强调是珀西在结尾降低或者是抹杀了“科学怪人”弗兰肯斯坦存活的可能性。可从查尔斯《原初的弗兰肯斯坦》中，恐怕并不能得出这一结论。珀西对玛丽原稿修改后呈现为：“他一边说着，一边从船舱的窗户跳到了靠近船只的一艘冰船上去；他自己跳了下去，并被海浪所卷走，很快，我就在远处的黑暗中失去了他的踪影。”^{[13][245]}通过这段修改后的文字与玛丽原版文本的比对，不难发现珀西对于玛丽原版的修改大抵只有介词的改动，单词的修改以及标点符号的增添，属于上文中所提及的“浅薄的改动”，并无多萝西夫妇于《怪物》中所称珀西在结尾处抹杀怪物仍旧生还的可能的深意。

学界对于珀西对玛丽的原稿“雕琢”的忽视除了体现在上述对于研究专著的考证缺失之外，也缺乏了对珀西部分改动之于玛丽创造“弗兰肯斯坦”初衷相悖的具体考量，而落入“珀西对于弗兰肯斯坦这一角色创造具有巨大作用和影响”的套话和窠臼之中。诚然珀西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一个科学普罗米修斯主义者，相较于科学而言，诗的伟大力量更让他着迷与臣服，他也坚信诗人的创造力如塔索那句大胆而真实的名言中所阐述的一样：没有人配受创造者的称号，唯有上帝与诗人^{[20][156]}。相较于珀西企图利用“诗”的力量来面对或制衡英国步入工业革命时期文学创作群体所面临的焦虑，玛丽更愿意站在功利主义的角度直接指出：“科学伦理学或人文价值要求限制和控制人工智能的发展，如果不是完全禁止或停止的话，科学家理应采取谨慎负责的态度”^[21]。这一具有现代性和科学伦理意义的观点。归根结底，有关珀西之于玛丽初版《弗兰肯斯坦》的“雕琢”不能以“珀西对玛丽有巨大的影响”一言以蔽之。若仍以这一陈腐观点去窥视这一极具现代性意义的作品，反倒是回应了哈罗德·布鲁姆于《影响的焦虑》中那种痛苦的情绪了——“诗的影响已经成为一种忧郁症或焦虑原则”。^[22]

参考文献：

- [1] 多萝西·胡布勒，托马斯·胡布勒. 怪物：玛丽雪莱与弗兰肯斯坦的诅咒 [M]. 邓金明,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 [2] 哈罗德·布鲁姆: 西方正典: 伟大的作家和不朽的作品 [M]. 江宁康,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5.
- [3] Zimmerman. Phyllis. Shelley's Fiction [M]. Los Angeles, CA: Darami Press, 1998.
- [4] P. D. Fleck. Mary Shelley's Notes to Shelley's Poems and 'Frankenstein' [J]. Studies in Romanticism, 1967(6): 238-239.
- [5] Rieger James. Frankenstein, or the Modern Prometheus: The 1818 Text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2.
- [6] Marie-Hélène Huet. Monstrous imagination [M].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 [7] Duncan Wu. 30 Great Myths about the Romantics[M]. Wiley-Blackwell, 2015.
- [8] Mellor Anne K. "Choosing a Text of Frankenstein to Teach" [M] // Mellor Anne K, Behrendt, Stephen C (eds): Approaches to Teaching Shelley's Frankenstein, New York: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America, 1990.
- [9] Leslie S. Klinger. The New Annotated Frankenstein[M]. New York: Liveright, 2017.
- [10] Charles E Robinson. Percy Bysshe Shelley's Text(s) in Mary Wollstonecraft Shelley's Frankenstein [M]. //Alan M. Weinberg, Timothy Webb (eds): The Neglected Shelle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5.
- [11] Suddaby Lee, Ross Gordon J. Did Mary Shelley write Frankenstein? A stylometric analysis[J]. Digital Scholarship in the Humanities, 2023(38): 750–765.
- [12] Ashley Chantler. The Original 'Frankenstein', and: Frankenstein: Icon of Modern Culture (review)[J]. The Byron Journal, 2010(38): 185.
- [13] Mary Wollstonecraft Shelley, Percy Bysshe Shelley, Charles E. Robinson, *The Original Frankenstein*, [M].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8.
- [14] Robin Gilmour, The Victorian Period: The Intellectual and Cultural Context of English Literature, 1830-1890[M]. London: Longman, 1993.
- [15] 萧莎. “疯狂科学家”的三宗罪:19世纪科学小说中的思想辩论与文化竞争[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4): 89-103.

- [16] A.N.怀特海. 科学与近代世界[M]. 何钦, 译. 北京: 商务印书局, 1989.
- [17] 徐凌. 雪莱与科学[J]. 自然辩证法通讯. 2007(2): 62-93.
- [18] Brian Stableford, *Science Fact and Science Fiction: An Encyclopedia*[M],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 [19] 金铖. 构筑想象的城堡[D]. 长春: 吉林大学, 2012.
- [20] 雪莱. 为诗辩护[M] 缪灵珠, 译. // 刘若端编. 十九世纪英国诗人论诗.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4.
- [21] 郝田虎. 《失乐园》《弗兰肯斯坦》和《机械姬》中的科学普罗米修斯主义[J]. 外国文学. 2019(1): 3-14.
- [22] 哈罗德·布鲁姆. 影响的焦虑[M]. 徐文博,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 2015.

Overlooked changes——About Percy Bysshe Shelley's revision of Mary Wollstonecraft Shelley's Frankenstein

Ruihao Chen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Abstract: Scholarly studies of the literary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Shelleys are rare, and most of them fall into the pattern of Percy's great influence on the creation of *Frankenstein*'s character. And when we try to incorporate Percy's changes in *The Original Frankenstein* into the field of observation and review, the previous conclusion that Percy has a great influence on Mary seems to produce more interesting new results. At the same time,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Percy's "shallow changes" and "profound changes" in Mary's first draft, it can be compared with Percy's attempt to use the power of "poetry" to face or balance the anxiety faced by the literary community in Britain entering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Mary is more willing to stand in the perspective of utilitarianism and directly point out that "scientists should take a cautious and responsible attitude to limit and control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which has the significance of modernity and scientific ethics. Therefore, Percy's "sculpting" should not be overstated, otherwise it is inevitable to enter the depression of Bloom's so-called "anxiety of influence".

Keywords: Percy Bysshe Shelley; Mary Wollstonecraft Shelley; Frankenstein; The Original Frankenstein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2.517

“代理人媒体”：东盟金边六国媒体涉华国际冲突报道的消息来源偏向研究

李康龙¹

(广西大学, 广西 南宁 530000)

摘要：在国际新闻报道中，各社会行为主体以消息来源的身份介入新闻生产进而获得参与真实建构、界定社会真实的权力，与新闻媒体形成复杂权力关系。本研究从“选择”和“重组”两大偏向考察东盟媒体涉华国际冲突报道的消息来源偏向，揭示被隐藏于幕后的权力实践。通过对相关报道的消息来源实证分析显示，东盟金边六国主流媒体在通过“选择偏向”广泛引用中菲两国政府官方声音的同时，主要借助“重组偏向”将中国声音和菲律宾声音分别置于观点相对立和相一致的消息来源网络之中，达到消解中国话语权、强化菲律宾声音的传播效果。研究有助于揭示东盟媒体与消息来源的权力互动实践，启示我们在推进我国国际传播时关注“重组”机制。研究在样本数量和议题类型层面具有局限性，未来可综合考察近年来多起冲突事件的新闻报道，或将研究视野拓展至其他议题新闻背后的消息来源互动关系。

关键词：东盟媒体 国际冲突报道 消息来源偏向 社会网络分析

一、前言

作为新闻来源的各行为主体拥有独属的议程，掌握着向公众公开或者隐藏某些信息的垄断权力。新闻来源向媒体提供的有价值的、可验证的和无成本的信息，以换取积极的回报，因而有学者将其称之为“信息补贴”^[1]。在这种新闻生产的路径中，新闻媒体成为了信息的被动传递者。虽然媒体具有消息来源的选择控制权，但如果记者不断地以对消息来源不利的方式报道新闻，消息来源也会倾向于停止传递信息。为了促使消息来源披露信息，记者有动机对消息来源的观点做出积极的解释^[2]。Berkowitz 将这种互动关系描述为一场“拉锯战”，认为新闻来源试图在“管理”记者的同时，希望呈现对自身有利的信息^[3]。因此，新闻来源能够有效影响媒体的新闻报道，媒体可能会故意向公众提供有偏见的信息，成为其“代理人”。换而言之，基于特定来源的信息可能构成某种偏见。

循此逻辑，新闻报道中的消息来源使用偏向作为媒体与各类消息来源（行为主体）之间权力互动的结果，可以成为我们观察媒体建构中权力关系的一个窗口。在中国与东盟国家经贸合作强化和南海争端频发的双重背景下，考察东盟各国主流媒体的涉华报道的消息来源偏向，可以反映出其国际新闻生产的复杂权力关系。此外，国际新闻作为一国政治立场的风向标，分析其信息来源偏向也能窥见各国在“中国-东盟”议题的观点和态度。

已有的消息来源偏向研究关注大众传播领域中，大众媒体重视哪些行为主体的信息，忽视哪些行为主体的信息，涉及一国之内的政府、企业、非营利组织等，少从国际新闻权力斗争的视角探究消息来源偏向。本研究选取印度尼西亚、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菲律宾六国主流媒体中涉华国际冲突报道作为研究样本，从“选择”和“重组”两个维度来探究东盟媒体在涉华国际冲突报道中的消息来源偏向。该六国是东盟中的主要国家，被称为“金边六国”，人口多、经济体量大，与中国的经贸往来更为密切，更加关注涉华国际事件。而国际冲突事件牵涉多国权益纠纷，吸引全球媒体的关注，相关报道涉及不同意识形态的象征场域，其消息来源偏向更能折射国际权力斗争实践。

[作者简介]

李康龙（2001—），男，湖南郴州人，广西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问题

(一) 消息来源偏向：新闻媒体的“选择”机制和“重组”机制

权力互动视角下的消息来源研究认为，各类行为主体会策略性地接近媒体，以消息来源的身份参与话语权争夺和真实建构；媒体亦会策略性地使用消息来源以维护或挑战既有权力结构^[4]。新闻媒体通过赋予消息来源建构持续意义的能力与其互动，对社会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

“选择”和“重组”是媒体与消息来源进行意义互动和权力实践的两大机制^[5]。选择机制是指新闻媒体依据新闻框架对社会真实进行选取和排除。在各个消息来源的权力互动中，新闻媒体会在考虑自身收益的前提下，对来源主体及其提供的信息进行筛选。重组机制，即媒体通过对信息内容的组合方式和时空转换，强调和再现部分真实，产生对社会行动的控制力。

国内外学界关注的焦点是记者从哪些来源获取信息，着眼于消息来源的选择机制，其研究问题多为各类消息来源是否以及在多大比重上被新闻报道采用。该取向研究认为，消息来源使用偏向是新闻生产过程中媒体（记者）基于自身利益和价值判断而做出的主动选择。比如，媒体为节约新闻生产成本，会倾向使用易接触、专业性、权威性的消息来源^[6]；记者为增加社会资本，会倾向使用官方机构和社会名流作为消息来源^[7]；媒体为掩盖其垄断新闻的意图，会有计划地寻找制式批判者作为消息来源^[8]。因此有大量的实证研究发现，是“权力中心的人”在消息来源中占主导地位。L.V.Sigal 调查美国华盛顿地区新闻记者与消息来源互动的情况，发现政府官员占消息来源的四分之三，是在新闻报道中占据绝对优势地位的权力主体^[9]。而在 Twitter 等社交媒体中，也有实证研究发现新闻媒体没有充分利用社交网络的民主潜力，偏向于使用精英消息来源^[10]。我国主流媒体在获取信息时，通常倾向于权威、可验证的官方消息来源，以增强报道的准确性与可信度^[11]。

而学界较少关注新闻媒体对新闻来源的重组机制，忽视被选择的主体以何种形式被重新组合、呈现。对“选择”偏向的强调，容易片面地认为“被选择得越多，影响力就越大”。但现实是，新闻媒体并不会公平对待所有新闻来源：有的是以积极的状态被呈现在新闻报道中的，而另一些却是以消极的状态呈现的，这些被积极呈现的消息来源显然具有（或被赋予了）更大的权力^[12]。因此以引用数多少这单一维度来考察消息来源偏向，实际上将新闻媒体与消息来源主体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简单化，其得出的主要研究结论也恐存在主观偏见、论证不足等问题。

既然媒体可以借助“选择”和“重组”两种机制完成其权力实践，对消息来源使用偏向的考察就不仅应该关注消息来源在多大程度上被选择的问题，而且应该重视消息来源以何种方式被重组的问题。因此，本研究从“选择”和“重组”两个维度考察东盟涉华国际冲突报道的消息来源偏向，以期更全面地揭示消息来源使用偏向及其背后的权力关系。

(二) 东盟媒体研究：海外华文媒体和“他塑”的中国国家形象

相对于欧美国家的媒体研究，东盟国家媒体一直被国内学界所忽视。相关研究论文的数量与“中国-东盟”的双边关系发展紧密相关。2013 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其中东盟各国也成为共建“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伙伴，此后的相关研究论文稳定增长。到 2020 年，东盟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发文量也达到历年顶峰^[13]。

有关东盟媒体的研究，国内学界多关注于东盟华文媒体。刘晋、蔡昌卓分析印度尼西亚媒体《国际日报》的报道框架，探究印尼华文媒体在传递“丝路之声”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14]。聂浩采用批评性话语分析的方法，对马来西亚《星洲日报》关于“一带一路”的新闻报道进行研究和分析^[15]。周思敏、俞皎岛对联合早报网关于人工智能的新闻报道进行框架分析^[16]。陈莹从媒体定位、内容、副刊、管理等方面分析新加坡《联合早报》的生存策略^[17]。此外，东盟华文媒体研究还大量见于硕士毕业论文。

国家形象是被大众媒介所制作的高度政治化的新闻幻觉^[18]，具有社会建构特征。学者们对于东盟媒体呈现出的中国国家形象及其建构方式也进行了实证研究，认为东盟国家民众对于中国形象存在刻板印象，探析“他塑”形象的客观面貌具有必要性^[19]。张昆、陈雅莉采用框架分析和质化内容分析法，考察两份东盟英文报纸报道南海争端过程中的主导性框架、意见话语和对华态度，发现中国在经济领域获得积极评价，而在其他方面仍存在一定的认知差异^[20]。罗奕通过对东盟六国大众媒体的涉华报道进行舆情监测，发现目前在东盟国家中，中国已经树立“成功的经济形象”，但“政治形象”和“国民形象”偏负面^[21]。

综合考察东盟媒体研究的相关文献，发现存在一下三点不足之处：一是国内相关研究主要以东盟华文媒体为研究对象；二是多数研究通过框架分析的视角探究媒体的报道框架，研究问题多囿于“呈现出什么框

架”“展现出什么形象”；此外，相关研究主要涉及“一带一路”“中国加入 RCEP”、人工智能等经济、科技、文化等重大事件，忽视了涉华国际冲突事件的特点和影响。

（三）研究问题

目前，国内关于东盟媒体与消息来源的互动关系研究，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关注，相关研究比较少，实证研究尚属空白。此外国际冲突议题涉及国家间激烈的政治经济利益和意识形态斗争，由此成为各国行为主体争夺话语权的重要场域。而在国际新闻报道中，受制于客观条件限制，媒体会更加依赖于消息来源，后者也由此可以获取更大的权力，甚至决定对新闻事件的定义和评价^[22]。因此，研究东盟各国主流媒体的涉华国际冲突报道的消息来源偏向问题，早已超出国家地理限制而延伸至国际权力空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新闻媒体与消息来源权力关系的绝佳案例。具体通过消息来源使用度与网络密度、节点中心度、边权重考察“选择”维度和“重组”维度。综上所述，本研究旨在讨论以下问题：

RQ1：在中国与东盟“合作-斗争”双重背景下，东盟主流媒体涉华国际冲突报道的消息来源卷入度情况如何？

RQ2：东盟主流媒体涉华国际冲突报道存在怎样的消息来源选择偏向和重组偏向？

RQ3：各国媒体报道中的消息来源使用偏向折射出怎样的权力关系？

三、研究设计：样本收集与编码

（一）样本选择

本研究选取金边六国中具有主要影响力的新闻媒体中涉及中菲“激光冲突”的新闻报道作为样本，包括印尼《雅加达邮报》、泰国《曼谷邮报》、新加坡《海峡时报》、越南通讯社、《菲律宾每日问询者报》、马来西亚《新海峡时报》，主要从 Lexis-Nexis 媒体数据库获取。本文以近年来涉及多方观点表达的南海冲突事件报道为研究样本，经过人工清洗和整理，最后获得有效样本 277 篇。

（二）类目建构

1.消息来源类型。已有研究对消息来源的类目建构主要基于其身份类型（比如政府、企业、普通公众等），为深入揭示不同国家行为主体间的权力差异，本研究引入国别维度，并在对小样本进行前期分析的基础上，将消息来源按照国别、身份两个维度划分为 3*4 共 12 个类目。其中从国别维度划分，包括：中国、菲律宾、他国（即第三方国家）；从身份维度划分，包括政府、军队、媒体、智库。

2.消息来源使用度。消息来源使用度用以考察消息来源在多大程度上被媒体选择和使用，参照陈先红、陈欧阳的研究将其操作化为“使用广度”和“使用密度”。使用广度用以衡量媒体在多大比重的新闻中选择某一消息来源，计算方法为：某一消息来源使用广度=使用该消息来源的新闻篇数/总新闻篇数；使用密度用以衡量某一消息来源在其覆盖的每篇新闻中被使用的平均次数，计算方法为：某一消息来源的使用密度=使用该消息来源的总次数/使用该消息来源的新闻篇数。例如，在 50 篇新闻中，有 15 篇使用了某个消息来源，则该消息来源的使用广度为 30%；该消息来源在三篇新闻中分别出现了 1 次、2 次、3 次，则该消息来源的使用密度为 $(1+2+3)/3=2$ 。使用广度越大表示该消息来源被越多的新闻采用，使用密度越大表示该消息来源在被采用的报道中发出的声音越大。

3.消息来源重组关系。消息来源重组关系即考察消息来源在新闻报道中是被如何重组呈现的。借鉴陈欧阳、蒋国亚的研究，本研究按照重组关系的性质将其操作化为“扩大型”和“消解型”两种类型：扩大型即媒体在使用某一消息来源时将其与观点、立场、态度相近的其他消息来源组合在一起，从而实现对其声音和权力的放大；消解型即媒体在使用某一消息来源时将其与观点、立场、态度相反的其他消息来源组合在一起，从而实现对其声音和权力的消解。编码时，对同时出现在一篇报道中的几个消息来源的引述内容进行两两之间的比较，如果两者态度一致，则这两个消息来源之间的关系标为“+”（扩大），反之，则标为“-”（消解）。比如：一篇报道中同时使用了中国政府、菲律宾政府、他国军队三个消息来源，其中中国政府和他国军队的立场相近，与菲律宾政府的立场相反，则中国政府与他国军队之间的关系标为“+”，中国政府与菲律宾政府之间的关系标为“-”，他国军队与菲律宾政府之间的关系标为“-”。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用内容分析和社会网络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内容分析能够实现对报道中消息来源使用情况的量化统计，社会网络分析则有助于直观地揭示消息来源之间的重组关系。

在操作步骤上，本研究先随机抽取 30% 的样本让两位培训过的编码员进行预编码，消息来源类型、消息来源重组关系两个变量的编码员间信度 Krippendorff's alpha 为 0.84 和 0.83，符合基本要求^[23]；对有争议编码进一步讨论直至达成共识后，编码员进行正式编码。完成编码后，进行消息来源使用广度及使用密度的计算，以及同一篇报道中消息来源两两之间重组关系的统计；并根据消息来源重组关系的性质（扩大、消解）构建 12×12 一模无向邻接矩阵，然后导入 Gephi 软件生成消息来源重组关系的网络图。网络图中的节点代表消息来源类型，节点越大表示该节点的点度中心度越大，即该消息来源与其他消息来源共现频率越高；两个节点间连线越粗表示这两个消息来源共现频率越高，边权重越大；边颜色“红色”意为两个消息来源是相互支持的强化扩大型关系，“蓝色”则表示两个消息来源是相互对立的消解型关系。

四、研究发现

（一）选择维度：“菲强中弱”的话语结构

从使用广度维度来看，菲律宾（90.90%）是东盟媒体采用最为广泛的消息来源（图 1），大大高于中国（66.23%）和他国（64.93%）。具体来看（图 2），来自菲律宾政府的信息是在东盟主流媒体关于中菲“激光冲突”的报道中出镜率最高（72.73%），远高于中国政府（44.16%）。此外，菲律宾军队（35.06%）、菲律宾媒体（2.60%）、菲律宾智库（5.19%）的使用广度也分别高于中国军队（18.18%）、中国媒体（1.30%）和中国智库（2.60%）。值得注意的是，东盟主流媒体还注重发出他国政府（28.57%）的声音。

而依据使用密度维度，相对于中国（1.57）和他国（1.6），菲律宾（2.23）也是发出声音最大的消息来源（图 2）。进一步分析，他国政府（2.00）和中国智库（2.00）虽然居于首位，但因为中国智库作为消息来源只出现在 2.60% 的新闻报道中，并没有被东盟主流广泛采用，所以不是重要信源。而菲律宾政府作为分布最广泛的消息来源，也具有较高的使用密度（1.87）。而相比之下，中国政府再次展现出话语弱势，其使用密度为 1.67，与菲律宾军队（1.66）不相上下，他国军队则略低（1.6）。其余各类消息来源的使用密度则不足 1.2。

综合以上两个维度，发现来自菲律宾（90.90%，2.23）的消息来源是东盟主流媒体关于中菲“激光冲突”事件的相关报道中出镜率最高、声音最大的消息来源，其使用广度和使用密度均位居首位。而作为当事国之一的中国（66.23%，1.57）却尽显话语弱势，在使用广度上略高于他国（64.93%，1.6），但使用密度相对更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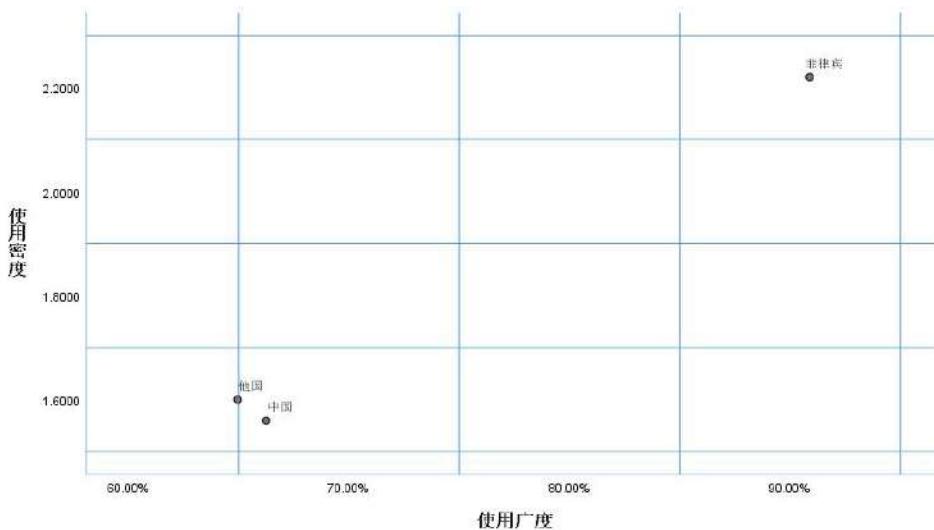


图 1 东盟主流媒体各国别消息来源使用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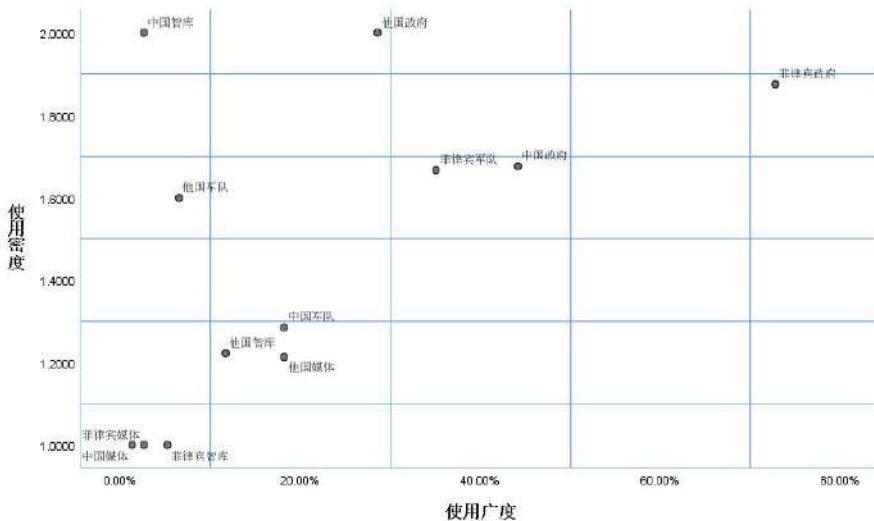


图 2 东盟主流媒体消息来源使用度

(二) 重组维度：平衡中立的来源幻象

本研究首先引入密度 (density) 这一指标来描述消息来源重组网络中各个节点之间的关系。一般来说，密度呈现出网络节点之间的联结程度，取值范围介于 0-1 之间。数值达到 0.5 以上，便可被视为中高等网络密度。密度越高，消息来源重组网络的完备性程度越高，信息流动现象越显著，整体重组网络对媒体提供资源影响的可能性越大^[24]。通过使用 Gephi 软件对六家媒体的重组关系数据进行计算，结果为 0.742，说明六家东盟主流媒体的中菲“激光争端”新闻报道的消息来源重组关系网络属于中高等密度网络，具有较高的完备性。

中心性 (centrality) 是社会化网络重要的结构属性，包括点度中心性 (degree centrality)、中间中心性 (betweenness centrality)、接近中心性 (closeness centrality) 等多种度量方式 (Borgatti, 2005)，能够描述个体行动者在网络中的权利位置^[25]。本研究无意探究节点的桥梁作用和流通方向，因此只引入点度中心度这一指标用以考察各个消息来源在重组关系网络中的权利位置，同时以两个消息来源的共现频率作为边权重。

点度中心度最高的节点是菲律宾政府 (点度中心度 159)，与其共现频率最高、连接最为紧密的三个节点为中国政府 (边权重 59)、菲律宾军队 (边权重 40) 和他国政府 (边权重 25)，其中前者与菲律宾政府之间的连线为蓝色，后两者与菲律宾之间的连线基本为红色，总边权重为 65，说明六家东盟主流媒体倾向将菲律宾政府与中国政府、菲律宾军队和他国政府组合在一起，以相互支持的观点强化菲律宾政府的声音，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对中国政府官方的“消音” (图 3)。

虽然中国政府的点度中心度为 149，居于第二位，并没有与菲律宾政府相差过大，东盟主流媒体看似给予了事件当事双方充分的话语表达权力。但事实上，与中国政府共现频率最高、连接最为紧密的三个节点为菲律宾政府 (边权重 59)、菲律宾军队 (边权重 27) 和他国政府 (边权重 25)，与其他节点的边权重则不超过 10。同时，中国政府与前两者的连线为蓝色，与他国政府的连线以蓝色为主、红色为辅。这说明六家东盟主流媒体在报道中国政府的声音时，通常会组合引用与其观点相悖的菲律宾政府、军队以及他国政府的信息，实现对中国政府的话语的“此消彼长”式压制，从而消解中国政府的声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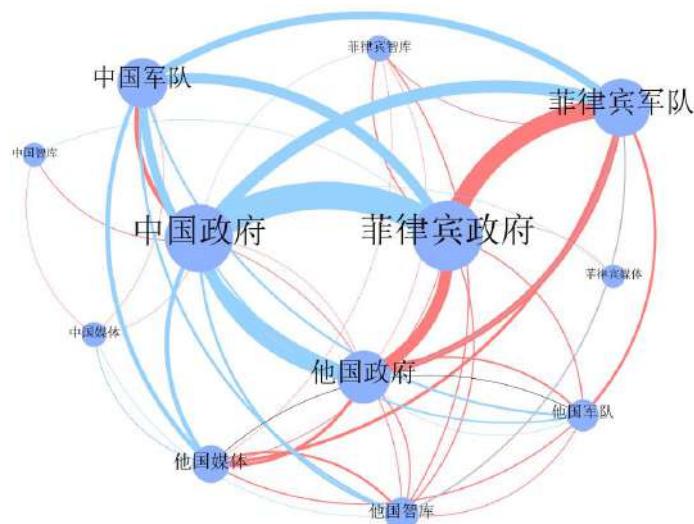


图3 东盟主流媒体消息来源重组关系网络

五、结论与讨论

传统的东盟媒体研究聚焦于华文媒体以及中国国家形象研究，研究对象多为涉华报道框架，虽然会涉及到“消息来源”这一指标，但多限制于“选择偏向”，同时也少涉及南海冲突事件，研究视角存在单一化的趋势。本文强调从消息来源的“选择”和“重组”两大偏向进行全面考察，对六家东盟主流媒体关于南海冲突事件的报道中的实证研究发现，中国声音在该事件的报道中被广泛引用，已成为难以使用选择机制直接排除的重要消息来源。但六家媒体通过“重组”机制组合多种对立声音以达到消解中国声音的传播效果。这一发现在理论和实践上具有一定启发意义。

在理论层面，揭示了“被遮蔽”的东盟主流媒体与多元消息来源主体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一方面，选择机制是东盟主流媒体参与权力实践的重要机制，通过对消息来源的选择或排除，赋予或剥夺消息来源参与真实建构的权力。本研究数据显示，在六家东盟主流媒体关于南海冲突事件的报道中，中国政府官方的声音是使用广度和使用密度最高的消息来源之一，似乎被给予了充分的话语空间，广泛参与社会真实的认知建构。另一方面，研究发现，不同媒体在报道结构与消息来源组合方式上存在显著差异，对各方信息的呈现效果具有影响。因此通过综合考察“选择”和“重组”两大权力实践机制，发现东盟主流媒体在结构安排中展现出对多方观点的表面均衡，但深层结构仍体现传播策略上的倾向性。

在实践层面，近年来大量的东盟媒体研究发现，在东盟十国的各主流媒体上出现的中国声音越来越多，关注度和引用率进一步提高，他塑的中国形象也日趋向好^[26-29]。但是我们在为“报道量”“引用率”大幅提高感到鼓舞时，必须要认识到“声音越来越多”不代表“形象越来越好”。伴随着中国与东盟各国的经贸往来愈加紧密、区域影响力不断扩大，中国已成为东盟国家各大媒体关注的焦点，难以直接借助“选择”机制排除中国声音。但六家东盟主流媒体虽然给予中菲两国政府相近的出镜率，但却通过不同的组合策略实现了对菲律宾声音的扩大和对中国声音的消解。这一发现启示我们，中国改善在东盟国家之中的国家形象认知、提升国际话语权的实践，不能囿于引用率、报道量等指标，而应进一步考察媒体重组实践方式。

本研究还具有下述局限。第一，研究只以南海冲突事件的报道为例，恐存在样本量较少的问题。进一步研究可以全面选取近年来的涉华国际冲突事件，增强研究样本全面性和代表性。第二，研究聚焦于国际冲突事件这一特殊国际新闻类别，缺少对经济、文化、社会、体育等其他议题的涉华新闻报道中东盟媒体与消息来源的互动关系的考察，未来或可从议题类型层面进行视野拓展。

参考文献：

- [1]Gandy O H. Beyond agenda setting: Information subsidies and public policy[J]. (No Title), 1982.
- [2]Dyck A, Zingales L. The media and asset prices[R]. Working Paper,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2003.
- [3]Berkowitz D, TerKeurst J V. Community as interpretive community: rethinking the journalist-source relationship[J].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999, 49(3): 125-136.
- [4]陈欧阳,蒋国亚.“被选择”不等于“被接受”：外媒涉华经济报道中消息来源使用的双重偏向[J].新闻

- 界,2022,(11):77-88.
- [5]臧國仁.新聞媒體與消息來源:媒介框架與真實建構之論述[M].三民書局,1999.
- [6]Rains S A, Ruppel E K. Channel complementarity theory and the health information-seeking process: further investigating the implications of source characteristic complementarity[J].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016, 43(2): 232-252.
- [7]Broersma M, Den Herder B, Schohaus B. A question of power: The changing dynamics between journalists and sources[J]. *Journalism Practice*, 2013, 7(4): 388-395.
- [8]Garcia-Pires A J, Kind H J, Sørgard L. The effects of strategic news sources on media coverage[J]. *Information Economics and Policy*, 2017, 41: 28-35.
- [9]Sigal L V. Bureaucratic objectives and tactical uses of the press[J].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1973: 336-345.
- [10]Hladík R, Štětka V. The powers that tweet: Social media as news sources in the Czech Republic[J]. *Journalism studies*, 2017, 18(2): 154-174.
- [11]陈先红,陈欧阳.公关如何影响新闻报道:2001-2010年中国大陆报纸消息来源卷入度分析[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2,34(12):36-41.
- [12]Cottle S, Nolan D. GLOBAL HUMANITARIANISM AND THE CHANGING AID-MEDIA FIELD: "Everyone was dying for footage"[J]. *Journalism Studies*, 2007, 8(6): 862-878.
- [13]黄诗仪.国内东盟媒体研究的知识经验与趋势分析——基于 CiteSpace 知识图谱可视化研究 (2002-2022) [J].采写编,2023,(09):136-138.
- [14]刘晋,蔡昌卓.印度尼西亚华文媒体的“一带一路”报道研究——以《国际日报》为例[J].传媒,2020,(22):50-52.
- [15]聂浩.马来西亚华文媒体中的“一带一路”倡议——基于对《星洲日报》相关新闻报道的批评性话语分析[J].青年记者,2019,(30):47-49.
- [16]周思敏,俞皎岛.海外华文媒体对人工智能的报道框架分析——以联合早报网与欧洲时报网为例[J].青年记者,2018,(33):95-96.
- [17]陈莹.新加坡《联合早报》的生存策略[J].青年记者,2013,(17):87-88.
- [18]董小英,李其,师曾志,等.奥运会与国家形象:国外媒体对四个奥运举办城市的报道主题分析[J].中国软科学,2005,(02):1-9.
- [19]张美云,杜振吉.基于媒体计算的中国形象“他塑”模型建构——以印度尼西亚等东盟国家为例[J].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37(06):150-157.DOI:10.15886/j.cnki.hnus.2019.06.020.
- [20]张昆,陈雅莉.东盟英文报章在地缘政治报道中的中国形象建构——以《海峡时报》和《雅加达邮报》报道南海争端为例[J].新闻大学,2014,(02):72-82.DOI:10.20050/j.cnki.xwdx.2014.02.012.
- [21]罗奕.他者眼中的中国形象——基于东盟国家大众媒体涉华报道的舆情分析[J].传媒,2019,(14):79-82.
- [22]Seib P M. *The global journalist: News and conscience in a world of conflict*[M]. Rowman & Littlefield, 2002.
- [23]Krippendorff K. *Content analysis: An introduction to its methodology*[M]. Sage publications, 2018.
- [24]Kang S M. Equicentrality and network centralization: a micro-macro linkage[J]. *Social Networks*, 2007, 29(4): 585-601.
- [25]Freeman L C. *Centrality in social networks: Conceptual clarification*[J]. *Social network: critical concepts in sociology*. Londres: Routledge, 2002, 1(3): 238-263.
- [26]王祖螺.中文国际传播与中国形象认知的相关性研究——来自东南亚五国的实证[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54(03):66-77.
- [27]孙梦诗,张瑛,张祎彤.东盟主流媒体报道中的中国经济形象研究——以中国加入 RCEP 相关报道为例[J].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39(03):158-168.
- [28]罗奕,梁媛.泰国华文媒体构建“中国形象”认同研究——以泰国《星暹日报》和《世界日报》微信公众号新闻推送为例[J].传媒,2016,(24):57-59.
- [29]申雪凤.海外华文媒体对“真实中国”形象塑造的作用——以联合早报网《读者调查》栏目为例[J].传媒,2016,(01):78-81.

"Agent Media": A Study on Source Bias in China-Relate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Coverage by Media of Six ASEAN Countries

Li Kanglong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Guangxi University, Nanning, China

Abstract: In international news reporting, various social actors participate in news production as information sources, thereby acquiring power to construct reality and define social truths through complex power relations with media.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source bias in ASEAN media's coverage of China-related international conflicts through the dual lenses of "selection bias" and "restructuring bias," revealing hidden power practices. Empirical analysis of news sources demonstrates that mainstream media in six ASEAN countries based predominantly cite official voices from both Chinese and Philippine governments via "selection bias," while employing "restructuring bias" to position Chinese and Philippine sources within opposing or aligned narrative networks. This dual mechanism diminishes China's discursive influence while amplifying Philippine perspectives. The study advances understanding of power interactions between ASEAN media and sources, highlighting the need to prioritize "restructuring mechanisms" in China's global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Limitations include sample size constraints and narrow issue focus. Future research should expand to multi-conflict analyses across diverse geopolitical contexts or extend to source interactions in non-conflict news.

Keywords: ASEAN media international conflict reporting source bias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2.525

因距生情：拟剧理论视阈下音频主播的自我呈现研究

——以克拉克拉 App 为例

王柏儒¹

(宁夏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 宁夏 银川 750021)

摘要：借助戈夫曼拟剧理论，采用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的研究方法，探讨面向亲密差异受众的音频主播如何进行自我呈现。研究发现，在近距离自我呈现时，主播通过剧班共谋、瑕疵呈现和隐私展演的方式塑造理想形象，维系亲密关系；在隐秘式自我呈现时，主播通过神秘化、缺席出现和限制不协调受众的方法恢复所耗精力，维持印象管理。但在面对亲疏不等的受众时，音频主播仍旧存在自我呈现的矛盾，可能产生内容输出瓶颈和直播倦怠心理等不良反馈，甚至产生“恐播”情绪。

关键词： 拟剧理论；音频主播；自我呈现；亲密距离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与沉浸式“杀时间”的短视频相比，音频的伴随属性愈发凸显，在移动端视听应用中也找到了独特的生态位，截至 2023 年 12 月，网络音频应用人均单日使用时长已达 29 分钟，仅次于短视频、长视频、娱乐和游戏直播应用，作为粉丝经济的重要变现途径，被赋予情感陪伴和社交互动价值的音频直播是网络音频应用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区别于视频直播，从事音频直播的表演者无需对自身外形或者直播环境精心修饰，他们以声音为核心，发展出情感陪伴、助睡催眠、音乐才艺和配音 Pia 戏等多样化的直播内容，形成了一套个性化的表演体系，音频直播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为更多普通人提供了自我呈现的舞台，但在呈现过程中又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诸多挑战。以戈夫曼拟剧理论为鉴，本文主要围绕两大问题展开研究：其一，音频主播采取何种“距离式”自我呈现的策略。探讨近距离的自我呈现如何进行，分析其为直播间的互动展演和主播个人形象塑造带来的便利；同时思考隐秘式的自我呈现如何在音频直播中展开，探析其存在的意义；其二，探究矛盾化的自我呈现方式，分析亲密关系差异下的自我呈现存在何种桎梏与弊端，通过探讨克拉克拉 App 音频主播独特的自我呈现方式以及主播自身接收的反馈，以期为未来研究提供理论参考。

二、文献综述

(一) 传声至今：音频直播研究现状

当前，网络直播已经成为互联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入参与到大众生活的方方面面。根据《第 54 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 2024 年 6 月，我国网络直播用户规模达 7.77 亿人，占网民整体的 70.6%^[1]。然而对于网络直播的既有研究聚焦于视频直播领域，对音频直播鲜有涉及，事实上，随着相关技术不断革新，网络音频行业持续发展，2024 年我国在线音频用户规模已达到 7.47 亿人^[2]，音频直播市场规模也有望迎来进一步扩容，对此，本文对音频直播的既有研究进行了分类梳理，将分别从两种角度出发阐明该领域研究现状。

1. 主体区别：从受众到传者

[作者简介]

王柏儒（2004—），男，山东潍坊人，宁夏大学本科生。

根据面向主体的差异，国内的既有研究大致可以分为受众视角和主播视角两部分。

从受众视角出发，用户与音频直播的关系是研究重点。王晨引入巴赫金的狂欢理论，通过分析移动电台直播的狂欢化特征，得出受众收听音频直播的核心动机是狂欢化场景实现了用户情感的释放^[3]。赵依伶同样以选择动机为出发点，构建了网络语音直播平台用户持续使用意愿的理论模型，并总结出语音直播平台对用户持续使用意愿的影响因素^[4]。余思乔则将目光聚焦于受众的角色转变，强调音频直播极强的互动性使得用户从单一的信息接收者逐渐转变为媒介使用者，成为音频内容生产的一部分，认为这种用户主体性的加持对于音频内容生产起到积极作用^[5]。除却整体的关系分析，受众视角的研究也愈发关注用户自身需求，李晨宇、石超从音频直播平台用户的孤独情绪入手，认为缓解孤独感是促成用户打赏的核心因素^[6]。赵红勋、刘秀娟则将研究重点放在用户的社交需求上，认为音频直播改变了用户原有的交往方式，强调其打造了“声音社交”的这一新的社交图景^[7]。

而作为衔接“声音社交”的音频主播，自然也不可忽视，作为正向的意义制造者，主播自身的体悟需要得到研究者的“看见”与尊重^[8]。揆诸既有研究，主播视角的文本大致聚焦于主播的表演策略、关系网络以及发展建议。郝思佳通过分析音频主播在形式、内容、互动等方面的情感传播技巧与问题，旨在引导平台良性发展^[9]。张雨则通过逐一分析主播与粉丝、同行和平台的关系，对音频主播这一职业进行了“全景式解码”^[10]。而在发展建议方面，马明扬将主播自身成长作为研究重点，解析音频直播成败的诸多要素，试图为主播提供一条可供复制的“成功之路”^[11]。但归结起来，多数研究关注的是主播发展状况，将其作为音频直播内容生产与传播的一环来看待，极少关注主播自身在职业实践中的主体性意义与面临的真实困境。实际上，在直播平台与助理、运营等“辅助者”的经济利益驱动下，音频主播往往面临着与受众亲密关系的“异化”^[12]，长期错位的“亲密”使得他们往往会承受较大的心理压力，甚至产生职业倦怠和恐惧情绪。

2.整体发展：成长逻辑与细节反思

2016年被称为中国“网络直播元年”，但直到2018年，我国在线音频用户规模突破4亿后，音频直播方才迎来自己的“井喷之年”。从发展动因上看，李巧玲认为语音直播在强刺激性的视频直播呈现疲态时，围绕听觉进行内容排布，以其强陪伴属性、优核心内容、低成本、高盈利的独特优势开辟了网络直播的“新战场”^[13]。白臻昊则将重点放在网易云音乐、斗鱼、映客等大平台的“入局”上，认为众多大平台的加盟将会为音频直播注入更多活力和竞争力，能够促使其向好发展^[14]。正是自身的独特属性，加之各大平台的强势“下场”，为音频直播提供了较好的发展空间。但为了实现快速成长，音频直播平台在运营模式、生产模式与商业模式的发展上一直持续发力。周小燕认为语音直播主要遵循受众参与的互动传播、名人效应、打赏经济、联动视频直播等四种运营模式^[15]。汪勤通过分析荔枝FM、蜻蜓FM、喜马拉雅FM等三家电台的内容布局，指出UGC模式是语音直播内容生产方式的主要方向，但需要加强内容审核以提高输出质量，同时不忘版权保护，努力实现人人生产、人人观看、用户与平台双赢的效果^[16]。在商业模式上，童云、李雨琪和张启锐总结出粉丝经济模式、内容订阅模式、广告定制模式和电商模式等四种经济模式，并把粉丝经济模式视作营收的主要方式^[17]，这种依托于情感积累的利益变现加快了音频直播的盈利速度，在其整体发展中起着关键作用。伴随着运营、生产与商业模式的逐渐成熟，音频直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内容同质化较高、强娱乐性、媒介暴力等问题，对此，申启武、李颖彦认为音频直播平台应当在强化用户黏性的同时，不断突出自身的内容特点，追求“差异化发展”^[18]。贺建平、庄学勋则以新媒体社会责任为理论视角，指出在线直播语音平台要强化制度管理、重视社会效益、保障直播内容的健康^[19]。从初入大众视野，到形成一套完善的成长逻辑，音频直播始终保持着较为平稳的发展速度，在“耳朵经济”持续扩容的当下，充当着音频内容生产的重要增量。

除对音频直播整体发展逻辑的分析，也有学者选择从小处着手，研究音频直播的某一切面或延伸。崔静从审美视角出发，认为音频直播在建构声音审美同时，也存在受制于商业利益而产生的“审美反叛”^[20]，比如“以丑为美”的审美取向。申启武、李颖彦则从情感角度出发，认为语音直播这种陪伴式的情感服务可以实现对现实生活的“情感反哺”，有利于受众的情感宣泄，满足其情感需要^[21]。无论是审美还是情感，都是研究者从某一切面对音频直播的思考。当然，也有学者选择从媒介融合角度对音频直播进行延伸思考，赖黎捷、邱鑫和吕颖莉将音频直播与广播直播带货结合起来，认为广播的转型应当发挥主流媒体优势，用专业性和可信度满足受众需求，改善广播经营状况^[22]。佟敏则以情感热线互助平台“绵羊热线”App为例，强调广播要在内容、渠道、运营等多方面进行“新媒体转向”，提高内容实用性和听觉感染力^[23]。从延伸文本来看，既有研究的主题在于如何将音频直播的成功经验用于传统广播转型，从中也可以窥见音频直播的向好发展趋势。

(二) 网络面向：自我呈现理论研究

谈到自我呈现，最早可以溯及芝加哥社会心理学派的“符号互动论”，由米德创立，体现在其著作《心灵、自我与社会》一书中，他的学生布鲁默在1937年出版的著作《人与社会》总结提出了这一概念。在“符号互动论”的形成过程中，不少学者对其做出了贡献。杜威认为人会因为遇到的障碍，有倾向性地做出行为改变，以此来克服障碍，满足一种理想化的自我期待与社会预期，由此提出了“习惯”和习惯改变的情境。杜威强调的这种“调整自我以适应环境”的实用主义哲学对符号互动论产生了重要影响。库利提出的“镜中我”概念将社会互动视作来自双方的“想象”，即将每个人都看作一面镜子，通过这面镜子，个体思索自我形象、他人评价以及自我感觉，以此来不断调适自我行为^[24]。库利这种“想象”的观点也对“符号互动论”的形成有重要意义。米德则将“角色”引入社会学领域，提出“扮演他人角色”的概念，认为个体的表演是基于观众的想象，正是在这种角色扮演的过程中，个体方能逐渐了解各种行为规范，最终实现自我的社会化^[25]。在前人的基础上，1959年，符号互动论第三代表人物欧文·戈夫曼出版了自己的专著《日常生活的自我呈现》，将日常生活中人际间的微观互动作为研究对象，系统性地阐述了“拟剧理论”。他提出，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行为，在某些程度上可视为一类表演。存在于社会空间中的每个个体都是表演者，或是某些剧班中的一员，在特定的场景与空间下，基于特定目的与规范，在观众的注视下进行角色扮演。在其整个表演过程中，表演者尽可能关注某些印象，并赋予相适应的品质、品性，当演出结束回至后台，表演者又恢复其原本真实状态。在前台，人们扮演的通常是一类理想化角色，后台则是与表演行为促成形象所不一致的发生区域，可以表述为准备区域，其具有一定的隐匿性，不必像前台那样约束自我，允许更为真实地呈现自我^[26]。戈夫曼的拟剧理论，诠释了拟剧化表演在日常生活情境中通过人际互动，达成自我印象管理的具体策略。

伴随着互联网技术和社交媒体的蓬勃发展，国内外的自我呈现研究都发生了明显的“网络转向”，其研究边界也在不断扩展。在国外的既有研究中，Joinson 将线上聊天作为研究视野，认为用户为提高自身的社交吸引力通常存在夸大或虚假的形象呈现^[27]。这一点突出体现在线上约会平台中，Toma 和 Hancock 发现，谎言和选择式呈现更有利提高用户的性吸引力^[28]。Hope Jensen 对私人博客上用户的身份建构进行分析，从心理学视角出发，探究用户对个人账号自我形象呈现的期待^[29]。Jung 通过对 Cyworld 用户的研究，总结出娱乐社交、自我表达、能力提升三大用户自我呈现的动机，同时提出讨好、逢迎、强迫三种形象塑造策略^[30]，对青年社区的自我呈现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阐述。在社交媒体的自我呈现方面，Bouvier 以 Facebook 为研究空间，系统总结出其用户的四种自我呈现行为^[31]，Maslowska 又以此作为研究对象，认为用户为提高自己的社交地位，往往会表现出“因人而异”的自我呈现策略^[32]。

在国内的既有研究中，自我呈现的“网络转向”特征更为明显，覆盖到多种网络呈现形式。甘韵矶以微信“晒”客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其在熟人社交平台的自我呈现与交往行为，认为“晒”客的自我呈现本质上是一种理想化的自我形塑，以此为桥梁，有利于加固熟人社交关系^[33]。在短视频方面，自我呈现的研究呈现出一种“由整入零”的趋势，即从研究短视频本身，拓展到对短视频不同呈现主体的针对性思考。从整体来看，王长潇、刘瑞一将网络视频和日常生活划分为个体呈现的前区和后区，强调前区的角色扮演往往可能产生个人后区的消逝，甚至产生一定的角色伤害^[34]。从不同主体来看，王朝阳、吴可将抖音日文版 Tik Tok 中日本青少年短视频作为研究对象，得出其自我呈现存在前台表演“伪后台化”、形象塑造戏剧化、低龄用户理想化等特征^[35]。汪圣、陈媛媛和任丽娟则将目光投向短视频中的图书馆员，认为其理想化的自我呈现解构了公众的刻板印象，但同时也存在表演痕迹过重等问题^[36]。沈奕杉、陈胜将研究对象聚焦于小红书平台上的女性离婚短视频，发现其自我呈现实现了从情境自我、消除自我、表演自我到抵抗自我、接纳自我、认识自我的转变^[37]，有利于离异女性跳出“离婚污名化”，悦纳新生活。此外，近年来，Vlog、Plog 等新兴社交形态也逐渐与自我呈现研究接轨，孙雨菡以“蜀中桃子姐”Vlog 为研究对象，探究三农 Vlog 中农民群体的自我呈现状况^[38]，刘芹妍则从“舞台布置”和“道具选择”等方面解读名人 Vlog 中的自我呈现策略^[39]。张美洁将目光转向小红书的 Plog 博主，认为其自我呈现是基于剧本、场景等要素而建构的理想自我，虽然能够借此打造个人 IP，提升商业价值，但也会产生自我呈现过度“景观化”、群体性孤独等问题^[40]。

除上述领域外，网络直播也是自我呈现理论应用的重要舞台，根据直播性质差异，既有研究大致可以分为电商直播和娱乐直播两种方向。在电商直播方面，钱霖亮关注到了中小带货主播这一特殊群体，他以浙江义乌北下朱村的中小主播为研究对象，发现其富含“草根元素”的自我呈现方式使得其突破了固有的资本劣势，将这种“低度包装”和本真的自我呈现转化为销售优势^[41]。杨志华还是从电商主播的整体视角出发，认为其自我呈现实践和与受众交流的过程中存在前台“职业化”、后台“公开化”、个体“多角色化”的特征^[42]。朱逸、尹卫华则认为，正是通过这种主播、受众等多方主体的互动，电商直播才呈现出一种“拟剧化营销”的运行机理^[43]。在娱乐直播方面，杨伟对明星直播的自我呈现行为进行分析，总结出能力、示弱、范例三

种策略^[44]。范彩华将抖音平台的健身直播作为研究对象，认为其主要使用理想化表演、满足观众窥视欲望和预防情境崩塌三种形象建构方式^[45]。此外，虚拟直播与游戏直播也成为自我呈现研究的常客。对于前者，金培培总结出虚拟主播主要采用直播前策划、直播中表演、直播后开放后台策略，辅之以粉丝的应援式创作，共同服务于虚拟主播自我呈现^[46]。对于后者，王璐认为游戏主播积极的形象展演有助于消解大众对游戏群体的刻板印象，但受制于经济利益等条件，主播自身也呈现出身体异化等风险^[47]。

对于主播的异化，江莉从直播运作流程的视角出发，认为其主要体现在主播主体性的丧失，已然沦为“为人设而活”的固有的劳动机器^[48]。而在 Xiaoxing Zhang、Yu Xiang 和 Lei Hao 看来，主播的异化很大程度上来源于经济利益驱动下亲密关系的商品化^[49]。在直播间中，主播看似在游刃有余地“招待朋友”，但在这一过程中往往会对不同的观众展现出不同的情感距离^[50]，而这种距离把控的重要影响因素就是受众的经济支付行为，是可供“买卖”的。这种商品化的亲密距离在为主播及平台提供经济利益的同时，也成为主播“异化”的关键，探究主播“距离式”自我呈现策略有利于找寻主播的主体性意义、发现主播当前面临的矛盾与困境。

基于以上考量，本研究选择以亲密距离为切入点，借助自我呈现理论，对音频主播这一通常被忽视但却日益重要的主播群体进行研究，主要提出以下研究问题：其一，音频主播通常采取何种“距离式”自我呈现的策略？其二，音频主播实践亲密关系的自我呈现通常受制于何种矛盾？

三、研究方法

采用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一）深度访谈

共选择 10 位音频主播通过腾讯会议的形式进行线上访谈。为确保样本的多样性，所选主播在性别、职业性质、直播类型、从业时间、粉丝量等方面均有差异。笔者通过观看其直播，与其达成访谈约定。此外，为增加研究信度，笔者根据主播守护牌等级，选择了 10 位等级较高的直播听众作为访谈对象。每位受访者接受访谈的时间约为 60~120 分钟，在被访者同意的条件下进行全程录音。访谈结束后，通过整理录音，将有意义的访谈文字全部摘录下来，共得到 29474 字的采访资料。

（二）线上参与观察

在单一的访谈资料并不充分的情况下，从 2024 年 7 月到 9 月，笔者深入受访主播的直播间进行了为期 2 个月的观察，在征求其同意的前提下，得以进入其粉丝群保持“潜水”状态，观察并收集信息，截至 2024 年 9 月 1 日，将微信群聊内容全部导出，包括话语文本、信息发布者、发布时间等。

四、研究结论

（一）何以咫尺：一屏之隔的互动展演

1. 剧班共谋：必要“剖白”服务前台表演

半遮面尚且引人遐思，但闻其声不见其人，更可以给听众留足想象的余地，也留给音频主播更大的表演空间。甫一开始，直播间里上演的可能是主播的独角戏，但无论是否出于本人意愿，这种状态并不会持续太久，剧班共谋是意料中事，它一般通过两种方式吸纳同伴。

其一，主动吸纳原有的合作伙伴。这一类成员一般指音频主播的运营或者助理，他们与主播之间本身就存在一定的合作关系，但是在直播之初，双方对彼此的了解都不深，很难做到坦诚相待。随着双方的不断磨合，同时也是出于主播的个人需要，运营和助理大概率会得到主播一定的个人“剖白”，得到这类信息的成员则正式成为剧班中的一员。在直播中，他们可能主动为主播的“谎言”买单，在直播间“摇旗呐喊”，维护主播的前台理想形象，这一类成员是理想化的剧班成员。

其二，被动接受亲密受众成为同伴。受众在直播间内停留的时间具有不稳定性，而这一点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主播与不同受众之间存在亲疏关系的差异。倘若每个音频直播间都有一定的“寿命”上限，那么从直播间存续之初就活跃着的“老粉”必然会比后来的“新粉”了解更多主播的个人信息，可能这一部分信息也夹杂着主播的个人加工成分，或许真假参半，但即便只掌握了部分信息，这些亲密受众也得以成为剧班中的一员，积极地在直播间内做好控场、挂板子，招徕新听众。他们大多数以一种“熟人”的姿态自觉地维护好直播间的秩序，这一类成员虽然的确发挥着一定作用，但并不是完全理想的剧班成员。一旦出现关系破裂等状况，“榜姐”“大粉”所掌握的主播个人信息就可能成为影响甚至破坏主播理想化形象的一把利刃。

对音频主播而言，无论是主动吸纳还是被动接受，剧班成员一定限度内的增多有利于直播间良好秩序

的形成，从“加固”老粉到吸引新人，在剧班成员的共同作用下，音频直播可以形成一个良性循环。但剧班共谋尤为重要的作用体现在对主播个人理想化形象的维护上，主播虽然向直播团队和部分亲密受众让渡了一定个人信息，但却为自身的前台形象覆上了一层防护网，使其前台的表演更具可信度，在剧班的配合下，其表演也更加自由。

2.前台瑕疵：不完美演出和亲密关系的维系

拟剧视域下，前台表演被赋予理想化和权威化的标签，但在音频主播的自我呈现中，适当的“示弱”也是表演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不以真面目示人的特点决定了音频主播在取信受众方面面临更大挑战。维护好理想化的“人设”固然重要，但在部分无关紧要的环节展示瑕疵更可能收获听众的信任。在音频直播中，人设基本从两方面呈现出来。其一是主播现实生活中的职业身份、家庭背景、学历等级、经济状况等信息。这一部分虽然与直播内容关系较少，却是人设魅力的主要来源，因此主播在展现此类信息时大多会做一定的理想化处理，同时确保可以对呈现内容自圆其说。其二是主播在直播间内的表演。这类表演虽然包含 Pia 戏、音乐等多种呈现形式，但本质上仍旧是一种陪伴式的表演，而无需“造神”。因此这一部分是瑕疵呈现的完美舞台，主播可以刻意展示一些与既定人设不符的特质，如唱歌破音或者“糊涂”头脑，以及适当的自嘲，这一部分瑕疵的呈现不仅对理想化人设的搭建无碍，反而可以使人设更加立体生动，因为理想形象并非完美形象，看似不完美的演出却能产生极富反差感的节目效果，让人设“落地”。

较之“神化”的人设，瑕疵化的人设与听众的距离感更弱，主播可以以此为契机“放下身段”，使其成为搭建传受双方亲密关系的桥梁。音频主播有多种方式实现和听众的亲密化，在听众进入直播间时，主播通常会“点名”欢迎，在收到礼物时尤其如此，读昵称可以让听众知道自己得到了主播的关注，在赋予尊重的同时也可以拉近与听众之间的距离，部分主播会选择给常来的听众添加备注，以此来维护已经建立好的亲密关系。此外，也有主播选择以专属歌曲冠名的方式来维系关系，即亲密程度高的听众可以在直播间留下独有痕迹，一定程度上，这也是一种激励手段。在建成的亲密关系中，主播和听众之间存在一种独特的交流方式，在直播进行时，主播和听众使用克拉克拉 App 的私信功能或者其他社交软件进行沟通，最为典型的是直播时在微信群同步交流，这是以“特权”来维系亲密关系的体现，因为新入场的听众是无法即刻享有这些权利的。

3.主动“泄密”：隐私暴露佐证理想形象

一般而言，后台是表演者的隐秘区域，是真实自我表达的空间，但在多样化媒介平台共存的当下，单一且完整的前台表演已经难以达成，即便在直播过程中，面对亲疏关系不等的听众，音频主播有时也不得不兼顾多种角色的扮演。前台和后台之间存在互相位移的倾向，呈现出一种“泛边缘化”的状态，如何在这种随时可能发生的角色翻转中维系好前台形象的理想化，主动“泄密”是音频主播常见的应对策略。这一策略要求音频主播应当准备好一定范围内等待暴露的私隐，这一部分内容介于前台和后台之间，既不像前台可以直接受演，又不似后台要完整保护，但又的确带有前后台的双重性质。

首先，一定程度的隐私性质使其成为主播与听众建立亲密关系的“投名状”，主播与部分听众共享“秘密”的行为使得这部分听众进入亲密关系的行列。在听众看来，掌控主播的部分私隐意味着他们在直播间中的地位要高于其他听众，其对音频主播的黏性又会进一步增加。其次，隐私的理想化使得这部分私隐具有加固前台形象的功能。无论是在直播间还是在日常生活的动态展示中，音频主播会通过多种方法制造意外，以此来展示理想化的私隐部分。最为典型的是在下播时段，在与听众道别后，主播会故意“忘记”关麦，以此合乎情理地表现出自己日常生活中的“本来面目”，此时听众就可能会惊奇地发现自己喜爱的主播现实形象依然理想或者具备反差萌感，但无论听众存在何种倾向，私隐部分展示的形象都只是前台理想化形象的一种延伸，所谓“后台”的暴露可以佐证前台已经建立好的理想形象。拥有这样一部分前台和后台的过渡区域，主播在表演时就有了一定程度的自由空间，在面对亲疏程度不同的听众时，主播可以充分利用听众的窥私欲，以过渡区域的私隐向新听众“投诚”，同时亲密受众因为提前掌握了这部分信息，也会产生一定的优越感。如此一来，无论主播角色如何翻转，始终有一个提前创设好的“后台”以作应对，音频主播理想化的前台表演就得以始终维系下去。

（二）何以隔膜：限制接触的印象管理

1.以声塑形：神秘化的“声音幻想”

“我们就像是一枚社会硬币，一面是敬畏，一面是羞愧”，里茨勒的话在音频主播的身上恰如其分地呈现出来。不同于视频直播，没有图像传达的声音表演给主播们天然地覆上一层神秘面纱。从客观角度讲，理想化的声音可以生成听众脑海中的理想化形象，这一过程不是由主播控制完成的，而是借助听众自身的“声

音幻想”完成的。至于这一理想化形象是否与主播本人相契合，听众无从得知，但只要主播后台的真实形象保持隐秘，听众心目中的理想形象就会一直存在，并且随时间延续而不断加固。相应地，一旦主播暴露出与听众期待不符的真实形象，听众就可能产生巨大的心理落差，甚至会缩短直播间的“寿限”。音频主播之于听众，因距离而“敬畏”，因坦诚而“羞愧”。基于这种考量，大多数音频主播会有意识地与听众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以此来维护听众心目中的理想形象。而听众对这种印象管理策略也并非全然不知，但他们大多数乐在其中。最为典型的莫过于“磕 CP”，在克拉克拉平台，依托“情侣营业”起号的音频主播并不鲜见，且近年来呈现一种“流水线生产”的模式，在直播中他们可能按照既定话术积极“暧昧”，在直播前后又通过直播切片或是文案视频等扩大影响，印证听众心目中的“真情侣”形象。尽管听众对他们的后台一无所知，但这并不妨碍“声音幻想”的膨胀。听众的“上头”本质上就是出于对主播未知形象的理想化描摹，因神秘化而产生“距离美”。

2. 缺席对待：面具下的疲惫人格

在音频直播过程中，缺席对待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主播缺席，另一种是听众缺席。首先来谈前者，对音频主播而言，直播可谓是一个“体力活”，因为对他们而言，身体的部分“缺席”使得声音成为进行自我呈现的唯一渠道，因此要想在有限的直播时段内获取更多热度，主播需要尽可能连续不间断地表达，这种表达未必言之有物，更像是主播对自身的“搜肠刮肚”，有时还需要临场应变、借助外力。譬如为维护人设，主播可能需要一边查阅资料一边与听众进行实时互动，在直播过程中就表现出“多重面具”的性质，因此主播魅力的呈现更像是一种表演，而这种表演往往需要花费大量精力，因此在一场直播结束后，主播往往没有多余的精力再投身于粉丝群的互动或者和部分粉丝的单线联系，而选择缺席出现，但是这里的缺席往往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缺席，主播的剧班同伴往往会代替主播来应对此类场面，积极地维护粉丝群秩序，照顾好听众情绪，给主播留足恢复精力的时间。

较之主播缺席，听众缺席更为私密，这与主播的“个人剧班”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虽然在直播过程中主播组建了较为完整的直播剧班，吸纳了很多剧班同伴，但无论是原有的运营、助理，还是后来的亲密听众，他们都不能接触到主播的完整后台，反之亦然，因此主播与其坦诚相待就必须承担一定风险。而在音频直播的过程中，主播难免会遇到部分难以应对的听众，甚至收获辱骂和难堪，但是为了继续维护直播间持续和睦的互动情境，主播也必须礼貌对待。即便侥幸躲过此类事件，主播在善待听众、讨好听众的过程中，还是难免会产生一些自尊的失落，部分主播会选择与剧班同伴贬损听众，以此作为补偿。但这种行为存在很大不确定性，由于主播与剧班同伴对彼此的了解并不深刻，当听众缺席现场，主播与同伴实质上是作为两个独立剧班来进行交流的，因此可能存在形象崩塌与泄密的风险，这也就是平台上主播“每日一塌”、榜姐“每日一瓜”的原因之一。

3. 近则不恭：限制不协调角色的出现

戈夫曼认为，只要允许非同行成员成为密友，叛逆者就会出现。在音频主播组建的剧班中，这一类不协调角色并不鲜见。根据其出发点的不同，不协调角色主要分为两种。

其一，破坏性不协调角色。即便没有完整后台的展示，主播在与剧班同伴过于亲密的关系中，仍有可能自我暴露太多，神秘感因此消逝，部分亲密听众对主播的新鲜感也会随之消逝。由于此时的亲密听众掌握了太多“内部信息”，基本完成了对主播的“祛魅”，在和主播的互动中占据了主动权。一旦此时双方产生矛盾或者关系破裂，原来的亲密听众很可能会完成由“跟随者”向“反叛者”的转变，它通常体现在“黑料 PPT”的制作与传阅，也可能是直播间的“贴脸开大”，但无论这批“叛逆者”选择何种方式进行“脱粉回踩”，对音频直播本身以及主播个人的声誉都会造成极大的破坏。

其二，人设型不协调角色。一般而言，音频主播在前台建构的形象虽然片面，但却是高度理想化的。听众会普遍认为自己的“声音偶像”是道德素养极高的人，因此当主播与听众距离缩短，就可能面临着“道德绑架”问题。最为典型的是节日红包的派发，更有通过水滴筹捐款等，且一般要求的款项较高。一旦主播拒绝此类道德性诉求，其前期建构的理想形象就会遭到极大质疑，严重者还会导致个人形象的崩塌。

归结起来，无论是破坏性不协调角色，还是道德性不协调角色，本质上都是主播与听众之间亲密关系的异化，所谓“近则不恭”，不协调角色往往出自亲密听众之中，想要限制其出现或产生影响，主播需要在直播间中建设防护性措施，如将可靠同伴设置为房管，以便及时禁言不当言论；在直播间之外，要学会合理维系亲密关系，有部分主播选择开通社交软件的小号专门运营粉丝关系，尽量将自己的现实生活和主播身份完全分离，始终与听众保持一定距离，以期打造一个富有神秘色彩的“完美主播”形象。

(三) 情之所致：亲密差异下自我呈现的矛盾

1. 远近难辨：流动性的亲疏关系

在音频直播中，即便一位听众和主播的关系完成了由陌生向“亲密”的转变，也不代表这种亲密关系可以长久存续，而是呈现出流动性的特征。在克拉克拉 App，听众与主播的亲密程度主要通过灯牌等级来呈现，其等级主要有两个因素决定。

其一为陪伴时长。所谓情感陪伴，不单是主播为听众提供，收听音频直播的受众也会“反哺”主播，听众陪伴主播的时长是双方亲密关系形成的重要基础。要使自己的灯牌始终“高高亮起”且不掉等级，听众需要尽量做到每天打卡、送小礼物，此外还需多多点赞评论主播更新的动态信息。即便听众没有为主播贡献太多的经济价值，这种基于长时间陪伴与互动建立的亲密关系通常也较为牢固。但很少有听众可以恒久保持这种维系亲密的行为，因此最初的亲密听众会不断流失，但新一批听众又会补齐缺位，如此往复。

其二为经济赋值。这一类亲密关系可以通过在短时间赠送大量经济价值较高的礼物来建立，就如同游戏中的以“氪”代“肝”。因为听众为主播贡献大量经济价值，其灯牌也会在短时间内快速升级，主播同时也会对其有所偏待，使其进入亲密听众的行列。因为在经济上的沉没成本太大，这一类听众通常会对主播要求偏高，一旦主播表现与其期待不符，就有可能关系破裂，亲密性也就随之消逝。因其与主播相识未深，原本了解就不够多，因而这一类迅速“上头”又迅速“下头”的情况发生频次较高，双方的亲疏关系也就更不稳定。

无论是基于情感陪伴，还是礼物打赏，音频主播与听众之间的亲疏关系始终存在流动性，并无稳固之说，因而对主播而言，“亲”与“疏”之间的界限极难把握，一定程度上也给其自我呈现带来了桎梏。

2. 朝新暮旧：面向新老听众的矛盾化表演与内容输出瓶颈

当亲密程度不同的听众同时在场，音频主播的自我呈现通常极具矛盾性，这本质上是因为亲密程度较高的听众需求发生了转移，由于这一类听众已经对主播的个人情况乃至部分后台有所了解，他们所期待的就不再是主播一如既往的前台表演，而是希望能够以“故交”的身份同他们进行寒暄或是深度交流。在直播间中，他们通常以积极上麦互动等方式来强调存在感，甚至可能反其道而行，以一种“玩世不恭”的态度贬损主播以证亲密，成为直播间中的不协调角色。最为典型的还是直播时微信群的同步互动，在这一过程中，主播大多无暇顾及新听众，一定程度上会加速其离场。但是对主播而言，维系既有亲密关系只是直播的一小部分，能够通过自我呈现积极地招徕新听众入场才是核心任务。那么一旦双方同时在场，主播的自我呈现就会陷入矛盾，陷入难解的“优先级”问题，亦无法在同一时间满足双方不同的收听需求。

此外，亲密听众对直播内容的高度熟悉会限制主播的前台展演，一定程度上导致内容输出瓶颈的产生。一般来说，音频主播都有用以吸粉的优势才艺，但对亲密听众而言，这些大多是重复性表演。那么在新老听众同时在场时，主播往往会陷入表演瓶颈，甚至产生“表演羞耻”，即羞于演绎对于部分重复性内容，这一现象在人气较低的直播间表现得尤为明显，在该类直播间新老听众比例严重失衡，亲密听众占比极高，主播的“表演羞耻”就更为凸显。在相对高人气的直播间，由于新听众不断入场，新老听众比例较为均衡，这一类内容输出瓶颈并不明显。但当亲密程度不同的听众同时在线时，其自我呈现的矛盾依然存在，尤其是在面对“榜姐”这一类提供较高经济价值的亲密听众时，矛盾更加显著。

3. 主播焦虑：直播倦怠心理与“恐播”情绪

阶段性的直播后，大多数音频主播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倦怠心理，这是由多方面压力促成的。因为与亲疏问题关系密切，这里着重分析其面临的涨粉压力。对音频主播而言，他们不仅需要积极维护好已有粉丝，更要努力拓展新听众，此外还面临着双方同时在场时自我呈现的矛盾。这意味着他们进行了长时间的情感劳动，在直播时保持持续的专注和高度的反应能力，不断构思下一步的举动以起到娱乐听众的效果。当他们离开直播间，有时也不得不继续戴上“面具”对粉丝群体进行线下维护，这种维护可能是“一对多”式，如微信群沟通；也可能是一对一式，即主播与粉丝单线联系。但无论是哪一种维护类型，对主播而言都是一种“加班式”情感劳动，主播生活与现实生活的边界逐渐模糊，“面具”成为日常穿戴工具，这是加剧倦怠心理的重要一环，因为当直播间的情感劳动渗入生活，音频主播几乎失去了恢复精力的空间，隐私虽然未被暴露，却依然呈现出一种“后台沦陷”的境地。此外，由于主播在直播中可能出现“自尊剥落”的情况，在直播间无法发泄的状况下，主播往往会将这种负面情绪带入现实生活，进而加剧直播倦怠心理，严重者会产生“恐播”情绪，甚至是心理问题。一场直播过后，部分主播在后台报复性地刷视频，更有甚者号啕大哭，音频主播在处理亲疏关系的高强度情感劳动中，往往会穷尽自身情绪，有成为“面具人”的趋势。

五、结语

作为一种独特的自我呈现方式，音频直播给普通人以很好的舞台去展示自己，不必受制于颜值、身材

或直播环境等客观条件。但音频主播的自我呈现仍旧面临着许多挑战，特别是在亲疏差异中自我呈现的矛盾化。无论是近处的合谋、瑕疵与泄密，还是隐秘的限制、缺席与神秘化，这些策略始终难以规避自我呈现的矛盾，在主播与听众流动性的亲疏关系之中，不协调角色出现、内容输出瓶颈产生，主播的直播倦怠心理也愈发严重，“恐播”情绪随之而来。如果主播不能及时进行心理调适，不仅会切断音频直播这一自我呈现的渠道，严重者还会危及自身健康。音频主播应当在自我呈现中根据面向差异及时调整自我呈现策略，明确虚拟社交环境与真实环境中自我呈现机制的差异，明晰真实的自我，从而避免被网络音频直播间驯化为“面具有人”。

参考文献：

- [1]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 54 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R/OL]. (2024-08-29) [2024-12-21].<https://www3.cnnci.cn/n4/2024/0829/c88-11065.html>
- [2] 艾媒咨询.2024 年中国新经济行业全景解读[R/OL].(2024-12-04)[2024-12-21].<https://report.iimedia.cn/repo3-0/43523.html?acPlatCode=IIMReport&acFrom=recomBar&iimediaId=103720>
- [3] 王晨.狂欢理论视域下的移动电台直播研究[D].河南大学,2019.
- [4] 赵依伶.网络语音直播平台用户持续使用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D].上海外国语大学,2022.
- [5] 余思乔.移动网络音频平台的用户互动研究[D].广东外语外贸大学,2017.
- [6] 李晨宇,石超.情感消费视角下音频直播平台用户的孤独情绪对打赏意愿的影响研究[J].新媒体研究,2023, 9(23):1-7+34.
- [7] 赵红勋,刘秀娟.表征、逻辑与隐忧:听觉回归下音频直播的声音社交[J].青年记者,2023,(12):39-41.
- [8] Taylor T .Watch Me Play:Twitch and the Rise of Game Live Streaming[M].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8-01-01.
- [9] 郝思佳.移动音频直播中主播的行为研究[D].沈阳师范大学,2022.
- [10] 张雨.移动音频直播主播的多元网络关系研究[D].安徽大学,2019.
- [11] 马明扬.融媒体视域下网络音频主播的成功之道——以《喜马拉雅 FM》为例[J].传媒论坛,2019,2(07):36-37.
- [12] 胡鹏辉,余富强.网络主播与情感劳动:一项探索性研究[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9,26(02):38-61+126.
- [13] 李巧玲.在线语音直播的兴起与发展探析[J].新闻研究导刊,2018,9(07):96.
- [14] 白臻昊.在线语音直播发展动因探析[J].视听,2020,(09):146-147.
- [15] 周小燕.荔枝直播等语音类直播节目的兴起及其运营模式研究[J].现代商贸工业,2020,41(19):37-38.
- [16] 汪勤.国内移动网络电台内容生产模式研究——以荔枝 FM、蜻蜓 FM、喜马拉雅 FM 为例[J].视听,2018, (07):34-35.
- [17] 童云,李雨琪,张启锐.网络音频直播的特征与商业模式[J].现代视听,2019,(11):17-21.
- [18] 申启武,李颖彦.现状与趋势: 网络语音直播产业的全景考察[J].中国广播,2020,(06):17-22.
- [19] 贺建平,庄学勋.检视在线语音直播的新媒体社会责任——基于喜马拉雅 FM 和荔枝 FM 的内容分析[J].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19,21(03):87-96.
- [20] 崔静.音频直播对审美的建构与反叛——以荔枝 FM 为例[J].新媒体研究,2019,5(24):70-72.
- [21] 申启武,李颖彦.网络语音直播:情感商业化逻辑下的声音表演[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9,41(02):143-147.
- [22] 赖黎捷,邱鑫,吕颖莉.广播直播带货现状与可行路径探究——基于广播主播与音频用户调查[J].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22,(03):84-87.
- [23] 佟敏.网络音频直播给传统广播带来的启示[J].新闻世界,2017,(09):61-65.
- [24] 查尔斯·霍顿·库利.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M].包凡一译.北京: 华夏出版社,2020:19.
- [25] 乔治·H·米德.心灵、自我与社会[M].赵月瑟译.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197.
- [26] 欧文·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M].冯钢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85.
- [27] Joinson,A.N.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the online world[J].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2016,6(2):0.
- [28] Toma L C .Looks and Lies: The Role of Physical Attractiveness in Online Dating Self-Presentation and Deception[J].Communication Research,2010,37(3):335-351.
- [29] Hope Jensen Schau,Mary C Gilly,We Are What We Post? Self-presentation in personal Web Space

- [J].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2002(2):385
- [30] JungT,YounH,Mcclungs.Motivation sandself.presentation strategies on Korean-based “Cyworld”web log ormat petsonal homepages[J].Cyber psychology&behavior:the impact of the internet,multimedia and virtual reality on behavior and society,2007,10(1):24
- [31] Bouvier G .How Facebook users select identity categories for self-presentation[J].Journal of Multicultural Discourses,2012,7(1):37-57.
- [32] Maslowska,E.(2013).Facebook and self-presentation:A content analysis study[J].Cyberpsychology,Behavior, and Social Networking,16(7),485-489.
- [33] 甘韵矶.微信“晒客”的自我呈现与交往行为研究[D].暨南大学,2016.
- [34] 王长潇,刘瑞一.网络视频分享中的“自我呈现”——基于戈夫曼拟剧理论与行为分析的观察与思考[J].当代传播,2013,(03):10-12+16.
- [35] 王朝阳,吴可.日本青少年的短视频自我呈现特征和文化因素分析——以抖音日文版 Tik Tok 为例[J].新闻与传播评论,2022,75(01):47-60.
- [36] 汪圣,陈媛媛,任丽娟.短视频平台中图书馆员形象的自我呈现研究[J].图书馆学研究,2024,(01):59-67.
- [37] 沈奕杉,陈胜.中国女性离婚短视频中的自我呈现与后女性主义话语实践——以小红书为例的网络民族志观察[J].新闻爱好者,2024,(07):64-67.
- [38] 孙雨菡.拟剧理论视角下三农 Vlog 的自我呈现研究——以“蜀中桃子姐”Vlog 为例[J].记者摇篮,2022,(05):27-29.
- [39] 刘芹妍.“舞台布置”与“道具选择”:名人 Vlog 中的自我呈现策略[J].视听,2024,(09):145-148.
- [40] 张美洁.拟剧理论视阈下 Plog 用户的自我呈现研究——以小红书博主为例[J].传媒,2024,(03):58-60.
- [41] 钱霖亮.低度包装与本真性展示:中小带货主播的阶层化数字劳动[J].浙江学刊,2021,(03):132-142.
- [42] 杨志华.拟剧论视角下电商主播的自我呈现[J].北方传媒研究,2023,(03):44-49.
- [43] 朱逸,尹卫华.网络直播购物情境下的拟剧化营销——基于抖音直播平台的分析与诠释[J].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学报,2021,28(02):114-124.
- [44] 杨伟.明星视频直播中的自我呈现及其社会资本重构[J].青年记者,2017,(02):81-82.
- [45] 范彩华.抖音直播健身主播的自我呈现研究[D].西安外国语大学,2023.
- [46] 金培培.拟剧理论视域下虚拟主播自我呈现研究[D].浙江传媒学院,2024.
- [47] 王璐.竞技类网络游戏主播的自我展演研究[D].吉林大学,2024.
- [48] 江莉.拟剧理论视角下网络直播异化发生何以成为可能[J].声屏世界,2024,(03):17-20.
- [49] Zhang X ,Xiang Y ,Hao L .Virtual gifting on China’s live streaming platforms: hijacking the online gift economy[J].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2019,12(3):340-355.
- [50] 董晨宇,叶蓁.做主播:一项关系劳动的数码民族志[J].国际新闻界,2021,43(12):6-28.

Self-presentation of Audio Streame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ramaturgical Theory: A Case Study of the KilaKila App

Wang Bairu¹

¹ College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Ningxia University, Yinchuan 750021,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help of Goffman's theory of drama simulation, this study adopts participatory observation and in-depth interviews to explore how audio anchors targeting intimate and diverse audiences present themselves.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when presenting themselves up close, anchors shape their ideal image and maintain intimate relationships through drama group collaboration, defect presentation, and private performances; In covert self presentation, the anchor recovers energy and maintains impression management by mystifying, absent appearances, and limiting uncoordinated audiences. However, when facing audiences with varying degrees of closeness, audio anchors still have contradictions in their self presentation, which may lead to content output bottlenecks and negative feedback such as live streaming fatigue, and even generate "fear of broadcasting" emotions.

Keywords: Drama theory; Audio anchor; Self presentation; intimate distance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2.514

数字经济发展时空演化分析——以黄河“几”字弯都市圈为例

闫浩浩¹

(¹内蒙古工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51)

摘要: 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指标体系, 综合运用熵值法、均方差法、CRITIC 法计算数字经济发展指标权重, 测度黄河“几”字弯都市圈 2011-2022 年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一步地, 分析数字经济发展的时空演化特征。研究得出: 黄河“几”字弯都市圈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 区域内差异较为显著; 空间上呈现南高北低、东高西低的分布特征, 高水平区域聚集于东南部地市, 具有显著的溢出效应; 最后提出建议, 助力黄河“几”字弯都市圈数字经济发展。

关键词: 数字经济发展; “几”字弯都市圈; 空间分布; 均方差法;

一、引言

1996 年唐·泰普斯科特首次提出数字经济概念, 后于 1988 年美国商务部发布的《新兴数字经济》报告中正式提出。2016 年, OECD 指出数字经济其内涵具体包括数字相关技术以及由此产生的新型经济和社会活动。国内学者对数字经济的定义大概分为新的经济形态与提高经济效率的一种因素。何枭吟 (2011)^[1] 认为, 数字经济是以知识为基础, 以因特网为标志、以互联网技术为手段的新型经济形态, 孕育了新的消费模式, 形成以数字融合为核心的产业发展趋势。张新红 (2016)^[2] 认为计算机、网络、通信等现代化信息技术革命催生了数字经济, 提高了经济效率、促进了经济结构的转变。数字经济测算研究方法大致分为两类: 一种是构建指标体系。如张雪玲 (2017)^[3] 从信息通信的多个角度出发构建指标体系, 分析得出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增速放缓且其内部发展不协调的现象仍然存在。刘军 (2020)^[4] 从信息化发展、互联网发展和数字交易发展三个方面构建省际数字经济评价指标体系并分析其驱动因素。另一种构建数字经济增加值核算框架。李宏兵 (2022)^[5] 从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个部分测算数字经济增加值。张红霞 (2022)^[6] 从最终产品入手, 利用 Ghosh 投入产出模型构建测度数字经济规模并分析数字经济区域分布特征。

近年来, 黄河“几”字弯都市圈数字基础设施不断完善, 数字经济水平逐步提高。截止 2023 年银川市累计建成开通 5G 基站 6748 个, 千兆网络覆盖率、5G 用户占比两项指标位居西北地区首位; 呼和浩特市建成开通了国家互联网骨干直联点、国际互联网数据专用通道, 启动建设了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节点和林格尔数据中心; 太原市 5G 基站达到 14000 座以上, 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超过 8%。包头市建成了大数据产业园、包头市绿色数字产业园、云计算应用中心、数字经济产业园、包头市云计算中心等发展载体。

黄河“几”字弯数字经济发展规模、产业数字化方面仍有待提升, 文中通过构建分析数字经济发展指标

[作者简介]

闫浩浩 (1998—), 男, 汉族, 河南焦作人, 内蒙古工业大学硕士在读, 研究方向为产业经济、数字经济。

体系, 进行时空变化分析, 明晰区域数字经济发展的特征, 为区域数字经济协同发展提供一定参考。

二、模型设计

(一) 指标体系构建

有关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评价相关的论文与研究报告中, 不同机构与学者对数字经济的测度不尽相同, 多数基于数字经济的基础设施、产业发展、以及创新发展等角度。因此本文借鉴王玉 (2021)^[7]、梁垚 (2021)^[8]、何盈颖 (2021)^[9]等对数字经济指标体系的构建, 并依据对数字经济内涵的界定, 遵循全面性、层次性、科学性和可获得性原则, 从数字基础、数字产业发展、创新发展、数字金融四个维度构建黄河“几”字弯都市圈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表 1 数字经济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单位
数字经济发 展水平	数字基础	每百人互联网用户数	/
		每百人移动电话用户数	/
	数字产业发展	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从业人员占比	%
		人均电信业务总量	万元
		科学技术支出水平	%
		人力资本水平	%
	创新发展	数字金融使用深度	/
		数字金融覆盖广度	/
		数字金融数字化程度	/

(二) 研究方法

1. CRITIC 法

CRITIC 法是由相关系数和标准差来确定指标权重的客观赋权方法, 其核心思想是根据指标的变异性与冲突性进行赋权, 其中, 变异性用标准差来表示, 若变异性越大, 说明数据波动越大, 其权重也将越大, 反之亦然; 冲突性用相关系数代表, 若相关系数越大, 表示数据冲突性越强, 权重将越低, 否则权重越大。与熵值法相比, CRITIC 法同时兼顾了指标的变异性与冲突性, 确定的权重更具有现实意义^[10]。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1) 指标标准化处理 (同熵值法)

(2) 计算第 j 个指标包含的信息量 C_j :

$$C_j = d_j \sum_{i=1}^n (1 - r_{ij}), (j = 1, 2, \dots, m)$$

$$r_{ij} = \frac{COV(X_i, X_j)}{\sqrt{Var[X_i]Var[X_j]}}$$

C_j 越大, 指标包含的信息量越大, 该指标的相对重要性和权重也越高。其中, d_j 为 指标 j 的标准差, r_{ij} 为指标之间的相关系数。

(3) 计算第 j 个指标的权重 W_j :

$$W_j = \frac{C_j}{\sum_{j=1}^m C_j}, (j = 1, 2, \dots, m)$$

(4) 计算样本综合得分 S_i :

$$S_i = \sum_{j=1}^m (W_j * X_{ij})$$

2. 均方差法

(1) 计算随机变量均值 \bar{X}_j

$$\bar{X}_j = \frac{1}{n} \sum_{i=1}^n X_{ij}$$

(2) 计算均方差 s_j

$$s_j = \sqrt{\frac{1}{N} \sum_{i=1}^n (X_{ij} - \bar{X}_j)^2}$$

(3) 计算指标权重 W_j

$$W_j = s_j / \sum_{j=1}^m s_j$$

(三) 数据来源

限于指标数据可得性, 本文研究期为 2011-2022 年, 数字基础与数字产业发展指标数据来源于各盟市统计年鉴 (2012-2023)、《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2012-2023)》, 数字金融指标数据来源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三、黄河几字弯都市圈数字经济发展时空演化分析

(一) 指标权重计算

1. 指标权重计算

将指标按照熵值法、CRTIC 权重法、均方差法分别计算权重, 然后取算术平均值, 结果如表 2 所示。由结果可知, 二级指标数字基础、数字产业发展、数字创新、数字金融所占权重分别为 22.95%、23.27%、26.26%、27.51%, 可见创新发展和数字金融在黄河“几”字弯都市圈数字经济的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

表 2 数字经济发展指标权重

二级指标	综合权重 (%)	三级指标	权重 (%)
数字基础	22.95	每百人互联网用户数	12.06
		每百人移动电话用户数	10.89
数字产业发展	23.27	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从业人员占比	11.34
		人均电信业务总量	11.93
创新发展	26.26	科学技术支出水平	10.10
		人力资本水平	16.16
数字金融	27.51	数字金融使用深度	9.41
		数字金融覆盖广度	10.16
		数字金融数字化程度	7.94

2. 数字经济测算

基于数字经济各类指标数据的可获得性,运用构建的数字经济指标体系,根据综合评价模型,测算出2011—2022年黄河“几”字弯都市圈19地市的数字经济综合指数,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2011-2022年黄河“几”字弯都市圈数字经济水平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银川市	0.1294	0.1731	0.2536	0.2538	0.2793	0.3206	0.3382
吴忠市	0.0908	0.0942	0.1078	0.1472	0.1703	0.1985	0.2416
石嘴山市	0.0397	0.1060	0.1654	0.1759	0.2349	0.2209	0.2623
中卫市	0.0612	0.1020	0.1661	0.2148	0.2418	0.1986	0.2857
延安市	0.2975	0.3816	0.3612	0.4457	0.5362	0.5250	0.5401
榆林市	0.3220	0.3102	0.3881	0.4125	0.4649	0.5038	0.5103
呼和浩特市	0.2002	0.2355	0.2537	0.2676	0.2841	0.4034	0.3556
鄂尔多斯市	0.1241	0.1267	0.1667	0.1781	0.1938	0.2416	0.2356
巴彦淖尔市	0.0564	0.0922	0.1439	0.1598	0.1882	0.2048	0.2474
乌海市	0.1030	0.0997	0.2129	0.2308	0.2258	0.2615	0.2964
乌兰察布市	0.0365	0.1013	0.1551	0.1788	0.1664	0.2071	0.2715
包头市	0.1227	0.1634	0.1807	0.1893	0.2092	0.2735	0.2677
阿拉善盟	0.0896	0.1381	0.2222	0.2205	0.2321	0.2924	0.3005
太原市	0.4082	0.4295	0.5045	0.4814	0.5426	0.5361	0.6056
吕梁市	0.2204	0.2693	0.2993	0.2797	0.3528	0.3643	0.4515
朔州市	0.2242	0.1961	0.2464	0.2653	0.3409	0.3240	0.4391
晋中市	0.2235	0.2684	0.3616	0.3341	0.4244	0.4044	0.4784
大同市	0.2578	0.2780	0.3240	0.2975	0.3244	0.3577	0.4460
忻州市	0.1827	0.2898	0.2837	0.2951	0.3788	0.3868	0.4366
平均值	0.1679	0.2029	0.2525	0.2646	0.3048	0.3276	0.3690

续表3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年均值
银川市	0.3552	0.3857	0.3663	0.4378	0.4499	0.3119
吴忠市	0.2812	0.2936	0.2861	0.2780	0.3270	0.2097
石嘴山市	0.3136	0.3349	0.3389	0.3318	0.3833	0.2423
中卫市	0.2353	0.2821	0.2970	0.3094	0.2867	0.2234
延安市	0.5343	0.5563	0.5872	0.6183	0.7039	0.5073
榆林市	0.5207	0.5585	0.6249	0.6537	0.6171	0.4906
呼和浩特市	0.3564	0.3781	0.3719	0.4010	0.3999	0.3256
鄂尔多斯市	0.2833	0.2832	0.2636	0.3247	0.3199	0.2284
巴彦淖尔市	0.2091	0.2341	0.2855	0.3321	0.3130	0.2055
乌海市	0.3009	0.2525	0.3036	0.3054	0.3368	0.2441
乌兰察布市	0.2013	0.2423	0.2911	0.3128	0.3279	0.2077
包头市	0.3164	0.2869	0.3311	0.3728	0.3091	0.2519
阿拉善盟	0.3260	0.3088	0.3255	0.3651	0.3653	0.2655
太原市	0.5881	0.6820	0.6976	0.6141	0.6669	0.5631
吕梁市	0.4266	0.4318	0.4186	0.4171	0.4205	0.3627

朔州市	0.3665	0.3902	0.4176	0.4263	0.4073	0.3370
晋中市	0.5101	0.5572	0.5514	0.5564	0.5860	0.4380
大同市	0.4391	0.4560	0.4107	0.4814	0.5267	0.3833
忻州市	0.4382	0.3786	0.4555	0.4846	0.4529	0.3719
平均值	0.3685	0.3838	0.4013	0.4222	0.4316	0.3247

由表3结果可知,黄河“几”字弯都市圈数字经济水平逐渐提高,年均值由2011年的0.1679提高到2022年的0.4316,年均增长率为9.22%,数字经济正逐渐成为黄河“几”字弯都市圈经济增长的关键动力。从数字经济水平来看,延安市、榆林市、太原市、晋中市和大同市五个地市的数字经济水平始终大于均值,延安市、榆林市、太原市、晋中市数字基础设施发展较好,数字经济水平较高,显著高于其他地市。而吴忠市、中卫市、巴彦淖尔市、乌海市和阿拉善盟数字经济水平始终低于均值,且与都市圈数字经济均值有着较大差距,数字经济水平较低。

从发展速度来看,黄河“几”字弯都市圈数字经济地市之间年均增速差异较大,数字经济水平地区差异较大。其中,乌兰察布市数字经济年均增长率达到29.2%,发展速度快,远高于平均增速。太原市、榆林、吕梁市数字经济增速分别为4.96%、6.39%、6.65%,低于平均增速,数字经济发展较慢。总的看来,各地市数字经济水平呈明显上升态势,但数字经济状况有着较大差异,区域发展不平衡,存在明显的数字鸿沟。

(二) 黄河几字弯都市圈数字经济发展时序演化分析

为能够直观比较数字经济区域间发展差异,本文将黄河“几”字弯都市圈19个地市按照所属行政区域分为宁夏地区(银川市、中卫市、石嘴山市、吴忠市),陕西地区(榆林市、延安市)、内蒙古地区(阿拉善盟、乌海市、巴彦淖尔市、鄂尔多斯市、包头市、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市)、山西地区(大同市、朔州市、忻州市、晋中市、太原市、吕梁市)四个地区。

首先从整体视角探究黄河“几”字弯都市圈数字经济发展时序变化,结果如下图1所示。从都市圈整体水平看,数字经济发展呈现上升的发展态势,在研究期内,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得到显著提升。分地区来看,各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均呈现波动上升的发展态势,地区间有着明显的发展差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从高到低依次为陕西部分、山西部分、内蒙古部分、宁夏部分,陕西部分地市数字经济水平远大于其他三个地区。随着时间变更,陕西部分地区与其他三个部分地区数字经济水平差距不断扩大,山西部分与内蒙古部分、宁夏部分数字经济水平差距较为稳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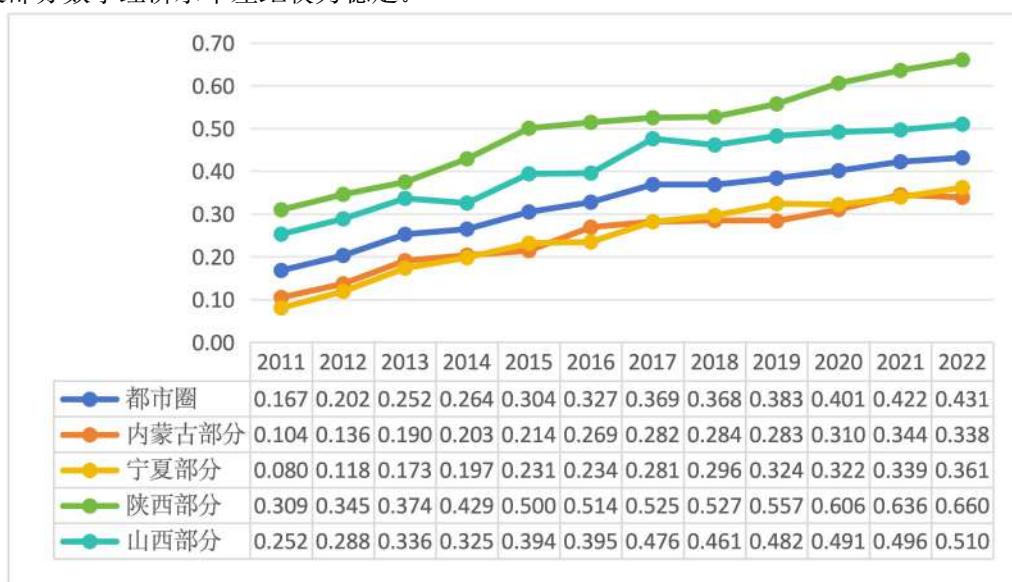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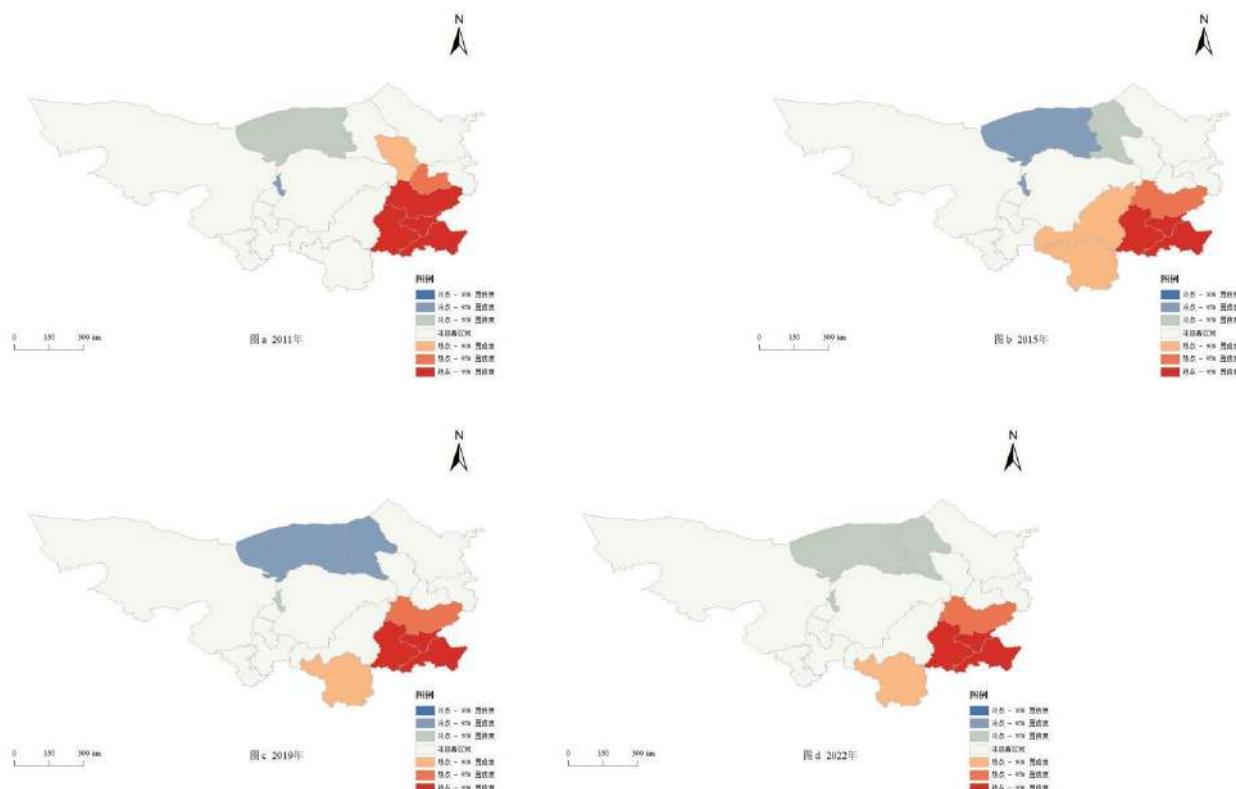
图1 都市圈数字经济发展时序趋势

(三) 黄河几字弯都市圈数字经济发展空间演化分析

1. 空间集聚性

采用 ArcGIS10.7 软件的热点分析操作, 从 90%、95%、99% 的 3 个置信区间分析 2011、2015、2019、2022 年 4 个研究时点黄河“几”字都市圈数字经济发展的冷热点空间分布格局及其演变趋势, 观察高值区与低值区的集聚位置, 并将其可视化 (见图 2), 以进一步分析区域内部数字经济发展的集聚模式。

可以看出, 黄河“几”字弯都市圈数字经济发展冷热点区域分异明显, 空间格局具有一定稳定性及延续性, 热点区域集中分布在山西地区和陕西地区, 形成了以太原为中心的增长极。冷点区域集中分布在内蒙古地区, 分布较少, 集中在巴彦淖尔市周围。具体来看, 4 个年份的热点区域空间分布具有明显的延续性, 2011 年热点区域主要分布在山西地区, 至 2015 年热点区域向西延伸, 涵盖陕西地区地市, 范围扩大, 至 2019 年范围缩小, 热点区仍以太原市为中心聚集, 至 2022 年区域范围无变化。冷点区域分布分散且置信度水平差异大, 2011 年仅有巴彦淖尔市和乌海市, 范围较小, 至 2015 年增加包头市为冷点区域, 置信度得到提升, 范围扩大, 至 2019 年区域置信度整体得到提升, 范围无变化, 至 2022 年区域置信度整体下降, 范围无变化。



注: 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 GS (2024) 0650 号地图制作, 底图边界无修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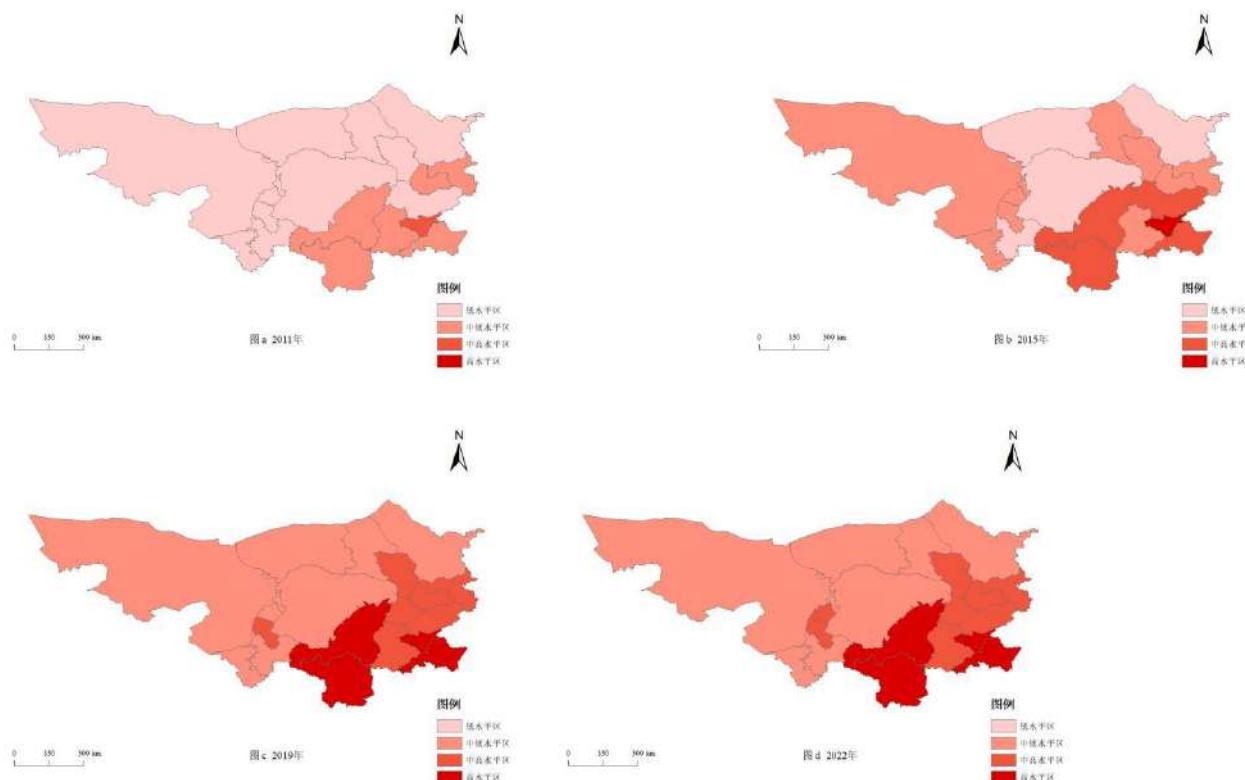
图 2 2011-2022 年数字经济发展的冷热点分布

2. 空间分类特征

为探究基于黄河“几”字弯都市圈数字发展的空间演化特征, 本文进一步利用 ArcGIS10.7 软件刻画了数字经济发展的空间演化趋势, 如图 3 所示

总体看来, 黄河“几”字弯都市圈数字经济发展呈现为“南高北低, 东高西低”的特征, 低水平区域缩小, 中高水平和高水平区域有所扩大。具体来看: 低水平区在 2011 年分布集中, 占比为 63%, 主要分布在内蒙古和宁夏地区, 至 2015 年区域范围缩小, 占比为 20%, 分布在内蒙古和宁夏地区; 中低水平区在 2011 年主要分布在陕西地区和山西地区, 分布较集中占比达到 31%, 至 2015 年向北延伸、向西转移, 范围扩大, 占比提升到 58%, 占据主导地位, 至 2019 年区域向西延伸迁移, 占比为 50%, 至 2022 年范围有所缩小;

中高水平区在2011年仅有太原市，至2015年区域向西向北迁移，增加到四个城市，主要分布在山西地区和陕西地区，至2019年区域向北向南延伸，范围扩大，占比为31%，主要分布在山西地区，至2022年范围扩大，宁夏地区占比提升；高水平区在2011年无出现，至2015年仅有太原市，至2019年增加榆林市、晋中市和延安市，高水平区域进一步扩大，至2022年无明显变化。综上，黄河“几”字弯都市圈数字经济发展在研究期内得到整体提升，高水平区域主要集中在陕西和山西部分地市，数字经济发展自东南向西北递减，在研究期内低水平区的主导地位逐步由中低水平区取代。



注：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 GS (2024) 0650 号地图制作，底图边界无修改

图3 2011-2022年数字发展的空间分类

四、结语

(一) 结论

从数字基础、数字产业发展、数字创新、数字金融四个方面构建指标体系，综合运用熵值法、均方差法、CRITIC法对黄河“几”字弯都市圈数字经济发展测度，并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对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分析，可得结论如下：

黄河“几”字弯都市圈数字经济发展在研究期内整体呈上升趋势，区域内部差异较为明显；南部地市及东部地市数字经济发展明显高于其他地市，东南部地市呈现明显的高水平聚集，具有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有着较强的关联，高水平区域集中在经济较为发达地区。

(二) 建议

第一，加快基础设施建设，促进数字产业化。在数字经济发展背景下，已有的基础设施不能满足发展要求，需要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黄河“几”字弯都市圈首先要结合自身发展状况及未来发展，推进物联网、算力基础设施以及信息通信网络建设，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设施保障，提升数字经济产业化水平。

第二，协调规划区域资源，促进区域数字经济发展一体化。黄河“几”字弯都市圈涵盖四省区19地市，地区发展有明显差异，加强区域数字技术、产业、人才之间的交流，促进区域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为黄

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持。

参考文献:

- [1] 何枭吟.数字经济与信息经济、网络经济和知识经济的内涵比较[J].时代金融, 2011(29):47.
- [2] 张新红.数字经济与中国发展[J].电子政务, 2016(11):2-11.
- [3] 张雪玲, 焦月霞.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及其应用初探[J].浙江社会科学, 2017(04):32-40.
- [4] 刘军, 杨渊鋆, 张三峰.中国数字经济测度与驱动因素研究[J].上海经济研究, 2020(06):81-96.
- [5] 李宏兵, 姚一帆, 杨雨昕.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测算研究——兼论数字经济的区域发展差异[J].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24(02):1-11+32.
- [6] 张红霞.生产网络视角下中国数字经济规模及其结构——基于时序投入产出表的实证研究[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22, 36(03):76-91.
- [7] 王玉, 张占斌.数字经济、要素配置与区域一体化水平[J].东南学术, 2021(05):129-138.
- [8] 梁垚.数字化发展水平对陕西省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J].现代商贸工业, 2021, 42(17):12-13.
- [9] 何盈颖.中国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D].河北大学, 2021.
- [10] 张晚晴.河南省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D].河南大学, 2023.

Analysis on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Evolution of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Taking the "JI"-shaped Bend Metropolitan Area of the Yellow River as an Example

Yan Haohao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ohhot 010051, Inner Mongolia

Abstract: Construct a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index system and comprehensively use the entropy method, mean square deviation method and CRITIC method to calculate the weights of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indicators, and measure the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level of the "ji"-shaped Bend Metropolitan Area of the Yellow River from 2011 to 2022. Further, analyze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The study concludes that the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level of the "ji"-shaped Bend Metropolitan Area of the Yellow River shows an overall upward trend, and the differences within the region are relatively significant; spatially, it presents the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high in the south and low in the north, high in the east and low in the west, and the high-level areas are concentrated in the southeastern cities, with significant spillover effects; finally, put forward suggestions to help the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of the "ji"-shaped Bend Metropolitan Area of the Yellow River.

Keywords: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ji"-shaped Bend Metropolitan Area; Spatial Distribution; Mean Square Deviation Method

<https://doi.org/10.70693/rwsk.v1i2.532>

内生式发展视野下东北乡村振兴的道路探索

——基于松原市车木铺村的个案研究¹

刘文喆¹ 韩骜¹

(¹吉林大学外国语文化学院, 吉林 长春 130012)

摘要: 马克思主义认为, 人是生产力中最具决定性的力量。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在乡村振兴, 而乡村振兴的关键在乡村人口发展。近年来东北地区面临着两大人口危机: 其一是人口净迁出规模不断扩大, 即人口外流; 其二是人口年龄结构失衡, 即高龄少子化。乡村地区相较于城镇而言, 基础设施较差, 发展质量不高, 人口问题更加严重。在如今的人口发展趋势之下, 难免存在相对贫困以及返贫的风险, 不利于东北乡村振兴工作的开展。本文以东北乡村地区为分析范围, 以松原市车木铺村为具体参考对象, 基于内生式发展理论, 结合东北地区的乡村现状, 分析东北地区的乡村人口问题, 探讨解决方法与可能性的同时, 为新时代的乡村振兴提供全新的观察视角。

关键词: 乡村振兴; 党的领导; 内生式发展; 农业农村现代化

一、研究目的与背景

农村问题一直是我国发展中最困难、最复杂的问题, 历史证明,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首先是在农村突破的, 中国农业的特殊国情决定了中国的农村问题不能用西方的理论和范式来解决, 需要发挥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性、整体性、人民性、发展性的优势, 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农村问题。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范式指导下, 加强理论研究, 开辟理论新天地, 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学术话语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 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²

改革开放以来, 东北地区的煤炭, 石油, 天然气等传统能源枯竭殆尽, 基础设施落后, 外资引进意愿不高, 第二产业转型不易; 服务业发展历史短, 借鉴经验少, 集群效应不强, 第三产业实力不济; 过度开垦致使水土流失, 黑土质量下降, 农产品附加值较低, 单位价值内利润不高, 第一产业优势不显。³基于这样的经济环境和发展格局, 从而形成了东北人口从乡村到城镇, 从城镇到山海关外的人口迁移现象, 而东北乡村的人口迁移过程, 使得东北地区承受了加倍的人口流失影响。

2020 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 东北地区人口占全国人口总数的 6.98%; 与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 东北地区人口所占比重下降 1.20 个百分点, 人口减少约 1101 万人; 其中, 黑龙江, 吉林, 辽宁三省的总人口数量占全国总人口数的比值分别下降了 0.60%, 0.34%, 0.25%; 65 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

[作者简介]

[1]刘文喆 (2002-), 男, 汉族, 吉林大学外国语文化学院。

[2]韩骜 (2002-), 男, 蒙古族, 吉林大学外国语文化学院。

[基金项目]

吉林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编号: (202310183023) 内生式发展理论下的乡村振兴中农村人口问题研究--以松原市车木铺村为例

² 韩喜平.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对人民立场的坚守[J].社会科学研究,2021,(1): 1-9

³ 李辉, 张佳音, 于鸿宁.东北农村流出人口就业状况及影响因素研究[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20, 60 (4) : 184-185。

为 16.39%，同六普相比提高了 7.26%，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东北人口流入最多的省份分别是山东、北京、河北、天津、广东。其中山东和北京的流入人口均超过 100 万，成为东北人口外流的主要目的地。⁴

相对于城镇来说，乡村的人口变化情况更为复杂。人口变化不仅直接影响到当地经济的发展，也会间接的影响到社会意识、文化习惯等。因人口变化而随之产生的一系列事物与其关系如何，对东北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又是如何带来影响的诸多问题，需要认真分析和谨慎对待。

内生式发展区别于外源式发展的掠夺性和扭曲性，代之以自发性和长远性。东北乡村地区广阔且肥沃的种植土地，为借鉴内生式发展理论提供了充分的物质基础。在保证东北乡村原有发展基础不受影响的前提下，可以通过教育资源的融合，现有产业结构的优化，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适当介入等方式，帮助提高东北乡村内部的生产水平，从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满足东北居民的生产生活需求，助力乡村振兴。

二、文献概述与理论视角

(一) 内生式发展理论

“内生”的基本概念是指某种植物（例如单叶植物）可以在不受外界因素的影响下，能够从茎的内部生长出与母茎相同的新个体。1975 年瑞典财团 Dag Hammarskjöld 在联合国报告《What Now》中首次提出内生发展，日本鹤见和子等也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内生发展概念，并将其定义为“由当地不同民族及群体，根据独特的自然生态环境和传统文化要求，参考外来知识、技能和制度，自主创建的（发展理念）”⁵。

内生式发展模式的核心在于培养地方的自主性和参与性。这一模式认为，发展的动力应当来源于乡村内部，而非外部的输入。特别是在面对如今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中央和地方财政紧缺，无力进行规模庞大且集中对点的供给；乡村又没有成熟的发展体系，使乡村经济难以在乡村区域内部构成完整的内循环体系，更加突显了内生式发展的理论优势。⁶

(二) 人口因素与乡村振兴的结构联系

人口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之一。其中，人口的自然结构（性别结构和年龄结构）、地域结构（分布结构）、社会经济结构（劳动力结构、产业结构、文化教育结构）等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制约我国农村发展的关键性因素。

1. 人口的自然结构是其它各种人口结构的自然基础，其中性别结构和年龄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社会的人口规模，而一个适度的人口规模是乡村发展的有利因素。过大的人口规模会使得社会供给出现供不应求的状况，进而影响人口就业和人口素质提高；过小的人口规模会使得社会供给供过于求，消费过程无法有效融入经济循环，进而影响社会再生产。因此，一定数量的乡村人口不仅是我国乡村振兴的前提，同时也是乡村发展达到一定水平的体现，乡村发展的动力归根到底是靠乡村人口提供的。

2. 人口的地域结构主要包括人口的自然地理结构，行政区域结构以及城乡结构等，人口的地域结构会直接影响人口的分布情况，进而影响区域经济的发展，同时区域经济的发展又会反作用于人口分布。一般来说，经济发达的区域通常会吸引经济欠发达区域的人口，经济发达的城镇通常会吸引其附属乡村劳动力的流入，从而导致经济欠发达的乡村不可避免的造成了人口流失问题。提高乡村经济，助力乡村发展，是维持乡村人口结构稳定的关键所在。

3. 人口的社会经济结构是由一定时期和一定地域的人口因素、社会因素以及经济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劳动力结构和产业结构在一定程度上而言决定了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下限，而文化教育结构则决定了其上限。各种社会经济因素的此消彼长，决定了社会经济发展必将使得人口的社会经济结构更加多元化、复杂化。因此稳乡村产业基础下限，提乡村人口素质上限，就显得尤为关键。人口素质具有一定的经济价值，高素质的乡村劳动力在乡村振兴当中作为一种重要的比较优势，会直接影响到第一产业的效益，从而影响乡村经济的发展状况。

(三) 内生式发展理论结合中国乡村振兴的思考

70 年来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的历史性成就是全球减贫的典范，为全球解决贫困难题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中国方案。70 年的历程表明，中国农村扶贫开发实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将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全方位的农业农村政策支撑体系下，广大农民的自由发展能力得到极大提升、主体性日渐凸显。自

⁴ 姚云云，高威威.东北乡村人口变化与乡村振兴：关系梳理、现实困境与政策建议[J].沈阳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24（5）：498-501。

⁵ 胡霞，刘晓君.内生式发展理论在乡村振兴中的实践——以日本岛根县邑南町为例[J].现代日本经济，2022，1：58-59。

⁶ 张秋菊，张超峰.农村内生发展的理论和政策实践：以日本中山间地区等直接补助制度为例[J].世界农业，2020，（499）：21-22。

上而下的专项顶层设计、协同推进的扶贫格局、精准的扶贫措施,体现了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的政策经验。新时代中国农村扶贫开发工作,应以新发展理念为统领,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精准扶贫、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⁷

三、东北乡村人口带来的乡村振兴难题

(一) 乡村少子化趋势初显,老龄化趋势加重

区域	0-14岁	15-64岁	65岁及以上	少儿抚养比	老年抚养比
全国	19.16/19.27	70.78/63.01	10.06/17.72	27.07/30.58	14.21/28.13
黑龙江省	13.80/9.88	79.00/72.92	7.19/17.20	17.47/13.55	9.11/23.59
吉林省	13.61/10.89	78.62/70.83	7.77/18.28	17.31/15.38	9.88/25.81
辽宁省	13.71/10.01	75.96/67.98	10.33/22.00	18.05/14.73	13.60/32.37

图1 东北乡村地区各年龄段占总人口比和抚养比(单位: %) 数据来源: 根据第六、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整理。“/”前后分别为“六普”和“七普”数据

从图1来看,对比“六普”和“七普”的数据,东北乡村地区的各年龄段人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0-14岁的人口数占全国的总人口数比呈现增长趋势,但东北三省都呈下降趋势,其中黑龙江省的变化最为明显,变化幅度为3.92%; 65岁及以上的人口数占全国的总人口数比,同全国数据相较而言,则无一例外的都呈现增长趋势,其中东北三省的老龄人口占比变化幅度平均为10.73%; 15-64岁的劳动力群体占总人口比也有所下降。共同造成了社会总抚养比的提高,为东北乡村的经济发展带来了一定阻力。

不考虑迁入人口的变量因素时,人口自然增长率的下降必然会引起出生率的下降,呈现少子化状态。少子化时期出生的人口,随着年龄的增长,必然会在将来成为社会所需要的适龄劳动力。出生于少子化时期的适龄劳动力必然又会呈现劳动力市场供不应求的趋势。与此同时伴随着退休劳动力数量的不断增加,必然会提高社会总抚养比,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

国内的很多与人口问题相关的研究都十分侧重人口老龄化带来的问题,是因为这一问题已经对目前的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一定影响,以此进行的分析和提出的相关解决措施也不在少数。但少子化问题同样是影响人口发展的重要一环,国家从计划生育开始,到“二孩”政策的转变,正是基于这一因素,因此分析人口问题时笔者建议应从多角度进行考虑。

⁷ 韩喜平.中国农村扶贫开发70年的历程、经验与展望[J].学术交流,2019,(10): 5-13, 191

(二) 乡村人口规模逐年缩减, 城乡发展矛盾不断加深

区域 年份	2002年	2007年	2012年	2017年	2022年
全国	6.45	5.17	4.95	5.32	-0.60
黑龙江省	2.54	2.49	1.27	-0.41	-5.75
吉林省	3.19	2.50	0.36	0.26	-4.07
辽宁省	1.34	1.53	-0.39	-0.44	-4.96

区域 年份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全国	56401/40.42	55162/39.40	50979/36.11	49835/35.28	49104/34.78
黑龙江省	1505/39.90	1467/39.10	1095/34.39	1072/34.30	1047/33.79
吉林省	1148/42.47	1123/41.73	899/37.36	870/36.63	852/36.28
辽宁省	1391/31.90	1388/31.89	1187/27.86	1150/27.19	1133/27.00

图2 近5年东北地区乡村人口数量及比重表(单位:万/%) (上) 和近20年东北地区人口自然增长率(单位:‰) (下) 图2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整理

从图2来看,尽管近5年东北乡村人口数量及比重逐年缩减,城镇人口占比逐年增高,近20年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却总体呈下降趋势,足以说明东北地区的人口规模逐年缩减问题是总体性的。东北乡村人口规模的缩减伴随着东北地区总体人口规模的缩减,在分析东北乡村人口问题的时候不应该脱离东北总体的人口环境。

对于乡村劳动力的供给不足问题,首先应该考虑到,乡村对人口的拉力效果是远不及城镇的,相反,对人口的推力却比城镇要更强。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东北三省流入本省城镇地区的乡村人口有431.84万人,适龄乡村劳动力由于宽松的户籍制度,多元的就业途径,优质的教育、医疗资源等,使得他们更倾向于留在城镇安家生活。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乡村适龄劳动力不断向城镇地区流入,城乡发展的差异性和不平衡性不断加深,促使东北的城乡发展带来的问题更加凸显,增加了东北乡村人口问题的解决难度。

(三) 乡村劳动力总体文化程度较低, 第一产业转型艰难

区域	35岁及以下	36-54岁	55岁及以上
全国	19.2	47.3	33.6
东部地区	17.6	44.5	37.9
中部地区	18.0	47.7	34.4
西部地区	21.9	48.6	29.5
东北地区	17.6	49.8	32.6

区域	文盲	小学	初中	高中及以上
全国	6.4	37.0	48.4	8.3
东部地区	5.3	32.5	52.5	9.7
中部地区	5.7	32.7	52.6	9.0
西部地区	8.7	44.7	39.9	6.8
东北地区	1.9	36.1	55.0	7.0

图3 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中农业生产经营人员的年龄构成(上)和受教育程度构成(下)

(单位: %) 图3 数据来源:《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

从图3来看,就劳动力受教育程度方面而言,东北地区农业生产经营人员的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其中初中文化占比超过半数,达到55%。虽然文盲率相较全国和各地区而言是最低值,但拥有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比例不仅低于东部和中部地区,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与西部地区也只能拉开0.2%的优势;就劳动力年龄构成方面而言,东北地区的构成比例同全国及其他地区相比基本一致。其中35岁及以下占比最低,与东部地区持平;36-54岁占比最高,接近半数;55岁及以上占比较低,与西部地区相差3.1%。

我国目前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年龄段主要集中于36岁及以上,平均约占总年龄段的81.23%,这批乡村劳动力同时也是受教育程度集中于小学,初中文化的人群。这与我国普及义务教育,及时稳定教育下限有很大关系,但较低的文化程度已无法适应新时代的农业发展。文化程度较高的农业技术人员一方面由于发展环境较差,落户意愿不高;另一方面由于技术普及难度大,无法完全施展过硬本领,形成了一种较为尴尬的局面。

东北地区作为我国主要的粮食作物产区,长期以来过度依赖第一,第二产业,留给第三产业的发展空间相对不充分;第三产业的发展困难又反作用于第一,第二产业,使得东北传统的农业和工业转型困难,缺乏经济活力,区域发展的吸引力自然会受到影响,导致适龄劳动力人口流失。

四、具体案例分析

(一) 基本情况概述（截止 2022 年）

车木铺村距当地政府 2 公里，全村幅员面积 10.9 平方公里，辖 4 个自然屯，总人口 690 户、2070 人，其中，常住户 450 户、1693 人，已脱贫的建档立卡贫困户 22 户、45 人，低保户 38 户、60 人，五保户 3 人，全村劳动力 800 人。现有耕地 850 公顷，林地 15 公顷，农业发展基础优势明显。

村民经济收入来源主要以从事种植业、养殖业、外出务工为主。种植业方面，现有农用机械 350 台套，大口径农田井 300 眼，可灌溉面积 500 公顷，2021 年种植玉米 650 公顷，村民人均纯收入可达 1.5 万元；养殖业方面，全村养殖户 59 户，养殖羊 357 只、牛 332 头，养殖业收入比重已占村民人均纯收入 20%。村集体经济情况较好，“三资”清查后，2021 年村集体经济收入已达到 40 万元。

村党支部共有党员 36 名，从学历比重上看，大专以上学历党员 6 名，高中及中专学历党员 7 名，初中学历党员 5 名，占比 50%；从年龄结构上看，35 周岁以下党员 6 名，党员队伍的学历层次较高、梯次配备较为合理。

(二) 近年发展问题

1. 全村义务教育适龄儿童数量约占全村总人口比例的 8%，老年人口和丧失劳动能力的成年人口数量约占全村总人口比例的 53%。部分村民反映孩子上学距离远，照顾不方便；老人活动范围有限，村内体育设施及健身器材不足，基本休闲娱乐需求难以满足。

2. 外出务工方面，2022 年外出务工人员共计 296 人，占全村劳动力人员比重 37.5%，劳动力流失情况较为明显；部分留守村民加入合作社的意愿不强，积极性有待提高；由于缺少相应的技术培训，特色农产品缺少销售和宣传路径，无法完全对接城镇市场等。

3. “初中及以下”的受教育程度约占全村总人口比例的 88%，村居治理的主体意识普遍不强；部分低保户、五保户村民存在“等靠要”思想；长期由村党支部推行的发展政策缺少和村民的必要与恰当沟通，致使部分村民对于政策解读和惠民效果理解不清，对早年的扶贫工作和如今的乡村振兴工作起到了一定的阻碍作用。

(三) 工作开展成效

1. 完善公共服务设施，重视群众精神需求。截止 2023 年 10 月，已新建两个文化广场共 3800 平方米，并于村内栽植云杉树 1233 棵，金丝垂柳 188 棵，连翘 2380 株，刺玫 1190 株；坚定落实九年义务教育制度，全村目前现有义务教育适龄儿童 164 人，入学率达到 100%，对于上学距离较远，家长照顾不便的情况，由村党支部统一协调处理。

2. 紧抓农业基础建设，降风险提成效。截止 2023 年 6 月，车木铺村积极推动建设大口径农田井，可灌溉耕地达到 500 公顷，全村 60% 的耕地都能实现旱涝保收；大力发展养殖业，现存栏羊 357 只、牛 332 头，全村人均纯收入达 1.4 万元，村集体经济收入超过 40 万元；针对电力配套不足等现实问题，镇政府总揽包装水肥一体化及高标准农田项目，预计 2024 年初将有 80% 的农户实现免耕种植技术应用。

合作社目前已有超过 60% 的农户入社，对该村常年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创业起到了一定的回流作用。与 2022 年外出务工人员相比减少了 53 人，使得全村劳动力回流约 18%；种植业与畜牧业相较以往均提高了集约化程度，因此提高的经济收入同 2022 年相比约 3%，更好的调动了广大村民的生产积极性。

3. 紧抓党建工作，预防返贫风险。村委会针对脱贫户、突发困难户、五保户、低保户、部分农户“两不愁三保障”及防返贫监测进行了全覆盖排查，重点关注了防返贫监测、“两不愁三保障”、村卫生室、自来水房看护、秋收是否存在困难等，列出清单，建立台账；组织包保干部入户结合明白卡做好政策宣讲解读工作，将惠农措施（教育、医疗、危房改造、安全饮水、肉牛养殖小额信贷等）、防返贫监测政策（APP 小程序）传递给群众。

由于经济发展带来切实的惠民效果，村党支部在政策解读和思想教育的开展工作也顺利许多，除去不可抗力因素，“等靠要”思想目前在该村实际占比已不足 2%，越来越多的村民能够理解村子的发展与自己的生活息息相关，主人翁意识有了进一步的加强。

(四) 理论实践总结

乡村振兴开发的有效实施和高效推进离不开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的新模式。打破经验主义的禁锢，跳出传统的思维绑定，是当前中国共产党乡村振兴的思想主导。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开始了数十年的乡村开发工作。在逐步增加政府财政扶贫投入的基础上，建立健全市场与社会扶贫开发投入体制机制。多措并举，

扩大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扶贫开发投入，通过建立健全政策引导、舆论宣传、税收优惠等奖励机制，通过以“千企帮千村”等为主题的企村共建活动，动员和引导市场主体积极主动参与到乡村开发事业中。中国共产党不断发挥好内生与外辅的扶贫开发。内生的发展动力是根本，外部输入动力是辅助；内生动力为基础，外部输入动力是补充。当前中国共产党不断激发内生发展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要“注重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智和志是内力、内因，扶贫如此，乡村振兴亦是如此，乡村振兴必须坚持智、志双扶。

需要再次强调的是，内生式发展理论目前在国内并没有一个完全成熟且形成体系的案例，其中的原因是深刻和复杂的：内生式发展理论的核心在于培养内驱力以实现“自治”，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发展过程；乡村振兴作为我国的一项长期坚持的国家政策，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贯彻过程，在此期间中央和地方在沟通与协调方面必然会产生一定的阻碍。

乡村振兴的行动主体，既要优先、充分发挥村民自身的主体性和能动性，也要借助政府、资本等外部力量；既要鼓励本村、邻村流出人口返乡创业发展，也要吸引、容纳外来人口参与村庄建设和经营；既要鼓励精英能人带头发展、提升村庄治理水平，也要引导普通村民的日常参与，增强其归属感和获得感。一是农民个体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受个人素质、观念、学识等综合能力的影响。农民虽然有自我奋斗的意愿，但受个体和家庭资源、能力的限制，很难依靠自身的力量将农业生产“做大做强”。尤其在乡村产业发展方面，农民对政府、村集体以及企业的依赖度很高。但乡村振兴具体目标的实现，需要政府的支持和市场的推动，更需要村民的积极参与。⁸车木铺村的发展模式并没有完全依托于内生式理论，而是前期通过政府的介入，在完善基础设施的前提下，通过思想工作的开展，逐步激发村民的主观能动性。

例如截止2023年10月，在市县两级政府共同协调之下，村民自发参与了2.5公里村域内水泥路的“白改黑”工程，组织修建围墙1.6万延长米、排水沟9650延长米，清理了“四沟四渠”8.1公里，铺设涵管10节，满足了村内的排水需求，同时村内道路全部完成硬化，并安装了289盏路灯，现已竣工交付使用，目前村域内路已实现100%硬化。经过上述的工作开展，目前已基本形成了一套适用于该村的发展体系。

五、结语

“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是习近平总书记在2023年5月初召开的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的一个重要论断，凸显了人口在中国式现代化中的基础地位。从人口视角看，拥有素质优良、总量充裕、结构优化、分布合理的乡村人口，同样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今后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需进一步关注乡村人口转变新格局，更加重视人口要素的支撑作用。

社会是由人构成的社会，人永远是社会经济发展最关键、最活跃的决定性因素。目前东北振兴战略难以持续推进的最大问题之一即东北的人口问题严重，而东北乡村地区要同时面临省内城镇和山海关外地区的双重拉力影响，乡村的人口问题相对而言更加突出和紧张。

乡村的现代化发展不可能仅依赖原住民的人口扩增，还需要依靠产业提升、产业转变、产业聚集吸纳新的人口聚集。现代农业和农村新兴产业的发展，急需一大批受过良好教育、掌握种养知识、懂市场、会经营的新型农业和农村产业的经营管理人才以及乡村医生、乡村教师、乡村农技员等专业技术人才。基于内生式发展理论，通过观察松原市车木铺村，从人口问题入手，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对于如何开展乡村建设工作并取得成果，进行了相关分析和介绍。并希望以此为东北其它农村地区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 [1] 何登录.乡村振兴与农村相对贫困治理协同推进——基于新内生式发展理论[J].创新, 2022, 6 (16) : 65-70.
- [2] 胡霞, 刘晓君.内生式发展理论在乡村振兴中的实践——以日本岛根县邑南町为例[J].现代日本经济, 2022, 1: 58-59.
- [3] 李辉, 张佳音, 于鸿宁.东北农村流出人口就业状况及影响因素研究[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20, 60 (4) : 184-185.
- [4] 姚云云, 高威威.东北乡村人口变化与乡村振兴: 关系梳理、现实困境与政策建议[J].沈阳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2, 24 (5) : 498-501.
- [5] 赵洪冰, 刘莎莎.乡村振兴背景下东北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刍议[J].辽宁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3, 25 (5) : 6-7.
- [6] 张秋菊, 张超峰.农村内生式发展的理论和政策实践: 以日本中山间地区等直接补助制度为例[J].世界农

⁸崔树义,田杨.乡村振兴的人口视角[J].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33(05):118-128.DOI:10.20004/j.cnki.ujn.2023.05.012.

- 业, 2020, (499) : 21-22。
- [7] 张文星, 岳文.深度推进东北乡村振兴的策略研究——基于东北乡村发展状况的调研分析[J].农村经济与科技, 2023, 34 (12) : 124-125。
- [8] 张星发, 徐虹, 张妍.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 新内生发展理论视角——以贵州省 Y 县为案例[J].当代经济管理, 2021,43 (10) : 32-33。
- [9] 赵周华.中国农村人口变化与乡村振兴: 事实特征、理论阐释与政策建议[J].农业经济与管理, 2018, 4: 23-25。
- [10] 韩喜平.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对人民立场的坚守[J].社会科学研究,2021,(1): 1-9
- [11] 韩喜平.事不避难者进: 新时代的历史性成就[J].人民论坛,2021,(12): 16-19
- [12] 韩喜平.中国农村发展难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解答[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第 56 卷 (6): 1-6
- [13] 韩喜平.中国农村扶贫开发 70 年的历程、经验与展望[J].学术交流,2019,(10): 5-13, 191
- [14]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习近平扶贫论述摘编 [M] .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8.
- [15]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中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编 [M] .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 2019.
- [16] 崔树义,田杨.乡村振兴的人口视角[J].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33(05):118-128
- [17] 韩喜平,何况.中国共产党百年消除贫困的伟大创造[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1,61(03)

Exploring the Road of Northeast China's Rural Revitalisation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Endogenous Development --A Case Study Based on Chemupu Village in Songyuan City

Liu wenzhe Han ao

²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Jilin University

Abstract: According to Marxism, people are the most decisive force in the productive forces. The key to solving the "three rural issues" lies in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the key to rural revitalization lies in rural population development. In recent years, the Northeast region has been facing two major demographic crises: one is the increasing scale of net population migration, i.e., population outflow; the other is the imbalance of population age structure, i.e., the age of the population is becoming fewer and fewer children. The demographic problem is more serious in rural areas, where infrastructure is poorer and the quality of development is lower than in towns. Under today's demographic trends, there is inevitably a risk of relative poverty and return to poverty, which is not conducive to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the Northeast. This paper takes the rural areas of Northeast China as the scope of analysis, takes Chemupu Village of Songyuan City as the specific reference object, based on the theory of endogenous development, combin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rural areas in Northeast China, analyses the rural population problems in Northeast China, and explores the methods and possibilities of solutions to provide a brand new perspective for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endogenous development; rural revitalization; party leadership; agricultural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2.518

基于 SAPAD 的老年服药提醒 APP 服务系统设计研究

盛雨欣¹

(¹东南大学，江苏 南京 211189)

摘要：85%以上的老年人患有一种及以上的慢性病，主要的治疗措施是长期服用针对性药物。患病老人用药流程包含病情复查、获取药物、按医嘱服药三个必要行为。由于环境、系统、认知等种种原因，老年人的平均服药依从性低于 45%，这造成了大量生命的损失和医疗资源的浪费。随着社会老龄化现象日益严峻，健康可持续的用药服务系统亟须完善。研究引入 SAPAD 方法分析构建可持续健康用药服务的触点，从 5 位典型慢性病老年人的行为出发，利用定量研究方法找出服务体系现存的客观问题。针对得出的问题，利用设计思维搭建针对慢性病老年人患者的可持续健康用药服务系统，为了减少慢性病所带来的医疗负担，积极发挥社区、药店、线上问诊的协同作用，提高慢性病老人健康服务体验。基于研究结果，研究将优化策略应用于老年用药健康服务系统的设计，以达到提升老年人福祉的目的。

关键词：慢性病用药；健康服务；SAPAD；设计策略

一、引言

世界卫生组织 (WHO) 于 2020 年提出了“健康老龄化”政策^[1]，健康老龄化是关系到个人福祉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2]，其实施的重要行动领域之一是为老年人提供以人为本的综合护理和初级保健服务^[1]。随着世界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的增加，慢性病的患病率和接受长期药物治疗的人数也在不断增长^[3]，然而服药依从性低是一个长期存在的复杂问题^[4]，且由于老年人身体退化及易罹患多种慢性基础疾病^[5]，因此与年轻人相比，老年人会出现更高的药物不依从性风险，从而带来更糟糕的健康状况和成倍增加的医疗保健成本^[6]。药物依从性被认为是一项重要的卫生问题，为老龄化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巨大挑战^[7]，因此，提升药物的依从性对于改善老年人的健康结果及慢性病管理至关重要。

研究预测，在未来的几年里，包括老年人和年轻人在内的全球人口将生活在智能家居、智能社区和智慧城市中^[8]。遗憾的是，尽管在医学上针对药依从性的客观问题提出很多设计目标，然而当下的一些产品并未能将设计目标很好地转化为产品需求，且缺乏从用户体验上的考量。现有的医学研究提出利用新产品、服务和体验来开发最适合的解决方案，其中 Annweiler 等人提出运用设计思维引领医学变革^[9]，与医疗保健和其他公共卫生相关领域的传统问题解决方法相比，设计思维可以带来更成功和可持续的干预措施^[10]。因此本文将设计思维作为一种有效的问题解决方法，将客观临床问题转化为设计驱动下的服务设计、可持续设计。

用药服务系统是涉及多个物理环境、多利益相关者、跨系统、跨组织的复杂系统，系统组织愈庞大则运行愈混沌，因此老人服药痛点多、体验差。从发现问题到解决问题涉及多个步骤，首先是问题的发现，复杂系统要素的抽离需要通过多维度分别对系统进行降维，这帮助我们找到问题的根源；其次是问题的延伸，系统在流程中与用户接触的问题表象，是系统造成影响的路径；最后是问题的解决，用户的实际用药需求是解决问题的最终目的，也是设计最终产出的评价标准。

因此，对于用药服务系统的设计需要一个多层级多维度的设计方法，在研究中我们引入了 SAPAD 方法，

[作者简介]

盛雨欣 (2001-)，女，山东人，东南大学艺术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的研究方向为交互设计研究。

SAPAD (Semiotics Approach of Product Architecture Design, SAPAD) 是由胡飞等人^[11]提出的以用户为中心解决实际问题的模型框架, 该模型结合产品符号学理论, 深入探索用户及利益相关者在许多系统组成部分之间的复杂交互关系中的深层含义、价值和潜在矛盾, 通过“行为-意义-对象”多维分析与映射, 从而对服务中的系统、软硬件及环境等要素及其关系进行重构^[12,13]。SAPAD 应用过程主要有三个阶段组成, 分别是行为观察与分析、意义分析与构建、服务、产品建设和设计, 已涉及实体产品、信息交互和服务与系统设计的各个领域。杨博琳、何人可^[14]提出了一种基于 SAPAD 的交互产品设计方法, 并将其应用于留学生在线教育场景; 刘艳和万萱应用 SAPAD-AHP 方法, 提出了一种针对老年患者分诊服务的系统数字设计^[15]。本研究通过 SAPAD 模型框架的引入, 可以完成从现有用药流程到用药行为进行映射, 此外其拥有语意层、经验层、语构层等多个层级, 语构层是从客观存在层面需要构建的各个系统, 经验层是从时间维度出发的用户在流程接触的软硬件触点, 语意层可以从用户的视角出发的实际用药需求, 从而形成有效整合跨学科视角的基础, 对复杂老年智能用药服务系统进行重构和创新设计, 这对实现服务系统的高效性和可持续性至关重要。

二、以老年人用户为中心的界面设计

以用户为中心的设计首要阶段是对情景的研究和解读, 这是之后开展服务设计创新与设计实践的重要基础^[16]。情景研究帮助设计行为分析设计所涉及的情境中人与物的关系, 分析用户使用特性。文章对当前研究中适老化手机 APP 的用户使用情景与相适应的产品特性进行了总结归纳, 从而分析发现用户的核心需求, 以期为后续的设计创新提供设计依据。

2020 年 12 月, 工信部发布的《移动互联网应用 (APP) 适老化通用设计规范》, 为适老化 APP 交互界面设计提供了参照标准^[17]。健康与医疗类 APP 界面的适老化设计应充分考虑老年人认知特性, 能够适应老年人视听能力下降、记忆能力衰退、肌肉骨骼老化、皮肤触点降低等生理问题与负面心理问题, 满足视觉呈现可感知、可理解、界面交互好操作等需求。

(一) 视听能力下降

衰老导致的肌肉萎缩、神经元退化或是肌肉僵硬等问题, 常常使老年人的各种行为动作都变得迟缓, 尤其是视觉和听觉能力的衰退, 导致老年人对图像与声音的刺激不再敏感^[18]。在日常生活中的表现为: 行动迟缓、对外界刺激做出的反应变慢; 视力与视敏度下降, 视野范围缩小, 色彩感受能力减弱; 在听觉方面的刺激不再敏感, 老年人声音敏锐度降低, 高音频听力明显下降, 部分老年人还会发生耳鸣。这些在 APP 界面设计上的影响表现为, 由于界面字体太小, 难以辨认, 操作精准点击度下降; 手机提示音音量较低而错过信息或来电提醒。因此, 在设计医疗类 APP 界面时, 要充分考虑老年群体视听能力下降的问题。路鹏、姜怡楠 (2023) 通过对 APP 界面中视觉符号的适老化设计来提升老年人对 APP 产品的接受与使用程度, 改善老年用户的交互体验^[19], 使用可读性强的无衬线体, 与对比强烈, 温暖柔和的色彩计划, 轻拟物化的图标编码, 帮助老年用户更容易地注意到界面中的符号信息。听觉方面, 丁玉兰 (2005) 认为, 在老年人产品设计中应尽量减少噪音干扰, 对警报和紧急信息提醒信号采用低频率声音, 并且搭配多种感知方式进行提示^[20]。

(二) 记忆能力衰退

老年人长时记忆和瞬时记忆较好, 但短时记忆下降严重, 将短时记忆转化为长时记忆能力较差, 机械记忆能力减退显著。老年人易忘事, 当时记住的东西可能很快就会忘记, 对于新鲜事物的好奇心减弱, 学习能力较弱。杨小静 (2020) 通过研究基于用户特征的适老智能产品的设计原则及应用形式, 为发展老年人智能居家养老解决方案提供思路^[21]。杨小静认为应尽量减少操作程序的复杂度, 操作程序尽量规律化、形象化, 减少记忆负担和学习成本; 功能合理分类, 充分使用提醒信息和警示信息, 避免多余信息。

(三) 肌肉骨骼老化、皮肤触点降低

老年人肌肉骨骼老化, 力量下降, 关节运动幅度减少。手指屈伸困难, 手部精细活动能力下降。手指上皮肤比较粗糙, 皮肤上敏感的触觉点数量下降、皮肤起皱且弹性越来越小, 手上指纹逐渐淡化, 皮肤触觉所需要的最小感知刺激强度也逐渐增大^[22]。在产品的功能使用方式设计上应充分考虑到老年人身体机能特点, 以省力、易用为原则进行设计。

(四) 老年人心理状况

老年人因慢性病困扰导致身体机能减弱及健康状况降低，可能会导致老年人抑郁和焦虑等负面心理状况的产生。温恒等（2023）认为，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可能面临孤独、失去社交角色感和人际关系减少等问题，这进一步加剧了老年人心理困扰的出现^[23]。当老年人面对功能复杂，操作困难的产品界面时，很容易产生负面情绪导致不好的体验。在设计老年产品交互界面的时候，要从老年人的认知特性出发，避免让其产生紧张、自卑、挫败等的负面情绪。

三、 用户研究

(一) 典型样本选取

针对慢性病老人用药服务的优化改良，研究在社区内的初期走访阶段有 20 位老人对研究课题抱有积极态度并愿意提供自身的患病细节及用药旅程，从而为自身群体谋求福祉。本研究对慢性病患者的用药相关情境进行了初步调研，将获取的信息进行归纳整理得到第一手资料。由于亲属与负责医师在患者照护过程中承担着重要责任，在初步了解相关护理情境的基础上，也将对老年慢性病患者亲属与负责医师进行深入访谈纳入考虑。

为全面了解慢性病老人服药过程，我们根据以下条件筛选典型观察对象：（1）患有常见慢性病，如糖尿病、高血压、脑卒中等，需要定期按时服药；（2）初始数据可以通过亲属、负责医师进行佐证；（3）患者可提供的数据和用药样本真实度高，愿意谈及自身的真实想法。因此，我们筛选出了五位典型病患 A,B,C,D,E: A, 67, 男, 患有高血压, 需每日定时服用降压药；B, 78, 女, 患有糖尿病, 需每日定期服药、注射胰岛素；C, 75, 男, 患有脑卒中；D, 女, 二元共病, 同时患有高血压与糖尿病, 需每日定期服药、注射胰岛素；E, 三元共病, 同时患有心脏病、肾脏疾病与糖尿病, 需每日定期服药。

(二) 确认用户路径

本次研究中的观察样本均自愿加入研究课题，且征得家属同意，通过实地考察结合非参与式的就医行为、路径、情绪的记录与观察，研究对五位典型病患开展了非正式访谈。通过对用药流程的跟踪，得到用药相关的活动：就医、开处方、拿药、买药、付款、服药。

(三) 实验材料总结

根据行为观察实验，我们发现在病情复查阶段，老人由于无法熟练使用线上预约平台，需要很早前往医院进行线下排队，并且由于科室及建筑结构的复杂，老人无法高效地规划路径。对于复查的老人，挂号缴费问诊的流程同样十分繁琐，存在重复检测与医生无法顺利沟通的问题；在获得药物阶段，在医院取药存在通勤时间长、流程繁琐等问题，但在社区药店却存在处方证明、药物种类少、配错药物等问题；在按医嘱服药阶段，老人表示忘记服药是药物依从性差的主要原因；其次是药品费用昂贵；再次则是对于需要服用短效药的慢性病老人来说，不能及时获得自己的生理数据，比如高血压老人服用降压药时，很难在亚健康状态出现伊始就及时服用降压药；最后是无法准确地获得药物计数，不便及时补充药物。

从产业和技术角度看，微电子技术与信息技术已趋于成熟，通过设计思维引领将其应用于健康可持续领域可以带来医疗效率的提高和服务质量的提升^[24]。因此对于慢性病用药的可持续健康服务，我们针对上述问题发现的机会点包括导视系统、病历云、药物云、紧急求助系统、福利系统、关怀系统以及服药系统，为整个服务流程分析后台及软硬件组成、服务触点、设计要点。

四、 基于 SAPAD 的行为-意义-对象分析

在对参与者的访谈基础上，总结归纳出慢性病老人用药的主要活动，接着将主要活动进一步细分，并与活动中相关的物理对象进行映射分析，在此基础之上，深入研究用户行为对应的意义，分别从语构层、经验层、语义层展开映射，之后进行聚类分析得到核心意义簇。

(一) 行为-对象的映射分析

行为-对象的映射分析主要用于社区及社会福利事业介入下的活动。第一是医疗活动，包含线上及线下的各种医疗服务；第二是药物供给，包含了社区医院、药店、线上配送等供药服务；第三是社会关怀与福利事业，包含了医疗保险、疾病补贴，对弱势群体的帮扶；第四是产品服务，包含了一系列养老、康复的健康产品以帮助老人健康生活。

对慢性病老人的用药活动共性进行拆解，从而为意义的映射做准备，如表 1 所示，4 大活动拆分成 11 个任务和 40 个子任务。

表 1 行为到对象的映射

活动	环境	任务	子任务
医疗活动	挂号处	挂号	预约诊室、排队挂号、等待叫诊
	门诊	看病	描述病情、医学检测、医生诊断、开处方笺
	缴费处	缴费	挂号缴费、门诊缴费、药物缴费、检测缴费
药物供给	药店、医院药房	取药	提供处方笺、药剂师配药、缴费、取药
	线上	药物配送	提供处方笺、线上支付、药物调配、上门配送
社会关怀与福祉	社区	志愿服务	日间照料、生活护理、家政服务、精神慰藉
	政府及社会救助团体	经济补助	药物补助、疾病补贴、医疗保险
产品服务	居家	智能化	生理监测、服药提醒、亲属监护、服药记录、药品管理
	外出	供药保障	药丸计数、药店地图、紧急呼叫、随身携带
	医院	信息化	电子卡模拟、同步病历、自动缴费、提供数据
	服务器机房	建立药物云	大数据监测、人工智能分析、药物物流管理

(二) 行为-对象-意义的映射

在用户行为拆分基础上进行意义挖掘及映射分析是 SAPAD 理论框架中的关键步骤之一，意义按照层次划分为语构层、经验层、语意层。因此首先将用户行为与这 3 个层次映射。

语构层主要讨论不同物理属性间的交互关系，是服务系统的构建依据之一。语构层包含了 7 个意义点：

(1) 导视系统；(2) 病历云；(3) 药物云；(4) 救护系统；(5) 福利系统；(6) 关怀系统；(7) 服药系统。

经验层聚焦用户与产品、用户与利益相关者（生产端）的交互关系，是服务系统中的软硬件触点，语构层包含了 22 个意义点：(1) 排队算法；(2) AR 导视；(3) 路径规划；(4) 同步病历；(5) 远程分析；(6) 电子处方笺；(7) 物流调配；(8) 药物管理；(9) 服药记录；(10) 处方证明；(11) 生理监测；(12) 一键呼叫；(13) 补助发放；(14) 医保统筹；(15) 费用减免；(16) 精准帮扶；(17) 亲属监护；(18) 病情跟踪；(19) 护工预约；(20) 服药提醒；(21) 依从性评估；(22) 副作用管理。

语意层关注于贯穿老年用药整个流程的个人情感因素及用户体验，语意层包含了 32 个意义点：(1) 排队队伍长；(2) 等待时间长；(3) 身体负荷大；(4) 医疗经验差；(5) 付款次数频繁；(6) 不能预约；(7) 医院标识混乱；(8) 沟通障碍；(9) 指示混乱；(10) 错过就诊时间；(11) 混淆诊疗类型；(12) 过度搬运；(13) 忘记药效；(14) 复诊成本高；(15) 医疗补助不足；(16) 疾病补贴不足；(17) 医疗费用高；(18) 医疗保健不完整；(19) 缺乏监测；(20) 没有日间护理；(21) 服药提醒不足；(22) 缺乏家庭监护；(23) 缺乏医疗记录；(24) 服务信息不足；(25) 应急能力低下；(26) 无法携带医疗设备；(27) 医疗储存不当；(28) 医疗库存不足；(29) 医疗类型有限；(30) 难以统计社区医疗资源；(31) 医疗分布不均匀；(32) 难以评估医疗资源。

(三) 语意层的聚类分析

语意层的映射是问题转化成设计实践的最后一个环节，因此对痛点进行聚类能够帮助设计师归纳设计要点，运用布尔逻辑算法矩阵对意义进行聚类分析，对相同层级内具有强相关性的意义进行合并，基于要素相关关系构建群组，定义意义间的相关系数取值区间为 [0, 3]，0 代表无关联，1 代表弱相关，2 代表强相关，3 代表核心相关，输出对称式聚类矩阵，获得意义簇。语构层意义聚类分析得到 5 个意义簇：(1) 取药流程；(2) 认知负荷；(3) 经济负担；(4) 服药触点；(5) 资源分配。



图 1 语意层的聚类矩阵分析

(四) 老年用药服务 SAPAD 映射模型的构建

通过 SAPAD 模型完成多层级多维度的老年用药服务系统的映射（如图 2），从语构层、经验层与语意层三个维度得到了用药系统、软硬件触点和用药需求的核心意义簇。中环是空间分布的用药系统，首先从中环出发依次得到外环：根据时间分布的软硬件触点和内环：根据用户的用药需求，其次将内环的用药需求进行聚类，得到五个意义簇。

SAPAD 模型从系统的角度全面剖析了系统端、产品端与用户端，为后续老年用药服务系统的建立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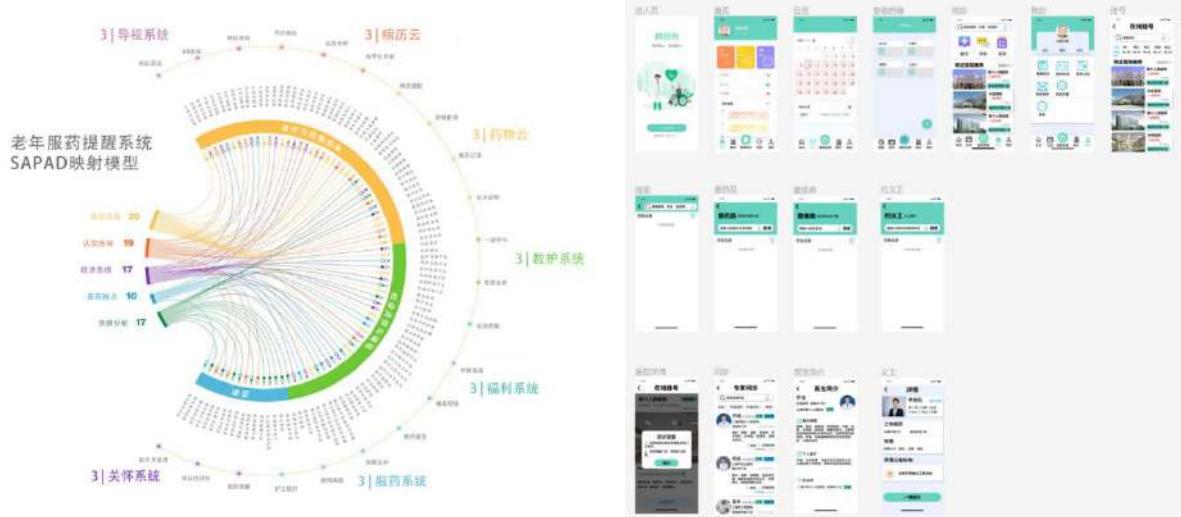


图 2 老年服药提醒系统的 SAPAD 映射模型

图 5 “药日历”APP 界面设计

五、老年服药提醒系统创新设计实践

（一）老年服药提醒服务系统设计

SAPAD 模型分析出的核心意义簇明确了慢性病老人的用药需求及目标，指出了老年用药服务流程的优化方向，并以可视化的方式进行准确描述。绘制服务蓝图进行系统性展示，如图 3，根据病情复查、获得药物、按医嘱服药三类行为，将老年用药服务流程划分为就诊及复诊、设置服药日历、服药提醒、服药、药物复购等阶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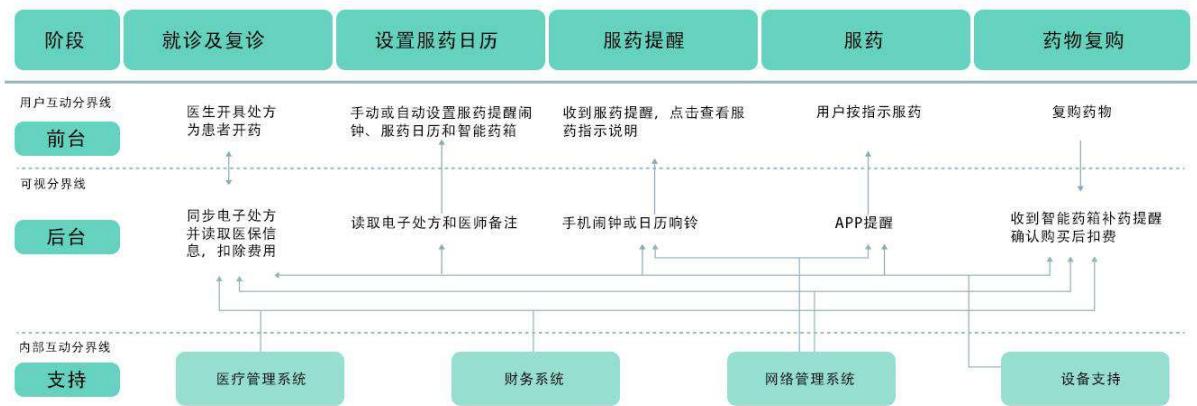


图3 服药提醒APP服务蓝图

(二) 信息框架搭建

基于前期对于适老化设计策略的研究结果进行设计实践，根据用户调研和 SAPAD 模型得到的结果指导老年人服药提醒 APP 的功能搭建。“药日历”APP 主要分为五个部分：“首页”“日历”“智能药箱”“就诊”“我的”，并根据功能特点搭建 APP 信息框架，见图 4。核心功能为服药提醒和智能药箱，提高操作效率。其他辅助功能集中在“就诊”和“我的”部分。



图4 “药日历”APP 信息框架

(三) 产品界面设计

产品界面设计遵循简洁化原则，以保证老年人可以迅速上手。在生理特征上，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会出现不同程度上的视力障碍，比如屈光不正和老年性眼病，比较常见的远视（老花眼），并且一些眼睛疾病也会在该年龄段出现：视网膜黄斑、白内障、青光眼、中枢视野损失^[27]。主要表现为对光的敏感度降低；远视，视力低；对色彩感知力下降。在界面设计中需要充分考虑老年人视力问题，尽可能使设计适应老年人生理需求。如图 5 所示，本次设计实践中采用了高饱和度与高明度的薄荷绿色为主色调，在互动键设计上也采用了饱和度较高的柠檬黄色和橘红色，对比鲜明，模块分界清晰。文字内容简洁易懂，字体大小、粗细精心考量，并且辅助以图形符号，即便在无法看清文字的情况下也可以通过图形符号进行识别。

在行为特征上，老年人行动较迟缓，往往会仔细观察后再小心翼翼地点击。机体的退化使老年人手掌摩擦系数小，图形解锁、指纹解锁、滑块解锁老年人使用起来都或多或少存在灵敏度不足、重复操作等情况。在本设计实践中，将字体和点击区域进行了相应放大，提高老年人的点击正确率。加强色彩对比，赋予模块清晰的边界，避免用户因识别不清造成的误触。在浏览界面时，将展示安排为一项一行。放大展示面积与描述文字，服务于老年用户浏览速度较慢，符合他们仔细阅读页面文字的特征需求。

六、结语

本文主要探讨了如何优化智能药物治疗服务，以解决老年慢性病患者的服药依从性问题。本研究提出了一种基于 SAPAD 模型的设计思维驱动的方法，将服务和经验整合到药物服务中，建立了一个可持续的医疗服务体系。基于以上研究，本文设计了一个综合性适老化服药提醒 APP，以优化老年人在药物治疗期间的行为。

综上所述，本文有以下创新点：在研究方法上，本文运用 SAPAD 模型，从混沌系统中抽离出精准详细的优化策略，以设计思维驱动，将新技术跨专业融合到用药服务及健康可持续产业；在设计实践上，本文显示了大数据和云服务在改善老年人药物管理方面的潜力，初步搭建了老年人慢性病用药的可持续健康服务体系，为该领域的未来研究和开发提供了参考案例。

同时出于局限性，本文的研究还存在许多不足：（1）设计实践中用户行为观察实验的样本量有待增加；（2）提出的设计方法还需要在更广泛的实践案例中加以应用和改善，以验证和提升该方法的适用性和普遍性。今后的研究会在此基础上进行改进和提升。

参考文献：

- [1]世界卫生组织.(2020).健康老龄化的十年:基线报告.
- [2]Akiyama, H. (2020). Aging well: an update. *Nutrition Reviews*, 78(Supplement_3), 3-9.
- [3]彭一航,方琴,谢莉玲,等.不同类型养老机构老年人服药依从性调查[J].中国护理管理,2020,20(03):348-354.
- [4]曹成霖,郭颖,洪子轩,等.慢性病共病老年人服药依从性研究的系统评价[J/OL].南京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5.
- [5]刘冬阳,黄昕彤,赖晋锋,等.中国中老年人慢性病共病流行趋势研究[J].中国慢性病预防与控制,2024,32(04):244-249.
- [6]刘影,姜俊丞,景汇泉.我国中老年人群慢性病患病率及患病种类区域差异与医疗卫生资源的相关性研究[J].中国全科医学,2024,27(12):1452-1459.
- [7]Ohta, R., Ueno, A., Kitayuguchi, J., Moriwaki, Y., Otani, J., & Sano, C. (2021). Comprehensive care through family medicine: improving the sustainability of aging societies. *Geriatrics*, 6(2), 59.
- [8]Thakur N, Han CY. A Simplistic and Cost-Effective Design for Real-World Development of an Ambient Assisted Living System for Fall Detection and Indoor Localization: Proof-of-Concept. *Information*. 2022; 13(8):363.
- [9]Annweiler, C., Noublanche, F., Boureau, A.& Berrut, G.(2023). Design thinking and clinical living labs: Two complementary approaches for addressing complex health challenges in geriatric medicine. *Maturitas*, 173, 121-122.
- [10]田原,董仕玮,王夏玉,等.基于服务设计思维的适老化手机 APP 界面改造研究[J].设计,2023,36(03):50-53.
- [11]Hu F,Sato K,Zhang X,et al. Semiotic basis for designing product architecture[C].The 19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ngineering Design,Seoul,2013:19-22.
- [12]胡飞,晋漪萌,王楷.基于 SAPAD 的无人售货产品服务系统设计研究[J].机械设计,2019,36(10):127-132.
- [13]胡飞,李顽强.定义“服务设计”[J].包装工程,2019,40(10):37-51.
- [14]杨博琳,何人可.基于 SAPAD 和场景化思维的在线学习交互产品设计研究 [J]. 包装工程,2023,44(02):167-179.
- [15]刘艳,万萱.缓解老年人就医焦虑的导诊服务系统设计研究[J].包装工程,2024,45(14):117-127+177.
- [16]田原,董仕玮,王夏玉等.基于服务设计思维的适老化手机 APP 界面改造研究[J].设计,2023,36(03):50-53.
- [17]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抓好互联网应用适老化及无障碍改造专项行动实施工作的通知 (工信部信管函〔2021〕67号) [A/OL].(2021-04-06).
https://www.mit.gov.cn/zwgk/zcwj/wjfb/txy/art/2021/art_b04e1baa455c448b80fb790d7c50bfd4.html.
- [18]王函静.基于产品语义学的老年人移动医疗 APP 设计研究[J].工业设计,2022(06):109-111.
- [19]路鹏,姜怡楠.基于视觉符号理论的 APP 交互界面适老化设计研究[J].包装工程,2023,44(12):189-197+212.
- [20]丁玉兰. 人机工程学[M]. 北京: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5.
- [21]杨小静.基于用户特征的适老智能产品设计研究[J].包装工程,2020,41(06):123-126.
- [22]汪晓春,纪阳,曹玉青.老龄产品开发设计[M].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4

- [23]温恒,刘钰曦,刘欢婷等.基于典型相关分析的老年人心理困扰与社会网络关系分析[J].社区医学杂志,2023,21(19):981-987.
- [24]Thakur, N.; Han, C.Y. A Simplistic and Cost-Effective Design for Real-World Development of an Ambient Assisted Living System for Fall Detection and Indoor Localization: Proof-of-Concept. *Information* 2022, 13, 363.
- [25]Zhang, X., HU, F., Zhou, K., & Sato, K. (2017, July). Reflecting Meaning of User Experience Semiotics Approach to Product Architecture Design. In *Transdisciplinary Engineering: A Paradigm Shift: Proceedings of the 24th ISPE Inc.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ransdisciplinary Engineering, July 10-14, 2017* (Vol. 5, p. 329). IOS Press.
- [26]Chen, S., & Li, Y. (2020). A Study on Oral Health Care System Designing for the Middle-Aged Based on SAPAD-PCA. In *HCI International 2020-Posters: 22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HCII 2020, Copenhagen, Denmark, July 19–24, 2020, Proceedings, Part III 22* (pp. 639-653).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 [27]袁蕾.基于感知的老年人智能手机交互界面设计与操作流程研究[J].*艺术与设计 (理论)* ,2018,2(05):92-94.

Design Research on an Elderly Medication Reminder APP Service System Based on SAPAD

Yuxin Sheng¹

¹ *Southeast University, Nanjing 211189, Jiangsu, China*

Abstract: Over 85% of the elderly population suffers from one or more chronic diseases, with long-term targeted medication being the primary treatment measure. The medication process for elderly patients with chronic diseases includes three essential behaviors: medical follow-up, obtaining medication, and taking medication as prescribed. Due to environmental, systemic, and cognitive factors, the average medication adherence rate among the elderly is below 45%, resulting in significant losses of life and health as well as the waste of medical resources. With the increasing severity of an aging society, the need for a sustainable and healthy medication service system is urgent. This study introduces the SAPAD method to analyze and construct touchpoints for a sustainable healthy medication service, starting from the behaviors of five typical elderly patients with chronic diseases. Using quant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objective problems in the existing service system are identified. Based on the identified issues, design thinking is employed to build a sustainable healthy medication service system for elderly patients with chronic diseases. To reduce the medical burden of chronic diseases, the study actively leverages the collaborative role of communities, pharmacies, and online consultations to enhance the health service experience for elderly patients with chronic diseases. The study applies the optimized strategies to the design of the elderly medication health service system to improve the well-being of the elderly.

Keywords: Chronic disease medication; Health service; SAPAD; Design strategy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2.516

美丽假象：社交媒体审美观对女性形象塑造的误导及反思

袁雨欣

(香港理工大学，香港 710048)

摘要：人的审美趋向根植在社会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中，并且随着社会发展不断变化的。当下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女性在各种社交平台上塑造着迎合“主流审美观”的个人媒介形象。同时，这些审美观也在不断影响女性现实生活中个人形象的塑造。在男性凝视和消费主义影响的“白、幼、瘦”审美下，逐渐引发了女性容貌焦虑。社交媒体平台上“完美”的女性形象与层出不穷的消费主义思潮将女性桎梏在现有的单一审美观中。本研究以社交媒体为背景，分析现代社交媒体环境下形成的审美新趋向及归因，揭示社交媒体背景下女性形象塑造的现实困境，探讨社交媒体视阈下美好女性形象塑造的路径。

关键词：审美观；青年女性；社交媒体；性别规训；容貌焦虑。

1. 审美观的演变与发展

女性形象是形象概念中的一部分，《女性话题概念及形象描述词语的分布分析》将女性形象看作一个动态化的概念，女性形象指社会对女性综合的规范和评价，既包括社会文化对女性角色的规范和审美观念，又包括女性在社会中的现实表现。女性媒介形象是媒介在社会交往中形成的能够吸引注意力的品相，是受众对媒介组织呈现的女性的印象集合，是媒介符号话的社会特征。^[1]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受男性凝视与网红经济的双重影响，以“白、幼、瘦”为特征的审美观在社交媒体上泛滥，将女性束缚于狭隘的审美框架之中，女性在线通过滤镜等手段积极构建个人媒介形象。同时，受媒介影响的异化审美范式又作用于女性现实生活，影响女性对个人形象的满意度以及其在职场上的发展。作者通过田野调查，聚焦社交媒体环境，按照“现行审美观的形成”，“被误导的女性形象”以及“女性形象塑造的反思”三部分，运用涵化理论与符号学理论分析审美新趋向的形成机制及其根源，剖析其如何误导女性形象塑造，并在此基础提出反思。

本次调查中，被访者均表示在形象管理过程中，会产生不同程度的焦虑甚至自卑心理，主要在意的节点有“身材、衰老、皮肤”；访谈发现，30岁以上的女性更注重皮肤衰老的问题，因此，医美项目及护肤消费成为她们日常为美开销的重要部分。焦虑视角包括自我审视与他人审视。自我审视是在比较模式下，个人因自身形象与网络形象不符所产生的焦虑感。他人审视是由于在父权社会中，女性处于被凝视的角色所产生的。为缓解由形象产生的焦虑心理，被访者提到频率较高的措施是进行“美妆、护肤、医美”。

审美观并非一成不变，而是根植于一定的社会文化环境。塔瓦约特总结了构造女性美貌的三个特殊时期，即美貌标准的现代演变过程。20世纪60年代末，年轻人普遍追求苗条，苗条成为了青春和健康的代名词。到了80年代初期，健美成为美貌概念中的首要因素。这一时期，运动被视为塑造健康美丽体型的一种重要手段。90年代初期，人们开始聚焦于美丽本身，并关注依托技术进步的化妆品和医疗手段。^[2]这三个时期展示了女性美貌标准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演变过程，反映了社会、文化和科技等多方面因素对审美观念

[作者简介] 袁雨欣，香港理工大学中国历史与文化学系在读研究生。

[1] 栾轶玫. 媒介形象的研究现状及重新定义[J]. 今传媒, 2006 (09X): 16-19.

[2] 刘燕. 审美与自我呈现：青年女性容貌焦虑的深层逻辑[J]. 中国青年研究, 2022, 5: 85-92.

的影响。

基于本土文化环境的审美特征也不断更替。回溯审美标准的历史变迁，春秋战国崇尚朴素美，汉晋时期崇尚纤细体型；唐朝则转向以肥为美的标准；宋元明清以来，娇柔瘦弱又成为审美潮流。^[3]杨斌从社会文化角度分析，认为以男性中心文化为主形成的社会审美标准，控制着女性的生活方式和意识，甚至以女性生命健康为代价形成了病态文化。^[4]如今社会审美观的形成仍受男性中心文化的影响，并通过社交媒体表现出来。在男性凝视下，女性用社会流行的审美标准审视自己，进而投入大量的时间和金钱对个人形象进行加工和规训，形成并固化了“白幼瘦”审美观。对美的追求是人的本能，但当个体或社会环境过于强调身体外貌时，很容易形成趋同性认知，在社交媒体的作用下，审美观变成一套僵硬的模板，大众不自觉被其影响。

有关社交媒体的使用及其影响也受到学者的关注，Marengo 等认为，频繁使用高度可视化类型社交媒体的个体，对自身容貌形象问题的担忧明显高于未使用社交媒体的同龄人。社交媒体构建虚拟自我形象的地方，女性会对自身容貌表现出格外的关注。^[5]必须指出，容貌焦虑已普遍存在于当代女性群体中，具有很强的社会特征，有必要反思当下审美观对女性塑造形象的错误指导。

2. 当下审美观形成的理论分析

2.1 被涵化的审美观

社交媒体潜移默化的对人们观念的塑造和价值认知产生影响。涵化理论认为，大众传媒的拟态环境对人们认识和理解现实社会有重要影响，这种影响是长期的、潜移默化的培养过程。^[6]社交平台所传递的“审美劝服”影响着用户的价值判断。

一方面，媒介设置“颜值至上”的议程被网红经济所浸润。单小曦、支朋在罗兰巴特的两级神话理论基础上提出了新的媒介技术神话框架，用以阐释新媒介的文化现象，他们认为“媒介神话”的初级系统由原来的语言符号系统扩展为媒介系统。而次级系统在媒介意指过程中，初级系统的所指意义逐渐退化，将一种文化意识形态包装为具有精神价值指向的思想观念。^[7]网红在社交平台上通过人设的打造成为关键意见领袖，掌握绝对的话语权，长期发表诱导性的内容，如“不化妆就不礼貌”、“体重过百就是胖子”、“学习女团的身材管理”等网络热门话题，制造着外貌至上的伪景观。在媒介的渲染下，平台通过媒介议程，将同质化、重复性高的审美标准传递给大众，影响着女性审美认知，导致女性主体性判断缺失，审美眼光逐渐固化。

另一方面，大数据时代，媒介不仅能够追踪用户行为，还能利用算法为用户定制个性化信息。基于技术支持，小红书等平台通过个性化推荐机制，基于用户的浏览记录和偏好，将海量内容推荐给用户，逐渐被受众所涵化。这些爆炸性的信息和同质化的内容将女性编织在“信息茧房”中，构成了媒介涵化受众的过程。双向涵化使得“白幼瘦”审美在大众脑中不断强化，形成规训个人形象的标准。

2.2 符号化的身体象征

语言学家皮尔士认为，符号在建构意义的同时，也被赋予支配的特性。符号的象征性是最难以定义的一种属性。^[8]身体作为一种象征符号，记录了社会文化的规则。社交平台上构建的女性形象成为一种景观，在消费社会中被不断加工，网红通过创造外貌神话，向大众传递着“白幼瘦”即自律、幸福、美丽等信号。

随着身体消费的兴起，刘娜和胡蓉指出在美妆短视频中，由于形象构建、身份认同和娱乐消遣的需要，人们制作或观看美妆短视频，实现乌托邦式的自我期待与建构，最终推动“她经济”下的符号消费。^[9]“她经济”的兴起预示着消费社会中女性身体已成为一种符号，通过各种身体消费行为，女性找寻个人形象的定位，彰显自己的身份。根据《颜值消费新趋势洞察报告（2023）》调查显示，颜值消费的核心力量是女性，占八成，25-35岁的青年女性成为颜值消费的主力军。^[10]在男权主义和商业利益引导下，不断强化女性身体作

[3] 王朋进. “媒介形象”研究的理论背景、历史脉络和发展趋势[J]. 国际新闻界, 2010 (6): 123-128.

[4] 杨斌, 虞重干, 李延超, 等. 女性身体美的历史审视[J]. 体育文化导刊, 2009 (7): 140-143.

[5] Marengo D, Longobardi C, Fabris MA, et al, “Highly-visual social media and internalizing symptoms in adolescence: The mediating role of body image concerns”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82(2018), pp. 63-69.

[6] 郭庆光《传播学概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

[7] 单小曦, 支朋. 自媒体文艺短视频的媒介神话学阐释[J]. 内蒙古社会科学, 2021: 195-203.

[8] 赵毅衡, 《符号学：原理与推断》，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

[9] 刘娜, 胡蓉. 美妆短视频中女性形象的自我建构[J]. 传媒, 2019, 24.

[10] 人民数据研究院, 《颜值消费新趋势洞察报告》，2023。

为消费客体的需求，推动其走上自我规训之路。

3. 研究设计

为进一步探究社交媒体审美观如何误导青年女性的形象塑造，作者于2024年7月通过随机抽样方式，对7名青年女性进行了半结构化的深度访谈，通过在线语音访谈收集材料。根据文献资料与预访谈情况，围绕访谈提纲，涉及的问题有“当下大众审美观的趋向”、“在社交媒体上对外貌身材相关内容的浏览频次”、“为美买单的消费能力”等。

3.1 样本选择

本次田野调查使用目的性抽样，确保受访者具有使用社交媒体的经历。在样本年龄方面，选择20-35岁期间的青年女性作为访谈对象，得到被访者的基本信息如表1所示。

表1 被访者信息

序号	被访者	年龄	职业	社交媒体使用频率	形象管理开销比例	所在城市
1	张张	28	大学老师	1-2小时/天	10%	河南新乡
2	洋洋	29	事业单位	1-2小时/天	10%	陕西西安
3	颜儿	27	私企财务	2小时/天	20%	深圳
4	杨过	32	留学顾问	1-2小时/天	20%	黑龙江哈尔滨
5	扬子	34	私企销售	1小时/天	50%	河南郑州
6	冰淇淋	21	学生	2-3小时/天	40%	山东济南
7	橘子	29	学生	1小时/天	10%	香港

3.2 操作过程

笔者于2024年7月上旬招募受访者，确认受访者自愿参与。通过问卷收集受访者基本信息，包括性别、年龄、生活习惯等，对受访者信息进行严格保密，保障其隐私权。2024年7月中旬根据问卷收集的信息拟定访谈大纲，自7月下旬开始对受访者进行半结构化深度访谈，每位受访者访问时间在30分钟以上。

完成访谈后，笔者对每位受访者的材料进行建档，在材料整理及编码的过程中，整合出青年女性都认为现行的审美观偏向“白幼瘦”标准。按照“编号、姓名、年龄、职业、媒体使用频率、形象维护开销、地区”的顺序进行编辑并对原始数据归纳分类。探究媒介使用频率、形象维护开销与女性形象塑造的关系。关于访谈语料的解析主要采用主题分析法，数据处理较为灵活，更适用于本文。

4. 女性形象塑造的影响因素分析

随着“白幼瘦”审美的升温，个体感到不符合公众审美时，会产生自卑和焦虑情绪，在容貌消费的推动下，外貌被过分强调，导致个体为寻求身份认同时陷入焦虑的状态。社交媒体的“完美外貌”展演对于容貌的社会性解读呈现单向化趋势，社会个体基于自我认同与他者认同的追求，在被凝视和被规训中呈现审美单向化，让人误入容貌焦虑中。

4.1 自视：虚假容貌背后的自我呈现迷失

社会比较理论认为个人对于自己的能力和观念进行自我评价的需要，是人际交往中人与人之间相互影响和某些竞争行为的直接原因。^[11]在社会审美文化的大背景下，个体会将自身与他人进行比较，从而确定自身价值。社交媒体通过议程设置让“白幼瘦”成为网络身体意象的标准，扩大理想形象与个体现实形象的差距，在社会形成焦虑氛围。社交媒体中的比较催生了许多模仿行为，用户会不自觉的认为网红的完美形象是自己的理想追求，因而积极迎合理想形象的标准。

“自我展现”是带有注视下的自我表演，戈夫曼曾提出拟剧理论，认为人在日常生活中有前台和后台之分，在不同情景下扮演不同角色。现实生活中，许多女性在社交平台展现的都是经过精心修饰的形象，这些身体意象的输出在平台得到了赞美，在社交媒体的浸染下，促使更多女性开始在意个人形象的展现，推动审美竞争，由此产生对自我的错误认知。

[11] 步小花, 高凤妮. 使用社交媒体对女性容貌焦虑的影响: 一个链式中介模型的检验[J]. 新媒体研究, 2021: 23.

社交媒体焦虑指个体因担心他人对自我体型或体格负面评价产生的心理反应。^[12]容貌焦虑是对外貌、身材不自信产生的焦虑感，在青年女性群体中尤为突出。网红经济语境下，身体传播对审美观的转化产生了极大影响，个体容易陷入体象障碍中，因对个人身体不满产生歪曲的心理。一些网红利用体象在注意力时代获取流量，“一个月瘦 20 斤”等话题在社交平台上拥有极高的关注度，对体象的片面追求引发了大众误认为自己不符合这些标准就是不完美的假象。加之视频图片等新媒体传播形式，降低了审美主体的素质要求，大众审美能力弱化，审美观念趋同且单一。

各种滤镜加持下的内容在网络上迅速传播，用户在浏览之余产生了焦虑情绪，潜移默化对自己的外貌失去信心。当女性习惯性使用美图和滤镜，就会加深对现实中个人形象的不满，越来越多的女性脱离现实并沉浸在过度美化的网络拟态中，不自觉的沉浸在社交媒体和广告主制造的焦虑经济里。

我平时用社交媒体的时间大概 1-2 小时吧，假期的时候可能有几个小时。如果说我要出去玩，想学某个妆容，也会花几个小时学。因为我是属于特别容易自卑的人，拍照的话，其实原相机会放大一些缺点，所以不管多晚，我都会修完图才愿意睡觉。每张图都是精修之后发布，修图时间大概需要 20-30 分钟一张。我在抖音的照片都是精修后发的，就是想打造一个比较精致的形象，跟我日常大部分时候不那么符合的，但我认为其实也是最好的一面展现出来。（被访者 6）

女性不仅在线构建着个人媒介形象，在线下也利用医美、化妆等手段对自身进行符号化修饰。鲍德里亚将消费主义视为一种可操作符号的系统性行为，制造“容貌焦虑”的目的不是重构审美文化，而是释放大众的购物欲，是基于消费社会背景下贴合受众消费心理的营销策略。许多商品被赋予高端、精致等符号意义，“贵妇面霜”等激发了女性的购物欲，导致物品在某种程度成为社会地位和身份的象征，人的主体性逐渐丧失。

不可否认，大众传媒抓住了女性消费者的心理，部分女性为追求社交平台上精致的形象进行超前消费，女性身体消费超越了身体的实用主义需求，演变为一种超现实的文化功能。据 Mob 研究院《2023 年医美人群洞察报告》显示，在小红书平台关于容貌焦虑的话题浏览量破 15 亿，近 8 成人有容貌焦虑。从性别上看，女性是医美行业的主力军占 73%，是男性的 2.7 倍。从年龄上看，主要在 25 岁以上。^[13]

我的日常开销比如光子嫩肤全模式，一个月做一次要 5000 块。还有我经常购买一些美容仪，一个月总共要 1 万左右。因为过了 30 岁，我就会更关注抗老的产品，而且我的鱼尾纹比较严重。在小红书上我有专门关注护肤的内容。（被访者 4）因为我还是学生，生活费比较有限，遇到想买的护肤产品也会用花呗或者美团月付去买。（被访者 6）

女性长期在社交媒体营造的审美场域中，逐渐形成了与现实脱节且失调的审美观。在审美幻象中，个体难以正确评价自我形象，于是产生了落差感，甚至自卑感。在大众消费主义的推动下，异化的审美观进一步激化了女性的焦虑情绪。社交媒体的审美塑造建立在人际交往中，视觉化的冲击容易造成隐形比较，因此不同个体也在社会审美文化的背景下，不断和媒介形象进行比较，不自觉的认同网络上的理想美，对个人身体意象产生负面情绪。

4.2 他视：男性凝视下的女性形象

女性形象的塑造在某种程度上与社会秩序父权化相关，社会上充斥的男性观念对女性的刻板印象影响了女性的成长和独立，限制了女性的自由选择，女性在社会秩序的凝视下成为男性的附庸。高科技与性别的结合不能过于理想化，大众传媒与男女平等价值观的传播，即存在一致性也有相互之间的张力。网络在为女性发声，展现自我的同时，也复制了现实生活的性别歧视，社交媒体上对“被看”女性对象的聚焦，即是男女平等和先进性别文化的公然挑战。^[14]

如今，在海量的网络信息面前，谁能吸引眼球，就可以在网络中持续发展，女性形象受市场经济中男权文化对女性美认知的影响，通过各种方式表现，美女博主不惜将自己打造成使男性赏心悦目的工具，将身体特征与自信、自律、成功等价值观相联系，更是消费社会对女性性别训练的特有方式。社交平台上一些女性甚至强调对女性身体的色情描绘，构建起最原始的审美刺激，将完美身体符号直接呈现在受众面前。受众在欣赏美的本能欲望刺激下，自然而然的接受完美身体符号。网络媒体的虚拟性、交互性和隐蔽性也暗合了受众在现实生活中对女性身体窥视的欲望，通过消费女性形象，扭曲了社会性别印象。

[12] Hart EA, Leary MR, Rejeski WJ, "The measurement of social physique anxiety", Journal of Sport & Exercise Psychology, 1 (1989), pp. 94-104.

[13] Mob 研究院，《2023 年医美人群洞察报告》，2023。

[14] 曾长秋, 李斌. 性别与传播——网络媒体中“被看”的女性形象[J]. 兰州学刊, 2015 (3): 188-191.

美国传播学家盖伊·塔奇曼在《壁炉与家庭：媒介中的女性形象》中提出“贬抑”一词，指网络媒体中被看的女性形象，是对其贬损和歪曲，女性在社会变迁中起到积极作用，在网络媒体中却遭到“象征性歼灭”。^[15]可以看出，网络上塑造的完美身材背后呈现的是他者话语的束缚，男性仍然拥有审美的重要话语权。

审美文化的转向与社会意义上的性别文化有关联，男性视角的强化是女性审美标准建构的基础，女性在丧失主体地位的情况下，成为被凝视的客体。通过乌托邦式的美貌建构，极大影响着性别的社会秩序以及女性的社会地位，女性囿于美貌牢笼无法在更为广阔的社会领域实现自我提升。^[16]这种他者话语也体现在内容创作上，如“好嫁风穿搭”等话题，将女性爱美的目的与取悦男性、获得男性认可连接起来，说明大众媒介对女性形象的建构充斥着刻板印象。

因为我身高有一米八，所以我会比较关注大码女装，这些衣服你去看，她对模特的身材也是有要求的，要腰细，臀翘什么的，其实这些要求对正常的有些微胖的女士都是比较难做到的样子。就是说社会还是会对我女生的身材有要求的。（被访者4）

不仅如此，男权在社会机制中以无数方式参与生产和调配。男性的审美凝视还渗透在劳动力市场上，研究发现颜值与劳动力市场有一定关系，Hamermesh and Biddle (1994) 最早研究了颜值与工资收入的关系，并验证了“美丽溢价”的存在。拥有平均水平以上颜值的劳动者相对于颜值在一般水平以下的劳动者能够多挣10%-15%。^[17] Mobius 和 Rosenblat (2006) 认为，美貌除了能够吸引雇主时期认为的能力，同时能增强个人信心并提高社交能力，这使得美貌的人工资收入更高。^[18]在社会交往的过程中，需要多种形式的语言和非语言艺术，其中美貌就是非语言沟通的载体。

我是做客户经理的，我发现如果我见客户的时候，收拾的比较干净利落，化个妆，客户对我的态度就会不一样，让我有些以色侍人的感觉。特别是我签下了某单，我感觉自己不是因为自己的能力，而是因为我的外表才能拿到这单。（被访者5）我是做留学机构培训的，我有一个学生长得也很漂亮，今年进了一家做视频的公司，那个公司就是只要长得好看上镜，哪怕你没有专业能力，不会剪辑，你的工资也比那些有技术的人高的。（被访者4）包括我自己在的留学机构也是，如果你的形象好一些，家长就会认为你更权威，就更愿意选择你教他们的孩子。（被访者4）

美丽的人更受青睐和认可，使得她们进行社交的边际成本更小，从而就能获得更多的社会机会和自信心，有助于提升其社交能力。因此，外貌与社会资本密切关联，进而影响个人在市场资源配置的竞争结果。

5. 自塑与他塑：女性形象塑造的反思

5.1 自塑：女性的自我觉醒

美的本质应是身体的健康，自信的表达，是自我清晰的认知，美从来没有统一标准。当下，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探索自身的内在美，发展独立的人格，创造去性别化的话语空间，重构符合时代发展的社会性别角色。女性学家陈志红说，“所谓女性意识，一方面既源于女性特有的生理和心理机制；另一方面，它又与人类社会的发展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不同的社会历史阶段决定着女性意识发展的不同层次和不同的历史内容。”^[19]女性主体意识作为一种精神存在着独立的可能性，同时也展现着一种诗意的想象。她们不断积累力量以对抗传统世界对女性的束缚和压抑，把目光投向社会舞台，在社会化传播与交流中传递“她者”意识。

社交平台上越来越多的女性通过亲身展演，打造新的自我审美定义，借助社会化媒介的可见表征以及自主能动性从而进入公共领域。许多女性开始打破传统男权社会下的畸形审美，直面自己“不完美”的形象，运用数字媒体技术重构“她们”与公共空间的关系。无论是作为传播者的女性、被塑造的女性、还是接受文化传播的女性，在进行交流与互动时，都应该树立起积极正面的主体形象，传达出女性的主体表达需求。

5.2 他塑：构建新的社会环境

媒介环境和网络空间是用户的公共话语平台，亟需加强网络空间的治理，保证和谐的环境。想要让女

[15] Gaye Tuchman, Arlene Kaplan Daniels and James Benet, "Hearth and Home: Images of Woman in the Mass Medi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pp.3 - 38.

[16] 李明文, 柏茹慧. 女性媒介形象呈现研究[J]. 当代传播, 2019 (3): 110-112.

[17] 徐淑一, 林建浩, 李捷瑜. 颜值与公平感知——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J]. 经济学 (季刊), 2020, 5: 341-362.

[18] Mobius M M, Rosenblat T S, "Why beauty matter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6(2006), pp.222-235.

[19] 张文鸯. 新媒体语境下女性媒介话语权的缺失、异化及建构[J]. 新闻界, 2014 (2): 29-32.

性摆脱社会对其身体审美的规训，就要完善媒介监测机制，建立女性传媒监测网络，对贬低女性、否定女性、鼓吹传统性别角色的内容进行地址，为平等的性别关系创造社会公共空间。

不仅如此，新媒体技术的不断发展，人人都有麦克风，每个人都可以在各大平台发表观点，传播变得多元化。提高大众的媒介素养，培养青年女性群体的社会性别意识和网络辨别能力，对传播性别不平等的内容进行反思和抵抗性解读。对平台上进行商业化包装的产品始终保持冷静客观的态度，不盲目跟风，以防掉入消费主义陷阱。随着社会的变革和发展，社交媒体早已成为人们认知社会以及审视自我的重要途径，媒介空间的文化发展与现实社会中的文化发展交相呼应，更一步推进了社会的文化变革。

社交媒体要努力打造包容的环境和积极的内容，提高女性的社会存在感与影响力，塑造多元的女性形象，通过调动新媒介下的多种感官系统，拉近女性群体与大众的距离，帮助女性获得社会身份认同，建立价值体系和自我提升，实现自我的满足感。社交媒体在这一过程中需要肩负着为女性争取社会关注和合理权益的责任。

此外，当代媒介环境下，涌现出众多“她力量”的文艺作品，这些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专注于实现自身的人生价值，而不是陷入外貌圈套中自卑又焦虑。社会风气正在不断转变，在媒介议题和各种文艺作品的影响下，部分女性也在摆脱现存的美丽枷锁，寻找更加独立的自我形象。

结论

基于田野调查，作者发现当代社交媒体基于经济利益，贩卖单一的“白幼瘦”审美标准，女性很容易掉进审美圈套中。在畸形审美观长期的涵化下，女性竞相模仿并塑造的“完美形象”，一方面通过网络技术在社交平台塑造虚假媒介形象，一方面通过医美手段改变真实外貌，当个体无法达到“完美形象”的标准就会产生焦虑。此外，劳动力市场上拥有美貌的人也会享受美貌带来的福利，也促使女性在职场上更注重个人形象。面对社交媒体营造的虚假审美，女性应该提高自我认知能力，培养自己的身份认同，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同时，平台应该肩负起更多的社会责任，减少不良价值观的传播，打破女性被凝视的困境，通过媒介传播多元化的审美价值观。

参考文献：

- [1] 栾轶玫. 媒介形象的研究现状及重新定义[J]. 今传媒, 2006 (09X): 16-19.
- [2] 刘燕. 审美与自我呈现: 青年女性容貌焦虑的深层逻辑[J]. 中国青年研究, 2022, 5: 85-92.
- [3] 王朋进.“媒介形象”研究的理论背景, 历史脉络和发展趋势[J]. 国际新闻界, 2010 (6): 123-128.
- [4] 杨斌, 虞重干, 李延超, 等. 女性身体美的历史审视[J]. 体育文化导刊, 2009 (7): 140-143.
- [5] Marengo D, Longobardi C, Fabris MA, et al,“Highly-visual social media and internalizing symptoms in adolescence: The mediating role of body image concerns”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82(2018),pp. 63-69.
- [6] 郭庆光《传播学概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
- [7] 单小曦, 支朋. 自媒体文艺短视频的媒介神话学阐释[J]. 内蒙古社会科学, 2021: 195-203.
- [8] 赵毅衡, 《符号学: 原理与推断》,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6年。
- [9] 刘娜, 胡蓉. 美妆短视频中女性形象的自我建构[J]. 传媒, 2019, 24.
- [10] 人民数据研究院, 《颜值消费新趋向洞察报告》, 2023.
- [11] 步小花, 高凤妮. 使用社交媒体对女性容貌焦虑的影响: 一个链式中介模型的检验[J]. 新媒体研究, 2021: 23.
- [12] Hart EA, Leary MR, Rejeski WJ,“The measurement of social physique anxiety”,Journal of Sport & Exercise Psychology,1 (1989),pp.94-104.
- [13] Mob 研究院, 《2023 年医美人群洞察报告》, 2023.
- [14] 曾长秋, 李斌. 性别与传播——网络媒体中“被看”的女性形象[J]. 兰州学刊, 2015 (3): 188-191.
- [15] Gaye Tuchman, Arlene Kaplan Daniels and James Benet,“Hearth and Home: Images of Woman in the Mass Medi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 pp.3 - 38.
- [16] 李明文, 柏茹慧. 女性媒介形象呈现研究[J]. 当代传播, 2019 (3): 110-112.
- [17] 徐淑一, 林建浩, 李捷瑜. 颜值与公平感知——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J]. 经济学 (季刊), 2020, 5: 341-362.
- [18] Mobius M M, Rosenblat T S, “Why beauty matters”,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96(2006),pp.222-235.

[19] 张文莺. 新媒体语境下女性媒介话语权的缺失, 异化及建构[J]. 新闻界, 2014 (2): 29-32.

The Beauty Illusion: Misleading Social Media Aesthetics on Women's Image Building and Rethinking It

YuanYuxin

Department of Chinese history and culture , the Hong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 Hongkong

Abstract: Human aesthetic tendency is rooted in the material and spiritual culture of society, and changes constantly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Nowadays,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technology, women are shaping their personal media images on various social platforms to cater to the “mainstream aesthetics”. At the same time, these aesthetics are also influencing women's personal image in real life. The “white, young and thin” aesthetic influenced by the male gaze and consumerism has gradually triggered women's appearance anxiety. The “perfect” image of women on social media platforms and the ever-increasing consumerism trend have shackled women to the existing single aesthetic. This study takes social media as the background, analyzes the new aesthetic tendency and attribution formed under the modern social media environment, reveals the reality of the dilemma of women's image shaping in the context of social media, and explores the path of shaping a beautiful women's image under the threshold of social media.

Keywords: aesthetics; young women; social media; gender regulation; appearance anxiety.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2.549

非洲现代性的危机：本·奥克瑞《饥饿的路》中的“荒原”¹

蓝婷¹

(¹四川外国语大学，重庆 400031)

摘要：本·奥克瑞的《饥饿的路》通过“荒原”意象的跨文化重构，揭示了非洲后殖民现代性危机的三重维度：身份认同的断裂、民族国家建构的悖论与生态殖民主义的延续。本文以T.S.艾略特的《荒原》为参照系，剖析奥克瑞如何将西方现代主义象征体系转化为非洲本土叙事工具，通过魔幻现实主义手法呈现“荒原”在非洲语境中的新内涵——既是对殖民现代性暴力（如资源掠夺、文化异化）的批判，亦暗含通过传统灵性维度实现文化疗愈的可能。研究指出，奥克瑞的“荒原”书写超越了后殖民文学常见的抵抗范式，在全球化语境中为非洲现代性困境提供了兼具在地性与普遍性的文学应答。

关键词：荒原意象；现代性危机；后殖民生态批评；魔幻现实主义

一、引言

社会的剧烈变迁常常伴随着深刻的文化断裂与认同危机，这种现象在全球范围内展现出多样化的区域特性。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在《民族国家与暴力》第三章中指出，这种变化不仅带来社会结构的深刻调整，还对传统文化体系构成了巨大的挑战。（1998:119）在非洲大陆，去殖民化的历史遗留问题使这种转型格外复杂，其表现为文化认同的分裂、生态危机的加剧以及社会价值的失衡。

尼日利亚作家本·奥克瑞（Ben Okri, 1959-）的《饥饿的路》（The Famished Road, 1991）正是对这一历史语境的文学回应。小说以“阿比库”（Abiku，即约鲁巴民间传说中的鬼孩）的视角，讲述主人公阿扎罗及其父母在贫困与社会动荡中经历的苦难。通过将非洲民间传说与现代社会问题交织，奥克瑞创造了一部融合魔幻现实主义与后殖民叙事的经典之作，深刻地反映了非洲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焦虑与迷失。作为“阿比库三部曲”（The Abiku Trilogy）的开篇之作，《饥饿的路》与后续的《迷魂之歌》（The Song of Enchantment）和《无尽的财富》（Infinite Riches）共同构建了一个探讨非洲社会现代性议题的宏大叙事体系。1991年，这部小说因其独特的文学价值获得英国布克奖，确立了奥克瑞在当代非洲文学中的地位。

奥拉图博桑·奥贡桑沃（Olatubosun Ogunsanwo）认为，奥克瑞打破了传统西方小说的叙事框架，通过融合非洲民间传说的神奇品质与西方现实主义，挑战了现实主义叙事的普遍性，同时，奥贡桑沃对叙事框架的解构为文本的跨文化象征分析提供了方法论基础。而瓦茨奎兹（Vazquez）则从政治与社会视角入手，指出奥克瑞通过将神话与现实相结合，深刻揭示了非洲社会的政治危机和文化困境。此外，国内学者朱振武与韩文婷以霍米·巴巴的“第三空间”理论为基础，从三重空间的角度解读该作品，认为其既书写了非洲社会的现实图景，也呈现了虚幻空间中的非洲梦想，展现了对非洲现代性路径的探索与反思。

在对《饥饿的路》进行的讨论中，笔者也看到了“荒原”的意象作为其中核心主题的可能性。这不仅继承了T.S.艾略特（T.S. Eliot）在《荒原》（The Waste Land）中对文化危机的批判，也赋予其非洲的后殖民特

乐 实

第11卷

乐 实

一期（

义

究深美 期一 郑娟娟

质，成为展现非洲现代性危机的重要象征。奥克瑞通过魔幻现实主义的叙事手法，使“荒原”这一意象在跨文化语境中获得了新的意义：一方面，它象征现代化对非洲社会结构和文化价值观的破坏；另一方面，它揭示了生态危机、身份认同困境与社会秩序瓦解等多重危机交织的复杂局面。

因此，本文旨在围绕《饥饿的路》中的“荒原”意象，深入探讨其如何表现非洲社会的现代性危机。在全球化的语境下，非洲社会如何应对文化断裂与生态危机？奥克瑞又如何通过“荒原”这一意象，重构非洲文化认同并回应全球现代性议题？通过对“荒原”意象的深层解读，本文试图揭示非洲文学在回应全球性文化困境中的独特贡献，同时为后殖民文学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二、象征与隐喻：艾略特的现代性危机反思

现代性在全球范围内既是社会转型的动力，也伴随着深刻的文化断裂与认同危机。T.S.艾略特的《荒原》(The Waste Land)与本·奥克瑞的《饥饿的路》(The Famished Road)分别从西方和非洲的视角，对这一议题进行了独特的文学表达。两者在“荒原”意象的象征运用上呈现出既一脉相承又各具特色的跨文化特性，构成了一种关于现代性危机的文学对话。在《荒原》中，艾略特以象征和隐喻的复杂体系，刻画出现代社会的精神困境和文化失序。束定芳在《隐喻研究》²中指出，隐喻并非仅是修辞手法，而是“通过认知与体验建立事物之间关联”的思想工具，这一视角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艾略特象征系统的多层次意义。

通过对美学范畴的考察，人们可以系统地把握审美意识和审美观念演变的基本特征，并且在审美观念的变化中揭示出美学思想发展演变的内在逻辑。(王丙珍，179)朱立元在《西方美学范畴史第3卷》³中提到：“现代性作为一种社会形态，其核心特征是传统价值的瓦解与文化体系的重组。”(55)《荒原》中的“水与干旱”、“火与焚烧”等意象不仅表达了个体精神的荒芜，也暗示了社会文化的失落与重建。张兴在其文章中提到：“‘水和干旱’，荒原的产生，是水的缺失，也是繁殖力缺失的表现。一方面，干旱、缺水等场景的描绘，凸显了荒原的荒芜和荒凉；另一方面，‘水’又象征生命和希望，暗示荒原中蕴含的生机和可能性。”

(177)值得指出的是，艾略特对工业社会的批判延续了波德莱尔对现代性异化的观察，将《恶之花》中的都市污秽升华为‘荒原’的整体性隐喻。后者描绘的都市污秽与精神空虚，与艾略特对工业社会的批判形成呼应，深化了“荒原”意象在现代性危机中的象征功能。正是在这些象征意象中，艾略特进一步发展了死亡与重生的辩证关系，为现代主义文学注入了独特的精神内涵。

艾略特将死亡与重生结合，象征旧秩序的崩塌与新希望的萌芽。这种辩证关系不仅延续了“荒原”意象的象征功能，更深化了现代社会文化复兴的可能性。《荒原》并非对现代性的简单否定，而是试图通过文化复兴实现精神重建。这种隐喻性书写为现代主义文学提供了深远影响，使其成为反思现代性危机的重要文本。

三、后殖民语境中的“荒原”：奥克瑞的非洲视角

相比艾略特聚焦于西方工业化与城市化的精神困境，奥克瑞则通过非洲视角赋予“荒原”意象以新的文化内涵。他的《饥饿的路》不仅继承了象征和隐喻的传统，还将其与非洲后殖民社会的现实深度结合。奥克瑞的“荒原”不仅象征环境的破坏，还隐喻后殖民社会中传统文化的断裂。正如朱立元所言，现代性带来的不仅是社会进步，还有对自然与文化的深重伤害。小说中的荒凉景象与艾略特的“干旱”意象形成对比，在强调生命力枯竭的同时，也蕴含了复苏的可能性。奥克瑞通过“阿比库”视角展现非洲现代性危机中的身份认同困境。束定芳指出，隐喻具有重构认知的力量，奥克瑞正是通过“荒原”这一隐喻解构了非洲现代性进程中的矛盾与焦虑。

(一) 身份认同危机

心理学家苏西·奥巴赫(Susie Orbach)在《饥饿抗争》(Hunger Strike: Anorexia as a Metaphor for Our Age 1993)中提出，绝食是一种面对压迫性环境的身体化反应。(Orbach, 1986: 42)小说第五卷第二章中，阿扎罗因为砸坏瞎老头的玻璃窗而被父亲厉声痛骂与挨打，之后选择绝食抵抗，从魔幻现实主义的角度来看，阿扎罗对“现代性力量”的抵抗不仅体现在对现实解释的拒绝，也表现他对“鬼魂砸了玻璃”的坚持，这种行为并非简单的幻想，而是他对传统约鲁巴民族信仰的捍卫，对外来理性、物质性的现代价值的一种无声反抗。奥克瑞写道：“在绝食的第二天，我呆在床上，自觉形象日渐高大……就这样进入了一种奇异的生命状态……”

(奥克瑞 1991: 332)“到了我拒绝吃饭的第三天……爸爸大而沉郁的脸不再令我害怕。他竟以为他凶狠的面容足以威震一切，这使他看上去有点可笑。我要离开这个世界，以示对他的惩罚……第四天……我顿时察觉到天下父母的脆弱，看清了他们其实是多么没有力量。”(本·奥克瑞，1991:333)这种身体化的抗拒象

² 束定芳：《隐喻学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20年版，第120页。

³ 朱立元. 西方美学范畴史(第3卷) [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第59页.

征了非洲个体在现代化过程中对自我身份的探索与坚持，体现出非洲文化在受到外来现代性压迫时的深层抗争。

从吉登斯的反身性自我理论来看，阿扎罗的绝食行为可以被视为非洲在现代化过程中对自我身份的探索和反思（吉登斯，1991:78）。作为“鬼孩”，阿扎罗游离于生死之间，象征了非洲文化中生者与灵界的交融，这是非洲传统信仰的核心要素之一。在魔幻现实主义的框架下，阿扎罗的绝食既是对家庭权威的抗拒，也是对现代性带来的物质化世界的无声批判。这种身体化的反抗反映了非洲社会在全球化进程中试图保持自我身份、抵抗文化侵蚀的复杂努力。阿扎罗的“奇异生命状态”——进入一个灵魂与人类共存的空间——进一步象征了非洲文化在现代性危机下的深层挣扎。奥克瑞通过阿扎罗的极端行为，揭示了非洲在现代性冲击中的身份困惑与文化重构需求，体现了传统文化面对外来现代性入侵时的无声抗争与深层反思。这种挣扎通过模糊现实与灵异边界的魔幻现实主义手法得以表现，赋予阿扎罗的行为以更深层次的象征意义。（吉登斯，1991：90）

（二）民族国家建构的危机

非洲在去殖民化后，面临着构建民族国家的艰难任务。这一过程不仅承载着政治统一的期望，也被殖民遗产的深层矛盾所束缚。阿奇利·姆贝梅（Achille Mbembe）在《论后殖民性》（On the Postcolony）⁴中指出，后殖民非洲的国家治理模式深受殖民时期权力结构的影响，延续了殖民边界划分和部落分割的结构性问题。这种遗留问题加剧了族群冲突，导致国家主权的合法性受损与社会治理的脱节。

20世纪60年代的西非，许多国家从独立初期的一党制迅速转向军政府统治。这种政治转型不仅未能实现民主化，反而进一步深化了权力的腐败与治理的无力。正如吉登斯在《民族国家与暴力》中所指出，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中，权力的集中与暴力的制度化往往掩盖了深层的不平等。《饥饿的路》通过阿扎罗的叙述，生动描绘了这一危机：选举的操控、政治暴力的泛滥以及社会权力的荒诞，使民族国家的统一叙事成为一种虚假的表象。

在小说中，穷人党与富人党的对立不仅仅是两个政治派系的冲突，更象征着不同社会阶层对民族国家建构的期望与利益诉求：穷人党代表底层民众，他们渴望公平分配资源和权力，试图通过民族国家的建构实现社会公正。富人党则代表权力精英阶层，他们通过维护既有利益结构巩固其权力地位。这种对立展现了民族国家建构中“统一性”的虚假叙事：表面上是民主的竞争，但实际上强化了社会的不平等。小说通过穷人党遭受暴力镇压和资源剥夺的情节，揭示出国家权力如何排斥底层群体的声音。

吉登斯认为，民族国家的权力集中常常依赖于一种暴力性的统一叙事。然而，在非洲的后殖民背景下，这种叙事往往缺乏实际的社会整合功能。《饥饿的路》中，富人党通过选举操控和暴力打压，将民主过程转化为资源分配的权力游戏。这不仅使底层民众的诉求被压制，也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贫富差距。通过“荒原”意象，小说揭示了贫富差距扩大对社会稳定和个体生活的深远影响。荒凉的社会景象与生态破坏象征了富人党对资源的垄断及其后果：社会整体陷入资源短缺、治理失效与精神迷失的恶性循环。阿扎罗的家庭挣扎于生存的边缘，其父亲作为代表穷人党追求变革的角色，最终因政治环境的压迫而陷入无力的抗争。

《饥饿的路》中的政治叙事凸显了非洲民族国家建构的深层危机：后殖民国家在试图通过权力集中建立统一性时，未能解决社会不平等问题，反而进一步加剧了社会分裂。穷人党与富人党的对立揭示了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阶级分化如何成为现代性危机的重要表现。

（三）生态环境危机

在卷四第一章中，阿扎罗目睹了森林的巨大变化：“惊天动地的爆炸声在森林上空响起，仿佛所有树木轰然倒地。”（奥克瑞，1991:291）这一情节不仅体现了自然景观的剧变，也反映了生态暴力在殖民后社会中的延续。森林的“面目全非”是对后殖民时期资源掠夺及生态失衡的隐喻，表现了非洲土地在现代化过程中被进一步商品化的命运。

根据生态后殖民主义的观点，殖民统治者通过大规模的资源开发破坏了本地的生态系统，而这种剥削模式在后殖民时代被全球资本主义延续，导致了生态失序和自然异化。奥克瑞通过描绘森林的爆炸，批判了殖民与现代性共同造成的生态危机。

卷五第一章中，持续的大雨导致粪水横流，院内“臭气熏天”，疾病在社区中肆虐。这段描写不仅再现了非洲公共卫生基础设施的脆弱，也暗示了自然灾害与现代性不平等交织所造成的后果。阿扎罗母亲用讲故事和煎鱼安慰孩子的方式，则体现了个体在生态危机面前的抗争与适应。自然灾害在后殖民社会中往往具

⁴ Mbembe, Achille. *On the Postcolon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1, pp. 60-68.

有双重象征意义：一方面是对生态殖民主义后果的呈现，另一方面则是现代性在非洲扩展中忽视环境保护和社会公平的反映。这些描写通过日常生活的细节展现了生态危机如何渗透到个体的生存体验之中。

奥克瑞笔下的“荒原”既指自然生态的荒芜，也隐喻精神与文化的枯竭。生态危机与社会危机交织在一起，使“荒原”成为后殖民社会现代性困境的集体象征。后殖民生态叙事常通过生态危机批判现代性对自然和文化的破坏。在《饥饿的路》中，生态的失衡不仅是一种物质现象，更是对非洲土地和自我认同丧失的隐喻。森林的破坏和大雨引发的疾病等生态描写，直指现代性与全球化对非洲生态与社会的不公正影响。这种影响既有殖民遗留下的生态创伤，也有后殖民治理中对环境保护的忽视。生态危机的探讨使“荒原”意象超越了纯粹的文化或政治隐喻，成为理解非洲现代性危机的重要维度。奥克瑞通过生态叙事提示了非洲在追求现代化时对生态伦理的迫切需求，自然生态的‘荒原’与精神、政治‘荒原’共同构成奥克瑞对现代性危机的全景式批判，三者互为表里，揭示后殖民创伤的多维性。

四、结论

以上通过艾略特与奥克瑞的意象对比，进一步揭示“荒原”在全球化语境中的变异逻辑。两位来自不同国家的作家在“荒原”意象的书写中体现了现代性危机的普遍性与地域性之间的张力。艾略特的“荒原”关注普遍性的现代性危机，而奥克瑞的作品则通过非洲化的“荒原”象征，揭示后殖民社会特有的生态破坏与文化冲突。在艾略特笔下，“荒原”表达了西方社会的信仰丧失与文化迷茫；在奥克瑞的叙事中，它则融入了非洲的生态危机与身份焦虑，成为后殖民现代性问题的象征。两者的文本对话揭示了象征与隐喻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适应与转化，证明了文学作为思考现代性问题的重要工具。艾略特的重生寓意文化复兴，奥克瑞则通过魔幻现实主义表达非洲社会的自我疗愈与希望重建。这种隐喻的延续体现了文学对全球现代性议题的深刻介入。

参考文献：

- [1] Orbach, Susie. Hunger Strike: The Anorectic's Struggle as a Metaphor for Our Age[M]. New York: Norton, 1993.
- [2] 本·奥克瑞.饥饿的路[M]. 王维东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3.
- [3] 吉登斯, 安东尼.现代性与自我认同: 现代社会中的自我与身份[M]. 赵旭东、方文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8.
- [4] 吉登斯·安东尼. 民族国家与暴力[M]. 赵晓力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8.
- [5] 王丙珍. 西方美学范畴的历史演变及文化意义 [J]. 边疆经济与文化, 2013, (05): 179-180.
- [6] 张兴. 现代主义的象征与隐喻——读艾略特的《荒原》 [J]. 青年文学家, 2024, (24): 177-179

The Crisis of African Modernity: The "Wasteland" in Ben Okri's The Famished Road

Ting Lan¹

¹ Sichu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Chongqing, China

Abstract: Ben Okri's *The Hunger of the Road* explores the threefold crisis of postcolonial modernity in Africa through the cross-cultural reconstruction of the “wasteland” imagery. These crises include the fragmentation of identity, the paradoxes of nation-building, and the persistence of ecological colonialism. This paper, using T.S. Eliot's *The Waste Land* as a reference, analyzes how Okri transforms Western modernist symbolism into a tool for African indigenous narratives. Through the use of magical realism, Okri reinterprets the “wasteland” in the African context, portraying it not only as a critique of the violence of colonial modernity (such as resource exploitation and cultural alienation), but also as an implicit possibility for cultural healing through traditional spiritual dimensions. The study concludes that Okri's portrayal of the “wasteland” transcends the resistance framework commonly found in postcolonial literature, providing a literary response to the African dilemma of modernity that is both locally grounded and globally relevant.

Keywords: Wasteland imagery; Crisis of modernity; Postcolonial ecological criticism; Magical realism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2.552

Signal-Based Trading Strategy for SPY ETF: A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Approach

Zhen Zou¹

¹*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Dalian (116025), China*

Abstract: This study develops a signal-based trading strategy for the SPDR S&P 500 ETF Trust (SPY) using a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framework to analyze interrelationships between SPY and global equity indices across U.S., European, Asian, and Australian markets. By synthesizing historical pricing data from these major benchmarks, the model generates systematic trading signals through predicted price trajectories. In controlled training scenarios, the strategy achieved superior risk-adjusted returns compared to passive buy-and-hold approaches, demonstrating the value of cross-market signal integration. While the framework shows promise for algorithmic trading systems, the study acknowledges limitations in generalizing historical patterns to evolving market conditions. The findings highlight opportunities to enhance predictive accuracy through machine learning architectures capable of processing nonlinear market dynamics. These insights advance quantitative trading research by establishing methodologies for cross-market signal synthesis and proposing pathways to develop adaptive models for volatile capital markets.

Keywords: SPY ETF; Signal-based trading strategy;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Global stock indices

1. Introduction

Exchange-Traded Funds (ETFs) are a unique and versatile financial instrument that provide investors with access to a diversified basket of assets, such as stocks, bonds, or commodities, without the need to purchase each component individually.

Unlike traditional mutual funds, ETFs trade on exchanges throughout the day at market prices, offering investors greater flexibility and control over their trades. Their ability to provide instant diversification, sectoral exposure, and access to both traditional and alternative investments, including exotic options, further enhances their appeal as a cost-effective and efficient investment vehicle.

Several key factors influence SPY's price movements, including market correlations, macroeconomic conditions, volatility, and global market sentiment, which collectively affect the dynamics of the S&P 500 Index.

To address this, this essay will center on following key areas: the selection of relevant global indices as predictors, the robustness of the regression model in handling financial time-series data, and the performance metrics for evaluating the predictive accuracy and profitability of the strategy. By leveraging the strengths of regression analysis within the Python programming environment, this study aims to produce actionable insights and demonstrate a systematic approach to ETF-based trading strategies.

2. Literature Review

2.1. The Features of ETFs and Their Role in Financial Markets

Over the past two decades, ETFs have grown into a critical segment of the financial markets,

providing exposure to a variety of sectors, indices, and alternative investments (Marszk & Lechman, 2020). Their role in investment portfolios has become even more pronounced due to their ability to efficiently replicate the performance of benchmark indices, such as the S&P 500.

ETFs like SPY, which track the S&P 500 index, are among the most widely traded financial instruments due to their liquidity, transparency, and role in passive investing strategies (Dias et al., 2024). These attributes make ETFs highly attractive for retail and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alike. Passive strategies underpinned by ETFs, such as SPY, allow investors to gain broad market exposure while minimizing transaction costs and management fees (Hill et al., 2015).

2.2. The Association Among Different Stock Markets

Global stock markets have demonstrated varying degrees of interdependence influenced by economic integration, trade relations, and financial crises. The dynamic relationships among the US, Asian, Australian, and European stock markets provide insights into cross-market influences and diversification opportunities.

US and Asian/Australian Markets: Studies highlight significant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US stock market and Asian markets, with the US market often leading in influence. For instance, Dhanaraj et al. (2013) demonstrated that US market movements significantly impact newly industrialized Asian economies such as Hong Kong, Singapore, and South Korea, especially during crises like the 2008 subprime crisis. Similarly, Shamsuddin and Kim (2003) found long-term integration between the Australian stock market, the US, and Japan, although this integration weakened after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

US and European Markets: The interdependence between US and European stock markets is strong, with integration studies often citing the US as a leading influence. For example, Sakthivel and Kamaiah (2012) observed robust co-movements between US indices and major European stock markets, reflecting globalization's impact (Sakthivel & Kamaiah, 2012).

Asian and European Markets: The connection between Asian and European markets is also evident but generally less pronounced than US-related linkages. Pan et al. (2014) showed strong co-movement between European stock indices, such as Germany's DAX and the UK's FTSE, and global leaders like the US market, while revealing weaker ties with Asian markets (Pan et al., 2014).

Post-Crisis and Pandemic Dynamics: Crises amplify interdependence among global stock markets. For instance, Jamil et al. (2023) revealed that ASEAN-5 markets moved more closely with US and European markets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compared to pre-pandemic periods, signifying contagion effects (Jamil et al., 2023).

2.3. Previous Studies on ETF Trading Strategies

Several studies have examined trading strategies for ETFs, with SPY serving as a prominent benchmark due to its popularity and robust liquidity. Bollapragada et al. (2013) compared various forecasting techniques, including regression, exponential smoothing, and ARIMA models, to predict SPY prices. Their findings indicated that multiple regression models achieved superior accuracy with low forecast errors.

Non-linear techniques such as neural networks have also been applied to ETF trading. Vasylieva et al. (2020) demonstrated that while linear models like moving averages provide short-term forecasts, neural network models can capture non-linear dynamics in ETF price movements over longer periods. Furthermore, adaptive evolutionary neural networks have been employed to optimize SPY trading strategies, outperforming traditional benchmarks such as moving averages (Sermpinis et al., 2016).

2.4. Regression-Based Models in Financial Forecasting

Regression models, particularly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have been extensively utilized for financial time-series forecasting due to their simplicity and interpretability. Bollapragada et al. (2013) achieved significant predictive accuracy for SPY prices using regression-based techniques, highlighting their suitability for time-series data.

The importance of evaluating model performance using robust metrics such as RMSE, Adjusted

R^2 , and Sharpe Ratio has been highlighted in recent studies. Liu (2024) employed a signal-based regression model to predict SPY's price changes.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regression model outperformed the passive strategy, with improvements in the Sharpe ratio and reduced maximum drawdown.

Additionally, regression-based models have been used to explore correlations between global stock markets. Umair et al. (2018) demonstrated the robustness of regression models when applied to large datasets from multiple global stock exchanges.

3. Data Description

3.1 Data Source

The data for this analysis is derived from publicly available stock market index data, specifically focused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erformance of the SPY ETF and several major global stock market indices:

Table 1 Data Source and Description

Indices	Region	Data Range	Description
SPY ETF	United States	2010/12/31-2021/09/17	Tracking the performance of the S&P 500 index, is included to provide insight into the broader US market trends.
S&P 500	United States	2010/12/31-2021/09/17	Tracking the performance of 500 large companies in the US.
DJI	United States	2010/12/31-2021/09/17	Sourced from the US stock market, representing 30 major American companies.
Dax	Germany	2011/01/03-2021/09/17	Correspondent to the German stock market, represented by the DAX index.
Nikkei225	Japan	2011/01/04-2021/09/17	Representing the performance of the Japanese stock market.
All Ordinary	Australia	2011/01/04-2021/09/17	Representing the performance of the Australian stock market, focusing on the All Ordinaries index.

For each index, its opening, high, low, closing price, adjusted closing prices, and volume on each transaction day are collected (take SPY ETF as an example):

Table 2 The First Five Rows in SPY ETF Data

Date	Open	High	Low	Close	Adj. Close	Volume
2010/12/31	125.5300	125.8700	125.3300	125.7500	102.0556	91218900
2011/1/3	126.7100	127.7000	125.7000	127.0500	103.1106	138725200
2011/1/4	127.3300	127.3700	126.1900	126.9800	103.0538	137409700
2011/1/5	126.5800	127.7200	126.4600	127.6400	103.5895	133975300
2011/1/6	127.6900	127.8300	127.0100	127.3900	103.3866	122519000

From Table 1, the time horizons of the Dax, Nikkei225 and All Ordinary indices are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the other three indices. So, the next step is to process the data for subsequent analysis.

3.2 Data Munging

(1) Data Integration

To handle time-zone differences effectively, ensuring that the data aligns with the analysis model, a data frame called *Indexpanel* is created, which serves as the foundation for the trading model.

The first step involves calculating the daily price changes for each index:

$$\text{Price Change}_{\text{Index},t} = \text{Open}_{\text{Index},t} - \text{Open}_{\text{Index},t-1} \#(1)$$

Additionally, a lagged value of SPY is created by shifting the values by one day, stored in the *spy_lag1* column, which helps in tracking the previous day's movement. Finally, a column named Price is added, which stores the opening price of the SPY ETF.

Table 3 The First Five Rows in *Indexpanel*

Date	SPY	SPY_lag1	DJI	SP500	DAXI	Nikkei225	Aord	Price
2010/12/31	1.1800	-	-	-	-	-	-	125.530
2011/1/3	0.6200	1.1800	8.0966	0.8600	-	-	-	126.710
2011/1/4	-0.7500	0.6200	93.4707	15.3300	6.2900	45.9092	-9.0000	127.330
2011/1/5	1.1100	-0.7500	17.7100	-4.1699	-13.6000	-7.1801	-25.2002	126.580
2011/1/6	-0.1300	1.1100	28.3193	7.5100	-16.6001	52.2402	7.8999	127.690

(2) Missing Value Processing

After checking, *Indexpanel* has the following number of missing values inside it:

Table 4 Number of Missing Values

Column Name	Number of Missing Values
SPY	1
SPY_lag1	1
DJI	1
SP500	1
DAXI	61
Nikkei225	163
Aord	57
Price	0

To fill the missing values, the last known valid value is carried forward, ensuring that no gaps remain in the data.

Table 5 *Indexpanel* (2696×8) After Processing Missing Values

Date	SPY	SPY_lag1	DJI	SP500	DAXI	Nikkei225	Aord	Price
------	-----	----------	-----	-------	------	-----------	------	-------

2011/1/4	-0.7500	0.6200	93.4707	15.3300	6.2900	45.9092	-9.0000	127.3300
2011/1/5	1.1100	-0.7500	17.7100	-4.1699	-13.6000	-7.1801	-25.2002	126.5800
2011/1/6	-0.1300	1.1100	28.3193	7.5100	-16.6001	52.2402	7.8999	127.6900
2011/1/7	-0.9800	-0.1300	-20.0693	-1.8800	42.0698	34.3203	-12.3999	127.5600
2011/1/10	0.8600	-0.9800	-24.5205	-3.5701	-71.1899	34.3203	9.2002	126.5800

Table 6 Result After Processing Missing Values

Column Name	Number of Missing Values
SPY	0
SPY_lag1	0
DJI	0
SP500	0
DAXI	0
Nikkei225	0
Aord	0
Price	0

(3) Data Splitting

To evaluate the model's ability to generalize to new, unseen data, the data is split into training and test sets. By using separate training and testing sets, it helps to ensure that the model's performance reflects its true ability to generalize to real-world data (Hastie, 2009).

Table 7 Methods of Data Splitting

Row Range	Indexpanel	
	Train Set (1000×8)	Test Set (1000×8)
1001-2000	1001-2000	1-1000

The dataset is divided using an index-based panel structure, where observations are ordered sequentially. In this study, the first 1000 rows (1-1000) are allocated to the test set, while the subsequent 1000 rows (1001-2000) form the training set. This backward allocation approach ensures that the test data precedes the training data, simulating a real-world scenario where future observations are predicted based on past information.

3.3 Training Data Set Exploration

(1)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Analysis

For the training set, the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analysis (use Excel) provides 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central tendency, dispersion, and distribu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elected indices and SPY price over the observation period.

Table 8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raining Data

	spy	spy_lag1	dji	sp500	daxi	nikkei	aord	Price
Mean	0.0464	0.1009	6.5604	0.9946	1.7816	-1.8197	0.7221	224.6636
Std. Error	0.0580	0.0612	5.2416	0.5791	3.8088	5.1672	1.3373	1.3205
Median	0.1100	0.2000	11.5947	1.7750	8.0898	0.8848	3.7000	210.6200

Mode	-0.3100	-0.2500	59.6895	6.5500	-22.1201	-209.7197	6.5000	207.2900
Std. Dev	1.8343	1.9354	165.7529	18.3115	120.4455	163.4010	42.2889	41.7582
Kurtosis	8.5388	10.0362	7.5020	6.7085	4.2047	9.5139	2.1315	4.6295
Skewness	-0.7985	-1.3034	-1.0829	-1.0512	-0.7316	-0.9550	-0.6515	1.6726
Min	-14.2400	-14.2400	-1252.6992	-126.2800	-884.8496	-1381.8506	-204.3999	163.5500
Max	8.8000	8.800	807.6992	76.1699	414.2500	1012.3789	129.5996	444.5300
Sum	46.3797	100.9400	6560.4463	994.6031	1781.5552	-1819.7422	722.0981	224663.6301
Observation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C.I. (95%)	0.1138	0.1201	10.2857	1.1363	7.4742	10.1398	2.6242	2.5913

While SPY and SP500 reflect stability, indices like DJI and Nikkei exhibit significant risk and return variability, highlighting the need for investors to consider volatility and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2) Correlation Analysis

By generating a scatter plot matrix for the *Train* dataset, this process enables an intuit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data's structure and inter-variable relationship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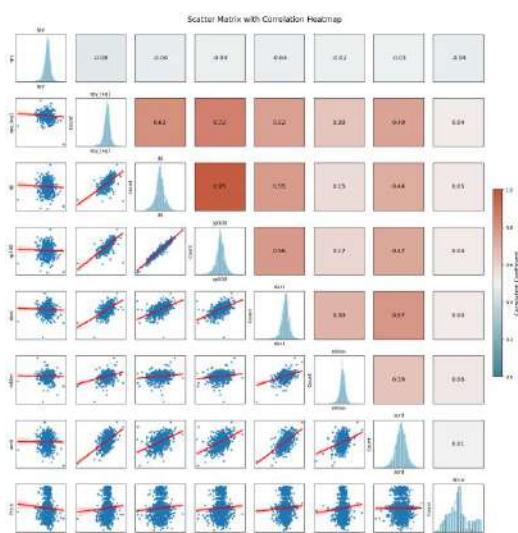


Figure 1 Scatter Matrix

According to the figure, Strong **positive linear trends** exist between dji, sp500, and spy_lag1, while variables like aord and Price show weak relationships.

The diagonal of the matrix shows the **individual distributions**, most variables follow bell-shaped distributions, indicating normality, with aord exhibiting higher variability.

As to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U.S. indices (dji and sp500) are highly correlated. Weak correlations are observed between global indices (e.g., aord, nikkei) and U.S. markets.

Specifically,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between each variable and spy are examined further:

Table 9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with spy Explanatio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with	Explanation

spy		
spy_lag1	-0.0800	The lagged value of SPY (spy_lag1) has a weak negative correlation (-0.080) with the current SPY value. This suggests a slight inverse relationship, implying that previous SPY performance has a marginal impact on its current movement, but the relationship is not strong enough to be considered significant.
dji	-0.0400	The Dow Jones Industrial Average (dji) shows a very weak negative correlation (-0.040) with SPY. This indicates that movements in the Dow Jones Index have little to no direct linear relationship with the SPY ETF.
sp500	-0.0290	The S&P 500 Index (sp500) also demonstrates a very weak negative correlation (-0.029) with SPY. Although SPY itself tracks the S&P 500, the negative value might reflect short-term differences due to lag effects or market volatility.
dax	-0.0370	The German DAX Index (daxi) exhibits a similarly weak negative correlation (-0.037) with SPY. This suggests that the European market (DAX) has minimal influence on SPY's movement, reflecting a lack of immediate connection.
nikkei225	-0.0180	The Japanese Nikkei Index (nikkei) has a near-zero negative correlation (-0.018) with SPY. This indicates virtually no linear relationship between SPY and Japan's stock market performance.
aord	-0.0080	The Australian All Ordinaries Index (aord) has the weakest negative correlation (-0.008) with SPY, essentially suggesting no relationship at all. SPY and AORD operate in geographically and temporally separate markets, which may explain the lack of correlation.

The weak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suggest that predictors individually explain little variation in SPY. However,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examines the combined effect of predictors, which may reveal relationships not apparent in pairwise correlations.

4. Methodology

4.1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Model Fitting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is a fundamental statistical technique used to model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 single dependent variable and multiple independent (predictor) variables (Tsay, 2010; Hastie, Tibshirani & Friedman, 2009).

In this case, the dependent variable is *spy* (the S&P 500 ETF), and the predictors include *spy_lag1*, *sp500*, *dji*, *daxi*, *aord*, and *nikkei*.

$$spy_t = \beta_0 + \beta_1 spy_{t-1} + \beta_2 sp500_t + \beta_3 dji_t + \beta_4 daxi_t + \beta_5 aord_t + \beta_6 nikkei_t + \varepsilon_t \quad \#(2)$$

To estimate the regression coefficients, write the regression equation in matrix form (Montgomery, Peck & Vining, 2012):

$$\begin{aligned}
 & \begin{matrix} spy_{1001} & 1 & spy_{lag1,1001} & \cdots & nikkei_{1001} & \beta_1 & \varepsilon_{1001} \\ (spy_{1002}) & = & \begin{pmatrix} 1 & spy_{lag1,1002} & \cdots & nikkei_{1002} \end{pmatrix} & (\beta_2) & (\varepsilon_{1002}) \\ \vdots & & \vdots & \ddots & \vdots & \vdots & \#(3) \end{pmatrix} \\ spy_{2000} & 1 & spy_{lag1,2000} & \cdots & nikkei_{2000} & \beta_6 & \varepsilon_{2000} \end{matrix} \\
 & \mathbf{Y} \quad \mathbf{X} \quad \boldsymbol{\beta} \quad \boldsymbol{\varepsilon}
 \end{aligned}$$

$$\hat{\boldsymbol{\beta}} = (X^T X)^{-1} X^T \mathbf{Y} \quad \#(4)$$

The regression results obtained through Python are as follows¹:

Table 10 OLS Regression Results

OLS Regression Results						
Dep. Variable:	spy			R-squared:	0.015	
Model:	OLS			Adj. R-squared:	0.009	
Method:	Least Squares			F-statistic:	2.448	
Observations:	1000			Prob(F-statistic):	0.0235	
Df Residuals	993			Log-likelihood:	-1850.8	
Df Model:	6			AIC:	3716	
Covariance:	nonrobust			BIC:	3750	
	coef	std err	t	P> t 	[0.025	0.975]
Intercept	0.0926	0.049	1.888	0.059	-0.004	0.189
spy_lag1	-0.1697	0.051	-3.349	0.001	-0.269	-0.070
sp500	0.0351	0.014	2.587	0.010	0.008	0.062
dji	-0.0032	0.001	-2.280	0.023	-0.006	0.000
daxi	-0.0002	0.001	-0.382	0.702	-0.001	0.001
aord	0.0015	0.001	1.057	0.291	-0.001	0.004
nickel	5.227E-05	0.000	0.159	0.874	-0.001	0.001
Omnibus	320.467			Durbin-Watson:	1.991	
Prob(Omnibus)	0.000			Jarque-Bera (JB):	4234.114	
Skew	-1.083			Prob(JB):	0.000	
Kurtosis	12.845			Cond. No.	194.000	

Regression Function:

$$\begin{aligned}
 spy_t = & 0.0926 - 0.1697 spy_{t-1} + 0.0351 sp500_t - 0.0032 dji_t \\
 & (0.049) \quad (0.051) \quad (0.014) \quad (0.007) \\
 & - 0.0002 daxi_t + 0.0015 aord_t + 0.00005227 nikkei_t \\
 & (0.001) \quad (0.001) \quad (0.000) \quad \#(5)
 \end{aligned}$$

Model Fit: $R^2 = 0.015$ means the model explains only 1.5% of the variation in the dependent variable (spy), indicating that most of the variability remains unexplained by the predictors. However, after accounting for the number of predictors, the explanatory power (Adj. $R^2 = 0.009$) of the model remains weak. The F-test indicates that the overall regression i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at the 5% level. However, the low F-statistic value suggests only a modest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ependent

¹ Standard Errors calculated in the table assume that the covariance matrix of the errors is correctly specified.

and independent variables.

Coefficients and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The intercept is marginally insignificant, implying that when all predictors are zero, the expected value of spy is not definitively different from zero. While all other slope coefficients are significant, daxi (-0.0002, $p = 0.702$), aord (0.0015, $p = 0.291$), nikkei (5.227E-05, $p = 0.874$): These variables are statistically insignificant, meaning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spy cannot be reliably determined from this model.

Model Diagnostics: **Omnibus** (320.467, $p = 0.000$) and **Jarque-Bera** (4234.114, $p = 0.000$) indicate that the residuals deviate significantly from normality. The high **kurtosis** (12.845) and negative **skew** (-1.083) suggest heavy tails and a left-skewed distribution of residuals. **Durbin-Watson** (1.991) is close to 2, indicating no significant autocorrelation in the residuals. **Condition Number** (194), a relatively high value, signals potential multicollinearity among the predictors. Further investigation of the correlation matrix confirms some level of collinearity, particularly with variables like sp500 and dji.

4.2 Multicollinearity Test

Multicollinearity occurs when two or more predictor variables are highly correlated, making it difficult to estimate their individual effects on the dependent variable. In this model, multicollinearity is tested in predictors which failed the p-value test (James et al., 2013).

Table 11 Correlation Matrix

	spy	spy_lag1	dji	sp500	daxi	nikkei	aord	Price
spy	1.0000	-0.0801	-0.0402	-0.0291	-0.0370	-0.0184	-0.0079	-0.0428
spy_lag1	-0.0801	1.0000	0.6222	0.7213	0.5234	0.2814	0.4949	0.0427
dji	-0.0402	0.6222	1.0000	0.9545	0.5468	0.1452	0.4391	0.0546
sp500	-0.0291	0.7213	0.9545	1.0000	0.5590	0.1695	0.4726	0.0448
daxi	-0.0370	0.5234	0.5468	0.5590	1.0000	0.3928	0.5728	0.0440
nikkei	-0.0184	0.2814	0.1452	0.1695	0.3928	1.0000	0.2893	0.0579
aord	-0.0079	0.4949	0.4391	0.4726	0.5728	0.2893	1.0000	0.0062
Price	-0.0428	0.0427	0.0546	0.0448	0.0440	0.0579	0.0062	1.0000

By examining dji, daxi, nikkei from the correlation matrix, which failed the p-value test above,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between these variables are relatively low, so there is no multicollinearity between these variables.

4.3 Prediction Based on the Model

After fitting the linear regression model to the training data, the next step involves using the model to generate predicted values for both the training and test datasets. Then compare the actual values of the dependent variable with the values predicted by the mode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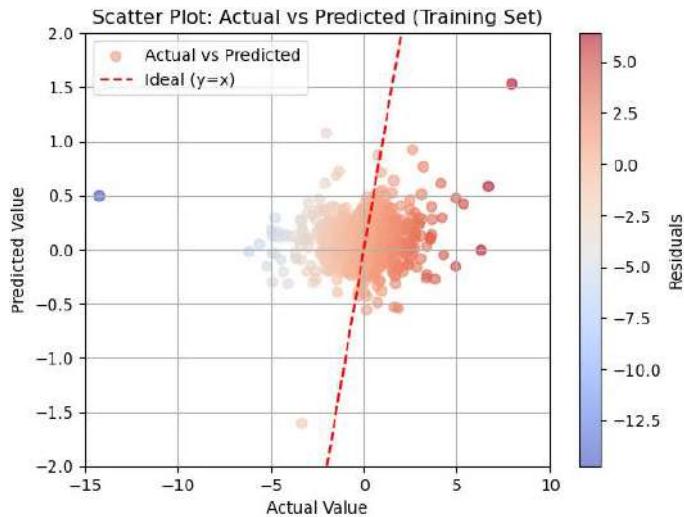


Figure 2 Scatter Plot of Actual versus Predicted Data for the Training Set

To conclude, the model predictions perfectly match the actual values, the points on the scatter plot should align along a 45-degree diagonal line, indicating equality between actual and predicted values.

4.4 Model Evaluation

To evaluate the predictive performance of the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model, a systematic calculation of two key metrics, Adjusted R^2 and Root Mean Squared Error (RMSE), is conducted for both the training and test datasets.

$$Adj. R^2 = 1 - \frac{(1 - R^2)(1000 - 1)}{1000 - 6 - 1} \quad \#(6)$$

$$RMSE = \sqrt{\frac{\sum_{t=1}^{1000} (s_{py_t} - \hat{s}_{py_t})^2}{1000}} \quad \#(7)$$

Table 12 Assessment Table for the Regression Model

	Train	Test
Adj. R^2	0.0086	0.0130
RMSE	1.5456	3.5162

Training Set Performance:

The Adjusted R^2 for the training set is 0.0086, indicating that the model explains only 0.86% of the variance in the spy values after accounting for the number of predictors. The RMSE for the training set is approximately 1.546. This value reflects the average magnitude of prediction errors for the training dataset. While RMSE is relatively low, it should be interpreted in the context of the dependent variable's range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 errors are practically significant.

Test Set Performance:

The Adjusted R^2 for the test set is 0.0130, meaning that the model explains about 1.3% of the variance in the spy values for unseen data. While slightly higher than the training set R^2 , this value remains very low. The RMSE for the test set is approximately 3.516,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training RMSE, which indicates that the model's predictions are less accurate when applied to new



Figure 3 Comparing Strategies for Training Data

data.

4.5 Strategy Building

The strategy begins by generating trading signals based on the predicted values from the linear regression model in training set. The signals are derived as follows:

- *A buy signal is generated if the predicted value (PredictedY) is positive.*
- *A sell signal is generated if the predicted value is negative.*

$$Profit_i = spy \times Order \#(8)$$

Here, Order represents the directional trade signal (+1 or -1). This calculation captures the gain or loss from each trade based on the actual performance of *spy* (Hastie, Tibshirani & Friedman, 2009).

$$Total Profit_{training} = \sum Profit_i = \$116.49 \#(9)$$

To evaluate the signal-based strategy, its cumulative returns are plotted against those of a buy-and-hold strategy, which assumes a constant long position throughout the training period.

From figure 3, there is a smooth upward trajectory in cumulative wealth reflects consistent profitability with limited volatility. Meanwhile, the points where the strategy diverges positively from the buy-and-hold benchmark highlight moments of particularly effective decision-making.

However, when turn to the Test set, the result shows less effective performance.

$$Total Profit_{test} = \sum Profit_i = \$71.01 \#(10)$$

The total profit that the strategy made to Test data is smaller than that of Training set. When compared the strategy applied to Test data with buy-and-hold performance:



Figure 4 Comparing Strategies for Test Data

The underperformance of the signal-based strategy compared to the buy-and-hold approach highlights the challenges of developing predictive models for financial markets. This outcome serves as a diagnostic tool, indicating areas where the model, feature selection, or strategy design may need refinement.

4.6 Evolution of Strategy

Evaluating the performance of a trading model requires robust metrics to quantify risk and return. Two widely recognized standards, the Sharpe Ratio and Maximum Drawdown, provide insight into the efficiency and stability of the strategy.

Training Set Performance:

$$\text{Daily Sharpe Ratio}_{\text{training}} = \frac{\mu_d}{\sigma_d} = 0.0790 \#(11)$$

$$\text{Yearly Sharpe Ratio}_{\text{training}} = \text{Daily Sharpe Ratio}_{\text{training}} \times \sqrt{252} = 1.2535 \#(12)$$

$$\text{Maximum Drawdown}_{\text{training}} = \max \left\{ \frac{\text{Peak Wealth} - \text{Current Wealth}}{\text{Peak Wealth}} \right\} = 0.0962 \#(13)$$

Test Set Performance:

$$Daily\ Sharpe\ Ratio_{test} = \frac{\mu_d}{\sigma_d} = 0.0186 \#(14)$$

$$Yearly\ Sharpe\ Ratio_{test} = Daily\ Sharpe\ Ratio_{test} \times \sqrt{252} = 0.2958 \#(15)$$

$$Maximum\ Drawdown_{test} = \max \left\{ \frac{Peak\ Wealth - Current\ Wealth}{Peak\ Wealth} \right\} = 0.3925 \#(16)$$

To conclude:

Table 13 Yearly Sharpe Ratio and Maximum Drawdown for Strategy

	Train	Test
Yearly Sharpe Ratio	1.2535	0.2958
Maximum Drawdown	0.0962	0.3925

The large disparity between the training and test Sharpe Ratios reflects a potential overfitting issue. The model performs well during training but fails to maintain consistent risk-adjusted returns when applied to new data. Furthermore, the higher Maximum Drawdown on the test set highlights the model's inability to mitigate large losses in an out-of-sample environment, undermining its practical utility in real-world trading scenarios.

5. Findings and Analysis

5.1. Model Performance and Interpretation

The low R^2 (0.015) and adjusted R^2 (0.009) values indicate that the predictors collectively explain only a small fraction of the variance in SPY. This underscores the complexity of SPY price movements and the influence of unmodeled factors (Tsay, 2010).

Statistically insignificant coefficients for DAX, All Ordinaries, and Nikkei imply limited direct impact from these indices. This aligns with their weak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observed during EDA.

Significant deviations from normality and high kurtosis in residuals point to model inadequacies in capturing extreme movements or non-linear relationships in the data.

5.2. Strategy Effectiveness Analysis

The strategy outperformed the buy-and-hold approach, yielding higher cumulative returns and a favorable Sharpe Ratio of 1.2535. This reflects the model's ability to exploit historical patterns in a controlled environment (Montgomery, Peck & Vining, 2012).

The strategy underperformed relative to buy-and-hold, producing a lower Sharpe Ratio (0.2958) and higher maximum drawdown (0.3925). This indicates reduced robustness in capturing patterns within unseen data, highlighting overfitting and the need for more generalizable models.

5.3. Analysis of Model Limitations

The inability to capture substantial variance in SPY suggests that the linear model may not fully account for the dynamic and complex nature of financial markets. Factors like macroeconomic indicators or non-linear relationships may need inclusion.

Furthermore, the disparity between training and test performance metrics underscores overfitting, with the model tailoring to training data patterns at the expense of generalization (Tsay, 2010).

Although multicollinearity tests did not indicate significant issues, the inherent high correlations between U.S. indices (SP500 and DJI) may have contributed to redundancy in predictor variables.

5.4. Recommendations for Improvement

(1) Enhance Feature Selection

The model relies primarily on lagged SPY values and contemporaneous global indices, which explain only a small fraction of SPY's variance. This suggests the need for additional predictors to capture overlooked drivers of SPY price movements. For example, by adding predictors such as Nasdaq in US market, cac40 in French market, and Hsi in Hong Kong market, the model can achieve better performance:

$$\begin{aligned} sp\ y_t = & \beta_0 + \beta_1 sp\ y_{lag1_t} + \beta_2 sp\ 500_t + \beta_3 dji_t + \beta_4 daxi_t \\ & + \beta_5 aord_t + \beta_6 nikkei_t + \beta_7 nasdaq_t + \beta_8 cac\ 40_t + \beta_9 hsi_t + \varepsilon_t \end{aligned} \quad \#(17)$$

(2) Adopt Advanced Predictive Models

The linear regression model oversimplifi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PY and global indices, failing to capture non-linear dynamics or complex interactions. Transition to algorithms capable of modeling non-linear relationships and interactions among predictors. Machine learning models such as Gradient Boosting Machines (GBM), Random Forest, and neural networks can better capture complex dependencies and provide improved predictive accuracy. Additionally, ensemble methods that combine multiple model outputs can enhance generalization and reduce the risk of model bias. Consider implementing XGBoost or LightGBM for faster computation and superior handling of large datasets. Regularly evaluate model performance using metrics like RMSE (Root Mean Square Error) and R² to monitor improvements over the baseline linear model.

(3) Address Multicollinearity and Feature Redundancy

High correlations among U.S. indices (e.g., SP500 and DJI) may introduce redundancy and reduce model interpretability. Apply Ridge or Lasso regression to shrink coefficients of less relevant predictors and reduce the impact of multicollinearity. Ridge regression can help mitigate overfitting by penalizing large coefficients, while Lasso regression can perform feature selection by shrinking some coefficients to zero. Conduct a 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 (VIF) analysis to identify and quantify multicollinearity among features. If severe multicollinearity persists, consider applying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PCA) to transform correlated variables into orthogonal components, thereby improving model stability and reducing overfitting.

(4) Improve Model Validation and Evaluation

The model's performance deteriorates significantly on test data, indicating overfitting to training data patterns. Replace a single train-test split with k-fold cross-validation to ensure the model's robustness across different subsets of data. Implementing a time-series cross-validation approach, such as walk-forward validation,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for financial data to preserve the temporal order and simulate real-world forecasting scenarios. Evaluate model performance across multiple folds using statistical tests to verify consistency. In addition to conventional error metrics (e.g., MAE, RMSE), track directional accuracy to assess how well the model predicts market trends. Incorporate backtesting to evaluate the model's profitability under realistic trading conditions, considering transaction costs and slippage.

(5) Refine Trading Strategy

The signal-based trading strategy underperformed the buy-and-hold approach in the test set, indicating inefficiencies (Brooks, 2014). Instead of a binary signal (buy/sell), use thresholds to differentiate between strong and weak signals, adjusting trade sizes accordingly. For example, generate buy signals only if the predicted price change exceeds a 1% threshold to account for transaction costs and noise. Implement a dynamic position-sizing strategy where trade size increases with stronger predictive confidence. Additionally, consider using stop-loss and take-profit mechanisms to manage risk and lock in profits. Analyze the Sharpe ratio and maximum drawdown to assess and optimize the risk-return tradeoff of the refined strategy. Explore alternative signal-generation techniques, such as momentum-based indicators (e.g., Moving Average Convergence Divergence) or volatility-adjusted signals, to improve decision-making.

(6) Feature Engineering for Temporal Effects

The model does not explicitly account for temporal market patterns or seasonality. Extend lagged features beyond SPY (e.g., lagged values for other indices like SP500 and Nikkei) to capture delayed effects. For example, add a 3-day lag for SP500 and DJI to investigate their cumulative impact on SPY, or add a binary feature indicating whether the day is a Monday, accounting for potential "Monday Effect" anomalies in stock prices. Introduce rolling-window features (e.g., 5-day and 20-day moving averages) to capture short-term and long-term market momentum. Consider encoding macroeconomic events or earnings announcement dates as categorical variables to account for external shocks. Furthermore, investigate seasonality by including quarterly and yearly dummies to capture cyclical market behaviors, such as the "January Effect" or fiscal quarter-end rebalancing.

6. Conclusion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a signal-based trading strategy for the SPY ETF by incorporating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and examining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various global indices. The analysis revealed that while U.S. indices exhibited strong correlations with SPY, the model's overall explanatory power was significantly limited, with very low adjusted R^2 values of 0.009 and 0.013 for the training and test data, respectively. Thes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model was not able to capture much of the variance in the SPY ETF's price movement, limiting its practical utility. Although the trading strategy showed promising results on the training data, it performed poorly on the test set, a clear indication of overfitting. This suggests that the model had learned specific patterns in the training data that did not generalize well to unseen data, highlighting a fundamental flaw in its predictive power.

Several limitations of the study were identified, including the reliance on a linear model, which likely oversimplifies the complexities of the financial markets. Financial markets are influenced by a multitude of factors, such as macroeconomic trends, geopolitical events, and market sentiment, which a linear model fails to capture. Additionally, the exclusion of volatility measures or other macroeconomic indicators, which are often crucial in understanding market dynamics, further hindered the model's performance.

For future research, it is recommended to explore more advanced, non-linear models, such as machine learning techniques, which have shown greater promise in identifying complex, non-linear relationships in financial data. Expanding the feature set to include volatility indices, sentiment analysis, and macroeconomic data could also provide a more comprehensive view of the market

dynamics that affect the SPY ETF. By refining the trading strategy and improving model robustness, future studies could make significant strides in enhancing profitability and developing trading strategies that are more adaptable to real-world market conditions. This would represent a meaningful step forward in the development of ETF-based trading methodologies with broader applicability and potential for real-world profitability.

References:

- Bollapragada, R., Savin, I. and Kerbache, L. (2013) 'Price forecasting and analysis of exchange-traded fund', *Journal of Mathematical Finance*, 2013, pp. 181–191. Available at: <https://www.scirp.org/journal/paperinformation?paperid=29338> (Accessed: 17 December 2024).
- Brooks, C. (2014) *Introductory Econometrics for Finance*. 3rd ed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Dhanaraj, S., Gopalaswamy, A. and Sureshbabu, M. (2013) 'Dynamic interdependence between US and Asian markets: an empirical study',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 Policy*, 5(3), pp. 220–237.
- Dias, R., Galvão, R., Irfan, M., Alexandre, P., Gonçalves, S. and Almeida, L. (2024) 'Delving into the exchange-traded funds (ETFs) market: understanding market efficiency', *Journal of Ecohumanism*, 2024.
- González-Mancha, J., Frausto Solís, J., Mora Guadalupe Castilla, V.G. and Terán Villanueva, D. (2017) 'Financial time series forecasting using simulated annealing and support vector regress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binatorial Optimization Problems and Informatics*, 8, pp. 10–18.
- Hastie, T., Tibshirani, R. and Friedman, J. (2009) *The elements of statistical learning: Data mining, inference, and prediction*. 2nd edn. New York: Springer.
- Hill, J.M., Nadig, D. and Hougan, M. (2015) A comprehensive guide to exchange-traded funds (ETFs).
- James, G., Witten, D., Hastie, T. and Tibshirani, R. (2013) *An Introduction to Statistical Learning: With Applications in R*. New York: Springer.
- Jamil, I., Kogid, M., Lim, T. and Lily, J. (2023) 'Pre- and Post-COVID-19: The impact of US, UK, and European stock markets on ASEAN-5 stock market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Financial Studies*.
- Liu, Y. (2024) 'A study on the effectiveness of SPY ETF prediction based on signal trading', *Academic Journal of Business & Management*, 6(7), pp. 1–12. Available at: <https://francis-press.com/papers/16369> (Accessed: 17 June 2024).
- Marszk, A. and Lechman, E. (2020) 'Application of diffusion models in the analysis of financial markets: evidence on exchange-traded funds in Europe', *Risks*.
- Montgomery, D.C., Peck, E.A. and Vining, G.G. (2012) *Introduction to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5th edn. New York: Wiley.
- Pan, Y., Hu, Y., Haran, E. and Manago, S.M. (2014) 'Co-movement of European stock markets based on association rule mining',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Data Mining*.
- Sakthivel, P. and Kamaiah, B. (2012) 'Interlinkages among Asian, European and the U.S stock markets: a multivariate cointegration analysis',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Behavioral Studies*, 4(3), pp. 129–141.
- Sermpinis, G., Verousis, T., and Theofilatos, K. (2016) Adaptive Evolutionary Neural Networks for Forecasting and Trading without a Data-Snooping Bias. *J. Forecast.*, 35: 1–12. doi: 10.1002/for.2338.
- Shamsuddin, A. and Kim, J.H. (2003) 'Integration and interdependence of stock and foreign exchange markets: an Australian perspectiv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Markets, Institutions and Money*, 13(3), pp. 237–254.
- Tsay, R.S. (2010) *Analysis of Financial Time Series*. 3rd edn. New York: Wiley.
- Vasylieva, O., Maksyshko, N. and Pedan, D. (2020)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quality to forecast models of exchange traded funds dynamics', *Scientific Bulletin of Uzhhorod National University*, 4(48), pp. 141–148.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2.548

地方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职院校“校本教材”的原则遵循、实践瓶颈与优化路径

唐浩然¹, 许伟胤¹

(¹吉林师范大学分院 吉林 四平 136000)

摘要: 在必备职业品格塑造与关键职业能力提升视域下, 地方红色文化资源的育人价值日益凸显。地方红色文化资源与高职院校“校本教材”的有机融合, 是高职院校落实校本课程育人的主要方式。以“指向品格塑造”“立足地域特色”“对标专业建设”三维原则遵循为参照, 当前地方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职院校“校本教材”实践探索中存在“选材不精”“融合不深”“落地不畅”三大瓶颈。基于此, 探索“定向整合”“统整编排”“贯通设计”等优化路径, 可有效提升高职院校“校本教材”中地方红色文化资源的育人效能。

关键词: 地方红色文化; 红色文化资源; 高职校本教材; 课程育人

地方红色文化资源因其内蕴的深厚育人价值及涵括的地域文化特色, 日益成为课程育人的重要资源凭借。“当下, 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迅猛发展, 传统工作世界发生颠覆性变化, 社会发展需求对人才的综合素质以及对不确定未来的适应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1]。培养符合经济社会发展所需的技能型人才始终是高职院校的育人使命。基于此, 为满足不同地域、不同行业的人才培养需求, 立足校情实际开展特色教学, 高职院校“校本教材”开发与编制的重要性便不言自明。地方红色文化资源所指涉的育人内容在空间面向、人才培养指向上恰恰与高职院校“校本教材”的育人诉求相吻合, 二者的有机融合为高职院校课程育人提供了具有天然可行性与较高效能预期的方案构想。本文将以“原则遵循”为导向, 明晰地方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职院校“校本教材”实践探索的现存实践瓶颈, 并针对实践瓶颈指明可行性优化路径。以期推动地方红色文化资源在高职院校“校本教材”中育人价值的实现, 同时促进地方红色文化资源的传承传递与推广传播。

一、地方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职院校“校本教材”的原则遵循

作为一项教材开发实践研究, 地方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职院校“校本教材”实践探索的逻辑起点是明确二者相融所应当遵循的原则。唯有如此, 才能为现存实践瓶颈的剖析及优化路径的提出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据此, 下文将从“红色文化育人指向”“红色文化内容整合”“红色文化品牌建构”三个路向出发, 展开多元化、立体化学理阐释。

(一) 指向品格塑造, 绘就未来工匠精神底色

培育大国工匠是新时代高等职业教育的应有之义。“高职院校在引领专业技能人才成为能工巧匠的基础上, 须引导其逐渐向大国工匠发展”^[2]。在数字经济新浪潮席卷全球、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加快、世界人才供需关系多变的新形势下, 未来大国工匠的精神底色无形中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变量之一。职业品格与职业能力是高职院校学生职业素养的两个侧面。高职院校“校本教材”中所融入的地方红色文化资源作为课程育人的目的与对象之间的媒介, 其所发挥的育人作用并不直接转化为学生的职业能力。换言之, 作为上层建筑之一, 地方红色文化资源主要以熏陶感染、潜移默化、春风化雨的方式在学生职业品格塑造层面发挥作用。具体而言, 地方红色文化资源所蕴含的爱党爱国、忠诚勇敢、正直无私、艰苦奋斗、攻坚克难、克己奉公、敬业奉献等价值观念在高职院校“校本教材”的有机融入中能够缓缓释放精神养分, 从而滋养高职

[基金项目]

2024年度吉林省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教学改革研究课题“地方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职‘校本教材’实践研究”(2024ZCY022)

院校学生的精神沃野，并成为学生关键职业品格形成的精神之基与思想之源。

有鉴于此，地方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职院校“校本教材”实践探索理应指向对未来大国工匠职业品格的塑造。即以地方红色文化资源的丰富矿藏为学生的职业胜任力与职业发展内驱力奠基。包括引导学生树立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努力奋斗的职业理想；形成顺应经济社会发展趋势的择业预期；拥有敬业乐群、吃苦奉献的职业操守；确立开拓创新、锐意进取的职业追求；培养百折不挠、越挫越勇的职业耐力。

（二）立足地域特色，唤起地方红色文化认同

受教育者的文化认同是文化资源作为教育资源促进教育目的达成的重要前提之一。相应地，高职院校学生面对“校本教材”中的地方红色文化资源，是深入其中还是游离其外？是感同身受还是等闲视之？主观上取决于学生对地方独特红色文化资源的认同程度。而唤起学生对“校本教材”中所引入的地方红色文化资源的深度认同，则有赖于地方红色文化资源的吸引力，这种吸引力首先来自地方红色文化资源所蕴含的与众不同的地域特色。地方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职院校“校本教材”实践探索的基础步骤是对地方红色文化资源的收集、分析、整理、筛选与整合。在上述过程中，需要始终立足所在高职院校所属地域的文化特色，唯其如此，才能“持续释放地域文化教育人、塑造人、激励人的作用”^[3]。

我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域长期以来形成的红色文化其内涵与外延均呈现出鲜明的“地域化”特征。例如，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中心——乌兰浩特市作为“内蒙古自治政府”的诞生地，被誉为“红色的城市”（简称“红城”）。正是“自治政府诞生地”这一红色文化符码赋予了乌兰浩特市以迥异于内蒙古自治区其他盟市的红色文化基因。同样以东北地区（含内蒙古东部地区）城市为例，吉林省四平市则因“四战四平”（四平解放战、四平保卫战、四平攻坚战、四平收复战）而被称为“英雄城”，成为特色鲜明的红色文化阵地。乌兰浩特的红色文化资源与四平的红色文化资源在时空场域、表现形式、应用路径上具有天然的地域性差别。作为教材开发者，只有洞见并紧扣这些差别并在红色文化资源的地域特色上持续、深入发力，才能在唤起学生文化认同的前提下激发“校本教材”中地方红色文化资源的育人潜力。

（三）对标专业建设，打造培基铸魂校本品牌

高职院校致力于培养直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所需的专业化、复合型技能人才。无论是职业技术学院还是高等专科学校，在“双高计划”背景下，高职院校普遍积极探索以“专业群”为导向的专业建设路径。在“专业群”课程改革对课程制度的适应性变革提出要求的同时，“专业群”辐射下的专业发展建设也对高职院校特色办学积淀提出了较高的要求^[4]。质言之，“专业群”建设呼唤广大高职院校回溯办学历程，尊重办学历史，以本院校积淀深厚、历史悠久、优势明显、发展前景广阔的专业为龙头，引领、聚合相关专业。在这条专业建设路径下，高职院校通常能够发现、确定自身的“王牌专业”，并以“王牌专业”为名片，打造专业建设校本品牌。

以上专业建设路径正为地方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职院校“校本教材”实践探索确立了“对标专业建设，打造培基铸魂校本品牌”的应然取向。具体而言，在同一地区办学的高职院校数量众多，区域内各院校对地方红色文化资源的校本引入在地域范围上难免具有重复性。而在不可避免的资源重复困局中，想要突出重围，则需紧紧围绕本院校的特色专业人才培养格局，以“专业特色”询唤人才培养所需的地方红色文化资源。例如，“铁人精神”是黑龙江省大庆市地方红色文化资源的特色组成部分。“铁人精神”以石油工人王进喜为原型典范，其具体内容包括“矢志不渝，壮怀激烈的爱国主义情怀”“积极向上，乐观负责的人生态度”“坚忍不拔，无坚不克的意志品格”“积极刻苦，不怕牺牲的工作精神”“严细认真，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奉献人民，自强不息的价值追求”“感恩社会，挚爱大众的道德人格”“艰苦奋斗，不知疲倦的生命活力”。毫无疑问，“铁人精神”具有普世价值，而由大庆市域内地方高职院校的专业集成情况来看，同样不可否认的是，相较于其他院校及专业，大庆X职业学院“石油化学工程系”相关“专业群”与“铁人精神”这一地方红色文化资源之间的内在联系更为紧密。故而，若在该院校“石油化工专业群”的“校本教材”中融入“铁人精神”红色文化元素，则更容易形成校本红色文化品牌。

二、地方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职院校“校本教材”的实践瓶颈

上文所厘定的“原则遵循”在理论基础层面为地方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职院校“校本教材”实践探索提供了目标、方向与策略上的规约。在“原则遵循”的引领下，以调查分析为基础，可以检视出当下地方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职院校“校本教材”实践探索在“资源选择”“融合深度”及“教学转化”三重向度上所存在的下述亟待突破的实践瓶颈。

（一）选材不精：选入教材的地方红色文化资源针对性不强

“选材”是地方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职院校“校本教材”实践探索的初始环节。对引入高职院校“校本教材”中的地方红色文化资源的选择精当与否的判别标准在于考量引入的地方红色文化资源其针对性是否鲜明。在地方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职院校“校本教材”的整体架构中，塔基是高职院校特色优势专业，塔身是最基层红色文化资源集聚区域，塔尖是高职院校学生必备职业品格。与之相对应，当前地方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职院校“校本教材”实践探索在选材针对性上的缺弱主要表现在下述三方面。

其一，当前对“校本教材”中所引入的地方红色文化资源的选择普遍并未精准聚焦高职院校特色优势专业。质言之，选择引入地方红色文化资源的高职院校“校本教材”其所服务的专业往往是普通专业，甚或是边缘化专业，即“处于弱势地位且获取资源较少的专业”^[5]。其二，当前对“校本教材”中所引入的地方红色文化资源的选择普遍并未精准聚焦高职院校所属地区的最基层红色文化资源集聚区域。其三，当前对“校本教材”中所引入的地方红色文化资源的选择普遍并未精准聚焦未来大国工匠发展的关键职业品格。所引入的地方红色文化资源与高职院校学生成人成才所必备的关键品格之间的必然联系不够紧密。

（二）融合不深：地方红色文化资源与教材中其他内容脱节

“融合”是地方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职院校“校本教材”实践探索的核心环节。对引入高职院校“校本教材”中的地方红色文化资源与教材之间融合深入与否的标准在于审视二者之间是否存在要素的简单叠加。从这一实践原则出发可知，所谓“融合”，在呈现形式上倡导“不着痕迹”；在效能发挥方式上倡导“润物无声”；在育人价值权重上倡导“不可或缺”。由此观之，当前地方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职院校“校本教材”实践探索在融合深度上的不足主要表现为下述两种倾向。

在内容上，当前高职院校“校本教材”中所引入的地方红色文化资源与教材中的专业性内容之间的适配性普遍不高。教材中地方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目标的达成因过于“郑重其事”而难以真正实现“悄然无声”。客观上致使专业性内容与地方红色文化资源之间存在融合“断点”。在形式上，当前对高职院校“校本教材”中所引入的地方红色文化资源的呈现普遍倾向于采用“单设栏目”“单设页面”，甚至“单设章节”的方式。这种呈现方式一方面反映出“校本教材”开发者深度融合意识的缺位，另一方面也在客观上强调了地方红色文化资源与教材其他部分之间的区别，割裂了专业内容与地方红色文化资源之间的紧密联结，阻碍了地方红色文化资源与教材内容的深度交叉融合。

（三）落地不畅：地方红色文化资源的有效性教学转化不足

“落地”是地方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职院校“校本教材”实践探索的终端环节。“课程资源是具有育人价值的能转化为课程组成部分或支持课程实施、保障课程效果的资源形态”^[6]。检视地方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职院校“校本教材”实践是否真正“落地”的标准是评估地方红色文化资源能否切实从课程资源转化为教学资源，以及这种资源转化是否能够有效满足教学设计、实施与评价的需求。如果作为课程资源的地方红色文化资源被引入教材后仅仅成为教材中的众多要素之一，既未成为教学设计活动的资源支持，也未在教学实施与评价活动中成为教学内容与过程的有机组成部分。便意味着“校本教材”中的地方红色文化资源没有被激活，其潜隐的丰富育人价值尚未释放，那么，育人效能的发挥便无从谈起。基于此，当前地方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职院校“校本教材”实践亟待打通的“堵点”主要源自下述三种倾向。

一则，在教学设计阶段，当前教师对高职院校“校本教材”中所引入的地方红色文化资源同学生职业品格塑造与职业能力提升之间的内在联系认识不清。换言之，在开展教学设计时，教师对作为教学资源的地方红色文化具体指向学生成人、成才的哪些品格规格缺乏针对性认识，因而往往很难做到因“材”施教。二则，在教学实施阶段，当前对高职院校“校本教材”中所引入的地方红色文化资源与“教学任务”“教学活动”融为一体实践探索尚待深化。当项目式教学成为高职院校的基本教学形态时，“校本教材”中的地方红色文化资源如何分级融入“项目”“任务”与“活动”，成为教师必须思考的关键实践瓶颈。三则，在教学评价阶段，当前对高职院校“校本教材”中所引入的地方红色文化资源育人效能的科学评价体系尚未真正建立。因此，虽然“校本教材”中地方红色文化资源的科学性与思想性能够得到保证，但现有评价体系对“校本教材”中地方红色文化资源育人过程的连续性及育人价值释放的持续性监控缺位。

三、地方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职院校“校本教材”的优化路径

以“原则遵循”为标尺，以“实践瓶颈”为突破口，对地方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职院校“校本教材”优化路径的探索主要聚焦于“融入范围划定”“融入系统建构”与“融入过程指引”三大领域。从而标定“锚点”，熔合“断

点”，疏通“堵点”，切实提升地方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职院校“校本教材”实践探索的育人实效性。

（一）定向整合，提升地方红色文化资源挖掘精度

划定适切的资源引入范围，可以为地方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职院校“校本教材”实践探索标定“锚点”。地方红色文化资源内涵丰富，外延广泛。例如，地方红色文化资源指涉的学科门类众多，包括但不限于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图书情报学、建筑学、文学、艺术学。众多学科门类的交叉融合为地方红色文化资源的挖掘提供了理论视野与方法论上的无限可能。再如，地方红色文化资源的呈现形态多样化，包括但不限于历史遗迹、基地场馆、物资与日用品、档案报刊与文件、日记与信件、照片与音视频、各体裁文学作品。丰富多样的呈现形态则为地方红色文化资源的挖掘提供了“收集整合”“筛选提取”的广阔空间。因此，为了有的放矢，高效育人，在地方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职院校“校本教材”实践的选材过程中，更应定向整合，提升地方红色文化资源挖掘精度。

首先，在“校本教材”开发时，应依照职业品格塑造的内容结构，分层次确定课程目标及教学目标，以目标统整地方红色文化资源的内容选择。从而确保所引入的地方红色文化资源与高职院校学生成人、成才所必备的关键品格之间具有紧密联系。其次，对“校本教材”中所引入的地方红色文化资源的选择应定准基调，精准聚焦高职院校自身特色优势专业。以“专业活力激发资源活力”为行动框架，真正诠释“校本教材”中地方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生动意蕴。最后，对“校本教材”中所引入的地方红色文化资源的选择应划准区域，精准聚焦高职院校所属地区的最基层红色文化资源集聚区域。当高职院校所属区级地方拥有独具特色的红色文化资源时，则优先引入区级红色文化资源。当区级红色文化资源的地域特色不够鲜明时，再考虑引入市级红色文化资源。

（二）统整编排，保障地方红色文化资源融合深度

坚持“统整编排”，可以“熔合”地方红色文化资源与高职院校“校本教材”中的专业性内容之间的“断点”。系统性是影响教材整体育人效能发挥的重要因素。注重系统性是教材开发与编写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亦即“系统考量、论证和设计各相关要素”^[7]。教材开发与编写的系统性在内容层面要求教材中的代表性要素在育人价值、功能与作用上相辅相成，互为表里，互为支撑。在形式层面要求教材中各章节、板块、栏目所提供的信息之间彼此服务、彼此诠释、彼此呼应。因此，为使引入高职院校“校本教材”中的地方红色文化资源作为教材中的有机组成部分与其他专业性要素不相脱节，协同育人，在引入地方红色文化资源时，应当避免内容与形式的“孤立化”，而应着力追求统整编排的“溶入”式引入，以保障地方红色文化资源融合深度。

首先，在内容上应当积极寻找所引入“校本教材”中的地方红色文化资源内蕴的众多育人价值中指向崇高职业理想、科学择业观念、健康职业心理、持久职业发展内驱力的内容，以这些内容为融合契机，与教材中的专业性内容有机融合。从而增强地方红色文化资源与教材中其他专业性内容之间的黏合度。其次，在形式上应当避免简单地将地方红色文化资源“单设栏目”“单设页面”“单设章节”，避免人为地将教材中的专业性要素与地方红色文化资源分别排列，从而防止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下意识地将教材中的专业性要素与地方红色文化资源视为彼此独立、互不关联的部分。上述内容与形式的双重统整编排，将为地方红色文化资源深度融入高职院校“校本教材”提供有力保障。

（三）贯通设计，提供地方红色文化资源教学参考

加强对教学过程的贯通性指引，可以疏通地方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职院校“校本教材”实践探索中的“堵点”。正如上文所述，教学设计、实施与评价是高职院校“校本教材”中所引入的地方红色文化资源从课程资源转化为教学资源，最终发挥育人效能的必由路径。故此，在“校本教材”开发与编制的全过程中，应当始终以“立足教学”“服务教学”“便于教学”为引入地方红色文化资源的关键参照。使“校本教材”所引入的地方红色文化资源成为教学设计活动的资源支持和教学实施与评价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进而激发地方红色文化资源潜隐的育人活力。具体而言，“校本教材”开发与编制时应当同步编写“教学指南”，以满足教学设计、实施与评价所需。在内容构成上，教学指南要包含“教学提示”“学习提示”“评价支架”等部分；在呈现形式上，教学指南既可以单独成册，也可以编入教材本体中。

其中，“教学提示”部分的编写应预见并指向教师在理念与实践上需要突破的瓶颈与需要直面的挑战，针对预期瓶颈与挑战给出突破与应对策略。即提示教师在利用地方红色文化资源开展教学时，如何处理好“知识与品德”“主体与主导”“直接经验与间接经验”之间的关系。“学习提示”部分的编写则应以学习者视角切入“校本教材”中的地方红色文化资源，预见并指向学生认知、理解、内化、应用地方红色文化资源时可能遇到的问题与可能存在的困惑，针对潜在问题与困惑给出启发与建议。“评价支架”部分的编写应聚焦教学评价的

资源需求。为利用“校本教材”中的地方红色文化资源开展的教学活动提供包括但不限于过程性评价、诊断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的涵盖自评、师评、生生互评的评价指标及量表等材料。上述“教学评”一体化“教学指南”具有贯通性特征,能够为地方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职院校“校本教材”的有效落地提供便捷、可靠的资源支持。

参考文献:

- [1] 刘晓敏,苏悦文.教育强国背景下职普融通的时代价值、现实困阻与发展策略[J].职业技术教育,2024,45(25):40-46.
- [2] 万芳琪,李翹彤.从“能工巧匠”到“大国工匠”—高职院校人才培养路径研究[J].甘肃教育研究,2024(12):21-24.
- [3] 陈振亮.地域文化视域下高校教育管理的优化模式[J].黑河学院学报,2024,15(10):70-73.
- [4] 许丽丽,况刘越.高职高水平专业群课程改革的制度创新[J].江苏高职教育,2024,24(05):57-66.
- [5] 韩梦露,赵艺晨,龙潇宇.边缘化专业大学生就业现状及其路径选择——基于社会学专业视角[J].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43(05):44-47.
- [6] 黄晓玲.优质原创课程资源的主要特点及建设思考[J].教学与管理,2019(13):38-41.
- [7] 乐进军.电子教材的设计原则和开发策略[J].教学与管理,2017(01):73-75.

The Principles, Practical Bottleneck, and Optimization Path of Integrating Local Red Cultural Resources into the "School-Based Textbooks" of Vocational Colleges

Tang Haoran, Xu Weiyin

The Branch of Jilin Normal University, Jilin Siping 136000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haping essential professional character and enhancing key professional abilities, the educational value of local red cultural resources is increasingly prominent. The organic integration of local red cultural resources and "school-based textbooks" in vocational colleges is an important way for vocational colleges to implement school-based curriculum education. Based on the three-dimensional principles of "character shaping",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benchmarking professional construction", there are three major bottlenecks in the current exploration of integrating local red cultural resources into "school-based textbooks" in vocational colleges: "insufficient selection of materials", "insufficient integration", and "poor implementation". Based on this, exploring optimization paths such as "targeted integration", "integrated arrangement", and "integrated design" can effectively enhance the educational effectiveness of local red cultural resources in the "school-based textbooks" of vocational colleges.

Keywords: Local red culture; Red cultural resources; School-based textbooks for vocational education; Curriculum education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2.550

数字戏剧现场性的消解与重构

代兴盛¹

(¹山东艺术学院戏剧学院, 山东 济南 250300)

摘要: 基于数智科技而生的数字戏剧现已成为一个热门的发展方向, 但由于其缺失“现场性”被视为是一种“媒介化入侵”。数字戏剧的诞生既离不开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推进, 也离不开消费主义文化融合的影响, 其究竟会成为戏剧的有益扩充, 还是会给戏剧本体造成伤害并掣肘其发展是值得关注和探讨的问题。但无论如何, 数字戏剧必须重视戏剧本体, 不能够忽视戏剧的“现场性”, 在“具身”、“空间”、“他人”三者的虚构上建立起想象空间并重构“现场性”, 最终朝着有益扩充的方向发展, 为未来的戏剧注入鲜活的动力。

关键词: 戏剧; 数字戏剧; 现场性; 数智科技

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 各种前沿的技术手段不断涌现, 给各行各业注入鲜活动力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新的挑战, 戏剧行业亦是如此。“数字戏剧”作为传统艺术与数智科技融合的产物代表之一, 在其闯入戏剧学者视野的过程中, 关于其“现场性”的问题讨论也随之出现并愈演激烈。“现场性”常被学者认定为戏剧的本体特征, “即时性、即地性、即兴性”是其重要的构成因素, 而现阶段的数字戏剧由于戏剧本体的忽视和技术壁垒的存在, 缺失了“现场性”, 与影像或电影的界限模糊不清, 被视为一种对戏剧本体的“媒介化入侵”。数字戏剧是不断变化发展着的新生事物, 其究竟会成为戏剧的有益扩充并注入鲜活的生机活力, 还是会给戏剧本体造成伤害并掣肘其发展? 这是戏剧界所关注的问题。在构建数字戏剧发展的过程中发现问题、总结问题, 寻找途径促进、引导这一新兴事物健康发展、臻于至善, 是这一问题讨论的价值所在。

一、潮流穷源: 何为戏剧的现场性

简单来说, 戏剧的现场性是一种不可复制的“感受体验”, 这种感受只能在当下有限的空间里与有限的人发生关系, 这个关系包含演员与演员、演员与观众、演员与环境、观众与观众、观众与环境, 他们之间的联系都发生在此时、此刻、此地。观众与演员在此环境的现场表演中获得了一种独一无二的存在价值, 观众因演员的表演引发思考, 演员也根据观众的反应做出应时的调整, 在不间断的、不可预料的、动态的、双向的变化中共塑戏剧。因此, 戏剧的演出由演员、观众和演出空间所构成, 而其现场性可以从“即时性”、“即地性”、“即兴性”三个角度去理解。

(一) 即时性

戏剧现场性的“即时性”概念最初由英国导演彼得·布鲁克 (Peter Brook) 提出, 其在《空的空间》 (The Empty Space) 中提到“直觉的戏剧”或“即时戏剧” (immediate theater)。虽然翻译不同, 但其所强调的戏剧是一种当下的、直接的、此时此刻正在发生的过程和形态。一方面, 在戏剧演出的时间范畴内一直都处于现在进行时态, 每场演出从开始到结束的全过程必然是崭新的、区别于以往的、不可复制的。另一方面, 在戏剧剧情的时间范畴内, 应充分发挥戏剧演出的现场表演、现场创作、不可复制的特点, 使演出内容结合时代、当天、此刻, 最大限度地缩小故事内容与现实生活之间的时间距离, 从而将演出内容的当下性、时效性尽可能地发挥出来, 激发观众对演出的共鸣感。^[1] 因此, “即时性”寄寓了戏剧演出的“现场性”魅力, 是观众的在场意识和共鸣意识的内在体现。

(二) 即地性

戏剧现场性的“即地性”概念在实践过程中是可以切身体会到的，理查德·谢克纳 (Richard Schechner) 的“环境戏剧”理论强调演出空间、演出地点的重要性，也是此概念的一种延伸。戏剧从排练场地到演出场地必然有一些表演、台词、调度等方面新的调整。一部戏剧即使在现有的演出场地已经形成某种固定的样态，但当其来到一个新的场地演出，必然会进行再次的、因地制宜的创作。^[1] 在这个过程中，体现了戏剧现场演出具有不可复制性，不是创作者被迫对演出做出某种妥协和让步，而是需要创作者主动捕捉到新场地的结构特征和建筑特征，积极地“为我所用”，使即地的条件与演出从内容到形式充分结合，做出新的调整，从而碰撞出新的火花，甚至形塑出一种在此地的、唯一性的艺术效果，使现场观众得到在此地的、唯一性的感受体验。

(三) 即兴性

“即兴性”概念最早出现在“即兴表演”的训练或创作方法中，而戏剧现场性的“即兴性”与其存在异质，其强调的是演员在戏剧演出中的即兴创作状态。由于每场演出观众的不同、演出情况的不同，演员必然会产生进行极快的即兴创作，发生一些不易被人发现但却又确实存在的接受和输出。^[1] 这种鲜活的反馈，使戏剧演出避免成为僵化、固化的复制品，而这正是由观演关系的存在、观演之间的“反馈”以及“空间”的存在构建所塑造的。戏剧理论家阿·波波夫 (Alexey Dmitriyevich Popov) 曾言：“观众对演员的影响，可以创造奇迹。观众以他自己的反应鼓舞着演员的情绪，给演员指出方向。于是演员产生了新的适应、新的色彩、新的重点，产生出他在一秒钟以前还没有想到和体会到的许多东西……”演员因观众或环境的影响做出现场的、鲜活的、即兴的反应，观众再得到新奇的体验，进而形成一种良性的现场观演关系。

二、内在消解：现场性在数字戏剧中的缺失

数字戏剧发展至今仍未有一个很明晰的定义，美国戏剧学者纳迪亚·马索拉 (Nadja Masura) 在定义“数字戏剧”时，将“现场性”或“观演双方共同在场”设为首要的限定条件，而从国内现有的实践，即作品《麦克白》和《嵇康》反推数字戏剧的产出过程，“现场性”明显缺失。

数字戏剧《麦克白》和《嵇康》都是在一个非传统剧场的场地 (如绿幕拍摄棚) 进行无观众演出，融合各种数智科技手段 (如 XR 技术、AICG 技术) 进行拍摄、记录和剪辑，最终诞生一部类似电影的影像，观众通过媒体平台观看。在此过程中，数智科技、数字影像、预制演出成为了“结构性因素”。传统的戏剧以现场演出为支撑，影像作为一种媒介为戏剧的传播提供便利，而数字戏剧则将影像的位置提高，没有戏剧舞台和现场观众，预制内容不再受到观众和环境的影响，观演双方对戏剧的共塑性消失，最终的输出也并非观众在实时观看，即时性、即地性、即兴性基本不复存在，这直接导致了戏剧“现场性”的缺失，甚至展现出一种“媒介化入侵”的态势。格洛托夫斯基 (Jerzy Grotowski) 认为：“没有演员和观众间感性的、直接的、活生生的交流关系，戏剧是不能存在的。”反观数字戏剧，无论是《麦克白》还是《嵇康》，都使用了预制拍摄后放映影像的手段。一方面，拍摄手段的加入使观众在景别切换中常常只能看到主角的舞台行动，其他角色则被卡在镜头之外，观众无法主动去捕捉信息。另一方面，演出是非实时的且影像隔绝了观众与演员，失去了“感性的、直接的、活生生的交流关系”，即使内容是戏剧演出，但实际体验上同观看电影、网络视频相似，没有“即时性、即地性、即兴性”的鲜活反馈，明显缺失了戏剧的“现场性”。

数字戏剧《嵇康》上线前曾在上戏实验剧院进行了为期五天的演出，但碍于有限的技术水平，创作者构建的“数字空间”与以往的“多媒体背景”在功能和形式上相差无几，数字空间与舞台空间同步演映的理想状态和现实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距。未来，若能够突破四维空间数据远程完整传输的技术壁垒，《嵇康》的构想或许会更加贴切地呈现。与其不同的是，《麦克白》自诞生之初创作者就将其最终的呈现形式定为影像，并无线上线下双演的想法。导演慕峰用“一部没有舞台的戏剧，一部只有舞台的电影”来形容这部作品，试图用数字科技替代传统实景舞美，用电影蒙太奇重新解构戏剧的表演空间，而最终的呈现效果差强人意。《嵇康》的线下演映和《麦克白》的线上放映或许代表了数字戏剧未来发展的两个分支，但就目前来看，线下演映的发展方向虽然极大程度地保留住了戏剧的现场性特征，但由于技术壁垒的存在，创作者构想的“数字空间”和以往的“多媒体背景”并没有太大区别，很难找出数字戏剧的独特性。线上放映的发展方向不仅存在忽视戏剧本体、缺失戏剧现场性的问题，还需要攻克一些技术壁垒，才能更完美地呈现。

数字戏剧的诞生伴随着以人工智能为代表新一轮科技革命的不断推进，其不仅是戏剧艺术的时代创新，还是媒介革命的具体表现。这场革命催生了许多新型艺术形态和新型媒介形态，如数字梅兰芳、京剧电影《安国夫人》等立体化、空间化的“数字演员”表演和“数字剧场”演播已渐成势头，“线上线下双演融合”使戏

剧表演形式和传播方式发生改变，“数字戏剧艺术空间”将成为下一代新型媒介。当四维空间数据远程完整传输得到普及，电影、电视、网络等传统影像媒介就会被这种新型数字空间媒介所取代。数字戏剧的诞生也离不开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消费主义文化融合的影响，戏剧的消费市场及未来发展都不容乐观，若想要扩大戏剧未来的消费市场，不仅意味着要努力创作高质量的戏剧作品，更重要的是找到一种范式，使其能够以尽可能大的规模出售戏票给大众。一部分人从打磨作品内容的路径出发，用作品质量赢得观众的认可后进行大规模的宣传和巡演。另一部分人则借助前沿的科技手段探索新的可能性。换句话说，数字戏剧可以视为创作者在消费主义影响下借助科技手段降低传播门槛、扩大观众人群、拓宽消费市场的探索尝试。

纵使各种数智科技手段会给舞台艺术、媒介传播甚至是消费市场带来深刻变革，但在审美感知和观众体验上，数字戏剧必须还是“戏剧”，不能是“影像”或“电影”，任何新技术都不能改变戏剧“现场”、“即时”、“即地”、“即兴”等本质的特征。数字戏剧如果过分强调“影像”、忽视戏剧本体且不做出适当的调整，媒介化形式的介入将会对戏剧本体进行侵蚀，扑向“媒介化入侵”的浪潮中。

三、未来构想：现场性的再度重构

彼得·布鲁克 (Peter Brook) 曾描述任何一个空间都能成为戏剧舞台，而其描述的前提是观众，阿尔托 (Antonin Artaud) 即使再提倡贫困戏剧也要保留观众的存在，观众是戏剧发生的根本。因此，数字戏剧要想再度构建现场性，那就得先从观众这个重要的主体切入，依靠观众的想象力营造出虚假的“在场体验”，在观众与演员的“自我欺骗”中重新架构出现场性。托宾·内尔豪斯 (Tobin Nellhaus) 把“具身”、“空间”、“他人”视作“在场体验”的三个关键词，未来构想中的数字戏剧也可以借助这三者的虚构来帮观众建立“在场体验”感，重构现场性。[2]

“具身”强调的是观众主动的身体状态影响着戏剧的发生效果。虽然，数字戏剧存在着线下演映和线上放映两个发展分支，但大部分数字戏剧构想的呈现方式是影像，即使是线下演映过的《嵇康》，其也耗费了大量精力，使用八机位同步拍摄和现场实时合成技术来制作最终呈现的影像。从这一角度出发，数字戏剧唯一能够实现的就是利用摄像机模仿观众的视角建立一段稳固的“观演关系”来使戏剧能够发生。在此过程中，要摒弃掉创作者主观意图的景别切换和刻意剪辑，最大程度地营造出是观众自己在主动看戏的错觉，让观众自己去捕捉舞台上的信息。对于演员而言，摄影机等同于观众，无论屏幕前的观众是否注视，只要摄影机不停这个戏就得继续演下去。对于观众而言，屏幕等同于舞台，只要演员在行动，看戏的行为就还在继续，凝视就一直存在，焦点就在摄影机对着的演员身上。因而，摄影机模仿了观众的视角伪造出了“具身认知”的感受，观众借虚假的“具身认知”相信自己就在现场。在未来的构想中，若是四维空间数据能够远程完整传输得到普及，数字戏剧将会无限接近于“即时性”和“即兴性”，观众的“具身认知”将会变得更强、更真，进而重构出现场性。

“空间”强调的是观演双方精神空间的同时在场。从这一角度出发，数字戏剧的影像最好是直播形式。直播过程是以共时为基础的，演员的表演对观众来说是正在进行中的，观众的观看对于演员来说也是持续存在的，一旦有意外发生，演员就会产生即兴的反应，观众就会接受到同步的反馈。当观演双方都意识到自己与对方正在同一时间经历同样的事情，并且会影响彼此时，那么这个时间上的共时就借助双方的想象力搭建起一个虚拟精神空间，达到了一种同时在场、共处同一“空间”的感觉。

“他人”强调的是观众与其他观众之间的在场关系。心理学上的“他人”侧重人的社会属性，其认为许多关于自身的重要体验，都需要他人的参与，放在关系性的体验中去确认，并在关系里增强。从戏剧的角度上去理解，即观众去看戏，周围存在着同样看戏的观众，彼此之间会相互增强这种“现场感”，周围观众的行为也会影响到此时观看的我，我的行为也会影响到其他观众。在传统戏剧演出中，观众与观众的距离是非常近的，而数字戏剧没有传统意义上的“观众席”，但是仍可通过构建虚假观众席的形式营造出与其他观众共同在场的感觉。一方面，观众可以聚集在类似剧场、电影院的场所，获得实在的在场感，还可以使用如 AR、VR 等技术，增强现实感。另一方面，观众在不同的空间中通过屏幕观看可以设置实时弹幕或实时评论的功能，在未来若能够远程完整地传输四维空间数据，构建出虚假观众席，即使身处的空间不同也能够在共同的观众席观看戏剧演出，“他人”便有了进入观众想象空间中的渠道，进而构成完整的现场性体验。

未来构想中的数字戏剧必须注重的仍是戏剧本体，通过“具身”、“空间”、“他人”三者的虚构建立起共同的想象空间，借助数智科技手段向着“即时性”、“即地性”、“即兴性”无限靠近，而非将数智科技或影像作为主体，最终才能够重构出精神上的现场性，成为戏剧发展的有益扩充。

四、结语

近些年,国内戏剧一直在经历戏剧数字化的实践,数字戏剧是新一轮科技革命推进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的融合产物。基于数智科技而生的数字戏剧尚未发展成熟,仍处在并将长期处在探索阶段,面临着双演融合趋势下剧场空间如何立体转化、戏剧本体与影像媒介如何有机融合、深度交互和沉浸环境中观众身份如何重新定义等问题。作为一个迅速发展着的新生事物,要使数字戏剧成为戏剧的有益扩展就不能够忽视戏剧本体及其现场性的特征,在探索讨论数字戏剧现场性如何消解与重构的过程中为戏剧未来的发展注入鲜活的动力。

参考文献:

- [1] 杨硕.戏剧演出中的“现场性”研究[J].四川戏剧,2021,(12):50-54.
- [2] 杜翊.影像参与:戏剧现场性的跨媒介重构[D].成都: 四川师范大学, 2022.

The Deconstruc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Liveness in Digital Theater

Dai Xingsheng

School of drama, Shandong University of Arts, jinan, china

Abstract: Born of digit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ies, digital theater has emerged as a burgeoning field of development. However, its perceived lack of "liveness" has sparked debates about it being a form of "mediatized intrusion." The rise of digital theater is inextricably linked to both the advancement of the new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and the influence of consumerist cultural integration. Whether it will ultimately serve as a constructive expansion of theatrical art or pose risks to the ontological integrity of theater—potentially hindering its evolution—remains a subject worthy of critical examination. Regardless of its trajectory, digital theater must prioritize the ontological essence of theater. It cannot afford to neglect the fundamental "liveness" inherent to theatrical practice. By cultivating imaginative dimensions through the triad of "embodiment," "spatiality," and "intersubjectivity," digital theater must reconstruct its "liveness," steering its development toward becoming a vitalizing force that injects renewed dynamism into the future of theatrical art.

Keywords: Theater; Digital Theater; Liveness; Digit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ies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2.542

京津冀城市群物流业效率测度研究

侯婷¹

(1 内蒙古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10)

摘要: 选取 2013-2022 年京津冀城市群 13 个城市的面板数据, 运用超效率-SBM 模型和 Malmquist 指数模型从静态和动态两个角度对京津冀城市群的物流业效率进行测度研究。结果表明: ①京津冀物流业静态效率总体较低没有达到有效水平。②京津冀城市群物流业动态效率年均增长 0.4%, 技术效率是其上升的主要原因。③提出加强物流基础设施建设、物流技术创新和区域合作、京津冀协同发展策略、政府制定相关的政策等建议。

关键词: 京津冀城市群 物流业效率 超效率-SBM 模型 Malmquist 指数模型

一、引言

物流业效率是衡量一个地区物流业发展能否对一个地区经济产生拉动效应的一个重要标志, 其内在蕴含着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 建立一个合理的关系模式, 将有助于提高经济发展的品质, 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京津冀地区近年来持续加大对物流产业的投资, 但是, 在大量投资取得成效的同时, 我们也要注意到, 目前我国地区物流发展中还存在着不平衡、不协调的问题, 以及粗放式的投入导致的效率低下、负溢出等弊端。京津冀地区是中国的“首都经济圈”, 也是中国政治、文化、北方经济的重要核心区。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 三地物流业的发展更加密切、更加迅速, 京津冀物流业的协同发展迎来了巨大的契机。通过对京津冀物流业效率的测算并对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有助于发现其物流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并据此提出针对性发展建议, 对京津冀物流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学术界对物流业效率没有统一的定义, 通常用物流业投入产出比来表述。现有研究大都倾向于从三个主要角度选择投入指标: 劳动、物质要素与财力, 具体投入产出指标有物流业员工人数、固定资产投资、公路里程等和物流业增加值、货运量等^[1]。国内学者在大量学习和借鉴国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结合我国国情进行了大量、全面的研究探索。从研究方法来看: 在物流业效率测度上, 学者们由最初的定性研究发展到定量研究, 运用能够处理多个投入产出指标的问题的非参数方法数据包络分析 (DEA)^{[2][3][4]}。但传统径向模型无法处理投入产出松弛性问题, 难以区分最大效率值同为 1 的决策单元。所以在传统模型上运用改进的 SBM^[5]、三阶段超效率-SBM^[6]、超效率-SBM 模型^[7]对物流业效率进行测度。鉴于此, 本文使用超效率-SBM 模型测算 2013—2022 年京津冀地区城市群物流业效率, 选择 Malmquist 指数对跨期物流业效率进行动态分析。

二、研究区、方法与指标

(一) 研究区域

京津冀城市群位于我国华北地区, 是我国三大城市群之一, 人口数量超过 1 亿, 总面积约为 21.8 万 km², 是我国北方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本文研究区域涵盖北京、天津两个直辖市, 以及河北省的石家庄、唐山、秦皇岛、承德等 11 个地级市的市辖区范围 (图 1)。

[作者简介]

[1]侯婷 (1999-), 女, 汉族, 河北省定州市人, 学生, 研究生, 内蒙古工业大学, 物流工程与管理专业, 区域物流方向研究。

京津冀区域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增加值持续增长,从2013年的3643亿元增长到2022年的5013亿元。社会物流总额突破18万亿元,物流运行效率持续提升,社会物流总费用占GDP比重从2013年的17.5%下降到2022年的14.7%,显示出物流业在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方面的显著成效。京津冀城市群的中心极化特征非常明显,呈现出以北京—天津为双核心的经济集聚态势,整个城市群由北京和天津两个中心城市主导,城市群的内部差异较大^[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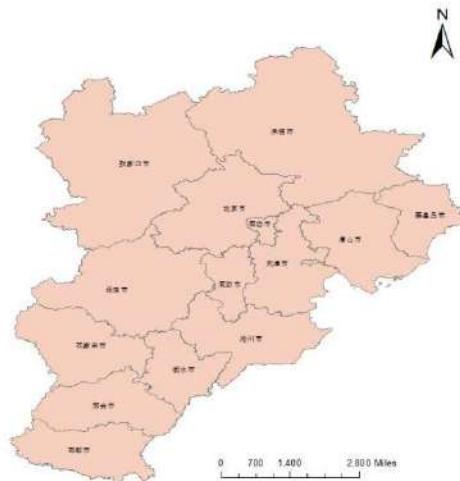


图1 研究区示意图

(二) 研究方法

1、超效率-SBM 模型

数据包络分析法(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DEA)是一种非参数效率评价方法,但这种方法主要是从径向方面考虑的,对于松弛变量的处理也存在不足,导致该方法存在一定的误差。为了模型计算的准确度,Tone[5]提出了SBM(Slacks-Based Measure)模型作为改进型,并在2002年进一步提出了超效率SBM模型,本文用超效率SBM模型测度京津冀城市群物流业静态效率,借鉴唐唯^[10]的研究具体公式如下:

$$\begin{aligned} \min \rho^* = & \frac{1 + \frac{1}{m} \sum_{i=1}^m \frac{s_i^-}{x_{ik}}}{1 - \frac{1}{r} \sum_{r=1}^m \frac{s_r^+}{y_{rk}}} \\ \text{s.t.} \{ & x_{ik} \geq \sum_{j=1, j \neq k}^n \lambda_j x_{ij} + s_i^- \\ & y_{rk} \leq \sum_{j=1, j \neq k}^n \lambda_j x_{rj} - s_r^+ \\ & \sum_{j=1}^n \lambda_j = 1; \forall \lambda_j \geq 0 \\ & \lambda_j \geq 0, s_i^- \geq 0, s_r^+ \geq 0 \end{aligned}$$

式中:n代表决策单元个数,本文n为13;m代表决策单元投入变量个数;r代表决策单元产出变量个数; x_{ik} , y_{rk} 表示第k个决策单元的投入、产出变量; s_i^- , s_r^+ 分别代表投入、产出的松弛变量; λ_j 是约束条件; ρ^* 代表物流业效率, ρ^* 越大,效率越高。

2、Malmquist 指数模型

Malmquist指数是来分析不同年份效率值变动的一种方法,基于两个及以上时期的面板数据,分析DMU在t时期到t+1时期的效率变化,本文用Malmquist指数模型测度京津冀城市群动态效率,参照何家琪^[9]的做法,Malmquist指数计算公式如下:

$$\begin{aligned}
 TFP &= M(x^t, y^t, x^{t+1}, y^{t+1}) = \sqrt{(M^t \times M^{t+1})} \\
 &= \sqrt{\left(\frac{D^t(x^{t+1}, y^{t+1})}{D^t(x^t, y^t)} \times \frac{D^{t+1}(x^{t+1}, y^{t+1})}{D^{t+1}(x^t, y^t)}\right)}
 \end{aligned}$$

如果 $TFP > 1$ 效率较前一年有提高；当 $TFP = 1$ 时，总效率恒定。当 $TFP < 1$ 时，总效率降低。TFP 指数分解为技术效率指标(Effch)和技术进步水准(Tech)。若 Effch>1, 决策单元的技术效率得到了改善；若 Tech>1, 技术水平一定程度上进步。继续分解 Effch 指数，得出纯技术效率 (Pech) 和规模效率 (Sech)。

(三) 指标选取

在我国统计年鉴中并没有专门“物流业”的直接数据，借鉴已有研究，选取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来代表物流业的整体发展。

(1) 投入变量选择

劳动力投入：现阶段物流业依旧是劳动密集型行业，用物流业从业人员数作为劳动力投入指标，选取《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河北统计年鉴》中 13 个城市的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从业人数的统计数据。

资本投入：龚雪^[8]、刘华军等^[11]在其研究中选取用固定资产投资代替资本存量作为资本投入量，本文在研究时借鉴这一方法，三省份的 13 个城市统计年鉴的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的固定资产投资作为资本存量的替代，并以 2013 年作为基期，对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的固定资产投资进行平减。

基础设施投入：公路里程作为物流业基础设施建设最重要的角色，指的是用于物流运输的公路实际长度，本文选取京津冀 13 个城市的统计年鉴中公路里程数的统计数据。

(2) 产出变量选择

经济产出：反映的是物流业发展中的经济效益，用物流业增加值来表示经济产出指标，选取 13 个城市统计年鉴以及统计公报中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增加值的统计数据。

规模产出：反映的是物流业中的活动规模，本文用货运量来表示规模产出指标，选取 13 个城市统计年鉴以及统计公报中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增加值的统计数据。

表 1 京津冀城市群物流业效率投入-产出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投入	劳动力投入	物流业从业人员数
	资本投入	物流业固定资产投资额
	基础设施投入	公路里程
产出	经济产出	物流业增加值
	规模产出	货运量

三、京津冀物流业效率测度分析

1、京津冀物流业效率静态分析

根据 Dearun 软件运用超效率 SBM 模型，对 2013-2022 年京津冀城市群的物流业效率进行了静态分析，结果如表 3 所示。

表 3 2013—2022 年京津冀地区城市群物流业效率

地区\年份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均值
北京市	0.452	0.460	0.459	0.459	0.456	0.453	0.452	0.448	0.460	0.450	0.455
天津市	0.796	0.839	0.751	0.741	0.772	0.829	0.809	0.783	1.088	0.939	0.834
石家庄市	0.741	0.713	0.801	0.710	0.905	0.941	0.847	0.753	0.728	0.714	0.785
唐山市	1.037	1.017	0.971	1.008	0.982	0.975	0.967	0.959	1.014	1.069	1.000
秦皇岛市	1.005	0.890	0.876	0.874	0.894	0.934	0.973	1.038	0.964	1.127	0.957

邯郸市	0.787	0.781	0.775	0.730	0.743	0.730	0.733	0.758	0.790	0.782	0.761
邢台市	0.774	0.745	0.862	0.878	0.927	1.009	0.927	0.939	1.001	0.933	0.899
保定市	0.681	0.631	0.613	0.622	0.632	0.643	0.655	0.615	0.620	0.648	0.636
张家口市	0.640	0.633	0.614	0.609	0.628	0.628	0.623	0.621	0.612	0.629	0.624
承德市	0.569	0.574	0.569	0.567	0.574	0.574	0.571	0.570	0.572	0.570	0.571
沧州市	1.056	1.007	0.981	0.978	1.001	1.003	0.985	0.909	1.005	1.010	0.993
廊坊市	1.019	0.938	0.899	0.883	0.703	0.821	0.856	0.877	0.717	0.717	0.843
衡水市	1.021	0.984	0.958	0.946	0.945	0.962	1.006	1.003	1.000	1.010	0.983
均值	0.814	0.785	0.779	0.769	0.782	0.808	0.800	0.790	0.813	0.815	0.796

从表 3 可以看出, 京津冀城市群物流业效率均值在 2013-2022 年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波动的形式。在 2021 年达到最大值 0.815。京津冀城市群的综合物流业效率均值为 0.796, 综合物流业效率最高的城市是最低的城市的 2.2 倍, 说明其总体物流业效率水平较低, 区域间差异很大。其中, 只有唐山市的综合物流业效率达到了 1, 处在前沿面上, 达到了有效水平, 说明无论在技术上还是规模上, 唐山市的资源利用都达到了最优, 即投入合理、产出效率实现了最大化。其余 12 个城市综合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均小于 1, 未达到有效水平, 还存在着较大的进步空间, 可以在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上进行改进和提高。

2、京津冀物流业效率动态分析

使用超效率-SBM 模型测算所得出来的结果是静态的效率值, 本文采取的是不同年份不同城市的指标数据, 只用这个模型, 无法测量出动态效率。所以采用 Malmquist 指数对京津冀城市群的效率值变动情况进行更加全面的分析。利用 Dearun3.2 软件测算京津冀城市群 2013-2022 年物流业全要素生产率指数, 结果如表 4、表 5 所示。

表 4 2013-2022 年京津冀地区分年份物流业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及分解

年份	Effch	Techch	Pech	Sech	Tfpch
2013-2014	1.021	0.945	1.061	0.963	0.942
2014-2015	1.108	0.927	1.045	1.057	0.984
2015-2016	0.997	0.971	0.973	1.023	0.964
2016-2017	0.853	1.329	0.970	0.889	1.074
2017-2018	0.984	1.049	1.039	0.961	1.032
2018-2019	0.946	1.053	1.002	0.944	0.994
2019-2020	1.357	0.732	1.086	1.254	0.941
2020-2021	0.979	1.072	0.930	1.080	1.052
2021-2022	0.968	1.081	0.982	0.986	1.052
均值	1.024	1.018	1.010	1.017	1.004

表 5 2013-2022 年京津冀地区分城市物流业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及分解

城市	Effch	Techch	Pech	Sech	Tfpch
北京市	1.012	1.005	0.998	1.002	0.979
天津市	1.013	1.012	1.018	0.998	1.027
石家庄市	1.054	0.992	1.075	0.981	1.049
唐山市	1.012	0.989	1.005	1.009	1.000
秦皇岛市	1.072	1.119	1.039	1.028	1.088
邯郸市	1.003	1.009	1.034	0.981	0.981
邢台市	1.225	1.020	1.007	1.187	1.012
保定市	0.990	0.997	0.999	0.992	0.981

张家口市	1.016	1.012	1.007	1.010	1.020
承德市	0.983	1.000	1.012	0.974	0.968
沧州市	0.990	1.013	0.988	1.002	1.003
廊坊市	0.918	1.066	0.950	1.041	0.948
衡水市	1.019	0.996	0.997	1.022	0.995
均值	1.024	1.018	1.010	1.017	1.004

根据 Malmquist 指数计算结果及分析可知, 从整体来看, 京津冀城市群物流业效率年均增长 0.4%。从表 4 可以观察到出, 技术效率、技术进步、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值分别为 1.024、1.018、1.010、1.017, 数值都大于 1, 都在以不同的速度增长。并且技术效率以年平均增长率 2.4% 的速度提升, 这表明, 对于京津冀城市群物流业效率提高, 技术效率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从表 4 中可以看出, 技术进步指数在研究年份内波动幅度最大。在 2016-2017 年技术进步指数达到最大值, 增长幅度最大, 这说明京津冀城市群对物流业的综合管理和技术水平差距很大, 对经济有一定影响。技术效率在 2013-2015 年和 2019-2020 年效率指数大于 1, 其余年份均小于 1, 说明这期间, 研究区物流业的实际的产出水平达到最优水平, 其余年份均有很大的差距。纯技术效率在 2015-2017 和 2020-2022 年指数小于 1 之外, 其余年份均大于 1, 说明京津冀地区对物流业的综合管理和技术水平差距很大, 对经济有一定影响。规模效率指数变化不大, 在 2016-2017 年达到最低值 0.893, 对研究期内规模效率指数没有达到有效水平有一定的影响, 说明物流业的规模因素对效率的影响很大, 要扩大物流业的发展规模。

从地区来看, 京津冀城市群物流业效率均值为 1.004, 指数大于 1, 显然京津冀地区在研究期内物流业效率值处于增长的态势。分析表 5 可知, 京津冀城市群, 天津、石家庄、唐山、秦皇岛、邢台、张家口、沧州和衡水的物流业效率指数都大于 1, 处于增长趋势。而北京、邯郸、保定、承德、廊坊和衡水的物流业效率指数小于 1, 处于下降趋势。究其原因, 北京、衡水主要是由于纯技术效率值较低; 邯郸、承德主要是由于规模效率指数较低; 保定、廊坊主要是由于技术效率指数较低, 这使得物流业效率处于下降的趋势。综上所述, 造成效率下降的原因是物流技术水平低、物流业规模较小和物流设施、装备落后造成的。就近些年表现来看, 京津冀地区物流业效率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四、结论与建议

1、结论

本文运用超效率-SBM 模型和 Malmquist 指数模型对京津冀城市群 2013-2022 年物流业效率从静态和动态两个视角进行测度, 运用全局空间自相关方法检验相关性并运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对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表明: (1) 静态视角: 根据超效率-SBM 模型测算结果可知, 京津冀地区 2013-2022 年物流业效率总体效率值小于 1 没有达到有效水平; 从区域来看, 京津冀 13 个城市均没有达到有效水平, 说明研究区物流业效率值与生产前沿面仍有一定差距。(2) 动态视角, 根据 Malmquist 指数测算结果可知, 京津冀地区 2013-2022 年物流业效率指数小于 1, 在以不同的速度下降。从区域整体来看, 京津冀地区物流业效率的年均下降 1.5%, 纯技术效率是其降低的主要原因。从地区来看, 北京市、天津市、秦皇岛市、邯郸市、保定市、承德市、廊坊市和衡水市物流业效率值在降低以外, 其余地区物流业效率指数都在以不同的速度增长。

2、建议

(1) 加强物流基础设施建设。京津冀区域物流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 特别是公路、铁路、水路、航空等物流基础设施还不够完善, 严重影响了区域内运作效率。在此基础上, 还应加强各种交通工具之间的协作与合作, 使之成为一种有效的交通方式, 从而提高我国物流水平。

(2) 加强物流技术创新和区域合作, 弱化物流“马太效应”。京津冀城市群整体的技术进步指数呈现增长的趋势, 但分城市来看, 部分地区技术存在衰退的现象。为此, 应加大物流科技创新与研究开发力度, 提升资源利用效率, 强化市场竞争, 推动物流产业的转型升级。在此基础上, 通过强化区域合作, 推进交通枢纽设施的共建与共享, 促进各地区间先进物流技术的合理流通与信息交换, 利用“溢出效应”与“分工效应”, 使区域内的物流技术差逐渐趋同, 达到协同发展的目的。

(3) 加强京津冀协同发展策略。从物流业综合效率来看, 京津冀城市群的物流业效率值存在很大的差距。尤其北京地区, 投入过度, 产出没有达到最优水平, 造成资源浪费。要加强对区域物流协调发展的整体规划, 促进物流空间布局规划的合理衔接, 构建综合交通网络, 健全物流走廊。在此基础上, 通过建立新的物流网络, 来实现对区域经济的有效整合。

(4) 政府制定相关的政策。京津冀区域间的政策协同机制,就是要充分利用区域各自的优势和已有的资源,从而达到优势互补、互惠互利的目的。在此基础上,京津冀城市群应进一步加强联系和合作,制订区域性的物流政策,保证物流的整合。

参考文献:

- [1] 李妍,孙振清.碳排放约束下我国物流业运行效率测算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商业经济研究,2021(08):75-78.
- [2] 连兆大,程德通.基于 DEA 模型的“一带一路”重点省份物流效率分析[J].商业经济研究,2017(04):80-82.
- [3] 王琴梅,谭翠娥.对西安市物流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基于 DEA 模型和 Tobit 回归模型的分析[J].软科学,2013,27(05):70-74.
- [4] 龚雪,荆林波.基于 DEA-Malmquist 模型的中国省域物流效率研究——来自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9,40(05):60-69.
- [5] Tone K.A slacks-based measure of efficiency in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J]. 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2001,130(3):498-509.
- [6] 秦雯,倪容.科技创新对珠江西岸物流产业效率的影响——基于超效率三阶段数据包络分析模型[J].科技管理研究,2022,42(20):89-95.
- [7] 刘承良,管明明.低碳约束下中国物流业效率的空间演化及影响因素[J].地理科学,2017,37(12):1805-1814.
- [8] 龚雪.区域物流效率测度及影响因素分析[J].统计与决策,2022,38(12):112-116.
- [9] 何家琪,王敏,邓梦华,等.长江经济带港口生态效率测度及动态研究——基于非期望产出的 SBM-Malmquist 模型[J].环境科学与管理,2023,48(05):21-26.
- [10] 唐唯.农村人口老龄化对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研究——以长江经济带为例[J].安徽农业科学,2024,52(09):182-186.
- [11] 刘华军,郭立祥,乔列成,等.中国物流业效率的时空格局及动态演进[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1,38(05):57-74.
- [12] 王青,金春.中国城市群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的定量测度[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8,35(11):77-94.

Research on the Efficiency Measurement of Logistics Industry in Beijing-Tianjin-Hebei Urban Agglomeration

Hou Ti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ohhot,
Inner Mongolia 010010*

Abstract: The panel data of 13 cities in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urban agglomeration from 2013 to 2022 are selected, and the efficiency of the logistics industry in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urban agglomeration is measured from static and dynamic perspectives using the super-efficiency-SBM model and the Malmquist index model. The results show that: ① The static efficiency of the logistics industry in Beijing-Tianjin-Hebei is generally low and has not reached an effective level. ② The dynamic efficiency of the logistics industry in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urban agglomeration has increased by 0.4% annually, and technical efficiency is the main reason for its increase. ③ Propose suggestions on strengthening logistics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logistics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regional cooperation, Beijing-Tianjin-Hebei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government formulation of relevant policies.

Keywords: Beijing-Tianjin-Hebei urban agglomeration, logistics industry efficiency, super efficiency-SBM model, Malmquist index model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2.538

言语行为对人物动机及态度的构建机制

——以音乐剧《欢乐岁月》为例

刘奕奕¹

(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60)

摘要: 聚焦于言语行为理论在音乐剧《欢乐岁月》对话与歌词中的应用, 深入探究言语行为对人物动机及态度的构建机制。研究采用文本分析法, 细致剖析剧中人物言语。通过解析格西·卡内基的言外行为, 揭示其如何展现人物动机并推动情节, 探究言语背后的深层意图。同时, 研究玛丽·弗林的言后行为, 探究其如何反映人物态度及人物间关系变化。研究发现, 不同类型言语行为精准勾勒出人物动机与态度, 在塑造人物形象、推进故事叙事中发挥关键作用。

关键词: 《欢乐岁月》; 言语行为理论; 言外行为; 言后行为; 语用学

一、导言

(一) 言语行为理论

言语行为是说话者实施的一种交际行为, 言语行为理论最早由英国哲学家奥斯汀 (J.L. Austin) 在其影响深远的著作《如何用语言做事》 (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 (1962) 中系统阐述。人们在说话时, 会同时发生三种言语行为, 即言内行为 (locutionary act) 、言外行为 (illocutionary act) 和言后行为 (perlocutionary act) 。

1、言内行为: 指说出词、短语和分句的行为, 它是通过句法、词汇和音位来表达字面意义的行为 (奥斯汀, 1962) 。

2、言外行为: 是表达说话者的意图的行为, 它是在说某些话时所实施的行为 (奥斯汀, 1962) 。

3、言后行为: 是通过讲某些话所完成或导致的行为, 它是话语所产生的后果或所引起的变化 (奥斯汀, 1962) 。

这一理论被广泛应用于电影、电视剧和戏剧中的对话分析, 如《冰雪奇缘 1》 (许曼萍, 2020) 、《绝望的主妇》 (陈春, 2013) 和《麦克白》 (田俊武, 2007) 。这些分析有助于阐明剧情故事中的人物特点和人物关系, 帮助观众理解对话的隐含意义。音乐剧中的对白和歌词同样蕴含着丰富的言语行为, 国外学者便分析了著名音乐剧电影《音乐之声》中主要角色的言语行为类型及其效果 (Munawwir Hadiwijaya, 2017) , 但该方面的研究在国内相对较少, 且鲜少有研究涉及言语行为对人物动机及态度的建构机制, 因此, 对音乐剧《欢乐岁月》中的言语行为进行探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二) 《欢乐岁月》

音乐剧《欢乐岁月》 (Merrily We Roll Along) 由作曲大师斯蒂芬·桑德海姆 (Stephen Sondheim) 创作, 荣获第 77 届托尼奖“最佳音乐剧复排”奖。该剧以时间倒序的方式讲述了三个好友的生活, 探讨了他们在追

[作者简介]

[1]刘奕奕 (2004—), 女, 湖北武汉人, 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本科生。

逐梦想的过程中所做的不同选择与付出的代价。然而，这种特殊叙事致使剧中台词与歌词在表意上有时较为隐晦，初次接触的观众往往难以把握，易产生情节曲折繁杂之感。

本文以该音乐剧为研究对象，深入剖析剧中人物的言外行为，揭示其如何展现人物动机并推动情节的演进；同时探讨言后行为如何直观体现人物态度，进而助力观众清晰理解人物关系和故事情节，为音乐剧的赏析提供全新视角。

二、言外行为详细分析

(一) 言外行为

言外行为是在说话时所实施的行为。通过分析话语中隐藏的言外行为，观众可以更好地理解说话者的动机和意图。美国哲学家、语言学家约翰·塞尔（John Searle）曾将言外行为分为五种一般类型，每一类中的行为都有同样的目的，但具有同样目的的言外行为可能具有不同程度的言外之力。

- 1、阐述类：陈述或描述说话者认为是真实的情况（塞尔，1969）。
- 2、指令类：旨在说服受众采取行动的指示、命令或建议（塞尔，1975）。
- 3、承诺类：说话者自己承诺未来要有一些行为（塞尔，1979）。
- 4、表达类：表达说话者情感或态度的语句（塞尔，1979）。
- 5、宣告类：通过话语改变外部世界的声明（奥斯汀，1962）。

(二) 对格西·卡内基台词的分析

在音乐剧中，格西·卡内基对弗兰克的劝说和诱惑在塑造弗兰克的人生历程和推动整个故事情节发展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她妩媚的性格和迷人的形象将弗兰克带入了一个浪漫和刺激的世界，使他远离了更加实际和脚踏实地的愿望。随着故事的发展，这种关系导致弗兰克做出了一些选择，最终使他偏离了原来的职业道路，走向了充满不确定性和遗憾的人生。从叙事的角度来看，格西对弗兰克的影响是情节发展的核心推动力，而深入理解她的言语行为对于把握她的动机至关重要。

在接下来的段落中，我将分析古西在《幽浮怪》（The Blob）和《成长》（Growing Up）中的台词，以说明她的言外行为是如何反映人物动机并影响情节发展的。

1、GUSSIE: Oh, no. I'm going to open my veins.

(GUSSIE turns to find JOE)

Joe. Joe. Hurry up. We have a gigantic catastrophe.

(To BETH)

Oh, this is scandalous.

(JOE leaves a Group, crossing over, leaning in to kiss GUSSIE'S cheek. She pulls away in irritation)

Joe, take this gorgeous person up to my closet and she is going to choose some rag of mine.
Move, Joe, please. I am paralyzed with shame.

(译文) 格西：哦，不要啊。我真该割腕自尽。

(格西转身去寻找乔伊)

乔，乔！快来。我们遭遇大灾难了。

(对贝丝)

哦，这太糗了。

(乔伊离开了一群人，走过去，俯身亲吻格西的脸颊。她恼怒地推开了乔伊)

乔，带这位漂亮的女士去我的更衣室，让她从我的那些破布里挑点衣服。去啊，乔，
麻烦你了。我真要被羞愧压垮了。

这一幕发生在格西为弗兰克举办的派对上，弗兰克向古西介绍了他的妻子贝丝，但格西似乎对贝丝毫无兴趣，还不小心把酒洒在了贝丝的裙子上。她于是说道“我真该割腕自尽”“我真要被羞愧压垮了”，这几句话的言外行为明显并非阐述事实，而是表达态度，旨在强调格西的感受和情绪。她并不是真的被压垮了，也不是要去割腕自尽，而是通过夸张的手法表达她对贝丝的歉意并且渴望得到谅解。她的动机在于在贝丝面前展现出表面的礼貌和真诚，从而使贝丝放松警惕，以便自己能够与弗兰克单独聊天，进而充分地利用弗兰克，将他引入自己设定的圈套。这种夸张的表达方式不仅增强了这一时刻的戏剧性，还让观众得以窥见格西性格中虚伪的一面。

“乔，乔，快点。我们遭遇大灾难了”这句话的言外行为也不是在阐述他们所面临的困境，而是在对丈夫乔伊下达命令。她的动机是想让乔伊帮她处理掉贝丝这个“麻烦”，从而为她和弗兰克创造独处的机会。然而，乔伊的反应显然未能满足她的期望，因为他没有按照她的意图去处理贝丝的问题，而是吻了格西，这种不恰当的言后行为让格西恼羞成怒，于是她更直接地重述了自己的请求，这进一步表明了她急切地想要摆脱乔伊和贝丝，以便与弗兰克单独相处的强烈动机。

2、GUSSIE: Life is knowing what you want, darling,

That's the thing you have to know.

.....

Growing up,

You hate the delay,

But after today,

You'll be on your way.

So what do you say?...

Hmmm?

(译文) 格西: 生活就是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亲爱的,
这是你必须知道的。

.....

成长

你痛恨迟迟不能出发,

但今日之后,

你将踏上通往成功的征途。

所以, 你说呢?

嗯?

这是歌曲《成长》中的歌词, 当时格西和弗兰克独处在暖房里, 她试图说服他制作一部快速、响亮、搞笑的百老汇名曲, 以赚取更多的钱。她首先用了一个自信的句子“生活就是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亲爱的”来说明了解自己和自己的欲望的重要性。这一话语的言外行为是为了揭露弗兰克内心急功近利的欲望, 让他有一个清晰的自我认知, 并以她为榜样, 发自内心地想要靠近她, 并帮助她创作符合大众审美的热剧。随后, 她承诺相信弗兰克的能力和潜力, 并说: “但今日之后, 你将踏上通往成功的征途”, 她的这一暗示行为表明了她支持弗兰克成长的决心, 并引导弗兰克信任她。然后, 她用询问弗兰克意见的方式让他更多地参与进来, 并推动他自愿做出决定。这些言语行为相互配合, 对弗兰克产生了强烈的情感冲击。正是通过这些话语, 弗兰克感受到了温暖和力量, 最终导致他在情节的关键时刻做出了“成长”的痛苦决定。因此, 格西的言语行为对叙事弧线的形成和弗兰克的性格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言后行为详细分析

(一) 言后行为

在言语交际的动态过程中, 话语的生成必然会引发相应的效应, 此即言语行为理论中的言后行为。从语用学的视角出发, 言后行为体现的是说话者说出话语后在听话者一方所产生的实际影响与结果。在常规情境下, 听话者凭借自身的语言理解能力和语用知识储备, 能够较为准确地领会说话者的意图, 并做出与之适配的回应。这种适配的回应既可以是言语层面的直接反馈, 也可以是通过肢体语言、表情等非言语方式传达的间接信号。

然而, 在复杂的人际交往场景中, 听话者受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 可能无法给出符合说话者预期的回应。这些影响因素涵盖了文化背景的差异、个人情感的波动、认知水平的局限以及当下语境的制约等多个维度。当听话者未能做出正确回应时, 其回应方式与说话者期望之间的偏差, 便成为了一种极具价值的分析线索, 能够直观地映射出听话者对说话者的态度。这种态度可能包含尊重、认同、漠视、抵触等多种复杂情感, 而言后行为正是揭示这些潜在态度的关键切入点, 为深入理解人物之间的关系和交际意图提供了有力依据。

(二) 对玛丽·弗林台词的分析

近二十年来, 玛丽·弗林一直深爱着弗兰克。然而, 当弗兰克忘记了自己的初衷, 坠入名利的深渊时,

她对弗兰克的态度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爱变成了厌恶。而这种态度的转变，从她对弗兰克和其他人物的言语所做出的反应，即言后行为中不难看出。

下面选取了《我们的时代》(Our Time) 和《那个弗兰克》(That Frank) 中的两段对话，分析玛丽的言后行为如何反映她对弗兰克态度的变化。

1、MARY: Are you the one playing the piano the last two days?

FRANK: (To CHARLEY) We're evicted.

MARY: Oh, no. You're wonderful. Sincerely wonderful.

FRANK: I'm sincerely grateful.

MARY: I even came up here on the roof to hear you better.

(译文) 玛丽：这两天是你在弹钢琴吗？

弗兰克：（对查理）我们被赶出来了。

玛丽：哦，不。你太棒了。真的很棒。

弗兰克：衷心感谢。

玛丽：为了听得更清楚，我甚至跑到屋顶上来了。

这一幕发生在玛丽、弗兰克和查理初次见面时。玛丽被音乐吸引，问弗兰克是不是钢琴家。弗兰克没有肯定地回答，而是用“我们被赶出来了”这样谦虚幽默的语气来表达他希望自己的行为没有打扰到玛丽，并试探她的真实意图和态度。玛丽非常欣赏他的音乐，当即否定了他的道歉，表示自己对音乐和他的喜爱和赞赏。她不想被人误解，也不想让弗兰克怀疑自己的音乐才华，所以她对弗兰克的话做出了讨好他的言后行为，这表明她当时对弗兰克的态度显然是欣赏的。

2、FRANK: Oh, Meg, this is Mary Flynn. Mary is my deepest, closest, best friend in all the world. We go way back.

MARY: But seldom forward.

MEG: Actually, Franklin gave me the novel you wrote and I read it over and over.

MARY: Didn't you get it the first time?

FRANK: Hey, gang, we got this orchestra and dancing inside.

(Loudly, to the GUESTS)

(译文) 弗兰克：哦，梅格，这是玛丽·弗林，是我在世界上最长久、最亲密、最好的朋友。我们的友谊追溯到很久以前。

玛丽：但很少向前。

梅格：事实上，弗兰克林把你写的小说给了我，我读了一遍又一遍。

玛丽：你第一次是没听懂吗？

弗兰克：嘿，伙计们，我们有舞蹈和管弦乐队在里面呢。（大声对来宾说）

此时，玛丽已经厌倦了等待，她认定弗兰克不会改变主意，重新开始创作音乐了。看着弗兰克在自己的派对上大受欢迎，她独自喝起酒来。弗兰克向梅格介绍玛丽时说他们是老交情，意思是他们的友谊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这个言外行为是让她们互相认识并交朋友，证明自己的人缘与才华。然而，对弗兰克感到失望的玛丽并不想满足他的要求，也不想给弗兰克他想要的言后行为。相反，她用冷漠的语气说“但很少向前”，以表示她对弗兰克的失望，驳回了他的面子，表明这时他们的关系已经破裂。

玛丽也不喜欢梅格，因为她是个为了成为电影新星而不择手段，企图勾搭弗兰克的女人。所以，当梅格说她一遍又一遍地品读玛丽的小说时，她的言外行为表面是为了表示对玛丽的欣赏，其实是为了在弗兰克面前留下随和好印象。按理说，玛丽应该向梅格表达谢意才对，可她却故意曲解梅格的意思，完全不给梅格面子，表现出不屑一顾的样子。看到这种尴尬的局面，弗兰克只好说管弦乐队和舞蹈都在里面，转移了话题避免了尴尬再度升级。

1、MARY: Don't you know that in this joint you must never, ever mention the name — (Shouts) CHARLES KRINGAS!

FRANK: (Crossing to her) Mary.

MARY: (Ignoring him, loudly) See, Charley, Frank and I once were these devoted, inseparable friends.

GUSSIE: Would anyone care to come inside?

MARY: Up until that famous television interview when Charley, in front

of—

FRANK: Mary, goddamn it, that's enough.

(译文) 玛丽: 你难道不知道, 在这个地方, 你永远永远都不能提到这个名字——(大喊) 查尔斯·克林斯!

弗兰克: (向她走去) 玛丽!

玛丽: (不理他, 大声说) 瞧, 查理, 弗兰克和我曾经是这样忠实、形影不离的朋友

格西: 有人愿意进屋吗?

玛丽: 直到那次著名的电视采访, 查理当着全国观众的面——

弗兰克: 玛丽! 该死的, 够了!

在这个场景中, 弗兰克和查尔斯的友谊已经破裂。然而, 玛丽坚持要提及查尔斯的名字和他们过去的往事, 希望弗兰克能回忆起他们过去的美好时光, 重新拾起他的梦想。然而, 弗兰克和他的新婚妻子格西试图阻止她。弗兰克大叫着玛丽的名字, 其言外行为是命令玛丽停下来, 而格西说的“有人愿意进屋吗”的言外行为是邀请其他客人进屋, 让玛丽独自一人静静, 停止自己的冒昧打扰。然而, 玛丽并没有理会他们, 而是继续讲话。这个言后行为表现了她对现在的弗兰克的蔑视, 以及对过去他们三人是好朋友的日子的怀念。

四、结论

在音乐剧《欢乐岁月》的叙事体系中, 言语行为对于情节推进与人物形象塑造起着不可或缺的支柱性作用。从语用学视角深入剖析该剧人物的言语行为, 能够为理解人物的内在动机、情感世界和态度倾向提供关键线索, 进而揭示其对情节构建的深层次影响。

言外行为作为言语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揭示人物动机层面展现出高度的精准性。以剧中格西·卡内基对弗兰克的言语劝诱为例, 她在特定场景下的话语表面传达一种意思, 但其背后隐藏的言外之意却巧妙地揭示了她试图将弗兰克引入特定情境、改变其人生轨迹的动机。这种动机驱动着人物的行动, 成为推动情节发展的核心力量。不同的言外行为交织在一起, 共同编织起情节发展的脉络, 使得故事在人物动机的相互作用下不断演进。

言后行为则在反映人物态度和揭示人物关系复杂性方面扮演着关键角色。玛丽·弗林在不同阶段对弗兰克言语的回应所产生的言后行为, 直观地呈现了她对弗兰克态度的转变过程, 从最初的欣赏逐渐演变为失望与厌恶。同时, 这些言后行为也映射出人物之间关系的动态变化, 如她与弗兰克、梅格等人之间微妙而复杂的情感纠葛。通过对言后行为的细致分析, 观众能够更加深刻地洞察人物关系的本质和演变逻辑。

尽管在实际的言语交际过程中, 情感因素时常干扰理性判断, 使得言语行为的解读变得复杂, 但只要我们敏锐捕捉并深入分析这些言语细节, 就能解锁音乐剧文本背后更为丰富的内涵。这种对言语行为的深度剖析不仅能够极大地提升观众观看音乐剧时的体验, 使其更具吸引力和洞察力, 还能让观众宛如身临其境, 真切地“听到”人物之间细腻的情感交流, 深切体会到音乐剧台词所蕴含的微妙魅力, 进而对音乐剧的艺术价值有更为全面和深刻的理解。

参考文献:

- [1] Austin, J.L. *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 [2] George Yule. *Pragmatic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 [3] Heba Ahmad Khater, Abdel Rahman Mitib Altakhaineh & Farah Dahnous. Pragmatic analysis of King Abdullah's speech: exploring speech acts and societal context [J]. *Cogent Arts & Humanities*. Volume 11, Issue 1. 2024.
- [4] John R. Searle, Ferenc Kiefer & Manfred Bierwisch. *Speech Act Theory and Pragmatics*[M]. Springer Dordrecht, 1980.
- [5] Munawwir Hadiwijaya. Speech Acts in Musical Movie “The Sound of Music”[J]. *Jurnal Filsafat, Sains, Teknologi, dan Sosial Budaya*, 2017, Volume 23.
- [6] 卜丹旎. 言语行为理论视角下《雷雨》王佐良英译本研究[J]. 海外英语, 2025(2):14-16,26.
- [7] 陈春.从语用学角度赏析美剧《绝望主妇》的经典对白[J]. 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3,26(04):59-61.

- [8] 陈佑林, 何举纯. 普通语言学概论[M].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11 (2024.7 重印) .
- [9] 付佳. 象似性视角下的戏剧对话语用研究[D]. 广西民族大学, 2024.
- [10] 高攀. 合作原则和面子理论视角下美剧人物对白的会话含义研究[D]. 西南石油大学, 2017.
- [11] 黄萍. 意向性·言语行为·目的原则[J]. 外语学刊, 2009, (04):69-72.
- [12] 黄倩. 从语用学的角度探析情景喜剧中的幽默言语[D]. 曲阜师范大学, 2012.
- [13] 梁艺欣. 电影《怪兽大学》中的言语行为[J].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33(04):99-101.
- [14] 史春颖. 言语行为视角下的《西雅图未眠夜》的台词分析[J]. 青年文学家, 2015,(03):130.
- [15] 宋延媛. 不同人际关系制约下的冲突性话语研究[D]. 四川师范大学, 2013.
- [16] 田俊武, 孙晶晶. 从语用的角度看《麦克白》中的人物对话[J]. 戏剧文学, 2007, (04):46-50.DOI:10.14043/j.cnki.xjwx.2007.04.010.
- [17] 许曼萍, 马炳军. 基于语用视角的言语行为研究——以《冰雪奇缘 1》为例[J]. 滁州学院学报, 2020,22(03):46-49.
- [18] 杨乐然, 周锁英. 语用学视角下析影视语言的言语行为[J]. 电影文学, 2011, (02):37-38.
- [19] 尹迪. 论桑德海姆音乐剧创作中的潜台词观念[J]. 音乐艺术(上海音乐学院学报), 2013, (02): 143-149+5.DOI:10.19359/j.cn31-1004/j.2013.02.014.
- [20] 赵娜. 语用学视域下的高中戏剧教学策略研究[D]. 五邑大学, 2023.

The Mechanism of Speech Act Theory on the Construction of Characters' Motivation and Attitude in Musical *Merrily We Roll Along*

Liu Yiy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60

Abstract: Focusing on the application of speech act theory in the dialogues and lyrics of the musical *Merrily We Roll Along*, the study explores in depth the mechanism of constructing characters' motivations and attitudes by speech acts. The study adopts the textual analysis method to carefully analyze the characters' speech in the play. By analyzing Gussie Carnegie's extra-verbal behavior, it reveals how speech act shows the character's motivation and pushes the plot forward, and explores the deeper intentions behind the words. At the same time, Mary Flynn's post-speech behavior is studied to explore how it reflects the characters' attitudes and changes in their relationships. It is found that different types of speech acts accurately outline the characters' motives and attitudes, and play a key role in shaping the characters and advancing the story narrative.

Keywords: *Merrily we Roll Along*; speech act theory; illocutionary act; perlocutionary act; pragmatics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2.547

《饥饿的路》中的非洲女性困境

蓝婷¹

(¹四川外国语大学, 重庆 400031)

摘要: 本·奥克瑞的布克奖获奖小说《饥饿的路》通过魔幻现实主义叙事, 以约鲁巴文化中的阿比库鬼孩传说为基点, 揭示了后殖民时期尼日利亚社会转型中非洲女性面临的交叉性压迫。研究聚焦小说中母亲与蔻朵大婶等女性形象, 将非洲本土女性主义理论与生殖正义学说、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相融合, 指出蔻朵大婶的经济突围与母亲的有限反抗构成了非洲女性主体性建构的辩证图景。通过约鲁巴学者奥耶武米的文化特殊性理论, 论证当代未婚生育污名实为前殖民时期母系传统遭遇现代性侵蚀的症候, 挑战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普适性预设。

关键词: 母职规训; 生殖正义; 交叉性压迫

1. 引言

作为当代非洲文学在后殖民语境下的重要突破, 本·奥克瑞 (Ben Okri, 1959-) 的布克奖获奖作品《饥饿的路》(1991) 以非洲本土的"阿比库" (Abiku) 鬼孩传说为叙事支点, 构建了一个交织着约鲁巴宇宙观与现代性批判的寓言世界。这部与《迷魂之歌》《无尽的财富》并称"阿比库三部曲"的魔幻现实主义经典, 通过幽灵叙事者阿扎罗的视角, 折射出后殖民时期尼日利亚社会转型中的多重困境。小说中女性角色在生存、生育与生产维度的命运轨迹, 恰似一面棱镜, 将非洲大陆现代化进程中的性别政治问题分解为光谱式的存在论危机。

国际学界对奥克瑞创作的研究已形成多维阐释体系。阿托·夸伊森 (Ato Quayson, 1997) 开创性地揭示了小说对非洲口头传统与西方现代叙事的辩证融合, 指出其"通过幽灵叙事解构殖民现代性的认识论暴力"的文本策略。这种批判视角在后续研究中得到延伸: 詹姆斯 (2007) 关注小说中的城市空间政治, 恩瓦帕 (2012) 则从生态女性主义角度解读自然书写。值得注意的是, 西方学界对作品中性别问题的讨论多集中于母性神话的解构 (Nnolim, 2005), 而较少触及劳动异化与生殖正义等交叉性议题。

中国对奥克瑞的接受史呈现出明显的代际差异。瞿世镜 (1997) 最早将其定位为"非洲后现代小说的开拓者", 但此后十余年间研究几近停滞。2009年后, 以朱振武团队为代表的学者重启研究, 运用后殖民理论解析小说中的文化身份问题, 提出"第三空间"理论框架下的非洲书写范式 (朱振武、韩文婷, 2017)。近五年研究焦点转向叙事诗学, 彭玲 (2020) 的魔幻现实主义研究虽具突破性, 却仍未触及文本深层的性别政治维度。这种研究空白与非洲本土批评形成鲜明对照——尼日利亚女性主义学者已开始重审奥克瑞创作中的性别表征 (Ogundipe-Leslie, 2018), 揭示其叙事中潜藏的父权制批判。

本研究具有双重学术价值: 在实践层面, 通过性别视角的介入, 重新发现《饥饿的路》中被叙事迷雾遮蔽的女性抗争话语, 为尼日利亚文学研究提供新的解码路径; 在理论层面, 借助非洲本土学者奥耶武米 (Oyewùmí, 2018) 的约鲁巴女性主义学说, 建构兼顾文化特殊性与理论批判性的分析模型, 推动中国学界对非洲英语文学的研究走向本体论层面的深度对话。

[作者简介]

蓝婷 (1999-), 女, 云南临沧人, 四川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非洲文学。

[基金项目]

2024年四川外国语大学一流学科和重点学科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 项目名称: 本·奥克瑞"阿比库三部曲"中女性形象的马克思主义转向 (项目编号: SISU2024XK082)

2.母职规训与生殖正义的缺失

2.1 作为社会义务的母职

《饥饿的路》在开篇就以一个不愿意降生到人间的鬼孩视角进行自述：“我们当中没有谁愿意降生到人世间。我们讨厌生存的残酷、无法实现的渴望、被奉为圭臬的人间不公、歧路交错的爱、父母的无知、走向死亡的事实，以及生者面对宇宙间质朴的美好事物时表现出的惊人的麻木。”（奥克瑞，1991：3）根据上世纪末的一篇报道，衰退中的非洲社会面临着逐年增高的儿童死亡率，特别是当母亲的主要收入来自非农业渠道时和生活在多成员家庭中，5岁以下儿童的死亡率更加凸显，暗示母职责任与生存资源的结构性矛盾。

非洲许多家庭中男女的结合主要是为了传宗接代，而非基于爱情。借由“人口资本”和“社会安全感”，家庭中可以通过多子多孙来增强其经济和社会地位。而对女性来说，这种高生育期望带来了巨大的困境，也让其沦为生物工具，使得女性的主体性在“社会安全感”的宏大叙事中被消解。劳雷塔（1988）指出，如果一个家庭没有子嗣，社会往往不会同情夫妻或女性的痛苦，反而会认为未出生的孩子在“哭嚎”，责备母亲没有“解救”他们，没能给她/他生命。情感上的孤立和被责备加剧了女性的痛苦，使得她们在婚姻和生育的决策中处于更加被动和受限制。

基于此，女性的生育不仅是个体选择的结果，更是面临社会责任。在非洲大陆上的众多国家、族群、团体秉持多生育主义的大背景下，阿扎罗一家却是典型的核心家庭模式，即一夫一妻一子，构成对传统生育主义的反叛。相较之下，阿扎罗的朋友埃德家的传统大家庭则暴露了性别权力的拓扑结构。一夫多妻制不仅是性别的压迫装置，更是劳动剥削的空间配置。女性在生产与再生产的双重系统中异化：既要承担田间劳作的经济生产，又需完成人口再生产的生物性使命。通过房间分配、食物配给等微观权力技术，拓扑结构将女性禁锢在从属位置。而母亲对独子阿扎罗生存的执着，暗含对生育主义逻辑的有限反抗，即通过精心养护独子来解构“多生育=高地位”的社会公式。

2.2 未婚生育污名化

在许多非洲社会，未婚生育的女性常常被视为不道德甚至不受欢迎的存在，这种污名化不仅仅是文化传统的产物，更深刻反映了殖民遗产和现代资本主义对生育的压迫。在小说中，蔻朵大婶作为一个非传统的女性，不仅是成功的商人和女性政治领导者，还承担着未来母亲的角色。即使拥有社会地位和影响力，可未婚生育仍然使她遭到社会的蔑视，酒铺里人们窃窃私语，谈论的都是她的私人生活。另一方面，在奥克瑞笔下，蔻朵大婶的外貌从一开始的“精明能干”逐渐变成“大腹便便”，腹中怀着“不肯降生的怪物”

（2003:315）。这样带有明显的污名化意味的形象，否定了蔻朵大婶前期的成就，使她在小说中看起来“不正常”。在非洲的社会中，类似的未婚生育不仅与个体道德有关，更是后殖民时期对生育的控制和现代人口政策的资本化体现。

在殖民遗产的影响下，女性的生育能力成了一种“资源”，用于巩固种族、阶级和性别结构。而在现代经济体制中，女性的生育行为往往与国家的人口政策挂钩，被看作是一个具有经济和社会价值的“资本”。在美国第三波女性主义浪潮中，生殖正义（Reproductive Justice）这一诉求格外显眼。人们呼吁生育权利与社会正义的交叉性，要求种族、阶级与性别压迫得到系统性消解。但在非洲大陆，这一概念遭遇了三重历史褶皱的撕裂。尼日利亚籍作家布奇·埃梅切塔（Buchi Emecheta）在《二等公民》（*Second Class Citizen*）中描绘的未婚母亲困境，也折射出殖民道德规训。

作为男性作家，奥克瑞的叙事视角折射出在非洲社会中的根深蒂固的传统性别观念，强化了女性在传统社会中生育角色的规范性，而蔻朵大婶的身份也被异化，成为“道德缺失”的形象。他的叙述传达了对未婚生育女性的道德审判，视其为偏离“正常”社会角色的存在。蔻朵大婶在小说中既展示了女性试图突破传统束缚、追求经济和社会独立的一面，也反映了她在这一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面临社会污名化和压制的挑战。人类学家奥耶隆克·奥耶武米 Oyeronke Oyewumi 关于约鲁巴社会前殖民时期母系继承制的研究显示，当代对未婚母亲的污名化实为父权制与殖民现代性共谋的产物。（2018:341）在提出她的论点时，奥耶武米引用了一系列的约鲁巴学者，诸如奠基人塞缪尔·约翰逊（《约鲁巴史》一书的作者），或是当代的约鲁巴历史学家、哲学家和语言学家。她称这些学者——通常是男性——为“性别支配者”，因为他们在约鲁巴社会中施加了性别等级制度，并与殖民机构和基督教传教团一起，共同构建了一个男权主导、女性从属的社会。

3. 交叉性压迫下的劳动异化

3.1 无偿家务劳动

尽管进入近现代社会，非洲绝大部分妇女的家务责任依然由传统社会结构决定，且这种无偿劳动通常是她们在出生之前便被内化的社会经验。在小说中，阿扎罗的母亲始终默默承担家庭运作的重担，从做饭、刷碗、洗衣，到细心照料儿子与丈夫，所有家务劳动均未得到任何形式的回报。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指出，生产和再生产的区分实质上是为资本主义服务的机制，女性的无偿劳动不仅保障了男性在外部市场的劳动力得以持续发挥，也使得女性的经济贡献在社会中被隐形化、贬低。正如希尔维亚·费代里奇 (Sylvia Federici) 所阐述，家庭中的再生产劳动（例如家务劳动和育儿）并未被资本主义经济承认，且不被视为“生产性”劳动，因此自然无法获得任何报酬（2012:33）。

随着家中的经济负担加重，阿扎罗的母亲尝试了小本经营。然而，当她走出丈夫说了算的家庭，前往集市上吆喝做买卖时，却因打手的骚扰而无法正常经营。作为象征公共领域的集市里依然是男性的天下，女性难以在其中实现真正的独立与自由。这一情节揭示了社会结构与资本主义经济秩序是围绕男性展开，即使女性在公共领域从事生产活动，她们也难以摆脱这种制度性的束缚。

3.2 有偿劳动的陷阱

作为女性独立经济活动的典型代表，蔻朵大婶无疑与传统家庭中的妇女截然不同。由于迟迟没有子嗣，蔻朵大婶较少受到母职规训的束缚。她率先投身商界，经营酒铺不仅为她提供了经济来源，也成为她在社会中权力关系的象征。酒铺内的顾客大多为男性，蔻朵大婶在这个小小的社会空间内拥有绝对的主导地位。表面上看，她似乎享有经济自由，并处于社会的高位，但实际上，她的权力仍然局限于特定的空间和经济活动范围内。

然而，作为女性经营者，蔻朵大婶时常面临男性顾客的骚扰、捣乱与拖欠账单等问题。为了维持生计，她从最初对男性顾客保持冷漠，到后来主动寻求有权势的政客为酒铺站台。这一转变反映了她在权力和资源之间不断进行的权衡与博弈，且她的目光因贪婪与坚韧而显得愈发锐利。蔻朵大婶在劳动中逐渐将其定义为有偿工作，并在与父权制和资本主义结构的对抗中不断前行，但她始终未能完全脱离由男性主导的经济体系，且深陷其中。这一现象与费代里奇对女性在资本主义体系下再生产劳动的分析不谋而合——即女性的“经济自由”在这些结构性限制下，往往无法实现真正的解放。

4. 结语

本·奥克瑞在《饥饿的路》中构建的多维性别政治图景，揭示了后殖民时期非洲女性在传统规训、殖民遗产与现代性转型夹缝中的生存困境。研究发现：在生育维度，传统母职规训与殖民现代性共谋导致生殖正义的体制性缺失，多生育主义的社会公式与核心家庭模式形成张力，未婚生育污名化现象折射出父权制与殖民遗产的双重规训；在生产领域，无偿家务劳动与受限的有偿劳动构成性别压迫的拓扑结构，女性在家庭再生产与市场生产中的双重异化暴露了资本主义与父权制的共谋机制；在生存层面，女性身体成为传统习俗、殖民遗产与资本逻辑竞逐的战场，公共空间的经济活动突破仍难逃男性主导秩序的控制。这种跨文化阐释框架的建立，不仅为尼日利亚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解码路径，更推动了中国学界超越后殖民理论的西方中心主义窠臼，在非洲英语文学研究中实现本体论层面的理论对话。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拓展至奥克瑞“阿比库三部曲”的互文性解读，探讨非洲女性如何在魔幻现实主义叙事中构建抵抗诗学，以及这种文学表征与当代非洲社会运动的现实关联。

参考文献：

- [1]Arnfred, Signe. "Review: Gender and Power in Modern Yoruba." [J]. *The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vol. 59, no. 2, 2018, pp. 341-342. Review of *What Gender is Motherhood? Changing Yoruba Ideals of Power, Procreation and Identity in the Age of Modernity*, by Oyèrónké Oyewùmí.
- [2]Ato, Quayson. "Protocols of Representation and the Problems of Constituting an African 'Gnosis': Achebe and Okri." [J]. *The Yearbook of English Studies*, Vol. 27, The Politics of Postcolonial Criticism (1997), pp. 137-149.
- [3]Buchi, Emecheta. *Second-Class citizen*. New York: George Braziller, 1975." *Journal of Postcolonial Writing*, 15(1), pp. 71-72
- [4]Federici, Sylvia. *Revolution at Point Zero: Housework, Reproduction, and Feminist Struggle*. [M]. PM Press,

2012.

- [5] Lauretta Ngcobo. *Motherhood, legend and reality about African Women*. Second African Writers' conference, Stockholm 1986, ed. [C]. Kirsten H. Petersen, pp. 173-181. Uppsala: Scandinavian Institute of African Studies, 1988.
- [8] Molara Ogundipe-Leslie, *Re-Creating Ourselves: African Women and Critical Transformation*. Trenton: Africa World Press, 1994), p. 3.
- [9] Nnolim, C. (2005). Deconstructing the maternal myth in African postcolonial fiction. *Journal of Commonwealth Literature*, 40 (2), 45-60.
- [10] Oyèronké Oyewùmí, "Introduction: Feminism, Sisterhood, and Other Foreign Relations," in *African Women and Feminism: Reflecting on the Politics of Sisterhood*, ed. Oyewùmí. Trenton: Africa World Press, 2003, p1.
- [11] 本·奥克瑞.饥饿的路[M]. 王维东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3.
- [12] 瞿世镜.(1997).非洲后现代小说的开拓者——本·奥克瑞创作初探.外国文学动态, (5), 32-35
- [12] 彭玲. 本·奥克瑞《饥饿的路》的魔幻现实主义解读[D].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 2020.
- [13] 朱振武, 韩文婷. 三重空间视阈下的非洲书写——以本·奥克瑞《饥饿的路》为中心[J].当代外国文学, 2017(4): 60-68.

The African Female Dilemma in The Famished Road

Ting Lan¹

¹ Sichu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Chongqing, China

Abstract: Ben Okri's Book Prize-winning novel *The Famished Road*, though its magic realist narrative rooted in the Yoruba myth of the Abiku spirit-child, unveils the intersectional oppression faced by African women during Nigeria's postcolonial social transformation. Focusing on maternal figures such as Azaro's mother and Mrs. Koto, this study employs an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 that synthesizes African indigenous feminism, reproductive justice theory, and Marxist feminism, arguing that Mrs. Koto's economic resistance and the mother's limited defiance constitute a dialectical portrait of African female subjectivity. Drawing on Yoruba scholar Oyèwùmí's theory of cultural particularity, it demonstrates that the contemporary stigmatization of unmarried motherhood constitutes a symptomatic manifestation of pre-colonial matrilineal traditions eroded by modernity, thereby challenging the universalist presuppositions inherent in Western feminist theories.

Keywords: motherhood penalty; reproductive justice; intersectional oppression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2.560

生态文明建设中的新质生产力角色：理论探讨与现实启示

陈楠¹

(¹南京林业大学，江苏 南京 210018)

摘要：自工业革命以来，传统以资源密集型经济增长模式为主导的生产方式对全球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中国在实现工业化与现代化进程中取得了显著成就，但也面临严重的生态环境挑战。对此，中国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并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升至国家战略高度。在此背景下，新质生产力作为一种融合绿色技术、清洁能源和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新型生产力形式，成为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力量。可以预见，随着技术创新和社会治理机制的不断完善，新质生产力将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发挥更加关键的作用，助力中国乃至全球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关键词：新质生产力；生态文明建设；绿色经济；可持续发展

一、引言

工业革命以来，传统以资源密集型经济增长模式为主导的生产方式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超越生态系统承载力的生产行为导致全球范围内生态失衡。随着全球生态危机加剧，资源短缺、环境污染和气候变化等问题已成为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重大挑战。中国在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成就，但同时也面临着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如空气污染、水资源短缺和土地荒漠化等。为应对这些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升至国家战略高度，探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型发展模式。这一理念不仅是一种环境保护政策，更是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重要方向。

在此背景下，“新质生产力”概念逐渐进入理论与实践视野。新质生产力不仅注重经济生产的高效性和创新性，还强调对自然环境的友好利用，核心在于通过绿色技术、清洁能源和可持续发展手段，推动生产方式的深度变革。它不同于传统生产力单纯追求经济增长速度，而是以生态环保、技术创新和社会责任为导向，致力于资源利用效率的提升与环境负担的减轻，为实现经济与生态协调发展提供新路径。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当前，国内外关于新质生产力与生态文明的研究虽有所发展，但总体上仍处于探索阶段。国外研究多聚焦于绿色技术创新和可持续发展政策，国内研究则偏重于理论分析和政策建议。

国际上，关于新质生产力与生态文明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绿色技术创新和可持续发展政策方面。Söderholm(2020)深入探讨了绿色经济转型面临的挑战，他强调未来研究应聚焦于不同制度背景下识别和实施新的政策工具组合，以促进可持续的技术变革；^[1]Lv 等人(2021)的研究揭示了金融结构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指出金融结构有利于绿色创新的发展，而金融规模和效率则可能产生负面影响，该研究表明环境监管对于绿色技术创新具有复杂的影响机制；^[2]Shen 等人(2021)分析了经济增长目标设定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发现地方政府设立和放大经济增长目标会对区域绿色技术创新产生抑制效应，特别是在经济增长迅速的城市或超额完成目标的城市中更为显著，这种效应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和外资引入得以传导，提示了经济发展目标设定需要考虑其对绿色创新的潜在影响；^[3]Madaleno 等人(2022)探讨了绿色金融、清洁能源、环境责任和绿色技术之间的因果关系，他们的研究表明这些因素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4]

国内学者普遍认同新质生产力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核心地位，认为它是符合绿色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形态。方珈瑶 (2024) 强调，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推动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不仅有助于提高生产效率和

[作者简介]

陈楠 (2002-)，男，南京林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

经济增长,还促进了降碳、减污等高质量发展目标的实现;^[5]宫长瑞、修珉(2024)提出了“绿色生产力”的概念,认为新质生产力的本质要求是绿色化转型,涉及开发清洁能源、新材料以及数据资源,他们强调技术创新对于劳动对象从传统矿物资源向清洁新能源转变的重要性,同时注重前沿材料的应用,为新质生产力提供产业基础;^[6]杨华、郭越(2024)探讨了新质生产力赋能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逻辑和战略价值,提出两者在价值纽带、表现形态、目标指向等方面具有一致性,为了实现协同发展,必须强化技术赋能、夯实政策支撑、活化生态资本、推进能源革新、聚焦人才培育,构建新型队伍并建立完善的绿色经济政策体系;^[7]王佳琪、张鹏(2024)认为,尽管新质生产力能够通过其独特生态内涵与生态文明建设紧密相连,但实际操作中仍面临顶层设计号召力不足等问题,因此,建议加强顶层设计、发挥碳市场功能、构建绿色消费场景、抢占未来生态强国发展制高点,以绿色生产力筑牢国际竞争新优势;^[8]刘鑫(2024)解析了新质生产力的生态属性及其与生态文明建设之间的内在一致性,提炼出其在理论与实践中的战略价值,并提出了法治护航、政策助航、创新导航、规划引航和合力促航等具体路径;^[9]孙健健、李宗明(2024)分析了新质生产力视域下生态生产力发展的理论意蕴、现实依据及实践路径,认为新质生产力能够在不牺牲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实现高效增长。通过对马克思生产力思想的新释,提出了基于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来完善宏观治理,坚持科技创新为核心,推动产业绿色升级;^[10]李萌萌(2024)着重讨论了新时代党领导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守正创新原则,强调“守正”与“创新”的结合,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强大动力,并确保了正确的发展方向。^[11]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的研究为新质生产力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角色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基础和实证支持。现有研究表明,新质生产力不仅是提升生产效率的关键,也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有效途径。尽管现有研究提供了参考,但新质生产力如何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发挥作用及其具体实现机制仍未充分阐明。本文的研究方法主要采用文献分析法与理论研究法,深入探讨这些问题对于完善生态文明建设理论和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三、生态文明与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基础

(一) 生态文明的理论概述

生态文明作为一种超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文明形态,契合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解放和生态解放的理念,主张通过尊重自然、保护环境来推动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生产力的发展不再以对自然的掠夺和污染为代价,而是通过绿色技术、清洁能源等创新手段,实现经济增长与生态保护的协调发展。生态文明还强调公共资源的合理利用和生态保护的社会责任,主张通过制度建设来引导和规范生产行为。

在国际上,“生态文明”一词首现于1978年法兰克福大学政治学系教授伊林·费切尔的《Conditions for the Survival of Humanity: On the Dialectics of Progress》中,该文用生态文明表达对工业文明和技术进步主义的批判;^[12]1995年美国学者罗伊·莫里森在其著作《生态民主》中引入了“生态文明”这一概念,这是英文学术中首次使用“ecological civilization”这一表达方式,并且率先明确提出“生态文明”是继“工业文明”之后的又一种文明形式。^[13]

在国内,学者叶谦吉在1984年首次提出“生态文明”概念。随着全球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各国逐渐认识到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之间的紧密关系。在国际层面,1972年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了首次人类环境会议,并发表了《人类环境宣言》,标志着全球生态保护意识的觉醒。随后的《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京都议定书》以及《巴黎气候协定》等一系列国际条约,进一步推动了全球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进程,使生态文明逐渐从一个学术概念发展成为国际社会广泛认可的价值理念。^[14-17]

在中国,生态文明的理念同样经历了从概念引入到政策实践的发展过程。2007年,中共十七大首次提出“生态文明”概念,强调将其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生态文明建设被提升到“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战略高度,标志着生态文明建设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随着中国生态文明理念的发展,其内容逐渐拓展到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绿色发展等多个方面,强调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进一步深化了生态文明的内涵,将其视为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之一。

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看,生态文明的核心在于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经典著作中多次强调自然的价值,认为人类并非独立于自然存在,而是通过劳动改造自然、依赖自然生存。然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由于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和利润驱动的生产目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逐渐恶化,出现了“代谢裂隙”,即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被人为分裂,使得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耗和环境的严重破坏成为不可避免的结果。^[18]因此,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通过改造生产关系,才能消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自然的破

坏，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生态文明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关于“联合劳动”和“自由人的联合体”的理想相呼应，体现了以人为本、实现生态公平与社会公正的价值追求。^[18]生态文明的内涵丰富，涉及经济、政治、文化和生态等多个领域，其核心理念包括可持续发展、绿色经济、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等。在生态文明的框架下，经济发展不仅是单纯的GDP增长，而是要实现资源的高效利用、生态环境的保护和社会的整体进步。

总的来说，生态文明不仅是对传统工业文明的批判和超越，更是一种全新的文明形态，指向可持续发展的未来。生态文明理念通过强调人类社会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为构建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社会和谐的可持续发展体系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二）新质生产力的概念与特征

新质生产力是指一种在信息化、科技创新和生态化驱动下所产生的全新生产力形式，是以新技术深化应用为驱动，以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快速涌现为重要特征，进而构建起新型社会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体系的生产力。与传统的劳动、资本和资源密集型生产力不同，新质生产力将可持续发展、绿色科技和生态文明的需求融入到生产力的构建中，以实现人类经济活动与自然环境的协调共生，其所关注的并非对自然界的掠夺性开发，而是对生态系统的保护和修复，从而确保人类经济活动的可持续性和稳定性。新质生产力的出现是当代科学技术迅速发展、信息化和智能化深度渗透以及全球生态危机加剧的产物，其核心在于通过技术创新、绿色资源利用、生态价值导向等手段，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新的动力源。

新质生产力之所以“新”，主要还是基于以往传统的“旧”生产力而言的。与传统生产力相比，新质生产力是包容了全新质态要素的生产力，意味着生产力水平的跃迁。

其一，新质生产力与传统生产力在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方面的态度上有显著不同。传统生产力以高能耗、高污染的方式推动工业化，忽视了资源有限性和生态系统承载力，导致资源枯竭和环境污染。相比之下，新质生产力强调绿色生产技术、可再生能源的使用及低碳工艺流程，追求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和谐统一，实现“以自然为基础”的生态平衡。

其二，传统模式依赖劳动和资本密集型投入来提升效率，而新质生产力则通过信息化、数字化和人工智能等高科技手段实现智能化和自动化生产。这种方式减少了对自然资源的依赖，在不增加物质投入的情况下实现高效产出，显著提高了资源利用效率。

其三，新质生产力在生态价值观和社会责任上的定位也不同于传统生产力。传统生产力往往只注重经济效益，忽略了环境和社会影响。新质生产力在生产过程中融入生态价值观，关注环境保护和社会责任，致力于在经济增长的同时保护生态环境，并在决策中优先考虑社会和环境的整体利益，促进绿色文化和生态文明的发展。

最后，全球协作和治理机制也是新质生产力区别于传统生产力的重要方面。传统生产力局限于特定区域或国家内运作，主要关注自身经济利益。新质生产力在全球性生态危机背景下，强调跨国界合作和全球治理的重要性，通过技术创新、资源共享和优化治理机制，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全球性问题，从而在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和国际社会绿色转型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在全球生态危机日益严重的今天，新质生产力不仅为人类社会提供了可持续发展的新思路，也为实现生态文明提供了坚实的生产力基础。新质生产力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支撑，通过技术创新、绿色转型和全球协作的方式，推动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在生产力方面的全面转型，使之朝着环境友好、资源节约的方向不断发展。

四、生态文明建设中的新质生产力角色分析

（一）生态环境保护的推动者

新质生产力通过技术创新、绿色产业发展和资源高效利用，有效减少了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推动了生态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实现。

传统生产方式依赖大量能源和资源，依赖煤炭、石油等能源，带来大量温室气体排放，严重影响气候变化。伴随高污染和高能耗，导致环境恶化。而新质生产力推动风能、太阳能等清洁能源发展，大幅降低了温室气体排放，有助于减缓全球变暖，还引入了清洁生产技术，如绿色化工技术和废弃物回收再利用，从源头减少环境破坏。这些技术不仅降低了废弃物的排放，也使生产活动更加环保。这种转变符合生态环境保护的需求，同时为可持续经济发展提供新动力。

传统生产方式新质生产力则传统的线性经济模式浪费资源并产生大量垃圾，而新质生产力提倡循环经济

济，通过资源的再利用、减少废弃物产生，提高资源利用率。例如，许多行业采用可回收材料和零部件，确保产品生命周期结束后能被回收再利用。这种方式减少了对自然资源的依赖，降低了生态压力。

新质生产力作为现代生产力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生态环境保护产生了深远影响。它通过绿色技术的应用、清洁能源的推广、资源循环利用以及社会消费结构的转型，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高污染、高能耗生产方式，而且在生产活动的方方面面嵌入了生态保护的理念，推动了生态文明的建设进程。随着新质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和技术的进步，未来它在生态环境保护中的作用将更加凸显。

(二)绿色经济转型的催化剂

新质生产力在推动绿色经济转型方面具有显著的功能，其核心在于通过技术创新、资源优化和低碳生产模式等手段，逐步改变传统经济依赖高污染、高能耗的增长方式，推动经济活动向绿色、可持续的方向发展。绿色经济转型不仅在生产层面表现为对资源效率和生态友好的追求，同时在消费模式、社会结构和全球合作等多方面对经济形态产生深远影响。

首先，新质生产力通过创新技术和绿色工艺提升资源利用效率，成为绿色经济转型的基础和驱动力。传统生产模式依赖大量资源消耗和原材料投入，导致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随着资源成本的上升，传统模式难以持续。而新质生产力通过节能环保技术、数字化技术和智能化设备优化生产流程，减少资源消耗、提高生产效率。

其次，新质生产力推动了绿色产业的形成和发展，加快了绿色经济结构转型。传统经济结构中污染严重的化石燃料和高耗能行业占主导地位，而新质生产力通过绿色能源、清洁生产技术等新兴行业崛起，推动经济向低碳、无污染的方向转型。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的迅速发展，减少了对污染能源的依赖；新能源汽车、生态农业和智能农业的应用改善了各行业的生产方式，为绿色经济注入动力。绿色产业的崛起不仅推动了传统产业的升级，还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生态环境。

最后，新质生产力推动了绿色消费模式的转变，推动社会层面的绿色文化和生态文明意识普及。随着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消费者逐渐关注产品的环保性、节能性和可持续性。市场上涌现出越来越多的绿色产品，如节能家电、可降解包装等，推动了企业产品和生产方式的绿色化。绿色消费观念的推广不仅倒逼企业转型，还促使政府和社会机构加大对绿色经济的支持，推动形成以绿色消费为导向的市场经济，促进生态文明建设。

新质生产力通过技术创新、绿色产业发展、绿色消费转变，形成了多维度的绿色经济转型路径，加速了绿色经济的发展，为传统经济结构带来了新机遇，也为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可行路径。未来，新质生产力在经济和生态环境保护中的作用将更加突出，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提供有力支撑。

(三)社会文明进步的引领者

新质生产力与社会文明进步的关系可以从多个角度探讨。新质生产力在推动经济转型、优化资源配置和提升生活质量等方面为社会文明进步提供了强大动力，同时也在引领人类向生态友好、和谐共生的现代文明形态迈进。在当今社会变迁和生态危机交织的背景下，新质生产力不仅仅是一种经济力量，更是一种带有道德和社会责任的力量。它促使人们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社会与经济的关系，塑造了新的价值观、行为模式和社会结构，为社会文明进步带来了全方位的变革。

首先，新质生产力通过绿色技术和可持续生产方式推动生活方式转变，为社会文明进步奠定了实践基础。新质生产力通过技术创新和产业优化，推动经济向绿色、低碳和高效方向发展。绿色产业、智能制造业和服务产业的兴起，逐渐取代了传统的高污染产业。这种产业结构转型不仅提升了生产效率和资源利用效率，还创造了大量的新的就业机会，推动了数字经济和共享经济的发展，为社会带来了更加生态友好的经济形态，并为社会文明进步注入了新动力。

其次，新质生产力为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和形成新的社会价值观念提供了思想基础。生态文明是现代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核心理念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新质生产力倡导可持续发展，通过绿色技术和产业转型，促进了社会对自然的尊重和资源的合理利用。环保意识和绿色消费观念的推广，使越来越多企业将社会责任纳入发展战略，推动了社会责任感的增强，进而影响全社会的价值观，推动了生态文明的形成。这种价值观的转变促使人们更加关注生态环境，推动社会文明整体进步。

新质生产力还带动了社会治理方式的创新，为社会文明进步提供了制度保障。随着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社会治理在理念和方式上也随之发生了深刻变化。现代社会逐渐引入了基于科技手段的智能化治理模式，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对社会事务进行精细化管理和智能化调控，使得社会治理更加高效和精准。

这种创新的社会治理方式，不仅有助于提升社会的整体管理水平，还使得社会治理更加透明、公平，促进了社会的和谐与进步。

综上所述，新质生产力在推动社会文明进步方面发挥了多层次、多维度的作用。它不仅通过技术进步和资源优化改善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而且通过绿色经济的转型、生态文明的推广，为现代社会带来了全新的发展机遇。在这种背景下，社会文明进步不再仅仅是物质和经济的增长，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可持续发展的综合体现。新质生产力所引领的这一文明转型，是人类在生态友好和社会和谐之路上的一次重要探索，为未来的社会文明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撑和广阔前景。

五、新质生产力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现实启示

（一）新质生产力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现实挑战

在中国，推动新质生产力与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度融合，面临着一系列现实挑战。尽管新质生产力的生态友好特性与绿色发展理念高度契合，但在实际推广和应用中，依然存在资源限制、技术瓶颈、体制障碍和政策执行力度不足等问题，制约了新质生产力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广泛应用和深层次发展。

首先，资源与环境的承载力限制是推进新质生产力的一个现实障碍。中国作为人口大国，经济总量庞大，对资源的消耗巨大，能源、矿产、水资源等都长期处于高需求、高消耗的状态。尽管近年来中国在大力推行绿色能源替代，但煤炭等传统能源仍在能源结构中占据相当比重，导致资源型城市环境污染较为严重。此外，由于地理分布不均，西部地区的资源条件和经济水平限制了对新质生产力的支持能力，资源短缺和环境恶化问题在这些地区表现尤为突出，从而导致中国东、中、西部的绿色发展进程不平衡。为实现全国范围内的新质生产力推广和应用，仍需克服区域资源和生态环境承载力的差异问题。

其次，技术创新能力不足和核心技术缺乏也是制约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瓶颈。新质生产力依赖于绿色科技和前沿技术的研发和应用，而在某些关键领域，如高端环保设备、新能源存储、智能化管理系统等方面，中国的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仍存在差距。尤其在产业关键环节的技术自主化和本土化方面，部分核心技术依赖于进口，导致在绿色生产领域的自主创新能力不足。尽管近年来政府和企业加大了对绿色技术的研发投入，但要实现从跟随到引领的技术跨越仍需时间和资本的积累。技术短板的存在不仅影响了新质生产力的竞争力，也限制了其在更广泛领域的应用推广。

此外，政策执行力度不足、产业结构单一化也构成了新质生产力推广的现实挑战。在一些资源型和工业密集型地区，由于传统产业根基深厚、经济结构固化，地方政府和企业在转型升级过程中往往缺乏积极性，推动新质生产力的难度较大。某些企业为了追求短期利益，常常忽视环保规定，通过虚报数据等方式逃避监管，给生态环境带来了持续性破坏。这样的现象使得新质生产力难以发挥其应有的生态治理功能。尤其是在东北、华北等工业重镇，传统制造业和重化工业的比重较大，经济发展较为依赖高耗能、高污染的行业，产业结构调整缓慢。这些地区虽然存在产业转型的需求，但转型过程中的利益调整和成本分摊困难，导致在新质生产力推广上步履维艰，难以形成区域性的绿色经济转型示范效应。

最后，公众参与意识不强和教育宣传不足也是生态文明建设和新质生产力推广中不可忽视的挑战。尽管近年来政府对环保宣传和生态意识的培育逐步加强，但在部分地区，特别是农村和欠发达地区，公众的环保意识仍然薄弱，对新质生产力的理解和认知不足。一些公众对于绿色消费、资源节约的意识不够强，环境保护观念未深入人心，甚至对节能环保行为产生抵触心理。这种情况下，生态文明建设难以真正落实到日常生活和消费习惯中。公众环保意识的不足不仅使得新质生产力难以获得社会广泛支持，也不利于形成全社会共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合力。

总的来说，资源限制、技术瓶颈、产业结构固化以及公众环保意识薄弱等因素共同构成了中国推动新质生产力与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挑战。要克服这些挑战，不仅需要从国家层面进一步加强政策支持和监督力度，还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形成一个多层次、多维度的绿色发展体系，以推动中国在实现生态文明目标的道路上稳步前进。

（二）新质生产力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应对策略

为应对新质生产力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现实挑战，中国可以从多方面着手，采取一系列有针对性的策略，包括政策支持、技术创新、社会参与和体制改革等，以实现绿色发展与经济转型的有机融合。

首先，国家层面应加大政策支持力度，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政策保障。通过制定和完善法律法规，明确新质生产力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地位，鼓励和支持绿色技术创新、清洁能源应用和低碳产业发展。国家可以设立专项基金，通过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绿色金融等手段，支持企业和科研机构开

展生态科技研发，减轻企业在绿色转型中的成本压力。此外，国家应通过政策引导和资金支持，推动资源型城市和传统产业密集区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加快绿色产业链的培育和新兴产业的发展，为新质生产力的推广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

其次，推动技术创新是实现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中国需要加强在核心绿色技术和前沿生态技术领域的自主研发能力，提升在清洁能源、环保设备、智能化管理等方面的技术水平。为此，政府可以在重点行业设立科研专项，鼓励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企业合作创新，集中力量攻克关键技术难题。同时，政府应注重推动技术转化和产业化，完善技术转移机制，建立绿色技术推广平台，促进科研成果快速转化为生产力。通过鼓励企业参与绿色创新，可以推动新质生产力在更多行业的应用，进一步促进经济结构的绿色转型。

再次，加强社会治理和公众参与是推进新质生产力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环节。要增强全社会的生态意识，需要广泛开展绿色宣传教育，通过电视、网络、宣传册等多种形式，普及环保知识，鼓励公众践行绿色生活方式。政府可以设立专门的环保教育课程，将生态文明理念纳入学校教育体系，让下一代从小树立环保意识。与此同时，还可以在社区和企业中开展环保行动和生态文明实践活动，激励更多公众和企业主动参与环保项目。公众的广泛参与将为生态文明建设形成强有力的社会支持，推动绿色生活方式在全国范围内的普及，为新质生产力发展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

最后，推进农村地区的新质生产力发展对于中国的整体生态文明建设尤为重要。在城乡发展不平衡的背景下，农村地区的新质生产力发展相对滞后，需要政府给予特别支持。通过政策引导和专项资金投入，支持农村地区的绿色技术推广和生态农业建设，例如推广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的应用，减少农村能源消耗的环境负担。进一步而言，政府可以鼓励农村合作社和农民企业家探索生态农业模式，如有机农业、循环农业等，实现农业生产的绿色转型，提升农村生态环境质量。同时，推动农村地区开展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项目，改善乡村基础设施，提升农村人口的生活质量。

综上所述，为应对新质生产力和生态文明建设中的挑战，中国需要在政策、技术、社会参与、体制机制和农村发展等方面采取系统性的应对策略。通过政策扶持和技术创新奠定基础，广泛动员公众参与生态保护，实现社会治理与新质生产力的深度融合，逐步建立一个适应新时代要求的绿色发展体系。在这样的系统性应对下，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和新质生产力发展将迎来更广阔的前景，为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

六、结论

在中国，随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深入人心，生态文明建设已被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新质生产力成为解决当前资源环境困境的重要抓手。从实践层面看，新质生产力不仅是推动经济绿色转型的重要引擎，也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关键力量，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未来，新质生产力将在生态文明建设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通过技术创新与生态理念的协同发展，中国有望构建绿色经济与生态文明相辅相成的新发展格局，为全球生态治理贡献更多“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参考文献：

- [1] Söderholm P. The green economy transition: the challenges of technological change for sustainability[J]. *Sustainable Earth*, 2020, 3(1): 6.
- [2] Lv C, Shao C, Lee C C.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financial development: do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innovation output matter?[J]. *Energy Economics*, 2021, 98: 105237.
- [3] Shen F, Liu B, Luo F, et al. The effect of economic growth target constraints on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2021, 292: 112765.
- [4] Madaleno M, Dogan E, Taskin D. A step forward on sustainability: The nexus of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 green technology, clean energy and green finance[J]. *Energy Economics*, 2022, 109: 105945.
- [5] 方珈瑶.新质生产力视角下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观研究[J].南方论刊,2024,(10):10-13.
- [6] 宫长瑞,修珺.绿色生产力：新质生产力的本质要求与要素变革[J/OL].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2024-12-06]
- [7] 杨华,郭越.新质生产力赋能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逻辑、战略价值及践诺理路[J].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

- (社会科学版),2024,18(03):18-27.
- [8] 王佳琪,张鹏.新质生产力赋能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思考[J/OL].青岛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2024-12-06].
- [9] 刘鑫.生态文明视角下的新质生产力——理论构建、战略价值与转化路径[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24,(09):62-68.
- [10] 孙健健,李宗明.新质生产力视域下生态生产力发展的理论意蕴、现实依据及实践路径[J/OL].贺州学院学报,1-11[2024-12-06].
- [11] 李萌萌.新时代党领导生态文明建设的守正创新[J].鄱阳湖学刊,2024,(05):5-18+155.
- [12] Fetscher I. Conditions for the Survival of Humanity: On the Dialectics of Progress[J]. Universitas, 1978, 20(1): 161.
- [13] Morrison R. Ecological democracy[M]. South End Press, 1995.
- [14] Garth B G. Declaration on the Human Environment[J]. 8 Stanford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37 (1973), 1973.
- [15] Declaration R. Rio declarat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EB/OL].(1992)
- [16] Protocol K. Kyoto protocol[J]. UNFCCC Website. Available online: http://unfccc.int/kyoto_protocol/items/2830.php (accessed on 1 January 2011), 1997: 230-240.
- [17] Delbeke J, Runge-Metzger A, Slingenberg Y, et al. The paris agreement[M]//Towards a climate-neutral Europe. Routledge, 2019: 24-45.
- [18]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2018.

The Role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i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and Practical Insights

Chen Nan¹

¹ School of Marxism, Nan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Nanjing,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he traditional resource-intensive economic growth model has caused serious damage to the glob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China has made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in the process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but it also faces serious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challenges. In response, China has put forward the concept of “green water and green mountains are golden mountains” and elevated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o the level of national strategy. In this context,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s a new form of productivity integrating green technology, clean energy and the concept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force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t is foreseeable that with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social governance mechanisms,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will play a more critical rol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help China and the world achieve the goal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Keywords: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Green Economy;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2.561

从资本逻辑到生态逻辑：奥康纳对当代资本主义危机的生态学解读

陈楠¹

(¹南京林业大学，江苏 南京 210018)

摘要：在当代资本主义全球化背景下，经济、社会、政治与生态领域的多重危机愈发凸显，尤其是环境恶化、资源枯竭和气候变化等问题，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及人类社会的生存发展构成了严峻挑战。文章以詹姆斯·奥康纳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切入点，探讨其对资本主义危机的生态学解读。奥认为，资本主义通过对自然资源的过度掠夺，不仅导致生态再生产危机，还加剧了社会不平等，威胁社会可持续发展。在资本主义框架内无法改善生态环境、避免生态危机，必须从根本上废除资本主义的利润最大化模式，构建一个超越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

关键词：奥康纳；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危机；生态社会主义

一、引言

当代资本主义在经济、社会、政治和生态等多个领域面临深刻危机，尤其是在全球化背景下，环境恶化、资源枯竭及气候变化等问题日益严重。这些危机威胁到自然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并对人类社会的生存与发展构成挑战。资本主义追求利润最大化与无休止扩张的逻辑已超出自然界承载能力，导致生态退化和社会不平等加剧。在此背景下，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作为批判资本主义的理论工具，提出了资本与自然之间的“第二矛盾”，詹姆斯·奥康纳通过其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力与自然基础之间的对立。

近年来，随着生态问题的日益严重，国内学者对西方绿色思潮与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逐渐增多。在国内学界，学者李红松(2024)指出，奥康纳强调解决生态危机必须从资本逻辑向生态逻辑的转变，这一观点为当代中国的生态政策制定提供了理论支持。^[1]冯明宇 (2024) 指出，平台资本主义不仅加剧了资源的过度开发，还导致了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恶化，进而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2]在具体实施层面，雷博华(2024)探讨了生态学社会主义的实践路径，指出在当代中国，如何将这一理论与本土实际相结合，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3]在国际层面，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态势，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资本主义与生态危机之间的关系。O'Connor (1998) 的《Natural causes: Essays in ecological Marxism》是生态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献之一，提出了“生态危机”的概念，探讨了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如何导致生态问题。O'Connor 强调，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即追求利润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是当代生态危机的根源。他的研究为进一步探讨如何在现代社会中解决这一矛盾提供了重要视角。^[4]Foster (2000) 在其著作《Marx's Ecology: Materialism and Nature》中，详细阐述了马克思的生态观及其与当代环境思想的关系。Foster 认为，马克思的理论不仅关注经济剥削，还涉及人与自然的关系，揭示了资本主义对自然环境的剥削机制，为理解现代生态危机提供了历史和理论基础。^[5]Böhm (2009) 对碳市场的批判性研究则揭示了市场机制在解决环境问题上的局限性。他们指出，虽然碳市场旨在通过经济手段促进减排，但在实际运作中却未能有效解决生态危机，反而可能加剧了环境的不平等。这一研究为评估市场导向的环境政策提供了重要的批判性视角。^[6]

由此可见，国内外学者对生态危机均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和看法。然而，对于当代资本主义危机是如何具体从资本逻辑到生态逻辑转变的，还没有具体深入的研究。本文主要采用文献分析法与理论研究法，旨在系统梳理和分析詹姆斯·奥康纳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并结合相关文献，阐明其“第二矛盾”理论对资

[作者简介]

陈楠 (2002-)，男，南京林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

本主义危机的生态学解读，在奥康纳的理论框架内提出合理的应对生态危机的策略。

二、资本逻辑与生态逻辑的对立

（一）资本逻辑的核心：利润最大化与积累

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最早由马克思在其《资本论》中提出，即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7]资本主义的基本运行逻辑可以用利润最大化与资本积累来概括。这一逻辑不仅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动力，也是其诸多危机的根源。资本的首要目标是通过剥削劳动力获取剩余价值，资本家通过压低劳动力成本、提高生产强度，尽可能提高生产力，以实现利润最大化。为了维持竞争力，资本家不断优化生产工具、技术和管理手段，在市场竞争的压力下，不断扩张生产规模。

资本积累是指通过再投资利润，资本家不断扩大生产规模，进一步增加剩余价值的获取。资本的积累推动了全球化进程，资本主义跨越国界、地域、文化和自然资源的限制，形成了全球性的资本流动与市场扩展。

资本积累过程伴随着一系列矛盾与问题，首先，资本积累不仅是劳动力的剥削，也是自然资源的剥削。资本主义为了维持扩张，需要不断开发自然资源，过度开发和资源掠夺导致了生态破坏和资源枯竭。资本主义追求无休止的增长，最终引发了资本与自然之间的矛盾；资本积累还加剧了经济不平等与社会矛盾。资本家通过积累获得更多的生产资料和社会资源控制权，集中化的资本进一步加深了资本与劳动的对立，少数资本巨头控制大部分财富与权力，导致广泛的贫富差距与社会资源的不公平分配。资本积累过程中，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不可避免。当资本为了追求更高利润压低工人工资、降低生产成本时，市场需求不足，造成生产过剩、失业和经济衰退，最终引发社会不稳定；此外，资本积累也带来了环境的不可持续性。随着全球工业化进程加快，资源消耗速度远超自然界的再生速度，导致森林砍伐、矿产枯竭、水污染、气候变化等问题。这些环境问题不仅限于发达国家，全球贫困国家和边缘地区的生态环境遭受了最严重的破坏。

总体来说，资本主义的利润最大化与积累逻辑推动了经济扩张和资源掠夺，但也带来了严重的生态和社会后果。詹姆斯·奥康纳的“第二矛盾”理论指出，资本积累不仅受到劳资关系的制约，还受到资本与自然之间的再生产危机的制约。资本对自然资源的掠夺破坏了生态平衡，导致自然再生产条件的恶化，影响资本积累的持续性。资本积累过程中的扩张性与自然界的有限性之间的根本冲突，使得资本主义无法避免地陷入生态危机与经济危机的双重压力中。这一分析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运行机制及其生态危机的根源。

（二）生态逻辑的核心：自然的有限性与生态平衡

生态经济学的最早由美国经济学家 Boulding 提出，他认为我们的地球资源有限，而封闭式的经济模式、人口增长及环境污染正威胁着未来生态系统的稳定，为了避免资源耗尽和环境进一步恶化，我们必须采用经济措施，构建一个开放且循环的生态系统。^[8]

生态逻辑与资本主义的利润最大化与无限扩张逻辑形成对立。生态逻辑强调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和生态平衡，反映了人类与自然相互依存的关系。自然资源在分布上有限，且具有再生周期，而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能力也有其承载极限。人类必须以可持续方式开发资源，避免过度开发和枯竭。然而，资本主义的扩张性忽视了资源再生能力，导致了过度开发和环境破坏。

生态逻辑强调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不仅在物质上有限，也体现在环境承载能力上。每个生态系统都有自我恢复能力，若超出这一能力，生态系统将遭受破坏。生态平衡是生态逻辑的核心。生态平衡指的是自然界中各个物种和生态过程的和谐关系。打破这种平衡可能导致连锁反应，危及整个生态系统。生态逻辑还强调人与自然的相互依存。自然资源不仅支持人类生存，也是经济活动的基础。

然而，资本主义往往将自然视为无限资源，忽视人类的依赖性。詹姆斯·奥康纳的“第二矛盾”理论指出，资本主义不仅面临劳资关系的危机，还在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耗中面临生态危机。过度掠夺自然资源最终将反作用于资本积累，使得资本主义无法持续发展。生态逻辑主张可持续发展，强调满足当前需求的同时，不应牺牲后代的资源。这一理念要求减少对自然资源的过度依赖，推动绿色技术创新，建立合理的经济模式，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与资本主义的无限扩张不同，生态逻辑主张适度增长和合理资源分配。经济增长应考虑自然资源的消耗和环境的可持续性，提升人类生活质量和社会福祉，而非追求经济总量的无止境扩张。

生态逻辑还主张全球公正的资源分配与环境治理。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导致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将环境成本转嫁到发展中国家，造成全球生态不平衡。生态逻辑呼吁通过国际合作和环境治理，推动全球生态公

平，实现可持续发展。尽管《巴黎协定》等国际框架试图应对气候变化，但资本主义体系仍然阻碍全球生态治理。^[9]

综合来看，生态逻辑强调自然资源的有限性、生态平衡和人与自然的相互依存，提出了与资本主义扩张逻辑根本对立的可持续发展路径。在全球生态危机背景下，生态逻辑为应对资本主义危机提供了方向，倡导减少资源过度索取、推动生态经济转型和实现全球生态公平，以构建更可持续的未来。

三、詹姆斯·奥康纳的“第二矛盾”理论

(一) “第一矛盾”：劳资关系中的生产矛盾

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框架中，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集中体现在劳资关系中的生产矛盾上，这被称为“第一矛盾”。^[7]这一矛盾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特征，即资本家通过雇佣劳动者来创造剩余价值，并通过剥削劳动者的劳动来实现利润最大化。这种剥削关系不仅是资本积累的基础，也是资本主义系统不可避免地走向周期性经济危机的根源。

在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中，劳动者与资本家之间的关系是对立的。资本家拥有生产资料，而劳动者只能通过出售自己的劳动力来获取工资，从而维持生存。资本家雇佣劳动者的目的是为了获取剩余价值，即劳动者在工作过程中创造的价值超过其工资的部分。这种剩余价值是资本家利润的来源，也是资本积累的基础。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家通过不断压榨劳动者来提高利润率，具体表现为加长劳动时间、压低工资、增加工作强度等方式。这导致了劳资之间的矛盾加剧，因为劳动者的利益与资本家的利益是根本对立的：资本家追求的是利润最大化，而劳动者追求的是更高的工资和更好的工作条件。

“第一矛盾”还体现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不稳定性上。随着资本主义的扩展，资本家为了获取更高的利润，不断增加生产规模和资本投入，但与此同时，劳动者的工资增长却被压制在最低水平。这导致了一个悖论，即虽然生产能力不断提高，但由于劳动者的购买力有限，市场对商品的需求无法与生产的扩张同步。这种供需失衡最终导致资本主义的周期性经济危机。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地包含了“生产过剩”危机的可能性，即生产的商品远超过市场的需求，从而导致企业倒闭、失业率上升和社会动荡。

此外，劳资矛盾不仅是经济上的，还具有深刻的社会和政治意义。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劳资之间的对立加剧，劳动者在生产中的主体地位逐渐被边缘化，劳动的异化现象愈加严重。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失去了对自身劳动的控制，劳动的成果被资本家所占有，而劳动者自身则成为了资本增值的工具。这种异化不仅使劳动者的生活质量下降，还削弱了他们的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利。这种社会不平等的扩大进一步加剧了劳资之间的对立，使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面临越来越大的社会压力。为了缓解这种矛盾，资本主义社会往往通过制度性措施来调节劳资关系，如工会组织、劳动法和社会福利政策。然而，这些措施往往只能暂时缓解劳资矛盾，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资本主义的核心逻辑依然是通过剥削劳动者来实现利润最大化，而这种逻辑与劳动者追求平等和尊严的诉求是不可调和的。

总之，“第一矛盾”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劳资关系的内在对立性。这一矛盾不仅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也导致了深刻的社会不平等和劳动者的异化。

(二) “第二矛盾”：资本与自然关系中的再生产危机

詹姆斯·奥康纳提出的“第二矛盾”理论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分析的深化，指出资本主义不仅存在劳资关系中的“第一矛盾”，还存在一个“第二重矛盾”，即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与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这一危机表现在资本与自然的关系上，具体是资本主义对自然资源的过度依赖和破坏，导致自然再生产能力下降，威胁到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可持续性。奥康纳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核心矛盾不仅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冲突，还包括资本积累与自然资源的不可持续性之间的矛盾。

资本主义依赖自然资源的无节制掠夺来维持其扩张逻辑，这种行为不仅破坏了自然界的再生能力，还导致资源枯竭和环境污染，形成了“再生产危机”。这一危机的核心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破坏了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的再生产条件。奥康纳指出，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不仅是环境问题，更与资本主义的内在逻辑密切相关。资本家为了追求高利润，不断扩张生产规模，需要更多的自然资源，这种扩张最终超过自然的承载能力，导致生态崩溃。同时，生态危机增加了生产成本，气候变化、极端天气等加大了农业和工业的生产难度，进一步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危机。

奥康纳的“第二矛盾”理论还揭示了生态危机加剧社会不平等。在追求利润过程中，资本主义将环境成本转嫁给贫困阶层和发展中国家，这些地区因资源掠夺和环境污染而承受更加严重的生态破坏。

奥康纳通过引入生态问题，扩展了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的视野，指出资本主义的自我毁灭性不仅体现

在经济领域，还体现在其与自然界的矛盾中。他认为，资本主义的扩张逻辑与自然资源的有限性注定无法持久，生态崩溃是不可避免的。为了解决这一危机，仅仅依靠经济改革或科技进步是不够的，因为根本问题在于资本主义的内在逻辑，要求无限扩张和利润最大化。因此，奥康纳主张超越资本主义，建立基于生态可持续性的社会主义体系，倡导人类社会与自然的和谐共存。他提倡的生态社会主义强调尊重自然界的有限性和生态系统的平衡，倡导以公正、平等和可持续性为核心的生产方式。这不仅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也是对未来社会发展道路的展望。

总之，奥康纳的“第二矛盾”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在生态关系中的根本危机，表明资本主义内在的不稳定性和不可持续性。他通过将生态危机纳入对资本主义危机的分析，提供了新的理论工具，有助于理解现代资本主义的多重危机。

（三）环境问题与社会问题交织

詹姆斯·奥康纳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强调生态危机与社会危机之间的紧密联系，揭示了资本主义体系内环境问题与社会不平等的相互交织。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生态破坏和社会不平等相互强化，环境问题不仅是自然界的危机，也深刻影响经济和政治，最终导致更严重的社会冲突和生态灾难。

资本主义依赖对自然资源的无节制开发，导致生态系统的退化。资本家为了追求最大化利润，不断剥削矿产、石油、森林等自然资源，忽视生态自我恢复能力。结果，气候变化、森林砍伐、空气污染、水资源短缺等问题日益严重。这些生态问题不仅威胁生态系统的稳定，也直接影响人类社会，导致粮食减产、能源短缺和极端天气频发，同时加剧社会不平等。

奥康纳认为，资本主义下的环境问题最直接影响贫困阶层和弱势群体。在全球化背景下，跨国公司和资本家通过资本流动，将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和边缘地区，这些地区依赖自然资源发展经济，却因此面临资源枯竭和贫困加剧。例如，气候变化导致的极端天气、海平面上升、干旱和洪灾等，主要影响贫困国家和低收入群体，而这些国家的生态破坏往往源于发达国家的高碳排放和资源消耗。发展中国家和贫困群体成为生态危机的受害者，却无力改变现状，从而加剧全球范围的社会不平等。环境问题的加剧还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如移民、冲突和健康问题。气候变化导致农业破坏、水资源匮乏，迫使大批人口成为“气候难民”。这些移民面临就业不足、住房紧张等问题，加剧了社会紧张和冲突。同时，环境污染对健康的威胁日益严重，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空气污染和水污染导致的疾病加重了社会的不稳定。

资本主义环境问题不仅扩大了全球贫富差距，也加剧了发达国家内部的阶级分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通过外部化环境保护成本，将污染的代价转嫁给社会，特别是贫困阶层。例如，工厂的废气排放和废水处理成本由社会承担，而非企业。贫困群体和工人阶级生活在污染严重的地区，承受更高的健康风险和生活成本，而富裕阶层则可以逃避这些问题，进一步加剧阶级不平等。

奥康纳的“第二矛盾”理论指出，资本主义面临生产和消费的不平衡，也面临生态与社会的不平衡。资本主义通过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和环境污染，将生态危机的代价转嫁给最弱势的社会群体，从而加剧全球范围的社会不平等。奥康纳主张，解决这一危机必须超越资本主义，走向生态社会主义，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推动社会公正与生态可持续发展。

四、从资本逻辑向生态逻辑的转变

（一）从生态危机到生态社会主义

詹姆斯·奥康纳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引发的生态危机，并主张通过生态社会主义实现从资本逻辑到生态逻辑的转变。他认为，资本主义在追求经济增长和利润最大化的过程中，必然会导致生态系统的破坏和社会不平等，因此，解决生态危机必须超越资本主义框架，建立以生态平衡和社会正义为核心的生态社会主义。

奥康纳指出，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结果，而非外部偶然现象。资本主义的积累逻辑促使资本家不断扩大生产规模，以获取更多利润。但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和生态系统的脆弱性使得这种无止境的扩展不可持续。虽然资本主义短期内能获利，但长期来看，这种剥削行为必然会破坏生态系统的自我修复能力，导致环境恶化、资源枯竭和生态失衡。因此，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矛盾的必然产物，它不仅威胁人类生存环境，也挑战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的稳定。

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奥康纳提出了生态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替代的社会发展模式，核心是重新构建人与自然的关系，强调生产应尊重自然规律，实现生态可持续性与社会公正的统一。生态社会主义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也区别于资本主义的绿色改革方案。它要求在经济结构上进行根本性变革，同时在人类生活

方式和社会价值观上做出重大调整。

首先，生态社会主义主张去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利润追求，转向满足社会需求和保护生态系统。在资本主义中，生产的目的是利润最大化，导致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耗和浪费。而生态社会主义则强调“生产为使用”而非“生产为利润”，鼓励生产活动以满足人民的基本需求，同时减少对自然资源的消耗。

其次，生态社会主义关注社会公正，特别是应对资本主义体系下加剧的不平等现象。生态危机与社会不平等紧密相关，低收入群体往往生活在污染严重的地区，面临更高的健康风险。跨国资本通过在发展中国家进行资源掠夺，将生态危机的代价转嫁给当地贫困人口。生态社会主义主张通过公平的资源分配和环境保护机制，减少生态危机带来的社会不平等，确保所有人都能公平享有干净的环境和资源。

再者，生态社会主义强调民主化的环境管理。奥康纳认为，资本主义体系下，环境问题通常由少数跨国公司和资本家掌控，他们只考虑经济利益，忽视环境和社会代价。生态社会主义主张建立民主的环境决策机制，确保社会成员能参与生态管理和政策制定。这样可以保障生态政策的透明性和公平性，推动社会朝可持续发展方向迈进。

奥康纳还提出，生态社会主义不仅是理论工具，也是实践需求。尽管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尝试通过技术创新和市场机制缓解环境问题，如碳交易和绿色能源，但这些措施并未根本改变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无法有效解决资源枯竭和生态退化的问题。奥康纳认为，真正的生态转型必须通过社会根本性变革，而非依赖资本主义自身的修复。

总的来说，奥康纳通过对生态危机的分析，提出了生态社会主义作为资本主义替代路径的理论构想。生态社会主义不仅强调经济结构转型，还注重社会公正和生态可持续性，提出了从资本逻辑到生态逻辑的转型路径。通过废除资本主义的利润导向，推动社会参与和民主治理，生态社会主义为解决生态危机提供了深远意义的理论和实践框架。

（二）生态社会主义的现实挑战

尽管生态社会主义为解决资本主义引发的生态和社会危机提供了一种理论上的替代方案，但其在现实中的实施面临诸多挑战。詹姆斯·奥康纳意识到，要实现从资本逻辑向生态逻辑的转变并非易事，生态社会主义的推行不仅要面对深厚的资本主义结构，还要克服社会、政治和文化等多方面的阻碍。

生态社会主义的实现面临资本主义强大经济体系的抵抗。资本主义的全球化使得资本积累和市场扩展的逻辑渗透到各个角落，跨国公司和金融机构在全球范围内占据了主导地位。任何试图从根本上改变这种资本主导的生产方式，都会面临来自资本势力的强烈反对。资本主义通过对市场的控制和资源的垄断，形成了一种对生态和社会变革的结构性压制。生态社会主义要想实现，其首要挑战是如何破解资本对资源分配和生产方式的控制，重新构建更公平的经济关系。

生态社会主义还面临社会文化上的障碍。资本主义不仅是一种经济制度，它还通过消费文化和生活方式深深植根于现代社会。人们的消费习惯、价值观念和对成功的定义往往与资本主义的逻辑紧密相关。即使在面临严重的环境危机时，许多社会成员仍然倾向于支持现有的增长模式，而对生态社会主义的激进变革持怀疑态度。这种文化上的惯性使得生态社会主义在赢得广泛社会支持时遇到了困难，推动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的转型成为关键挑战之一。

生态社会主义的推行还需面对政治上的阻力。在当今全球的政治格局中，许多国家的政治制度深受资本的影响，政府与大企业的利益紧密相连。即使有些国家意识到生态危机的严重性，往往也只会采取温和的改革措施，难以进行彻底的结构性转型。此外，国际政治和经济体制的不平衡也加剧了生态社会主义的推进难度。许多发展中国家受制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剥削，缺乏自主推行生态转型的能力，同时发达国家对生态危机责任的推诿也阻碍了全球合作的实现。

生态社会主义在理论上提供了一种从资本逻辑向生态逻辑转变的可行路径，但在现实中，其推行面临来自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社会文化惯性和政治力量的多重挑战。要克服这些障碍，需要广泛的社会动员、政策创新以及全球范围的协同努力。

（三）从资本逻辑到生态逻辑的转变策略

在面对生态危机和社会不平等的双重挑战时，从资本逻辑向生态逻辑的转变不仅是理论需求，更是迫切的实践需求。要实现这一转变，必须从根本上废除资本主义的利润最大化模式，构建一个以“生产为使用”为核心的经济结构，同时推动“民主化的环境管理”，让每个社会成员都能参与到环境治理的决策过程中。

首先，废除资本主义利润最大化模式，推动“生产为使用”的经济结构。资本主义的利润最大化模式通过

不断扩张生产规模、压榨资源、追求短期利润，导致生态危机和社会不平等。因此，转向“生产为使用”的经济结构是根本转变策略。这意味着生产应根据社会需求而非资本积累进行规划，确保资源消耗不超过生态承载能力，推动节能环保、可再生能源和循环经济。消费模式也应从消费驱动的增长模式转向“可持续消费”，关注理性消费、绿色消费和减少浪费。同时，资源分配需从市场主导机制解放出来，采用社会化管理，如生态基金、生态税制和社会企业，确保资源公平、可持续地分配。

其次，推动“民主化的环境管理”。生态社会主义的实现需要通过“民主化的环境管理”来推进，以替代传统资本主义模式下由少数跨国公司和政府主导的决策方式，确保广泛的社会参与。治理决策应让所有社会成员，尤其是受生态危机影响最严重的群体，参与其中，确保政策能够反映社会需求和生态利益。同时，治理过程必须提高透明度和公平性，避免权力寻租和腐败现象，通过信息公开和公众监督保障政策执行的公正性。此外，民主化管理还应注重资源的公平分配和环境正义，确保贫困和弱势群体在环境改善过程中能够受益，避免“绿色歧视”。

再者，促进国际合作，推动全球生态治理。由于生态危机的全球性特征，生态社会主义的转型不仅是国内的任务，还需要全球范围内的协同合作。许多生态问题，特别是气候变化、跨境污染和生物多样性丧失等，超越了单一国家的治理能力，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因此，国际合作是推动从资本逻辑向生态逻辑转变的一个重要策略。国际社会应加强对全球环境问题的关注，建立更具包容性和公正性的全球治理体系。在这一体系下，发达国家应承担起更多的历史责任和现实责任，特别是在生态债务和技术转让方面，为发展中国家的生态转型提供支持。同时，全球生态治理必须考虑到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具体情况，制定具有差异化的政策，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双重目标。国际合作需要通过全球性的环保协议和组织实现协同作用。类似《巴黎气候协议》等全球性协议为推动国际间的环保合作提供了框架，但未来还需要更多具体的政策和实施措施，尤其是在推动绿色技术共享、环保资金援助等方面，全球范围的协调合作至关重要^[9]。

最后，提升教育和社会意识，推动文化转型。从资本逻辑向生态逻辑的转变不仅仅是经济结构和治理模式的调整，更是文化和社会意识的深刻变革。生态社会主义的推进需要全社会树立生态文明的意识，提升公民对环境问题的认知和责任感。通过教育系统、媒体传播和社会运动，向公众普及生态伦理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形成广泛的社会共识，从而推动环境治理的长期效果。

综上所述，从资本逻辑向生态逻辑的转变不仅是一个经济层面的结构性转型，更是政治、社会和文化全方位的深刻变革。通过废除资本主义的利润最大化模式、推动“生产为使用”的经济结构、建立民主化的环境管理机制、加强国际合作及提升社会环境意识，我们可以为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铺平道路。生态社会主义的转型策略提供了一条可行的路径，推动全球向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公正的目标迈进。

五、结论

奥康纳的“第二矛盾”理论拓展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视野，指出资本主义不仅面临劳资关系的“第一矛盾”，更因资本积累对自然资源的掠夺而陷入生态再生产危机。资本逻辑以利润最大化为驱动，无视自然界有限性和生态平衡，导致资源枯竭、环境退化和社会不平等加剧，而生态逻辑则主张可持续发展与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废除利润最大化模式、推动“生产为使用”、民主化环境管理和全球合作等转变策略不仅批判了资本主义的不可持续性，也为未来社会提供了可行方向。

展望未来，从资本逻辑向生态逻辑的转变虽面临重重阻力，但随着生态危机的加剧和全球意识的觉醒，人类社会有望通过技术创新、社会动员和国际协同，逐步迈向生态社会主义的理想图景。这一转型不仅将缓解生态压力，还能推动社会公正与全球公平，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奥康纳的理论为我们理解和应对资本主义多重危机提供了深刻洞见，其生态社会主义愿景激励着全球范围内构建一个可持续、公正的美好未来的努力。

参考文献：

- [1] 李红松.奥康纳生态学社会主义批判——以《自然的理由》导言为中心的分析[J].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4,24(02):29-37.
- [2] 冯明宇.平台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审视——以资本主义经济的“反生态性”为线索[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24(02):10-18.
- [3] 雷博华.奥康纳生态学思想评析[J].武夷学院学报,2024,43(01):30-35.

- [4] O'Connor, James. *Natural causes: Essays in ecological Marxism*[M]. Guilford Press, 1998.
- [5] Foster J B. *Marx's Ecology: Materialism and Nature*[M]. Monthly Review Press, 2000.
- [6] Böhm S. *Upsetting the offse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arbon markets*[M]. London: MayFlyBooks, 2009.
- [7]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2018.
- [8] Boulding K E. *The Economics of The Coming Spaceship Earth*[R].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66.
- [9] Horowitz C A. *Paris agreement*[J]. *International Legal Materials*, 2016, 55(4): 740-755.

From the Logic of Capital to the Logic of Ecology: an Ecological Reading of the Contemporary Crisis of Capitalism by O'Connor

Chen Nan¹

¹ *School of Marxism, Nan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Nanjing, China*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contemporary capitalist globalization, multiple crises in the economic, social, political and ecological spheres have become more and more prominent, especially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resource depletion and climate change, which pose serious challenges to the sustainability of natural ecosystems and the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ies. The article takes James O'Connor's theory of ecological Marxism as an entry point to explore his ecological reading of the crisis of capitalism. O argues that capitalism, through the excessive plunder of natural resources, not only leads to a crisis of ecological reproduction, but also exacerbates social inequality and threatens sustainable social development. Unable to improve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avoid ecological crises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capitalism, it is necessary to fundamentally abolish capitalism's profit-maximizing model and construct a development model that transcends capitalism.

Keywords: O 'Connor; Ecological Marxism; Ecological Crisis; Ecosocialism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2.568

余华和森鸥外的女性观对比

——以《文城》和《雁》的女主形象为中心

王云樵

(四川外国语大学 日语学院, 重庆 400031)

摘要:“追寻自我觉醒与情感解放的女性”作为近代文学的核心主题之一,不仅在女性主义作家笔下熠熠生辉,亦在男性作家笔下得到独特诠释。余华和森鸥外作为中国现代和日本近代的先锋作家,分别在《文城》与《雁》中凝聚了自己独特的女性观。两部作品在塑造女性形象时,既延续了男性凝视的传统框架,又通过叙事语调的置换通过女主视角传递内在声音,从两位女主人公相似又不同的人物形象中,既诉说着近代中日女性自我觉醒的现实与幻觉,亦映射出两位作家截然不同的女性观。

关键词: 余华; 森鸥外; 《文城》; 《雁》; 女主形象; 女性观

一、《文城》与《雁》

余华作为中国当代文坛一位杰出的作家,被广泛评价为新时期先锋文学的开拓者。余华的创作蕴含近代价值观与传统伦理观、价值观之间的决裂,体现对传统文化的反叛,正如先锋文学特征,他打破公认的规范和传统,不断创造新的艺术形式和风格,通过离异既定的秩序,从中宣布自己的主体性,向传统文化的教条和信念发起挑战^{[1][366]}。

森鸥外是日本近代文学的双壁之一,从德国留学归国后以昂扬的姿态在文坛崛起,为明治初期的日本社会带来了启蒙之风,是日本近代文学的先驱者和开辟者。如刘娟所述,“鸥外的创作选材广泛,内容常常围绕文化的碰撞和冲突,体现了当时日本新旧思想的对抗与融合,与明治时代精神及其内在矛盾冲突相吻合,也与明治时期近代文明的曲折发展趋势相符合。”^{[2][3]}

在“封建与近代的思想碰撞”这一主题上,余华和鸥外的创作可谓不谋而合。在《文城》之前,余华凭借《在细雨中呼喊》《活着》《兄弟》《许三观卖血记》名声大噪。但如郭晓雨所说:“其中的女性不是‘贤妻良母’就是‘娼妇’,对女性身份的简单化处理使得她们身份单一、形象雷同,处于被遮蔽的状态,缺乏自我而显得空洞。”^{[3][101]}然而在《文城》中,这样的女性书写迎来了转变,小美复杂又矛盾,其形象充斥着对自我的追寻,体现着对女性自我的关注。而在《雁》之前,鸥外最有名的作品当属《舞姬》《泡沫记》《信使》的浪漫三部曲。这三部作品都是鸥外以自己留德期间的生活体验为来源的带有自传色彩的小说。爱丽丝、玛丽、伊达分别作为三部作品的女主人公,在鸥外笔下都拥有着强烈的近代性自我。然而她们三人的自我更像是一种“飞来之物”,充满不真实感。鸥外将女性作为背景板,通过三位女主人公与生俱来的自我推动故事发展,传递自己内心的自我纠葛。直到《雁》的诞生,鸥外才首次描绘出了一个生活在日本近

[作者简介]

王云樵(2000—),男,四川泸州人,四川外国语大学日语学院日语语言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日本近现代文学。

[基金项目]

四川外国语大学校级研究生科研创新重点项目“以象征符号似的叙事诉说现实和幻觉——《雁》与《文城》中女主形象的比较研究”(编号:SISU2024YZ027)。

代社会现实的女性，小玉深受束缚却向往自由，传达着女性的自我困境。

因此，在《文城》和《雁》之前，余华和鸥外在塑造女性形象的时候，可以说都是无意识地把男性对女性的某种期许，从男性的角度出发，寄托在女性的形象上，让这些女性的自我意识缺失，更多的是对男性的一种服务，一种虚无的自我存在的丧失。而《雁》和《文城》作为二人创作生涯中首部也是唯一一部包含女性主视角的现实小说，矛盾又立体的两位女主人公体现着鸥外和余华女性书写的转变和对女性群体的关怀，从中更能够观察到鸥外和余华在现实中各自的女性观。

二、于他者境遇中挣扎的自我

在余华和鸥外的笔下，《文城》和《雁》的故事均发生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传统与近代碰撞时期，而主人公的小玉与小美作为生活在底层的社会女性，在生存轨迹中被异化为“他者”，经历物质与精神的双重边缘化。

小美和小玉作为底层人家的女儿，出于艰苦的现实条件而经受着生存上的压力，两者既面临着物质资料贫乏导致的生存困境，又在苦难和困境中被家人定义，受限于所赋予的身份之中，生存空间由此遭到限制。小美在受男尊女卑封建思想荼毒的家庭之中，被父母当作“贤妻”培养；小玉在受前近代思想侵蚀支配的父亲影响之下，作为“艺妓”成长。

为了解决生存困境，两人最终都成为了家庭的牺牲品，殊途同归于一条道路——“出嫁”。事实上，在“出嫁”后，小美和小玉的生存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改变，但小美成为童养媳，小玉则成为小妾，虽是“出嫁”，却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妻子”，在新的身份幻觉中，两人同时面临着新的现实生存困境。

小美和小玉在各自的现实中带着被赋予的身份嫁到了富裕人家，成为了“妻子”似的附属物。小美在受男尊女卑封建思想荼毒的家庭之中，被父母当作“贤妻”培养，最终沦为沈家的“童养媳”；小玉在受前近代思想侵蚀支配的父亲影响之下，作为“艺妓”成长，最终沦为末造的“妾”。

二人同样作为贫穷人家的女儿和富贵人家的“妻子”，成为了原生家庭的牺牲品和婚姻的附属品。在这样的现实中，二人在他者境遇中愈陷愈深，在二人身上由他人打上的本应是幻觉的烙印逐渐加深，在不知不觉间转化为现实。

而小玉和小美面临苦难和困境的最直接的原因是指向自我的，正因存在自我的挣扎，才有悲剧的诞生。小玉和小美置身于他者境遇中，作为附属品受到支配，在成长阶段，二人被周遭当做他者凝视，在这个过程两人都失去了自我，成为了“艺妓小妾”和“贤妻良母”之幻觉的现实载体。

然而，小美和小玉却不只是逆来顺受，出于对自由和美好的向往，小玉和小美都在他者境遇中挣扎着寻找自我。小美在林祥福这一他人的爱和尊重下，在自己和他人的关系中通过外省寻回了自我。小玉则以父亲和末造为契机，向冈田勇敢求爱，在自己和自己的关系中通过内省抵达了自我。哪怕小美和小玉的自我觉醒只不过是昙花一现，终究无法逃离破灭的结局，却也是二人挣扎的象征。

林祥福将小美视作主体，小美却在“生育的性”的肉体记忆下，将自己视作他者。小玉为了满足自我欲望察觉到“主体的性”的肉体记忆，她将自己视作主体，却被冈田视作他者。无论是小玉还是小美，都没有摆脱传统规范中“贤妻良母”的精神记忆，也没有冲破家族制度的藩篱。在余华和鸥外的笔下，小美和小玉都呈现出追求自身欲望的“主体的性”，但生儿育女、相夫教子的“生育的性”在二人的肉体记忆中占绝对地位，更没有将“主体的性”作为武器来倡导。

这样共同的“压抑—觉醒—破灭”的自我觉醒轨迹，却存在“外省式觉醒”和“内省式觉醒”之分。外省式觉醒的小美走不出的是自己内心的围墙，内省式觉醒的小玉打不破的是外界环境的束缚。看似相同的人物轨迹，但外省式和内省式之间却存在着本质的差异，两位作家内心的女性定位及女性观蕴含其中。

三、源自现实的美好祈愿——余华的女性观

作为男性作家，余华在创作之时很难站在女性的立场进行思索，就如余华自己所认为的“女性心理不好把握”，这与其男性视角的局限、个人经历的得失有着密切的联系^{[4]36}。此前余华笔下的女性形象，无论是贤良顺从的典范，还是庸俗放纵的符号，抑或冷漠无情的化身——本质上是基于男性视角的想象建构，服务于不同维度的男性需求。这些角色多被框定为妻子、母亲、女儿或寡妇等身份，其存在意义完全依附于男性角色。一旦男性角色消失，女性便沦为空洞的叙事工具，既丧失主体性，亦失去言说内心的话语权。此类形象实为传统男权观念在中国近代文学中的具象化体现，折射出女性价值被规训为服务男性的功能性存在。

但是这样的女性观在《文城》中窥见了转向。小美不再是空洞的存在，而是作为一个复杂的个体跃然纸上，女性也从被男性角色操纵的客体之物变为了可以掌握自己命运的独立形象。正如张静怡所说，“小美不同于余华笔下的其他女性人物，她不是余华作品中常见的‘善之母’‘恶之花’，也不属于‘刚之羊’，她在封建的重压下苦苦挣扎，又在话语权的争取与放弃中萌发出新的自我主体意识。”^{[5]33}

小美的形象承载着自我意识的深层矛盾，既渴望冲破封建枷锁，又深陷传统规训的泥潭。其挣扎过程凸显了女性在困境中的独特价值。余华通过这一角色，既展现女性生存的艰难，又揭示其自我意识从萌芽到衰落的悲剧性。小美既非完全符合封建伦理对女性的期待，亦未真正融入女性解放的叙事，其“物化”与“半从属”状态折射出转型期女性的身份撕裂。

余华对小美命运的安排充满悖论，引发读者“哀其不幸”与“怒其不争”的双重情感，最终导向对角色命运的深刻共情与反思。在其笔下，所有生命皆试图反抗命运束缚，小美对“文城”的追寻正是这种抗争精神的缩影——即便结局注定虚无，仍执著于突破生存的边界。

“文城”是虚幻的，象征着近代女性无法抵达自我的现实。同时，虚幻的“文城”也象征着余华对女性处境的美好寄托。在对人性真善美这一主题的追求下，余华作品中的生命都在奋力挣扎，试图摆脱命运的束缚，他们每个个体生命背后都具有一种来自本身的对抗命运的强大力量，向往文城的小美也不例外。正如日译版中，《文城》被译为《夢幻の町》（梦幻之城），“文城”虽然只是幻觉，却承载了在现实中，余华对女性解放的关怀。即便现在仍是幻想，但在真善美人性的指引下，就像文中阿强所说：“总会有一个地方叫文城。”^{[6]330}相信终有一天，梦幻会成为现实。

四、幻觉背后的潜藏真相——鸥外的女性观

鸥外以“雁”为题，暗示“雁”的命运象征着人物的命运。而“雁”是群居动物，在迁徙时习惯成群结队。一只“雁”的死象征着小玉的悲剧命运，而在那一只雁的背后，还有无数只雁的存在。因此，“雁”实际上正是近代日本社会广大女性的象征。

在“雁”之中，鸥外看到了在传统精神下女性的处境，以及她们自我的挣扎和生活的苦难，而对于代表了这一切的小玉，他安排了冈田这一男性来成为她的希望。冈田可以说是鸥外本人的化身，一方面，他是帝大的医学生，向往着西方的先进文化；另一方面，他自幼接受传统教育，立身处世的功名之心和家国情怀驱使他维护国家秩序。冈田可以说是处于近代与封建的交叉路口，代表着明治初期的大多数知识分子。

鸥外本人也正是如此，其思想则呈现出传统与近代的撕裂。作为率先接触西方思想的启蒙家，他试图赋予女性觉醒的可能性，但自幼浸润的封建伦理又使其无法彻底接纳女性的真正觉醒。这种矛盾投射在小玉的形象塑造中，他清楚“艺妓”和“妾”应是被留在过去之物，却还是在小玉身上刻下了烙印；他既以细腻笔触刻画其自我，又以“被击落的雁”隐喻其觉醒的夭折。最终，小玉眼中的“无限遗憾”及悲剧结局印证了森鸥外的保守立场，他欣赏的仍是封建伦理规训下的“人偶式”女性美，而非真正独立的女性人格。

矶贝英夫在评价《雁》时指出：“小玉是一位‘总是很温顺的’对于父亲所说的话‘百分百同意’的女子^{[7]68}。森鸥外笔下的少女小玉被赋予‘闺阁式’的纯净特质：涉世未深、性格恬静，其外在形象始终保持着传统审美下的‘洁净之美’。这种刻画透露出作者对女性形象的理想化投射，他将小玉的‘美丽’神圣化，实则暗含对封建伦理中‘未觉醒的女性美德’的迷恋。尽管鸥外明白“艺妓”与“妾”是应被留在过去之物，但他还是无法违背内心的价值观。

这种思想的双轨性导致其女性观的内在冲突：理性认知支持女性解放，情感深处却固守男权秩序。他试图通过“矛盾的调和”自我安慰，实则暴露了近代知识分子在传统与现代夹缝中的精神困境。于是最终鸥外找到了二者最佳的融合点，那就是女性有“意志”地自我“牺牲”。正如文中对小玉的心理描写：“小玉当初除了想让父亲享享福，没有任何别的念头。勉强说服了固执的父亲，做了人家的外室。只当成一种不得已的堕落，在利他的行为中求得一种心安。”^{[8]359}这也是他“利他的个人主义”思想的体现，他只能以一种与自己最为契合的矛盾的女性观来自我安慰^{[9]36}。鸥外心中理想的女性形象可见一斑。

所以，他看似赋予了小玉“娼妇性”的“艺妓”外表和身份，让小玉勇敢追求自由和欲望，实际上却往小玉身上刻下“贤妻良母”的精神记忆；好像给予了小玉自我觉醒的希望，却又通过冈田这个化身扼杀了小玉的自我。结合鸥外贯穿创作生涯的“諦念”（放弃）思想，他对待女性就像冈田看待小玉一样，更多的是站在消极的旁观者角度。冈田面对小玉的感情选择出国留学的情节与鸥外另一部作品《舞姬》中丰太郎为了前途抛弃爱丽丝的情节高度相似，更是自己亲身经历的写照。鸥外的创作核心始终围绕他“自己的自我”，《雁》也不例外。

“雁”作为汉字在日语中有两个读音，但鸥外的《雁》发音同日语中的“癌”，考虑到鸥外精通医学，这也

许是他故意为之。但从另一方面考虑，如若读作“瘤”的“雁”只是巧合，那这一系列的偶然，或许也在无意中代表了他思想中的毒瘤。鸥外看似拥有先进的女性观，但其中的先进不过是幻觉，现实是隐藏在背后的落后的女性观。

五、结语

《文城》与《雁》在各自的视域下针对女性的自我做了系统描绘，通过小美和小玉在苦难中挣扎的自我，传达了作家对“女性自我觉醒与情感解放”的思考。余华和鸥外在叙事中一定程度上突破了男权语境的条条框框，批判落后的封建伦理观点，虽然小美和小玉对自我的追寻最终都化为幻觉消逝在了现实，但通过她们的命运轨迹，两位作家在传达女性意识、引发读者深思的同时，表达了自己对女性生存的关照。

“雁”是有生命之物，鸥外赋予了它们翅膀，最终却没有让它们飞翔。自由幻觉背后的残酷现实象征着鸥外看似先进实则落后的女性观。“文城”是无生命之物，没有自由甚至不存在于现实，实际却承载着余华对女性解放的美好寄托。虚幻的现实背后是余华近乎乌托邦式美好祈愿和积极的女性观。

鸥外身处特殊的历史时代中，他身上的矛盾特质及女性观并不仅是他自己一人所独有的，作为社会精英的鸥外代表着近代日本的上层建筑。余华在中国当代文坛拥有独一无二地位的成就，在通过文字引起读者共鸣这一点上，他的观念也代表着社会的观念。然而同样是医生的身份，鸥外出生医生世家，是高高在上的陆军一等军医；余华出生县城，是名不经传的卫生院牙科医生。二人立点的不同导致了代表阶级的不同。代表时代意志的鸥外一定程度上象征着维护统治的封建伦理，代表平民百姓的余华一定程度上象征着对美好生活的自由向往。从这种象征性中，再次暗示了余华与鸥外二人积极和消极对立的女性观。

- [1]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3.
- [2] 刘娟.森鸥外小说创作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2022.
- [3] 郭晓雨.丧失自我的空洞存在——探析余华作品中的女性观[J].名作欣赏,2022(12):101-103.
- [4] 郝欣如.从女性书写的转变看余华的女性观[J].今古文创,2022(23):34-36.
- [5] 张静怡.女性生存困境的现代书写——以余华《文城》中的纪小美为例[J].文学观察,2023(10):31-33.
- [6] 余华.文城[M].北京:北京十月出版社,2021.
- [7] 磯貝英夫.『雁』のお玉[J].解釈と教材の研究,1959(4):67-71.
- [8] 森鸥外.森鸥外精选集[M].高慧勤,等译.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0.
- [9] 么淑云.森鸥外作品中的女性形象[D].黑龙江:黑龙江大学,2013.

A Comparative Study of Yu Hua and Mori Ōgai's Views on Women —Focusing on the Female Protagonists in *Wencheng* and *The Wild Geese*

Wang Yun-qiao

School of Japanese Studies, Sichu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31

Abstract: The theme of "women in pursuit of self-awakening and emotional liberation," as one of the core motifs in modern literature, shines not only in the works of feminist writers but also finds unique interpretations in those of male authors. Yu Hua and Mori Ōgai, as pioneering figures in modern Chinese and Japanese literature respectively, have crystallized their distinct perspectives on women through their novels *Wencheng* and *The Wild Geese*. While both works adhere to the traditional framework of the male gaze in shaping female characters, they simultaneously subvert this paradigm by employing shifts in narrative tone to amplify the inner voices of their protagonists. Through the portrayal of these heroines—similar yet divergent—the novels articulate the realities and illusions of women's self-awakening in modern China and Japan, while also reflecting the authors' strikingly contrasting views on femininity.

Keywords: Yu Hua; Mori Ōgai; *Wencheng*, *The Wild Geese*; Female Protagonists; Views on Women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2.619

封建礼教下的双重困境：

《红楼梦》与《源氏物语》中的已婚女性形象对比研究

张洪涛¹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法学院 浙江杭州 310000)

摘要：本文以中国和日本两国的古代经典名著《红楼梦》、《源氏物语》为研究对象，通过对两部作品中具有代表性的已婚女性形象，分为妾室、正妻两组进行对比，探讨中日两国古代社会中已婚女性所共同面临的境遇及其缘由。本文旨在通过这种跨文化比较，深入理解中日古代社会的性别伦理，并为当代社会的性别平等议题提供历史参照。

关键词：《红楼梦》；《源氏物语》；女性形象；封建礼教；婚姻制度

作为中国极具盛名的古典名著，《红楼梦》在数百年来引得无数人为之着迷和痴狂，甚至形成了专门的研究领域“红学”。而《源氏物语》则被称为日本版的《红楼梦》，在日本亦被奉为古典文学的巅峰之作。两部作品虽在创作时间和社会及文化背景上存在明显差异，但却在描绘女性的生存与命运方面却呈现出极高的相似性。《红楼梦》以宏大的家族兴衰为背景，细腻描绘了一群闺阁女子的悲欢离合；《源氏物语》则通过光源氏三代人的爱情纠葛与政治斗争，揭示了平安时代的社会风俗和皇室权力的错综复杂。本文将聚焦于这两部作品中的已婚女性形象，将四位具有代表性的女性形象分为妾室和正妻两组，通过对两部作品中女性形象的对比分析，探讨古代东亚社会中女性所面临的共同困境及其根源。

一、妾室的困境：赵姨娘与夕颜

在《红楼梦》和《源氏物语》中，同样身为妾室的赵姨娘和夕颜，也具有极强的相似性，她们表面上的不同遭遇则反映了古代东亚社会中妾室共同的悲惨命运。

赵姨娘是《红楼梦》中贾政的妾室，也是贾环的生母。她的形象较为复杂，既有受害者的一面，也有明显的施害者特征。首先，作为妾室，赵姨娘的社会地位较低。她在贾府中常常被边缘化，很少出现在台面上。一旦出现，几乎都与丢脸、闹事儿扯上联系。这其实反映了妾室在封建家庭中的尴尬地位。其次，赵姨娘与正室王夫人之间存在激烈的矛盾和竞争关系。出于对贾宝玉和王熙凤受到偏宠的嫉恨，她几次采取卑劣手段生事，包括利用自己的儿子贾环。这反映了多妻制下妾室为了生存而不得不进行的残酷竞争。最后，赵姨娘的行动自由受到严格限制，她无法自由决定自己和儿子的未来。这说明妾室不仅缺失社会地位，也失去了个人自由。

而夕颜在《源氏物语》中是光源氏的一个出身粗鄙的平民情人。她的遭遇反映了平安时代底层女性的脆弱处境。首先，夕颜出身平民，与贵族光源氏的关系使她处于极其不稳定的地位。她无法公开与光源氏建立正式关系，只能以隐秘的方式相见。这反映了当时社会阶级差异对爱情的巨大阻碍。其次，夕颜与光源氏的关系必须保持隐秘，这给她带来巨大的心理压力。她无法享有正常的家庭生活，也无法给予女儿稳

[作者简介]

张洪涛，重庆奉节人，本科毕业于内蒙古大学汉语国际教育专业，于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硕士在读，研究方向为跨文化。

定的生活环境。这反映了底层女性在与上层男性建立关系时所面临的困境。最后，夕颜的神秘死亡反映了低出身女性在贵族社会中的脆弱处境。她的悲剧结局说明，在严格的等级制度下，跨越阶级的爱情往往难有好结果。

通过比较分析《源氏物语》中的夕颜与《红楼梦》中的赵姨娘，我们可以发现虽然两部作品分属不同的历史时期和文化背景，但作为妾室的女性角色却面临着惊人的相似困境。

两位角色都面临着身份地位极不稳定的困境。夕颜虽然得到了光源氏的宠爱，却因出身低微而不能获得正式的婚姻地位，只能住在简陋的住所，生活在社会地位带来的阴影下。赵姨娘同样缺乏稳固的社会地位和经济保障，必须通过各种手段来确保自己和孩子的生存权益。这种地位的不稳定性使她们始终处于焦虑和不安全的状态中。

作为妾室，两人都无法获得社会的普遍认同。夕颜不敢与其他贵族女性来往，只能生活在社会的边缘地带。赵姨娘在贾府中地位低下，常常受到他人的歧视和羞辱。这种社会认同的缺失严重影响了她们的自我价值认同，导致性格逐渐变得偏激或自卑。

为了生存，她们不得不放弃尊严。夕颜虽得到光源氏宠爱，却时刻担心失宠，这种持续的不安全感最终导致她在意外中因惊恐而死。赵姨娘则必须在争宠中表现得急躁而刻薄，为子女的前途不断奔波操劳。她们的生存困境与人格尊严形成了难以调和的矛盾。

对子女前途的担忧是她们共同的心结。虽然夕颜没有生下孩子就离世，但她生前就极度担心自己的出身会影响与光源氏的关系。赵姨娘则要为环儿的前途四处奔走，想尽办法为孩子争取资源和机会。作为妾室所生的子女往往面临着社会地位和发展机会的双重劣势。

在封建礼教的压迫下，她们的人格发展都受到严重限制。夕颜因身份自卑而不敢表达真实的情感，只能以温柔恭顺的姿态示人。赵姨娘则在生存压力下性格日渐扭曲，不得不采取极端手段来争取利益。这种人格发展的局限最终导致她们无法实现自我的完整成长。

从这两个典型的妾室形象可以看出，在古代社会中，妾室的命运充满了悲剧性。她们既要面对来自正室的压力，又要承受社会地位低下带来的歧视，同时还要为自己和子女的生存前途不断奔波。这种多重困境不仅摧残了她们的人格尊严，也深刻影响了她们的心理健康和人生发展。她们的遭遇集中体现了封建礼教和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压迫，揭示了古代婚姻制度的不平等本质。

二、正妻的困境：王熙凤与葵之上

在《红楼梦》和《源氏物语》中，正妻虽然地位看似尊贵稳固，但实际上也面临着诸多困境。王熙凤和葵之上作为两部作品中的代表性正妻角色，她们的遭遇反映了古代东亚社会中正妻的普遍处境。

在《红楼梦》中王熙凤是荣国府继承人贾琏的正妻，她精明强干，实际操持着贾府的日常事务。首先，作为正妻，王熙凤拥有一定的权力和地位。她能够参与家族内部的一些决策，对内帏的事物拥有管理权，这反映了正妻在封建家庭中的重要地位。但是，尽管王熙凤掌握了实际权力，但她仍然无法阻止丈夫的外遇。贾琏与尤二姐等人的关系让王熙凤长期处于嫉妒、难过、愤怒之中，备受煎熬，这反映了即使名义上与丈夫对等的正妻也难以独占丈夫。最后，王熙凤为了维护自己的地位，不得不采取各种手段，包括残酷对待丈夫的妾室。这种行为虽然令人不齿，但也反映了正妻在多妻制下为了自保而不得不采取的生存策略。

而葵之上是《源氏物语》中光源氏的正妻，也是左大臣的女儿。她的遭遇反映了平安时代贵族女性作为正妻所面临的困境。首先，作为正妻，葵之上拥有崇高的社会地位。她的婚姻是政治联姻的产物，反映了正妻在维系家族利益中的重要作用。其次，尽管地位尊贵，葵之上却无法获得丈夫的真心。光源氏对她态度冷淡，这反映了在政治联姻下，正妻虽然地位稳固，但难以获得真正的幸福。最后葵之上产后早逝，这个悲剧性结局反映了当时女性在生育方面所面临的巨大风险，同时也暗示了正妻在完成传宗接代的任务后，往往被边缘化的命运。

通过对比王熙凤和葵之上的遭遇，我们可以深入洞察古代东亚社会中正妻所面临的复杂困境。这些女性虽然拥有表面上的尊贵地位和一定的家庭权力，但实际上却背负着沉重的责任和无形的枷锁。她们不仅需要管理繁琐的家务，还肩负着传宗接代的重任，这种权力与责任的双重压力常常让她们疲惫不堪。

在感情生活中，正妻们更是难以获得真正的安全感。一夫多妻制的社会环境使她们不得不时刻面对丈夫可能的外遇，甚至要与其他女性展开残酷的争宠竞争。这种持续的情感压力和不安全感，严重影响了她们的生活质量和心理健康。

更令现代人无法想象的是，正妻的尊贵身份非但没有为她们带来更多的自由，反而成为了束缚她们的枷，给她们带来诸多苦痛。她们的角色被严格限定在家庭之中，几乎没有有机会去追求个人的价值和自

由。同时，许多正妻的婚姻还是政治联姻的产物，盲婚哑嫁，从而迫使她们不得不在家族利益和个人幸福之间做出艰难的选择和妥协。

这些困境反映了中日古代社会中的性别失衡，以及婚姻制度的弊端。即使是地位较高的贵族女性，想要摆脱社会对她们的束缚依旧难如登天。正妻们的遭遇警示着当代女性，在一个性别不平等的社会中，表面的地位和权力并不能真正保障女性的幸福和自由。只有从根本上改变社会的性别制度，才能真正实现性别平等，让所有女性都能自由地追求自己的人生价值和幸福。

这些困境的根源同样可以追溯到前文提到的社会因素，如父权制社会结构、不平等的婚姻制度、封建礼教的压迫等。正妻的遭遇进一步证明，在古代东亚社会中，即使是地位最高的女性也难以逃脱被压迫的命运。

三、造成女性悲惨遭遇的深层原因

通过对《红楼梦》和《源氏物语》中已婚女性角色的分析，我们可以归纳出造成她们悲惨遭遇的两大主要原因：封建礼教的束缚和男权社会的压迫。

(一) 封建礼教的束缚

无论是中国的清代还是日本的平安时代，社会都处于男性主导建立的封建等级制度之下。这种社会决定了女性在两性关系中处于从属地位，使得她们天然地丧失了自主权。在《红楼梦》中，我们可以看到家族权力完全由男性掌控，女性即使有才能并且掌握了一些权力，如王熙凤，也难以真正影响家族决策。在《源氏物语》中，虽然女性似乎有一些表面上的自由，然而实际上她们的命运仍然掌握在男性手中，难以自主。

中国的儒家思想不仅在中国根深蒂固，作为好学生的日本也大量吸收了儒家文化，对女性的道德、行为规范都做出了严苛的限定。“三从四德”等思想严重限制了女性的自由，潜移默化地迫使她们磨灭自我个性以符合社会期待的角色。在《红楼梦》中，我们看到即便强势如王熙凤这样的女子，仍然需要谨言慎行，自抑以符合“贤妻良母”的标准。在《源氏物语》中，葵之上同样被要求忍受丈夫的滥情，不得表露嫉妒之情，做出贤妻模样。

(二) 男权社会的压迫

两部作品都反映了当时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男权社会，主要体现在一夫多妻制。这种制度本质上是对女性的不公平，它允许男性同时与多个女性保持关系，而要求女性对一个男人保持绝对忠诚。在《红楼梦》中，我们看到贾琏可以同时与王熙凤、平儿和尤二姐等多个女性保持着夫妻关系。同时在《源氏物语》中，与光源氏同时保持亲密关系的女性更是不计其数。然而，两部作品中却少有胆敢违背贞操道德，纵情声色的女子。这种制度下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两性婚姻中的悬殊地位，引发女性之间的残酷竞争，也使得即使是最受丈夫宠爱的女性也难以获得真正的幸福。

同时，男权社会下的女性缺乏足够的、合格的教育。虽然两部作品中的女性角色大多受过一定教育，但这种教育主要是为了培养她们成为合格的妻子和母亲，她们的个人发展则从未被考虑在内。《红楼梦》中大观园的女孩们虽然能读书吟诗，弹琴作画，但她们所接受的这种教育最终目的仍然是为了在婚姻市场上更具竞争力，甚至被视为姑娘家的玩意儿。《源氏物语》中女性的教育同样如此，仅是为了培养她们成为合乎社会规范的女性。

结语

通过对《源氏物语》和《红楼梦》中四位已婚女性角色的比较研究，我们可以看到，在封建礼教和男权社会的双重压迫下，无论是正妻还是妾室，都面临着难以摆脱的困境。正妻要承担维护家族秩序的责任，同时忍受丈夫的不专情；妾室则要在争取生存权益的过程中，不断面对身份低下带来的种种困扰。这种困境的形成，根源在于封建礼教对女性的束缚和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压迫。这种制度性的不平等，最终导致了女性在婚姻生活中的悲剧命运。这种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历史，也能为当代社会中的性别平等提供有益的思考。

参考文献：

- [1] 曹雪芹著：《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

- [2] 紫式部著, 丰子恺译: 《源氏物语》,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5 年版
- [3] 王岩: 《日本平安时代女性文学繁荣的条件与背景》, 东北大学学报, 2005 (06)
- [4] 杨倩: 《<源氏物语>中女性形象——日本平安时代女性的哀歌》, 才智, 2013 (21)
- [5] 董江洪: 《<源氏物语>中的女性世界》, 语文学刊, 2014 (10)
- [6] 李先瑞: 《两个善妒的女人——试比较王熙凤和六条妃子》, 时代文学, 2015 (1)

**The double dilemma under the feudal ethic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married female images in The Dream of Red Mansion
and Genji monogatari**

Zhang Hongtao

Hangzhou Dianzi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00

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and The Tale of Genji, the ancient classics of China and Japan,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rough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typical married female images in the two works,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of concubines and wives for comparison, to explore the common circumstances faced by married women in the ancient society of China and Japan and their reasons.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deeply understand the gender ethics of ancient Chinese and Japanese society, and to provide historical reference for gender equality issues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Keywords: The Dream of Red Mansion; Genji monogatari; Female image; Feudal ethics; Marriage institution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2.564

进退之间：清代江南文人的隐逸思想及形成原因

——以苏州状元石韫玉为例

孙铭泽¹ 董粉和¹

(¹苏州科技大学 社会发展与公共管理学院，江苏 苏州 215009)

摘要：隐逸思想在江南文脉的延续中意义重大。以清代苏州状元石韫玉为研究对象，通过梳理石韫玉的个人生平、交际网络与文学创作，结合地域特色及时代特征，可以清楚地揭示石韫玉的隐逸思想及其形成原因，进而探讨乾嘉时期江南文人隐逸思想的时代特征及其文化内涵。石韫玉在宦海浮沉十八年之后，归隐乡里，通过掌教书院、藏书治学、募劝赈济等方式，实现自己隐逸理想。以石韫玉为中心的案例分析表明，清代江南精英阶层，已经很好地调和了“经世”和“遁世”之间的仕隐矛盾，并重构了传统隐逸思想的内涵。

关键词： 石韫玉、隐逸思想、江南文化

石韫玉作为乾、嘉、道时期的著名文士，“为文贯穿古今，尤长于经世之学”^[1]。石韫玉的隐逸思想，飘飘然有魏晋之风，也体现了儒家“君子固穷”的达观之态，更有他自己在经世济民宏愿之外的人生哲思。石韫玉对于隐逸思想的实践，折射出了清中期政治生态和文坛风气的变迁，也展现出清代江南精英阶层隐逸为表，济世为里的生存智慧，揭示了隐逸文化在江南文脉中的独特意义。

一、石韫玉的个人经历

石韫玉（1756-1837），字执如，号琢堂、竹堂、竹堂居士、竹翁、归真子、绿春词客、西碛山人，又号花韵庵主人，亦称独学老人，清苏州府吴县人，生于清高宗乾隆二十一年，卒于清宣宗道光十七年，享年八十二岁。石韫玉祖籍丹阳，其曾祖石政在明末清初的战乱中逃难至苏州定居。祖父石邦桢，父石熙载。石韫玉少时即聪颖过人。其人文武双全，才华横溢。法式善赞其曰：“大廷封策名第一，上马提戈下马笔。见者诧为飞将军，岂知渠是苦吟身。”^[2]石韫玉于乾隆四十四年中举，经历十年不第后，于乾隆五十五年考中进士，在殿试中被特拔置第一甲一名，授翰林院修撰。

石韫玉自乾隆五十五年入仕，至嘉庆十二年告病归田，为官十八载，清心自守，忧国忧民。石韫玉历任翰林院修撰、福建乡试正考官、提督湖南学正、日讲起居注官、四川重庆府知府兼护理川东道、陕西潼商道、山东按察使署布政使。嘉庆十二年，部议革职。仁宗念其军功，赏给翰林院编修、国史馆行走。旋以足疾请辞归田。

石韫玉归田后，勤勉治学，乡中多有善举。他先后延席杭州紫阳书院、金陵尊经书院、苏州紫阳书院，还在扬州书局校勘《全唐文》，在苏州纂修道光《苏州府志》。石韫玉晚年退隐林泉，时常扶危济贫，又协同乡贤士绅建设乡里，在乡中多有善举。道光十一年（1831）淮北遭灾，许多灾民流落苏州，他募劝赈济；道光十四年（1834）苏州遭遇水灾，他亦是不顾年迈劝助赈济。“凡乡中有善举，公必出为领袖，始终

[作者简介]

[1]孙铭泽（1999—），女，汉族，苏州科技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2]董粉和（1964—），男，汉族，苏州科技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无倦”^[3]，堪称乡贤典范，有忠厚长者之风。

《清史列传》中评价石韫玉：“生平律身清谨，未达时，见得罪名教书，即焚之。家置一纸库，名曰孽海。然性和易近人，不立崖岸。所为文贯穿古今，尤长于经世之学。诗破除唐宋门户，援笔立成。”^[1]著有《独学庐诗文集》，卒年八十二。

二、石韫玉的隐逸思想

石韫玉是清代苏州状元，也是江南文人的代表。其诗文著作《独学庐诗文稿》，内容丰富，体裁多样，较好地展现乾嘉道时期的文化背景和特色。今人从《续修四库全书》中辑出石韫玉的《独学庐文稿》（包含有《独学庐初稿》、《独学庐二稿》、《独学庐三稿》、《独学庐四稿》、《独学庐五稿》、《独学庐余稿》、《独学庐文稿附录》诗稿二十七卷文稿二十一卷）及《独学庐尺牍偶存》二卷点校出版。这其中，石韫玉的许多诗文都是围绕着“隐逸”的主题展开的。在诗文中，他抒发了人生的慨叹、政治黑暗的困苦、儒家“君子固穷”的清高自矜、思乡之情和林泉之思等情怀，并探讨了隐逸哲学的实践性。

（一）石韫玉的清吟自赏

基于对传统隐逸文化的理解，石韫玉所追求的是一种“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淡泊自守、安贫乐道的隐逸生活。他在《西碛山人歌》中描绘了一个理想的自我形象：“山人无事终岁读，架上有书七千轴。食有杞菊无膏粱，衣有薜荔无纨縠。一壶酒，一张琴，入林不密山不深。门前落叶秋不扫，山人踪迹无人寻。”^[4]

在石韫玉的仕宦生涯中，外放重庆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在上任重庆知府之前，石韫玉担任过翰林院修撰、福建乡试正考官、提督湖南学正、日讲起居注官，并没有脱离出一个传统文官的政治眼光和升迁道路。但是在嘉庆五年（1800），石韫玉任重庆知府后，他逐渐开发了自己的军事才能，也更加关注到了百姓的疾苦、吏治的腐坏、朝廷的无能，更加深刻地认识了“道”和“治”之间的关系。

石韫玉在重庆知府的任上，勤勉有为，昼则马上追贼，夜则坐穹庐下治文书，三更方就枕，五更又拔营，寒暑不替。嘉庆五年（1800）春，白莲教军进犯重庆。石韫玉率部依据嘉陵江等有利地形，防守重庆，终使白莲教军败溃退走。石韫玉还与长寿县令余钰考察地形，商讨构筑长寿新城。在为政之余，他去往东川书院考课学子，关心地方文教事业。身处巴山楚水，远离京师、故土和家人，周旋在官民军吏之中，石韫玉对人生有了新的体悟：

“仕宦至二千石，古人以为荣名。今我忽忽不乐，毋乃不近人情。男儿堕地有志，此意真如耳鸣。独知不能共喻，他人安得相争？我生四十有五，平生有志无成。文不能调台鼎，赞襄密勿承明。武不能握兵符，风雷号令施行。坐守一州斗大，消磨秋蟀春鶗。何似拂衣归去，江湖放浪余生。杞菊一庐偕隐，鸥波万里同盟。”^[4]

石韫玉表示自己欲法古人，拂衣归隐，不问朝堂，放浪余生。这就是江南文人“在世超然”的隐逸文化。嘉庆七年，石韫玉在京家人回到原籍。但石韫玉依旧留在蜀地为官，征讨平乱。嘉庆八年春，石韫玉作下了《暮春书怀》二首，抒发自己的抑郁之情和归隐之心：

“自徙戎马蜀江湄，欲觅封侯苦数奇。春色渐随樊素老，宦情惟有杜鹃知。望云鹤已乘轩倦，上竹鱼犹縕壑迟。回首五湖烟水阔，黄金何日铸鵠夷？”^[4]

“当时解褐换朝绅，转烛光阴十四春。清佩曾趋三殿直，劳薪遍历九州尘。官逢邓禹应相笑，赋拟扬云未逐贫。闻道钧天张广乐，可知世有谪仙人？”^[4]

此外，对于家乡的思念，也构筑了他退隐归乡追求的一部分：“贝锦多销骨，金丹不驻颜。近来新乐府，惟谱《念家山》。”^[4]乡关何处？归期何在？“日落风起，群鸟乱飞。陟彼崇邱，遥望故扉。浮云如盖，罨我庭闱。京华虽乐，不如南归。溪有荇藻，山有蕨薇。薄言采之，可以疗饥。家有板舆，胜于駸駸。金貂烂然，不如莱衣。平沙迢迢，密雪霏霏。嗟哉游子，境与心违。”^[4]石韫玉对于归乡隐居的向往，使他构建出了隐逸生活的美好蓝图。他在自己的诗作《喜达里门》中畅想道：“他乡虽好不如归，喜趁晨光叩故扉。万卷藏书成敝帚，十年应举尚初衣。自怜道路风尘老，渐觉朋友慰藉稀。差胜洛阳苏季子，闺中尚有妇停机。”^[4]

嘉庆十年，石韫玉进京觐见仁宗时，适逢元旦佳节。节日中，处处都弥漫着喜庆团圆的氛围，但石韫玉却心生惆怅。他回顾平生，感慨万千：“人生百岁期，今朝我过半。盛颜既蹉跎，桑榆日已吁……倦鸟恋山樊，劳人思里閈。”^[4]嘉庆十二年，石韫玉辞官归田，再不出仕。

（二）石韫玉的交友酬唱

石韫玉在和友人的交往酬唱中，也经常表现出自己的归隐之心。嘉庆八年，合州知州龚际美罢官南归，

石韫玉为他作诗送行：“载石方知陆绩贫，一琴一鹤仅随身。共游宦海风涛里，心羡先登彼岸人。”^[4]石韫玉对于友人归乡隐逸的羡慕之情溢于言表。他感慨自己身在宦海风波不断，身不由己。嘉庆十年，石韫玉归葬自己原配夫人蒋氏，在家乡休养期间，他为友人蒋业晋题了《天远云归图》。在这首诗中，我们可以看到传统江南士人对于隐逸文化的理解和构思：

“世事茫茫何日了，白云唯有归山好。君不见，天上卿云五色深，萧索轮囷世共宝。几时霖雨到苍生，回风牵率空颠倒。何似闲云一叶轻，山中自悦无人酬。我亦身如岭上云，初心愿守青山老。一朝出岫本无心，欲归未归自烦恼。世人未解云何心，犹羡从龙甚夭矫。观君此图忽枨触，话到故山归计杳。松菊柴门亦已荒，劳人难卜归迟早。丁宁重与白云期，一片野心当自保。”^[4]

嘉庆十二年(1807)，石韫玉在山东按察使任上，因案被劾。嘉庆皇帝召其回京城，同僚孙星衍在济南汇泉僧舍为石韫玉饯行时，石韫玉即席而作了一首应酬诗，定下泛舟五湖、共话松菊之约：“十年鞅掌苦劳薪，暂得今朝自在身。无恙云林应住佛，有情鱼鸟尚依人。霜前落叶先辞树，风里飞花不恋茵。话到故山松菊好，归田相约五湖滨。”^[4]

这种闲云野鹤的隐逸生活，对于身在官场，不得自由的石韫玉来说，有着莫大的吸引力。石韫玉常与友人慨叹命运无常，畅想归隐林泉的宁静生活。从山东到京城后，石韫玉和故友法式善相会。多年不见，物是人非，石韫玉感慨良多。他也为法式善题扇三首，诗云：

“采采菱花寄所思，绿云一朵堕湘湄。故人若问依消息，笑指游鱼上竹时。

绿蓑青笠古元真，误向桃源二问津。满地江湖归未得，临渊尚有羡鱼人。

我本烟波旧钓徒，十年梦想在莼鲈。秋光正好人犹健，一片归心向五湖。”^[4]

此外，石韫玉与同年张问陶、表亲黄丕烈、王芑孙、袁枚等人都有诗文往来，还与沈复交好。在与友人的交际之中，石韫玉加深了对于隐逸文化的理解，也更加确信了自己对归隐生活的向往。石韫玉晚年与袁枚交往的信札内容，也佐证了石韫玉对于隐逸思想的实践性和行动力。

石韫玉在自己的抒怀之作中，对隐逸文化的理解是层层递进的，也是多方面的，兼具哲学思考和实践意义。而在退隐归乡之后，石韫玉结诗社，掌书院，贤达乡里，治学藏书，编纂方志，为江南文脉的传承做出了卓越的贡献。隐逸生活并没有让石韫玉消沉潦倒，反而使他的生命更加圆满。

三、石韫玉隐逸思想的形成原因

环境的熏陶对于人的成长是非常重要的。石韫玉作为清苏州府吴县人，生长读书皆在苏州。石韫玉在二十九岁赴安徽担任幕僚之前，除了几次短暂的北上应举的游历以外，一直在苏州流连。石韫玉祖籍丹阳，其曾祖石政在明末清初的战乱中逃难至苏州定居，传至石韫玉，已有四代。苏州是江南文化的中心之地。江南的隐逸文化由来已久，始于魏晋，唐宋时期形成其地域特色，经济重心南移后进一步完善。明清之际，江南市镇经济发达，文脉兴盛，文人众多，“市隐”文化发达。苏州的民俗风貌和地区文化，都对石韫玉的成长和人格塑造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苏州故土的文脉之盛、风物之雅、林泉之清、隐居之逸，都影响着石韫玉的文学创作和仕途选择。

此外，隐逸观的实践本身就包含着对不同的伦理矛盾的深刻思考，包括仕隐矛盾、儒道冲突、生存危机、知行合一、自我塑造等课题。其隐逸思想的形成，受到了当时的政治环境、石韫玉的个人经历、苏州地区的文化氛围和文化传统等多方面的影响。

(一) 苏州地区的隐逸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中，就有丰富的隐逸思想和较为明显的出世趋向。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隐逸思想，是去功利化的。它提倡人们与世俗功利相决裂，投身更广阔的天地，返璞归真，追寻人生的价值和宇宙的哲思，劳苦身心，淡泊自守，构建一个自由的、诗意的、天然去雕饰的精神乐园。在清代的苏州地区，这样的隐逸文化尤为盛行。苏州风物繁盛，文化底蕴深厚，文化氛围浓郁，文人雅士众多。江南地区文脉昌盛，文化活动频繁。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石韫玉从京城会试归来，与众好友结碧桃诗社，以诗会友，追慕风雅。诗社成员包括石韫玉、张邦弼、赵基、王芑孙、张诒、沈起风、沈清瑞七人。石韫玉晚年归田居家，还集结吴中旧友重聚，结成问梅诗社，吟诵切磋，乐陶陶然。问梅诗社作为道光年间苏州地区较有声望的诗社，是文人雅士们抒怀诉情，一展才华的聚会之所。其中，张吉安、王芑孙、吴翌凤、孙星衍、表亲黄丕烈等人俱在。亲友重聚，赏四时之景，乐林泉之乐，吟诗赏花，赏景赋诗，都让石韫玉的归隐生活更加闲适愉快。问梅诗社的活动多为怀古祝祷，如为东坡庆生、赏菊忆陶等，具有高雅的文化旨趣，在苏州当地也颇具影响力。道光十一年(1831年)，在重修沧浪亭，倡建吴郡名贤祠的时候，石韫玉还亲系赞语，

端书勒石。^[5]

另外，苏州园林中所包含的隐逸文化，也深深地影响了石韫玉。苏州作为江南的繁华之地，山水秀丽，人杰地灵，城中园林众多。当隐逸山水的文人思想融入了苏州园林的建造之中时，苏州园林也就代表了大隐于市的文人态度。苏州古典园林中，就蕴涵着深厚的中国传统隐逸文化审美内涵。苏州园林在方寸之间叠山理水，构天人之合于市井之内，正是江南文人在疏离政治和与世俗社会保持联系之间努力保持微妙平衡的现实投射。

苏州园林众多，许多退休官员和富商都会选择在苏州营造园林，颐养天年。苏州园林历史悠久，明清时期的名园层出。据学者研究，明代苏州园林 271 处，数量为全国之首。清代，园林也有 130 余处。^[6]苏州的园林文化是渗透进了苏州的城市建设里面的。清人沈朝初《忆江南》词云：“苏州好，城里半园亭”^[7]。作为中国传统文人园林，最重要的主题之一，就是隐逸。园林是隐逸意识的物化，也是隐逸意识的表达。园林是隐逸山林的思想和城市生活的完美结合，是文人雅士避世交游的理想场所。

苏州园林的造园立意之中，包含着宏大丰富的隐逸思想和审美。苏州古典园林将建筑、山水、花木高度融合，化自然与人和谐统一，借助诗文绘画进行审美点化，创造出融多种意象群的“天人合一”的审美境界，既是诗意栖居的地方，又是隐逸文化的中心。^[8]苏州园林的造园旨趣中，蕴含着文人园林“隐逸”的思想特质，彰显讲求借物抒情、以少胜多、以山水为题、以形写神。在有限的城市宅园空间中，将寄情山水的文人意境寄托于与闹市一墙之隔的咫尺山林之内，将有限的实体空间扩大到广袤的山水意境之中。栖居于城市，栖居于自然，栖居于山水，栖居在自己的精神之中，是隐逸哲学的回归。^[9]

苏州是园林的城市，也是文人雅士的集聚之所，是文化艺术的流行之地。苏州园林的主人，或是无心功名的名贤隐士，或是遭受贬谪的退休官员，或是狂放洒脱的吴中名士，或是崇尚风雅的文人富豪。苏州的城市和苏州的园林是融为一体的。苏州园林的隐逸哲学也流传在苏州整个城市之中，冲击到周边地区，乃至流布整个江南。在这样的园林城市中成长起来的石韫玉，也对“隐逸”有更多的接受和思考。

（二）石韫玉的个人志趣

石韫玉生性聪颖，喜交游，善治学，嗜藏书，工诗文，爱风月，爱好广泛。苏州《紫阳书院志》载：“韫玉少工诗文，能诗能文，诗文双优。与同人结碧桃诗社，所作未尝无风云月露之好，晚岁一归平淡。性喜旷朗而恶拘伪，既无官，身同闲云野鹤。韫玉善谈，喜与客饮。所居有五柳园、晚香楼、花韵庵、鹤寿山堂等胜，朝夕读书其中，日有常课。课不完，不入内室。至老不变。生平以才思敏捷称，为人清谨和易。”^[5]这样的生活态度，是与刻板的清代官场相悖的。

石韫玉爱好治学藏书，擅作诗，文通古今，自成一体。法式善曾赞曰：“石琢堂濂访诗，格高律细，胎息唐贤。”^[10]石韫玉的一生著作宏富，类别众多。仅集部书便有《独学庐诗文集》、《独学文存》、《独学庐外集》诗稿二十七卷、文稿二十一卷，《读论质疑》一卷、《尺牍偶存》二卷、《微波词》四卷。此外还有《竹堂类稿》十六卷，《花韵庵诗余》、《花韵庵词余》各一卷，《花间九奏》九卷（九个短剧，分别为《伏生授经》、《罗敷采桑》、《桃叶渡江》、《桃源渔父》、《梅妃作赋》、《乐天开阁》、《贾岛祭诗》、《琴操参禅》及《对山救友》，皆为纯粹之文人剧），《红楼梦》（传奇十折），《多识录》九卷，《袁文笺正》十六卷、补注一卷，并曾辑《全唐文》、《明八家文选》等。

这其中，石韫玉愿意以一个状元文人的身份进行戏曲创作并不常见。石韫玉的文人剧笔法细腻，戏剧冲突合理，独白真切。他选择用戏曲创作的形式，借戏中人物之口，表达自己对奸佞的蔑视，对尊严和荣誉、对人生理想的坚守等等。戏曲的欣赏和创作，对石韫玉来说，是一种人生排遣寂寞，抒发感怀的方式，也是表达自己的理想和热爱的途径。石韫玉在功名利禄之外，也保留了自己雅趣逸兴的热土。

石韫玉性嗜书。在入翰林院供职后，他开始大量购书藏书，勤勉治学。在《凌波阁藏书目录序》中他自述道：“余家本寒微，先世藏书甚少……迨进士及第之年，则已读书七千卷矣……其后稍稍购求，二十年来又得此四万余卷，凡此皆节衣食之费而置之者也。”^[4]独学庐就是他建的藏书之所，也是他“独学为心”的治学之所，是他心灵隐逸的虚空之处。

在藏书治学之外，石韫玉还喜好篆刻，尤擅隶书。李放说他：“工隶书，铁笔古雅。”石韫玉自己则言道：“我生爱铁笔，制作追皇古。帝羲臣颉不可攀，降从八体寻规矩。残字共宝鸿都经，阙文莫补岐阳鼓。”^[4]又言：“我少习鄙事，爱古忘愚蠢。穷年琢山骨，胪列同璜琼。不解嘲石癖，稍异供书佣。抚此触素好，恍闻谷音跕。珍如金万镒，袭以锦十重。岂云雕虫技，壮夫所不容？”^[4]乾隆五十八年（1793），石韫玉又突发奇想，将传世名篇《兰亭序》三百二十四个字，打乱顺序，颠倒其文，重新组合，成就了一篇新的序文，世称《颠倒兰亭序》，并钩摹上石，立碑于绍兴兰亭，流传颇广。

总的来说，石韫玉的个人喜好和兴趣更偏向非功利性的一面：自洽、自足、自娱。将“独学庐”作为自己书斋的名字，也恰恰说明了石韫玉对于独处和治学的需求。不管是篆刻、作诗、编撰戏文，还是藏书治学，都于爵禄无用。但石韫玉更加偏好的，就是生活中这些“偷得浮生半日闲”的乐趣。这也符合了“隐逸”的旨趣。

（三）政治环境的压抑

石韫玉主要的为官经历集中于乾、嘉二朝，但在他为官时期，清王朝的政治生态并不乐观。乾隆皇帝晚年昏聩，重用和坤，贪图享乐。朝廷专权横肆，吏治腐败。嘉庆初年，朝政混乱。清高宗驾崩后，嘉庆皇帝迅速向和坤及其党羽发难，借机整顿朝堂，并下旨广开言路。一时之间，朝臣欢欣，报国志士无不踌躇满志。但是，嘉庆皇帝并不是真的能广纳贤言，虚心受谏。嘉庆四年（1799）八月，石韫玉的同科好友、翰林院编修洪亮吉上书《乞假将归留别成亲王极言时政启》直言谏议，批评嘉庆新政，“赏罚则仍不严明，言路似通而未通，吏治欲肃而未肃”。^[11]八月二十五日，成亲王永理将洪亮吉的谏议呈送皇帝，皇帝阅后大怒，当即经内阁发下谕旨问罪洪亮吉，将洪亮吉革职，交刑部，“由军机大臣会同刑部严审定拟具奏”，最终戍发伊犁。^[12]洪亮吉的遭遇，使得许多锐意改革之士对朝廷心灰意冷，纷纷选择明哲保身。政治的黑暗使人无可奈何。在洪亮吉死后，石韫玉还写下了《更生居士挽辞》，表达了自己对于洪亮吉的钦佩和同情：“吾友更生翁，平生好岸异。官为柱下史，封章无路致。手草万言书，高论罔识忌。投诸执政门，藉达登闻使。上言补袞职，下言慎名器。胪列众公卿，一一寓风刺。剖心志无他，批鳞视如戏。圣明日方中，处士敢横议？”^[13]

另外，在清代官场中，因言论获罪并不局限于谏言，普通的诗词文章也有可能给自己和家人带来牢狱之灾。清代统治者大兴文字狱，从文章中截取文字，罗织罪名，打击异己，稳定统治。文字狱使得许多汉族文人身获重罪，甚至性命不保，全家受到牵连。清朝著名的文字狱有戴名世案、徐骏案、朱方旦案等。

清代的文字狱不论从数量、还是规模、持续时间、牵连的广泛都要超越前代。这其中，有夷狄之辩的关系在。虽然在清朝，满人的汉化程度很深，但是在强调“内中国而外夷狄”的儒家思想中，满人始终是被排斥的对象。因此，为了巩固皇权统治与强制思想领域的专制，文字狱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达到了高潮。^[14]清代统治者大兴文字狱，使得整个时代的文化都笼罩在一种黑暗压抑的氛围之中。高发的文字狱使无数文人灰心丧志，有许多人避世隐居，为求平安自保；也有人专注考据，埋首于故纸堆中，乾嘉学派就此壮大。隐逸避世，在当时整个文人群体中形成了一股潮流。

事实上，在清代，许多汉族文人的消极心态都是由政治和民族等因素引起的。一方面，清王朝是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许多汉族文人都有一种“遗民心态”，特别是在江南地区，出现了一大批缅怀明王朝、痛斥满清政权、拒不出仕隐居避世的汉族文人。另一方面，在清代的官场上，很长一段时间都存在着扶满排汉的政治倾向，汉族文人地主们始终在地位上低于满清贵族们。这也会引发汉族文人群体的不满。

此外，政治的黑暗也影响到了民生安稳和百姓生存。在石韫玉赴蜀地上任期间，他就曾亲眼目睹了挣扎在白莲教和官府之间求生的百姓生活之疾苦。特别是官府的军队，作风之恶劣、搜刮百姓之彻底、吏治之腐败，都让石韫玉受到了重大的冲击。但是，他却不得不接手这样的局面，平定叛乱，打击白莲教，并维持朝廷的形象。嘉庆四年（1799），石韫玉路过七盘岭时，根据自己的亲眼所见，写下了《七盘岭记事》：

“夜宿宁羌州，朝登七盘岭。峻板崎岖高入云，过关卅里无人影。昨宵驿吏向我言，官兵半千关上屯。如何今日驱车去，匹马只轮无觅处。鬚头童子草间出，戟手指天向余说：连日关头曾列营，旌旗蔽日刀枪鸣。朝来忽闻有贼信，顷刻仓皇拔营遁。我闻国家设兵以卫民，如何贼犹未至兵先奔？道旁一叟向余泣，但怨官兵不怨贼。官兵避贼如避雷，贼去百里兵始来。贼来焚掠有余烬，官兵所过扫地净。佩刀不斩贼人头，但入村舍屠猪牛。战马无刍又无豆，中田群行麦苗秀。村居十室九无人，绣户文窗摧作薪。承平将吏工谐笑，不习戎韬习文貌。忽闻贼去心肠宽，整顿弓刀迎上官。上官问贼曰小丑，小丑至时大兵走。”^[15]

兵丁成灾，吏治腐败，欺上瞒下，阿谀奉承。而白莲教不灭，匪患不绝，百姓困苦无助，求救无门。贼匪之祸未平，吏治苛政之猛令百姓更加绝望。“官兵所过扫地净”的现实颇具讽刺意味，也是清廷政治腐败的延伸。面对这样的现实状况，石韫玉尽管有勤勉爱民之心、经世济民之才，也是有心无力，疲乏不堪。事实上，在重庆担任知府期间，石韫玉为官清正，处事有方，多有贤名，广受赞誉。嘉庆九年，四川大计群吏，石韫玉名列一等。《勤政殿召对记》记载：嘉庆十年四月十一日，余以卓异人员引见，奉旨交军机处记名以道用。……上问：“汝在四川几年？”臣奏：“臣在四川先后七年。”上问：“汝在勤保军营办事，所办何事？”臣奏：“凡勤保答奏及一切文武文移，皆是臣办。又擒获贼匪，亦由臣审问供词。”上问：“贼匪也是你审，究竟他们因何造反？”臣奏：“贼以邪教煽惑愚民，蓄志已久，意在聚众抢掠。”上云：“有人言官逼民反，果否？”臣奏：“皇上圣明鉴察，贼匪蔓延五省，即如四川一省，扰及四十州县，岂有如许州县无一好

官之理？实在多是好作乱之人。”上云：“两者都有，贼也可恶，官也有不好的。”……臣奏：“大臣们全仗圣明训示。”上微笑领之。臣遂叩头辞出。”^[14]

石韫玉在川蜀一地，为政勤勉，事必躬亲，既有文官之才，也有具备良好的军事才能。但尽管如此，在现实政治的打击和官场的黑暗面前，石韫玉依然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有苦难言。他无力改变百姓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现实，也不能对统治者直言痛弊，指出朝廷官逼民反、吏治腐坏的危难之局。

中国传统文人大多都有着经世济民、安定天下的崇高理想。但是，在高远的志向与自我期许之外，中国传统文人也天然地拥有另一个选择，那就是隐逸。他们会为宇宙发出无穷的哲思，会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挣扎反思，或是在目睹了现实社会的黑暗和无奈之后，选择避世归隐。石韫玉作为一个汉族传统文人，具有经世济民和隐逸淡泊的两面性。他在困顿黑暗的现实政治面前，选择了践行自己的隐逸理想，是出于对时代问题、现实困顿、个人需求的综合考量。

四、结语

石韫玉的诗文写作，在保留现实关怀的同时，具有一种浪漫主义风格。其中对于采菊东篱、泛舟五湖的隐逸生活，长期怀有一种浪漫的想象和向往。在许多观点中，隐逸的追求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经世济民、仕宦进取的儒家思想相悖。但事实上，隐逸的实践，能够在几千年之中长盛不衰，就是因为这一思想实践的现实意义在不断被更新。隐逸观的实践，从遗世独立、内化分离、身在江海而心在魏阙的痛苦挣扎，逐渐走向了“知行合一”、自我探寻、穷达通变的精神滋养。江南地区隐逸文化的发展，折射出了江南士人群体对于政治生态和时代危机的回应。

石韫玉对于人生的追求，一方面受到中国传统文化中道家思想的影响，留恋山石林泉，视自然山水为精神家园，使得他的诗作行文清丽，飘逸超然；另一方面又继承了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情怀，退居田园而关怀苍生，慎修己身，投身地方的文教事业，推动江南地区的文化繁荣与发展。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隐士”“逸民”往往具有较高的精神追求，强调个人的存在和独立，以隐逸之举求高洁之志。《后汉书》有言：“或隐居以求其志，或回避以全其道，或静以镇其躁，或去危以图其安，或垢俗以动其概，或疵物以激其清。然观其甘心畎亩之中，憔悴江海之上，岂必亲鱼鸟乐林草哉？亦云性分所至而已。”^[15]隐逸林泉山水，并不是一种消极的生活方式，而是中国文人独特的一种和谐的追求。在清代的江南文人群体中，隐逸生活并非全然的超脱和遁世，而是一种“在退隐中进取”的独特模式。这种隐逸思想对于江南文脉的传承和江南文化的繁荣，都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参考文献：

- [1] (清) 佚名. 清史列传 [M]. 王钟翰,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1987.
- [2] (清) 法式善. 法式善文学家族诗集 [M]. 多洛肯, 点校.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8
- [3] (清) 陶澍. 陶澍全集, 六, 文集 [M]. 长沙: 岳麓书社. 2010.
- [4] (清) 石韫玉. 独学庐文稿 [M].董粉和,点校.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20.
- [5] 杨镜如. 紫阳书院志 1713-1904 [M]. 苏州: 苏州大学出版社. 2006.
- [6] 张新沂.中外建筑史 [M]. 北京: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19.
- [7] (清) 顾禄. 清嘉录 [M].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9.
- [8] 刘卫平. 苏州古典园林的隐逸文化审美意象 [J]. 前沿,2008,9:78-81.
- [9] 苏畅作. “咫尺山林”与“壶中天地”——园林意境感知与实体空间共构 [M].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23.
- [10] 钱仲联. 清诗纪事 [M].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04.
- [11] 赵尔巽. 清史稿 [M]. 北京: 中华书局出版社. 1977.
- [12] 陈金陵. 洪亮吉评传 [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8.
- [13] 庾向芳. 近代史学转型视野下的民国清史学 1912-1949 [M].上海: 三联书店. 2021.
- [14] 眭骏. 石韫玉年谱 [M].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09.
- [15] (宋) 范晔. 后汉书 [M]. 陕西: 三秦出版社. 2004.

Between the politician and the hermit: The Seclusion philosophy of Literati in Jiangnan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and Its Formation Causes

— Taking Shi Yunyu, the Top Scholar from Suzhou, as an Example

Sun Mingze¹, Dong Fenhe¹

¹ Suzho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uzhou

Abstract: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idea of seclusion in the continuation of the cultural heritage of Jiangnan is of great importance. Taking Shi Yunyu, the top scholar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in Suzhou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as the research object, by sorting out his personal life, social network and literary creation, and combining the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features of the times, it can clearly reveal Shi Yunyu's "seclusion" thought and its formation reasons, and further explo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s of the seclusion thought of Jiangnan scholars during the Qianlong and Jiaqing periods. After eighteen years of ups and downs in officialdom, Shi Yunyu retired to his hometown and realized his seclusion ideal through teaching at a private school, collecting books and studying, and raising funds for relief. The case analysis centered on Shi Yunyu shows that the elite class in Jiangnan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had well reconciled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engaging in the world" and "retreating from the world" in terms of officialdom and seclusion, and reconstructed the connot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seclusion thought.

Keywords: Shi Yunyu; The Seclusion philosophy; Jiangnan culture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2.563

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历史演进及其当代启示

陈楠¹

(1 南京林业大学, 江苏 南京 210018)

摘要: 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的人民观点与历史唯物主义原理, 深刻体现了党以人民利益为根本的价值追求, 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中形成的核心执政理念, 贯穿于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的各个历史阶段。这一思想在不同时期表现出不同的演进逻辑与实践特征, 体现了其作为党不变立场的意义。“以人民为中心”思想在新时代的国家治理、共同富裕、生态文明及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中具有深远启示,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与实践路径。这一思想不仅反映了党对人民主体地位的坚持, 也为应对当代挑战、实现民族复兴与全球合作贡献了中国智慧。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 以人民为中心; 历史脉络; 国家治理

一、引言

“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共产党长期实践中形成的核心执政理念, 也是贯穿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全过程的根本价值追求。这一思想深刻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民观点以及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揭示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精神源泉和实践逻辑。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关键阶段, “以人民为中心”不仅成为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指导思想, 也为实现共同富裕、全面推进现代化提供了价值指引和行动纲领。

从历史视角看, 中国共产党始终以实现人民解放和幸福为奋斗目标, 无论是在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还是在提高生活水平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及推动经济和社会进步的改革开放阶段, 党都坚持将人民利益置于最高位置。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 新时代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核心在于秉持“人民至上”的理念, 这一思想凸显了我国在新阶段社会进步的价值取向。从现实视角看, 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阶段, 人民的需求愈加多样化, 满足这些需求并解决发展中的不平衡问题是新时代的重要课题。在全球治理变革背景下, “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不仅指导中国式现代化, 也为全球治理提供“中国方案”。深入研究这一思想的历史演进与当代价值, 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内外关于“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研究已有较为丰富的成果, 从理论溯源到实践应用, 不同时期、不同学者从各自领域展开了深刻探讨。

在国内研究方面, 周耀杭与黄相怀(2021)在《“江山就是人民, 人民就是江山”重要论述的理论探析》一文中, 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探讨了习近平提出的“以人民为中心”思想, 认为其根本是实现人民福祉, 同时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思想指。^[1]冯明宇(2023)在《平台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审视——以资本主义经济的“反生态性”为线索》中分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如何解读资本主义对自然的掠夺性利用, 并强调“以人民为中心”思想在生态领域的应用。他指出, 这一思想有助于促进生态文明建设, 将人民需求与生态保护结合起来, 为解决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提供路径。^[2]刘晓艺(2023)在《“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范式下人与自然关系的新解读——以“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为线索》中提出, 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思想不仅强调经济和社会发展, 还涉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体现了全局视角与人类共同利益的融。^[3]郎友

[作者简介]

陈楠(2002-), 男, 南京林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

兴 (2024) 在《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一文中, 指出实现共享, 需要政府、社会和个人的共同努力。在他看来, 政府在推动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发挥着核心作用, 确保其益处能更广泛且公正地惠及全民, 而农民群体则是这一普惠进程中的关键受益对象, 而公众参与则是实现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的社会基础, 只有三者共同努力才能真正地做到“以人民为中心”。^[4]宋才发 (2024) 在《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中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保障, 必须坚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根本目的, 维护人民的切身权益。^[5]

在国外研究方面, 卢卡奇在《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Studies in Marxist Dialectics》一书中从阶级意识的视角解释了人民的主体性, 认为历史的推动力在于无产阶级觉醒, 这为“以人民为中心”思想提供了理论基础。^[6]葛兰西调“人民”为构建新型社会关系的核心, 这一观点启发了“以人民为中心”思想在文化领导权构建中的应用。^[7]怀特在《How to Be an Anti-capitalist in the 21st Century》中探讨了反资本主义运动中的人民力量, 提出以人民需求为核心的社会经济模式是实现公平与效率的关。^[8]福斯特在《The Return of Nature: Socialism and Ecology》书中提出马克思主义生态学对“以人民为中心”思想具有深远影响, 特别是在生态危机时代, 强调人民的主体地位对于推动社会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尤为关键。^[9]

综上, 国内外学者均从不同视角论证了“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国内研究更多聚焦于政府和人民如何良性互动的层面, 而国外学者则从理论基础和全球视角探讨其普适性。这些研究共同丰富了“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理论内涵, 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

本研究扎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 融合对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的深度考察, 采取理论解析与历史考察相辅相成的研究策略, 旨在揭示“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演进脉络及其对现代社会的深刻启示。

三、马克思主义“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理论渊源

马克思主义“以人民为中心”思想根植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 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重要体现。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中, “人民”是指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 他们是社会历史的主体和创造者。列宁进一步结合俄国革命实践, 深化了以“以人民为中心”思想。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 我党继承并发展了这一思想, 将其融入中国的革命、建设与改革实践中。此部分将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论述、理论体系与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三个层面, 探讨“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理论渊源。

(一) 历史唯物主义与“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理论方法

“以人民为中心”思想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重要体现, 也是其方法论的具体运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通过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揭示了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

唯物史观认为, 物质生产是社会存在与发展的根本, 广大劳动者作为生产力的主要力量, 在历史发展中处于核心地位。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言: “劳动是财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10]”因此, 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不仅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 也塑造了历史的整体进程。这种对人民主体地位的强调为“以人民为中心”思想提供了理论依据。

马克思主义以阶级分析方法为核心, 通过揭示社会经济结构与阶级关系的矛盾, 明确了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在社会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 无产阶级作为被剥削阶级, 其解放不仅意味着自身的自由, 也是整个社会摆脱压迫和剥削的关键。这种阶级分析方法进一步深化了“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特别强调社会革命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而这一目标必须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点。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 “劳动者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11]”这一论述将人民利益与社会进步的根本目标紧密结合, 构成了“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终极追求。

(二) 马克思、恩格斯的人民主体观

在构建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过程中, 马恩鲜明地提出“人民大众是历史演进的主体力量”这一论断, 深入阐明了人民群众在社会变革与历史进程中的主体作用。

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中, 社会历史演进的根基在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冲突, 而劳动群众作为生产力的主体, 始终扮演着推进历史进程的关键角色。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表明, “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 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 必然会扩大它的群众性基础。^[12]”这表明, 人民不仅是生产活动的主体, 也是推动历史进程的决定性力量。

马恩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提出, 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是通过暴力革命实现自己的解放, 同时推动

全人类的解放。^[13]这一思想奠定了“以人民为中心”理念的价值基础，即把人民的解放与自由视为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进一步指出，无产阶级的解放不仅是经济剥削的解除，还包括政治解放和人类自由全面发展的实现。^[10]这种对无产阶级解放的系统思考，为“以人民为中心”思想提供了理论依据。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本质上是劳动者争取自身权利和解放的斗争。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强调，巴黎公社的根本经验是它体现了“劳动人民自己的政府”，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治权力提供了典范。^[14]这种基于人民利益的革命实践理念，直接构成了“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理论渊源。

（三）列宁对人民主体性的实践深化

列宁结合俄国革命实践，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人民主体观，将其理论运用于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中，赋予其更为鲜明的时代特征。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明确指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是实现无产阶级的利益，而无产阶级的利益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15]因此，无产阶级专政的目标不仅是维护无产阶级的权利，更是为了全社会的解放。这一思想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对“以人民为中心”理念的实践应用，为后来的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理论基础。

列宁特别重视人民群众在革命中的主体作用。他指出，“革命的真正发动者是群众，是无产阶级大多数。”这一观点为后来的群众路线理论提供了理论支持。同时，列宁还提出了“人民民主”的概念，强调革命后建立的国家必须代表人民的利益，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为“以人民为中心”思想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实现提供了范式。

在俄国革命胜利后，列宁领导苏维埃政府开展了一系列社会改革，涉及土地分配、劳动保护、教育普及等领域，目的在于改善劳动人民的生活条件，实现人民群众的基本权益。这些实践丰富了“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内涵，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现实关怀。

（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传承与发展

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继承并发展了“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创新地提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毛泽东提出的群众路线、邓小平提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都体现了这一思想在中国实践中的不断创新与深化。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以人民为中心”思想深刻反映了人民在社会历史中的主体地位和实践作用，其理论渊源可追溯至马克思、恩格斯的人民主体观，以及列宁结合革命实践对这一思想的进一步发展。通过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这一思想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核心，将社会发展的目标确立为人民的解放与全面发展。在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的历程中，中国共产党秉持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实现了其与中国实际的深度交融与创新，进而孕育出一种核心的意识形态，这不仅贯穿于党的历史实践中，也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新时期的理论构建与社会发展贡献了坚实的理论支柱。

四、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历史发展

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结果，其内涵随着不同时期的历史条件和实践要求不断丰富和发展。自1921年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阶段，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的核心理念，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一切行动的导向和归宿。此部分将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时期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阶段，全面探究中国共产党的“以人民为中心”理念，分析其历史发展脉络及具体实践体现。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全心全意为人民谋解放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21-1949），中国共产党致力于推翻“三座大山”的压迫，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在这一时期，“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内涵主要表现为以工农为主体，团结各阶层人民，开展民族解放和民主革命。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将“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作为根本宗旨。1927年，毛泽东于《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明确指出，农民构成了中国革命的核心力量，明确了中国革命的依靠对象和领导力量。^[16]在革命实践中，中国共产党通过土地革命、武装斗争等手段，直接改善农民的生活条件，展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实践初衷。

毛泽东在革命战争年代提出群众路线思想，即“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

去”。这一思想成为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的重要方法论，也是“以人民为中心”思想在实践中的具体体现。长征时期，红军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依然坚持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赢得了人民的信任与支持。毛泽东强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一大优良作风。在1944年党的七大上，这一原则被进一步制度化，成为党的根本宗旨。此外，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坚持“保护群众利益、与人民打成一片”，不仅是党开展革命的重要力量，也是人民解放事业的重要依靠。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形成了“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雏形和基本框架。毛泽东强调，中国共产党是致力于服务人民的政党，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主人。在革命战争时期，他提出“依靠群众、发动群众”，通过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等实践，切实贯彻了以民为本的群众路线理念。

（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为人民建设美好生活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1949-1978），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展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以人民为中心”思想逐步转向以改善人民生活、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的社会建设领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确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这一时期，党的政策和方针始终围绕人民的根本利益制定，如土地改革彻底消灭封建剥削制度，使广大农民获得土地，极大提高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和生活水平。

1953年开始的社会主义三大改造旨在实现生产资料的公有化，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在这一过程中，党注重发动群众参与改革，通过合作社、生产互助组等形式，使广大劳动者成为生产活动的主人，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

党在这一时期主导了一系列旨在改善人民生活条件的大型建设项目，如长江大桥、铁路网建设等。这些基础设施的建设不仅为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也直接提升了人民生活水平。与此同时，党通过推广扫盲教育、普及基本医疗服务等措施，显著改善了人民群众的文化和健康水平。

（三）改革开放时期：为人民实现共同富裕

改革开放时期（1978-2012），中国共产党将“以人民为中心”思想融入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发展中，着力解决贫困问题，推动共同富裕。

邓小平深刻阐述了“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将国家与党的工作核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强调以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水平。通过改革开放，中国共产党大力发展市场经济，使亿万人民摆脱贫穷，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实现了从革命逻辑向发展逻辑的重大转变。邓小平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指出发展经济是解决我国各类难题的关键。他强调，以人民为中心不仅要让人民群众摆脱贫穷，还要让人民过上富裕生活。改革开放的启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经济特区的设立以及全面的市场化改革，都是这一思想的具体体现。邓小平特别注重发展成果的人民共享，他提出“共同富裕”的目标，明确了党在新时期推进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方向，同时邓小平强调“四项基本原则”，确保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地位不动摇，从而奠定了“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理论基石。

江泽民执政期间，中国共产党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他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一思想既是对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和社会发展实践的理论总结，也是对人民群众利益的深刻回应。在江泽民的领导下，党更加注重扩大人民民主和加强法治建设，农村税费改革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标志着人民生活质量的显著改善。同时，江泽民将可持续发展理念纳入国家战略，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体现了对人民长远福祉的关注。

在胡锦涛的领导下，“以人民为中心”思想得到进一步深化，形成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胡锦涛提出，以人为本是党执政兴国的本质要求，发展必须以实现人民的全面发展为目标。在这一时期，党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和公共服务的均等化，通过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来回应人民群众多样化的需求。胡锦涛还强调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性，提出“让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理念，凸显了“以人民为中心”思想在社会政策中的具体实践。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大力推进教育、医疗、住房等领域的改革，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九年义务教育的普及等措施直接惠及人民群众，为实现共同富裕奠定了基础。

（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人民创造幸福生活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2012至今），中国共产党进一步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实施了一系列政策，推动社会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习近平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一承诺，赋予“以人民为中心”思想以新的内涵。他强调，“以人民为中心”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

要义，是党治国理政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习近平提出了一系列以人民为中心的战略部署，包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赢脱贫攻坚战、推进乡村振兴和实现共同富裕。在社会治理方面，他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通过推进高质量发展、优化公共服务供给、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等举措，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多方面需求。特别是生态文明建设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习近平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以回应人民对美好环境的期待。此外，他在国际上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将“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扩展到全球治理领域，展现了中国共产党服务全人类福祉的责任担当。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党对人民的庄严承诺。”通过精准脱贫攻坚措施，中国成功实现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面脱贫，人民生活质量显著提升，充分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实践效果。新时代以来，党将深化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相结合，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经济质量与效益，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提供了有力保障。

新时代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通过大力推进污染防治、发展绿色经济，党以实际行动改善了人民的生活环境。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并在浙江、江苏等地开展共同富裕试点。

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历史演进是党百年来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的具体体现。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从毛泽东到习近平，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不断发展和创新，每一位领导人都结合时代特点赋予其新的实践内涵。这一思想不仅是党始终不变的根本立场，也是党在不同时代面对新任务、新挑战的指导方针。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以人民为中心”始终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鲜明旗帜，也是党团结带领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动力。中国共产党始终将人民放在核心位置。无论是在民族解放、社会建设，还是现代化发展中，“以人民为中心”思想都贯穿始终，成为党领导中国革命与发展的基本遵循。

五、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当代启示

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思想不仅是党长期实践和理论探索的宝贵成果，也是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指导思想。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形势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多样化需求，这一思想为新时代的治国理政提供了重要启示。

（一）在新时代坚持人民至上的国家治理理念

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而“以人民为中心”思想则为党领导下的国家治理提供了价值导向。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应将满足人民需求和维护人民利益作为核心目标，加强制度建设和治理能力提升。比如通过健全基层治理机制，鼓励人民参与决策、监督和管理，增强治理的透明度和公信力。

新时代的国家治理需要聚焦人民在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领域的基本权益保障。具体而言，应通过健全法治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为人民提供安全、稳定的生活环境，保障公民权利得到充分实现。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党和政府需要深化改革、优化政策设计，以回应人民日益增长的多样化需求。

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党的群众路线的精髓。在新时代，应通过多种形式加强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倾听基层声音，了解实际需求，及时调整政策措施。这种实践路径不仅有助于增强国家治理的精准性，也有利于党和人民形成良性互动关系。

（二）推动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并将其作为长期目标。“以人民为中心”思想为共同富裕提供了理论基础，其核心在于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在新时代，推动共同富裕的重点是缩小收入差距，实现城乡、区域和行业之间的均衡发展。具体措施包括加快推进农村现代化，完善区域协调发展机制，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水平，建立更加公平的分配体系。共同富裕不仅是经济指标的提高，还包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在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领域，应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公共服务覆盖面和质量，使所有人都能享受到现代化建设的成果。共同富裕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不仅要依靠国家政策支持，还需要弘扬互助精神和社会责任意识。例如，通过促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推动慈善事业发展，形成政府、市场和社会力量协同推进的共同富裕格局。

(三) 推进高质量发展的现实要求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这一转变的根本目的是更好地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在这一过程中，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思想，将提升人民生活质量作为评价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标准。高质量发展要求在经济增长的同时注重公平分配，以实现人民福祉最大化。例如，在产业结构调整中，应优先发展就业带动效应明显的行业；在城市化进程中，应注重保护弱势群体利益，防止因发展带来的社会分化。

以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重要战略，但这一过程需要兼顾包容性增长，确保发展红利惠及所有人。例如，通过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和激励基层创新，扩大社会就业机会，使创新成果能够普惠大众。

(四) 深化生态文明建设与绿色发展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党在新时代提出“两山论”理念，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思想在环境保护领域的实践深化。新时代的生态文明建设要求转变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推进绿色经济与循环经济发展。例如，通过支持可再生能源技术的研发与应用，推动传统产业绿色转型，为人民提供更清洁的生产与生活环境。生态治理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任务，需从源头防治污染、恢复生态系统功能入手。可以通过严格落实环保法，健全污染防治机制，确保人民享有健康的生活环境。这种治理过程的核心仍是为了人民的根本利益服务。

(五)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意义

“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实践不仅局限于国内，还为全球治理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特别是在应对全球性问题（如气候变化、贫困与不平等）时，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体现了人民至上的价值观，强调通过合作实现共同发展。

新时代中国的对外合作始终坚持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原则。例如，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互联互通和经济合作，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提升基础设施水平和民生保障，展示了“以人民为中心”思想在国际领域的实践意义。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积极倡导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通过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国际救援等事务，中国以实际行动彰显了对全人类福祉的关注。

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思想在新时代的国家治理、社会发展、生态文明建设和全球治理中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其核心理念不仅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了思想动力，也为解决当代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提供了理论与实践参考。通过深化对这一思想的理解与应用，党能够更好地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世界和平作出贡献。

六、结论

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思想贯穿党的百年奋斗历程，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也是党始终秉承的价值立场和执政理念。从毛泽东提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到习书记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一思想在不同历史时期展现出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和实践特点。

“以人民为中心”思想体现了党对人民利益的深刻认知，展现了党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在新时代，这一思想以全面深化改革、脱贫攻坚和生态文明建设等实践为依托，持续推动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回应人民群众多样化的需求，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坚实基础。

展望未来，“以人民为中心”思想将在新的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党将继续以人民利益为出发点，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的现实问题，推动共同富裕迈向更高水平。同时，通过参与全球治理，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注入更多中国智慧和方案。无论时代如何变化，“以人民为中心”这一思想始终是党治国理政的核心遵循，也是党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的重要原因。

参考文献：

- [1] 周耀杭,黄相怀.“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重要论述的理论探析[J].理论动态,2021(33):11-19.
- [2] 冯明宇.平台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审视——以资本主义经济的“反生态性”为线索[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 24(2):10-18.
- [3] 刘晓艺.“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范式下人与自然关系的新解读——以“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

- 为线索[J].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24, 26(2):124-132.
- [4] 郎友兴.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J].国家治理, 2024(18).
- [5] 宋才发.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J].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4,46(06):1-10.
- [6] Lukács G.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Studies in Marxist dialectics[M]. mit Press, 1972.
- [7] Gramsci A.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M].The applied theatre reader. Routledge, 2020: 141-142.
- [8] Wright E O. How to Be an Anticapitalist in the 21st Century[J]. 2020.
- [9] Foster J B. The return of nature: Socialism and ecology[M]. NYU Press, 2020.
- [10]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2018.
- [11]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M].人民出版社,1965.
- [12]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M].人民出版社,1961.
- [13]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M].人民出版社, 2018.
- [14]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M].人民出版社,1961.
- [15] 列宁.列宁国家与革命[M].1949.
- [16]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M].民族出版社,1977.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s "People-Centered" Development Thought and Its Contemporary Revelations

Chen Nan¹

¹ School of Marxism, Nan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Nanjing, China

Abstract: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s "people-centered" development ideology, which originates from the people's point of view of Marxism and the principles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profoundly embodies the Party's fundamental value of pursuing the interests of the people, and is the core governing philosophy of the CPC, which was formed in the course of its century-long struggle, and has been carried through all the stages of the history of China's revolution, construction, and reform. This idea has shown different logics of evolution and practical characteristics in different periods, reflecting its significance as the unchanging position of the Party. The idea of "people-centeredness" has far-reaching revelations in national governance, common prosperity,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 in the new era, and it provides a solid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path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aus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t provides solid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path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is idea not only reflects the Party's adherence to the people's subject position, but also contributes Chinese wisdom to addressing contemporary challenges and realizing national rejuvenation and global cooperation.

Keywords: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eople-centered; Historical context; national governance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2.565

明清风水知识在琉球近世村落的具体应用研究 —以《北木山风水记》为例

王育洁¹

(¹广西师范大学, 广西 桂林 541000)

摘要: 中国与琉球友好往来的历史源远流长, 明清两朝与琉球的封贡关系长达 500 年, 中国的风水文化对琉球王国(今为日本冲绳地区)影响深远。通过调查琉球王国的村落风水文献之一的《北木山风水记》, 整理了风水见分勘察风水时有两大类具体举措, 一为住宅外环境的风水调整, 如山、水、路等; 二为住宅内结构的调整, 类似于家居风水, 如灶台、厕所、井等。在此基础上, 通过探讨该书中风水见分勘察风水的具体举措和理论, 分析中国堪舆文化对琉球村落的影响, 为阐述中华堪舆文化的域外生存提供参考。

关键词: 琉球; 风水; 北木山; 堪舆文化; 村落

风水堪舆之术, 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明清时期, 风水之风盛行的同时, 中国的风水知识随着海洋贸易的兴起, 辐射了东亚地区, 如朝鲜半岛、越南、琉球王国(今为日本冲绳地区)、日本等。尤其是在作为明清属国的琉球王国, 风水对其影响尤为突出。琉球王国不仅在首里城、玉陵、国庙等王家建筑的应用都采用了风水理论, 其村落也依据风水理论进行搬迁。可以说, 琉球王国自上而下的建设都受到了风水理论的影响。迄今为止, 关于琉球村落风水, 新城(1993)^[1]、椿勝 坂本 北野(1997^[2], 2003^[3])、町田 都筑(2010)^[4]、小熊(2011)^[5]、内原(2013)^[6]等都进行了研究。其中涉及北木山风水的研究有内原(2013)、町田 都筑(2010)。内原(2013)比较了石垣村和新川村的山林一带(抱护)、学校、道路、灶台等风水调整法。都筑 町田(2010)对《北木山风水记》中的形势论、方位论、八宅法研究进行了解读, 并注释了《北木山风水记》。综上所述, 琉球的村落风水多关注于村落植被与抱护的关系, 虽有对《北木山风水记》的内容进行解读, 但并未对村落风水、家宅具体调整的理论知识方面进行分类探讨, 也鲜少结合明清风水和堪舆理论的变迁进行比较分析。风水见的调整法可谓是研究风水在琉球民间普及的一个重要突破口, 因此具有较大的研究价值。

一、风水在琉球的传播与《北木山风水记》

据琉球国由来记的记载, 康熙 6 年(1667 年), 风水思想传到冲绳, 周国俊国吉通事, 作为接贡存留通事渡闽, 去福建学风水理论, 学成后归琉球国而传入的^[7]。而在球阳尚质王(1650 年)的记载里说到了唐荣地理记, 记载着唐荣人从古代就开始学习风水知识。后 58 年, 蔡温在闽学习风水, 得到了秘书和大罗经后归琉球王国, “在福州遍寻地理先生, 幸遇刘(希开)先生, 就从他精学地理, 悉受其秘书及大罗经一面”^[8], 蔡温回国后担任国师一职, 他在琉球推行风水知识。1848 年, 琉球国又遣郑良佐(与仪通事亲云上)、蔡呈祯、蔡大鼎等人到福州学习风水地理知识^[9]。《北木山风水记》^[10]成立于近世末期, 由派遣到八重山各村调节风水的风水师郑良佐所著, 记载村落迁徙的指示和各村的风水调整之事琉球王国民间风水调整材料

[作者简介]

王育洁(1987-), 女, 湖南娄底人, 广西师范大学讲师。

[基金项目]

2020 年度国家社科课题一般项目(20BMZ097)

有冲绳本岛北部的羽地间切真喜屋、稻岭两村的风水见分记录和《北木山风水记》。前者只记载了调整法，并未涉及具体的风水理论；后者二者兼备，凸显了风水知识在琉球村落的应用。北木山又称八重山群岛，为琉球群岛西部的岛屿群，群岛内包含面积超过 200 平方公里的西表岛和石垣岛两岛。《北木山风水记》的序中，关于该书的起源，新城敏男谈论道“1771 年的大海啸对村落造成了破坏，之后村的重建过程中未请风水师鉴定，新村的建设过程中也未得到风水鉴定，村民们认为未请风水师鉴定而导致各村凋敝，因此协议向王府提出申请派遣风水师。之后，被派遣的郑良佐（与仪通事亲云上）在岛上鉴定风水，解说吉凶，将道路的顺逆和抱护的欠缺情况绘于纸上，交给八重山的官员。”^{[10]1-2}。如今俯瞰八重山的古地图，会发现过去的各个村落沿着山纵线分布到海边。这意味着村民为了获得生活的必要物资，村落的规划具备了“山、水源、耕地、海”的要素，通过这种规划，村落实现了稳定安宁。这种规划的背后可谓蕴藏着中国风水学的智慧。

二、《北木山风水记》中风水见分勘察风水的具体举措

理想风水的原型应该能够包、围、拱、绕地“聚气”等。《北木山风水记》中风水见分勘察风水的具体举措可分两种，一种为住宅外环境的风水调整，如山、水、路等；另一种为住宅内结构的调整，类似于家居风水，如灶台、厕所、井等。本研究通过整理该书中风水见分勘察风水的具体举措和理论，分析中国堪舆文化对琉球村落的影响，为阐述中华堪舆文化的域外生存提供参考。

三、住宅外环境的风水调整

风水观念集中体现了中国人顺应自然的态度，它极大地影响了建筑的选址、朝向、布局等。住宅外风水调整是堪舆文化的重要内容，其核心思想为“天人合一”，体现了古人对自然环境的朴素的认知。《北木山风水记》中，风水见分在勘察北木山村落的风水时，主要先调整住宅外环境的风水，从水、山、石、路、这四个方面来进行调整。

（一）水的调整—强调水道迂曲及流向

水在风水学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分量，《北木山风水记》^{[10]3-25}强调“水往来之地，通则旺，塞则衰。水道固有自然气运。又去水之处，不可闭塞。若一闭塞，不但前水不来，龙势亦不贯。又洪水害稼。”，且“水为财气，门乃气口。若从门出水，则有破财之妨。本村，多从门出者有之，不吉。宜戌辛酉未申丙丁方，各见其便而流出，乃于十二宫方位极为合法。”。其中水流去的方向是风水调整的重点，书中有诸多记载，例如“村中直路，其前地势卑下而水急流去，不吉。宜见其高低，又从阳数而筑或三阶或五阶以流去，乃其水稍缓而无急流之妨，乃吉。”；又见“村中之水，后头向癸方而流去，左边向辰方而流去，不吉。宜掘塘以停止，乃吉。”，“村中之水，向左右而分去。恐有苦穷之妨，不吉。其后，有反弓之形。恐不能居人长寿。此地不可住居。”，“本村、新川两村界路之口，直向海滨，水又从此流去，不吉。宜少曲折，乃吉。”，“人家在高顶上，水向左右而分去。其家，虽是寄居富贵，必至寒缕。本村，人家在高顶上，水向左右而分去。恐有寒缕之妨。必须宜居他处以避其妨。此乃避凶趋吉之道也。”等。关于水流去向的具体方位，书中也多次提及，例如“宅内之水，丁庚辛戌方，各见其便而可流出，吉。”，“宅内之水，戌辛酉庚未申丙丁方，各见其便而可流出，吉。”，“宅内之水，辰乙卯甲申寅方，各见其便而可出，乃吉”等。综上所述，《北木山风水记》关于水路调整法注重水路畅通，水道迂曲和水流的去向。

关于水路畅通和水流的去向，宋代胡舜申《地理新法》的“水论”中说道“山静物属阴，水动物属阳。……水如人之血脉，血脉周流于一身之间，阙有度数，顺而不差，则其人必康且强，逆而失常，则其人必病且亡……水各自吉方来凶方去，贪厌养生水居官旺故，水欲凶来吉去，则冲败生旺气”^[11]。而水的曲折则意味着留财，风水学中有“山管人丁水管财”之说，因此中国风水学中强调理想的水道迂曲行进，而不应笔直地流过该地区，且水流方向也极为重要—吉利的水道应该从吉利方流向凶方，该地居民可永享富贵荣华。由此可见，《北木山风水记》运用中国的风水知识对八重山村落风水进行了水路的调整，强调水路要曲折通达。

（二）山的调整—避开恶山，涵养山气

小熊诚在《冲绳的村落移动和风水》中指出《球阳》里记载了琉球村落迁居的情况，19 世纪前主要是因耕地不足而迁居，19 世纪时，风水鉴定成为了村落迁居的主要原因。而“恶山”和“山凹陷泻气”成为了琉球村落迁居的一大原因^[5]。《北木山风水记》^{[10]3-25}关于“山”风水有多次的描述，例如：“坎山高大肥满，则有诚实、富厚之庆。若使低陷而寒风吹入，则有贫苦，寿夭之虑。又子方凹陷而风入者，则有子孙溺水之妨。癸方凹陷而风入者，则有男女淫欲之妨。壬方凹陷而风入者，则有贫贱之妨。予想，川良山道，子癸

壬方凹陷之处，宜密载松树以遮其风，乃无上以种种之妨，而诚实，厚富之庆，必从此兴也。”“又右边之山甚凹陷，不吉。宜多载树木以辅佐，乃吉。”“本村，近山作宅。恐居民为山木湿气所伤而不能发生，不吉。”“本村，后头恶山甚多。恐居人有败绝之妨，不吉。”“本村，右边有山冲来出，不吉。宜多载树木，又坐狮子，以制其凶，乃吉。”“当面有山而冲者其祸甚速。本村，当面有山冲，不吉。”“四村，以山形言，则为一体。水势亦然。若水去之处，加土闭塞，则山气不贯，不大合风水之法。而又白圭之道非禹之道，此处必须熟察。”等多处关于山的风水记载。

所谓恶山，即山形不佳之山。关于山的形状，郭璞早在《葬书》中便谈论道“占山之法，势为难、形次之，方又次之。形如仰刀，凶祸伏逃。形如卧剑，诛夷逼僭。形如灰囊，灾舍焚仓。形如投算，百事昏乱。形如植冠，永昌且欢。形如覆釜，其巅可富。形如负垄，有垄中峙。形如燕巢，法葬其凹，胙土分茅。形如侧垒，后冈远来。……”^[12]，可见中国传统风水认为山的形状会影响到人的命运。关于山气，中国传统风水文化中讲究“山环水抱必有情”。《葬书》内篇中云“夫土者气之体，有土斯有气。气者水之母，有气斯有水。经曰：土形气行，物因以生。夫气行乎地中，发而生乎万物。其行也，因地之势。其聚也，因势之止。葬者原其起，乘其止。地势原脉，山势原骨。委蛇东西，或为南北。千尺为势，百尺为形。势来形止，是谓全气。全气之地，当葬其止。气之盛虽流行，而其余者犹有止。虽零散而其深者，犹有聚。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经曰：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13]，强调将生气聚止于某地，有必要防止生气逸散。层层山峦才能遮挡住风，故吉地通常是为群山所环抱的盆地。自晋代郭璞《葬书》之后，“气”的理论便成为风水的中心问题，一切具体的风水活动都必须以得气为主而展开，这是中国风水观的最基本的要点。因而，风水特别忌讳“死气”“煞气”“泄气”“漏气”，认为这会带来厄运，财源损耗，乃至导致疾病。由此可见，《北木山风水记》按照风水中关于山的理论对村落的布局进行了调整，强调房屋要位于聚气之处，因此房屋依山而建，山环水绕为佳。

（三）石一避开恶石

《北木山风水记》强调住宅环境应避开恶石。在我国民俗文化中，石头常常用来作为调理风水格局的材料，石头的形势理论和山的形势理论一样，都认为形状奇怪的石头为恶，对人命运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应当避开。《北木山风水记》^{[10]3-25}中有多处记载了恶石的调整法，如“恶石在门前，必有凶险之灾。若在屋后，则有败绝之妨。其石头除去，尤吉。又载树筑墙以避，亦可。”“今所居之地面又多恶石。恐居人性情乖戾。”“恶石直对门，不吉。宜因旧改开其门，乃吉。”“本村，东方有恶石，不吉。除去，尤吉。又载树筑墙以避，不妨。”“其后恶石甚多，恐有居民败绝之妨。此处不可居住，宜移他处，乃吉。”“村中有恶石而直向人家，不吉。宜因旧塞道栽树，又各所当人之家坐狮子以避其凶，乃不妨。”“甲方有恶石向村中，不吉。宜于正面坐狮子，以避其凶。又多栽树木以避之，又可。”“酉戌之方，其山中间有恶石而直向村中，不吉。宜坐狮子以制其凶，乃吉。又多栽树木以避，又可。”等。为了避开恶石带来的煞气，《北木山风水记》记载可用狮子以制其凶或在树木以遮其凶，也就是用狮子制煞和用树木当屏风遮煞之意。冲绳的石狮子是一种民间辟邪之物，冲绳的风狮爷在冲绳方言中被称为「シーサー」，多半被建在门口、屋顶或是村落的高台上，据说有着除恶鬼，守护房屋、人民、村庄的作用。刘晓峰（2018）指出“琉球群岛存在的石敢当与石敢当相关的文化，在整个东亚地区都是非常突出的。从保存的数量来看，琉球群岛可以说是世界上单位面积石敢当分布最多的地方。这一数字不仅在日本是最多的，即便在中国大陆，也没有任何一个地域能望其项背。琉球石敢当的这种普遍性存在，很早就引起派往琉球的中国使者们的注意。”^[14]，清人周煌《琉球国志略》在记载琉球人居住情况时曾道“贵家有削磨极平者。屋上、门前，多安瓦狮；及立片石，刻「石敢当」者。「隋书」谓「门户必安兽头骨角」”^[15]。中国南方、台湾地区仍有在屋顶、门口等地放置石狮子除魔的习惯，琉球王国的风狮爷和中国南方的石狮子辟邪民俗可谓关系密切。

（四）道路风水调整—宽阔曲折为吉

八重山诸岛现今还流传着一句话“在八重山生活，人生难免迷茫，但永远不会迷路”，各村的道路如棋盘排列，现今各个区域也蔚然有序。《北木山风水记》^{[10]3-25}中对于道路的记载是最丰富的，可见风水见调整风水时最注重道路，例如：“路，曲折而拱来者为进气，横直而抱身者为界气。本村，后高前低，恐村中气走泻，不吉。宜自美崎之前横开道，以回抱，乃其气不走泻，为吉。”、“（平得村）前面道路宜宽阔，乃人才两发。本村，前路不分明。宜照图，以改开，乃吉。”、“（宫里村）村前直路，横路，宜照图，以改开，乃吉。村后，似反弓之形，恐不能居民长寿，宜照图，以开道，有多栽树木以辅佐，乃吉。”、“（木孚喜村）其前道路，宜照图，改开，以与番所道路相连，尤吉。”、“（仲本村）本村前道，宜因旧与番所道相连，乃

吉。后道，有背去之形，不吉。宜照图，以改开，乃吉。”、“（保里村）本村，左边地势高而气下去，宜因旧开道以护其气，乃吉。后道，直去而无情，不吉。宜照图，曲折又其侧栽树木以护其气，乃吉。”、“（东筋村）本村，当丁道者，宜立石敢当，又掘小塘以避其凶，乃吉。当工字路者，必有两家伤分之妨。”、“（下地村）本村道路，曲折而不直，尤合法。”、“道路，以曲为吉，以直为凶。本村路口，直向海滨，水又从此流，不吉。宜少曲折，乃吉。”、“当工字路者，必有两家伤分之妨。本村，大滨仁屋，系岭仁屋家，犯此妨。宜速改开，乃吉。”、“各家，道路来冲者，立泰山石敢当，可以制之。其法，高四尺八寸，阔一尺二寸，厚四寸，埋入土八寸。上凿石起虎头，再凿泰山石敢当五字。其凿石起工，须择冬至后六辰六寅日用之，则吉。至除夕以生肉三片祭之，新正寅时竖之，莫令外人见之，为妙。”、“四方有路围宅者，主世出癫痫之人。本村，仁屋家，犯此妨。宜见其便，以塞断其一方，乃吉。”等，可观察到《北木村风水记》在调整道路风水方面尤其注重道路的曲折和道路的宽阔，路冲需避，可用泰山石敢当制之，工字路和路围宅均大凶。中国风文学中十分注重道路风水，《阳宅十书》^[16]多有论述。如“凡宅或水路桥梁四面交冲者，使子孙怯弱，主不吉利。……水路冲门，忤逆子孙……众路相冲，家无老翁。”^[16]“四面交道主凶殃，祸起人家不可当。”^[16]“南来大路正冲门，速避直行过路人。”^[16]“东西有道直冲怀，定主风病疾伤灾。”^[16]“门前有路川字形，破财年年官事兴。”^[16]^[49]这些说法，迄今为止在房屋建造方面都有着参考价值。风水中很忌直路冲宅，尤其是直路冲门，更为风水之大忌。风文学认为，住宅由道路围绕者为凶，如“四面交道主凶殃，祸起人家不可当。”^[16]而为凶相的是住宅基地三面有道路相通。故《北木山风水记》非常重视道路畅通和避免路冲，有路冲可立石敢当制之。路冲的理论不仅辐射了琉球王国，对日本和韩国近世的道路建设也产生过深远的影响。限于篇幅，不再赘述。

四、住宅内部结构风水调整—居家风水

清代，住宅的内部构成即居家风水，成了关注的重点，出现了很多和住宅内部构造相关的理论。据前文所述，因琉球王国的风水见多从福建留学，因此琉球王国盛行的是福建派的风水知识，即“理气派”。而清代风水理论的变化自然也影响了琉球风水。琉球风文学除了讲究周边环境和住宅的方位，也讲究居家风水。风水调整时关注住宅的内部的特征在琉球王国村落风水调整时也有体现。《北木山风水记》所记住宅内结构风水的调整举措主要有本宅、灶台和井、方位。下章将从本宅、灶、方位这三个方面分析中国风水知识对八重山村落住宅内环境风水调整的影响。

（一）本宅

《黄帝宅经》认为：“夫宅者，阴阳之枢纽，人伦之轨模。……阳者生化物之父也，阴者生化物之母也。……阴阳之理，顺之则亨，逆之则否。”^[17]阳宅风水的论述中很讲究屋宅的地点选择、朝向及内部设计构造等。《八宅明镜》曰“宅无吉凶，以门路为吉凶。”^[18]^[89]，又云“安宅大门，宜迎来水之吉地以立门。”^[18]^[89]，也就是说是衡量住宅的风水好坏时，住宅大门时十分重要的指标，且大门门口见来水为吉。我国风文学里重视四神相应，宅前为朱雀位，即前方有一水池或平地，意味着有“明堂”，门便适宜开在前方中间。在中国风文学的影响下，《北木山风水记》^[10]^[3-25]同样十分重视大门的环境，也就是明堂，记载着“屋大而门小，则气闭。屋小而门大，则气泻。各从屋之大小可以开之，乃吉。”“屋前、屋后有粪坑臭秽者，不吉。”“两宅挟路两门相对，必有一家衰。后来勿犯此妨。”“宅地前阔后狭这则贫乏，前狭后阔者富贵。右长左短者则富，右短左长者则少子孙，左角缺者长房不利。”“门前若见粪屋，财散人离。”“前宅后坟，坟必兴而宅必败。前坟后宅，宅既盛而坟自衰。宜开路，以避其凶，乃吉。”“前宅后坟，坟必兴而宅必败。前坟后宅，宅既盛而坟自衰。宜开路，以避其凶，乃吉。”等具体本宅明堂风水调整法。

（二）灶

厨房，乃饮食之处。而厨房中心的灶台，乃司命之神，主一家吉凶祸福。禄为养命之源，灶乃食禄之所，万病皆由饮食而得。故灶必择吉方而安，故中国的风文学中历来注重灶的安放。在中国风文学影响下，《北木山风水记》^[10]^[3-25]也强调灶台安置的环境，记载了“窑乃司命之神，主一家吉凶祸福，如饲养斯应，何也。禄为养命之源，窑乃食禄之所，万病皆由饮食而得。故窑必择吉方而安。”“屋梁压窑，主多病。”、“窑前左右有门而冲，主口舌破财。”“窑后有井，则有克妻之妨，后来勿犯此妨。”、“窑后，对火门不可开门、窗，主家中不安。”、“未进门先见窑，主破财。进门先见，又同。”等调整法。可以观察到，上述灶台风文学调整方案中尤其注重灶忌讳门路直冲。中国传统的风文学观念中，认为厨灶是一家煮食养命之处，故此不宜太暴露，尤其是不适宜被门路所带引进来的外气直冲，否则家中便多损耗。我国民间多有开门对灶，财畜多耗一说。其次，“屋梁压窑，主多病。”指的是“灶忌横梁压顶”—风文学上有“横梁压顶”不吉利的说法，睡

床或坐椅上方有横梁压顶固然不吉，而灶上有横梁压顶则更不适宜，否则家人多病，尤其是对妇女健康有损。而“窑后，对火门不可开门、窗，主家中不安。”则来源于灶生火热，因煎炒时所产生的油烟对人体亦不适宜，故此炉灶向正房门固然不吉；其次“坐凶向吉”是安放炉灶时的重要规则。所谓“坐凶”是指炉灶要放在不吉利的方位，镇压着凶神，但却一定要“向吉”，即是说炉灶的火门一定要向着吉利的方位，借以吸纳吉气。《八宅明镜》对此作如下的解释“火门者，锅底纳柴烧火之口，得向吉方，发福甚速，期月之间即验。”^{[18]48-51,94}，所谓“火门”即是炉口，为什么炉灶要坐凶向吉呢？《八宅明镜》又云“灶，安本命凶方则吉，压本命吉方则凶，屡试屡验。”^{[18]48-51,94}。值得注意的是，可以看到近世末琉球的村落风水的调整中，有很多村民家都调整了灶台的朝向，可以说是采纳了中国风水中注重炉灶环境的观念。如在阳宅风水调整时，据神山里之子親雲上羽地間切風水史料(1888)^[19]和久米村神山里之子親雲上様式ヶ村風水御見分日記(1857)^[20]的记载，琉球村落的灶都向西进行了调整。如“かまと松川屋作替之砌辰巳之間後て * 二而 * 戊亥之間 * 二 * 向乾方下庚戌向”“かまと長田屋作り替之砌巳方後て亥方 * 二 * 向下辛酉向”“かまと新里屋作り替之砌卯辰ノ間後て丙戌ノ間 * 二 * 向辛方下辛酉 * 二 * 向”“かまと山城屋作替之砌四五六尺程前 * 二 * 寄卯辰ノ間後て酉戌ノ間 * 二 * 向辛方下間辛酉向”，从近世末期的村落风水调整情况来看，炉灶向西属于风水见在调节村落风水时的刻意为之，且现今冲绳地区传统的琉球民家的厨房、厕所和牲畜便所也位于房屋的西侧^[21]。

(三) 方位

中国古人推崇宅命互配，也就是房屋结构要结合八宅方位及流年的九宫飞星来调整。屋宅风水，清朝流行八宅派，其指导书为《八宅明镜》，该书为唐代堪舆大师杨筠松所著，到了明清时期，再由簪冠道人所重新编写的风水书。其书的八宅法即透过对于八卦五行道理的理解，阐明个人的气运，如何受到宇宙之和居住空间的「气」相互影响作用，致使居住在其中的个人的气运也相应地经历着吉凶祸福。

《八宅明镜》中的八宅法，依照坐向将宅分为东四宅（坎、离、震、巽）与西四宅（干、坤、艮、兑）；将人分为东四命（坎、离、震、巽）与西四命（干、坤、艮、兑）。东四命之人应住在东四宅；西四命之人应住在西四宅。东四宅之方位对于彼此皆为四吉方，而西四宅的各方位对于东四宅则皆为四凶方，依此原则安排住所内的空间分布^{[18]20-55}。《北木山风水记》^{[10]3-25}在调整住宅内部结构方位时，多次出现八宅法和九宫飞星相关的内容，如“按八宅方位，艮宅生气在坤，大门在坤，尤吉。但玄馆在天堂前，不吉。宜九尺移过在左边，乃吉。”“按九宫方位，艮宅，坤卦飞在艮宫。飞宫之坤土，助坐宫之艮土，为旺气方。五黄飞在坤宫，虽犯五黄之煞，而五黄属土，为本宅旺气，门路却吉。”“按三元气运，道光甲辰起，离卦入宫中，而推算乾飞在坤宫，为死气方，不吉。同治甲子起，坎卦入宫中，而推算兑飞在坤宫，为生气，尤吉。”“窑宜安生气延年天医方，乃吉。（未坤申为生气方，庚酉辛为延年方，戌乾亥为天医方）”“茶炉又宜安生气延年天医方，乃吉。”“神乃司人间福禄，若居凶方则吉，居吉方则吉。宜择亥震庚三吉之方而奉安，乃官民俱则吉，艮方宜可。”“子壬癸三方，在八宅为五鬼方，在九宫为煞气方。厕在此方，尤吉。但子位不可作厕。其位，巽卦所飞之地，巽为文昌之星，厕在此方，人民多不聪明。又丙丁午三方，在八宅为祸害方，在九宫为煞气方，厕在此方，尤吉。”“窑在戌乾亥方，在八宅为天医方，在九宫为生气方。尤吉。”“番所，各家，坐艮向坤，是为艮宅。大门开在坤方，是为坤门。照八宅方位，艮宅生气在坤，大门在坤，尤吉。”“本村井，在兑乾延年天医方，吉。”等。根据上述记载，可观察到中国的大游年变卦和八宅法九宫飞星的理论也传到了古琉球，并对当地的住宅结构方位有着重大的影响，影响了琉球的传统住宅布局。

五、结语

在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明发展历程中，风水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影响着国人的思想观念与行为模式。风水地理知识随着中琉两国的朝贡贸易传入琉球，给当地的都城规划、园林建设、村落布局、住宅选址、墓地营造等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也寄托着古琉球人民对理想住居及未来的憧憬。中国与琉球友好往来的历史源远流长，明清两朝与琉球的封贡关系长达500年，琉球也曾是东亚海洋贸易和海路文化交流的重要枢纽。本研究是中琉历史关系研究中的一环，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也能为中外文化交流提供有益的启示。

参考文献：

- [1]新城敏男.八重山の村落風水[J].沖縄県立図書館史料編集室紀要.1993(18):1-20
- [2]椿勝義,坂本磐雄,北野隆.集落の風水史料及び古地図に基づく八重山地方の集落坐向：風水思想による沖縄の集落空間形成に関する研究その1[J].日本建築学会計画系論文集.1997(62,500): 213-220

- [3]椿勝義,坂本磐雄,北野隆.807 『北木山風水記』及び集落古図の分析 : 沖縄八重山地方集落の道路配置及び形状に及ぼした風水思想の影響 その 1(歴史 意匠)[J].日本建築学会研究報告九州支部 3 計画系.2003 (42): 453-456
- [4]町田宗博,都築晶子.「風水の村」序論-『北木山風水記』について[J].琉球大学法文学部紀要.2010(2):199-213.
- [5]小熊誠.沖縄の村落移動と風水—村落史の記憶と歴史的事実—[J].歴史と民俗.2011(3,27),155-184
- [6]内原英聰.近世琉球弧における島嶼型風水の展開 一八重山諸島の村落風水を事例として—[J].法政大学大院紀要.2013(70):59-81
- [7]伊波普猷.琉球国由来記卷 4[M].东京:井上书房.1962: 128-129
- [8]那霸市企画部市史編集室.那霸市史卷 1[M].冲绳县.1980:366
- [9]徐竞,陈硕炫.试论风水在琉球的传播与应用[J].海交史研究,2022(01):84-101.
- [10]石垣市総務部市史編集課.北木山风水记 (石垣市史叢書 16)[M].冲绳.2008
- [11]胡瞬申.地理新法(写).韩国学中央研究院数码藏书阁.年代未详: 19-20
- [12]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葬書[DB/OL].(2025-3-9).[2025-3-9].
<https://ctext.org/wiki.pl?if=gb&chapter=242782>
- [13]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葬書[DB/OL].(2025-3-9).[2025-3-9].
<https://ctext.org/wiki.pl?if=gb&chapter=346403&remap=gb#p40>
- [14]刘晓峰.东亚视域下的琉球石敢当文化[J].民俗研究,2018(06):140-147+156
- [15]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琉球国志略卷四下[DB/OL].(2025-3-9).[2025-3-9].
<https://ctext.org/wiki.pl?if=gb&res=707072&searchu=%E7%9F%B3%E6%95%A2%E7%95%B6&remap=gb>
- [16]明王君荣撰.四库存目青囊汇刊 3 阳宅十书.郑同(校) 广州:华岭出版社.2010
- [17]董易奇 (编).黄帝宅经[M].湖南:湖南美术出版社.2011:566-576
- [18]杨筠松、簪冠道人.八宅明镜[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1-250
- [19]神山里之子親雲上羽地間切風水史料(1888)[DB/OL].(2025-3-9).[2025-3-9].
<https://shimuchi.lib.u-ryukyu.ac.jp/collection/shimabukuro/si00301>
- [20]久米村神山里之子親雲上様式ヶ村風水御見分日記 (1857) [DB/OL].(2025-3-9).[2025-3-9].
<https://shimuchi.lib.u-ryukyu.ac.jp/collection/shimabukuro/si00201>
- [21]アロマと琉球風水ですつきり 第 14 回 キッチン 1 琉球民家の台所 [N/OL].(2025-3-9).[2025-3-9].<https://longe.jp/aroma14/>

Research on the Specific Application of Ming and Qing Feng Shui Knowledge in the Villages of Ryukyu —A Case Study of "The Feng Shui Records of Hokubokuzan"

Wang Yujie¹

¹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Gulin, Guangxi, 541006, China

Abstract: The history of friendly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Ryukyu dates back a long time. The tributary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nd Ryukyu lasted for 500 years, and Chinese Feng Shui culture had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the Ryukyu Kingdom (now the Okinawa region of Japan). By investigating "The Feng Shui Records of Hokubokuzan," one of the village Feng Shui documents of the Ryukyu Kingdom, two major specific measures were summarized for Feng Shui inspection: one is the adjustment of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of residences, such as mountains, water, and roads; the other is the adjustment of the internal structure of residences, similar to home Feng Shui, such as stoves, toilets, and wells. On this basis, by exploring the specific measures and theories of Feng Shui inspection in the book, 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geomancy culture on Ryukyu villages is analyzed, providing a reference for explaining the extraterritorial survival of Chinese geomancy culture.

Keywords: Ryukyu; Feng Shui; Hokubokuzan; Geomancy Culture; Village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2.594

沉浸、释放与回归：青年剧本杀社交的内在逻辑¹

侯培森¹ 王梦菡¹

(¹上海中侨职业技术大学、上海金山区、201514)

摘要：通过参与式观察和访谈，以剧本杀游戏社交为例，探析深度媒体化时代，青年群体剧本杀游戏社交的内在逻辑。在剧本杀游戏中，游戏通过架起与他人情感联结的桥梁，使青年获得了“情绪价值”；在不同类型的剧本杀游戏中，通过移情得到了情绪释放，获得了多元的社交体验感；在特有的游戏社交机制中，青年在互动交流中得到身体回归，满足了“身体参与”的需求。虽然从青年剧本杀游戏社交的内在逻辑中能够探析出青年群体的在深度媒介化时代的内在需求以及追求的社交体验，但剧本杀游戏内外依然存在着许多问题的仍值得讨论。

关键词：剧本杀游戏；青年；身体参与；情绪价值

一. 引言

近年来，网络媒介技术迅速发展并加速渗入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熟谙新媒介技术的青年群体表现出高涨的热情，并依托社交媒体平台参与塑造其独特的青年社交文化。“深度媒介化”的时代根本性地重塑着青年群体之间的社会交往方式，^[1]也使得他们的社会交往逐渐表面化、无意义化。^[2]虽然，“深度媒介化”时代，人与人的联结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建立，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现实交往的减少，青年群体似乎没有获得想象中的满足，并且缺少了原始的社交体验。深度媒介化不断拓宽青年群体的交往边界，但也将青年群体“困”在线上。虚拟空间带来的短暂集体狂欢终究难以逾越人内心的鸿沟，反而使他们陷入了“群体性孤独”。^[3]特别是如有的学者所关注到的，深度媒介化时代给青年的社交带来便利和更广泛的联结，但是也使得他们陷入群体性孤独、情感性交往弱和参与感降低的深渊。于是，青年群体更加迫切地寻求社交与网络媒介分离的方法，更加注重寻求线下交往互动的回归。

青年群体迫切地需要一个线下平台来与其他人进行深层次的情感联结，而游戏仿佛是一个很好的链接方式。随着网络媒介技术的发展，以游戏为主的社交方式逐渐成为人们社会交往的主要渠道，尤其对于青年群体来说，游戏是他们联系彼此的主要方式。剧本杀作为一种新式线下聚会游戏娱乐方式，近年来被青年群体所追捧。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对为什么线下剧本杀是当代年轻人的社交新宠进行调查，通过对1543名青年受访者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78.9%的受访者表示通过线下游戏社交交到了新朋友。^[4]而对于剧本杀的起源，目前较为统一的说法是起源于二战时期的英国的派对游戏“Murder Mystery Game”（谋杀之谜），经过国内玩家的改编，逐渐发展成为剧本杀。^[5]剧本杀游戏为人们搭建了一个全新的人际交往空间，在游戏中青年群体暂时逃离了虚拟空间里的“第二人生”，回归到现实的亲身交流。对青年群体来说，剧本杀以更强的娱乐属性和高质量的互动社交，逐渐成为青年群体的社交新宠。线下剧本杀也凭借沉浸式体验和全过程沟通互动的特性为青年群体提供了一条重新回归面对面交往的新路径。剧本杀游戏深受最受年轻人的欢迎，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青年群体对社交的诉求和心态。因此，本文对于青年剧本杀游戏社交的内在逻辑的研究，有助于了解当前青年群体在现实生活中的心理、精神文化需求，以及青年群体对社交的需

[作者简介]

[1]侯培森（1995-），男，汉，安徽亳州人，上海中侨职业技术大学辅导员，助教，主要从事青年社会工作，大学生思想教育研究。
[2]王梦菡（1998-），女，汉，河南平顶山人，上海中侨职业技术大学辅导员，助教，主要从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求。同时，这对理解在深度媒介化环境下青年群体回归线下交往行为的心理诉求具有一定的意义。

二. 文献综述

游戏是一种文化现象，广泛存在于在历史发展长河中。游戏亦是一种大众艺术形式，是大众媒介，也是社会的延伸。荷兰学者赫伊津哈曾在其著作《游戏的人》中说道：“人是游戏者，人类文明是在游戏中并作为游戏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6]鲁威人等学者认为游戏文化是人类认知世界的起点、生活方式的内容、社会关系的纽带以及社会文化的基础。^[7]游戏以共同遵守的既定的规则、以趣缘为导向将青年群体连接起来。张丽芳在其研究中注意到了线上游戏社交的发展会对线下的人际关系产生影响。^[8]在游戏过程中，游戏玩家之间的亲密性、互动频度明显增强，能够满足青年在游戏场景中自我展示和人际交往的社交需求，而这种影响必然也会蔓延到现实世界中将青年个体之间串联起来。游戏是休闲娱乐的，也是满足青年个体之间社交诉求的媒介工具，通过营造出虚拟的游戏空间来提供一种新型的社交空间。依托游戏社交互动系统等使参与游戏的青年人的人际关系具备了可持续性的发展。对于游戏剧本杀社交的研究，国内则较多对剧本杀的游戏内容的沉浸性和叙事性以及游戏的发展方向的介绍，同时探讨剧本杀如何能够风靡于青年群体之中进行多视角的解构。一方面缺乏对于玩家在剧本杀游戏中如何建构自我，以及如何影响青年群体社会交往过程的研究。另一方面，对于剧本杀游戏对青年社交方式的影响等方面的阐述也相对较少。大部分学者的对于青年社交的研究角度更多的集中于青年群体线上社交的表现与结果，而对于青年线下交往的研究较少。对于剧本杀的研究，则忽视了线下剧本杀游戏社交对于青年群体社交互动行为的影响。剧本杀游戏为青年线下社交提供了新的“社交货币”，是青年线下游戏社交较为直观的体现。同时也反映青年群体在现实生活中的社交、心理和精神文化需求。因此笔者选择青年参加线下剧本杀游戏社交空间为本研究的出发点，探索青年群体在剧本杀游戏社交中的互动行为和内在需求。

本研究主要运用质性的研究方法，笔者一方面通过到几家剧本杀线下门店，和研究对象参与到线下剧本杀游戏之中，参与式观察研究对象在游戏中社交行为以及游戏后如何进一步升级或维护这种关系。另一方面通过加入各个剧本杀门店微信拼车群来进一步观察研究对象。同时对具有代表性的青年玩家进行访谈，进而了解其在深度媒体化时代对剧本杀游戏社交的内在逻辑。

三. 剧本杀社交表征分析

（1）扮演式社交：沉浸式的最佳体验

当你玩剧本杀的时候，你要放下手机而且会有一种角色代入，跟网络游戏不同的是，个体本身就是游戏的角色，在剧本里扮演另外一个角色。而这种游戏最大的魅力在于，能让你从时间中抽离，去体验一段平行的生命旅程，这是很多玩剧本杀的青年的体验。在游戏的过程中，挑选角色、发挥想象力补充和丰富角色的过程，也是逐渐放下自己，进入想象和扮演“他者”的过程。建构了一个“新现实”，让沉浸在情境里的玩家看到了人生更多希望和可能性。同时在剧情和环境中获得不同的感受，暂时脱离现实生活中的诸多烦恼，投入到一种全新的人生和身份中去，体验着不同的人生抉择和故事。随着对情境逐渐投入，在知晓很多的线索下，玩家有了很大的选择性，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来影响游戏的走向，提升了其游戏体验感。

（2）无负担社交：“社恐”最好的马甲

现实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具备多重社会身份，也在生活、工作中承担各自的责任，人们要扮演好属于自己的角色，维持符合自身身份的形象。而剧本杀游戏能够营造轻松、舒适的游戏氛围，在这种氛围中，青年可以暂时摆脱来自现实工作上或复杂的人际关系所带来的负担，沉浸地进行游戏娱乐与社交，不用过多的在意现实中的琐事。通过这种游戏空间也使得他们得到更真实、更接近也更安全的“连结”，这就是剧本杀游戏能够提供的，就是这种“无负担深度社交”。或许有些“社恐”青年在日常生活中不敢表达自己的想法，也拒绝与他人的互动，害怕被别人观察，或者自己在公共场所做出不适当的行为后产生过度的心理压力等等。而在游戏中，在促进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考虑，剧本杀游戏中有关剧本的角色之间的关系、关键信息的分享以及故事情节的推进都是在以玩家之间的互动交流为基础而展开的。恰恰正是一群有共同兴趣的人因为“一个剧本”聚在一起，相互之间不问真名，酣畅淋漓地体验一种“新人生”，一起经历“生死离别”或者感悟“爱情真谛”，也有真实动人的拥抱。而“剧终”后，每个人又回到自己家中，为第二天繁忙的工作做准备，不需要为自己承担责任，就像美美地睡了一觉，或者做了一个梦一样。

(3) 破圈式社交：强制的互动交流

社交媒体让人们的联系更方便，但是却也让人感受到更孤独。青年群体体现在缺的应该是一个能够和谐、温暖、平等的生活表达平台，而不仅仅是一个匹配工具。青年通过“剧本杀”平台来构建自己的完整的、立体的、有温度社交形象。尤其是这种让别人替你破冰，很自然地带入社交情景的这种模式，在之前的所有社交模式里其实是很少有的。剧本杀属于强制性社交，也就是按照玩家的头产生互动关系，剧本杀的通过剧本给玩家设立了人设和话题，建立了你我之间的关系，就算你是一个内敛不善言辞的人，也会因为在游戏里的角色和任务不停地找你搭话配合。在游戏机制的推动下，你必须去主动地和你对面的陌生人交流，形成真实、有效且强制的互动交流，打破了青年之间的“情感限制”，实现社交主体双方的同时在场，加强了青年群体之间的现实面对面交往，消除了彼此之间的心理隔阂，拉近了彼此之间的社交距离。

四. 令人沉浸的剧本杀：青年剧本杀社交的内在逻辑

(1) 架起情感联结的桥梁：满足“情绪价值”期待

作为互联网时代的原住民，青年群体已经习惯与线上交流、结交新朋友。在各类社交软件拓宽认识新朋友的渠道，但线上社交的标签化、人设化的形象使得线上的互动流于表面，不利于深度交流。同时，他们在生活和工作繁琐的重负下趋于“低欲望”，对线上社交日渐迷茫。尤其是一些青年人更习惯用躺平、佛系描述自身目前的社交状态，带来的是重回现实生活的孤独。于是，他们正在寻找一个媒介平台，能够真正地帮助他们与朋友又或是陌生人建立有意义的、更深层次的联系。比起通过在网络社交媒体上各种人设形象和标签，他们发现更有价值的交友方式：在展示真实自我的基础上，与他人真诚地沟通进行更深层次的联结。他们的社交行为以需求满足为基础，但并不会一味地制造需求。于是对“生理需求”或“填补空虚”的欲望转向对情绪价值的期待成为与陌生人建立关系的重要基础。

在剧本杀游戏中，场景内容丰富、情节设置立体，往往需要多名玩家一同参与；而在日常生活中，凑不齐人的时候，或是选择发朋友圈广招“闲人”，或是选择交给店家安排组队拼场，无论哪种方式都能够促进人们扩大自己现有的社交圈，使“剧本杀”的人际扩圈作用显得尤其突出一场。这得益于它能够提供一个舒适的、轻松的、可以深度交流的交友环境以供青年建立高质量的关系。可以说，剧本杀的使命正是建造一个这样全新的社交空间，能够满足青年在游戏场景中自我展示和人际交往的社交需求。青年玩家扮演剧本中拟定的角色，通过代入线索演绎推动故事的发展，共同完成游戏的目标。在角色扮演的基础上认识和了解现实中彼此，以游戏为媒介建立起情感上连接。而在游戏结束后，店家会提供的是一个在固定的微信群与同车的玩家汇聚、建立连接的机会。而通过共同的话题是让人们走出封闭圈、有兴趣进行剧本杀社交的一大原因。这拉近了青年群体人际交往距离、深化关系传播效果，同时以游戏为纽带建立认同，满足了青年对社交的“情绪价值”。

(2) 移情、情绪释放、瞬时体验：多元的情感需求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曾提出，演绎者通过将自己的情感转移到自己所塑造的角色当中，这个过程叫作“移情”。而在当代精神分析领域中，移情强调扮演者将自己内心的情绪，或对过去事物堆积的情感释放到所扮演的角色中，从而达到情感宣泄的效果。与看电影不同的是，在剧本杀游戏中，青年不仅可以体会故事人物中的复杂故事与内心情感，他们还能在剧本基础上尽情的发挥自己，去替角色选择自己的人生，满足了青年想要去真正的经历和体验幻想，在休闲娱乐的同时得到了精神压力的释放。

剧本杀的流行也体现了时下青年群体对情感交流和情绪释放的强烈需求，大多数青年人在生活中，都习惯了情绪内敛、不向外展露自己真实的想法。而在玩剧本杀时，剧本通过设置的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或爱恨冲突的角色羁绊，让青年在感悟角色中去释放自己的情感。在同时，由于剧本杀的开放性，不拘泥固定的台词，这就给青年玩家很大的选择性，他们可以借角色之口，充分地发挥自己的特质，主动展现现实生活通常不会轻易展现的一面。这些都让剧本杀在客观条件上，让人释放压抑情绪，又或是单纯地共情。在今天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娱乐、哪怕是纯娱乐也扮演着重要的社会角色，它承担了纾缓社会压力和情绪的“代偿性满足”的“减压阀”“按摩器”。^[9]

当人们完全沉浸在某种活动上时，会伴有高度的兴奋、强烈的成就感、控制感和充实感，并从现实世界中抽离进入心流状态。米哈里·契克森米哈里 (Mihaly Csikszentmihalyi) 将心流定义为当个人精神力完全投注在某种活动上的感觉，这种感觉能源源不断出现都获得了类似的让他们兴奋的情绪。心流的产生时会伴有兴奋感和充实感。特别是当活动顺利的时候，这种体验会使人们更愿意多次进行这些活动。^[10]在时间体验上，处在心流体验中的人会遗忘时间并产生时间感知的错觉。^[11]之所以剧本杀游戏能够带来的“瞬时”

享受，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赋予参与者极强的沉浸感、参与感。Dixon 提出的交互性四层进阶理论，他认为人们在交互性沉浸体验的活动中伴有着“游弋、参与、对话、合作”这四层递进关系的交互，而不断叠加的四层关系让参与的人们能够体验到更广泛的自由度和自主权，使得参与者得到酣畅淋漓的社交体验。^[12]而剧本杀游戏给青年提供了虚构而又真实的社交体验。当青年在一场活动中能够完整地进行四层交互关系时，就会不自觉地沉浸在其中并产生很好的社交体验感。^[13]

（3）互动交流中身体回归：“身体参与”的渴望与追寻

随着深度媒介化趋势愈演愈烈，身处在网络世界的青年们越发真切地感受到身体的“剥离”，身体成为一个不知如何安置的“多余物”。他们利用网络来获取新闻资讯，通过更新朋友圈来证明自己与外界的联系，在深夜或某个放空的时刻，抱怨自己像一座孤岛。于是他们似乎本能地对“身体不在场”感到焦虑。在这样的背景下，回归“身体在场”的愿望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刻都强烈，也越发偏好那些更具交互性、代入感的娱乐方式。这种种都体现了青年群体对具身互动和面对面交流的渴望和期待。而剧本杀游戏能够通过场景营造、情境引导、分享互动等环节，由玩家加以还原、演绎虚拟的角色，建构出一个基于趣缘而形成的虚拟与现实并存的世界。^[14]在剧本杀游戏中，玩家的“表演”不是孤立的，而是包含在一个“整体创作”当中，即玩家们互为演员和观众（主持人则像是若即若离的“导演”）共同创作、完成了一段“虚实相生”的旅程。这“狂欢”无疑需要“身体在场”。“身体在场”暗含着某种“情感纽带”，或是“真实”的保证。心理学认为认知和身体是独立的，大脑的思考独立于身体；身体是人思考的工具，人的思考不能脱离身体。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或可说剧本杀构建了一个微型的狂欢场域，玩家得以暂时地摆脱现实的秩序与距离。这也是其社交属性的体现，“拼车”或遇到“朋友的朋友”在剧本杀中很常见，但哪怕是陌生人在“狂欢”中，也很快就能建立起一种“半游戏半现实”的相互关系，当我们把个体行为变为集体行为时，就是一种具身社交。剧本杀是一个非常好的“具身社交”方式。相较“无情”的数字信号，具身交流更加连贯，也更加“亲密”，当自己的身体与别人的身体真切地进行互动时，共度的时间不可复制粘贴，人也不能同时“在场”两个地方，心理会更容易打开。由此“身体在场”被赋予信息之外的“不可替代的仪式意义”。

五. 结论与讨论：基于青年剧本杀游戏社交行为的反思

剧本杀在营造全身心投入、沉浸式的游戏社交氛围方面，无疑为当下生活在庸常状态的青年群体提供了现实和虚拟相联通的社交空间。究其本质是提供人与人之间一次深度交流的娱乐平台，剧本杀俨然已成为青年群体扩大社交圈的一种有效媒介平台。它不仅是单单只作为一种休闲娱乐放松而存在的。它的兴起与它能够满足当代青年群体的心理需求和社交需求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在研究剧本杀社交行为的过程中，笔者注意到在剧本杀社交内外依然存在着许多问题的值得讨论。

一方面，对于在深度媒体化时代的青年群体而言，比起宅在家里或者在王者游戏中寻找自我的价值，亦或者通过朋友圈来试着联结外界，仿佛只有剧本杀游戏中里与他人一起演绎和沉浸，才能获得很好地社交体验。然而，当这场“梦”清醒之后，内心的孤独感被重新唤起，个体又像一座孤岛与他人隔离。然而如何消除这情感上孤独，才应该是我们在游戏中应该寻找的答案。通过和游戏中的其他玩家进行演绎和沉浸式社交的方式来对抗个体情感上的孤独。然而，回归现实后，这些问题仍旧存在，仿佛游戏只是一个能够暂时对抗孤独的工具，暂时的营造一个虚拟的社交空间让青年去逃避。虽然如此，即便剧本杀游戏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但它也确实满足了当下许多年轻人的心理需求。在游戏中他们根据角色对自我的定位在进行不断地探索，这对于青年的自我同一性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意义。但我们更应当关注的是，当社会飞速向前发展，当人们物质财富在不断提高的时候，青年群体的精神世界并没有因为网络信息的过载而丰富反而变得贫乏。当代许多青年群体不足以处理和应对面对生活和工作上所带来的压力以及情感的孤岛，因而希望通过游戏去放松，满足自己休闲娱乐的需求的同时也满足他们心理社交需求。因此，当我们脱离游戏去重新审视这个问题，我们应当如何帮助青年群体构建一个满足自我的精神世界，帮助他们应当如何应对个体的情感孤独，这是值得研究者仔细思考的问题。

另一方面，剧本游戏是一种健康的社交游戏，同时也是青年喜好的文化传播方式，从外在表现上，剧本杀游戏能够将年轻人的目光从电子设备上拉回到线下互动交流环境中。线下剧本杀游戏中的“身体在场”的确能够让青年沉浸其中，同时又能带给他们更加真实的社交体验。然而这需要满足许多现实条件的。就目前线下剧本杀的发展状况来看，由于行业监管不严，部分剧本传递的价值观扭曲化很容易形成问题的综合，成为“精神鸦片”。因为剧本是情感和价值传递的载体，一个优秀的剧本带来的情感共鸣、心理慰藉以及对人性的思考和反思。这并不是所有的剧本杀门店都能满足软硬件条件，这往往限制线下剧本杀正向功

能的发挥。而作为内容创作积极性与效率高最高的剧本行业来讲，剧本源于生活，高于生活，需要的是刺激作品实现高质量的提升，淘汰劣质的、不符合大众文化的剧本，使其成为一个有态度有价值的文化产业。那么今后还要潜心研究思考，如何在不改变剧本杀本质特质的前提下，借助剧本杀的故事、体验、演绎，将正能量思想与文化传递给青年群体，如何让他们远离独处、回归社会，回到人与人的真实交流与互动关照之中，才是“剧本杀”更高的追求与发展方向。正如哲学家伯纳德·苏茨所说：“是游戏让我们在无事可做的时候有事可做。因此，我们把游戏称为‘消遣’，并把它们看作是对我们生活间隙的微不足道的填补物。但它们比这重要得多。它们是未来的线索。”

参考文献：

- [1] 乏如克·哈帕尔. 回归连通性：传媒社会学视阈下的新型社交方式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2022.
- [2] 常江,何仁亿.安德烈亚斯·赫普:我们生活在“万物媒介化”的时代——媒介化理论的内涵、方法与前景[J].新闻界, 2020(06):4-11.
- [3] 赵辰霄.线下剧本杀：群体性孤独的解药——基于跨学科视角的阐释[J].科技传播,2021,13(20):85-89.
- [4] 孙山,陈文琪.78.9%受访者表示通过线下游戏交到了朋友[N].中国青年报,2021-07-22(010)
- [5] 陈依凡.“剧本杀”手机游戏：叙事、互动与时间的三维研究[J].新闻研究导刊,2019(03):48-50.
- [6] 赫伊津哈：《游戏的人：文化中游戏成分的研究》，何道宽译，花城出版社,2007年.
- [7] 鲁威人, 石正贵, 宋立欣.游戏文化学.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19:13-26.
- [8] 张丽芳. 游戏社交与线下人际关系的相互作用机制研究[D].武汉大学,2021.
- [9] 喻国明.娱乐与游戏:一种未被正确认识的价值媒体[J].新闻与写作,2017(11).
- [10] [美]米哈里·契克森米哈赖.心流，最优体验心理学[M].张定绮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7:51,102,129.
- [11] 李立. 大众文化的审美时间体验及其价值悖论[J].新疆社会科学,2009(2).
- [12] 赵梦婕.线下剧本杀的心流体验分析[J].视听,2021(12):170-171.
- [13] Steve Dixon. Digital Performance: A History of New Media in Theatre, Dance, Performance Art and Installation. Cambridge: MIT Press, 2007. pp.564-595.
- [14] 谭昭,关屹.表演的身体与重构的形象：“剧本杀”的个体叙事研究[J].视听,2022,(08):149-151.

Immersion, release and return: the inner logic of youth murder mystery game socialization

Hou Peisen Wang Menghan

Shanghai Zhongqiao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University Shanghai Jinshan

Abstract: Through participatory observation and interviews, we take murder mystery game socialization as an example to explore the internal logic of murder mystery game socialization among youth groups in the era of deep mediation. murder mystery game socialization, the game bridges the emotional connection with others, so that young people gain "emotional value"; in different types of murder mystery games, they get emotional release through empathy, and gain a sense of diversified social experience; in the unique social mechanism of the game, young people get their bodies back in the interaction and communication to meet the demand of "body participation". In the unique social mechanism of the game, young people can return to their bodies in the interactive communication and satisfy the demand of "body participation". Although the internal logic of youth murder mystery game socialisation can be analysed from the intrinsic needs of youth groups in the era of deep media and the pursuit of social experience, there are still many problems inside and outside the murder mystery game that are still worthy of our discussion.

Keywords: murder mystery game; youth; physical participation; emotional value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2.597

养老机构失能老人长期照护的多重困境

——以 L 市 R 养老院为例¹

韩敬梓² 杨瑞¹ 赵婷¹ 盛玲嫣¹

(¹ 兰州财经大学 兰州 730030)

摘要: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 失能老人长期照护的可持续发展不容忽视。本研究基于对 L 市 R 养老院失能老人的参与式观察和深入访谈, 旨在阐明养老机构失能老人长期照护的多重困境及发展路径。养老院实践中失能老人收不抵支、精神慰藉匮乏、养老观念固化等问题尚未得到有效解决; 养老机构面临医疗卫生和照护资源不足、服务技能有待提升、供需失配等显著短板问题。因此, 促进养老机构服务资源协调整合、纠正老人的认知偏差等是推动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失能老年人照护保障体系的关键举措。

关键词: 人口老龄化; 失能老人; 长期照护

一、问题提出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 由衰老、疾病等原因导致的半失能、失能老人规模显著增加, 机构养老需求复杂化、多元化特征日益凸显。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明确指出, 应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财政承受能力, 以高龄、失能老年人照护为重点, 有效满足老年人基本养老服务的刚性需求。相关数据显示, 我国失能老年人群会长期持续扩大。此外, 失智症患者数量也在快速增长。如果将失能、失智人口与需要连续照护 6 个月以上的残障者、慢性精神病人及其亲属加总, 这一群体将涉及 2 亿多人。其中, 由于失能老人占比最高致使其影响的人数也最多。失能老年人专业照护服务面临严峻挑战。与此同时, 随着老年人口绝对数量的增加, 需要专业照护服务的老年人数量也会增加, 这将在一定程度上引起机构养老服务需求量的增加, 机构养老的发展亦存在一定困局。此外, 家庭结构随着人口出生率的变化而呈现出新的格局。人口出生率的逐年递减显示出: 核心家庭逐渐取代了之前多世代、多子女的家庭结构, 核心家庭已经成为主要的家庭结构。家庭照护老人的能力和精力有限, 无法满足失能老人特殊的照护需求, 且老人的照护费也不同程度地影响着家庭子女的收入能力, 减少其收入来源。家庭成员承担老年人照护责任时, 非但无法像有偿性照护者一样获得劳动报酬, 而且会产生大量的机会成本; 挤占了照护者大量时间资源。持续地照护严重影响了家庭照护者的个人生计。家庭照顾者通常不具备足够的照护知识和专业护理工具, 导致其照护水平和照护能力有所欠缺。同时, 失能老年人受限于身体状况, 面临诸多健康问题, 且就医困难, 因此他们对专业照护服务的需求更为迫切。养老机构如何为失能老人提供满足其需求的照护服务成为了我国面临的现实难题。本文拟从 L 市 R 养老院入手, 以失能老人长期照护服务的视角切入, 分析养老机构照护不足的多重困境, 并结合 L 市人口老龄化现状提出相应对策, 以期为完善养老机构照护服务提供可持续发展的解决方案。

[作者简介]

[1]韩敬梓, 女, 辽宁凌源人, 社会工作师, 社会学博士, 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人类学博士后, 兰州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 上海大学国际禁毒政策研究中心青年客座研究员, 研究方向: 社会治理;

[2]杨瑞, 女, 河南柘城人, 兰州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研究、社会治理研究。

二、文献回顾与理论框架

(一) 文献回顾

1963年,美国医疗救助福利部首次提出“长期照护”这一概念,即家庭和缺乏医疗条件的养老机构无法对由于高龄、失能失智、突发事故等原因丧失或部分丧失生活自理能力的老年人提供长期照护服务。Canton (2006)指出,老年人不能生活自理,需要他人照护90天以上的为长期照护。2016年,世界卫生组织(WHO)对先前存在的“长期护理”“长期照顾”“长期介护”等术语进行了统一,并将官方翻译修订为“长期照护”,“长期”意为护理期间的长度。

失能老人长期照护服务需求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黄匡时(2014)在对中国老年人健康长寿影响因素调查(CLHLS)的分析发现,我国老年人的日常照护需求率在50%–60%之间。朱松梅(2014)则从中观、宏观层面对完善农村失能老人长期照护体系详细阐述,一是在整体性视角下明确农村失能老人长期照护关键要素,二是组建农村失能老人长期照护共同体,构建需求侧、供给侧、管理侧、保障侧良性互动的有机整体。Afroz等(2023)指出长期照护服务内容除基本的生活护理之外,还要重视老人康复服务,特别要重视环境因素的作用,环境因素是影响失能老人家庭康复的重要因素,良好的社会环境可以改善老年人的家庭康复服务。

“失能”,“失能老人长期照护”的相关概念界定,为本文对失能老人的界定以及研究变量的选取提供了必要指导。本文将通过详细地阐述奥尔德弗ERG理论、分析养老机构失能老人日常生活、医疗服务等方面的需求,并说明失能老人精神慰藉等心理关爱方面的困境,从而探索养老机构失能老人长期照护的可持续发展路径。

(二) 理论框架

本文运用ERG(existence-relatedness-growth)理论对养老机构失能老人需求进行分析。ERG理论是由美国耶鲁大学组织行为学教授克雷顿·奥尔德弗在1969年提出的,在其《人类需求新理论的经验测试》中阐述,并对马斯洛需求层次论修改并且大量实证研究后得以形成。奥尔德弗教授指出,人类的核心需求并非马斯洛所提的五种,而是可以归结为三种核心需求:生存需求(Existence Needs)、关系需求(Relatedness Needs)、成长需求(Growth Needs)。

生存需求指的是与个体衣食住行紧密相关的基础需求,对应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中的第一级和第二级需求。相互关系需求则是指在社交互动中与他人建立良好关系的愿望,可以理解为与同事、上下级、朋友等建立的社交联系,与马斯洛理论的第三层级需求相当。发展需求关注的是个体在自我实现层面的追求,涉及对个人能力及未来成长的渴望,对应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中的第四和第五层级需求。在马斯洛的理论框架中,当个体较低层级的需求得到满足后,会进一步寻求满足更高层级的需求。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从三个层面理解失能老人需求:生存需求指的是为个体提供满足其基本生活条件的必需品,包括满足失能的日常生活需求以及医疗服务需求;相互关系需求是指满足失能老人在人际关系方面的需求,即获得他人及社会的认同与接纳;发展需求则是指失能老人追求自我价值实现的精神需求,包括获得精神慰藉与支持。根据ERG理论,当失能老人的发展需要得不到有效满足时,对于相互关系需求和生存需要的需求会随之增长。因此在养老养老机构的实践过程中,应充分结合失能老人的个性化需求,提供能够满足其需求的多元化服务。

三、养老机构失能老人长期照护现状

R养老院是位于L市的一家公建民营养老服务机构。截至2024年,该养老院共有500张床位,5名专业护理人员和2名医生。根据我国民政部发布的《老年人能力评估规范》,本研究选取了居住在R养老院的112名失能老人作为研究对象,运用访谈法选取入住R养老院失能老人、养老院负责人及工作人员等利益相关者作为访谈对象,面对面进行深入访谈。访谈时间为2024年4月,每位失能老人访谈时间约30分钟,围绕失能老人的入住背景、家庭与身体情况,深入了解失能老人多样化需求,鼓励、支持失能老人分享真实想法。获取到真实且原始的信息,从而更深入地了解失能老人的实际生活和需求状况。

基于ERG理论及研究结果得出,养老机构失能老人的需求总体分成三类:生存需要、相互关系需要、发展需要。本文引用选自112位失能老人访谈记录表达较为清晰的失能老人(其中1位丧偶)的采访记录,且均获得老人及家属同意,了解失能老人多样化的需求问题。

(一) 生存需要

生存需求是机构失能老人存在的最基本的需要，包含生理和安全的需要。它包含生活中的衣食住行基础条件。第一是维持失能老人的身体机能正常运行的生理性需要也就是日常生活需求，第二则是安全需要主要体现于医疗服务需求。

日常生活需求是生存需求的首要组成部分。在 CHARLS 数据中影响日常生活需求的因素主要有慢性病状况以及失能程度两项。老人慢性病主要涉及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失能程度的衡量包括吃饭、起床、穿衣、上厕所等方面。R 养老院失能老人有 112 位，占 41.8%；88 位失能老人患有慢性病，占 68.75%。其中，按照 ADL 失能程度评定表可以发现：重度失能老人占 37%，中度失能的老人占 9%，轻度失能的老人占 54%，可见，失能老人需要得到更加专业化的医疗照护服务。

失能老人最基本生活保障的经济来源同样是日常生活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保障为失能老人维持生存提供必需品。某前广播站话务员失能老人 L 说“住在这里（R 养老院）一个月四千快，我的退休金只有一千，每个月得靠儿子帮衬”。由此可见，大多失能老人无法凭退休金或自身积蓄缴纳高额的养老院护理费用，部分老人没有退休金，只能靠子女支付。个别失能老人终生未婚，靠积蓄为自己缴纳护理及养老费用。

年龄的增加往往会伴随健康问题加重。经过调查发现，R 养老院仅为老人提供基础的医疗和养老服务，定期为老人测血压、测血糖等基础医疗服务。在面对突发疾病、常见病和多发病时，只能紧急送往医务室或拨打 120 急救电话。护理员 A 表示“我是大专毕业之后通过培训直接进入这家养老院工作的；每天上午值班的只有三位护理员，负责整个楼层的老人护理，常常忙不过来，平时主要让老年人晒晒太阳按按摩，专业的医疗基础设施和医疗水平需要去医院才能实现”除此之外，个别失能老人对院内的医疗设施抱有怀疑态度，害怕一旦自己出现突发情况，因院内医疗技术不足而耽误病情。某前工厂厂长失能老人 M 说“这离医院太远了，院内有没有什么设施，不敢生病”。综合来看，R 养老院存在养老服务护理意识不强，照护服务质量不高、专业性不足等短板问题。

(二) 相互关系需要

相互关系需要主要体现在老人社交方面，也表现为与子女交往的需求方面。失能老人由于身体机能退化与社会角色转变，心理健康问题凸显，更加渴望子女以及工作人员对自己的尊重，且有较强的社交意愿。

社交活动是失能老人相互关系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统计失能老人日常社交活动满意度发现：40%的失能老人认为 R 养老院提供的日常社交活动一般；36%的失能老人对 R 养老院提供的日常社交活动抱有积极态度，认为日常社交活动非常好或比较好；24%的失能老人对 R 养老院提供的日常社交活动抱有消极态度，其中，15%的失能老人认为 R 养老院提供的日常社交活动不太好；9%的失能老人认为 R 养老院提供的日常社交活动不好，加之身体原因，老人对社交活动不感兴趣，便拒绝参与。养老院失能老人与其子女、配偶交往的欲望比较强烈。曾于某医院就医医生失能老人 D 在接受访谈时感叹“我女儿工作特别忙，一个星期只能看我一次，有的时候连住两个星期都不来，我特别想她。有的时候她来了，只待了半个小时就走了，我想让她多来看看我，但我又不敢告诉她，害怕影响她的工作。”与子女交往的需求方面（表 3-1 所示），失能老人中 79%的家庭是非独生子女家庭，24%的家庭是独生子女或无子女家庭。失能老人在与子女的关系方面，非常满意的占 32%，比较满意的占 32%，不满意的占 36%。

表 3-1 失能老人互相关系的需求情况

需求	项目	分类	人数	百分比
相互关系需求	子女数量	2 个及以上	88	79
		1 个及以下	24	21
	同子女关系	满意	56	50
		比较满意	26	23
		不满意	30	27

(三) 发展需要

发展需求更多体现在老人心理健康状态方面。失能老人中，独居老人的精神慰藉需求相较于夫妻双方健在的失能老人对社会交往需求更迫切。某工厂前员工失能老人 C 说“我的老伴去世以后，感觉很孤单，情绪低落时还会哭”该类老人不愿意与同辈老人交流。喜欢在房间里独处，易出现抑郁、焦虑、失落等负向情绪。独居老人 A 补充到“老伴走的早，我想找到伴侣相互帮忙，一个人太孤单了”。部分失能老人渴望寻求伴

倡或挚友, 尝试与外界接触, 开启新的生活。进一步统计失能老人心理健康需求情况(表3-2所示)发现:感到孤独的失能老人有43人, 占38%;感到不孤独的老人有69人, 占62%。对生活满意、比较满意、不满意的人数分别为34人, 44人和34人, 分别占比30%、40%和30%。部分失能老人在养老院养老过程中因种种原因时常感到孤独, 应在心理健康方面考虑失能老人的特殊性, 给予更多的关怀与照顾。

表3-2 失能老人心理需求情况

需求	项目	分类	人数	百分比
心理健康需求	孤独感	感到孤独	43	38
		不感到孤独	69	62
	生活满意度	满意	34	30
		比较满意	44	40
		不满意	34	30

四、养老机构失能老人面临的照护困境

基于对R养老院的分析, 研究发现养老院失能老人照护服务的供给与需求之间始终难以完全对接。,发现养老院失能老人照护服务供给与需求之间始终难以完全对接。存在护理人员照护服务匮乏、服务技能不足、失能老人经济、精神与观念挑战的困境。

(一) 照护服务匮乏

供给内容指服务供给的数量和类型。R养老院在供给内容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

一是护理人员数量十分有限。失能老人相较于其他普通老人需要专业化、精细化、个性化的服务, 尤其是高龄失能失智老人这类特殊群体。然而, 护理人员承受过大的工作压力, 无法及时地回应失能老人的需求, 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与老人进行更有效的沟通, 老年人的实际需求并未得到关注。

二是照护服务资源缺乏。失能老人因健康状况不佳和身体机能衰退, 导致其行动能力和生活自理能力受到显著限制。这使得他们对医疗服务资源的需求更高。然而, 养老院的服务仅限于满足失能老人的基本医疗需求, 缺乏专门的医疗辅助设备, 因此无法进行专业的康复护理。基于养老院现有的医疗资源和能力, 要充分满足失能老人的医疗护理需求仍存在诸多挑战。

三是照护服务种类单一。随着经济不断发展和生活水平提升, 老年人的需求已经超出了基本的生活需求范畴。根据ERG理论, 不同层次的需求有可能会同时出现。失能老人面临着显著的经济压力, 由于收入与支出之间的不平衡, 养老机构的运营压力日益加大。长此以往, 养老机构可能会因经营管理资金匮乏等问题, 造成设施资源的浪费, 从而无法为老年人提供更为周全的康复护理服务。

四是正式照顾供给功能弱化。部分老人入住养老机构之后, 若与子女关系不够融洽, 极易产生孤独感。由于长期照护失能老人, 子女需要缴纳高额的护理费用, 同时, 子女还需承担抚养下一代的责任。在照护失能老人过程中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难免无暇顾及, 只能简单地陪伴老人, 非正式照顾供给功能受限。

(二) 服务技能不足

一是服务态度有待改善。调查发现护理人员的学历普遍为大专, 且多数未接受过专业培训, 仅由养老院中经验丰富的工作人员对其开展短期培训后便上岗。通过观察其工作过程发现, 部分护理人员在照护老人时存在直接称呼老人姓名、大声斥责老人、对老人提出的问题置之不理等行为, 呈现不耐烦的工作态度。

二是照护服务的专业化水平低。失能老人往往有长期照护的需求, 然而养老院在提供持续照护服务方面存在显著短板。长期照护服务与一般的照护服务有所区别, 它更加注重医疗治疗的持续性和稳定性, 特别是考虑到老年人身体机能的特殊情况。然而, 养老院并未配备用于提供持续性照护服务的医疗器械。部分护理人员在关注老人的情感生活方面的经验存在明显不足, 同时缺乏必要的专业服务技能。仅能提供简单的安慰, 而无法提供更为专业的服务。年纪较大的护理人员A表示“表示自己年纪大了, 做事情不如年轻的护理人员。在学习新的知识和技能方面, 存在诸多困难。工作强度比较大, 也没有精力和时间去学习。”且对于康复护理服务重视度不足。相较于普通老人, 失能老人对康复护理服务的需求更为迫切和全面。多数失能老人面临身体残疾、行动不便等挑战, 部分老人还需应对术后康复护理的问题。

三是服务供给数量不足。R养老院在为失能老人提供护理服务的员工数量上明显不足, 仅有5名护理

人员，且他们并未接受过专业的护理康复训练。在实际操作中，这些护理人员很少能开展有针对性的康复护理活动来帮助他们缓解病情和改善生活质量。长此以往，失能老人的健康状况并未得到改善，反而出现病情加剧的情况。养老院对康复护理服务的重视程度不足，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只能依赖医院和家属的支援。

（三）失能老人经济、精神与观念挑战

一是收入未得到保障，经济难以承担养老费用。失能老人最基本生活保障的经济来源是日常生活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养老金制度仍存在不完善之处。首先是基本养老金水平过低无法满足大部分老年人的基本生活需求。其次是养老金来源单一。大多数失能老人可以维持生活收支基本平衡，但也有一部分老人因为收入太少或支出太多（一般是医疗支出）而收不抵支，生活困难。部分老年群体没有退休工资或者退休工资很少，大部分老人难以支付高昂费用。照护失能老人是长期性工作，需要长期按时吃药和诊疗等。此外，护理级别也会相较于普通老人更高，进而花费也更高。老人的收入无法得到保障，难以覆盖其养老费用。

二是精神慰藉满足能力欠缺。独居老人对于子女的依赖程度要远高于一般老人。部分老人由于老伴去世或子女外出等原因时常感到孤独，却只能与护理人员或同住在养老院的老人进行沟通和聊天。护理人员由于工作强度较大，无法腾出时间专门安慰失能老人。作为失能老人，正常的情感需求和精神需求被经常忽视。长期以来，一方面，失能老人“老而无用感”加深，自己没用，不仅帮不了子女，还成为子女的拖累，不少老人要求“安乐死”。另一方面，独居老人寻求伴侣，与人沟通、交流的需求长时间无法得到满足。面对情感的缺失，加之老人的文化程度普遍较低，无法通过自身的能力进行调节，进而使其精神慰藉需求难以得到满足。

三是养老观念的固化，容易自我封闭。失能老人由于身体机能等各方面的影响，对于情感表达的需求更加强烈。失能老人大部分依靠局外人取得与子女的沟通与联系。部分失能老人抱着“不愿意麻烦别人”的心态，从而逐渐减少了与外界的沟通，形成自我封闭的状态。同时，养儿防老的观念和现代养老观念发生碰撞。很多老人持有养儿防老的固有观念。有老人表示在养老院生活身心不自由，又担心子女因此而污名化，背上“不孝”的骂名。相比于养老院，老人更愿意由自己的子女照护。由于传统固有观念的影响，使老年群体在入住养老院时，内心容易自我封闭，而子女和工作人员都无法及时地关注到老人的心理状态。

五、解决养老机构失能老人照护困境的实践路径

依据 ERG 理论解决养老机构失能老人需求问题，可以以养老机构失能老人为主体，从国家、养老机构及工作者、子女及家人三个方面解决失能老人不同层次的需求，达到“1+1+1>3”的效果

（一）国家优化服务供给

在养老机构失能老人的长期照护中，需构建国家－家庭－社会－市场的多元供给体系。国家作为公共服务的提供者，肩负着照护失能老人的兜底责任，推动供给服务的改革。通过多方的协调与努力，持续提高失能老人照护服务的质量。一是提供充足的养老服务供给。完善医疗资源和各项设备，做到失能老人照护设备与失能老人照护服务需求精准匹配。完善养老机构养老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提高医疗设备配备，补齐专业养老服务队伍。二是完善照护服务的政策支持。建立健全养老机构养老服务补贴政策，提高养老机构养老优越性、便利性、普及性。鼓励和支持养老照护养老机构与医疗机构、健康管理机构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通过签订合作协议、共建服务平台等方式，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从而推动医疗资源向养老照护领域延伸，为老年人提供便捷、高效的医疗服务；三是将健康管理与心理服务融入日常照护中，全面提升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探索建立“医养结合”、“康养融合”、“心养并重”等多种新型服务模式。在养老照护机构内设立医疗点或远程医疗服务终端，实现医疗服务的即时响应；开展定期健康检查、慢性病管理、康复护理等健康服务；并设立心理咨询室，为老年人提供心理疏导、情绪支持等心理服务。

（二）养老机构完善服务形式

1. 提升长期照护服务专业化

作为直接接触并照顾老年人的专业人员，养老护理人员在养老服务体系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养老机构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升其专业化水平：一是强化护理人员的专业培训。针对养老护理人员设计系统化的学习培训方案，并积极吸纳具备医疗工作专业背景、掌握相关知识和技能的人才。全面提升护理团队

的整体素质和专业水平。二是在护理人员上岗之前注重人文教育，通过系统加强护理团队的养老培训力度，深入传授关于老年护理服务的核心理念、价值观以及专业伦理，同时教授他们科学有效的护理方法。三是建立跨学科的人才队伍，鼓励跨学科背景人才进入长期照护领域。四是加强宣传，转变社会对从事照护工作的护理人员的传统认知，并着力提升其社会认同感和接纳度，从而提升护理人员的自我认同感。五是鼓励护理人员通过不同的方式，为不同类型的失能老人提供多元化、个性化的服务。对失能老人的基础资料进行详尽地收集与分析，包括基本信息、疾病历史、药物使用状况以及个人兴趣等。在此基础上，综合考量失能老人的年龄层次、受教育程度以及认知能力等特征，严格遵守个体化原则，充分尊重每位老人的独特性与需求。尊重失能老人的个人意愿，赋予其更多的自主选择权，以确保老人获得真正的尊重与关怀。

2.促进机构服务资源整合

护理人员作为老年人与各类照护资源之间的桥梁，首要任务是全面、准确地了解老人的身体状况、生活习惯、兴趣爱好及特殊需求等信息。护理人员需积极探寻并建立起与医疗机构、康复中心、社区服务中心、心理健康服务机构等多方资源的有效联系。具备敏锐的洞察力和良好的沟通协调能力，对接适合失能老人的服务资源。在护理团队内部构建经验共享机制，即设立工作经验分享小组。有效促进不同年龄层护理人员之间的沟通与互动，激发年轻护理人员对年长同仁的协助意愿。通过小组活动，提升整个机构护理人员的服务水平。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达到节约医疗与照护成本的目的。在资源链接的基础上，护理人员需进一步发挥协调作用，确保各类照护资源能够顺畅、高效地服务于老人。这包括但不限于：协调不同服务机构之间的合作，确保服务流程的连贯性；根据老人的实时需求变化，灵活调整服务内容与频率；解决服务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冲突与矛盾，保障老人的合法权益。

（三）家人助力家庭协作

家人作为家庭养老体系中的第一责任人，其角色与责任尤为重要。面对工作与家庭之间的张力，尤其子女需要在工作与个人生活之间寻求平衡，以确保对失能老人的有效陪伴与照护。一是增强对机构养老重要性的认识，深刻理解老年人在身体、心理及情感上的特殊需求。通过定期沟通、情感交流，及时了解老人的身体状况、心理变化及生活需求，为提供精准、有效的照护服务。二是提高赡养老人的水平。失能老人的身体机能随着年龄的增长不断地下降，当老人的自理能力减弱时，子女向父母提供一定的经济援助，有效增强失能老人在购买养老服务方面的能力。助力失能老人选择更专业机构养老服务。同时积极学习相关护理知识与技能，提升自己在照护中的专业能力，以更加科学、合理的方式关爱老人。三是帮助失能老人摒弃对养老机构的偏见，积极适应新形势下养老观念的重构。这并非是摒弃孝顺的核心理念，而是结合新的社会环境，对传统孝文化进行重新定义和弘扬。子女应积极引导老人形成正确的养老观念，从实际养老需求出发，帮助老人消除对养老机构的误解，从而摆脱传统养老观念的束缚。

六、结语

本文基于对 L 市 R 养老院失能老人的参与式观察及深入访谈，系统分析了养老机构失能老人长期照护的多重困境，并探讨了解决老人照护困境的实践路径。R 养老院在失能老人照护方面存在显著困境，具体表现为照护服务匮乏、服务技能不足以及失能老人经济、精神与观念层面等挑战。基于此，国家应优化服务供给，构建多元供给体系，完善政策支持，推动“医养结合”等新型服务模式的发展。养老机构应提升服务专业化水平，促进服务资源整合，为失能老人提供个性化、多元化服务。子女则应增强对机构养老重要性的认识，提高赡养老人的水平，助力失能老人摒弃对养老机构的偏见，积极适应新形势下的养老观念。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深入发展，失能老人数量持续增加，对专业照护服务的需求日益迫切。养老机构失能老人长期照护体系将面临更多的机遇与挑战。一方面，应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如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提升照护服务的智能化水平，提高服务效率与质量。另一方面，应持续推动养老服务政策创新，建立健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为失能老人提供更加坚实的制度保障。同时，加强跨学科研究，探索失能老人心理健康、康复护理等方面的新理论、新方法，为失能老人提供更加全面、专业的照护服务。通过多方的共同努力，推动养老机构失能老人长期照护体系的可持续发展，为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贡献力量。

参考文献：

- [1] 李志宏. 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研究总报告[J]. 老龄科学研究, 2015, 3: 4-38.
- [2] 杨团. 中国长期照护的政策选择[J]. 中国社会科学, 2016, 11: 87-110, 207.

- [3]王广州, 周玉. 中国家庭规模的变动趋势、影响因素及社会内涵[J]. 青年探索, 2021, 4: 42-49.
- [4]伍海霞, 王广州. 快速老龄化过程中中国独生子女家庭照料负担研究[J]. 中国软科学, 2021, 7: 152-163.
- [5]田文泽, 李杰. 老年人非正式照护对子女工作收入的影响研究: 基于 PSM 的实证分析[J]. 调研世界, 2020, 11: 32-38.
- [6]熊吉峰. 资源、生计与农村失能老人的家庭照护[J]. 农村经济, 2014, 4: 116-119.
- [7]曹艳春, 王建云. 老年长期照护研究综述[J]. 人口与经济, 2013(4): 84-89
- [8]钱煜. 循证实践视域下城市空巢老人精神慰藉的社会工作介入[D]. 中南民族大学, 2019.
- [9]拜争刚. 循证社会科学[M].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8.
- [10]Afroz, S.K., Rubayyat, H., & Samson, B.A. Informal Care giving Provision for Disabled or Elderly in the Families and Work Productivity: Evidence from 11 Waves of an Australian Population-Based Cohort[J]. *Pharmaco Economics*, 2023, 31(9): 1117-1136.
- [11]民政部关于进一步扩大养老服务供给促进养老服务消费的实施意见 40000169-4/2019-00025, 养老服务司, 2019.
- [12]赵越, 刘兰秋. 英国和美国社区居家安宁疗护服务模式及其对我国的启示[J]. 中国全科医学, 2022(19): 2330-2335.

Multiple Dilemmas of Long-Term Care for Disabled Elderly in Nursing Institutions --Taking L City R Nursing Home as an Example

Jingzi Han, Rui Yang, Ting Zhao, Ling Yan Sheng

¹Lanzhou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Lanzhou 730030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population ag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long-term care for the disabled elderly cannot be ignored. Based on participatory observation and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the disabled elderly in L City R Nursing Home, this study aims to elucidate the multiple dilemmas and development paths of long-term care for the disabled elderly in nursing homes. Problems such as the inability of the disabled elderly to earn enough to cover their expenses, the lack of spiritual comfort, and the solidification of the concept of old age in nursing home practice have not yet been effectively solved; nursing institutions are facing significant shortcomings such as insufficient medical and health care resources, service skills to be upgraded, and the mismatch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Therefore, promoting the coordin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service resources in elderly care institutions and correcting the cognitive bias of the elderly are the key initiatives to promote the establishment of a care and protection system for the disabled elderly that suits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

Keywords: population aging; disabled elderly; long-term care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2.591

身体与民族：民国时期岭南武术与民族国家建构

黄昊昱

(西南民族大学，四川 成都 610041)

摘要：民国时期岭南武术作为连接身体实践与民族主义的重要载体，为解码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构机制提供了独特视角。研究发现，武术通过科学化训练体系构建国民身体规训、跨国符号生产强化国家文化认同与宗族网络动员整合地方社会资源，实现了从地方性技艺到国家文化符号的转型。民国时期岭南武术的转型揭示了一条关键规律：民族国家建构需通过身体实践将抽象意识形态具象化。岭南武术现代化进程中传统性与现代性的张力，揭示了文化认同建构需在守护基因与创新转化间寻求平衡的历史规律，同时也为全球化时代非遗活态传承提供实践范式。

关键词： 岭南武术；身体；民族国家

一、引言

在民国社会剧烈转型的历史语境下，民族国家的形成是近代中国发展中的应有之义，武术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只是一种体育运动或技击艺术，更是一种深植于中国文化土壤中的文化现象和精神象征。特别地，武术在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充分发挥了独特且重要的作用。而岭南地区因其特殊的地理区位与文化生态，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岭南武术文化，成为了中华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岭南地处南海之滨，作为中西文化交汇的前沿地带，所以岭南武术在近代化进程中较早接触西方体育与军事技术，同时又依托宗族伦理维系着“以身为器”的技艺传承体系，形塑了其独特的发展路径，这种传统与现代的文化张力能够使岭南武术作为观察民族主义如何重塑身体实践的典型范例。对岭南武术的深入研究，可以更好地理解岭南武术作为一种身体实践，在这一时期如何成为连接个体、社群与国家认同、传统与现代的重要纽带，以及它如何在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发挥作用。

身体政治理论强调身体是权力运作的微观场所，政治权力通过规训、训练、医疗等手段实现对身体的控制。身体既是被压迫的对象，也是反抗的载体。武术作为一项典型的身体实践，它的发展轨迹深刻反映了近代中国政治转型中国家与社会在身体层面的权力博弈，这种动态关系至今仍影响着武术的现代化发展路径。这也是引入身体作为研究视角的原因。相关研究认为，民国时期岭南武术通过“科学化”转型和制度化推广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例如，精武体育会等组织通过“以武强国”理念，将武术与救亡图存相结合，塑造了“新民”形象。政府通过体育议决案将武术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强化其作为“国术”的政治象征意义。岭南武术的“身体实践”被赋予双重功能：既强健国民体魄，又通过文化符号传递民族认同。身体政治理论认为，武术通过规训国民身体实现“国族化”转型，董刚等学者（2022）指出武术从“末技”到“国术”的话语蜕变，完成了“身体的觉醒”与“国家认同的塑造”，武术通过规训国民身体实现“国族化”转型^[1]。这一转变不仅涉及技术体系的革新，更折射出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对民众身体的改造诉求。张震等（2021）进一步提出武术作

[作者简介]

黄昊昱（2001—），女，西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西南民族研究院硕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

本文系西南民族大学2024年研究生“创新型科研项目”（一般项目）《身体与民族：民国时期岭南武术与民族国家建构》（项目编号：YCYB2024101）成果。

为“国家意识形态的身体映像”，在近代民族危机中承担起规训国民精神的重任^[2]。

基于既有的研究基础，本研究将武术实践中的身体视为权力与认同的双重载体，尝试从以下四个维度解析民国岭南武术参与民族国家建构的深层机制。

二、科学化改造与武术现代化

在民族国家建构的历史背景之下，岭南武术的现代化转型呈现出科学化改造与现代化的显著特征。这一过程既是对传统武术“身心合一”哲学的重构，也是国家权力通过现代知识体系重塑国民身体的治理实践。在当时内忧外患的复杂社会背景之下，国家和社会面对着“东亚病夫”的耻感叙事对民族身体的污名化，武术也被更多地赋予了保家卫国的情感因素，民国时期空前高涨的“强国强种”思想更是激发国人对武术的无尽热情。武术在当时的兴起反映着国人希望以武术强身、救国的迫切愿望。在西方体育的冲击之下，武术界需要以身体的科学规训为突破口将传统技艺转化为兼具民族性与现代性的文化资本。

在身体技术的标准化改造层面，民国政府通过教育体系将武术纳入国民身体锻造工程，武术被纳入学校体育课程，成为正规教育的一部分，这一举措不仅促进了武术的普及，也推动了武术的科学化和规范化发展。这一时期武术研究方法趋于多样化，综合了多种研究手段，例如中央国术馆以解剖学解构传统身体认知，通过引入生理学与解剖学原理，对传统武术进行技术解构与重组；洪拳的“工字伏虎拳”被拆解为弓步、马步等标准化动作单元，形成可量化考核的教学模块。这些科学方法的应用为武术的科学化发展奠定了基础。另一个重要的武术组织是精武体育会，精武体育会的历史可追溯至1910年，由近代著名武术家霍元甲在上海创立，初名“精武体操学校”。霍元甲逝世后，陈公哲、卢炜昌等核心成员着手组织重构。1915年社团正式订立章程，明确“以提倡武术，研究体育，铸造强毅之国民为主旨”（出自《中国精武体育会章程》）。其课程体系包含技击、文事、游艺三大类，其中技击部设置徒手、器械等标准化训练模块，并通过“强种救国”的民族主义口号将武术纳入国民教育体系^{[3][4]}。此后凭借系统的教学体系与广泛的社会活动，迅速发展为全国性体育组织。随着精武的南传，1919年，广东精武会宣告成立，随后数年间，佛山、阳江、汕头等岭南城市及港澳地区相继建立分会，同时向南洋地区拓展，形成以岭南为中心的传播网络，使“精武主义”思想在岭南大地传播，形成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同时也对岭南武术科学化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5]。

在身体符号的现代性阐释中，岭南武术家通过跨学科知识重构身体的民族寓言，重构传统技艺的合理性，开始运用西方数学、物理等方式来研究武术，揭示其内在的科学内涵。岭南武术家林世荣在《虎鹤双形拳谱》中采用西洋解剖图解析招式发力原理，将传统武术玄妙的“内劲”概念转化为肌肉群协同作用的生物力学模型。中央国术馆推动的竞技武术评分体系，将“腾空摆莲540度”等动作列为难度考核标准，标志着身体技能的量化竞赛机制形成。总体来说，科学化的研究方法不仅提升了武术的理论水平，也增强了其在社会中的认可度。

然而，科学化改造也暴露了传统身体哲学与现代规训的深层矛盾。标准化教学虽提升了武术的普及性，但这种改造遭遇了传统武术界的激烈争议，传统武术“重意不重形”的哲学精髓被简化为肢体动作的机械组合，佛山鸿胜馆蔡李佛拳传人批评标准化训练导致“招式僵化，失其神髓”“拳术神韵流失”，反映出科学理性与传统哲学的根本冲突。这种争议揭示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文化认同的结构性困境——民族国家建构既需要借助现代性话语重塑传统文化，又面临文化本真性流失的风险。

三、社会政治变革中的武术角色

在民国前后这样一个社会政治发生巨大变革的时期，岭南武术发挥着地方治理的重要作用。总的来说，岭南武术的发展与地方治理的互动贯穿了从古代到近现代的整个历史进程，这一特性体现在社会组织、军事防御和治安维护中，还深刻影响了地方文化认同与社会秩序的构建。自秦汉以来，中央王朝通过军事开拓和羁縻政策逐步将岭南纳入统一治理体系，武术是军事经略与文化整合的一种手段，如南越国推行的“和辑百越”政策，将中原武术与岭南土著格斗技术融合，形成了早期武术的雏形。到了宋元与明清时期，岭南地区的武术在地方社会起到的作用主要是宗族武装与基层治理。从宋元时期岭南地方豪族通过组建“弓箭社”“忠义巡社”等民间武术组织，承担保境安民的职能，到明代中叶，常有倭寇侵扰东南沿海，这时岭南的宗族势力进一步呈现军事化的特点。许多地方通过“筑寨建围”形成宗族武装联盟，以武馆和秘密结社为基础，参与镇压地方叛乱的武装活动。古代岭南地区宗族械斗频繁，武术也成为了争夺资源的核心工具，地方官虽尝试立法约束，但宗族武术团体仍长期主导基层治安。

到了晚清和民国时期，社会动乱，岭南武术的身体实践更是深刻嵌入了国家权力与地方社会的互动网络。民国时期，岭南武术团体通过设立武馆、参与地方自卫队等方式，成为了维持社会稳定的非官方力量，

也作为权力博弈的文化资本。如佛山鸿胜馆在1925年省港大罢工期间组织工人武术队维持治安，将蔡李佛拳术改编为适合工人习练的“工会防卫十二式”，招式简化为直拳、勾拳等实用动作，并融入罢工口号作为训练节奏口令。由此可见国家与地方社会的互动在武术领域呈现出了复杂的张力。1934年广东省政府颁布《国术团体管理条例》，要求武馆“所授器械技击须报县党部核准”，试图通过技术审查强化国家管控。但地方势力通过武术组织维系自治，如番禺沙湾何氏宗族武馆加入抗日武装，将传统棍术改良为战术工具。这种分化折射出武术作为“身体政治”工具的双重属性：佛山部分洪拳团体被伪政权收编，其训练内容被用于搜查抗日分子，凸显武术在权力博弈中的道德模糊性。

岭南武术的身体实践成为观察民国“国家-社会”关系的显微镜。从鸿胜馆的阶级身体动员到宗族仪式的权力再生产，身体既是权力角逐的战场，也是文化传承的载体。这种身体政治的双重性，既折射出现代国家建构的复杂性，也预示了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适应性转型。

四、国际传播与民族形象塑造

在民国时期的跨国场域中，岭南武术通过华侨网络与商业电影双重路径，成为塑造民族形象的文化媒介。精武体育会南洋分会将洪拳“工字伏虎”改编为团体操，配合舞龙舞狮形成“中华文化嘉年华”，通过标准化身体规训规避殖民审查，又强化海外华人的文化认同。潮汕地区的南枝拳通过“老爷生”神诞巡游进行社区展演，武术家扮演的“青面虎”在锣鼓节奏中完成“三扑三剪”动作，将武术套路转化为信仰仪式，成为离散族群维系文化记忆的身体实践^[6]。

岭南武术的海内外传播不仅是技艺的扩散，更是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在全球范围内的身体书写。最具有代表意义的黄飞鸿（1847-1925）作为岭南洪拳宗师，他的身份在民国时期已被叙事重构。更随着这一形象的影视化，实现了从民间武师到民族符号的升格。据统计，近百年来香港制造了百余部“黄飞鸿电影系列”；两岸三地（大陆、香港、台湾）共产出14部344集以上有关黄飞鸿叙事的电视连续剧、20余部黄飞鸿题材小说，以及还有上千集的黄飞鸿故事无线电广播和1500集以上黄飞鸿传奇报纸连载。黄飞鸿系列电影在中国和美国好莱坞银幕上取得了巨大成功，成为与新派武侠小说、霍元甲系列并列的三大中国现代武功文化叙事系列之一^[7]。影片中标志性的“虎鹤双形”招式被编码为“东方智慧”的视觉符号：虎形象征力量，鹤形代表灵巧，二者的融合成为中华民族刚柔并济精神的具象化表达^[8]，岭南地域文化深入其中。影片中360度旋转踢击动作经电影慢镜头处理成为与西方拳击对抗的文化隐喻。这种身体叙事通过身体暴力的奇观化展演，解构了“东亚病夫”的殖民想象，这样的对抗外国拳师的情节设计，在国外华人社群引发强烈共鸣，使武术成为华侨建构文化认同的身体文本。

武术的国际传播折射出离散社群的身份策略。华人群体通过武术展演，既回应主流社会的种族歧视，也重构了文化主体性。旧金山致公堂以洪拳“三点半棍”作为身份暗号，海外同乡需通过特定招式应答确认宗亲关系，这种身体密码既维系了群体边界，又规避了排华法案的语言审查。国民政府授予新加坡精武会“宣扬国术”匾额，标志着武术团体从地方组织升格为国家文化符号，将武术升华为柔性外交资源，在全球场域中塑造着“尚武不屈”的中国形象^[9]。但在跨文化传播中，武术符号面临意义偏移的风险，美国媒体将咏春拳解读为“反抗殖民的暴力美学”，完全忽视其“止戈为武”的哲学内核。这种误读揭示文化传播的深层矛盾——本土文化基因与异域接受语境之间的张力始终存在。

跨国场域中的岭南武术身体实践，既是文化抵抗的柔性武器，也是身份重构的流动文本。武术身体始终在传统基因与现代性之间寻找平衡。这种动态调适既彰显了中华文化的适应智慧，也暴露出后殖民时代文化传播的深层悖论——身体作为最直观的交流媒介，往往最先遭遇意义流失的风险。

五、宗族、信仰与武术的互动

在岭南社会的历史文化肌理中，宗族制度与民间信仰构成了武术传承的双重根基。宗族通过祭祖、建祠堂、选族长、修族谱、设族田、建族学等方式组织化，成为维护乡村稳定的重要力量。由于岭南地区老百姓社会阶层较低、社会治安较乱、匪寇祸患较多，这种社会背景决定了宗族武术盛行的风气。如蔡李佛拳的传承体系便是以新会陈氏宗族为核心，依托族规将“师传”与“家族传承”相结合，要求习武者恪守武德与宗族伦理，并通过族田租金维持武馆运营，形成“以武养族，以族护武”的共生模式。另一个著名的拳种洪拳也具有庞大的宗族化网络，由族长兼任拳派掌门，借助宗族力量扩大影响力。宗族间的资源争夺与防御需求进一步推动了武术的实用化转型，如客家土楼内的桩法训练和洪拳的硬力对抗技法，都是直接服务于宗族械斗与联防体系，甚至将武术训练融入龙舟竞渡的划桨发力技巧，使武术成为宗族生存竞争的工具。宗族伦理还通过仪式化操演渗透武术实践，将身体实践与宗族伦理结合。岭南关氏祠堂定期举行演武祭祖仪

式，这种活动体现了宗族作为文化中介的功能，通过礼仪标识将地方传统与民族国家建构相联结。在拜师仪式中，传统武术强调严格的师徒关系确立程序，包括引进、考察、递贴、行拜师礼等环节，确保技艺传承的封闭性与伦理约束。若有子弟违反伦理规范，宗族可通过革除习武资格等方式强化治理，这种权力源于宗族对武术传承权的垄断，体现宗族通过身体规训实现社会控制。

民间信仰则为武术注入了神圣性与仪式功能，两者在祭祀展演中形成了深度互嵌。如粤西年例驱傩仪式中的短打标掌，是以模仿神灵征战场景强化信仰权威，同时彰显武术的实战价值。醒狮活动更成为宗族整合的象征，广宁县的宗族通过狮头制作祈福、舞狮收入修缮族田，将“采青”“梅花桩”等高难度动作与宗族荣誉绑定，使武术表演成为凝聚血缘共同体的文化纽带。武术流派本身也构建起融合三教思想的信仰体系，蔡李佛拳的“形神合一”桩法修炼、洪拳与道教符咒结合的铁线拳功法，都赋予了武术超越性的精神维度。这种信仰与技艺的交融，使得武术既是肉身修炼的技艺，也成为沟通人神、安顿心灵的文化实践。这种武术与宗族、信仰的三维互动，本质上构成了岭南地方社会整合资源、维系秩序的文化策略，既借助宗族制度实现武术传承的在地化扎根，又通过信仰仪式赋予武术超越世俗的神圣意义，最终在民国动荡的时局中形成兼具防御功能、文化认同与精神寄托的生存智慧。

六、结论

民国时期岭南武术的历史实践揭示了传统身体文化参与民族国家建构的复杂机制。通过科学化训练、跨国符号生产与宗族网络动员，武术从地方技艺转化为兼具规训工具与认同载体双重属性的国家符号。民国时期岭南武术的转型路径表明，传统身体文化并非被动消解于现代性浪潮，而是通过创造性转化成为民族国家建构的能动力量。

参考文献：

- [1] 董刚,金玉柱,陈保学,等.民国时期中国武术的身体政治逻辑及其现代意义[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22,56(01):63-70.
- [2] 张震,金玉柱,陈新萌,等.中国武术文化的三重映像[J].体育文化与产业研究,2021,(01):148-167.
- [3] 栗庆英.民国时期武术组织研究[D].华中师范大学,2015.
- [4] 张银行,郭志禹.公共服务视阈下的民国武术社团组织研究——以精武体育会为例[J].南京体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28(01):35-39.
- [5] 郭春阳,王晓东.论精武粤传的成因与意义[J].搏击(武术科学),2013,10(12):26-28.
- [6] 林伟贤.南枝拳技术表现特征及其适应性分析[J].武术研究,2024,9(10):9-12.
- [7] 姚朝文.黄飞鸿功夫电影海外传播路线及文化影响力分析[J].文艺研究,2010,(07):99-106.
- [8] 姚朝文.乡土中国创造文化想象的世界奇观——百部黄飞鸿电影吉尼斯纪录的启示[J].学术研究,2013(3):134-137.
- [9] 郭玉成,许杰.精武体育会与中央国术馆的武术传播研究[J].体育文化导刊,2005(2):76-79.

Body and Nation: Lingnan Martial Art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ation-State during the Republican Period

Haoyu Huang

Southwest Minzu University, Chengdu,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 Lingnan martial arts, as an important carrier connecting physical practice and nationalism, provided a unique perspective for decoding the mechanism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modern Chinese nation-state. The study found that martial arts has achieved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local skills to national cultural symbols through a scientific training system,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physical training, the production of transnational symbols, the strengthening of national cultural identity and clan networks, the mobiliz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local social resources, and the realization of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local skills to national cultural symbols. The transformation of Lingnan martial arts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 revealed a key law: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ation-state needs to visualize abstract ideology through physical practice. The tension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in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 of Lingnan martial arts reveals the historical law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identity needs to seek a balance between guarding genes and innovative transformation. At the same time, it also provides a practical paradigm for the inheritance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Keywords: Lingnan Martial Arts; Body; Nation-state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2.584

阿根廷主流媒体对于“一带一路”倡议报道的数量、主题与框架分析

王菁菁¹

(¹杭州师范大学, 杭州 浙江 31121)

摘要: 本研究基于框架理论, 采用混合研究方法, 考察阿根廷主流媒体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报道特征、主题及框架。通过道格琼斯 Factiva 数据库采集了《Télam》《Infobae》《Clarín》《El Economista》2022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期间的185篇报道, 并使用 DIVOMiner 文本分析工具进行系统编码。研究发现, 阿根廷媒体主要聚焦于经济合作和地缘政治议题。总体而言, 报道语气倾向积极, 但对项目透明度、环境可持续性和潜在发展风险仍存疑虑。框架分析表明, 媒体主要通过政治和经济视角解读“一带一路”, 并塑造互利共赢的合作形象。尽管总体语气偏向积极, 但部分报道中的风险警示可能影响公众对项目的认知。研究结果为理解阿根廷媒体在“一带一路”报道中的立场与倾向提供了重要视角, 并为中国提升在拉美地区的影响力和话语权提供了参考依据。

关键词: 一带一路倡议、阿根廷媒体、框架理论、拉美、地缘政治

一、引言

2023年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 拉美地区作为连接欧亚非大陆的重要桥梁, 已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参与方。自2017年拉美正式纳入合作框架以来, 已有22个国家加入其中, 中国视其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自然延伸。阿根廷于2022年成为首个正式加入“一带一路”的拉美大国, 与中国在多领域建立了互利合作关系。随着中阿关系的不断深化, 阿根廷主流媒体对“一带一路”的关注度显著提升。然而, 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一带一路”倡议在拉美地区的总体报道特征, 以及个别国家如墨西哥和巴西的媒体呈现, 对阿根廷的专门研究相对不足, 尤其缺乏阿根廷正式加入“一带一路”后的系统分析。虽然有部分学者曾对2015-2017年阿根廷媒体的报道焦点、舆情及框架进行分, 但彼时阿根廷尚未正式加入, 相关报道数量有限。鉴于此, 本研究选取2022年阿根廷加入“一带一路”至2024年中阿建交52周年这一时间段, 以阿根廷四家主流媒体为样本, 采用定量内容分析与定性框架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系统考察阿根廷媒体对“一带一路”的报道数量、主题、倾向及框架建构。研究旨在揭示阿根廷舆论对“一带一路”的认知图景, 并为中国在拉美地区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提升国际传播效能提供参考。

二、新闻框架理论

本研究以新闻框架理论 (news framing) 为主要理论基础。该理论认为, 媒体在报道新闻时, 并非简单地呈现客观事实, 而是通过选择、强调、组织和呈现信息的方式, 构建特定的“框架” (frames), 从而影响受众对事件的理解和评价。本研究将运用框架理论, 分析阿根廷主流媒体如何构建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叙事框架。具体而言, 我们将考察媒体在报道中如何界定“一带一路”的性质, 如何描述其影响以及如何评估其价值。通过识别和分析阿根廷媒体使用的主要框架, 本研究旨在揭示其对“一带一路”的认知倾向, 同时也将探讨框架建构背后的动因。

三、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本研究旨在考察阿根廷主流媒体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报道特征,选取了四家在阿根廷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媒体作为研究对象:《Télam》(阿根廷国家通讯社)、《Infobae》(阿根廷最大的数字新闻聚合网站之一)、《Clarín》(阿根廷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和《El Economista》(阿根廷著名的经济商业报刊)。选择这四家媒体的原因在于:(1)它们在阿根廷媒体格局中具有代表性,能够反映不同类型媒体对“一带一路”的报道视角;(2)它们覆盖了广泛的受众群体,其报道内容能够较为全面地反映阿根廷社会对“一带一路”的认知;(3)它们的新闻报道易于获取,方便进行数据收集和分析。

本研究的时间跨度为2022年至2024年,选取这三年时间的原因在于,2022年阿根廷正式加入“一带一路”倡议,而2024年则标志着中阿建交52周年,在此期间,中阿合作不断深化,媒体对“一带一路”的报道较为集中。本研究以“la franja y la ruta”(“一带一路”的西班牙语表达)为关键词,对上述四家媒体在这一时间段内发布的新闻报道进行检索。通过Factiva数据库检索,共初步收集到226篇相关报道。为了确保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本研究对重复报道进行了处理。重复报道判断的标准是标题、内容、发布时间三者均高度相似。经过筛选,剔除重复报道后,最终得到有效样本136篇。各媒体的有效报道数量如下:《Télam》有效报道69篇(原始79篇,去除重复10篇),《Infobae》有效报道45篇(原始58篇,去除重复13篇),《Clarín》有效报道40篇(原始50篇,去除重复10篇),《El Economista》有效报道31篇(原始39篇,去除重复8篇)。

类目建构

根据研究问题,本研究特别关注的变量为“报道量”“报道体裁”“传播主体”“报道主角”“报道主题”“报道倾向”。

报道量。本研究报道数量指月报道量,以月度为单位分析样本关于一带一路的新闻报道篇数,探析一带一路议题在不同时间段的媒体关注度。

报道体裁。本研究建构了四个类别:(1)消息;(2)通讯;(3)深度报;(4)评论

传播主体。根据媒体的影响力范围和特点,本研究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四家主流媒体,国家官方通讯社《Télam》,用户量和阅读量最大的报纸《Clarín》,著名经济报刊《El Economista》以及最大的数字聚合网站《Infobae》为传播主体。

报道主角。关于一带一路的报道涉及多群体,报道中的主角角色反映了阿根廷主流媒体报道的视角和出发点。本类目的项目主要有:(1)阿根廷政府及政府官员(2)中国政府及政府官员(3)企业家和商界领袖(4)专家学者(5)项目参与者(如一带一路建设项目的工人或管理人员)(6)国际组织代表(7)民众。

报道主题:新闻主题的选择反映了媒体的议程设置与关注重点。本研究的报道主题主要包括:(1)经济合作与投资;(2)地缘政治与国际关系;(3)文化交流与人文合作;(4)国际合作与对话;(5)其他主题

报道倾向:学者Mousa(1987:104)曾按态度倾向将新闻报道划分为三类:正面报道(Favorable),负面报道(Unfavorable)和中性报道(Neutral)。参考这一分类标准,本文的编码标准主要类目也分为:(1)正面(2)负面(3)中性。

四、主流媒体报道特征

(一) 报道数量

2022年1月至2024年12月,阿根廷主要媒体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报道共计185篇。

根据图一的数据显示,2022年2月和2023年10月的报道数量显著高于其他月份。这一现象与两国合作的关键节点及具体项目的推进密切相关。在2022年2月年阿根廷正式加入“一带一路”倡议,并与中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谅解备忘录,使阿根廷成为拉美地区首个加入该倡议的主要经济体。此次外交突破对阿根廷意义重大,标志着中阿两国关系的深化和合作的广泛开展。阿根廷媒体对这一事件进行广泛报道,强调了“一带一路”倡议在能源、基础设施和贸易等领域的影响。2023年10月的报道高峰与第三届“一带一路”高峰合作论坛召开直接相关。阿根廷总统费尔南德斯率团参会,并在论坛期间就基建、金融合作与中方达成多项共识。此次论坛成为阿根廷媒体关注的重点,四家主流媒体对论坛的召开和成果进行了全方位的报道,强调“一带一路”对阿根廷经济复苏的积极作用。同时媒体跟踪报道了多项合作项目的进展,进一步展示了“一带一路”倡议在实际合作中的成果。综上所述,阿根廷对于“一带一路”的报道数量激增,与“一带一路”

路”主题的大型国际会议的召开及对外合作密切相关。这表明阿根廷媒体对涉及国际利益和国际合作的重大事件保持着较高的关注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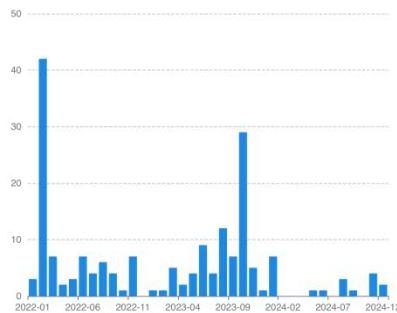


图 1 阿根廷主流媒体月报道数量

(二) 传播主体与新闻体裁

通过对新闻体裁的编码分析可见，阿根廷四家媒体在“一带一路”议题的报道中呈现出不同的体裁倾向。《Télam》主要采用通讯体裁，以较为详实的叙述展现双边合作的具体进展；《Clarín》侧重消息报道，强调新闻的时效性与简洁性；《Infobae》在深度报道方面表现突出，注重对议题的深入剖析；而《El Economista》则是在通讯、消息和深度报道体裁上的分布数量较为均衡。整体而言，通讯和深度报道是“一带一路”相关报道的主要体裁，相较于简短的消息报道，阿根廷媒体更倾向于通过用详细的背景信息、专业分析和专家观点，增强报道的深度与权威性，以促使公众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内涵及其对阿根廷发展的潜在影响形成更加全面的认知。这一体裁选择不仅反映了阿根廷媒体对议题的持续关注，也表明其在国际合作报道中更加侧重背景解读与政策分析，从而提升报道的公共价值与社会影响力。

媒体	报道体裁			
	消息	通讯	深度报道	评论
Telam	11	43	12	3
Clarín	15	6	8	5
El Economista	10	9	8	2
Infobae	12	9	17	2

图 2 新闻媒体关于“一带一路”报道体裁分布

(三) 报道主角

在统计的 185 篇报道中，阿根廷政府及政府官员占 46.3%，中国政府及官员占 32.3%，企业家和商界领袖占 11.5%，专家学者和国际组织代表分别占 4.2% 和 2.9%，项目参与者占 2.06%，民众占 0.3%。由此可见，阿根廷主流媒体对于“一带一路”报道中关注的对象是政府及官员的活动，同时也注重经济人士的相关报道。

这种报道主角的选取反映了媒体在框架议程设置，更加注重政府间的合作和官方活动，从而凸显“一带一路”在国际关系和经济合作中的地位。此外，企业界和商界领袖占比较低，专家学者、国际组织代表报道数量有限，说明四家媒体的报道重点还是关注于官方和政策方面，而非学术和民间视角。此倾向不仅反映了媒体报道的策略，也能凸显出“一带一路”在阿根廷主流媒体中的议题设置及传播效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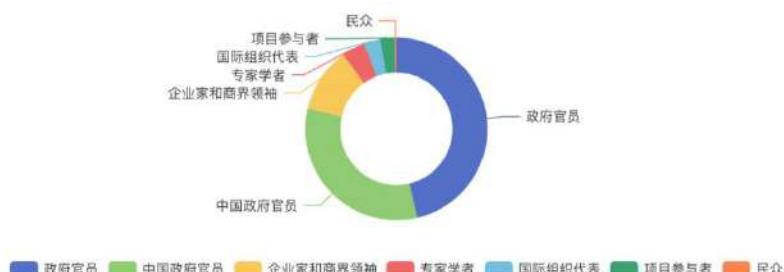


图 3 报道主角分布

(四) 报道议题

关于“一带一路”报道议题的分布,反映了主流新闻媒体关注的重点。分析发现,经济合作与投资占37.9%,地缘政治与国际关系占34.1%,文化交流与人文合作占7.4%,国际合作与对话占10.1%,其他议题(阿根廷内政等方面)占10.6%。由此可见,阿根廷主流媒体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报道更加聚焦于经济领域。

具体到各个媒体上,《Télam》报道内容较为全面,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例如在文化交流方面,中阿达成深化两国在编辑出版和传媒领域的合作的协议。这种全面的报道方式有助于读者理解“一带一路”倡议的多维度影响及其对中阿关系的全面推动。《Infobae》则重点关注经济合作和投资,特别是对“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具体项目和经济效益进行了详细报道。《Clarín》更多关注地缘政治与国际关系,探讨了“一带一路”对阿根廷及其在国际社会中的位置的影响。《El Economista》则在报道中结合了经济合作与国际对话,分析了“一带一路”倡议对阿根廷经济结构的潜在影响,以及在国际合作中所扮演的角色。总体来看,虽然不同媒体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阿根廷主流媒体普遍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经济方面给予了更多关注,反映出其对经济合作与投资的高度重视。

(五) 报道倾向

四家媒体的总体倾向呈积极态度,大部分报道集中在“一带一路”对经济发展的潜在益处上,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机会和贸易便利化。这表明媒体普遍对“一带一路”在促进经济增长和带动投资方面持积极态度。然而,在以下几个方面也存在消极报道。首先,在项目透明度问题上,一些报道对“一带一路”项目的透明度提出了质疑,担心项目资金使用和实施过程中的信息披露不充分。这些担忧主要围绕项目的管理和资金流向。其次,一些媒体批评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可能更多地服务于中国的国家利益,而非阿根廷的长远利益。这些报道对中方的动机和利益表达了疑虑,担心阿根廷可能会在合作中处于不利地位。另外,个别报道指出了“一带一路”项目可能对阿根廷环境和社会产生的负面影响,如生态破坏和当地社区的影响。这些关注主要集中在项目实施过程中的环境保护和社会责任方面。最后,一些媒体报道分析了“一带一路”在国际关系中的潜在风险,特别是它可能引发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对此类报道的担忧主要在于项目可能影响到阿根廷在国际舞台上的独立性和地位。

(六) 高频词

在所统计的185篇报道中,共出现了5大重点高频词汇(不计入地名、人名、“一带一路”等),包括发展、合作、经济、政府、会议,如图4所示。

发展:认为一带一路的目的是促进沿线国家的合作、开放发展。通过加强基础设施的建设、贸易便利等,为各国经济发展提供更新的动力。

合作:认为一带一路需要国家政府间的合作,政府间的合作主要体现为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资金融通等方面。

经济:认为一带一路带动了沿线经济的发展,在经济层面实现突破。媒体普遍认为,“一带一路”在经济层面实现了显著突破,推动了地区经济增长。

政府:报道指出“一带一路”的推进与发展主要依赖于政府的引导和推动。这表明媒体关注政府在实施“一带一路”战略中的主导作用和政策支持。

会议:高频词“会议”反映了对“一带一路”相关会议的重视。媒体普遍认为,这些会议对于总结成果、规划未来和凝聚共识具有重要意义。

结合高频词分析可知,阿根廷主要媒体对“一带一路”报道的着眼点在于经济发展、政府合作和国际交流。这与前述对报道主题的分析结果高度一致,都表明经济发展是媒体关注的核心议题,这突显了“一带一路”倡议对阿根廷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和潜在影响。

五. 新闻框架分析

通过对统计到的185篇文章的详细阅读与分析,梳理出阿根廷主流媒体在报道“一带一路”倡议时所使用的关键新闻框架。结果显示政治、经济是其中一个被频繁使用的框架,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政治框架

阿根廷主流媒体在构建政治框架时,主要关注以下两个相互关联的核心议题:首先,媒体倾向于将中阿两国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合作项目解读为具有战略意义且发展前景广阔的合作。这些合作协议不仅标志

着双方在经贸、能源和科技等领域的实质性合作迈出了重要一步，更预示着未来合作的巨大潜力。媒体通常强调，这些合作协议涵盖基础设施建设、资源开发和科技创新等多个领域，旨在促进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并通过深入挖掘各自的优势资源，推动合作项目向更高水平和更广领域拓展，为地区的繁荣与稳定作出积极贡献。其次，阿根廷主流媒体也密切关注多国领导人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互动。媒体普遍认为，“一带一路”倡议作为连接亚欧非大陆的重要国际合作平台，吸引了众多国家的积极参与。各国领导人在这一倡议下积极开展友好合作，推动项目落实和政策对接，体现了国际社会对“一带一路”的认可和支持。通过高层互访、多边会议等机制，各国领导人就深化合作进行了深入交流，达成了广泛共识。媒体通常强调，这种密切的领导人互动不仅增进了彼此的战略互信，也为“一带一路”建设注入了强大的政治动力，并展望“一带一路”在未来能够成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力量。

词云图

备注



图 4 高频词

(二) 经济框架

1. 阿根廷国内经济状况

阿根廷经济目前面临诸多挑战，包括高通胀率、比索贬值压力以及经济衰退的风险。高失业率，24年一季度阿根廷失业人口达到110万，失业率为7.7%，同比和环比均有所上升。高失业率不仅影响了民众的生活水平，还制约了消费需求的增长。同时，新上任的总统哈维尔·米莱采取的一些列新政，紧缩的财政政策包括停止所有新的公共项目、内阁部门减半、停止向省级政府提供资金、削减数万个公职等，引起了国内局势的动荡不安。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阿根廷的经济发展潜力。然而，尽管存在这些困难，阿根廷的经济也有其独特的带动作用。例如，阿根廷作为南美的重要国家，其农业特别是粮食作物的丰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经济的短期反弹。此外，政府正在进行的财政调整虽然面临诸多挑战，但也可能为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奠定基础。

2. 中国企业对于阿根廷的投资，中阿之间的经贸合作

根据报道显示，中国企业在阿根廷的投资正在不断增加，这不仅体现了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也为阿根廷带来了新机遇和经济增长的动力。中国企业的投资领域广泛，涵盖了能源、基础设施、制造业等多个关键领域。这些投资不仅有助于阿根廷经济的多元化发展，还为其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进一步拉动了经济增长。中国作为阿根廷的重要贸易伙伴，对阿根廷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通过加强双边贸易、投资合作以及技术交流等方式，中阿两国在经济领域的互补性得到了充分体现，为彼此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3. 次要框架，议题涉及一带一路的内涵诠释和评价态度

除了政治框架和经济框架之外，阿根廷主流媒体在报道“一带一路”倡议时，还构建了一些次要框架，以丰富对该倡议的解读，这些次要框架主要围绕对“一带一路”内涵的诠释、对合作的态度评价以及文化交流三个议题展开。在诠释“一带一路”内涵时，媒体倾向于强调其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国际合作平台属性，并通过引用官方定义和结合具体项目，增强其可信度和可感知性，从而提升公众对该倡议的认知度和正面形象。同时，在评价合作态度时，媒体虽总体呈现积极倾向强调“一带一路”对经济发展和国际合作的促进作用，

但也并非完全回避潜在风险，而是会穿插对项目透明度、债务可持续性以及环境影响等问题的关切，旨在呈现相对平衡和客观的视角。然而，也需要注意到不同媒体可能因立场和利益的不同而有所差异的评价。例如，在《Télam》报道中，提出阿根廷国家的内忧外患，认为阿根廷仍需谨慎行事，不能与全球第一强国美国对立。优先任务应是扩大国际决策的回旋余地，与可靠的伙伴建立坚固的联盟，维持与尽可能多的国家的良好关系（包括避免介入他国冲突），做成好生意，吸引生产性投资，并在全球传播阿根廷的正面形象。

此外，文化交流也是次要框架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媒体往往会将“一带一路”倡议下的文化交流活动，如文化节、艺术展览、影视合作、教育交流等，作为报道内容。通过报道这些活动，媒体旨在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理解和交流，并展现“一带一路”倡议在人文领域的积极影响。这类报道通常会突出文化多样性，强调文化交流对增进两国人民友谊、促进文明互鉴的重要作用。例如，媒体可能会报道中国文化节在阿根廷的举办，展现中国传统文化在阿根廷的受欢迎程度，以及两国在文化领域的合作成果（请在此处补充具体的报道案例，并注明来源）。这种框架的构建，既能够丰富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解读，增强其吸引力，又能够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理解与尊重。

六. 原因分析

从上文分析可知，虽然有疑虑和质疑的声音，阿根廷对“一带一路”倡议总体上反应积极，这一倡议对于促进世界经济贸易，两国互惠共赢有重要的作用，有利于全球价值链的重构。其原因主要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

（一）中国在拉美地区影响力的提升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也是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中国的崛起为拉美地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这种机遇主要体现在中拉双边贸易的显著增长。正如《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发展报告 2023》（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发布）指出，中拉经贸关系对拉美国家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明显提升。2022 年中拉贸易总额达到 4857.90 亿美元，连续第二年突破 4500 亿美元，较 2021 年涨幅超过 7%。这一数据不仅印证了中国在拉丁美洲地区经济影响力的快速扩张，也表明拉美国家越来越依赖与中国的贸易合作来促进经济增长。与此同时，中国与多个拉美国家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FTA），例如智利、秘鲁、哥斯达黎加、厄瓜多尔和尼加拉瓜等。这些 FTA 的签署，不仅降低了双边贸易的关税壁垒，提高了贸易的便利化程度，也促进了投资的增长，从而为中拉经贸关系的深入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此外，中国与拉美国家共同建立了多个多边合作机制，例如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论坛（中拉论坛）。这些机制为双方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开展合作提供了重要平台，推动了中拉关系的全面发展，为“一带一路”倡议在拉美地区的实施创造了有利条件。这种经济影响力的增强，使得阿根廷等拉美国家更加重视与中国的合作，并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寻求更多的发展机遇。

（二）中阿关系提升，阿根廷政府重视中阿关系

中阿关系近年来确实在不断提升，这主要体现在双方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深入合作。阿根廷政府非常重视与中国的关系，这种重视体现在多个方面：首先，政治层面，阿根廷政府坚持一个中国政策，这是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的政治基础。无论阿根廷内部政局如何变化，其奉行对华友好的政策不会改变。这种坚定立场有助于维护两国关系的稳定性和深度。其次，在经济领域，阿根廷政府在维护自身经济金融稳定的同时，也积极寻求与中国的深度合作。双方在贸易、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合作。此外，在文化领域，阿根廷政府也积极推动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与合作。通过加强地方、青年、教育、卫生等人文交流，阿根廷不仅希望加深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更希望通过这些交流活动，让中阿友好更加深入人心。

（三）阿根廷致力于摆脱对美依赖，实现多元发展

阿根廷，作为南美洲经济体系中的关键一环，其经济动态长期以来显著地受到美国经济波动的影响，这一现象在多个维度上得以体现，其经济命脉与美国市场的紧密交织尤为突出。从历史视角审视，阿根廷多次陷入债务危机的泥潭，这些危机的根源之一即在于与美国金融机构及债权人之间复杂而紧密的关系。这种外部经济依赖导致了阿根廷在面对信贷条件收紧时尤为脆弱，加剧了其债务负担，推高了融资成本，并削弱了其偿债能力。在汇率领域，美国经济政策的调整，尤其是货币政策的变动，对比索汇率产生了深远且直接的影响。美联储的加息政策作为典型例证，通过吸引国际资本流向美元资产，导致美元升值，进

而触发了比索的贬值趋势。这一过程不仅增加了阿根廷的进口成本，还通过价格传导机制引发了输入性通货膨胀，对国内经济稳定构成了严峻挑战。

面对这一现状，阿根廷加入金砖国家（BRICS）的举措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此举显著增强了阿根廷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为其提供了一个更为多元和均衡的国际舞台。通过金砖国家这一平台，阿根廷能够更有效地表达自身立场和利益诉求，减少对美国经济的过度依赖，从而逐步构建更加独立和自主的经济体系。进一步地，阿根廷作为金砖国家的一员，将能够与其他成员国在多个领域开展深入合作。这种合作不仅限于贸易和投资，更将延伸至金融稳定、货币合作以及全球经济治理等层面。通过共同应对全球经济挑战，阿根廷可以借鉴其他成员国的成功经验，提升自身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实现经济的更加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综上所述，阿根廷加入金砖国家是其经济战略调整的重要一步，有助于其在全球化背景下更好地维护自身利益，增强国际自主权，并推动经济实现更加稳定和可持续的发展。这一举措不仅是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积极回应，更是对未来国际经济格局的深刻布局。

参考文献：

- [1] 徐四海,张海波.墨西哥媒体“一带一路”报道特征研究[J].国际传播,2018,(02):51-59.
- [2] 钟点.巴西主流媒体“一带一路”报道倾向分析[J].国际传播,2018,(02):44-50.
- [3] 贾诗慧,张凡.阿根廷媒体看“一带一路”:焦点、舆情及报道框架[J].国际传播,2018,(02):60-68.
- [4] Goffman,E. *Framing analysis:An essay on the organization of experience*. New York:Harper&Row.1974,21.
- [5] Mousa, S. (1987). The functions of mass media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Gazette*, 40(2), 95-111.
- [6] 界面新闻. (2024年6月26日). 阿根廷经济陷入技术性衰退，超一半国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检索自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802890534838072453&wfr=spider&for=pc>
- [7]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 (2023).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发展报告2023》. 北京.
- [8] 曹廷. (2025,2月24). 织密海空航线，中拉互联互通更深入. 人民日报海外版.

Framing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 Analysis of Argentine Mainstream Media Representations.

Wang Jingjing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Hangzhou, China

Abstract: This study, grounded in framing theory and employing a mixed-methods approach, examines the characteristics, themes, and framing strategies of Argentine mainstream media coverage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RI). A total of 185 news articles were collected from Telam, Infobae, Clarín, and El Economista via the Dow Jones Factiva database, covering the period from January 1, 2022, to December 31, 2024. These articles were systematically coded using the DIVOMiner text analysis tool.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Argentine media primarily focus on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geopolitical issues. Overall, the tone of the coverage tends to be positive, but concerns persist regarding project transparency,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and potential development risks. Framing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the media predominantly interpret the BRI through political and economic lenses, shaping an image of mutually beneficial cooperation. Despite the generally positive tone, risk warnings in some reports may influence public perceptions of the project. The study's findings provide important insights into the stance and biases of Argentine media in their coverage of the BRI and offer a reference for China to enhance its influence and discourse power in the Latin American region.

Keyword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rgentine Media, Framing Theory, Latin America, Geopolitics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2.616

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路径

陈楠¹

(¹南京林业大学, 江苏 南京 210018)

摘要: 全球环境危机日益严峻, 生态文明建设成为当代世界各国应对可持续发展挑战的重要议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 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与中国国情相结合, 形成了独特的生态文明建设路径。从改革开放初期的环境保护意识觉醒, 到“科学发展观”下的绿色发展理念提出, 再到“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生态文明建设战略地位的确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生态思想经历了深刻演变。当前, 生态文明建设仍面临一系列挑战, 中国将继续深化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中国化实践, 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生态文明; 绿色发展

一、引言

随着全球环境问题的日益严峻, 生态文明成为当今世界各国关注的热点话题之一。气候变化、生态破坏、资源匮乏等问题不仅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 也促使各国深入思考可持续发展的路径。在中国, 生态文明建设已上升为国家战略, 成为推动社会经济全面发展的重要方针。中国提出的“绿色发展”理念, 强调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 为全球绿色转型提供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全球性议题, 已经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特别是在中国, 生态文明建设已成为国家战略的核心内容之一, 相关研究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趋势。

国内学者普遍认识到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白姗姗 (2024) 在其文章《马克思主义自然观视域下的生态文明建设》中指出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导致了人类对自然环境的破坏, 这促使马克思和恩格斯思考并提出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她主张坚持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指导, 学会运用科学理念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并结合中国具体生态现状找到适合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路径;^[1]丁启慧和柳泽民 (2024) 则进一步探讨了生态文明内涵的理论再澄清, 认为生态文明本质上是实现人类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性的内在统一和良性互动。^[2]他们强调, 生态文明并非回归不加干预的“原生态”, 而是在遵循客观规律的基础上通过创造性实践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余泽娜 (2024) 总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生态文明建设的五大重要经验, 她提到自 1973 年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工作会议以来, 中国共产党不断探索调整生态文明建设的方式方法, 实现了从被动到主动、从局部到整体、从单一到协同等转变, 走出了一条既顺应国际趋势又符合本国国情的道路;^[3]宫长瑞和吴琳琳 (2024) 同样关注到了十八大以来党领导生态文明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及其宝贵经验。他们指出, 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力度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积累了包括坚持党的领导与人民生态权益契合呼应在内的多项宝贵经验;^[4]初金哲等人 (2024) 分析了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生态文明建设的意义、掣肘及探索方向, 特别强调了“双碳”目标对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性;^[5]杨承训 (2024) 也在其文章《加快生态文明建设, 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中提到了类似观点, 即需要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转化为具体的制度机制和政策举措, 以体现精神变物质的实际进程。^[6]他强调, 在当前阶段, 中央提出了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等

[作者简介]

陈楠 (2002-), 男, 南京林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

一系列系统化措施，标志着中国正在加速从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向更可持续且以生态保护为先的新发展模式。

国外学者也认识到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及其在全球背景下的潜在影响，他们认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不仅仅是针对国内环境问题的解决方案，而且是一种结合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情况的独特发展路径。Arran (2012) 在其文章《China and the Struggle for Ecological Civilization》中探讨了中国在追求生态文明过程中的努力。他指出，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不仅是对环境问题的一种回应，而且是中国共产党在推动自身经济社会实践中提出的一个马克思主义答案。^[7]这一观点反映了国外学者对于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一种理论框架和实践策略的理解；Hansen 等人在《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terpreting the Chinese past, projecting the global future》中则更深入地探讨了生态文明作为社会技术想象的角色。他们认为，生态文明不仅是中国国内环境保护政策的基础，也被视为全球未来的愿景。^[8]Hansen 等人将生态文明理解为一种包含文化与道德价值的社会技术想象，其中传统文化遗产被用来解决地球未来的问题。他们描绘了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新乌托邦，在这里市场经济和消费继续增长，而科技解决了污染和环境退化的基本问题。这种视角表明，中国正试图在全球范围内推广其生态文明理念，强调从传统绿色发展理念转向以生态优先为核心的发展路径。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的研究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基础和实证支持。现有研究表明，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已经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马克思主义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是如何进一步“中国化”的问题仍未充分阐明。本文的研究方法主要采用文献分析法与理论研究法，从不同以往的视角提出自己的观点。

三、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与绿色发展理念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为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理论支持和思想启示。马克思在其经典著作中深入探讨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提出了“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的理念，强调资本主义经济模式下的自然剥削与社会不公。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继承和发展这些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绿色发展、生态优先、绿色转型等理念，并在具体实践中探索出一条独特的生态文明建设路径。

（一）马克思主义的生态观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并非一开始就作为独立的学科存在，而是随着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与对自然界的辩证分析而逐步发展起来的。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不仅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模式对人的剥削和对社会的不公，同时也强调了资本主义经济活动对自然环境的掠夺性破坏。^[9]马克思通过分析自然界的生产过程与社会生产过程之间的关系，提出了“自然界是人类生存的基础，人与自然是辩证统一的”这一观点。这一观点为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提供了理论依据。马克思在其另一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人类的生存离不开自然界，人的劳动活动不仅改变了自然条件，也在不断改造着自然界。^[10]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提出了人与自然的“物质交换关系”，即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关系。因此，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想不仅重视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联系，更强调自然界对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

然而，马克思并没有系统地提出完整的生态学理论，部分原因在于他生活在工业革命初期，那个时期的环境问题还未像今天这样严峻。因此，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尤其是 20 世纪的生态学者，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在这些发展中，詹姆斯·奥康纳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着重从资本主义的结构性问题出发，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模式如何导致生态危机。奥康纳认为，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特别是利润最大化的驱动力，导致了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和生态环境的系统性破坏。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生态思想与生态文明建设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生态思想，是在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所形成的独特理论体系。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快速的经济增长和城市化进程带来了环境污染和资源短缺等严重问题。面对这些挑战，中国逐渐意识到，单纯追求经济增长而忽视环境问题，最终将损害人民群众的福祉，并影响可持续发展。

1997 年，党的十五大首次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的战略构想，明确指出生态环境保护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性。^[11]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不断深化，生态文明建设成为 21 世纪中国发展的核心议题之一。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文明理念，为中国的绿色发展指明了方向。这一理念的提出，标志着中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历史性跨越，并进一步强调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生态思想强调，发展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而应当尊重自然规律，推动绿色转型，实现经济与生态的双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在强调生态保护的同时，注重经济发展的持续性与人民群众的长期利益。在这一理论框架下，绿色发展理念成为国家发展战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是对传统发展方式的批判，也是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追求。

（三）绿色发展理念的理论渊源与实践路径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为绿色发展理念的提出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马克思通过对自然界与社会生产关系的辩证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破坏，为后来的生态马克思主义学派提供了思想基础。

绿色发展理念的提出，是对传统工业化发展模式的反思和对全球环境问题的回应。绿色发展提倡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资源的高效利用与环境的有效保护。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理念之一，旨在推动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协调发展。其理论渊源可以追溯到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和发展观。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强调，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绿色发展理念同样强调这种辩证关系，认为经济发展应当建立在对生态环境的尊重和保护之上。在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基础上，绿色发展理念强调自然资源有限性，反对对自然的盲目开发与掠夺，主张采取可持续的生产与消费模式，实现经济与生态的和谐统一。

绿色发展理念的提出是中国应对环境危机与资源约束的重要政策工具。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常态，资源环境承载力的压力日益增加，绿色发展已成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在此背景下，绿色发展不仅体现在生态文明建设上，还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多个层面的创新与变革。

在绿色产业转型方面，绿色发展理念推动传统产业向绿色、低碳、环保的方向转型，发展新能源、绿色制造等绿色产业。通过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优化，促进经济发展与资源节约的有机结合；在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方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实施严格的污染控制与排放标准，推动绿色消费和绿色生产。中国在推动绿色发展的同时，重视环境治理，通过制定相关法规和政策，努力解决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在绿色城市建设方面，中国大力推动绿色城市建设，促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通过建设绿色基础设施、推动绿色建筑与低碳出行，提升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在绿色国际合作方面，加强全球绿色治理与国际合作，推动全球绿色发展的共同愿景。中国还积极参与全球气候变化应对，提出中国方案，推动绿色“一带一路”倡议，助力全球生态环境保护。

绿色发展理念不仅是中国发展的战略选择，也是全球应对环境危机的共同追求。在全球气候变化的背景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经典生态观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现实国情，提出了绿色发展理念，主张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基础上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发展理念的提出与实践，既是中国发展面临的现实需求，也是全球应对环境危机的创新路径。中国的绿色发展为其他国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同时也为世界经济提供了可持续发展的新范式，绿色发展理念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理论支撑，并为全球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与启示。

四、从绿色发展到生态文明

（一）绿色发展与生态文明的关系与区别

绿色发展与生态文明是现代可持续发展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既有内在联系，也存在理论内涵与实践路径上的区别。绿色发展更多是从经济模式、生产方式的角度入手，旨在实现资源高效利用与环境保护的协调统一，而生态文明则超越了经济与技术的范畴，强调人与自然的整体和谐与文明形态的转型。

马克思指出：“劳动不仅是生产财富的过程，也是生产自然物的过程。”^[9]这一论断表明，人类社会的发展依赖于自然界的资源供给与生态支持，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双向的物质循环关系。然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这种关系被打破，导致了生态危机的产生。绿色发展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增长模式，旨在缓解资本主义发展中对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耗与环境的过度破坏，试图通过技术进步与资源再利用实现经济与生态的双赢。

生态文明的理论基础可以追溯到马克思关于“自然与社会辩证关系”的思想。马克思认为，自然界不仅是人类物质生活的基础，也是人类文化与文明的重要来源。在这种意义上，生态文明不仅仅是绿色发展理念的延伸，而是对人类文明形态的根本性重构。它包含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多方面内容，力求在各个层面实现人与自然的共生共荣。

在中国的实践中，绿色发展是实现生态文明的重要路径。党的十八大首次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明确提出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12]绿色发展作为实现生态文明的重要手段，通过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技术创新和环境治理，为生态文明的实现提供了具体的路径。

（二）从绿色发展转向生态文明

绿色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国在追求现代化进程中不断深化和拓展的战略方针。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环境问题日益显现，如何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和谐共生成为亟待解决的课题。从绿色发展到生态文明的转变，不仅是中国经济结构与发展模式的变革，也是全社会生态意识的逐步觉醒和生态制度创新的进程。这一转型历程，通过对各个历史时期的政策与领导人讲话的梳理，看到中国生态思想的不断深化。

改革开放初期是生态环境保护的起步阶段。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但也伴随着严重的环境污染和资源消耗。在这一时期，环境保护并未成为主流政策，经济增长往往被置于优先地位。但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末期，环境污染引发的社会不满和对外界环境形势的关注，使得中国政府开始重视环境保护问题。1983年召开的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工作会议，正式把环境保护确定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此时，绿色发展的概念尚未完全形成，但这一阶段的政策反映了中国在初步发展过程中对生态问题的关注。在1987年，联合国发布的《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首次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标志着全球环保议题的日益重要。^[13]虽然中国的环保政策尚未与这一国际趋势紧密对接，但从《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纲要》到后续的环境保护法、能源法等政策逐步出台，可以看出，绿色发展作为一个渐进的过程，开始在中国的政策中逐步被重视。

进入21世纪，国家提出绿色发展理念并做出相应实践。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中国面临的生态压力愈加严峻，尤其是资源消耗、能源结构不合理和污染问题，亟需转变发展方式。在2003年，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并明确指出要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胡锦涛主席在多次讲话中提到：“要坚定不移地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着力改善生态环境，推动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可持续发展。”这一时期，绿色发展理念正式成为中国发展的核心战略之一。200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修改通过，进一步强化了环境保护的法律保障，并开始推动绿色技术和产业发展。2006年，政府提出了“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是中华民族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这标志着中国在绿色发展方面迈出了坚实步伐，尤其在节能减排和环境治理方面提出了具体目标和政策。2008年，中国政府通过了《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战略目标。绿色发展被进一步嵌入到国家发展的宏观规划中，绿色产业和技术创新成为国家发展的关键抓手。胡锦涛在多个场合强调，必须在保障经济增长的同时，注重生态文明建设，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2012年，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态文明成为国家战略。^[12]此时，绿色发展理念与生态文明理念的结合，标志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发生了质的变化。从单纯的环境保护转向全面的生态文明建设，既包括资源的合理利用，也涵盖了社会制度的改革、文化认同的培育以及环境治理机制的创新。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和战略布局中，必须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一项核心内容。”这是中国领导人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刻洞察。自此，生态文明不仅仅是环境保护的进一步延伸，而是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个领域的全面布局。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强调经济发展不能以破坏环境为代价，要始终坚持可持续发展道路。在这一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促进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全面建设”，明确了未来中国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整体规划。

党的十九大，生态文明建设深入推进。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明确提出，“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并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和战略布局中。习近平总书记在报告中指出：“要建设生态文明，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一时期，生态文明的内涵从“环境保护”扩展到更加全面的绿色发展模式，尤其是“绿色发展”成为中国经济转型的重要标志。十九大明确提出，要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加强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推动绿色技术创新，增强生态环境的质量和效率。新时代的中国，正在通过制度改革、政策引导以及社会参与，推动从“绿色发展”到“生态文明建设”的全方位转型。在具体政策层面，中国实施了“十三五”

规划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提出了具体的绿色发展目标：到 2020 年，全面实现生态环境质量的根本改善，构建起更加完善的生态文明体制。绿色发展不仅涉及产业结构调整、能源结构优化，还包括资源配置、市场机制改革等多方面内容。

综上所述，从改革开放初期的“环境保护”到党的十八大提出的“生态文明建设”，再到党的十九大提出的生态文明的全面推进，中国的生态文明思想经历了一个从初步关注到全面深化的历史进程。从绿色发展到生态文明的转变，体现了中国发展战略的历史性飞跃。绿色发展从一个局部的环境保护概念，逐渐演变为国家战略，成为中国经济社会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理念。在这一过程中，中国领导人深刻认识到，生态文明建设不仅是环境保护的延伸，更是实现社会全面进步的重要途径。在这一战略指导下，中国正朝着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强国迈进，生态文明建设也必将成为未来发展的长期任务和根本目标。

五、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主要挑战与应对策略

（一）当前生态文明建设中的挑战与障碍

在生态文明建设进程中，绿色转型面临着诸多挑战与障碍，这些问题既源于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深层缺陷，也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特殊国情。马克思中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质上是“以无限增殖为目标的资本积累过程”，这种无节制的生产和消费逻辑不可避免地引发了生态危机。^[9]在中国实践中，绿色转型不仅需要破解资源环境约束，也需要应对经济社会结构性矛盾的制约。

首先，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马克思曾指出，“自然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不得不不断与自然界进行斗争，以便从中获取生活所必需的资料。”^[14]这一论断揭示了经济活动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复杂关系。在中国，快速的工业化与城市化带来了经济增长，但也加剧了资源的过度消耗与生态环境的破坏。例如，部分地区仍依赖高耗能、高污染的传统产业，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目标的冲突尚未根本缓解。

其次，生态意识与行为惯性的冲突。马克思主义强调意识形态的作用，认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在当代中国，虽然生态文明建设已成为国家战略，但部分公众的生态意识与实际行为之间仍存在脱节。例如，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等行为在日常生活中依然普遍，社会整体尚未形成节约资源、尊重自然的绿色生活方式。

再者，生态技术与制度创新的不足。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技术创新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动力，但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技术进步往往服务于资本增值，而非生态环境改善。^[9]在中国，尽管绿色技术取得了一定进展，但在高端绿色技术的研发与推广方面仍存在短板。此外，绿色发展的制度体系尚未完全健全，特别是在资源定价、生态补偿、环境执法等领域，仍需进一步完善。

最后，全球化背景下的环境治理挑战。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思想强调，各国人民的利益是互相联系的。在全球化背景下，生态危机具有跨国性和全球性，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等问题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应对。然而，国际环境治理中存在的不公平现象，如发达国家的“碳转移”行为，对发展中国家提出了更高的生态要求，给中国的绿色转型带来了外部压力。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角下的应对策略

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和中国的实际情况，绿色转型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应对策略应从理论深化和实践创新两个层面展开。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生态文明建设必须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为出发点，既实现经济发展，又注重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性。在实践中，中国通过推动绿色产业发展、实施区域生态补偿机制等措施，努力在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之间找到平衡。我国实施了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战略，将生态优先理念贯穿于经济发展全过程，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社会的自由发展有赖于每个人的自由发展。”^[15]生态文明建设需要社会公众的广泛参与支持。中国应进一步加强生态文明教育，将绿色理念融入国民教育体系，通过宣传与引导，提升公众的环保意识。同时，通过政策激励与法律约束，促进公众从绿色理念向绿色实践的转变，如推广垃圾分类制度、倡导低碳出行等，以强化公众参与，推动社会生态意识转型。

绿色技术创新是绿色转型的关键动力。马克思在论述科技与生产力的关系时指出，技术进步是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中国应加大对绿色技术研发的投入，推动可再生能源、节能减排、污染治理等关键技术的突破。此外，还需建立绿色技术的推广机制，加强科技成果转化，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技术支撑，提升生态文明建设水平。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应通过深化生态制度改革，建立更加完善的环境治理体系。在资源定价方面，应体现生态产品的真实价值；在环境执法方面，应严格执行生态保护法律法规，确保违法行为受到应有惩罚；在生态补偿方面，应构建多元化的补偿机制，激励地方政府和企业参与生态保护，深化生态制度改革，完善环境治理体系。

马克思主义的国际视野强调全球合作的重要性。中国应在全球生态治理中发挥引领作用，推动气候变化谈判、跨国生态合作等进程。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推动绿色发展理念的国际传播，与世界各国共同分享绿色技术与经验，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贡献中国智慧，积极参与全球生态治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探索，为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提供了科学指引和强大动力。

六、结论

从绿色发展到生态文明的转型，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也是对人类发展模式的深刻反思与创新探索。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以生态文明建设为抓手，致力于破解现代化进程中的生态困境，为世界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和参考。这一实践不仅表明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具有强大的现实生命力，也为人类走向可持续发展的未来开辟了新的路径。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是中国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对全球生态治理的重大贡献。在新时代，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中国将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导，不断深化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为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推动世界的可持续发展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参考文献：

- [1] 白姗姗.马克思主义自然观视域下的生态文明建设[J].产业与科技论坛,2024,23(20):11-13.
- [2] 丁启慧,柳泽民.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再澄清与实践再反思[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4,21(11):18-23.
- [3] 余泽娜.中国共产党领导生态文明建设的五大重要经验[J].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4,24(05):11-25.
- [4] 宫长瑞,吴琳琳.十八大以来党领导生态文明建设的宝贵经验[J/OL].北京林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7[2024-12-21].
- [5] 初金哲,佟丹丹.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生态文明建设的意义、掣肘及探索研究[J].华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24(06):114-120.
- [6] 杨承训.加快生态文明建设，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J].当代经济研究,2024,(10):5-6.
- [7] Gare A. China and the struggle for ecological civilization[J]. Capitalism Nature Socialism, 2012, 23(4): 10-26.
- [8] Hansen M H, Li H, Svarverud R.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terpreting the Chinese past, projecting the global future[J].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2018, 53: 195-203.
- [9]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2018.
- [10]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M].人民出版社,1961.
- [11] 郑科扬,虞云耀,傅杰.面向 21 世纪的中国共产党:学习党的十五大报告[M].中国方正出版社,1997.
- [12] 胡锦涛.十八大报告[J].2012.
- [13] Imperatives S. Report of the 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Our common future[J]. Accessed Feb, 1987, 10(42,427).
- [14] 马克思,刘丕坤.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人民出版社,1985.
- [15]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M].人民出版社,1965.

The Marxist Sinicization Path i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Chen Nan¹

¹ School of Marxism, Nan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Nanjing, China

Abstract: The global environmental crisis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sever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issue for contemporary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to meet the challenge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the practic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Marxist ecological thought has been combined with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 to form a unique path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From the awakening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consciousness in the early stage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to the proposal of green development concept under the “scientific outlook on development”,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trategic posi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in the overall layout of the “Five-in-One”, the ecological ideology of Marxism in Chinese has experienced a profound evolution. At present,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still faces a series of challenges, and China will continue to deepen the practice of the Chineseization of Marxist ecological thought and contribute Chinese wisdom and strength to the construction of global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Keywords: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Green Development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2.615

乡村振兴背景下汤家汇小镇旅游形象感知与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

赵雯¹ 车晨¹ 刘家俊¹

(¹内蒙古大学 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1)

摘要: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 乡村旅游作为推动乡村经济发展的重要产业, 逐渐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红色旅游与乡村旅游的融合, 展现出独特的价值与发展潜力。本文以安徽省汤家汇小镇为研究对象, 运用高频词分析、网络语义分析和情感分析等方法, 探讨了该地区旅游形象感知的现状与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路径。研究结果表明, 汤家汇小镇的旅游形象主要围绕“红色”、“革命”、“大别山”等关键词展开, 游客对其红色文化资源和乡村自然景观表现出较高的认同度, 但在服务设施和基础设施方面存在一定的改善空间。情感分析显示, 大部分游客对小镇旅游体验持积极态度, 但仍有一定比例的游客表达了中性或消极情绪。基于这些发现, 本文提出, 汤家汇小镇应进一步优化旅游产品, 增强红色旅游与乡村旅游的融合, 提升基础设施建设, 以推动其乡村旅游的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 乡村振兴; 汤家汇小镇; 红色旅游; 旅游形象感知; 情感分析; 网络语义分析

一、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为乡村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 其中, 乡村旅游作为乡村产业发展的重要方向, 已成为推动农村经济增长、优化城乡关系的重要抓手。近年来, 红色旅游与乡村旅游的融合发展模式逐渐兴起, 在丰富乡村旅游业态的同时, 也为乡村文化振兴提供了新的动力。红色旅游作为承载革命历史记忆、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重要载体, 与乡村的自然景观、传统文化、民俗风情相结合, 不仅提升了乡村旅游的文化内涵, 也促进了乡村旅游的品牌塑造和市场竞争力。如何在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充分挖掘红色文化资源, 并将其与生态旅游、乡村产业振兴有机结合, 成为当前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议题。

尽管乡村旅游和红色旅游的融合发展具有广阔的前景, 但在实践中仍面临诸多挑战。一方面, 部分乡村红色旅游地存在资源开发与保护不平衡的问题, 红色文化资源的挖掘较为浅层, 缺乏深入的文化体验和教育功能, 导致游客黏性不足, 难以形成长效旅游市场。另一方面, 乡村旅游的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薄弱, 旅游产品开发模式单一, 未能有效结合乡村产业体系, 导致产业链条不完整, 经济带动效应有限。此外, 红色旅游的教育功能与乡村旅游的休闲属性在某些方面存在一定的矛盾, 如何在满足游客多样化需求的同时, 保持红色旅游的严肃性和教育性, 是乡村红色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因此, 探讨乡村旅游与红色旅游融合发展的模式, 构建文化、产业、生态协调发展的机制, 成为当前学界和实践领域亟需研究的重要课题。

作者简介: [1]赵雯 (1979—), 女, 内蒙古包头人, 内蒙古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讲师, 研究方向为乡村旅游及传统文化保护研究。

[2]车晨 (1991—), 女, 内蒙古赤峰人, 内蒙古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讲师, 研究方向为旅游行为意图, 共同第一作者。

[3]刘家俊 (2006—), 男, 安徽阜阳人, 内蒙古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本科生在读, 研究方向为乡村旅游。

[基金项目] 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课题“内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研究”(2023-WL0060); 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课题“内蒙古文物保护与旅游开发互动机制研究”(2024-WL0039); 内蒙古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内蒙古暗夜星空旅游发展模式研究”(2024NDC216); 2022年度留学人员创新创业启动项目: “内蒙古康养旅游高质量发展研究”(12000-15072203)

基于此,本文以安徽省汤家汇镇为研究案例,探讨乡村旅游与红色旅游融合发展的路径及其对乡村振兴的推动作用。汤家汇镇作为一处具有重要革命历史意义的红色文化基地,同时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乡村旅游发展条件,为乡村红色旅游融合发展提供了典型案例。本文采用实地调研、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及文献分析等研究方法,围绕乡村旅游形象感知、红色文化资源利用、产业融合模式等方面展开分析,探讨如何通过红色文化赋能乡村旅游,提升旅游地品牌价值和市场竞争力,并构建红色旅游、乡村经济、生态环境共生共赢的发展机制。研究成果将为乡村红色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同时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有益借鉴。

二、文献综述

(一) 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研究进展

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不仅要求其在经济层面上能够持续增长,还应注重文化内涵的提升、生态环境的保护以及社会效益的实现。孙九霞等(2023)指出,探讨了乡村旅游资源开发与共同富裕目标之间的内在关系,分析了当前面临的差距,并提出了以“有效开发、协同开发、可持续开发”为核心的创新路径,旨在推动乡村旅游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助力实现共同富裕。乡村旅游应在保护自然生态的基础上,推动农业与旅游的深度融合,实现乡村经济多元化发展。同时,管恒善等(2023)强调,旅游作为促进乡村经济发展的关键手段,通过合理开发乡村旅游资源可带动当地经济和改善民生,但过度开发可能超出生态环境承载能力,导致不可逆后果,因此,实现乡村旅游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对落实乡村振兴和可持续发展战略至关重要。

此外,生态旅游、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也逐渐成为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议题。王琴梅和方妮(2017)在对乡村旅游的研究中提出,生态文明建设是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乡村旅游应当作为生态环境保护的有力手段之一,推动生态保护与旅游产业的双赢发展。李光绪(2023)进一步指出,乡村旅游的高质量发展需要政策、市场与技术的综合推动,政策应鼓励地方特色文化的展示,市场应关注游客多元化需求,而技术则可以推动乡村旅游服务质量的提升。

(二) 旅游形象感知的研究进展

旅游形象感知是游客对旅游目的地的整体印象和情感反应,它不仅影响游客的选择,也直接影响到目的地的品牌塑造和市场竞争力。许多学者通过研究旅游形象的感知,提出了多种影响因素和测量维度。王承云等(2022)揭示了旅游者对上海红色旅游形象感知的层次结构及其情感评价,指出红色精神文化的传承是积极情绪的核心因素,而景点结构不合理和非自主性行为则是负面情绪的主要来源。蒋思玮等(2025)则认为,乡村旅游的形象感知不仅由自然景观的美丽与否决定,还与地方文化的独特性、民俗体验的真实性等密切相关,游客的旅游行为受这些因素的强烈影响。

在乡村旅游的形象塑造过程中,文化内涵和地方特色被认为是关键因素。余可发(2021)研究表明,乡村旅游的品牌形象塑造应注重文化的深度挖掘与创新,能够帮助旅游地提升独特性,增强其在市场中的竞争力。梅文慧和王历晴(2017)也提出,乡村旅游目的地应通过多元化的营销策略来塑造鲜明的旅游形象,特别是通过社交媒体和数字化平台提升旅游形象的传播力,从而吸引更多的游客。

(三) 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的关系研究

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关系已经成为近年来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朱长宁和鲁庆尧(2023)指出,乡村旅游不仅可以促进农民就业和收入增加,还能为地方政府提供税收来源,推动乡村基础设施的改善。因此,乡村旅游的高质量发展应与乡村振兴的目标高度契合,即不仅要实现经济效益,还要注重社会效益和文化效益。王金伟等(2024)进一步指出,乡村振兴战略中,乡村旅游发展应该注重乡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将地方特色文化与现代旅游需求相结合,实现乡村文化的创新性转化。

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乡村旅游也面临着产业整合和创新的问题。乡村旅游的成功不仅依赖于自然资源的利用,还依赖于地方文化的创新与品牌建设,乡村旅游的产业链应当更加多样化,涉及农产品、文化创意产业、手工艺品等多种领域。通过这种融合,能够提高乡村旅游的吸引力,提升乡村振兴的整体效果(崔海洋,成玲,2025;宋才发等,2025;明庆忠等,2023)。

(四) 研究地概况

为了深入探讨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旅游的高质量发展路径,本研究选取了汤家汇小镇作为研究对象。

汤家汇小镇位于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是一个典型的融合自然资源、农业资源和文化底蕴的乡村旅游目的地。小镇地处金刚台脚下，四季分明，拥有得天独厚的山水景观和丰富的农业资源。其自然资源优势包括茂密的森林、清澈的溪流以及广阔的田园风光，这些资源为乡村旅游的生态体验提供了优良条件。此外，汤家汇小镇还拥有独特的农业资源，特别是茶叶、中药材和有机水稻，已成为当地重要的特色产品。除了自然和农业资源，汤家汇小镇还具备深厚的文化底蕴，尤其是红色文化的优势。作为大别山腹地的革命老区，小镇保存了大量的红色遗址和纪念建筑，成为红色旅游的重要目的地。该地区的革命历史和文化为小镇的旅游形象增添了独特的文化内涵。小镇通过挖掘并传承地方文化、红色文化和传统农业文化，逐步形成了以农业体验、红色文化旅游和乡村民宿为核心的多元化旅游模式。近年来，汤家汇小镇依托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逐步发展成为乡村旅游的典范。小镇将农业、旅游与文化深度融合，推动了乡村经济的多元化发展。乡村民宿的兴起和乡村旅游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提升了小镇的吸引力，也为当地居民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和收入来源。然而，随着游客数量的增长，如何平衡旅游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如何在保持地方文化特色的同时避免同质化，仍然是汤家汇小镇面临的挑战。总体而言，汤家汇小镇通过发挥其独特的自然和文化资源优势，逐步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乡村旅游发展路径，为其他乡村旅游地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借鉴。

三、数据收集与研究方法

(一) 数据收集与处理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主要包括社交媒体（如微博、抖音）、旅游网站（如携程、马蜂窝）等平台上的游客评论数据。这些平台上游客的评价内容包括对汤家汇小镇旅游资源的认知、旅游服务质量的反馈、景区体验的描述等。这些数据反映了游客对旅游地的真实感受，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和现实意义。数据收集过程采用网络爬虫技术和手动收集相结合的方式，确保获取足够的样本数据。所有收集到的数据在进行分析前，首先经过数据清洗和预处理，包括去除无关信息、重复数据、错别字和噪声数据等。预处理后，数据将被输入到高频词分析、网络语义分析和情感分析等分析工具中进行进一步处理和分析。

(二) 高频词分析

高频词分析是一种定量分析文本中高频词汇的方法，能够揭示出文本中反映关键内容的核心词汇。在本研究中，我们通过对汤家汇小镇的游客评论、社交媒体帖子以及旅游网站的游客反馈数据进行高频词分析，识别出游客对汤家汇小镇旅游形象感知的主要关键词。具体操作包括以下步骤：首先，收集游客对汤家汇小镇的评论数据，包括微博、抖音等社交平台和马蜂窝、携程等旅游网站上的评论；其次，利用Python中的自然语言处理（NLP）工具进行文本处理，提取出高频词并生成词云图，从而直观地展示游客在评论中常提及的词汇。通过高频词分析，能够初步了解游客关注的主要旅游元素，如自然景观、乡村体验、红色旅游等，为进一步的语义分析和情感分析提供基础。

(三) 网络语义分析

网络语义分析主要通过对游客评论的语义信息进行深入解析，揭示出游客对汤家汇小镇的认知结构和情感倾向。利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可以帮助研究者挖掘评论中的潜在信息，包括游客的具体体验、态度和观点。在本研究中，网络语义分析将采用文本挖掘技术，对收集到的游客评论数据进行分词、词性标注、句法解析以及语义理解等操作。通过这些方法，能够识别出评论中的关键主题，如“红色”、“红军”、“革命”等，并进一步分析游客对这些主题的态度。语义分析将依托成熟的工具和算法，通过对每条评论的语义结构进行解析，了解游客对汤家汇小镇的整体认知框架。这种分析不仅有助于识别游客对小镇的关注点，还能揭示出游客的情感倾向。

(四) 情感分析

情感分析是利用计算机算法对文本数据中的情感色彩进行分析，分类为正向、负向或中性情感。在本研究中，情感分析将对游客在社交平台、旅游网站等线上平台发布的评论进行情感倾向分析，评估游客对汤家汇小镇的整体满意度和具体体验的情感态度。情感分析使用的主要工具为情感词典和机器学习算法，通过对评论进行情感分类，判定其情感倾向。情感分析的具体过程包括：首先，对游客评论数据进行情感词典匹配和情感分类；其次，利用机器学习算法，对情感类别进行预测和归类；最后，分析情感分布，以揭示游客对汤家汇小镇的情感态度。通过情感分析，能够全面了解游客对汤家汇小镇的情感反馈，识别游

客的主要满意点和不满点，从而为改进小镇的旅游服务和资源配置提供依据。

四、数据分析结果

(一) 高频词分析结果

通过对从社交媒体平台（如微博、抖音）及旅游网站（如携程、马蜂窝）收集的游客评论数据进行高频词分析，揭示出游客对汤家汇小镇的主要认知维度。在分析过程中，研究者利用 Python 中的 TextBlob、WordCloud 等工具提取关键词，并生成词云图。从分析结果来看，游客提及频率较高的关键词主要集中在“金寨”、“红色”、“红军”、“革命”等方面。具体而言，“金寨”这一关键词出现频率最高，表明汤家汇小镇作为金寨县的一部分，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历史背景在游客的感知中占据了重要地位。金寨作为著名的革命老区，是红色旅游的重要目的地之一，游客对这一地区的文化和历史具有较强的认同感与兴趣。其次，“汤家汇”、“红色”、“革命”也是频繁出现的词汇，反映了游客对汤家汇小镇的红色旅游资源的高度关注。作为革命历史的见证地，汤家汇小镇的红色文化遗产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参观，尤其是在国家大力推动红色旅游的背景下，游客对革命历史和红色教育有着浓厚的兴趣。此外，游客还提到“红军”、“历史”等关键词，显示出游客对汤家汇小镇作为历史文化名镇的认知，尤其是对红军长征时期的历史背景及其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的关注。红军的足迹、历史遗址和革命文化在游客的讨论中占据了重要地位，表明这些元素构成了汤家汇小镇旅游形象的核心部分，并且是游客选择该地作为旅游目的地的重要动因之一。

表 1 高频词排序

序号	单词	词频	序号	单词	词频	序号	单词	词频
1	金寨	703	21	商城	64	41	参观	37
2	汤家汇	482	22	国家	63	42	步道	36
3	红色	431	23	将军	61	43	发展	36
4	革命	248	24	文物	59	44	纪念	35
5	安徽	227	25	金刚台	58	45	皖西北	34
6	旅游	188	26	建筑	54	46	特色	33
7	小镇	185	27	生态农业	53	47	指挥部	33
8	大别山	173	28	保护	50	48	公路	33
9	红军	152	29	遗址	50	49	徒步	31
10	历史	135	30	放松	48	50	鄂豫皖	31
11	六安	124	31	天堂寨	47	51	茶产业	31
12	旧址	106	32	村落	47	52	传统	31
13	风景	105	33	乡村	45	53	赤色邮政局	29
14	文化	90	34	河南	44	54	古朴	28
15	景点	89	35	立夏节起义	41	55	笔架	28
16	自然	81	36	政府	39	56	红军街	28
17	教育	76	37	豫东南	39	57	遗迹	27
18	苏维埃	72	38	线路	38	58	烈士	27
19	体验	70	39	美丽	38	59	民宿	27
20	中国	69	40	朱家湾	37	60	小学	26



图 1 词云图

(二) 语义分析结果

为了进一步深入理解游客的旅游形象感知,本研究利用ROSTCM6对游客评论进行网络语义分析。通过对文本中的词汇进行分词、词性标注、句法解析和语义理解,揭示出游客对汤家汇小镇旅游资源和服务的整体认知结构。分析结果显示,游客普遍将汤家汇小镇的旅游形象与“红色”、“革命”、“大别山”、

“安徽”紧密联系。这表明，汤家汇小镇的核心旅游形象是建立在其深厚的革命历史文化基础上的，特别是与红色文化和革命历史的关联，使得这座小镇在游客心中形成了鲜明的历史印记。游客在评论中反复提到“红色”和“革命”，这不仅表明汤家汇小镇作为一个红色旅游目的地的地位，也反映了游客对小镇历史文化的认同与热情。此外，“大别山”和“安徽”这两个关键词的出现频率较高，进一步突显了汤家汇小镇的地理特征和地方文化特色。大别山作为革命老区的重要组成部分，赋予汤家汇小镇浓厚的红色旅游资源，而“安徽”则强调了汤家汇小镇在整个安徽省旅游资源中的独特地位。

通过对游客评论文本的网络语义分析,研究还揭示了游客对汤家汇小镇旅游资源的多维认知。除了红色旅游资源外,游客还表现出对小镇自然风光、民俗文化和农耕体验的浓厚兴趣。评论中涉及的“自然”、“生态农业”以及“体验”等词汇,表明游客对小镇的生态环境和乡村风情有较为积极的评价,尤其是对田园风光和农业景观的体验具有较高的期望。这些认知不仅显示了游客对汤家汇小镇的多维度评价,也反映了游客在选择旅游目的地时,既看重历史文化的底蕴,也对自然景观和乡村生活方式充满好奇与向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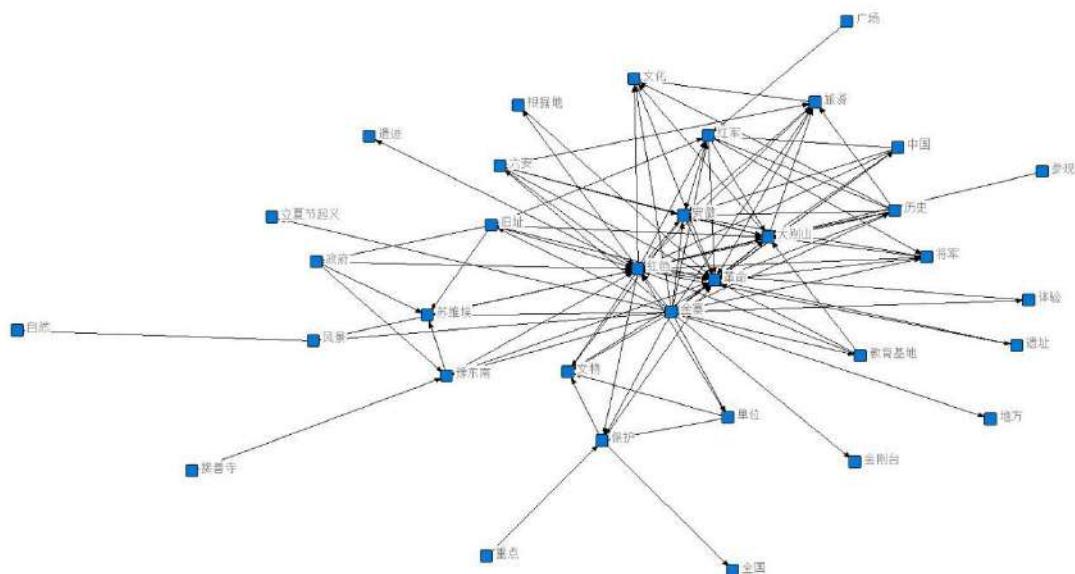


图2 网络评论社会网络和语义网络分布图

(三) 情感分析结果

情感分析的目的是通过自动化工具对游客评论进行情感分类，识别游客对汤家汇小镇旅游体验的正向、负向或中性情感倾向。情感分析结果显示，游客对汤家汇小镇的整体情感倾向主要呈现出积极情绪、中性情绪和消极情绪三种类型。具体而言，积极情绪占比 48.97%，表明大多数游客在评价汤家汇小镇时表达了较为正面的情感。游客普遍赞赏小镇的自然景观、红色旅游资源和乡村体验，认为小镇的历史文化背景丰富，尤其是红色文化和革命遗址的开发为游客提供了深刻的教育意义和情感共鸣。此外，游客也对小镇的生态环境和田园风光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这里是一个适合休闲、放松并感受自然与历史的理想之地。其次，中性情绪占比 40.61%，说明相当一部分游客对汤家汇小镇的体验持较为中立的态度。此类游客的评论中，较少表现出强烈的情感色彩，往往更多是对旅游资源和服务的基本描述，如提到景点的布局、设施的完善性以及交通状况等。虽然这些评论并未显著表达出负面情绪，但也未表现出特别热烈的喜爱或高度推荐，反映了部分游客在整体满意度上较为平稳、无明显倾向。消极情绪占比 10.42%，这一比例相对较低，表明少数游客对汤家汇小镇的旅游体验感到不满。消极情绪的评论通常集中在一些具体的旅游服务方面，如住宿条件、交通不便、部分景点设施欠缺等。部分游客还提到，在红色旅游项目的呈现上存在一定的商业化倾向，未能充分传达革命历史的深度和情感，这也导致了部分游客的失望情绪。

情感类别	词条数 (条)	所占比例	情绪分段统计	词条数 (条)	所占比例
积极情绪	902	48.97%	一般 (0—10)	548	29.75%
			中度 (10—20)	195	10.59%
			高度 (20 以上)	159	8.63%
中性情绪	748	40.61%			
消极情绪	192	10.42%	一般 (-10—0)	160	8.69%
			中度 (-20—-10)	29	1.57%
			高度 (-20 以下)	1	0.05%

表 2 情感类别表

五、结论与探讨

本研究通过高频词分析、网络语义分析和情感分析等多维度的分析方法，对汤家汇小镇的旅游形象感知与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路径进行了深入研究。研究表明，汤家汇小镇的旅游形象在游客的认知中主要围绕“红色”、“革命”、“大别山”和“安徽”等关键词展开，这表明红色旅游与乡村旅游的融合已经在游客的认知中占据了重要位置。红色旅游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旅游形式，与乡村旅游在汤家汇小镇的结合，不仅凸显了小镇的历史文化价值，也为其实现差异化的竞争优势。红色文化和革命历史资源已经成为汤家汇小镇的核心旅游资源，形成了强烈的文化认同感。通过高频词分析，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红色旅游与革命历史的文化符号在游客心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这些元素已经成为汤家汇小镇旅游品牌的关键构成。

情感分析的结果进一步揭示了游客对汤家汇小镇旅游体验的情感倾向。分析显示，约一半的游客情感表现出积极情绪，这些游客对汤家汇小镇的红色文化资源、革命遗址和自然景观等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其既具有历史文化价值，又能提供宁静的自然体验。尤其是在游客对红色文化的认同和对自然景观的赞美中，汤家汇小镇的红色旅游和乡村旅游的结合显得尤为重要。然而，约四成的评论表现为中性情绪，这表明游客的旅游体验缺乏深刻的情感共鸣，可能是因为现有的旅游产品尚未完全满足游客对个性化、多样化体验的需求。少数游客的评论则表达了消极情绪，主要集中在旅游设施、服务质量及交通不便等方面，表明汤家汇小镇在其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中，虽然红色旅游的文化吸引力显著，但仍面临提升服务和基础设施的挑战。

通过对分析结果的总结，我们可以得出，汤家汇小镇的红色旅游资源和乡村自然景观已成为其独特的竞争优势，但这种优势的充分发挥仍需进一步改进和优化。红色旅游和乡村旅游的融合提供了独特的旅游产品和体验，游客普遍认同这一融合模式，并表现出较高的满意度。然而，游客情感分析中存在中性和消极情绪的反馈，显示出汤家汇小镇在服务设施、交通便捷性和游客接待等方面仍有提升空间。因此，汤家汇小镇应注重结合红色旅游的深度挖掘和乡村旅游的多样化需求，推动这两者在更高层次上的融合，形成

更加丰富和互动的旅游产品，增强游客的情感共鸣和体验深度。

本研究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数据来源的单一性和情感分析方法的局限性。虽然通过在线游客评论收集了大量的数据，但这些评论只能代表部分游客的反馈，可能存在一定的代表性偏差。情感分析技术在处理复杂情感时也存在一定的误差，尤其在游客评论中含有混合情感的情况下，可能影响情感倾向的准确性。未来的研究可以结合更多元化的数据来源，如实地访谈和问卷调查，进一步深入了解游客的真实需求与体验。此外，随着情感分析技术的不断发展，结合深度学习、情感词典扩展等技术，未来能够更精确地分析游客的情感表达，提高研究的准确性。

未来的研究应进一步探讨如何深化红色旅游与乡村旅游的融合，以提升旅游产品的多样性和创新性。汤家汇小镇的红色旅游资源与乡村自然景观相结合，已具备了良好的发展潜力，但为了实现高质量的乡村旅游发展，必须在产品创新和服务优化方面下功夫。具体而言，汤家汇小镇应结合红色文化资源，开发更加具有互动性和参与感的旅游项目，打造深度文化体验和教育意义相结合的旅游活动，如红色教育体验营、历史文化主题村落等。这不仅能够深化游客对红色文化的理解，也能够提升游客的参与度和情感共鸣。同时，乡村旅游的基础设施建设也需要同步提升，如改善交通、住宿和旅游信息服务，增强游客的便捷性和舒适度。

此外，汤家汇小镇应根据红色旅游和乡村旅游的融合，推动全域旅游的发展，扩大旅游的消费场景。通过将红色文化、农业体验、乡村风貌和生态旅游等多元化元素结合，小镇能够提供更为丰富的旅游选择，满足不同游客群体的需求，提升其市场竞争力。在这方面，小镇可以借助现代化科技手段，创新旅游产品和服务形式，利用数字化平台来提供虚拟导览、智能化服务等创新体验，进一步提升旅游服务质量和服务满意度。通过这些措施，汤家汇小镇不仅能提升红色旅游的文化价值，还能促进乡村旅游的高质量发展，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

总之，红色旅游与乡村旅游的融合在汤家汇小镇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未来，汤家汇小镇应不断创新旅游产品与服务，优化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游客的整体体验，进而推动其乡村旅游的高质量发展。通过这一路径，不仅可以提升汤家汇小镇作为红色旅游目的地的吸引力，也为乡村振兴提供有力支持，为我国的乡村旅游与红色旅游融合发展探索出一条可持续的路径。

参考文献：

- [1] 孙九霞,张凌媛,罗意林.共同富裕目标下中国乡村旅游资源开发: 现状、问题与发展路径[J].自然资源学报,2023,38(02):318-334.
- [2] 管恒善,代洪丽,顾佳琪.乡村旅游与生态环境保护协调发展探索[J].环境保护,2023,51(Z3):89-90.DOI:10.14026/j.cnki.0253-9705.2023.z3.012.
- [3] 王琴梅,方妮.乡村生态旅游促进新型城镇化的实证分析——以西安市长安区为例[J].旅游学刊,2017,32(01):77-88.
- [4] 李光绪.文化资源赋能乡村振兴的内在机理与实践路径——基于吉林省民族地区“西村”的实践研究[J].黑龙江民族丛刊,2023,(05):85-94.DOI:10.16415/j.cnki.23-1021/c.2023.05.009.
- [5] 王承云,戴添乐,蒋世敏,等.基于网络大数据的上海红色旅游形象感知与情感评价研究[J].旅游科学,2022,36(02):138-150.DOI:10.16323/j.cnki.lykx.2022.02.001.
- [6] 蒋思玮,黄诗艺,陈嘉文,等.基于网络文本的民族特色村寨旅游形象感知研究——以羊茸哈德村为例[J].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025,41(01):82-90.DOI:10.19933/j.cnki.ISSN1674-3652.2025.01.010.
- [7] 余可发.生态位视角下乡村旅游目的地品牌成长机制研究——以婺源篁岭为例[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21,(06):13-28.DOI:10.13676/j.cnki.cn36-1224/f.2021.06.003.
- [8] 梅文慧,王历晴.社交媒体时代旅游目的地的品牌传播研究[J].今传媒,2017,25(03):14-15.
- [9] 朱长宁,鲁庆尧.乡村旅游发展对农户收入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匹配倍差法[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23(03):155-167.DOI:10.19714/j.cnki.1671-7465.2023.0046.
- [10] 王金伟,黄震方,王兆峰,等.乡村振兴视域下新质生产力赋能文旅深度融合: 科学问题与战略路径[J].资源科学,2024,46(12):2335-2354.
- [11] 崔海洋,成玲.传统村落“产村景”一体化促进共同富裕路径探析[J/OL].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11[2025-03-14].<http://kns.cnki.net/kcms/detail/45.1349.C.20250228.1317.002.html>.

- [12]宋才发,杨志恒,王孟欣,等.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与政策研究[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50(02):1-27.
- [13]明庆忠,李志飞,徐虹,等.共同富裕目标下中国乡村旅游资源的理论认知与应用创新[J].自然资源学报,2023,38(02):286-304.

Research on the Tourism Image Perception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Path of Rural Tourism in Tangjiahui Tow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Zhao Wen¹, Che Chen¹ Liu Jiajun¹

¹ College of History and Tourism Culture,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Hohhot, Inner Mongolia

Abstract: With the deepening implementation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rural tourism has gradually become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rural development, serving as a key industry to drive the rural economy. Particularly, the integration of red tourism and rural tourism has demonstrated unique value and development potential. This study focuses on Tangjiahui Town in Anhui Province, employing methods such as frequency word analysis, network semantic analysis, and sentiment analysis to explore the current perception of the town's tourism image and the path towar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tourism image of Tangjiahui Town primarily revolves around keywords such as "red," "revolution," and "Mount Dabie." Tourists show a high level of recognition for its red cultural resources and rural natural landscapes, although there is room for improvement in service facilities and infrastructure. Sentiment analysis reveals that most tourists have a positive attitude toward the town's tourism experience, but a certain proportion of tourists express neutral or negative emotions.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Tangjiahui Town should further optimize tourism products, enhance the integration of red tourism and rural tourism, and improve infrastructure to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its rural tourism.

Keywords: Rural Revitalization; Tangjiahui Town; Red Tourism; Tourism Image Perception; Sentiment Analysis; Network Semantic Analysis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2.620

数学史概论课程思政建设：消防救援中的数学智慧与育人价值

于晟伟¹ 何永明¹ 王洪庆¹ 赵赫¹

(¹ 中国消防救援学院，北京 102202)

摘要：本文探讨了在《数学史概论》课程中融入思政教育的路径，以消防救援为应用背景，挖掘其中的数学智慧与育人价值。通过对消防救援中数学知识与方法的分析，阐述如何将数学史与思政元素相结合，实现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的统一，为培养具有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素质人才提供参考。

关键词：数学史概论；课程思政；消防救援；育人价值

一、引言

教育的核心要旨在于立德树人，课程思政作为教育教学改革的关键路径，致力于将思想政治教育全面融入各类课程教学，构建全员、全程、全方位的育人体系，达成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的深度融合。数学作为一门基础学科，贯穿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科技的飞跃，数学教育在多个维度实现了拓展与深化，具体体现在信息技术应用、教学形态创新、数学建模实践、教师专业发展以及课程思政融合等方面。

在信息技术与数学教育融合的维度上，文献^[1-7]深入探讨了信息技术对数学教学的变革性影响。生成式人工智能为数学学习提供了个性化路径，智慧教室通过物联网技术实现了互动式教学，动态数学资源平台则为师生提供了丰富的教学素材。这些技术的应用不仅创新了数学知识的呈现方式，更激发了学员的学习兴趣，培养了其数字化适应能力和创新思维。

数学教学形态与模式的创新同样成果显著。文献^[8-16]等提出了问题提出教学法、翻转课堂、混合教学模式等多种创新模式。问题提出教学法注重培养学员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的能力，翻转课堂通过课前自主学习和课堂互动深化知识理解，混合教学模式则结合线上线下的优势，为学员打造灵活高效的学习环境。

数学建模与实验教学的探索进一步强化了数学教育的实践性。文献^[17-22]等强调了数学建模在创新能力培养中的独特作用。通过将实际问题转化为数学模型，学员不仅加深了对数学理论的理解，还在模型构建与求解过程中锻炼了逻辑思维和创新能力。实验教学则通过实际操作和数据处理，验证了数学模型的正确性和实用性。

在教师教育与发展领域，文献^[23-27]等为数学教师的专业成长提供了系统指导。从师范生培养到在职教师的持续发展，再到教育硕士课程设计，这些研究致力于打造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的教师队伍，以提升数学教育的整体质量。

课程思政与数学文化的融合为数学教育注入了人文关怀。文献^[17,28,29]等探讨了如何将思政元素融入数学教学，通过数学家故事、数学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以及数学之美等方面的教育，提升学员的人文素养和价值观念。

《数学史概论》作为数学教育的重要课程，系统展现了数学的发展历程及其文化内涵，蕴含着丰富的

[作者简介]

[1] 于晟伟（1995—），男，吉林长春人，中国消防救援学院讲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博士研究生。

[2] 何永明（1978—），男，江西南昌人，中国消防救援学院副教授。

[3] 王洪庆（1977—），男，黑龙江双鸭山人，中国消防救援学院副教授。

[4] 赵赫（1997—），男，北京人，中国消防救援学院助教，首都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

思政教育资源。消防救援作为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工作，与数学知识和方法紧密相连。将消防救援中的数学智慧融入《数学史概论》课程思政建设，不仅能够增强学员对数学知识的理解和应用能力，还能通过真实案例培养学员的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实现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的有机统一，为社会培养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人才。

二、数学史与课程思政的结合基础

（一）数学史的教育价值

数学史作为数学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系统地记录了数学学科从古至今的演进历程，全面地呈现了数学知识体系的产生、发展、变革以及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应用实践。通过深入学习数学史，学员能够清晰地了解数学学科的起源、发展脉络，以及数学家们在漫长探索过程中所经历的艰辛历程与取得的卓越成就。这种了解有助于有效激发学员对数学学科的浓厚兴趣和深切热爱，显著增强其数学学习的自信心与内在动力。同时，数学史还蕴含着丰富的科学精神、创新思维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对于全面培养学员的科学素养、人文精神以及创新能力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此外，数学史的学习能够帮助学员建立起跨文化的视野，理解不同文明背景下数学发展的多样性和统一性，从而在更广阔的视角下认识数学作为人类智慧结晶的普遍价值，进一步提升学员的全球视野和文化包容性。

（二）课程思政的内涵与要求

课程思政作为一种创新且具有战略意义的教育理念与实践路径，其核心要旨在于将思想政治教育全面且有机地融入课程教学的各个环节，实现知识传授与价值塑造的深度融合。这一过程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专业素养和教育智慧要求。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不仅要高度关注学员对专业知识的掌握程度和技能的培养效果，更要将学员的思想政治素质、道德品质、社会责任感和家国情怀等方面培养作为重要教学目标。这意味着教师需要深入挖掘课程中蕴含的思政元素，实现思政教育与专业知识的有机结合，引导学员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教师需要依据不同学科、不同课程的特点，探索多样化的思政教育融入路径。例如，在理工科课程中，可以通过展示科学技术在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关键作用，激发学员的爱国情怀和创新精神；在文科课程中，可以通过分析社会现象和文化作品，培养学员的社会责任感和人文关怀。教师需要具备跨学科的知识视野和教学设计能力，将思政元素自然地融入教学环节，避免生硬的说教和堆砌。通过情境创设、案例分析、小组讨论等多种教学方法，使学员在潜移默化中接受思想的熏陶和价值的引领，从而达到知识与品德同步提升的教育效果。

（三）数学史与课程思政的契合点

数学史与课程思政在教育目标上具有高度的内在一致性，为两者的有机结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数学史中蕴含着丰富的思政元素，为课程思政的实施提供了坚实的素材基础。例如，数学家们在研究过程中的爱国情怀、严谨的科学精神和创新意识，数学知识在解决实际问题中的广泛应用价值，以及数学发展过程中体现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等。这些元素与课程思政的要求紧密契合，为在《数学史概论》课程中有效开展课程思政提供了丰富多样的素材和坚实的内容支撑，使得在该课程中实现数学知识传授与思政教育的有机结合成为可能。具体而言，数学史中众多数学家的故事展现了他们为国家强盛和民族复兴而投身科学的研究的崇高使命感，如祖冲之在艰苦条件下坚持数学研究，为国家的科学事业做出巨大贡献，这种爱国情怀能够激发学员的民族自豪感和为国家奋斗的决心；而数学在军事、经济、科技等领域的实际应用则凸显了其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体现了知识服务于社会的价值取向，有助于培养学员的社会责任感和实践能力。通过将这些思政元素巧妙地融入数学史教学，能够在传授数学知识的同时，引导学员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实现知识与品德的协同发展，为培养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提供有力保障。

三、消防救援中的数学智慧

（一）数学建模在消防救援中的应用

消防救援中常常需要对火灾蔓延、救援路径规划、资源分配等问题进行分析和决策，这些问题都可以通过建立数学模型来求解。在火灾蔓延预测中，可以运用微分方程模型、元胞自动机模型等来描述火势随时间的变化规律。例如，微分方程模型可以根据建筑物的结构、材料以及火灾的类型等因素，确定模型的

参数，从而预测火灾的发展趋势，为消防指挥人员制定救援方案提供科学依据。元胞自动机模型因其结构简单与计算复杂度低的特点在大空间森林火灾蔓延建模中得到广泛应用。在救援路径规划方面，可以利用图论中的最短路径算法，结合地理信息系统（GIS）数据，确定从消防站到火灾现场的最优路径，提高救援效率。此外，基于建筑BIM模型与流体动力学模拟的实时火情推演，可以预测火势扩散路径、烟雾浓度分布，从而动态规划最优救援路线。

（二）几何知识在消防救援中的作用

几何学在消防救援中有着广泛的应用。在确定消防车的停放位置时，需要综合考虑消防车与火灾现场的距离、角度以及消防水带的长度等因素，运用几何知识进行合理布局，确保消防水带能够有效覆盖火灾区域，同时避免消防车受到火灾的威胁。在高层建筑火灾救援中，消防人员需要根据建筑物的高度、楼层结构等信息，计算出云梯消防车的合适伸展角度和长度，以安全、快速地将消防人员送达火灾楼层进行救援。例如，在实际操作中，消防人员需要精确计算云梯消防车的伸展角度，以确保其能够准确到达目标楼层，这涉及到三角函数和几何原理的应用。

（三）概率统计在消防救援中的应用

概率统计方法在消防救援中可用于风险评估和资源优化配置。通过对火灾发生的历史数据、地理环境、气象条件等因素进行统计分析，可以评估不同区域、不同时间段内火灾发生的概率，为消防部门合理部署消防力量、制定预防措施提供科学依据。同时，在消防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利用概率统计模型可以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确保在火灾发生时能够及时、有效地进行救援。例如，通过分析历史火灾数据，可以预测特定区域的火灾风险，从而优化消防站点的布局和资源的分配。此外，借助大模型技术，可以对消防资源的分配和调度进行动态优化，提高救援效率和精确性。

四、基于消防救援的《数学史概论》课程思政育人路径

（一）挖掘消防救援中的数学史案例

在《数学史概论》课程教学中，教师可以通过收集和整理与消防救援相关的数学史案例，并将其有机融入教学内容，使学员在学习数学知识的同时，领略数学在实际应用中的魅力与价值。

案例1（文献[30]中第70页）《周髀算经》作为中国古代最早数学著作之一，其中不仅记载了勾股定理的一般形式，还蕴含着古代人民对火灾防控的智慧。具体而言，“以日下为勾，日高为股，勾股各自乘，并而开方除之，得邪至日”这一记载，体现了勾股定理在古代建筑防火布局中的巧妙应用。

假设建筑A的高度为 a ，建筑B的高度为 b ，根据勾股定理，可以将建筑之间的水平间距视为直角三角形的斜边，其中两条直角边分别为建筑的高度差和一个假设的垂直距离。具体计算公式为： $c = \sqrt{a^2 + b^2}$ ，其中 c 是建筑之间的水平间距。这种基于勾股定理的计算方法，不仅在古代被广泛应用于建筑防火布局，也在现代《建筑设计防火规范》中得到了体现。现代规范虽然更为复杂和全面，但其核心原理依然是通过数学计算来确保建筑之间的安全距离，从而有效阻止火势的蔓延。

通过这一案例，学员能够深入了解中国古代建筑中的防火墙设置和建筑物布局中的防火间距等设计所运用的几何知识和数学原理，深刻感受到古代人民对火灾防控的智慧和创新精神。

（二）培养学员的科学精神和创新意识

在通过深入分析消防救援中的数学问题及其解决方法，可以有效引导学员学习数学家们在探索过程中所展现出的科学精神和创新意识，激发学员的探索热情和创新潜能。

案例2《武经总要》卷十二记载了水囊的制作和使用方法：“水囊，以猪牛胞盛水。敌若积薪城下，顺风发火，则以囊掷火中。”在古代军事防御中，水囊的投射距离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如风力、投掷角度、水囊的重量和材质等。由于古代缺乏现代的数学和物理理论支持，水囊的投射距离更多地依赖于实际经验和士兵的技巧，而非精确的公式计算。

现在，我们尝试复原水囊投射距离的计算方法。设投射的初速度 v ，投射的角度 α ，水囊密度 ρ_1 ，空气密度 ρ ，重力加速度 g （约为 9.8 m/s^2 ）。水囊投射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斜抛运动，我们现将斜抛运动进行正交分解成竖直上抛运动和水平匀速运动。

竖直上抛的加速度 $a = \frac{g\rho}{\rho_1}$, 则运动时间

$$t = \frac{2v \sin \alpha}{a} = \frac{2v \rho_1 \sin \alpha}{g \rho},$$

则水囊投射距离

$$d = v \cos \alpha \cdot t = \frac{2v^2 \rho_1 \sin 2\alpha}{g \rho},$$

经实验验证, 该公式的计算值与实验值相差很小, 具有很好的拟合效果。

上述案例让学员从实际问题出发, 运用数学知识和方法复原古文中提到的方法原理, 并通过具体实验对模型的拟合效果进行验证。这种勇于探索、敢于创新的精神将激励学员在学习和未来工作中积极思考、勇于创新, 努力解决各种复杂问题。鼓励学员在学习过程中尝试运用数学知识和方法对消防救援中的实际问题进行分析和解决, 培养学员的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

(三) 增强学员的社会责任感和家国情怀

消防救援工作关乎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与社会稳定的维护, 将消防救援中的数学智慧融入课程思政, 能够使学员深刻认识到数学在保障社会安全方面的重要作用, 进而增强学员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在教学过程中, 教师可以通过结合实际案例, 讲述消防人员在救援过程中展现出的无私奉献和英勇无畏的精神, 引导学员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 激发他们对消防事业的尊重和敬意。介绍我国在消防科技领域的自主创新成果以及在国际消防合作中的贡献, 有助于培养学员的民族自豪感和家国情怀, 增强学员的爱国主义情感和社会责任感。在《数学史概论》课程中, 教师可以收集和整理与消防救援相关的数学史案例, 将其有机融入教学内容。教师还可以引入现代消防救援中的数学模型, 包括火灾蔓延预测模型、救援路径规划算法等, 展示数学在解决实际问题中的重要作用, 进一步增强学员的实践能力和创新意识。

五、结论

课程思政作为一种创新的教育理念和实践模式, 旨在将思想政治教育全面融入各类课程教学的各个环节, 实现知识传授与价值塑造的深度融合。其根本目的在于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为消铸盾, 培养学员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提升学员的政治意识和思想道德修养。在新时代的教育背景下, 课程思政不仅是教育教学改革的重要方向, 更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举措。本文聚焦于在《数学史概论》课程中融入思政教育的路径探索, 以消防救援为应用背景, 深入挖掘其中蕴含的数学智慧与育人价值。通过对消防救援中数学知识与方法的系统分析, 详细阐述如何将数学史与思政元素有机融合, 实现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的有机统一。

在《数学史概论》课程教学中, 教师可以通过收集和整理与消防救援相关的数学史案例, 将其有机融入教学内容。本文通过分析古代数学著作中的勾股定理在建筑防火布局中的应用, 以及复原古代军事防御中水囊投射距离的计算方法等案例, 引导学员在学习数学知识的同时, 领略数学在实际应用中的魅力与价值。通过深入探讨消防救援中的数学问题及其解决方法, 可以有效引导学员学习数学家们在探索过程中所展现出的科学精神和创新意识, 激发学员的探索热情和创新潜能。同时, 结合消防救援的实际案例, 讲述消防人员在救援过程中所展现出的无私奉献、英勇无畏的精神品质, 引导学员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 增强学员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总之, 本文通过在《数学史概论》课程中融入思政教育, 为培养具有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素质人才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参考文献:

- [1] 刘锦, 王赛, 王振平. 从“整合”走向“融合”——《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2022年版)》信息技术应用新变化[J]. 数学教育学报, 2025, 34(01): 70-76.
- [2] 穆肃, 陈孝然, 周德青. 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教学设计分析: 需求、方法和发展[J]. 开放教育研究, 2025, 31(01): 61-72.

- [3] 阳吴宝. 信息技术赋能数学项目式学习的实践探索[J]. 上海教育科研, 2025, 1:41-47.
- [4] 胡明永. 数智教学:信息技术与初中数学课程深度融合的形态拓新[J]. 数学通报, 2024, 63(10): 44-49.
- [5] 李红美, 卞鹏, 徐梦秋. 智慧教室环境下数学课堂互动教学双编码分析系统开发与行为模式挖掘[J]. 现代教育技术, 2024, 34(03): 105-115.
- [6] 张燕艳. 现代教育技术赋能高校数学教学高质量发展——评《高校数学教学与模式创新》[J]. 中国油脂, 2023, 48(06): 161.
- [7] 李粉香. 互联网背景下高等数学教学理论与实践——评《互联网+动态数学: 网络画板推进数学教学变革》[J]. 中国科技论文, 2022, 17(03): 363.
- [8] 郑毓信. “数学问题提出”的三种教学形态: 比较与分析[J]. 数学教育学报, 2025, 34(01): 1-5+63.
- [9] 姚敏. 信息技术背景下中职数学教学模式创新——评《中职数学教学改革探索与实践》[J]. 人民长江, 2024, 55(10): 263-264.
- [10] 曹一鸣, 吴景峰. 生成式 AI 赋能数学课堂教学内容选配的探索与研究——以高中数学例习题选配为例[J]. 数学教育学报, 2024, 33(05): 60-66.
- [11] 胡骏, 马倩. 数学启发式教学策略的实践及其效果研究——评《全景式数学教育: 一样的数学, 不一样的教学》[J]. 应用化工, 2023, 52(08): 2505.
- [12] 吴仁芳, 夏世娇, 王碧茹. 数学教学空间的内涵意蕴、特征及架构[J]. 教育理论与实践, 2023, 43(17): 53-57.
- [13] 孟宪康. 基于“互联网+”技术的混合教学模式在高职数学教学中的应用研究——评《信息化背景下高职高等数学教学创新研究与实践》[J]. 中国科技论文, 2023, 18(04): 470.
- [14] 郭二芳. 翻转课堂在高等数学信息化教学中的应用——评《信息化环境中基于翻转课堂的数学教学设计》[J]. 中国科技论文, 2023, 18(03): 361.
- [15] 赵勇. 探索性数学教学实验培养学生创新素质的研究与实践[J]. 实验室研究与探索, 2021, 40(04): 226-230+240.
- [16] 王三华, 屈泳, 阮小军. 基于雨课堂的混合教学模式应用研究——以“数学建模实验”课程为例[J]. 实验室研究与探索, 2020, 39(05): 160-164.
- [17] 龙珠, 陈祥伟, 董波. 工科数学实验教学体系融合思政的研究与探索[J]. 实验室研究与探索, 2023, 42(11): 216-219.
- [18] 孙永红. 高职数学建模和数学实验在教学中的应用——评《数学建模教学与评估指南》[J]. 中国高校科技, 2023, 6: 100.
- [19] 蔡鹤金. 高校数学建模案例化教学实践及应用研究——评《数学建模及其应用》[J]. 材料保护, 2020, 53(11): 184-185.
- [20] 吴鹏, 张娟, 刘嫣然. 新课改下数学建模的教学方法与教学策略研究——评《数学建模》[J]. 林产工业, 2020, 57(11): 119.
- [21] 王利东, 张运杰, 高红. 微分方程教学中强化建模思想的探讨——2016 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题启示[J]. 实验室研究与探索, 2020, 39(10): 181-184.
- [22] 苏茜, 黄亚群, 张怀雄, 等. 依托建模竞赛探索数学实验教学新模式[J]. 云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20, 42(S1): 78-83.
- [23] 李凯, 郭玉峰. 近二十年中国数学师范生教育研究: 演进、热点与展望[J]. 数学教育学报, 2024, 33(06): 61-69.
- [24] 刘兰英. 基于教师职业能力标准的全日制教育硕士生课程体系构建——以学科教学(数学)专业为例[J].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2024, 8: 30-36.
- [25] 李德贺, 张晓. 师范类专业认证背景下地方师范院校高等数学教学改革探索[J]. 教育理论与实践, 2024, 44(12): 50-53.
- [26] 李波, 连颖颖. 师范院校高等数学教学存在的问题与对策[J]. 教育理论与实践, 2024, 44(03): 52-55.
- [27] 赵萍, 尤利华, 刘秀湘. 基于“一生一优课”的教育硕士课程实践教学模式探索[J].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21, 53(04): 121-128.
- [28] 张鹏. 高等数学教学中思政元素的挖掘策略[J]. 教育理论与实践, 2023, 43(18): 48-50.
- [29] 侯方博. 大学数学教学中渗透数学文化的作用与途径——评《多元视角下的数学文化》[J]. 林产工业, 2020, 57(09): 116.

[30] 李文林. 数学史概论(第三版)[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in the Course of the History of Mathematics: Mathematical Wisdom and Educational Value in Fire Rescue

Yu Chengwei¹, He Yongming¹, Wang Hongqing¹, Zhao He¹

¹ *China Fire and Rescue Institute, Beijing 102202,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path of integrat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to the course of the History of Mathematics, using fire rescue as the application background, and exploring the mathematical wisdom and educational value in it.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mathematical knowledge and methods in fire rescue, this article elaborates on how to combine the history of mathematics with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achieve the unity of knowledge imparting and value guidance, and provide reference for cultivating high-quality talents with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novative spirit, and practical ability.

Keywords: History of Mathematics; Course ideology and politics; Fire rescue; Educational value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2.621

以“格林公式”教学为案例的思政元素挖掘探讨

何永明¹ 于晟伟^{1,*} 王洪庆¹ 王亚男¹ 汪雁¹

(¹中国消防救援学院, 北京 102202)

摘要: 高等数学不仅是理工科学生必备的基础知识, 也是跨学科研究的重要工具, 无论是物理、化学、工程学还是经济学都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旨在培养学员严谨的逻辑思维能力, 并为学习其它课程奠定理论基础, 在消防救援人才培养中占据重要地位。以“格林公式”教学案例为基础, 分别从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思想、刻苦钻研的学术精神、严谨细致的规矩纪律意识、赴汤蹈火为消铸盾的奉献精神等方面充分挖掘思政元素, 紧扣育人目标开展课堂教学, 并为其它基础课程的课程思政教学提供参考。

关键词: 格林公式; 课程思政; 曲线积分; 二重积分; 消防救援

一、引言

课程思政这一概念最早由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于2014年提出并在上海本地高校进行试验, 最终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的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座谈会中明确提出, “其他各门课都要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 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 形成协同效应, 从而要‘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 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 努力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详见文献^[1])。教育部2020年《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明确指出, 要把思想政治教育贯穿于人才培养体系, 全面推进高校课程思政建设, 发挥好每门课程的育人作用, 提高高校人才培养质量(详见文献^[2])。

通过研究与数学有关的部分课程思政参考文献, 发现从事数学教育研究的同行做了大量的工作, 取得了不少数学课程思政方面的教学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是以数学中的个别知识点作为课程思政融入点, 详细介绍课程思政的融入方法。蒋艳等^[3]以定积分的概念、可分离变量微分方程应用为例, 探讨了高等数学与思政教学的有机融合。张亚苗等^[4]以“重积分的几何应用”为例, 介绍了如何在高等数学课程教学中融入思政教育, 并给出了具体的教学分析和教学过程。田进凤^[5]以定积分的概念为例, 剖析了定积分概念中蕴含的思政元素, 并给出了在定积分的概念教学中如何实施课程思政的具体过程。第二种是从理论上进行理解和分析, 将育人目标融入数学教育中, 利用特定方法对思政元素进行分析。张雪婷^[6]以高等数学中的“极限”教学为例, 从坚定融入理念、探索融入途径、创新融入方式、拓展融入渠道、完善融入体系五个方面, 探索如何开展好高职高等数学课程思政教学。朱聿铭^[7]从高等数学教学与课程思政协同发展的必要性入手, 确定工科高等数学教学与课程思政融合目标, 拓展融合实践策略。蔡鸣晶^[8]从课程思政的内涵、融入策略及设计与实施路径等方面, 阐述对高职公共基础课课程思政的设计与实施的认识和感悟。第三种是根据教学内容精心挖掘, 提炼出可供深度融合的思政元素。庄科俊^[9]以“条件极值”典型教学案例入手, 挖掘蕴含其中的课程思政元素。

[作者简介]

- [1] 何永明 (1978—), 男, 江西南昌人, 中国消防救援学院副教授。
- [2] 于晟伟 (1995—), 男, 吉林长春人, 中国消防救援学院讲师,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博士研究生。
- [3] 王洪庆 (1977—), 男, 黑龙江双鸭山人, 中国消防救援学院副教授。
- [4] 王亚男 (1986—), 女, 河北燕郊人, 中国消防救援学院副教授。
- [5] 汪雁 (1982—), 男, 云南曲靖人, 中国消防救援学院副教授。

现有的参考文献里, 课程思政在高等数学教学中涉及面越来越多, 只是考虑到高等数学 12 章内容知识面较广、授课课时较多, 现有的课程思政研究内容和教学设计数量难以满足需求, 有些重点内容并没有覆盖, 因此需要同行们更多地研究思政融入问题, 比如高等数学课程比较重要的几个公式格林公式、斯托克斯公式、高斯公式等, 不仅在理论上有重要地位, 还在实际应用中有着广泛的应用, 在课程思政融入上需要创意新颖的教学设计思路。

课程思政建设全面深入实施, 要紧紧抓住教师队伍“主力军”, 课程建设“主战场”, 课堂教学“主渠道”, 合理选取、恰当融入, 以“盐融于水”“春风化雨”形式应用于课堂教学。高等数学不仅是理工科学生必备的基础知识, 也是跨学科研究的重要工具, 无论是物理、化学、工程学还是经济学都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格林公式是多元微积分学中的一个基本公式, 是高等数学中一个至关重要的知识点和难点, 在理论上和实用上都有重要作用。本文以“格林公式”内容为例, 针对选定教材中提取的教学案例, 充分挖掘蕴含的课程思政元素, 以作同行参考。

二、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思想

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哲学理论, 数学规律同样蕴含着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思想。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 包含对立统一的规律, 相互联系、相互转化, 推动社会向前发展(详见文献[10])。现以数学逻辑思维和基础理论为依据, 培养塑造学员利用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思想从正反两个方面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在学习知识的同时改造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案例 1 (文献[11]中第 175 页) 把曲线积分转化为二重积分的问题。计算曲线积分

$$I := \oint_L (2xy - x^2)dx + (x + y^2)dy$$

其中 L 是由抛物线 $y=x^2$ 和 $y^2=x$ 所围成的区域的正向边界曲线。该题可利用格林公式, 设

$$P = 2xy - x^2, Q = x + y^2, \frac{\partial P}{\partial y} = 2x, \frac{\partial Q}{\partial x} = 1$$

则

$$I = \iint_D \left(\frac{\partial Q}{\partial x} - \frac{\partial P}{\partial y} \right) dx dy = \iint_D (1 - 2x) dx dy = \int_0^1 (1 - 2x) dx \int_{x^2}^{\sqrt{x}} dy = \int_0^1 (1 - 2x)(\sqrt{x} - x^2) dx = \frac{1}{30}$$

其实该题也可以直接利用曲线积分的计算方法, 记 $L1: y=x^2$, x 从 0 变到 1; $L2: x=y^2$, y 从 1 变到 0; 所以

$$\begin{aligned} I &= \int_{L_1} (2xy - x^2) dx + (x + y^2) dy + \int_{L_2} (2xy - x^2) dx + (x + y^2) dy \\ &= \int_0^1 [(2x^3 - x^2) + 2x(x + x^4)] dx + \int_1^0 [2y(2y^3 - y^4) + (y^2 + y^2)] dy \\ &= \int_0^1 (2x^5 + 2x^3 + x^2) dx + \int_1^0 (-2y^5 + 4y^4 + 2y^2) dy = \frac{7}{6} - \frac{17}{15} = \frac{1}{30} \end{aligned}$$

由此可见

$$\oint_L P dx + Q dy = \iint_D \left(\frac{\partial Q}{\partial x} - \frac{\partial P}{\partial y} \right) dx dy$$

案例 2 (文献[12]中第 199 页) 利用二重积分转化为曲线积分的问题。计算二重积分

$$\iint_D e^{-y^2} dx dy$$

其中 D 是由三个顶点 $O(0,0)$, $A(1,1)$, $B(0,1)$ 所围成的三角形区域。

该题可令

$$P = 0, Q = xe^{-y^2}$$

所以

$$\frac{\partial Q}{\partial x} - \frac{\partial P}{\partial y} = e^{-y^2}$$

再利用格林公式，得

$$\iint_D e^{-y^2} dx dy = \oint_D xe^{-y^2} dy = \int_{OA} xe^{-y^2} dy = \int_0^1 ye^{-y^2} dy = \frac{1}{2}(1 - e^{-1})$$

通过以上两个教学案例，曲线积分与二重积分可以相互转化，反映出事物之间并不是孤立存在的，体现了事物发展的对立统一、普遍联系的规律，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引导学员用联系的观点看待问题，对同一问题可以从不同角度、不同方位换位思考，开创性解决问题，正确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相互关系。特别是要利用该规律深刻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精髓要义，运用正反两个方面解决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启示学员用系统性、综合性、关联性的角度看待问题，有助于全面准确地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提高解决问题的效率和质量。同样地，教师也要用发展的观点审视学员，通过调动学员学习兴趣、帮助学员在学习中形成正确的方法和习惯，逐步提高获取数学知识的能力，从而改善学员的学习效果。在现实课堂上，广大教师可以选取相似的案例讲解，利用不同的曲线积分和二重积分的例题代替以上题目。

三、刻苦钻研的学术精神

刻苦钻研是科学家们在追求学术真理的过程中展现出的高贵精神，是习近平总书记对黄大年同志先进事迹重要指示精神中“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所蕴含的优秀品质，也是我们广大教师潜移默化传导给学员的求学技能。

案例 3 格林公式揭示曲线积分与二重积分的关系。就像高斯公式表达了空间闭区域上的三重积分与其边界曲面上的曲面积分之间的关系、斯托克斯公式把曲面 Σ 上的曲面积分与沿着 Σ 的边界曲线上的曲线积分联系起来一样，格林公式表达了平面闭区域上的二重积分与其边界曲线上的曲线积分之间的关系。格林公式的发现背景与电磁学的研究密切相关。在乔治·格林生活的时代，电磁学蓬勃发展，为研究通电线圈在磁场中受到的磁力作用，需要计算磁力场对该线圈的做功，这涉及到对坐标的曲线积分（详见文献[13]）。考虑到计算复杂，格林公式的提出为这类积分的计算提供了简便的方法。格林公式不仅在数学上具有重要意义，还在物理学中有着广泛的应用。它帮助物理学家们更有效地计算电磁场中的一些问题，推动了电磁学的发展。

通过格林公式产生的背景，让学员对格林公式产生浓厚的兴趣，简要介绍格林的大致情况，格林是一位英国数学家，属于大器晚成，40岁才入剑桥大学本科生，44岁大学毕业后在凯斯学院任教，4年后去世（详见文献[13]）。格林用短暂的生命为世界贡献了宝贵知识财富，离不开他刻苦钻研、厚积薄发的学术精神，引导教育学员努力学习、勤于思考、善于积累，孜孜不倦地追求学术真理，勇攀科学高峰。

案例 4（文献[11]中第 179 页）平面曲线积分与路径无关的问题。证明曲线积分

$$I := \int_{(1,2)}^{(3,4)} (6xy^2 - y^3) dx + (6x^2y - 3xy^2) dy$$

在整个 xoy 面内与路径无关，并计算积分值。

该题中可令函数 $P = 6xy^2 - y^3$, $Q = 6x^2y - 3xy^2$ 在 xoy 面这个单连通区域内具有一阶连续偏导数，并且

$$\frac{\partial Q}{\partial x} = 12xy - 3y^2 = \frac{\partial P}{\partial y}$$

因曲线积分在 xoy 面内与路径无关，取折线积分路径 MRN，其中 M(1,2), R(3,2), N(3,4)，则有

$$I = \int_1^3 (24x - 8) dx + \int_2^4 (54y - 9y^2) dy = 80 + 156 = 236$$

该题通过在一定情况下平面曲线积分与路径无关，把积分路径转化为简单路径，从而巧妙地解决计算问题。引发学员好奇心，引导学员掌握扎实的数学基本功，为探索数学奥秘奠定坚实基础。教育学员通过刻苦钻研和勤奋思考，培养强烈的学术意识和探索精神，提高用数学模型解决实际问题的兴趣，感知数

学的基本思维方式和解题技巧，让学员自我展示、自我鼓励、体验成功，在不断尝试中激发求知欲，感受数学之美。

四、严谨细致的规矩纪律意识

当前，全党正在开展党纪学习教育，其目的就是要强化纪律和规矩意识。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数学亦是如此。在学习数学的过程中，学员们不仅仅是为了学习知识，更重要的是学会用数学预设条件，采用数学的思维方式去分析、解决客观实际问题。

案例 5 单连通区域与复连通区域划分问题。设 D 为平面区域，如果 D 内任一闭曲线所围的部分都属于 D ，则称 D 为平面单连通区域，否则称为复连通区域（详见文献[12]第 196 页）。首先让学员对格林公式的适用范围有清楚的交代，引导学员把规矩纪律放在个人成长、团结协作、社会秩序以及个人品德塑造过程中的重要位置，把规矩纪律作为人生的指南与底线，作为人生的基础，作为交往的准则，作为修身养性的关键。懂得规矩，守住规矩，才能守住人生的方向。

案例 6 逆时针方向与顺时针方向的规定。我们把单连通区域的边界曲线的逆时针方向规定为正向；把复连通区域的边界曲线中外面的闭曲线逆时针方向规定为正向，内部的闭曲线顺时针方向规定为正向（详见文献[12]第 196 页）。格林公式的学习要求学员具备严格的规矩纪律意识、严谨的数学思维。规矩是社会运行的基础，也是做人的基本准则。只有遵守规矩，我们才能与他人和谐相处，共同构建一个良好的社会秩序。守规矩就会对自然怀有敬畏之心，做人做事都必须遵循一定的规则和秩序。

五、赴汤蹈火为消铸盾的奉献精神

2018 年 11 月 9 日，习近平向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授旗并致训词，代表党中央向全体消防救援人员致以热烈的祝贺并强调，组建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是立足我国国情和灾害事故特点、构建新时代国家应急救援体系的重要举措，对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维护社会公共安全、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具有重大意义（详见文献[14]）。通过学好数学基础学科，培养学员严密逻辑思维能力，教育引导学员树立为国家消防救援事业无私奉献的精神品质。

案例 7 求森林火灾中过火面积问题。设某次森林发生火灾，过火区域呈 n 边形形状，经过无人机的精确测量，该 n 边形的 n 个顶点坐标按逆时针方向依次为 $M_1(x_1, y_1), M_2(x_2, y_2), \dots, M_n(x_n, y_n)$ ，试计算此次林火的过火面积。

该题中 n 边形的正向边界 L 由有向线段 $M_1M_2, M_2M_3, \dots, M_{n-1}M_n, M_nM_1$ 组成，有向线段 M_1M_2 的参数方程为 $x=x_1+(x_2-x_1)t, y=y_1+(y_2-y_1)t, t$ 从 0 变到 1（曲线积分的换元法，以文献[15-17]为例），所以

按相同的方法可得：

$$\begin{aligned} \int_{M_1M_2} xdy - ydx &= \int_0^1 [x_1 + (x_2 - x_1)t](y_2 - y_1)dt - \int_0^1 [y_1 + (y_2 - y_1)t](x_2 - x_1)dt \\ &= \int_0^1 [x_1(y_2 - y_1) - y_1(x_2 - x_1)]dt = \int_0^1 (x_1y_2 - x_2y_1)dt = x_1y_2 - x_2y_1 \end{aligned}$$

所以，此 n 边形的面积 A 为

$$\begin{aligned} A &= \frac{1}{2} \left(\int_{M_1M_2} + \int_{M_2M_3} + \dots + \int_{M_{n-1}M_n} + \int_{M_nM_1} \right) (xdy - ydx) \\ &= \frac{1}{2} \left[(x_1y_2 - x_2y_1) + (x_2y_3 - x_3y_2) + \dots + (x_{n-1}y_n - x_ny_{n-1}) + (x_ny_1 - x_1y_n) \right] \end{aligned}$$

案例 8 求林火隔离带保护面积问题。在森林灭火战术中常常采用人为设置易燃植被隔离带用以保护重要区域。某次森林发生火灾，通过消防员点烧的方式，人为制造出一条封闭的隔离带用以保护重要设施，该隔离带方程为 $x=2\cos 3t, y=2\sin 3t$ （单位：km），试计算该隔离带所保护区域的面积。

设该题中隔离带正向的参数方程中的参数 t 从 0 变到 2π , 所以

$$\begin{aligned}
 A &= \frac{1}{2} \int_L x dy - y dx = \frac{1}{2} \int_0^{2\pi} 2 \cos^3 t (6 \sin^2 t \cos t) dt - \frac{1}{2} \int_0^{2\pi} 2 \sin^3 t (6 \cos^2 t) (-\sin t) dt \\
 &= 6 \int_0^{2\pi} (\cos^4 t \sin^2 t + \sin^4 t \cos^2 t) dt = 6 \int_0^{2\pi} \sin^2 t \cos^2 t dt \\
 &= 6 \int_0^{2\pi} \frac{1}{8} (1 - \cos 4t) dt = \frac{3}{2} \pi \approx 4.71 km^2
 \end{aligned}$$

森林火灾扑救是对森林火灾采取的控制和扑灭措施, 目的是使火灾造成的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 消防安全对于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稳定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详见文献[18])。在格林公式学习过程中, 可安排学员观看消防员现场灭火的视频, 以此作为切入点感受森林火灾的巨大危害, 引导学员进行思考如何构建灭火隔离带, 如何计算过火面积, 把学习格林公式与消防救援联系起来, 紧贴学员岗位履职实际。本案例将森林火灾扑救中的问题与格林公式求解有机结合, 让学员了解消防救援行业现状, 培养消防救援职业认同感和自豪感, 激发学员的爱岗敬业热情, 并意识到胜任岗位要靠知识支撑, 只有脚踏实地、认真学习, 才能在需要的时候转化为不竭动力, 从而立志为消防救援事业不懈奋斗。

六、结论

课程思政就是指在日常教学过程中融入思政元素, 其目的就是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为消铸盾, 培养学员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提升学员的政治意识和思想道德修养。本文以高等数学课程中的“格林公式”教学案例为基础, 分别从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思想、刻苦钻研的学术精神、严谨细致的规矩纪律意识、赴汤蹈火为消铸盾的奉献精神等角度充分挖掘育人思政元素, 紧贴消防救援岗位实际, 使学员提高学习数学的兴趣, 让教师在教学中更好地履行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为学科、基础课程的课程思政案例式教学提供参考和借鉴。

参考文献:

- [1] 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 12 月 7 日至 8 日在北京召[N]. 北京: 新华社, 2016.
- [2] 教育部关于印发《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的通知[N]. 北京, 2020.
- [3] 蒋艳, 钟艳, 黄爱武. 高等数学课程思政案例教学探讨[J]. 科教文汇, 2021(9): 87-89.
- [4] 张亚苗, 潘芳芳, 刘健. 《高等数学》融入课程思政的教学设计[J]. 产业与科技论坛, 2024, 18(23): 182-184.
- [5] 田进凤. 高等数学教学中课程思政的教学实施-以“定积分的概念”为例[J]. 高等数学研究, 2022, 25(6): 87-90.
- [6] 张雪婷. 探索高职高等数学课程思政教学-以“极限”教学为例[J]. 铜陵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22, 21(2): 25-28.
- [7] 朱聿铭. 工科高等数学教学与课程思政深度融合实践研究[J]. 佳木斯职业学院学报, 2022, 38(5): 136-138.
- [8] 蔡鸣晶. 融入课程思政的信息化教学设计-以“无穷限反常积分”为例[J]. 教育教学论坛, 2021, 8(31): 181-184.
- [9] 庄科俊. “条件极值”典型案例的课程思政元素挖掘[J]. 绵阳师范学院学报, 2025, 44(2): 25-31.
- [10] 王锐生, 薛文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M]. 高等教育出版社.
- [11] 同济大学数学科学学院. 高等数学习题全解指导(下册)第八版[M]. 1 版.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3.
- [12] 同济大学数学科学学院. 高等数学第八版(下册) [M]. 8 版.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3.
- [13] Cannell D. M. 《George Green: Mathematician and Physicist 1793–1841: The Background to His Life and Work》[M], SIAM (Society for Industrial and Applied Mathematics), ISBN: 978-0-89871-462-9.
- [14] 新华网《永远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习近平为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授旗并致训词侧记》[N]. 2018.
- [15] 宁荣健, 彭凯军. 曲线积分的换元法[J]. 大学数学, 2016, 32(04): 62-67.
- [16] 詹华税. 关于曲线和曲面积分的换元法[J]. 厦门理工学院学报, 2020, 28(05): 89-92.
- [17] 宁荣健, 周江涛. 曲面积分的换元法[J]. 大学数学, 2017, 33(02): 73-78.

[18] 《森林防火条例》(国务院令第 541 号) [M]. 2008.

Exploration into the Explor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Using the Teaching of “Green’s Formula” as a Case Study

He Yongming¹, Yu Chengwei¹, Wang Hongqing¹, Wang Yanan¹, Wang Yang¹

¹ China Fire and Rescue Institute, Beijing 102202, China

Abstract: Advanced mathematics is not only an essential foundational knowledge for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students, but also an important tool for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Whether it is physics, chemistry, engineering, or economics, it is an indispensable part, aiming to cultivate students' rigorous logical thinking ability and lay a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learning other courses. I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cultivation of firefighting and rescue talents. Based on the teaching case of “Green’s Formula”, we fully explor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philosophy, diligent academic spirit, rigorous and meticulous discipline consciousness, and the spirit of dedication to serving as a shield against adversity. We closely adhere to the goal of educating students and carry out classroom teaching, providing reference f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in other basic courses.

Keywords: Green’s formula; Course ideology and politics; Curve integration; Double integral; Fire rescue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2.634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Differences of Advertising Ethic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Cross-cultural Contexts

Leiya Tian¹

¹ Lanzhou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Lanzhou, Gansu Province, China

Abstract: Due to th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history, culture and law,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advertising ethics expression, as well as the standards and principles for ethical misconduct in advertising, vary among different countries or regions. As two typical representative countries in the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advertising cultures, the differences in advertising ethic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have certain research value for the current practice of cross-border advertising dissemination. The research focuses on representative advertising works that can showcase the cultural background differences or present the ethical tendencies of the two countries.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contemporary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it conduct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cultural and ethical manifestations of advertising in the two countries. The research specifically combines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cultural patterns divided by Hofstede, using positive or negative cases of Chinese and American advertisements to explore the issues of advertising ethics expression and ethical misconduct i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Based on the cultural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t proposes normative strategies for addressing advertising ethics issues in the two countries.

Keywords: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cultural differences, advertising ethics, Chinese and American cultures

1. Introduction

The term "ethics" generally refers to the cultural and moral frameworks agreed upon in a society, which can both provide positive moral guidance and norms for a cultural activity, as well as provide a certain degree of constraint on moral misconduct^[1]. Advertising ethics i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generally refers to the sum of social norms, moral standards and behavioural norms that need to be strictly followed in the dissemination of advertising works i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 economic integration, international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frequent. Due to the influence of cultural differences, the situation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integration will inevitably bring about the contradiction and conflict of ethical values. Advertising is an important research field of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globalised Internet media has also greatly promoted the diversity of cross-border advertising communication channels and cultural expressions. As a product of commercial capital operation, multinational brand advertisements, on the one hand, as products in the spiritual field, carry a certain cultural background and national

¹ Leiya Tian (1999-), Lanzhou, Gansu, is a postgraduate student at the School of Business and Media, Lanzhou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values; on the other hand, they also need to reasonably disseminate the brand's inherent cultural values on the basis of catering to the ethical backgrounds and aesthetic concepts of other countries.

2. Background and reasons for the selection of the topic

Since China's accession to the WTO, there have been many cases of crisis public relations caused by improper localised communication of multinational brands in China: Dolce & Gabbana suffered great public pressure and brand blockade because of its blasphemy and insult to Chinese culture and tradition; Toyota's "domineering" advertisement of the Shishi in the Chinese market (Fig. 1) violated the politically sensitive topic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and Nike's "Scary Room" advertisement (Fig. 2) was controversial because of its blasphemy of Chinese national culture and customs. Nike's "Room of Horrors" advertisement (Fig. 2) is controversial because of its blasphemy against Chinese culture and customs. Therefore,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re-examining the localised marketing and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of multinational brands, and identifying the differences in the ethical expressions of advertisements in different cultures and the internal causes of cultural conflicts, will have a positive effect on the practice of globalised communication of multinational advertisements.

As two typical countries in terms of cultural orientation and ethical values,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can, to a certain extent, fully represent the East and West cultures and reflect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East and West cultures. The advertising ethics of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not only carry the connotat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but also are an important consideration for the localisation and internationalisation of international brands. In this paper, we will explore the differences in advertising ethic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deep-rooted causes of advertising ethical misconduct i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rough the literature research method and in the context of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taking the cultural background of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s the perspective. Finally, we will analyse the normative countermeasures of advertising ethics based on the differences of the two countries' national conditions.

Figure 1:



Figure 2:



3.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American cultural backgrounds and the ethical performance of advertising

The causes of the differences i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and American advertisements include various factors, such as the differences in the degre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legal norm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and the different values and ways of thinking formed by different cultural backgrounds. The degre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will affect the development and content of advertising culture, and the differences in cultural background will also affect the formulation of legal provisions.

As far as law is concerned, the world is divided into two systems: the law of the sea system, represented by the United Kingdom and the United States, which respects unwritten customary law, and the civil law system, represented by China. The law of the sea system respects the unwritten customary law, giving rise to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s self-regulation-led advertising regulatory system,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s advertising ethical regulatory framework is slightly lax, the content and form of advertisements are more diversified; while China belongs to the civil law system, giving rise to the "government-led" advertising regulatory system, the advertising ethical framework is more strict^[2], and the restrictions are more stringent^[2]. China, on the other hand, belongs to the civil law system, which has given rise to a "government-led" advertising regulatory system and a more restrictive framework for advertising ethics^[2].

As far as culture is concerned, Hofstede, a Dutch intercultural scholar, has proposed five dimensions of cultural patterns, including individualism, collectivism, uncertainty avoidance, power distance, feminism, masculinity, and short-term and long-term orientation. In this section, the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 between Chinese and American cultural values and ethics will be analysed through the first three more representative cultural dimensions^[3].

3.1 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

The individualistic culture led by the United States places more emphasis on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individual and more emphasis on the value of the individual. In the process of consumption, Americans are more inclined to rationalist way of thinking. The classic advertisements reflecting the American individualistic cultural orientation are as follows.

- (1) An American brand of wine copy: a man's taste is determined by his use of the product - trust in personal judgement, emphasis on personal rationality.
- (2) 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Recruiting Service's text: The Army of One (Becoming an All-Rounder) - emphasises the realisation of self-worth rather than dedication to the collective and the nation, and caters to the emotional element of heroism and the promotion of individual strength and courage in the United States culture. This is very different from the Chinese emotional motivation to join the army "to serve the motherland".
- (3) Ford car copy: not the same company, not the same car - individual differences, personality claims.
- (4) In 2017, in the United States Dior new perfume *The New Eau de Parfum* advertising film: incarnation of Miss Dior Natalie Portman in the exuberant enthusiasm, romantic and sexy - to show women's self-independence and personality liberation style.

The collectivist culture represented by China, on the other hand, places greater emphasis on the concept of shared benefits for the group, and Confucian morality and ethics have been rooted in the hearts and minds of the people for thousands of years. The integrity of China's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has given rise to the traditional ideas of harmony and unity, emphasis on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and the importance of the family. The concepts of "loyalty, forgiveness and moderation (忠恕中庸)" advocated by Confucianism, "unity of heaven and mankind (天人合一)" by Taoism, and "doing good to others" by Buddhism are all essentially stressing the importance of social harmony and harmony. The concepts of "loyalty, forgiveness and moderation" advocated by Confucianism, "unity of heaven and mankind" by Taoism, and "harmony with others" by Buddhism are all essentially individual attitudes that emphasise harmonious coexistence and a collective approach to survival among all members of society. Therefore, traditional concepts such as patriotism, filial piety, thrift and frugality, and reverence for tradition, which emphasise the maintenance of blood and geographic ties, are widely recognised by the Chinese people and expressed in Chinese cultural works. The following are typical examples of Chinese cultural advertisements.

- (1) Meiling refrigerator advertising slogan: Chinese life - fully embodies the collectivist tendency of the culture, the people of the country's love and support for the country, as well as the support of domestic products of the mentality.
- (2) Coconut Island Turtle and Deer Wine video advert: It tells the story of two old chess players who argue about who is more filial to their children, and in the end, they find out that their children have bought the same kind of wine in order to pay tribute to them - reflecting the cultural tradition of filial piety of the Chinese people.
- (3) mobile communications Shenzhou card advertising slogan: from now on, please inform and drive everyone around you, the correct use of home appliances, cut off the power supply in a timely manner - reflecting the Chinese people to promote the concept of thrifty consumption.

(4) Zhangyu Wine: Legendary Quality, Hundred Years of Zhangyu - implying that Zhangyu wine aging experience of a long time precipitation, catering to the people of the country on the long history and cultural traditions of the revered psychology.

However,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new media advertisements, the interactive and virtual features of online media have made a certain impact on the long cultural tradition and collective way of thinking in China. The values of Internet users tend to be individualised and diversified, and the original collectivism-based ethical model is gradually replaced by individuality liberation and sense of autonomy ^[4]. American professor Negroponte said: "The digital age is the advent of the true age of the individual". In the face of such an inevitable development trend, China needs to keep exploring new ethical and cultural identities to enhance its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3.2 Uncertainty avoidance

Uncertainty avoidance describes the degree to which people in a culture feel uneasy about unpredictability in the face of the apparent certainty of what they perceive. People in cultures with high uncertainty avoidance feel threatened by, and prevent, ambiguous and unpredictable situations, whereas people in cultures with low uncertainty avoidance generally have a greater sense of security, and are more likely to favour relaxed attitudes to life and to encourage a positive approach to challenges. Countries and societies with higher levels of uncertainty aversion tend to be accompanied by clear legal norms, such as China and Japan, while countries with lower levels of uncertainty aversion have a greater appreciation for individual initiative and a stronger sense of innovation.

China believes in absolute truth and authority, and Chinese advertisements usually confirm the practical value of a product by listing the honours it has received, its quality and commercial reputation. For example, the advertisements of Xiaoban Tea, which was listed on the market in 2014, explicitly state that the tea is of a prestigious category, and that the quality of the tea is guaranteed by professional tea masters in the industry, and so on, to express the authority of the product. The level of uncertainty avoidance in China is controversial in the cultural field. On the one hand, under 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history and tradition, Chinese people are accustomed to "learning from the past and knowing the new", emphasising cultural inheritance rather than innovative thinking, but on the other hand, Chinese culture does not show a strong resistance to new and unquantifiable things ^[5]. On the other hand, Chinese culture does not show strong resistance to new and unquantifiable things ^[5]. On the whole, however, China still favours a culture of low uncertainty, as can be argued from the following two perspectives.

First of all, Chinese people are good at divergent thinking and implicit expression, which, to a certain extent, has given rise to the Chinese thinking orientation of "emotion first" ^[6]. For example, the packaging copy of the domestic liquor brand "Jiang Xiaobai" reads: "May I pour wine back to you after ten years, and may we still be old friends after ten years", "Don't go around proclaiming your heart, because you are not the only one who has a story!", "Accompany you to walk the furthest road, is my deepest set", etc., has become a classic case in the Chinese advertising industry. The success of the brand's advertising copy is that it tells the stories that people have hidden in their hearts, bringing people closer to each other, and catering to China's emotional concept of the supremacy of human feelings.

Secondly, compared with the United States, China's level of commod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still to be improved, th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of some of China's domestic product quality is insufficient, the belief in a high degree of uncertainty, the Jedi authority and promote the quality of the product advertisement is difficult to compete with the same type of international authoritative brands, and China's advertisement is gradually converging to a low degree of uncertainty in the direction of the creative appeals, emotional needs, and experiential marketing. Although it is difficult to quantify the actual marketing effect of emotional appeal advertisements on the audience, this path is an important means for Chinese brands to improve their soft competitiveness. As far as Chinese national car brands are concerned, in th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of fierce brand competition, traditional hard promotional methods cannot meet the strategic needs of national car brands. For example, Ruilin G5 takes the sporty sedan as the core positioning point of the brand, and calls itself the "King of the track", but the engine power of the modified car is limited, and the market positioning strategy has certain limitations. Chery Automobile combines consumers' emotional and rational demands, and makes a video advertisement with the theme of "Chery

Automobile, thanks for having you all the way", which puts the hard work and hopeful feelings of young people's entrepreneurial road into the sports car that witnesses their struggles all the way to a "soft-selling" promotion to motivate consumers. The "soft-sell" promotion motivates consumers to buy the car.

In American culture, where uncertainty avoidance is significantly lower, people are more able to think outside the box and are willing to break with authority and stereotypes. American advertisements like to be different, and more creative and dramatic tension. 18 years Burger King Halloween video advertisement, a group of people were invited to the Alexandria Hotel, after the psychic will invite other ghosts into his body, so that the ghosts will taste Burger King for Halloween launched a limited edition of white bread burgers. The whole advert has a spooky atmosphere, and despite the negative effects that may be brought about by consumers' resistance to scary adverts, it boldly experiments with horror themes and spooky video presentation styles. Adverts involving the supernatural are not allowed to appear in the Chinese market.

3.3 Power distance (power range)

The power distance of a culture refers to the difference in power distance between members of a society, and this indicator can be regarded as a derivative concept of the difference between 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 Althoug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quality and interactivity in social communication in the new media era can reduce the power distance of a society to a certain extent, in the long run, the Internet media also aggravate the degree of "digital divide", and the technological barriers and the differences in the media literacy of the members of the society expand the power distance of the members of the society in accessing the media and acquiring knowledge, therefore, the power distance of the society in the new media era is shrinking or expanding. In the long run, however, the Internet media have also intensified the degree of "digital divide", and technological barriers and differences in media literacy among members of society have widened the distance between members of society in terms of access to media, knowledge, and so forth.

As far 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and American cultural works are concerned, we can conclude that the social power distance is higher in China, which is represented by the collectivist culture, and lower in the United States, which is represented by the individualist culture. The use of the image of the current national leaders in Chinese and American advertisements and the support of the rights holders in the advertisements can prove the above conclusion: due to the legal regulations and cultural restrictions, the image of the Chinese leaders is never allowed to appear in Chinese advertisements; however, the advertisem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have the right to use the image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country in power, and it even becomes a laughing stock in the advertisem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Apple computer advertisement "*what is on your power book*", former United States Democratic President Bill Clinton looks at the screen of his Apple computer with an extremely unnatural expression. The screen shows an Elvis Presley film, Barbie dolls, and jokes about members of Congress. In the American animated film "*Minions*", Queen Elizabeth II is portrayed in a comical and exaggerated manner. The former US President and the Queen of England are both symbols of power, but American advertisements and films are able to use their images freely, which also reflects the low level of power distance in American culture. American Marlboro cigarettes have set the tone of the brand with the image of western cowboys. However, in the brand's Hong Kong advert, the main character, the rancher, looks down on the cowboys as they drive the horses up the hill, potentially championing the rancher's position of power, which is in line with Chinese cultural values. In addition, Chinese advertisements like to use the image of ancient emperors, which itself is a symbol of high power distance in Chinese feudal society. In the Nine Muses sanitary ware advertisement, Zhang Tielin plays the role of the emperor who finally chooses to use Nine Muses sanitary ware products, symbolising the brand's noble and luxurious temperament, which greatly attracts the attention of Chinese consumers.

4. The Causes of the Problem of Ethical Misconduct in Advertising i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Strategies for Responding to the Problem

As a social and cultural phenomenon, advertising has the responsibility to pay attention to social benefits and avoid ethical and moral misconduct in advertisements. The ethical misconduct of advertising i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cludes not only the problem of ethical and moral contents of advertisements, but also the problem of conflict caused by the misinterpretation and uselessness of other cultures in transnational advertisements.

4.1 The problem of ethical and moral failures in advertising i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Tencent Chairman Ma Huateng said in an interview that he would join forces with security guard 360 to compete with Baidu and prepare for the impact of Baidu's medical adverts. Baidu's infomercials contain a lot of false information, which is a huge potential health hazard for Chinese people in the long run. This is also a reflection of China's lack of regulation of Internet advertising, especially infomercials, and the lack of ethical standards for advertising in China. On the one hand, due to the development of productive forces and social reforms, China's modern advertising started late, and many advertising theories are directly translated from foreign literature, and China's advertising industry has not yet formed an imperfect system, although there is also the China Advertising Association (CAA), which is a mechanism to regulate the content of Chinese advertisements, due to the policy environment, the CAA has not yet formed a mechanism to regulate the content of Chinese advertisements. Although China also has the "China Advertising Association" as a mechanism to regulate the content of Chinese advertisements, due to the policy environment and other problems, the actual power and supervision of the China Advertising Association needs to be improved^[8]; on the other hand, the legal regulatory framework of Chinese advertisements as well as the internal censorship mechanism of the media need to be further improved compared with the United States, where the modern advertisement has an earlier start. Against this background, Chinese advertisements are plagued with ethical problems such as false information, over-exaggeration, emotional abuse, and the use of inappropriate advertising methods to attract attention^[9].

Since 2009, research on advertising ethics has been gradually added to the agenda of American academic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re are also advertising ethical problems such as false medical advertisements on the Internet, the abuse of junk food in advertisements, the distortion of money values due to the symbolisation of consumerism in advertisements, and gold-digging, etc.^[10]. In this regard, under the dynamic environment of information explosion and rapid information updating.

- (1) The advertising industry should continue to improve the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 and clarify the scope of authority and responsibility of the government and advertising regulatory bodies.
- (2) Media organisations should comprehensively monitor ethical misconduct in online advertising through the development of big data, cloud comput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other technological means, and their staff should strengthen education on advertising ethics.
- (3) The audience of adverts should be constantly aware of reporting.

4.2 Ethical Misinterpretation in Chinese and American Transnational Advertising

For example, Americans regard China's Forbidden City as a place of business that can provide leisure and entertainment services, but in the eyes of the Chinese, the Forbidden City is a sacred and inviolable symbo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For multinational brand advertisements, respecting the differences in the ethical culture of other countries is an important prerequisite for the localisation and internationalisation of the brand.

In April 2019, an advert released by Burger King in the Chinese market featured a comical image of several customers pinching burgers with giant chopsticks, which was questioned in China for racial discrimination. This is another advert fiasco promoted by a multinational brand in China following Dolce & Gabbana's insult to China. No matter whether Burger King's applic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was unintentionally misinterpreted, or whether it was due to its resistance to Chinese culture under cultural hegemony, the essence of this incident is that multinational advertisements are abusing Chinese culture and ignoring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American culture and ethics.

Therefore, multinational brand advertisements in the field of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should follow the following requirements. Firstly, advertisements should respect the differences of different cultures' ethics and avoid the hegemonic concept of self-culture. Secondly, the advertisements should make full use of the empathy effect and promote the concepts common to each culture. For example, the core emotion of IKEA advertisements around the world is basically based on the warm atmosphere among family members. Finally, insist on self-cultural

self-confidence and enhance the international recognition of our own ethical culture.

5. Conclusion

Through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advertising ethics and deep culture i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t is found that Chinese and American cultures have their own characteristics, which also reflects the positive appearance of the world's cultural diversity. The degree and level of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al ethics in Chinese and American multinational advertisements can directly influence the acceptance of brand localisation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brand internationalisation. However, due to the influence of cultural background, the problem of ethical misconduct in advertising i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s different, and different regulatory strategies should be formulated according to the needs of national conditions.

References:

- [1] Hugo Slim. Ethics of humanity [M]. Suzhou University Press:202305.334.
- [2] LI Mingwei,SHANG Yanqing. On the administrative regulation of advertising in China[J]. International Journalism,2013,35(07):118-125.DOI:10.13495/j.cnki.cjjc.2013.07.013.
- [3] Hofstede, G.H.Cultures and Organization, Software of the Mind.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vol. 38,1993.pp.
- [4] Pan Jinguang,Li Su. Network Culture Consumption:Value Mechanism, Currents of Thought and Guiding Mechanism[J]. JACF,2024,(04):142-147.DOI:10.16064/j.cnki.cn34-1003/g.2024.04.012.
- [5] Duan Wenjian,Feng Bing.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Main Characteristics and Basic Experience of New China's Cultural Narrative[J]. Lanzhou Journal,2025,(01):40-48.
- [6] Pu Qiuju.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use of multimodal metaphors in a cross-cultural context--Taking the example of Mercedes-Benz car TV advertisement[J]. Academic exploration,2016,(03):103-108.
- [7] Yan Hongxiu. Value security in the age of digital intelligence:An examination based on ethical governance[J]. People's Forum-Academic Frontier,2024,(22):90-99.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4.22.010.
- [8] Gao Jiaqi,Xie Xuefang. Ethical Review and Governance Path of Advertising Industry in the Age of Digital Intelligence[J]. Journa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Edition),2023,56(02):116-121+128.
- [9] Su Shimei. The intellectual landscape of advertising ethics research in modern China: media mirrors and thematic veins[J].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Review,2022,75(04):96-105.DOI:10.14086/j.cnki.xwycbpl.2022.04.008.
- [10] HUANG Yubo,YANG Jinlian. The Regulatory Framework of Infomercial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s Significance[J]. Modern Communication(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2020,42(01):133-137+152.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2.628

19世纪中至20世纪初俄罗斯征服和统治突厥斯坦期间的伊斯兰教政策

陶克清¹

(¹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 100875)

摘要: 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 俄罗斯帝国在征服与统治突厥斯坦地区期间, 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伊斯兰教的管理政策。这些政策充分体现了俄罗斯帝国在殖民扩张过程中, 对伊斯兰教这一重要社会文化力量的复杂态度和应对策略。从最初的尊重与非干预, 到中期的俄化政策推行以及对新兴意识形态的应对, 再到后期更为深度的政策调整, 这一系列演变不仅反映了俄罗斯帝国在整合中亚地区过程中遭遇的诸多挑战与困境, 也为当代世界处理多元文化共存、宗教与政治关系等全球性议题, 提供了宝贵的历史参考。

关键词: 俄罗斯帝国 突厥斯坦 伊斯兰教 宗教政策

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 俄罗斯帝国在对突厥斯坦^②地区 (Туркестан) 进行征服与统治的过程中, 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具有复杂性与多变性的宗教政策。这些政策不仅构成了俄罗斯帝国殖民扩张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且对中亚地区当时及后世的社会结构、文化形态以及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且持久的影响。

一、征服中亚过程中俄罗斯的伊斯兰教政策转变

18世纪中叶, 俄罗斯帝国在完成了对西伯利亚及远东地区的探险和军事占领后, 开始将目光投向中亚地区。在中亚北部, 俄罗斯帝国先后设立了喀山总督区^③ (Казанская Губерния)、阿斯特拉罕总督区^④ (Астраханская Губерния)、乌法省^⑤ (Уфимская Провинция) 和托博尔省^⑥ (Тобольская Провинция) 等边疆省份, 并沿着这些省份的南部边界线和额尔齐斯河不断修筑军事堡垒, 形成了一条直面中亚哈萨克人和准噶尔人的“奥伦堡堡垒线”, 通过“切香肠”的方式逐步蚕食中亚土地。

早期作为征服者的俄国殖民者深受大俄罗斯主义和东正教为正宗观念的影响, 并怀有一定的宗教复仇心理。俄罗斯人有着13-15世纪被蒙古人征服、统治并被迫改信伊斯兰教的历史, 当初俄罗斯人各部正是利用宗教热忱摆脱蒙古人的统治而取得独立, 他们对蒙古人的战争往往被赋予拯救东正教徒免受伊斯兰教徒迫害的意义。这种历史背景使得俄罗斯人在内心深处对伊斯兰教产生蔑视和仇恨, 并将强迫穆斯林改信东正教视为己任。

在16世纪后期至18世纪前期, 俄罗斯帝国对穆斯林采取了迫害歧视和强迫改宗的政策。1552年兼并喀山汗国、1556年吞并阿斯特拉罕汗国后, 俄罗斯帝国境内拥有了大量穆斯林人群。这些穆斯林在社会地位上无法与基督教徒平等, 未受洗的人 (首先是穆斯林) 无权雇佣或支配东正教徒, 俄罗斯帝国甚至下令

^① [作者简介]

[1] 陶克清 (1990—), 男, 安徽马鞍山人,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② 这里的突厥斯坦地区指的是中亚南部俄属突厥斯坦 (Русский Туркестан), 即俄罗斯史学界狭义上的中亚 (Средняя Азия), 包括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哈萨克斯坦南部地区。

^③ 建立于1708年。

^④ 建立于1717年。

^⑤ 建立于1719年。

^⑥ 建立于1719年。

对那些“走上歧路”信奉伊斯兰教或其它非基督教的人进行最严厉的惩罚^[1]¹⁶⁸。穆斯林神职人员被剥夺权利，瓦克夫^⑦土地被强占，清真寺和古兰经学校被破坏或关闭。对于不信东正教的鞑靼贵族，根据俄罗斯帝国政府的特别法令，他们的土地和农奴被剥夺。此外，俄罗斯帝国还在楚瓦什人、莫尔多瓦人、马里人、乌德穆尔特人、巴什基尔人居住的地区强制推行东正教，甚至出现将整村的人赶下河去集体受洗的情况。这些宗教暴政引发了穆斯林的激烈反抗。

然而，到了18世纪后期至19世纪60年代，俄罗斯帝国政府吸取了喀山^⑧等地的教训，开始认识到仅凭强迫和武力无法使境内穆斯林民族改变信仰，于是转变策略，改而利用伊斯兰教为其殖民扩张服务。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结束了宗教迫害政策^[1]¹⁷⁰，在奥伦堡建立了供给俄罗斯和西伯利亚穆斯林使用的宗教集会场所，幸存下来的鞑靼贵族得到了与俄罗斯贵族同等的权利。为了削弱布哈拉毛拉们在哈萨克草原的影响，俄罗斯帝国选用控制区内与沙皇政府合作的鞑靼毛拉，雇佣他们到草原传教，试图通过这些与沙皇政府合作的伊斯兰神职人员来控制中亚地区的宗教信仰，借以掌握中亚人的宗教领导权^[1]¹⁷⁰。然而，这些鞑靼神职人员很少能真心与俄国人“合作”，反而在中亚地区宣传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思想，刺激了当地人民的民族意识觉醒。

二、考夫曼的“不干涉主义”政策

1867年，随着突厥斯坦总督府在塔什干的正式设立，俄罗斯帝国对突厥斯坦地区的统治进入了更为系统与深入的阶段，相应的宗教政策也进行了针对性的调整与完善。为了降低军事征服的阻力并为后续的行政管理创造相对稳定的环境，俄罗斯统治当局采取了一种表面上较为温和且具有一定试探性的宗教政策。

突厥斯坦总督区（1886年后改为突厥斯坦边区）成立初期的宗教政策核心原则是：一、保持对宗教与风俗的表面尊重。俄罗斯帝国当局公开宣称尊重伊斯兰教以及当地民众长期以来形成的生活习俗与宗教传统，避免因直接冲击当地宗教文化而引发大规模的反抗情绪。二、宗教事务的非干预主义。当局明确表示不主动介入当地的宗教活动与宗教事务，允许清真寺等宗教场所正常开展宗教仪式与活动，维持当地宗教的自主性。三、传统管理机构的利用。在构建地方行政管理体系时，俄罗斯帝国充分利用当地已有的传统管理机构，而这些机构往往与伊斯兰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通过与当地的宗教领袖、部落首领等合作，借助他们的影响力来实现对地方的有效管控。

首任总督考夫曼认为对伊斯兰教最有效的方式不是进攻，而是当没有穆斯林一样^[2]¹¹⁷，这样也就没有伊斯兰教问题了，既不支持，也不反对。得益于此，伊斯兰教社会宗教体系的三大支柱得以保留：穆斯林初等和高等教育机构，确保了宗教知识的传承；清真寺和圣地，保障了宗教仪式的自由进行；沙里亚法庭，维护穆斯林的生活规范^[3]。然而尽管表面上采取了不干涉的宗教政策，但俄罗斯帝国当局并非完全放任当地宗教势力的发展，考夫曼废除了一些宗教职位并竭力阻止鞑靼人来突厥斯坦边区传教^[1]²⁰²⁻²⁰³，以排除他们对当地人的宗教影响，在土地分配、税收制度等关键领域，也悄然推行了一些有利于自身统治的政策调整，为后续深入控制该地区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宗教与政治权力之间的复杂互动埋下了伏笔。

考夫曼主导的土地改革成为这一时期宗教政策与社会经济政策相互交织的关键案例。改革的核心在于将土地使用方式纳入国家管理体系，然而在推进过程中引发了政府内部不同派系之间的激烈争论。考夫曼主张土地归国家所有，并以公社或家庭为单位进行分配使用^[4]²²⁸，这一举措会收回包括大量归属于清真寺或宗教学校的瓦克夫土地；而自由派则积极推动以“私人所有权”为基础的土改模式，外交部更是担心此举会激怒中亚地区的大地主和宗教界人士，引发强烈的政治危机^[4]²⁵⁴。尽管存在分歧，改革初期仍按照考夫曼的设计进行，直至1886年《突厥斯坦边区管理条例》的出台，才使土地政策在法律层面得以进一步明确与规范。

从19世纪80年代中期起，俄罗斯帝国试图在突厥斯坦地区全面推行俄化政策，教育领域也成为宗教政策的核心阵地。当局大力兴办俄式学校，旨在培养一批具有俄罗斯文化认同的知识分子群体，以此来削弱伊斯兰教在当地社会中的思想影响力，并逐步传播俄罗斯的价值观与文化体系，实现对当地社会结构与文化传统的深度改造。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泛突厥主义与泛伊斯兰主义思潮在中亚地区的兴起，给俄罗斯帝国的殖民统治带来了全新的挑战。这些思潮主张团结所有突厥民族或穆斯林群体，以抵抗外来殖民统治，建立独立自主的民族国家。泛突厥主义者在教育领域掀起了“扎吉德运动”，他们以启蒙为中心展开活动，要求伊斯兰教改革，进行教育改革，建立新方法学校^[3]，其中部分激进分子受奥斯曼土耳其的影响，主张中亚脱离俄罗斯，

^⑦ 瓦克夫（Waqf），特指伊斯兰教的宗教用地或财产，通常由捐赠者将其土地或财产捐赠给清真寺、宗教学校等宗教机构，其收益主要用于支持宗教活动、教育、慈善等公益事业。

^⑧ 1731年喀山东正教大主教卢卡·科纳舍维奇发起大规模的改宗运动，随后发生了屠杀鞑靼人的流血事件。

建立独立的大突厥国家^[2]¹²⁰。俄罗斯统治当局虽然对这些思想的传播保持高度警惕并采取了一些应对措施，但其应对策略往往相对滞后，并不能有效遏制这些思想影响力的增长。

三、杜霍夫斯基的宗教政策调整

俄罗斯帝国统治之初，考夫曼的“不干涉主义”起到了很好的缓和宗教矛盾的作用，然而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中亚地区社会、政治与意识形态领域发生了剧烈变化，社会矛盾不断激化，抗议、示威活动频繁发生，甚至爆发了多次大规模的起义^⑨。在这些社会动荡事件中，诸如“泛伊斯兰主义”等宗教因素往往发挥了重要的催化与凝聚作用，使得俄罗斯当局不得不重新审视其宗教政策。尽管长期以来俄罗斯帝国当局试图维持“不干涉政策”的表象，但随着社会矛盾的日益尖锐，中央与地方政府逐渐意识到伊斯兰教在中亚社会中根深蒂固的影响力，以及其在民众生活中的核心地位，开始对宗教政策进行深度反思与调整。

1899 年，突厥斯坦总督杜霍夫斯基向俄罗斯皇帝提交了《突厥斯坦的伊斯兰教》报告，该报告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宗教政策原则，包括使当地神职人员摆脱国内外伊斯兰教中心的控制与影响、削弱苏菲主义在突厥斯坦穆斯林精神生活中的主导地位、防止瓦克夫资金被用于反政府宣传活动、在穆斯林学校课程中引入欧洲元素等，这些成为他在突厥斯坦开展宗教政策改革的指导思想。

杜霍夫斯基认为“冲淡伊斯兰教徒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主要任务”^[5]，在考夫曼的伊斯兰教政策上他作了大幅调整，他限制伊斯兰教宗教机构的发展，严格控制穆斯林经学院和初级学校，拒绝给中亚穆斯林设立宗教管理机构，并把它们和伏尔加流域的穆斯林的联系割断，排除来自喀山、巴什基尔地区的影响。对宗教上层人士的选举也加以审批和管控，防止鞑靼人把持中亚地区的宗教权力^[6]¹⁹⁸。削弱伊斯兰教法权威，限制沙里亚法在当地的适用范围。在经济上剥夺清真寺和宗教学校的土地所有权，并对瓦克夫土地收税，还限制每个乡只能供养一名专职的教士^[7]⁷⁸。在教育和文化领域，试图培养俄方懂中亚语言和情况的军事和行政干部，同时把俄国语言和文化介绍给当地人，至少给小部分中坚分子，以改善双方公众的关系，促使这部分中坚分子以后带领全体居民脱离他们的宗教首领，并使之倾向俄国所代表的现代世界。

然而，这些政策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却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没有发挥太大的作用，一直到 1917 年革命爆发，俄罗斯统治当局也未能有效缓解当地的宗教紧张局势，反而因为降低了伊斯兰教神职人员的地位遭到强烈反对，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地区的不稳定。

四、俄罗斯突厥斯坦宗教政策的困境与思考

尽管俄罗斯帝国在突厥斯坦地区实施了长达数十年的宗教政策调整，试图在尊重伊斯兰教传统与实现殖民统治目标之间寻求平衡，但最终这些政策未能取得预期的成功，反而陷入了诸多困境。

首先这要归结于政策执行的不一致性，从中央政府到地方各级管理机构，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着显著的差异与脱节现象。中央政府制定的政策在地方层面往往因官员的更替、地方利益的考量以及对当地实际情况的不了解等因素而无法得到有效落实，导致政策执行的连贯性与一致性受到严重破坏。

其次，俄罗斯统治当局对伊斯兰教影响力存在系统性的忽视。俄罗斯帝国当局在制定与实施宗教政策时，未能充分认识到伊斯兰教在中亚地区社会结构、文化传统以及民众心理等各个层面所具有的深远影响力。许多政策在设计与执行过程中，未能深入触及当地居民的核心关切与宗教情感，从而在客观上削弱了政策的有效性。

俄罗斯当局社会经济政策的缺陷与滞后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在土地分配、税收制度等关键社会经济领域，俄罗斯帝国的政策未能充分考虑当地居民的历史权益与现实需求，引发了广泛的社会不满与抵抗情绪。这些社会经济问题与宗教因素相互交织，进一步加剧了地区社会的不稳定。

俄罗斯帝国统治突厥斯坦地区期间这些宗教政策的实践经验与教训，不仅对于理解当时中亚地区的社会变迁、文化冲突以及政治演进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对于当今世界在处理多元文化共存、宗教与政治关系等全球性议题时，也为我们提供了具有历史深度的参考与借鉴，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认识宗教因素在地区政治稳定与社会发展中的复杂作用机制。

参考文献：

- [1] 孟楠.俄国统治中亚政策研究[M].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2000.
 [2] 蓝琪.中亚史六卷本(第 6 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

^⑨ 比如 1892 年塔什干“霍乱”起义和 1898 年安集延起义。

- [3] Лысенко Юлия Александровна. Религиозная политика как механизм закрепления имперских позиций России в Туркестанском крае (вторая половина XIX начало XX в.)[J]. Вестник Том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2012(4): 194-198.
- [4] Кауфман К.П.. Проект всеподданнейшего отчета генерал-губернатора фон Кауфмана 1-го по гражданскому управлению и устройству в областях Туркестанского генерал-губернаторства [M]. СПб., 1885.
- [5] 孟楠.沙俄征服中亚后对伊斯兰教的政策[J].西北史地, 1998(2): 45.
- [6] Gavin Hambly, et al.. Central Asia[M].New York: Delacorte Press, 1969.
- [7] 陈联璧, 刘庚岑, 吴宏伟.中亚民族与宗教问题[M].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2.

Russian Empire's Islamic Policies during Conquest and Rule of Turkestan from Mid-19th to Early 20th Century

Tao Keqing¹

¹ School of Histor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China

Abstract: In the mid-19th to early 20th centuries, during the conquest and rule of Turkestan, the Russian Empire introduced and implemented a series of Islamic management policies. These reflected its complex attitude and strategies towards Islam, a key social and cultural force, during colonial expansion. From initial respect and non-intervention, through mid-period Russification and responses to emerging ideologies, to later deeper adjustments, these policy changes showed the challenges the Russian Empire faced in integrating Central Asia, and offer historical insights for today's world in dealing with multicultural coexistence, religion-politics relations, etc.

Keywords: Russian Empire, Turkestan, Islam, Religious Policy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2.534

一境到底：贯通历史课程“教-学-评”一体化的重要途径

张攀

(佛山市南海区石英实验学校, 广东 佛山 528200)

摘要: 情境教学与“教-学-评”一体化的有机融合既体现了核心素养时代历史课堂的本质追求, 同时也便于引入合理、有效的量规对学生的学习效果进行评估。以教学目标为出发点, 通过逆向设计的原则将学习任务镶嵌在“一境到底”的历史情境活动中加以呈现, 同时运用量规对学生的学习效果进行动态跟踪和反馈, 能够为教师提供更真实的学习评价依据、为学生提供更直观的学习目标指引, 进而不断提高历史课堂教学的质与效。

关键词: “教-学-评”一体化; 情境教学; 一境到底; 宋元科技

《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2022年版)》(下文简称“新课标”)引领下的历史学习如一苇渡江, 学生是船上客, 双基是手中桨, 核心素养在彼岸, 学生在学习途中的所见、所闻、所得与教师的教学设计关联甚密。“教-学-评”一体和“创设历史情境”分别是新课标课程理念和课程实施建议中提出的两个上位概念。面对同一教学问题, 新课标中的上位概念提供给教师的不再是单一的标准答案, 而是多元的参考方案。笔者认为, 打通两个上位概念的关键, 在于将情境教学与“教-学-评”一体化有机融合, 创设出既能够体现核心素养时代历史课堂本质追求, 又便于引入有效量规对学生学习效果进行评估的深度教学情境。

一、“一境到底”的学理阐释

“情境教学”作为历史课堂上常见的教学法之一, 在过去30余年被广泛实践和探讨。但在一线历史教学中, 很多教师对“情境”的理解仍存在较大偏差, 这一偏差主要体现在对“历史情境”和“历史情境活动”两个概念的界定不清晰。对此黄牧航指出, “历史情境”是指历史知识点(包括历史上的人、事、物、制度等)是在怎样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 “历史情境活动”指今天学生面对哪些与历史相关的现实问题, 又是通过什么方式方法来解决的。^①

过往不少历史教学设计中呈现的情境或情境活动, 通常只是为了满足某一知识点的讲授需要而拼凑的产物, 从应试能力培养的角度来看, 此类缺乏课程一致性思维的设计固然能够完成教学任务, 但倘若因此罔顾历史课程的育人目标, 师生定然会与“聚焦培根铸魂, 提升核心素养, 形成有效评价”的新课标精神相行渐远。

笔者认为, 情境是为了情境活动的需要而创设的, 情境活动是为了服务于教学目标而出现的。“一境到底”的历史情境活动通过呈现同一历史情境的不同侧面来满足教学目标的需要, 承载全部教学内容、串联完整教学线索, 能够使“教-学-评”一体化更切合课堂实际。下文以统编教材七年级下册第13课《宋元时期的

[作者简介]

张攀(1997—), 男, 汉族, 甘肃高台人, 历史二级教师, 研究方向为中学历史教学。

[基金项目]

本文是广东省2025年度中小学教师教育科研能力提升计划项目“基于学科核心素养的初中历史‘教-学-评’一体化实践研究”(编号:2025YQJK0413)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① 黄牧航.中学历史核心素养命题的关键技术二:创设情境问题[J].历史教学(上半月刊),2024,(05):11-15.

科技与中外交通》为例, 对“一境到底”的设计和应用进行探讨。

二、“一境到底”的实施路径

(一) 明确目标, 以学定教

“最好的设计是‘以终为始’, 从学习结果开始的逆向设计”^①。这就要求在设计情境活动时要目标先行, 确保目标与学生的实际能力相匹配。《宋元时期的科技与中外交通》是七年级下册第二单元“辽宋夏金元: 民族关系发展和社会变化”中的最后一课, 主要讲述了宋元时期印刷术、指南针、火药的发展以及中外交通四个方面的内容, 本课内容体现了单元主题“社会变化”在科技和中外交流领域变化的表现。知道宋元时期先进科技的代表性成就、发达的海陆交通、宋元科技对世界文明发展做出的贡献是本课的教学重点和关键问题。依据上述教材分析, 确定教学目标如下:

一是知道印刷术、指南针、火药在宋元时期发展及应用的史实; 通过分析材料, 归纳指南针用于远途水上航行的意义; 通过小组合作学习, 探究雕版印刷术和活字印刷术的特点及适用范围。

二是知道宋元时期海陆交通的基本史实; 通过从材料中提取信息, 分析驿站对元朝政治、经济、文化等发展的意义。

三是通过分析材料, 探究印刷术、指南针、火药对世界文明进程产生的影响, 认识其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

新课标指出, 教学目标要具有可操作性和可检测性。于本课而言, “可操作性”要求目标清晰明了并能够在情境活动中得到有效落实; “可检测性”要求情境能够有助于反馈目标的达成效果。

(二) 立足教材, 以史入境

知识的开端永远必须来自感官^②, 情境的构建便是激发学生感官体验的过程。本课涉及的教材内容对于大部分七年级学生而言属于“知惑参半”的旧知, 引导学生在“既不陌生, 也不熟悉”的新情境下开展“旧知新探”, 是本课情境切入的难点。

笔者采用“小切口, 广拓展、深研究”^③的设计思路, 选取教材“相关史事”栏目中马可·波罗及其著述《马可·波罗行纪》作为切入点, 结合公元1338年罗马教皇本笃十二世派遣使团前往中国朝觐元顺帝事件^④, 将历史细节简化整合后, 构建情境切口:

“公元1271年, 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来到中国并在这里旅居了十七年。回国后, 他将自己在中国的所见所闻整理成了著名的《马可·波罗行纪》。书中这个繁荣强盛的东方大国, 引起了欧洲人极大的好奇心。公元1338年, 罗马教皇本笃十二世派遣使团, 沿着古老的陆上丝绸之路, 不远万里前来中国, 拜访彼时的元顺帝。”

仅凭文字构建的情境不足以支撑起“一境到底”的感官体验, 在课堂导入环节出示大段文字材料会对学生造成阅读压力, 导致出现畏难情绪。因此笔者使用AI大模型工具, 将上述文字情境转以视频的形式进行呈现, 增强学生对情境的兴趣度和接受度。

(三) 任务驱动, 以评促学

情境的导入既为学生搭起连接已知与未知的桥梁, 也为后续学习任务埋下伏笔, “一境到底”的情境活动则能够保证教学的连贯性和知识的整体性不被任务所割裂。在此情境之下, 笔者以“有客自远方来——宋元时期的科技和中外交通”为教学主题, 将教学内容整合为“大国交通——迎宾他乡”“大国发明——泽惠世人”“大国远航——名扬海外”三个连贯的结构化情境如图1, 每个情境中都包含若干个子情境用来落实目标任务和评价反馈。下文以其中三个环节为例做具体展示。

① 格兰特·威金斯, 杰伊·麦克泰格. 追求理解的教学设计[M]. 闫寒冰等, 译.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 15.

② 夸美纽斯. 大教学论[M]. 傅任敢, 译.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14: 156.

③ 朱真. “小切口”式历史教学刍议[J]. 历史教学(上半月刊), 2012(21): 42-48.

④ 左芙蓉. 罗马天主教与蒙元的关系[J]. 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 2007(3): 46-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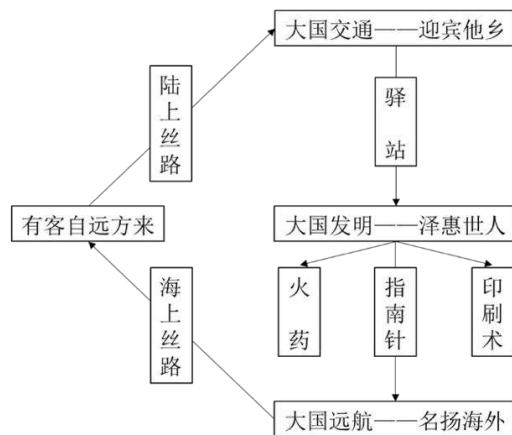


图 1

情境一：大国交通——迎宾他乡

“使团从罗马出发，沿着著名的陆上丝绸之路向东方行进，一路上跋山涉水历尽艰辛，当他们进入中亚地区的元朝疆域后，路况大为好转——元朝境内的交通网四通八达，交通要道上每隔一段距离就设有驿站供往来客商经停食宿、补充物资。使团沿着驿站继续东行，在抵达元大都的时候，元顺帝早已带领一众朝臣恭候他们多时——原来，沿途驿站的官员已经将使团入境的消息通过急递铺呈报给了元顺帝。”

此情境主要用于落实前文所列目标二。任务和量规如表 1：

表 1

任务一：根据情境材料，结合教皇使团的经历，分析驿站对元朝发展起到了什么作用。先参照量规和示例独立完成任务，然后小组内依据量规讨论，达成一致意见并发言展示。			
材料	材料类型	对元朝发展起到什么作用？	
凡在属国，皆置驿传，星罗棋布，脉络相通，朝令夕至，声闻毕达。 ——元·《经世大典·站赤一》	一手史料	畅通政令	
元有天下，薄海内外，人迹所至，皆置驿传，使驿往来，如行国中。 ——《元史·地理志》			
四通八达的驿路通往全国各地。……每年来往于两都之间运输货物的车辆络绎不绝。 ——李云泉《略论元代驿站的职能》			
一条条相互连结的驿道，……把原本属于中原的医药和农桑的宝贵经验传向了远方，也把国外的先进生产技术以及文明带到了国内。 ——玉门市博物馆《丝路驿站 小河碎影》展览简介词			
量规			
	优秀	良好	一般
史料分类	能按照史料的表现形式或价值等标准对其分类	基本能按照史料的主要分类标准对其分类	分类标准混乱，思路尚不清晰
史料分析	能准确提取信息，并进行概括表述	基本能准确提取信息，但存在个别错误，表述基本准确	只能准确提取少量信息，表述存在较多错漏
自我评价			
小组评价			
教师评价			

情境二：大国发明——泽惠世人

“为了对使团一路艰辛表示慰劳，同时展示大元的富庶和先进，元顺帝为来客精心准备了一场琳琅满目的迎宾展览。其中最吸引使团注意的，莫过于指南针、铜火铳以及一盘铜活字——这几乎代表了当时世界上最领先的技术。”

【子情境】“正所谓‘礼尚往来’，元顺帝打算制作一批印有‘大元’字样的国礼赠送给教皇使团，为了使礼物更有纪念意义，他想请使团成员分别使用雕版印刷术和活字印刷术，亲手体验国礼的制作过程。”

配合情境展示的还有教材“相关史事”栏目中“《梦溪笔谈》中对毕昇发明活字版的记载”以及教师整理的雕版印刷术和活字印刷术的工艺流程图。此情境主要用于落实前文所列的目标一。目标任务和量规如表2：

表2

量规			
	优秀	良好	一般
灵活操作	能依据工艺流程图，正确、美观地写、刻、印“反字”	写、刻、印“反字”的过程中出现了一定失误，但能够设法补救	写、刻、印“反字”的过程中出现了较大失误，无法补救
辨别价值	能在体验过程中准确描述两种印刷技术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并指出二者各自的适用范围	能在体验过程中感知到两种印刷技术的不同特点，并描述二者各自的适用范围	单纯体验，没有实感
小组合作	积极参与小组合作学习，并完成分工任务	能参与小组合作学习，但任务完成不理想	消极对待小组合作学习，不能正常完成任务
自我评价			
小组评价			
教师评价			

(四) 提炼升华，以境融情

情境三：大国远航——名扬海外

“胡天汉月映西洋，丝路沧桑三千年。两条丝路连接东西两种文明，教皇使团的元朝之行已经告一段落，而他们此行所见到的指南针、火药武器以及印刷术对世界产生的影响才刚刚开始——教皇和他的使团恐怕很难想象，就是这三项技术，在几百年后的欧洲将会引发一场令他们始料未及的剧变……”

此情境主要用于落实前文所列目标三。任务和量规如表3：

表3

任务七：根据情境材料，结合本课所学知识，选择这三项技术中的一项或多项，谈一谈中国古代重大发明对世界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哪些影响，撰写一段不少于两百字的短文，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课后参照量规独立完成任务，然后小组内依据量规互评。			
量规			
	优秀	良好	一般
观点拟定	观点拟定明确	观点拟定不够明确	观点拟定含糊不清
观点解释	能依据所学史实准确解释观点，做到史论结合、言之有理	基本能利用相关史实解释观点，史论结合不到位	不能正确运用相关史实解释观点，出现较多知识性错误
表述	用词准确精炼，表述完全正确	用词基本准确，表达基本正确	用词不够准确，词不达意

规范	确	
自我评价		
小组评价		
教师评价		

三、“一境到底”的实践反思

“教-学-评”一体化，倡导“评价不再凌驾于教学之上或游离于教学之外，而是镶嵌于教学之中，成为教学的有机组成部分，使教、学、评在持续的良性互动中最大限度地达成目标，促进学生学科核心素养的逐步形成与发展”^①。高质量历史情境活动的要义在于教师围绕课标确定课题主旨，并通过挖掘教材内外的丰富史料，构建教学目标、教材内容、核心素养三者融通的情境活动框架，将学生引入预设的时空场景，通过与古人对话、向古物求索、为古事作解等多种方式开展有效学习。学生在此过程中既是目标的完成者，也是评价的执行者。

实践表明，“一境到底”的教学设计思路是落实上述理念的有效途径。笔者运用该教学设计思路，在七年级、高一年级分别开展了基于《中国历史（七年级下册）》和《中外历史纲要（上）》的“教-学-评”一体化教学实践，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之后，对学生进行不记名问卷调查，调查结果表明，绝大多数学生对相关教学活动表示认可，认为历史课堂变得更加有趣、有料、有所获。学生反馈统计见表4：

表4

“一境到底”的历史课堂使你在历史学习中获得了哪些提升？	
选项	占比
A.学习兴趣	77.23%
B.学习方法	74.20%
C.学习能力	68.30%
D.历史思维	77.07%
E.学习效果	66.44%

从调查结果来看，“一境到底”为学生的历史学习赋予了更多的可能性和更强的自主性；同时也暴露出一些笔者或已感知、或未察觉的问题，如有学生反馈情境创设有时显枯燥、情境活动有时略复杂、目标任务有时不明确、量规尺度有时太主观等，这些问题为笔者下一步探索指出了方向。从国内基础教育现状来看，情境教学与“教-学-评”一体化相结合的研究成果尚不多见，鲜有成体系的典例和范式供参考。在今后实践中，有以下问题值得进一步探索：

一是让情境契合教学目标。清晰的教学目标是“教-学-评一致性”的前提和灵魂，教学“有效”的唯一证据在于目标的达成。^②情境是目标落实和任务驱动的重要载体，在教学和评价中起着关键作用，用情境活动贯通历史课堂教学，就是为学生创造一个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真实场域。在创设情境时，教师应对教学目标进行准确把握，根据学情将教学重难点转化为具体的学习任务，再将任务合理穿插在情境活动中。

二是让量规符合核心素养。教、学、评是新课标理念下教学过程的一体三面，共同构成了教学活动的主体框架，核心素养目标的达成是其共同旨归。^③量规是“针对学生学习制定的，它包含一组清晰连贯的标准，以及这组标准下各层级的表现质量描述”。^④教师制定量规，就是以核心素养为主要维度，对教师的教学目标和学生的预期表现进行科学、合理的界定，一方面可以辅助教师基于学情做出更恰当的教学预设，另一方面也可以为不同层次的学生提供更直观的目标指引。

三是让评价融合生本课堂。课堂评价贯穿课堂教学始终，既是促进学生学习的重要教学手段，又是诊

① 王蔷,李亮.推动核心素养背景下英语课堂教—学—评一体化:意义、理论与方法[J].课程·教材·教法,2019 (5) :114-120.

② 崔允漷,夏雪梅.“教-学-评一致性”:意义与含义[J].中小学管理,2013 (1) :4-6.

③ 张亚龙.学历案:落实“教-学-评”一体化的重要抓手[J].中学历史教学参考,2024 (5) :31-34.

④ 苏珊·布鲁克哈特.如何编制和使用量规:面向形成性评估与评分[M].杭秀等,译.宁波:宁波出版社,2020: 4.

断、调控、引导课堂教学的重要工具。^①这就要求教师在课内外必须致力于通过量规等评价机制对学生的学习表现进行及时、正向的反馈，构建“人人参与情境、人人共享评价、人人收获成就”的学习共同体，让“评价结果的运用有利于改进教师教学、促进学生学习”^②，共同驱动“教”与“学”指向目标的达成并为达成目标而努力，同时又因为评价反馈而激发起学生继续学习的动力。

综上所述，“一境到底”的历史情境教学活动是贯通“教-学-评”一体化的重要途径。教师在教学设计中应当基于教学目标制定指向突破教学重难点、达成核心素养的学习任务，并以高质量情境加以呈现，同时运用量规等评价工具对学生的学习效果进行动态跟踪和反馈，集教师之力和学生之智打造高质量历史学习共同体，不断提高历史课堂教学的质与效。

参考文献：

- [1] 黄牧航.中学历史核心素养命题的关键技术二：创设情境问题[J].历史教学(上半月刊),2024,(05):11-15.
- [2] 格兰特·威金斯,杰伊·麦克泰格.追求理解的教学设计[M].闫寒冰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15.
- [3] 夸美纽斯.大教学论[M].傅任敢,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4:156.
- [4] 朱真.“小切口”式历史教学刍议[J].历史教学(上半月刊),2012 (21) :42-48.
- [5] 左芙蓉.罗马天主教与蒙元的关系[J].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7 (3) :46-50.
- [6] 王蔷,李亮.推动核心素养背景下英语课堂教—学—评一体化:意义、理论与方法[J].课程·教材·教法,2019 (5) :114-120.
- [7] 崔允漷,夏雪梅.“教-学-评一致性”:意义与含义[J].中小学管理,2013 (1) :4-6.
- [8] 张亚龙.学历案：落实“教-学-评”一体化的重要抓手[J].中学历史教学参考, 2024 (5) :31-34.
- [9] 苏珊·布鲁克哈特.如何编制和使用量规：面向形成性评估与评分[M].杭秀等,译.宁波:宁波出版社,2020:4.
- [10] 杨向东,崔允漷.课堂评价：促进学生的学习和发展[J].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192.
- [11] 邵朝友,张斌.指向核心素养的形成性评价[M].济南:山东科学出版社,2022: 21.

One Situation to the End: An Important Way to Achieve the Integration of “Teaching-Learning-Evaluation” in the History Course

Zhang Pan

Foshan Nanhai Shiyiying Experimental School, Foshan City, China

Abstract: The organic integration of Situational Teaching and the integration off “Teaching-Learning-Evaluation” not only reflects the essential pursuit of history classes in the era of core literacy, but also facilitates the introduction of reasonable and effective rubrics to evaluate students’ learning effects. Taking the teaching objectives as the starting point, the learning tasks are embedded in the historical situational activities of “One Situation to the End” through the principle of reverse design, and the rubric is used to dynamically track and feedback the students’ learning effects, which can provide teachers with more realistic learning evaluation basis and provide students with more intuitive learning goal guidance, thereby continuously improving the quality and effectiveness of history classroom teaching.

Keywords: “Teaching-Learning-Evaluation” integration; Situational Teaching; One Situation to the End; Technology in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① 杨向东,崔允漷.课堂评价：促进学生的学习和发展[J].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192.

② 邵朝友,张斌.指向核心素养的形成性评价[M].济南:山东科学出版社,2022: 21.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2.656

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新闻伦理的博弈与融合

王才铭¹ 田蕾娅¹

(¹ 兰州财经大学, 甘肃 兰州 730000)

摘要: 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新闻伦理之间存在着复杂的互动关系。传统文化中包含着许多关于道德、伦理和价值观的观念, 这些观念可以影响现代新闻伦理的发展。研究旨在探讨传统文化与现代新闻伦理之间的冲突与融合, 并分析其在实践中的表现。研究通过对比分析与案例分析法, 深入剖析传统文化与现代新闻伦理在价值观念、观念对峙、原则和实践层面上的冲突。接着, 从仁爱精神、中庸之道和诚信观念等方面探讨了传统文化与现代新闻伦理的融合可能性, 并通过案例分析展示了其在实际报道中的体现。最后, 提出了传统文化与现代新闻伦理融合的策略与建议, 包括探索契合点、平衡古韵与今律、构建新闻伦理体系等方面思考。

关键词: 中国传统文化; 现代新闻伦理; 价值观念

一、引言

中国古代, 新闻伦理思想和一般的社会伦理思想常交融在一起。古代的新闻传播经历了口头传播、手写文字传播、印刷传播几个阶段。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 新闻伦理和一般的社会伦理交融在一起。先秦诸子提倡的“诚”、“信”、“实”、“公”, 不仅是做人的品德, 也是新闻传播的品德。“道听而途说, 德之弃也。”(孔子《论语·阳货篇》)“巧言令色, 鲜矣仁。”(孔子《论语·学而篇》)“巧言乱德。”(孔子《论语·卫灵公篇》)孔子这些话, 论述的是社会道德, 也包含了某些新闻传播伦理思想[1]。

中国自古为“礼仪之邦”, 道德理想成为人们为之奋斗的目标,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 儒家伦理思想体系中的爱国主义、统一思想和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 成为维系中华民族的重要纽带。如“夙夜在公”(《诗经》);“国而忘家, 公而忘私”(贾谊《治安策》);“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人生自古谁无死, 留取丹心照汗青”(文天祥);“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顾炎武), 这些思想都显示了强烈的为国家、为民族、为整体的献身精神。自古以来, “仁”与“义”成为中华民族的脊梁, 多少民族英雄和进步人物宁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 为国家和民族的独立与尊严而壮烈牺牲。还有“富贵不能淫, 贫贱不能移, 威武不能屈”(孟子《孟子·滕文公下》), 以及仁、义、礼、智、信、温、良、谦、恭、让等这些道德观念, 则成为人们修养的准绳和依据[2]。这些伦理思想的精华, 不会因时间的流逝而失去光彩,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 它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们为国家的强盛、民族的独立而奋斗不已。这种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精髓思想渗透到新闻伦理思想中, 便自觉形成了报人对自身素质和修养的要求[3]。

研究通过对传统文化与现代新闻伦理的冲突与融合进行深入研究, 旨在为新闻伦理实践和传统文化传

作者简介: 王才铭 (1999—), 男, 四川达州人,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在读。

田蕾娅 (1999—), 女, 甘肃兰州人,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在读。

承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通过对案例分析法，研究为传统文化与现代新闻伦理的融合可能性提供了新的见解，并为构建适应时代发展的新闻伦理体系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二、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新闻伦理的概述

(一) 传统文化的内涵与特点

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具有稳定的价值观、信仰、习俗和行为规范的总和。它反映了一个社会的历史传承、价值取向和文化特色，对人们的思想、行为和社会生活产生深远影响[3]。传统文化的特点具有稳定性：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和规范经过长期的沉淀和传承，具有相对稳定的特点。传承性：传统文化通过代际传承和教育传承，在社会中得以延续和发展。地域性：不同地区和民族的传统文化具有独特的地域特色和文化差异。

(二) 现代新闻伦理的发展历程、原则及规范

西方伦理学史上，康德第一个系统地阐述了自律的概念，并将自律视为道德的本质和基础。19世纪末，随着新闻业的兴起，新闻伦理开始受到关注。《纽约时报》的创始人奥克斯提出了“真相至上”的新闻理念，这标志着新闻伦理开始受到重视。20世纪初，美国新闻协会制定了新闻行业的第一个行为准则，强调新闻报道应当客观、真实、公正。20世纪中期，随着电视、广播等新媒体的兴起，新闻伦理逐渐扩展到了新媒体领域，对新闻报道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进行了进一步的规范和完善。并且构成了现代新闻伦理的基本框架，倡导新闻媒体的自律和内省，从而将相关规范内化为媒体的自觉行动[4]。平衡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其中“公共利益”指的是国家、社会和公众的利益；而“私人利益”则包含两个维度，既指新闻媒体的利益，也指报道对象的利益。在新闻报道中，需要遵守新闻伦理原则，以确保新闻报道的真实性、客观性和公正性。

(三) 传统文化与现代新闻伦理的互动关系

中国传统与现代新闻伦理之间存在着复杂的互动关系。传统文化中包含着许多关于道德、伦理和价值观的观念，这些观念可以影响现代新闻伦理的发展。例如，一些传统文化强调诚实、正直、公正和责任等价值观，这些价值观在现代新闻伦理中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5]。现代新闻伦理也可以对传统文化进行传承和创新。新闻媒体可以通过报道传统文化活动、宣传传统文化价值观等方式，促进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同时，现代新闻伦理也可以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形成适应现代社会的新闻伦理观念。在一些情况下，传统文化与现代新闻伦理之间也可能存在冲突。例如，一些传统文化可能强调家族、社群的利益高于个人利益，而现代新闻伦理则强调个人的知情权和隐私权。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在传统文化和现代新闻伦理之间进行权衡和协调。

传统文化与现代新闻伦理的互动关系不仅是复杂而多元的，而且也体现了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共同发展，传统文化为现代新闻伦理提供了深厚的历史和文化底蕴，而现代新闻伦理则在传承和创新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为传统文化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这种互动关系促进了新闻报道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也为社会价值观念的传播和传承提供了重要的平台。

三、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新闻伦理的融合可能性

(一) 传统文化中的仁爱精神与现代新闻伦理的融合

——“汶川地震”报道中仁爱精神在新闻报道中的体现

仁爱精神强调关爱他人、同情弱者和帮助有需要的人。汶川地震是中国历史上一次极其严重的自然灾害，也是一次对新闻报道伦理的考验。在这次地震中，传统文化中的仁爱精神与现代新闻伦理的融合体现得淋漓尽致。首先，新闻报道中展现了对灾区人民的同情和援助，体现了仁爱精神。在报道中，新闻媒体不仅仅是冷冰冰地报道灾情和救援进展，更多的是通过镜头展现了灾区人民的坚韧和互助精神，呼吁社会各界伸出援手，这体现了仁爱精神在新闻报道中的体现[7]。其次，新闻报道坚持了事实真相的报道原则，

没有过度渲染。在汶川地震的报道中，新闻媒体力求客观、真实、公正地报道灾情和救援情况，避免了对灾情的过度渲染和不实报道。这种客观、真实的报道体现了现代新闻伦理的原则，同时也尊重了传统文化中的仁爱精神，让更多人了解到灾区人民的真实处境，从而引发更多的社会关注和援助行动。

此外，新闻报道还展现了对灾区人民的尊重和关怀。在报道中，新闻媒体尊重了灾区人民的隐私和尊严，没有对灾民进行过度的镜头追逐和侵犯隐私的报道，而是更多地展现了他们的坚强和互助精神。这种尊重和关怀体现了仁爱精神在新闻报道中的具体表现，也符合现代新闻伦理对于尊重当事人权益的要求。

因此，汶川地震的新闻报道充分体现了传统文化中的仁爱精神与现代新闻伦理的融合可能性。在报道中，新闻媒体既传递了人文关怀，又保持了客观公正的报道原则，这种融合不仅提升了新闻报道的道德水准，也增强了新闻媒体在社会中的公信力和影响力。

（二）传统文化中的中庸之道与现代新闻报道的平衡

传统文化中的中庸之道与现代新闻报道的平衡原则在许多方面都有着相似之处。除了平衡和克己复礼的观念外，中庸之道还强调了谦逊、审慎和包容。这些观念与现代新闻报道的价值观和伦理要求相契合，对于新闻报道的角度和态度也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8]。

首先，中庸之道强调谦逊。在传统文化中，谦逊是一种美德，强调个体应该谦虚谨慎地对待自己的言行。这种谦逊的态度与新闻报道中的客观公正原则密切相关。在新闻报道中，谦逊的态度意味着媒体应该以谦卑的心态对待新闻事件，不妄下结论，不主观臆断，而是应该以审慎的态度收集信息，客观地呈现事实，避免过度渲染和偏颇的报道。这种谦逊的态度有助于确保新闻报道的客观性和公正性，符合中庸之道的谦逊精神。其次，中庸之道强调审慎。在传统文化中，审慎是一种重要的品质，强调在处理事务时应该慎思慎行，不轻率妄为。这种审慎的态度与新闻报道中的事实核实原则密切相关。在新闻报道中，审慎的态度意味着媒体应该在报道事件前进行充分的事实核实，避免不实报道和误导性信息的传播。这种审慎的态度有助于提高新闻报道的准确性和可信度，符合中庸之道的审慎精神。最后，中庸之道强调包容。在传统文化中，包容是一种重要的美德，强调对待他人应该宽容包容。这种包容的态度与新闻报道中的多元观点呈现原则密切相关。在新闻报道中，包容的态度意味着媒体应该呈现多元的观点和声音，包括不同利益相关者的看法和意见，避免片面性和偏颇。这种包容的态度有助于提高新闻报道的多元性和客观性，符合中庸之道的包容精神。

因此，传统文化中的中庸之道与现代新闻报道的平衡原则在谦逊、审慎和包容等方面有着相似之处。这些观念对于新闻报道的角度和态度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有助于确保新闻报道的客观性、公正性和多元性，体现了传统文化与现代新闻报道的融合可能性。当报道一起社会事件时，例如一场政治示威活动，传统文化中的中庸之道与现代新闻报道的平衡原则可以得到应用。新闻报道需要平衡呈现不同参与者的观点和立场。报道应该包括政府官员、示威者、当地居民、专家学者等多方的声音和观点，以展现事件的多元性和复杂性。这符合中庸之道的追求平衡的精神，也体现了现代新闻报道的平衡原则。

（三）传统文化中的诚信观念与现代新闻业的信任建设

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之一，它强调诚实、守信和正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诚信被视为个人品德和社会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思想强调“仁、义、礼、智、信”，其中“信”即诚信。诚信被认为是人与人之间建立良好关系和社会和谐的基础。古代故事如“一诺千金”、“季布一诺”等都体现了诚信的重要性。

在新冠疫情期间，媒体的报道不仅仅是传递信息，更是对社会稳定和公众情绪的引导。在这一时期，传统文化中的诚信观念与现代新闻业的信任建设体现得尤为突出。除了媒体自身的报道行为，公众对媒体的信任也受到了考验。首先，传统文化中的诚信观念强调了诚实守信。在疫情期间，媒体需要通过诚实守信的报道来赢得公众的信任。例如，报道疫情数据、防护知识、医疗救治情况等信息时，媒体需要确保信息的真实性和客观性，避免夸大报道或者不实信息的传播，以此来赢得公众的信任。然而，一些媒体可能

会出于吸引眼球或者追求利益而夸大报道，甚至传播不实信息，这种行为会严重损害公众对媒体的信任。其次，传统文化中的诚信观念强调了言行一致。在疫情期间，媒体的言行需要一致，言出必行。媒体需要坚守新闻伦理和职业道德，确保报道的真实性和客观性，避免虚假报道和不当行为。只有媒体能够言行一致，才能赢得公众的信任。然而，一些媒体可能会在报道中言行不一致，或者出现不当行为，这也导致公众对媒体的信任受到质疑。

在这一背景下，一些媒体通过诚实守信的报道，及时准确地传递疫情信息，呼吁公众采取防护措施，报道医护人员的奋斗和患者的康复情况，这些报道赢得了公众的信任和尊重。相反，一些不负责任的报道、夸大事实的传播或者不实信息的散播，可能会导致公众的恐慌和不信任。因此，传统文化中的诚信观念与现代新闻业的信任建设在新冠疫情期间得到了具体的体现。媒体通过诚实守信的报道和言行一致的行为，赢得了公众的信任，也体现了传统文化中的诚信观念对于现代新闻业的重要指导意义。同时，这也提醒了媒体在报道中需要更加注重诚信和责任，以赢得公众的信任和支持。

四、新兴技术提升传统文化与新闻伦理的融合维度

2022年11月30日，一款由美国人工智能研究实验室OpenAI推出的以人工智能为基础的自然语言处理工具ChatGPT在全世界范围内传播并大受欢迎，短短5天内，它的注册用户数量已经突破了100万，是人类科技史上增长速度最快的消费者应用程序，甚至有人称之为强人工智能即将来临的契机与拐点。ChatGPT作为一款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应用，具有语言理解和文本生成能力，同时，它还能完成撰写邮件、视频脚本、文案、代码等任务，是一种以“对话+创作”为基础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在新闻传播领域，ChatGPT的应用能够为新闻媒体带来许多效益。首先，ChatGPT的内容生产功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代替新闻记者、编辑进行新闻内容的生产与发放，通过海量训练参数的投喂、自然语言处理、人类反馈强化训练等技术在解放新闻内容生产力的同时还能节省成本，实现降本增效的目的。其次，ChatGPT通过“一对一人机服务模式对用户数据的收集、整理，制定用户标签，再将标签形象化，建立数据库，依靠算法实现内容分发的精准匹配，增强用户黏性，提升内容影响力。最后，ChatGPT能根据用户内容需求为他们提供灵感、创意信息，同时通过用户的指令对新闻资源进行自主整合，在提高写作质量的前提下加速了内容生产。因此，ChatGPT被广泛应用在新闻传播领域，甚至有学者认为在未来ChatGPT能取代记者成为新的新闻生产者，给新闻行业带来无限的可能。但是，如果使用不慎，将会对新闻伦理带来一定的危害。新闻伦理是新闻生产和传播实践应该遵循的价值取向、专业规范和行为准则。刘涛认为常见的新闻伦理失范问题一般有三个“尺度”：一是新闻内容的层面，即新闻内容是否符合新闻的基本价值观，如真实性、客观性和公正性等原则；二是新闻报道是否违反了新闻行业的基本职业准则和道德规范，例如社会责任、程序正义等；三是新闻实践是否对个人造成了任何损害，比如侵犯隐私权或缺乏人文关怀等[9]。

一方面，传统文化强调尊重权威、尊重长辈、尊重知识，这些价值观在新闻报道中体现为对事实的尊重、对信源的核实以及对专业知识的尊重。而ChatGPT的出现可能挑战这一观念，因为它可以通过大量的数据训练和算法优化，提供快速准确的信息和答案，从而削弱了人类专家和知识的权威性。现代新闻伦理强调新闻的公正性、客观性和独立性。这些原则要求新闻工作者以及非新闻工作者在传播信息时保持中立，不偏袒任何一方，并遵循事实真相。这与传统文化中强调的中庸、和谐、平衡的价值观有一定的共通之处。

另一方面，在ChatGPT等人工智能工具的介入下，新闻生产的过程发生了变化，新闻的价值坐标也可能随之游移。ChatGPT等工具可以通过自动化写作和数据分析，提高新闻报道的效率和准确性。这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公众对快速、准确信息的需求。但这些工具可能会导致新闻报道的同质化，削弱新闻的独特性和深度。此外，由于ChatGPT等工具在训练过程中可能会受到数据偏见和算法偏差的影响，导致生成的新闻内容存在一定的倾向性。这可能会影响新闻的客观性和公正性，从而引发公众对新闻价值的质疑。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传统文化与现代新闻伦理之间存在着冲突与融合的关系。为了解决这些冲突，我们需要寻求传统文化与现代新闻伦理的融合。首先，我们可以在新闻生产中引入人工审核和编辑机制，对 Chat GPT 生成的内容进行审核和修正，确保新闻的真实性和客观性。其次，我们可以加强对 Chat GPT 等人工智能技术的监管和规范，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和伦理准则，防止其滥用和误用。总之，传统文化与现代新闻伦理的冲突与融合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我们在技术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过程中不断探索和创新。通过合理利用 Chat GPT 等人工智能技术，我们可以为新闻行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同时也要注意保护传统文化的价值和新闻伦理的原则。在 Chat GPT 等人工智能技术的推动下，新闻行业需要在坚守现代新闻伦理原则的同时，更好地传承和弘扬传统文化中的优秀价值观。

五、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新闻伦理的融合之策

(一) 承前启后：探索传统文化与现代新闻伦理的契合点

1. 强调传统文化中道德价值观的重要性：传统文化中强调的诚实、正直、公正等价值观与现代新闻伦理中的核心原则是相通的。在新闻报道中，可以将这些传统价值观与现代新闻伦理相结合，提高新闻的可信度和公信力。

2. 整合传统文化元素与现代新闻表达形式：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系副主任杨晓哲教授认为，如今各行各业与人工智能的结合都更加深入，学会与 AI 合作，将是今后每个人必备的能力，也是未来的大势所趋。随着越来越多的生成式人工智能产品逐渐渗入各行各业，AIGC 必将成为内容生产领域的主流新模式。当然，在 AIGC 推动行业智慧升级的同时，我们也必须厘清技术的双重影响，从而建立危机意识，防患于未然[10]。这意味着在新闻报道中，不仅要传承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念和精髓，还要灵活运用现代多媒体技术和表达手段，使传统文化元素得以生动展现，从而更好地传播传统文化的魅力和内涵。

3. 培养跨文化的理解与交流：为了更好地实现传统文化与现代新闻伦理的融合，需要加强跨界交流与合作。这包括与文化界、学术界、新闻界等多方合作，共同探讨传统文化与现代新闻伦理的融合之道，开展相关研究和实践项目，促进不同领域之间的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通过跨界交流与合作，可以更好地促进传统文化与现代新闻伦理的融合，推动新闻行业的发展与进步。

(二) 继往开来：平衡古韵与今律的适时代体系

1. 尊重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在融合传统文化与现代新闻伦理的过程中，首先要尊重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包括儒家的仁义礼智信、道家的自然和谐观念、佛家的慈悲善良等。这些价值观念贯穿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对于塑造新闻从业者的职业道德和行为规范具有深远的影响。

2. 灵活调整传统伦理观念：同时，随着社会的变革和新闻传播形式的多样化，传统文化中的伦理观念需要进行适度的调整和灵活应用。例如，传统文化中强调的“忠孝节义”等观念，需要在现代新闻报道中得到合理的转化和运用，以适应当下社会的多元化需求和新闻传播的特点。这就要求我们在融合传统文化与现代新闻伦理的过程中，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形成既具有传统文化特色又符合现代社会需求的新闻伦理体系。

3. 借鉴传统文化的智慧，完善现代新闻伦理：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智慧和经验，这些宝贵的遗产对于完善现代新闻伦理体系具有重要意义。儒家的“仁者爱人”、“义者行义”等思想，可以为现代新闻伦理提供宝贵的借鉴和启示，使其更加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因此，我们应当在融合传统文化与现代新闻伦理的过程中，深入挖掘传统文化中的智慧，结合现代新闻传播的特点和社会需求，不断完善新闻伦理体系，构建适应时代的体系。

(三) 融古铄今：构建适应时代的新闻伦理体系

1. 制定具体的行为准则：根据传统文化与现代新闻伦理的契合点，制定具体的行为准则，明确新闻工作者在报道、采访、编辑等方面应遵循的规范和标准。

2. 强化监督与问责机制: 鼓励公众参与新闻伦理的讨论和监督, 对于违反新闻伦理的行为进行严肃处理, 维护新闻行业的良好形象和社会公信力。

3. 持续教育与培训: 通过持续的教育与培训, 例如将传统文化和新闻伦理的相关内容纳入新闻专业的学术课程中, 培养学生对两者理解和应用能力。

总之, 传统文化与现代新闻伦理的融合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 需要各方共同努力。通过探索契合点、平衡古今体系以及构建适应时代的新闻伦理体系, 我们可以更好地发挥传统文化的优势, 提升新闻伦理水平, 为社会的和谐与进步做出贡献。

六、结语

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新闻伦理的融合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 需要我们不断地探索和实践。通过对传统文化的深入理解和尊重, 以及对现代新闻伦理的坚守和创新, 我们可以找到两者的契合点, 构建一个适应时代发展的新闻伦理体系。首先, 传统文化与现代新闻伦理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冲突, 主要表现在价值观念、观念对峙、原则冲突和实践冲突等方面。这些冲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新闻报道的客观性、公正性和道德性, 对新闻行业的健康发展构成了一定的挑战。其次, 传统文化与现代新闻伦理的融合是可能的, 我们发现了一些传统文化价值观念与现代新闻伦理原则之间的契合点。例如, 仁爱精神与新闻报道的体现、中庸之道与新闻报道的平衡、诚信观念与新闻业的信任建设等, 这些都为传统文化与现代新闻伦理的融合提供了可行性的路径。最后, 我们提出了一系列的策略与建议, 包括深入挖掘传统文化的伦理智慧、结合现代社会需求和新闻传播特点、强化新闻从业者的伦理教育与培训、建立新闻伦理与传统文化的对话机制等, 这些策略与建议为传统文化与现代新闻伦理的融合提供了实践指导和理论支持。

然而, 也要清醒地认识到研究中存在的不足之处。首先, 对于传统文化与现代新闻伦理融合的具体实践案例研究还不够深入, 提出了一些比较笼统的案例, 还需要进一步挖掘和分析。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深入探讨传统文化与现代新闻伦理的融合路径和方法, 以及如何在实践中更好地应用这些理论。同时, 我们也需要关注新兴技术对新闻伦理的影响, 如人工智能、大数据等, 探讨如何在新的技术环境下坚守新闻伦理的核心价值。希望本研究能够为传统文化与现代新闻伦理的融合提供一些有益的思考和启示, 促进新闻行业的健康发展和社会的和谐进步。

参考文献:

- [1] 黄克剑.《论语》解读[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210.768.
- [2] 文敏.孟子德性伦理思想研究[M].云南大学出版社:202210.265.
- [3] 张静.中国传统文化解读及其当代价值探索[M].新华出版社:202305.139.
- [4] María L ,Susana D H .News Media Innovation Reconsidered:Ethics and Values in a Creative Reconstruction of Journalism[M].John Wiley & Sons, Inc.:2021-03-24.DOI:10.1002/9781119706519.
- [5] 范渊凯.浅析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对我国新闻道德的影响[J].传媒观察,2011,(07):34-36.DOI:10.19480/j.cnki.cmgc.2011.07.012.
- [6] 王秋菊,朱良志.社会化媒体舆论失焦: 现象、成因及应对策略[J].中国编辑,2023,(06):28-33.
- [7] 季为民.数字媒体新闻伦理研究的新观点、新问题和新趋向[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0,42(04):31-37.
- [8] 龙耘. 中国文化与现代传播[M].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6.
- [9] 贾立.我国新闻伦理的现实评价和未来构建[D].内蒙古大学,2012.
- [10] 胡正荣,李涵舒.颠覆与重构: AIGC 的效用危机与媒介生态格局转化[J].新闻与写作,2023,(08):48-55.

The confrontation and integration between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contemporary journalism ethics

Wang Caiming¹, Tian Leiya²

Lanzhou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Lanzhou, China

Abstract: There exists a complex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modern journalism ethics. Traditional culture contains many concepts regarding morality, ethics, and values, which can influence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journalism ethics. The research aims to explore the conflicts and integration between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modern journalism ethics, and analyze their manifestations in practice. The research employs comparative analysis and case study methods to deeply analyze the conflicts between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modern journalism ethics in terms of value concepts, conceptual oppositions, principles, and practical aspects. Subsequently, it explores the possibility of integration between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modern journalism ethics from aspects such as the spirit of benevolence, 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and the concept of integrity, and demonstrates their manifestations in actual reporting through case studies. Finally, it proposes strategies and suggestions for the integra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modern journalism ethics, including exploring convergence points, balancing ancient charm and modern norms, and constructing a journalism ethics system.

Keywords: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modern journalism ethics; value concepts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2.663

线性代数课程思政：以数学之美育时代新人

赵赫¹于晟伟^{1*}王洪庆¹何永明¹

(¹中国消防救援学院，北京 102202)

摘要：本文探讨了线性代数课程思政的必要性、思政元素挖掘及实施策略，重点结合线性代数与消防安全领域的实际案例，如火灾模拟与预测、消防资源优化配置、消防装备性能分析等，阐述了线性代数在解决实际问题中的重要作用。通过教学内容设计、教学方法创新和教师自身建设等策略，将思政元素有机融入线性代数教学，实现了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的同频共振。实践表明，该课程思政模式有效提升了学生的知识掌握水平、科学精神和责任感。未来需进一步完善评价体系，推动课程思政向更高质量发展，助力学生成为德才兼备的时代新人。

关键词：线性代数；课程思政；矩阵运算；育人模式；消防救援

一、引言

线性代数作为高校理工科及部分文科专业的重要基础课程，不仅是数学知识的传递，更是培养学生逻辑思维、抽象能力与创新精神的关键载体。在新时代教育背景下，课程思政成为教育改革的重要方向，将思政元素有机融入线性代数教学，旨在实现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的同频共振，助力学生成为德才兼备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将线性代数与消防安全相结合，不仅能够为消防领域提供科学支持，还能让学生在学习中深刻体会到数学的实际应用价值和社会责任。

课程思政这一概念最早由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于2014年提出并在上海本地高校进行试验，最终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的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座谈会中明确提出，“其他各门课都要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从而要‘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努力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1]。教育部2020年《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明确指出，要把思想政治教育贯穿于人才培养体系，全面推进高校课程思政建设，发挥好每门课程的育人作用，提高高校人才培养质量^[2]。

通过研究与数学有关的部分课程思政参考文献，发现从事数学教育研究的同行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不少数学课程思政方面的教学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大致可以分为三种。

第一种是以数学中的具体知识点作为课程思政融入点，详细介绍课程思政的融入方法。郑红梅等^[3]以可逆矩阵的概念以及应用为例，探讨了线性代数与思政教学的有机融合。丛静^[4]以“线性相关和线性无关”为例，介绍了如何在线性代数课程教学中融入思政教育，并给出了具体的教学分析和教学过程。王淑霞等^[5]以行列式的概念为例，剖析了行列式概念中蕴含的思政元素，并给出了在线性代数教学中如何实施课程思政的具体过程。

第二种是从理论上进行理解和分析，将育人目标融入数学教育中，利用特定方法对思政元素进行分析。

作者简介：

[1]赵赫（1997—），男，北京人，中国消防救援学院助教，首都师范大学硕士。

[2]于晟伟（1995—），男，吉林长春人，中国消防救援学院讲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博士。

[3]王洪庆（1977—），男，黑龙江双鸭山人，中国消防救援学院副教授。

[4]何永明（1978—），男，江西南昌人，中国消防救援学院副教授。

熊显萍等^[6]根据“线性代数”课程高度抽象和离散化的特点，全面分析线性代数课程思政育人优势，结合“线性代数”课程思政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及难点，构建“三环六步”课程思政教学路径并进行实践探索。刘媛媛^[7]以“线性代数”课程为例，深入探究基于OBE理念的课程思政学习效果评价体系构建，首先分析OBE理念与课程思政的结合模式，着重讨论其在“线性代数”教学中的创新应用及实践策略。梁填等^[8]基于地方院校线性代数课程教学的实践探索，剖析当前线性代数课程思政融入的常见误区，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在此基础上梳理基于案例式教学的线性代数课程思政教学方法。冯曼^[9]从高等院校的教学实践出发，研究了在《线性代数》课堂教学中如何进行科教融合和课程思政，探讨了新型的OMO教学模式，鼓励学生参与教学实践。

第三种是根据教学内容精心挖掘，提炼出可供深度融合的思政元素。李忠广等^[10]基于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标准，结合自动化专业需要，从课程思政、专业需求、软件辅助及考核方式四个方面探讨线性代数课程教学改革。卢金花^[11]首先给出课程思政的核心要求和教育目标，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以应用为导向的教学设计，包括课程思政元素的融入和基于实际应用场景的教学案例，最后提出线性代数课程的评价与改进方式。詹亮等^[12]以西华大学线性代数课程为例，分析线性代数的学科和学情特点。围绕政治认同、国家意识、文化自信和公民人格四大核心要点，从可视化的教学内容、体系化的教学方法和教学全过程展现课程思政元素和实践课程思政，列举大量的思政元素案例，为线性代数课程思政教育提供一定的参考。伊晓玲^[13]从线性代数的基本概念与理论框架、实际应用中的重要性、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应用以及实际问题求解方法等方面，全面审视面向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线性代数教学内容，剖析线性代数教学中存在的现实困境，并从课程思政的视角提出针对性的优化策略，包括理论实践融合、教学方法创新和评价体系优化等方面，以期促进线性代数教学的发展。

现有的参考文献里，课程思政在线性代数教学中涉及面越来越多，考虑到线性代数六章内容知识面较广、授课课时较少，现有的课程思政研究内容和教学设计数量难以满足需求，有些重点内容并没有覆盖，因此需要同行们更多地研究思政融入问题，比如线性代数课程比较重要的概念，例如对换，不仅在理论上占有重要地位，还在实际应用中有着广泛的应用，在课程思政融入上需要创意新颖的教学设计思路。

课程思政建设全面深入实施，要紧紧抓住教师队伍“主力军”，课程建设“主战场”，课堂教学“主渠道”，合理选取、恰当融入，以“盐融于水”“春风化雨”形式应用于课堂教学。线性代数不仅是理工科学生必备的基础知识，也是跨学科研究的重要工具，无论是物理、化学、工程学还是经济学都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对换是线性代数中的一个基本概念，是线性代数中一个至关重要的知识点，在理论上和实用上都有重要作用。本文除课程思政、实际应用外，以“对换”相关内容为例，针对选定教材^[14,15]中提取的教学案例，充分挖掘蕴含的课程思政元素并给出教学方法，以备同行参考。

二、线性代数课程思政的必要性

(一) 学科特性与育人使命

线性代数以其高度的抽象性、逻辑性和系统性著称。从矩阵运算到线性空间，从特征值到线性变换，每一个概念、定理都蕴含着严谨的数学思维。这种思维训练能够培养学生一丝不苟的科学态度和追求真理的精神。然而，仅从知识层面教学，学生可能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难以深刻领悟数学的内涵与价值。课程思政的融入，能够将数学知识背后蕴含的哲学思想、科学精神、文化传承等思政元素挖掘出来，使学生在掌握知识的同时，接受思想洗礼，明确学习目的，增强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

(二) 应对时代挑战与需求

当今世界，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前沿领域蓬勃兴起。这些领域都离不开线性代数的支撑，如矩阵理论在图像处理、机器学习算法中的广泛应用。同时，时代也呼唤具有创新精神和家国情怀的高素质人才。通过线性代数课程思政，可以引导学生关注学科前沿与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激发学生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热情，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爱国精神，使他们在未来的学习与工作中能够为国家的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贡献力量。

三、线性代数课程中的思政元素挖掘

(一) 数学史与文化传承

线性代数的发展历程是一部人类智慧的结晶史。从克莱默提出克莱默法则，到凯莱创立矩阵理论，再到希尔伯特对线性空间的系统研究，每一个重要成果都凝聚着数学家们的心血与智慧。在教学中，教师可以穿插介绍这些数学史故事，让学生了解线性代数知识的来龙去脉，感受数学家们勇于探索、不畏艰难的

精神。同时，介绍中国古代数学家在矩阵理论等方面的贡献，如《九章算术》中的方程组解法，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与文化自信，使学生认识到数学是全人类共同的财富，传承与发扬数学文化是每个学习者的责任。

（二）科学精神与思维品质

线性代数的学习过程是对学生科学精神和思维品质的全方位锤炼。在矩阵运算中，学生需要遵循严格的运算规则，这培养了他们的严谨性；在解决线性方程组问题时，学生要运用多种方法，如高斯消元法、克拉默法则等，这锻炼了他们的灵活性；在抽象的线性空间概念学习中，学生需要从具体到抽象、从特殊到一般地思考问题，这提升了他们的抽象思维能力。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将这种科学精神和思维品质迁移到其他学科和生活中，培养他们实事求是、勇于创新、善于思考的品质，使其成为具有科学素养的现代公民。

（三）团队协作与社会责任

线性代数课程中的一些复杂问题，如大型矩阵的求解、线性规划的实际应用等，往往需要学生分组合作完成。通过小组讨论、分工协作，学生能够学会倾听他人意见、发挥自身优势、共同攻克难关，培养团队协作精神。同时，教师可以结合实际案例，如线性代数在经济预测、资源分配、环境保护等领域的应用，引导学生思考如何运用数学知识为社会解决实际问题，增强他们的社会责任感，使学生明白数学学习不仅仅是为了考试，更是为了服务社会、造福人类。

四、线性代数与消防安全的结合

2018年11月9日，习近平向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授旗并致训词，代表党中央向全体消防救援人员致以热烈的祝贺并强调，组建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是立足我国国情和灾害事故特点、构建新时代国家应急救援体系的重要举措，对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维护社会公共安全、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具有重大意义^[16]。通过学好数学基础学科，培养学员严密逻辑思维能力，教育引导学员树立为国家消防救援事业无私奉献的精神品质。

（一）火灾模拟与预测

线性代数中的矩阵理论和数值计算方法在火灾模拟与预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利用火灾动力学模拟器(FDS)对火灾进行建模和模拟时，需要通过矩阵运算来处理复杂的热传导、对流和辐射等物理过程。通过建立线性方程组，可以对火灾发生后的烟气流动、温度分布等进行定量分析，从而为消防员提供更准确的火灾现场信息，帮助他们制定更有效的灭火策略。

（二）消防资源优化配置

线性代数中的线性规划方法可以用于优化消防资源的配置。例如，通过建立线性规划模型，可以确定在不同区域配置消防站、消防车辆和消防员的最佳数量，以确保在最短时间内到达火灾现场并进行有效扑救。这种方法可以提高消防资源的利用效率，减少火灾损失。

（三）消防装备性能分析

线性代数中的向量和矩阵运算可以用于分析消防装备的性能。例如，在研究消防员防护服的热防护性能时，可以通过建立热传导模型，利用矩阵运算来计算防护服在不同热环境下的温度分布。这有助于设计更高效的防护装备，提高消防员的安全性。

（四）实际案例分析

1. 纯电动SUV汽车火灾数值模拟分析^[17]

在某纯电动SUV汽车火灾案例中，研究者通过建立整车火灾模型，利用线性代数中的矩阵运算和数值方法，对火灾的燃烧进程、火焰传播、热释放速率、车内不同位置温度变化以及驾驶员位置烟雾进行了详细分析。结果表明，火灾蔓延呈现明显的阶段分化，分为电池包内热扩散、车厢内可燃物燃烧及整车全面燃烧三个阶段。通过这种模拟分析，可以为消防员提供火灾现场的详细信息，帮助他们更好地制定灭火策略，减少火灾损失。

2. 灭火救援作战训练安全避险能力评估^[18]

在消防救援队伍的作战训练中，运用线性代数中的层次分析法，可以构建面向实战的作战训练安全避

险能力评估指标体系。通过分析近年来典型伤亡案例,研究者从作战类型、人员特征、灾害特点、地域特征和伤亡原因等方面对作战训练安全事故进行分析研究。这种方法可以帮助消防部门更好地评估和提高作战训练的安全性,减少人员伤亡。

森林火灾扑救是对森林火灾采取的控制和扑灭措施,目的是使火灾造成的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消防安全对于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稳定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19]。在学习过程中,可安排学员观看消防员现场灭火的视频,以此作为切入点感受森林火灾的巨大危害。

五、线性代数课程思政的实施策略

(一) 教学内容设计

教师在备课时要深入挖掘线性代数教材中的思政元素,将其有机融入教学内容。例如,在讲解矩阵时,可以结合航天工程中矩阵的应用,介绍我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历程,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在讲解线性空间时,可以引入量子力学中的希尔伯特空间概念,引导学生思考数学与物理学的交叉融合,拓展学生的学科视野。同时,编写课程思政教学案例集,将思政元素以生动具体的形式呈现给学生,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能够直观地感受到数学与思政的紧密结合。

(二) 教学方法创新

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方法,增强课程思政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例如,运用案例教学法,选取与线性代数相关的真实案例,如火灾模拟、消防资源优化配置等,引导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同时在案例分析过程中融入思政教育,让学生在实践中体会数学的价值与社会责任;运用小组讨论法,组织学生围绕线性代数中的难点问题或思政主题展开讨论,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和批判性思维;运用多媒体教学手段,制作精美的课件、视频等教学资源,将抽象的数学知识和生动的思政故事相结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下面我们以“对换”教学为例进行说明。讲述对换定义后,加入互动环节:

案例 首先,请出6名同学,在教室前3人一行列队,两行从左至右将所站位置依次编号,且位置编号不进行改动:

1	2	3
1	2	3

第一行向后转,两行同学面对面站立并记住自己面对的同学,之后集体向后转背对背。第一行站在1号和2号位置的同学交换位置,之后站在1号和3号位置的同学交换位置;第二行站在1号和3号位置的同学交换位置,之后站在1号和2号位置的同学交换位置。站定后集体向后转,按最初站位标号的话现在同学们的站法如下:

3	1	2
2	3	1

两行同学进行的指令相同,只是顺序不同,但是造成的结果完全不同,以此提示同学们要按规矩行事,无论是数学、训练还是生活,不能因为看似毫无影响就不注意行事顺序或工作纪律,顺序的更改可能会造成完全不同的结果,甚至可能酿成不可挽回的事故。

(三) 教师自身建设

教师是课程思政的关键实施者,其自身的思想政治素质和教学能力至关重要。教师要不断加强自身政治理论学习,深入领会党的教育方针和课程思政的内涵要求,提高政治站位,增强课程思政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同时,教师要深入钻研线性代数专业知识,提升教学水平,善于挖掘和运用思政元素,做到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的无缝对接。此外,教师还应积极参与课程思政培训、教研活动和教学改革实践,不断总结经验,提高课程思政的实施效果。

六、线性代数课程思政的实践效果与反思

(一) 实践效果

经过一段时间的课程思政实践,学生在多个方面表现出积极变化。在知识掌握方面,学生对线性代数

知识的理解更加深刻，学习兴趣显著提高，成绩也有所提升；在思想观念方面，学生对数学的价值有了更全面的认识，爱国情怀、社会责任感和团队合作意识明显增强；在综合素质方面，学生的创新思维、逻辑思维和抽象思维能力得到进一步锻炼，综合素质得到全面提升。

（二）反思与展望

尽管线性代数课程思政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在实践中仍存在一些问题。例如，部分教师对课程思政的理解还不够深入，存在生硬说教或思政元素与专业知识结合不够紧密的现象；课程思政评价体系还不够完善，缺乏科学合理的评价指标和方法，难以全面、客观地衡量课程思政的实施效果。未来，应进一步加强教师培训，提高教师课程思政能力；完善课程思政评价体系，建立以学生为中心的多元评价机制；加强课程思政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不断总结经验，优化课程思政实施方案，推动线性代数课程思政向更高质量、更深层次发展。

课程思政就是指在日常教学过程中融入思政元素，其目的就是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为消铸盾，培养学员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升学员的政治意识和思想道德修养。本文以线性代数课程中教学案例为基础，分别从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思想、刻苦钻研的学术精神、严谨细致的规矩纪律意识、赴汤蹈火为消铸盾的奉献精神等角度充分挖掘育人思政元素，紧贴消防救援岗位实际，使学员提高学习数学的兴趣，让教师在教学中更好地履行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为基础学科、基础课程的课程思政案例式教学提供参考和借鉴。

七、结论

线性代数课程思政是新时代高校教育改革的重要举措，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通过深入挖掘线性代数课程中的思政元素，创新教学方法，加强教师自身建设，能够有效实现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的有机统一，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文化素养和社会责任感，为国家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奠定坚实基础。在未来的教学实践中，我们应不断探索和创新，持续优化线性代数课程思政的实施路径，让数学之美与思政之光在学生心中交相辉映，助力学生成长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时代新人。

参考文献：

- [1]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 12 月 7 日至 8 日在北京召[N]. 北京：新华社， 2016.
- [2]教育部关于印发《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的通知[N]. 北京， 2020.
- [3]郑红梅，马引弟，和斌涛.立德树人视域下“高等代数”课程思政探索与实践[J]. 黑龙江教育(理论与实践), 2025, 1: 95-97.
- [4]丛静.培根铸魂润物无声——例谈线性代数教学中课程思政的实施[J]. 辽宁科技学院学报, 2024, 26(04): 71-73+104.
- [5]王淑霞，阎欣华，杜建卫.“线性代数”课程思政案例探索与实践[J]. 教育教学论坛, 2023, 32: 98-101.
- [6]熊显萍，梁永丁.“线性代数”课程思政的育人价值与实践探索[J]. 兴义民族师范学院学报, 2024, 5: 80-85.
- [7]刘媛媛.基于 OBE 理念的课程思政学习效果评价体系构建研究——以“线性代数”课程为例[J]. 科学咨询 (教育科研), 2024, 10: 30-33.
- [8]梁填，张文超.基于案例式教学的线性代数课程思政教学改革实践与探索[J]. 大学教育, 2024, 20: 82-86.
- [9]冯曼.新工科背景下本科院校《线性代数》课程教学研究与实践[J]. 宿州学院学报, 2024, 39(09): 76-80.
- [10]李忠广，田秀梅，周景雷. 工程教育专业认证背景下线性代数教学改革[J]. 造纸技术与应用, 2025, 53(01): 66-68+71.
- [11]卢金花.课程思政视域下以应用为导向的线性代数教学改革[J]. 学周刊, 2025, 1: 13-17.
- [12]詹亮，裴峥.线性代数课程中思政元素的发掘与实践[J]. 中国教育技术装备, 2024, 7: 61-64.
- [13]伊晓玲.课程思政视域下面向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线性代数教学策略优化[J].知识窗(教师版), 2024, (08):96-98.
- [14]同济大学数学科学学院.线性代数 第七版 [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3.
- [15]同济大学数学科学学院.线性代数附册 学习辅导与习题全解 第七版[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3.
- [16]新华网《永远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习近平为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授旗并致训词侧记》[N]. 2018.
- [17]郭琦琳，陶亮宇，马哲树，等.纯电动 SUV 汽车火灾数值模拟分析 [J]. 储能科学与技术:1-9[2025-03-20].DOI:10.19799/j.cnki.2095-4239.2023.0762.

- [18] 崔或宁. 灭火救援作战训练安全避险能力评估指标体系构建[J]. 中国警察大学学报, 2024, 40(2): 68-74.
- [19] 《森林防火条例》(国务院令第 541 号) [M]. 2008.

Linear Algebra Cours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ultivating New Era Talents with the Beauty of Mathematics

Zhao He¹, Yu Chengwei^{1*}, Wang Hongqing¹, He Yongming¹

¹ China Fire and Rescue Institute, Beijing 102202,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necessity of integrat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ours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ourse IPE) into linear algebra courses, the mining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and the implementation strategies. It focuses on the practical cases of linear algebra in the field of fire safety, such as fire simulation and prediction, optimization of fire-fighting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analysis of fire-fighting equipment performance, elaborating on the important role of linear algebra in solving practical problems. By designing teaching content, innovating teaching methods, and strengthening the self-construction of teacher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are organically integrated into the teaching of linear algebra, achieving the resonance of knowledge imparting and value guidance. Practice shows that this course IPE model effectively improves students' knowledge mastery, scientific spirit, and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In the future, it is necessary to further improve the evaluation system and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ourse IPE to help students grow into well-rounded talents with both moral integrity and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Keywords: Linear Algebra; Cours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ourse IPE); Matrix Operations; Talent Cultivation Model; Fire Rescue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2.630

记忆史视野下的孙中山研究

——评《崇拜与记忆——孙中山符号的建构与传播》

罗 嫣¹, 谭 洁¹

(¹湘潭大学, 湖南 湘潭 411105)

摘要: 20世纪70年代, 新文化史在西方兴起, 并呈蔚为大观之势。新世纪以来, 中国史学界受此影响, 产生一批新文化史研究成果。陈蕴茜于2009年出版的《崇拜与记忆——孙中山符号的建构与传播》一书是运用历史记忆理论研究中国近代史问题的一部力作。陈著从记忆视角出发, 结合象征符号等跨学科研方法对后孙中山时代进行考察, 探究政治权力、社会记忆与孙中山崇拜生成的内在关联, 具有重要学术价值。记忆作为沟通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桥梁, 更需以较长时段视角加以审视、考察, 特别是注重底层人物的声音, 由此才能推动记忆史研究走向深入。

关键词: 《崇拜与记忆》; 记忆史; 孙中山; 建构

一、引言

20世纪70年代, 西方学界出现了以“语言学转向”与“文化转向”为标志的重大学术转向, 后现代主义思潮盛行。后现代主义强调“消解宏大叙事, 颠覆精英文化, 提倡文本化的历史研究”^[1], 对20世纪初兴起的“新史学”研究方法产生巨大冲击。受此影响, 西方史学界开始从注重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转向注重人文方法, 新文化史由此兴起。记忆史作为新文化史研究内容之一, 有力地促进了新文化史研究的发展。在中国近代史领域, 部分学者已运用记忆理论进行研究, 并产出具有一定学术地位的研究成果, 较具代表性的有周海燕《记忆的政治》(下文简称“周著”)、[美]柯文《与历史对话: 二十世纪中国对越王勾践的叙述》等。上述著作较为鲜明地体现了象征符号与表象史、记忆史研究相结合的特点。

陈蕴茜于2009年出版的《崇拜与记忆——孙中山符号的建构与传播》(下文简称“陈著”)一书是运用历史记忆理论研究中国近代史问题的一部力作。陈著广泛运用人类学、时间空间、文化记忆、象征符号等跨学科理论, 极大地突破了既往政治史研究的模式, 实现了研究方法的创新。陈蕴茜极尽史料搜罗之能, 不仅运用丰富的档案史料, 还采集了大量报刊、地方志、回忆录、文史资料等, 全方位展现出国民党对孙中山崇拜的建构之路。该书既是中国新文化史研究的开拓之作, 亦是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又一学术丰碑。

二、主要创见与学术价值

孙中山是清末民初中国政局的领袖人物, 中国人将其比作“中国的华盛顿”, 尊称其为“国父”。孙中山逝世后, 各政派势力围绕其事迹、思想等展开一系列的争夺与建构。正如德国史学家扬·阿斯曼所言, “过去在记忆中不能保留其本来面目, 持续向前的当下生产出不断变化的参考框架, 过去在此框架中被不断重新组

^① [作者简介]

[1]罗嫣(1999—), 女, 浙江衢州人, 湘潭大学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碧泉书院)硕士研究生。

[2]谭洁(2000—), 女, 四川广元人, 湘潭大学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碧泉书院)硕士研究生。

织”。而记忆正是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桥梁，“记忆不仅重构着过去，而且组织着当下和未来的经验”^[2]。因此，运用社会记忆理论，结合象征符号等跨学科研究方法对后孙中山时代进行研究，探究政治权力、社会记忆与孙中山符号建构的内在关系，具有重要学术价值。从实践结果看，作者的研究既全面展现了孙中山符号的建构过程，亦较为充分地说明了孙中山符号建构的实际效果及历史影响。笔者不揣冒昧，在下文试图概述该书的学术创见及主要观点，总结该书的学术价值，并将读毕后的有关思考予以表达。

该书由“导言”“结语”及中间九章内容构成，全书凡60余万字，600余页，可谓一皇皇巨著。考察孙中山生前思想与行动中存在的个人崇拜因素，以及孙中山去世初国民党神化孙中山的行动是本书的主要内容之一。在思想方面，作者注意到，“孙中山不承认民众是认识和改造社会的主体，将全国四万万人都说成是需要先知先觉唤醒其觉悟的‘愚蠢的’阿斗”^[3]。孙中山“军政——训政——宪政”的革命三阶段理论，“知易行难”的哲学思想、早年接受的儒学教育等，皆为其生前死后的个人崇拜，以及之后的蒋介石崇拜提供理论依据。在行为层面，孙对同盟会内的异见者或挑战其权威的同志，并非以宽容谋取和解，而是将个人凌驾于同盟会之上，认为只有自己才是同盟会的领导。在此后发动二次革命，成立中华革命党，掀起护法运动的历次政治行动中，孙中山对个人集权的追求从未中断。“孙氏及其追随者都在有意无意地将他塑造为至高无上的权威，从而开启了初期的个人崇拜”^[4]。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垄断孙中山的政治遗产，极力抬升“总理遗嘱”与“总理遗教”，通过建构、推广孙中山崇拜寻求统治合法性。

为揭示孙中山崇拜何以被建构，作者从仪式角度对孙中山符号进行考察。仪式具有特定时空场域。“仪式的作用是要使集体的认同体系保持活跃而不至于陷入停滞状态。仪式将那些与认同相关的知识传达给每个参与者。”^[5]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通过追悼仪式及奉安大典等神圣仪式，“使仪式参与者感受到孙中山符号的至圣地位，并在仪式的宣传、动员、操演中体认孙中山符号”^[6]。各种神圣仪式既使孙中山符号“进入”仪式参与者的记忆，又塑造整个社会共同的集体记忆。除对特定的神圣仪式进行考察外，陈著还对日常政治仪式进行考察，探究重复进行的常态仪式对社会有关孙中山记忆的影响。在各种日常仪式中，作者尤为关注学校周期性仪式。国民党以政治权力督促各级各类学校严格按照规定举行各类纪念日仪式。国民党通过各种日常仪式，“塑造出一种形式化与概念化的孙中山。这既是孙中山个人被神圣化的过程，同时也是国家权力被神圣化的过程”^[7]。但由于国民党“过于直接地在仪式中表达政治意图，因而忽略了仪式过程及其象征功能的非实用性”^[8]，致使仪式过于日常化与实用化，在一定程度上也引起仪式参与者的厌烦和抗拒。

此外，作者从时间、空间角度出发，探究时空是如何经政治操演，进而塑造孙中山崇拜的。在时间层面，作者以总理纪念周、植树节、有关孙中山的系列纪念日作为考察对象。其运用“制度时间”与“日常时间”理论，揭示国民党如何通过各类制度时间来建构孙中山符号，推动孙中山记忆进入社会生活。国民党通过主动参与、权力强制、宣传教育、出版刊物等方式，在各种“制度时间”中使国民党、各社会阶层等参与到对孙中山的纪念活动中，“让人们在实践中形成对孙中山的集体记忆，接受国民党意识形态教化”^[9]。国民党还注重吸收中国民间传统纪念日的文化资源，希冀促使孙中山崇拜能够深入民间。

在空间层面，作者将空间分为神圣空间、政治空间、教育空间、日常空间等各个方面，在关注神圣性、政治性较强的中山陵、中山纪念堂等空间的同时，亦关注较为下层的文本空间（教材）、校园空间。作者还考察行政规划、市政公园等市政系统、休闲娱乐空间与孙中山符号建构的关联。国民党通过在各类空间中嵌入孙中山崇拜的具体形式（文字、雕塑、遗像等），实现空间建构的多样化，“通过空间定位、象征语言，以实现符号意义的再现，并借由其他象征符号的辅助建构，凸显中山符号的深刻内涵，进而体现符号霸权的内在张力，催化民众对中山符号的接受与认同”^[10]。

在国民党的强力推动下，政府官员、社会精英、商人团体、下层民众都参与到孙中山崇拜运动中，形成对孙中山的不同群体记忆。政府官员借助孙中山符号进行诉求表达，社会精英以孙中山符号批判国民党黑暗统治，商人利用总理遗像等孙中山象征物牟取商业利益，下层民众将孙中山符号作为“弱者的武器”。

统治与回忆之间存在密切关联，统治“以回溯的方式论证自己的合法性，并以前瞻的方式使自己变得不朽”^[11]。“国民党竭力加强全民对孙中山的记忆，以便为自己的统治寻求更多的合法性资源”^[12]。但国民党所希冀建构的孙中山崇拜与记忆并未完全达到预设，民众心目中的孙中山记忆亦未与国民党宣传的孙中山记忆保持一致，孙中山记忆在不同社会阶层中呈现出明显差异性。此外，由于孙中山崇拜运动的自身缺失，“造成崇拜运动与民间社会的分离，又使这场运动难以深入农村社会，孙中山也未能真正幻化为民间崇拜的神祇”，最终“孙中山崇拜运动并没有真正获得成功”^[13]。

陈著既在史料方面搜罗详尽细致，又运用跨学科理论；既关注历史重大问题，又回应现实关切，揭示出国民党与孙中山崇拜、孙中山符号与现代民族国家建构、孙中山崇拜与社会记忆的关联，为后孙中山时代的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其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第一，陈著是运用新文化史方法研究中国近代史具体问题的重要实践成果，丰富了中国新文化史研究。“下层社会是拙于舞文弄墨的一个群体，往往行事不留痕迹，靠的是对手的笔墨因缘而传世”^[14]。新文化史即力图在下层社会研究领域进行突破。作者笔下主体多元，既关注政党团体、社会精英，又尝试书写下层民众，特别是运用回忆录、文史资料、地方志、课本、图片等史料，甚至进行实地景观考察。作者在进行宏大叙事的同时，加入一定程度的微观考察，具有前瞻性、创新性。

第二，陈著是理论与史料结合的典范。新文化史注重借鉴文化人类学、符号象征等学科理论，将之运用于历史研究。史家对历史的书写易出现“以论代史”问题。若稍有不慎，各类史料易成为理论的注脚，这样的历史研究也就成为其他学科自证理论的素材，致使历史研究丧失主体性。陈著恰当实现理论与史料结合，既运用各种跨学科理论，又未进行预先的价值判断和理论预设，并广泛采集各种史料，建立在扎实的史料实证基础上运用跨学科理论，很好地做到“史论结合”，不失为运用跨学科理论进行历史研究的经典之作。

三、余论

如前所言，新文化史关注底层民众，但“研究底层民众，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如何找到题目的‘声音’，也就是说，庶民怎样表达其政治态度并发出自身的诉求”。^[15]具体而言，史料问题是记忆史研究特别是发掘底层社会记忆研究的困境所在。就陈著而论，因其研究孙中山崇拜及记忆在全国各地、社会各界的建构与传播情况，占社会大多数的下层民众势必成为其重要考察对象。正如前文所言，陈著很好地展现下层民众是如何受国民党政治力量的安排，被动参与到孙中山崇拜中去，但却未能呈现出民众主动参与孙中山崇拜，甚至解构孙中山崇拜的一面。譬如，有关孙中山的各类纪念日作为一种对日常生活的制度安排，参与其中的民众感受究竟如何？重复且繁杂的各种纪念日是否消解民众对孙中山的崇拜？针对这一问题，作者虽援引部分人物回忆录作出说明，但透过这些人物难以透视整个下层民众在孙中山崇拜运动中的全貌。就记忆层面讨论，陈著展现的似乎更多是孙中山记忆如何通过各种制度时间、特定空间场域“进入”民众内心世界，在不断重复的仪式中巩固记忆。但各种政治活动是否达到国民党的预期，广大底层民众，特别是占人口绝对数量的农村群体是否得以建构起有关孙中山的集体记忆？作者在结语中虽在理论层面、宏观层面作出解释，认为国民党发起的这场运动难以深入农村社会，但仍缺乏相应的史料支撑。这一问题的解决或有待于更多仪式“参与者”的史料被发掘。

近代中国饱经战乱，缺乏和平稳定的国内环境，教育资源不足、教育普及程度较低，致使民众知识水平整体较为低下。传统专制政权长期对民众进行压制，民众政治观念匮乏，思想有待解放。下层民众本就不擅长以文字形式留下自身历史的“证据”，上述缘由则更让底层史料留存欠缺可能。日记、回忆录、文史资料是中国近代史领域进行记忆史研究的重要史料。自清季以至当代，个人日记与书信的留存数量尤为丰厚，改革开放后还出版大量的回忆录及文史资料。但整体来看，大部分史料更多记录的是中上层人物的历史，特别是重要政治人物、社会文化精英的历史，进行下层研究明显存在困难。^②当下，口述史研究不断兴盛，大量口述史资料整理出版，为深化中国近代记忆史研究提供更多可能。美国历史学家柯文所著《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充分运用山东大学采访、收集到的有关义和团运动亲历者的口述材料。该著作虽不是一部记忆史研究专著，但运用历史记忆的研究方法。诚如其所言：“‘参加义和团运动的经历’已成历史，或者留在记忆里，或者忘记，或者复述，或者歪曲。”^[16]口述史注重对下层民众的研究，所获口述资料虽具有主观性，但记忆本身亦具有主观性，两者在此方面合流。口述资料为深化中国近代记忆史研究提供又一丰富史料资源。当下的口述史研究，注重抢救性发掘新中国成立前后，特别是建国初年一般人物所经历的重大历史事件。由于年龄原因，许多中国近代史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见证者，今天正不断减少，用口述史资料研究新中国成立前近代中国下层社会的历史记忆难免存有缺憾。

记忆作为沟通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桥梁，更需以较长时段视角加以审视、考察。前文所提周著既运用历史记忆理论，又注重以较长时段视角观察作为过去的历史事件是如何在事后不断被发掘、被建构的。该著作研究的虽是大生产运动，但关注的不是大生产运动本身，而是大生产运动是如何作为一种历史资源，在特定时刻被提起、重复，最终得以在群体记忆里不断流传、延续。该著虽已出版良久，但提供打通中国

^② 戴海斌在《近代史研究》上发表的《亲历、见证与记忆：庚子事变中的几个“小人物”》一文可谓别出心裁。其考察了三个“小人物”是如何参与到庚子事变中去的。值得注意的是，其所研究的“小人物”本身并无历史记录，小人物的行动“痕迹”全部出于他者的记录。因此，从他者记载角度研究小人物、下层民众，不失为一条路径。参见戴海斌：《亲历、见证与记忆：庚子事变中的几个“小人物”》，《近代史研究》，2022年第4期。

近代史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一条实践路径。此外，牛保秀发表的《八十年来中共纪念话语中的白求恩形象》^[17]一文，从较长时段的视野出发，考察中共是如何在纪念活动中不断因时因势建构白求恩形象。该文虽从纪念视角出发，但“纪念活动正是为保存历史记忆而付诸行动的手段，因而研究纪念活动就不能不要求去研究记忆。”^[18]作者在文中也确乎阐释白求恩纪念活动对强化记忆、塑造认同的作用。从文本选取上，作者详尽分析《人民日报》有关白求恩的纪念文本，通过该报对一线医生、学生群体的报道，观察纪念活动对一般民众的影响，与周著在研究理路上具有一脉相承之处。

参考文献：

- [1] 杨华.二十年来新文化史在中国大陆的传播、影响及实践[J].史学月刊,2022,(4):116.
- [2] 扬·阿斯曼.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M].金寿福、黄晓晨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35.
- [3] 陈蕴茜.崇拜与记忆——孙中山符号的建构与传播[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47.
- [4] 陈蕴茜.崇拜与记忆——孙中山符号的建构与传播[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61.
- [5] 扬·阿斯曼.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M].金寿福、黄晓晨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149.
- [6] 陈蕴茜.崇拜与记忆——孙中山符号的建构与传播[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145.
- [7] 陈蕴茜.崇拜与记忆——孙中山符号的建构与传播[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222.
- [8] 陈蕴茜.崇拜与记忆——孙中山符号的建构与传播[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222.
- [9] 陈蕴茜.崇拜与记忆——孙中山符号的建构与传播[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280.
- [10] 陈蕴茜.崇拜与记忆——孙中山符号的建构与传播[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449.
- [11] 扬·阿斯曼.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M].金寿福、黄晓晨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67.
- [12] 陈蕴茜.崇拜与记忆——孙中山符号的建构与传播[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559.
- [13] 陈蕴茜.崇拜与记忆——孙中山符号的建构与传播[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584.
- [14] 陈恒、耿相.新史学：新文化史第四辑[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155.
- [15] 王笛.西方新文化史对中国史研究的影响[J].历史研究,2020,(4):23.
- [16] 柯文.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M].杜继东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71.
- [17] 参见牛保秀.八十年来中共纪念话语中的白求恩形象[J].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2021,(1).
- [18] 郭若平.中共纪念史研究的学理省思[J].党史研究与教学,2022,(2):15.

"Sun Yat-sen Researc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emory History——Review of Worship and Memory: the Construction and Communication of the Symbol of Sun Yat-sen"

Luo Yan¹, Tan Jie¹

¹ School of Philosophy and History and Culture, Xiangtan University, Xiangtan, China

Abstract: In the 1970s, New Cultural History emerged in the West and achieved remarkable development.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new century, influenced by this trend, a number of research achievements on New Cultural History have been made in the Chinese historical academic community. Chen Yunqian's book "Worship and Memory: The Construc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the Symbol of Sun Yat-sen," published in 2009, is a significant work that applies the theory of historical memory to study issues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Start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emory and combining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methods such as symbolic studies, Chen examines the post-Sun Yat-sen era, exploring the intrinsic connections between political power, social memory,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cult of Sun Yat-sen, which holds considerable academic value. As memory serves as a bridge connecting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it requires examination from a long-term perspective, particularly by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voices of ordinary people, so as to further advance the in-depth study of memory history.

Keywords: "Worship and Memory"; history of memory ; Sun Yat-sen; construction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2.650

公共社交领域的转移、身份构建与认同

——中国贵州黔东南苗族村落社交媒体使用研究

文筠同¹

(¹宁波诺丁汉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浙江宁波，315100)

摘要：随着社交媒体技术的飞速发展和通讯设备的普及，较为封闭的苗族村落也逐渐融入了更广泛的信息网络。社交媒体的普及不仅为苗族人提供了丰富的外部资讯，还在无形中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社交模式。本文从传播学的视角出发，采用田野调查方法，深入了解社交媒体的普及与使用对苗族人带来的各种影响。研究发现，社交媒体改变了苗族人传统的社交空间，同时也使得苗族传统习中的文化内核逐渐消失。另外，苗族人通过对社交媒体的使用而接触到不同的文化与价值观，导致他们民族文化的自信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然而，社交媒体在给苗族文化带来冲击的同时，也为苗族人搭建了一个新的“精神社区”，这很大程度上强化了苗族人的身份认同和凝聚力。研究旨在增强社会大众对民族文化多样性保护的关注，强调在社交媒体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平衡传统与现代的复杂关系。社交媒体作为一个双刃剑，既能推动文化传播和创新，也可能带来文化的弱化和丧失。因此，如何在社交媒体的使用中寻找传统文化的现代传承方式，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关键词：新闻传播；社交媒体；苗族文化；公共社交；身份认同

引言

随着媒体技术的发展，社交媒体广泛渗透到生活中，学者们从受众身份认同、使用行为等方面对其进行研究。在中国，少数民族及其文化也受到关注。苗族是中国55个少数民族之一，因历史上未保存文字，其文化主要通过口耳相传或传统节日、祭祀等方式传承^[1]。但是，随着新城镇化和旅游业的不断发展，苗族人与外界的联系愈发密切，同时苗族人对于社交媒体的使用也更加频繁深入，这导致外来文化给苗族传统文化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苗族人也逐渐对本民族文化缺乏认同。在这样独特的苗族文化语境下，社交媒体的使用对苗族人的生活带来的影响，值得我们关注。

一、苗族人的传统公共社交领域

德国学者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提出公共领域理论，认为公共领域是一个向所有公民开放的社会空间^[2]。咖啡厅、广场、剧院、学校等都是传统的公共领域，人们在其中进行社交，形成社交空间。现如今，网络及社交媒体等新媒体的出现，既成为了公共领域中的媒介，同时也搭建了一个新的虚拟的公共空间。相较于有着较为多样社交空间的都市人，村寨里的苗族人有自己较为集中的传统社交领域。

报德村位于贵州省雷山县西北面，全村有200多户，分为3个自然寨、共有15个小组^[3]。报德村全村面积并不大，由于长期信息闭塞和通讯技术发展落后，导致人们对媒介的接触整体起步都比较晚，所以

[作者简介]

文筠同（1995-），男，贵州凯里人，宁波诺丁汉大学，硕士研究生。

长期以来老一辈的苗族人都保持着传统的社交方式，苗族村落内村民们更钟情于面对面的口头传播的交流方式，苗族家庭之间的联系基本上也都是靠走访串门。美国学者哈特在“媒介系统论”中提出“示现的媒介系统”，指人们通过自身身体表达传递信息。在口语传播中，信息由一个身体发出，并被另一个身体接收，传播行为通过身体完成。这个系统没有符号意义的转移或物质流动，传播过程是身体生物功能的“示现”，即通过身体器官发出、体验、理解和记忆语言^[4]。所以透过口口相传的语言、眼神和肢体语言等进行交流的媒介系统，它自发、亲近、便捷，也更真实、直接、感性，并且充满了体温的生动。这便是苗族人长期以来使用并且直到现在依然倾向的沟通方式。口语传播的方式虽然受到时间和空间的束缚，但依然成为村民内部最主要的交流方式有几个原因：其一，贵州少数民族村寨数量多，密度大，而且在空间上表现出明显的非均衡性，为凝聚型分布^[5]。报德村就是典型的少数民族村落，其面积狭窄，村民居住紧凑，以及长久以来由于通讯技术发展落后，使得村民更愿意以走访串门的方式传递信息。其二，由于长期生活在经济和教育落后的山区，苗族老一辈未意识到教育的重要性，导致整体文化程度较低，且学习和使用汉语的机会有限。因此，传统苗族人日常生活中更倾向使用苗语交流^[6]。同时因为苗语没有文字，只通过口口相传，所以这一语言特性决定了传统的苗族人更愿意采取面对面交流的方式而非其他文字形式；其三，苗族独特的氏族群居方式使得家庭之间联系紧密，村民关系亲近。面对面互动、相互串门、喝酒和集体农作成为苗族人感情维系的重要手段^[7]。时至今日，无论是村中会议还是人际交往中的聚会邀请，面对面的告知依然是报德村老一辈苗族人最高效和便捷的方式。他们始终认为这种附着在身体的口语传播方式充满了自然性，并从中散发出自然而然的真实、感性与亲近。基于村民们这样的生活习惯和文化背景，“集会”就成为苗族人社交与信息传递的最佳途径，并成为苗族人特有的公共社交空间。

“跳芦笙舞”是苗族人最为重要的社交方式，“芦笙场”自然而然也就成为苗族人交换信息的重要空间。“芦笙场”一直以来都是苗族人极为重要的传统社交场所，它既是苗族男女爱情的见证，也是苗族人自我保护的手段。芦笙是苗族特有的簧管乐器，常用于伴奏芦笙舞。芦笙舞是以男子边吹芦笙边舞动下肢为特征的传统民间舞蹈，除祭祀活动外，还在婚礼、丧葬和新屋落成时跳^[8]。每逢苗族传统节日和男女青年进行传统社交活动时，男生便吹芦笙，女生跳芦笙舞。苗族人的害羞文化使得他们对待男女关系也十分谨慎，不会直接在长辈面前手拉手谈情说爱，传统的苗族人基本的社交行为便是在“芦笙场”上完成。因此，跳芦笙舞对于苗族人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存在和象征，这个活动也将苗族人相互联系起来，成了他们重要的社交方式。对于长久信息闭塞的苗族人来说，传统的公共社交领域（跳芦笙舞）对他们来说意义重大，面对面的口语传播也不可替代。因为较为弱势的苗族人长期生活在闭塞的山区，以及苗族人较强的家族观念，使得他们形成了强烈的向内聚集的意愿，无论是从自然环境上、民族文化上，还是合作式的生产方式或经济来源上都在不断加深这种聚合观念。因此，苗族人对于公共领域中聚集行为的重视与依赖则是他们聚集心理的外部呈现。

二、微信群——苗族人新的社交公共领域

社交媒体等网络媒介为人们的社会交往建立起了一个新的社交空间，在这里有与“芦笙场”类似的社交公共领域，比如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信息、更新状态，也有一对一的私密传播领域，如微信的私信聊天功能^[9]。同时，人们在社交媒体中可以突破“一对一”的聊天方式，将其范围扩大到“群组”的形式，实现多人同时沟通。长久以来，地理临近性是社交关系约束机制的主导因素之一，然而社交媒体对空间的打破使得人与人之间的距离逐渐消亡^[10]。这种新平台的建立使得人们将现实生活中的人际关系延伸到社交媒体中，将互动从现实空间平移到社交媒体的虚拟空间，让彼此打破时间和空间的束缚，从而得到更高效和高频率的互动。

如今，苗族青年们和家族成员之间通过社交媒体更加便利地进行社交活动，然而社交媒体中社交的空间结构也反过来对苗族青年的观念和行为方式产生了巨大影响，同时也影响了现实社会的组织形态。基于“害羞”的道德标准，老一辈的苗族人在生活中产生了“跳芦笙舞”的社交风俗。这些独特的习俗是苗族文化对外呈现的文化符号，也是作为老一辈苗族人社交方式的呈现形式和载体，同时还利于传播苗族文化。苗族人多年来一直坚持的这些习俗，在社交媒体普及之后都受到巨大的影响。微信等社交媒体可以随时随地形成个人私密空间，导致为了维护“害羞”所建立起来的习俗受到冲击。“跳芦笙舞”这一苗族文化符号随着其使用价值的消减，在年轻的苗族人心中的文化意义也逐渐淡化。

“虚拟社区”概念，指的是网络虚拟空间中进行的活动。虚拟社区包括公共讨论，如分享观点、知识或情感，个体与他人或群体进行交流，并在此过程中持续发展人际关系^[11]。在虚拟社区中也同样存在着社会角色和社会等级，每一个在虚拟社区中的成员都拥有自己的意志和价值观。相同的民族、兴趣爱好、行为主张等将虚拟的个体在社区中聚集，在这里会激发个体之间产生相似的价值认同。社交媒体在为年轻苗族

人提供全新的私人领域的同时，也搭建起了将大家聚集在一起的公共领域——“微信群”。微信群的出现增强了年轻一代苗族人之间感情的联系，也加深了集体的认同与团结，同时也成为报德村中年轻一代苗族人凝聚集体意识、维系本族文化的新社交公共领域。

在过去，村中有什么事情，都选择挨家串门或者把村民聚集起来一起告知，而社交媒体中“群组”的出现可以让信息被快速统一地传递。虽然对于活动范围较小的报德村，老一代的苗族人依然习惯于通过开会聚集的形式传递信息，但对于年轻的苗族人来说，“群组”的出现提供了更快速且有效的交流方式。近年来，报德村的旅游开发吸引了大量游客，居住在这里的村民们也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其中包括对环境的破坏、不文明的旅游现象等。这对于长久以来生活环境都较为封闭且缺少旅游管理应对经验的苗族人来说，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微信群组”的建立将苗族人聚集在同一空间内，在遇到问题和突发事件时能够第一时间将信息发布在“群组”中，得以让大家掌握最新情况并一起商量应对的方案。在微信群中，除了日常的互动，发布的内容更多是一些村内事务的通知和关于周边村落的要闻，微信群给年轻一代的苗族人提供了通知、召集、提醒的便捷功能。社交媒体将在同一利益共同体中的村民聚集在一个场所，共同面对旅游开发中的种种问题，在旅游产业高速发展的今天，报德村苗族青年们逐渐依赖这一高效、便捷的信息传递方式。同时，他们在社交平台中形成了一个小社会。随着大量游客的涌入，村民会遇到很多由于不同文化差异所带来的问题和质疑，在面对苗族文化宣传、环境保护等问题时，大家会将网络平台上有价值的新闻、文章和个人见解发送在微信群组中互相交流，并从网络上相关的事件和案例中学习解决问题的方法和经验。这种集体空间中的互动，不仅解答了报德村年轻一代苗族人面对旅游业发展中遇到的困惑，同时增强了他们的集体认同感。

由于外界对神秘的苗族文化存在一些误解和质疑，使苗族人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所以苗族人急需得到文化认同、民族认同等身份的认同，而社交媒体为其提供了绝佳的平台，苗族人将现实生活中的公共领域延伸到这一精神社区中，他们在这里积极发声、表达态度。不同于苗族人传统的公共领域，社交媒体的公共领域既给苗族人创造了具有归属感的精神社区，又提供了去中心化的互动方式，将话语权分散给每一名成员，这种权力的分散激发了苗族人自由积极地在虚拟社区中表达意见，帮助其他成员解决问题的行为，使得苗族人在这一场景下的凝聚力和文化自豪感越来越强。

“精神社区”即在这个社区中的成员，虽然成员分散在不同的地域，但是他们拥有同一种情感、同一种信仰追求，使他们相互之间保持着同一种强烈的、内聚的社会网络，从而形成心理上或者精神上的共同体。因而他们更强调精神和文化上的维系，在这“想象共同体”中找到归属感和存在感。所以在“精神社区”中，社区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它真正的本质是社区中的“精神”，社区内部成员的意识才是社区发展的核心因素^[12]。

三、社交媒体中苗族人自我身份的构建与认同

身份认同是个体在对自我身份的确认和对所属群体的认知，与之相伴的是情感上的体验以及对行为模式进行整合的心理历程。它既是对自己所在的群体共同性的肯定，也是与其他群体差异的区分。而文化是一个民族的关键符号，也是民族身份的具体体现，这其中包括了价值观、伦理道德、艺术、风俗等^[13]。社交媒体的图文结合、音影并用的多元传播模式让长久闭塞的苗族人更直观地看到外面的世界与其他民族的生活和文化，使其形成对比之后，苗族人也产生了对自我身份的认同。

在社交媒体中，年轻一代的苗族人积极使用微信群组转发关于苗族文化的文章，正是他们凝聚集体意识和认同维护本民族文化的表。在过去通讯闭塞的时期，老一辈的苗族人很少有机会与外界的其他民族接触并形成对比，因此也难以形成强大的民族认同感。而社交媒体的出现使得年轻一代的苗族人迅速地接触到其他民族的文化，无论从生活方式还是文化习俗，苗族人都意识到自身拥有的独特性，因此苗族人的身份认同感迅速增加，并使得他们在社交媒体上的凝聚力更强。在微信社交媒体的群组中，年轻一代的苗族人自己形成了一个小社会，这里成为了苗族人新的“想象共同体”，在这其中，这种精神上的团结激发了苗族人的归属感和存在感，形成了新的网络群体。在社交媒体中，人们可以根据自己民族文化、宗教信仰等选择发表不同的言论，由于偏好、民族等方面的趋同，使得在社交媒体中更容易产生“群体集化”的现象。共同的民族特征使他们对同一事件的关注度更高，言论也更一致。社交媒体的弱控制性使得网络群体在高度一致性的场景下产生一种价值感的认同^[14]。

社交媒体的出现让苗族人与外界主流社会有了更多交往，通过这些媒体他们接触到外界的各种政治、娱乐等海量信息，我们往往认为这些信息会对生活在大山里的苗族人带来巨大的冲击，使苗族人的文化认同感被消减。但事实是社交媒体平台中的苗族人得以类聚，在共同面对外来文化的冲击过程中又建立了新

的身份认同的共同体，并因此增强了自我的民族认同意识，社交媒体成为了苗族人身份认同的粘合剂，民族凝聚力的催化剂。

民族文化与心理认同是通过一定的生活习俗、生产方式、道德标准以及文化产品得以表现^[15]。但是社交媒体的入侵使得传统苗族村寨里的民族文化在对外呈现的过程中，民族的文化内核逐渐消失或是受到主流文化不同程度的同化。伴随着文化风俗的变形甚至是消失，短暂激发出的苗族人的心理认同感恐怕难以长久延续，所以对于文化载体的维护更利于苗族人的身份认同感的增强。

如今，社交媒体等新媒体已经成为了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新型公共空间。社交媒体在为人们提供海量的信息时，也成为了塑造人们想法观念、改变人们对文化和生活等方面的重要力量^[16]。近年来，随着旅游业的迅速发展和科技的进步，年轻一代苗族人普遍依赖社交媒体进行日常交流和获取信息，成为社交媒体使用的主要群体，虽然传统的苗族人对于社交媒体的使用仍处于初级的起步阶段，但是社交平台上大量的信息已经为苗族人的生活带来改变。尽管如此，保守的苗族人对于社交媒体的态度依然很谨慎。由于苗族人长期生活在单纯和睦的环境中，加之整体文化水平不高，因此他们对于网络诈骗等事件的辨别能力不强，出于这种担心，年纪较大的苗族人对社交媒体的使用仍处于浏览多于互动的浅层阶段。

四、结语

文章基于传播学视角，从社交空间、身份构建与认同方面探索了社交媒体对苗族人的影响和对其文化的冲击。这些冲击实际上是对苗族人传统社交空间的转变，也是对苗族文化边界的打破。社交媒体的使用为年轻一代苗族人提供了新的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其中在虚拟公共领域中，“去中心化”的权力结构让苗族人可以在这里畅所欲言，微信等社交媒体所提供的“个人私密领域”则模糊了苗族男女“跳芦笙舞”的传统联系互动方式。年轻一代苗族人逐渐倾向且依赖社交媒体提供的便捷交流方式，使得苗族传统文化习俗“跳芦笙舞”背后的内涵被消弱。“跳芦笙舞”不再是充满传统文化内涵的少数民族特有的行为方式，而是变成一种为了吸引游客，发展旅游业的商业表演。这种苗族文化符号的淡化使得苗族文化边界受到冲击而逐渐模糊，这对苗族传统文化来说是极大的伤害。社交媒体为原始民族部落打开连通世界的通道，让主流社会的体系和价值观通过社交媒体传递到苗族村寨，一方面让苗族文化中的传统习俗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侵袭，另一方面也唤醒了苗族人保护传统文化的意识。

参考文献：

- [1]吴正彪.苗族语言文字的发展状况及苗文推广普及的困境与出路管窥[J].文山学院学报,2012,25(1):73-77.
- [2] 哈贝马斯.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 曹卫东, 王晓珏, 译. 上海: 学林出版社, 1999: 94.
- [3] 百 度 百 科 .(2024). 报 德 村 . 百 度 百 科 . [2024-9-1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A%A5%E5%BE%B7%E6%9D%91/15885247>
- [4]陈翔.论媒介系统与身体之关系——基于 A·哈特的“媒介系统论”[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33(9):159-162.
- [5]谢鹏,张扬.基于 GIS 的贵州省民族村寨空间分布格局[J].数字化用户,2020(33):133-135
- [6]陈沛照.从一个苗族村落的教育民族志反思中国边远民族地区教育[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10):13-19.
- [7]温士贤.流动中的家与社会:一个苗族家庭的迁徙史研究[J].贵州民族研究,2018,39(8):43-49
- [8]钱应华.苗族“芦笙舞”引入高职高专院校体育课程的探讨[J].体育科技,2012,33(03):136-138.
- [9]苗珊珊,吴曦,许增巍.数字治理新实践:虚拟公共空间何以促进村民公共事务参与——基于乡村微信群的实证分析[J].山西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24, 23(1):23-34.
- [10]黄鑫楠,孙斌栋,张婷麟.地理距离对互联网社会中网络信息传播的影响[J].地理学报,2020,75(4):722-735
- [11] 王思斌. 社会学教程[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169.
- [12]赵利生,马志强.精神社区及其现实意义[J].甘肃社会科学,2019,(02):86-93.
- [13]张淑华,李海莹,刘芳.身份认同研究综述[J].心理研究,2012,5(01):21-27.
- [14]信鸽.网络社会群体的身份认同[J].巢湖学院学报,2010,12(1):35-38.
- [15] 肖玲聪, 崔海亮. 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心理研究[J]. 理论探讨, 2022(2): 1-12.
- [16]袁清华.微博的理想与现实——兼论社交媒体建构公共空间的三大困扰因素[J].浙江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0,35(6):20-25

Transfer, Identity Construction and Identity in Public Social Spheres --A Study of Social Media Use in Miao Villages in Southeast Guizhou, China

Yutong Wen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Ningbo, China, 315100)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ocial media technology and the popularization of communication devices, the more closed Hmong villages have gradually integrated into a wider information network. The popularization of social media not only provides the Miao people with rich external information, but also changes their lifestyle and socialization patterns in an invisible wa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 this paper adopts a field research method to gain an in-depth understanding of the various impacts that the popularization and use of social media have brought to the Miao people. It is found that social media has changed the traditional social space of the Miao people, and at the same time, it has also caused the gradual disappearance of the cultural kernel customs in the traditional Hmong practice. In addition, Hmong people have been exposed to different cultures and values through the use of social media, which has led to different degrees of changes in their national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However, while social media have impacted Hmong culture, they have also created a new “spiritual community” for Hmong people, which to a large extent has strengthened their identity and cohesion. The study aims to enhance the public's attention to the protection of ethnic cultural diversity, and emphasizes the complex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in the context of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ocial media. Social media, as a double-edged sword, can promote cultural dissemination and innovation, but may also bring about cultural weakening and loss. Therefore, how to find a modern way of passing on traditional culture through the use of social media has become an urgent issue.

Keywords: Communication; social media; Hmong culture; public socialization; identity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2.655

Poetic Translation and Connotation Construction:

Reflections on the Design Valu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Decorative Patterns

Bingxue Zhang¹, Yixuan Zhou^{2*}

¹ College of Education, Hanyang University, Seoul 04763, South Korea

² College of Design and Innovation,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Jinhua 321004, China

Abstract: Chinese traditional decorative patterns are a unique humanistic art paradigm with oriental poetic charm that has emerged i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Chinese decorative art. They express the aesthetic trends and aesthetic practices of Chinese decorative art. Based o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thre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oetic connotations of Chinese traditional decorative patterns, namely "poetic semantics", "harmonious aesthetic feeling", and "inclusive nature", this paper attempts to present the root aesthetic logic in the tradition of decorative art from an oriental context. It also hopes to create an internal cultural identity with poetic connotations in modern design through this exploration.

Keywords: Chinese Traditional Decorative Patterns; Poetic Translation; Connotation Construction; Modern Design

1. Conceptual Analysis of Decorative Patterns

(1) The Concept of Decorative Patterns

Zong Baihua stated when elaborating on the foundation of the emergence of fine arts: "Each form of fine arts is deeply rooted in its unique worldview and emotional perception of life" (Zong, 1978). Decorative patterns, as a special form of symbolic artistic expression in fine arts, tracing back the origin of its logical thinking is one of the approaches to exploring its development laws.

About the Author:

Bingxue Zhang, PhD candidate, College of Education, Hanyang University

Yixuan Zhou, Lecturer, College of Design and Innovation,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Funding]:

Research Project of the Korea Institute for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o.2023KIHSSB009)

The term "decoration" emerged in Western decorative art during the 17th to 18th centuries. It generally refers to the artistic embellishment carried out through decorative means or techniques. In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Dictionary, there are two interpretations of the word "decoration". One refers to the adornment of the body or the appearance of objects in daily life, and the other refers to the decorative items that serve the function of beautification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1978). From this,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term "decoration" has different meanings in different contexts. On the one hand, it represents the act and phenomenon of decoration, and on the other hand, it refers to the result produced by the act of decoration. In the Book of the Later Han Dynasty: Biography of Liang Hong, it is recorded that: "The woman requested to make plain clothes, hemp shoes, and tools for weaving baskets and spinning. When she got married, she first entered the husband's family after dressing up (Fan & Sima, 1965)." At this time, the word "decoration" did not belong to the process and result of the act of decoration, nor did it involve the field of arts and crafts or the design discipline. Instead, it was an autonomous and spontaneous daily activity that permeated social life. This shows that "decoration" also has a broad and a narrow sense in terms of specific acts and results. In his book The Tao of Decoration, Li Yanzu also pointed out that decoration can be divided into broad and narrow aspects, and he cited the English language system for distinction. In addition to the term "decorative art" which specifically refers to decorative art in English, other so-called decorative words can generally be divided into two categories. One category, such as "decoration", mainly refers to the decorative phenomenon in a broad sense, representing the decorative phenomenon and act on the surface of people or objects in an overall sense. While "ornament" refers to specific types or individual decorative items, as well as the narrow decorative phenomena and results such as patterns and decorative forms, that is, the meaning of "decorative art", such as specific decorative items, patterns and decorative motifs (Li, 1993).

Regarding the term "pattern", Lei Guiyuan stated in his book Basics of Pattern published in 1963: "Patterns are the preliminary designs of form, color, and structure in applied art, decorative art, architectural art, industrial art, and other fields (Lei, 1963)." According to Li Yanzu's textual research, the term "pattern" is a borrowed word translated from Japanese at the beginning of this century, and it also has a broad and a narrow sense. In a broad sense, it refers to the design plans and drawings for achieving a certain purpose. For example, after a certain amount of conceptualization, the elements such as shape, color, and decorative patterns are redesigned. It is a non-representational graphical manifestation, which is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English word "design". That is what Pang Xunqin said: "Pattern work is to design the shape of all utensils and the decoration of all utensils (Pang, 1986)." When specifically manifested in combination with carrier factors such as craftsmanship materials, patterns in a broad sense can be divided into planar patterns or decorative motifs with a decorative meaning in a two-dimensional space and the three-dimensional shapes of utensils or products in a three-dimensional space. The former is commonly known, while the latter, such as the Ming-style wooden furniture with a modeling structure but without additional decorative patterns, is also included in the category of patterns, or it can be called three-dimensional patterns. As design became an independent discipline,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existence of three-dimensional modeling patterns was obviously diluted. At this time, the main manifestation of patterns existed in a narrow sense, that is, as planar patterns with decorative motifs or the composition of decorative motifs as the main forms.

(2) The Artistic Role of Decorative Patterns

Through the separate interpretations of the two concepts of "decoration" and "pattern", the concept of "decorative pattern"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clear. However, the deep connotation of "decorative pattern" is not simply a mechanical combination of the two concepts, but rather a complementary and mutually enhanc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in the creation of materials. Decoration expresses the various attribut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ecorated objects through patterns. In the

expression of patterns, whether it is decorative deformation or imagery modeling, it refines, condenses, and exaggerates the decoration itself (Zhong, 2011). From this perspective, decorative patterns are an orderly, regular, and idealized type of pattern that combines application and beauty. They are a means or technique for beautifying objects that meets visual needs and is in line with aesthetic ideals. In addition to meeting the standards of artistic embellishment, decorative patterns also take into account the practical requirements of the craftsmanship and materials of the decorated objects. They need to fully conform to the elements such as the function, theme, shape, and structure of the decorated objects. Through the redesign and construction of patterns and decorative motifs such as individual motifs, suitable motifs, two-way continuous patterns, and four-way continuous patterns, a holistic decorative space full of order and narrative is created. The overall design temperament of decorative patterns can be either lively and free or solemn and serious. This special temperament permeates people's daily behaviors through a special sensory perception, and forms the medium and carrier for the generation of decorative effects through people's observation and practice. In this process, simple pattern design is sublimated into an overall consideration of decorative art. Decorative patterns also reflect the dominant selection factors of people in the process of pattern reconstruction. This is an objective summary of people's practice of decorative art in the natural and social environment, and this objective cognition is transformed into a subjective artistic creation that reflects the context of cultural traditions.

2. The Concept and Aesthetic Valu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Decorative Patterns

(1) The Concept of Chinese Traditional Decorative Patterns

Chinese traditional decorative patterns are a unique humanistic artistic paradigm with oriental poetic charm nurtured i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traditional decorative art, and a splendid epitome of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art. They are a traditional art form that combines aesthetically pleasing shapes and auspicious implications. Our ancestors integrated their imagination with the observation of objects and phenomena on the basis of conforming to the laws of natural life. These patterns go beyond their simple decorative function and comprehensively reflect the integrity and particularity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encompassing numerous elements such as primitive worship, religious beliefs, philosophical concepts, and traditional folk customs. After going through the trials of a long history, Chinese traditional decorative patterns have gradually developed unique folk characteristics that appeal to both refined and popular tastes and have been widely integrated into people's daily lives. Compared with other art forms, they have also become one of the most intuitive and explicit means of expression in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art, and an indispensable national symbol in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art.

(2) The Aesthetic Valu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Decorative Patterns

The German art historian Wilhelm Worringer once described the essential connotation of decorative art in this way: "The artistic will of a nation is most purely expressed in decorative art. Decorative art is like a chart, in which people can clearly discern the unique and inherent elements of the absolute artistic will (Worringer, 1992)." During the long process of cultural integration and historical accumulation, as an artistic form of expression for understanding the natural world, Chinese traditional decorative patterns reveal a simple aesthetic taste and the longing for a better life. They have also formed a unique expressive style that is lively in image yet clean and plain, manifesting a unique national cultural atmosphere. Chinese traditional decorative patterns express the beautiful wishes of seeking good fortune and avoiding disasters through means of moral implications such as metaphor, analogy, pun, homophony, and symbolism. They adopt an expression method in which the figurative and the abstract coexist in parallel, and the emotional and the rational coexist, transforming themes such as auspicious birds and beasts, flowers and fruits, and auspicious

characters into simple and beautiful artistic languages. In addition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xpressing national aesthetics and customs, this artistic language is diverse in its modeling, and it also encompasses the concepts of formal aesthetic feeling in modern design, such as repetition, alternation, and opposition (Zhou & Kim, 2020). As a manifestation of the planar decorative art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it not only conveys and expresses the traditional oriental poetic connotations of China, but also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s, modeling thinking, aesthetic characteristics, and laws of formal beauty contained in it provide practical reference value for the integration of the modern design industry and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art.

3. The Aesthetic Consciousness of Chinese Traditional Decorative Patterns

(1) The Symbolic Consciousness of Chinese Traditional Decorative Patterns

The embryonic form of early decorative patterns, as a visual means of communication with the outside world, is a non-deliberate expression with special symbolic connotations. It is "a chaotic entity of matter and spirit, a mixture of pleasure and aesthetic feeling, and the initial form of artificial objects (Zhuge, 1991)." It reflects the objective understanding of aesthetic practice by primitive aesthetic consciousness during group life. From the initial simple symbols to the gradually stylized and systematic patterns, the repeated influence of aesthetic consciousness in the process endows them with both symbolic meaning and simple aesthetic feeling. This is an aesthetic cognitive system that coordinates and adapts to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and is continuously revised and shaped by the collective consciousness and collective values of various groups. In the process of expressing symbolic meanings, the differences in social development levels and collective cognition have led to patterns with different styles in various regions. Among them, Chinese traditional decorative patterns symbolize China's collective emotions of simplicity, modesty, and love for life, as well as the ethical values of respecting culture and advocating etiquette.

(2) The Modeling Consciousness of Chinese Traditional Decorative Patterns

At the very beginning of the origin of primitive thinking and nature worship, the consciousness of decoration emerged in response to the subtle relationship between nature and human beings. Along with people's fantasies and contemplations about themselves and all things in the world, creation myths and primitive decorative patterns came into being hand in hand. Such decorative patterns with mythological themes reflect the understanding and interpretation of primitive groups in their life practices. They also transform this understanding and interpretation into a form of subjective artistic creation that mirrors the roots of regional culture and the aesthet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egion.

Specifically, under the influence of primitive thinking and nature worship, the human spirit was unable to explain and control many natural phenomena. People conjectured that primitive images were a true manifestation of some supernatural power, and then used patterns or primitive images to express their worship or awe of nature. In other words, the ancestors used decorative behaviors to reduce the degree of threat that external forces posed to their spirits, thereby alleviating psychological pressure, which led to the birth of primitive patterns (Zhang, 2003). During this period, primitive decorative patterns took all natural things in the human world, such as the sun, the moon, clouds, wind, and fire, as their objects, endowing them with certain symbolic meanings and making corresponding expressions, thus forming the most primitive connection between art and nature. Later, with the widespread dissemination of myths and legends, the range of materials for pattern depiction was expanded. Gradually, various images in primitive and mythological worship were deified. Using abstract and concise expression techniques, natural images with aesthetic significance, such as the sun, the moon, stars, etc., which originated from nature or primitive worship, were depicted. In terms of modeling, they were mostly composed of rigorous geometric shapes or abstract graphics, creating

a solemn and stable modeling atmosphere. This expressed the aesthetic practice in which the subject's objective understanding was sublimated into artistic creation, and finally formed the theme expression centered on natural phenomena and myths and legend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productive forces, the good wishes for real life gave birth to the emergence of auspicious patterns, marking a further enrichment and expansion of the themes of Chinese traditional decorative patterns. It eliminated the serious awe of nature conveyed in primitive decorative patterns and was replaced by a lively and interesting life ideal. The richness of themes also made the ways of expressing emotions more flexible and diverse. The simple expectations for real life showed the traditional oriental emotions of China through the vivid colors and shapes, and conveyed the simple temperament of longing for nature and beauty.

4. The Poetic Connotations of Chinese Traditional Decorative Patterns

(1) The Poetic Semantics of Chinese Traditional Decorative Patterns

"Poetic quality" should originally be a blended experience of the material and psychological expressions of the essence of an object. It encompasses the material and spiritual connections between the subject and the object, and implies the speculation between the perceptual and the rational in thinking patterns. It is the true and comprehensive perceptual experience of the mind towards the images of objects. The perceptual characteristics of this poetic connotation are destined to be sudden and instantaneous, while the rational factors contained therein lie in its associativity and connotation. These characteristics together endow Chinese traditional decorative patterns with poetic semantics. Chinese traditional decorative patterns explore and shape the potential aesthetic elements in primitive image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this traditional aesthetic connotation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refined, and in turn, nourishes the latent aesthetic concepts of the general public. This process reflects the guidance of perceptual factors on the rational expression factors in Chinese traditional decorative patterns, enabling them to continuously revolve around and inherit the core connotations of traditional aesthetic thoughts with an unbroken stream of emotions. In terms of the cultural soil in which Chinese traditional decorative patterns are rooted, compared with the West, their oriental poetic semantics are more prominently highlighted.

(2) The Harmonious Aesthetic Feeling of Chinese Traditional Decorative Patterns

After examining and reflecting on the metaphysics of Confucianism and Taoism and post-ontology, Cheng Chungying, a Chinese-American philosopher, believes that the primary characteristic of Chinese philosophy lies in the "principle of integral unity." That is, all things in the world continuously originate from the same root and are thus integrated into one entity (Cheng, 1991). The most highly regarded and long-standing concept in traditional aesthetic thoughts and aesthetic philosophy stems from the idea of harmony, which emphasizes the coordination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forms. It represents a "harmonious aesthetic feeling" within a contradictory entity, where there is mutual coordination and a dynamic balance of give and take. The traditional humanistic thought centered around the "harmonious aesthetic feeling" has subtly guided the aesthetic concept of the harmonious unity of the modeling, color, and formal elements of Chinese traditional decorative patterns. It can be observed that from the origin to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traditional decorative patterns, they have been nurtured by traditional aesthetic thoughts and traditional humanistic thoughts. The "harmonious aesthetic feeling" running through them provides us with a wealth of cultural connotations from various aesthetic perspectives that cannot be explained by Western art theories. It not only aligns with the political ideals of ancient Chinese society but is also regarded as the standard of Chinese traditional aesthetic thoughts. It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interpretations of aesthetic concepts in Chinese traditional decorative patterns.

(3) The Inclusive Natur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Decorative Patterns

For a long time, Chinese traditional decorative patterns have undergone the baptism of different cultures. While inheriting the Eastern ritual and music civilization and aesthetic traditions represented by the Huaxia ethnic group, they have also been profoundly influenced by the cultures of all ethnic groups in China. After absorbing the nutrients of different ethnic and regional cultures, Chinese traditional decorative patterns have been constantly practicing their own cultural inclusive nature. Their unique and diverse temperament and forms, as well as vivid and flexible colors and shapes, can weaken the constraints of uniform industrial technology in design, and possess broad inclusive value. This process of absorbing and drawing on diverse cultures has continuously given rise to new appearances of decorative art in different eras. It is also one of the important reasons why Chinese traditional decorative patterns have been passed down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and never faded. It reflects the precious cultural inclusive nature and the cultural core that keeps pace with the times of Chinese traditional decorative patterns, laying a prerequisite for their inheritance in modern design.

5. Conclusion

With the in-depth development of the globalization trend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mass media, which is gradually becoming more large-scale and intensive, has eliminated the cultural differences between different cultures, making communication between heterogeneous cultures extremely smooth. In this process, in order to maximize their profits, producers strongly advocate and produce goods with mass appeal and universality. As a result, the frequency of the appearance of personalized emotional elements in goods has been reduced, and the important role played by cultural individuality in the design connotation has been inadvertently ignored. Consequently, the connection between design emotion and culture has gradually shown signs of fatigue. Li Yanzhu believes that, looking at the history of craftsmanship and design on a global scale, in the era of large-scale industry, cultural and technological exchanges among various ethnic groups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frequent. Technology has become an international language and culture. Based on this, the national and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products and designs have been greatly diluted (Li, 2006). Although the integration of ethnic arts with the core of heterogeneous cultures is a development trend brought about by the technological trend, in this wave of uniform globalization, it brings not only the homogenization of goods and designs but also the homogenization of culture and connotation. Therefore, while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convenience brought by the functions of goods, we should also be alert to the cultural nihilism hidden in the trend of the times. Kim Minsu believes that "the root of the competitiveness of goods lies in the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through design" (Kim, 1996). Therefore, in order to highlight the charm of Chinese design in the torrent of cultural homogenization, it is necessary and urgent to inherit and develop Chinese traditional decorative art.

As a humanistic and artistic bond with oriental poetic charm, Chinese traditional decorative patterns integrate traditional concepts such as Chinese language, moral values, and aesthetic ideas, and have already formed a highly complete ideological system of decorative art. The connotations it contains far exceed the appearance of the form of decorative patterns in the traditional sense. It is a microcosm of Chinese cultural forms and a true reflection of spiritual identity. Weng Bingfeng pointed out that "design and national culture develop in parallel, and culture is the foundation and visual carrier of design" (Weng, 2007). It can be seen that in the trend of cultural homogenization, Chinese traditional decorative patterns will create possibilities for the realization of new modern designs that combine nationality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Wang Defeng once said that "only through tradition can true innovation be possible" (Wang, 2005). Summarizing and extracting the classic images with originality and forward-looking in Chinese traditional decorative patterns

enables modern design to draw humanistic warmth and historical emotions from traditional plastic arts, inherit the national elements and spiritual connotations in Chinese traditional decorative patterns, break free from the fetters of cultural homogenization, understand the poetic connotations of Chinese traditional decorative patterns in the "origi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decorative art, present the original aesthetic logic in tradition through a new poetic context, and then create an internal cultural identity with poetic connotations in modern design.

References:

- [1] Zong Baihua. *Aesthetic Walks*. Shanghai[M].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81.
- [2]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Modern Chinese Dictionary*[M].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78.
- [3] Fan Ye, Sima Biao. *The Book of the Later Han*[M].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65.
- [4] Li Yanzu. *The Way of Decoration*[M]. Beijing: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Press, 1993.
- [5] Lei Guiyuan. *Fundamentals of Patterns*[M]. Beijing: People's Fine Arts Publishing House, 1963.
- [6] Pang Xunqin. *Collected Essays on Arts and Crafts: Revisiting Arts and Crafts*[M]. Beijing: China Light Industry Press, 1986.
- [7] Zhong Wei. *Decorative Pattern Design*[M]. Beijing: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Press, 2011.
- [8] Wilhelm Worringer. *Abstraction and Empathy*[M]. Taipei: Asia-Pacific Books, 1992.
- [9] Zhou Yixuan, Kim Taiwan. *Constructing Cultural Identity of Ethnic Artistic Forms in Modern Design*[J]. *Journal of Guizhou University*, 2020(02).
- [10] Zhuge Kai. *Principles of Pattern Design*[M]. Nanjing: Jiangsu Fine Arts Publishing House, 1991.
- [11] Zhang Ben. *Exploration of the Origins of Patterns*. *Decoration*[J], 2003(11).
- [12] Cheng Chungying. *On the Spirit of Chinese and Western Philosophy*[M]. Shanghai: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1991.
- [13] Li Yanzu. *The "Nationalization" of Design and the Globalization Perspective*[J]. *Design Art*, 2006(02).
- [14] Kim Minsoo. *The Cultural Significance and Function of Design: A Study on Establishing the Cultural Concept of Design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Plastic Arts*, 1996(19).
- [15] Weng Bingfeng. *On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Value of Graphic Design*[J]. *Journal of Nanjing University of the Arts*, 2007(01).
- [16] Wang Defeng. *Philosophy of Art*[M]. Shanghai: Fudan University Press, 2005.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2.642

“永远的杉菜”：网络哀悼空间的集体记忆建构研究 ——以台湾地区艺人大S粉丝为样本

陈栩梵¹，王竣²

(¹暨南大学，广东广州 510632，²厦门大学，福建厦门 361000)

摘要：社交媒体所搭建的数字空间逐渐成为超越时空限制的纪念场所，投身其中的致哀人群正凝聚成情感与思想的“集体记忆”。近期，中国台湾艺人徐熙媛（大S）因病离世的消息震惊华语世界。作为风靡两岸三地的偶像，大S为世人留下了诸多经典作品。其生命定格于48岁，却引发了一场跨越个体与群体的精神震荡。本研究以大S粉丝群体为样本，试图探寻网络哀悼中集体记忆空间的搭建过程，以及当下台湾大众流行文化存在的问题。研究发现，粉丝们通过仪式习惯、隔空对话、固定纪念三种方式自发地进行哀悼表达，展现出致哀群体独特的心理表达和身份认同。此过程亦催生了共同体的自觉意识，进一步推动集体记忆的建构。在网络舆论愈加撕裂的当下，借由对大S的追思，进行反思总结，怀念是为了更好地迈向未来。

关键词：网络哀悼；集体记忆；台湾艺人大S；新浪微博；网络舆论

一、引言

“有种想念像是智齿，因为忽然很痛，才知道她的存在。”

死亡与传播技术的关系既古老又重要，因为死亡意味着短暂和失去，而传播技术及其实践则提供了延续性和恒久性。2025年2月3日，台湾艺人徐熙媛（大S）因流感并发症离世的消息引起华语世界的集体震动。作为台湾偶像剧黄金时代的代表人物，大S凭借《流星花园》中的“杉菜”一角爆红亚洲，一度成为两岸三地观众的共同记忆符号。可以说，她的离世不仅是个体生命的终结，更成为一场跨越地域与代际的集体情感事件。事发后，数以百万计的网民和粉丝通过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悼念文字、分享影视片段、点亮虚拟蜡烛等方式表达哀思，形成了独特的数字哀悼景观。这一现象，不仅是粉丝文化的缩影，更折射出数字时代集体记忆建构的复杂机制。

回望大S的一生，从“杉菜”一角到文化偶像，其职业生涯与台湾偶像产业的兴衰可谓紧密交织。2001年，《流星花园》以现象级热度席卷亚洲，塑造了“霸道总裁与灰姑娘”的经典叙事模式。剧中“杉菜”角色凭借反叛精神与独立人格，成为女性主义思潮在东亚大众文化中的早期实践样本。随后，大S本人也从演员转型为多栖艺人，其时尚形象、情感生活甚至养生理念均被媒体广泛报道，逐渐从娱乐明星升华为一种文化符号。她的离世之所以引发强烈反响，正是因为其身份的多重性——她既是个人青春的载体，亦是台湾流行文化黄金时代的标志。换言之，粉丝的哀悼行为不仅是对个体的缅怀，更是对一段集体文化记忆的追认与重构。

在传统哀悼实践中，身体在场与仪式参与是情感表达的核心。然而，数字时代的哀悼逐渐转向虚拟空间。社交媒体平台通过技术赋权成为连接生者与逝者的重要媒介，使哀悼者能够突破时空限制，以文字、

[作者简介]

[1]陈栩梵（2001—），女，四川宜宾人，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新闻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融合新闻学、国际传播。

[2]王竣（2002—），男，广西崇左人，通讯作者，厦门大学电影学院艺术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港台电影、性别与媒介文化。

图像、视频等符号构建逝者的数字化存在。恰如传播学者约翰·彼得斯 (John Durham Peters) 所言, 与逝者的“对话”虽无法实现双向互动, 但单向的传递本身即承载了深刻的社会意义^[1]。因此, 本研究以大 S 的粉丝为样本, 试图探寻数字技术如何重构哀悼实践的文化逻辑, 并以此反思台湾偶像产业在全球化与本土认同冲突中的转型困境。

二、文献梳理与研究问题

(一) 集体记忆: 从实体空间到数字媒介

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 (Maurice Halbwachs) 在《论集体记忆》中提出, 记忆并非个体的孤立行为, 而是社会群体通过共享经验、仪式与符号构建的“框架”, 这一过程极具动态性与选择性, 群体可以通过不断重构记忆来适应现实需求^[2]。这一理论揭示了记忆建构的社会性本质, 强调物理空间与物质载体在记忆形塑中的结构性作用。而在数字时代, 社交媒体平台日益成为集体记忆的新型载体。社交平台上的点赞、转发、评论等功能, 使个体记忆迅速转化为集体叙事的组成部分。例如, 微博“超话”通过算法聚合相关内容, 形成主题化的记忆空间; Instagram 的“故事”功能则通过 24 小时限时内容, 强化记忆的即时性与流动性。而大 S 粉丝的哀悼行为本质上是一种记忆的“再生产”。粉丝群体通过发布经典剧照、引用台词、制作混剪视频等符号化表达, 不断激活并强化对偶像的集体认同。

从媒介记忆的维度看, 逝者留下的社交媒体帐号形成了一个持续开放的留言墙, 所有人都可以在此分享逝者生前的文字和往事, 来自不同视角的私人记忆交织重叠在一起, 共同书写专属于逝者的“人物志”, 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记忆民主化”的实践。因此, 逝者的社交媒体账号提供了一个公共哀悼的“界面”

(surface), 不仅具有“可读”的公开性, 更具有“可写”的交互性; 不仅围绕个体死亡本身, 还形成了围绕死亡的社会交往空间^[3]。

(二) 网络哀悼: 情感共同体与技术赋权

大众媒介的发展大大改变了集体悼念的仪式, 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介不仅成为新的表现载体, 由新媒体构成的网络空间还成为集体悼念的虚拟场所。在网络空间中, 来自不同地域的网民无组织地被吸引来悼念逝者, 这些哀悼者是零散去中心化的, 而网络哀悼的核心正是在于实现“虚拟在场”。彼得斯 (Peters) 从媒介哲学视角阐释“错位在场”, 认为技术中介创造了跨越生死界限的象征对话。而中国学者刘海龙则提出, 数字媒介打破了物理空间的限制, 使哀悼者能够通过文字、图像等符号建立与逝者的持续联系^[4]。以微博纪念账号为例, 用户通过点亮“蜡烛”表情、分享逝者故事, 构建了情感共鸣的虚拟社群。大 S 的粉丝群体则通过“超话”标签、纪念视频合集等方式, 将哀悼行为转化为一种公共仪式, 强化群体的边界与凝聚力, 从而建构纪念空间, 呈现出兹兹·帕帕克瑞斯 (Zizi Papacharissi) 定义的“情感公众”特质, 即通过算法推荐系统强化的情绪共振, 个体哀伤被转化为集体情感动员^[5]。

(三) 粉丝文化: 身份认同与流行文化反思

粉丝 (Fans) 是指对特定对象深度倾慕、崇拜的受众, 他们会为喜爱的对象投入大量的精力、情感和金钱, 常会表现出痴迷狂热的情绪, 这些特定对象包括但不限于各类明星名流、影视作品、综艺节目或特定品牌、特定类型的产品等。粉丝文化则是指粉丝为喜爱的特定对象付出无偿劳动或进行消费的现象, 不仅包括粉丝与偶像之间的频繁互动, 粉丝与粉丝结成社群, 粉丝有组织地应援“爱豆” (英文 idol 的音译, 意为偶像), 也包括粉丝在“爱豆”作品基础上展开的同人创作等^[6]。

粉丝是粉丝文化的主体, 消费性是粉丝文化本质。粉丝研究学者亨利·詹金斯 (Henry Jenkins) 指出, 粉丝群体通过文本再生产与社群互动, 可以形成独特的“参与式文化”^[7], 但这一理论在东亚语境中遭遇在地化修正。台湾学者林鹤玲认为, 本土粉丝文化存在“殖民化怀旧”特征, 即通过对 90 年代偶像剧 IP 的反复消费, 缓解当下文化创造力匮乏的焦虑^[8]。而近年以来, 台湾流行文化就面临着原创性衰退、过度依赖怀旧 IP 等问题。可以说, 大 S 的离世不仅唤起集体怀旧情绪, 更暴露了本土偶像文化在新时代的断层危机。

综上所述, 既有研究尚未充分回答在数字时代技术如何重构网络哀悼实践的文化逻辑, 并形成文化反思。因此, 本研究基于大 S 粉丝社群的网络民族志观察, 结合对大 S 粉丝群体的半结构访谈和社交媒体中悼念帖文的内容分析, 试图探寻网络哀悼中集体记忆空间的搭建过程, 以及当下台湾大众流行文化存在的问题, 旨在为理解数字时代的记忆政治与文化产业危机提供新的分析路径。

三、研究设计与样本收集

本研究采用网络民族志方法, 选取微博、Instagram、Facebook 等平台上与大 S 相关的哀悼话题作为主要观察场域, 并进一步加入其粉丝群组。研究团队首先通过潜水观察的方式, 识别了群组中活跃度最高的 20 名粉丝成员, 并对他们的身份进行了确认。随后, 研究者通过私信、聊天的方式邀请这些成员参与后续的深入访谈。经过这一过程, 共有 8 名粉丝成员同意并愿意参与本研究的访谈环节。在坚持异质性和多样

性的原则下,研究者进一步通过他人引荐,成功线下接触并深入了解了2名粉丝成员。本研究最终确定10名访谈对象,相关信息详见表1。

本研究的访谈环节通过线上视频、语音电话或线下面对面交流的方式与受访者进行半结构访谈,每位受访者的访谈时长50—90分钟不等。在征得受访者的同意下,研究者对访谈全程进行了录音,在经过学术化处理后,研究团队最终整理出了近2.5万字的访谈记录,为后续的研究与论文撰写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表1 受访者基本信息

编号	代号	性别	年龄	职业	参与平台	发表频次	代表性分享行为
1	ZK	男	34	讲师	微博、FB	每周十次	台词/蜡烛
2	HXY	女	32	教师	IG	每日多次	影片/图文
3	WES	男	30	公务员	微博	每周十次	经历/感悟
4	ZXJ	女	21	学生	微博	每日一次	综艺节目
5	WYH	男	29	设计师	FB	每周三十次	感悟/节目
6	WX	女	28	影评人	IG	每周二十次	电影/节目
7	LA	男	25	音乐人	微博	每日八次	台词/蜡烛
8	ZYY	女	27	摄影师	IG	每周十次	经历/感悟
9	CTT	男	33	自媒体	微博、FB	每周二十次	电影/节目
10	LHS	女	24	学生	微博	每日十次	影片/图文

四、内容分析:哀悼实践与记忆建构

(一) 仪式习惯: 符号化表达的集体共鸣

仪式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其本质在于将具有特定文化内涵的行为进行程序化规范,从而形成典礼的秩序体系^[9]。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仪式化行为随处可见。从清晨的一杯咖啡到睡前的阅读时光,从节日的盛大庆祝到日常的小习惯,这些仪式化行为赋予了生活独特的意义和价值。从人本主义的视角来看,生活中的仪式化行为具有重要的作用。而传统仪式活动往往强调物理空间的“在场性”,借助鲜花、旗帜等具象化载体来传递情感寄托。然而,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应用,仪式活动逐渐突破了时空与物质载体的双重限制、拓展了仪式的外延边界,为参与者提供了更为便捷的参与途径。由此,数字化的集体哀悼形式应运而生,其重构着传统哀悼仪式的范式,为悼念者与被悼念者之间搭建了新型互动平台^[10]。

网络空间中的哀悼仪式具有显著的符号化特征。粉丝群体通过特定的仪式化行为来强化群体认同感。以超话“再见了杉菜”为例,众多用户通过周期性发布剧集经典台词,实现对偶像的致敬,进而完成对青春记忆的仪式性唤醒。正如受访者HXY所言,“每当看到剧集中的台词,我都会不由自主地回想起当年那段快乐的追剧时光。那时候,每个人都沉浸在道明寺和杉菜的故事里,仿佛自己也成了他们世界的一部分。”由此可见,粉丝群体的哀悼行为具有独特的传播特征,既不注重具体内容的传递,也不追求功利性目的,而是通过纯粹的关系性传播来维系情感联结。但正是这种看似无实质内容的行为,却能在实践过程中产生深远的象征意义。

(二) 隔空对话: 情感投射与身份重构

研究者在社群中观察发现,粉丝常以“隔空对话”形式试图与逝者建立一种虚拟的联系。例如,在相关纪念视频的弹幕中,频繁出现诸如“姐姐,一路走好”“下辈子还要做你的粉丝”之类的留言。尽管这种单向的交流并无法获得实际的回应,但通过情感投射的方式,实现了粉丝的自我疗愈,本质上反映了粉丝渴望建立延展性情感空间的心理需求^[11]。身为设计师WYH制作了一部名为《杉菜与我的20年》的混剪视频,累计播放量超百万。在采访过程中他几度流泪,“剪辑时我就一直在哭,发布后更忍不住了。大家都通过在评论区以大S的口吻安慰我,让我不要难过。看着这些评论,仿佛她依然存在着。”在这个具有高度同一化特征的“树洞”空间中,粉丝群体获得了情感宣泄、彼此鼓励以及传递爱意的契机。他们在学习、职场和日常生活中所经历的种种际遇,以及亟待倾诉的复杂情绪,皆通过向大S留言得以呈现。这些留言不仅蕴含着对美好生活的质朴憧憬,更折射出对理解与认同的深切渴求,从而构建了一个独特的情感维度体系。这种互动并非空洞的对话,而是借助偶像生前的艺术造诣与人格魅力所塑造的记忆图景,来抚慰个体的内心世界,丰富其精神领域,并最终形塑了大S粉丝群体的集体记忆图式。

正是这一情感空间所彰显的温情特质与包容属性,激发了粉丝群体持续的表达欲望。通过发帖、留言与互动等日常化、仪式化的文本生产,参与者们在数字场域中构建并维系着具有哀悼属性的文化空间,使

“生”的意义在这一场域中获得无限延展。粉丝群体通过持续的情感叙事，不仅对抗着现实层面的丧失体验，更在虚拟实践中重构着记忆主体的价值维度。从社会学视角来看，这种情感表达机制恰好回应了现代社会中的集体心理需求。粉丝群体得以在超话社区中构筑与大S之间的情感纽带，并获得相应的情感投射反馈。而活跃于超话中的群体，实质上是在讲述这个时代的情感叙事，他们的情感体验折射出时代的集体情感特征。与此同时，大S的记忆形象也在这一哀悼空间中被重新诠释，在文化层面实现了永恒的意义延续。

（三）固定纪念：社群共建与记忆固化

社交媒体平台的技术架构已突破传统记忆载体的物理局限，演变为数字时代的新型记忆剧场。研究者观察发现，粉丝群体往往自发地编织着记忆的网络，他们以“大S悼念日”等线上活动为节点，将散落的个体记忆串联成璀璨的珍珠项链。在这些特殊的时刻，粉丝们如同夜空中的繁星，通过同步发布剧照、合唱主题曲等方式，在虚拟空间中汇聚成璀璨的星河。这种集体仪式不仅是对偶像的缅怀，更是一种情感的升华，将个人的思念转化为群体的共鸣。如受访者WX和WES所言，“虽然我们从没见过面，但是我们就像家人一样。”“大家不约而同地分享着那些珍贵的剧照，一同在线上合唱起那些熟悉的主题曲，那种感觉真是太震撼了。仿佛在这一刻，每个人的情感找到了共鸣的港湾，不再孤单。我们相互支持，相互鼓励，共同守护着那份珍贵的记忆，也让这份爱变得更加深厚和广阔。这样的经历，让我深刻体会到，即使身处不同的地方，心与心的距离也可以因为共同的热爱而无限拉近。”这些朴实的话语道出了数字时代情感联结的独特本质。在这个由比特和字节构建的空间里，素未谋面的陌生人因为共同的情感寄托而成为精神上的家人。社交媒体平台的技术架构，从群聊功能到话题标签，从实时互动到内容共享，为这种新型的情感共同体提供了生长的沃土。每一次点赞、每一条评论、每一张分享的图片，都是记忆的砖石，共同构筑起一座跨越时空的情感纪念碑。

这种记忆的固化过程，既是技术赋能的产物，也是人类情感需求的自然流露。在数字技术的催化下，个体的缅怀升华为集体的仪式，私密的回忆转化为公共的纪念。社交媒体平台不仅记录了这些情感的表达，更通过算法推荐、内容聚合等技术手段，使这些记忆得以在更广阔的时空中传播和延续。在这种记忆数字化的过程中，粉丝群体既是记忆的书写者，也是记忆景观的建造者，他们通过技术赋权实现记忆实践的民主化转向。这种转向不仅重构了记忆生产的权力关系，更在数字时空中开辟出超越物理消亡的情感延续场域。

五、反思与展望：哀悼背后的文化断层与未来想象

“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点，遗忘才是。”^[12]哀悼的目的除了表达哀思，亦让人们从中得到反思。在数字时代，这一悼亡箴言被重构为一场技术赋权与记忆异化的辩证博弈。

（一）怀旧经济与创新匮乏

大S骤然离世，当时的聚光灯悄然黯下，这位曾以《流星花园》里杉菜一角点燃整个亚洲少女心的“偶像剧教母”，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或许未曾想到，她留下的不仅是一代人的青春记忆，更如同一面棱镜，折射出台湾偶像产业积弊已久的困局与迷思。首先，经典IP的过度消费已然成为产业难以摆脱的桎梏。制作方对《流星花园》这一文化符号的反复开采，恰似饮鸩止渴。从2001年台湾版本到2018年大陆版本，再到2021年日本翻拍版本，每一次重制都在稀释原作的文化价值。这种“新瓶装旧酒”的开发模式，不仅未能重现初代作品横空出世时的文化震撼，反而暴露了创意枯竭的窘境，看似是延续经典，实则是对文化记忆的透支。当制作人将精力耗费在如何用高清镜头复刻20年前的服化道时，却忘了真正打动观众的，是那些能穿透时代的鲜活生命力。

其次，新生代艺人的断层危机亦令人忧心。纵观台湾娱乐圈，能够跨越地域界限、引发强烈共鸣的新生代偶像屈指可数。新生代偶像的星光寥落至此番青黄不接的局面，迫使粉丝群体陷入怀旧泥沼。最后，创意同质化的痼疾则进一步加剧了产业的式微。现如今的偶像剧创作仍固守“霸道总裁”与“甜宠套路”的陈旧叙事框架，与Z世代追求个性化、多元化的审美取向渐行渐远。这种创作惰性不仅限制产业创新发展，形成恶性循环，更使其在激烈的区域文化竞争中逐渐丧失优势。

台湾偶像产业的困境，实则是整个华语娱乐圈转型阵痛的缩影。在全球化与数字化的浪潮中，如何打破“经典复刻”的路径依赖，培育具有时代印记的文化符号，创作出真正触动新生代观众心弦的作品，成为从业者亟待破解的时代命题。大S的骤然离去，或许恰如黑夜中流星划过，为这场文化突围战提供了难得的反思契机。

（二）两岸张力中的文化身份

大S的“跨海峡偶像”身份在这场集体哀悼中被赋予了新的文化景深。她的公众形象不再局限于一位艺人，而是升华为“华语文化共同体”的具象载体，成为连接两岸集体记忆的情感纽带。在众多悼念帖中，研究者发现，有不少帖子流露出对两岸关系缓和的深切期盼。这种跨越海峡的情感共振不仅体现了个人对偶像的追思，更折射出两岸民众对和平共处的共同向往。然而，这种文化认同的分化也深刻反映了台湾流行文化在全球化浪潮与本土认同之间的撕裂与挣扎。一方面，台湾流行文化作为华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始终与大陆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另一方面，在全球化的冲击下，本土认同的建构又不可避免地与地域政治、历史记忆等因素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复杂而微妙的文化张力。大S的哀悼空间，正是这种文化张力的缩影——既是对华语文化共同体的追忆与呼唤，也是对本土认同的重新审视与思考。她的形象在哀悼中被重新诠释，既承载了两岸共同的文化记忆，也映射了全球化时代下文化认同的多元与矛盾。

（三）技术赋能与数字遗产的未来

数字技术的革新为文化记忆的保存与传承开辟了崭新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不仅体现在技术维度的革新，更重塑着人类情感传承的深层肌理。在数字时代，记忆不再受困于物理载体的桎梏，而是通过数字技术的多元模态获得了永恒的生命力。

虚拟现实（VR）技术的突破，为粉丝搭建了沉浸式记忆宫殿。这个数字空间突破时空维度的限制，让观众得以“漫步”于《流星花园》的经典场景中，与虚拟杉菜展开跨维度互动。这种技术不仅革新了观剧体验的物理边界，更创造了情感寄存的数字圣殿，使集体记忆得以在虚实共生的维度中获得新生。区块链技术的引入，则为文化记忆的保存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靠性。通过将悼念内容上链，每一份情感表达都被赋予了独特的数字指纹，确保了记忆传承的完整性与不可篡改属性。这种存储特性不仅守护了记忆的原始样态，更开创了一种新型数字遗产，使情感叙事获得永恒的技术封印。人工智能的发展，特别是AI数字人技术的突破，为文化记忆的延续提供了新的可能。通过机器学习算法对海量影像与声音数据的深度分析，可以构建出高度拟真的数字形象，不仅能够复刻大S的音容笑貌，更能通过神经网络迭代交互体验，使数字生命具备自主进化的潜能。

六、结语

在数字时代的哀悼仪式中，情感宣泄的数字洪流与记忆政治的暗涌交汇成斑驳的文化光谱。大S粉丝群体的集体实践，犹如一面棱镜，折射出技术赋权下记忆建构的韧性特质：他们依托超话社区的持续互动，将碎片化的个人记忆编织成具有集体认同价值的叙事矩阵；在虚实交融的场域中，将偶像的艺术生命锻造成永恒的文化符码。这一过程不仅展现了数字时代记忆生产的独特机制，更暴露出文化转型过程中的深层阵痛——当传统偶像工业遭遇数字文明的解构力量，当集体记忆面临代际更迭的挑战，粉丝群体不得不在怀旧情绪与创新诉求的张力场中寻求动态平衡。

台湾流行文化若要突破当下的发展瓶颈，需在多重张力场域中找寻破局之道：既要守护“永远的杉菜”所镌刻的文化记忆，又要以开放姿态拥抱全球化的文化潮流；既要维系本土文化的独特性，又要实现跨文化的创造性转译。这种平衡绝非机械折中，而是需要在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全球的对话中，培育出具有生命力的文化新形态。唯有如此，台湾流行文化才能突破“杉菜时代”局限，在数字时代的文化版图中重新定位，绽放出新的生命力。这不仅关乎一个时代的文化记忆，更关系到未来文化认同的建构与传承。

参考文献：

- [1] 常江,何仁亿.约翰·杜伦·彼得斯:传播研究应当超越经验——传播学的技术史视角与人文思想传统[J].新闻界,2018(6):7.
- [2] 赵敏秀.新媒体反转新闻集体记忆的建构路径[J].青年记者,2018(2):2.
- [3] 邵鹏,王晟,应恩挺.网络哀悼的赋权效应:社交媒体哀悼空间的话语实践与权力博弈[J].传播与社会学,2024(70):115-151.
- [4] 陈中雨.自然媒介,技术媒介与“媒介即基础设施”——以彼得斯的《奇云:基础媒介哲学》为例[J].未来传播,129(03):69-76+114.
- [5] 常江,朱思垒.从主动受众到情感公众:介入性新闻的技术缘起与文化阐释[J].新闻界,2023(8):4-13.
- [6] 蔡琪.网络与粉丝文化的发展[J].国际新闻界, 2009(7):5.

- [7]蔡骐,黄瑶瑛.新媒体传播与受众参与式文化的发展[J].新闻记者,2011(8):6.
- [8]林鹤玲,郑陆霖.台湾社会运动网路经验:一个探索性的分析[J].台湾社会学刊,2001(25):111-156.
- [9]唐丝蜜.仪式观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展演实践研究——基于湘西苗族鼓文化节的考察[J].贵州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4):148-162.
- [10]尹倩.数字人文视域下文学存在方式的重构[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32(2):96-112.
- [11]张晓辉,孙菁苓.对虚拟 AI 言说:用户对聊天机器人的情感联系探析——以软件 Replika 为例[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3(9):125.
- [12]李逍.哀悼表达、影像生产与话语建构[D].杭州:浙江传媒学院,2023:27.

Forever Suguru : A Study on the Construction of Collective Memory in Online Mourning Spaces: A Sample of Taiwan Region Artist Barbie Hsu's Fans

Chen Xufan¹, Wang Jun²

¹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China

²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China

Abstract: The digital space constructed by social media has become a place of remembrance that transcends the limitations of space and time, and the people who devote themselves to mourning therein are coalescing into a ‘collective memory’ of emotions and thoughts. The digital space constructed by social media has become a place of remembrance beyond the limitations of time and space, and the people who pay tribute in it have become a collective memory of emotions and thoughts. Recently, the news of the death of Taiwan Region artiste Xu Xiyuan (Barbie Hsu) due to illness shocked the Chinese-speaking world. As a popular idol on both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 Barbie Hsu left many classic works for the world. Her life was fixed at the age of 48, but it triggered a spiritual shock that transcended the individual and the group. Taking Barbie Hsu's fans as a sample, the article tries to explore the process of constructing collective memory space in online mourning, as well as the missing parts of contemporary Taiwan Region popular pop culture. The study finds that fans spontaneously express their mourning through three ways: ritual habits, spatial dialogue, and fixed remembrance, demonstrating the unique expressive psychology and identity of the mourning group. At the same time, this process has also given rise to a sense of community consciousness, further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collective memory. At a time when online public opinion and consensus are increasingly torn apart, it is important to reflect on and summarise the memory of Barbie Hsu. We believe that remembrance is a way to move forward to a better future.

Keywords: online mourning; Sina Weibo; online public opinion; Taiwan Region artiste Barbie Hsu; collective memory

Doi doi.org/rwsk.v1i2.647

Auditory Atmospherics in Games: Beyond the Visuocentric Paradigm

Hengran Yang¹, Tiansuo Hong²

¹ Graduate School, Kyonggi University, Suwon-si, Gyeonggi-do 16227, Korea

² Hebei Institute of Communications, Shijiazhuang, Hebei 050000, China

Abstract: The videogame industry has always put visual components at the forefront in its design and analytical processes while following a visuocentric approach. This paper contends that a new perspective is needed to appreciate how auditory atmospherics play a vital yet underestimated role in creating immersive and captivating gaming experiences. This study demonstrates how sound can create player presence and evoke emotions to guide them through video game environments confirming sound design as essential for developing immersive virtual worlds. According to existing research the paper investigates how detailed soundscapes enhance player immersion and improve the total gaming experience. The paper investigates how auditory elements affect psychological states and emotions through their influence on immersion levels, emotional reactions, cognitive abilities and examines potential health consequences. The paper describes the technical implementation of immersive audio within game development software while projecting the evolution of game audio through innovations in spatial audio technology and procedural sound creation supported by AI-driven sound design and biometric integration. This paper proposes a comprehensive multi-sensory game design strategy that positions auditory atmospherics as an essential core element for the progression of interactive entertainment.

Keywords: Auditory Atmospherics, Game Sound, Immersion, Emotional Response, Visuocentric Paradigm

1 Introduction

The videogame industry showcases significant expansion in its audience size and financial gains which highlights the importance of understanding what affects player experiences. Game development has traditionally emphasized visual elements like high-quality graphics and realistic rendering but sound offers a powerful tool to enhance gameplay through emotional impact and altered player perception beyond visual capabilities. This paper examines auditory atmospherics as a fundamental element in game design to shift away from a traditional visuocentric approach toward sound-based immersion for enhanced gaming experiences. The auditory landscape created by game designers plays a major role in generating immersion defined as complete involvement in the game world with loss of time awareness and external world connection.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sound design's role in establishing presence within games while evoking emotions and directing players throughout the gaming experience based on existing research.

2 Literature review

Game studies as a field has traditionally followed a visuocentric approach which focuses primarily on visual

components when examining game design and player experience. . Foundational principles of game audio and sound design demonstrate sound's immersive capabilities in interactive spaces through techniques and practical game engine implementations^[1]. Exploration of game sound working practices reveals audio's importance by examining technological methods and integration challenges in game development pipelines^[2]. The case study of sound design analysis in "Transistor" reveals how expertly created soundscapes function collaboratively with game art and mechanics to generate emotional responses and enhance player involvement^[3]. Research into game design reveals the necessity for a holistic design philosophy that treats auditory atmospherics as essential elements for creating player experiences and narratives in virtual worlds.

Research studies delve into how sound influences player immersion by examining its effects on gaming experiences. Studies demonstrate stereo sound improves both player immersion and narrative believability when used in first-person game settings^[4]. Auditory immersion and the believability of a first-person perspective in computer games: Do gamers feel stronger immersion with mono or stereo foley and does one type appear more realistic than the other? Researchers have investigated how soundscapes generate specific emotions like tension and fear especially in horror genre games where sound cues play a crucial role in building the atmosphere.^[5]. Research on audio's wider role in computer gaming demonstrates the ways different game audio categories help engage players while building immersion. Research into computer game audio demonstrates its essential role in creating player immersion^[6]. Recent research investigates how ambient sounds and character sounds affect player avatar identification and immersion differently^[7]. This collection of research urges game studies to shift their paradigm from visual dominance toward appreciating how sound atmospherics extensively influence player experience and game design.

3 The Power of Auditory Atmospherics

The deployment of crafted soundscapes within game design functions as a fundamental element because these soundscapes work in harmony with visual elements to create immersive gaming experiences. By attending to the nuanced auditory environment, developers are empowered to significantly amplify player immersion, thereby forging a gaming experience that is not only more engaging but also profoundly memorable^[8].

3.1 Creating Presence and Immersion

The proper use of auditory elements establishes a strong sense of presence inside virtual gaming environments. The detailed simulation of real-world sound elements together with the intentional placement of environmental audio signals helps to firmly connect players to the game's reality^[9]. Developers use sound to connect players to virtual worlds thus creating a strong sense of presence in-game. The precise sound design of footsteps reverberating inside a virtual cavern helps create a sense of depth and space through its echoing effects. The remote but audible crashing of waves against a virtual shore adds depth to the game soundscape and defines the game world boundaries which improves player spatial understanding and creates a more realistic experience that merges virtual and physical perception. By layering detailed audio cues developers create an immersive soundscape which enables players to experience a realistic connection to their virtual surroundings.

3.2 Evoking Emotions

A gamer's emotional state becomes deeply affected by sound which operates at an instinctive level. Music stands out as an effective means for influencing players' emotions because it establishes particular moods while building tension in a nuanced way to trigger a full range of emotional responses. Dynamic upbeat scores implemented into action gameplay sequences generate excitement and energy which strengthens player engagement and involvement. When developers strategically implement slow, dissonant or eerily melodic musical sections they create suspense and anticipation which leads players to experience increased alertness and emotional sensitivity. Sound design and music elements purposefully chosen and meticulously applied stand as core components that boost emotional resonance during critical game events and shape players' emotional experiences through their gaming journey. This careful orchestration of sound allows developers to tap into the player's emotional landscape, creating a more resonant and impactful experience^[10].

3.3 Guiding the Player

Sound cues extend beyond emotion and immersion to become essential elements for guiding players and delivering information within games. The intentional use of sound design guides players through intricate virtual worlds while providing essential real-time information about their environment. Distinct enemy footsteps create an auditory alert for players which signals potential danger and prompts them to take strategic actions. The use of subtle auditory signals like faint chiming sounds or directional rustling enables developers to discreetly reveal hidden items and secret paths which rewards players who pay attention to their soundscape. Through sound-based information delivery and dynamic feedback game developers build immersive player experiences that surpass visual communication while incorporating essential audio elements into the gameplay.

4 Examples of Games with Effective Auditory Atmospherics

Multiple games have created unforgettable experiences through the expert use of sound-based atmospherics. Some notable examples include:

- *Alien: Alien: Isolation*: *Alien: Isolation* uses sound effectively to maintain a continuous feeling of fear and suspense throughout this survival horror experience. The spaceship's creaking, the alien's hissing sounds and the eerie silence together create a terrifying and immersive atmosphere^[11].
- *The Last of Us*: The action-adventure game uses music and sound effects to intensify the emotional resonance of pivotal story moments. The soundtrack transitions between gentle melancholy and intense action-packed sequences to reflect the characters' emotional progression^[12].
- *Ori and the Blind Forest*: The platformer game creates an atmosphere of wonder through its hauntingly beautiful soundtrack. The soundtracks work in harmony with the visuals and emotional storytelling to produce a deeply engaging and memorable experience.
- *Hellblade: Senua's Sacrifice*: The action-adventure game *Hellblade: Senua's Sacrifice* incorporates binaural audio to recreate psychosis experiences while delivering an immersive and unsettling sound environment that illustrates the protagonist's mental state.
- *Red Dead Redemption 2*: The open-world western game *Red Dead Redemption 2* employs a dynamic soundscape to deliver realism and immersion to players. The combination of nature sounds with bustling town noises and ambient music creates a believable and enchanting game world^[13].
- *Subnautica*: The underwater exploration and survival game *Subnautica* employs sound to generate feelings of mystery and wonder. The whale calls reverberating through water alongside submarine noises and the sounds of deep ocean create an unforgettable immersive experience.
- *Gris*: This puzzle-platformer adventure game uses its sound design to evoke various emotions and strengthen players' connection to the protagonist's adventure. The player's actions and narrative progression cause the music to swell and change thereby delivering a profound atmospheric experience.

The following cases illustrate how sound design creates various atmospheric states that range from feelings of tension and terror to sensations of peace and tranquility^[14]. These examples demonstrate that sound can be utilized to deepen immersion while evoking emotions and guiding players to produce a more complete and captivating gaming experience.

5 Psychological and Emotional Impact of Auditory Atmospherics

Research in interactive entertainment now acknowledges how auditory atmospherics deeply affect psychological and emotional responses among players which makes it an emerging field of academic study. Research currently demonstrates that sound plays a powerful role across multiple dimensions of player experience rather than serving as just an additional element. The research focuses on how background and character sounds affect player experience in video games^[15]. The metrics extend to player immersion depth while measuring emotional response intensity during gameplay and how cognitive performance changes within virtual spaces.

Each player interacts with sound differently under different physiologies and cultures

5.1 Augmenting Immersion and the Sensation of Presence

Current research demonstrates how sound significantly boosts player immersion and strengthens their sense of presence in the detailed virtual environment of a game. In this sense, immersion defines the mental state where players become completely absorbed in the game world while losing awareness of their real-world surroundings. The concept of presence indicates the player's personal experience of existing in the virtual space while they remain physically outside of it.

A compelling empirical study at the University of York highlighted the essential function of sound in producing immersive experiences. Game participant engagement levels dropped along with their sense of experiential realism when they played games that lacked auditory stimuli. The fundamental study demonstrates that sound plays an essential role in building virtual worlds that maintain both consistency and realism while offering an engaging experience that fully captures players' attention. Without sound the illusion of reality breaks down which prevents players from engaging with the virtual world in a meaningful way as they struggle to fully immerse themselves.

5.2 Emotional Modulation through Auditory Design

Gaming sound design uses auditory elements to trigger various emotional responses in players which span both positive states like excitement and joy as well as negative ones such as fear and sadness. Music stands as an effective tool for emotional manipulation which creates an immersive mood throughout the game while guiding the player's emotional journey. Effective sound design depends on the strategic use of both musical scores and detailed sound effects to generate emotional reactions that harmonize with the game's narrative and interactive elements. Auditory hallucinations serve as an effective tool for emotional manipulation in horror games through strategic application. Developers generate strong feelings of unease and fear in players through the deliberate use of disembodied vocalizations and enigmatic whispers that seem to come from nowhere. The approach skillfully merges the game world and player reality to create a deeply immersive atmosphere that introduces disturbing uncertainty. Auditory illusions dramatically enhance the psychological intensity of horror-based interactive games by driving players into deeper layers of anxiety and suspens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is approach generates important ethical questions about the possible lasting psychological harm that comes from intentionally creating fear and anxiety in gamers. When audio tools with significant power are employed they require a careful evaluation of both player health effects and their long-term consequences.

To fully grasp the implications of immersive audio requires studying its possible negative impacts including Game Transfer Phenomena (GTP)^[16]. Game Transfer Phenomena (GTP) represents the continuation of gaming experiences through intrusive sensory, cognitive, and motoric experiences after gameplay ends. Auditory intrusions constitute an essential component of GTP where players experience involuntary memories of in-game audio elements and complete auditory hallucinations including voices and sound effects from the game world after stopping gameplay. Some anecdotal evidence claims that GTP experiences remain harmless and enjoyable for numerous players but it remains essential to understand that certain people with increased sensory sensitivity or established psychological vulnerabilities can find these intrusions extremely troubling. The occurrence of frequent and intense auditory GTP events in clinical settings can reflect or lead to reduced psychological health which highlights the necessity for further investigation into the lasting impacts of immersive sound-based gaming environments.

5.3 How Auditory Cues Affect Cognitive Performance in Interactive Gaming Environments

Recent studies reveal how specific sound elements in video games play a significant role in changing players' cognitive abilities. Multiple studies suggest that rich auditory game environments help develop specific cognitive abilities. Research findings indicate that people who spend significant time playing video games show improved auditory processing speeds. The cognitive benefits observed in gamers are believed to originate from the intricate auditory demands presented by the dynamic sound environments found in modern games^[17]. The complex nature of these auditory environments requires instant and precise interpretation of multiple simultaneous sound events which might lead to neuroplastic adaptations that improve the processing efficiency of auditory information. Engaging with immersive game audio produces cognitive advantages which enhance players' ability to process

auditory information faster and more precisely across various situations and possibly outside gaming scenarios.

The intentional use of music in game sound design provides a sophisticated method to influence player cognitive processing. Scientific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different musical elements such as tempo, rhythm, and instrumentation can affect attention and cognitive resource distribution in distinct ways^[18]. Research shows that musical genres and compositions with slower tempos and predictable harmonic structures help promote focused attention while decreasing cognitive distractions. Music featuring fast tempos and intricate rhythms or lyrics can unintentionally shift attention away from cognitive tasks that demand prolonged focus. The dichotomy between different sound design elements reveals that developers can use audio strategically to enhance player performance through various gameplay objectives. To help players concentrate on analytical thinking during puzzle-solving segments game developers utilize calming ambient music to create a mental environment that promotes problem-solving abilities. The use of high-energy, upbeat music during action-packed sequences can improve player arousal and reaction time which enhances performance in fast-paced reflex-based gameplay.

Research investigating character-specific audio cues in game soundscapes has provided significant insights beyond the general impact of game music. The research examining video game soundscapes discovered that character-specific auditory elements linked to player actions directly affected multiple important aspects of player experience in a positive way. The dimensions under consideration showed increased player immersion together with stronger avatar identification which means players felt more connected with their in-game characters and they experienced more enjoyment overall^[19]. Research shows that purposeful inclusion of player-character-specific auditory feedback within game environments greatly improves player presence and world connection which leads to more immersive and enjoyable gaming experiences.

6 Technical Aspects of Implementing Auditory Atmospherics

The latest game development software supplies developers with numerous choices to build and apply immersive sound designs. Wwise and FMOD audio middleware enables developers to build responsive soundscapes that adjust based on the player's activities and environmental shifts. The available tools provide developers with real-time sound adjustments capabilities along with event-driven sound triggers and interactive music systems to achieve unparalleled control over the audio experience.

6.1 Real-Time Sound Adjustments

Developers can instantly modify sound features including volume, pitch, and effects using Wwise and FMOD. Developers can adjust audio elements on the fly which helps match the soundscape with gameplay dynamics to evoke specific emotional reactions. Game developers could implement real-time audio adjustments to progressively amplify unsettling whispers and creaking noises whenever players move toward suspenseful zones within a horror game to boost tension and fear.

6.2 Triggering Sounds with Gameplay Actions

Wwise and FMOD both use an event-driven method which connects sounds with specific actions within the game. Through this feature developers achieve a sound environment where audio effects respond to player movements and gameplay interactions. The sound of footsteps becomes activated by player movement speed and surface type, resulting in a more lifelike and engaging gaming environment.

6.3 Dynamic Audio Transitions

Developers have the ability to move between various sounds smoothly during gameplay using audio states and switches. When players enter combat the background music transitions from calm and atmospheric sound to intense and action-packed tones which enhances the encounter's emotional impact. The game "Dead Space" features music that changes dynamically when an enemy approaches which generates a feeling of imminent danger and urgency for players.

6.4 Interactive Music Design

Developers can use Wwise to build music tracks that dynamically react to both player movements and

narrative developments within the game. The musical experience becomes more interactive and captivating because the music stays alive and directly responds to the player's actions during gameplay. In action games the music intensifies and gains additional layers when players execute combos or defeat enemies to offer an immersive audio reward.

6.5 Optimized Audio Management

Successful audio management guarantees seamless performance while preventing excessive sound buildup. Game developers must manage audio elements by controlling their simultaneous playback and determining playback priorities according to their significance in the game experience. Audio occlusion and prioritization techniques enable developers to maintain audible clarity by preventing critical sounds from being overshadowed by less important audio elements.

6.6 Creating Spatial Audio Effects

Through binaural audio and ambisonics spatial audio technologies simulate 3D sound perception to produce realistic and immersive auditory environments. These audio technologies generate depth perception alongside directional sound cues which together create environmental presence and improve player immersion.

7 Studying the Future of Audio Environments in Game Development

Audio atmospherics in gaming today stand at the forefront of a landscape rich with transformative possibilities. The latest developments in fundamental audio technologies such as spatial audio rendering, procedural sound generation and AI-driven sound design methodologies are establishing new possibilities for creating profoundly immersive and dynamic experiences for players. Advancements in game audio technology are transforming sound from a secondary component into the fundamental structure that supports interactive world-building and enhances player involvement.

7.1 Spatial Audio: Immersive Soundscapes and the Illusion of Presence

The modern game development sector sees widespread adoption of spatial audio technologies which mark a transition to perceptually realistic and immersive soundscapes. Audio systems including Dolby Atmos and Sony 3D Audio demonstrate this movement through their advanced techniques which recreate sound travel and perception in multi-dimensional environments. Spatial audio technology advances beyond conventional sound systems by allowing developers to position individual sound objects within a complete 360-degree sound environment. The improved spatial fidelity enables developers to produce soundscapes that deliver enhanced auditory depth along with precise sound directionality and a robust sense of environment presence. Players experience deeper immersion because sound elements effectively match the virtual space and strengthen the sensation of being part of the game world.

Technology	Description	Example in Games
Dolby Atmos	Creates a 3D soundscape by simulating how sounds would be heard in a real-world environment.	Call of Duty: Modern Warfare, Cyberpunk 2077
Sony 3D audio	Uses Head-Related Transfer Function (HRTF) technology to create a personalized spatial audio experience.	Marvel's Spider-Man: Miles Morales, Returnal
Binaural audio	Uses two microphones to record sound in a way that simulates how humans hear.	Hellblade: Senua's Sacrifice, Resident Evil Village
Ambisonics	A full-sphere surround sound technique that captures sound from all directions.	Half-Life: Alyx, Star Wars: Squadrons

State-of-the-art spatial audio rendering methods depend heavily on progress in basic audio processing

techniques such as Head-Related Transfer Functions (HRTF), convolution reverb, and ambisonics. These technologies collaborate effectively to create authentic three-dimensional audio spaces in games.

- Head-Related Transfer Function (HRTF) Technology: HRTF modeling functions on the basis of replicating how a person's head shape and outer ear structure affect sound coming from various spatial directions. Through detailed acoustic measurements and computational modeling HRTF technology produces filters for game audio that can be personalized or standardized to users. Effective HRTF processing achieves precise sound source positioning around a listener in all three dimensions including above and below the listener which produces enhanced verticality and realistic three-dimensional sound localization. The ability to communicate subtle spatial cues through audio processing plays an essential role in creating realistic auditory experiences.
- Convolution Reverb: Convolution reverb presents a major step forward beyond conventional algorithmic reverb methods. The system works by recording impulse responses from actual or virtual spaces and uses these recordings to modify game audio as it plays back. The system precisely models sound reflections and reverberations in various environments by analyzing room dimensions and surface acoustic characteristics. Developers who use convolution reverb technology produce realistic acoustic spaces in virtual settings such as expansive cathedrals with echoes or confined metallic corridors with tight reverberations that result in a more immersive environment for players.
- Ambisonics: Ambisonics represents a complete spherical surround sound technique that captures and reproduces audio from all directions within a three-dimensional space unlike channel-based surround sound systems. The Ambisonic encoding method records the complete sound field from one specific location which enables flexible and immersive audio reproduction across multiple speaker setups or headphone systems. Ambisonics serves as an influential innovation in game development enabling developers to craft intricate sound environments which respond to player movements and perspectives within virtual spaces. This technique successfully delivers an authentic sensation of sound immersion which makes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game world and the player's perception almost disappear.

Advanced audio processing techniques and spatial sound technologies move game sound design to more sophisticated immersive audio experiences, paving the way for sound to become increasingly essential in enhancing player engagement and virtual world believability.

7.2 Procedural Audio Generation

Procedural audio generation breaks away from sample-based sound design by using algorithmic processes to create sounds during gameplay. This method enables the creation of a much broader range of complex auditory experiences which surpasses the limitations of pre-recorded sound assets. Procedural audio systems create sound in real time through specific rules and parameters instead of using fixed sound files which enables infinite variations that respond to in-game events. The natural dynamic qualities of procedural audio make it exceptionally effective for developing responsive soundscapes that adapt seamlessly to player interactions and environmental shifts while intensifying a game world's immersion and realism. Expansive open-world games can use procedural audio to produce authentic and dynamic natural sounds including wind patterns and wildlife noises. A virtual forest exists where every leaf rustle and raindrop along with animal sounds is produced distinctly from environmental factors and player location to generate a detailed and continuously fresh auditory experience. Procedural audio techniques enable dynamic sound element creation across multiple categories including real-time adaptive footstep sounds on various surfaces and weapon noises that change with distance and environmental factors. Procedural audio systems produce complex soundscapes with minimal memory requirements because compact algorithms replace large sample libraries.

7.3 AI-Driven Sound Desig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now stands to transform many aspects of game development while sound design serves as a prime example of this transformative potential. The audio pipeline now benefits from AI technologies that automate demanding tasks like sound asset creation and the processes of mixing and mastering. The automation

process enhances development efficiency while enabling sound designers to focus on creative and conceptual sound design work. AI technology provides robust solutions for improving specialized areas of game audio including dialogue production and synchronization of lip movements. Modern AI technologies enable developers to build dialogue systems that produce contextually relevant character speech which responds dynamically to story pathways and player decisions. AI-based lip-syncing systems produce lifelike facial animations that match either generated or pre-recorded dialogue to improve the realism of virtual characters in interactions^[20]. AI demonstrates significant potential for developing soundscapes that uniquely match individual player behaviors and preferences. Consider an AI system that performs real-time analysis of player gameplay styles by recognizing movement patterns and combat decisions before adjusting game audio to match these detected behaviors. Players who prefer stealth and exploration will experience enhanced ambient sounds and atmospheric music while action-oriented players will encounter heightened combat music and sound effects through AI-driven dynamic adaptations that deliver immersive audio experiences tailored to each player's unique style.

7.4 Biometric Audio

The field of game audio is experiencing a revolutionary trend as it incorporates biometric data to build soundscapes that respond both interactively and physiologically. The innovative biometric audio system uses real-time physiological data streams that monitor heart rate, respiration rate, electrodermal activity, and neurological signals to adjust the game's sound environment dynamically. The primary idea involves establishing a connection between the player's physical state and the game world's soundscape which enables the audio to change dynamically based on the player's emotional and physiological feedback. A horror game could use biometric sensors to detect when a player experiences fear and stress through increased heart rate and skin conductance to activate more intense music and sound effects which heightens the game's tension. A puzzle-solving game system that detects player frustration or cognitive overload through biometric data automatically transitions to a soothing ambient soundscape which helps foster relaxation and improved focus on problem-solving tasks. The use of biometric audio extends its usefulness beyond horror games to multiple different genres. Action games could achieve heightened physical engagement by adjusting music tempo and intensity according to player arousal measurements. Narrative-driven games use changes in environmental sounds and character vocal tones to mirror the player's emotions during their interactions with intricate story arcs and character bonds. The connection between players' physiological reactions and the game's sound environment will enable biometric audio to deliver deeply personal gaming experiences that merge physical and virtual realities like never before.

7.5 Health Considerations for Auditory Atmospherics

The benefits of immersive audio experiences in gameplay should be weighed against the health hazards of continuous exposure to loud game sounds. Research demonstrates that prolonged exposure to high sound levels in video games can cause permanent hearing damage and tinnitus among players.

Developers have multiple strategies available to them to mitigate risks.

8 Conclusion

Through this paper we sought to reveal how auditory atmospherics can transform interactive gaming environments. Our arguments promote a fundamental shift away from traditional visual focus to emphasize sound as a critical element for creating gaming experiences that deeply engage players emotionally while providing dynamic immersion. By adopting auditory design principles developers can surpass visual-only limitations to access new creative possibilities while achieving deeper player involvement in virtual environments.

The continuous forward push of audio technology through advances in spatial audio rendering and procedural sound generation along with AI-driven design and biometric integration signals the beginning of an unprecedented audio revolution in gaming. These developments go beyond simple enhancements and signal essential changes that will transform interactive sound at its core. The future auditory dimension of gaming will become central and more impactful through personalized three-dimensional soundscape creation along with dynamic auditory environments generated by algorithms which respond to the player's physiological state.

Advancements in graphical fidelity and visual realism do not solely determine the future trajectory of gaming technology. The direction toward truly immersive and emotionally resonant interactive experiences shows a clear shift toward comprehensive multi-sensory game design approaches. Game designers must fundamentally reconsider sound as a primary element of game creation because it provides essential functions beyond enhancing visuals by shaping player perception and evoking deep emotions while guiding them through virtual environments with unmatched precision and effectiveness. The future direction of gaming must consider not just visual elements but also the substantial impact of auditory elements.

- [¹] Sinclair, J. L. (2020). *Principles of game audio and sound design: sound design and audio implementation for interactive and immersive media*. Focal Press.
- [²] Bournemouth University. (n.d.). Game Sound: Working Practices, Technologies, Challenges and Emerging Opportunities. (2022-7-1)<https://eprints.bournemouth.ac.uk/37152/1/SAMIS%252520Presentation%252520MC%252520DG%252520V2.pdf>
- [³] Asplund, I. (2017). Songs of Transistor: A study of sound design in video games.
- [⁴] Wennerberg, D. (2019). Auditory immersion and the believability of a first-person perspective in computer games: Do players have a preference between mono and stereo foley, and is one perceived as more believable?
- [⁵] Aziminejad, S., & Agfemalm, A. (2023). Examining the role of soundscapes for player experience: A Case Study of Darkwood.
- [⁶] Huiberts, S. (2010). *The Role of Audio for Immersion in Computer Games*. University of.
- [⁷] Haehn, L., Schlittmeier, S., & Böffel, C. (2023). I Hear, Therefore I Am-Influence of Sound Design in Videogames (pp. 1648-1651). Universitätsbibliothek der RWTH Aachen.
- [⁸] Atmospheric Effects in Video Games: A Comprehensive Overview (2024-7-30) <https://www.yellowbrick.co/blog/animation/atmospheric-effects-in-video-games-a-comprehensive-overview>
- [⁹] Sound Design in Games: Creating an Auditory Experience (2024-4-2) <https://blog.emb.global/sound-design-in-games/>
- [¹⁰] Agrawal, S.; Simon, A.; Bech, S.; Bærentsen, K.; Forchhammer, S. Defining Immersion: Literature Review and Implications for Research on Audiovisual Experiences. *J. Audio Eng. Soc.* 2020, 68, 404–417. DOI: <https://doi.org/10.17743/jaes.2020.0039>
- [¹¹] The Most Atmospheric Video Games - TheGamer (2024-7-16) <https://www.thegamer.com/best-atmospheric-video-games/>
- [¹²] The Role of Sound and Music in Creating Atmosphere In Games - GAME PILL Game Studio(2023-2-4) <https://gamepill.com/the-role-of-sound-and-music-in-creating-atmosphere-in-games/>
- [¹³] 10 Games So Immersive You'll Forget The Real World Exists - YouTube (2024-12-23)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IdwktG7424>
- [¹⁴] Zhang, Y., & Song, Y. (2022). The effects of sensory cues on immersive experiences for fostering technology-assisted sustainable behavior: A systematic review. *Behavioral Sciences*, 12(10), 361.
- [¹⁵] Haehn, L., Schlittmeier, S. J., & Böffel, C. (2024). Exploring the impact of ambient and character sounds on player experience in video games. *Applied Sciences*, 14(2), 583. DOI: <https://doi.org/10.3390/ap14020583>
- [¹⁶] De Gortari, A. O., & Basche, A. (2021). Pain and gain of auditory intrusions with video game content: Game transfer phenomena in clinical cases. *European Psychiatry*, 64(S1), S642-S642. DOI: <https://doi.org/10.1192/j.eurpsy.2021.1705>
- [¹⁷] Shin, K. S., Yim, Y. K., Kim, Y., Park, S., & Lee, J. Y. (2017). Effects of visual game experience on auditory processing speed. *Cyberpsychology, Behavior, and Social Networking*, 20(3), 187-194. DOI: <https://doi.org/10.1089/cyber.2016.0171>
- [¹⁸] Wharton, A.; Collins, K. Subjective Measures of the Influence of Music Customization on the Video Game Play Experience: A Pilot Study. *Game Stud.* 2011, 11. Available online: https://gamedstudies.org/1102/articles/wharton_collins (accessed on 28 November 2023).
- [¹⁹] Cohen, J. Defining Identification: A Theoretical Look at the Identification of Audiences with Media Characters. *Mass Commun. Soc.* 2001, 4, 245–264.
- [²⁰] Yang, H. (2025).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rt robots: the future of technological art or the end of the human artist?. *International Theory and Practice i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1), 243-251. DOI: <https://doi.org/10.70693/itphss.v2i1.85>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2.668

浅析宁夏知识产权转化运用促高质量发展的问题及对策

唐璐琪¹

(¹北方民族大学，宁夏回族自治区 银川 750030)

摘要：《“十四五”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规划》和《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年）》的出台，充分体现了国家在战略层面对知识产权的重视。知识产权创造性转化与应用是激发科技创新的重要途径。宁夏地区作为西部地区的发展强省，一直以来对知识产权的转化运用十分重视。但是由于近些年知识产权领域的快速发展，在创造性转化促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从不同方面出现了多种类型的问题。本文通过分析在校学生知识产权意识、职务发明过程中权利归属、高校智力成果转化、企业高新认定、个人维权以及宁夏地区非遗保护方面的问题，从不同领域、多个角度归纳问题产生的原因。根据具体的问题，结合相关领域问题的产生原因，给出相对应的解决方案，给宁夏地区的知识产权创造性转化运用提供一些切实可行建议。

关键词：知识产权；转化运用；维权意识；权利分配；对策

一、研究背景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有关精神，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激发全社会创新创造活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知识产权强区建设，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结合自治区实际。2024年9月26日，宁夏回族自治区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宁夏回族自治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该条例指出权利人依法就作品、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商标、地理标志、商业秘密、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植物新品种及法律规定的其他客体享有的专有权利。该条例的出台，标志着宁夏回族自治区拥有了涵盖知识产权全部种类的地方性法规。全方位弥补了《宁夏回族自治区专利保护条例》的大量空白，解决了《宁夏回族自治区专利保护条例》部分条文已与现行上位法不匹配，也不适应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统筹推进知识产权严保护、大保护、快保护、同保护”的新要求等一些列问题。

随着《宁夏回族自治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陆续出台实施，势必会加速推进宁夏地区知识产权转化运用促高质量发展的进程。然而无论是将创造性智力成果转化为知识产权的过程中，还是将知识产权转化运用的实际推进与运作的进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遭遇一系列错综复杂的问题。这些问题会随着保护客体的不同和转化流程的阶段不断变化，存在着多样性和复杂性的特点，阻碍知识产权的转化和运用。因此分类型逐阶段的分析问题的来源以及产生的原因，对问题的有效化解起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效能。同时面对形态各异的各种问题，多元化的探求问题的解决方法，对于宁夏地区初步实施《宁夏回族自治区专利保护条例》和促进地区知识产权转化运用更为直接和有效。

二、多元群体之间各异问题的剖析

由于知识产权保护客体种类的多样化，演化出了权利主体多元化的特点。其中主要分为高校，企业和个人三种较为明显的差异主体。不同的主体之间又会划分出更为细分的权利主体。差异权利主体之间在知识产权的维权和转化过程中面临着不同的问题。

（一）在校生知识产权意识薄弱

大学生是祖国的希望，是建设经济政治事业的主力，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我们国家的未来^[1]。在当今

[作者简介]

唐璐琪（1995—），女，河南郑州人，北方民族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产权已成为重要的无形资产和竞争资源。然而，令人担忧的是，在校生群体中普遍存在知识产权意识薄弱的问题，这一现象在各教育阶段均有不同程度的体现，并引发了一系列不容忽视的后果。

从基础教育阶段来看，学生们往往在不经意间就陷入了知识产权侵权的行为中。例如，在完成作业或制作手抄报等任务时，许多学生会直接从网络上搜索图片、文字资料，未加思考地复制粘贴，全然不顾这些内容是否受到版权保护。这是因为他们尚未形成对知识成果归属和合法使用的清晰认知，在他们的观念里，网络上的信息如同公共资源，可随意获取和使用，缺乏对原创作者权益的尊重和基本的版权意识。

高等教育阶段，这种情况也并未得到显著改善。新在学术研究领域，部分学生为了完成论文，存在抄袭他人研究成果、篡改实验数据等学术不端行为。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些行为不仅违反了学术道德规范，更侵犯了他人的知识产权。有些学生在参与科研项目时，对于自己研发过程中产生的知识产权保护缺乏主动性，不了解专利申请的流程和意义，致使学校和团队的科研成果未能得到及时有效的保护，造成潜在的知识财富流失。

这种知识产权意识薄弱的状况，根源在于学校教育中相关课程的缺失或不足。长期以来，应试教育占据主导地位，使得学生们将主要精力集中于考试科目，而知识产权教育未能得到足够重视，仅在少数专业课程中略有涉及，且教学内容往往流于形式，缺乏深度和系统性，难以让学生真正理解知识产权的内涵、价值和法律规范。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在知识产权人才培养中作出了很多有益尝试，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仍然面临着诸如知识产权人才知识结构难以满足社会需求、知识产权学科长期定位不明、教学内容与课程设置合理性不足等问题^[2]。《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在该论文当中简称为《意见》）指出，高校在开展法治教育时应该做到“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学生”，剖析各高校的教育现状我们可以看出，关于知识产权的教育模式已经显得有些落后，在教育进程中只关注理论知识的传授，忽视了实践活动的开展^[3]。

家庭环境也对学生知识产权意识产生影响。大多数家长自身缺乏知识产权意识，在日常生活中未对孩子进行这方面的引导和教育，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没有接受到正确的知识产权观念熏陶，自然难以形成良好的意识习惯。

社会大环境同样不可忽视。在当前信息爆炸的时代，网络上充斥着大量未经授权的盗版资源，从影视作品、音乐到各类软件、文学作品等，这些资源的轻易获取让学生们误以为知识产权的保护并不重要，或者认为侵权行为是一种普遍存在且无需承担后果的“常态”，从而在潜移默化中削弱了他们对知识产权的敬畏之心。

在校生知识产权意识薄弱带来的危害是多方面的。在学术层面，严重破坏了学术氛围的纯洁性和严谨性，阻碍了学术创新的发展，使得科研成果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大打折扣，降低了学术研究的质量和价值。从长远来看，当这些学生步入社会后，他们的这种意识可能会延续到工作中，影响企业的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力，不利于整个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削弱了国家在全球知识经济竞争中的实力。

（二）职务发明创造权利纠纷问题

知识产权作为当今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其受关注程度不断攀升，与此同时由于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对职务发明的权利归属制度也提出了新挑战^[4]。职工的职务发明创造权利纠纷问题日益凸显，成为了企业与员工关系中的一个敏感而关键的领域。随着创新驱动发展理念在各行业的深入贯彻，职工在工作过程中所产生的创造性成果数量不断攀升，与此同时，围绕这些成果的权利归属、利益分配以及权益保护等方面的纠纷也呈现出增长态势。

从纠纷的产生原因来看，首要因素是企业与职工之间对于职业创造权利的界定模糊不清。许多企业在员工入职时签订的合同中，未能明确规定在工作范围内员工所完成的发明创造、技术改进、创意设计等成果的所有权归属。例如，在软件开发公司，程序员在完成项目代码编写过程中，可能融入了个人独特的算法设计，但企业认为这是职务行为，成果应归公司所有；而员工则认为自己在业余时间也投入了大量精力进行技术探索和优化，应享有部分权利，这种模糊的界定极易引发纠纷。

激励机制的不完善也是导致纠纷的重要原因之一。一些企业虽然鼓励员工创新，但在实际操作中，对于员工的创造性贡献未能给予足够的物质奖励和职业发展激励。当员工的创新成果为企业带来显著经济效益时，若企业未按照合理比例对员工进行分红或奖励提升，员工会感到自身权益受到侵害，从而引发权利纠纷，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打击了员工的创新积极性。

在法律层面，尽管我国有知识产权相关法律法规，但在具体的职业创造权利纠纷案例中，法律条文的

解读和适用存在一定的复杂性和模糊性。对于职务发明创造中“本职工作”“主要利用单位物质技术条件”等关键概念的界定，在不同行业、不同企业情境下可能存在差异，这使得纠纷的解决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增加了纠纷处理的难度和不确定性。

（三）高校智力成果转化

在知识经济蓬勃发展的当下，高校作为智力成果的重要产出地，其成果转化却面临着诸多难题，严重制约了高校科研价值的充分释放以及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

首先，高校科研成果与市场需求之间存在明显的脱节现象。许多高校教师和科研人员在开展研究工作时，往往更注重学术前沿性和理论创新性，而对市场实际需求关注不足。例如在一些高新技术领域，科研成果虽在学术层面取得了显著突破，但由于缺乏对市场应用场景、成本效益以及用户需求的深入调研，导致这些成果难以直接对接企业的生产需求，无法顺利转化为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或服务，造成了智力资源的极大浪费。

从高校内部管理机制来看，成果转化的激励政策不完善是一大阻碍。现行的高校评价体系大多侧重于科研项目的立项数量、论文发表级别以及科研经费的获取额度等指标，对于科研成果转化的重视程度相对较低。这使得科研人员在进行科研活动时，更多地将精力放在满足学术评价要求上，而缺乏积极推动成果转化的内在动力。即使有部分科研人员有意进行成果转化，繁琐复杂的审批流程和知识产权管理规定也让他们望而却步。高校内部各部门之间在成果转化过程中缺乏有效的协同合作，技术转移办公室、科研管理部门以及法务部门等之间的信息沟通不畅，难以形成高效的成果转化工作链条，进一步降低了成果转化的效率。

在资金投入方面，高校智力成果转化面临着严重的资金短缺问题。从实验室研究成果到实现产业化生产，中间需要经过中试、市场推广等多个环节，每个环节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然而，高校自身的科研经费主要用于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阶段，难以承担成果转化过程中的巨额资金需求。同时，由于高校科研成果转化的风险性较高，社会资本和金融机构往往对其持谨慎态度，不愿轻易投入资金，导致高校智力成果转化在资金上陷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困境，许多有潜力的成果因缺乏资金支持而无法迈出转化的关键步伐。

此外，高校与企业之间的合作也存在诸多障碍。一方面，高校和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突出，企业不了解高校的科研优势和最新成果，高校也不清楚企业的技术需求和市场动态，双方缺乏有效的沟通平台和对接机制，使得许多潜在的合作机会白白流失。另一方面，在合作过程中，由于双方的目标、利益诉求和文化背景存在差异，容易在知识产权归属、利益分配、风险承担等关键问题上产生分歧和矛盾，影响合作的稳定性和持续性，进而阻碍了智力成果的顺利转化。

（四）企业高新申报困难

宁夏地区的企业在进行高新技术申报或者认定时，往往会产生知识产权数量与质量不足的问题。部分企业拥有的知识产权数量较少，或者知识产权的技术含量不高，难以满足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对知识产权的要求。例如，一些企业仅有少量的实用新型专利，缺乏核心的发明专利，在申报时竞争力较弱。同时企业的知识产权需要与主营产品或服务紧密相关。但实际情况中，有些企业的知识产权与自身核心业务的关联度不够，无法有效证明其在高新技术领域的创新能力。

研发投入方面，许多企业对研发费用的核算不够准确和规范，存在将非研发费用计入研发费用的情况，或者研发费用的归集口径与高新申报要求不符。例如，把生产设备的常规维护费用误计入研发费用，导致研发费用数据不准确。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对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的比例有明确要求。一些企业由于资金紧张或对研发重视程度不够，研发投入不足，无法达到规定的比例，从而影响申报。

人员构成方面，申报高新技术企业要求企业的研发人员占企业当年职工总数的比例达到一定标准。部分企业存在研发人员数量不足或对研发人员的界定不清晰的问题，导致研发人员占比难以满足要求。对于研发人员的学历、专业技术职称等资质证明材料，企业可能准备不充分或存在不规范的情况。如部分研发人员学历证书丢失，未能及时补办或提供有效证明。

高新技术产品及服务方面，由于企业对高新技术产品服务的认定标准理解不够准确，导致在申报时将一些不符合要求的产品或服务误列为高新技术产品（服务），而真正符合条件的却未被充分体现。准确核算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入并进行合理归集是申报的关键。但企业在实际操作中，可能存在收入分类不清、与非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入混淆的情况，影响了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入占比的准确性。

高新申报材料需要全面、准确地反映企业的创新能力和技术水平。但一些企业在撰写申报材料时，存在内容不完整、重点不突出、表述不清晰等问题，未能充分展示企业的优势和特色。申报材料的整理和装订也有一定的要求。部分企业在这方面不够重视，材料的逻辑性不强，排版混乱，甚至存在缺页、漏项等情况，给评审人员留下不良印象。

（五）个人维权困难

从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可以看出，截至 2023 年底我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达到 10.92 亿，短视频的用户规模达到 10.53 亿，使用增长率 96.4%，短视频成为网络视听行业的中流砥柱。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侵权手段日益多样化且愈发隐蔽^[5]。例如，在数字音乐、影视、文学作品等领域，个人侵权者通过各类非法下载、在线播放、私自传播等方式侵犯版权，但这些行为往往借助复杂的网络技术和虚拟的网络环境进行，侵权源头难以追踪，侵权路径也错综复杂。侵权者可以轻松地使用匿名身份、虚拟专用网络（VPN）等手段隐藏自己的真实信息，使得知识产权所有者及其代理人难以确定侵权主体的真实身份和地理位置，这大大增加了打击侵权行为的难度和成本。对于知识产权所有者来说，通过法律途径打击个人侵权行为往往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首先，收集侵权证据就是一项艰巨的任务，需要对各类复杂的网络信息进行固定、公证，这涉及到专业的技术手段和法律程序，成本不菲。其次，诉讼过程漫长，从立案、审理到执行，可能需要数月甚至数年的时间，在此期间，知识产权所有者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来跟进案件进展，支付律师费、诉讼费等一系列费用。而与之相对的是，即使最终胜诉，获得的赔偿金额可能相对较低，无法弥补其在维权过程中所付出的成本，这种维权成本与收益的严重失衡，使得许多知识产权所有者在面对个人侵权行为时望而却步，不愿积极主动地采取法律措施进行维权，从而间接纵容了个人侵权行为的发生。

（六）非遗申请问题

宁夏地区非遗传承保护研究在国内尚不成系统，专门针对宁夏非遗传承保护法律方面的研究在国内比较薄弱。据统计，宁夏的非遗大致分为 10 大类，共计 100 多个品种，分别分布于 20 个市、县（区），在全国乃至世界历史文化宝库中占有一席之地^[6]。但是宁夏地区的许多非遗项目的传承人年龄偏大，年轻一代对非遗技艺的兴趣和参与度较低，导致传承后继乏人。一些传统的手工技艺，如贺兰砚制作等，面临着“人亡艺绝”的困境。缺乏系统的传承人培养计划和培训体系，非遗技艺的传承主要依赖口口相传和个人经验积累，传承方式较为单一，难以满足现代社会对非遗传承的需求。而宁夏地区的非遗保护工作存在无专门机构、无专业队伍、无专用场所等问题，部分工作人员专业不对口、理论研究水平偏低，对非遗工作任务疲于应付，无法高质量完成相关工作。对宁夏地区非遗资源的系统性研究不足，缺乏对非遗项目的历史渊源、文化内涵、艺术价值等方面的深入挖掘和研究，影响了非遗申请的质量和效果。部分申报主体对非遗申报的要求和流程不够熟悉，申报材料的内容完整性、准确性和规范性存在问题，如对项目的描述不够清晰、佐证材料不足等，影响了申报的成功率。对非遗项目的认定标准理解不够准确，在申报过程中存在对项目的分类不当、对非遗特征的把握不准确等问题，导致一些本应符合条件的项目未能成功申报，而一些不符合要求的项目却进入了申报程序。

三、各领域知识产权转化问题对策

（一）加强高校知识产权教育工作的对策

1.学校方面

（1）对知识产权教育进行准确的定位

目前高校开展知识产权的学科定位比较模糊，有些学校将知识产权归类为理工科，还有一部分学校定义为法学教育的分支学科。知识产权的发展依托于专利代理和知识产权侵权诉讼两个方面，定义为理工科教育背景能更大限度的提升学生的发展途径。

（2）及时调整法治教育的教学内容

高校上级主管机构包括学校自身应注意组建专业的人才队伍，对当前法治教育大纲进行认真分析和研究，要注意在教学过程中对相关内容进行优化。在优化大学生知识产权方面的法治教育内容时，需对过往教学内容进行深入剖析。对于那些经实践证明能有效提升大学生法治意识的部分，应予以保留并持续运用；而对于已不符合当下实际情况、无法有效助力学生法治素养提升的内容，则应果断摒弃或进行适应性调整。

2.教师方面

(1) 提高教师的素质

目前高校教师利用职务便利侵犯在校生知识产权的案件屡见不鲜。对高校来说，应不断拓宽渠道，采用多种形式不断提升法治教师的整体素养。要注意加强教师培训，紧扣依法治国这一宗旨，高校法治教师应紧随时代脚步，同时高校还应当为教师从物质、时间等方面创造更多的便利条件，促进其法治素质及综合素养的全面提升。高校应制定明确、详细且严格的学术规范和道德准则，明确规定师生在学术研究和作品创作中的权利与义务，对剽窃等学术不端行为作出清晰界定，并制定相应的处罚措施，包括警告、记过、降职、解聘等，增加违规成本。

建立规范的论文指导和审核机制，明确导师在指导过程中的职责和权限，要求导师定期提交指导记录。同时，加强对论文的查重检测和同行评审，除了使用常见的查重软件外，还应组织校内或校外专家进行匿名评审，确保论文质量和原创性。高校应将学术道德教育纳入教师培训和学生培养的全过程，通过开设专门课程、举办讲座、组织研讨会等形式，向师生宣传学术道德规范，强调剽窃行为的严重后果，培养师生的诚信意识和道德责任感，树立正确的学术价值观，对遵守学术道德的师生进行表彰和奖励，对学术不端行为进行公开通报批评，形成良好的舆论导向。

(2) 增强学生维权意识

鼓励学生对自己的作品进行登记，如通过学校的学术管理系统或第三方权威机构进行作品备案，记录作品的创作时间、内容等关键信息，为可能出现的纠纷提供证据。高校学生管理部门和教师应通过多种渠道增强学生维权意识，如新生入学教育、班级会议等，向学生宣传自身的知识产权保护知识，告知学生其作品享有知识产权，如著作权等，以及在遇到剽窃行为时应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对存在疑点的作品进行深入调查，核实情况，一旦发现问题，严肃处理。

(3) 改革知识产权教育的教学形式

维权意识教育并不是空中楼阁，透过普法教育视角来看，在课堂之外也应当通过多种形式不断加强教育。例如通过建立在学校内部设立自己的“今日说法”，告诉大学生们与他们切身利益相关的知识产权知识或者他们将来会遇到的法律问题，让他们通过听故事的方式学习到各种的法治教育^[7]。

(二) 职务发明创造权利纠纷解决途径

1.明确职务发明创造的界定

清晰合同约定，在员工入职时或进行特定项目研发前，单位与员工签订详细的合同或协议，明确约定职务发明创造的范围、定义及判断标准。例如，规定在工作时间内、利用单位物质技术条件完成的发明创造，以及与本职工作相关的发明创造等属于职务发明创造。还可以单位应制定完善的内部规章制度，对职务发明创造进行细化规定，明确在何种情况下员工的发明创造属于职务发明，以及相应的权利义务关系，确保员工清楚了解单位的政策和要求。单位应建立合理的职务发明创造奖励报酬制度，根据发明创造的价值、市场效益等因素，明确规定员工应获得的奖励和报酬比例。

2.建立有效的沟通协商机制

单位内部应建立畅通的沟通渠道，当出现可能的纠纷时，鼓励员工与上级领导、研发部门负责人或知识产权管理部门进行及时沟通。通过面对面交流、邮件沟通等方式，双方充分表达自己的观点和诉求，寻求共同认可的解决方案。如果单位内部沟通协商无法解决纠纷，可以寻求第三方调解机构的帮助。例如，由行业协会、知识产权调解中心等专业机构进行调解，这些机构具有丰富的调解经验和专业知识，能够提供客观公正的调解方案。

3.遵循法律程序解决

当事人可以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等相关行政部门请求处理。如果纠纷无法通过协商或行政途径解决，当事人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将根据双方提供的证据，依据相关法律规定进行审理和判决。司法途径具有权威性和终局性，能够对纠纷作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裁决。

4.加强知识产权管理与培训

单位应加强对知识产权的管理，建立规范的职务发明创造申报、审查、登记等管理流程，确保每一项职务发明创造都有明确的记录和档案，便于追溯和管理。定期对员工进行知识产权培训，提高员工对职务发明创造的认识和理解，增强其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和法律素养，减少因误解或无知而导致的纠纷。

(三) 高校智力成果转化推进建议

(1) 完善政策支持体系

政府应出台专门针对高校智力成果转化的优惠政策，如税收减免、财政补贴等。对于高校教师和科研人员转化成果给予奖励，在职称评定、绩效考核中加大成果转化指标的权重，激励其积极参与转化工作。完善知识产权相关法律法规，明确高校智力成果的产权归属和利益分配机制，简化专利申请和审批流程，加强对高校知识产权的保护，为智力成果转化提供法律保障。

(2) 加强平台建设

高校应设立专门的技术转移中心或办公室，配备专业的技术转移人才，负责智力成果的筛选、评估、推广和交易等工作，为高校与企业之间搭建沟通桥梁。依托高校优势学科和科研资源，建设众创空间、孵化器、加速器等创新创业载体，为师生提供创业场地、设备设施、创业辅导等一站式服务，降低创业门槛，提高创业成功率。与企业、科研机构等建立长期稳定的产学研合作关系，共同组建研发中心、联合实验室等创新平台，开展协同创新，促进智力成果与市场需求的精准对接。

(3) 强化资金支持

政府设立专项基金，用于支持高校智力成果转化项目，对具有市场潜力的项目给予启动资金支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高校智力成果转化。通过建立风险投资基金、科技银行等金融机构，吸引社会资本投入高校智力成果转化领域。鼓励高校与企业、金融机构合作成立产业投资基金，为成果转化项目提供多元化的资金支持。建立健全知识产权质押贷款、股权融资、科技保险等金融服务体系，为高校智力成果转化提供多样化的融资渠道，降低融资门槛，提高融资效率。

(4) 培养和引进专业人才

在高校设置技术转移相关专业或课程，培养既懂技术又懂市场和法律的复合型技术转移人才。同时，加强对现有技术转移人员的培训，提高其业务水平和服务能力。制定优惠政策，吸引具有创新创业经验和市场开拓能力的高层次人才到高校创业或参与成果转化工作，带动高校师生创新创业，提升智力成果转化的整体水平。

(5) 提高师生转化意识和能力

定期组织开展针对高校师生的智力成果转化培训和讲座，邀请专家、企业家等分享成果转化成功案例和经验，提高师生对成果转化的认识和理解，增强其转化意识和能力。在高校内部建立成果转化激励机制，对积极参与成果转化的师生给予表彰和奖励，鼓励师生将科研成果转化成实际生产力，营造良好的成果转化氛围。高校要建立健全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加强对智力成果的知识产权保护和管理，及时申请专利、商标、著作权等，提高知识产权质量，为成果转化提供有力支撑。为师生提供市场调研、技术评估、商业计划书编制等咨询服务，帮助其了解市场需求和竞争态势，制定合理的成果转化策略，提高成果转化的成功率。

(四) 企业高新申报整体完善

(1) 做好知识产权整体布局

企业应提前规划知识产权布局，注重知识产权的质量，确保其与企业的核心技术和产品密切相关，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和先进性。明确各个阶段的工作任务和时间节点，一般来说，建议企业在申报年度的前一年开始准备知识产权、研发费用归集等工作，提前半年左右开始准备申报材料，确保有充足的时间进行整理和完善。企业应根据自身发展战略和研发需求，合理规划研发人员的招聘和培养计划。吸引高素质的技术人才加入企业，加强与高校、科研机构的合作，引进外部研发力量。同时，对企业内部员工进行技术培训和再教育，提高员工的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确保研发人员占比符合高新认定要求。

(2) 加大研发费用投入

企业应建立完善的研发费用核算体系，按照会计准则和高新认定的要求，对研发费用进行单独核算和归集。设立专门的研发费用科目，明确各项费用的列支范围和标准，确保研发费用的真实性和准确性。

(3) 完善高新技术产品及服务

企业要深入研究高新技术领域的界定标准，结合自身产品（服务）的特点和技术优势，准确判断其是否属于高新技术产品（服务）范畴。在申报材料中，详细阐述产品（服务）的核心技术、技术创新点、关键性能指标等，与高新技术领域的要求相对应，突出其高新技术特征。

(4) 规范申报材料

企业应认真研读高新认定的申报指南和要求，按照规定的格式和内容撰写申报材料。组织专业人员进行材料的编写和审核，确保材料内容真实、准确、完整，逻辑清晰，重点突出。同时，注意申报材料的排版和装订，使其整洁美观，便于评审专家查阅。

(五) 个人知识产权权利维护

(1) 增强知识产权保护意识

个人应主动学习知识产权法律法规，如《商标法》《专利法》《著作权法》等，了解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侵权认定标准及维权途径等，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在创作过程中，注意保留与作品或发明创造相关的原始证据，如创作手稿、设计图纸、实验数据、电子邮件等，以便在侵权发生时能够有效举证。对于自己的作品、发明创造等，应及时进行知识产权登记或注册，如申请专利、商标注册、作品登记等，以获取法律的明确保护。在对外展示或使用自己的知识产权成果时，要注意规范操作，明确权利归属和使用范围。同时，谨慎授权他人使用，签订详细的授权合同，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

(2) 采取有效维权措施

发现侵权行为后，个人可以首先尝试与侵权方进行沟通协商，要求其停止侵权行为，赔偿损失等。通过友好协商解决问题，既能节省时间和成本，又有利于维护双方的合作关系。如果协商无果，可以委托律师向侵权方发送警告函，明确指出其侵权行为及可能承担的法律后果，起到一定的威慑作用，促使侵权方主动解决问题。对于一些侵权行为明显、情节较轻的情况，可以向相关知识产权行政管理部门如版权局、工商局、知识产权局等申请行政查处。个人应收集充分的证据，包括侵权证据、自身损失证据等，聘请专业律师，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侵权方承担停止侵权、赔偿损失、消除影响等民事责任。对于严重的知识产权侵权行为，如构成假冒注册商标罪、侵犯著作权罪、侵犯商业秘密罪等，个人可以向公安机关报案，追究侵权方的刑事责任。

(3) 借助外部资源和力量

许多行业都设有专门的知识产权保护组织或协会，个人可以加入这些组织，借助其资源和平台，获取维权指导和支持，还可以与其他会员交流维权经验。对于经济困难的个人，可向当地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法律援助机构会为符合条件的申请人指派律师提供免费的法律服务，帮助其进行维权。

(4) 政策法规与制度建设

宁夏地区应根据本地区非遗的特点和现状，制定专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或细则，进一步明确非遗的定义、范围、保护原则、政府及相关部门的职责等，使非遗保护工作有法可依。政府可出台税收优惠、财政补贴等政策，鼓励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参与非遗保护与传承。如对投资非遗项目的企业给予税收减免，对非遗传承人给予创作补贴等。建立非遗保护工作协调机制，加强文化、财政、教育、旅游等部门之间的沟通与协作，形成工作合力。同时，完善非遗项目申报、评审、认定、监督等工作流程，确保保护工作的科学性和规范性。

(5) 传承与人才培养

认定与扶持传承人，进一步加强非遗传承人的认定工作，建立动态的传承人数据库，对各级传承人给予相应的生活补贴和传承资助，为他们开展传习活动提供必要的场地和设备支持。在宁夏的高校和职业院校中开设与非遗相关的专业或课程，如民间音乐、舞蹈、陶瓷制作等，培养非遗保护、研究、传承等方面的专业人才。对非遗项目中家族传承和群体传承的典型案例进行表彰和奖励，通过宣传引导，提高社会对这种传承方式的认知度和认同感，营造良好的传承氛围。

(6) 记录与整理

持续开展宁夏地区非遗的全面普查工作，运用文字、录音、录像、数字化多媒体等手段，对非遗项目的历史渊源、表现形式、工艺流程、传承情况等进行真实、系统和全面的记录，建立非遗数据库和数字档案馆。组织专家学者对宁夏非遗进行深入研究，挖掘其文化内涵、艺术价值和历史意义。出版相关研究成果，如专著、论文集、图册等，为非遗的保护和传承提供理论支持。

(7) 传播与推广

利用电视、广播、报纸、网络等媒体平台，开设非遗专题节目、专栏或网站，宣传宁夏非遗的魅力和价值。制作高质量的非遗纪录片、宣传片等，通过社交媒体广泛传播，提高非遗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定期举办宁夏非遗文化节、民俗展览、传统技艺大赛等活动，展示非遗项目的独特风采。组织非遗项目进社区、进校园、进景区，让更多的人近距离接触和了解非遗。

四、结语

无论是高校、企业还是个人，在智力成果转化过程中都会出现多个层面的问题，这些问题亟待高校、政府、企业以及社会各界共同努力解决。通过完善政策法规、优化管理机制、加大资金投入以及加强合作

交流等措施，破除障碍，打通智力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实现知识产权科研创新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紧密结合和良性互动。同时，法律界也应进一步细化相关法律法规的解释和适用标准，为各种问题的解决提供更加清晰、有力的法律支撑，从而营造一个和谐稳定、鼓励创新的知识产权成果转化环境，推动行业的持续进步。

参考文献：

- [1] 杨健燕.大学生法治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及其解决对策[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06 (8) : 35 ~ 36.
- [2] 刘坤轮.高校知识产权人才培养的问题反思与模式重构[J].中国法学教育研究,2021,(02):94-103.
- [3] 蔡晶.浅析大学生党建工作创新机制[J].科技信息, 2011(31):389.
- [4] 路锴.职务发明权利归属制度研究[D].西南交通大学 2022.DOI:10.27414/d.cnki.gxnu.2022.000449.
- [5] 付慧敏.短视频著作权侵权问题研究[J].法制博览,2024,(31):154-156.
- [6] 秦欣.宁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法律保护研究[D].甘肃政法学院,2016.
- [7] 邓韵秋.我国高校法治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J].新智慧,2018,(06):66-67.

A Brief Analysis of the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Promot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through the Transform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n Ningxia

Tangluqi¹

¹North Minzu University, Yinchuan, Ningxia Hui Autonomous Region 750030

Abstract: The release of the "Nation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Plan for the 14th Five-Year Plan Period" and the "Outline for Building a Stro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Nation (2021-2035)" fully demonstrates the country's strategic emphasis 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is an important way to stimulat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s a strong province in the western region, Ningxia has always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transform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However, due to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field in recent years, various types of problems have emerged in different aspects in the process of promot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through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problems in students' intellectual property awareness, rights ownership in the process of job-related inventions,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tellectual achievements in universities, high-tech enterprise recognition, personal rights protection, and the protec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Ningxia, and summarizes the causes of the problems from different fields and multiple perspectives. Based on specific problems and the causes of problems in related fields, corresponding solutions are provided to offer some practical suggestions for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 Ningxia Hui Autonomous Region.

Keywords: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 transformation and application ; awareness of rights protection; rights distribution; countermeasures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2.626

轻罪时代下犯罪附随后果研究^①

刘丁玲¹ 苏圣斌²

(¹中国政法大学, 北京 100088, ²中南大学, 湖南 长沙 410083)

摘要: 当前, 犯罪附随后果的适用与轻罪治理的需求相违背。其适用随意性强、严厉程度高、波及范围广泛使之呈现惩罚过重的属性, 阻碍着犯罪治理现代化的发展。探究其原因在于相关规定违背宪法精神、犯罪附随后果的性质认定模糊、实践中混淆罪行与犯罪人表现要素。对于犯罪附随后果存在的问题, 应当坚持预防为主, 惩罚为辅的适用精神。在具体制度层面, 前科消灭制度的对象应实现大面积覆盖, 启动时间可借鉴追诉时效制度并附加相对的犯罪记录封存制度, 启动程序上兼采职权与申请模式, 以此激励恢复性司法与被遗忘权在社会观念中的正确体现并引领对于前科者的正确评价, 助于服刑完毕人员的社会复归。

关键词: 犯罪附随后果 轻罪治理 犯罪记录封存 犯罪预防 恢复性司法

一、问题的提出: 轻罪时代下犯罪附随后果的现状扫描

随着我国严重暴力犯罪数量与重刑率下降, 轻微犯罪数量与轻刑率上升, 刑事犯罪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 我国已经进入轻罪时代。^[1]我国犯罪所处阶段的界定一方面是对犯罪现象发展变化具体事实的确切描述, 另一方面也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对于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的要求。在立法层面, 因身处风险社会与世界立法活性化的时代, 与传统的“制裁刑法观”或者“保障刑法观”不同, 当今流行的是“风险刑法观”或“预防刑法观”, ^[2]轻罪立法已然成为目前刑事立法的潮流。在此基础上, 司法应当顺应风险时代发展对罪犯予以妥善处置, 与轻罪立法形成动态平衡以实现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避免出现立法较轻而司法较重抵消治理效果的倒挂现象。

轻罪时代面临的重大问题除了积极刑法观与消极刑法观的争论、罪名适用呈现象征性立法或情绪性立法之外, 更在于如何处理过于严苛的犯罪附随后果。犯罪附随后果是指刑法之外的法律法规、规章等规定的, 对有犯罪前科的人或其家庭成员、亲属等适用的, 对其特定权利和资质的限制、禁止或者剥夺。^[3]近年来罪犯实际受到的惩罚与“轻罪”的内涵不相匹配, 在犯罪附随后果的处理上越来越难以符合犯罪治理现代化的需要, 与逐渐轻缓化的刑事政策背道而驰。早有学者评论, 我国重刑主义不仅源自量刑过重, 还包括过于严苛的犯罪附随后果。^[4]在这些年的司法实践与社会生活中, 犯罪附随后果的适用呈现如下特点: 第一, 犯罪附随后果适用的随意性强。在形式上犯罪附随后果的影响并无时间限制, 犯罪是一时的, 却给服刑后的犯罪人打上了终身犯罪前科的烙印; 在实质上由于犯罪附随后果的适用不规范, 导致犯罪人没有救济的途径与方式, 社会主体侵犯犯罪人各项基本权利更加容易。第二, 犯罪附随后果严厉程度高。实践中犯罪的附随后果存在“第二次刑罚”的戏称。虽然行为人因犯轻微罪行受到的刑事处罚并不算重, 但其被定罪之后随之而来的“行政罚”所产生的附随后果, 制裁的严厉性在事实上远重于刑罚本身。^[5]服刑完毕后, 在社会复归的过程中, 行为人所面对的是必然的犯罪附随后果与社会公众的不理解情绪, 这无疑将经监狱改造后的行为人又推向社会对立面, 使其生活在社会中困难重重, 甚至引发再度犯罪。第三, 犯罪附随后果波及范

[作者简介]

[1] 刘丁玲 (2001—), 女, 江苏镇江人,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刑法学硕士研究生。

[2] 苏圣斌 (2000—), 男, 天津人, 中南大学法学院法律 (法学) 硕士研究生。

围广泛。犯罪不仅对服刑完毕人员本身日后的生括产生负面影响，而且也将因其亲属于藩篱之间。例如在日常求职中，罪犯本人会被要求提供《无犯罪记录证明》，在入学、入党、入伍的过程中，罪犯本人与亲属都会受到政审考察的阻力，呈现“一人犯罪全家受罚”的株连现象。2023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指明，五年来审结一审刑事案件590.6万件，判处罪犯776.1万人。^[6]在犯罪群体如此庞大的前提下，犯罪附随后果倘若再波及亲属，一方面导致更多无辜的人受到不当的惩罚，另一方面也会引发更多的社会纠纷。

犯罪人再社会化既是刑事政策的基本目标之一，^[7]^[2-3]也是刑罚执行的主要目的之一。基于以上论述可见，在轻罪时代下犯罪附随后果的适用随意性强、严厉程度高、波及范围广已然使得犯罪附随后果异化为刑罚之外对刑满释放人员第二次强力惩罚，与轻罪时代的时代背景与刑罚想要实现的目的不协调。在此基础上，如何使得犯罪附随后果顺应轻罪时代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的精神值得探究。也就是说，为配合轻罪化、轻刑化的趋势，确保立法上刑法干预前置化的正当性，有必要将刑罚附随后果的严厉性也降下来。^[8]

二、问题的溯因：惩罚性犯罪附随后果的追本溯源

近年来，犯罪附随后果因适用随意性强、严厉程度高、波及范围广呈现的惩罚性特质导致了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其中讨论较为激烈的包括罪犯子女是否可以成为国家公职人员以及辅助性职务，罪犯服刑后能否享受低保待遇、抚恤与优待、荣誉称号，罪犯改造完成后还能否参加特定考试获得特定职业资格证书等，分别对应着职业禁止、利益剥夺、资格受限等不同的附随后果情形。相关情形的讨论以及上文所述问题与犯罪附随后果的具体规定、性质、实践认定息息相关。

（一）犯罪附随后果的相关规定违背基本宪法精神

针对犯罪附随后果适用的随意性强，细细考察可看出许多具体情形具备惩罚属性的问题源头在于不合法律（这里指的是法理或上位法）的规定和不合理的道德要素。我国犯罪附随后果的法律渊源复杂，呈现规范与非规范、法律与道德交融错杂的状态。具体而言，在规范性层面，上至法律下至规范性文件并没有统一的立法逻辑，存在上位法无效而下位法依旧适用的情形；在非规范性层面，不成文性加重了社会评价的随意性和主观性。下文将有明确规定的情形作为规范性犯罪附随后果，将法律并未明确规定的情形（包括规定模糊以及完全没有规定的情况）作为非规范性犯罪附随后果进行讨论。

在规范性犯罪附随后果层面，众多法律、行政法规、司法解释乃至规范性文件中存在明显的违宪条款。此处仅举例影响范围最广的剥夺劳动权条款。劳动权属于社会经济权利这一基本权利中的子权利，《宪法》第42条规定了公民的劳动权。一方面赋予中国公民劳动的权利，另一方面也要求国家通过各种途径保障公民的劳动与就业。《劳动法》第12条规定了劳动者就业平等，《就业促进法》第3条规定了劳动者平等就业和自主择业的权利等等。劳动权（就业权）是最基本的权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提倡热爱劳动的公德，劳动是一切有劳动能力的公民的光荣职责。改造完成的人就是有劳动能力的公民，不应当对他们设置限制、投以歧视。然而事实却不尽如人意，许多立法甚至是低层次的规范性文件都会对有前科人员的就业予以限制。例如《陪审员法》第7条第1款第1项剥夺受过刑事处罚人担任陪审员的权利；《检察官法》第13条第1款第1项排除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人担任检察官的情形；《监察官法》第13条第1款第1项也将受过刑事处罚的人排除在监察官的行列之外；《公证法》第20条第1款第2项对于公证员的要求也是如此。也许有观点回应说限制特殊类型人群进入特定领域存在正当性，那么下面的规定可谓对于有前科者的全方位“封杀”。如《劳动法》第25条赋予用人单位解除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劳动者劳动合同的权利；《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第6条限制有前科者从事民用爆炸物品的生产、销售、购买、运输和爆破作业等；在芜湖市人民政府发布的《芜湖市人才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招聘公告》的禁止报考条件中明确指出受过刑事处罚、劳动教养、少年管教的不得报考，同样的黄冈一国有集团公司招聘条件中也排除受刑事处分并在服刑期间的或曾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公民。^{[9]-[10]}整体来说，有犯罪记录案底的人基本不能从事法官、人民陪审员、检察官、公务员、律师、司法鉴定人员、公证员、拍卖师、证券从业人员、破产管理人、食品生产经营管理人员等多项职业，并且在其他诸多岗位上有扩张之势。

在非规范性层面主要包括对于有前科者亲属的就业限制以及有前科者本人的社会评价。对于有前科者亲属的就业限制，例如《公务员法》第24条第1款第3项的规定“有法律规定不得录用为公务员的其他情形”，此规定作为兜底条款充当公务员“拦路虎”的角色；2021年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布《公务员录用考察办法（试行）》第8条第4项规定对于涉密职位的人员需考察家庭成员和主要社会关系的有关情况。上述情况虽然没有直接表明限制罪犯子女考公，但从实际情况来看，公务员系统、事业单位、国企等相关机构在招聘时，直系亲属有过犯罪记录的人员通常无法通过政审。且不说正确与否，有相关规定的但稍许模糊的情况尚且可以通过目的性解释限制就业，更加困扰前科者的在于完全无规定复归之路下的社会负面评价。从个体信任的角度出发，倘若并非至亲亲属很难理解罪犯人的人品或者正确对待罪犯人的罪行，公众对于有

前科的人可谓有避之而无不及；从用人单位的角度出发，在能力条件相当的情况下能够招聘到没有犯罪记录的人相较于有犯罪记录的人一定优先考虑，这是一种规避风险的选择。然而，此类评价借由法律过渡至道德，实际并无确切根据。我们并不能从一个人是否犯过罪来认定这个人的善恶本性，否则刑法理论无需区分“自然恶”的自然犯与“禁止恶”的法定犯，直接将两种犯罪人都定义为恶人即可。虽然犯过罪的人不一定为善，但也不能直接推定为恶，最大的偏见在于人心。美国过罪化现象已经是前车之鉴，真正阻碍犯罪人回归社会的并非来自法律限制，而是犯罪信息的公开进而导致社会广泛知晓，引发种种永久的排斥与谴责——犯罪人发自内心认同自己是一个罪孽深重的人——犯罪率非降反升。^[11]¹⁰⁵ 平等权作为宪法的基本权利之一，强调虽然现实中的人存在先天差别，但任何人都有人格尊严，为此在自由人格的形成和发展上应当享有平等的权利。换言之，国家平等保护不同公民。改造完成的人与普通公民不存在本质差异，应当享受平等的权利。宪法要求的人人平等不仅仅体现在白纸黑字上，而且应当内化在现实生活中，使人们真真切切感受到平等，反对各种形式的歧视。

（二）犯罪附随后果的性质认定模糊

实践中犯罪附随后果严厉程度高，呈现惩罚性的特征，进而引发了对于犯罪附随后果性质的认定讨论，即犯罪附随后果究竟应当发挥什么样的功能。在理论上，犯罪附随后果的法律性质认定存在争议，主要存在刑罚说、行政处罚说和保安处分说三种立场。

主张刑罚说的学者认为犯罪附随后果是刑罚体系之外的资格刑，虽没有在刑法中明确规定，但其实质与刑罚无异。^[12] 刑罚说易于被驳倒，犯罪附随后果既不符合刑罚的属性，也不符合刑罚的法律特征，将犯罪附随后果认定为刑罚违背了罪刑法定原则。刑罚是国家为了防止犯罪行为对法益侵犯，而由法院根据刑事立法，对犯罪人适用的建立在剥夺性、限制性痛苦基础上的最严厉的强制措施。^[13]⁶⁶⁷ 在属性方面，刑罚本身作为国家对于犯罪行为的否定性评价与对犯罪人的谴责，倘若又将犯罪附随后果以类似属性施加在行为人身上，违反禁止重复评价原则。在法律特征方面，刑罚及其内容必须由刑法明文规定，司法机关不得创制刑罚的种类与使用方法。这是罪刑法定的要求，也是《立法法》第 11 条第 1 款第 4 项的明文规定。犯罪附随后果并未明文规定在刑法之中，称其为刑罚不符合形式的法律特征。主张观点可能以《刑法》第 37 条之一的从业禁止制度与第 100 条规定的前科报告作为论据。然而，犯罪附随后果的表现形式多样，其他犯罪附随后果类型主要规定在刑法之外的法律法规中，同时该论据在解释涉他型附随后果时也无能为力。

主张行政处罚说的学者认为犯罪附随后果是一种行政措施，属于行政处罚中资格罚的一种。^[14]⁷¹⁰ 同样，将犯罪附随后果认定为行政处罚存在无法解释的问题。第一，行政处罚存在行政机关这一处罚主体，是对于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等对象的惩戒方式。而犯罪附随后果本身并无行政处罚实施主体的参与而是自动生效，且行政处罚作为减损权益或者增加义务的惩戒方式需要经历一系列如调查检查、处罚决定以及送达的程序，犯罪附随后果在适用上颇为随意甚至没有救济途径。第二，行政处罚中的资格罚主要包含暂扣许可证件、降低资质等级、吊销许可证件等，其面向大多为法人或其他组织，与个人的适配性较低。第三，行政处罚的设定局限于法律、法规和规章，换言之其他规范性文件不能设定行政处罚，然而犯罪附随后果的规定范围并不能被法律法规与规章所涵摄。此外需要指明的是，从严厉程度的角度出发，认为犯罪附随后果不属于行政处罚的观点^[15]并不可取。观点的根基在于刑罚重于行政处罚，而犯罪附随后果的严厉程度又高于刑罚，因此三者在严厉程度的位阶排序上是犯罪附随后果、刑罚、行政处罚，从而得出犯罪附随后果不是行政处罚。该观点犯了理论与实践混淆的错误，将理论上的行政处罚与实践中的犯罪附随后果相比，自然无法得出正确结论。更何况犯罪附随后果与行政处罚的严厉性均需要控制，后者可以近些年企业合规的实践推进避免对企业的行政资格罚过重来佐证。如果统一标准进行比较，在理论上刑罚既重于行政处罚又重于犯罪附随后果，在实践中也存在行政处罚与犯罪附随后果重于刑罚的情况，也就是说，从严厉程度这一角度上来说，行政处罚与犯罪附随后果难以比较。

因刑罚说与行政处罚说弊端明显，保安处分说基本占领了讨论主阵地^[16]。古典刑事法学派认为刑罚之毕，罪孽之终。然而随着近代刑事法学派的发展，刑罚目的由报应逐渐过渡至预防，强调社会防卫的重要性。主张保安处分说的学者主张犯罪附随后果应当关注行为人本身的人身危险性，服务于社会防卫。^[17] 理论上对于保安处分的性质一直有二元论与一元论的争论，但无论是何种观点，核心都在于社会防卫以及改善行为人理念。保安处分的概念多样，最广义和广义的保安处分不强调限制，只要有害均可施加不区分人或物的刑事司法或者行政处分，但因极易侵犯人权而在当今社会丧失合理性。笔者承认犯罪附随后果与保安处分（此处采取最狭义的概念或狭义的概念）的部分相似性，例如两者都是犯罪后的处分，以实施犯罪行为为前提；两者也都具有代替刑罚或者补充刑罚的机能，但不可忽略的是保安处分仍应由行政机关决定或法院宣告，体现其程序的正当性与限权的法定性。可见犯罪附随后果虽与保安处分有相似之处，但也

并不能直接纳入保安处分的范围。

综上，在现阶段保安处分说的确与犯罪附随后果的性质更为契合，应当坚守以预防犯罪为主的精神来指导犯罪附随后果的适用。这不仅是犯罪附随后果本质的部分体现，也迎合了风险社会的时代要求。值得注意的是，关于程序的正当性是目前犯罪附随后果区别于保安处分的重要一点，所以笔者只肯定犯罪附随后果与保安处分说的部分类似，不认可“保安处分说”直接界定犯罪附随后果的性质。

（三）犯罪附随后果适用的判断素材混淆罪行与犯罪人表现要素

犯罪附随后果的判断素材到底是罪行本身还是犯罪人表现要素，抑或是其他要素将直接影响犯罪附随后果的适用。立足于罪行本身是追溯过去，而针对犯罪人表现则是面向未来。犯罪附随后果包括涉己（针对犯罪人本人）和涉他（针对犯罪人家庭成员或其亲属）两类，在实践中呈现出混合罪行和犯罪人表现要素与直接忽略两种要素而适用犯罪附随后果的情况，前者主要体现在涉己型犯罪附随后果，后者主要表现在涉他型犯罪附随后果上，具体展示如下：

1.涉己型犯罪附随后果：混合罪行和犯罪人表现要素

针对涉己型犯罪附随后果，实践中存在只要犯过罪就有必然的、无区分的犯罪附随后果的现象。具体体现为如下两种情形：前科记录和个人社会信用高度捆绑与犯罪附随后果和犯罪本身类型无关。无论哪种情况，都是犯罪附随后果将罪行要素与犯罪人表现要素混合起来描画服刑完人员的一种体现。

第一，前科记录与个人的社会信用高度链接，进而导致犯罪记录制度的异化。公共信用立法以国家强制力为保证，由政府借助已有的信息手机途径，汇总、加工与评价各种信息，为社会成员勾勒信用画像。除此之外信用记录的披露还分为特殊情况的信用查询或履职过程的依法主动披露，以促进社会的诚信。^[18]在现实生活中，违法和犯罪往往与失信惩戒相联系，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

（以下简称《纲要》）多处内容也体现将“违法”与“失信”等同或联结的理念。法人或者自然人严重的违法犯罪事实对其社会信用产生负面影响是必然的，在违法层面，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66条的规定，被执行人拒绝履行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信息会被法院记录在征信系统中。据此2017年《湖北省社会信用信息管理条例》等其他地方规范性文件均有将拒不履行法律文书的行为纳入公共信用信息目录的相关规定，进一步完善了相关的社会信用体系。在犯罪层面，社会信用与犯罪记录制度共用“犯罪记录”的评价要素，例如2018年《上海市公共信用信息归集和使用管理办法》第13条规定刑事判决信息等信息属于其他失信信息。以上文件均体现曾受过法律非难的事实已然成为社会信用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将前科记录与社会信用高度捆绑存在问题，如果仅将犯罪记录作为社会信用制度的基本信息尚且合理，但一些地方的信用评价制度将犯罪与其他生活福利相联系可谓与制度的目的南辕北辙，具备了惩罚的意义。例如广东省某市将刑事处罚与落户制度相挂钩，通过积分制为有前科的人设置入户障碍。^[19]前科记录与个人社会信用的高度链接使得犯罪记录对于服刑后人员的生活无孔不入，犯罪记录制度与失信惩戒制度同质化将有前科的人排除在正常社会生活外。根据《纲要》关于奖惩机制与设立目的的规定，守信激励应优先于失信约束以鼓励社会诚信意识的觉醒，而非造成全员都被失信所约束和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危机。因此应当认为，失信惩戒应更加偏重“戒”，着重偏重于对行为的管理预防，而非行为人的已然过错。^[20]综上，前科记录与社会信用高度链接过于注重犯罪人曾经所犯下的罪行，并且有认定前科者未来难以复归的倾向。

第二，忽视犯罪附随后果的适用与犯罪本身类别的关联性。根据《刑法》第37条之一关于职业禁止的规定已然可以看出犯罪附随后果的应有之义。对于职业禁止对应犯罪的要求是利用职业便利或者违背职业要求的特定义务，足见其目的是为了预防服刑完人员再次利用自己与职业相关的便利实施犯罪，强调犯罪附随后果与犯罪本身的关联性。令人失望的是，我国多数犯罪附随后果“在限制或者剥夺的时候很少从职业内在需求加以规范，而限制几乎所有有前科的公民”。^[21]犯罪性质与附随后果所禁止的内容之间应当保持一致，否则就会出现为惩而惩的过度处罚现象。实践中的情况比比皆是，例如2014年《江苏省机动车驾驶人文明交通信用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中将交通肇事罪与严重交通失信相连接，并将严重交通失信作为限制贷款的重要参考依据。交通肇事罪作为过失犯罪，犯罪人的特殊预防性本就相较故意犯罪更低，更何况交通肇事罪本身与经济方面的贷款有何联系呢？根据2023年《大连市物业管理条例》第28条的规定，业主委员会候选人选举材料应载明候选人的刑事处罚情况，受过刑事处罚与作为业主委员会成员为其他业主争取权益又有什么冲突呢？类似的规定还包括2023年《清远市城乡基层网格化服务管理条例》中受过刑事处罚的无法担任网格员，2023年《深圳经济特区医疗调理（2022年修订）》中受过刑事处罚的不得担任医疗机构负责人等等，均未考虑到附随后果与犯罪本身的关联，均属于“一棍子打死”的情况，又让改造完成的人如何复归呢？此外令人深思的是，以上犯罪附随后果并未考虑故意犯罪与过失犯罪的区别，统一规定为“受过刑事处罚”。在刑法理论上，故意犯罪人对危害结果持积极蔑视的态度，而过失犯罪人是因为疏忽大

意或过于自信而没有认识到危害结果的发生，两者在定罪量刑上都有差距，为何到了犯罪附随后果的认定上却不分情形笼统规定而统一处置呢？当然也有一些正面的规定体现犯罪附随后果与犯罪本身的相关性，说明类似的意识的确存在也值得推广。如《关于在招标投标活动中全面开展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的通知》中对于有行贿犯罪记录的单位或个人作出一定时期内限制进入市场、取消投标资格、降低资质、不予聘用或者注册的处置，就是考虑到了行贿会影响招投标活动的公正性；2021年《四川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条例》第21条规定因贪污、贿赂、侵占财产、挪用财产或者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受过刑事处罚的成员，不得参选理事或者监事，同样考虑到犯罪的经济属性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管理性质。忽视附随后果与犯罪本身的相关性只会导致惩罚的泛滥，妨碍有前科者正当的社会复归，无法起到任何社会治理的效果。

也许会有质疑认为，刑罚的认定就是结合罪犯的罪行与根据罪犯人表现确定的预防要素，犯罪附随后果如此规定并无问题。但正如上文所述犯罪附随后果不是刑罚，更偏向社会防卫。哪怕认定为刑罚，那么定罪量刑需要违法有责的统一，出罪则只需缺少一个要素即可。犯罪附随后果是服刑之后的效果，将确认刑罚所需的要素移花接木至犯罪附随后果并不恰当。此时罪行以及对其评价已经结束，应主要面向罪犯人的表现进行确定犯罪附随后果。

2.涉他型犯罪附随后果：忽略罪行和罪犯人表现要素

相较于涉己型犯罪附随后果而言，涉他型犯罪附随后果则因直接忽略罪行与罪犯人表现因素变得更为不合理。如果说涉己型犯罪附随后果还与惩罚与预防罪犯人再犯的要素有关，涉他型犯罪附随后果未免走的太远。例如近年来讨论最为激烈的当属罪犯子女考公是否应当受到限制。支持限制者认为制度设立初衷在于增加犯罪成本，遏制与惩戒犯罪，同时此举对于预防公职人员腐败、以权谋私等犯罪行为有积极意义。反对限制者则认为此种重刑主义并不能起到一般预防的效果，还导致株连的卷土重来，破坏刑法的公正性，同时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罪责自负”的法治原则。折中观点则认为限制不应当是普遍无差别的，对于特殊岗位的要求可以限制但应在一定范围内。^[22]

一般支持限制者都代表广大无辜群众的利益，支持限制者一方面认为罪犯子女进入公职人员队伍可能侵犯体制廉洁性，另一方面也的确因此获得了竞争优势，只要亲属没有涉嫌犯罪，自己便有很大概率高枕无忧；而反对限制者则是更多站在罪犯人以及法理的角度予以论证，表示自己做的事情自己负责，何苦为难家里人呢？早已脱离了亲属关系的子女却因为生父生母的过失犯罪丢失原本的机会的情况也不在少数。在刑法理论上，罪责自负原则或谓责任主义原则都强调个人只能为自己做的事情负责。责任主义有着宪法依据，我国《宪法》第33条第3款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从责任基础来看，尊重人权意味着应当将人作为目的而非单纯的手段，如果将罪犯子女排除在考公的范围之外，无疑是将有前科者作为选拔人才筛选的手段。不可否认的是，涉他型犯罪附随后果的确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一般预防的效果，考虑到亲属的前途，理性人也许会放弃犯罪。但与此同时对于破罐子破摔型的罪犯人，在家庭意识与法律意识淡薄的情况下，连自己都可以堕落至狱，亲属也不再是被考虑的因素，作为牺牲品的还是亲属。因此忽略罪行和罪犯人表现要素，使得亲属受到罪犯人的影响并非明智之举，不仅对于罪犯人本身鲜有影响，而且剥夺了无辜人的竞争机会，不得不说也是一种人才的流失。

总之，无论是失信惩戒制度体现出的惩罚色彩还是犯罪附随后果与犯罪本身关联性的缺失，抑或是变相的株连，都体现了犯罪预防与人权保障冲突与糅合的内在矛盾。服刑完毕后的犯罪分子并非都是社会的敌人，将严厉的犯罪附随后果无限制强加给有前科的人与其亲属，只会让其社会复归更为艰难。毕竟，预防犯罪并不代表让罪犯人被社会排斥，使罪犯人复归社会，实现社会防卫与人权保护的统一，才是刑事法律的价值追求。^[23]

三、问题的应对：轻罪时代下犯罪附随后果的积极回应

面对轻罪时代下犯罪附随后果的诸多问题，实务界与理论界亟须予以回应。有学者认为，不应以附随后果的严厉性否定轻罪立法，而应修改有关附随后果的规定，推进轻罪立法。与其坚持前科消灭，不如直接删除其他法律、法规有关犯罪附随后果的规定，为保障犯罪附随后果的规范实施应当将其全部纳入刑法附加刑部分。^[24]上述观点看到了轻罪立法的必然趋势，但对于犯罪附随后果规范的建议并不具有可操作性。且不说犯罪附随后果形式多样，其所覆盖的法律、法规包括规范性文件范围已然非常巨大，将其删除可谓法律规范的一整个大洗牌。将现行犯罪附随后果纳入刑法附加刑的做法虽然为附随后果提供了形式正当性的基础，但体系庞大内容多样实为裁量的法官设定了难题。在犯罪附随后果已经具备社会属性的前提下，将其直接剥离出实践的轨道并不具备可行性。与其大刀阔斧完全删除犯罪附随后果，不如对现行制度进行细致修改更能收获轻罪时代犯罪附随后果的应有效果。

（一）适用精神层面：以预防为主，惩罚为辅

正如上文问题与原因分析的那样，现犯罪附随后果的惩罚性已然暴露，原本设定的预防效果已荡然无存。倘若不对其进行适用上的限制，犯罪附随后果就会完全变成“第二次刑罚”，进而引发社会信用层面“第三次刑罚”。在进行具体制度改革之前，明确犯罪附随后果应有的适用精神实属必要。多数学者强调犯罪附随后果的目的仅仅在于预防，试图完全摒弃犯罪附随后果的惩罚属性而一步到位，这是难以实现的。试图让犯罪附随后果实现预防犯罪人再度犯罪的目标，只能以逐渐淡化惩罚属性为途径。

犯罪附随后果的预防目的属于功能论的范畴，会受制于本体论的讨论。必须明确的是犯罪附随后果本身具有“刑”的属性，实际上属于一种刑事制裁方式，这是犯罪附随后果的本质。^[25]这也是笔者在讨论附随后果性质的时候有所保留，不赞成以狭义的保安处分直接定义附随后果的性质是预防这一结论的原因。刑事制裁措施是犯罪人针对国家司法机关对于犯罪行为否定评价与对犯罪人的谴责而实际感受的可为一般人感知的不利反应。^[13]⁶⁶⁵刑事制裁是一种社会实践，是随着历史发展的进程、人们对犯罪等现象的看法、应对违法犯罪的对策的发展变化而变化的。^[26]⁴⁴同时如此定义恰恰体现了犯罪附随后果的性质，即一方面包含对犯罪人本身的否定性评价，另一方面具备一般预防与特殊预防的目的，表明犯罪附随后果也是社会实践发展变化的产物。想必还会有异议认为涉他型附随后果难以用刑事制裁措施界定，对此的回应是涉他型附随后果本来就未考虑责任主义从而丧失合理性，进一步完善与佐证了刑事制裁说的观点。此外，之所以不将犯罪附随后果认定为上述刑罚说、行政处罚说、保安处分说，正是因为如果直接能够归入上述范畴又何必平添犯罪附随后果的概念呢？犯罪附随后果的名称就说明其相较于刑罚、行政处罚、保安处分具有独立性，而自身相较于犯罪不具有独立性，必须依赖前刑罚的存在而存在。也就是说，随附后果的正当性，是由前刑罚所提供的，主张随附后果不存在惩罚性质的主张，实际上是把随附后果独立化了，也就不该叫“随附”后果了。除非能论证出随附后果有独立的正当性，否则主张取消随附后果的惩罚性就是在篡改随附后果概念本身。

综上，结合现阶段犯罪附随后果功能论的需求以及本体论的讨论，笔者认为犯罪附随后果的适用应当以预防为主，以惩罚为辅，无论如何在现阶段不可掉入完全惩罚与完全预防的窠臼，明确界定性质有助于指导后续具体制度的修改操作。

（二）实际操作层面：前科消灭制度规范的进一步完善

在确立了犯罪附随后果的适用精神后，应当着重对前科消灭制度进行回应。前科本身是对犯罪人的否定性评价，既包括公权力主体的规范性评价，也包括公众的非规范性评价，在制度层面主要探讨规范的内容。前科制度是犯罪附随后果适用的依据，犯罪记录等相关制度是前科制度的基础，因此下文不可避免会存在重叠讨论前科制度与犯罪记录制度的问题。前科消灭制度是针对曾经被定罪或者判刑的人，在具备法定条件时，注销犯罪记录的制度。^[27]制度本身具有排除犯罪记录人员再生障碍、减少重新犯罪、缓和社会矛盾等多项价值。笔者认为现阶段应当构建附条件的前科消灭制度，基本思路是从适用对象、适用期限、适用模式层面展开。

第一，明确犯罪前科消灭制度的适用对象。有学者认为积极刑法观时代下，前科消灭制度覆盖全体犯罪人员（包括所有未成年人与成年人）非常有必要，^[28]但一视同仁的态度在处理不同罪名的预防层面有失偏颇。根据犯罪附随后果惩罚与预防兼具的适用精神，惩罚已自然融入前期刑罚与服刑后的短期社会复归时间之内，而长期的预防需要根据罪质的轻重结合再犯可能性进行调整。例如初犯和再犯、偶犯或惯犯、悔改态度好坏、犯罪后表现好坏应当在前科消灭层面有所区别。笔者认为对于初犯、偶犯、悔改态度良好、犯罪后表现良好的服刑完毕人员可以适用前科消灭制度，这是基于再犯可能性视角作出的一般性判断。在此之外，从罪质的轻重方面，借鉴缓刑与假释的条件，应当排除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有组织暴力性犯罪有关前科消灭制度的适用，上述类别犯罪能够体现犯罪人危险的人格，有其社会防卫必要性，阻止其进入特定领域有正当性。

第二，明确犯罪前科消灭制度的开始期限，也可以说是犯罪附随后果的适用期限，遵循比例原则。“要考虑降低犯罪附随后果的严重性……对某些轻罪（如危险驾驶等罪）的非刑罚附随后果需要认真研究，妥善作出规定，使犯罪的附随后果符合比例原则要求。”^[29]比例原则有四大内涵，即目的性、有效性、必要性与适当性，其中必要性指的是手段有效且使公民负担最轻，而适当性指的是干预强度与合法理由的紧迫性与重要性相当。^[30]⁴²犯罪附随后果本身试图达到的目的是使犯罪人铭记刑罚的痛苦并时刻警示自己的行为举止，追究犯罪尚且具有追诉时效的限制，作为犯罪附随的后果倘若没有时间限制就与犯罪追诉制度本身不协调，干预强度高于刑罚便也丧失了预防的目的。多数学者提倡参考追诉时效的规定，即被判处附加刑的、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的、10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分别设定1年、5年、10年、15年的考验期限。^[31]笔者对此予以认可，追诉时效制度是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的一种体现，有利于司法机关集

中精力追诉现行犯罪，利于社会安定。犯罪附随后果的消灭正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宽的体现，同样有助于犯罪人的社会复归，助于社会安定，因而两者具有类似性质可以借鉴。与此同时，在对犯罪前科消灭设定起始点时应同步附加相对的犯罪记录查询封存制度，毕竟正如上文所说，犯罪记录仅仅是一种失信的素材，不可赋予过多的法律意义，且其危害性无法与犯罪相提并论，不宜设置无限期的查询期。此处可借鉴《刑事诉讼法》第286条的有关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即前科消灭开始时点为犯罪记录封存的时候，记录封存后的行为人对外可以宣称自己没有犯罪记录，犯罪记录被封存后请求出具《无犯罪记录证明》的，理应出具，但在面对司法机关主动查询时，不得声称自身无犯罪记录。犯罪记录制度的原意在于满足防卫社会和预防犯罪的要求，即集中管理犯罪记录以免使得行为人受到社会不当评价而影响其社会复归。^[32]相对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一来可保证司法机关的数据完整与后续可能构成其他犯罪的量刑参考，二来助于服刑完毕人员的社会复归。

第三，明确犯罪前科消灭制度的模式，配套救济措施应同步跟进。犯罪前科消灭制度的模式指的是启动程序，即究竟是依职权还是依申请适用前科消灭。笔者认为旨在保护服刑后人员的利益可双轨同时进行两种模式，对于罪质较轻、判处刑罚时间较短的可由人民法院依职权启动，例如针对过失犯罪与未成年人犯罪的前科消灭可直接由法院依职权决定。除此之外的犯罪可采取依有前科者本人申请的方式启动，司法机关在考察其考验期限与回归社会表现的基础上做出裁决。当然无论是依职权还是依申请，都应当赋予相关人以救济措施。例如因犯罪前科导致的公平就业权、受教育权、享受社会福利等权利受侵害应当允许提起对应诉讼，还应同时赋予近亲属在就业、入伍、升学时受阻的救济权。

（三）社会观念层面：前科消灭非规范层面的进一步讨论

犯罪事实的社会观念评价代表着犯罪人前科的非规范层面。非规范性评价并非前科消灭制度作用的对象，前科消灭制度只能攻击犯罪记录的载体使得规范性犯罪附随后果失去评价根据。犯罪作为一种既定的客观事实只能逐渐被遗忘却永远不会消灭，真正可能被逐渐消除的只有犯罪产生的不利后果。^{[33][389]}前科消灭制度只是犯罪附随后果完善的第一步，最终应落脚于淡化社会生活意义上对于前科的偏见。道德为法律提供思想指引与价值基础，而规范层面前科消灭制度的适用又是非规范层面社会观念实现进一步改善的前提。换言之，无论法律与制度如何改变都是从浅层表达一种适当的倾向，其目的是试图冲破人们心中的藩篱，逐渐拨开人们对于犯罪人的偏见，毕竟真正影响有前科人复归的是社会其他公众的误解与排斥。

犯罪附随后果的消灭及犯罪人社会复归看似是将危险重新释放，但其本质是恢复性司法彰显司法温度的体现。恢复性司法指的是犯罪人对本身行为负责，由犯罪方和被害方或特定利害关系人共同决定该案件的法律后果以及如何化解矛盾的过程，^[34]核心在于恢复被犯罪侵害的法益。在理论上，恢复性司法的讨论主要集中在环境犯罪上。从广义的角度而言，只要有助于社会关系修复的情况都能够被纳入恢复性司法的范畴。法以社会为基础，是社会的产物，反映并调整社会关系，适用于环境法益修复的恢复性司法理应能够适用于各种社会关系修复的证成。在犯罪这一国家机关与犯罪人之间因犯罪行为而产生的刑事法律关系中，无论对于哪一犯罪都会使得社会关系（法益本身）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侵害。不同于传统的刑事制裁方式注重惩罚与预防，恢复性司法更注重社会关系的修复，而服刑完毕人员在社会复归的过程中最为重要的就是修复被犯罪行为破坏的社会关系。这种修复不是将有前科者排除在社会关系之外，而是需要其积极作为来竭力弥补。因此倘若戴上有色眼镜排斥有前科者，则不利于其利用自身的天赋与技能为社会做出积极贡献从而修补已被损害的社会关系。需要注意的是，实践中当然也存在特定法益无法对应补救的现象，例如侵犯他人民生命权、健康权的情况，所以应当允许此类情况下的前科者在部分针对性补救之外（例如道歉赔偿、帮助赡养亲属）利用非针对性补救继续弥补，即利用自己的劳动为社会持续创造价值，换句话说有些情况下恢复性司法的内涵更为广泛，其是为了达到社会关系良好的动态平衡，并非完全的头疼医头。此种理念也与社区矫正类似，都是在外界帮扶下，通过的实际行动减轻或补救犯罪行为造成的损失，从而缓解甚至消除犯罪产生的社会矛盾，修复受损的社会关系。

同时，被遗忘权的肯定也为犯罪附随后果的消灭提供了非规范性质上的依据，其指代公民依据个人信息权针对网络空间个人信息中已过时的、公开的、影响个人价值判断的个人信息，要求信息处理者予以删除、断开链接的权利。^[35]在刑事层面上，被遗忘权与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本身价值贯通，都是通过使不良的记录逐渐淡化在公众的视野中，使得对犯罪人的负面评价降低，助其重返社会。在犯罪记录封存的基础上，被遗忘权将其功能延伸至网络空间，通过删除不当泄露的个人信息与索引限制，能够进一步减少犯罪人的负面评价。刑法中的前科消灭制度和追诉时效制度中体现的正当惩罚道德根据在数字时代下构成了被遗忘权的根据，被遗忘权成为信息主体的基本权利。^[36]人不能始终活在过去，遗忘是新的开始。所犯下的罪过已然得到处罚，内心的恐惧与折磨也在监狱里被冲刷干净，理应获得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这也是服刑完

毕人员对于社会复归最大的需求。

基于恢复性司法与被遗忘权理念，笔者认为可以通过以下措施在非规范层面尽可能改善公众对于犯罪人员偏见色彩的社会观念。第一，开设专为有前科人员复归的工作渠道，对于轻罪犯罪人并不刻意与普通人进行区分从而减少歧视的产生，改善公众对于犯罪人的评价。第二，审查对于单位无故要求《无犯罪记录证明》的情况，允许就业人员在遭受歧视的时候进行举报，提供相应的救济渠道。第三，及时关停轻罪犯罪人有关的负面评价网页宣传，同时限制搜索引擎对于相关信息的检索，将已经消灭的犯罪记录纳入隐私权的保护范围。总而言之，制度上的改善是思想改善的催化剂，只有在制度上表明态度指明倾向，才能努力在思想上化解犯罪人社会复归的困境。

四、结语

从规范与非规范层面提出改善意见只是一个具体的角度，难免有缺漏，例如犯罪附随后果本身的正当性及其关联性限制亟待解决，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适用需要加以进一步探讨，非规范层面的具体操作建议有待细化等。轻罪时代的浪潮无法阻挡，但犯罪附随后果已然呈现了倒挂的现象，这不仅是法律适用上的困境，更是社会观念的困境，对此只能逐渐通过制度层面的进步推动观念评价的跨越，以此回应轻罪时代的需求。刑法既是惩罚的工具也是改善的工具，有前科的人改造完成后也是社会的一份子，在社会建设中也有不可或缺的地位。不为惩罚而惩罚，只为改善而改善，也是新时代刑法的应有之义，道阻且长。

参考文献：

- [1] 卢建平. 为什么说我国已经进入轻罪时代[J]. 中国应用法学,2022,(03):132-142.
- [2] 黎宏. 当代刑法的理论与课题[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22.
- [3] 彭文华. 我国犯罪附随后果制度规范化研究[J]. 法学研究,2022,44(06):171-188.
- [4] 孙国祥. 新时代刑法发展的基本立场[J]. 法学家,2019,(06):1-14+191.
- [5] 黄太云. 一般违法行为犯罪化倾向的系统反思[J]. 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22,40(01):158-168.
- [6] 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EB/OL].
(2023-3-17)[2025-03-15]<https://www.court.gov.cn/zixun/xiangqing/393751.html>.
- [7] 冯卫国. 刑事执行与罪犯处遇新探索[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19.
- [8] 王强军. 刑法干预前置化的理性反思[J]. 中国法学,2021,(03):229-247.
- [9] 芜湖市绿色食品产业研究院有限公司 2024 年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公告. [EB/OL]. (2024-02-14)[2025-03-15]
https://mp.weixin.qq.com/s/HaUnWB_Kc-KggFBaFMXMeg.
- [10] 黄冈一国有集团公司公开招聘 53 人. [EB/OL]. (2024-02-06)[2025-03-15]
<https://mp.weixin.qq.com/s/4GQef63iaoqg9tveKqq37g>.
- [11] See Richard G. Wright, Sex Offender Laws: Failed Policies, New Directions[M]. New York: Springer Publishing Company, 2009.
- [12] 李荣. 我国刑罚体系外资格刑的整合[J]. 法学论坛,2007,(02):66-70.
- [13] 张明楷. 刑法学 (上) (第六版) [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21.
- [14] 马克昌. 《刑罚通论》[M]. 湖北: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9.
- [15] 李若愚,孟令星. 法定犯时代背景下犯罪附随后果的解构和重建[J]. 湖北警官学院学报,2021,34(01):147-160.
- [16] 罗翔. 犯罪附随性制裁制度的废除[J]. 政法论坛,2023,41(05):24-35.
- [17] 徐久生,师晓东. 犯罪化背景下犯罪附随后果的重构[J].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25(06):65-75.
- [18] 沈毅龙. 公共信用立法的合宪性考察与调整[J]. 行政法学研究,2019,(01):106-119.
- [19] 沈岿.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法治之道[J]. 中国法学,2019,(05):25-46.
- [20] 张学文. 罪错记录附随失信惩戒的泛化及校正[J]. 征信,2020,38(03):51-57.
- [21] 王彬. 我国限制有前科公民就业资格的立法例考察——以就业歧视为视角[J]. 法学,2009,(10):37-50.
- [22] 孙天骄. 罪犯子女考公限制要不要取消? 专家建议分岗位罪名决定限制与否[N]. 法治日报,
2023-03-09(04).
- [23] 涂欣筠. 新社会防卫论及其对我国刑事政策的启示[J]. 理论探索,2017,(02):117-122.
- [24] 张明楷. 轻罪立法的推进与附随后果的变更[J]. 比较法研究,2023,(04):1-17.
- [25] 赵坦. 犯罪附随后果的“刑”之属性及量刑抵消功能之提倡[J]. 天府新论,2023,(06):106-121.

- [26]王瑞君. 量刑情节的规范识别和适用研究[M]. 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6年.
- [27]房清侠. 前科消灭制度研究[J]. 法学研究, 2001,(04):80-93.
- [28]彭文华. 犯罪附随后果制度的体系定位与本土设计[J]. 中国刑事法杂志, 2023,(04):140-156.
- [29]周光权. 法典化时代的刑法典修订[J]. 中国法学, 2021,(05):39-66.
- [30]伯阳. 德国公法导论[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 [31]徐立, 成功. 我国轻罪治理背景下前科消灭制度的构建[J].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26(05):119-127.
- [32]李怀胜. 犯罪记录对社会信用体系的耦合嵌入与功能校正[J]. 法学杂志, 2021, 42(03):109-118.
- [33]杜里奥·帕多瓦尼. 意大利刑法学原理[M]. 陈忠林, 译.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4.
- [34]卢君, 王明辉. 论环境犯罪惩治的恢复性司法模式[J]. 人民司法, 2017(1):5.
- [35]阮晨欣. 个人信息被遗忘权的刑法保护规则研究[J]. 法学杂志, 2023, 44(06):121-135.
- [36]翟小波. 信息作为惩罚——为被遗忘权辩护[J]. 环球法律评论, 2022, 44(02):5-17.

Research on the Accompaniments of Crimes in the Era of Minor Offenses

Liu Dingling¹, Su Shengbin²

¹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Beijing 100088, China

²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Hunan, China

Abstract: At present, the application of criminal consequences is contrary to the need for mitigating minor offenses. Its strong arbitrariness, high severity, and wide range of impact make it exhibit the attribute of excessive punishment, which hinders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crime governance. The reasons for this are that the relevant regulations violate the spirit of the Constitution, the nature of the accompanying consequences of the crime is ambiguous, and in practice, the elements of the crime and the perpetrator's performance are confused. For the problems of accompanying consequences of crimes, we should adhere to the spirit of prevention first and punishment as a supplement. At the specific institutional level, the target of the criminal record elimination system should be widely covered, and the initiation time can draw on the statute of limitations system and attach a corresponding criminal record sealing system. In terms of initiation procedures, both powers and application models should be adopted to encourage the correct reflection of restorative justice and the right to be forgotten in social concepts, and to lead the correct evaluation of criminal record holders, helping to facilitate the social reintegration of those who have completed their sentences.

Keywords: Consequences of Criminal Accompaniments; Management of minor offenses; Sealing of criminal records; crime prevention; Restorative justice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2.658

交流电路理论分析的数学化路径

付亚坤¹ 于晟伟^{1*} 何永明¹

(¹中国消防救援学院, 北京 北京 102202)

摘要: 高等数学是近代数学的基础, 它具有高度的抽象性、严密的逻辑性和广泛的应用性。作为各类非数学专业必修的基础课, 高等数学的学习对理工科后置课程的学习与理解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电学的相关课程特别是《电工与电子技术》《电路基础》等专业基础课程中, 本文从高等数学与电学的交叉视角出发, 阐述高等数学的概念和方法如何帮助构建交流电路模型, 提高分析的效率和准确性^[2], 探讨复数、微分方程、傅里叶变换、拉普拉斯变换等数学工具在交流电路建模与分析中的应用。通过建立电路行为的数学描述框架, 揭示数学抽象与物理现象之间的内在关联, 为复杂电路系统的设计与优化提供理论支撑。通过数学工具的灵活应用将抽象复杂的电路分析简单化, 让知识的融合更加生动, 不仅便于学生理解, 而且在增加课堂的趣味性上发挥了作用。

关键词: 高等数学; 正弦函数; 傅里叶级数; 复变函数; 交流电路

一、引言

高等数学是非数学专业开设的一门专业基础必修课。作为一门基础学科, 高等数学不仅是学好其他专业课程的前提和保障, 还是很多后续课程的基础和工具, 在许多学科领域里都有着重要的应用。在《电工与电子技术》《电路基础》等电学基础课中对于诸多知识的分析中高频次使用高等数学中诸多的知识点。交流电路作为现代电力系统与电子设备的核心载体, 其动态特性涉及电压、电流的周期性变化与能量传递的复杂关系。传统经验分析方法难以解决动态过程建模(如瞬态响应与稳态振荡), 非线性元件特性描述(如电容、电感与半导体器件)多频信号叠加效应分析等问题, 高等数学通过提供形式化语言与定量工具, 构建从微观元件特性到宏观系统行为的桥梁, 充分应用傅里叶级数、相量、微积分等数学的方法对交流电模型进行描述, 分析交流电路的特性^[3], 在计算分析及拓展研究中综合应用中, 使抽象的交流电路理论有了具体的数学模型, 简化了计算分析过程, 对于学生的理解和深入学习提供强大的助力。

二、交流电模型与正弦函数的关系

(一) 交流电的定义与模型

在电学的定义中, 交流电是一种周期性反转方向并不断改变其大小的电流(电压), 根据这个定义在数学中只要符合周期性和正负交替变化的函数均可以作为交流电的模型来使用。如图1所示的各函数所表示的波形均符合交流电的定义, 这就为交流电的特性分析提供了更多的模型可供选择。

(二) 交流电的产生与正弦函数

在生活中交流电是由交流发电机利用电磁感应原理产生, 其本质如图2所示, 同机座固定在一起的磁极构成定子, 与转动轴铁芯、线圈固定在一起构成转子共同作用, 当转子以 ω 角速度转动1周时, 线圈的两个边各转动经过一次N极和S极, 并且因切割磁力线而产生感应电动势, 根据右手定则可知, 线圈经过N极和S极时, 感应电动势的方向相反, 且经过N极和S极时, 线圈垂直切割磁力线, 这时, 感应电动势最

[作者简介]

[1]付亚坤(1981—), 男, 湖北襄阳人, 中国消防救援学院副教授。

[2]于晟伟(1995—), 男, 吉林长春人, 中国消防救援学院讲师,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博士研究生。

[3]何永明(1978—), 男, 江西南昌人, 中国消防救援学院教授。

大，线圈经过中心位置时，不切割磁力线，不产生感应电动势，所以转子每转 1 周，感应电动势的方向和大小就变化 1 周，即感应电动势作周期性变化。若线圈起始位置角度为 φ (初相角)，则线圈产生的电压 (感应电动势) 为

$$u=U_m \sin(\omega t + \varphi_0)$$

我们将其称之为电压的瞬时值表达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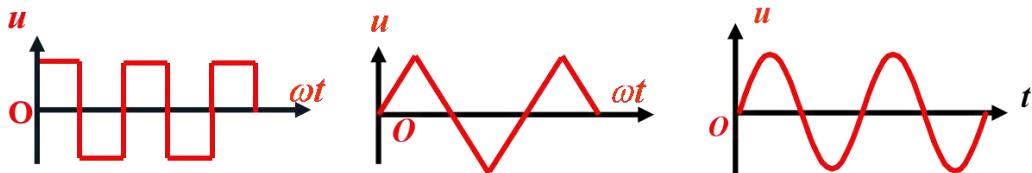


图 1 可以表示交流电的函数图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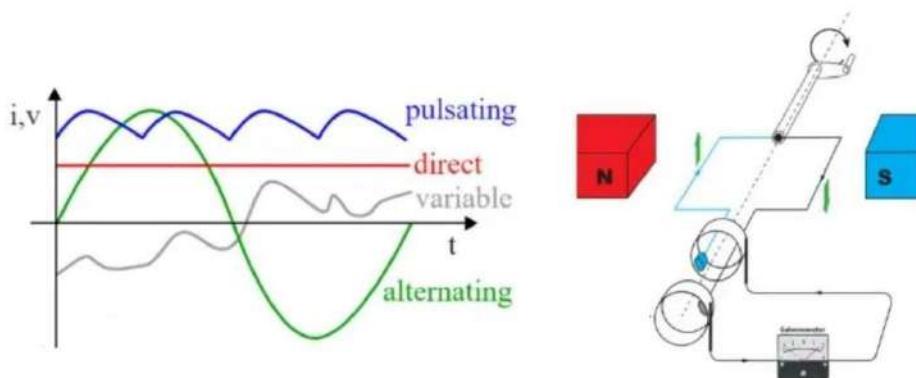


图 2 交流电产生与正弦函数

从上述描述中可以发现，交流的发电机产生交流电的过程与正弦函数的产生过程在形式上具有一致性，发电机中的闭合线圈对应有向线段，发电机的定子磁极所对应的圆周则与有向线段角度变化时的轨迹对应，得到交流电的图像模型正是正弦函数图形，所以交流电压的表达式采用正弦函数的形式来表示，同理交流电流亦是如此，电流的瞬时值表达式为

$$i=I_m \sin(\omega t + \varphi_0)$$

于是我们将以三角函数为表达式的交流电称为正弦交流电。在授课过程中，结合数学中非常经典的旋转的有向线段图向学员讲解正弦交流电的产生过程，对于学生理解交流电的产生和特性有着较为有效的辅助作用，同时为后续的交流电路参数的分析方法选择埋下伏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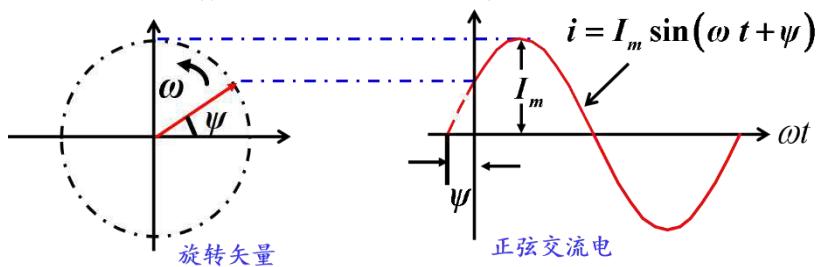


图 3 复数与正弦交流电

(三) 交流电的其他形式与正弦函数

正弦交流电只是交流电中的一种形式，在自然界中存在的各种电信号都可以看作以交流信号的形式存在，想要对任意交流信号进行分析，就用到了高等数学中非常重要的傅里叶级数以及极限的思想。傅里叶级数理论告诉我们，任何周期函数都可以表示为不同频率的正弦和余弦函数的和。以方波为例，其按照傅里叶级数对方波函数进行变换，即

$$u = U_0 + \sum_{k=1}^{\infty} A_{km} \sin (k \omega t + \psi_k)$$

$$= \frac{U_m}{2} + \frac{2U_m}{\pi} (\sin \omega t + \frac{1}{3} \sin 3\omega t + \frac{1}{5} \sin 5\omega t + \dots)$$

将表达式以图形的方式可表示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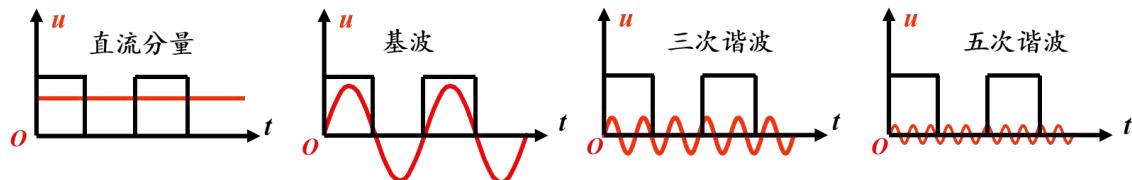


图 4 方波函数的分解图形

将图 4 中的直流分量、基波和足够多的谐波进行叠加, 得到一个近似方波。虽然理论上需要无限个谐波才能完全表示方波, 但在实际应用中, 通常取前几项即可满足精度要求。由此可见, 各类交流电信号均可采用傅里叶变换将其分解为多频率、多幅值正弦交流信号的叠加, 为进一步分析提供了便利。

三、交流电物理量与复数的应用

(一) 复数运算法则与交流电参数分析

各类电信号均可分解为正弦交流信号的叠加, 因此在对正弦量进行定量分析过程中, 常常需要对正弦量进行加减乘除运算, 这就涉及三角函数的和差化积、积化和差知识, 计算过程繁琐^[12], 出错概率较大, 对学生三角函数解析能力提出了挑战。再加上三角函数的幅值、频率和初相位三个参数参与计算分析的全过程, 让交流电路性质分析的难度增加。

然而, 我们注意到三角函数两同频率正弦量叠加, 表述为

$$\begin{aligned} & A \sin(\omega t + \alpha) + B \sin(\omega t + \beta) \\ & = (A \cos \alpha + B \cos \beta) \sin \omega t + (A \sin \alpha + B \sin \beta) \cos \omega t \end{aligned}$$

叠加前后相位和幅值发生变化, 而频率不发生改变, 且该计算过程服从复数运算法则。在非变频交流电路中, 电路中电流和电压频率相同, 在任意时刻两者的频率均不会发生改变, 所以在分析时分析的重点放在幅值和相位上, 忽略频率这个参数。三角函数运算时的特性与正弦交流电路中的特性再一次对应, 可以利用复数进行正弦量之间的计算, 三角函数的复杂计算则转化为复数的四则运算^[5], 将复数的知识点应用于交流电路物理量的分析中。

(二) 相量的概念

为了简化交流电路的分析, 将复数引入电学, 用复数表示的正弦交流电路物理量被称之为“相量”。相量是表示正弦交流电物理量大小和相位的矢量^[1], 是仅用于电学中的概念。交流电路中电流和电压的三角函数表达式与电流和电压相量分别表示为:

$$u = U_m \sin(\omega t + \phi) \quad \Rightarrow \quad U_m = U_m \angle \phi \quad U = U \angle \phi$$

$$i = I_m \sin(\omega t + \psi) \quad \Rightarrow \quad I_m = I_m \angle \psi \quad I = I \angle \psi$$

电压的相量符号为 \dot{U}_m , 读作电压的相量, 同理电流的相量符号为 \dot{I}_m , 读作电流的相量^[1]。除极坐标表示法之外, 结合复数的表示方法, 以电流相量为例, 还可表示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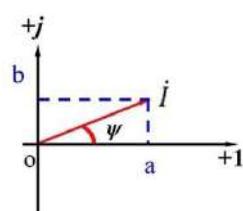
三角函数式: $\dot{I} = I(\cos \psi + j \sin \psi)$

指数式: $\dot{I} = I e^{j\psi}$ (由欧拉公式得到)

代数式: $\dot{I} = a + jb$, 其中 $a = I \cos \phi$, $b = I \sin \phi$ (如右图)

为了区分复数中的虚部 j 和交流电路中的电流 i , 在相量中的虚部我们用 j 表示。

上式中 I_m 表示最大值, I 表示有效值 (平均值), 它们之间的数量关系由其热效应和功率比较来确定。在这里应用到了高数中的积分, 以正弦交流电为例: 假设交流电 i 和直流电 I 通过相同的电阻, 在相等的时间



内产生相等的热量，则直流电的数值即为交流电的有效值，用数学表达式表示为

$$\int_0^T i^2 R dt = I^2 RT$$

将 $i=Im \sin(\omega t + \psi)$ 表达式带入上式，可求得在正弦交流电路中 $I_m = \sqrt{2}I$ ，同理 $U_m = \sqrt{2}U$ 。

(三) 使用相量应注意的问题

同时我们注意到，在交流的分析中，各类符号的大小写在不停地变化着。需要明确的是小写字母表示交流电的物理量，可以理解为它随时间变化而变化；大写字母表示直流电物理量，可以理解为恒定的量；而相量是大写字母上带点的物理量。

需要注意的是，相量是仅在电学中存在的概念，且仅有电压和电流这两个物理量，电压和电流的相量表达式和瞬时表达式两者之间并不是相等的关系，相量只能用来表征在某一时刻电路中电压和电流的状态，这一点在课堂上是需要反复强调的。

四、相量分析法与交流电路的分析

为了交流电路的分析更加简洁便利，应用了相量的概念，利用相量进行交流电分析的方法称为“相量分析法”^[5]。

相量分析法的基础是电路中各元件模型电流和电压的关系相量参数进行。在研究电阻 R、电感 L、电容 C 三个基本元件上电流与电压关系时，我们知道

电阻元件 R：电阻描述的是消耗电能的性质，电流 $i=Im \sin(\omega t + \psi)$ 的交流电路中电阻上电压与电流的关系为： $u=iR$ ，用相量表达式表示为： $\dot{U}_R = \dot{I}_R R$ ，所表达的含义分为两个部分：一是电压和电流符合欧姆定律的数量关系，即 $U=IR$ ；二是电阻上的电压和电流同相位，也就是说电阻两端电压和流过它的电流之间的相位差为 0。

电感元件：由于电磁感应现象的存在，电感元件对于交流电的阻碍作用由交流电的角频率 ω 决定，电感元件两端电压与电流的关系为

$$u = L \frac{di}{dt}$$

当电感电路中通入 $i=Im \sin(\omega t + \psi)$ 的正弦交流电，则电感线圈两端电压的相量表达式表示为

$$U_L = j\omega L I$$

除了表示电感上的电压和电流的数量关系为 $UL=I\omega L$ 外，还利用复数 j 的概念表示出电感上电压的相位超前电流 90°，也说明当电源的频率 ω 越高，电感对电流的阻碍越强，即电感具有通直流，阻交流的作用。在这里 ωL 定义为感抗 XL 。

电容元件：根据电容元件存储电场能的特点，电容元件对于交流电的阻碍作用也由交流电的角频率 ω 决定，电容元件两端电压与电流的关系为

$$i = C \frac{du_c}{dt}$$

当在电容电路中通入为 $u=Um \sin(\omega t + \phi)$ 的正弦交流电压时，电压和电流关系用向量相量表达式表示为

$$\dot{U}_C = \frac{-jI}{\omega C}$$

表达式表明电容上的电压和电流的数量关系为 $UC=I/\omega C$ 外，同时也表示出电容上电压的相位之后于电流 90°，亦可知电源的频率 ω 越高，电容对电流的阻碍越弱，即电容具有阻直流，通交流的作用。在这里 $1/\omega C$ 定义为容抗 XC 。

在交流电路分析过程中为了可以简化分析，通常在相量关系的基础上借助复数的极坐标图形，将同频率的正弦量相量画在同一个复平面中（极坐标系统），并将之称为相量图。以电阻 R、电感 L、电容 C 串联的电路中（如图 5 所示），通过的电流为 $i=Im \sin(\omega t + \psi)$ 交流电。该电路中三个元件上电流相同，因此在向量图中则会以电流的相量为参考依据，画出各元件电流、电压的相量关系图，如图 6 (a) 所示。在相量分析中，更加注重电流和电压之间的相位关系，对初相位的关注相对较少，因此在作图时忽略实轴与虚轴的限制，以选取的参考相量为基准，将图 (a) 画为图 (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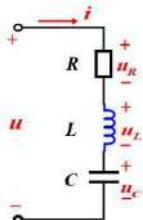


图 5 RLC 串联电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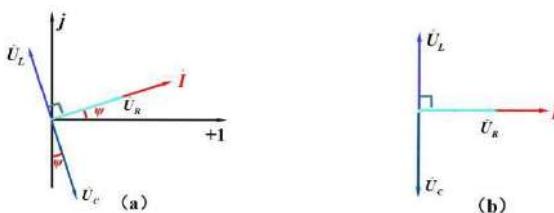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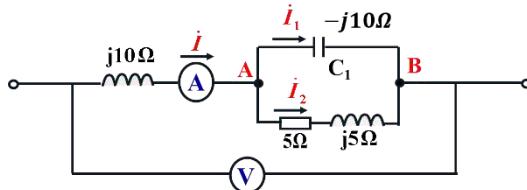
图 6 相量分析图

$$X_L = \omega L, \quad X_C = \frac{1}{\omega C}$$

$\varphi = \tan^{-1} \frac{X_L - X_C}{R}$ 阻抗的模表示阻抗的大小，阻抗的幅角则表示阻抗两端电压与电流之间的相位差，即 $\varphi = \varphi_u - \varphi_i$ 。阻抗等同于直流电路中电阻的角色，其在电路中串并联计算规则与等效电阻一致，计算过程则需按照复数的计算法则进行。需要强调的是阻抗是复数，而不是相量。

在交流电路的分析中，利用各元件在交流电路中电流与电压的数量、相位关系，结合相量图，是一维空间中三角函数式的实数运算转化为二维空间中的相量复数运算，可以简化分析过程，减少较多的计算过程，让分析过程更加清晰。

例：下图电路中已知 $I_1=10A$ 、 $U_{AB}=100V$ ，求：总电压表和总电流表的读数。



从题干不难看出，已知条件中的电流电压均为有效值，所求电压表与电流表的读数也是有效值，在求解过程中不需要进行幅值转换；然后对电路图进行分析，电流表在电路的主干路上，因此所测电流为总电流，电压则是所示图中的总电压，整个电路是由电阻、电容、电感三种原件组合而成，因此计算方法有两种。

解法一：根据相量表示法，利用复数计算完成分析。

$$\begin{aligned} AB & \quad Z_{AB} = U_{AB} / I_1 = 100 \angle 0^\circ \quad Z_1 = -j10 \quad Z_2 = 5 + j5 \\ (Z_1 \quad Z_2 \quad) & \quad Z_{AB} = \frac{Z_1 \parallel Z_2}{-j10 + 5 + j5} = \frac{-j10 + 5 + j5}{50} = 10A \end{aligned}$$

第二步 根据欧姆定律，计算总的电流 \dot{I}

$$I = \frac{U_{AB}}{Z_{AB}} = \frac{100 \angle 0^\circ}{10} = 10 \angle 0^\circ A$$

第三步 计算主干路上电感电压 \dot{U}_L

$$U_L = I(j10) = 100 \angle 90^\circ V$$

第四步 根据基尔霍夫电压定律计算总电压

$$\begin{aligned} U &= U_{AB} + \dot{U}_L \\ &= 100 \angle 0^\circ + 100 \angle 90^\circ \\ &= 100\sqrt{2} \angle 45^\circ V \end{aligned}$$

由此可得电压表的读数为 141.4V，电流表读数为 10A。

解法二：根据各元件电流、电压相量关系，结合相量图（见图 7）完成分析过程。

第一步 令 $Z_1 = -j10$ ， $Z_2 = 5 + j5$ ，将其变为极坐标式得到：

$$Z_1 = 10 \angle -90^\circ \quad Z_2 = 5\sqrt{2} \angle 45^\circ$$

第二步 以 AB 两点间电压的相量 \dot{U}_{AB} 为参考相量，画相量图标记为①，见图 7(a)。

根据阻抗幅角与电压、电流相位之间的关系， Z_1 为纯电容支路，该支路电流超前电压 90° ，即电流 \dot{I}_1 超前电压 $\dot{U}_{AB} 90^\circ$ ，电流大小 $I_1 = U_{AB} / |Z_1| = 10A$ ，画相量图标记为②。同理可得电流 \dot{I}_2 的相量图，标记为③，由 Z_2 的极坐标表达式不难看出， \dot{I}_2 与 \dot{U}_{AB} 之间的夹角为 45° ，且 \dot{I}_2 滞后于 \dot{U}_{AB} ，电流大小 $I_2 = 10\sqrt{2}A$ ，

此时应注意画图时 I_1 和 I_2 的长度关系。

第三步 由题图知 $\dot{I} = \dot{I}_1 + \dot{I}_2$, 利用平行四边形法则将电流 \dot{I}_1 和电流 \dot{I}_2 相量进行叠加见图 7(b), 得到 \dot{I} , 标记为④, 结合直角三角形相关知识可得 $I=10A$ 。

第四步 总电流 I 流过电感, 则电感上的电压 \dot{U}_L 超前电流 \dot{I} 90° , 电压大小 $U_L=I \times XL$, 即 $U_L=100$, 与 U_{AB} 大小相等, 在画图时注意两者线段长度相等, 标记为⑤, 见图 7(c)。根据基尔霍夫电压定律知 $\dot{U} = \dot{U}_{AB} + \dot{U}_L$, 将 \dot{U}_{AB} 和 \dot{U}_L 叠加, 得到 \dot{U} , 相量图标记为⑥, 并求得 $U=100\sqrt{2}V$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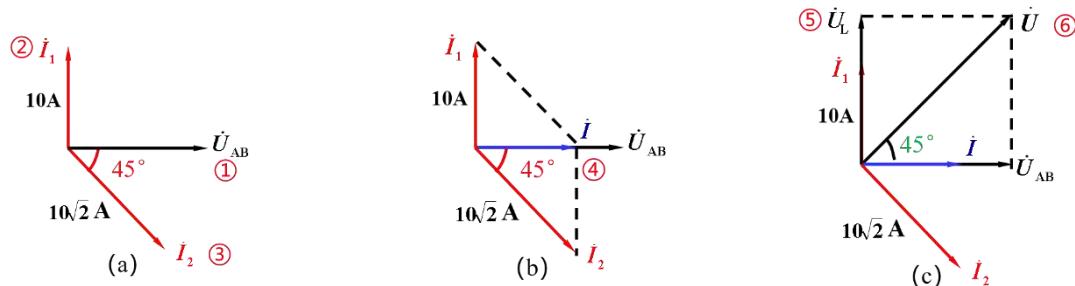


图 7 相量图分析全过程

以上两种分析方法, 在理解交流电路电压、电流关系的前提下, 首先都定义了参考相量, 然后根据利用各支路与电压、电流之间的大小、相位关系, 分别应用了复数的四则运算和复数的图形分析法最终求得了相关的结果。方法一适用范围更加广泛, 但计算过程容易出现问题; 方法二利用相量图结合简单的计算完成分析, 过程更加直观简便, 但遇到幅角复杂时便不宜使用了。

对于交流电路除了对电压、电流的分析之外, 对于交流电路还需要分析电路的有功功率、无功功率以及视在功率, 结合功率的定义式均利用积分的思想进行计算分析。

五、结论

交流电路基本原理的学习中, 从对线圈切割磁力线实验探索交流电与正弦函数的关系^[9], 将正弦函数的三要素赋予了具体的物理意义, 把抽象的理论知识具象化; 在交流电的分析中, 不仅抓住三角函数与复数之间的关系, 而且紧扣电路中频率不发生变化这一关键, 将复数引入电学成为新的概念; 通过模和幅角与交流电中的幅值和初相位的对应关系, 明确了复数的实际应用。除此之外, 在分析过程中反复用到傅里叶级数、积分、微分等多个数学知识点, 更加体现了数学知识在众多专业中的重要性。在电学专业的所有专业课程中, 都离不开高等数学的知识。高等数学为专业服务的同时, 也通过专业知识对抽象的数学概念和方法赋予了实际意义。

参考文献:

- [1] 秦曾煌. 电工学 (上) [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1.
- [2] 李静霞. 高等数学在人工智能中应用的探究[J]. 创新创业理论研究与实践, 2024, 11(22): 106-111.
- [3] 欧阳陶斐. 浅谈高等数学在电工电子中的实际应用[J]. 教研探讨, 2017, 7: 186-187.
- [4] 王宏, 薛燕, 史雪飞. 交流电路分析与相量法的教学体会[J]. 教育教学论坛, 2019, 1(1): 185-187.
- [5] 左全生. 对正弦电路中引入相量分析法的探讨[J]. 电子世界, 2018, 15: 39-40.
- [6] 李婷婷. 高等数学在电学上的几个应用[J]. 高校理科研究, 2015, 12(1): 121-122.
- [7] 卢厚元, 李波. 高等数学融入专业群课程体系建设的实践探索-以湖工职院高等数学与电子信息类专业的融合为例[J]. 湖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22, 5: 76-80.
- [8] 马玉峰. “向量法”在高等数学上的应用[J]. 甘肃高师学报, 2013, 5(18): 71-72.
- [9] 黄跃萍. 正弦交流电相关数学知识讲解浅析[J]. 科技视觉, 2023, 4: 181-183.
- [10] 刘汉明. 切割类感应电动势计算归类分析[J]. 中学生理科应试, 2021, Z1: 45-48.
- [11] 姬芳芳. 相量法在正弦稳态电路中的应用研究[J].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21, 43(6): 26-31.
- [12] 方志平. 利用复数求解三角函数问题[高中数学教与学]. 2022, 9: 13-16.
- [13] 牛腾. 对正弦交流电路教学的一点思索[J]. 西北职教, 2015, 1: 52-53.
- [14] 陈建辉. Multisim 软件在《电工学》教学中的应用[J]. 信息与电脑, 2018, 9: 104-106.

The Mathematical Path of Theoretical Analysis of Communication Circuits

Fu Yakun¹, Yu Chengwei^{1*}, He Yongming¹

¹ China Fire and Rescue Institute, Beijing 102202, China

Abstract: Advanced mathematics is the foundation of modern mathematics, which has a high degree of abstraction, rigorous logic, and wide applicability. As a compulsory basic course for various non mathematics majors, the study of advanced mathematics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the learning and understanding of post courses i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In the relevant courses of electricity, especially in professional foundation courses such as "Electrician and Electronic Technology" and "Fundamentals of Circuits", this article star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intersection of advanced mathematics and electricity, and elaborates on how the concepts and methods of advanced mathematics can help construct AC circuit models, improve analysis efficiency and accuracy [2], and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of mathematical tools such as complex numbers, differential equations, Fourier transform, Laplace transform, etc. in AC circuit modeling and analysis. By establishing a mathematical description framework for circuit behavior, the intrinsic relationship between mathematical abstraction and physical phenomena is revealed, providing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he design and optimization of complex circuit systems. By flexibly applying mathematical tools, abstract and complex circuit analysis is simplified, making the integration of knowledge more vivid. This not only facilitates students' understanding, but also plays a role in increasing the fun of the classroom.

Keywords : Advanced mathematics; Sine function; Fourier series; Complex function; Communication circuit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2.617

新时代高校反邪教教育研究

魏斌¹, 洪婷婷², 果建业¹, 邵继萍³

(¹西北民族大学, 甘肃 兰州; ²华南理工大学, 广东 广州; ³兰州财经大学, 甘肃 兰州)

摘要: 进入新时代, 我国反邪教工作取得了显著历史性成就, 整体呈现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 但同时也面临着一系列新兴挑战与复杂困境, 亟需在实践中予以深入应对与理论上进一步探索。邪教组织作为人类发展的内外阻碍力显然已严重危害社会安全和进步, 裹挟国家布展和谐社会的进程。其中, 高校逐渐成为邪教组织渗透的“新型社区”, 其通过隐蔽多元的方式手段, 试图将背离主流意识形态的极端思想植入高校师生的认知体系之中。为切实维护高校师生的合法权益, 确保高校继续保持传播优质文化的“净土”, 反邪教教育已成为时代赋予的重要课题。因此, 基于高校反邪教教育工作的现状研究, 分析其中蕴含的内在挑战与困境, 提出务实高效且针对性强的实践路径, 对于维护世界安全与稳定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关键词: 高校; 反邪教教育; 现实路径

一、研究背景

“邪教是具有巫术性质和反社会性质的黑社会组织”^[1], 通常指一种具有极端宗教或意识形态特征的组织或团体, 其信仰、行为或实践背离主流的社会规范。且邪教组织以伪宗教信仰为掩饰, 通过心理操控等非常规技术对其信仰者施加精神压力, 以达到对其思想的控制。与此同时, 邪教组织在社会层面表现出对主流价值体系的对抗与解构, 并通过构建封闭性的亚文化群体制造社会秩序混乱与认同危机的极端化组织形态。“通常以教主崇拜、精神控制等手段, 诱惑法律意识淡薄、信仰问题模糊的群众加入邪教组织, 进而达到为少数创办人获取巨额财富的目的。”^[2]其核心特征包括对成员实行极端控制、对外封闭、对异己产生排斥和敌意等, 且常以虚假的宗教或精神诱导为手段, 满足其领袖或核心成员的权力欲望, 鼓吹背离人伦的信仰体系, 以此剥夺信徒独立思考能力, 使其完全服从领袖或集体意志。这种思想控制和行为控制, 常伴随着精神虐待、身体剥削、财产剥夺等多种不良行为, 对信徒的身心健康造成严重危害。是信仰异化的极端产物, 也是文化异化导致生成异化最终影响社会秩序正常运行。

[作者简介]

魏斌 (1999-), 男, 甘肃通渭人, 硕士, 新疆社会学学会会员。研究方向: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社会治理研究;

洪婷婷 (1995-), 女, 广东湛江人, 华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果建业, 男, 兰州大学硕士, 西北民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学院讲师, 西北民族大学对外联络办公室科长, 研究方向: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通讯作者: 邵继萍, 女, 教授, 硕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 体育人文社会学。

[基金项目]

1.2023年度甘肃省反邪教工作研究重点课题(GSFX[2023]LX004)“新时代高校反邪教教育研究”;

2.甘肃省2023年度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重点项目(2023ZD002)“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甘肃实践研究”;

3.甘肃省高等学校科学研究项目(课题编号:2023CXZX-188)“民族地区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学术演进、热点及发展趋势研究”

其中，“全能神”“摄理教”“观音法门”“法轮功”等邪教组织，都曾试图将大学校园纳为其渗透的重点区域，例如，有相关报道指出“浙江杭州市蒋某金，2004年考上浙江中医药大学滨江学院针灸推拿学专业，然而，自从加入‘全能神’邪教组织后，性格变得越来越孤僻，经常与父母顶嘴。2012年12月4日，蒋某金留下一封书信离家出走，原本幸福的家庭变得支离破碎。”^[3]因此，邪教组织的非法活动不仅是对大学生群体本身的一种威胁，更是对高等教育以及知识传承和意识形态的潜在挑战。党和国家相继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关于做好抵御境外利用宗教对高校进行渗透和防范校园传教工作的意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意见》等指导性文件，为高校反邪教教育提供了重要遵循。

高校反邪教教育的核心内容包括对邪教的本质、特征及其危害的系统性剖析和解读，以及展开应对策略研究。研究表明，通过多样化教学手段和课程设置，可帮助高校学生构建对邪教的科学认知和辨识能力，增强其对邪教组织的警惕性。这种教育不仅为高校师生传授相应知识，同样也是高校师生思维能力和人格塑造的系统过程，能有效促进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同时，高校反邪教教育的有效实施需进一步依托现代信息技术，创新教育手段。如通过线上平台开展反邪教教育课程，利用大数据分析监测邪教传播趋势。同时，也需深度结合学校高效管理、高水平教师队伍建设和社会各界力量的积极参与，形成立体化、系统化的防范机制和体系。

二、高校反邪教教育的重要意义

高校反邪教教育的必要性来源于邪教组织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冲击和对校园安全的威胁。邪教通过有目的的宣传和洗脑手段，有削弱主流意识形态在学生思想观念中影响力的风险。进行高校反邪教教育是维护校园稳定的内在需求，也是构建校园立体化维稳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实践逻辑在于通过加强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与阐释，提高学生对主流价值观念的认同度，同时建立有效防范机制，包括思想政治教育、法律意识教育、信息监测与应对机制等，以削弱邪教对主流教育和科学教育效果的负面影响，切实维护高校校园秩序与安全。

（一）高校反邪教教育是维护高校师生合法权益的有力武器

高等院校知识分子众多，师生群体思想活跃、知识渊博，构成了一个充满开放和多元思想的学术单元。“在数字时代发展的大背景下，高校反邪教教育的重要性凸显无遗”^[4]。首先，高校反邪教教育有助于保障学生权益。邪教组织以诱导和洗脑手段影响学生，通过反邪教教育，可强化学生的理性思维和辨别能力，使其能够更好地认识邪教的险恶本质，避免成为邪教组织的受害者，有效保护了学生的合法权益。其次，教师在反邪教教育中扮演重要角色。反邪教教育不仅加强了教师对邪教的认知，也培养了他们更好地引导学生抵御邪教的能力，保护了教师的合法权益。再者，高校反邪教教育维护了高校的正常秩序与稳定。邪教对高校师生利用信息技术等手段渗透到高校之中。通过反邪教教育，能加强师生对邪教的认知和抵御能力，有效维护高校的正常秩序与稳定，保障校园内的安全环境。

（二）高校反邪教教育是维护大学校园稳定的必然选择

“据有关学者调查不仅信教学生比例在逐年增加就是认同和赞成信仰宗教的也占有相当的数量和比重”^[5]。邪教及其渗透活动对高等院校秩序构成了直接威胁。这种威胁不仅仅导致校园内部的秩序扰乱，甚至可能对校园文化和价值体系产生颠覆性影响。邪教组织有计划地以迷惑、拉拢、洗脑等手段渗透到校园内部，挑战着正常的教学秩序。在非洲尼日利亚，该地方的高等院校的校园安全受邪教组织侵蚀，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邪教组织的暴力和犯罪活动、挥舞危险武器以及沉迷于酒精和硬性毒品^[6]。因此，高校反邪教工作不仅是对内维护校园稳定的迫切需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选择。具体来说，邪教不良诱导的本质是导致校园恶性事件的关键因素之一。其反科学的教义和观念往往会迷惑部分师生的正常思维，混淆其正确的价值观念，甚至扭曲个人道德观念。这种混乱使学生在解决矛盾时变得越发偏激和极端，在一定程度上受影响师生可能会采取激烈手段解决纷争。只有全面加强校园内部的反邪教各项防范措施，才能进而有效遏制邪教对校园稳定的威胁，构筑一个和谐、安全、稳定的高校环境。

（三）高校反邪教教育是弘扬主流意识形态的有效举措

高校反邪教教育在当前形势下具有弘扬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意义。邪教的非法侵害不仅是对个体思想的干扰，更是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挑战，高校反邪教教育成为有效应对和抵制这种挑战的关键一环。其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高校反邪教教育可通过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巩固主流意识形态在学生群体中的地位，助力学生建立牢固的思想防线，阻止邪教思想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侵蚀。其次，高校反邪教教育可加强对邪教思想的揭露和批判，引导学生辨

别邪教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区别。通过对邪教的深入分析和研究，学生能够更准确地辨别邪教思想的荒谬性和危害性，确保其思想认知与主流意识形态保持一致。

三、高校反邪教教育的实践困境

（一）教育手段的内在局限性

高校反邪教教育在实践过程中面临的核心困境之一，正是教育手段在应对邪教宣传策略上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的外在表现是传统教育形式对邪教高度隐蔽性与欺骗性宣传模式的辨识能力不足。在更深层次上则体现为，教育手段在面对邪教组织应用的复杂技术逻辑与传播结构时的力量薄弱。邪教组织依托其精心设计的宣传体系，通过信息篡改、情绪操控等心理学机制，将目标锁定于认知程度不足且心理较为柔弱的高校学生群体之中，以高密度、多维度的传播策略侵蚀高校学生的思想防线。尤其是邪教组织在传播媒介上的深度利用，其中包括文字叙事的逻辑缝合、视觉图像的符号植入、视频内容的情绪煽动以及社交媒体算法的推送操控，形成了全方位的注意力捕获与意识形态渗透。

与此同时，传统教育手段在邪教组织非法渗透的过程中显现出明显的应对乏力。其传统教育过程受制于内容的线性传递与形式的单一性，难以有效避开邪教传播技术逻辑的运行轨道，更难以破解邪教组织基于数字媒介和情绪引导的策略性扩散。与此同时，传统教育体系的目标设定多以知识传递为核心，对技术媒介的使用与反制的整体能力建设却相对滞后，使得教育手段在面对邪教传播“注意力诱捕—心理渗透—意识转化”的深度操作链条时，难以形成有效的对抗体系。

更为深刻的是这种局限性并非仅仅来源于教育手段本身的技术落后或方法单一，而是源于教育手段所隐含的逻辑结构与传播体系难以突破邪教组织高度灵活的传播方式所构建的“认知迷宫”。邪教利用信息超载与情绪劫持等手段，强化了对个体注意力资源的割裂性占有，使传统主流教育的抗邪能力在个体认知裂变的局面下显得力不从心。由此看出教育手段的局限不仅体现在具体方法的局部失效，更在于教育体系在数字技术主导的传播生态中能否重构其权力效能与传播逻辑，从而实现对邪教意识形态侵蚀的有效抵御。

（二）专项经费投入不足与机制性掣肘

尽管近年来我国教育经费整体呈现逐年递增的态势，但在高校反邪教工作领域，实际投入与实践需求之间仍存在明显差距，反邪教专项经费的不足以成为制约反邪教教育体系全面构建的关键性瓶颈。显然该问题从侧面体现为资金总量的匮乏，并进一步折射出高校反邪教工作在资源分配、资金管理与支持机制上的结构性短板，导致反邪教工作的系统化推进受阻，教育实践的创新性与前沿性难以实现。

专项经费的匮乏直接制约了高校在反邪教领域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深度与广度。反邪教教育并非简单的信息传播或知识灌输，而是一个需要理论支撑、实践验证与动态调整的复杂系统工程。然而，受限于经费投入不足，高校难以在反邪教教育的理论方法创新、典型案例深度剖析与预防策略动态优化方面形成稳定的科研支持。在实际过程中，邪教传播模式的隐蔽性与多样性迫切需要相关部门及专业人才通过大数据分析、心理学研究和社会传播学视角的综合研究来破解其传播路径与心理操控逻辑，但此类技术密集型研究往往需要大量资金支持。经费短缺使得相关研究无法形成体系化推进，高校在制定反邪教教育策略时难以摆脱经验性与碎片化困境。

此外，资金投入机制的不完善也进一步放大反邪教教育中的资源分配矛盾。在许多高校中反邪教教育工作更多依赖临时性资金调配，缺乏专门的经费预算与长期支持机制。这种不稳定的资金供给模式使得反邪教教育的活动规划、资源配置与长期效果评估难以持续展开，同时也受制不同部门之间的利益网格。因此导致在实际工作中，高校往往缺少充足的资金用于开发创新型教育内容、制作多媒化教学资源或举办高质量的学术论坛与社会实践活动。这种投入模式不仅弱化了教育内容的吸引力和传播效果，也使得高校在面对邪教传播的技术化、媒介化与隐蔽化挑战时难以构建强有力的对抗工具。

与此同时，专项经费的缺失不仅制约了高校反邪教教育的现实效能，还在无形中削弱了社会对反邪教教育重要性的认知。资金支持的不足使得反邪教教育在高校内部难以获得应有的战略地位，进而可能导致反邪教意识形态建设的滞后性与边缘化倾向。这种状况在不同程度上影响高校培养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也可能为邪教组织在高校的潜在传播与渗透留下了不同程度的隐患。

（三）邪教教育工作机制不畅与协同难题

高校反邪教教育工作中机制不畅的现状，直接影响了教育的系统性、协同性与实际成效。这种机制性掣肘，既源于高校内部资源分配的结构性复杂，也与反邪教教育工作定位不够明确、职责划分不够清晰、部门协作不够紧密等问题密切相关。当前，高校中负责反邪教工作的机构主要集中于学生工作、思想政治教育及保卫处等部门，但这些部门各自承担着不同的职能，工作重点与资源倾斜方向各有侧重，导致反邪

教教育工作在实践中难以形成统一的系统性布局与协调推进的合力。

具体而言，学生工作部门和思想政治教育部门在高校中通常承担着以学生发展和思想引导为核心的多项任务，其经费投入和人力资源配置更多集中于学术支持、心理健康与思想政治教育等传统领域，而对反邪教教育的专项支持则相对有限。这种资源倾斜的不均衡性，直接影响了反邪教教育的覆盖面和实施深度。尽管像马克思主义学院等思想政治教育部门在课程设计中可能融入部分反邪教教育内容，但由于缺乏专项资金支持与系统化教学工具，往往只能停留在较为浅显的知识传递层面，难以深入揭示邪教传播的社会背景与心理机制，更难以培养学生在日常实际生活中对邪教危害的深刻认知和抵制能力。

与此同时，保卫处等安全职能部门虽然在防范和打击邪教方面具有专业经验，但其主要职责侧重于安全事件的应急处理和常规巡查，缺乏将反邪教教育与学生成长需求相结合的系统性规划能力。更为重要的是，学校不同部门在反邪教教育中的职能定位未能得到管理层的明确界定，部门间的协作机制缺乏有效的协调与整合。具体来说，学生工作部门可能在某些情况下主导了反邪教宣传活动，而思想政治教育部门与保卫处却未能充分参与，这种工作割裂的现象使得反邪教教育难以形成整体联动效应，甚至可能导致教育内容的重复与资源的浪费。

此外，高校内部资源分配的复杂性与有限性，也进一步加剧了反邪教工作推进的难度。在资源分配过程中，高校往往需要在教学、科研、行政管理与学生事务之间进行优先级排序，而反邪教教育作为一项具有长期性、隐蔽性特点的工作，容易在短期目标优先的资源分配逻辑中被边缘化。因此，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反邪教教育活动可能被压缩为形式化宣传或阶段性任务，而缺乏贯穿全年的常态化教育实践和多层次的体系化部署。

（四）课程设置系统性不强与跨学科协同不足

高等学校反邪教教育中课程设置的系统性不足，已成为影响教育实践效能的核心制约因素之一。当前，高等教育在反邪教教育领域尚未形成一套科学完整的课程体系，课程设置的零散性和片面性，不仅削弱了反邪教教育的针对性与时效性，也难以满足学生对邪教问题深入了解和有效防范的实际需求。这一问题的根源不仅在于课程内容设计的碎片化，还反映出高校在课程体系构建中跨学科协同的缺失，以及对邪教问题复杂性的系统认知不足。

邪教问题的多维度特性，决定了反邪教教育必须是一项跨学科、跨领域的系统性工程。邪教现象牵涉心理学、宗教学、社会学、传播学、法学等多个学科领域，其传播模式隐秘多样，其操控手法具有高度心理暗示性和欺骗性，因此仅凭单一学科视角难以全面揭示其运作机制。然而，在许多高校，反邪教教育的内容通常是零星地嵌入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或其他学科的相关模块中，这种内容散布的课程设置方式缺乏整体设计和逻辑衔接，导致学生无法形成对邪教问题的系统认知，更难以具备批判性思维能力去有效应对邪教的诱导与渗透。

例如，部分高校虽在思想政治理论课中引入了反邪教相关内容，但往往仅以邪教危害的简单描述或警示性案例分析为主，缺乏对其深层社会根源、心理机制及传播逻辑的剖析。学生虽然能够了解邪教的表层危害，但对其背后已经异化后的文化语境、社会条件和心理学基础却难以深入审视。这种片面性的教育内容无法全面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尤其是在信息传播渠道多元化、邪教利用技术手段渗透不断升级的背景下，学生面对邪教诱惑时的防范意识与抵御能力更显薄弱。

此外，课程设置中的学科间壁垒进一步加剧了反邪教教育的割裂状态。邪教问题的跨学科性质决定了高校需要构建协同创新的教育模式，但在实践中，不同学科间的资源整合与课程联动仍存在较大障碍。例如，宗教学课程可以深入揭示邪教与正统宗教的本质区别，心理学课程可以剖析邪教对个体心理的操控方式，传播学课程则能够分析邪教传播的媒介逻辑，但这些学科的内容在实际教育中却往往是各自为政，缺乏联动整合。跨学科协同的不足，直接导致高校反邪教课程内容的深度缺失与广度局限。

四、高校反邪教教育的现实路径

（一）强化意识形态引领

强化意识形态引领，构筑坚强意识形态阵地是高校反邪教教育的关键路径之一。一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在思政课中，教师应加入有关反邪教教育的部分内容，突出马克思主义思想对邪教的深刻批判，明晰宗教与邪教的区别，强调邪教的危害性，揭露其挑战公共秩序、国家政权的险恶用心，提升对邪教的警惕性。二是培养学生理性思维，坚定马克思主义坚定信仰，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来认识客观世界、改造主观世界，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内容融入课程，理解宗教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增强对邪教的认知与理解。创新教学方式，通过结合反邪教经典案例和相关法律法规，丰富相应的

课程内容，使思政课更加生动鲜活、针对性强。通过学生主动参与课堂讨论、撰写小论文、舞台剧表演、开展反邪教宣传教育、建设反邪教实践基地等方式，增强学生对邪教的认知，例如“2022年7月，杭州市高新区积极举行反邪教宣传月，推进数智反邪，揭牌大学生反邪教社会实践基地，旨在对广大学生群体及社会大众进行反邪教警示教育，增强全社会对反邪教斗争的认识和参与，提升公众识别、辨别和防范邪教的意识与能力”^[7]。此类措施有助于全方位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加强对邪教的辨别和抵制能力，塑造理性、成熟和积极向上的思维。三是强化意识形态引领，需革新舆论矩阵，提升反邪教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媒介是传播主流意识形态的有效方式，并具备拓展影响范围的时代功能。“高校可进行反邪教网络阵地建立”^[8]，有效利用反邪教宣传网站、微信公众号、微博、B站、学习强国等新媒体载体，积极传播主流意识形态与符合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相关内容，全方位压缩邪教宣传空间，提升反邪教宣传与教育效果，提升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效能。

（二）加强反邪教组织领导

强化组织领导与整合团队优势是高校反邪教教育路径中至关重要的一环。整合并调动各方资源、协调多方力量，有助于建立一个高效的反邪教教育体系，提升高校对抗邪教渗透的能力。一是跨部门整合各方资源，建立涵盖教学、学生管理、心理健康、安全保卫等多个领域的工作格局，提高应对邪教问题的专业性和针对性。二是注重横向与纵向整合。横向整合是指整合学校各职能部门资源，包括学生处、宣传部门、学术研究机构等，实现资源共享、信息互通，提升工作的整体效率。纵向整合是实现二级学院和职能部门的高效协同，建立定期联席会议制度，分析反邪教形势任务，分享信息和经验。三是高校应将反邪教教育与培养优秀人才的目标相结合，确立党委统一领导，整合宣传、统战、保卫、学工、团委等多个职能部门，形成多元高效联动体制和长效预警机制，及时制止校园内疑似邪教组织的活动。并进一步提升学生对于邪教组织的识别与抵御能力，从课程设置方面着力推进。四是加强与其他高校的合作，实现反邪教信息互联互通，构建完善的反邪教联盟网络，有效分享信息、经验，并实现资源共享。最后，建立定期的反邪教教育工作评估与检查机制。该机制应由相关部门的领导小组负责组织，定期对各部门开展的反邪教工作进行评估，审查工作进展、制定的策略和政策的实施情况，并根据评估结果对反邪教教育体系进行调整和优化。

（三）开展反邪教课题研究

高校应当采取多种方式来支持和促进学术研究的开展，为反邪教教育提供更加深入和系统的理论支撑。一是设立专项资金，支持高校教师开展针对邪教领域的研究项目。资助范围涵盖对邪教现象、邪教思想、传播方式等多个方面的系统研究。通过资助教师进行深入研究，为制定反邪教教育策略提供更为科学和系统的理论基础。二是鼓励并支持跨学科的研究合作。邪教研究涉及多个学科领域，包括心理学、社会学、法学、民族学等。应建立跨学科的研究团队，从不同学科角度深入分析邪教组织的运作模式、社会影响力以及对个体心智的影响机制。比如，心理学方面可探究洗脑效应，社会学方面可研究邪教的社会影响力等。三是在高校设立专门的反邪教研究中心，聚焦于邪教问题的研究。研究中心可组织多领域专家，开展理论研究、调查分析、政策论证等工作，并形成可供实践参考的工作建议。四是开展实地调研，深入了解不同类型邪教组织的特点和运作模式。深入分析邪教对个体心智的影响机制，通过案例分析揭示洗脑效应、社会影响力等方面的运作逻辑，为防范邪教提供更为有效的理论支持。最后加强国际间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借鉴国际反邪教的先进经验和研究成果^[9]。通过国际合作，获取多元化的研究视角，从而丰富和完善对邪教问题的认识，为国内反邪教工作提供更为广泛的参考与借鉴。

（四）强化反邪教联防联控

高校与政府相关部门之间的合作关系在反邪教工作中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高校应当主动与地方政府、公安部门等建立紧密合作关系，以便更加有力地开展相关工作。政府作为公共治理的主体，其在资源、法律和政策支持等方面拥有独特优势，对于反邪教工作的开展至关重要。因此，在建立合作关系的过程中，首先需明确合作目标和合作范围，共同制定反邪教工作方案，明确各自的责任与任务。同时建立信息共享和资源协同机制，通过信息共享，能够更快速地获得邪教组织的活动信息和动向，从而及时采取防范措施。积极与青年组织、社会反邪教组织、志愿者团体以及爱心救助组织等建立合作关系，是构建多元合作体系的重要部分，通过策划举办各种形式的主题活动、文化节、义工服务等，利用多元化形式深入传达对邪教的警示和防范，使学生更加深入地了解邪教的危害，并形成警钟长鸣的防范机制。以多种形式加强家校合作，利用网络平台建立家校互动交流的渠道，向家长提供相关的反邪教信息、教育资源、案例分享等，增强他们的防范意识和能力。

（五）完善高校反邪教教育法规

强化高校反邪教教育的法治建设是确保教育工作稳健有序开展的必然路径^[10]。健全完善的法律框架既为高校提供了明确的法律指引，也为反邪教工作提供了规范化的规则体系。相关的法规与制度的建立需对高校反邪教工作目标、任务以及责任分工进行明确规定。通过界定这些工作的核心目标，明确规划工作任务，并对工作责任进行细致划分，从而为高校反邪教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明确的指引。建立法规和制度需明晰相关部门的职责和权限，法规建设不仅仅是为了对作品内容进行规范，更是为了确保各个相关部门在反邪教工作中有明确的职责划分和权限界定。明确规定反邪教工作的责任部门、反邪教教育内容及方法等，为校园反邪教教育工作提供了法律支持和操作指引。专门针对不同类型高校反邪教教育进行分类指导，例如针对民族类院校、公安类院校等院校，需明确学校对邪教宣传和渗透的防范措施，规范不同高校开展反邪教工作的程序和标准。需结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制定符合高校自身特色的反邪教教育管理规定。

五、结语

综上所述，开展高校反邪教教育不仅关乎个体学生的成长与安全，更是提升整个社会对于邪教问题的认知与防范能力的重要途径。高校反邪教教育的意义远超出个体防范邪教渗透的范畴，其核心价值在于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培养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关乎学生个人安全与成长的重要课题，承载着维护社会稳定、加强法治建设的历史使命。在高校中开展深入系统的反邪教教育有助于学生树立正确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增强大学生辨别、抵制邪教思想的能力，从而提升其自我保护的能力。通过深入挖掘邪教的本质、特征以及对个人和社会的危害，能够更好地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判断能力，提升他们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素养，形成健全完善人格。

参考文献

- [1] Tian Xiang M. The Destructive Cult, the Cause of Formation, Nature and Countermeasures[J].文化与宗教研究:英文版, 2015, 3(5):10.
- [2] 陈永胜.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心理学的独特学术价值[J].世界宗教研究,2023(04):1-7.
- [3] 中国反邪教网.朔风.护航开学季上好防范邪教第一课 [EB/OL].(2023-09-19)[2025-02-27].https://ga.tj.gov.cn/gaxc/fxjjsjyjxc/202309/t20230919_6410208.html?utm_source=chatgpt.com
- [4] 王勃浩,戴继诚,王明生.路径依赖视角下的邪教治理数字化转型探究——以Z市为例[J].科学与无神论,2023,(01).
- [5] 马玉堂,张久献.当前大学生宗教信仰的现状、原因及对策分析——以甘肃兰州三所高校为例[J].科学与无神论,2013,(03):15-21.
- [6] Agetue NF、Ogodu OJ.邪教与尼日利亚高等院校的和平/安全校园[J].《公共管理、金融与法律杂志》,2022(24).
- [7] 中国新闻网.杭州滨江推进数智反邪 揭牌大学生反邪教社会实践基地 [EB/OL].(2022-07-19)[2025-02-27].https://www.zj.chinanews.com.cn/jzkzj/2022-07-19/detail-ihcakuiy5355880.shtml?utm_source=chatgpt.com
- [8] 薛鹏,范宝祥.互联网环境下青年群体面对邪教的挑战与对策研究[J].科学与无神论,2020(05):47-52.
- [9] 陈耕,戴继诚.场域理论视角下提高我国邪教治理国际话语权探究[J].科学与无神论,2022(03):67-74.
- [10] 雷安军,王留彦.欧美主要国家对邪教的法治化管理模式比较研究[J].科学与无神论,2020(06):49-53.

Research on anti-cult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in the new era

Wei Bin¹, Hong Tingting², Guo Jianye¹, Shao Jiping³

¹ Northwest Minzu University, Lanzhou, Gansu Province, China;

²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Guangdong, China;

³ Lanzhou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Gansu Province, China;

Abstract: Entering the new era, China's anti-cult efforts have achieved remarkable and historic accomplishments, demonstrating a steady and positive development trend. However, these efforts are also confronted with a series of emerging challenges and complex difficulties that require practical solutions and further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Cult organizations, as both internal and external impediments to human development, have significantly jeopardized social security and progress, hindering the nation's endeavors to build a harmonious society. Notably,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ave increasingly become "new communities" infiltrated by cults, which attempt to implant extreme ideologies deviating from mainstream values into the cognitive systems of faculty and students through covert and diverse means. To effectively protect the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college faculty and students and ensure that institutions of higher education continue to serve as sanctuaries for disseminating high-quality culture, anti-cult education has emerged as a critical issue in this era. Therefore, based on research into the current state of anti-cult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nherent challenges and dilemmas and proposes practical, efficient, and well-targeted strategies. This approach holds significant theoretical value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maintaining the security and stability of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Keywords: universities; Anti-cult education; Realistic path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2.635

PBL 教学法在现代金融基础课程中的应用与探索¹

梁天悦^{1*}, 秦 雯¹

(¹安徽职业技术学院, 合肥 安徽 230011)

摘要: 随着金融行业数字化转型加速, 高等职业院校金融服务与管理专业面临传统教学模式与行业人才需求错位的现实挑战。研究以《现代金融基础》课程为载体, 系统构建基于 PBL (Problem-Based Learning) 教学法的“问题—探究—实践—反思”四阶教学模式。选取商业银行流动性危机、普惠金融产品设计等多个真实金融场景, 采用行动研究法对金融服务与管理专业学生进行三轮教学实践。结果显示: 实验班学生知识应用能力测评优秀率、小组项目方案被合作金融机构采纳率均有提升, 特别是在金融数据分析和监管政策解读方面成效显著。研究成果为高等职业院校金融专业核心课程改革提供了可复制的实施路径, 印证了 PBL 教学法在培养“懂业务、会分析、能决策”的复合型金融人才方面的独特价值。

关键词: PBL 教学法; 现代金融基础; 高职教育; 应用型人才培养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一) 高职金融教育的现实困境

当前高职金融专业教学普遍存在“三脱离”现象: 一是教学内容脱离行业前沿, 2023 年行业调研显示 78% 的课程未涉及数字人民币、碳金融等新兴领域; 二是教学方式脱离认知规律, 学情调查表明 63% 的学生在传统讲授课堂中出现注意力断层; 三是能力培养脱离岗位需求, 企业反馈毕业生需平均 4.7 个月适应期才能独立完成信贷风险评估等基础工作^[1]。这种供需矛盾在《现代金融基础》课程中尤为突出, 该课程作为专业基石, 当前普遍采用“概念讲解+例题演练”模式, 导致学生陷入“学不会、用不上”的恶性循环。

(二) PBL 教学法的理论适配性

PBL 教学法的建构主义内核^[2]与金融学科特性^[3]高度契合: 其一, 金融知识的强应用性要求学习者通过真实问题理解抽象概念, 如通过设计家庭理财方案掌握货币时间价值理论; 其二, 金融业务的跨学科特征需要团队协作解决问题, 如制定企业汇率避险方案需整合国际金融、财务管理、法律知识^[4]; 其三, 金融市场的动态变化倒逼教学情境持续更新, 例如, 在提款挤兑和募资失败的双重夹击下, 硅谷银行 (Silicon Valley Bank, SVB) 由于流动性枯竭而被金融监管机构接管事件 (后简称 SVB 事件)。这种“在做中学”的理念与《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提出的“岗课赛证融通”要求形成深度共鸣。

二、课程设计与实施路径

(一) 三维教学目标重构

基于 Bloom 教育目标分类理论^[5], 构建知识、能力、素养三维目标体系 (见表 1)。在“商业银行信贷决策”模块中, 教学目标从传统的“掌握信贷流程”升级为“能为小微企业设计可行性融资方案”, 具体分解为: 识别企业财务报表关键指标 (知识维度)、运征信系统模拟平台评估违约风险 (能力维度)、恪守信贷人员职业道德准则 (素养维度)。这种重构使抽象的理论学习转化为可观测的行为目标。

[基金项目]

安徽职业技术学院 2023 年度院级质量工程教学研究项目“PBL 教学法在现代金融基础课程中的应用与探索”(项目编号: 2023yjjyxm52); 安徽职业技术学院 2023 年度院级质量工程教学研究项目“基于数智化转型的大数据与会计人才培养模式探索”(项目编号: JYYJXM13)

表 1 教学目标对比分析表

维度	传统目标	PBL 目标	评价方式
知识	记忆金融市场分类	解析科创板注册制改革影响	政策解读报告评分
能力	计算存款利息	设计养老金融产品组合	方案可行性论证答辩
素养	知晓职业道德规范	处理利益冲突情境模拟	行业导师情景评价

(二) 模块化教学内容设计

将教材内容重构为“基础认知—市场运作—风险管理—创新实践”四大模块，每个模块设置三至四个驱动性问题^[6]。例如在“金融科技应用”模块中，以“如何利用区块链技术解决供应链金融信息不对称”为核心问题，串联起数字货币、智能合约、跨境支付等知识点。教学资源建设方面，开发包含 34 个微课视频、12 套监管文件汇编、8 个金融数据平台的“三位一体”资源库，其中中国人民银行征信系统模拟平台的使用使学生在虚拟环境中完成超过 200 次信用评级实操。

三、典型教学案例——以“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单元为例

(一) 问题情境设计

选取 2023 年硅谷银行 (SVB) 流动性危机作为教学案例，设计“银行如何在利率波动中保持流动性安全”的核心问题。具体任务包括：(1) 分析 SVB 资产负债结构，计算流动性覆盖率 (LCR) 和净稳定资金比例 (NSFR)；(2) 模拟美联储加息环境下的压力测试；(3) 制定应急融资预案。教学资源包含 SVB 财报数据、美联储货币政策声明、巴塞尔协议 III 中英文版等一手资料，确保问题情境的真实性和探究深度。

(二) 教学过程实施

1. 问题导入阶段

播放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 (CNBC) 关于 SVB 事件的新闻报道，引导学生提出案例中的关键问题，如“为什么持有至到期证券 (HTM) 会导致流动性危机？”、“如何平衡收益性与流动性？”等。教师将问题归类为“政策环境”、“资产负债管理”、“监管指标”三个探究方向。

2. 知识建构阶段

学生分组查阅《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办法》、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 (FOMC) 会议纪要等文献，使用 Excel 建立流动性缺口分析模型。教师适时介入，讲解久期匹配、利率敏感性缺口等核心概念，确保理论支撑的准确性。

3. 方案设计阶段

各小组分别扮演银行管理层、监管机构和储户，从不同视角制定解决方案。例如，A 组提出“优化资产负债期限结构，增加高流动性资产占比”；B 组建议“建立流动性压力测试常态化机制”；C 组设计“与同业机构建立应急资金互助协议”。

4. 成果展示与评价阶段

采用“模拟听证会”形式进行答辩，邀请现为银行风控岗位负责人的企业导师担任评委。评价标准包括：方案可行性 (40%)、数据分析准确性 (30%)、团队协作表现 (20%)、答辩逻辑性 (10%)。最终评选出最优方案并纳入课程案例库。

(三) 教学效果分析

通过前后测对比，学生在以下方面提升显著：(1) 政策解读能力：能准确识别宏观审慎评估体系 (MPA) 考核指标变化对银行经营的影响，正确率从 58% 提升至 89%；(2) 数据分析能力：能独立完成流动性指标计算和压力测试，实操题得分率提高 42%；(3) 职业判断能力：在模拟决策中展现出风险收益权衡意识，方案可行性评分达到 4.2/5.0，较传统教学提高 1.6 分。企业导师称赞学生提出的“建立流动性风险预警指标体系”建议具有实操价值，拟纳入银行新员工入职培训计划。

四、实施效果与反思

(一) 量化成效分析

为全面评估 PBL 教学法在《现代金融基础》课程中的应用效果，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成绩对比、企业反馈等多种方式，对 2023 级金融服务与管理专业学生进行了三轮跟踪研究。以下为具体数据分析结果：

1. 学生成绩对比分析

表 2 实验班与对照班期末考试成绩对比 (独立样本 t 检验)

变量	组别	样本量 (N)	均值 (Mean)	标准差 (SD)	t 值	p 值
----	----	---------	-----------	----------	-----	-----

期末考试成绩	实验班	48	82.5	6.8	9.47	0.000
	对照班	45	67.3	9.2		

对实验班 (n=48) 和对照班 (n=45) 的期末考试成绩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 结果显示:

实验班平均分为 82.5 分, 标准差为 6.8, 显著高于对照班的 67.3 分 (标准差为 9.2),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t=9.47$, $p<0.01$) ; 在实操题部分 (如“设计小微企业融资方案”), 实验班得分率为 76.8%, 较对照班的 48.3% 提高了 28.5 个百分点; 在理论题部分 (如“解释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实验班得分率为 85.2%, 较对照班的 72.1% 提高了 13.1 个百分点。

2. 学生能力提升分析

表 3 实验班学生能力提升前后测对比 (配对样本 t 检验)

变量	组别	样本量 (N)	均值 (Mean)	标准差 (SD)	t 值	p 值
知识应用能力	前测	48	42.3%	10.2%	15.32	0.000
	后测	48	89.6%	6.8%		
问题解决能力	前测	48	3.2/5.0	0.8	12.45	0.000
	后测	48	4.5/5.0	0.6		
团队协作能力	前测	48	78.5%	9.3%	8.67	0.000
	后测	48	95.2%	4.7%		

通过能力测评量表 (Cronbach's =0.87) 对实验班学生进行前后测对比, 结果显示:

知识应用能力: 学生在“金融数据分析”任务中, Python 使用熟练度从 42.3% 提升至 89.6%; 问题解决能力: 在“设计家庭理财方案”任务中, 方案可行性评分从 3.2/5.0 提升至 4.5/5.0; 团队协作能力: 小组任务完成率从 78.5% 提升至 95.2%, 且组内分工明确度评分达到 4.3/5.0。

3. 学习满意度调查

表 4 实验班学生学习满意度调查结果

变量	样本量 (N)	均值 (Mean)	标准差 (SD)	同意率 (Agree)
提高了学习兴趣	48	4.6/5.0	0.5	91.6%
知识记忆更持久	48	4.5/5.0	0.6	87.5%
团队协作能力提升	48	4.4/5.0	0.7	83.3%
问题解决能力增强	48	4.3/5.0	0.8	79.1%

对实验班学生进行问卷调查 (有效回收率 96%), 结果显示:

91.6% 的学生认为 PBL 教学模式“提高了学习兴趣”; 87.5% 的学生表示“知识记忆更持久”; 83.3% 的学生认为“团队协作能力得到提升”; 79.1% 的学生反馈“问题解决能力增强”。

4. 企业反馈与就业竞争力分析

表 5 企业导师对实验班学生能力评价

变量	样本量 (N)	均值 (Mean)	标准差 (SD)	最小值 (Min)	最大值 (Max)
数据分析能力	48	4.5/5.0	0.6	3.8	5.0
职业判断能力	48	4.3/5.0	0.7	3.5	5.0
风险评估报告质量	48	4.2/5.0	0.8	3.0	5.0

表 6 实验班与对照班就业适应期对比

变量	组别	样本量 (N)	均值 (Mean)	标准差 (SD)	最小值 (Min)	最大值 (Max)
就业适应期	实验班	48	2.3 个月	0.8	1.5	4.0
	对照班	45	4.7 个月	1.2	3.0	6.0

与合作金融机构联合开展毕业生能力评估, 结果显示:

实验班学生在顶岗实习期间, 风险评估报告质量评分达到 4.2/5.0, 较对照班提高 1.6 分; 企业导师对实验班学生的综合评价中, “数据分析能力”和“职业判断能力”两项指标分别达到 4.5/5.0 和 4.3/5.0; 实验班毕

业生平均就业适应期缩短至 2.3 个月，较对照班的 4.7 个月显著降低。

（二）现存问题

1. 教师角色转换难度大

传统教学模式中，教师主要扮演知识传授者的角色，而在 PBL 教学中，教师需要转变为学习引导者和问题设计者。调查显示，超过半数的教师反映在初期实施中存在“重讲授轻引导”的惯性思维，难以准确把握介入时机和引导深度。例如，在“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案例中，部分教师倾向于直接给出答案，而非引导学生自主探索解决方案。此外，教师对金融行业前沿动态的跟踪不足，导致问题设计缺乏时效性和针对性。

2. 学生适应性差异显著

高职学生普遍存在理论基础薄弱、自主学习能力不足的问题。学情调查显示，少数学生在 PBL 初期表现出“无从下手”的困惑，特别是在数据分析和政策解读任务中，得分率较低。此外，团队协作中也存在“搭便车”现象，个别学生在小组任务中参与度较低，导致任务完成质量参差不齐。

3. 教学资源整合难度高

PBL 教学需要大量真实案例和数据支持，但现有教学资源存在以下问题：一是金融数据获取渠道有限，学生难以接触到 Wind、Bloomberg 等专业终端；二是案例更新滞后，部分案例仍沿用 2018 年之前的市场数据，无法反映当前金融环境的变化；三是虚拟仿真平台建设不足，学生缺乏实操训练的机会。

4. 评价体系科学性不足

当前 PBL 教学评价仍以教师主观评价为主，缺乏多元化的评价主体和标准化的评价工具。例如，在“设计家庭理财方案”任务中，评价指标多集中于方案的完整性，而忽视了学生的创新思维和风险意识。此外，企业导师参与评价的比例较低，导致评价结果与行业需求存在一定偏差。

5. 课程思政融入度不够

在 PBL 教学中，课程思政元素的融入往往流于形式。例如，在“普惠金融产品设计”案例中，部分学生仅关注产品的收益性，而忽视了“金融为民”的社会价值导向。如何将“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服务实体经济”等国家战略有机融入教学案例，仍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三）优化路径

1. 构建“双师型”教师培养机制

定期举办“校企双导师工作坊”，邀请银行、证券等金融机构的专家参与案例设计和教学指导；建立教师企业实践制度，要求专业教师每学期至少完成 15 天的企业挂职，跟踪行业前沿动态；开发 PBL 教学能力培训课程，帮助教师掌握问题设计、过程引导和评价反馈的技巧^[7]。

2. 实施“分层递进”教学模式

针对学生能力差异，设计“基础-进阶-拓展”三级任务包^[8]。例如，在“证券市场分析”模块中，基础任务为解读上市公司财报，进阶任务为构建投资组合模型，拓展任务为撰写行业研究报告；建立“导师-助教-学生”三级帮扶机制，由高年级优秀学生担任助教，协助教师指导低年级学生；引入“翻转课堂”理念，课前通过微课视频帮助学生掌握基础知识，课中聚焦问题探究和实践操作。

3. 建设“三位一体”教学资源库

开发“金融数据实验室”，集成 Wind、同花顺等专业终端，为学生提供真实数据支持；建设“动态案例库”，每学年更新 10-15 个案例，确保教学内容与行业动态同步；开发虚拟仿真项目，如“数字人民币支付系统运维”、“绿色金融产品设计”等，提升学生的实操能力。

4. 完善多元化评价体系

引入企业导师评价，将行业标准纳入考核体系。例如，在“信贷风险评估”任务中，由银行风控主管对学生的方案进行评分；开发 PBL 评价量表，从知识应用、技能操作、团队协作、职业素养四个维度进行量化评价；建立“过程性评价+终结性评价”相结合的模式，将课堂表现、小组贡献、成果质量等纳入总评成绩。

5. 深化课程思政融合

将“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服务实体经济”等国家战略融入教学案例。例如，在“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案例中，引导学生思考如何平衡商业利益与社会责任；开发“金融伦理与职业道德”专题模块，通过角色扮演、情境模拟等方式，培养学生的职业操守和社会责任感；邀请行业楷模开展专题讲座，分享金融从业者的职业成长故事，激发学生的职业认同感。

五、结论与展望

本研究证实，PBL 教学法通过重构“问题—知识—能力”转化链条，可以有效破解高职金融课程理论与

实践脱节的难题。通过对现存问题是分析给出优化路径与解决方案，使 PBL 教学法在《现代金融基础》课程中的应用更加科学化、系统化，为培养高素质金融技术技能人才提供有力支撑。

未来研究将进一步探索 PBL 与金融科技、绿色金融等新兴领域的深度融合，持续提升课程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水平，为培养适应金融数字化转型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提供持续动力。

参考文献：

- [1] 王心如. 数字金融职业教育人才发展蓝皮书[M]. 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24.
- [2] 中国人民银行. 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办法[Z]. 2018.
- [3] 教育部. 职业教育专业教学标准（金融服务与管理专业）[S]. 2021.
- [4] 严雅娜.(2021).PBL-翻转课堂教学法在《税务稽查》中的应用.山西财经大学学报,43(S1),104-106.
- [5] 刘景福,钟志贤.(2002).基于项目的学习(PBL)模式研究.外国教育研究,(11),18-22.
- [6] Junming Xu,Yanmin Jia,Chunyong Liu,Xiaoli Liu,Baoyu Zhang,Chen Ye & Zhan Wang.(2025).Experimental study on flexural performance of steel-HFRC composite box beam.Case Studies in Construction Materials,22,e04402-e04402.
- [7] Hangbin Chai,Haoxuan Wu,Yurui Zhang,JIayu Zhou,Dewen Liu,Yue Yu & Wenyuan Liao.(2025).Research on the shear behavior of PBL connectors in steel fiber reinforced concrete composite beam..Scientific reports,15(1),5824.
- [8] 何声清,綦春霞. (2024). 教师对项目化学习的感知风险及其与实施意愿的关系. 教师教育研究, 36 (03), 52-59. doi:10.13445/j.cnki.t.e.r.2024.03.007.

The Application and Exploration of PBL Teaching Method in Modern Financial Foundation Course

Liang Tianyue^{1,*}, Qin Wen¹

¹ Anhui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Hefei 230011,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acceleration of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financial industry, the financial services and management major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is facing the realistic challenge of the mismatch between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odel and the talent demand of the industry. This paper takes the course "Modern Finance Foundation" as the carrier, and systematically constructs a four-level teaching model of "problem-inquisition - practice-reflection" based on PBL (Problem-Based Learning) teaching method. Several real financial scenarios such as commercial bank liquidity crisis and inclusive financial product design were selected to carry out three rounds of teaching practice for students majoring in financial services and management with action research metho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excellence rate of students' knowledge application ability assessment and the adoption rate of group project schemes by cooperative financial institutions have improved, especially in financial data analysis and regulatory policy interpretation. The research results provide a replicable implementation path for the reform of core courses for finance major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and confirm the unique value of PBL teaching method in cultivating compound financial talents who can understand business, analyze and make decisions.

Keywords: PBL teaching method; Modern financial foundation;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Training of applied talents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2.638

偏头痛与心理不适导致的言语抑制——语言学视角下的情绪表达障碍

张晶晶¹

(¹ 云南民族大学文学院, 云南 昆明 650000)

摘要: 本文旨在探讨偏头痛及心理不适(如情绪低落、焦虑等)对个体的言语行为, 从语言学角度分析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表现形式及对社会互动的影响。结合神经科学对偏头痛机制的理解, 以及心理学对情绪表达的研究, 本文试图构建一个跨学科的解释框架。

关键词: 神经语言学; 言语; 言语抑制

引言

偏头痛作为一种常见的神经系统疾病, 其反复发作的头痛症状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同时, 心理不适如情绪低落、焦虑等也是现代社会常见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些状况往往导致患者言语抑制, 不愿或难以与他人交流。本文将从语言学角度深入探讨这一现象。

一、偏头痛与心理不适的概述

(一) 偏头痛的定义及语言联系

偏头痛是一种反复发作的神经系统疾病, 焦虑和情绪障碍已被证明是与偏头痛最相关的精神共病。从医学的角度来看, 偏头痛是一种慢性的、反复发作的神经血管性疾病, 主要表现为单侧、搏动性的中重度头痛, 伴有恶心、呕吐、畏光等症状。分类包括无先兆偏头痛、先兆偏头痛等。而本文所要探究的偏头痛仅仅是偏头痛引起的感觉器官的不适方面对语言和言语的影响。

通过对偏头痛进行系统听力学研究, 发现偏头痛患者可能存在外周或中枢听觉障碍。从语言思维功能的生理基础来说, 人脑中听觉性语言中枢, 在大脑左半球的后部, 靠近视觉语言中枢, 是1874年德国神经学家卡尔·韦尼克发现, 也叫韦尼克区, 这一区域如果受损的话, 仅仅只能听到别人讲话, 但是不能够理解别人讲的, 自己的表达能力也会有问题。

综上, 偏头痛症状会引起语言能力的障碍问题, 偏头痛与语言思维有着重要的影响。

(二) 心理不适的定义及语言表现

这里所要讨论的心理不适主要是建立在生理基础上, 偏头痛时会引起头部局部难受, 严重时会蔓延到面部, 导致生理不适, 从而引起心理情绪化, 比如: 不耐烦、听不进去话、疲倦等等, 最终影响到语言的表达。

当然, 心理不适的范围会涉及到很多方面, 比如, 涵盖情绪低落、焦虑、抑郁等多种情绪状态, 这些情绪状态可能源于生活压力、人际关系挑战等。而语言中的社会性使语言具有了社会现象, 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际也让此具有心理现象, 加之与语言功能的联系也是人类思维的工具, 在两者的关联中思维和语言是形影相随的, 也会对彼此产生重要作用, 所以是不可分离的关系。因此, 心理不适会对语言产生重要影响。

二、言语抑制的语言学分析

从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成果证明了, 思维作为人脑的活动, 具有大脑神经生理的基础, 人脑中分为左右

[作者简介]

张晶晶(2001--), 女, 云南景洪人, 云南民族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

两个半球，其中语言功能区分有四个，说话中枢和听觉性语言中枢对本次所要讨论的语言反应较为重要，因为，假如两者受到损伤可能会丧失说话能力，造成表达问题。

(一) 言语抑制的定义及表现形式

言语抑制指个体在特定情境下减少或停止言语输出的行为。从字面意思中不难理解，言语是人们运用语言进行交际的过程，如果在交际过程中受到一些因素的影响，那可能会导致交际双方中某一方的言语减少或者停止。

在偏头痛或心理不适情境下，言语抑制可能表现为沉默、话语减少、交流意愿降低等。

比如：A 在受到偏头痛的影响时，与 B 的会话会较为短少。

B：你想吃什么？

A：都行。

B：吃红烧肉和小青菜可以吗？

A：好的。

B：什么时候去吃？

A：看你。

通过以上的会话可以看出 B 是主导言语者，对交际产生的趋向有着引导作用，而 A 的言语主要依靠 B 的思维进行，情绪单一。这是较明显的言语抑制现象。

(二) 语言学视角下的言语抑制机制

语言的功能是客观存在的，主要是具有社会功能和思维功能，社会功能中最基本的就是能够完成信息传递这一社会中人和人的基本交流，并且这一传递不仅具有语言本身，还会存在辅助语言的身势这类非语言形式。同时，社会功能还存在人际互动功能，主要发生在说话者和受话者双方。另外，语言的思维功能也是一个重要方面，思维的形式、机制等与语言有着紧密联系。具体来看，

语言作为社会互动的重要工具，其使用受到个体情绪、认知状态等内部因素的影响。比如：A 是说话者，B 是受话者

A：我现在不太想讲话，我需要安静一下。

B：好的，那你休息一下吧。

这里，A 传递的信息是基于自身感受的判断，认为自己不舒服需要休息，并且直接地表达了自己的态度和要求。B 接收到了其信息也了解了对方的需求，并且还做出了回应。由此能够看出，A 和 B 作为说话和受话双方将语言作为交际互动的工具，通过话语表达出自己的意图，也得到了对应的反馈。

头痛导致的疼痛及心理不适可能干扰个体的语言处理能力，进而影响其言语行为。

仍然以 A 和 B 进行举例，两者交际的过程的话语表达可以较为直观的感受出偏头痛对言语行为造成的影响。

A：我现在不太想讲话，我需要安静。

B：那你听我讲吧。

A：但我还需要安静。

B：我很快，说完就走。

A：安静一下。

B：十分钟就好。

A：（会采用面部表情或者手势以及躯体姿态代替语言传递自身的无奈态度）

从 A 的话语表达的态度可以看出对于复杂信息的处理是拒绝态度，并且希望能够稍后再处理的意图，而 B 也能够接收到 A 的信息，但是 B 存在对态度和意图是否认同的自主选择性，当然，对于生理的不适 A 也在话语中表现出来了单一化的情绪趋向和简洁语言表述。

三、偏头痛与心理不适对言语行为的具体影响

偏头痛是一种神经性的生理感受，对感觉器官的影响会比较严重，而语言中思维的功能基础是感觉器官的感觉和感知，所以双重作用下在感觉器官上的刺激会有明显的反映，言语行为也会受到影响。

(一) 偏头痛对言语行为的影响

疼痛可能导致患者注意力分散，难以集中精神进行言语交流。当偏头痛严重时，感觉器官集中在感觉上，而减低了对知觉的反应。

比如：

A：同学们抬头看黑板

B: (能够按照指示进行动作，但是不一定能够进行深度思考)

A: 我们所要讨论的是形象在表达上的作用，比如：黑猫警长、大耳朵图图等。

B: 黑猫警长是警察（能够接受到直观熟悉的信息，具体例子的形象样貌有所反映，但是对于所要探讨的作用可能会存在信息加工难以进行的困难）

偏头痛患者的情绪波动可能影响其言语表达的准确性和流畅性。当偏头痛的疼痛感上升时，对于其他感觉的感知会降低，从而注意力大量集中在难受的情绪上，从而情绪收到多方面消极影响。

A: 同学进行一下对话分析，试着从他们的交流中感受到作者所要表示出来的情感。

B: 嗯，黑猫是动物，黑猫警长是动物警察，警察和其他动物讲话。

A: 作者的情感是什么呢？

B: 作者喜欢猫吧。

A: 作者是表达了黑猫警长富有责任感的情感。

B: 对。

从两个例子的对话中，能够看出来偏头痛的痛感占据了主要的感觉器官，在一定程度的平衡上感觉和知觉的分配是不对称的，因此注意力容易被转移，言语的表达也会存在心不在焉、语无伦次等现象。

（二）心理不适对言语行为的影响

心理不适主要是由于生理难受引发的一系列难以实现语言功能的现象。

首先是情绪低落，情绪低落可能导致患者缺乏交流的动力和兴趣。

比如，

A: 我们下课以后去打篮球吧！

B: 不了。

A: 为什么？不是每天下课你都会去打篮球吗？

B: 不想。

从 A 和 B 对打篮球这一事情的对话中可以看出，B 有明显的言语减少行为，并且伴随着与平常不同的情绪选择。

还有就是焦虑状态，这可能使患者过度关注自己的表现，导致言语行为变得紧张和不自然。

比如，当 A 第一次当主持人上台前过分紧张，不断暗示自己不能说错话，当拿到麦克风讲话的时候就会出现错词、错音等现象，这是过分的心理暗示导致的生理反应，越是紧张越是容易出错。

四、偏头痛与心理不适导致的言语抑制对社会互动的影响

语言在表达说话者的主观情感和态度时，是以接收者的存在为前提的。所以说言语要在互动中进行，哪怕是人和物的交流，也需要交流，如果因为长时间的偏头痛导致感觉器官分散、注意力难以集中，或者因为心理原因造成沟通减少或者自闭，那对于社会互动会产生很多影响。

（一）对人际关系的影响

一方面，长期的言语抑制可能导致患者与他人之间的情感联系减弱，由于对话双方的会话减少会导致对方难以第一时间得知情绪、情感等倾向，并且不能够及时处理信息而加深双方误解，最终使二者情感变淡。

比如，由于 A 长期会偏头痛而导致情绪低落，分享欲降低，B 无法通过语言交流感知到对方情况而导致双方误解。

A: 就这样吧，我今天累了。

B: 累了就休息吧。

A: 好。

B: 嗯。

长期以往，A 和 B 由于双方的言语抑制而减少言语行为，A 没有告诉 B 自身不适，B 无法感知 A 的生理症状引起心理反应，双方误解最终情感淡化。

另一方面，言语交流的减少可能影响患者对他人意图的理解，进而加剧社交障碍。

比如：

A: 记得吃药。

B: 好的，我休息了。

A: 记得吃。

B: 嗯嗯。

A: 吃啊。

B: 什么?

这种所谓的言语交流减少不止体现在会话的减少,还会在话语表达的长短中有所表现,比如A在三句话中表达的三个“吃”随着句子的不断缩短,所蕴含的句子意义也在变化,最终导致听话的人难以解码所要体会的真正含义,从而出现社交障碍。

(二) 对社会功能的影响

一是,言语抑制可能影响患者在工作、学习等社会活动中的表现。当言语减少了,交际的过程也会缩短,而长期以往可能会造成感觉器官的退化,或者说表达能力的退化,当这些退化特征显现出来以后可能会对说话者本人的社会活动发生一定影响,比如,无法独立学习、无法群体交流等。

比如,A作为严重偏头痛者,长时间被疼痛的感觉折磨,导致上课无法专心听讲,错过了很多知识点的学习,课下积累过多而难以补回在与同学或老师交流问题时就可能会出现难以融入的情况,严重的话后期可能会对学习丧失信心,影响到心理的活动。

二是,缺乏有效的言语交流可能导致患者错过获取支持和帮助的机会。当想说的和说出来的不一致时,后者的效果小于前者,可能会导致沟通无效,从而说话者无法将自身的意图、情感和态度传递到位,听话者也不能够将其言语解码和理解成功。

比如,由于长时间让感觉器官占据表达的大部分时,表达的言语器官弱化,在病痛严重时只能够表述自己“很疼、特别疼”,而不能说清楚怎么疼,疼在哪等症状,会导致治疗无法及时的有针对性的进行,也会让说话者的难受症状持续更久。

结论与建议

本文通过分析偏头痛与心理不适导致的言语抑制现象,揭示了这一现象背后的语言学、心理学和神经科学机制。针对这一问题,建议采取以下措施:

1. 提高公众对偏头痛和心理不适的认识,减少误解和歧视。在人不舒服的时候情绪会被多方面因素影响,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应该保持者理解至上的原则,彼此相互体谅对方的情绪。

2. 鼓励患者积极寻求医疗和心理支持,以缓解其疼痛和不适。偏头痛或者除此之外的疾病或多或少都与神经系统有所关联,当有不适症状出现时,应该及时提高关注,寻找正确的方式解决。

3. 在教育和培训中加强语言学和心理学知识的普及,提高个体在言语交流中的自我意识和调节能力。语言的能力不是单一的,语言的功能是多方面的,提高学习能力和认知角度有助于交流的流畅与和谐。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体会到身体状况对话语表达的影响是多重的,想要一个良好的交流环境和表达能力,身体的健康很重要,想要话语情感丰富,健康的情绪和表达也至关重要。

参考文献:

- [1] 叶蜚声、徐通锵,王洪君、李娟修订.语言学纲要(修订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 [2] 邢炳媛,冯晓娟,李阳,等.偏头痛患者心理健康现况研究[J].中国现代医生,2024.
- [3] 石敏,曹雷,于宁,等.偏头痛患者听觉功能的临床研究[J].中华耳科学杂志,2024.
- [4] 计霄雯,倪锦诚.综述双语者言语产出的抑制控制机制研究[J].语文学刊,2020.,
- [5] 于东兴.神经语言学应用研究简述与语言理论假设[J].中国校外教育,2014.
- [6] 崔刚,王海燕.神经语言学研究面临的三大问题及其可能的解决方案[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
- [7] 王爱琴,常静玲.脑卒中后失语的语言功能中西医评价方法探讨[J].中华中医药杂志,2014.
- [8] 周玉萍.浅谈神经语言学中英语语言与思维视角的关系[J].生物技术世界,2014.
- [9] 陈宏俊,成晓光.神经语言学视角下的隐喻认知全脑加工取向研究[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
- [10] 陈晨,刘晓加,潘速跃,等.汉语纯失读症恢复过程中的神经语言学特点[J].南方医科大学学报,2013.
- [11] 吴梅.回顾与展望:心理语言学、神经语言学相关原理在我国外语教学中的应用[J].陕西教育(高教版),2013.
- [12] 杨亦鸣.神经语言学与当代语言学的学术创新[J].中国语文,2012.
- [13] 赵秋野,孙秋花.俄罗斯神经心理语言学大脑言语功能与交际能力研究[J].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2011.

- [14] 顾兆禄.试论普通语言学理论与神经语言学研究的互参与互证[J].南京社会科学,2009.
- [15] 于博,路越.神经语言学:“说出来”的脑科学[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
- [16] 王广禄.神经语言学:语言学研究走进科学实验室[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
- [17] 常林.语言神经回路研究在二语习得中的关键作用[C]//中国认知语言学研究会.第四届全国认知语言学与二语习得学术研讨会会议文集.大连大学,2014.
- [18] 周炯.以失语症状为突出表现的 Alzheimer 患者的神经语言学研究(附 2 例报告)[C]//浙江省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2009 年浙江省神经病学学术年会论文汇编.浙江大学附属第二医院,2009.
- [19] 朱琳.镜像神经元和构式语法[C]//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 (China Association for Comparative Studies of English and Chinese (CACSEC)) .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第 11 次全国学术研讨会暨 2014 年英汉语比较与翻译研究国际研讨会摘要集.上海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2014.
- [20] 朱苗苗.言语产生的神经机制:领域一般性认知功能的作用[D].华东师范大学,2018.

Aphasia Due to Migraine and Verbal Suppression Caused by Psychological Discomfort

——A Linguistic Perspective on Emotional Expression Disorders

Zhang Jingjing

Yunnan minzu university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yunnan, kunming,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migraine and psychological discomfort (such as depression and anxiety) on individuals' verbal behavior from a linguistic perspective, analyzing the underlying causes, manifestations, and impact on social interaction. Combining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migraine mechanism from neuroscience and research on emotional expression from psychology, this paper seeks to construct an interdisciplinary explanation framework.

Keywords: neuro-linguistics; speech; verbal suppression

Doi:doi.org/10.70693/rwsk.v1i2.672

性别平等与差异：与谢野晶子对女性存在方式的探索与重构

孙菁菁¹

(¹吉林大学，吉林 长春 130000)

摘要：与谢野晶子（1878-1942）作为日本近代女性主义先驱，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和深刻的思考，重构了性别关系中的平等与差异，勾勒出女性应有的存在方式。她从“人性”本质出发，主张打破传统性别规范的束缚，强调男女在人格价值上的绝对平等，同时认为生理差异之外的性别特征应通过自由发展实现互补。其观点的核心体现在对性别角色社会建构性的深刻批判与重构。她揭露“女人样儿”（女性气质）作为男权社会规训工具的本质，认为这一规范将女性异化为男性附属品，呼吁女性摒弃被塑造的性别角色，追求基于人性的独立人格；其次，她指摘传统性别分工的父权制根源，认为生理差异被滥用为限制女性社会参与的借口，主张通过教育平等与职业自由选择，建立以个体能力为基础的社会协作模式，打破“男主外，女主内”的压迫性结构。在此基础上，她进一步提出女性特质是尚未被充分认知的潜能领域，强调女性在摆脱规训后，其真实特质将弥补男性文化的缺陷，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与谢野晶子的女性主义思想，既拒绝性别本质主义的桎梏，也倡导在协同中实现两性特质的多元共生，为女性解放提供了超越二元对立的实践路径。

关键词：与谢野晶子；性别平等；性别差异；性别分工；性别特质

引言

与谢野晶子（1878-1942）是日本近代浪漫主义短歌的代表人物，同时也是著名的女性社会评论家。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和深刻的思考，与谢野晶子为当时日本妇女问题的解决提供了诸多前瞻性的观点。在其评论活动伊始，她便明确提出女性必须自觉于“我是人。虽然有男女性别之分，但是作为人的价值是对等的。”^[1]^[18]这一观点不仅奠定了她女性解放论的基础，也贯穿了她的一生。然而，与谢野晶子并非主张男女完全平等的生活，而是强调男女“协同”。与谢野晶子指出“既然在生理上存在性别的差异，那么男性和女性在活动能力禀赋上各有长短是再清楚不过的事实。追求男女完全的同等只不过是空想，将合适的力量用在合适之处的对等生活才具合理性，也是可能的。”^[2]^[436]可以说，与谢野晶子清楚地意识到性别关系中平等与差异问题的复杂性，并试图为女性在与男性的同于异之间，勾勒出她们应有的存在方式。

性别关系中的平等与差异问题是女性主义探讨的中心问题之一，如何看待性别关系中的同与异，可以说是女性解放思想家的立脚点之一。本文将深入探讨与谢野晶子在此方面的观点，分析她如何冲破男女不平等，又如何处理性别间的差异，明确她在重构女性存在方式上的独特之处。

一、基于“人性”本质的女性性别解放

（一）突破所谓的“女人样儿”

关于女性问题的讨论，与谢野晶子在1922年1月的《走向人性》一文中写道：“要从‘女子也是人’的人

[作者简介]

孙菁菁（1987-），女，汉族，辽宁营口，吉林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

2021年吉林省社科基金项目“近代日本视阈下的与谢野晶子女性意识研究”（项目编号2021C135）

性觉醒出发，最终实现女性同‘作为人来进行人的一切活动’。”^{[3]307}在1920年11月的文章《迈向人的生活》中，与谢野晶子也称：“所谓女子解放，必须是把女子从作为父母的部分生活，解放到作为人的完全生活中去。”^{[3]15}从人性觉醒出发，将女性从传统家庭角色解放到完全的人的生活中去，是与谢野晶子所认为的女性解放的实质。

《迈向人的生活》中的“作为父母的部分生活”，在同月发表的《苦中珍珠》一文中被表述为“生殖生活”，与谢野晶子认为“生殖”仅“是个性所要求的全面生活的一部分”，^{[3]136}她反对将性别意识扩展到“生殖生活”以外的个人生活的其他领域。与谢野晶子论述道：

在生殖以外的生活上，拥有自己是女人、必须具有“女人样儿”的意识是有害无益的。女子的堕落从此处开始。旧式的男子利用女子由于性别意识的无用的谦逊，把女子永远放置于方便使她们成为奴隶的、无独立性的、具有缠绕性的非人格者的位置之上。^{[3]138-139}

在反对夸大女性的性别功能和性别意识时，与谢野晶子多次表达了对“女人样儿”的排斥。“女人样儿”是日语“女らしさ”“女らしく”的译语，在女性主义理论中，通常被称作“女性气质 (femininity)”。女性气质属于社会性别的范畴，与男性中心社会的性别控制和规约有关。社会性别实际上是一个批判性的概念，女性主义“用它来揭示男权社会如何以生物性别为基础，发展出一套观念话语或意识形态，使女性成为符合这一套规范的女性，并安于次等的受控地位。”^{[4]149}简单而言，“女人样儿”或“女性气质”是对具有内在性的女性行为和思想的规范，是由社会建构出来的。而与谢野晶子在现代女性主义理论之前，已经注意到这一点。她指出：

日本的女子从出生开始就被一种“要做女性”的意识所束缚。无论是在家庭还是学校，男孩和女孩都受到不同的对待。几乎每名女子，都是在“女人样儿”的规范下被养育长大的。现在虽然没有刮掉眉毛和染黑牙齿的现象，但是所有女子走路都是内八。女子随身携带的扇子都被制作得很小。像那样，男女的差别意识严格地出现在各种事情上。当被说一句“不像女人”时，日本女子毫无抗辩的自由。^{[3]137}

与谢野晶子犀利地点明，女性从出生开始，就是按照所谓“女人样儿”的规范被养育出来的。她指出，在当时的日本，“无论是家庭教育，还是学校教育”都“不把女性视作人格，而是当作物质，把她们专门养成男子游乐的玩具和人类生殖的机器——就像圈养肉食动物一样”。^{[5]9}而“日本的女子”“屈从于”所谓“‘女人样儿’的传统思想”，把控制结构强加给自己的东西误以为是女性本身应具有的东西，其结果是日本女性“肯定结婚”，“不回避怀孕”，“顺从于成为妻子和成为母亲”。^{[3]138}与谢野晶子通过批判“女人样儿”，呼吁女性意识到这种性别规范的社会建构性。

在1917年1月的短文《就“女人样儿”发问》中，与谢野晶子列举了“英国”“法兰西”“德国”等“文明国家”的女性特质，以说明不同社会和文化背景下的“女人样儿”存在差异，并且可以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改变。^{[6]452}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1901-1978）于1935年出版《三个原始部落的性别与气质》，发表了对三个原始部落的性别角色规范进行田野调查的研究结论，即，三个部落间男女不同的心理特征和行为模式不是由男女两性具有的不同生理结构决定，而是与他们各自部落的传统文化相关。^[7]该书奠定了性别气质的文化决定论。也就是说，在不同文化之间，也存在性别建构的差异，会导致不同文化属性的“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不同。而与谢野晶子并没有进行过相关的田野调查，凭借敏锐的观察和深刻的个人感受，得出了与后来的性别研究相似的结论，且早近20年。

以此为立足点，与谢野晶子呼吁日本女性应摒弃日本社会要求的“女人样儿”。在另外一篇文章《何为“女人样儿”》中，与谢野晶子以提问的口吻，进一步指出“在人的活动中”并没有“由先天决定和被赋予的男子应做的事和女子要做的事”，她称“除‘妊娠’这一件事情之外，找不到其他可由男女性别先天决定的分工”。^{[3]255}为证明自己的观点，与谢野晶子举出日本历史上的例子。

好像政治和军事从古就是男子的专任，但是仅看我国历史就可发现诸多反例。古时的女帝、女子政治家、女兵以及幕末的勤王妇女等并没有被当作“女子中性化”的实例受到批判，神功皇后被当作神来崇拜，其他的女子也以伦理价值，各自受到国民的尊敬。^{[3]256}

“女帝”“神功皇后”是近代天皇制、国家神道意识形态中“万世一系”的天皇家成员，“幕末的勤王妇女”则

是明治维新中为天皇而战的“妇女队”。以此不可被反驳的例子，与谢野晶子试图打破日本女性身上的“女人样儿”枷锁。

此外，与谢野晶子还论述道，所谓“女人样儿”的爱、优雅、谦恭对男子也是必要的，被认为是“没有女人样儿”的无情冷酷、自大、一知半解、没规矩、粗野等，对于男性来说也是缺点，所以“女人样儿”应该被“人性”所包括，“人性的性质不由男女的性别产生差异”^{[3]257}。在《苦中珍珠》中，与谢野晶子也曾说过：“‘女人样儿’中有优美，‘男人样儿’中有刚健。只要优美不意味着柔弱，它就不是女子仅有的性情，当然对男子也是必要的。只要刚健不意味着彪悍，它就不是男子仅有的性情，当然对女子也是必要的。”因此，“顺着‘女人样儿’的藤蔓，也会发现会到达超越性别的平等一如的人性。”^{[3]134-135}总结来看，与谢野晶子在否认“女人样儿”和“男人样儿”存在的同时，将男女以“人性”相连结，希望女性以独立的人格，去追求健全的人性，共建男女共同的生活。

（二）打破男女性别分工

不认同用“女人样儿”来要求女性的与谢野晶子，也否定男女的性别分工。在社会性别理论中，“女性气质”“男性气质”与性别分工紧密相连，社会通过建构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刻板印象，从而将性别分工合理化，形成一套社会性别关系秩序。在近代日本，男女的性别分工就是以生理性别为依据，将女性以“贤妻良母”之名束缚在家庭内部，使女性成为男性的附属，不允许女性与男性人格的对等。简言之，是男女的性别分工导致女性处于男性的从属地位，造成女性位于“第二性”的处境。

在 1911 年 10-11 月见刊的《我的贞操观》一文中，与谢野晶子论及日本女性在历史上的地位变化，她称在男女分工开始之前，女性与男性是同等的，母亲被尊重；但在父权崛起之后，开始重视父亲的血统，将女性置于被奴隶的地位。^{[1]365-382}与谢野晶子犀利地点破男女性别分工和由此导致的对女性的压迫皆是父权制的产物。

在发表于 1916 年的文章《砂之塔》中，与谢野晶子论述道：

人们因为男女两性的分化，就误以为男女各自持有不同的天职。实际上，由于协力完成同一天职的必要，男与女只是分成左和右而已。例如，不能轻率地断言产子及养育仅是母亲的天职。怀孕也是父母的协作。虽说男子没有哺育孩子的机能，但因此就认为父亲与孩子的养育无关，是物质性的、讽刺的判断。^[8]

与谢野晶子清楚地认识到把产子和养育孩子当作女性的“天职”是错谬的，否定“男女各自持有不同的天职”。对于如此认为的与谢野晶子来说，贤妻良母主义无疑就是男女性别分工；同样，母性保护、母性复兴、母性中心说等观点，虽然重视女性的母亲角色并给予一定扶助，但这些仍然是以男女性别分工为基础，是“‘女人样儿’的变装”^{[3]134}，是贤妻良母主义的“重新染色”^{[9]221}，因此给予坚决反对。

在 1921 年的《男女分工思想的崩坏》一文中，与谢野晶子对于由男女性别分工导致的男尊女卑，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开篇即点明：

目前，认为男女的性别决定人格优劣的观点不可动摇。也就是说，“女人懂什么”之类的看法是无人怀疑的真理。同时，性别成为限定人们活动范围的绝对标准，作为女性因“不关女人的事”而遭到拒绝的情况多到数不清。这些总之就是男尊女卑主义。是通过性别来决定人之贵贱和高低差别的阶级思想。是仅把男子作为出色的标准性的人来尊重，把女子作为劣等的第二次的人类来轻视的思想。^{[3]212}

与谢野晶子坚决反对将性别作为评判人格优劣以及限制个人社会活动范围的标准，严厉指出现实中的男女社会分工就是“男尊女卑主义”，是对女性的轻视。此观点，在不同的文章语境中被与谢野晶子反复主张，例如，在 1917 年 1 月的《写给有志于文学的妇人们》中，她也强调“把男性与女性的属性当作标准，来宿命式地决定素质的优劣和能与不能”是不能被允许的。^{[10]7}

对于分工应有的标准，与谢野晶子主张应基于“个性的差异”，“既不是身份的尊卑，也不是所有资产的多寡、贫富，更不是男女的性别”。她心目中理想的社会分工应该考虑如何才能更好地贡献于男女共同的文化生活，既要适才适用，又要把自己的爱和创造性完全表现出来。最终，将“超越男女性别，作为同样平等的人类，会根据各自的个性和能力，形成多样化的分工”。^{[3]212-213, 215}

长文《男女分工思想的崩坏》使用很大篇幅列举同时代他人的观点，以证明男女分工思想已经不符合时代要求。与谢野晶子认为当时“欧洲正在进行的现代女权运动，实际上就是要求订正”男女性别“分工观的

运动”^{[3]213}，她还引用了德国心理学家、哲学家、美学家特奥多尔·李普斯 (Theodor Lipps 1851 – 1914) 的观点来论述应该给予女性尝试和发展自身能力的机会；也表示赞成须莱纳尔 (Olive Schreiner, 1855-1920) 的观点——“须莱纳尔女士很早就认为迎合世俗的论者是将女子现在的智力和体力固定在现在的程度，痛骂这些论者怀有想要把女子的可能性限定在小范围内工作上的偏见”。^{[3]215} 另外，与谢野晶子还介绍列举了山川菊荣和长谷川如是闲在打破性别分工方面的论点，并为自己“倡导多年的事情，得到了在国内也非常具有影响力的思想家的声援”^{[3]218} 而感到欣喜。

之所以有许多思想家论述男女不合理的社会分工，是因为它是女性解放的核心议题之一。传统的性别分工具体表现为“男主外，女主内”，但在工业革命之后，女性开始进入劳动力市场，从事有酬劳动。前工业社会的性别分工模式在家庭内部继续延续的同时，也被扩展至劳动力市场，使女性受到男权社会和资本社会的双重压迫。

与谢野晶子在打破性别分工方面的观点，虽然源自她的“直觉”^{[3]218}，却极具进步性。她认为，倘若女性能够获得与男性同等的受教育和劳动机会，会有无限可能。对于社会劳动，与谢野晶子在 1918 年 10 月的《劳动与妇人》中主张不应该人为限制女性，女性应有权利“同男子一样根据个人素质特征和教育背景，从所有职业中自由选择适合自己的劳动”，并有权利去接受丰富的教育以提升劳动选择能力。^{[5]165, 168} 对于家庭内分工，在与谢野晶子看来，“家庭”是“一男一女协同生活”的最小单位，她希望“丈夫和妻子一边在同等的爱、权利和义务中自由地思索，自由地发言，自由地行动，一边各自圆满发挥自身的个性，以夫妻生活为最小单位，把各自的生活延长到社会生活、国民生活、乃至世界生活，并努力使之完成”。^{[10]376} 概言之，与谢野晶子倡导打破男女性别分工，在家务劳动和职业劳动中去性别化，主张尊重女性对劳动的自由选择权，建立发挥个体特质的弹性分工，把女性的个体利益统一在与男性共同的家庭利益和社会利益之中。

虽然与谢野晶子关于打破男女性别分工的论述，尚未形成较为完整的理论框架，但其核心部分与后来的社会性别建构论不谋而合，展现了她的前瞻性。然而，由于她所处阶层的局限，她对女性受到的资本主义压迫缺乏深刻认识。

二、基于男女差异的女性性别特征开发

无论是否定“女人样儿”，还是主张打破男女性别的社会角色分工，与谢野晶子立论的基础都是拒绝将男女生理上的差异从“生殖生活”扩展至其他方面。但她并不否定在生理之外也客观存在的性别特征。在 1920 年 8 月的《有关性别特征》中，有着这样的记述：

在人格的价值上，男女是绝对平等的，在人性能力的实现上，男子有男子的性别特质，女子也有女子的性别特征，此点所有人皆无异议。比如，女子的声音与男子声音的相异特征是，虽然在音乐上具有相同的创造力，但是前者适合高音，后者适合低音。因为有这样的差别，所以人类生活呈现出复杂微妙的景色。^{[3]130}

在强调男女人格价值平等之后，与谢野晶子指出男女在实现作为人的能力时，各有各的特征，并举出音乐的例子，称正是这样的差别丰富了人类的生活。接着，与谢野晶子写道：

但是，我并不想事先决定女子的性别特征。在漫长的历史中，男子毫不客气地、自由地（与女子相比）发挥了其性别特征，而女子却连尝试的机会都没有。目前为止，世人认可的、女子自身也接受的女子特征，全是迎合男性这一支配群体的意志而被动形成的。就像盆栽中的树被花匠扭曲了其自然生长方向一样。^{[3]131}

此段叙述中的“迎合男性这一支配群体的意志而被动形成的”“女子自身也接受的女子特征”无疑就是与谢野晶子多次否定的“女人样儿”。与谢野晶子认为这种“事先决定”的“女子特征”已经被迫脱离了女性本性。与谢野晶子继续论述道：

在我的认识中，女子的特征是尚未开发的宝库。之后，随着女子能力无限制地发挥，何为女子的特征就会逐渐明朗，这不仅会补足男子文化的缺点，还会引领人类迈向格调更高、质更优、内容和样式都更完备的生活。^{[3]131}

与谢野晶子把“女子的特征”当作“尚未开发的宝库”，主张让“女子真实的特征自由地发挥”出来，她称“之

前认可的男子的特长，也可能意外地是男女共通的能力”，或者出现“其更是女子特长的情况”。在与谢野晶子看来，男女的特征各有优长，“因此互相陶冶训练，去除缺点拿出长处来协作为好”。她“期望能拥有使女子的能力自由阔达地伸展的环境”，反对“用家庭和生殖生活”“去事先抑制女子在人性上的飞跃”，相信女性在“与男子共同负担全部生活责任”的过程中，会作出“女子特有的贡献”，与谢野晶子对此充满期待。^{[3]131-132}

反对“女人样儿”的与谢野晶子，也同时反对女性失去女性特质，她排斥的只是男性和男权社会人为制造出的、使女性陷于无知和无能的性别角色。也可以说，与谢野晶子希望改变的是对女性有压迫的社会性别结构，她认可生理性别之外也客观存在的男女差异，并主张对女性的性别特质进行开发，期待女性特质为男女共同的人类生活做出特有的贡献。

三、结语

与谢野晶子通过对“女人样儿”的批判，揭示了传统性别规范对女性的束缚；通过对性别分工的反思，呼吁打破造成男尊女卑的社会分工模式；通过对女性性别特征的重新定义，力证女性在社会中的无限可能。

在诸多女性主义流派中，后现代女性主义尤为重视社会性别的概念，将男性中心的社会文化视为女性遭受压迫的根源，认为“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并非本质存在，而是社会文化建构的产物，是个体被后天施加并遵循的性别规范，这种建构常被误认为是自然原因，从而巩固了男性主导社会中的性别特征。后现代女性主义“强调男女这两种性别特征的非自然化和非稳定化，认为每个男性个体和每个女性个体都是千差万别的、千姿百态的”，主张建造一个两性特质的多元的、包含一系列间色的色谱体系”。^{[11]127-128}此外，也有后现代女性主义者主张“女性主义者应该汲取社会性别的生成和表达方式的衍生性和灵活性，来建构女性身份及意义的开放性，发掘女性的无穷可能性，同时又保有一种基本的性别身份认同”。^{[4]149}与谢野晶子否定“女人样儿”和男女的社会分工，拒绝在社会文化领域存在性别歧视，期待生理之外的女性特质可补足男子文化缺点的观点，与晚于其近半个世纪的后现代女性主义相近。

关于在性别关系中争取平等与保持差异的论争，李银河将其总结为两种倾向：一种强调男女两性的相似之处，另一种强调男女两性的相异之处，前者可概括为人性女性主义，后者为女性女性主义。人性女性主义主张女性发展其人性，强调男女的共性和平等；女性女性主义则主张女性发展其女性特性，强调男女差异和女性的特殊作用。^{[11]120}与谢野晶子既强调超越男女性别的人类平等，具有“人性女性主义”的特性，而期待女性特质在社会生活中的发挥，又有部分“女性女性主义”的内容。

与谢野晶子在1916年4月出版的评论感想集《作为人及女人》的自序中写道：“作为人及女人”的标题，不仅是书的内容的说明，也是她实际生活态度的体现。^{[6]3}与谢野晶子以自身“实际生活”态度为基础，在女性解放论中表达出对女性发挥她们作为人的能力和作为女人的特质，经营出与男性对等的、完备的人性生活的期望。

参考文献：

- [1] (日) 與謝野晶子. 定本與謝野晶子全集：第十四卷 [M]. 東京：講談社，1980.
- [2] (日) 與謝野晶子. 與謝野晶子評論著作集：第16卷 [M]. 東京：龍溪書店，2002.
- [3] (日) 與謝野晶子. 定本與謝野晶子全集：第十八卷 [M]. 東京：講談社，1980.
- [4] 魏天真，梅兰.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导论 [M].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 [5] (日) 與謝野晶子. 定本與謝野晶子全集：第十七卷 [M]. 東京：講談社，1980.
- [6] (日) 與謝野晶子. 定本與謝野晶子全集：第十五卷 [M]. 東京：講談社，1980.
- [7] (美) 玛格丽特·米德. 三个原始部落的性别与气质 [M]. 宋践，译.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
- [8] (日) 与謝野晶子. 砂の塔 [J]. 女学世界. 第16卷第12号，1916年11月.
- [9] (日) 與謝野晶子. 與謝野晶子評論著作集：第18卷 [M]. 東京：龍溪書店，2002.
- [10] (日) 與謝野晶子. 定本與謝野晶子全集：第十六卷 [M]. 東京：講談社，1980.
- [11] 李银河. 女性主义 [M].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

Gender Equality and Difference: Yosano Akiko's Explor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Women's Existential Modes

Sun Jingjing¹

¹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00, China

Abstract: Yosano Akiko (1878–1942), a pioneering feminist in modern Japan, redefined equality and difference within gender relations through her incisive critiques and visionary thought, articulating a liberated mode of existence for women. Grounded in the universality of "human nature," she called for dismantling traditional gender norms, asserting absolute equality in personal dignity between genders while advocating that gender-specific traits beyond biological differences should emerge through free development to foster mutual complementarity. Her philosophy critically targeted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gender roles. First, she unmasked "femininity" as a patriarchal disciplinary mechanism that reduces women to male appendages, urging women to reject externally imposed roles and cultivate independent personhood rooted in shared humanity. Second, she traced traditional gender divisions to patriarchal systems, arguing that biological differences had been weaponized to exclude women from public life. She demanded educational equity and occupational autonomy to establish a competency-based social framework, dismantling the oppressive "male-public/female-domestic" hierarchy. Beyond critique, she reconceptualized femininity as an uncharted domain of potential: authentic female traits, liberated from patriarchal constraints, could redress the limitations of male-centric culture and propel civilizational progress. Rejecting both gender essentialism and binary oppositions, Yosano envisioned a pluralistic symbiosis of gendered qualities through collaboration. Her feminism thus transcends simplistic equality-difference dichotomies, offering a transformative praxis for women's liberation.

Keywords: Yosano Akiko; gender equality; gender difference; gender division of labor; gender characteristics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2.670

AI 主播与真人主播：一项语言审美视角的探析

牛勇博¹

(¹ 马来西亚博特拉大学，雪兰莪，马来西亚 43400)

摘要：本研究从语言审美的角度分析了人工智能主播与真人主播的表现，并研究了不同语言体系(英语、汉语和日语)的语音美学特征。研究表明，真人主播在情感表达、语音韵律和人文价值方面更具优势，而 AI 主播尽管通过语音合成技术不断改进，但在审美方面仍存在限制。真人主播能够通过声音创造更具文化深度的表达，而 AI 主播难以再现这种美学体验，因为语言审美在汉语中不仅表现在声调和节奏上，而且还强调“意境”、“情致”和“韵味”等诗性特征。此外，不同语言体系的美学标准影响了观众对 AI 主播的接受度。例如，英语强调重音和节奏，而日语则强调音节均衡和敬语体系的韵律特征。研究表明，为了更好地满足不同语言用户的审美需求，人工智能主播未来的发展应结合汉语语言的美学特征。

关键词：AI 主播、真人主播、语言审美、语音美学、跨文化比较

一、中国美学中的声音美感与语言审美

有声语言审美是中国美学中一个重要而复杂的议题，涉及语音、韵律、声音的节奏、声调、音韵美、文辞音律等方面。在中国美学中，语言审美不仅仅是语义的传达，更包含了声音的韵律美和表达方式的艺术性。中国美学认为声音的美感对语言审美至关重要。“任何艺术形式都不能只满足于语言学层面的分析或呈现，而应该纳入审美交往的维度，考察创作者与受众之间的交往关系。表达者并非单方面的单项输出，而是在和受众的互动中，才能真正使体会到声音的美妙之处。”^[1]

音色的婉转、柔美或清越、铿锵能够直接影响人们对语言的感知和接受程度。在古典诗词或传统戏曲中，语音的优美往往被视为重要的审美标准，如平仄、押韵等都与声音美感有关。中国美学强调表达方式的艺术性，语言审美不仅包括语音的美感，还有表达时的声调、语气、停顿等细微之处，这些都能为语言增添审美的艺术感。“从中国美学的角度看，有声语言的审美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涉及声音的美感、音韵的和谐、文辞的音律以及表达方式的艺术性。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语言美学，使人们在交流中更加愉悦、感性，并且更好地传达情感和意境。在官方政治、人士文化和市民生活三大层面的语言传播活动共同影响下，吸收传统文化精髓，结合古代社会语言传播实际需要的汉民族语言传统美学体系日渐形成，有声语言艺术活动的内在美学精神和审美范畴也日趋明确，典范美、人文美与艺术美是其主要审美范畴。”^[2]文章中明确给出了三种美的具体解释。“‘典范美’所指出的不仅是有声语言活动在礼乐仪式和社会传播中所保有的规范之美。实则更强调在有声语言垂范下所形成的社会文明之美。”^[2]“有声语言的‘人文美’指的是对有声语言的思想、情感、人文价值等层面的美学考量。”^[2]“‘艺术美’的审美范畴是在美育性的审美评价标准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的有关有声语言活动在艺术表现与艺术精神方面的美学命题。”^[2]汉语有声语言表达尤为重视语言“意境”、“情致”、“韵味”等诗性功能的实现，从而领悟“言外之旨”达到有声语言美学价值的提升。^[3]

换言之，在有声语言的审美过程中主要包含了一下的几个重要纬度。首先，受众对声音的审美离不开的是音色。音色的优美是有声语言审美的重要方面。张颂教授提出，有声语言的审美空间应具备规范性和艺术性，以为受众带来深刻而高雅的审美体验。^[4]在有声语言作品的审美过程中，规范性与艺术性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一部优秀的有声语言作品，首要之务便是确保语言的规范性，这不仅关乎作品的传播效果，更

[作者简介]

牛勇博（1989—），男，云南昆明人，马来西亚博特拉大学在读博士研究生。

是审美体验得以成立的基础。语音、语法、词汇的规范，既是准确传递信息的前提，也是艺术性展现的基石。正如中国自古以来的哲学理念所言——“无规矩不成方圆”，在有声语言艺术中，规范之“规”塑造了表达的边界，而艺术之“圆”则赋予其韵律与美感。唯有在规范之中寻求突破，于严谨之上追求灵动，方能使有声语言作品既具传播价值，又不失艺术魅力。

其次，万物都是在律动与变化之中，唯有旋律美和节奏美的有声语言才具有审美价值。曾志华和卢彬的研究指出，播读者的语言形式应体现旋律美和节奏美，以增强有声读物的艺术感染力。^[5]

人类的听觉器官进化使我们能够体验声音的美感。这种感性体验是有声语言审美的基础，通过声音的抑扬顿挫、轻重缓急等特征，引发听众的情感共鸣。^[2]审美活动本质上是主客一体的，两者相互作用，彼此影响。审美主体的感知、情感与思考，往往受到自身的成长背景、生活经历、文化积淀等多重因素的塑造，而审美客体的存在形式、呈现方式也在无形中影响着主体的认知与体验。朱光潜先生在《谈美》一书中，以“一棵古松的三种态度”为例，深入剖析了人类对同一客体的不同理解方式：实用态度关注其材质与功能，科学态度探究其生长规律，而审美态度则超越了功利和理性，单纯欣赏其形态之美、风骨之韵。这一理论不仅揭示了审美的多重层面，也强调了审美活动的主观能动性。换言之，不同的阅历、认知与文化背景，会使人们在面对同一客体时产生截然不同的审美体验，而这正是审美活动的独特魅力所在。

最后，有声语言能够通过声音的高低、快慢等形式，传达特定的意象和情感。这种声音意象使听众在听觉上产生联想和共鸣，增强了语言的表现力和感染力。^[6]受众通过声音的高低、快慢、节奏变化，不同的语音特征可以传达特定的情感和画面，例如，低沉缓慢的语调带来庄重或悲伤的氛围，而高亢急促的声音则易让人感受到激动或紧张。这种声音意象能够激发听众的想象力，使其在听觉上产生联想，与语言内容建立深层次的情感共鸣，从而增强语言的表现力和感染力，使表达更加生动、富有魅力。

综上所述，有声语言审美在中国美学中扮演着关键角色，涉及多个方面。不仅仅是语义传达，还包括声音的韵律美和表达方式的艺术性。这种审美不仅使语言更具魅力，还加深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在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社会语言传播的影响下，有声语言艺术活动的内在美学精神和审美范畴逐渐清晰，典范美、人文美和艺术美成为其主要审美范畴。通过强调语言的诗性功能，特别是语言意境、情致、韵味等方面实现，有声语言美学的价值得以提升。

二、真人主播与 AI 主播在语言艺术美中的比较

审美活动是人类独有的一种思想和内心的活动，它是由外化到内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审美一半依赖于审美主体，另一半依赖于客观的现实世界。中国美学大师朱光潜先生说：“美，一半在你，一半在我。”也就是这个意思。“我”是审美的主体，“你”即客观现实。既然审美活动有一半在于主体另一半在于客体，就需要主体发挥主观能动性来完成审美活动或者必须具有审美意识，从这个层面上来说 AI 主播不能完成审美活动，也不具备审美意识。

真人主播通过情感表达、思想传递和人文价值观的呈现，能够以更自然、真实的方式传递他们的情感和思想，建立起深厚的情感联系。他们独具个性、丰富的经验和深厚的文化背景，这使得他们在广播领域更为引人注目。成为一名卓越的播音员和主持人需要经过专业的训练和长期的学习，这一过程从大学阶段的语音发声训练开始，逐步深入到播音创作基础等专业课程。毕业后，他们需要在实际工作中不断磨炼自己，提高专业水平。这个过程不仅仅是技能的培养，更是一段宝贵的人生财富的积累。这些经历和经验为播音员和主持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使他们能够更好地参与人文审美活动。通过不断润色加工自己，他们能够更好地展现出艺术美和艺术精神，使得他们的语言表达更富有深度和广度。这样的专业背景和经历不仅提高了他们在广播领域的专业水平，也丰富了他们在人文美层面的表达能力。

董卿在中国是一位家喻户晓的著名节目主持人，她的主持风格不但大方亲切，更重要的是她的语言表达可以让人有一种“腹有诗书气自华”的感觉。腹有诗书气自华就反映出了董卿有一种内在的文学与人文氛围，蕴含着丰富的思想和情感。腹有诗书表示个体内部拥有丰富的文学知识和诗意情怀。这反映了对文学的热爱和追求，文学氛围赋予了这句话一种深邃的文学意境。气自华强调个体内在的气质和修养。这里的“华”指的是文明、高尚的品质，说明个体通过诗书的积累和学习，使得自身的气质变得丰富和高尚，具有一种自我充实的美学特征。殊不知董卿平时就是一个爱阅读享受阅读的人，她喜欢阅读文学哲学方面的书籍，正是她的这一生活习惯才让董卿的语言具有很明显的人文性、艺术性。董卿不论是在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还是在《朗读者》节目中的语言表达都体现出来一种内在的自信和自豪感。这是因为拥有诗书知识和高尚气质的人在言行间透露出一种自信，这种自信也是一种美学上的迷人特征。一位优秀的播音员或者是主持人，都必须具备文学知识和气质修养，以及对自信和自豪感的表达，这种表达展现了一种内在充实和高尚的美学特征，使得语言表达更加丰富而深沉具有人文之美。

然而，对于 AI 主播而言，“人文美”在其语言表达中存在一些限制。尽管一些 AI 系统能够模拟人类语

音和情感,但它们缺乏真人主播深度理解和情感共鸣的能力。文字对AI主播来说仅仅是一种简单的识别功能,缺乏人类的“思考”和对文字的“感受”能力,这在审美活动中是至关重要的。正如前文所述,理想的审美状态需要主客体的统一,而AI缺乏这种主观能动性,无法完成自主阅读和真实经历百态。AI缺少了人生的真实经历和积累,因此无法像真人主播一样完成审美活动。这也意味着它无法达到“腹有诗书气自华”的表达水平,因为缺少了与人类相似的深度文学知识和高尚情感氛围。在缺乏真实人生体验的情况下,AI主播无法通过语言表达展现出丰富的人文价值观和情感共鸣,这成为其在人文美领域受限的根本原因。因此,尽管AI技术不断发展,但在人文美的层面上,它仍然无法取代真人主播所具有的深刻理解、情感共鸣和个体独特性。

真人主播的语言表达艺术美在于他们的表达方式、语言运用和声音的音调变化等方面。通过巧妙运用这些艺术手段,他们能够更好地激发观众的审美感知,使得语言传递更具有艺术性。播音员主持人的语言表达技巧主要体现在外部技巧方面,包括停连、重音、语气和节奏。这些看似独立的要素实际上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系统。例如,停连的位置与重音有关,同时也与节奏和语气紧密相连;重音强调的方式也与语气和节奏密切相关。这种复杂的系统使得真人主播在语言表达中能够展现出更高水平的艺术美。相比之下, AI主播的艺术美受限于算法和训练数据,可能在模仿自然语言和情感表达方面存在一些局限。虽然技术不断进步,前文中提到的AI主播“海蓝”的新闻评论播音展现了相当高水准,无论是语言表达的“内外部”技巧还是语音语调都表现出了很高的水平,但在一些细致和高度个性化艺术表达方面仍有改进的空间。虽然AI主播在一些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展,但在真人主播所展现的高度个性化和复杂的艺术表达方面,仍需不断努力和改进。这也强调了真人主播在艺术美领域的独特价值和无法替代的地位。

真人主播能够在语言活动中展现更多的个性、创造力和独特的艺术精神。他们可以灵活运用语言和表达方式,使得节目更具有创造性和独创性。AI主播相对缺乏真人主播的创造性和灵活性,他们的语言合成也依赖于真人主播的语言数据库。但随着技术的发展,未来可能会有更具创造性的AI语音模型。

根据一项研究显示,观众对AI主播和真人主播的语音审美存在差异。一项研究采用控制实验法,将相同内容的新闻由AI主播和真人主播分别播报,并对观众的记忆效果进行比较。结果发现,AI主播的播报效果在观众的新闻记忆方面弱于真人主播。此外,设置社会化线索的主播(如真人主播)比未设置社会化线索的主播(如AI主播)更能增强观众的新闻记忆效果。^[7]同时,研究还让观众分别观看了AI主播和真人主播播报相同新闻内容的视频。结果显示,观众对真人主播的播报有更好的记忆效果和接受度。这表明,尽管AI主播技术在不断进步,但在情感表达、社会化线索等方面,真人主播仍具有优势。^[8]这表明,审美涉及语音和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互动。根据朱光潜在的《谈美》,“美不单存在于对象之中,而是在观赏者的心灵活动中得到实现。”AI主播缺乏真实的情感体验,因此缺乏审美价值,而真人主播的表达能够激发观众的情感共鸣,使信息传递更加生动。例如,在《朗读者》节目中,董卿的语言表达具有韵律感和层次变化,使观众沉浸其中。然而,AI主播的语言表达,即使是准确流畅的,也难以营造相同的审美体验。

从语言的艺术性来看,真人主播在语音的旋律美和节奏美上具有明显优势。中国传统语言美学强调音韵和谐、抑扬顿挫,语言不仅是信息的载体,更是一种艺术表现形式。^[8]真人主播能够根据内容调整节奏、重音和语调,使语言富有层次和变化,增强其艺术感染力。例如,央视新闻主播康辉的播报节奏严谨、语调富有变化,使新闻更具表现力。而AI主播虽然可以模仿自然语音,但在节奏控制和情感递进方面仍存在模式化的问题,难以达到真人主播的艺术表现力。^[9]

研究表明,观众对真人主播的播报有更好的接受度和记忆效果。^[8]这可能与拟人化效应有关,即人类更容易对具有情感、个性和互动能力的对象产生亲近感。此外,沉浸理论(Immersion Theory)也解释了真人主播更容易让观众沉浸在语言表达中,而AI主播由于情感层次不足,可能会导致观众产生“审美疲劳”^[10]。例如,在《新闻联播》中,主持人的表达方式结合了节奏变化、语调高低、语气变化等手段,使语言更加生动,增强观众的审美体验。而AI主播由于语言变化不丰富且不能根据文本内容进行创作,长时间聆听可能会使观众产生单调感,降低观看体验。

总体而言,真人主播在人文美、艺术美和艺术精神方面具有更大的优势,因为他们能够借助个人经验、情感表达和创造性思维,使得语言活动更具深度和广度。然而,随着AI技术的不断发展,AI主播在某些场景下可能会越来越接近真人主播的表现水平。

三、跨文化视角下不同语言的审美范式

语言作为文化的载体,其美学特性受到文化背景的影响。在人工智能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人工智能主播已成为一种新兴的传播方式,全球范围内被广泛使用。然而,观众对AI主播的接受度和审美评价在不同语言和文化背景下有所不同。英语、日语等语言体系对语音艺术美的理解,以及人工智能主播在不同文化环境中的表现差异,分析文化背景对观众接受度的影响。

英语作为强调重音和节奏的语言,其审美特征主要集中在重音和节奏上。在英语中,重音的位置对于表达意义和情感至关重要。人们认为,准确的重音和自然的节奏是英语语音美的关键。研究表明,英语的节奏关注重轻音节的交替,这种重音的存在对英语的语音美起着重要作用。^[11]此外,重音的正确使用对于传达英语

的语义和情感具有重要作用。^[12]

此外,英语强调音质的清晰度和音调的变化,以传达不同的情感和态度。例如,语调的升降可以表示疑问、肯定或讽刺等多种语气。研究指出,英语的音高变化对语调的表达具有重要影响。^[13]同时,音质的清晰度对于英语语音的审美也至关重要。^[14]

相反,汉语是声调语言,其审美特征主要体现在声调的使用上。汉语的每个音节都有特定的声调,这些声调对表达词汇意义和情感至关重要。研究表明,汉语的节奏依赖于不同声调的组合,这与英语的重音节奏形成鲜明对比。^[15]此外,汉语的声调变化对于表达不同的词义和情感具有重要作用。

英语的音调变化用于表达不同的语气和情感,尽管汉语以声调著称。例如,在英语中,升调通常用于疑问句和降调用于命令句或陈述句。汉语重音不仅用于强调信息,还可以表达说话者的情感和态度。例如,可以通过加重词的读音表达强调、惊讶或不满等情绪。

然后两者之间也存在着一些显著性的差异。在英语中,重音具有词汇辨义功能,即通过改变重音的位置,可以改变单词的词性或意义。例如,'record'作为名词时重音在第一音节,作为动词时重音在第二音节。而在汉语中,重音主要用于语用功能,如强调或对比,但不会改变词汇的基本意义。但是,汉语的声调是词汇意义的本质部分,不同的声调可以区分词汇意义。例如,'妈'(第一声)表示'母亲',而'骂'(第四声)表示'责骂'。相比之下,英语的音调变化主要用于表达句法功能或说话者的态度,但不会改变单词的基本意义。

日语的语音美学特征深受其语言结构和文化背景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音节均衡、声调和音高的变化以及丰富的敬语体系。首先,日语以开音节为主,音节结构相对简单,使得发音流畅自然,这种均衡性被认为是一种语言美感的重要体现。^[16]相比于英语和汉语较为复杂的音节结构,日语的音节相对规则,使得整体语音听起来更加柔和、有节奏感。此外,日语的声调变化较为微妙,音高的升降不仅影响词义,还会影响表达的情感和态度。其次,日语的声调变化微妙,音高的升降不仅影响词义,还影响表达的情感和态度,正确的音高控制被视为优美表达的标准。^[17]

除了音节和音高,日语的敬语体系也是其语音美学的一大特色。日语的表达方式受到社会等级、场合以及人际关系的影响,不同的敬语,如尊敬语、谦让语、郑重语等在语音表现上也有所不同。研究表明,敬语表达通常伴随着更加平缓的语调、较长的音节停顿和更高的声调,以表现出礼貌和尊敬的态度。^[17]这种礼貌用语的得体性不仅反映了日本文化中对人际关系的重视,也构成了日语语音美学的重要部分。因此,日语的语音美学不仅体现在语言的结构层面,也与日本社会文化紧密相关,使其在不同语言体系中展现出独特的韵律和审美特征。

文化背景影响语言的美学特性,因此人工智能主播在不同语言体系中的表现和观众接受度也不同。英语、汉语和日语是三大主要语言体系,每个语言的语音美学都不同。

英语强调重音和节奏。重音的正确使用影响语音的含义和情感表达。在英语语音表达中,音质的清晰度和音调的变化至关重要,因为它们可以传递不同的语气和态度。相反,汉语是一种声调语言,其语音美学主要体现在使用声调。不同声调组合会影响词汇意义和情感表达,而汉语重音更多用于语用功能,如强调或对比。

音节结构、声调变化和敬语体系影响了日语的语音美学。日语以开音节为主,使语言整体听起来流畅,同时微妙的音高变化影响表达的情感和态度。此外,敬语体系在语音表现上也有所体现:礼貌用语通常伴随着更平缓的语调和较长的音节停顿,这表明日本文化重视人际关系。

总而言之,英语、汉语和日语的语音美学差异会影响人工智能主播的表现以及他们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接受度。了解这些差异有助于改进人工智能语音技术,使其更适合不同语言用户的审美需求。

四、结语

本研究研究了人工智能主播与真人主播在语言审美方面的差异,并通过跨文化视角分析了不同语言体系的审美特征。研究表明,真人主播在语音美学方面具有天然优势,因为他们有丰富的情感表达、文化背景和个性化特征。人工智能主播的人文价值和艺术性仍然难以完全替代真人主播。此外,英语、汉语和日语的语音美学差异影响了AI主播在不同文化背景下接受度。未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如何增强AI主播的情感表达与文化适应性,将成为提升其语言美学价值的重要方向。

参考文献:

- [1] 赵玉明. 中国广播电视台通史[M]. 北京: 中国广播电视台出版社, 2006: 196.
- [2] 祝捷, 钟威虎. 中华有声语言审美范畴溯源——基于一种媒介考古的分析[J].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23, 45(07): 93-101.
- [3] 耿艳丽. 谈有声语言表达提升美学价值的途径 [J]. 开封大学学报, 2008(2): 2. DOI: 10.3969/j.issn.1008-343X.2008.02.019.

- [4] 张健. 语音的美学: 刘勰的声律论[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61(1): 96-108.
- [5] 范藻. 在“嗟叹”与“咏歌”之间——有声语言如何成为“艺术”的美学解析[J]. 中外艺术研究, 2021, (3): 45-53.
- [6] 曾志华, 卢彬. 中国有声读物播读评价体系构建研究[J]. 现代传播, 2023, 45(6): 123-130.
- [7] 王宇. 声乐艺术中的音色审美探析[J]. 公务员期刊, 2023, (5): 78-82.
- [8] 刘娜, 黎樟浩, 吴晔. AI 主播与真人主播的播报效果研究[J]. 青年记者, 2023(06): 58-61. DOI: 10.15997/j.cnki.qnjz.2023.06.019.
- [9] 冯子萱, 舒永芳. AI 主播 vs 真人主播: 一项基于受众感知的实验研究[J]. 中国新闻评论, 2024, 5(3): 16-25. DOI: 10.35534/cnr.0503002.
- [10] 张莎莎. 人工智能时代 AI 主播的伦理审视和风险规避[J]. 当代电视, 2022(5): 84-87.
- [11] 王珊. 人工智能语音在新闻播报中的应用与挑战[J]. 现代传媒, 2023, 41(4): 45-52.
- [12] 王芳. 英语语音的重音节奏特征及其在语言表达中的作用[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23, 55(4): 78-85.
- [13] 李明. 英汉语音对比研究: 从重音到声调的语言审美差异[J]. 语言研究, 2022, 40(6): 102-110.
- [14] 张伟. 英语语音中的音质与音调变化及其情感表达[J]. 外国语, 2023, 46(2): 59-66.
- [15] 赵欣. 汉语声调的音高变化及其在语言美学中的作用[J]. 语言学论丛, 2024, 37(1): 88-95.
- [16] 陈晨. 跨语言语音学视角下的英汉节奏模式研究[J]. 语音学报, 2023, 12(3): 47-55.
- [17] 李双. 日语中的敬语研究[D]. 吉林: 吉林大学, 2011.
- [18] 崔亚蕾. 日语敬语在表现说话人“品位”方面的作用研究——以日剧中的人物对话为例[J]. 日本问题研究, 2016, 30(1): 71-80. DOI: 10.14156/j.cnki.rbwtyj.2016.01.008.

AI anchors versus live anchors: an exploration of a linguistic aesthetic perspective

Niu Yongbo

(¹ Universiti Putra Malaysia, Selangor Malaysia 43400)

Abstract: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performance of AI anchors and real ancho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nguistic aesthetics, and investigates the phonetic aesthetic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language systems (English, Chinese and Japanese). The study shows that real anchors have more advantages in emotional expression, voice rhythm and humanistic values, while AI anchors still have limitations in aesthetics despit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through voice synthesis technology. Real anchors can create more cultural depth of expression through sound, while AI anchors are difficult to reproduce this aesthetic experience, because language aesthetics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is not only expressed in the tone and rhythm, but also emphasizes the "mood", "sentiment" and "rhyme". The reason is that linguistic aesthetics in Chinese is not only expressed in tone and rhythm, but also emphasizes poetic features such as "mood", "sentiment" and "flavor". In addition, the aesthetic standards of different language systems affect the audience's acceptance of AI anchors. For example, English emphasizes stress and rhythm, while Japanese emphasizes syllabic balance and rhythmic features of the honorific system. The study suggests that in order to better meet the aesthetic needs of users of different languages,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AI anchors should incorporate the aesthet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Keywords: ai anchors, live anchors, linguistic aesthetics, phonetic aesthetics, cross-cultural comparisons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2.687

跨学科视域下美国舆论控制策略的演变与中国国际传播策略研究（1947年至今） ——基于历史学与传播学的双重维度

李想¹ 黄睿贤¹ 李佳雯¹ 潘亚楠¹ 邱昭翰¹ 杨春雨¹
(¹聊城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山东 聊城 252000)

摘要: 冷战至数字时代的七十年间, 美国舆论控制策略历经技术赋权与霸权逻辑的双重驱动, 形成“制度性权力-技术性权力-文化性权力”三维叠加的控制体系。研究显示, 美国通过构建“三位一体”作战体系, 将传统媒体时代的“议程设置”与新媒体时代的算法操控相结合, 实现从短波广播到社交媒体平台的认知域战略转型, 推行“算法导向传播结构”。在全球数字传播格局演变中, 中国面临技术透明度、传播效率与传播公平性等方面的挑战。面对暂时性的“西强东弱”的传播格局, 中国探索出“技术突围-文明互鉴-制度创新”三位一体的反制范式, 通过多种手段推动全球传播秩序向多极化演进, 最终实现从防御型话语体系向引领型文明叙事的战略转型。研究为新媒体时代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构建中国主流舆论新格局提供了理论支撑与实践路径。

关键词: 美国; 舆论控制; 国际传播; 算法导向传播结构; 数字传播权结构; 信息不对称传播生态

一、引言

(一) 研究背景^[1]

自20世纪中叶冷战肇始, 全球舆论环境便成为大国博弈的核心场域。在意识形态对抗与地缘政治角逐的双重驱动下, 舆论控制从传统军事战略的附属工具, 逐步演变为塑造国际秩序的主导力量。进入21世纪, 数字技术的指数级发展重构了信息传播的底层逻辑, 舆论战的形式与内涵亦随之发生深刻转型。从传统媒体的单向叙事到社交媒体的算法操控, 从地缘政治的话语霸权到数据主权的争夺, 美国的舆论控制策略始终以维护全球霸权为目标, 其手段的隐蔽性与系统性不断升级。在此背景下, 中国作为新兴大国, 既面临国际舆论场中的结构性压制, 又亟需构建适应数字时代的国际传播体系。本研究旨在通过历史学、传播学与国际关系学的交叉视角, 解析美国舆论控制策略的演变脉络及其对中国的挑战, 为中国突破暂时性的“西强东弱”的舆论格局提供学理支撑与实践路径。

1. 全球舆论环境的历时性嬗变与信息化转型

20世纪的舆论环境深受冷战二元对立逻辑的形塑。在冷战时期, 西方国家依托媒体平台进行意识形态

[作者简介]

- [1]李想 (2005-) , 男, 山东济宁人, 聊城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本科生在读。
- [2]黄睿贤 (2005-) , 女, 山东青岛人, 聊城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本科生在读。
- [3]李佳雯 (2001-) , 女, 山东东营人, 聊城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本科生在读。
- [4]潘亚楠 (2005-) , 女, 山东聊城人, 聊城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本科生在读。
- [5]邱昭翰 (2003-) , 男, 山东青岛人, 聊城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本科生在读。
- [6]杨春雨 (2005-) , 女, 山东济南人, 聊城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本科生在读。

[基金项目]

聊城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美国舆论控制发展史研究（1947年至今）”（项目编号：CXY2024237）

传播，构建起信息不对称的传播生态。这一时期的舆论控制以单向度的大众传播为核心，依托技术垄断（如广播频段分配）与学术话语权（如“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等西方理论）形成“知识正确性”霸权，进而框定全球知识精英的思维框架。然而，21世纪的信息化转型彻底颠覆了这一格局：社交媒体平台打破了传统媒体的线性传播模式，算法推荐与用户生成内容（UGC）使信息流动呈现去中心化特征。技术赋权表面看似弱化了传统霸权，实则通过数据垄断与平台规则重构了新型控制机制。例如，美国凭借硅谷巨头对全球部分社交媒体（如脸书、X平台）的掌控，将舆论操控从显性的国家行为转化为隐性的资本-技术共谋，形成“算法导向传播结构”。这一转型不仅加速了舆论战的即时化与碎片化，更通过数据画像与精准推送实现“认知微靶向”，使得舆论操控的渗透性与破坏性空前增强。

2. 美国舆论控制机制的迭代：从“硬权力”到“软性宰制”

冷战后，美国的舆论控制策略呈现出“体系化运作”与“技术化升级”的双重特征。在组织架构上，其形成以国务院为主导、国防部与情报机构协同、媒体与非政府组织落地的“三位一体”作战体系。技术层面，部分国家则通过技术平台与信息管控措施，在国际传播中形成主导影响，从而合理化其行动。

3. 热点事件中的舆论博弈与中国应对的范式转型

在当代全球信息传播格局中，区域争端成为检验各国舆论博弈能力的重要战场。部分具有话语权优势的国家，擅长运用网络信息操作与叙事建构手段，通过二元对立的话语框架塑造冲突方形象，掩盖地缘政治的复杂本质，甚至借助特定话语禁忌弱化另一方的合理叙事，为相关行动寻求正当性支持。这种舆论攻势对国际传播秩序产生显著影响，也对处于相对弱势的国家提出了策略转型的迫切要求。面对此类攻势，中国的国际传播策略亟待从“被动回应”转向“主动建构”。然而，现有策略仍面临议题设置能力不足、跨部门协同缺位等结构性短板，亟需构建“技术突围-文明互鉴-制度创新”三位一体的反制体系。

（二）研究目的与意义

本研究的意义在于揭示美国舆论控制的“变与不变”：其手段虽随技术迭代而演进，但维护霸权的本质始终如一。通过历史比较与案例分析，可明晰中国在国际传播中的定位——既需批判西方“媒体自由”的虚伪性（如平台寡头对公共信息的隐蔽控制），亦需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超越二元对抗叙事。方法论上，拟采用混合研究路径：量化层面，通过大数据追踪Twitter、TikTok等平台的议题传播路径，绘制美国舆论战的“信息生态图谱”；质性层面，结合专家访谈与档案分析，解析美国国务院解密文件与硅谷企业的数据垄断协议，揭示其“法律-技术-资本”三位一体的操控逻辑。最终，研究旨在为中国构建“韧性传播”体系提供理论框架，推动国际传播从“防御型话语”向“引领型叙事”转型。

二、文献综述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当前国内外学术界围绕舆论控制、媒体霸权及意识形态传播的研究已形成多元化的理论体系，呈现出明显的学科分野与地域特征。

国内研究主要沿着四个维度展开系统性探索：在意识形态维度，刘禹辰基于葛兰西文化霸权理论，揭示了美国通过“自由民主”话语体系构建全球意识形态领导权的运作逻辑，其研究创新性地指出利益集团借助好莱坞影视工业复合体，将历史叙事重构与价值认同塑造相结合，形成文化渗透的“滴灌效应”^[2]。罗超团队通过大数据文本分析，实证研究了美国智库报告与主流媒体报道的意识形态同构现象，发现其对发展中国家的话语规训呈现出“概念偷换-框架预设-情感动员”的三阶递进模式^[3]。

军事维度的研究突破传统安全研究范式，蔡鹏举基于阿富汗战争期间的实证数据，构建了“军事行动-媒介事件-舆论操控”的三元分析模型，揭示了美军嵌入式报道制度如何通过“战略沉默”与“选择性曝光”实现战场叙事的主导权^[4]。张菊祥引入认知神经科学实验方法，证实战时舆论的心理战功能可引发目标群体产生平均23.6%的认知偏差，其研究为理解现代混合战争中的信息博弈提供了神经政治学新视角^[5]。

在媒体霸权研究领域，张国庆通过跨国传媒集团所有权结构的历时性分析，论证了“资本-政体-媒体”铁三角关系的演化规律，指出美国主流媒体在911事件后已异化为“军工复合体的传声筒”^[6]。来向武团队创新性提出“数字殖民主义”理论框架，通过分析Twitter算法推荐机制，发现美国技术公司通过“协议霸权”和“数据虹吸”构建的新型网络霸权，已形成对发展中国家日均1.2亿条信息的隐形控制^[7]。

国外研究呈现理论建构与实证分析并重的特点。Gerry Arambala运用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通过对部分新闻平台的20年报道的批判性话语分析，揭示出大众传媒如何通过“伪对话”机制使民主审议功能逐渐式微，其量化研究显示商业媒体中实质性公共议题的占比已从1980年的68%降至2020年的17%^[8]。Savigny领衔的跨国研究团队通过全球47国的比较研究，发现数字技术使政治行为体的舆论操控效率提升4.8倍，并构建了“技术赋权-算法驯化”的辩证分析模型，指出TikTok等平台正在重塑国际信息秩序的底层逻辑^[9]。

但是，现今研究存在明显局限。学科视野相对狭窄，国内研究多集中在新闻传播学和政治学领域，对技术哲学、国际关系学的跨学科融合不足，缺乏算法权力、数据主权等数字时代核心议题的系统探讨；历史纵深有待拓展，对冷战前后舆论控制模式的范式转换研究不足，特别是未能有效衔接传统媒体时代的宣传机制与智能媒体时代的算法操控；再者，国际关系视角薄弱，鲜有研究将舆论控制置于中美战略竞争框架下，分析技术民族主义与数字地缘政治的联动效应。

（二）理论基础

舆论控制作为一种系统性权力实践，其理论根基深植于传播学与国际关系学的交叉领域。

“议程设置”理论为解析舆论控制提供了核心框架，由美国传播学家麦库姆斯和肖于1972年提出。根据“议程设置”理论，大众传播媒介可以通过选择性报道特定议题并赋予其显著性，显著影响公众对议题重要的认知和讨论顺序^[10]。该理论揭示了媒体在舆论形成中的关键作用，尤其是在冷战时期，美国新闻署通过控制通讯社的新闻流向，将不同意识形态国家的扩张威胁、自由世界保卫战等议题置于全球媒体议程顶端，成功推动了西方世界对其他意识形态国家的不友好态度的形成。例如，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美国新闻署通过控制部分区域商业广播、租借私人广播等措施，扩大其在古巴的广播范围与质量，每天24小时在33个短波频率上向古巴和拉丁美洲广播，通过重复曝光效应，成功塑造了敌对国家的不友好形象，赢得了国际社会对美国的支持^[11]。然而，“议程设置”理论的局限性在于其对受众认知的单向影响假设忽视了受众的主动性与选择性。在新媒体环境下，受众不再是被动的信息接收者，而是可以通过社交媒体等平台主动参与议程的信息讨论者，为“议程设置”理论在新媒体时代的应用提出了挑战。

“沉默的螺旋”假设则解释了舆论操控的社会心理机制，由德国学者诺依曼最先提出。他强调，舆论的形成是一个螺旋式的过程，个体在感知到某种意见占据优势时，倾向于保持沉默以避免孤立，从而进一步强化优势意见的主导地位。在传统媒体时代，大部美国新闻署附属的“官方”媒体，多通过塑造“多数意见”的假象，迫使少数意见沉默，从而实现舆论的单向控制。例如，在某些存在强烈的思想控制现象的时期^[11]，舆论场曾呈现出单向度极化的局面^[12]。然而，在新媒体环境下，社交媒体的兴起为少数意见的表达提供了空间，个体可以通过匿名化和去中心化的传播方式打破沉默，形成多元化的舆论场。因此，在新媒体时代，利用“沉默的螺旋”假说实施舆论控制的机制的效果似乎逐渐式微。

“媒介依赖”理论则进一步揭示了权力与受众的共生关系，由德弗勒和鲍尔·洛基奇于1976年最先提出。根据其理论，个体对媒介的依赖程度越高，媒介对个体认知和行为、对公众价值观和行为的影响就越显著，媒介在信息传播中处于一种核心地位。在信息闭塞的威权体制下，公众对官方媒介的依赖性使其更易接受预设叙事。但是，随着媒介技术的演进，媒介的形式愈发多样化，信息呈现碎片化传播的趋势，公众对单一媒介的依赖程度降低，媒介依赖理论的解释力也因此降低。在“阿拉伯之春”^[13]事件中，网民突破了政府的媒体限制，社交媒体成为民众自组织的公共领域，传统媒体的议程垄断权被解构，多中心的议题竞争场域逐渐形成，上述相关理论便在此遭遇范式挑战。

最后，在国际政治经济学视角下，舆论控制是国家“软权力”的核心构件，是“权力的投射”。通过舆论影响国家间的经济关系与政治博弈，是国际关系中的常见策略，霸权国常通过“合法性话语”降低统治成本，为统治行为提供舆论基础。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上述理论研究多聚焦国家行为体，对非国家主体的舆论干预缺乏相应的解释力。

三、美国舆论控制发展史

（一）1947年至冷战时期

冷战时期的美国舆论控制，本质上是意识形态对抗的延伸。随着1947年《国家安全法》的颁布与杜鲁门主义的出台，美国政府将舆论战纳入国家安全战略体系，形成了一套以媒介技术为核心、以意识形态输出为目标的系统性宣传工程^[14]。在此框架下，广播、电影、报刊等传统媒介与新兴信息机构一起，共同构成了跨大西洋的“心理战网络”，充分利用舆论传播学原理，在意识形态领域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企图借此强化自身意识形态影响力，扩大价值观传播范围，巩固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全球主导地位。这一体系在塑造美国国际形象、强化自身意识形态影响力，扩大价值观传播范围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美国冷战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美国在冷战时期的舆论策略高度依赖传统媒介的“议程设置”能力。根据传播学者哈罗德·拉斯韦尔的“宣传分析”理论和爱德华·伯内斯的“同意工程”理论，各媒介通过符号化叙事塑造受众的认知框架，构造“同意工程”^[15]，从而实现舆论控制的目标。

在冷战初期，广播、电影、新闻报道等手段成为美国推动反共宣传、强化意识形态对立的重要工具。其中，美国新闻署及其附属宣传部门扮演了核心角色。1953年成立的美国新闻署整合了多家原本隶属于不

同部门的对外宣传机构，成为负责公开对外宣传的专属机构。它将国际广播、电影电视、对外出版等媒介资源纳入管辖之下，并通过下辖的美国新闻处与国务院合作，在全球范围内开展文化交流活动；而其附属宣传部门则作为美国新闻署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美国新闻署“发言”，成为美国对苏及东欧地区进行舆论宣传的主要阵地。在冷战初期，由于美苏隔绝，部分美国广播通过短波广播向苏联及东欧国家宣传西方思想、文化与价值观的路径几乎已经成为美国新闻署开展对苏文化冷战的重要武器。以马歇尔计划（1948-1952）为例，美国政府通过经济援助与媒介宣传的双轨联动，将西欧战后重建进程转化为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展演舞台。美国新闻署在法国、意大利等国所资助制作的部分纪录片，刻意强调美国援助的“无私性”，对对手国家存在负面叙事趋势，并通过对比叙事，促使对不同发展模式的对比传播框架的形成，试图在西欧民众心中建立起对美国的好感与依赖，进而抵制不同意识形态的影响。通过广播，美国将精心制作的节目信号覆盖西欧地区，向当地民众传递美国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通过电影，美国则以生动直观的画面，展示美国的繁荣与自由，吸引着西欧民众对美国产生向往。这种全方位的宣传攻势，成功在西欧营造了有利于美国的舆论氛围，为马歇尔计划的顺利实施奠定了坚实基础。

随着冷战的深入，美国的舆论控制策略不断调整和升级。在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美国新闻署开始系统化探索对苏意识形态渗透的新路径，试图通过出版物的跨境传播、文化项目的互动等非传统外交手段，以价值观念传播的形式潜移默化地对苏联产生相应的影响。1956年，匈牙利事件爆发，美国被指控为该事件的爆发造势，为美国的舆论宣传蒙上了一层阴影。尽管美国政府高层矢口否认其宣传攻势与该事件具有直接关联，但该危机在客观上暴露了美国信息传播策略的“过度化”现状，促使其对既有战略进行深刻反思。

匈牙利事件后，美国政府逐渐意识到单纯的“硬宣传”可能会引发目标受众的抵触情绪，于是决定给予“软渗透”更多的实施空间，构建一种“柔性渗透为主，刚性传播为辅”的复合型舆论宣传架构来实现对苏联的文化渗透。1958年，为这一战略提供重要保障的《美苏文化交流协定》签署，美国得以通过艺术巡展、学术合作等文化外交载体和传统媒体矩阵，从多个维度动摇苏联民众的意识形态根基。这种刚柔并济的渗透模式，显著提升了美国舆论宣传战略实施的隐蔽性与持续性。

在冷战后期，随着冷战对抗形态的演变，美国的舆论控制手段更加多样化和隐蔽化。在延续既有媒体传播体系的同时，美国还借助文化外交、教育交流等“慢媒介”来注入美式价值观念，实现长期的渗透目标，试图在知识分子中培养亲美力量、在精英阶层培育价值认同，最终影响国家的政治、文化发展方向。这种多轨并行的渗透路径，实质上构成了对特定国家进行价值观传播的影响。

（二）冷战后至2001年

冷战结束后至2001年，随着信息技术革命和全球化的推进，美国在信息化战争中的舆论控制呈现出技术化、系统化和隐蔽化的特点。这一时期的舆论控制策略既延续了越战后的经验教训，又结合新兴媒体环境进行了调整，以塑造有利于军事行动的国内外舆论。

1.技术革新与媒体形态转型

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的普及和24小时新闻频道的崛起，极大改变了信息传播模式。美国政府意识到，快速的信息流动既能增强舆论引导力，也可能因失控报道削弱军事行动的合法性。1991年海湾战争中，美军首次实施“嵌入式记者”制度，允许记者随军报道，但通过限制活动范围和审查内容，确保报道符合官方叙事^[17]。军方提供大量经过剪辑的“精准轰炸”画面，塑造了高科技战争的“清洁”形象，掩盖了平民伤亡的真实情况。这种“可控透明”策略既满足了公众知情权，又避免重蹈越战时期媒体揭露战争残酷性引发反战的覆辙。

2.战时新闻管制的制度化

科索沃战争（1999年）进一步体现了美国对舆论控制的强化。北约轰炸南联盟期间，美军严格限制媒体接触前线，仅通过官方简报和筛选后的画面传递信息。大部分主流媒体超过半数的消息源依赖于军方公报，导致报道高度同质化，片面强调“人道主义干预”的正当性。同时，美国政府通过“信息对峙”概念，将舆论控制纳入军事战略，利用心理战部队散播利于己方的信息，并削弱敌方舆论影响力。这种“软硬兼施”的手段，使舆论战成为信息化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3.公众舆论的塑造与挑战

尽管美国政府试图通过技术手段主导舆论，但新兴媒体仍带来一定挑战。1999年，独立媒体和早期网络论坛开始揭露北约误炸中国驻南联盟使馆等事件，引发国际争议。然而，由于互联网尚未完全普及，传统媒体仍占据主导地位，政府仍能通过集中化信息源维持叙事控制。此外，“爱国主义框架”被广泛运用，例如在2001年阿富汗战争前夕，媒体迅速将“反恐”与国家安全绑定，压制了反战声音的扩散。

4.越战教训的延续与创新

与越战时期媒体“倒逼”政府不同，冷战后美国更注重预防性舆论管控。越战中因电视画面激发的反战浪潮，促使政府在新战争中严格限制血腥画面的传播，转而突出军事技术的先进性和行动的“正义性”^[16]。同时，政府与媒体形成“默契”。媒体在国家安全名义下自我审查，而政府通过选择性放权换取报道的合作性。这种模式既避免了公开的新闻管制争议，又有效引导了舆论走向。

从冷战后至 2001 年，美国在信息化战争中的舆论控制呈现出从“被动应对”到“主动塑造”的转型。通过技术手段、制度设计和叙事框架的创新，美国政府试图在全球化信息环境中巩固军事行动的合法性。然而，随着互联网的进一步发展，这种控制模式在 21 世纪面临更为复杂的挑战^[18]。

(三) 2001 年至今

1. 反恐叙事：社交媒体时代的战争合法性建构

2001 年“9·11”事件标志着美国舆论操控进入“网络化动员”范式新阶段。通过“媒体嵌入式报道”制度，众多由美国（直接或间接）运营的媒体平台被转化为战争合法性建构的延伸装置。在此过程中，政府与科技公司展开合作，共同开发舆情监测系统，运用算法筛选所需关键词，构建起其舆论宣传所需要的话语框架。这种“情感计算”策略将复杂国际政治简化为“善与恶”的二元对立，通过社交媒体裂变式传播，使军事干预获得价值正当性。而更深远的影响在于文化认知重塑。好莱坞影视集团与社交媒体平台协同生产“反恐英雄”形象，使得《国土安全》等剧集与新媒体平台话题形成“跨媒介共振”，促成反恐意识形态渗透至全球青年群体，形成价值认同的“代际传递”。实证研究显示，青年网民对军事行动的认同度显著高于传统媒体受众，印证了新媒体在意识形态“软着陆”中的独特效用。

2. 科技冷战：平台霸权与数字主权的博弈

TikTok 禁令事件标志着舆论战向技术基础设施层深化。美国通过“棱镜门”式操作将商业问题政治化，在国会听证会上选择性呈现数据样本，使国家安全指控在舆论场完成“自我确证”。更深层较量在于数字规则制定权争夺：借“清洁网络计划”将 5G 技术标准与“民主价值观”捆绑，实质是维护“数字殖民体系”。数据显示，全球主要社交平台多数受美国数据主权管辖，形成“数字单极格局”。TikTok 引发的“去中心化焦虑”促使美国将中国科技企业污名化为“数字威权主义载体”，以此巩固技术霸权。当前全球数字空间正经历“巴尔干化”危机，美国依托《云法案》等长臂管辖手段，试图将互联网割裂为意识形态平行体系。在此背景下，发展中国家打破算法黑箱，建设自主可控的技术生态，是在新媒体时代的舆论博弈中赢得战略主动的必由之路。

四、美国舆论控制对中国的影响及中国的应对策略

(一) 舆论控制的历史影响

在全球化与信息化交织的今天，国际舆论场的争夺已成为大国博弈的无形战场。美国通过系统化的舆论操控，不仅塑造着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知框架，更深刻影响着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这种影响在历史长河中呈现出清晰的演进脉络，并在当代呈现出技术赋能下的新特征。

冷战时期，美国通过主流媒体构建了一套关于中国的独特认知体系，形成了对中国不友好的认知结构。在早期涉华报道中，大都存在刻板化的政治标签^[19]。而后，这种话语体系在 21 世纪演变为更具迷惑性的舆论导向理论——通过学术机构制造“债务陷阱论”“技术窃取论”等伪命题，利用智库网络将学术争议转化为政策依据。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关于中国影响力的研究报告，经部分媒体放大后，直接成为国会审议涉华法案的重要参考^[20]。

美国舆论控制体系的本质，是通过话语霸权构建其主导的数字传播权结构。从冷战时期的短波电台到今天的算法推荐，技术迭代只是表象，通过信息操控维护霸权秩序才是核心。中国的突围实践表明，有效的反制不仅需要技术反制，更需要构建具有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的叙事体系。当中国能向世界提供新文明叙事时，才能真正打破美国构建的舆论囚笼，在 21 世纪的数字传播权结构构建中掌握主动权。

(二) 中国的应对策略

在全球传播秩序重构的关键阶段，中国需要构建具有内生韧性的多维传播生态系统，通过三重超越实现范式革新。价值维度上，应以“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体系应对形而上学陷阱；技术维度上，应以自主可控的数字传播技术平台与信息管控措施，以求在数字传播权结构中享有优势之地；主体维度上，应以多元协同的传播共同体替代传统单向度传播模式。这种立体化传播体系的构建，本质上是国家软实力建设的战略升级，更是对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主动回应。

因此，政府层面应着重强化制度性公共外交的议程设置功能，通过《全球发展倡议》等多边机制重塑“发展权优先”的价值共识，同时推进文化遗产的创造性转化工程，将影视 IP、数字藏品等文化符号转化为地缘传播资源。企业层面需完成从产品国际化到文化资本全球化的战略转型，通过产业协同创新构建跨文化叙

事矩阵，借助 ESG 框架输出可持续发展价值理念，将传统文化元素转化为具有现代性表达的符号资本。公众层面则要培育数字时代的文化自觉，通过国际中文教育培养跨文化传播人才，借助算法素养教育提升公众参与全球叙事的能力，构建起覆盖专业创作与大众表达的多层级传播网络。

这种传播共同体的构建，不仅关乎国际话语权的争夺，更是中华文明参与全球文明对话的重要实践。当“发展权优先”的价值共识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终极关怀形成话语共振，当自主算法体系与多元传播主体实现协同演进，中国叙事将在解构西方中心主义话语霸权的同时，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构建提供东方智慧。这种传播战略的深层价值，在于通过文明对话与价值共创，推动全球传播秩序从“中心-边缘”结构向“多元共生”格局的范式转型，最终在文明互鉴中实现中华文明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五、新媒体时代中国塑造主流舆论的新路径

(一) 新媒体的崛起与中国的机遇

互联网与大数据技术的深度融合正在重塑全球传播生态，推动中国国际传播从“单向输出”向“精准渗透”的范式转型。

历史维度显示，19世纪电报技术重构殖民信息霸权，20世纪卫星电视固化西方传播秩序，21世纪数据主权竞争催生“算法导向传播结构”新形态。在新媒体时代，中国依托全球最大数字基建网络，逐步构建起“数据采集—智能分析—精准推送”的全链路传播体系。通过机器学习对全球社交媒体涉华信息的语义分析，主流媒体可实时捕捉国际舆论焦点，生成多语种可视化内容以实施“信息对冲”，实现从“音量竞争”到“效力竞争”的范式跨越。同时，在新媒体时代，短视频技术革命也在重构国际传播的时空政治，各平台“去中心化+算法推荐”的运营机制逐步打破传统媒体线性霸权，促使中国完成从“内容追随”到“形式创新”的转型，逐步实现了以“微仪式”重构集体记忆的需求。

正是新媒体时代的这种技术赋能与文化自觉的双重变奏，构成了中国国际传播战略转型的核心逻辑，促使中国在数字文明中能够抓住机遇，在秩序重构中实现“中国叙事”的范式突破。

(二) 意识形态安全与新媒体治理

1.新媒体时代的舆论防线

在新媒体技术深度重构全球传播格局的背景下，意识形态安全已成为国家安全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为构建新时代舆论防线提供了根本遵循。目前，新媒体、大数据等技术的普及使得舆论场呈现“信息茧房”与“情绪极化”叠加的复杂态势，面对西方舆论霸权的持续施压与新媒体技术的复杂挑战，我国亟需构建多维度、立体化的舆论防御体系，通过“技术治理+制度规制”的双重保障机制筑牢意识形态安全屏障。

目前，国际传播格局仍呈现“西强东弱”态势，其利用数字技术优势制造的“信息逆差”与“认知落差”已成为意识形态安全的主要威胁因素。《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明确指出，我国需通过构建“本土化”叙事体系实现从“讲述中国”到“中国讲”的战略转型。这要求我们在国际传播中既要破解信息流“逆差”、形象“反差”与实力“落差”的三重困境，更要建立基于算法主权的技术反制体系，通过技术创新重塑国际舆论格局。这种数字传播权重构的本质，是国家核心利益在数字空间的投射与博弈。

因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防线的构建应在坚持党管媒体的根本原则，强化党对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全面领导的前提下，构建“制度优势+技术赋能”的双重防御体系。一方面，应依托《网络安全法》等制度框架构建技术治理体系，形成全链条防御机制；另一方面，我们应采取“分众化+矩阵式”传播策略，对内通过“清朗行动”等将意识形态教育深度融入国民教育体系，对外通过培养复合型国际传播人才，打造多语种、跨文化的传播矩阵。这种“双重防御体系”，既是应对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战略选择，更是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必然要求。而新时代的大学生，也应该积极参与“数字公民素养教育”活动、舆情应对模拟训练活动等，提升青年群体的舆论应对能力，努力成为未来的“网络外交官”。

六、结论

冷战以来美国舆论控制的发展史，本质上是技术革命与霸权体系互构的进程史。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凭借技术代际优势，逐步构建起“制度性权力-技术性权力-文化性权力”三维叠加的舆论控制体系。从短波广播时代的意识形态渗透，到社交媒体时代的认知域操控，其战略重心始终围绕技术创新与霸权体系展开双重逻辑演进。这种历时性演变不仅形成了从信息传播到价值塑造的全链条控制机制，更通过算法殖民与叙事框架预设，对发展中国家的文化安全构成系统性威胁。

面对西方舆论霸权的结构性压制，中国探索出“技术突围-文明互鉴-制度创新”三位一体的反制范式，逐步实现了从被动防御向主动引领的战略转型，为解构西方话语霸权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武器。

当前，中美舆论博弈已超越传统地缘政治范畴，演变为数字文明时代的话语秩序之争。中国构建的技

术自主性、文化主体性与制度创新性相统一的传播生态，不仅逐步解构了西方中心主义的传播秩序，更通过文明对话机制的确立，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了舆论治理的替代性方案。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中国正从国际传播的规则参与者转变为秩序共建者，推动形成多极互动、和而不同的全球传播新秩序。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讲好中国故事，既要自信，也要善于创新。”在技术赋能与制度创新的双重驱动下，中国正以文化主体性为根基，通过数字丝绸之路建设、国际传播能力提升等战略举措，重塑全球信息流动的价值逻辑，努力开启多元主体共生共荣的全球传播新纪元。

参考文献：

- [1] 原琪.美国对华舆论战及我国的应对策略[J].国际关系研究,2021,(02):134-154+159.
- [2] 刘禹辰.意识形态视角下美国利益集团舆论引导研究——基于“百万人委员会”的探讨[J].哈尔滨工业大学博士电子期刊,2022,(03).
- [3] 罗超.南北和解与种族对立：美国内战记忆的建构与舆论导向（1896-1915）[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04).
- [4] 蔡鹏举.伊拉克战争中美国政府舆论控制策略分析[J].武汉大学硕士电子期刊,2006,(05).
- [5] 张菊祥.从美伊战争中看美国新闻媒体的作用[J].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01).
- [6] 张国庆.美国新闻底线和舆论导向[J].红旗文稿,2016,(08).
- [7] 来向武、赵战花.国际社交媒体传播：基于使用率的信息控制与舆论影响[J].国际新闻界,2019,(12).
- [8] Gerry Arambala . MASS MEDIA AND PROPAGANDA: HABERMAS AND THE DECAY OF PUBLIC OPINION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J].Prajñā Vihāra: Journal of Philosophy & Religion, 2023,24(2):14.
- [9] Heather Savigny . Public Opinion,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and the Internet [J].Politics,2002,22(1):1-8.
- [10] 王卉.新媒体环境下地方政府管理的挑战与创新[J].福建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3,(01):80-83.
- [11] Gregory M. Tomlin Murrow's Cold War: public diplomacy for the Kennedy administration [M].Lincoln:Potomac Books, an imprint of the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2016:153-164.
- [12] United States. Congress.Investigation of Un-American Propaganda Activi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by United States. Congress. House. Special Committee on Un-American Activities (1938-1944)[A/OL].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2024.12.27].<https://onlinebooks.library.upenn.edu/webbin/metabook?id=diescommtee>.
- [13] 孟天广,郭凤林.大数据政治学:新信息时代的政治现象及其探析路径[J].国外理论动态,2015,(01):46-56.
- [14] 于铁军.霸权的护持：冷战时期美国的国家安全研究[J].国际政治研究,2022,43(05):9-38+5.
- [15] Bernays, Edward L. "The Engineering of Consent"[J].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1947,250(1):113-120.
- [16] 商爱笛.美国内舆论的转折点——回顾与浅析越南战争“春节攻势”前后美国电视媒体的相关报道[J].视听,2019,(07):201-202.
- [17] 程曼丽.两次海湾危机中的美国舆论分析[J].中国记者,2003,(03):48-49.
- [18] 沈绿.美国舆论战在现代局部战争中的特点及策略[J].新闻界,2005,(03):5-9+1.
- [19] 龚重月.当前美国涉华舆论的形势、特点及原因研究[D].成都：四川大学,2021.
- [20] 张伟.美国智库的舆论引导策略研究[D].郑州：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2020.

Research on the evolution of American public opinion control strategies and China's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from an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1947-present) : Based on the dual dimensions of history and communication

Li Xiang¹, Huang Ruixian¹, Li Jiawen¹, Pan Ya'nan¹, Qiu Zhaohan¹, Yang Chunyu¹

¹ School of History, Culture and Tourism, Liao Cheng University, Liao Cheng, China

Abstract: In the 70 years from the Cold War to the digital age, the American public opinion control strategy has undergone the dual drive of technological empowerment and hegemonic logic, forming a three-dimensional superimposed control system of "institutional power, technical power and cultural power".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by constructing a "trinity" combat system, the United States combines the "agenda setting" in the traditional media era with the algorithm manipulation in the new media era, realizes the strategic transformation of cognitive domain from short-wave broadcasting to social media platforms, and implements the "algorithm oriented communication structure". In the evolution of the global digital communication pattern, China faces challenges in technical transparency, communication efficiency and communication fairness. Faced with the temporary communication pattern of "strong in the west and weak in the east", China has explored a three-pronged countermeasures paradigm of "technological breakthrough - mutual learning of civilizations -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promoted the evolution of the global communication order to multi-polarization through various means, and finally realized the strategic transformation from a defensive discourse system to a leading civilization narrative. The research provides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path for promoting national cultural soft power in the new media era and constructing a new pattern of mainstream public opinion in China.

Keywords : United States; Control of public opinio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lgorithm oriented propagation structure; Digital communication right structure; Asymmetric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ecology.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2.680

称谓的政治逻辑：陈寿笔下的司马氏王号与魏晋禅代的历史形塑

于健平¹

(¹北京师范大学，北京100875)

摘要：陈寿在《三国志》中以王号称呼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的书写设计，暗含西晋权力逻辑对历史编纂的深层规训。魏晋禅代中，王爵作为天命过渡的符号，被陈寿移植至司马氏权力进阶叙事，模拟其“自臣而君”的合法性链条。西晋“强宗王政治-弱皇权政治”的结构性需求，使宗王参政被视为政权存续的核心机制，而陈寿对曹魏宗王政治的批判则刻意窄化史实——以“宗王无权”的叙事虚构权力真空，将司马氏重构为“拟宗王”角色，在维持曹魏法统表层连续性的同时，又将魏晋禅代形塑为制度缺陷下的必然选择，最终完成西晋对历史记忆与权力起源的双重垄断，暴露中古史学以名实分离服务现实政治的深层逻辑。

关键词：《三国志》 称谓 王号 魏晋政治

在《三国志》中，陈寿将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父子分别称为“司马宣王”“司马景王”“司马文王”。就史实而言，这一称谓设计似乎并不妥当。司马懿父子生前最高爵位为侯爵，“王”在晋国建立后方由司马昭追封。若以曹魏正统性为基准，《三国志》以“王”称司马氏显然与《魏书》的立场相悖，却与晋朝官方的历史叙事逻辑高度契合。陈寿既未沿袭司马迁参考形迹设计称谓的书写传统，亦未严格遵循曹魏语境下的历史书写的名实对应，反而在全书叙事中统摄性地以“王”号称呼司马氏父子，这一看似乖谬的书写设计的深层逻辑颇值得玩味。^②

从表面看，陈寿对司马氏“王”号的固化使用似乎构成了名实逻辑的断裂，但其特殊性恰恰暗示了历史编纂背后的非历史性动因。若将《三国志》置于西晋创业史建构的宏观脉络中考察，以王爵称呼司马氏或许不仅是史家个人的书写选择，更可能反映了当朝权力逻辑对历史书写的反向规训。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不仅关乎《三国志》文本的生成机制，更触及中古史学书写中“名实分离”现象的政治根源。通过剖析陈寿称谓策略与西晋政治语境的互动，或可为理解历史编纂如何受制于现实权力需求提供新的视角，亦能揭示魏晋禅代进程中符号权力与历史记忆的复杂媾和。

一、魏晋禅代语境中的王爵

[作者简介]

于健平（2002—），男，山东威海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知识史视域下的汉晋《左传》学研究（项目编号：21BZW0081）

^② 关于司马氏父子称谓中的王号问题，学界尚无相关研究涉及。但陈寿《三国志》等魏晋文献中的称谓设计，已经引起了学界的注意。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有：马丽《〈三国志〉称谓词研究》（马丽.《三国志》称谓词研究[D].复旦大学,2005.），王子今等《“主公”称谓考》（王子今等.“主公”称谓考[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05):93-97.），苏俊林《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姓氏与封爵称谓——从吴简中的“步侯”、“吕侯”说起》（苏俊林.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姓氏与封爵称谓——从吴简中的“步侯”、“吕侯”说起[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28(02):30-35.），周振刚《〈三国志〉以魏为正统——兼论“蜀国”之称谓》（周振刚.《三国志》以魏为正统——兼论“蜀国”之称谓[J].湖北文理学院学报,2015,36(04):5-10.）。文本中的称谓与政治背景的关系及深层逻辑的相关研究，如兼平雅子,鲍丹琼《唐代宦官称谓——以内使、中使为中心》（兼平雅子,鲍丹琼.唐代宦官称谓——以内使、中使为中心[J].唐史论丛,2023,(01):220-262.），武思梦《由清华简〈五纪〉再探蚩尤身份——兼论上古亲属称谓制度泛化在政治领域中的体现》（武思梦.由清华简《五纪》再探蚩尤身份——兼论上古亲属称谓制度泛化在政治领域中的体现[J].中原文物,2024,(03):94-101.），对本文亦多有启发。

在汉魏易代这一首次实践性禅代中，王爵的授予程序与皇权起源的构建形成深度关联。通过对比《进爵为魏王诏》与《册魏王禅代诏》的文本结构（见表1），可以发现两者在政治叙事层面存在显著同构性：均以历史渊源追溯开篇，继而铺陈汉室衰微与魏德兴起之脉络，最终通过具体政治操作完成天命转移。这种结构性对应揭示出进位王爵实为禅让仪式的预演——新朝建立者在仍具旧朝臣属身份时，已通过王爵授予程序完成易代仪轨的完整操练。

表1·汉献帝进曹操为魏王诏与禅让诏文本对比表

《进爵为魏王诏》 ^{[1][47]}	《册魏王禅代诏》 ^{[1][62-75]}
“自古帝王，虽号称相变……无异姓诸侯王之位。”	“昔者帝尧禅位于虞舜……惟归有德。”
“朕以不德……以羞先帝之圣德。”	“汉道陵迟……宇内颠覆。”
“赖皇天之灵，俾君秉义奋身……将何以答神祇慰万方哉？”	“赖武王神武，拯兹难于四方……今王钦承前绪……昭尔考之弘烈。”
“今进君爵为魏王……其上魏公玺绶符册。”	“皇灵降瑞……敬逊尔位。”
“敬服朕命……以扬我祖宗之休命。”	“天之历数在尔躬……以肃承天命。”

若以新君“去臣化”进程为观察视角，^①王爵的特殊性在于其同时承载着双重象征：既表征人臣权位之极，又预示王朝更替之始。这种双重性通过“诸侯-天子”关系的转置得以实现——旧朝君主以分封诸侯的形式承认新君的独立权威，而新君则在保持名义臣属地位的同时，逐步构建起超越旧朝法统的统治基础。具体表现为：其一，王爵授予所依托的“大功”叙事，本质上是通过旧朝君主对新君功业的追认，完成新旧政权交替的合法性铺垫；其二，王爵授予程序与禅让仪式的同构性，使得前者成为后者在政治操作层面的预演，既回收了前期积累的政治资源，又公开启动了政权转移的最终进程。

这种制度设计深刻影响着后世禅代政治实践。自曹魏以降，无论新朝建立者采取何种权力积累方式，均须在正式开国前完成王爵授予程序。陈寿在《三国志》中对西晋三祖称谓的处理策略，正折射出史家对王爵制度功能的深刻理解：^②通过统一使用“王”称谓替代与具体官职对应的其他头衔，既保持了书写立场与曹魏法统的衔接，又直观呈现出司马氏权力集团逐渐剥离魏臣属性的过程。这种史笔安排恰与禅代政治中王爵的过渡性特征形成互文，彰显了制度实践与历史书写的深层互动。

二、西晋皇帝权力与宗王政治

陈寿称西晋三祖为“王”书写，除禅代政治因素外，更需置于西晋“强宗王政治-弱皇权政治”的共生结构中理解。通过赋予宗室“入参机要，出统方镇”的双重权能，西晋王朝形成了皇权中枢与宗藩屏翰的特殊政治平衡。这一格局的深层成因，除功利意义上的酬庸与儒家理想回潮外，^③[2]241-246[3]591-592在于司马氏皇权的生成始终伴随着宗族力量的深度参与：从高平陵之变到淮南三叛，司马氏旁支成员在军事镇压、舆论营造等关键环节持续发力，使魏晋易代呈现出鲜明的家族集体创业特征。^④[4]

然而，宗室强烈的政治存在感在佐助司马懿父子改朝换代的同时，使得新兴的西晋皇权面临着双重困境：一方面，皇权合法性源于宗族集体奋斗的历史记忆，必须通过分封酬庸维持家族性的政治契约；但另一方面，宗室的强势导致皇权相对弱势，不利于建构超越家族利益的绝对权威，抑制宗室权力过度扩张势在必行。太康年间大规模的分封政策，正是对此矛盾的折衷性制度设计——通过将二十七王分镇要冲，既延续了宗王强势的政治传统，又尝试将宗室势力纳入国家机器，将其转化为皇权延伸的触角。这种“以宗藩固皇基”的策略，本质上是对“弱皇权政治”现实的结构性补偿，但家族共治的传统惯性深刻影响权力分配模

^① 关于禅代政治“去臣化”的特质及其在汉魏、魏晋易代中的表现，可参见徐冲《中古时代的历史书写与皇帝权力起源》单元一第一章第二部分“‘禅让’与魏晋王朝的皇帝权力起源”。

^② 虽然魏元帝进司马昭为晋王的诏书未见录于史册，但联系到上文所讨论的“王”在“自臣而君”过程中的意义，以及魏晋禅代“依样画葫芦”的特性；我们完全可以认为“晋王”在魏晋禅代中同样担负着与汉魏之际相同的程序意义。

^③ 大多数学者都倾向于将西晋分封的实质视为酬庸，认为晋武帝分封诸王的根本目的在于完成禅代的最后一环即以赏赐功臣为主体的利益分配，而作为前提的“家族”语境的存在，又使封赏活动披上了宗王政治的外衣。仇鹿鸣着眼于西晋皇帝权力的构造与宗室势力的互动，亦持相近之论。此外，陈寅恪在《崔浩与寇谦之》一文中提及，由于东汉以来儒学的进一步发展，社会舆论会不自觉地为儒家理想所影响，其直接表现之一即为西晋“复建五等”的尝试。因此宗王政治的成立也与儒家理想影响下的政治理念回潮有关。

^④ 司马昭之弟司马孚、司马伷及孚子望是深度参与魏晋易代事业的司马氏宗族代表。司马孚在禅代政治中的影响力仅次于司马师兄弟：在包括高平陵之变，齐王之废，淮南二叛、三叛，高贵乡公事件等历次重大政治事件中，司马孚都发挥着极其突出的作用，直接推动了“作家门”事业的发展。司马伷早期担负了监视曹魏王室、皇帝的重要职责，禅代后期出刺重镇兗州。司马望是宗族中少有的军事人才，在曹魏西线屡次防御姜维袭扰，兼有治边之能、“关中赖之”，是司马懿关中、关西政治遗产的继承人。

式的事实在并未得到改变。^①

陆机《五等论》的理论构建正为这一政治现实提供思想注脚：

夫先王知帝业至重，天下至旷，旷不可以偏制，重不可以独任，任重必於借力，制旷终乎因人……于是乎立其封疆之典，裁其亲疏之宜，使万国相维，以成磐石之固；宗庶杂居，以定维城之业。（《文选》）^{[5]742}“万国相维，以成磐石之固”的封建理想，实则是将宗王参政制度化为皇权运行的必备组件。通过强调“宗庶杂居”的层级治理，陆机在理论上赋予宗王分掌皇权的合法性：当宗王作为皇帝权力的辅弼者参与国家治理时，既可破解“偏制独任”的集权困境，又能实现“譬犹众目营方，则天网自昶；四体辞难，而心膂获义”的权力网络全域覆盖效果。^{[5]743}这种将宗王权力嵌入皇权体系的设计思路，折射出西晋政治精英对“强宗王政治”的功能性依赖。

相较于陆机的理想化设计，刘颂对宗王掌权的重要性认知更为现实：

若乃兼建诸侯而树藩屏，深根固蒂，则祚延无穷，可以比迹三代……郡县之察，小政理而大势危；诸侯为邦，近多违而远虑固……借令愚劣之嗣，蒙先哲之遗绪，得中贤之佐，而树国本根不深，无干辅之固，则所谓任臣者化而为重臣矣……（《晋书·刘颂传》）^{[6]1294-1298}

在刘颂看来，由于“所遇之时，实是叔世”，加之易代方式特殊，西晋皇帝权力自形成起就很难实现“直绳御下”式的集权统治。晋武帝通过凸显皇帝个人权威以稳定统治的政治设计，自始至终都会受限于“弱皇权政治”的现实而无法落地。因而在此前提下，若要维稳统治，就必须引入宗王势力参与至高权力运作，以弥补弱势皇帝权力的先天性缺陷。^②

这种认知源于其对魏晋易代的深刻反思：

魏氏承之，圈闭亲戚，幽囚子弟，是以神器速倾，天命移在陛下。长短之应，祸福之徵，可见于此……及陛下圣明之时，开启土宇，使同姓必王，建久安于万载，垂长世于无穷。^{[6]1297}

曹魏禁锢宗室导致神器速倾的前车之鉴，反向论证了“同姓必王”对巩固统治的决定性作用。^③当刘颂强调“若乃建基既厚，藩屏强御，虽置幼君赤子而天下不惧”时，^{[6]1297}实已揭示西晋“强宗王政治”的本质——它不仅是酬庸功臣的工具，更是维系脆弱皇权的制度支柱。

“强宗王政治-弱皇权政治”的形成本质是历史经验、现实权力结构与政治理论的三重互构：司马氏借助宗族力量完成易代的历史路径，造就了皇权对宗室势力的先天依赖；新兴皇权的权威不足，迫使统治者将宗王参政制度化为权力延伸机制；而陆机、刘颂等人的理论阐释，则为这种特殊政治形态提供了意识形态背书。在此语境中，西晋政治精英任一维度下皇权问题讨论，都必然聚焦于“皇权-宗王”的互动张力——这种思维定势既是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对现实政治结构的理论投射。

三、批判错位与王号书写：陈寿对曹魏宗王政治的重构

在西晋“强宗王政治-弱皇权政治”政治模式的认知框架下，陈寿对曹魏宗王政策的批判呈现出显著的时代错位。在《武文世王公传》末，陈寿以“魏氏王公徒有国土之名，而无社稷之实”为核心，构建起曹魏宗王“禁防壅隔，同于囹圄；位号靡定，大小岁易”的弱势处境叙事，将“骨肉之恩乖”的危困归咎于“为法之弊”，即制度设计的结构性缺陷。^{[1]591}然而细考曹魏政治生态，这一的批判实际存在三重认知裂隙：

其一，权力配置的观察维度存在偏差。宗王并非被完全排除于曹魏核心权力圈层之外，较为典型的例子是燕王曹宇：

帝以燕王宇为大将军，使与领军将军夏侯献、武卫将军曹爽、屯骑校尉曹肇、骁骑将军秦朗等对

^① 一方面，宗王势力的强盛使得西晋政治呈现出诸王、世族、外戚三方竞争而诸王占据优势的面相；但另一方面，皇帝权力本身并未因宗王的活跃而趋于强势，仍带有显著的暗弱性格。因此，皇帝权力与宗王势力之间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张力，二者的强弱在宏观权力结构中实现了平衡：皇帝在核心权力结构中通过意识形态建设以及后续的制度措施跟进，为宗王预留了控制权力的位置；宗王强势掌权后，在某些场域内担任起皇帝利益的代言人，实现对皇帝权力的反哺。但如果宗王在竞争中落败、其势力被摧毁，那么“弱皇权政治-强宗王政治”将会迅速解体，取而代之的是皇帝权力与其依赖的新力量结合后形成的新政治形态。东晋门阀政治的生成即为此例。

^② 西晋宗王也乐于以皇帝权力保障者自居：“骨肉宜敦，而猜佻荐至，险诐宜远，而谗说移行。此皆臣等不聰不明，失所宗赖。遂令陛下谬于降授，虽戮臣等，不足以谢天下……臣等虽劣，足匡王室……臣愚以为宜委太宰以关右之任，一方事重，及自州郡已下，选举授任，一皆仰成。若朝之大事，废兴损益，每辄畴咨。此则二伯述职，周召分陕之义，陛下复行于今时……臣等竭力扞城，藩屏皇家，陛下垂拱，而四海自正。”（《晋书·司马虓传》）

^③ 《晋书·段灼传》：“然魏文徒希慕尧、舜之名……忽骨肉之恩，忘藩屏之固，竟不能使四海宾服，混一皇化……陛下受禅……虽应天顺人，同符唐、虞，然法度损益，则亦不异于昔魏文矣……而今诸王有立国之名，而无襟带之实。又蜀地有自然之险，是历世奸雄之所窥觎，逋逃之所聚也，而无亲戚子弟之守，此岂深思远虑，杜渐防萌者乎？”可见，这一认识并非刘颂独有，而是当时晋人的普遍认知。

辅政……而宇常在帝侧，故未得有言……帝曰：“卿不闻用燕王耶？”放曰：“陛下忘先帝诏勅，藩王不得辅政……陛下不远虑存亡，而近系恩旧。委祖考之业，付二三凡士……”（《三国志·魏书·明帝纪》裴注引《汉晋春秋》）^{[1]113}

冬十二月，明帝疾笃，拜宇为大将军，属以后事。受署四日，宇深固让；帝意亦变，遂免宇官。（《三国志·魏书·曹宇传》）^{[1]582}

材料的缺乏使我们无法确定所谓的“藩王不得辅政”诏是否真实存在。但魏明帝的态度足以证明，宗王参政并非制度性禁忌，其成立与否取决于君主基于现实考量的临时授权，以及出于个人情感的政治信任。

其二，权力主体的分析范畴相对狭隘。如果我们将视野由“宗王”扩展至“宗室”，就会发现曹魏中枢权力虽排斥宗王，却始终倚重以夏侯惇、曹仁为代表的宗族姻亲。自曹操创业至魏明帝托孤，在中央与地方的权力架构中，曹氏、夏侯氏成员始终占据要职，“亲旧肺腑，贵重于时，左右勋业，咸有效劳”。^{[1]305}曹植著名的“族疏而异姓亲”之说，实为宗王的特殊境遇，远不能涵盖曹魏宗室整体。^[7]在宗室政治和官僚政治双线并行的复合体系中，宗室势力始终是曹魏皇权运行的支柱。在某种意义上，这一政治生态与西晋“强宗王政治-弱皇权政治”在权力结构上并无本质差异，区别仅在于权力载体的身份属性不同而已。

其三，权力结构的分析范式出于误植。西晋“再建五等”的实践，使陈寿将宗王参政视为皇权存续的必要条件。这一认知导致其在解释曹魏衰亡时，将藩屏失位、宗王靡弱建构为关键致因。然而事实上，尽管王爵并无实权，但曹魏皇权的辅弼者并未缺位。真正承担这一职能是未获王爵的宗亲集团。高平陵之变后统治危机的爆发，恰印证宗室势力（而非宗王群体）才是曹魏政权正常运作的关键保障。陈寿以“宗王缺位”解释曹魏倾覆的叙事立场，实质是将西晋制度性预设，强行植入前代权力结构分析导致的历史认知偏差。

上述认知裂隙的存在，导致陈寿在书写魏晋史事时，会不可避免地遭遇一个隐蔽的历史诠释难题：一如前文所论，强势宗王匡弼弱势皇权是晋人普遍认可的理想政治模式。因此，陈寿对曹魏宗王政治衰颓的批判，以及将其归为魏晋易代原因的论断，实际都相当于否定了曹魏皇帝权力的合理性。但魏晋禅代法统的存在，又要求陈寿必须在历史书写中表现曹魏皇权延续的正当性。

陈寿将西晋三祖的称谓设计为“王”，或即针对这一书写悖论提出的解决方案。通过赋予司马懿父子“异姓王”的政治位格，陈寿在曹魏权力场域中植入虚拟的宗王镜像：司马氏专政被重构为填补宗王缺位的制度代偿，其攫取核心权力的过程获得类似宗王辅政的合法性外衣。这一书写策略的巧妙之处有三：其一，曹魏“弱皇权政治-强宗室政治”的政治生态被改写为司马氏主导的“弱皇权政治-强霸府政治”，后者比附了晋人理想中的最优政治模式，曹魏皇权延续的正当性得到了确认。其二，在“弱皇权政治-强霸府政治”二元结构中，三少帝的废弑可被编码为君主破坏权力平衡的自毁行为，司马氏“作家门”反而能获得维护统治秩序的道德合法性。其三，由于“王”与“帝”身份跨度较小，借助以三祖晋王、武帝称帝为主线的阶梯式叙事，司马氏代魏得以呈现为由诸侯向天子的自然进阶，从而将“自臣而君”的伦理悖论转化为自屏藩而正位的权力结构演变。

这一系列寄寓于历史书写的政治隐喻，在与现实政治的共振中趋于完善。陈寿通过将司马氏霸府比拟为宗王政治的前形态，实现了文本叙事与现实制度的互文论证——当西晋宗王参政成为常态时，历史书写中“拟宗王”叙事便反向确证了现实政治的合法性。这种双向强化的阐释策略，不仅使“天禄永终，历数在晋”的禅代法统逻辑自洽，更将司马氏代魏建构为填补制度缺陷的历史必然。从本质上看，陈寿的书写设计正是在今律古的认知模式下，将历史书写工具化、服务于意识形态的表现：他通过重构前代权力结构的空白，为当代理想制度创设历史依据，同时借虚拟“异姓王”位格，为权力过渡铺设制度演进的幻象。在这一过程中，陈寿既完成了对西晋正统性的历史论证，又弥合了正史编纂中制度想象与现实政治之间的鸿沟。

四、结语

综上所述，陈寿在《三国志》中以王号称呼司马父子的书写设计，植根于为魏晋禅代的制度逻辑和西晋特殊的政治现实。陈寿突破司马氏生前未获王爵的史实限制，是效仿汉魏禅代逻辑，将王爵的过渡性功能移植至司马氏权力进阶的叙事中，以此模拟天命转移的合法性链条。这一书写设计的可行性源自西晋“强宗王政治-弱皇权政治”的政治现实。司马氏依靠宗族集体力量完成易代的历史路径，使宗王参政成为皇权存续的制度支柱，宗王强势辅政被晋人视为理想政治模式的核心。受此影响，陈寿对曹魏宗王政治的批判产生了显著的认知裂隙。他刻意忽略了曹魏宗室参政的实例，模糊了曹魏“宗王”“宗室”的权力分野，将曹魏倚重宗亲集团的政治生态曲解为“宗王失位”的制度缺陷。在此前提下，陈寿以西晋宗王政治的制度设计为模板，为西晋三祖构拟了“异姓王”位格，进而将司马氏专政重构为填补曹魏权力空白的必然选择。这种书写设计本质是以制度实践反向规训历史阐释：当现实中的宗王参政被预设为政权存续的前提，历史编纂便需重构前代权力结构中的“宗王缺位”，从而将现实制度的理想设计转化为历史演进的终极归宿。

更深层而言，这种“名实分离”的书写现象，暴露了中古史学在王朝正统性建构中的工具性本质。陈寿通过称谓系统的符号化操作，在曹魏法统与西晋正统间构建起双重叙事：表面维持历史书写的连贯性，实则将司马氏“自臣而君”的身份蜕变，包装成“弱皇权政治”语境下宗王势力接管权力的自然进程。当虚拟的“拟宗王”叙事与现实中的宗室参政制度形成共振，历史编纂便完成了对权力更替的终极论证——符号化的历史记忆既遮蔽了血腥的权力博弈，又将新兴政权的合法性锚定于重构的制度演进史中。这种历史书写与政治权力的深度媾和，不仅揭示了中古史学以今律古的认知范式，更展现了历史编纂如何通过重构过去，为现实权力结构铸造跨越时空的合法性闭环。

参考文献：

- [1] 陈寿. 三国志[M]. 北京：中华书局，1959.
- [2] 仇鹿鸣. 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修订本）[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
- [3] 陈寅恪. 陈寅恪先生全集[M]. 台北：里仁书局，1979.
- [4] 胡志佳. 西晋建国前司马氏的发展[J]. 逢甲人文社会学报，2005, (10): 77-102.
- [5] 萧统编，李善注. 文选[M]. 北京：中华书局，1977.
- [6] 房玄龄等撰. 晋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4.
- [7] 津田资久. 曹魏至親諸王攷--『魏志』陳思王植伝の再検討を中心として[J]. 史朋/北海道大学東洋史談話会編，2005, (38): 1-29.

The Political Logic of Titulature: The Sima Clan's Princely Titles and the Historical Construction of the Wei-Jin Abdication in Chen Shou's Narratives

YU Jianping¹, FANG Tao²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China

Abstract: In *Records of the Three Kingdoms*, Chen Shou's deliberate use of princely titles (e.g., "Prince Xuan of Jin" for Sima Yi, "Prince Jing of Jin" for Sima Shi, and "Prince Wen of Jin" for Sima Zhao) subtly embodies the Western Jin's political logic disciplining historical narratives. By transplanting these titles—symbols of the Mandate of Heaven's transfer during the Wei-Jin abdication—into the Sima clan's ascension narrative, Chen Shou analogized their legitimacy chain from "subject to sovereign." The structural demands of Western Jin's "strong clan-based princely politics vs. weak imperial authority" system elevated clan prince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s a core mechanism for regime survival. Yet Chen Shou's critique of Cao Wei's princely politics deliberately narrowed historical realities: his narrative of "powerless imperial clansmen" fabricated a vacuum of authority, recasting the Sima clan as "quasi-princely" agents. While superficially maintaining Cao Wei's legal continuity, he framed the Wei-Jin transition as an inevitable choice under systemic flaws, ultimately legitimizing Western Jin's dual monopoly over historical memory and power origins. This exposes medieval Chinese historiography's deeper logic—manipulating nominal-real disjunctions to serve contemporary politics.

Keywords: Records of the Three Kingdoms, Titulature, Princely Titles, Wei-Jin Politics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2.719

刘智《天方性理》中的心性论——兼论对宋明理学的吸收

汪正祺¹ 张思听²

(¹苏州科技大学, 江苏 苏州 215009, ²昆明理工大学, 云南 昆明 650031)

摘要: 刘智《天方性理》以真主本体为终极依据, 通过“性”的先天层级划分与“心”的灵修阶梯设计, 将宋明理学的“性即理”、“心即理”、“体用一源”等命题纳入伊斯兰心性论框架。其以“继性”为真宰首显, 重构“性即理”的本体论根基; 以“心分七品”融合苏菲功修与儒家道德实践, 最终实现了伊儒思想的创造性转化。这一转化既保留了伊斯兰教义的核心, 又通过结构性类比使儒家心性论成为诠释宗教体验的工具, 为跨文化哲学提供了方法论启示。

关键词: 刘智; 天方性理; 心性论; 宋明理学

刘智(约1660—约1730年), 江苏南京人士, 为我国回族穆斯林杰出学者及伊斯兰教思想之集大成者。其毕生致力于“以儒诠经”之事业, 即运用汉语及儒家思想对伊斯兰教经典进行阐释。刘智致力于将伊斯兰教思想与中国儒释道哲学相融合, 从而构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伊斯兰教思想体系, 促进了伊斯兰教在中国的本土化与民族化发展。同时心性的探讨在伊斯兰文化与中国哲学中也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刘智的心性论思想, 为其学术成就的巅峰之作。其《天方性理》以苏菲主义显化理论为核心, 融合伊斯兰教义与宋明理学概念, 构建了一套独特的心性论体系。这一体系以“性”与“心”的互动关系为主线, 既体现了伊斯兰哲学对人性本质的终极追问, 又展现出对中国传统心性论的深刻吸收与创造性转化。

一、多层结构与灵性根源: 刘智对“性”的阐释

刘智作为一名穆斯林其思想必然是以伊斯兰思想为基础的, 所以其关于人性的思想主要根植于《古兰经》等经典, 《古兰经》中有言:“我必定要用泥创一个人, 当我把他造出来, 并将我的精神吹入他的体内的时候, 你们当为他而倒身叩头。”(38:71-72) 其中的“精神”有时也译为“灵魂”。刘智受伊斯兰教苏菲主义影响颇深。²在苏菲主义的思想中人的灵魂即是人的本质。如苏菲神秘主义哲学家伊本·阿拉比看来, 安拉是永恒的实在, 物质世界只是变换的幻象而已。而人的本质(灵魂)实际上就是造物主的本质。³那么人的灵魂便与安拉所联系起来。这种思想被刘智所继承, 同时刘智在其译注中也将“灵魂”译“性”以此来与中国传统概念相联系。

那么在刘智看来人性(灵魂)是什么呢? 刘智言:

灵活者, 人之所以为人之性也。其性一本, 而该含六品: 一、继性; 二、人性; 三、气性; 四、活性; 五、长性; 六、坚定。⁴

在刘智看来“灵活”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那个特性, 换而言之便是人的本质规定性。马联元在将“灵活”翻译为阿拉伯语时, 便将其翻译为“灵魂”或“精神”。⁵人性(灵魂)中包含了六个品级, 它们依次为继性,

[作者简介]

[1]汪正祺(1998—), 男, 回族, 河南信阳人, 苏州科技大学硕士研究生。

[2]张思听(2005—), 女, 回族, 河南信阳人, 昆明理工大学本科生。

² 马文兵, 季芳桐. 刘智生平考释与思想渊源探究[J]. 世界宗教研究, 2024, (08): 112-117.

³ 王家瑛: 伊斯兰宗教哲学史[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3年版, 第638页。

⁴ (清) 刘智著, 马勇刚主编: 《天方性理》释解[M].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15年版, 第147页。

⁵ (清) 马联元: 《性理微言注释》, 印度坎福尔, 石印本, 伊历1343年版。

人性，气性，活性，长性，坚定。而刘智又将继性与人性（本性）归于先天之性，后四性归于后天之性。就先天之性来说：

继性者，继真宰之本然而有者也。真宰之性，无有开其先也，但有继其后也，此性则因真宰之本然，以为本然，故曰继也。此性即真宰之首显，而以为万性之本元者也。⁶

人性者，人于先天而各得其所分与之性也。此性不远与继性，而但因其先天之有分，则其名与义，遂不觉其微有所别矣，是谓本性。⁷

本性者，本乎先天之所分与，而无美不备者也。其性与后天气性、活性、长性、坚定之性相混为一。但其显也，有先后之分，后天四品以次先显，此一品显于其最后。本性与继性，与真宰之本然有次第，而无彼此。由真宰之本然，而有继性，由继性之分与，而有本性，是其所为次第也。⁸

继性是真宰赋予人的最初的东西，除此之外并无其他的品性，它是真宰本体的一种自显的表现。由此，人性与真宰便相联系起来。而刘智又将继性称为“元性”，孔颖达有言：“元，始也。”刘智认为“古今人物之性命，莫不从此而印析，所谓千古群命之一总命也。”⁹万事万物的性命皆从此性上翻印而出，这也是真主最初的一个命令。就像《古兰经》中：“造化天地的主，他判定一事的时候，仅对它说：‘有’，它立刻就有。”

（2:117）这个最初的“有”的命令，实际上便可视为刘智的“继性”。只是在《古兰经》中是真主主动地创造，在刘智这里是真主自然的流溢。由此，后面的品性便从“继性”流溢而出，不再是真主直接的流溢。¹⁰

人性在刘智这里又被称为本性，本性由先天继性所分而来。季芳桐教授看来本性可以说是刘智心性论中最重要的概念，它有至善、智慧等特点。¹¹事实上确实如此。虽然本性与后天四性混同为一，但并不是说本性是后天的。之所以说后天四性显现之后本性才会显现，这显然是从逻辑层面来看，当人们生理之性具备之后，先天的继性才会有寓所从而降衷于人，由此本性就由隐到显了。本性与继性之间的关系，在刘智看来二者的内容是一样的。刘智直言：

本性与继性原非二也，本性未分之先，只此继性，而无本性。继性分与之后，名为本性，而不名为继性。¹²

所以本性同继性并没有区别，只是出现的次第不同而已。因此也可言“继性即本性”。刘智对于本性与继续关系的论述与程朱理学性与理关系的论述十分相同，朱子言：“未有形气，浑然天理，未有降付，故只谓之理；已有形气，是理降于人，具于形气之中，方之谓性。”¹³朱熹看来在气化流行之前，只有一个天理。气化流行之后“理”随着“气”降衷于人才有了“性”的称谓。所以，这里不难看出刘智对于朱熹“性即理”的吸收。

虽然本性是一“完美无不备”的品性。但由于人“各得其所分”，所以每个人的本性尽管都来自继性，却依然会有所不同。这似乎很像道家的“各随其性。”道家的思想中每个人的本性即每个人本然的样子，从这点来看与刘智的本性并无不同。但要注意道家的本性并没有一个必然的道德方向，以及每个人的本性并无等差之比较。而刘智由于宗教信仰的原因，其本性是必然有道德方向的，同时本性中也有着先天的等差。

性之最初，而近于真宰者，至圣之性也，其次大圣之性，其次钦圣之性，其次列圣之性，其次大贤之性，其次知者，其次廉介，其次善人，其次庸常，凡九品。¹⁴

刘智将人之性又分为了九个层级，从距离真宰远近或者说“穆罕穆德之光”¹⁵照耀的远近，来进行的等级的分配，越是接近真主品级就越高。这里就有了命定论的意味，刘智出于伊斯兰教思想将人的不同在先天之时似乎便已经做出了区分。

除此之外，刘智看来本性中先天的具有两种能力与德行。

本性之中，万理具足，万事不遗，万物皆备。其体量如此广大也，其光之所通，无不贯彻，而于无不

⁶ (清)刘智著，马勇刚主编：《天方性理》释解[M].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47页。

⁷ 同上。

⁸ (清)刘智著，马勇刚主编：《天方性理》释解[M].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57页。

⁹ (清)刘智著，马勇刚主编：《天方性理》释解[M].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59页。

¹⁰ 流溢说是伊斯兰教早期翻译希腊哲学时所吸收的观点，刘智在这里延续了这样一个观点。具体见吴雁.伊斯兰新柏拉图主义研究[J].阿拉伯世界研究,2007,(04):73-80.

¹¹ 季芳桐：伊儒会通研究[M].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18页。

¹² (清)刘智著，马勇刚主编：《天方性理》释解[M].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59页。

¹³ (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 [M]. 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608页。

¹⁴ (清)刘智著，马勇刚主编：《天方性理》释解[M].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95页。

¹⁵ 在宗教中，光历来有着神秘的解释，伊斯兰教也不例外。刘智这种人性九品的思想正是对于光论的继承。具体见金宜久：中国伊斯兰探秘——刘智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本，第71-82页。

贯彻之中，含有一种清妙之智，统摄活性所有一切知觉；含有一种清妙之欲，统摄气性所有一切之爱恶，是谓二力。二力者，专于后天表世发现其本领。又于无所不贯彻之中，显然有一种天然返照，绝意后天而真见夫本性从出之所。显有一种天然趋向，因明于照而直趋夫真宰本然之真。是谓二德。二德者，专于先天本始发现其本领。二德必待其人修明之，既至而后显也。¹⁶

本性无所不有，无所不包含。它先天的具有一种“清妙之智”来统领活性中的一切知觉；先天的具有一种“清妙之欲”来统摄气性之中的一切喜爱与厌恶的情感。而这两种能力必须要在后天也就是现实世界中才能体现出来。同时，它还有一种先天的返照的特性，能够脱离后天的束缚而明察本性的来源。并且这种本性会让人们天然地趋向真宰本然。所以本性天然给予了人的道德方向。但是本性这种先天德性也必须经过工夫才能彻底显现出来。刘智用本性先天的功能，给出了人为何能够复归真主的依据，也为其工夫论提供了基础。

刘智在讨论人性中的后天的四性别时，实际上已经从人的机能出发，只是概念上依旧用“性”来表达而已。¹⁷在刘智看来：

气性者，人所禀于后天气质之性也，是谓爱恶性。活性者，附于躯体，而以为知觉运动者也，是谓食色性。长性者，即所以生长躯体，自小而大者也，是谓发育性。坚定者，即所以坚整躯体，而不使其解散者也。虽不名性，亦性也。¹⁸

具体而言，所谓“气性”，实际上来说就是人的喜爱与厌恶的两种情感。在刘智看来便是人们的七情六欲总的来看不过就是爱与恶罢了。不仅如此“气性”也是人由凡入圣的核心要素。

人为万物之灵，具此能爱能恶之机，迨其后而扩而充之，因为爱，以力行其所当爱之事，因为恶，以力去其所当恶之事，皆此气此力为之。而以故，其人日进于圣贤也。¹⁹

人正是由于有了情感的发动，才能有行为的产生。能够竭力地去做自己爱的事情，竭力的不去做自己厌恶的事情。若无情感的支撑，人的行为是无法坚持下去的。但是这种爱恶为何必然是趋向于圣贤而非小人呢？在刘智看来，这是由于气性的这种能力来源于人的本性之用。

气性之所能为者，皆本性之所欲为者也。本性所有之知能，尽付于气性之发现也。²⁰

刘智这里所说的爱恶实际上是指随着本性之用的爱恶，气性若能为本性所主宰，那么本性所有知与能就可以全部赋予气性从而显现出来。由于本性至善，所以气性之好恶必然也是“好好色，恶恶臭。”因此人之情感就成为由凡入圣的动力。实际上，刘智在这里大胆地吸收了宋明理学的理气论模式，在宋明理学中“性即理也。”因而由性宰气则必然向善，由气宰性则可能出现一种负面的导向。同时宋明理学将人为何会出现不同归结于气性之上，朱熹言：“天命之性，本未尝篇。但气质所禀，却有偏处，气有昏明厚薄之不同。”²¹正是由于气秉之性不同造成了人的差异，气又被分为了“清气”与“浊气”，人若禀气是清的便是圣人，若禀气是浊的便是愚者。刘智这里也是如此。

清之中有至清焉，此圣人所禀赋之气也，其气以风胜。清矣，而不得其清之至焉，此人所察赋之气也，其气以水胜。清矣，而又居乎其清之次焉，此智者所禀赋之气也，其气以火胜。清之数居其十之一二，浊之数居其十之八九，此愚者禀赋之气也，其气以土胜。²²

刘智吸收宋明理学理气论的同时又坚持了其伊斯兰教的思想，将气分为“清”与“浊”的同时，又纳入了风、水、火、土四元素，在伊斯兰文化中这四种元素是构成了人身体的平衡。而这四元在刘智看来也象征着气性的不同属性，风即安定性，安定性以本性之用以为用即圣人所有的品级；水即常腥性，常腥性似乎以本性之用以为用即贤人所有的品级；火即悔悟性，悔悟性好像还没有失去本性之用即普通人所有的品级；土即自任性，自任性是完全失去了本性之用即完全任意妄为的人所有的品级。²³人之圣贤愚，也由禀气清浊而导致。刘智从而将气性的内涵更加具体化了，这是宋明理学所没有做到的。

刘智对于“活性”、“长性”以及“坚定性”可以说是纯粹从伊斯兰生理学层面出发了。所谓“活性”刘智有时候又将其称为“觉性”，实际上就是指人的感官知觉和运动机能的特性，正是有了这一特性，人们才会有生

¹⁶ (清)刘智著，马勇刚主编：《天方性理》释解[M].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57页。

¹⁷ 金宜久：中国伊斯兰探秘——刘智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本，第95页

¹⁸ (清)刘智著，马勇刚主编：《天方性理》释解[M].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47页。

¹⁹ (清)刘智著，马勇刚主编：《天方性理》释解[M].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55页。

²⁰ 同上。

²¹ (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 [M]. 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4页。

²² (清)刘智著，马勇刚主编：《天方性理》释解[M].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79页。

²³ (清)刘智著，马勇刚主编：《天方性理》释解[M].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55页。

理欲望。同时刘智认为万物实际上都具有“活性”，因此，在他看来万物都有知觉和运动的特性，哪怕是一块石头也是有知觉与运动的，我们没察觉到并不代表其不运动不知觉。²⁴这种万物皆有知觉与运动的思想是极具价值的。所谓“长性”刘智又将其称为“发育性”或“草木之性”。此性具有吸收、消化、保存、排泄的能力以此保证人能健康成长。在人成熟之后，便会显露出原有的两种能力即“妙种力”与“传像力”。这两种能力正是人们能繁衍以及遗传的原因。²⁵最后，所谓的“坚定”刘智又将其称为“金石之性”。此性就像金石一样有坚固的特性。正是有了此性人们的身体架构才能各处其位，而不变动。人体也是因为此性而能够成为一个完整的躯体不分散。²⁶

总的看来，刘智对于人之性的论述在伊斯兰的基础上又大胆地吸收了宋明理学特别是程朱理学的内容，但是我们要注意到在宋明理学中“性”是具有本体论地位的，而刘智这里最高的实体并不是“性”而是真主。如朱熹的“天理”是自存的本体，其“性即理”强调人性与天理的直接同一；而刘智的“继性”作为“真宰首显”，仅是本体流溢的第一层级。这种差异导致二者对“性”的定位截然不同：朱熹之“性”是“理”在人的落实，侧重道德普遍性；刘智之“性”则是真主意志的阶梯化显现，隐含先天命定（九品之分）。由此可见，刘智虽沿用理学术语，却以“继性”置换“天理”，将儒家道德本体转化为宗教本体，从而为“性分九品”的命定论提供了形而上支撑。同时，刘智用“继性—本性—后天四性”的架构回应了宋明理学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划分模式，先天的继性与本性皆为至善且无所不备的“天地之性”，后天的四性皆由“元气”²⁷所出的“气质之性”。

二、刘智对“心”的阐释：形神二分与灵修阶梯

正如先前所述，刘智对人性的阐释融合了伊斯兰文化与宋明理学的精髓。同样地，刘智在此将伊斯兰的宗教精神、阿拉伯的医学传统与中国传统的心性思想进行了有机地结合，深入探讨了心的起源、本质与分类问题，对“心”进行了深刻的思考。

在刘智之前，中国伊斯兰教学者王岱舆认为：“缘夫人之身，有形神，而心亦有色妙。”²⁸就人身体而言有形体与精神的区分，与之相应人心就也有“色”与“妙”之分。刘智继承了王岱舆的思想认为，人之心分为“方寸之心”（形心）与“妙体之心”（真心）。

心之妙体，空寂无外，而身内所有之心，心之位也，性之所寓也。心之妙体，为性之先天，心之方寸，为性之寄寓，方寸其后天也。²⁹

在刘智这里延续了其对性的划分，将心也分为先天与后天，先天的“妙体之心”实际上就是“性”，后天的“方寸之心”就是有形的肉体之心。先天的“妙体之心”寓于后天的“方寸之心”中。由于“妙体之心”无形无方，所以必须依靠“方寸之心”而显示出来，故其论述主要在“方寸之心”。³⁰

首先，刘智依据阿拉伯医学传统认为人是由男子脊髓中的“种子”进入女子的子宫而演化而出，³¹“种子”进入子宫后又会发育出清浊二气，二气之后便是演化出红、黄、白、黑四液，而四液又与四元相应。红液即风层；黄液即火层；白液即水层；黑液即土层。而风与火（红黄液）结合就构成了人的心，水与土（黑白液）结合就构成了人的肉体，这也就是身心的由来。³²同时，在刘智看来人的身体器官之中最重要的便是人之心。

如人之一身，心居至内，身之所不能通者，心能通之，心通无形之位，即犹如“阿尔实”通理世之位也。故小世界，以藏寓于内者为大、为上也。又曰，人心如天，人身如地。³³

人的身体之中，人心是处于身体最内层的，同时，人心能够通达到身体达不到的地方。就像“阿尔实”³⁴一样能够通达所有无形之性理的境界。所以小世界（人体）中，在内层的为大为上。用天地来比喻的话，心就是天，身就是地。实际上刘智在这里主要是想表达“心”先天具有的这种通达于无形性理的能力，正是

²⁴ (清)刘智著，马勇刚主编：《天方性理》释解[M].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53页。

²⁵ (清)刘智著，马勇刚主编：《天方性理》释解[M].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51页。

²⁶ (清)刘智著，马勇刚主编：《天方性理》释解[M].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49页。

²⁷ 刘智将元气视为“先天之末，后天之根。”是后天一切有形物质的开端。(清)刘智著，马勇刚主编：《天方性理》释解[M].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5页。

²⁸ (明)王岱舆著，余振贵点校，正教真诠·清真大学·希真正答[M].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0页。

²⁹ (清)刘智著，马勇刚主编：《天方性理》释解[M].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61页。

³⁰ 季芳桐：伊儒会通研究[M].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15页。

³¹ 单于德：回族医学奥义[M].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7页。

³² (清)刘智著，马勇刚主编：《天方性理》释解[M].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37—143页。

³³ (清)刘智著，马勇刚主编：《天方性理》释解[M].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39页。

³⁴ 伊斯兰天文图中，将天分为九层，就像中国传统中所言的“九天”，其中最高的天便是“阿尔实”，此天是先天与后天的连接。

由于这种先天的能力，所以心才是最关键的。

那么人心为何像“阿尔实”一样能通达性理呢？在刘智看来：

后天之心，何以有烛理之能？盖胚胎当体窍初分之时，已先有所为。属火者，发为灵明之孔，而对峙于心之左右。灵明之孔，即才智之根，而烛理之能，已早伏于此矣。³⁵

刘智认为，人的有形之心，天生就具有一种才智，正是这种才智或者说“灵明之孔”让人能够通达于性理。随后，刘智对于后天之心的内涵也进行了具体的描述。

形色之心，本一物也。而其品有七，每一品有一品之德。德者，心之所得以为才智者也。每一德有每一德之作用，亦犹天有七政，而每一政各有专司也。³⁶

尽管有形之心仅表现为一有形之物，其内部却蕴含七个品级的层次结构，每个品级均具备其独特的“德”，即前文提及的“灵明之孔”。这些“德”不是抽象概念，它们各自承载着特定的功能，正如天穹中的七星，各自执掌着不同的领域，各尽其责。因此，心之七品与心之七德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对应关系。

最外一品为顺德藏。顺则不逆，然亦有时反顺而为道者，则以所藏之位，处于最外也。外当气血流行之冲，而德易受其所侵，故顺者亦有时而违逆也。其二品为信德藏……而信德因之摇也。其三品为惠德藏……而此德因之变也。后此四德，所藏之位，不于其表，不于其里，虽不离于形色之方寸，而却不落于形色之分际，非气血之所得而侵弊也，故不至于有变。后此之四德之发明，而前此之三德亦因之以守其常矣。其四品为明识藏……日光能掩诸光，而非诸光之所可得而掩者也。其五品为笃真藏……趋于内，则自远于外也。其六品为发隐藏……发者，现之渐也。其七品为真现藏……现则方寸之迹混，而无方无所之妙，无分于彼此矣。³⁷

心的最外层被称为“心包”（心的纹络），其对应的德性为“顺德藏”。这种德性意味着顺从真主而不违逆，然而，有时会出现逆反的情形。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心包位于心的最外层，因此它容易受到气血的影响。第二品名为“信德藏”，位于“心表”（心的外层薄膜）之位。此德性是对真主的坚定信仰，犹如磐石之固。然而，有时会出现动摇，这并非出自本意，而是由外界因素引起。因为“信德藏”与“顺德藏”相邻而居，若“顺德藏”受到气血的干扰，难免会影响到“信德藏”，使其也产生动摇。第三品名为“惠德藏”，位于“心里”（心的血肉）的位置。此处所指之“惠德”意涵为仁慈与慷慨，而非严苛与刻薄。然而，这种仁慈有时也会变得严苛，其转变的原因在于前两品的影响。总体而言，这三品德性易受气血的影响而发生转变。然而，从第四品起，德性便不再受气血的影响。刘智认为，只有当后四品的德性得以显现，前三品的德性才能摆脱气血的干扰，保持其固有的状态。第四品，即“明识藏”，位于“心灵”之处。当此品之德性显现，即可直接洞悉事理，不受其他知识之干扰。此德性犹如日出之光辉，太阳升起之际，任何其他光亮皆无法遮蔽其光芒。第五品为“笃真藏”，处于“心仁”的位置。此一德性显露出时，便会如火炎的特性一般内附上升，直接趋向本然而不会受到任何阻碍。第六品名为“发隐藏”，位于“心妙”的位置。无论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所有深奥难解、不可思议的道理都蕴含在这个德性之中。最终品级为“真现藏”，位于“初心”的核心位置。真宰的全体之用都蕴含于这一品级之中，然而若功夫不足，才智未能充分展现，那么真宰的大用就无法显现。只有经历从“明识”到“笃真”，再从“笃真”到“发隐”，最终由“发隐”至“真现”的逐步功修，真主的全体大用才能彻底展现。在这种状态下，“方寸之心”的界限与形式将完全消融，从而与“妙体之心”无异。

由此可见，刘智的“心”大体上与“性”的划分一致，也是形上与形下之分。形上的“妙体之心”是纯粹至善的，形下的“方寸之心”则与物质相联系的，善恶取决于形上的“妙心”是否得到彰显。心分七品实际上也不过是这二品之心的细化。心包，心表，心里与气血相连可视为“方寸之心”。心灵，心仁，心妙，初心完全脱离了气血的影响可视为“妙体之心”。刘智之所以对其细化，不过为了阐明苏菲功修理论以及功修的层次罢了。³⁸黑鸣凤直言：

七品含七政，理数昭然。视其人功夫何境，即知其心开几层。人焉瘦哉？明识为日，智者之品也。日无不明，故智者不惑。其能不变者，知止矣。³⁹

黑鸣凤用儒家的“人焉瘦哉”与“知止”来总结刘智对人心修养境界的精细描绘。“人焉瘦哉”出自《论语·为政》：“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瘦哉？人焉瘦哉？”孔子主张，通过全面审视一个人

³⁵ (清)刘智著，马勇刚主编：《天方性理》释解[M].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61页。

³⁶ (清)刘智著，马勇刚主编：《天方性理》释解[M].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64页。

³⁷ 同上。

³⁸ 季芳桐著：天方性理注释、翻译及研究[M].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22年版，第173页。

³⁹ 黑鸣凤康熙年间人士曾为刘智《天方性理》作注释。(清)刘智著，马勇刚主编：《天方性理》释解[M].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64页。

的言行举止，我们便能清晰地了解其本质。黑鸣凤引用《论语》来表明刘智之所以对于心进行细致的划分的原因就是在于：一个人的功修水平是可见的，因此他内心所处的境界也就显而易见了。同时他认为第四品开始的“明识藏”实际上便是智者品级的人的心所呈现出的内心境界，智者不会疑惑的原因正是因为心灵的明识德显现出来而无所遮蔽。而德性之所以能够恒久的保持下去，就是在于“知止”。“知止”出于《礼记·大学》：“大学之道……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朱熹认为：“止者，所当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知之，则志有定向。”⁴⁰唯有朝向着至善的境界并坚定不移，方能使自己的志向稳固；志向稳固，方能使心灵不被外界所动摇。儒家所追求的至善境界，是指心灵完全与天理相契合的状态。而刘智所言的至善，则是指心灵完全映照出造物主的全知全能。当然，在这种状态下，人自然也达到了至善的境界，但这里显然蕴含了对真主的宗教信仰中的顺从之意。

刘智的言心方式与宋明理学中的言心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在宋明理学中，心被区分为“人心”与“道心”，这种二分法的根源可追溯至《尚书》中的十六字心传：“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二程阐述道：“人心惟危，人欲也；道心惟微，天理也。”⁴¹所谓的“人心”便是私欲，所谓的“道心”便是天理。人似乎存在两种截然对立的心，但实际上并非如此。《二程遗书》中进一步讲述道：“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心，道之所在，微，道之体也。心与道浑然一也。对放其良心者言之，则谓之道心；放其良心，则危矣。”⁴²“人心”代表失去良心的状态，而“道心”则是保持良心的状态。因此，“人心”与“道心”不过是心在不同状态下的表现形式。朱熹的思想也受到了二程的影响，他提出：“只是一个心，知觉从耳目之欲上去，便是人心；知觉从义理上去，便是道心。”⁴³在朱子看来，“人心”与“道心”的区别在于心的知觉是顺从人欲还是顺从天理，本质上仍是心的不同的表现。不仅理学如此，心学对于“人心”与“道心”的分断亦是如此。王阳明云：“人心之得其正即道心，道心之失其正者即人心，初非有二心也。”因此，无论是理学还是心学，对“人心”与“道心”的区分，都是基于心所呈现的是天理还是人欲。

在宋明理学的哲学体系中，心若表现为人的欲望，实则是由于气的作用导致天理在心内被遮蔽。如前文所述，刘智认为心的前三品之所以会沉沦，同样受到气血作用的影响。因此，刘智将宋明理学关于心的论述方式融入其对心的阐释之中。据此，所谓的“妙体之心”可视为“道心”，两者区别仅在于一个心呈现为天理，另一个心使得“真主之大用”完全彰显。而“方寸之心”实际上不外乎“人心”，皆会被气欲所影响。宋明理学在探讨心时，偏重于道德层面，对生理心的阐释则不够细致。⁴⁴刘智在继承宋明理学关于“心”的思想基础上，结合伊斯兰文化对心特别是有形的肉体之心进行了具体化阐述，从这点来看其补充了宋明理学在此方面的不足。

三、心性合一与体用一元：刘智对心性关系的阐释

心与性的论述是《天方性理》中的重要概念，那么心性关系则是刘智理论的关键。刘智在心性关系的论述中不仅表现出了伊斯兰文化的特点，同时，还体现出了其对于宋明理学的整体吸收。

心性会通可以说是回儒们的共识，⁴⁵早期的金陵学派学者，王岱舆认为，人的心分为肉体之心与精神之性。人的肉体之心天然地具有认识“性”的能力，而人的精神之心实际上与“性”是一致的。⁴⁶，从而将心与性相互联系起来。此外，马注对心性亦持有会通的观点，在他看来，真主创造出人是由心到性再到身的过程，因此心对于性是有优先性的。所以当心受到影响时，性也会被其影响，性依附于心，若想要认识性就必须先认识心。⁴⁷但是，早期的回儒们对于心性关系的论述并不具备系统性，而刘智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了系统化的阐释。⁴⁸

首先，刘智认为：

性理未分之前，只此一心。心也者，无方所者也。性理即分之后，不名心而名性。性自理世趋象世之时，无形无体，而寓于心。⁴⁹

⁴⁰ (宋)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 [M]. 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3页。

⁴¹ 《二程外书》卷3

⁴² 《二程遗书》卷21

⁴³ (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 [M]. 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009页。

⁴⁴ 季芳桐：伊儒会通研究[M].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56页。

⁴⁵ 薛莉.心性会通是回儒之间的根本会通——季芳桐教授访谈[J].中国穆林,2017,(03):53-57.

⁴⁶ (明)王岱舆著，余振贵点校，正教真诠·清真大学·希真正答[M].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0页。

⁴⁷ (清)马注著，余振贵点校，清真指南[M].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46、357页。

⁴⁸ 高东兴.伊儒会通视域下的人性理论[D].宁夏大学,2020.

⁴⁹ (清)刘智著，马勇刚主编：《天方性理》释解[M].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61页。

在初始阶段，性与心本质上是相同的，它们在形而上的本体中并未显现出差异。当性理尚未明确区分时，仅存在一个先天的心，这个心即人性与人心的结合体。在性理未明确划分的时期，它们都存在于真一本体，也就是真主之中。这颗心实际上指的并非有形的肉体之心而是前文提及的“妙体之心”也就是“真心”。人性与物理分明之后，无方位无处所的“妙体之心”便成了“性”，但是由于“性”无形无体，所以必须降衷于“方寸之心”中，从而才能不悬空于形上的世界而构成现实世界的人的本性。所以，就本质层面言之，性于心是一而非二。

然而，析而言之，性与心则就有了分别。此分别主要在于“方寸之心”与“性”之间。

先天之心，为性所分析之源；方寸之位，为性所显露之助。何也？方寸虽属后天，而其所具有之才智，实足以知性，实足以显性。性之虚妙无所不有，但妙而不能自为显发也，必得心之才智足以发之。而其性，乃有所借资而显。性譬则火也，心譬则煤也。煤无火则不炽，火无煤又何以着乎？约而言之，先天之理，必有借于后天之心，亦必有皆于后天之气。有后天之心，而其理乃烛，有后天之气，而气理乃行。⁵⁰

先天之心与性本源相同，本质上并无二致；然而，后天之心作为性的寓所，其本质已与性不完全相同。尽管如此，性仍需依赖后天之心以显现。由于性本身是虚灵而微妙的，它无法自行展现，必须借助于后天之心所蕴含的天赋才智。性与后天之心的关系，恰似煤炭与火的关系：没有火，煤炭无法燃烧；同样，没有煤炭，火也无从点燃。因此，在刘智的观点中，若无后天之心，性将无法展现，而若无后天之气，性亦将停滞不前。所以刘智总的言之：“非心无性，非性无心”。⁵¹性理未分时，心为混沌本体；性理既分后，性寓于心，心为性显之助，从而心具有识性、显性之能。黑鸣凤亦认为，刘智所阐述的心性关系，实际上类似于种子与果实的关系。细分开来，种子与果实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从整体上看，种子与果实是统一的整体。⁵²

其次，刘智认为，有形之心与性的区别并非一成不变。实际上，有形之心中天生蕴含着认识性的潜能，而性中也具备天然的返照之能。只要人们愿意付出努力，心与性便能够重新相合为一。

以方寸所有之才智，与本性中所含清妙之智会合，而其为知也益也。以方寸所有之才智，会合本性中所显天然之返照，而其察理也益真。是知方寸所寓之性，亦非全无以自用其力也。借方寸之位以为寓，因方寸之明以为用，迨至心之才力既尽，而六品性体统会于一，则方寸之位无所用之，而依然成其为妙体之心，而不落于方所也。然后谓心即性也可以，谓性即心也可。⁵³

性之本能力与心之先天能力互为补充。当有形之心的所有才智与本性的智相融合时，心的认知能力得以增强。有形之心之的所有才智与性之本真返照相一致时，对万物之理的洞察将更为精准。尽管本性借助有形之心作为其寓所，并通过它得以显现，但当心之全部能力得以充分展现，六品之性将融合为一，此时，有形之心与性的界限将不复存在，回归至初始的混沌状态，此时既可称之为心，亦可称之为性，心与性再无区别。因此，正是主观的心之能使得客观的性之理得以被认知和呈现；同样，客观的性之理确保了主观的心之能的认知正确。心与性从而得以合一。当心性合一之时，人所展现的状态，即前文所述的有形之心的全部德性显现出来的状态，即人的心与行完全呈现出“真宰大用”的状态。

在中国哲学中，体用关系是一个重要的概念。刘智的心性会合思想正体现出了这一关系，其中性为本体，心为作用。性体作为心之用的本源，心乃是根源于先天之性，并且在逻辑上，性体已然暗含着心之用，人的心灵的能动作用以及情感的自然流露，其实都潜藏在人的性体之中。内在的道德本性有着天然的张力，进而转化为人的现实的心理活动与外在情感。可以说，心是性的彰显与外在呈现。朱熹曾提出“未发是体，已发是用”的观点。性作为本体，具有至静、超越和内在的特质，处于一种隐微的、仿若被遮蔽的状态。若要将其显现并使之成为现实，就必须依赖于心。性体作为一种内在的道德力量，必然会向外扩展，并体现为现实的情感与心灵活动。而性体正是通过人的外在情感与心理活动，来表达并实现其对于具体事物的道德规定，从而也将自身得以实现。由此可见，性体的显发过程与人的心灵的实现过程实质上是同一的。性为体，心为用，性与心、体与用实现了统一。这与宋明理学“体用一源，显微无间”⁵⁴的体用观有着相同的理论特征。但要注意到，程朱的“体用”指向道德本体与修养实践的连续性，而刘智的“体用”则以苏菲功修为媒介，要求通过“七品心德”的逐步显化，使“方寸之心”复归于“妙体之心”，最终消融自我以契合真主。这种“体用”观不仅包含道德完善，更追求宗教意义上的“人主合一”，体现了伊儒思想在终极关怀上的分殊。同时，

⁵⁰ 同上。

⁵¹ (清)刘智著，马勇刚主编：《天方性理》释解[M].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56页。

⁵² (清)刘智著，马勇刚主编：《天方性理》释解[M].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62页。

⁵³ (清)刘智著，马勇刚主编：《天方性理》释解[M].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61页。

⁵⁴ (宋)程颢，程颐著：二程集 [M]. 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582页。

其思想亦体现了对理学与心学的中和倾向。众所周知，理学与心学在心性关系上的冲突主要表现为心与性是否等同。刘智在此提出了心与性的双重关系，若分析的言，有形之心与性的确存在差异，但若整体地看，心与性可视为一体。刘智通过语言表述的辩证，间接地调和了理学与心学之间的争议。这一观点无疑为宋明理学提供了新的诠释视角。

综上所述，刘智的心性论是伊儒文明对话的典范。他通过吸收宋明理学的概念框架与术语，将苏菲主义的心性思想转化为中国化的哲学体系：一方面，借“性”的层级划分与“心”的动态功能，调和了伊斯兰的绝对一神论与儒家的内在超越传统；另一方面，通过本体论的置换，实现了宗教体验与道德实践的融合。这种转化不仅丰富了伊斯兰哲学的内涵，也为跨文化哲学建构提供了方法论启示——即在保持核心教义的前提下，通过本土化术语与结构性类比，实现异质思想的创造性转化。这种策略既避免了对儒家思想的简单依附，又以哲学工具深化了宗教表达，为当代文明互鉴提供了历史范本。

参考文献：

- [1] 季芳桐.伊儒会通研究[M].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15.
- [2] 刘智.天方性理释解[M]. 马勇刚，主编.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15.
- [3] 程颢，程颐.二程集[M]. 北京：中华书局，2004.
- [4] 马注.清真指南[M].余振贵，点校.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
- [5] 高东兴.伊儒会通视域下的人性理论[D].银川：宁夏大学，2020.
- [6] 薛莉.心性会通是回儒之间的根本会通——季芳桐教授访谈[J].中国穆林,2017,(03):53-57.
- [7]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 [M]. 北京：中华书局，1986.
- [8]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 [M]. 北京：中华书局，2012.
- [9] 金宜久：中国伊斯兰探秘——刘智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 [10] 季芳桐.天方性理注释、翻译及研究[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22.
- [11] 王岱舆.正教真诠·清真大学·希真正答[M].余振贵，点校.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
- [12] 吴雁.伊斯兰新柏拉图主义研究[J].阿拉伯世界研究,2007,(04):73-80.
- [13] 马文兵,季芳桐.刘智生平考释与思想渊源探究[J].世界宗教研究,2024,(08):112-117.
- [14] 王家瑛：伊斯兰宗教哲学史[M].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

The Metaphysics of Mind in Liu Zhi's Tianfang Xingli: Integrating Islamic and Neo-Confucian Thought

Wang zhengqi¹, Zhang siyu²

¹ Wang zhengqi, Suzho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Jiangsu, Suzhou

² Zhang siyu, Kunm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Yunnan, Kunming

Abstract: Liu Zhi's *Tianfang Xingli* (Celestial Philosophy of Human Nature) establishes the essence of Allah as the ultimate foundation. By delineating the innate hierarchy of "nature" (xing) and designing graded stages of spiritual cultivation for the "heart" (xin), it integrates Song-Ming Neo-Confucian propositions such as "nature as principle," "mind as principle," and "the unity of substance and function" into an Islamic framework of mind-nature theory. Liu redefines "successive nature" (jixing) as the primary manifestation of the Divine Sovereign, thereby reconstructing the ontological basis of "nature as principle." Through the concept of "seven grades of the heart," he harmonizes Sufi spiritual practices with Confucian moral praxis, achieving a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of Islamic-Confucian thought. This synthesis preserves the core tenets of Islamic doctrine while employing structural analogies to reinterpret Confucian mind-nature theory as a tool for articulating religious experiences. The work offers methodological insights for cross-cultural philosophy, demonstrating how doctrinal frameworks can be adaptively reimagined across intellectual traditions.

Keywords: Liu Zhi; Tianfang Xingli; mind-nature theory; Neo-Confucian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2.691

课程—毕设导师制下的 A 校区 B 学院经济学专业本科生科研素养提升效果研究

黄娟¹

(¹ 中国石油大学 (北京) 克拉玛依校区, 新疆 克拉玛依 834000)

摘要: 研究通过定量与定性方法, 系统评估了“课程—毕设”导师制在 A 校区 B 学院经济学专业学生科研素养提升中的效果。研究采用混合方法设计, 定量数据通过统计分析评估科研素养变化, 定性数据通过访谈深入探讨学生与导师的体验。结果显示, 学生科研素养在课程学习期间和毕业设计完成后均显著提升, 且毕业设计完成后采用该模式的学生显著优于传统教学模式学生。定性访谈表明, 学生和导师一致认为个性化指导和实践训练是提升科研能力的关键。“课程—毕设”导师制的优势在于其系统性与持续性的科研训练、个性化指导及实践导向的项目驱动。定量结果验证了该模式通过整合课程与毕业设计, 实现了从理论学习到实践应用的递进式培养; 访谈数据进一步揭示, 导师一对一指导有效解决了学生个体化需求, 而嵌入课程的研究项目增强了实践能力。这些发现与现有文献保持一致, 并通过实证数据和长期效果评估补充了导师制长期影响的证据。然而, 研究也发现实施中的挑战, 包括导师时间与资源不足。为此, 提出加强导师培训、明确职责及设立激励机制等改进建议, 以优化指导质量并确保模式的可持续性。本研究为导师制在经济学教育中的应用提供了实证支持与实践指导。

关键词: 课程—毕设导师制; 经济学专业本科生; 科研素养

一、研究背景

近年来, 随着全球经济环境的快速变化和知识经济的深入发展, 高等教育对学生科研素养的培养愈发受到重视。科研素养, 即理解、开展和批判性评估研究的能力, 已成为衡量学生学术能力和职业竞争力的重要指标。在中国, 国家教育政策明确提出要提升高校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 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然而, 传统的高等教育模式往往以课堂讲授为主, 学生在课程学习中获得的理论知识与毕业设计等实践环节之间存在脱节, 导致学生在独立开展研究时面临困难, 尤其是在需要综合运用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的学科中表现更为明显。

经济学作为一门兼具理论性和实践性的学科, 对学生的科研素养提出了更高要求。经济学研究不仅需要学生掌握扎实的理论基础, 如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 还要求他们具备复杂的数据分析能力、研究设计能力和将理论应用于实际经济问题的能力。然而, 现有研究表明, 经济学专业的学生在科研实践中常常遇到挑战, 例如难以将理论模型与实证数据结合、缺乏独立设计研究的能力, 或在论文写作中论证不够严谨(王军等, 2022)。这些问题部分源于传统教学模式中科研训练的不足, 学生往往在毕业设计阶段才首次接触系统性研究, 缺乏从课程学习到研究实践的过渡性培养。

为应对这一挑战, A 高校在经济学专业中引入了“课程—毕设”导师制。这一模式通过将课程学习与毕业设计整合, 旨在为学生提供系统化、持续性的科研训练。不同于传统模式中课程与毕业设计分离的做法, “课程—毕设”导师制强调导师在学生整个学习过程中的持续指导作用。导师不仅在课程阶段帮助学生掌握理论知识和研究方法, 还在毕业设计阶段提供个性化的支持, 指导学生完成从研究选题到数据分析再到论文撰写的全过程。这种模式的实施旨在弥补传统教学的不足, 提升学生的科研素养, 使其更好地适应学术研究

[作者简介]

[1] 黄娟 (1990—), 女, 四川人, 中国石油大学 (北京) 克拉玛依校区文理学院讲师。

[基金编号: JG2022050]—中国石油大学 (北京) 克拉玛依校区教育教学研究与改革项目

和职业发展的需求。

科研素养的提升对经济学学生具有重要意义。在学术领域，具备科研能力的学生能够更有效地开展独立研究，为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做出贡献；在职业领域，科研素养是经济学毕业生在政策分析、金融咨询、市场研究等岗位中不可或缺的核心竞争力。然而，尽管导师制在高等教育中的应用已受到广泛关注，现有研究多集中于理工科或综合性本科教育，针对经济学专业学生科研素养提升的实证研究仍较匮乏。此外，文献中关于导师制长期效果的评估也较为有限，缺乏对学生从课程学习到毕业设计全程科研能力变化的系统性分析。

基于此，本研究聚焦A高校B学院经济学专业的“课程—毕设”导师制，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旨在评估该模式对学生科研素养提升的效果及其具体机制。通过分析学生在课程学习和毕业设计阶段的科研能力变化，结合学生和导师的访谈数据，本研究将探讨该模式的优势、实施中的挑战及其在经济学专业中的适用性。这一研究不仅为优化“课程—毕设”导师制提供了实证依据，还为该模式在其他学科中的推广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实践参考。

二、文献综述

学生科研素养的培养是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目标，尤其在快速发展的科技与社会背景下，学生需具备批判性思维、研究设计能力和实践创新能力。“课程—毕设”导师制作为一种将课程学习与毕业设计深度融合的教育模式，通过导师指导贯穿学生学术生涯，旨在提升科研素养。现有文献对导师制与高校学生科研素养的研究多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导师制的多样性与应用

现有文献指出导师制在高等教育中的应用呈现多样化特征，适应不同学科与教育需求。王俊彦（2025）研究了高职汽车专业中学术导师制的应用，强调其通过个性化指导促进学生职业素养与技能提升。乔宁等（2025）从“三全育人”视角探讨了地方应用型高校涉农专业的导师制建设，提出优化师生互选与制度保障的策略。张文旭等（2025）在“新工科”背景下分析了产学研协同育人的导师制，设计了以需求为导向的培养模式，增强学生解决工程问题的能力。景丽等（2025）则聚焦产教融合下的“双导师制”，通过校企协同优化人才培养。

这些研究显示导师制能够灵活适应学科特点，但多集中于工学、医学、农学等学科经济学学科的探索不足。“课程—毕设”导师制可通过经济学学科课程与研究项目，填补这一空白，为更广泛的学科提供支持。

2. 导师制对学生发展的影响

现有文献发现导师制不仅限于技能培养，还通过情感支持与职业指导提升学生心理健康与综合素质，对学生学业与综合素质的提升作用显著。刘想等（2025a）研究高职院校项目导师制，发现其通过项目驱动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与实践技能。雷俊安和赵复婧（2025）以湖北文理学院道桥专业为例，提出“四位一体全过程导师制”，实践表明该模式提升了学生的就业竞争力与社会责任感。余丽（2025）探讨了导师制对学业情绪的影响，研究表明师生互动与自我控制显著促进积极情绪，且学业自我概念起中介作用。“课程—毕设”导师制可进一步强化这一作用，利用连续性指导深化师生关系，增强学生科研信心。

3. 导师制在科研素养培养中的作用

科研素养是导师制的重要目标，涉及研究能力、伦理意识与实践应用。邹大威等（2024）研究了本科生导师制在中医综合能力培养中的应用，提出“导心、导学、导向、导行”理念，促进学生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刘民杰等（2025）在智能制造专业中探索基于导师制的培养模式，通过竞赛与个性化指导提升应用型科研能力。刘春玲等（2025）分析了现代学徒制下的“双导师制”，强调校企双导师在理论与实践技能培养中的协同作用。

现有研究显示导师制对科研素养的短期促进作用明显，但缺乏对学生长期科研能力发展的追踪。“课程—毕设”导师制通过将课程学习与毕业设计整合，可提供持续性研究训练，弥补这一不足。

4. 导师制实施中的挑战与创新

导师制实施面临挑战，如职责不清与资源不足。戚佳等（2025）分析“双一流”高校导师制现状，发现导师职责泛化、培训不足等问题。孙振宇和许泽浩（2025）指出激励机制缺失与师生沟通不足的普遍性。创新方面，马月红等（2024）提出“多元双轨导师制”，结合校内外导师提升指导效果；袁成福等（2024）在农

业水利工程专业中优化导师制，适应“新工科”需求。导师制的成功需依赖制度支持与创新设计。“课程—毕设”导师制可通过明确导师角色、融入课程体系并结合校企资源，解决职责模糊与激励不足问题，提升实施效果。

综上所述，导师制在学生科研素养培养中具有重要价值，其多样性与应用效果已在多个领域得到验证。然而，现有研究在长期效果评估、经济学学科应用及量化研究方面仍有不足。“课程—毕设”导师制通过课程与毕业设计的有机结合，为科研素养的系统培养提供了新路径。未来研究可聚焦其长期影响及在不同学科中的适应性，以进一步优化教育改革实践。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旨在评估“课程—毕设”导师制对A高校B学院经济学专业学生科研素养的提升效果，采用混合研究方法，结合定量和定性数据，以确保研究的全面性和深度。

1.定量研究

本文采用纵向研究设计，在学生入学时（T1）、课程学习期间（T2）和毕业设计完成后（T3）三个时间点进行问卷调查，以追踪学生科研素养的变化。选取2021—2023年入学的经济学专业本科生（共计175名学生）作为本文的调研对象。其中，61名学生选修了《面板数据与横截面数据分析》课程并接受“课程—毕设”导师制，作为实验组，另114名学生接受传统教学模式，作为对照组。

测量使用自编科研素养量表，涵盖研究设计能力、数据分析能力、论文写作能力和科研伦理意识四个维度。量表采用李克特五级评分法（1=完全不符合，5=完全符合），经信度检验，Cronbach's α 系数为0.85，具有较高信度。

数据分析采用重复测量方差分析（Repeated Measures ANOVA）考察学生科研素养在三个时间点的变化趋势，并使用独立样本t检验比较“课程—毕设”导师制与传统教学模式下学生科研素养的差异。

2.定性研究

同时，本文采取半结构化访谈法，深入了解学生和导师对“课程—毕设”导师制的体验和评价。从问卷调查的175名学生中随机抽取20名学生，以及参与“课程—毕设”导师制的4名导师进行访谈。学生访谈内容包括对“课程—毕设”导师制的整体体验、科研素养提升的具体表现、对导师指导的评价等。导师访谈内容包括对该模式实施过程的感受、学生科研素养的观察、实施中的挑战与建议等。最后采用主题分析法，对访谈结果进行转录、编码，提炼主要主题。

四、研究结果

1.定量研究结果

（1）学生科研素养在三个时间点的变化

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学生科研素养在T1、T2和T3三个时间点存在显著差异（ $F=120.35, p<0.001$ ）。具体数据如下表所示。

表1 学生科研素养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

时间点	均值 (M)	标准差 (SD)	显著性差异
T1 (入学时)	2.8	0.5	—
T2 (课程学习期间)	3.5	0.45	较T1显著提升 ($p < 0.001$)
T3 (毕业设计后)	4.2	0.4	较T2显著提升 ($p < 0.001$)

注：重复测量方差分析显示三个时间点间存在显著差异（ $F = 120.35, p < 0.001$ ）。

表1的结果表明，“课程—毕设”导师制下学生科研素养在三个时间点均呈现显著提升，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为 $F = 120.35$ ($p < 0.001$)，显示时间对科研素养变化有显著影响。学生科研素养从入学时的2.80 ($SD = 0.50$) 提升至课程学习期间的3.50 ($SD = 0.45$), $p < 0.001$ 。这一阶段的提升可能源于课程中导师的指导，学生开始接触研究方法和经济学理论应用，初步构建科研能力基础。随后，学生科研素养从3.50 ($SD = 0.45$) 进一步提升至毕业设计后的4.20 ($SD = 0.40$), $p < 0.001$ 。这一阶段的显著进步表明，毕业设

计阶段的实践研究和导师的深入指导进一步巩固和提升了学生的科研素养。

为量化这一提升的效应大小, 可计算偏 η^2 (partial eta squared)。鉴于F值较大(120.35), 偏 η^2 可能超过0.14, 表明时间因素解释了科研素养变异的大部分, 凸显“课程—毕设”导师制在持续培养学生科研能力方面的强大效果。这种逐步提升反映了该模式通过课程学习和毕业设计的系统整合, 为学生提供了连续性的科研训练。

(2) “课程—毕设”导师制与传统教学模式的比较

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 在毕业设计完成后(T3), 接受“课程—毕设”导师制的学生科研素养得分($M=4.20$, $SD=0.40$)显著高于传统教学模式的学生($M=3.80$, $SD=0.45$), $t=4.50$, $p<0.001$ 。这表明“课程—毕设”导师制在提升学生科研素养方面具有显著优势。

表2 两种教学模式下学生科研素养得分T检验结果

教学模式	均值(M)	标准差(SD)	t值	p值
“课程—毕设”导师制	4.20	0.40	4.50	< 0.001
传统教学模式	3.80	0.45		

注: 独立样本t检验显示两组在T3时科研素养存在显著差异。

表2显示, 在毕业设计完成后(T3), 接受“课程—毕设”导师制的学生科研素养得分($M=4.20$, $SD=0.40$)显著高于传统教学模式的学生($M=3.80$, $SD=0.45$), $t=4.50$, $p<0.001$ 。两组均值差为0.40, 这一差异在统计上显著且具有实践意义, 表明导师制学生在科研素养上表现出更强的能力。为进一步评估效应大小, 可计算Cohen's d。根据合并标准差0.425, 计算Cohen's d约为0.94属于大效应量(>0.8), 表明“课程—毕设”导师制对科研素养的提升效果非常显著。

上述结果表明, “课程—毕设”导师制在提升学生科研素养方面具有双重优势:

时间维度: 从T1到T3的持续提升显示, 该模式通过课程阶段的基础训练和毕业设计阶段的深度实践, 实现了科研能力的系统性培养。

模式维度: 与传统教学模式相比, 导师制在T3的优异表现凸显了其通过个性化指导和研究实践带来的附加价值。这与经济学专业注重数据分析和实际问题解决的特点高度契合。

导师制的优势可能在于其个性化指导和实践导向。相较于传统教学模式的标准化授课, 导师制通过将课程与毕业设计结合, 让学生在导师的直接支持下参与实际研究项目, 从而更有效地提升数据分析、研究设计和论文写作能力。

2. 定性研究结果

定性研究通过对学生和导师的半结构化访谈, 采用主题分析法提炼出关键主题, 揭示了“课程—毕设”导师制在提升学生科研素养方面的作用及其实施过程中面临的挑战。以下分别从学生和导师的视角展开详细分析。

(1) 学生访谈

学生访谈的主题分析提炼出三个主要主题: 科研能力提升、科研信心增强和实践能力提高。这些主题反映了学生在“课程—毕设”导师制下感知到的多方面成长。

科研能力提升方面, 学生普遍认为, 导师的个性化指导是他们掌握研究方法和数据分析技术的关键。这种指导在毕业设计阶段尤为突出, 学生在研究设计和论文写作能力上取得了显著进步。例如, 许多学生提到, 导师不仅帮助他们明确研究问题, 还指导他们选择合适的研究方法, 如定量分析中的回归模型或定性分析中的案例研究方法。此外, 在数据分析过程中, 导师通过一对一辅导, 帮助学生理解复杂的统计软件操作和数据解读技巧, 例如如何处理缺失值或验证模型假设。这种个性化的支持相较于传统课堂教学更为灵活, 能够针对每个学生的具体需求提供反馈, 从而显著提升其科研能力。在毕业设计中, 学生普遍反映, 他们能够设计出结构更清晰、逻辑更严谨的研究方案, 论文写作的质量也得到了提升, 例如文献综述的深度和论证的说服力都有所增强。这种能力的提升得益于导师制提供的“学中做”机会, 使学生在实践中逐步掌握科研的核心技能。

科研信心增强方面，学生一致表示，导师在课程学习和毕业设计中的持续指导显著增强了他们的科研兴趣和独立思考能力。这种信心提升源于导师创造的支持性学习环境。例如，在课程阶段，导师通过定期讨论和反馈鼓励学生提出自己的研究想法，哪怕这些想法最初不够成熟；在毕业设计阶段，导师的持续陪伴则帮助学生克服研究中的困难，如数据收集的挫折或分析结果的困惑。一位学生提到：“导师让我觉得科研不是遥不可及的事情，我逐渐敢于尝试更有挑战性的课题。”这种从依赖导师到逐步自主的过程，培养了学生的自我效能感，使他们对科研的态度从畏难转为主动探索。此外，导师的鼓励还激发了学生对经济学研究的兴趣，许多学生表示愿意在未来继续从事学术研究或相关职业。这种信心的增强不仅是个体心理层面的成长，更为学生未来的科研道路奠定了基础。

实践能力提高方面，通过课程中嵌入的研究项目，学生能够将经济学理论应用于实际问题分析，从而提升了解决问题的能力。这种实践导向的学习方式使学生深刻体会到理论与现实的连接。例如，在研究与课程相关的项目中，学生可能需要分析某一经济政策对市场的影响，或通过数据模拟评估某一经济变量的波动。这些任务要求学生将课本中的理论（如供需模型或博弈论）转化为可操作的研究方案，并得出有意义的结论。学生反映，这种“做中学”的过程让他们对经济学的理解更加深入，同时也培养了他们应对复杂问题的能力。例如，一位学生提到，他在研究地方经济发展时学会了如何结合实地数据和理论框架提出政策建议。这种能力的提升不仅增强了学生的学术竞争力，也为他们未来在经济分析、政策咨询等职业领域中的实践奠定了基础。导师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引导者的角色，帮助学生选择贴近现实的研究课题，并指导他们将理论与实践无缝衔接。

（2）导师访谈

导师访谈提炼出两个主要主题：教学效果和实施挑战。这些主题反映了导师对“课程—毕设”导师制的积极评价及其在实际操作中的现实困境。

教学效果方面，导师普遍认为，“课程—毕设”导师制通过整合课程学习和毕业设计，使学生的科研素养得到了系统性培养，尤其在数据分析和论文写作方面进步显著。他们指出，该模式的核心优势在于其连贯性：学生在课程阶段学习的理论知识和研究方法，可以直接应用于毕业设计的研究实践中。例如，一位导师提到，学生在课程中掌握的基础数据分析技能（如描述性统计或假设检验），在毕业设计中得到了深化应用（如构建多变量模型或进行时间序列分析）。这种从理论到实践的递进式培养，使学生的科研能力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提升。此外，导师还观察到，学生在论文写作方面的进步尤为突出，例如论文结构更规范、论证更严密，这得益于导师在毕业设计阶段提供的详细反馈和修改建议。相比传统教学模式中课程与毕业设计分离的做法，“课程—毕设”导师制通过长期的师生互动，建立了更紧密的指导关系，使学生能够在一个持续的学习框架内逐步成长。导师认为，这种系统性培养方式不仅提升了学生的科研素养，也增强了他们对科研过程的整体理解。

实施挑战方面，尽管教学效果显著，导师们一致指出，时间和资源有限是实施“课程—毕设”导师制的主要障碍。许多导师表示，由于教学任务繁重，他们难以抽出足够的时间为每位学生提供深入指导，尤其是在毕业设计阶段，学生对导师的需求最为集中。例如，一位导师提到，他同时负责多门课程的教学和多项行政工作，导致每周能分配给每位学生的时间非常有限，这可能影响指导质量。此外，资源不足也限制了导师的支持能力，例如缺乏专门的培训或技术支持，使得部分导师在指导复杂数据分析时感到力不从心。针对这些问题，导师们提出了优化建议：一是加强导师培训，例如开设关于科研指导技巧或时间管理的课程；二是建立激励机制，如通过减少教学负担或提供科研奖励，鼓励导师更积极地投入到指导工作中。他们认为，若能解决这些实施中的挑战，“课程—毕设”导师制的潜力将得到更充分的发挥，从而进一步提升学生的科研素养。

学生和导师的访谈结果共同揭示了“课程—毕设”导师制在提升科研素养方面的显著成效。从学生视角看，该模式通过个性化指导和实践机会，全面提升了科研能力、信心和实践能力；从导师视角看，该模式实现了教学的系统性和高效性，但其成功实施依赖于时间和资源的充分保障。这些发现为优化该模式提供了方向，例如通过加强制度支持和资源配置，进一步放大其教育价值。

五、进一步讨论

本研究通过定量和定性方法，系统评估了“课程—毕设”导师制在 A 校区 B 学院经济学专业学生科研素

养提升中的效果。定量数据表明，学生的科研素养在课程学习期间（T2）和毕业设计完成后（T3）均有显著提升，且在T3时，采用该模式的学生科研素养显著高于传统教学模式的学生。定性访谈进一步支持这一结论，学生和导师均认为该模式通过个性化指导和实践训练显著提升了科研能力。这一发现不仅与文献综述中关于导师制对科研能力提升作用的观点一致（如邹大威等，2024；刘民杰等，2025），还通过实证数据和长期效果评估，进一步验证了“课程—毕设”导师制在持续性指导和研究训练中的有效性。

“课程—毕设”导师制在提升学生科研素养方面的优势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系统性与持续性科研训练

定量结果显示，学生科研素养在课程学习期间（ $M = 3.50$, $SD = 0.45$ ）和毕业设计完成后（ $M = 4.20$, $SD = 0.40$ ）均有显著提升（ $F = 120.35$, $p < 0.001$ ）。这表明，“课程—毕设”导师制通过将课程学习与毕业设计整合，构建了一个系统化、持续性的科研训练体系。与传统教学模式中课程与毕业设计分离的做法不同，该模式使学生能够在课程阶段打下理论和方法基础，并在毕业设计中通过实际研究项目深化应用。例如，学生在课程中学习的计量经济学方法，可以直接用于毕业设计的实证分析，从而实现从理论到实践的无缝衔接。这种递进式培养确保了科研能力的系统性提升，避免了传统教学中知识碎片化的弊端。

2. 个性化指导的关键作用

定性访谈结果显示，导师的个性化指导是学生科研素养提升的核心驱动力。学生提到，导师通过一对辅导帮助他们解决研究中的具体问题，例如优化研究设计、选择数据分析工具（如Stata或R软件），以及提升论文写作质量。这种针对性指导能够快速响应学生的个体需求，相较于传统大班教学更具灵活性和深度。例如，一位学生在访谈中表示：“导师帮我调整了研究问题，还教我如何用软件处理数据，让我少走了很多弯路。”这种个性化的支持不仅提升了学生的技术能力，还增强了他们对科研过程的整体把握。

3. 实践导向的项目驱动

定性数据进一步揭示，课程中嵌入的研究项目使学生能够将经济学理论应用于实际问题分析，从而显著提升了实践能力。例如，学生可能通过分析某一经济政策的市场效应或模拟某一经济指标的波动，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可操作的研究成果。这种实践导向的学习方式与刘想等（2025a）关于项目驱动培养创新能力的观点一致，不仅加深了学生对理论的理解，还培养了他们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此外，本研究通过长期跟踪学生的科研素养变化（从T1到T3），弥补了文献中关于导师制长期效果评估不足的空白，提供了更可靠的实证支持。

尽管“课程—毕设”导师制成效显著，其在实施过程中仍面临一些挑战。定性访谈中，导师普遍反映时间和资源不足是主要障碍。由于教学任务繁重和行政职责较多，他们难以充分投入到每位学生的指导下，尤其在毕业设计阶段，学生对导师的需求最为集中。一位导师提到：“我同时带几门课和多个项目，很难每周都给学生详细反馈。”这种时间压力可能削弱指导质量，影响学生科研素养的提升。此外，部分导师指出，缺乏专门的资源支持（如数据分析软件培训或研究助手）也限制了他们的指导能力。这与戚佳等（2025）和孙振宇和许泽浩（2025）提到的导师职责泛化和激励不足问题相呼应，表明资源分配和职责界定是当前亟待解决的关键。

为应对上述挑战，本研究提出以下改进措施：（1）加强导师培训：学校应定期组织导师培训课程，内容涵盖科研指导技巧、时间管理策略及高级数据分析工具的使用，以提升导师的指导能力和效率。（2）明确导师职责：制定详细的导师职责手册，明确其在课程和毕业设计中的具体任务，避免职责模糊导致的工作重叠或遗漏。（3）设立激励机制：通过教学奖励、减免部分教学任务或提供科研经费支持等措施，激励导师更积极投入。例如，对指导效果优秀的导师可授予“年度优秀导师”称号，或优先推荐其参与科研项目。这些措施旨在缓解导师的时间压力，提升指导质量，确保该模式的长期可持续性。

六、研究结论

本研究表明，“课程—毕设”导师制在经济学专业中具有高度适用性，并展现出跨学科推广的潜力。经济学作为一门注重实证研究和数据分析的学科，要求学生掌握复杂的研究方法和工具。“课程—毕设”导师制通过将课程学习与研究项目结合，为学生提供了将理论知识应用于实际经济问题分析的机会。例如，学生在

课程中学习的微观经济学理论，可以在毕业设计中通过市场数据分析得到验证和深化。定性访谈显示，学生在研究设计（如问卷设计或实验设计）和数据分析（如回归分析或面板数据处理）方面的能力显著提升。这种理论与实践的融合，不仅加深了学生对经济学核心概念的理解，还培养了他们在政策分析、市场预测等领域的实践能力。此外，该模式通过导师的持续指导，帮助学生克服科研中的技术难题，增强了他们的科研信心和独立性，为未来的学术研究或职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当前文献中关于经济学学科导师制效果的实证研究较为稀缺。本研究通过定量和定性数据的结合，系统验证了“课程—毕设”导师制在经济学专业中的有效性，填补了这一领域的空白。与此同时，该研究通过长期效果评估（从课程学习到毕业设计完成），回应了文献中关于导师制缺乏持续性研究的不足，为后续研究提供了理论和实践依据。尽管本研究聚焦于经济学专业，但“课程—毕设”导师制的核心理念——通过课程与项目的整合提升科研素养——具有跨学科的适用性。例如，在管理学专业中，该模式可以将管理理论与企业案例研究结合，帮助学生提升战略分析能力；在社会学专业中，则可以通过社会调查项目的嵌入，培养学生的数据收集和定性分析能力。为实现跨学科推广，可根据不同学科特点进行适应性调整：如在理工科中增加实验设计指导，在人文社科中强化文献分析训练。这种灵活性使该模式具备了在高等教育中广泛应用的潜力。未来，学校可通过试点项目验证其在其他学科中的效果，并逐步推广至整个学术体系。

“课程—毕设”导师制在A高校B学院经济学专业的应用，显著提升了学生的科研素养，并优于传统教学模式。其通过系统性训练、个性化指导和实践导向，实现了科研能力的全面提升，尤其在研究设计、数据分析和论文写作方面成效显著。然而，导师时间和资源有限的挑战需通过培训、职责明确和激励机制加以解决。该模式在经济学专业中的成功实践，不仅验证了其学科适用性，还为其在其他领域的推广提供了借鉴。未来，学校应优化实施机制，扩大应用范围，以进一步推动高等教育中科研素养培养的创新与发展。

参考文献：

1. 王俊彦. (2025). 学业导师制在高职汽车专业个性化人才培养中的应用. *内燃机与配件*, (5), 147—149. <https://doi.org/10.19475/j.cnki.issn1674-957x.2025.05.028>
2. 乔宁, 李守杰, 李法君, & 刘杰. (2025). “三全育人”视域下地方应用型高校涉农专业本科生学业导师制建设探析. *安徽农业科学*, 53(4), 271—273+278.
3. 张文旭, 郭立民, & 蒋伊琳. (2025). “新工科”背景下产学研协同育人的学业导师制培养研究. *工业和信息化教育*, (2), 15—18.
4. 刘想, 毛燕华, & 邢玉娟. (2025a). 高职院校项目导师制实施现状及对策思考. *湖北开放职业学院学报*, 38(2), 65—67.
5. 景丽, 王双, & 刘子祯. (2025). 产教融合背景下“双导师制”的实施效果与挑战探讨. *山西青年*, (3), 147—149.
6. 雷俊安, & 赵复婧. (2025). “四位一体全过程本科生导师制”育人模式的探索与实践——以湖北文理学院道桥专业为例. *湖北文理学院学报*, 46(1), 57—61.
7. 余丽. (2025). 本科生导师制对学业情绪影响的中介效应研究.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43(1), 93—99.
8. 邹大威, 刘长利, 朱智耀, & 高连印. (2024). 本科生导师制对中医综合能力培养的探索与实践——以首都医科大学中医药学院中医学专业为例. *医学教育管理*, 10(6), 669—674.
9. 刘民杰, 吴国鹏, 马超, 张玥, 陈晔, & 康瑜. (2025). 基于导师制的智能制造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探索. *现代农机*, (1), 114—116.
10. 刘春玲, 史洁, & 潘国明. (2025). 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下双导师制实施的研究. *农机使用与维修*, (1), 151—154. <https://doi.org/10.14031/j.cnki.njwx.2025.01.037>
11. 戚佳, 刘继安, & 徐艳茹. (2025). “双一流”高校实施本科生导师制的现状与特征. *黑龙江高教研究*, 43(1), 38—44.
12. 孙振宇, & 许泽浩. (2025). 本科生导师制的实践研究与改进建议. *教育教学论坛*, (2), 13—16. <https://doi.org/10.20263/j.cnki.jyxlt.2025.02.002>
13. 马月红, 崔得隽, & 韩霞. (2024). 多元双轨导师制对青年教师思政能力培养的影响分析. *大学*, (S2), 188—190.
14. 袁成福, 李娜, & 王艳艳. (2024). 新工科背景下农业水利工程专业本科导师制的实践与探索. *智慧农*

Study on the Enhancement of Graduation Research Literacy among Economics Undergraduates at School B, Campus A under the Course-Thesis Mentorship System

HUANG Juan¹,

¹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Science, China University of Petroleum(Beijing) at Karamay, Karamay, China*

Abstract: This study systematically evaluated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Course-Thesis” mentorship system in enhancing the research literacy of economics students at School B, Campus A, using both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methods. The research adopted a mixed-methods design, with quantitative data analyzed statistically to assess changes in research literacy, and qualitative data collected through interviews to deeply explore the experiences of students and mentor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students’ research literacy significantly improved both during the course and after completing their thesis, with students under this model outperforming those in traditional teaching models upon thesis completion. Qualitative interviews indicated that both students and mentors unanimously regarded personalized guidance and practical training as key to enhancing research capabilities. The “Course-Thesis” mentorship system’s strengths lie in its systematic and continuous research training, personalized guidance, and practice-oriented, project-driven approach. Quantitative findings confirmed that this model achieves a progressive cultivation from theoretical learning to practical application by integrating coursework and thesis work. Interview data further revealed that one-on-one mentorship effectively addressed students’ individual needs, while research projects embedded in the curriculum bolstered practical skills. These findings align with existing literature and provide additional evidence of the long-term impact of mentorship through empirical data and long-term effect assessments. However, the study also identified implementation challenges, such as insufficient mentor time and resources. To address these, recommendations include strengthening mentor training, clarifying responsibilities, and establishing incentive mechanisms to enhance guidance quality and ensure the model’s sustainability. This study offers empir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applying mentorship in economics education.

Keywords: Course-Thesis Mentorship System, Economics Undergraduates, Research Literacy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2.539

语料库驱动的网络隐性仇恨言论的语用分析

——以“专家建议”话题评论为例

徐俊扬¹

(暨南大学, 广东 广州 510632)

摘要: 本文基于 KH coder 语料库工具的词汇共现网络功能和言语行为理论, 对网络媒体中关于“专家建议”话题的评论进行分析。研究发现网络隐性仇恨言论存在以谓词为驱动的表现方式, 其语用功能的表现与谓词原来功能不一致, 从而隐性地达成了评论者的目的。

关键词: KH coder; 仇恨言论; 言语行为理论

一、研究背景

1.1 现实背景

2023年1月27日,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国际大屠杀纪念日之际发表讲话, 回顾了这段可怕的历史, 并对当今世界现状表示担忧。他着重提到了“错误信息、偏执的阴谋论和不受控制的仇恨言论 (Hate Speech) (Brown, 2017)”的猖獗, 反犹太主义的兴起以及白人至上主义和新纳粹主义意识形态的扩散, 世界必须对“蛊惑人心的仇恨声音”保持警惕。同一天, 在白宫举行的农历新年招待会上, 针对最近在亚洲社区发生的两起大规模枪击事件, 美国总统拜登承认反亚裔仇恨犯罪的增加, 并指出亚裔社区期间所经历的“深刻的仇恨、痛苦、暴力和损失”。

可见, 仇恨言论这一现象在国际社会深受重视且具有极大的潜在危害:一方面, 仇恨言论的发生促使了暴力的煽动, 多样性和社会凝聚力的破坏;另一方面, 仇恨言论的发酵威胁到国际社会急需凝聚的共同价值观和原则。

近期, 我国主流社交媒体——新浪微博关于“建议专家不要建议”、“年轻人为什么不爱听专家建议”、“年轻人反感专家问题究竟出在哪”等话题走热, 话题底下频频出现各种看似温和却令人寒心的评论, 而这些“温和”的评论的点赞数和回复量都相对较高, 这意味着我国网络仇恨言论现象也处于发酵状态。

1.2 网络仇恨言论研究回顾

近几年, 关于网络仇恨言论的研究基本集中在国外英文期刊的发表, 主要分为宗教、人权、性别和政治四大类, 不同类型的网络仇恨言论都带有其特有的意识形态特征, 包括伊斯兰恐惧症 (Islamophobia)、另类右派 (Alt-Right) 和白人民族主义 (White Nationalism) 等 (Castaño-Pulgarín et al., 2021)。在仇恨言论的表达上, Răileanu (2016)着手于宗教话题探讨仇恨言论发布者的言语特征以佐证当事人普遍与其他人存在对事件的不同看法, 并且这种特立现象的表现会在社交网络上被放大。Sundén 和 Paasonen (2018)在设身处地地观察和分析关于女性的网络仇恨言论后发现相关话语倾向于羞辱的表达方式。Trajkova 和 Neshkovska (2018)在研究出于政治目的的仇恨言论中发现事主偏好于扮演分析人员或是仲裁者来表达负面评论并对他人施以权力和支配。He et al. (2021)收集不同种类的言论并分析得出仇恨言论和反言论 (Counterspeech) 的相互关系, 印证了反言论对减少仇恨言论的积极效应。Parvaresh (2023)通过大量语料的观察发现网络仇恨言论的形式和意义都表现得比较隐晦, 并根据语用功能来尝试对相关言论作具体分类以为后续研

作者简介: 徐俊扬 (1998—), 男, 广东东莞人, 暨南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语料库语言学。

究其隐晦特征为参考。本研究基于前人的研究基础,以言语行为理论为指导,尝试对我国媒体相关语料做语料库数据整理和语用分析,并就相关现象提出菲薄见解。

二、研究设计

2.1 研究问题

本文考察我国主流社交媒体中相关话题的评论并作语用分析,主要研讨以下三个问题:1)网络隐性仇恨言论的相关表现形式及语义特征;2)相关话题中的网络仇恨言论者的具体攻击对象3)网络隐性仇恨言论行为的意义。

2.2 语料来源

哔哩哔哩弹幕网(Bilibili),简称B站,是中国的一个弹幕视频分享网站,其建立初衷为给用户提供和谐而干净的弹幕视频分享平台。B站用户年龄层主要集中在出生于1990-2009年区间的Z世代群体(Generation Z),青年用户倾向于凭借着匿名性、互动性极强的弹幕及评论功能达成情感认同(糜舒涵,2020)。为此,笔者选择收集该网站中两则视频的一级评论作为语料制作语料库,视频分为1)央视网的2011年春晚相声《专家指导》建议专家们多看、2)央视网快看的央视网评为何年轻人越来越反感“专家”,经语料库工具识别共计2154条中文语料。

2.3 研究工具和理论

KH coder(樋口,2016,2017)是一款用于定量内容分析和文本挖掘的免费软件,可对中文(简体中文)、法语、英语、日语等多种语言进行分析处理,并预置词性赋码和可视化数据分析功能,从形式和意义上帮助我们做进一步的文本分析。其中共现网络图(Co-Occurrence Network)能根据Jaccard系数对词与词之间(根据词性划分不同词类的词)关系及频率信息绘制图标,并根据不同颜色划分相应的“关系社群”(subgraph)。

Searle在Austin所提出的言语行为三分说(顾曰国,1989)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直接言语行为(Direct speech act)和间接言语行为(Indirect speech act)的区别。其中,直接言语行为即部分言语行为可直接实现交际目的,而间接言语行为的交际目的需要通过另外一个言语行为表达时(何兆熊,1984)。

在多语篇的具体分析过程中,一方面语料库语言性能提供自下而上的量化分析数据的视角,从而补足在文本纵深分析中的人工观察语料中存在的短板;另一方面,语用分析为量化研究所遗留的问题提供理论兜底和细化探究,进而高效地完成语篇分析目的。

三、研究过程

3.1 词汇共现网络分析

用KH coder语料库工具加载观察语料库,对语料库进行词性标记并生成词汇共现网络,如图1所示:

根据图1,围绕“专家”的关系群最多紧密,主要包括不、建议(Verb)、媒体、说、都,可以看出相关评论主要涉及专家的一些行为措施,并且“不”与“专家”的关系比较密切,似乎表现出对“专家”的相关行为的持有否定态度较多,具体观察下如下关系排名前三的索引行(concordance):

(1)“不”与“专家”的关联语境:

1)但很多媒体的专家没加名字,也不知道是哪个专家,或者就是几句话,专家是流量的代名词。

2)专不专家的我分得清,相比起来我更关心春晚节目能不能按这个水平(对“专家建议”的讽刺性话题内容)办。

3)专家建议:以后自媒体的标题不要使用“专家建议”。

4)(专家的相关事务)我根本不管,相声界各种什么争来争去的,跟我没一毛钱关系,我只想看到好节目。

5)这是一个我认为很复杂的,需要双向努力的问题。有时候不是专家的问题
从中可以观察到,“不”在整体的语境中表现出消极的语义韵(Sinclair,2004:34),对“专家”的身份、建议、责任等相关事项存在怀疑和不确定,而这种所谓“怀疑和不确定”的模糊性概述似乎又藏有更深层次的语用表达。令人欣慰的是,其中部分评论也用“不”来表达出视频内容的理性存疑,从中也可发现与之相符的语义表达,如“需要双向努力”,体现出对“专家”现实表现抱有期待的语义倾向(甄凤超,20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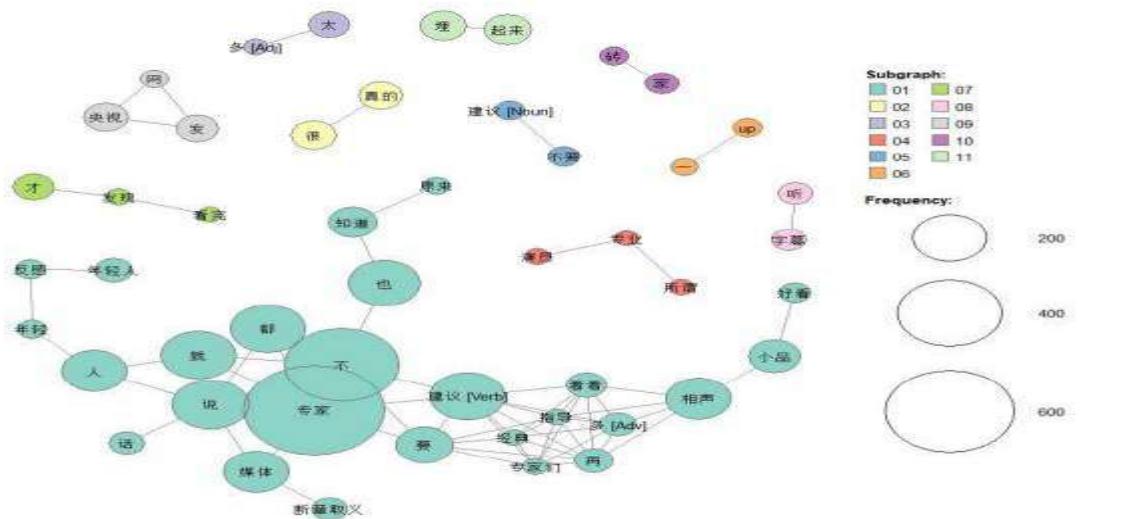


图1 观察语料库的词汇共现网络图

注：图片中的横线颜色深浅代表关联强弱程度，深为强，浅为弱；图片中的圆的大小代词频高低，大为高，小为低（不包括最小的圆的词频比较），不同颜色的圆代表不同的关系群（subgraph）。

（2）“建议（Verb）”与“专家”的关联语境：

- 1) 你是不是上错号了（指官方媒体所播放的内容与日常内容主题不一致的现象，即对“专家建议”话题的讽刺视频），那些专家建议有一半都是你发的，左右互搏流量吃的饱饱的
- 2) 建议辞典里取消专家二字，以后直接用本名
- 3) 建议专家们多看看2011兔年春晚相声《专家指导》（对“专家建议”的讽刺性话题视频），重温经典，建议专家不要再建议。
- 4) 近期那些离谱的“专家建议”大多都是媒体断章取义……
- 5) 不是不要专家指导，是建议不要那么多伪专家！

从关联索引能察觉出，“建议”周围的语境辐射出来的大多呈现出消极的语义韵，即对“建议”的否定和批判等相关态度，而2)、3)中的“建议”在语境中似乎表现出与语境外（汉语词典）中的“建议”中阐述出来的态度不一致，这与5)中的“建议”的语用表达好像有点偏差。

（3）“媒体”与“专家”的关联语境：

- 1) 但是，专家说的话很多时候的确被各种媒体肢解得支离破碎，受众得到的都是碎片。
- 2) 很多头衔都不是国家和国际的更像是自己编的，而且网上还有很多自媒体自称“专家”。
- 3) 专家现在在大众眼里这么不靠谱，和断章取义的媒体也有很大关系
- 4) 其实不一定是专家，现在自媒体随便说句话，就被传成专家
- 5) 我提议以后以后自媒体引用专家的话时，必须做应用出处注释，否则一律按照谣言不过审

显然，在关联“媒体”和“专家”的相关语境中呈现的语义倾向多数指向对“媒体”的任意妄为的批评，如“肢解得支离破碎”、“自称”、“随便说句话”等，

中间的“媒体”与“专家”似乎本就是对“矛盾”，两者所传达的或其利益所向彷彿对不上。再回到图1中找到“媒体”，其词汇共现关系中相邻的就是“断章取义”，那么与“媒体”矛盾的“专家”的语境义似乎与其语境外（词典）的本义相匹配了，即群众对专家的认可语义表达。

3.2 语用分析

经过上述“专家”的词汇关联网络整理和具体语境分析可以简单看出多数评论者对“专家建议”话题的大致看法和态度倾向，但其中还存在部分意思模糊的表达需要深入话语内容进行剖析。我们抽取从上述分析中存惑的话语：

- （1）建议专家们多看看2011兔年春晚相声《专家指导》（对“专家建议”的讽刺性话题视频），重温经典，建议专家不要再建议。

句子中的“建议（Verb）”所显现的语义与具体的语用功能相斥，“建议”的本义是针对一个人或事件提出自身合理的见解或意见，使其向着更积极的方向发展，其语用功能是积极的，而这里第一个“建议”是让受事者去接受一个对其自身影响不好的事物——讽刺性话题视频，这明显与“建议”的出发点相违背。第二个“建议”出现在第三个“建议”之前，“专家”是第二“建议”的受事

者, 按照“建议”原来的语用功能解释——“不要再建议”是评论者对受事者“向积极方向发展”的驱动, 而第三个“建议”所驱动的成分本应也是积极的, 而“不要再建议”明显否定了第二个“建议”所带来“积极方向”的驱动的解析, 因此第二个和第三个“建议”所呈现的语义与其原本的语用功能也是相斥的。可见, 整段话语所呈现的是话语的间接引语功能, 评论者通过这种“违背”话语规则的表达方式间接地表达出对专家建议的讽刺和专家身份的贬毁, 属于仇恨言论的隐性表达。

(2) 专不专家的我分得清, 相比起来我更关心春晚节目能不能按这个水平(对“专家建议”的讽刺性话题内容)办。

此处从谓词“分”(区分)、“关心”和“办”(举办)来探讨, “分”所引导的小句呈现的语义是对“专家身份的真伪”的了悟, 功能是推动话语向进一步话题发展或避谈相似话题, 体现评论者对“专家身份的真伪”话题的冷漠态度。“关心”的施事对象是春晚节目, 并且评论者对春晚节目的愿望是按“这个水平”举办, 而材料中的“水平”是“专家建议”的讽刺性内容的表现方式, 体现了对这类话题的娱乐性的赞誉, 语用功能是表达对相关话题内容的肯定的态度。该则评论中两个小句通过呈现的相反语用功能表达了对专家身份的漠不关心, 而对讽刺专家话题的内容报以热忱, 间接表明了评论者对专家的冷嘲热讽, 同样属于隐性仇恨言论的表达方式。

四、总结

本研究以使用了语料库工具中的词汇共现网络以分析网络仇恨言论的基本表现方式和具体目的, 并结合言语行为理论对话语的表层和深层语义语用价值做进一步的剖析, 发现其中存在着仇恨言论的隐性表达, 回答了本文所提出的三个问题:

(1) 网络隐性仇恨言论的表现形式存在以谓词为驱动推动话语表现具体语用功能的趋向, 语义特征多数表现为具体语境内的谓词语义与谓词原有语义发生偏差。

(2) 相关话题中的网络仇恨言论者的具体攻击对象一般为话题对象, 但也存在与其关联的其他对象, 比如词汇共现网络中的“媒体”也被予以攻击对象的身份。

(3) 网络隐性仇恨言论行为的意义是根据其话语的语用功能所驱动的, 大多评论者都是对目标对象进行“攻击”行为, 这种行为的表现在很大程度释放了评论者的情绪, 从而引起媒体及社会层面的关注, 推动更进一步的发酵反应。

本文所搜集的语料是来自官方媒体账号的视频评论, 相较于其他评论渠道, 该渠道对于评论中带有的“攻击性”的评论包容度较低, 因此其自身普遍带有攻击性言论的自动或人工的筛选过滤机制, 除去了大多与仇恨言论相关的评论内容, 但本研究通过语料库数据整理和语用分析发现其中仍有一些“温和”的仇恨言论。笔者认为, 这种隐性仇恨言论现象的发生也表明了在“讲文明, 树新风”的背景下仇恨言论在发酵的同时也发生了演化, 评论者在释放情绪的过程中以隐性的表达方式有效地过渡到大多官方正式媒体平台。对于这种转变, 笔者建议应当加大相关规定限制。虽然不否认互联网确实需要一定程度的包容性, 但长时间的隐性仇恨言论的发酵和演化可能会产生新的不可控因素, 对于这样的不可控因素, 相关机构应该提前做好引导和控制以建立良性、可持续发展的网络文明生态。

参考文献:

- [1] Brown, A.(2017).What is hate speech? Part 1: The Myth of Hate.Law and Philosophy, 36(4), 419–468.<https://doi.org/10.1007/s10982-017-9297-1>
- [2] Castaño-Pulgarín, S.A., Suárez-Betancur, N., Vega, L.M.T., & López, H.M.H.(2021).Internet, social media and online hate speech.Systematic review.Aggressive and Violent Behavior,58,101608.<https://doi.org/10.1016/j.avb.2021.101608>
- [3] Răileanu, R.C.(2016).Religion-Based User Generated Content in Online Newspapers Covering the Collective Nightclub Fire.Roman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and Public Relations, 18(2), 55.<https://doi.org/10.21018/rjcp.2016.2.2090>
- [4] Sundén, J., & Paasonen, S.(2018).Shameless hags and tolerance whores: Feminist resistance and the affective circuits of online hate.Feminist Media Studies, 18(4), 643–656.<https://doi.org/10.1080/14680777.2018.1447427>
- [5] Trajkova, Z., & Neshkovska, S.(2018).Online hate propaganda during election period: The case of Ma

- cedonia.Lodz Papers in Pragmatics, 14(2), 309–334. <https://doi.org/10.1515/lpp-2018-0015>
- [6] He, B., Ziems, C., Soni, S., Ramakrishnan, N., Yang, D., & Kumar, S.(2021). Racism is a virus: Anti-asian hate and counterspeech in social media during the COVID-19 crisis. Proceedings of the 2021 IE EE/ACM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dvances in Social Networks Analysis and Mining, 90–94. <https://doi.org/10.1145/3487351.3488324>
- [7] Parvaresh, V.(2023). Covertly communicated hate speech: A corpus-assisted pragmatic study. *Journal of Pragmatics*, 205, 63–77. <https://doi.org/10.1016/j.pragma.2022.12.009>
- [8] 麋舒涵. (2020). 新媒体环境下的青年亚文化狂欢——以哔哩哔哩弹幕网为例. *传媒论坛*(10), 157-158.
- [9] 樋口耕一. (2016). A Two-Step Approach to Quantitative Content Analysis: KH Coder Tutorial using Anne of Green Gables (Part I). *立命館産業社会論集 = Ritsumeikan Social Sciences Review*, 52(3), 77–91.
- [10] 樋口耕一. (2017). A Two-Step Approach to Quantitative Content Analysis: KH Coder Tutorial Using Anne of Green Gables (Part II). *立命館産業社会論集 = Ritsumeikan Social Sciences Review*, 53(1), 137–147.
- [11] 顾曰国. (1989). 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 诠释与批判. *外语教学与研究*, (1), pp. 30-39, 80.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name=cjfd1989&filename=WJYY198901014&dbcode=cjfd>
- [12] 何兆熊. (1984). 英语语言的间接性. *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学院学报)*, (3), pp. 11-15.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name=CJFD1984&filename=WYXY198403002&dbcode=CJFD>
- [13] Sinclair, J.(2004). Trust the Text: Language, Corpus and Discourse (R.Carter,编). Routledge, 34. <https://doi.org/10.4324/9780203594070>
- [14] 甄凤超. (2022). 词项框架下话语对象的意义建构及其路径分析. *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 45(2), pp.37-46.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name=DKFX2022&filename=WYXY202202004&dbcode=DKFX>.

A Corpus-driven Pragmatic Analysis of Implicit Hate Speech on the Internet: A Case Study on the topic of Experts' Advice

Xu Junyang

College of Foreign Studies,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Chin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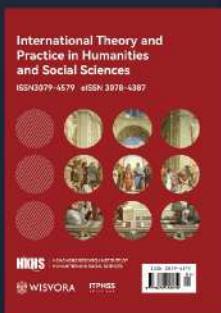
Abstract: The paper analyzes comments on the topic of "experts' advice" in online media based on the lexical relational network function of the KH coder corpus tool and speech act theory. It is found that online implicit hate speech exist a predicate-driven expression, and its pragmatic function shows inconsistent with the original function of the predicate, thus implicitly achieving the reviewer's illocutionary purpose.

Keywords: KH coder; Hate Speech; Speech Act Theory



WISVORA 出版社：专注于学术出版管理，WISVORA 出版社提供期刊编辑、论文出版和国际索引、期刊创办、期刊托管等服务，增强学术研究的全球传播和影响力。

www.wisvora.com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刊

由香港人文社会科学院主办的一本中英文学术期刊致力于为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者提供一个高质量的学术交流平台。本刊重点关注学术研究中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应用，旨在探讨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的核心议题，促进知识的广泛传播与共享。作为一份面向全球中文学术界的专业期刊，本刊倡导跨学科、跨文化视角的学术探讨，为学术界和实践领域之间搭建桥梁，推动社会科学知识的进步与应用。

Online ISSN 3079-4552
Print ISSN 3079-4552

ISSN 3079-4552



9 773079 455255



学术赠阅

权责声明

期刊所刊载的评论、意见、观点等均出自文章作者个人立场，不代表本出版社的观点或看法。对于文章任何部分及文内引用材料给任何个人、机构、及其财产所带来的任何损失及伤害，本出版社均不承担任何责任。我们郑重声明，本出版社的出版业务，不构成对任何产品商业性能的保证，也不表示本社业已承认本社出版物中所述内容适用于某特定用途。如有疑问，请寻找专业人士协助。